



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

陈夏红 编撰

The Chronicles of
Prof. Chien Tuan-sheng Vol. I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

①

陈夏红 编撰

The Chronicles of
Prof. Chien Tuan-sheng Vol.1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北京

不以欲而害学。学者，吾唯一之希望也。

——钱端升

目 录

· 上 册 ·

- 1 | 1900 年 (0 岁)
- 1 | 1905 年 (5 岁)
- 1 | 1910 年 (10 岁)
- 2 | 1911 年 (11 岁)
- 2 | 1912 年 (12 岁)
- 2 | 1913 年 (13 岁)
- 3 | 1914 年 (14 岁)
- 3 | 1915 年 (15 岁)
- 4 | 1916 年 (16 岁)
- 4 | 1917 年 (17 岁)
- 5 | 1918 年 (18 岁)
- 6 | 1919 年 (19 岁)
- 7 | 1920 年 (20 岁)
- 8 | 1921 年 (21 岁)
- 9 | 1922 年 (22 岁)
- 10 | 1923 年 (23 岁)
- 11 | 1924 年 (24 岁)
- 13 | 1925 年 (25 岁)

2 | 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上）

- 41 | 1926 年（26 岁）
63 | 1927 年（27 岁）
75 | 1928 年（28 岁）
85 | 1929 年（29 岁）
87 | 1930 年（30 岁）
95 | 1931 年（31 岁）
99 | 1932 年（32 岁）
101 | 1933 年（33 岁）
105 | 1934 年（34 岁）
257 | 1935 年（35 岁）
264 | 1936 年（36 岁）
270 | 1937 年（37 岁）
299 | 1938 年（38 岁）
334 | 1939 年（39 岁）
368 | 1940 年（40 岁）
393 | 1941 年（41 岁）
404 | 1942 年（42 岁）
421 | 1943 年（43 岁）
442 | 1944 年（44 岁）
453 | 1945 年（45 岁）
468 | 1946 年（46 岁）
475 | 1947 年（47 岁）
486 | 1948 年（48 岁）
492 | 1949 年（49 岁）

1900年(0岁)

2月25日

钱端升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

【1900年我生于当时江苏省属松江府，今属上海市上海县的钱家塘。家中世代以行医为生，但母亲和祖母们，除家务外，也操耕织。】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4页。

1905年(5岁)

钱端升开始接受启蒙教育。

【1905年，是旧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和新学兴起的一年。是年父亲和伯父们开始教我读书认字，接着就在家乡读私塾，直到1910年夏。1908年，即我八岁前，只勉强能背诵《四书》《史鉴节要》《诗经》《左传》和《唐诗三百首》部分篇章，由于同族各家延聘了一位圣约翰毕业的先生当塾师，兼授国文、数学、英文、史地等科目，使我耳目一新，进步颇大。】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4页。

1910年(10岁)

钱端升就读于敬业学堂，读小学。

【1910年下半年我随堂兄到上海城内就读于敬业学堂，……】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64 页。

1911 年（11 岁）

钱端升转入养正学堂，继续读小学。

【1910 年下半年我随堂兄到上海城内就读于敬业学堂，一年后又转入养正学堂，至 1912 年冬小学毕业。】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64 页。

1912 年（12 岁）

冬

钱端升小学毕业。

【……至 1912 年冬小学毕业。】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64 页。

1913 年（13 岁）

春

钱端升考入松江（江苏）省立三中。

【1913 年春考入松江（江苏）省立三中，四年后毕业。】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64 页。

1914年(14岁)

1915年(15岁)

12月

在《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校校友会杂志》发表汉译英习作《作息》。

【作息】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乃为人之正理

今城市之人日高未起

此时农家唱歌笑乐耕田已数亩矣

城市之人深夜入戏园酒肆劳精疲神

此时农家安卧已久矣

故城市之人寿者少而夭者多

乡下之人强者多而弱者少

无他 乡下之人早眠早起 能多得日光清气故耳

日光清气养生最要之物也。

It is our proper rule of action to work when the sun rises, and to rest when the sun sets,

Now townspeople are still in bed, when the sun is high up in the sky.

At this time, peasants have already ploughed several acres, and are merrily singing their ditties.

Persons in the city go to theaters or restaurants late at night. Consequently, their energies and spirits become weary and exhausted. But in the meanwhile the peasants have been sound asleep for a long time. So few of the townspeople enjoy a long life; most of them are short-lived. Many of the country people are strong; few of them are weak. This for no other reasons than that country people have plenty of sunshine and fresh air by going to bed and getting up early.

Sunshine and fresh air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one's life.】

——钱端升：《汉文译英：作息（中英文对照）》，载《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校校友会杂志》1915年12月，第1期，第7-9页。

据《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校校友会杂志》1915年第1期所载学生信息，钱端升属于三年级甲班，字爱青，16岁，籍贯上海人，住址为“塘湾乡双溪里”，通讯地址为“上海曹行镇杨信盛号转交”。

——《在校学生姓氏录》，载《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校校友会杂志》1915年12月，第1期，第3页。

夏红注：这篇文章可能是钱端升署名发表的最早文章，当时作者身份为江苏省立第三中学三年级甲班学生。笔者认真拜读《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校校友会杂志》，有如下整体印象：第一，钱端升于中学时代并未表现出在政治、法律专业方面的早慧，因为已有其他同学在校刊里发表大量的时评文章。第二，钱端升在中学时代，在体育方面的成绩亦不算突出，该校刊里运动会成绩，均无钱端升相关信息。第三，这篇文章系英文翻译习作，说明钱端升此时英文水平在同学中尚可。

1916年（16岁）

钱端升转学上海私立南洋中学。

【为了投考名声颇著的清华学堂，1916年我转入师资很深的上海私立南洋中学，插入五年级，次年夏毕业。】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4页。

1917年（17岁）

7月

与江苏省立三中同学蔡振，共同在《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杂志》发表

《平板测量用之照准器之制作法：附图》一文。

照准器亦即俗话说的水准尺。就这篇《平板测量用之照准器之制作法》而言，是一个通过玻璃管、木板、螺丝钉等制作成平板测量中的照准器。文中记载，测量术“所需器具，如三足架、照准器、卷尺、标杆之属，大都可以手工制造。其中照准器之构造，稍微复杂，曾于实验之际，合二人之力，积十时之功，制成照准器一具。使用数次，尚无不合”。蔡振、钱端升遂将制造方法与同学分享。

——蔡振、钱端升：《平板测量用之照准器之制作法：附图》，载《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杂志》1917年7月，第2期，第58-60页。

8月

钱端升参加清华入学考试。

【……次年夏毕业，报考清华，即被录取。】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4页。

【1917年7月的高等科插班生考试，有310人报名，其中上海176人，北京134人。这次考试亦令考生直接报考所要插入的班级。考试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行，由王文显等老师主持。考试结果，录取80名，录取率约为26%。另外，专科生有28人报考，录取7人。】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5页。

1918年(18岁)

3月31日

在《清华周刊》发表《联邦制可否行于中国论》一文。

本文申论联邦制是否适用于中国。钱端升的答案是完全否定的。在短文中

钱端升指出，主张在中国推行联邦制者，姑且不论其是否有私心，而仅以利弊看，则结论十分明显。联邦制利在自治、息纷，而弊在力分、统领难具人，“据此以观，利轻弊重，联邦制之不良已可概见”。钱端升更进一步表示，考诸历史，“数小邦联为一邦者有之，未有以统一政府而退为联邦者”。钱端升略述德、美国史后，更加确信：“夫以德美俱中心势力之强，行联邦制尚无亡国之虞而亦有趋于统一之倾向，孰谓以毫无中心势力之中国而可以退行联邦制哉！”钱端升认为中国当前的问题根源，不在制度之优劣，而在国人“乏德行”、“乏知识”，“苟国人而知守法，即人人守一最劣之法，其纷扰当不至于如今日。若能守现行之法，行现行之治，复乌至有今日之纷扰哉！”钱端升更是得出结论，“吾敢曰，联邦不及统一，不可行于中国，而欲救今日之纷扰，在根本之教育，不在政体之如何也。若不图其本，勉行斯制，吾既恐其不能实行；即能实行，吾又恐德美之长不可得而争攘扰乱或且视今日而尤甚哉”。

——钱端升：《联邦制可否行于中国论》，载《清华周刊》1918年3月31日，第133期。

1919年（19岁）

5月4日

钱端升参加五四运动。

【北大政治系教授钱端升说，三十年前的“五四”，我正在清华高等学堂四年级读书，“五四”运动我是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是五月四日下午的事，我们清华同学五五才进城的，贴标语与北平学生会联系。整个的五月都是在动荡中，五四运动当时在北平有两个高潮，六月三日清华学生全体进城游行宣传，这次被捕的人很多，光清华就有二十多人，被关在北大理科大楼里，后来又一起关到北大法科大楼（现在的三院），被监禁的一共有一千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一直到八号我们才由清华全体同学迎接回校。六月十五日在上海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北平也派代表许德珩等出席。】

——柏生：《几个“五四”时代的人物访问记》，载《人民日报》1949年5月4日。

8月

钱端升清华毕业，赴美留学。

【二年清华转瞬即逝，1919年获官费赴美留学。】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4-565页。

9月

抵达美国，插入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四年级读政治学。

【……1919年获官费赴美留学。第一年我插入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四年级读政治学，翌年夏获文学学士学位。】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4-565页。

1920年(20岁)

春

钱端升在北达科他州立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第一年我插入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四年级读政治学，翌年夏获文学学士学位。】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页。

暑期

钱端升就读于密执安大学政治系。

【……翌年夏获文学学士学位。暑期就读于密执安大学政治系，旋去哈

佛大学。】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页。

9月

钱端升开始求学于哈佛大学。

【……暑期就读于密执安大学政治系，旋去哈佛大学，所学各课属历史、政治和经济三系合成科目，偶尔也旁听哈佛法学院一些课目。】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页。

【自1920年9月初进哈佛到1923年12月离去，在哈佛共三年两个月。】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页。

【所开设的课程虽然不多，但内容精博，……】

——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6页。

9—12月

在哈佛大学期间，完成如下两篇论文：

1. *Are there Inherent Political Rights of Man?* (《人的政治权利存在吗?》)
2. *Freedom of Speech* (《言论自由》)

——钱端升：《钱端升主要著作目录》，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3—574页。

1921年（21岁）

3月

在哈佛大学完成英文论文 *The Open-door Policy of China* (《中国的门户开

放政策》)。

——钱端升：《钱端升主要著作目录》，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4页。

4月

在哈佛大学完成英文论文 *The United States Commerce Court* (《美国的贸易法庭》)。

——钱端升：《钱端升主要著作目录》，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4页。

不详

在哈佛大学学习。完成英文论文 *Rider Legislation in Congress* (《国会中立法的附加条款》)。

——钱端升：《钱端升主要著作目录》，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4页。

1922年(22岁)

1月

钱端升完成哈佛硕士课业。

【1922年1月我完成硕士课业，同年6月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页。

在哈佛大学完成英文论文 *Thomas Hart Benton and the Public Lands* (《托马斯·哈特·本顿和公共土地》)。

——钱端升：《钱端升主要著作目录》，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4页。

4月

在哈佛大学完成英文论文 *James Harrington*（《詹姆斯·哈林顿》）。

——钱端升：《钱端升主要著作目录》，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4页。

春

赴华盛顿数周，查阅资料并为博士论文搜集资料。

【1922年春又赴华盛顿数周在国会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向参众两院的书记长和若干委员会的主席请教国会委员会的权力与进行工作的具体情况，以便较好地完成《议会委员会——比较政府研究》这一研究论文。】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页。

6月

钱端升获得哈佛文学硕士学位。

【1922年1月我完成硕士课业，同年6月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页。

1923年（23岁）

8月14日

完成英文博士论文序言。

——T. S Chien, Preface, See at: T. S Chien, *Parliamentary Committee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Govern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 American Congress, French Chamber of Deputies and German Reichsta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23.

11月

钱端升完成博士所有学业并通过所有考试。

【1923年11月完成哲学博士所需课业并通过了各种考试，并于1924年夏获得博士学位。】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页。

12月初

钱端升离开哈佛大学。

【自1920年9月初进哈佛到1923年12月初离去，在哈佛共三年两个月。其间，除暑假在佛蒙特州立大学学习拉丁语和西班牙语外，1922年春又赴华盛顿数周在国会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向参众两院的书记长和若干委员会的主席请教国会委员会的权力与进行工作的具体情况，以便较好地完成《议会委员会——比较政府研究》这一研究论文。这三年又两个月确是我一生学习较顺利，较有成就的一段时间。】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页。

1924年(24岁)

春

漫游欧洲各国半载，访问英法德奥诸国学者、议会、议员及工作人员，熟悉了某些大图书馆。

【结束哈佛的学业后，藉校长罗威尔先生的介绍函筒，我漫游欧洲各国半载有余，就教于英、法、德、奥某些宪法或政治学教授、学者，访问了各

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同时熟悉了某些大图书馆的情况。】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页。

夏

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1923年11月完成哲学博士所需课业并通过了各种考试，并于1924年夏获得博士学位。】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页。

5月

启程返国，历时月余。

【1924年5月，结束了近五年的游学生涯，东返祖国，六月初抵达上海。】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页。

秋

执教于清华学堂。

【1924年秋，我开始任教于清华，并在此后的二十八年中，主要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1924年，我来到清华，先是担任教员。】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页。

11月

在《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发表书评，评介 Dr. Julius Hatschek 的 *Deutsches und Preussisches Staatsrecht* 一书。

该书共两本，由柏林 George Stilke 书店于 1922 年至 1923 年出版。

据钱端升介绍，讲德国国家法的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颇有两三本，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聊胜于无。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政局大变，制度维新，原有的作品亦失去其存在的依据。而讨论现行德国国家法的作品，Julius Hatschek 的作品为第一部，“其价值盖可见矣”。钱端升对这本书的评价分为如下三个主题：

- 一、Hatschek 的方法；
- 二、此书之组织；
- 三、评述。

——钱端升：《评 Deutsches und Preussisches Staatsrecht》，载《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4 年 11-12 月，第 3 卷第 1 期，第 139-149 页。

在《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发表书评，评介 Malborne W. Graham 的 *New Governments of Central Europe* 一书。

该书于 1924 年由纽约 Henry Holt 公司发行，近 700 页。

钱端升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疆土大变，各国政制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英德法的出版物中，有关德国政府的著述颇多，而其他中欧国家的政制则极少涉及，由此，“此书之价值如何估值勿论，要可供多少资料”。据钱端升介绍，该书内容仅限于继承德奥两国的诸国，由俄罗斯、土耳其分裂出来的诸多国家，还有巴尔干半岛诸国，暂为涉及。钱端升介绍该书体例和内容后指出，该书“于历史沿革则可胜任，于政府之组织及其机关之活动，殊欠确切之摹写、有识之推论”。

——钱端升：《评 *New Governments of Central Europe*》，载《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4 年 11-12 月，第 3 卷第 1 期，第 153-156 页。

1925 年 (25 岁)

1 月 2 日

在《清华周刊》发表《清华改办大学之商榷》一文。

据钱端升为该文所撰按语，该文系他本人前不久致大学筹备委员会会长意见书（英文）的中文节译稿。而钱端升翻译发表的初衷，则是因为“意见书上后，未窥全豹者，误解兹多”。孙宏云在编辑《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时选入该文，但系节选本。

钱端升此文针对清华改办大学问题，提出若干点意见：

第一，清华应先办文理科大学，“再逐渐凑于完美”，开设哲学、史地、政治、经济、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物理化学、自然科学、数学等，“择要先教，量时度力而扩张之”；文理科的学习年限，应定为四年。

第二，中国社会之堕落，根本原因在于“读书知礼”之人太少。钱端升认为，经史文章及格物致知之书，才属于“读书知礼”之术；按照士、农、工、商的习惯分类，农工商皆可前往专门学校学习，而士人教育则只能在大学完成，“士愈多，则世愈盛，而国愈治；反是，则世愈衰，而国愈乱。此万世不易之理，盖即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之意也”。钱端升指出，英国重视士人教育，故其操政权者“其操行高人一等，故政界绝少鄙污之事”；美国多农工商流，故“虽国强民富，而政调总带鄙俗之气，鬻官营私之事，往往倾动全国”。在钱端升看来，中国的太平之世与今日的污浊不堪，所差主要也在士林茂盛与否，故“今后教育方针，当以造就若干士人为急务，量力所及，以广士林；数十年后，数百年后，全国之人皆为士人；农工商人亦先为士人，而后再为农工商；以礼义为本，以技术为用，国运可昌，否则殆矣”。

另外，钱端升特别澄清，并不是说职业教育不重要，而是说士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同等重要，“生为今日之中国人，若能读万卷书，即不出于中国本有之经史子集，本于愿已足”。若更欲博通中外，问礼于东西之书，若是在吾国几无适宜之校可入，盖因无适宜读书之地基读书之法在也。育士人、张学风，世界各国俱有著名学府可寻；中国纵然北大自称最高学府，但较之世界各国的著名学府，能不自愧也难，“清华无志发展则已，如有之，则当以此为矢，此高程度之文理科所以不可少也”。

第三，清华大学在文理科之外应设何科，应视大学之教育范围而定。钱

端升的意见是“大学教育首以造就读书知礼之士人，次则予此种士人以一种专门之学问”。职是之故，钱端升提出，“吾国现时，何者为专门学问，可为大学之分科，何者为技术，当另设专校，尚无定论，俟定后，清华当照力量之所及，继续添设分科。如国内缺少技术学校，亦可酌量添设。但此时亦以全副精神办理一完美之文理科”。

第四，清华大学应顺应世界潮流，男女兼收，不存偏见。“中国男子欲读书知礼，几无大学可入，女子更无论矣。若男子当读书知礼，女子亦当读书知礼无疑。故清华将来不为好大学则已，若为好大学，则不特男子当来此，女子亦当来此也。”基于可行性考虑，钱端升甚至对女生宿舍问题作出规划。

第五，清华改办大学后，新旧学生待遇应完全一致，即给予新生、旧生大体一致的留洋机会，既确保学问优长的旧生可以继续出洋深造，而新生中的优秀者，亦可出国留学，“若旧生全体出洋，而新生不出洋，或即出洋，而仍须与他校毕业生比试，则清华恐永不能得相当之好学生”。

——钱端升：《清华改办大学之商榷》，载《清华周刊》1925年1月2日，第333期，第1-14页。

【1月2日，钱端升《清华改办大学之商榷》，载《清华周刊》第333期（此文为《大学筹备委员会会长之意见书》之译文，原文为英文）。文中说：“清华改办大学时，应具下列各端之考虑：

（一）所拟办之大学为中国今日所需要者；

（二）改办大学之计划可实行者；

（三）本校财力可以支持所拟办之大学；而该大学可充量利用本校已有之房舍、器物、教师、职员者；

（四）改办大学后学生不论新旧，均不受不公正待遇。”】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月9日

彭光钦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两头制”管见》，就清华改办大学

事宜回应钱端升的《清华改办大学之商榷》一文。

【“两头制”管见

彭光钦

读钱端升先生《清华改办大学之商榷》一文，知校内外均不乏怀疑清华采用“两头制”之人。愚以为清华大学与清华学校不但并行不悖，且有非两者并行不可之势，此所以清华在最近之将来不能不采用两头制以为过渡也。

欲知清华之应否行两头制，必先考清华学校与清华大学之性质。苟其性质相同，则以“独头制”为宜；盖办理较易，而经费又较节省也。苟其性质不同，则不可“削足适履”，以办理较易或经费较省二强两性之不同之学校混而为一。金铁合炉而冶，智者必知其不可也。

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校也；清华大学为完全大学，造“领袖人才”之学校也。惟其为留美预备学程为辅，故其授予毕业生之课程，为预备留美之课程，以能与美国大学课程衔接为主，而以国学及关于国情之课程为辅；学生所受之训练亦重适合美国大学生活之训练，俾在美国能多得学识，归国后多有所贡献。惟其为完全大学造领袖人才也，故其课程以适合国情、适合国家需要为主。其学生所受之训练，亦以适合养成国家需要之人才，训练适合本国社会生活之人民；两者性质之不同有如此也。

欲今后清华采用独头制，非独理有所不可，势亦有所不能。盖现已在校之学生所受之课程及训练，与国内其他中学或高中所受者大大不同。苟驱旧生以随新生，则不但前功尽弃，抑且恐终日伏案尚难追随；苟驱新生以随旧生，则不但所学者与其所已学者，且听英文讲演已成第一困难，离年招来之新生，中学毕业插入二中三尚不能追随者不少其人，即以此固。故曰欲强清华采用独头制乃势所不能也。

怀疑清华采用两头制者，大都由于与清华情形隔膜，不顾事实，以理想裁判是非。苟稍悉清华情形的或不致有所怀疑也。】

——彭光钦：《“两头制”管见》，载《清华周刊》1925年1月9日，第334期，第4-5页。

钱端升因约女孩跳舞，被《清华周刊》作为新闻报道。

【新年跳舞会 王酌清、钱端升两博士，陈雋人、吴汉章、徐志邻三先生，曾约请女友多人，于旧历除夕赴北京饭店之新年跳舞会。翩翩翔舞之中，“读书知礼”之钱博士，尤承诸女友之青睐云。】

——佚名：《新年跳舞会》，载《清华周刊》1925年1月9日，第334期，第12页。

4月

在北京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发表《新近宪法中立法行政两机关之关系》一文。

根据钱端升的题注，该文系根据对丹麦宪法、墨西哥宪法、苏俄宪法、芬兰宪法、德意志宪法、秘鲁宪法、捷克斯洛伐克宪法、爱沙尼亚宪法、奥地利宪法、南斯拉夫宪法、曹锟宪法、土耳其宪法等最近十年来颁布的宪法综合研究的成果。这十年新宪法中尚有乌拉圭宪法，但钱端升未能找到该宪法文本。

在该文中，钱端升特别就最近十年来诸国新宪法中有关立法和行政机关关系条文详加对比，借此明确立法、行政机关关系的变迁，同时预测将来的趋势。

钱端升认为，传统对政制的三分法——总统制、内阁制、委员制并不甚明确，而钱端升将近代政府分为四种：国会政府分峙制、国会政府协行制、国会专权制以及政府专权制，同时将之巧妙地比喻成人类之兄弟、夫妇及母子关系。钱端升兹就下述主题展开论述：

第一，政府对国会之势力。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行政机关关于立法机关成立及开闭时所操之权，涉及议员之委任、行政人员兼任议员、国会之召集、国会之闭会、国会之解散；第二种为行政人员于立法机关立法时所操之权，涉及政府大政方针之宣示、建议权、参加讨论权、投票权、法律之裁可及公布。

第二，国会对政府之势力。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行政机关之置废及行政人员之任免权，第二种涉及行政者。共涉及行政机关之组织、行政首领之推选、阁员之任免、内阁之责任、大政方针之通过、问难权、查问权、弹劾权、用决议案以干涉行政、财政权之参与、缔结条约权之参与、宣战媾和权之参与、常任委员会等等。结论为行政机关之设置及行政人员的任用，有脱离国会干涉的趋向；从行政机关看，国会权力有所增加。

——钱端升：《新近宪法中立法行政两机关之关系》，载《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5年4-6月号，第3卷第3期，第389-409页。

4月3日

现代文化史教授陈达请假离校，钱端升等代课。

【教授代庖 现代文化史教授自陈达先生请假离校后，由钱端升、谭唐、朱彬元、张鑫海等诸先生继续代理。上星期钱先生第一次演讲已毕。由谭唐先生演讲，美国现在文化情形。先生诙谐百出，仍不失其大笑话家之资格，听者莫不兴趣高烈云云。

该班论文迟交现已得现实许可，延期至春假后云云。】

——佚名：《教授代庖》，载《清华周刊》1925年4月3日，第342期，第23-24页。

5月

是时清华大学部正式成立。

【本年所聘教员：历史：钱端升（兼英文）。】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5月9日

钱端升首次出现在吴宓日记中。

【上午，乘火车入城，访严继光，未遇。即赴忠信堂宴客（梁漱溟未到）。

12M. 忠信堂，宴客：王国维，姚华，黄节，梁漱溟，姜忠奎，钱稻孙，张彭春，张鑫（应为歆，夏红注）海，钱端升，陆懋德，杨宗翰，吴宓。

下午二时散。】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23页。

5月25日

吴宓造访钱端升。

【晚，在王文显处谈。又在歆海，端升处谈。歆海谓宓办《学衡》为“吃力不讨好”，不如不办。乃谓《现代评论》，作者以文登其中为荣。又谓宓为“中世之圣僧”云。噫！】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页。

6月9日

吴宓日记云钱端升辞去。

【此间诸人，殊鄙琐。歆海去矣，端升亦辞。学者不容，相率以去。殊可忧也。】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页。

6月18日

在上海完成《租界惨杀国人案交涉方法》一文。7月2日发表于《晨报副刊》之“沪案特号”。

就沪案僵持问题，钱端升提出两步走策略：

第一步，为争体面，亦为解决先决问题，重在速决，不得已时用兵亦在所不惜。这类问题有下列逐项条件：第一，租界解严，一切警备均撤退；第二，释放因此案而被羁押的国人；第三，英政府向中国政府正式道歉；第四，英政府承认并赔偿死者及受损失者；第五，英国宪兵涉嫌直接杀人伤人

者，先行解职，依法惩办；第六，中国民众的爱国行为在法律轨道内，英政府不得抗议。

第二步，为争实利，重在谈判，能得一点是一点。有下列各项：第一，道歉的程序、赔偿之根据及方法等先决问题予以保留；第二，直接激发此次事变的事项：租界内立法及行政权、上海之领事裁判权。

钱端升进一步申言，为求交涉成功，国内各界须一致对外，积极筹款以维持暂时失业的工人，另外还需要加强对外宣传，给予英国经济上的打击。钱端升认为工商学联合会及总商会的交涉条件太过繁琐，且部分与此案毫无关系，外交当局并无全部采纳的必要。

另外，就交涉人员安排，无论是安排外交部主办还是特派大员主持，均无问题，但需要任命得力人选，现任五位交涉者并非上上之选。钱端升提出如下三步：其一，由京内商学政法外交各界推举二三十人，组成沪汉案委员团，监督且会同外交部办理；其二，由外交部向英国大使提出先决问题，解决沪汉案，且通知领事团领袖以原来的照会内容；其三，以后步骤亦按照钱端升建议进行。

——钱端升：《租界惨杀国人案交涉方法》，载《晨报副刊》1925年7月2日，沪案特号，第4-6页。

7月

在《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发表书评，评介 Marcel Prelot 的 *La Representation Protesio inelle dans l'Allemagne Contemporai* 一书。

该书由巴黎 Editions Spes 出版社于1924年出版。钱端升指出，对于德国新宪法中的“经济会议”，作为欧洲战后一种新的政治组织，“是应职业代表的新要求新原理而发生的”，先前学界并没有太多的研究。除了先前评介的 Finer 的书外，Prelot 这本书是另外一本。钱端升概括，这本书主要聚焦于四大部分内容：其一，经济会议的历史根据和前驱；其二，宪法会议中解决经济代表问题的方法；其三，临时经济会议的成立和工作；其四，经济会议

的将来。钱端升指出，外界误解德国新宪法第165条规定的经济会议是新组织，其实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俾斯麦时期；只是因为德国的政党妒忌，所以从1920年开始，很长时间以来只能设临时经济会议。而德国经济会议1922年亮相后又沉寂，钱端升援引该书作者的意思，“这是因为德国经济团体的组织还不够强固，所以政客们胆敢将宪法165条置诸脑后，不去奉行”。

——钱端升：《评 La Representation Protesio inelle dans l'Allemagne Contemporai》，载《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5年7-9月，第3卷第4期，第595-598页。

在《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发表书评，评介 H. E. Barnes 等人的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一书。

该书由纽约 A. A. Knopf 出版社于1925年出版，近600页。据该杂志的编者按，鉴于该书内容涉及各种社会科学的过去、现状及其趋势，除引论外共11章，每章均由专门作者撰写，分别讨论一种科学。故《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的书评，亦由不同学者分别完成：史学、人文地理学、文化的人类学诸章，陈翰生执笔；生物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高仁山执笔；经济学、政治学、法理学等，钱端升执笔。

依据上述分工，钱端升重点评论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一书中经济学、政治学和法理学部分。

就经济学而言，钱端升指出，经济思想史是本章作者 K. W. Bigelow 的重点，有如下六点批评意见：其一，用现代经济的方式去批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难免削足适履，过于牵强，“这本书并不是经济思想史专书，更无包括 Plato 和 Aristotle 的必要”；其二，该作者忽略 Bodin 的经济学，而就阿奎那的论述大说特说，舍本逐末；其三，对威廉·佩蒂的作品关注不够；其四，作者对古典经济学派推崇备至，但该学派为何未能久存，解释不够，“若说他们是被历史派所攻破罢，那么老经济学派的理论在当代史很有根据的，历史学派绝不能因时势变迁而诋他们不合时宜的。他们最大的弱点，还是因为他们的论辩不圆到，……”；其五，老经济学派在美国流布

很广，但著作对相关代表性学者的代表性作品完全未提及；其六，作者对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学派的解析，还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解析，不够到位，隔靴搔痒。钱端升特意引用了作者的观点，“近来经济学家偏向统计和数量的研究；或许经济学和数学的接近，是经济学变成科学的一种趋向罢”，但未加臧否，看得出来钱端升是支持还是反对。

就政治学而言，钱端升亦指出，政治思想史在该章中占据大半，著者要在三十多页中展示两千多年的政治思想史，“简陋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著者除了这种当然的弊病外，还患了详简不均的弊病”。钱端升似乎对作者归纳的政治学不能成为一种科学的原因很感兴趣，特意概括了如下四点：其一，政治学术语多为日常习语，不宜称为专有术语；其二，政治现状无法控制，无法实验；其三，政治学相关的学科如社会学，亦未达到科学的地方；其四，讨论政治不能常处客观地位，不时得指点改良政治，违反科学独立的精神。

就法理学来说，钱端升指出，该章作者罗斯科·庞德是美国当代的法学宗师，“他是社会学派的一个大领袖，但是其他派别的学说，若新康德派，他也十分有研究的，能表同情的”。钱端升对庞德大加赞赏，认为其他章节作者太偏重思想史，而忽略学问本身的发展；但庞德却能够脱此窠臼，其“法律学史”一段，分别论述各个派别，“不但是诸派的思想，而且诸派的方法，都能说出。”而鉴于庞德是社会学派的翘楚，故对社会学派的学说方法说得更为透彻精详。在钱端升看来，庞德这篇 1.5 万字的文章，“是一篇又浅显而又有价值的文字”，唯一遗憾的就是庞德并未去考问法理学是不是科学，“也许他不以法理学为科学罢，因为他的目标是伦理的；也许他和一般法理学家，像 Holland 等，一样把法律看作一种形式上的科学罢”。

——陈翰笙、高仁山、钱端升等：《学术书籍之介绍与批评：H. E. Barnes and Others: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载《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5年7-9月，第3卷第4期，第598-609页。

7月2日

在《晨报副刊》之“沪案特号”发表《租界惨杀国人案交涉方法》。

——钱端升：《租界惨杀国人案交涉方法》，载《晨报副刊》1925年7月2日，沪案特号，第4-6页。

7月10日

钱端升造访吴宓。

【午，钱端升来。】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3页。

7月26日

钱端升造访吴宓。

【下午，钱端升来，述日前散海宴胡适，胡因 Winter 之询，对宓嘲笑之语。宓境殊危，但亦当坦然处之耳。】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9页。

7月30日

钱端升访吴宓、吴宓赴钱端升家。

【夕，钱端升导钱昌祚来。即赴钱端升室中，钱君请宴。晚，在其处与赵学海、竹白远伦等谈。】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1页。

8月10日

吴宓与钱端升一道进城。

【下午三时半，偕钱端升乘火车（头等）入城。】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5页。

秋

清华大学改办成大学，钱端升成为清华大学教授。

【1925年秋，清华首次招收本科，自后逐步成为一所完全的大学，我也随之而成为教授。】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页。

9月11日

在《清华周刊》发表《论学潮》一文“赠新旧诸生”。

在这篇短文中，钱端升明确表达了反对学生罢学而参与学潮的立场。欲抑先扬，首先承认国民之救国义务，继而指出青年学子绝非一般国民，“学生生于此不幸之中国，万不得已而至于旷学费时，以救国干政，已非万全之计；以学生而反对某为校长、某为教长，即令其人真万恶不赦，仍虞得不偿失；若假救国干政之名，而行罢课之实，或号召趋附，徒作党派之争，则学生之罪在不道矣”。钱端升特别强调，“学生之本务在求学，士为邦本，求学即所以厚国力；废学救国，辍诵干政，政何以良”。钱端升历数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历次学潮，指出学生之奔走呼号对于外交、对于民气，或许有提掖之功，但“所得能否补学问上之损失，则未可知也”。由此种种，钱端升认为“罢学非计，鹜外伏危”，故不惮辞费，将罢课行为斥为“自杀式之罢课”，在新学期开始之际，勉励新旧学生切勿“牵入无谓之学潮”。钱端升在短文中更是提及其1925年6月对于学生罢课发表的意见：“学生对五卅责任，在示威，在宣传，俱当于课余或假日行之，俾可持久；即不获已而出于罢课，亦当限于一日之长。迨时清华学生会，以与各校一致行动故，不欲违学联合会之罢课决议。然一致行动，以在理为限，不在理者绝不能盲从。”

——钱端升：《论学潮赠新旧诸生》，载《清华周刊》1925年9月11日，第24卷第1期（总第350期），第10-15页。

9月11日

为清华旧制部学生开设世界史、比较政治课程。

——《学校新闻·普通科》，载《清华周刊》1925年9月11日，第24卷第1期（总第350期），第29页。

9月18日

在《清华周刊》发表《过分之安分守己》一文再度“赠新旧诸生”。

在此文中，钱端升论及，清华十余载毕业校友六七百，最大特色为“平稳”。“平稳”二字的含义，具体可褒可贬，可褒者则学生安分守己，不闻外事，孜孜求学，平平淡淡；而可贬者，则无声无息，不分是非，万念俱灰，平淡无奇。钱端升似乎更看重“平稳”的贬义，认为清华的诸多因素造成了这一特征：其一，学校以预备留美教育为职志，缺少个性发展之可能；其二，学校初创时，教职员不易招揽，因陋就简，至今如此；其三，学校由外交部主管，外交部跋扈骄横，“稍带任何色彩之人，不令之来，来亦难留”，平稳度日已数年；其四，学生为出洋孤注一掷，与出洋无关者皆不闻不问。对于此“平稳”弊端的克服，钱端升认为，归根结底还是要“是者当是，非者当非”，“教员讲学时，疑者问之，非者驳之，学生之问难，为教师最大值答报，不问不驳，非事师之道也。……天下事必有是非，学问亦然，能是是而非非，斯为真学者；得过且过，只求心是人之是，而不敢明非人之非，实乃为学之大障”。在文末，钱端升勉励学生以彻底自勉，而力戒平稳；钱端升认为，因学潮而荒废学业，或因过度平稳而安分守己，均为不及，还望学生能有所改革。

——钱端升：《过分之安分守己》，载《清华周刊》1925年9月18日，第24卷第2号（第351期），第11-13页。

10月

在《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发表书评，评三本书，分别是 Leon Duguit 的 *Trait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的第4、5卷，Maurice Hauriou 的 *Precis Elementair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Joseph-Barthelemy et Paul Duez 的 *Traite*

Elementair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钱端升指出，这三本书都是法国宪法学研究中的佳作，作者也都是声誉卓著的大家。其中狄骥的 *Trait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前三卷已由王世杰教授在该杂志第2卷第1期中评述。

钱端升这篇书评对三本书既有总评，也有分评。

在总评部分，钱端升指出，这三本书的方法大同小异，基本都是历史的、比较的、客观的。但三部书中立论不同之点甚多，钱端升列举如下：其一，主权问题；其二，内阁对参议院负责问题；其三，参议院审理危害国家罪时的权限问题；其四，总统加入党争漩涡问题。

在分评部分，钱端升认为狄骥的《宪法学》包罗甚分，为近年各相关学科必读的杰作；但其再版虽然比第一版篇幅大增，但立论和框架仍然大致不变，参考书目亦未有必要的增删，有关参考资料比较陈旧。而奥利欧作为法国行政法、国家法的巨子，这本书将之前的《宪法学大纲》抽精华而成，“持论稳健，取材精审，尤为初学者的一本入门好书。”巴退尔米教授的专长在于法国式宪法学，而这部《宪法学要论》却未能发挥其特长。

——钱端升：《评 *Trait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Precis Elementair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和 *Traite Elementair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载《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5年10月—1926年3月，第4卷第1、2期合刊，第290—298页。

10月5日

吴宓宴钱端升等。

【6: 30 P. M. ——Yamen。宓宴客：戴志骞先生、文人，王文显，庄则宣先生、夫人，何林一先生、夫人，Mr. Winter, Mr. Jameson, 钱端升，张歆海。】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8页。

10月14日

曹云祥提出辞职，引发清华新一轮校长之争。张彭春拟接任，遭到钱端

升等反对。

【钱端升(1900-1990)是北大在清华的一颗种子,惟此时尚未发芽。】

【桥川时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北京: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年),734页。钱端升是上海人,1917年插班清华,1919年毕业于美国北达科他大学法学学士,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返国后先后任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然后才转任清华的。他自觉并非清华之主流派。在学校认同上,他倾向北京大学,所以说他是北大在清华的一颗种子。】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9页。

【首先让我们看看究竟是哪些人反对张彭春接任校长,为什么要反对他,他们心目中的人选是谁,以及各种势力如何展开活动。据张彭春自己分析,反对他的是清华校内一个H.H.教员社团(此名全称尚查不到),其组成分子为钱端升、庄则宣、吴宓、王文显、陈达、叶企孙与一个叫T.L.(不知其名)的野心家,除了王文显都是清华的少壮派。其中T.L.是曹云祥有意培养的接班人,可是张彭春说他是“乱分子”,善于使用手段,写匿名信,制造学校不安,以保送自己上宝座者。清华少壮派知道张彭春和南开的密切关系,又怀疑他与北大“太接近”,尤其是胡适。张自己也承认“想联合北大南开来同黄炎培、郭秉文战”,和清华毕业生争这块地盘。曹云祥说清华少壮派所以反对张彭春,是因他专制、冷傲、量小、猜疑心重、不近人情、不让人、好走极端、好唱高调,又不能中西兼通。】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0-81页。

【校内H.H.集团钱端升等曾去拜访外交总长沈瑞麟,强烈反对张彭春,欢迎胡适。因胡不肯来,改推梁启超,请徐志摩出面,表示“若有反对,H.H.包办担任疏通”工作。梁启超则表示愿意支持张彭春,“然而到必要时,也愿意为学校牺牲”。可见梁启超亦有意校长一职。不过,亦有反对之声。曹云祥谓梁外务太多,对他失望。在H.H.集团中,T.L.和留英的王文

显亦有意竞争，惟得不到充分支持。如此一来，近两个月来的校长人选问题，仍是一个僵局。】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2页。

10月31日

写《对俄问题致勉己书》一文。后载11月3日《晨报副刊：社会》。

——钱端升：《对俄问题致勉己书》，载《晨报副刊：社会》1925年11月3日，第5期，第1-3页。

11月3日

在《晨报副刊：社会》“对俄问题讨论号（二）”发表《对俄问题致勉己书》一文。

钱端升坦言，此文是应《社会》约稿而写。除了约稿因素外，钱端升觉得《社会》对苏俄问题的讨论“煞是有趣，我有时也忍不住技痒，想凑几句话；我所以不敢率尔说乎啊，是因为研究苏联的事情，实在太不容易了”。

钱端升将他的问题分为两层：其一，帝国主义有没有赤白的区别？其二，对苏联的政策应该怎么样？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钱端升指出这是陈启修文章的题目，隐含与陈启修辩论之意。钱端升认为陈启修的文章过于“玲珑”，在帝国主义中嵌了财政资本进去，又说苏联没有财政资本嫌疑，然后用没有财政资本嫌疑的苏联代替赤色国家，最终得出结论说赤色的国家当然不会发生帝国主义。接下来钱端升对陈启修文章中帝国主义的定义以及共产国家有没有资本侵略的可能两个问题，逐个驳斥。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钱端升指出，帝国主义是中国仇敌，但假设世界上只有中国和甲乙两国，甲乙两国均为帝国主义且互为仇敌，那么中国也可以与侵华稍缓和的帝国主义做朋友。按照这个逻辑，钱端升得出结论：“亲苏

联去反对帝国主义完全是一种利害的关系，与改良内政不相干。”至于一般民众担心的苏联对中国内政的捣乱，钱端升认为这种不利的宣传“一大半是仅仅在不自然的、多疑的、中帝国主义毒的心理上存在，实际上是没有这回事”。钱端升指出，在有人实实在在指出苏联乱华之前，他认为“苏联是应当亲的”。

——钱端升：《对俄问题致勉己书》，载《晨报副刊：社会》1925年11月3日，第5期，第1-3页。亦见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民国十五年）》，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57-166页。

11月19日

吴宓访叶企孙、钱端升。

【陈达来，谈及校事。

夕，与叶企孙、钱端升谈校事。在其处吃饭。】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7页。

吴宓日记11月18日载：

【晨，庄则宣来，谈及曹校长将赴英国，拟荐张彭春自代，而张继任，恐校内发生冲突，难以和衷共济。故拟设法抵制，并推陈锦涛来任校长各情。宓以张继任，苟能捐弃前嫌，礼贤下士，开诚布公，则亦幸事。如其不能，则外方继任之人，似范源廉为宜。宓本不喜卷入世间，故此事亦拟不参与。惟静待自然之变迁。即张任校长，如竟不能相容，则亦只有另求枝栖，自行所志而已。呜呼！世事之多变也。】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6-97页。

夏红按：此亦即表明校长继任人选之争，应该是11月18日之后的事情。而苏云峰所谓10月14日曹云祥辞职一说法，前后相差月余，存疑。

11月20日

在《清华周刊》第24卷第10期发表《帝国主义有无赤白的结论》简

目，注明原文发表于《晨报副刊》。

【帝国主义有无赤白的结论

- 一、帝国主义不限定是经济的；
- 二、共产主义与整合之的帝国主义不是不相容的；
- 三、苏俄既然不是共产国家，两种帝国主义都有发生的可能；
- 四、苏联既然算赤色国家，她的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赤色帝国主义。

见晨报副刊。】

——钱端升：《帝国主义有无赤白的结论》，载《清华周刊》1925年11月20日，第24卷第10期（总第359期），第34页。

另，据本期《清华周刊》所发表之“教职员新闻”，钱端升出席大学教职员关税自主会，当选为中文宣传股副主任。

【能者多劳 大学教职员关税自主会已于上周宣告成立，我校出席者有曹庆五、张歆海、钱端升、叶企孙诸先生，会中选举职员，我校张歆海先生当选为西文宣传股主任，钱端升先生当选为中文宣传股副主任云。（清）】

——佚名：《教职员新闻》，载《清华周刊》1925年11月20日，第24卷第10期（总第359期），第25页。

11月24日

吴宓与钱端升等商讨校长事。

【11-12在北院六号，与张（歆海）、庄（则宣）、钱（端升）、叶（企孙）协议校长事，拟由同人表示，推（一）范（二）梁（三）周（四）王文显（五）马寅初等为校长。即起草中英文宣言。在其处吃饭。】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0页。

11月27日

《清华周刊》报道钱端升等参加大学普通科筹备会事宜。

【政治外交门 政治外交门亦于上星期内，由专门科主任庄先生邀请钱

端升、余日宣、朱雨润、郑麀、刘崇鉉诸先生于专门科办公室开会讨论。课程方面，除欧洲国际现状外，并注重日本及俄国政治外交情形。闻拟学外交者必须了解法文，学政治者，拟于最后一年中以部分时间研究中国固有地方制度云。】

——佚名：《大学专门科筹备处》，载《清华周刊》1925年11月27日，第24卷11号（第360期），第15页。

11月30日

钱端升、张歆海造访吴宓。

【上午，张歆海、钱端升来谈。

夕，与庄则宣同访张歆海。】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3页。

12月1日

在北平《晨报》“七周年增刊”上发表《治外法权问题》一文。

该文纵论中国治外法权的裁废问题。欲裁废，必先了解治外法权本身的含义及来龙去脉，钱端升在文章第一部分着重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归纳出治外法权的五点三类。三类者，即完全由外人处理者、外官处理而华官观审以及华官处理而外员得观审者。

由此研究，钱端升在第二部分发现“八十年来，外人步步欺凌，无所不至，凡非条约所赋予，而外人实际上享受者”，亦比比皆是：其一，外人观审已变成外人会审；其二，华官观审之制早被废弃；其三，租界开设以来，华人间诉讼及华洋诉讼，均被外人找借口行使管辖权；其四，享受治外法权的国家不以条约为限，几乎见者有份；其五，外人在华所享有的治外法权本仅限于程序法，如今程序法、实体法均为外人霸占。

钱端升在第三部分对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在华治外法权做了详细梳理，得出两点结论：首先，外籍领事馆大多不懂

法律，但依然行使司法权，甚至有如意大利等国聘请别国人员担任法官，“法律不一致，审查费时日，证据不易得，执行不方便，凡此虽外人亦不能隐饰”，“外人以此朽败之司法行政自欺，而尚诋吾国司法之不良，亦正见其责己宽而责人严耳。吾国司法纵不良，吾国法官纵无识，决不至视领事裁判及领事而更劣”。钱端升申言之，治外法权之有害于中国，更是罄竹难书：其一，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外圈不能实行；其二，华洋诉讼中，外籍法官多厚洋人薄华人；其三，华官审理案件，外人参与会审，华官权不得伸；其四，外人扰乱治安，而华官无可奈何；其五，部分老奸巨猾之辈躲入租界，为中国政府之患；其六，不肖华民假借外人旗帜，冒享治外法权。

基于此，钱端升在第四部分提出，“治外法权至今已为十手所指、十目所视之弊制”。而其收回问题，巴黎和会未予讨论，华盛顿会议不过一纸空文，只有司法调查委员会东来一事得到落实。钱端升指出，调查委员会既然来了，无法拒绝，那么中国代表“应十分注意于治外法权之现状，将越权之事，尽情暴露，将领事法院腐败之处，极力考察；如是，则调查结果，或转足为我利也”。而至于治外法权之收回，有两部分：违约行使之治外法权，应立即取消；条约允许之治外法权，可以分为两种：要么直接宣告废除，要么与各国重订条约。钱端升特别提及，鉴于英美日法“实为东亚之横暴者”，故需与上述四国共订条约，否则只要其中一个国家不放弃治外法权，其他国家亦不可能完全放弃。而对于条约所允许的治外法权，钱端升提议中国应以商约为诱饵，重订条约；囿于中国国贫民弱，“吾只能以恐吓及民气，收回利权，而绝不能以利权换利权也。若因此而酿起国际争端，则诉之于海牙国际法庭可也”。

——钱端升：《治外法权问题》，载《晨报·七周年增刊》1925年12月1日，第12期，第72-85页。

【12月1日，钱端升《治外法权问题》，载《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12月2日

钱端升访吴宓。

【四时，钱端升来。又赴钱处谈，至晚饭时。】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4页。

12月3日

在清华学校普通科做演讲《政治学》。该演讲稿经章熊记录，发表于1926年1月1日《清华周刊》，署名为“钱端升博士讲，章熊笔记”。相关内容概要，见1926年1月1日相关条目。

——钱端升：《政治学》，载《清华周刊》1926年1月1日，第24卷70号（总第366期），第1-6页。

——孙宏云：“编者注”，载孙宏云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2页。

12月4日

在《清华周刊》发表《清华学校》一文。

据《清华周刊》编者按载，本文的前半部分曾在北京《晨报》刊载，读之者莫不奔走相告，先睹为快，可谓一纸风行。《现代评论》亦向钱端升约稿，而《清华周刊》记者认为，“与其发表于外，引起外间之误会与批评，不如载诸本刊，以促内部之商榷与改良”，由此与钱端升商量，钱端升遂将底稿提供给《清华周刊》。

钱端升承认，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求舆论之援助，以达改良清华之目的’”。至于对他作文初衷的种种不解与指责，他抱着“纵受委屈，吾何恤哉”之心态对之。该文从清华之现状、弊病及改良方式三方面展开：

就清华之现状而言，其要点可分为如下四方面：其一，分为旧制部、大学部及研究院三部；其二，内部组织比较复杂，研究院、大学部、旧制部各

有教员，各有教务会议，除此之外还有以职员为主组成的校内最高权力机关校务会议；其三，经济消耗极大，三百多学生，每年要花费七八十万元；其四，清华旧制部将自生自灭，停招新生，将来拟分为普通训练科和专门训练科，研究院设国学一门，纯为试点。

钱端升基于上述现状，进一步申述清华存在之弊病如下：其一，靡费甚巨。鉴于清华学校受益于美国退还之庚子赔款，经费阔绰，故有如下诸多浪费地方，比如空房甚多、教员过剩、各机关往来函件居高不下、宴会招待及津贴等费用亦度之甚高。其二，机关太多，仅校长辅助机构就有机要处、中文文案处、英文文案处等，训练学生之机构则有斋务处、学监部、课外作业部、职业指导部及同学干事部等等。其三，组织太无根据，会议林立，“主任满池游，机关多如鳅，叠床架被，因应不灵”，所谓委员会更是层出不穷，其实际作用却又乏善可陈。其四，教员地位太低，职员高高在上，所谓教授会议不常开，亦无实权，教务会议中职员亦十去其六，“实有职员万能，教员垂听之感”，“因之稍有学问者，必其人能隐气吞声，否则恒不愿来，即来亦不久留”。其五，美籍教员养尊处优，待遇远较本国教员优厚，而背后又有美国使馆撑腰，使得本国贤才没法乐而用之。其六，学科杂乱，旧部制学生两百多，学科一百许，只能多开学科解决教员冗余问题。

基于上述现状与弊病，钱端升提出如下改良方案：其一，就学制而言，旧制学生任其毕业出洋，不足细论；大学部需要视学生人数决定分科与否，分科太多，经济必费，亦不利于通识人才之培养，钱端升认为清华应集中有限财力，招致国内硕学通儒，以文理科为基础，为国家造士；研究院是否因国学而特设，需要再斟酌。其二，就招生而言，近期内清华将有旧制学生及大学生并立，新生招生应以现有房舍为限，确保物尽其用，亦促进大学及早成立。其三，就经费节约而言，应从庚子赔款每年拨付清华的经费中，划出若干设置基金，以便庚子赔款付清后，大学依旧可以继续维持。其四，就教授待遇而言，清华虽然待遇优厚，景物优雅，但因为讲学之风不盛、教授地位不高及中外教授不平等因素，依旧难以招致第一流学者加盟；故“清华而

不欲多得第一流教授则已，若欲之，则非增加教授之地位不为功”。其五，就组织而言，大学传统中校长、教务长体制与现在教授治校的评议会制度各有利弊，清华介于两者之间，使得“职员之权，有长无已。大权旁落，校长教授俱乏统帅之力”；故改良的办法在于，赋予教授会以治校之权，教授之上，除校长外无其他职员，而教务长亦由校长充任，校长兼任教授会主席，统一事权，另允教授会设各种委员会统治全校。

另据《现代评论》所载该文，该文尚有第四部分论及“根本问题”。钱端升认为，清华之根本问题在于隶属于外交部，由董事会与学务处负责日常管理；而董事会成员“既非学者，又非教育家，又不十分关心清华之事，然兼有立法及监督大权。董事会……舍维持现状、息事宁人外，无其他政策可言。至于教育之新思想，校务之改进，大学之目标，则固充耳不闻，即闻亦不悟者也”。钱端升认为清华在这样的董事会的领导下，“绝少改进及发展希望”。而从根本上来说，钱端升认为清华的当务之急是校务的独立，“解除一切不利于学校进步之束缚”，而不是隶属于外交部还是教育部。而就清华校长之争，钱端升对曹云祥颇多肯定，但认为清华校长职务最好由学者出身且与清华无纠葛者担任，“盖清华之弊，积重难返，不有学者，不足以革之，与外部或清华有密切关系者，则碍于情面，狃于成例，亦不能以革之”。钱端升甚至由此提名丁文江、王宠惠、吴敬恒、马寅初、胡适、胡敦复、范源濂、梁启超、唐文治、翁文灏、魏宸组诸先生，“斯数人也，不特能革除积弊已也，以其为学者，必能进清华为真正学府，以其为有力之人，更必从事于董事会之废止或改组等”。

——钱端升：《清华学校》，载《清华周刊》1925年12月4日，第24卷第13号（第362期），第35—42页。

【下午2—3时，赴职员会议，谈钱端升《清华学校》一文。】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4页。

【1925年秋，钱端升在《北京晨报》批评清华，认为“清华之急务，在校务上之独立，而不在教部、外部之争”，如果外交部仅管经费，而任清华

自行发展，董事会以学者为主，则属于外交部也不碍，若属于教育部，“事事受制于教部之官僚，则亦不可”。】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页。

【不过，这样的改革仍不能令清华少壮派满意，钱端升说现行之“教务会议”制度，“既非校长集权，也非教授治校，而职员之权，则有增无已”。主张应由教授治校，设立教授会和评议会，而以评议会为全校之最高权力机关。教授会得设立各种委员会，统治全校，一如美国市郡之议会组织。钱端升的批评，加速了曹云祥改革的决心。】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2页。

【1925年钱端升说，“清华教员俸给与京中各校比，则清华为优，且清华景物优雅，物质上之生活亦佳。”】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3页。

【如“少壮派”之一的钱端升于批评清华诸多缺点时，得曹颇多称许，谓其风度宽大，三年余来的改革，虽未能尽除积弊，然能使学风安静，学生专心向学，其功非小。谓其延聘梁启超、王国维等名师讲学，振兴清华门楣而减“美化”之讥。谓其创设基金，谋清华于永久，也善政之一，望其久任，致力于教务之改良。】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8页。

【钱端升则批评旧制生不过二百余人，竟开课百余种，大学部现仅普通科一年级，因分科太多，使每科学生均感不足。旧制大一和新制大学部普通科分别上课，形成严重浪费，因此对张彭春的改革，亦表示反对。新制课程改革遂告终止，张彭春因而郁郁辞职而去。】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178页。

12月5日

《现代评论》第2卷第5期亦刊载《清华学校》一文，“文字稍有出入”。

——钱端升：《清华学校》，载《现代评论》1925年12月5日，第2卷第52期，第9-14页。

——孙宏云：“编者注”，载孙宏云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12月11日

《清华周刊》报道钱端升为学生做《政治学》演讲事宜。

【政治演讲 上星期四，修学目的及方法班请钱端升博士演讲政治学研究方法及分类。先讲：（一）政治学之名称及定义；（二）与政治学相关之学科；（三）政治学之历史；（四）政治学之现状；（五）政治学之分类。将以上五层，详细说明。后述政治学之研究方法及其用途。后以时间过迟，为克尽所言，至为憾事。】

——佚名：《政治演讲》，载《清华周刊》1925年12月11日，第24卷14号，第25页。

12月13日

钱端升造访吴宓。

【3-4时钱端升来，谈继任校长事。钱谓宓加入反抗与否，与宓前途均无关系。加入恐受人利用，不加入则为众所排斥，是两难之局也。

五时，庄则宣来，邀赴北院九号。陈达来，叶、钱亦归，在其处晚饭。议反抗张君事，直至晚十时半始散。陈达拟出宣言，并决议明夕公请校长茶叙，表示反抗之意。庄等既欲抗张又不肯出面，欲请他人上前。此事宓本不热心，虚与委蛇而已。】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7页。

12月15日

吴宓访钱端升。

【庄来，知签名者无一人。故宣言之举，即行取消。

十一时，往告张、钱。张（歆海）竟召庄来。又于下午，自偕钱见张（仲述）直告以拟举梁任公或某某等为校长，张拒之。宓事后自知，深惜彼等之逞意气而僨事。张不惟不见信，且增嫌怨也。】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7-108页。

12月16日

吴宓访钱端升。

【5-6时以梁任公招，往。谈校长问题。梁愿出任校长，以（一）维持现状，（二）不改政策（出洋等），（三）尊重张仲述地位，为方针。宓拟即以调人自居，劝逼张仲述加入，一致推戴梁任公。既维持张氏地位，又免风潮。而宓亦为清华办一大事，见重于各方。似策莫善于此者。

六时，访叶企孙，叶赞成。

晚，访陈达及钱，二人亦均可。又拟招贺麟谈，询学生意向。贺因上课，未及来也。】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8页。

12月20日

张彭春对钱端升咬牙切齿：

【同年12月20日，张又说：“清华将来一定落在新起毕业生之手，庄（则宣）、张（歆海）、钱（端升）……都不过是先锋，大队还在后面，学校发展必须加人，加进的十之八九是清华新毕业生。所谓新毕业生，就是曾受过清华园毒环境在三年以至八年之久的，这样恶轮回是全国最大的祸。”跟

着他批评说，“八年清华园，五年美国，回国来还想望着清华园，这种人怕是阴谋有余，而其胆量有限了”。可见他对清华少壮派的“深恶痛绝”。如上所说，这时钱端升正好在《北京晨报》发表文章批评清华，其中对张彭春和清华少壮派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权利冲突。】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9页。

12月21日

致信章士钊，一方面表达其对章士钊的声援，另一方面欲向章士钊借德国新政相关书若干。

钱端升致章士钊信片段如下，标点为夏红所加：

【……壬子以还，项城帝制自为，诈诡百出，人心被毒，莫可救药。讫于今日，上自士流，下逮聿卒，竟以波谲云诡为尚，君子道丧，小人道长，真是非之别此世也盖已久矣，夫复何言？升愚雅好月旦，略识是非，闻世人之攻先生，恒愤愤为不平。徒以先生适居要津，位高权重，一不慎即患趋附之嫌。且甲寅论政论文之作，亦与鄙意相左。而先生之推崇合肥，更与升狂罔之格格不相投。今先生退位矣，先生之长之孤忠之远识，不可淹没。纵举国无公是，无公非，公理是非亦曷能靳先生而不与哉？信乎尊者所指解严之旨也，即先生不问毁誉，率直之士亦曷能不说公道话哉？愚蠢如升，亦知所以明是非矣。升近窃思研求德国新政，周鯁生兄为言先生于该项书籍，搜罗甚富，窃欲假而读之。而尊府适以被毁闻，不识尚有存者否？如蒙不弃而辱教之，幸甚幸甚。……钱端升，清华学校，12月21日。】

——钱端升：《壬子》，载《甲寅》1926年1月23日，第1卷第28号，第11—12页。

吴宓访钱端升。

【晚，访 Winter。又访钱端升，谈。】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1页。

12月22日

吴宓陪查良钊访钱端升。

【查良钊来，在叶、钱处陪同晚饭。】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1页。

12月25日

在《晨报副刊：国际》发表《莫索尔问题》一文。

该文论述莫索尔问题的来龙去脉。莫索尔位于小亚细亚中部，介于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在一战后因为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问题，由国际联盟委托英国托管，进而成为搅动欧洲政坛的一个火药桶。英国托管后，承认伊拉克国王，进而促动伊拉克立宪，钱端升认为此举既可以让英国在西亚获得好的口碑，安抚印度殖民地的伊斯兰教徒，同时也能消除英国人民对政府每年花费巨款托管的抱怨。

——钱端升：《莫索尔问题》，载《晨报副刊：国际》1925年12月25日，第12号，第9-10页。

12月27日

吴宓陪杨宗翰访钱端升。

【下午三时，杨宗翰来，相见甚欢。六时，同至北院九号叶、钱二君处，宓备饌（菊花锅，六肴）共食。】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3页。

12月29日

在北京完成《国际法庭》一文。该文1月22日发表于《晨报副刊：国际》。

该文详细介绍了国际法庭的由来、组织及权限。钱端升指出，国际法庭由来源于国际仲裁法庭，国际法庭的理想并未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消灭，巴黎

和会反而对其有所强化。国际法庭设有法官11人、补充法官4人，任期皆为9年，开庭时以11人为准，除全体庭外还有简易庭、劳工问题的特别庭、运输问题的特别庭等，另外还设有陪审员若干，其费用由国际联盟拨付，设在海牙。就国际法庭的权限而言，分为判决诉讼和贡献意见两种。钱端升亦论及了国际法庭所判决的几个重大案件。钱端升指出，国际法庭成立四年来，有如下成绩：其一，根基坚固，法官深得人望，少偏私之责；其二，国际法的解释有了固定和法定化的希望；其三，各国渐渐接受国际法庭；其四，提升了国际联盟的信用。当然，国际法庭也还面临不少问题，尤其是许多国家还不承认国际法庭的权限，而在强国睥睨小国的时代，国际法庭并不全能主持公平正义。

——钱端升：《国际法庭》，载《晨报副刊：国际》1926年1月22日，第15期，第9-10页。

1926年(26岁)

1月1日

《清华周刊》发表前述1925年12月3日在清华学校普通科所做演讲《政治学》一文。

该文分九大部分，条分缕析政治学的基本框架：

- 一、政治学的名称及定义；
- 二、政治学是否为科学；
- 三、与政治学相关的学问，包括法律、经济学、历史、心理学；
- 四、政治学的历史；
- 五、政治学的现状；
- 六、政治学之分类；
- 七、政治学之前途；
- 八、研究政治之方法；

九、政治学之将来。

——钱端升：《政治学》，载《清华周刊》1926年1月1日，第24卷第70号（总第366期），第1-6页。

1月6日

吴宓访钱端升。

【次访梁任公。梁先生颇赞成普通国学之议，决于明日会中讨论。又访钱、叶二君谈。】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3页。

1月11日

钱端升访吴宓。

【钱端升来，亦劝宓辞去研究院事，或兼任教授，以资过渡。与王文显君之意同。

晚，至北院九号，叶君来。】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5页。

1月18日

吴宓访钱端升。

【下午5-6时访钱端升及张歆海于北院。六时半至七时半，在工字厅陪徐志摩君晚宴。又与诸君至礼堂听徐君演说《文学与艺术》。九时别去。】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0页。

1月20日

钱端升访吴宓。

【4-5时，仍办公，检定书籍等。钱端升来谈。】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2页。

1月22日

在《晨报副刊：国际》发表《国际法庭》一文。

——钱端升：《国际法庭》，载《晨报副刊：国际》1926年1月22日，第15期，第9-10页。

1月23日

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登载出钱端升给他的私人信件，并公开回复。钱端升颇不悦，于1926年2月21日完成《甲寅周刊的“通讯”》，发表于2月27日《晨报副刊》。

钱端升致章士钊信片段已如1925年12月21日条目所示。章士钊批语如下，标点为夏红所加：

【高谊弥感。是非者，固非一日之事也。凡愚为文，必设想三年后有人读之，其评断当如何。华颠静夜，已复校阅，能否不自羞死，如此推算一过，始行下笔。其做事亦然。自目前为政情所障，为怨毒所控，任彼悠悠，愚乃无所介意也。推崇合肥，不审足下何指？寻常交友，期于久要，宁至国事，不能伦类。平居假人之力，以戈声华，一旦势异，便尔多方趋避，图再仰首伸眉于后来。反动之局，此奸猾之细人为之，非学士大夫所宜出也。凡与人家国事，允宜慎之于始，不宜议之于终。当人盛时，志忽不通。自揣所枉过甚，义在求去，君子犹且膳肉醴酒，假借微物，俾勿伤厚，以全始终。又况时际阽危，谊切同舟，而情趣并无不合者乎？此意怀之而不欲道。笔之所至，辄不能已，惟足下察焉。德国书籍，暂不审所存几许。儿辈来言，寒家被掠时，魏家胡同洞口以至室门，残书满地似茵，室内则书籍稿件之毁坏者，弃地积五寸许，被焚者犹不论焉。洋书难裂，乃抛向屋顶，飞如蝴蝶。如此糟蹋，存又几何？今恐怖犹未尽息，难于清理。俟得实在，便以奉闻。孤桐。】

——转引自钱端升：《壬子》，载《甲寅》1926年1月23日，第1卷第

28号，第12页。

1月28日

吴宓访钱端升。

【五时，乘人力车回校。途中念此次张氏去职离校，如竟成事实，则实为权臣威加于主者之普通下场。各方反对虽烈，然已司空见惯，久已无足轻重。此次去张，纯由校长自决。而校长之为此，必自有不得已之原因。或缘大权旁落，恐驾驭为难；或张竟有图谋去校长而代之之举动，为所觉察，故而出此。诸人之谗言，以及宴会表示，不过适凑其机，校长以乐于俯从而利用之耳。钱、叶诸君，亦如是揣测也。

六时抵校，钱君（端升）来。Winter来，晚饭。】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2页。

1月30日

吴宓念及钱端升。

【念日来在校，以种种事故，形劳神苦，诸友如钱、叶等，均劝我离校入京，迁地散心，求乐自养。岂知到京乃遇此苦。】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3页。

2月4日

张仲述携眷离校，校中风潮起，吴宓访钱端升。

【学生代表去后，宓至北院钱、叶二君室中，亦有代表在焉。校中之大风潮，遂从兹作始矣。】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7页。

2月5日

校中风潮大起。

【是晚校中风潮大起。学生开大会，挽留张仲述，又将不利于反张诸人。以反张之人，就其事迹之轻重，立意之公私，人品之高下，列为三等，凡十一人。其中（一）元凶三人，王祖廉、庄则宣、徐然。（二）次凶五人，全绍文、曹霖生、虞振镛、陈达、蔡正。（三）陪凶三人，张歆海、钱端升、吴宓。通过后，即聚众前往包围校长住宅，迫校长签约，允行三事。（一）迎张氏回校。（二）斥退王、庄、徐三主任。（三）改良学校，裁员减政。校长悉允之。次乃包围王、庄、徐及曹霖生之住宅，并游行，唱口号，加以辱骂，迫王、庄、徐对众立允辞职。宓因情形如此，得报，遂决久住京中，以避风潮焉。】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7页。

2月21日

写《甲寅周刊的“通讯”》一文。

该文开篇钱端升即感叹：《甲寅》周刊真是奇怪，要写信批评它，肯定不会发表，但只要有与章士钊相关，“只消你这封信中说了他几句好话，或者给了他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就是与《甲寅》本身不相干，大概也会得登出来的”。钱端升提及他有次写信向章士钊借书，信中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章士钊起先端起架子，并未理会，但随后却在《甲寅》第28号登出钱端升的信，同时加上批语，钱端升不得不致函责备并答批语。大意为章士钊藏书甚丰，遂有效唐士贷书之举，但章士钊将函件未加回复，径行发表，“是不能以无言矣”。钱端升表示，他没写给《甲寅》的信，居然登了，那么写给《甲寅》的信，更该登了，——但第二封信不仅未登，反而惹章士钊写《告罪》之文发表于《甲寅》第30号。钱端升指出，章士钊不认罪也罢了，反而指责钱端升一年对其公私形迹“指斥”无已。钱端升叹息，“我既没有揭人隐私，也没有学村妇的谩骂，有什么‘逸乎……范围’？”钱端升坦言，章士钊最大的冤家是在学界，尤其提倡八校合并和清理积欠，“他的政治生活固是无聊，但是我们绝不能以人废言”。另外，章士钊因解散女师大而结

怨于学界。钱端升指出，“我再对章士钊生活：我确是给你抱不平，我第一封信中感慨的话即含有此意。我有什么不可告人？人家对我有什么清议呢？乃你起先则未得我的允许，发表我的‘言事’的信；既面又说我怕清议；这是何等样的‘君子修辞之旨！’”

——钱端升：《甲寅周刊的“通讯”》，载《晨报副刊》1926年2月27日，第48页。

2月22日

清华风潮平息。

【是日校中开课。（昨之布告出后，风潮竟得结束，安稳开学，亦幸矣！）

晚8-11时校长召集全校教职员大会于科学馆212室，报告此次张仲述去职，及风潮经过情形，并议善后办法。众议改组行政系统，实行教授治校。当场两次投票（复选法）举定梅贻琦、钱端升、孟宪承、戴超、陈达及宓六人，连同校长，为宪法起草委员，起草本校组织大纲。

自翌日起，该委员会每星期开会数次，每次辄三四小时以上。经两星期，而全案告成。】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2页。

2月27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甲寅周刊的“通讯”》一文。

——钱端升：《甲寅周刊的“通讯”》，载《晨报副刊》1926年2月27日，第48页。

3月5日

钱端升在《清华周刊》发表《清华改组之商榷》一文。

这篇文章系钱端升在《清华改办大学之商榷》《清华学校》等文的余绪，继续申论清华改组问题，与前文颇多“互相贯通之处”。钱端升亦特别

声明，相关改组计划得益于叶企孙先生者颇多。

该文第一部分为“改革之要点”。钱端升先后提出教授治校、修订学制、公决预算决算、裁并机关、添招学生、废弃董事会等建议。钱端升在诸要点中，花费笔墨尤其多者为教授治校和修订学制。

就教授治校而言，钱端升曾戏言，治校如治国，要么开明专制，要么真正民治。在钱端升看来，开明专制需要两个条件：其一，全体师生员工能够信任校长，一切惟校长是从；其二，校长本身确信开明专制为善治，以己身之精力，为学校谋幸福。而这两个条件现在的清华都不具备，所以除了教授治校别无他法。但清华现在的问题在于会议林立，固然能议决职分内的事项，但无人为之执行；校务会议中职员比教授多，“苟职员而惟校长惟命是听也，则是校长避专制之名，卸专制之责，而有专制之实也；苟职员而能离校长而独立者，则是职员操纵一切矣”。钱端升申言，所谓教授治校，绝不是组织毫无实权的校务会议，也不是设五六个学系推选系主任候选人若干，再让校长任命并参加校务会议，“教授不治校则已，若治之，则校内重大事故（不涉教务者亦属之），必经教授或教授代表之议决或同意，方可执行。且不特立法之权，校长须公诸教授而已；即执行之权，校长亦必须处处征教授之意见，受教授之监督”。钱端升坦言，教授治校已为各大学之宪政原理，又为清华之口头禅，纵然有各种批评与怀疑，但无论从教授方面还是校长角度，都是善制。

就修订学制而言，钱端升认为应以四年为期，原有之普通科、专门科应立即废止，课程内容则以文理科为主，工、商等专门之科需要外审地域之分配、需要之缓急，内审财政状况、设备情形及学生需要而定。而旧制学生则按照原定计划，毕业放洋即可。就课程设置而言，重在精深而非数量。而就研究院的设置来说，钱端升曾认为这是畸形发展的怪胎而大加反对，但在这篇文章中观点稍变，即研究院的教授和学生可以留存并划归各系，研究院的机关则决计废除。

而就财政公开来说，钱端升指出财政公开是公共事业之常理，在清华亦

载入校务章程，但未施行。预算及收支报告应系统排列、比较且合计。就裁并机关而言，其要义在《清华改办大学之商榷》《清华学校》已申述，一仍其旧。就添招学生事宜，钱端升提出多招学生且男女兼收，持论亦未尝稍变。而就董事会而言，钱端升认为系赘瘤机关，如果推行教授治校，可以直接裁废。

该文第二部分，钱端升草拟了一份《清华大学组织大纲草案》，共分学制、校长、校务会议、学系及学系主任、教务及教务主任、教授会议、常任委员会、事务机关、大纲修订及施行事宜等9章42条，钱端升关于清华大学的架构，尽在其中矣。

该文第三部分论及清华大学改组的具体步骤。鉴于现行章程由外交部批准，故改革也应从外交部允许“取消旧章、改组一切”开始，或者由校务会议讨论改组之事，议决后报外交部批准。但如果外交部拒绝批准，则需要采取非常手段。鉴于清华现在已陷入“无法律状态”下，钱端升提出，改组贵在急进，“教授当举一小委员会，付以讨论改组计划之全权。如委员会悉心讨论，则旬日可毕；再经教授会之通过，半月可毕。如是，则自讨论以迄外交部批准，亦不过二旬已耳。无论如何，至始至终，不宜逾一月之期”。钱端升进一步规划，如果他草拟的改组计划通过，则需要即时或在两周之内成立校务会议、成立各学系并推举学系主任和教务主任、推举常任委员会等等。至于研究院之改组，现在实行可以，下一年实行亦可以，无关宏旨。钱端升认为，清华改组最难问题依然是事务机关之裁并，尤其是相关部门裁并后相关主任及职员的路问题；对此钱端升提出，除了年内自动辞职者外，改组后有新机关者归新机关，无处容身者暂置秘书处，通过机构改革，杜绝人浮于事之弊端。

——钱端升：《清华改组之商榷》，载《清华周刊》1926年3月5日，第25卷第2号，第79-96页。

3月6日

吴宓日记提及起草《清华学校组织大纲》竣工。

【是日所以心境恶劣，因委员会起草《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已竣工。该大纲中，竟将研究院取消。仅于各系中设研究教授及研究生。此乃钱端升之意，宓亦甚赞成。惟念去年三月六日，研究院中、英文章程，方在大学筹备会中通过，而今年此日，复在委员会之《组织大纲》中取消之。由我作成，复由我手破坏。我乃如杀身自焚之蚕儿。因力顾大局，希望全校改良，协赞钱、孟诸君，并愿以身作则之故（裁并机关），乃自在委员会中，将研究院主任之职位取消。如此高尚之心情，谁复谅解？然此弥可伤悲也矣。】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3页。

3月8日

清华“改组委员会”讨论“清华学校组织大纲”时，接受了钱端升的意见，废除清华国学研究院。

【其实，停办的决定早已订于1926年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之中，而其根本原因是校内资源分配冲突、国学和科学孰先，及大学部学生和研究院学生利益冲突的结果。前面谈到吴宓之辞职，仅是此事之一端而已。最早主张停办的应该是钱端升。他早在国学研究院成立以前就持反对态度，成立后，又在1925年底发表《清华学校》一文，说“研究国学本无须特别机关”，今设院研究国学，不过是多一机关，两分费用，使校内组织更趋于复杂难理罢了。】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6页。

【接着清华“改组委员会”（由教授会选出之代表6人组成，钱端升为委员之一，研究院无代表，吴宓和赵元任仅列席）于1926年3月8日讨论“清华学校组织大纲”时，接受了钱端升的意见，说国学研究院是一“畸形发展组织”，应立即废除，将其教授和学生归并于各系，教授改称研究教授，学生改称研究员，待成立毕业院后，学生改为毕业院学生。】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327页。

3月18日

钱端升亲历“三·一八惨案”。

【出事以后（有少数我的朋友在内）受伤的有的就逃到我的医院来，而少数学生也跟着跑来了，大家都狼狈不堪，血淋淋地撞门而入，给我的嫂嫂和看护都吓得要死，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呢。（记得有顾淑型、钱端升在内。）我嫂嫂告诉我：并且有些人就到我诊室内去拿起药棉、纱布等就用起来了，看护叫着来帮忙，他们也不听，打长途电话到清华园。我和元任坐车进城，到了西直门，而城门又不开了。因为他们恐怕清华学校有再多的人加入请愿。第二天一大早，我一个人进城，到诊所门口一看，还有一个巡警站在那里问我是何人，不准进去。我说这是我自己的诊所，如何不准我进去。他说你为何窝藏匪人，你是不是也在内起事的人？我真气得不得了，我回答他说教育界的人对国家利害关系的请愿，怎么是匪人？我若在内为何才从城外跑来，青红皂白不分还做巡警吗？我打门进去看见诊所屋内乱得一塌糊涂，血布一地到处都有，顾和钱两个人还未走，脸色还是苍白的，钱还可以说话，而顾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们以后说因为他们站在前面听见里面上头叫放实枪的，他们就关照学生后退，但是来不及了。他们五六人往里面一退，所以没正式受伤，只是惊吓和气得失魂落魄而已。我给顾送回西河沿他姐姐处，我和钱就回清华园了。】

——杨步伟：《杂记赵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2页。

3月19日

钱端升参加3月18日天安门集会。“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钱端升被困城里。翌日被杨步伟等疏散回家或回校。

【3月，奉系军阀与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军舰掩护奉军进攻，竟炮轰大沽口，被击退。日本公使以大沽口被封锁，违反《辛丑条

约》为借口，联合八国公使于3月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等无理要求。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游行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拒不接见，卫队开枪，群众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史称“三·一八惨案”。

参加请愿群众中，有少数清华大学师生及受轻伤群众，到景山东大街步伟诊所请求急救包扎，并暂避警察追捕。诊所护士电话通告，元任夫妇急忙赶往诊所，但西直门已关闭无法进城，只好返回清华。3月19日城门开放，步伟急赴诊所处治伤员，并帮助疏散师生（据步伟追忆有顾淑型、钱端升）回家或回校。】

——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7页。

【自是日起，以执政府门前枪杀学生惨案，放假，停课。28日起，复续放春假一星期，直至4月12日始上课。在此假期中，校中多故，学生互争。当局召集临时教职员大会，举出委员10人，宓亦在内，应付此局。继又以近畿战事，设紧急委员会。又草拟对外宣言，表示对惨案之愤慨。又追悼韦生杰三大会。然与宓已无深切之关系，故不悉记。】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1页。

4月

清华真正进入教授治校时期，钱端升与闻校政。

【（二）教授治校时期

经过两年改革波浪的冲击，曹云祥于1925年9月成立一个“十人校务管理委员会”，委员除校长为当然主席及各行政主管外，还有教员会议选出之代表4人，为教员参与校政之始。在钱端升的催促下，曹于1926年初，再成立一个“清华学校改组委员会”，由全体教职员大会推举曹云祥（主席）、梅贻琦、戴超、陈达、钱端升、孟宪承、吴宓7人为委员。陈达以下4人皆清华少壮派主将。诸位委员虽认识到“教授治校理想甚高，实现匪易”，

国内各校尚无成功者，但为“适应民治教育之潮流”，兼顾本校特殊情况，应有所兴革，以补救以往之阙失，乃于这年3月1日至3月8日共开7次会议，历40小时，制订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草案，修正后，于4月15日经清华教职员会议三读通过，“交由校长执行”。会议同时决议第一次教授会议定于4月19日（礼拜一）下午8时举行，似乎没有缓冲余地。教授会如期举行后，曹云祥才依照行政程序呈报于外交部。】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2页。

【总之，清华在1919年以前为职员治校时期，1922年起教师夺取参与校政，至1926年摆脱清华董事会之控制和校长一元化的领导，进入教授治校时代，实现了半年前钱端升所鼓吹的校务独立自主理想，但好景不长，等到国民政府统一北方，改清华为国立大学，并于1928年9月颁布“国立清华大学条例”后，重申教育部即校长之权力。】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6页。

4月19日

钱端升参加清华第一次教授会议。

【第一次教授会议如期在1926年4月19日晚上8时至12时在科学馆212号教室举行，全体会员60人，到会者47人，出席率78%，曹云祥为主席。从这次会议纪录中，可以看到他们发言热烈，所有提议、附议、讨论、表决、通过或否决，均依民主程序：

首由大会公举朱君毅为教授会临时书记，次主席问本会会员四人，因事不能出席，函送选举票四张，是否有效？众讨论结果，均承认此选举票为有效。

朱君毅问大会须有若干人始足法定人数？陈福田君提议，赵师轼（学海）君附议，本会须有全体会员之半数以上，始足开会法定人数，通过。……余日

宣君提议，赵元任君附议，教务长之选举，在第一第二次票选时，须超过三分之二以上之数，但第三次票选时，过半数即可，通过。虞谨庸（振镛）君提议，钱雨农（端升）君附议，第三次票选时，候补人数定为二人，通过。陈福田君主张采用不记名投票法，众赞成。

次选举教务长，第二次选举结果，为梅月涵（贻琦）君（二十七票），孟宪承君（十二票），戴志骞君（七票），赵元任君（三票）。第三次选举结果梅月涵君（三十三票），孟宪承君（十五票），梅月涵（贻琦）当选为教务长。

次选举评议员七人，第二次选举结果为陈通夫（达）君四十票，孟宪承君三十七票，戴志骞君三十三票，杨梦赉（光弼）君三十二票，吴雨僧（宓）君三十票，赵元任君二十七票，陈福田君二十四票，麻伦（Malone）君二十票，钱端升君十九票，叶企孙君十六票，陆咏沂君十六票，王力山君十四票，虞谨庸君十三票，朱汇臣君九票。票数最多之前七人为陈通夫（达）君，孟宪承君，戴志骞君，杨梦赉（光弼）君，吴雨僧（宓）君，赵元任君，陈福田君，当选为评议员。】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4-45页。

4月

梅贻琦课程改革，历史学系设置和钱端升有关。

【第二年：治国史者先选修中国近代史；治西洋史者先选修欧洲近百年史，如时间不冲突，可同时兼选。

历史研究法（2），教授梁启超。

中国近代史（8），（暂缺）。

西洋近百年史（8），教授钱端升，清华1919级，哈佛政治学博士。

中国文化史（6），（暂缺）。

英国史（6），（暂缺）。

美国史（4）（暂缺）。

日本史（4）（暂缺）。】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2页。

4月28日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成立。

【4月28日，清华学校评议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议决大学部设立国文学系、东方语言学系、西洋文学系、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历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哲学系、教育心理学系、农业学系、工程学系、音乐学系、体育军事学系等17学系（后将东方语言学系与西洋文学系合为外国语文学系，教育心理学系、农业学系、音乐学系、体育军事学系均未成立）。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历史学系、哲学系及社会学系5系均为清华最早成立的系。此次会议议决设立专修课程的11个系，其中有国文学系、西洋文学系和历史学系等。暂不设专修课程的有6个系，其中有东方语言学系、社会学系和哲学系。】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夏红注：

此与钱端升相关甚大。牵涉到钱端升此后“归队”自己的专业，而不再作为历史学系教员。

6月28日

吴宓夜遇钱端升。

【九时，访王文显，未遇。遇钱端升。钱谓此举应待诸客去后为之，以免开罪诸人。且今当自任招待，不许客人迁出，而已庶务处之用心，告客人知之。】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4页。

夏红注：

是日吴宓盛怒，缘清华庶务处将天津来的杨绍曾诸人安排于吴宓住处，致使吴宓极感不便，认定清华庶务处此举意在“挑拨侮辱宓，以强宓迁出西客厅”。吴宓为此找清华校长，要求庶务处道歉。是日晚访王文显未遇而见到钱端升先生，故有此对话。

钱端升乃明白事理之人。

7月9日

吴宓前往北院叶企孙、钱端升处吃午饭。

【是日陈君入城。杨绍曾、刘崇鋳来。在北院钱、叶二君处午饭（西餐）。】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9页。

7月10日

吴宓访钱端升。

【晚，访钱、叶于北院，遇之于途。】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0页。

7月12日

吴宓陪陈寅恪拜访钱端升等人。

【上午陪导陈寅恪参观图书馆。是日在钱、叶君宅中用西餐。每日三餐，一元二角。夕，大雨。晚，复往。校长来，钱、叶等与谈校中事，多所主张。】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0页。

【父亲在清华，住工字厅的西客厅。寅恪伯父出来，与父亲住在一起。父亲连日陪导寅恪伯父参观图书馆，拜访刘崇鋳、杨绍曾、钱端升、叶企

孙、李济、庄则宣诸先生。王国维先生，又李济、刘崇鋳、杨绍曾等君也来回访寅恪伯父。】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6页。

7月16日

吴宓坚辞西洋文学系代理主任，钱端升劝阻之。

【晚访 Winter 以此事告知。Winter 谓为本系计，仍以宓为代理主任为宜。但当以术取得校长之明白委任状，再由本系公举投票以确定之，则一切名正言顺矣。钱端升则谓宓不就任此职为失策云。】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2页。

夏红注：

是日吴宓访校长，谈及西洋文学系事情，校长告之以对聘任教员毫无成见，又谓将函请吴宓为该系代理主任。吴宓坚辞不就。遂有此日记。吴宓乃真学人也，不贪，不恋，真乃中世之圣僧。

7月24日

吴宓、叶企孙宴友于北海。钱端升爽约未到。

【宓驰至北海漪澜堂楼上，是日宓与叶企孙在此合宴客（西餐，费约11元），客如下：张准、赵石民、凌其竣、袁同礼、余泽兰、陈宏振、瞿国眷、刘崇鋳、汪泰基。未到者，钱端升。原约六时半，以宓故迟。十时散，微雨。】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6页。

8月1日

吴宓访钱端升。

【是日在钱、叶二君处用西餐一日（一元二角）。宓平日极思节俭，只

以不胜友人之怂恿，往往舍己从人，而致靡费。此后当自作主张，力趋坚定，其无益之聚会，及非必要之应酬游宴，一概婉辞谢绝。既省时间，且省钱财，又致心安也。】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9页。

8月7日

吴宓访钱端升。

【在校未多读书，料理家务。上午访王文显，送别。又访钱、叶二君。】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2页。

8月30日

钱端升访吴宓。

【晨九时，钱端升来，谈校事。】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3页。

9月11日

钱端升等访吴宓。

【下午3-4时，陈源、杨振声偕钱端升来。陈源即拟就清华之聘，而尚牵于北大之关系，未遽决。宓告以讲师之办法，待其自择。袁同礼亦同来。

晚在钱、叶二君处，与袁及钱昌祚等谈。钱对宓有所规劝。大约谓办理校中及本系各事，不必处处认真，不必因小事忧急或动气。至于重大之事件，则决定后必实行。向校中所要求者，亦必得到乃止，以上皆忠言也。】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0页。

9月14日

吴宓托钱端升探求陈源真正意向。

【校中于上星期函聘陈源为西洋文学系教授，至今尚未得复。宓以排置

功课，备极困难，一人不来，全局牵动。乃托钱端升入城探询陈源真正意向。是晨，钱君归，言陈源决不能来任教授，但或可任讲师，而功课及钟点，必须如何如何云云。宓以此种条件，事实上断难做到，不如舍陈而另聘教授专任。】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1页。

10月18日

钱端升访吴宓。

【钱端升来。】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6页。

10月22日

钱端升、叶企孙赴熊庆来召宴。

【晚，6-10时赴熊庆来招宴于工字厅，钱、叶来。】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8页。

10月28日

吴宓访钱端升。

【晚访钱、叶。】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2页。

11月3日

王国维、陈寅恪云曹云祥辞职，电约郭秉文来校。此意告钱端升。

【9-10时王静安先生及陈寅恪来此小坐。寅恪言曹校长已就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之职，年内即离校，并已电约郭秉文来接任清华校长。此意已告知戴、杨、钱、叶诸君云云。宓姑静以观之而已。】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6页。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11月4日

钱端升致信胡适。

【适之先生：

时光像流水过得快，一别又是三四月。你离国之前，我没有机会替你饯行；你出京那天的晚上，我又有了了一点微恙，不能祝你平安上道，真是抱歉。

你走后的行止，你走后的感触，我常在《晨报》及其他诸位友人处听见一二。有人说你很表同情于共产，此真“士三日不见，当刮目以待”了，真令我伎欲行不得的人，望洋兴羨。同时我希望暂时没有人把这件事发表，不然，又要惹动老严不三不四的文兴了。

这回英国对华态度骤然变更，使得你在英国的兴头一落千丈，多么不幸！我们本来希望你在英国大学界中占一地位，替中国从文化方面表扬表扬，间接也可以收一点政治上的效果。谁知道英国的面孔又变长了呢？

在外国没有意思，还是回到中国来罢。我有一个不小的建议——在我意思的是不小。去年我已经问过你是否愿意担任清华校长，我现在请你再考虑一下。曹庆五预备于寒假中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经理去，同时他想请郭鸿声来替他，这都是他当面同我说的。这一遭，他的确想走。他走了，清华的风气就有变更的可能。不过我们决不能让郭来。想来想去，最妥当的办法是劳你的驾。清华校长，再在现在状况之下，要有下列几点：（一）通过外交部，（二）美使馆不反对，（三）学生不反对。除了这三点以外，我们希望能得一个学者，有勇敢心者，并且有好的 taste（风趣）者。可是这种人能有多少呢？有人提过马寅初，但他是太好好的一个先生，恐怕整顿清华不起来。有人同我说王雪艇很有点力量，我也是这样想，但恐怕打不进外交部，而且他不是留美学生，美使馆也需要反对他。如果你肯来，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是学者，有志意者，有资望者，是美国留学生（这并不是我特别亲美，不过事

实不能不这样），是与现今外交当局很有交情，又是能开刀的好手。你肯来，就千妥万妥；你不肯来，那就找不出什么适宜的人来了。请你不要看轻了清华的机会。我并不是清华派，平常也不甚重视清华的。不过我常常有两种思想：第一，我既然进了清华，一天不离清华，便一天不能忘情于清华的改良；第二，清华进款每年有二百万左右，以后还可增加，在现在中国财政状况之下，的确不算少。依我看来，二三年内，北方国立大学，不会得有进行的机会；而教会学校，总是教会学校，不可教也；私立学校，总是小家气，不能立也。所以不绝如缕的大学教育，在北方只得从清华着想。若是能把清华本身弄好，把出洋的糜费减少，清华便有百余万的经费。以此吸收北京各大学的像样教授和像样学生，也绰乎有余。北京各大学的好人像通伯、雪艇的境况，你是知道的。你说是不是应该给他们一个好好教授的地方，以维持我们的大学教育么？

我是很表同情于北大的，深深地希望通伯等为北大出力，把北大弄好。以后要是有机会，大家都进北大去发展，但是谁敢说北大的经济在这几年内有希望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这种时候，当然应该向有希望的地方进行。

总之，我以为清华在未来几年内，负有维持北方大学教育的重任，凡有能力做他的校长者，不可不试。校长不是一种有趣的事情，我可承认。但是我敢说，若是我自己的年岁大一点，资望深一点，我也一定敢牺牲自己安闲读书的生活，去尝一尝校长的辛味。

或许你又要说，你没有力量来做胜任的校长，这一点请你万万不要客气。你要肯来，校内校外俱不患没人帮助。我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也有三分潜势力；你尽管来开刀整顿，我们一起人一定竭力地帮助（说一句笑话，即使你的刀开到我的身上，我还是十分赞助）。校外的像《现代评论》那班人，你如做了校长，都有愿进清华帮忙的可能。所以清华决不是莫可救药的。

只消你说你愿意考虑我的建议，我便想法宣传；这个宣传功夫，当然不

至十分费力，因为大多数的人是十分希望你来的。

临了，请你说明白，要是你可以来，我能否把你的复信酌量发表？这事我当然会谨慎将事，请放心。

我希望不久即可以得到一封满意的复信。

祝你一路平安，多见，多闻。

钱端升

十五年十一月四日】

——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6—409页。

胡适原信眉批：

【“我愿意考虑你的提议，却十分不愿意你去‘设法宣传’。这是我答复。请谅解此意。”】

——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6页。

【接着又有传说曹要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做经理，想请郭鸿声（按鸿声即郭秉文之字）来接任。前面说过，郭秉文是清华主流派反对最力的人物，曹此时为何请郭，原因不明。钱端升知道后，再度为胡适活动起来。钱说他自己不是“清华派”（原注一），不过既进了清华，便不能忘情它的改良。他在1926年11月给胡适的一封长信，透露了许多清华权力竞争的内幕，证明本文前面的分析是正确的。在这封信中，钱端升向胡适表示，“我们决不能让郭来，想来想去，最妥当的办法还是劳你的驾”，但要通过外交部、美使馆与学生三关。钱说清华同事都希望能请一位学者，有勇气，有好品味的人来担任此职。有人提过马寅初，惟马是一位好好先生，恐怕不能整顿清华。亦有人提过王世杰，但他不是留美学生，外交部和美使馆也需要反对。如果胡适肯来，则可通过此二关。若能来，必有内助。钱端升说，“我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亦有三分潜势力。你尽管开刀整顿，我们一起人一定竭力地帮助。”又说《现代评论社》那班人也都会进清华来帮忙的。总之，清华在未来数年内将负起维持北方大学教育的重任，“凡有能力做他的校长者，

不可不试”，如能接受，就设法宣传（可能指对学生而言）。这是一封清华权力结构有分析力和煽动性的信。胡适时在英国，收到信后在信眉上批云，“我愿意考虑你的提议，却十分不愿意你去设法宣传”。（原注二）如果曹云祥真的离去，胡适应可顺利地接掌清华。可是事情又发生变化，曹云祥继续留任，钱端升的运动又告落空。】

原注一：【《传记文学》卷16，1992年1月，第1期，第141-145页。钱说自己不是清华派的理由是：一因自己是插班生，在清华仅二年。二因他自美返国后，执教北京大学而非清华。】

原注二：【梁锡华编：《胡适密藏书信选》（台北，远景，1982年），第569-573页，钱致胡函。】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2-83页。

1960年11月7日，胡适曾向胡颂平先生提及任清华校长事：

【先生谈起白话的电报说：“当年我在上海居住的时候，清华大学闹风潮。张歆海等几个人想要我出来当校长，我复了一个白话电话：

干不了。谢谢。

不是只消五个字的电报而又很明白吗？”】

——胡颂平编：《胡适之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77页。

吴宓晚访钱端升。

【晚访钱、叶及Winter。】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6页。

11月25日

吴宓晚访钱端升。

【晚，在钱、叶二君处谈。】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5页。

11月26日

吴宓与钱端升在 Winter 处谈。

【晚，在 Winter 处，共钱端升谈，直至就寝时始归。】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56 页。

1927年(27岁)

1月5日

吴宓决定回陕省父。钱端升劝阻之。

【晚，君毅来。又钱端升来，颇劝宓勿赴陕，谓其事危险。宓谓当三思。】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74 ~ 275 页。

春

钱端升在北大兼任教授。

【1927年春季，我开始在北京大学兼任教授，教政治和法律两系的宪法课。】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65 页。

2月5日

在《现代评论》发表《美国对华的外交》一文。

该文起笔于汉口事件后英国的形势：若得不到日美的合作，英国的蛮横就难以实行，而日本对华外交政策比较明了，但美国是不是会袖手旁观，值得观察。钱端升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动力有四种：资本家、海陆军及官僚、国会和舆论。据钱端升分析，美国资本家在华贸易仅占对外贸易的 3%，

远小于英国和日本，基本工业更是绝无仅有，因此资本家主张干涉中国者极少；而海陆军及外交系统的官僚，不似英、日有所谓行业精神，尚无尾大不掉的势力，对华感情亦算不上差，并无来中国耀武扬威的心理，故不至于兴风作浪；就国会而言，议员中传统议员较多，会对外表达意见，但偏向于自由平等、少管闲事，对华感想不外是注重中美向来的亲善，不愿同贪得无厌的列强共同肆虐中国；就舆论而言，各类日报大多是政党的机关，涉及外交的言论多愿听命于政府，而不自作主张，势力大，但亦对华友好；除报纸外社团决议案、请愿书等，就对华方针而言，更注重商业和教会利益，故中国应留神切勿伤害教士和商人利益。综上所述，从外交政策原动力角度，美国尚不大可能做出仇华举动。钱端升进一步表示，美国总统制政府下，国务卿居于外长地位，但现任国务卿人选对于欧亚两州事务并无参与兴趣，动武更是谈不上。钱端升更是从宪法规定的条约通过权为依据，表示条约主要取决于总统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沟通，虽有请求总统与中国缔结平等条约之举，但并无强迫措辞。综上所述，钱端升认为美国和英国一个鼻孔出气的可能性极小，中国反而可以树立倒英的目标，善加利用，极力联络美国的议员和舆论。

——钱端升：《美国对华的外交》，载《现代评论》1927年2月5日，第5卷第113期，第5-9页。

4月9日

在《现代评论》发表《收回上海租界的迫切》一文。

该文开头即指出，“上海归入国民政府之版图，已经半月余，而收回租界的工作尚未进行”，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都是雷声大但雨点小，钱端升由此落笔，展开对租界问题的述评。钱端升特别强调，其他租界早收回晚收回利害不大，但1个上海租界的重要性，远胜于其他22个租界的重要性，“因为他和革命事业处对敌地位，绝对不能不趁早收回”。钱端升指出，“要思藉谈判而望英国——或其他各国——斯斯文文地把上海租界交给我们，恐怕是

与虎谋皮罢”，但鉴于“上海租界是在华帝国主义者的大本营：他们所赖以压迫我们、侵略我们的一切事业和机关，十九都以上海租界为根据地。狂吠乱噬的西字报，造谣惑众的外国通信社，操纵金融的外国银行，出没长江的外国军舰——哪一个不以上海租界为中心点，而助长帝国主义者的势焰？”钱端升由此指出，“上海租界一日不收回，那种势焰就多一日的继长增高，而革命的障碍也就一日大一日。革命和上海租界，实在是势不两立”。钱端升进而论证，收回上海租界，缓进也不是一个办法，不能指望外国人知难而退，不费一兵一卒而交还租界，和平、武力与先后缓急没有联系，与其将来动武，不如现在就发端；而从时机的角度，钱端升认为鉴于北伐的进展，上海租界也有即日收回的必要。钱端升指出，“帝国主义者是受挫击不叫饶的，区区纸上要求，谁也知道不会发生什么效力……老实说，上海的大批外国军队，是永远不会自动撤退的。要他们开步走，迟早总须得用些实力。现在也许用些威胁，就可以把他们赶跑；以后则非用军力不行”。钱端升还指出，在现在的局面下，撤除租界警备和取消租界很难截然分开，故虽然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收回租界，则着手时可以从要求撤除警备入手。

——钱端升：《收回上海租界的迫切》，载《现代评论》1927年4月9日，第5卷第122期，第5-7页。

5月1日

钱端升母丧。

【晴。星期。是日钱端升母丧，在京中聚贤堂开吊。本约定为知宾，以目疾未能往也。以困居室中，极苦寂寞，故于上午柬招张荫麟来谈。】

——吴宓：《吴宓日记》卷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5页。

夏红注：

吴宓回陕省亲，4月25日回校。

钱氏母丧，殊可痛也。听钱大都先生讲，钱端升的父亲在1917年钱端升考上清华不久就逝世，故钱端升刚上清华就回家奔丧。恰十年后，母亲再

驾鹤西去，钱端升自此无人疼矣。

钱端升似此后就不在清华，吴宓日记 1927 年未再现也。

5 月

《清华大学一览（1927 年）》出版，载有《学程大纲》及各系专修课程与教师名录。

【历史学系

教授：梁启超 陆懋德 麻 伦 刘崇鋳

讲师：钱端升

助教：梁廷灿 蒋善国

历史学系学程（附学生和任课教师）

第一年

国文 6 英文 6 自然科学一门（物理、化学、生物学择一）6 或 8 中国通史 8（陆懋德） 西洋通史 8（刘崇鋳）

第二年

历史研究法 2（梁启超） 中国近代史或欧洲百年史 8（钱端升） 本系选习 8 自由选习 18 或 20】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1-52 页。

夏红注：

看来是高估了 1926 年 5 月政治学系成立之于钱端升的意义。因此到次年钱端升仍然是历史学系的讲师。学政治而教历史，将心比心，钱端升的心情恐怕不能算好，所以 1927 年起在北大兼课并讲授政治学不是没有理由的。梁启超居然曾和钱端升为清华历史系同事，此乃新发现也！

【学位：博士；姓名：钱端升；级别：1919；系别：政治系；职别：教授；备注：清华批判者】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142页。

夏红注：

同样来自《清华一览》(1927)的史料，但齐家莹和苏云峰所获取的信息竟有天壤之别。莫非钱端升此时为政治系专任教授，前往历史系代课只是兼职，而兼职又不能以教授称之？待求考。

钱端升碰见卫聚贤，谈及清华校长事情。

【另一封卫聚贤写给胡适的信中云：

“北京确下，第三集团已入驻北京。清华校长问题因之发生，生曰昨晚与外交部某友人谈清华校长问题，他说外交部方面欲委托查良钊（现河南教育厅长，前北京师大校长），生略露先生长清适宜，他说先生向与西北军（冯）不接头……今日见钱端升先生，他说清华校长还无人提及讨论过……生云将来由何处委，他说由大学院委，不由外交部委……”】

——邓云乡：《“文化古城”简说》，载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页。

春夏

钱端升南下，秋季时应南京中央大学之聘任，前往南京执教。

【1927年春夏奉系军阀入关，对教育界、报界人士极为横暴，我于是南走沪宁，秋季应南京中央大学之聘为政治系副教授。“副教授”为该校是年教师最高职称，因为有人认为只有像巴黎、里昂等大学的教授才配称“教授”，于是，凡受该校聘者，不问男女老少，也不论文、法、理、工、农、医，一律贬称“副教授”，受之者颇觉可笑，幸而我并无愠色。】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著：《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566页。

7月30日

在《现代评论》发表《设立中央计划委员会刍议》一文。

在此文中，钱端升提出，革命本身是建设不是破坏，革命过程中破坏是为了更好地建设。鉴于北伐尚未成功但各地的建设事业已在突飞猛进中，而现有中央政治会议又无法实现计划功能，只要新设法制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机构而执掌计划事宜，钱端升认为，“设了许多不相统属的委员会，而由一个忙不过来的政治会议总其成，总不是个完善的办法”，遂建议中央设立一个中央计划委员会，兼承担立法和调查研究机关的职能。按照钱端升的设想，“它可以同立法机关一样，把种种建制或革废的事物，提出讨论，拟定办法，通过法案或决议案送呈政治会议。如政治会议认为可行，则成为法律或决议；如不可行，则可以交计划委员会复议，或竟予搁置。换言之，计划委员会关于一切计划事宜，成为政治会议的预备会。有了计划委员会，凡计划的事宜可以预先得精审的讨论，而政治会议可以腾出时间来专管党国的要事”。而从计划委员会的组成来看，钱端升认为应该有一大半是专门学者或者富有经验者，能够以调查和研究来制订计划，应该以四十人左右为宜，其中部分为政治、法律专家，而部分为经济专家，剩下的名额则酌量分配。鉴于计划委员会与政治会议的特殊紧密关系，钱端升认为，可以将计划委员会视为政治会议的预备会，政治会议成员可以自由列席计划委员会及其分委员会，而政治会议讨论有关计划事宜，亦可以令计划委员会派员陈述一切。由此种种，钱端升希望中央计划委员会能够使得建设事业可以顺利进行，中央政治会议的效率亦可以大幅度增加。

——钱端升：《设立中央计划委员会刍议》，载《现代评论》1927年7月30日，第6卷第138期，第10-12页。

8月6日

钱端升在《现代评论》发表《党治与舆论》一文。

该文从言论自由起笔。钱端升开篇即提及，民国十余年来，舆论自由状况每况愈下，除了民国初年短暂的曙光，直奉军阀盘踞中国后，封报馆、扣报纸、杀主笔、摧残舆论，无所不用其极；此次北伐之后，全国舆论中心上

海亦归民国版图，然而军事倥偬、党国多难，舆论自由状况并未明显好转，“一部分人就怀疑国民党也是不能扶翼舆论，甚至于讥党治下的舆论比以前更是不自由”。钱端升认为，这种怀疑的发生，“大部分是由于一般国民未能充分了解党治的意义”。钱端升指出，国人多以欧美政党比较中国国民党，以欧美政党政府比中国党治，鉴于欧美国家总是容忍反党舆论，故中国也应容忍研究系、政学系、醒狮派舆论的存在。钱端升认为这是由于国人对国民党的不了解。在钱端升看来，国民党是一个革命党，其使命是全盘革命而非局部改良、零星改革，故党员应是赞成革命的民众的全部分，而不像通常政党只有少部分人加入；职是之故，英美诸国可以有好几个政党存在，但中国只能有一个国民党，不能有其他的政党，更遑论研究系、政学系等等尚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政党，“真正的政党，即使有之，也没有在中国存在的余地。如其这些政党大体是赞成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他们就应加入国民党；如其不赞成国民革命，那他们就是反革命，应得在打倒之列”。鉴于此，钱端升特别强调，国民党与一般政党的不同，也决定了国民党党治与普通政党政治的根本不同，“国民党的党治是全体革命民众的政治，当然用不到去保留反革命而且反国民党的党系了。因此在党治之下，只有拥护国民革命和同情国民革命的舆论，才有扶植的价值，保护的权力；其他的舆论，或反对党的，或是反革命的，不但不避扶植，不但不必容忍，而且应当老实不客气的取缔，不如是国民革命的路程上便多阻碍了”。

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钱端升还指出，反革命的舆论固然应该严厉取缔，而赞助革命的舆论则应竭力奖励。钱端升把赞助革命的舆论又分为两类：赞许革命、宣传国民党宗旨的舆论和批评政府方略、指摘政府用人行政的舆论。对于前者当然不光应该扶植，还应该积极奖励，甚至由党国自行办理；对于批评的舆论，也应当扶植，“反革命的舆论根本是不利于革命的，批评的舆论却不一定是反对革命；所以反革命的舆论应取缔，而以真实的态度、革命的目光，批评政府的方略或用人行政的议论，不但不应当与反革命的舆论混在一起，而且应当绝对的尊重，庶几能‘过则改之，无则加勉’”。

当然，钱端升也没把话说死，“批评也须有一个限度，绝不是说谩骂或讥笑也值得扶植”。另外，钱端升还为这种取缔设定了一个限度，“反革命的言论固然应该取缔，谩骂讥笑的论调固然应禁止，但也须有一定的准则，绝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取缔或禁止的。……所以党部或政府应当早日制定出版条例，庶几因作反革命言论或取谩骂讥笑论调者，也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后，才得处分，如是则值得扶植的舆论，更无误被取缔的危险了”。钱端升最后甚至将此上升到反党的层面：“反对党治的人总说党治下无舆论，这原是厚诬党治的言论。所以国民党要积极提倡舆论——批评的和称许的应一样待遇——才能扫除这种诬蔑咧。”

——钱端升：《党治与舆论》，载《现代评论》1927年8月6日，第6卷第139期，第7-10页。

8月20日

在《现代评论》发表《日内瓦海军会议》一文。

该文略述8月4日以失败告终的英美日海军会议。钱端升指出，日内瓦会议本是华盛顿会议的延长，但华盛顿会议以成功告终，而日内瓦会议却宣告失败。各国的争议点有如下四点：其一，舰的吨量和炮的大小；其二，舰龄；其三，吨数的比例；其四，总吨数。钱端升预言，日内瓦会议的失败，将使得海军竞赛难以避免，尽管华盛顿会议限制了主力舰的发展，但近年来兴起的辅助舰将与海军竞赛毫无二致。钱端升还指出，日内瓦会议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和日本的沆瀣一气，国际形势与华盛顿会议大相径庭；虽然英日未公然联盟，但英日在华行动与联盟无异。职是之故，日内瓦会议失败的结果，便是一方面坚定中国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信心，另一方面给了中国改善中美关系的好机会。钱端升坦言：“倘若因日内瓦会议的失败，英日得以团结，而我仍不获一助，那才是我们的双料失败呵。”

——钱端升：《日内瓦海军会议》，载《现代评论》1927年8月20日，第6卷第141期，第5-8页。

9月24日

在《现代评论》发表《党治与用人》一文。

钱端升开篇即申言，用人，亦即任用相当的人员去担任相当的职务，是政治上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无论民主无论独裁政体，概莫能外，“才难”是古今中外所有国家的难题。而这个问题在中国国民党奉行党治之下，显得更难，因为中国只有国民党能存在，由国民党去实行国民革命，进而去消灭一切反革命的势力，西方国家政党轮替、人员轮替的情形不适合，中国特色问题是“非国民党员是否可以充任官吏的问题”。

钱端升提出，官吏是否必须由党员担任，取决于相关职务。官吏可以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位高权重，“握政府的枢纽，定施政的策略”，固在政党政治中，政务官的任免完全凭政党为转移；由此看来，国民党的政务官，亦必须是国民党员，必须忠实于党的领袖。而事务官则秉持政务官的意志，执行赋予的职务，任用也以才能、功绩为进退依据，随着政治的进化而以考试制度为其拔擢录用的依据。中国虽然是党治国家，事务官任免亦难出此窠臼。

但在钱端升看来，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人才之匮乏。而应对的办法，则是设立行政官吏养成所或专门学校，“招收青年有为学子，给以相当的训练，庶几四五年后，行政人员的来源可以不绝”。钱端升进一步论述，考试权本为五权宪法之一，国民党如要得贤明人才，则应及早施行考试制度。只是，钱端升认为，这两种方案都是西方行之有效的经验，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国民党还需要拿出全副革命的精神，来解决用人问题，以实现党治的意义，无论政务官还是事务官，如下三种人完全不能录用：其一，无耻且操守丧尽的官僚，比如王宠惠；其二，游手好闲、买空卖空的青年会派成员，比如余日章、王正廷等；其三，无行青年，道德堕落，大发横财。除此之外，钱端升提出，土豪劣绅、老朽昏庸等等，亦是有害而无益的人物，万万要不得。钱端升归纳说，国民党所需要的人才，尤其是政务官，应该有人格、有操守、有作为，富于革命新思想，“民众对于国民党的信仰，往往以国民党所用的

人为标准的；不称职的官吏愈多，则民众对于党的信仰也愈弱。……矫正的方法，除了采用考试制度以淘汰不称职的事务官外，惟有在有声望的忠实同志指挥之下，多用些敢作敢为的青年。……再为鼓励官吏的廉洁起见，俸给不妨从丰，待遇不妨从优，而规律却不可不严，凡此胥有待于文官任用的规定和监察的周密”。

——钱端升：《党治与用人》，载《现代评论》1927年9月24日，第6卷第146期，第4-7页。

10月29日

在《现代评论》发表《党纪问题》一文。

该文指出，主义、领袖与党纪，是团结党员号召党员的法宝，“党纪本是护党工具”。对于国民党尤其如此，尤其是当国民党主张以党治国，不容其他政党存在的前提下，如果国民党因党纪废弛或不存而涣散，那不光是国民党的不幸，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钱端升进一步申言，党纪的要义在于明确何种举动应受党纪约束，何种举动不受党纪约束；党章、党义及一切党的决议是任何党员都得遵守的，尤其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必须得到遵守，而国民党的总章、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则因时制宜、与时俱进，其他用人行政更是随时可以改良。另外，钱端升还强调，“遵守”“一致进行”绝非禁止一切事后的批评和变更，“国民党的决议，若是党员有不满意时，他也尽可批评，尽可谋修正；只消他在那个决议没有修正以前能照旧奉行，他就没有违背什么党纪”。而从积极方面言之，党纪的威慑力在于，“凡有不利于党的言论行动，都应在严厉取缔之列。凡是党的命令，在没有变更以前，党员应有绝对服从的义务”。

——钱端升：《党纪问题》，载《现代评论》1927年10月29日，第6卷第151期，第3-5页。

11月12日

在《现代评论》发表《上海临时法院的存废问题》一文。

钱端升开篇即指出，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的问题根源在于会审公廨，会审公廨基于《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而合法有效，但随着帝国主义的逐步侵害，领事裁判权被逐步扩大，临时法院也成了上海领事团所操纵的侵华机关。尽管五卅惨案以来朝野各方收回会审公廨的努力未取得成效，但国民政府当局应着眼于要么将之完全取消而设置特别法院，要么恢复会审公廨。钱端升指出，上海临时法院背后是会审公廨问题，其存在本身有三个恶果：其一，按照旧约，中国政府可以独立任命法官，但现在反而需要通知领事团；其二，领团向会审公廨设置职员，属于法外行动，但现在连书记官都归领团推荐；其三，纯华人案件领团本无容置喙，但现有相关案件需领事官派员观审。钱端升指出，临时法院的根源是不平等条约问题，国民政府应坚守其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立场，对此万万不能承认。钱端升建议，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应积极把事实上的容忍换成法律上永久的废除，可以借临时法院的存废问题，在包括租界问题、领事裁判权问题在内的不平等条约废除方面积极作为。

——钱端升：《上海临时法院的存废问题》，载《现代评论》1927年11月12日，第6卷第153期，第5-7页。

12月10日

在《现代评论》发表书评《王世杰氏的〈比较宪法〉》。

在该文开头，钱端升提及，尽管最近七八年来出版界算是比较有生气，但社会科学图书依然以译介或小册子为主，大部头的著作极其稀缺，即便有亦以拾人牙慧为主，真正有价值的大部头凤毛麟角。正因为如此，王世杰的《比较宪法》才分外值得关注。而在这之前，中国之前有关宪法的著作，在钱端升看来，大多要么是似通非通的译本，要么是名写实抄的嚼蜡之作。在钱端升看来，任何良好的教本或者参考书应该“以许多名家著作作为根据，参以著者自己的意见，加上精细的抉择和簇新的编制”，但这一条件在王世杰的《比较宪法》出版前，极少有作品具备。

在钱端升看来，王世杰的《比较宪法》亮点之一，便是不以国别为讨论标准，而是以宪法中的相关问题为讨论标准，钱端升认为这种法国式的治学法，才是真正的比较，而非国别宪法的“各论”。当然，钱端升也清醒地看到了中、法学术方法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差别：法国具有悠久的宪政史，任何制度都可以和国外宪政做比较研究，而中国从来不是立宪国家，宪法具文极少实行，故亦很难拿具体制度与别国比较。

在这篇书评中，钱端升对王世杰《比较宪法》的评论基本中立，是者是之，非者非之。钱端升特别肯定了两点：其一，书中推论主权一节极其精彩，而这个问题本身十分艰深，能够深入浅出、有条不紊，颇可称许；个人基本权利一章亦不乏亮点，作者能够把现代宪治允许的个人自由说明白，甚至比不少外国著作说得还好，“难能可贵”；对于国家组合制度，王世杰在“联邦制度”一节中的论述亦颇为钱端升所认同。其二，王世杰书末所写的《中国制宪问题的经过》一章，在钱端升看来虽然类似附录，但是极其有用，远胜于中国宪法史书籍中的报纸式记录或者不得要领的杂糅，其“取材之精审，记述之扼要，实凌驾一切所谓中国宪法史而上之”，被钱端升称为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钱端升认为，该书“内容的详尽，态度的纯正，叙述的简当，议论的中肯，见解的透彻，俱足以使它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出版物中取得特殊的地位”。虽然著者的原意，只是在供给大学学生的浏览，实则任何对于宪法有问题有兴趣的人也须得一读。

当然，钱端升对王世杰也有批评，要点在如下五个方面：其一，王世杰自述偏重于陈述而少议论，这种不置可否而罗列观点的做法，“有时竟会使读者如坠五里雾中”。其二，该书除末尾中国宪法史，其他如国家及宪法的概念、人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国家组合制度及宪法修改，都是法国式宪法教科书中司空见惯的内容，在这方面王世杰创新有限，王世杰对日本、德国学者关于国家职权分立理论论述有意无意的忽略，在钱端升看来更是一大遗憾。其三，王世杰的《比较宪法》未能避开详略不均的学术书通病，对选举权、人民基本权利论述周详，但对于法院等问题却失之简略。其

四，王世杰的《比较宪法》亦有不少知识和细节上的错讹，钱端升一一做了订正。其五，钱端升认为该书所用的术语，因随俗多用日本名词，不相宜之处比比皆是，列举的参考书籍亦有欠考虑的地方。

——钱端升：《王世杰氏的〈比较宪法〉》，载《现代评论》1927年12月10日，第7卷第157期，第17-19页。

夏红按：《清华法律评论》编辑刘猛在2015年重刊此文时撰写的“编者按”中指出，尽管王世杰、钱端升合著的《比较宪法》在学界几近妇孺皆知，但钱端升早年评论王世杰独著《比较宪法》的书评颇不为后人所注意，除了北京政法学院联合批判小组于1958年撰写的《批判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初稿）》外，几十年仅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潘惠祥在其2009年发表于《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的《钱端升的美国政治学背景析论》中提及。

1928年(28岁)

3月24日

以“山木”之名，在《现代评论》发表《党治与国民会议》一文。

该文开篇即提及，“党治与国民会议是国民党的两种根本主张，同时也是国民党的解释中最费解释的两种主张”。军事统一完成之后，与党治及国民会议相关的诸多问题，则成为最高决策者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

钱端升提及，党治主义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在于使得一切政治、经济、军事等势力都受党的支配，“以党治国”；而消极的方面则在于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党外无党”。钱端升指出，革命的目的在于消除一切恶势力，而消除这种恶势力必须要凭借强大的革命武力，才能摧枯拉朽，“在革命的过程中，我们果没有一种伟大的政党支配革命的武力，或虽有了这样的一个政党，同时容许反对党之存在，使彼日以攻讦排挤，灭杀这个政党的权威，摇撼一般军人服从党纪的信心，则所谓国民革命，终必演成一个军治的局面。所以党治的第一功用，就在防止军治”。而党治的第

二功用，则在于监督官治、扶植民治，失败的议会史已证明一般民众如果没有相当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组织，议会制度或其他民治制度都不会发生良好效果，职是之故，孙中山先生提出训政。钱端升指出，训政不能完全交付官僚，“假使军事统一之后我们立将训政的工作完全交付政府，而不于政府之外或政府之上，保留一个富于革命性的有极大权威的政党，以支配政府，以策励政府，我们又怎能保障这个政府，不至敷衍苟且，延长民治制度实现的期间，蹈前清官僚训政的覆辙呢？”

钱端升指出，无论军政训政时期，党治都需要维持。但是对于“军政训政”的具体阶段，则需要结合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来确定，而坊间所争议的国民会议与国民大会，尽管都是民意机构，但其构成、初衷等等千差万别，并非同一个事物。

综上所述，在钱端升看来，无论如何，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忠实于孙中山的建国理想，切实按照《建国大纲》展开训政工作；而在全国过半数以上省份完成训政工作之前，则应坚持党治原则，而不应遽然召开国民大会或国民会议；在全国过半数省份完成训政工作之后，就应该召集国民大会，制定中央正式宪法，开始推行宪政，“党治与国民会议是相续的，不是可以同时并行的”。

——山木：《党治与国民会议》，载《现代评论》1928年3月24日。

5月17日

钱端升致信胡适。

【昨夜钱端升信来，说：

“你几时来？太坚辞了也好像生气似的；演讲不要再却了罢？”

今天经农也有信来，说：“希望你即日来京。”我想一年不到南京，早已招人疑怪，今天去还可以看见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的大会，遂决计今晚启程。】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35页。

夏红注：

这是钱端升首次出现在胡适日记中。

5月18日

胡适与钱端升见面。

【与端升同到成贤街五八号，此即任叔永旧宅，现为端升、经农、奚若、楼光来诸人的寓所。他们要我住在这里。】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36页。

5月19日

胡适与钱端升等一道赴宴。

【回到寓所后，与朱（经农）、张（奚若）、钱（端升）三位同到国民政府的宴会。我们到时，也快吃完了；原来他们都是站着吃，每人只有一盘菜，一盘面包，一杯饮料；故吃的很快。我们后到，排在一根大柱子旁边，我很高兴，怕他们看见我要我说话。】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38页。

5月20日

钱端升与胡适等一道出游。

【到大学院，与杏佛、经农、端升、奚若、高君珊以及蔡先生夫妇，同去游览。先到第一林场，后到子敬的建业农场，午刻到灵谷寺吃饭。蔡先生半路被政府打电话追了回去，因为昨日日本可能有个觉书，故外交委员会开会议此事。

杏佛与子敬骑马游山，精神甚好。国民政府之下，有些小事确可以使人乐观。如蔡先生在大学院打球，如张之江、谭延闿等在国府前比赛骑马，如中大校长张乃燕与教职员学生比球，如昨晚国府宴会上大家站着三个钟头，这都是新气象的一点表现。虽然浅薄，究胜于无。

杏佛近年来过的生活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在铭德里时，家中虽有灶而不举火，烧水都没有器具。他常说，他的生活可叫蜡烛主义，点完即算了。现

在他居然天天出去骑马；昨晚我们赴宴晚了，也正是因为野外骑马去了。我们等候他的汽车来邀。这种气象使人起一点兴致。

下午回到第一林场，坐了一会。杏佛提议去游紫霞洞。紫霞洞山前可望见孙中山墓，看的很清楚。造墓费预算一百万两。

在紫霞洞时，大家因为陈剑修有婚姻问题，故主张代他求一签。后来大家都各求一签，大都无甚意义。独有我的一签的签诗奇怪之至，文字也很通顺。我此番来南京，真所谓“谄鬼神”也！】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39-140页。

【全国教育会议日刊第13号（民国17年5月29日），捡得旧稿，存之。

紫霞洞求签记

5月20日星期，教育会议的各位代表都结队出去游览南京的名胜。有上中山墓的，有游明陵的，有到灵谷寺的，有游燕子矶的，大家都兴高采烈，表过不提。

单说其中有一个游览队，那天下午游到了紫霞洞，这一队里有蔡院长夫人、杨杏佛、高君珊、朱经农、张奚若、钱端升、周仲奇、周子敬、陈剑修、胡适之等十个人。

这一行人到了紫霞洞，坐下吃茶，大家都信口乱谈。其中有人知道甲先生近来有点心事，便提议替甲先生求一支神签。胡适之便取过签筒来，抽出一签，是第十七签，签诗记不清了。甲先生接过签诗一看，跳起来喊道，“不灵！不灵！别人抽的不算！”于是他自己走过去，抽出一签。这一签真灵了，因为甲先生不喊“不灵”了。一会儿大家围拢来要看签诗，但是这签诗立刻就看不见了，大概有人藏起来带回去留作纪念品罢。

风气一开，同来的人都求签了。乙先生求得第九签，诗“时运大通之象”。诗云：

拨开云雾睹青天，况是中天日正圆。

匹马通衢无阻碍，佳声美誉得争传。

乙先生是骑马来游的，所以他说：“这诗有点意思！”

丙先生抽得第二十五签，诗云：

宁待震雷惊曲突，直教群蛰尽回头。

丙先生新任教育行政机关要职，我们都希望他不久便给我们一声“震雷”，群蛰回头，教育大兴。

丁夫人抽得第五十签，诗云：

不若用和为贵美，团团碧月满乾坤。

丁夫人前两天新到南京，夫妇儿子媳妇团聚一堂，正是团圆碧月之象。

戊先生得四十四签更妙了。诗云：

眼前清浊须分别，莫作寻常容易看。

他现在主管图书审查的事，大可以把这两句话写在他办公室的墙上，作个座右铭。

己先生脚上有病，走不上山，坐在山下汽车里等我们。端升代他抽得第十八签，诗的末句云：

家肥端自俭中来。

己先生从前在北京穷的不得了，但他替他的夫人挑衣料是向来不惜重资的。近来他又贫又病，居然学会了省俭的生活，却不料还要受山鬼的教训啊！

但最厉害的教训还算得是庚先生的第十二签。诗云：

恶衣粗食且认真，逢桥下马莫辞频。

流行坎坷非寻常，何必区区谄鬼神。

庚先生去年归国，在上海做了一年的野鸡教员。足迹不到南京。这回初次到新都来观光，便有一家促狭的报纸，说他奉“要人电召”而来，今天在这里还要受山鬼的揶揄，真是活该！

听说庚先生第二天就要搭车走了，临行时还把紫霞洞的签诗贴在他的日记里，并且发了一个大誓。誓词的内容，待探明报告。】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00—402页。

夏红注：

据胡适日记的整理者曹伯言附注，在这天的日记下面本来附有六幅图片，其中有“高君珊女士、蔡子民夫人在灵谷寺，钱端升照的”，胡适“在第一林场，钱端升照的”等字样，只是这些照片以及文字“均模糊不清，从略”（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42页）。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对此几日情形记述如下：

【五月十五日 在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先生自己的记载：

在民国十七年五月十八日的日记里，我曾详记我在南京王雪艇先生寓中同吴稚晖先生同桌吃饭，饭后大谈的情形。其中有这一段：

稚晖先生总忧虑共产党还要大得意一番，中国免不了杀人放火之劫。我却不这样想。……这是二十五年前的谈话。现在看来，我是错了，他的远虑是很可以佩服的。

——《追念吴稚晖先生》，载《吴稚晖先生纪念集》，第15页。

先生生前和编者谈起这次到南京去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当大学院院长的时候，蔡先生要我担任大学院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那年五月里，大学院举行全国教育会议，蔡先生托人到上海来表示，要我去出席，我去了。那天开了会，晚上蔡先生招待我，要我说话，我也说了话。开了会，去玩紫云洞，同去的是蔡夫人、杨杏佛、陈剑修、高君珊和我几个人。大家到了紫云洞，陈剑修为了他的婚姻问题求了一条签诗，我记不得了。杏佛觉得好玩，也求了一条。我记得末尾两句：

残照一鞭归去也，

路人争道马如飞。

蔡先生以前引过一句诗：“杀君马者道旁儿。”意思是说，路旁的人赞你的马跑得快，于是你更得意，你更加鞭，结果你的马力尽了，终于跑死了。过不了几年，杏佛就被刺死了。

那时大家都觉得好玩，也劝我抽了一张。我那一张的签诗是这样的：

恶衣粗食且认真，逢桥下马莫辞频。

流行坎坷非寻常，何必区区谄鬼神。

我对大家说：“你们看，签诗要我不必谄媚鬼神，还是早走为是。”当天就坐夜车回上海了。

——胡颂平：《从适之先生的墓园说起》，载《传记文学》四卷二期，1964年版。】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733-735页。

夏红注：

根据胡适日记以及其他资料，不难发现胡颂平的记述略有错误，胡适并没有在当天晚上就回到上海，而是5月21日晚上。

5月21日

胡适、钱端升等商量高仁山追悼会的程序。

【又与端升、经农、赵述庭共商廿四日高仁山追悼会的程序。此事只有三日了，尚未有预备。仁山夫人陶曾谷又因小孩生病前天回无锡了。我不能等到此会，故催他们做点筹备。】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44页。

【晚上杏佛、经农、君珊、端升与我同去吃饭，谈的极高兴，然后作别。九点上车，天热不能即睡，车开后许久始睡。】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45页。

5月22日

胡适致江冬秀的信中，提及钱端升。

【十七夜搭车往南京去了一趟，住了三夜，昨夜仍搭夜车回来。我虽然辞了“专家”委员，又辞了公开讲演，但经农、端升、云五都写信来，说至少须以“大学委员会”名义到会一次，免得“太露相”了，一班朋友不好相见。

所以我决定去走一次，开了两次大会，陪蔡先生、夫人玩了一天山，始终不曾在会场上开口一次。只在两次宴会席上说了几句话，总算不曾得罪人。】

——胡适：《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7页。

6月15日

胡适为中央大学换校长风潮前往南京，再次和钱端升等见面。

【六点半到南京，与梦麟、仲苏、郑韶觉同到东方饭店。早餐后，同往大学院。我先到成贤街八号，问奚若、端升二人的意见。奚若详述中央大学易校长的经过，其大意有以下各点。

（一）此事发端在中央党部的陈果夫、叶楚伦；他们听了许多流言，以为中大即将有大风潮，并且有政治意味，故他们要蔡先生早日解决此事，请他自己兼任校长。

（二）蔡杨事前不曾先与张静江、张乃燕商量。故引起许多误会。

（三）杏佛处置也有许多失当之处；奚若是高等教育处长，事前全不知道。那天他偶然到杏佛房里，只见他同杨孝述谈胡刚复事；杏佛说：“刚复为什么不辞职？”杨孝述说：“他不久就要走的。”杏佛说：“不久！来不及了。”他就取纸大书“调任张乃燕为大学院参事”、“任命吴敬恒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等等命令。允中与奚若面面相觑，只好不开口。所以奚若对我说：“我做高等教育处长，比一个书记也比不上，不走还等什么？”

他们也略述北大的问题的经过。】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79—180页。

8月25日

郭廷以致信罗加伦，在摸清清华情况后，欢迎罗加伦北上就职。钱端升等一并受到邀请。

【在校同学对于毕业同学，感情颇恶，决难合作。彼等认明盘踞清华而

使学校陷于目今情境者，均为毕业同学。故在京毕业生以“罗某掌校，誓死反对”之电报，及“清华将北大化”之宣传，激惑在校同学，竟均不为所动，而一笑置之。同学对于现任教员，极多不满者。学生评议会已议决驱逐者十余人，职员尤多。彼等深望周鯁生、秉志、胡步曾、钱端生（升）、陆志韦、傅孟真等能于秋间到校。我师一再致意于吴宓，不知吴早已宣言不与我师合作。清华各系同学于吴均一致不满，对赵元任尚好。】

——郭廷以：《致志希师》，1928年8月25日。转引自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12页。

8月30日

是日起，清华学生会代表拜访钱端升等。

【诚如郭所说，清华学生会代表萧仁树、傅任敢、钟一帆3人于22日南下，30日起拜会大学院副院长杨杏佛、大学院文化处处长钱端升、外交部次长唐悦良、参事张敬海、新校长罗加伦、南京清华同学会蔡竞平及张静愚、上海清华同学会洪深及吴毓骧等人，9月8日返校，写了一篇详细的《南下代表报告书》。】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页。

9月12日

钱端升与郑之蕃之侄女断绝关系。

【正午郑之蕃来谈。因谈钱端升与郑君之侄女断绝事，宓遂以毅及彦之历史告郑。郑极言毅所行非理。】

——吴宓：《吴宓日记》卷四，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7页。

9月29日

在《现代评论》发表《立法权的行使与立法院》一文。

根据作者文末标注的时间判断，此文写作于9月25日。在此文中，钱端升对立法权问题做了详细论述。钱端升首先提出，在一般宪政国家，立法权的行使正常情况下需要四种步骤：建议、讨论、裁可及公布。就建议权而言，一般分散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人民本身，而且应排除人民请愿式的建议权。而讨论权则专属于立法机关，“无论何人所提的法律草案，在立宪国家俱须经过国会的讨论及表决”。而裁可权则是立法的重要条件，由国家权力最高机关行使，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共享。而公布权则专属于行政机关，大体上属于立法程序的最后一步。而在采行“直接立法”的国家，人民既享有创制权也享有建议权，国会有义务审议人民以创制而提出的法律案，甚至人民可以不经过讨论而直接将创制的法律草案提出复决，甚至行使裁可权。钱端升指出，国民政府过去的立法权行使极其特殊，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亦系国家法律主权之所寄，而党治下裁可法律的权力则属于党的代表大会或者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法律的权力由中央政治会议行使；建议法律的权力由政治会议本身和其委员掌握，中央执行委员交议，国民政府亦可提请；公布法律的权力则属于国民政府。也正是因为如此，“法律案讨论的简陋或免不了的，因为政治会议并不具备立法机关的各种便利。法律的执行机关——国民政府——既毫没有裁可的权，法律不易执行或竟不能执行的缺憾也是免不了的”。钱端升认为，只有到了宪政时期，五权宪法实行之后这种简陋和缺憾才会因为权力的科学配置而稍加避免。

但现在的问题是宪政尚未开始而五院即须设立，立法权又该如何行使呢？钱端升提出如下五点：其一，立法建议权很不集中，立法院、行政院及党方均可提案，党方机关甚多，为避免混乱计，立法建议权最好只赋予以下机关：立法院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和行政院。其二，立法院成立后，专行讨论权；职是之故，立法院委员和专门委员的划分既不必要，也容易产生问题。其三，五院成立后，法律的裁可权行使主体更不易确定；钱端升认为，立法裁可权应由中央政治会议统一行使，而不给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置喙该权力的可能。其四，法律的公布权仍由国民政府行使。其五，立法院

成立后，应该在立法院内部设置专门的法律起草机关。

——钱端升：《立法权的行使与立法院》，载《现代评论》1928年9月29日，第8卷第199期，第3-5页。

10月29日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载《各系主任教授讲师一览》，无钱端升。

【“经改组以后，留下的十八位教授，都是学问与教学经验，很丰富而且很有成绩的。新聘的各位教授，也都是积学之士。”（《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201页）名录如下：

.....

历史系：罗加伦（兼主任） 朱洗祖 孔繁霭 刘崇铉 张星烺 王桐龄 陈垣】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12月3日

胡适第三次与钱端升在南京见面。

【饭后到教育部，见着经农、曾毅、述庭诸人。又同经农去看奚若、端升，谈到天黑。】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57页。

1929年(29岁)

2月

钱端升在上海过春节。

【2月4日，离广州，经香港乘“林肯”号海轮到上海。夫人带着如兰、

新那到码头迎接。在上海一住 19 天，正值阴历年，看望大寄娘跟远房姨妈冯启亚，以及亲朋好友杨杏佛、钱端升、林语堂、徐志摩和王云五等，后回北平。】

——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61 页。

5 月

为专著《法国的政治组织》撰写序言。

【这册小书不过是欧美日本的政治组织的一部分。著者的计划，想把英、美、法、德、日、俄的政府合著成一本书；全书的完成尚需时日，所以先把法国那部分先行刊印。六国的政治组织牵涉甚广，为节省时间计，凡在外国文中已有相当论著的几国政府，拟就根据于那些论著酌量编订，而加以必要的增删或修正。本书取材多半本于下列各书：

Bryce, James: *Modern Democracies.*

Carire, Jean et Bourgin, Georges: *Manuel des Parties Politiques en France.*

Duguit, Leon: *Manuel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Haurion, Maurice: *Precis de Droit Administratif et de Droit Public.*

Jacques, Leon: *Les Partis Politiques sous la Troieme Republique.*

Munro, William Bennett: *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

门罗（Munro）书中关于法国的部分差不多是本书前几章的张本，著者对门罗教授尤深感谢。

钱端升

（民国）十八年五月，于南京。】

——钱端升：《序》，载钱端升：《法国的政治组织》，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

1934 年再版时，对初版序言略有修正：

【这册小书不过是欧美日本的政治组织的一部分。著者的计划，想把英、

美、法、德、日、俄的政府合著成一本书；全书的完成尚需时日，所以先把法国那部分先行刊印。六国的政治组织牵涉甚广，为节省时间计，凡在外国文中已有相当论著的几国政府，拟就根据于那些论著酌量编订，而加以必要的增删或修正。……门罗所著《欧洲各国政府》[William Bennett Munro, *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 (1925)]一书中关于法国的部分差不多是本书前几章的张本，著者对门罗教授尤深感谢。

钱端升

(民国)十八年五月，于南京。】

——钱端升：《初版序》，载钱端升：《法国的政府》，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秋

钱端升短暂失业，翻译屈勒味林之《英国史》。

【1929年秋，由于中央大学国民党派系之争和学生罢课，我被迫辞职。失去了教书之业，我只好另谋出路，乃于1929年10月至1930年夏翻译了屈勒味林的《英国史》。】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6页。

1930年(30岁)

2月18日

完成《德谟克拉西的危机及将来》一文。3月份发表于《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1号。

——钱端升：《德谟克拉西的危机及将来》，载《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0年3月，第1卷第1号，25-50页。

3月

在《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发表《德谟克拉西的危机及将来》一文。

该文共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民主，距今四五十年前的相关著作多为阐释或纪实，很少贬斥或怀疑；而法国各大革命之后，随着平民政治的真正实行，“流弊渐著”，而诋毁、斥责民主的文字亦日见其多。钱端升提及白赆士的《近代平民政治》中对平民政治的悲观论调，“即使他仍不至于绝望，仍不至于怀疑它的将来”。基于此，钱端升由此出发，打算在该文中，“要把德谟克拉西在晚近所以遭人怀疑、轻视甚或唾弃的原由及言论，解析讨论，从而推测到它的将来”。

第二部分主要阐释民主的意义。钱端升指出，就狭义来说，民主是指一种平民主政的政体，而广义的民主则介于虚实之间，既可能是哲理上的空想，也可能是社会组织的体制和人类活动的原则。钱端升指出，该文将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民主，而民主的内涵则以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为界定，尽管民是什么，有、享、治又是什么，都需要进一步界定。

第三部分综述了平民政治的趋势，“若以数字而论，欧战后的一二年要算民主国建立得最多的一个时期”。但钱端升不无遗憾地指出平民政治否极泰来的趋势：“平民政治最大的难关不意竟于此时相随而起，反民主的独裁政治竟相继发生，蔓延全球。……不但反民主的独裁制风行一时，且人民似有厌倦德谟克拉西的样子。究竟近几年来耳朵变动仅是过程中的一种挫折，还是新趋势的一种肇端？”为回答这个问题，钱端升详细考察了独裁制的内容，即苏俄式的阶级专制和意大利的独夫专制。钱端升通过洋洋洒洒的详细比较，得出如下结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尤其是民主的大敌。但钱端升亦指出：“我们不能不特因独裁政治的盛行而遽疑民主政治的不行，切不能因而视为平民政治推行的障害。”“独裁的所由起，固然由于政治的纷乱和权力

的微弱，但我们再一细考纷乱微弱之所由起，则我们决不能归罪于平民政治。现今采用独裁政治的各国，以前俱没有人过真正平民政治的康庄大道。”“而且独裁也不是最近的现象，历史上甚多独裁的例证”。钱端升进一步指出了独裁的路线图：“政治太腐败或太专制则生革命；革命的政体往往倾向民主；人民因不习政治之故，革命的政府往往乱而无力量；人心厌乱，强有力的独裁因之而起；但独裁是独裁，无论治安方面怎样可靠，而专制必达于极点；人民因回想到初革命时之自由，终必采纳一种能维持革命时的权力而又不过于激烈的整体，这种政体往往是一种缓进的平民政治。”基于此，钱端升得出结论：“平民政治遇到不能应付的严重时局时，固然有发生独裁的可能，但平民政治并不因独裁而会一蹶不振”，“就事实层面，独裁的盛行并没有中止平民政治的进展。”

第四部分聚焦于坊间对平民政治的批评。钱端升指出，批评平民政治的观点可以分为五种：其一，轻视平民，怀疑平民的道德，小看平民的能力，鄙薄平民的智识，所以不能相信平民政治。钱端升认为，“无恒性、无远谋、不勇敢、不廉洁”等所谓平民政治的弊端，绝非平民政治所独有；而且现代政治越来越积极，政府的威权无时无刻不与人民发生关联，“平民如不参加政治，或政治不是以平民为对象，则为政很少成功的可能”。其二，以不文不雅诋毁平民政治，以为今人的文物礼貌不如古人，退步主因则是平民政治，甚至有人诋毁平民政治缺乏浪漫性。钱端升认为这种观点不值得一驳，“我们不能因朝廷贵族生活之繁华而鄙弃平民政治的质朴，犹之，我们不能因农用牛车的富于浪漫性而漠视汽车的功用”，“所以感情作用的批评，实是抹杀事实而已”。其三，发生上述两种论调的人，“都是未能忘情于君主或贵族生活者”，而“最近更是有一班人想从心理及生物上来证明人类的不平等和平民的低下”。钱端升认为，幸亏出身论尚未被实施证明，否则平民政治顿失立足之地。其四，还有两种批评拘泥于平民政治的构造：比如认为民主国家多追求政党政治，而政党政治总是让少数人操纵一切，最终形成头目政治，故有些人不根本反对平民政治，但提议改组政党。钱端升指出，“平民

政治是多党的政治，所以即使政党尽为头目所把持，至少人民还可以从多个头目政治中挑选一个来主持国家的大政，但在非平民政治的国家，……人民连挑选的自由也没有了”。另有批评认为平民政治与频繁选举紧密联系，“选举的官吏往往不是专家，所以行政不良为平民政治的通病”。钱端升指出，平民政治和专家政治本身不冲突，选举制度亦有改良的可能。其五，平民政治运用不良，尤其平民政治常多近无力政治，政府行动滞笨，亦成为人们批评平民政治的口实；钱端升认为，政府之强弱与否，与国土广狭、民族异同等因素紧密相关，与政体自身的关系并不紧密。另外，批评者认为平民政治当选者多碌碌无为；钱端升认为，平民程度高则当选的代表水平也高，两者互为因果，因此平民政治的目标之一则在于提高人民的程度。

第五部分则对上述讨论做了总结。钱端升指出，评判一个制度应该采取比较的标准，应和相替的制度比较，而不应单从理想层面比较；另外，评判应就大体立论，而不应就局部吹毛求疵，坊间一大部分所谓“倾向书”，“先有一个厌弃平民政治的目的，然后再找些破碎的事实来充实他们的议论”。钱端升还指出，还有部分批评者因发现一二弊端而攻击平民政治，更是不合逻辑。归根结底，钱端升对于民主政治的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我们……对于平民政治的希望无穷，我们更断定凡背了平民而独裁的政治终将归于无成”。

——钱端升：《德谟克拉西的危机及将来》，载《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0年3月，第1卷第1期，第25-50页。

在《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发表系列书评，分别评介如下书籍：

1. *Les Constitutions de l'Europe Nouvell.* (B. Mirkine-Guetzevitch) ; *Les Constitutions Modernes* (F. R. Dareste et P. Dareste) 等2本。

2. *Handbuch der Verfassung und Verwaltung in Preussen und den Deutschen Reiche* (Hue de Grais) ; *Principles of the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of the German National Republic* (Johannes Mattern) ; *The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Germany* (Frederick F. Blachly and Miriam E. Oatman).

——钱端升：《新书介绍与批评》，载《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0年3月，第1卷第1期，第228-232页。

6月

在《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发表系列书评，分别评介如下书籍：

1. Les Reglements des Assemblees Legislatives de la France depuis 1789 (Notices historiques et Textes) (Roger Bonnard)；
2. Elements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Francais et Compare (A. Esmein)；
3. Grundziige des Sovetrussizchen Staatsrechts (N. Timaschow)；How the Soviet Works (H. N. Braibford)；Le Pouvoir Central et le Systeme Electeral de la Russie Sovietique (Dragomir Isaakevitch)；La Theorie Generale de l'Etat Sovietique (B. Mirkine-Guctzevitch)

——钱端升：《新书介绍与批评》，载《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0年6月，第1卷第2期，第482-484页。

秋

钱端升重新受聘为清华教授，在这里工作至1934年。

【1930年秋，我再度回到清华教书，同时在北大兼课，直到1934年初离北平去天津《益世报》为止。】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6页。

8月30日

钱端升、叶企孙访吴宓。

【晚，叶企孙、钱端升来。钱夫人将至比京 Brussels 留学。兹查得火车票价如下：

北京至巴黎或比京，头等，一〇一四元国币。

北京至奉天，头等，奉天至北京二等，七二四元国币（以上俄境内新增票价十五亦已计入）。

钱、叶二君，劝宓改迟，与彼等同行。并乘头二等。宓应以再商，但私心则决与燠乘三等行矣。】

——吴宓：《吴宓日记》卷五，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5页。

9月12日

吴宓出发，钱端升送行。

【老姨太及张生送宓登火车。姑母一家，则有硕、颢、润诸表兄弟妹来送。友朋则有张奚若、钱端升。又遇杨震文、徐祖正、赵文珉登。至平日知友之来送者，则浦江清、赵万里、朱自清诸君。

8时20分，车行。】

——吴宓：《吴宓日记》卷五，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0页。

9月

在《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发表《世界公法学会》一文。

该文详细介绍了“世界公法学会”（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Droit Public）的概况。据钱端升介绍，该机构由法学学者叶慈等于1926年创立，旨在联合各国的公法学者，研究公法及政治学的相关问题，会内活动以集会讨论为主。入选该机构需要在相关领域具有极高的造诣，所以这也是充满荣誉性的学术机构。为方便国内读者了解，钱端升还节译了部分该学会的章程。

——钱端升：《世界公法学会》，载《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0年9月，第1卷第3期，第665-669页。

在《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发表书评，评介 *The Mechanism of the Modern State: A Treatise on the Science and Art of Government* 等书。

钱端升这组书评，评介三本书，分别是：

(1) Sir John A. R. Marriot, *The Mechanism of the Modern State: A Treatise*

on the Science and Art of Government,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7, pp. 1200;

(2) A. B. Keith, *Responsible Government in the Dominion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7, pp. 1339;

(3) F. A. Ogg, *English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New York: The McMillan Company, 1927, pp. 793.

钱端升指出，上述三书的内容及性质各有所侧重，但同为关于英国政制之书，故放在一起介绍。其中 Mariott 的书表面上涉及比较政府，实际上处处以英国为主；钱端升认为该书结构不够严整伟大，取材亦不够鸿波精通，立论亦不算平允显豁，“对于政治学或宪法，没有任何新的贡献”。而 *English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则是一本比较好的教科书，但其败笔在充斥着媒体报道的痕迹。*Responsible Government in the Dominions* 为该书第二版，以引用法令及判例见长，再版文字已平顺很多。

——钱端升：《评 The Mechanism of the Modern State 等》，载《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0年9月，第1卷第3期，第691-693页。

11月25日

胡适日记中存入1928年诸人求签事。具体可见1928年相关条目。

11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其首部专著《法国的政治组织》。

目录如下：

- 一、立宪史略；
- 二、总统；
- 三、国务院及行政制度；
- 四、参议院；
- 五、众议院；

- 六、国会的职权；
- 七、法律及法院；
- 八、地方政府及属地政府；
- 九、党派。

——钱端升：《法国的政治组织》，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

12 月 3 日

胡适抵达北京，与钱端升在北平见面。

【夜与江冬秀同去看江宇澄先生夫妇，及孟和、性仁。见着端升、奚若等。】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 6 卷，联经出版公司 2004 年版，第 404 页。

12 月

在《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发表《哈林吞政治思想的研究》一文。

哈林吞今译为詹姆斯·哈林顿，其名著《大洋国》最早于 1960 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迄今已一版再版。钱端升这篇写于 1930 年代的论文，对哈林顿的政治思想做了全面的介绍，长达 51 页。主要论述如下问题：

- 一、哈林吞的传略及他的时代。
- 二、哈林吞的政治著述。
- 三、哈林吞的政治思想：
 1. 政府的原理；
 2. 大洋国的政府组织；
 3. 法律；
 4. 社会及宗教。
- 四、哈林吞政治思想的影响。

五、哈林吞的批评。

——钱端升：《哈林吞政治思想的研究》，载《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0年12月，第1卷第4期，第723-773页。

1931年(31岁)

1月

在《政治学报(北平)》“创刊号”发表《英国之员吏制度》一文。

该文系钱端升的演讲稿，由潘如澍记录整理，钱端升本人亲自删改而定稿。钱端升指出，国内对英文的 Civil Service 一般翻译为吏治制度、文官制度或公务员制等，他均认为不妥，因为该词在英国“泛指一切英国政府的办事人员，上自达官显宦，下至胥吏走本，均包括在内的”，故改以“员吏”称之。而之所以讲这个题目，则是因为考试院新近设立，国内舆论正关注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尤其是考试、监察改革。钱端升指出：“现今国民政府有考试院之设立，一方面固然要采用中国固有的科举制度，但同样也非参考外国任用员吏之制度不可，而在各国之制度中，据我个人的观察，要以英国之员吏制度为最有成绩，同时也是一种最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制度。”讲座正文分如下三部分：

一、英国员吏制度之沿革。

二、英国员吏制度的内容，分为三方面：其一，员吏取录与任用的标准，涉及管理之机关、员吏之分级、员吏之考试等；其二，升降与责罚；其三，辞职与养老金。

三、结论。钱端升认为英国员吏制度有如下优点：其一，永久性；其二，团体性；其三，廉洁性。而英国员吏有两种特性：其一，别的国家员吏制度所考学科，多半属于专门学识，但在英国则不是；其二，别的国家员吏容易流为官僚，易和时代背道而驰成为落伍者，而在英国则因为富有人文教育之故，不易流为官僚政治。钱端升认为，中国过去科举取士尤其注重人文

造詣而非专门技术，这一点与英国员吏制度不谋而合，“将来中国的考试制度在这一方面或者也可以有所取法吧！”

——钱端升讲：《英国之员吏制度》，潘如澍记，载《政治学报（北平）》1931年1月，第1卷第1期，第17-24页。

在《政治学报（北平）》“创刊号”发表书评，评介 Sir Almeric Fitzroy 的 *The History of the Privy Council* 一书。

据钱端升的介绍，该书在有关英国枢密院的研究中独树一帜，已有研究多限于某一段时期，而 Fitzroy 的书则是一部“整个的简史”，“故十分值得留心英国历史及制度者的注意”。钱端升介绍，作者 Sir Almeric Fitzroy 长期以来担任枢密院秘书，故对枢密院的过去及一切文件极为熟悉，“凡研究枢密院历史的学生无一不以他的赞助为可贵”。在钱端升看来，这本书的优点即在于言简意赅、比例合适，能够在340页的篇幅里对枢密院的沿革有完整的印象。

——钱端升：《评 *The History of the Privy Council*》，载《政治学报（北平）》1931年1月，第1卷第1期，第147-148页。

在《政治学报（北平）》“创刊号”发表书评，评介 F. R. Turner 的 *The Cabinet Council of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1622 - 1784*, Vol. 1 一书。

钱端升指出，最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学者对于欧洲史已经有一些精深的研究，英国宪法史尤其是佳作迭出，部分作品即便英国人亦推崇有加，Turner 的这本书亦不容忽视。据钱端升介绍，Turner 教授对17世纪、18世纪的宪法史有深切的研究，尤其注重于内阁的发展，他在1927年曾出版两大本有关枢密院的巨著，而这本 *The Cabinet Council of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1722 - 1784*, Vol. 1 则是研究内阁的大作，第1卷出版于1930年，而第2卷预计亦将于1931年出版。钱端升指出，作者的计划可谓伟大之至，如果全部出版齐备，学者至少可以有六大本有关17世纪、18世纪宪法史的巨著，但 Turner 教授1930年夏天的不幸逝世打乱了这一伟

大的计划。钱端升指出，17世纪是英国枢密院的衰退期，而18世纪则是内阁的生产时期，而内阁萌芽正式起源于17世纪，故 Truner 的这本书从1622年到1784年，从内阁的萌芽到规模初具，这160多年正是英国内阁发展中最重要时期，但在这本书之前却没有系统研究。钱端升还提及，作者曾预告第2卷将有一完备的文献目录，势必将成为搜寻17世纪、18世纪英国内阁史的入门。

——钱端升：《评 The Cabinet Council of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1622 - 1784》，载《政治学报（北平）》1931年1月，第1卷第1期，第149 - 150页。

在《政治学报（北平）》“创刊号”发表书评，评介 Leonard le Marchant Minty 的 *Constitutional Laws of the British Empire* 一书。

这本有关不列颠帝国宪法的书于1928年由伦敦的 Sweet and Maxwell 出版社出版。钱端升指出，学界近年来极为关注不列颠帝国的宪法，在国际政治上亦有重要联系。尤其在英联邦，除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洲、爱尔兰自由邦及印度，究竟各国独立还是附属于不列颠帝国，非常值得探究。在这个领域，钱端升尤为推崇 Keith 教授的《自治地的责任政府》一书，但该书篇幅繁琐，不易卒读，而 Minty 这本书仅有250页，对全帝国各部分对内对外的宪法都有论及，极为适合初学者。钱端升除介绍目录还提及，该书作者从法学家的角度出发，内容多有法令及判例，但该书为一般教科书所不具备的是，作者在法令及判决之外，还常常以事实来解释一切法律上的情形，使读者即便不熟悉法律条文也能领悟。

——钱端升：《评 Constitutional Laws of the British Empire》，载《政治学报（北平）》1931年1月，第1卷第1期，第151 - 152页。

3月14日

胡适、钱端升等在金岳霖家茶叙。

【到金岳霖家吃茶。我到的太早了。与岳霖闲谈。吃茶的人渐渐来了，有 Miss Jones, Mrs. Swan, Prof. & Mrs. Jameson、志摩、叔永、沙菲、擎黄、奚若夫妇、端升、熊□□。

我们谈论英美的新诗，请 Jameson 试说 T. S. Eliot 的诗究竟有何好处。他说的也不能使人满意。Miss Jones 也说她不能懂 T. S. Eliot 的诗，读了也毫不懂得。】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27页。

11月20日

徐志摩飞机失事。钱端升等与胡适一道纪念。

【昨早志摩从南京乘飞机北来，曾由中国航空公司发一电来梁思成家，嘱下午三时雇车去南苑接他。下午汽车去接，至四时半人未到，汽车回来了。我听徽音说了，颇疑飞机途中有变故。今早我见《北平晨报》记昨日飞机在济南之南遇大雾，误触开山，堕落山下，司机与不知名乘客皆死，我大叫起，已知志摩遭难了。电话上告知徽音，她也信是志摩。上午十点半，我借叔永的车去中国航空公司问信，他们也不知死客姓名。我问是否昨日发电报的人，他们说是的。我请他们发电去问南京公司中人，并请他们转一电给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十二点多钟，回电说是志摩，我们才绝望了。

下午，思成、徽音夫妇来，奚若来，陈雪屏、孙大雨来，钱端升来，慰慈来，孟和来，孟真来，皆相对凄婉。奚若痛哭失声，打电话来问的人便更无数。

朋友之中，如志摩天才之高，性情之厚，真无第二人！他没有一个仇敌；无论谁都不能抗抗（拒）他的吸引力。】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622页。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002页。

1932年(32岁)

4月4日

朱自清在欧洲期间，泰勒小姐向其借钱，云如果钱端升能从北京借钱给她，她将在五月还朱自清。

【把泰勒要借的钱给了她。泰勒小姐启口还要向我借十五英镑，她说如果钱端升能从北京借钱给她，她将于五月中旬把钱还我。她给他拍去电报，但星期四之前得不到回答。如借钱事落空，她就不得不改变计划，也就不需要钱了。她说她已经养成中国人的习惯，花钱不注意，而她姐姐则从不向人借钱，在美国胡乱花钱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8月

费正清、费慰梅夫妇抵达北京，与林徽因、钱端升等人相识。以下是费慰梅笔下对于林徽因家客厅的描述：

【随着我们友谊的加深，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一个仆人把天井入口处红漆的双扇大门的门闩打开，我就穿过小花园去找到徽音。在起居室一个暖和的角落里坐下并泡上两杯热茶，我们就赶快开始叙述我们各自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我们有时分析和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我们就转向我们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把关于对方不认识的朋友的追忆告诉对方。

天才的诗人徐志摩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说话来思念他。我时常想，她对我用流利的英语进行的题材广泛、充满激情的谈话可能就是他们之间生动对话的回声，那在她作为一个小女孩在伦敦时就为她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的哲学家金岳霖，实际上是梁家一个后加入的成员，就住在隔壁一座小房子里。梁氏夫妇的起居室有一扇小门，经由“老金”的小院子通向他的房子。通过这扇门，他常常被找来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的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和客人混在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

这群人是老金在大学里的亲密同事。除了其他人之外，其中包括两位政治学家。张奚若是一个讲原则的人，直率而感人。钱端升是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陈岱孙是一个高个子的、自尊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一些的教授，都在其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突破。在哈佛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李济，领导着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发掘。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领导着影响很大的社会研究所。这些人都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老金一样，是一些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六，一些妻子们也会出席并参加到热烈的谈话中去。

我们也受到了邀请，在我们刚到北京的那些天，有时作为徽音的客人参加。我们受到老金的欢迎，其他人在相互讲故事时当然是用中文谈话、耳语和哄笑，也容忍了我们。当次年费正清成为清华的教员，而我们的中文也学得再好一些时我们就不再是外人了。

星期六下午在老金家的聚会时常移到一家中国饭馆继续进行。……】

—— [美] 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曲莹璞、关超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 年版，第 74 - 75 页。

孔飞力的描述：

【在中国人方面，费正清怀有深情的朋友也很多，如钱端升、蒋廷黻、梁思成、郭廷以等，他们都受过西方教育，在这一领域里分享约翰的生活。】

—— [美] 孔飞力语，见保罗·柯文、默尔·戈德曼编：《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张晓阳译，东方出版中心 2000 年版，第 37 - 38 页。

1933年(33岁)

4月12日

在清华园完成《西班牙的新宪法》一文。后发表于6月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

——钱端升：《西班牙的新宪法》，载《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3年6月，第3卷第4期，第735-775页。

4月27日

钱端升与朱自清等一道受吴宓邀赏花。

【晚吴雨僧请客赏花，有高君珊、钱端升、叶企孙、公超夫妇、寿民夫妇、江清兄等。】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6月

在《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发表《西班牙的新宪法》一文。这篇文章长达41页，纵论西班牙新宪法。纲目如下：

一、宪法史。

二、新宪法的分析。涉及：

1. 国体及分权；
2. 西班牙人的权利义务；
3. 国会及立法；
4. 总统；
5. 政府；
6. 司法；

7. 护宪法院；

8. 宪法的修正。

三、共和国的新态。

——钱端升：《西班牙的新宪法》，载《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3年6月，第3卷第4期，第735-775页。

在《清华学报》上发表《德意志的国会及国会议员》。

该长文共分如下四部分：

一、国会的选举。

二、国会的任期、集会及解散。

三、国会的组织。

四、议员。

——钱端升：《德意志的国会及国会议员》，载《清华学报》1933年6月，第8卷第2期，第1-35页。

另，本期《清华学报》第2页刊有编辑部名单，钱端升名列其中。

【国立清华大学

清华学报编辑部

浦薛凤（总编辑）

王文显 吴 宓 吴景超 金岳霖 施嘉炆
陈 达 陈寅恪 陈 桢 陈 总 孙国华
张 准 张奚若 庄前鼎 冯友兰 叶企孙
叶崇智 熊庆来 赵人雋 蒋廷黻 钱端升
钱稻孙 燕树棠 刘文典 谢家荣 顾毓琇】

——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学报编辑部》，载《清华学报》1933年6月，第8卷第2期，封二。

【本月，《清华学报》第8卷第2期出版，载有陈寅恪《读连昌宫词质疑》，闻一多《岑嘉州繁年考证》，钱端升《德意志国会及国会议员》，金岳霖《释必然》，吴景超《近代都市化的背景》，姚徽元《宋书索虏传南齐书

魏虜传北人姓名考证》等文。】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夏红注：

此时钱端升已经回到清华。具体可阅孙宏云《清华政治系的展开》。

9月1日

在上海《民族》杂志发表《希忒勒秉政前的德意志政党》一文。

该文纵论希特勒上台前德国政坛的政党政治。主要分如下部分：

- 一、1919年以前的政党史。
- 二、革命以来的政党史。
- 三、各党的分子、根据地及党纲。
- 四、各党的组织。

——钱端升：《希忒勒秉政前的德意志政党》，载《民族》（上海）1933年9月1日，第1卷第9期，第1453-1477页。

9月16日

朱自清与其幺妹谈钱端升事。

【晚幺妹来谈钱端升事，似可成。】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9月19日

在清华园撰写《德国的政府》一书序言。

【我这本书虽仅十六七万言，然以贫病交袭、变故频仍之故，自十八年冬月动笔起，迄完成之日止，几达四年之久。在这四年中，德国已自若臻稳固的共和政体变到独裁，而这书所自本的槐马尔宪法则洵如安虚刺教授所预

言，已成为“只历史家尚感兴趣的废纸”。如求准确，我这书实应正名为《希特勒独裁前德国的政府》，因为我所叙述的是一九三三年三月及以前的德国政府，而三月以来的变化则我只简略地于每章之后补记了一些。但一国的政府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全变更的。在形式上独裁制固于本年三月代替了议会政府，但议会政府自一九三〇年以来又何日不在独裁化的过程之中？反之，行政的组织、吏治的精神、法院的编制以及地方制度等等，则固今犹如昔，大体未变。所以我希望我这书仍可以助读者对于德国现代的政府得一基本的认识。

钱端升

二二，九，一九，于清华园。】

——钱端升：《德国的政府》，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序。

11月25日

在清华园《法国的政府》撰写《再版序》。

【将英、美、德、法、日、俄政府合著一书的计划，因年来心神无宁，迄未能实现。说来亦真有老大徒伤之感。

关于英美两国政府的英文的书籍甚是充富。国人懂英文者甚多，故欲知该两国政府的情形容尚不难。惟德法政制的实施情形，即德法的著者亦因偏重公法，未能予以充分注意。故今将该两国的政府尽先成书，分别付印。日俄的政府只能暂付缺如。

本书虽名再版，实等新著。除第一、第三、第五及第八等四章大体上尚保留原版文字外，其余各章均是重写过的。然著者对于门罗教授的感谢却不因是而减少。

钱端升

二二，一一，二五，于清华园。】

——钱端升：《再版序》，载钱端升：《法国的政府》，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12月23日

胡适日记载蒋廷黻推荐钱端升，继罗隆基担任《益世报》主笔。

【《益世报》编辑刘豁轩来谈，他今天去访蒋廷黻。蒋廷黻推荐钱端升君继努生之任。】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730页。

1934年(34岁)

1月1日

就任天津《益世报》主笔。

【……直到1934年初离北平去天津《益世报》为止。】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6页。

【我还曾一度担任天津《益世报》主笔，专写社论，不编新闻。《益世报》当时是北方两大报之一，罗隆基曾为主笔，由于批评蒋介石而被驱走。后来该报聘我就任“主笔”，并希望我稍变罗隆基的文调，以求“保全日报”。不料后来蒋介石终因我的一篇社论《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南行》大为恼火，并立即勒令邮局对《益世报》停邮，使我在该报呆了八个月写了百七十篇社论后被迫离去。】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7页。

在《东方杂志》“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发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

该文继《德谟克拉西的危机及将来》一文，继续讨论民主政治的衰颓问题。钱端升指出，他现在对于民主政治依然有无穷的希望，对于漠视平民利益的独裁制度丝毫未减厌恶，“然对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众谋真

实福利的政治制度，纵是独裁制度，我也不能不刮目相看”。全文共分如下四部分：

第一部分论及民主政治的衰颓。在这部分论述中，钱端升将平民政治改换成民主政治，并指出民主政体的共同特点有：其一，人民无论财富状况，在法律上一概平等；其二，国家权力有限，个人保留若干自由权；其三，人民有代议机关，依个人平等原则选出；其四，议会中同时有两个政党存在，互相监督、轮流执政；其五，为保障人权、限制国家权力，政府采权力分立制度。但钱端升也指出，20世纪初民主政治尚被视为最良制度，“凡未采用民治的国家，其统治者且常带多少心虚及自惭的口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亦成为民主政治最后的凯旋，到了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及苏俄共产主义节节进步，民主政治自身缺点暴露无遗，替代制度的可堪大用也在实践中得到了一步步检验。钱端升进一步分析，民主政治衰颓的最大原因，则是无产者阶级意识的发达和国家经济职务的增加，“民主政治的失败，无产阶级的不合作实为重大原因”。“民主国家不能应付现代国家的经济问题，无法完成现代国家的经济职务，则实是民主政治难以补救，或竟不能补救的弱点。”

第二部分论及现代的独裁制度及极权国家之诞生。钱端升分别选取俄国的苏维埃制、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以及德国的希特勒主义，并特别展示了这些国家中异于民主政治的方面。

第三部分讨论的是什么是适合现代的制度。钱端升指出，“民主政治的衰败及独裁制度的比较成功决不是一时的偶然现象，而是近代经济制度所造成的一种必然趋势。……近年来民族主义的空前发达也将使民主政治更站不住，而独裁制度更为盛行”。据钱端升的观察，民族主义体现在两个方面：经济的民族主义及军备竞赛，两者互相联系，前者尤为重要，“如果经济的民族主义并不十分发达，民主国家本不妨维持其向有的制度，而徐图改善。但经济的民族主义既如今之发达，则没有一个国家敢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为增进其生产力或维持其向有的优越地位起见，任何牺牲亦将为各民族所忍

受”。钱端升进一步指出，事实证明，代民主政治而崛起的苏维埃制和法西斯主义，在经济统制方面都比民主政体更有优越性；当然其他制度也还有生存空间，如果英美变更生产方法，采取统制经济，也可能会由苏维埃主义及法西斯主义之外的其他政体所取代。钱端升进一步申言，阶级斗争的学说虽然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后盾，但在民族主义的高潮下并无实现的可能，今后继民主政体而起的制度，无论如何自号，其注意点都将是民族经济实力的培养，以前的革命理论势必将不复被人们提起。在这种大背景下，钱端升认为全球政治制度的最终变迁虽然难以预言，但有三点则十分明确：其一，民主政治毫无出路，非放弃不可；其二，独裁制度会继之而起；其三，在民族情绪降低之前，国家权力将趋于无所不包的极权国家。

对于为什么独裁是一种必然的过渡，钱端升指出，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如果不用独裁，民治时代一盘散沙的状况终将无法纠正。而就独裁本身论，钱端升认为一党独裁优于一人独裁，更容易保持独裁的稳定性，不发生继承问题。而所谓的独裁，对于独裁者有较高的要求，需要独裁者能够“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众谋实际的福利，能对现代经济制度有认识，能刻苦耐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至于说独裁易引起国际战争而民主容易消除国际战争的说法，钱端升认为并无确切的道理与依据。钱端升亦明确指出，“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若依大多数人民的福利而论，独裁也不见得不及民主政治”，“赞成民主政治者一方提倡个人自由，一方又声言民治为大多数人福利的保障。然独裁既能为大多数人增进福利，则又乌能因少数人的自由之被剥夺，而应要维持谋福不及独裁的民治”？

第四部分论及中国未来的政制。钱端升坦言，“我们是除了所谓旧文化——古董式的文化——外，一切落后，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当务之急则是奋起直追，“求为一个比较有实力的国家，庶几最可怕最残酷的世界大战到临时，我们已不是一个毫不足轻重的国家”。但对于奋起直追的方法，则众说纷纭，平民教育、增进人民健康、开放党禁、提倡民治、分治合作、不再内战等等。钱端升则认为，中国的途径与别国无异，“无论是

增进人民的智识及健康也好，或增加人民生产能力也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必绝对无成的。欲有一强有力的政府，则提倡民主政治不但是缓不济急，更是缘木求鱼”。职是之故，钱端升提出，“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欲达到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国家有这种权力则又非赖深得民心的独裁制度不为功”。钱端升进而申辩，“这样的独裁制度本不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所不能容的”，故“如果国民党能独裁，一方铲除破坏统一及阻碍中国近代化的阶级，一方则侧重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则这种独裁的结果必定可以增加国家的权力，增进民族的经济地位，并得到大多数人民的赞助”。当然，强有力的独裁也需要强有力的国民党，钱端升明确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一盘散沙、民智落后、能力微弱的民族，我们尚望其能进而成为一个近代国家，则国民党中兴，国民党能成为有力的独裁者的希望自然不是没有。不过像它过去那样地缺乏能力、缺乏目的，则它当然不能成为独裁者，更不要说是成功的独裁者”。钱端升未回答国民党不能成功独裁的问题，只是强调，“中国需要生产上极敏捷的进步，而要达到这目的，则最好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为目标的独裁。为早使这独裁能实现起见，我们再不要耗费精力于永不易得到，且得到了也无实力的民主政治的提倡；我们更要防止残民以逞的独裁之发生”。

在这篇文章的末尾，钱端升坦言，包括他自己在内一班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熏陶的人，“对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载《东方杂志》1934年1月1日，第31卷第1号，第17-25页。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今年的展望》。

在该文中，钱端升有感于1933年的忧难困苦，对于政府和人民都提出了殷切期望。于政府方面，钱端升提出四点希望：其一，希望政府能振作为政的精神，增加工作效率；其二，希望政府能够在培养民族经济实力的工作

上痛下功夫；其三，希望政府能够在未来的一年内消弭内乱，防止新内乱的发生，并将边陲问题作一永久解决；其四，希望中央能有明确的外交政策，既考虑对日妥协的必要，更要考虑中国在未来两大敌对阵营中的地位。而对人民方面，钱端升希望人民改良对政府的态度，从要么漠不关心、畏惧政府，要么怀疑政府、抨击政府，改变为一方面严厉督责政府、不畏政府，另一方面给政府以善意批评，给予智力、体力及物力的协助。除此之外，钱端升还提出，人民之中的生产团体和政党亦应发挥积极作用。

——钱端升：《今年的展望》，载《益世报》1934年1月1日，第1版。
朱自清与其么妹谈钱端升。

【午金七哥偕么妹来。么妹谓昨在北京饭店见陈说钱端升与别的女子跳舞，因谓周太太等甚冷，其实我早已忘怀了，她不曾忘怀，念之惆怅。】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

1月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美国国会开会前政况的观察》。

在这篇社论中，钱端升首先指明，于1934年1月1日召开的美国国会，是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通过之后的第一次常会，在美国宪政史上为一大变革。而接下来钱端升笔锋一转，评价了罗斯福新政之成败得失。在钱端升看来，罗斯福1933年3月4日出任美国总统时，美国正饱受经济衰落之苦，失业率、破产率居高不下，民气极其懊丧；在这种背景下，罗斯福一方面积极恢复公众的信心，采取措施拯救金融体系，另一方面则在国会的大力支持下，先后通过减政法、农村救济法和实业复兴法，同时依据上述法律设置为数不少负责经济事务的政府机构。在钱端升看来，罗斯福对于通货膨胀的排斥，会限制其经济复苏目的的达到，这一点已为事实所证明；罗斯福最后还是变相地采取了通货膨胀之策，而其成效则仍需观察。钱端升所担忧的是，正在开会的国会纵然民主党占优势，但仍有民主党与共和党联合阻止总统改

革计划的可能；在那种情况下，罗斯福新政还能持续多久，将成疑问。正因为如此，在钱端升看来，本届国会辩论的焦点将是通货膨胀政策，罗斯福新政之成败亦全仰仗于这一政策了。

——钱端升：《美国国会开会前政况的观察》，载《益世报》1934年1月4日，第1版。

1月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中国外交的出路》。

这篇文章因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的元旦讲话只谈内政、避谈外交问题而起。在钱端升看来，内政与外交互为因果，“内政有办法，可以增加外交之力量；同样，外交得到胜利，也足帮助内政之成功”，职是之故，中央于内政需要建设和统一，于外交亦需要合理而自主，尤其在国联不可靠、英法不足恃、对日退让亦无由阻止其贪婪的情况下，既要梳理内政政策，外交方面亦应赶快找出路。钱端升认为，外交政策的确定首先需要知己知彼，既明了本国地位，亦看清国际形势；而外交政策的运用，则妙在互有利益的共赢。而就我国的外交政策而言，钱端升认为“治标莫过于自卫，治本莫急于自主。能知己知彼，则自卫可得其法；能互有利益，则自主方谈得到”。鉴于此，钱端升认为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一是引诱中国及列强承认伪组织，二是厉行“多边外交”、瓜分中国，所以中国自卫本位的外交政策也应对症下药：其一，不但自己不中日本圈套，也要加强国际活动，防止国联和美国放弃其“不承认主义”；其二，抱定坚定态度，下最大决心，防止日本煽动内乱、分割领土，更不可因畏惧日本煽动内乱、分割领土而屈服、妥协，以防止日本最终通过“多边外交”来实现引诱我国承认伪满洲国的目的。另外，钱端升认为，政府应充分利用九·一八事变之后太平洋均势被打破的局面，联手美俄，限制日本，“万不可因日本一时的静观，忘记了国难，与之交欢。应抓住了机会，作积极反日战线之完成，以互利的政策，临对美对俄的外交”。

——钱端升：《中国外交的出路》，载《益世报》1934年1月5日，第1版。

1月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如何挽救新疆局面》。

在这篇社论中，钱端升针对新疆1931年以来的乱局，尤其是新疆军阀之间的内斗和北俄南英之虎视眈眈，指出中央政府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解决问题：其一，鉴于中央任命在边陲地带具有很高权威，中央应根据已掌握的新疆各军事领袖的实力，除已因残杀好斗出名的军阀外，分别赋予其名义和职责，责令他们维护防区治安，严禁互斗；其二，鉴于民族失和为困扰新疆的严重问题，中央应采取分治政策，在南疆采取自治，省政府根据中央政策予以经济上的便利、鼓励自治，以便弱小民族增加向心力，而不至于倾向于英俄；其三，鉴于新疆英化或者俄化后对中国休戚相关的战略意义，中央应待军事稍定、民族间相安之后，全力恢复新疆与内地的交通，减少税收关卡，奖励新疆与内地的贸易，同时大力支援新疆的建设。钱端升认为，此三招为挽救新疆危局的根本之策。

——钱端升：《如何挽救新疆局面》，载《益世报》1934年1月6日，第1版。

1月10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刘桂堂部之南窜》。

这篇社论乃针对匪兵刘桂堂之部袭扰河北、山东等而发。钱端升有感于华北之乱，认为察冀两省虽号称驻兵二三十万，但这些军队中既有训练有素的兵力，但亦不乏军纪涣散、为非作歹的杂牌军。对于后者，钱端升认为“如防范稍有疏忽，驾驭稍一宽纵，或待遇稍见不平，则此项军队立可为日伪所用，或则投诚彼方，或则进扰关内。倘不能见售于日伪，则仍可到处骚扰，恢复其土匪或流寇之生活”。刘桂堂匪兵的叛变即属于此类。钱端升有感于当局的绥靖与纵容，特别忠告当局应该将此类匪兵立即剿灭，以绝后

患，同时对华北之军事外交均有一彻底且安全的办法。

——钱端升：《刘桂堂部之南窜》，载《益世报》1934年1月10日，第1版。

1月1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溥仪称帝前后应有之防范》。

钱端升这篇社论因溥仪即将在伪满洲国称帝的传言而起。纵然关内大部分公众舆论惶惶不可终日，但钱端升认为此举从如下五个角度来说，倒也有积极意义：其一，此事可为日本侵华决心的试金石，“日人决意使东北脱离中国之日，即中日问题到了最严重之时；在日人未有决意以前，中日间的一切问题固未尝不可和平解决，即中日亲善亦未尝无实现之可能。然日人决意使东北脱离中国版图后，则中日间终不能不凭武力来解决。即此时我方不能以武力与日抗争，日后仍不能不用武力。即此时日方故示宽大，日后彼仍将致我于死命”。其二，溥仪其人，“区区竖子，无意志力，更无才识”，此种傀儡戏一演再演，日人之无远见亦跃然纸上，只会贻笑大方，不足为虑。其三，我国虽然不能阻止溥仪称帝，但如真称帝，仍然需要向日方提出最强烈抗议，一方面唤醒国人亡东北之痛，另一方面示友邦以不屈服不妥协之决心，以免外界误解中国改变外交政策态度有意妥协，甚至外界因此而顺势承认伪满洲国。其四，溥仪如果真称帝，虽然与东北得失无关，但政府与国人仍应防范日伪另起挑衅，借祭陵、省亲名义引发新的纠纷。其五，中央及地方当局应早下决心，早定对日政策，决一死战，严密禁止潜伏在关内的日伪特务挑起新的事端。

——钱端升：《溥仪称帝前后应有之防范》，载《益世报》1934年1月13日，第1版。

1月1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闽变结束以后》。

钱端升写这篇社论的背景是1933年11月20日，蒋光鼐、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福州发动兵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月15日，蒋介石军队攻陷福州，福建事变告一段落，钱端升此文即写于此时。在这篇文章中，钱端升认为，福建事变尽管不到两个月即告结束，但所值得痛心且反思者甚多，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以党国高层公然叛党叛国者，福建事变为第一遭，其性质之恶劣远甚于其他地方的动乱，“可痛乃弥甚”。钱端升认为，政府方面能够迅速平定福建事变，当属不幸中幸事，希望十九路军能够尽早归附中央，而免福建人民之生灵涂炭，中央亦可重新放重心于“剿共”工作。钱端升更进一步反思，引起福建事变的原因有很多：其一，该军领袖野心太大，不识大体；其二，中央待各军薄厚不一，导致地方军“因怨愤成仇恨，因疑惧起变心”，接下来中央军事当局应改进工作，平等待遇地方各军；其三，广东方面的态度，亦是引起福建事变的重要原因，此事平息后广东方面应极力拥护中央、拥护统一；其四，国人对背叛政府之举的同情，无论是视陈、李之举为革命，还是因反对中央政府而支持福建，都纵容了福建事变的发生，“我人以为补救现政府之不满在严密督促，而不在根本推翻。必国人有此健全合理之心理，然后好乱者流无所得逞，而闽变一类之内乱亦可不易发生矣”。

——钱端升：《闽变结束以后》，载《益世报》1934年1月16日，第1版。

1月17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四中全会与政治改造》。

这篇社论写于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即将开幕之际。这届会议因为福建事变而召集，钱端升开门见山，先接昨日《闽变结束以后》之余绪：国人之所以公然同情福建事变，除去私图外，认为南京政府是恶政府而望其速倒，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南京政府之令人不满甚久。故钱端升提出，四中全会应借福建事变平定的契机，“力谋政治上可能的改造，以

谋归服已失之人心”。

钱端升认为，所谓政治改造，不外乎人的问题与制的问题。就人的问题而言，对于未参加中央政治者可分两类：留沪中委政见不一，亦缺实际力量，不足为虑；而实力派中胡汉民、陈济棠等则互相观望，钱端升认为胡汉民与西南诸委加入中央政治与否，与政治改良并无关系，胡汉民如能来，中央自当欢迎，胡汉民不能来亦无所谓，不应因胡而变制，而且胡汉民来中央与否，与西南并无明显关系。鉴于胡汉民八项主张除倒蒋外无甚新意，与其通过迁就胡汉民但不能实行的政治决议，还不如不问胡汉民来否立即改进政治，西南军阀割据问题另当别论。而就制度问题而言，钱端升认为最应努力改革的有三件事情：精简政府机构，取消骈枝机关及不切实用之机关；改革公务员任用制度；改组中央政治会议。钱端升指出，国民党向有“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之病，所谓改革自应从实行开始，“与其好高骛远，毋宁自迹自卑”。

——钱端升：《四中全会与政治改造》，载《益世报》1934年1月17日，第1版。

1月1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四中全会与党之改革》。

这篇社论继续借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即将召开的契机，讨论党治的存废与改革问题。在钱端升看来，反对党治者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原则上反对一党专政，无论该党为国民党、共产党抑或其他政党；第二种是根本上不反对党治，但反对国民党之党治，拥护其他党之党治；第三种属于对党治毫无主张，只是国民党治国成绩太差而反对党治。就这三种而言，钱端升认为第一种只限于极少数知识阶层中的中年分子，不足为虑；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大多数舆论则反对国民党之党治，亦不易成功，职是之故，钱端升认为第三种人，他们的观点与党治成绩直接挂钩，随时可以转化，“党治之成绩稍佳，则反对者可以不反对；反之，党治的成绩较劣，

则不反对者亦可反对”。在钱端升看来，国民党人与其惴惴不安，抑制舆论，而看不到“中国国民最和平，最畏事，党治之将来全系于国民党本身”，还不如“善用其权力，稍稍增进民族之地位及民生之状况，则党治固无人能推翻之”，——如果国民党长期缺乏健全的组织、苦干的精神及实行的能力，不反对党治者迟早将站在党的对立面，而消极反对党治者亦将不择手段推翻党治。钱端升认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难当前，国民空前团结，是国人赐予国民党的机会，国民党应善用此机会增进民族地位，而不应利用此机会加强其权力。

在四中全会召开之际，对于改进党治，钱端升提出如下三点建议：其一，党的自身必须要团结，胡汉民、蒋介石、汪精卫应共处一堂、遵守决议，如胡汉民拒不出席，四中全会应预定制裁之方；其二，愿国民党党员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党治之下之党员必须为能吃苦能操劳之党员”，“国民党员如不甘卧薪尝胆，则尽可退为平民”，四中全会应严订训练党员之办法，使党员在具体岗位上各尽其责，洗除“党老爷”、“党衙门”等负面舆论；其三，主义与口号俱为空物，细密的计划非常重要，再宏伟的大政方针都需要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钱端升认为，四中全会如能解决这些问题最好，如果解决不了就应该请专家解决，否则的话，固然福建事变平定了，但国民党弹冠相庆为时尚早。

——钱端升：《四中全会与党之改革》，载《益世报》1934年1月18日，第1版。

1月1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解决土地问题的急要》。

钱端升写作这篇社论的由头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土地政策研究委员会召开会议，准备向四中全会提交有关土地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在钱端升看来，土地问题是长期以来被忽略的问题，无论是国统区还是共产党统治区，土地问题的解决都在所难免，急需出台先进政策，以使农民能安居乐业。钱端

升指出，“对国事得过且过，不知未雨绸缪，向为国人弱点之一，而政府更不能例外”。而此次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紧迫问题，还是因为福建事变中对方提出计口授田的口号。钱端升认为，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最要紧的事情是切实重视土地问题，制定土地政策及实施办法，并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下去。在钱端升看来，土地政策本身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土地政策可以渐进、和平，但最后的彻底目标依然是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如目标不彻底，则‘窃用’者仍将不乏其人；如办法不渐进、不和平，则实行必有阻碍，且公允亦无从保障”。其二，既然平均地权为彻底目标，则赤化区与非赤化区的土地政策，步骤上可以有轻重缓急之分，但目标本身则不应有任何区别。其三，农民中佃农、自耕农最为清苦，应该通过转佃农为自耕农、合自耕农为集耕农而予以扶持，同时将盈余土地用于发展工业。其四，对于大地主因其极尽盘剥之能事，应立加限制，采取渐进办法，如一方面征收累进税，一方面勒令降低田租，最终取缔大地主，实现平均地权的彻底目标。

——钱端升：《解决土地问题的急要》，载《益世报》1934年1月19日，第1版。

1月20日

在《益世报》发表有关内蒙问题的社论一篇。但因相关报纸散佚，只能存目。

【我们尝于一月二十日论及蒙古的自治问题。我们当时有两项主张。我们主张给蒙民以比较完备的自治组织，藉以维持他们的内向心；但我们也主张保护汉人正当的经济利益，以增加全民族的实力。】

——钱端升：《内蒙的自治》，载《益世报》1934年3月8日，第1版。

1月2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最近几年内日苏间会有战事么？》。

这篇社论暂时将评论的目标从国内转向国际。对于日苏之间是否会发生战争，钱端升表达了他的看法。在这篇短文中，他有这么几个判断：其一，如果世界大战发生，日本和苏联有90%的可能会成为对峙的双方，剩下的10%的可能是他们在面对共同敌人时成为友军；其二，鉴于世界各国中人民好战而又想战者，只有日德两国，其余各国纵能战也不想战，世界大战还需要一二十年的酝酿，故日苏间因世界大战而交战的可能性不甚可能；其三，日俄之间单独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取决于日本方面，——苏联方面忙于其经济计划，发展重工业、农场集体化，“全国备战而不想战”，而日本方面跃跃欲试，不计后果；其四，日苏间近期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仍有，中国的节节退让会导致日苏接壤的面积越来越大，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故钱端升建议中国：其一，切勿太无出息，节节退让，否则日苏之战可能因此而尽早发生；其二，多方筹措增强国力，即便将来开战之际日苏双方均不敢轻视中国。

——钱端升：《最近几年内日苏间会有战事么？》，载《益世报》1934年1月21日，第1版。

1月2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孙殿英军的驻地问题》。

该文发表的背景是孙殿英军队奉中央之命西进屯垦，但在宁夏、甘肃一带遭到地方军阀抵制，由此引发一系列冲突，甚至中央亦将任命孙殿英为青西屯垦督办之令撤销，另辟临时驻地。钱端升认为此军事乱局，包括许多需要分别处理的事情，需要对症下药：其一，孙殿英乱收土匪扩编，固然为人所不齿，但与西进与否是两个问题，任何一方都不应将二者混为一谈。其二，青海屯垦为各界共识，但让数万久不务农的士兵屯垦究竟是否可能，尚需考虑；更进一步，如果中央下定决心，则应给予孙殿英军行军便利，而不是任由地方军阀围追堵截。其三，既然孙殿英识大体而听令于中央，中央无论如何应为孙殿英军指定驻防之地，满足其求自存之最低心理，否则冲突必

成战事，小战必成大战，只能先解决移驻问题，再解决缩编问题。

——钱端升：《孙殿英军的驻地问题》，载《益世报》1934年1月22日，第1版。

1月2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福建的军事善后》。

该文继续讨论福建事变后的军事问题。钱端升认为福建事变平定后，政局无大碍，所紧要解决者主要还是军事善后问题。而在当时形势下，中央可以将十九路军残余消灭，相关传言甚为炽烈；但如果消灭不了，则十九路军残余则可投南方胡汉民麾下，亦可投入共产党麾下。钱端升通过公开报道分析，十九路军原有六七万人，即便经过福建事变，应该还有三四万人。如此多的兵力，从各个方面计，收编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而进一步考虑，收编之后，为了安抚人心，十九路军之番号亦应保留，进而使第十九路军成为国家之军队，而非一二军阀之私有军队。

——钱端升：《福建的军事善后》，载《益世报》1934年1月25日，第1版。

1月2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四中全会的总检讨》。

这篇文章写于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闭幕之日。如果说开幕之前，钱端升对于这次会议极其殷切，那么闭幕之后，钱端升则极其失望。钱端升所批评者有几方面，首当其冲者则是会期太短，前后实际会期只有四天，全会只有四次，“在未开会之前，通电促驾，派员疏解，当事者似不恤竭九牛二虎之力以促会之开成；在既开会之后，则又草草了事，唯恐散会之不速”。钱端升进一步分析参会人士之外，认为“全体会议之无足轻重由来已久”。而就四中全会的成绩而言，钱端升从如下三个方面做了点评：其一，就全会的精神而言，此次全会一方面松懈之至，另一方面乱发

言、乱提案的风气远无过去之烈，全部提案不到五十件，议决者更只有区区二十七件。其二，从领袖的团结来看，此次全会鉴于冯玉祥、阎锡山方面并未派员出席，从大团结的立场来看亦“极不圆满”；但反过来看，钱端升提出如果少数蓄意捣乱的政客不出席，倒也值得庆幸。其三，从议案本身而论，钱端升认为“此次全会实无一记的价值”，有限议决的二十多个议案，要么空泛无当，要么琐屑不值得一提，完全坐实了国民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口碑；钱端升指出，“所以此次全会决议案虽不多，我们倒不认为全会的失败。苟此区区而不能实行，则我们将认为国民党之大辱”。钱端升落笔收尾时指出，舆论对此次四中全会开会前期望不大，闭会后失望亦不大，但国民党既然以国民的保姆自居，国民党员尤其是其领袖们则应视此次全会毫无成绩为大耻，应从此开始努力谋党力的补充、党意识的统一化及党员的纯洁化。

——钱端升：《四中全会的总检讨》，载《益世报》1934年1月26日，第1版。

1月27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论整理并减轻田赋》。

钱端升写作此文，乃受四中全会孔祥熙关于田赋议案的启发。在文中，钱端升检核有关文献后得出结论，中国田赋问题之主要问题，有四个方面：其一，税率太不合理；其二，附加税名目太多；其三，政府税官中饱私囊太多；其四，预征极其严重。而针对此积弊，钱端升提出如下解决方案，即先由清丈入手，继而对天地分等，确保财务行政绝对廉洁。鉴于清丈一时三刻难以完结，钱端升提出三个治标的办法：其一，进行土地陈报，区分无粮或轻粮之田，秉公加征，借此增加田赋；其二，省级、县级附加税一律取消，并入正税，同时限制各省最高税率；其三，绝对禁止各地对赋税的预征，以讨伐叛逆的精神和勇气来讨伐预征。

——钱端升：《论整理并减轻田赋》，载《益世报》1934年1月27日，第1版。

1月28日

钱端升自天津回北平，与胡适叙。

【下午到清华大学，见着蒋廷黻、吴景超、叶公超。在廷黻家吃茶，钱端升（新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从天津来。我们谈的很高兴。】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45页。

1月2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一·二八两周年又过去矣！》。

如题所示，钱端升写作本文的背景是一·二八事变两周年。钱端升指出，一·二八事变对于中国人民和政府有两大教训：其一，日本军国当局必欲灭中国而后快；其二，中国若不统一则难言有效抗日。种种迹象已数次证明这两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钱端升认为除了牢固吸取教训外，国人更应断绝依赖国联之心理，而应力求自助。钱端升所失望的是过去两年间，国人侵略一来便惊慌失措，侵略一走便歌舞升平，全无抗日的意志与追求，钱端升忍不住呐喊，“今日日人之侵略，实比我民族历史上任何外侮为严重，吾族再不奋发图强，则苟安终亦将不可得也”。而除了国人应奋发图强外，政府尤其应努力于抗日力量之养成，而不是军阀混战。钱端升认为往后应谋统一、图自强，而不是在一·二八纪念日到来之际做一无关痛痒的纪念。

——钱端升：《一·二八两周年又过去矣！》，载《益世报》1934年1月29日，第1版。

1月30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如何消弭疏附之变》。

此文写作因传言中的疏附之变而起。疏附为今新疆喀什下属县，当时传闻疏附已宣告独立，设土耳其斯坦政府，同时求阿富汗之承认，亦有传言说

俄商暗中唆使疏附政府与马仲英合作，将国民政府势力彻底从新疆逐出。钱端升此文即因此而起。与1月6日发表的《如何挽救新疆局面》一致，钱端升在该文中再次提出建议缠回自治，以怀柔异族、任其自治为要图。而在扶助自治、招揽民心外，钱端升认为更要紧的当是阻止盛世才、马仲英之争，借此改善缠回对内地国民政府之感情。

——钱端升：《如何消弭疏附之变》，载《益世报》1934年1月30日，第1版。

1月3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政府不要辜负人民拥护统一的苦心！》。

钱端升提出：“我们拥护统一，因为我们认定九·一八以来的国难是我中华民族空前的大难；我们如稍一不慎，则立有亡国的可能。拥护统一固不见得便能救亡，但不统一则一定可以速亡。”正因为如此，钱端升表示无论如何都应拥护政府，“政府如果能满我们之意，我们固可热烈地拥护；政府即不能满我们之意，我们也只能善意的督责，而不能存破坏的妄想”。钱端升指出，在过去两年多来绝大部分人的看法如此，至今政府虽不能令人满意，但拥护之心未减分毫。当然，钱端升也提醒政府：“政府不要辜负人民拥护统一的苦心！”钱端升在这篇短文中提出四点建议：第一，请政府领袖先吃苦耐劳，提倡卧薪尝胆的精神；第二，订立国防大计，消灭割据，构建大国防观；第三，以国防为中心考虑政策，少修路，多生产国防相关硫酸、硝酸等军事工业；第四，迅即成立国防外交，在日本发动大规模侵袭之前，利用这稍憩的时间广交友国。钱端升指出，国人因国难而拥护政府，政府更应急切以国防为核心，政府越尽责，拥护则越热烈，政府方面断然不可辜负人民拥护统一的苦心！

——钱端升：《政府不要辜负人民拥护统一的苦心！》，载《益世报》1934年1月31日，第1版。

2月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法国内阁的更迭》。

该文是对法国萧丹内阁倒台前因后果之分析，多事实方面的描述。钱端升指出，法国内阁向来以短命出名，究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党派分歧严重，——因为法国政坛党派林立，组阁政党很难以某一两党为后盾，而以许多党的集团为后盾，党派分歧进而既影响政府的团结一致，在国会的支持亦更容易受党派分歧之影响。

——钱端升：《法国内阁的更迭》，载《益世报》1934年2月1日，第1版。

2月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藏事不可忽视!》。

钱端升在该文中论述了涉藏政策的几点建议。这篇文章并无明显时事背景，仅在文中开篇提及近几年边陲多事，而西藏问题比新疆、内蒙问题更难解决云云。之所以更难，钱端升归纳了三点原因：第一，宗教本应和政治无涉，但在西藏，宗教的影响比在新疆、蒙古更大；第二，西藏的民族主义比蒙古族、回族更高；第三，内蒙无外国背景，俄国在新疆仅有商业利益，而英国在西藏除商业利益外，甚至有领土要求。钱端升亦意识到，较之新疆的矿藏与土地等经济蕴藏，西藏并无优势，但西藏战略地位重要，若不属于中国，而属于英国，这种情况下南疆、西康等省将门户大开，极其危险。除了战略地位，西藏市场亦有利于内地及居住在尼泊尔的藏人。职是之故，钱端升认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民族相安、通商便利”，具体建议如下：第一，纵然千难万难，考虑到班禅在西藏的重大影响，政府应力助班禅回到西藏。第二，中、英、印三方外交关系错综复杂，中国一方面应联络藏人，使其与中央政府站在一起而不站在英方，另一方面应趁时机俱佳，趁早与英国通过外交协商解决西藏问题，而非被动地等待对方提出修约。第三，青海及西康无论如何不应划入西藏境内，宁可给予西藏较高的自治，但划界问题则寸土不让，藏军如有进扰则迎头痛击。钱端升同样指出，对西藏用兵乃下策中之下策，结果只会将西藏推向英方，只有一方面怀柔藏人，一方面与英方交涉，才是上策。

——钱端升：《藏事不可忽视！》，载《益世报》1934年2月2日，第1版。

2月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再论疏附事件》。

这篇社论是钱端升有关新疆的第三篇社论。与前两篇相比，观点并无明显变化。钱端升先解释新疆事件的急迫性：第一，我国的版图几十年日见其小，大蹙而特蹙，仅存之边陲中，仅新疆广袤富饶；第二，各边陲中，只有新疆还有妥善解决的可能。对于传言中的疏附事件，钱端升认为发生的可能性更大。但无论如何，政府都应妥善设计解决新疆问题，一方面制止新疆大地上盛世才、马仲英之争，另一方面赋予缠回高度自治，扶植回族官兵回驻南疆，逐步提高内地对南疆的向心力。有鉴于形势严峻，钱端升不得不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内，连续三次呼吁政府采取切实措施。

——钱端升：《再论疏附事件》，载《益世报》1934年2月4日，第1版。

2月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美国的新货币法》。

这篇社论关注的是罗斯福新政中的货币法案。该法案已于1月30日由罗斯福总统颁布施行。钱端升将该法案的要点归纳为五点：第一，金币的纯金比例降低；第二，收购国内银矿，增铸新银币；第三，规定国内黄金无论公私，必要时可由政府管制；第四，发行汇兑平准金20亿元；第五，施行期限暂定为两年。

在钱端升看来，降低金币的黄金比例，有如下三个作用：第一，国内普通公司债券的比例大幅度减轻，以前1美元债务现在只需偿还0.59元；第二，金币减值，则比较容易引发通货膨胀，而经济凋敝时期通货膨胀为促进经济的重要办法；第三，对外能够提高外国货币的汇兑价格，鼓励本国输出，限制外国输入，由此进一步引发国际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和贸易竞争。另外，钱端升认为此货币法案亦有政治上的作用，能够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来

降低失业，振兴市场，增加薪资。

——钱端升：《美国的新货币法》，载《益世报》1934年2月5日，第1版。

2月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省长制与委员制》。

这篇社论讨论的是省政府的组织这一困扰民国政制多年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提起则因四中全会的相关议案。就其背景而言，中国向来在地方行政机关采取首领制度，不管是巡抚、民政长、巡按长还是省长；而从1926年国民政府在广东采行委员制开始，委员制盛极一时，从中央到地方纷纷改行委员制，蔚然成风。除了风气因素，钱端升认为，中国行省少而军人政客多，也是采取委员制的主要诱因。但钱端升客观指出，如“委员制的真精神不存在”，上述理由也难成立，省政府主席与省长并无二致。在钱端升看来，省长制与委员制之间本无高下优劣之分，理论上委员制甚至在省长制之上，毕竟省政府既是立法机关又是行政机关，大权在握，亦容易滥用、误用权力，而委员制则因合议而降低滥用概率。但钱端升亦清醒地指出，既然委员制的真精神从未能表现，还不如老老实实改回省长制。

鉴于改回省长制的建议不绝如缕，但实行极其艰难的状况，钱端升认为障碍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省政府改行省长制后，原有各省五六位省委员的安排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如果将省政府各厅裁并成直隶于省政府之司，削去单独执行法令之权，则省政府内部的组织亦需要大幅度更改。

站在学者角度，钱端升正告政府，实行省长制不过是求名实相符而已，与省政的改良与否并不直接相干；省政的改良还需要从人事角度及财政角度着手，人事角度少用军人，多用文人，尤其多用有新知识的文人；财政角度中央财政收入富裕于各省，故应多多援助各省的建设。惟其如此，省政才可以革新。

——钱端升：《省长制与委员制》，载《益世报》1934年2月6日，第1版。

2月7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古物的政治可以不玩了罢!》。

本文讨论的是北平文物的保管问题。钱端升开篇即怒斥：“中国今年黑漆一团的政治甚多，而最臭最不可解的莫如关于旧都古物的政治。”关于北平文物，钱端升认为分两个问题：存放地点问题和保管机关如何组织的问题。

就存放地点而言，钱端升反对商界、文化界提出的将所有文物藏在北平，认为应该采用民族共同享受的原则，去粗取精后，在南京、广州、汉口等地分别存放。钱端升认为，无论华北是否亡于日本，都不赞成古物南迁：如不亡于日本，则不应南迁；如亡于日本，人民生命财产亦有牺牲，文物受损更不在话下。职是之故，钱端升认为存放在上海租界区的文物应该检点后，分别运送南京、北平及其他各地。

而就文物保管机构的组织，钱端升提出，如果文物分别存放在南京和北平，则两地应分别设立博物馆。博物馆按照旧习隶属于内政部，按照西方习惯隶属于教育部。如果北平设置博物院，那么北平可以隶属于博物院者，均无另设保管机构的必要，诸如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管理颐和园委员会、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及坛庙管理处等，均应裁并。就故宫博物院而言，陋习在于党国要人多兼理事但不理事，理事长大权在握，理事机构为空架子，应该予以明确取消。

——钱端升：《古物的政治可以不玩了罢!》，载《益世报》1934年2月7日，第1版。

2月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工程师组四川考察团》。

该文借中国工程师学会将组织四川考察团事宜，而向考察团、向政府、向读者喊话。钱端升立论的基础在于，中国的近代化取决于各省的分工合作

而非各自为政、但求自给，而分工合作的基础则取决于详细调查。鉴于政府方面尚未做这方面的工作，钱端升对中国工程师学会将组织四川考察团之举表示了热烈欢迎。在钱端升看来，四川的民丰物阜，较之西北的贫瘠荒凉，更有考察、开发的空间。但钱端升同样殷切建议，考察组在入川前两个月中，应及早准备，牢记经济建设的必要，必要时可以邀请农业专家同行，以免将考察变成游览，确保考察团切实代政府尽一部分调查责任。钱端升还提出，政府方面对于四川应有新政策，应放弃以川阉制川阉的旧政策；疆藏问题重要，四川问题亦重要，政府应切实履行职责。

——钱端升：《工程师组四川考察团》，载《益世报》1934年2月8日，第1版。

2月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华侨的疾苦》。

该文针对华侨掀起回国潮而发。钱端升从如下四点判断，海外华侨陷入厄运：第一，出国华侨数量少于回国华侨数，侨民总数减少；第二，华侨每年向国内的汇款甚多，但亦大幅度锐减；第三，失业华侨普遍增加；第四，华侨在外所经营的企业也陷入不景气当中。对此华侨之不振，钱端升认为理由有三个：全世界经济的衰落、华侨所在地政府虐待侨民及有些国家管制经济并限制生产。在钱端升看来，这些因素很多政府左右不了，但政府依然可以做一些工作，毕竟无论从民族主义角度还是从人情角度，海外华侨都有恩于国民党、有恩于中华民国。钱端升认为，政府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做最低限度的努力来改进华侨工作：第一，在世界经济衰落开始两年中，华侨汇入不少资本悉数用于投资工业及广东、福建部分城市的产业，但由于战乱及政府的失职，大多失败；政府应采取各种方法，减少营业税，在某些领域赋予华侨优先投资权。第二，政府应在东南亚各国加强外交努力，与各国交涉，免征或减少当地华侨的人头税，减轻当地华侨负担。第三，对于失业归国华侨，政府应有所救济和给予就业上的照顾。

——钱端升：《华侨的疾苦》，载《益世报》1934年2月9日，第1版。

2月10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钱币革命不可随便提倡!》。

这篇社论针对四中全会上焦易堂等所提的币制改良方案而写。在四中全会上，焦易堂依据刘冕执所提议的能力本位币制，再三提案于中央委员会，钱端升闻之，不禁大声呐喊，“币制改良……不是一件可以随便提倡、随便附和、随便乱谈之事。我们的币制诚需改良，然应怎样改良，则须详考国民的习惯、国内的经济状况、国际贸易情形以及其他因素”。钱端升详细回顾能力本位币制的“发行、保证、缴还”实质，认为该币制有如下三个问题：第一，能力本位币制要求能力价值与有职业人的收入挂钩，实质是根据收入状况而向社会借贷且没有利息的借据；第二，任何货币之所以流通，全在人民信心，尤其对于货币背后金银等的信任心，但能力钞券所代表的为不可捉摸且价值无定的能力，政府为最后保证人之说更不知道一驳；第三，能力钞券如果真得流通，必然导致滥发横行。钱端升指出，他对于能力本位制的怀疑尚不止此三点，“党国要人乃亦不察事机，不问轻重，随便附和于某一人所创造的偏僻议论，而究欲令之成为定案”，尤可怪罪。

——钱端升：《钱币革命不可随便提倡!》，载《益世报》1934年2月10日，第1版。

2月1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山海关之收回》。

这篇社论写于1934年2月10日山海关主权由日伪收归中华民国之际。对此，钱端升感情澎湃。1933年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后，北平东北一带被划为停战区，停战区内中方不得驻兵，日军则可视察，而日军之撤退居然绵延至二月以上……日人仍拒长城六口，如今仅归还山海关，日本政客却大力宣扬中日亲善谬论，钱端升能不恼火？钱端升惟愿其他长城五

口亦及早回归，否则在残缺的主权下日伪仍可随时来袭。另外，钱端升更是建议民国接收当局善于安抚日伪统治区民众，“使当地人民知我之政治，较善于日伪之政治”，不欺人民，不征苛税，锐意教育，尽力救济，既获人民之讴歌，更令奸党匪类无由而生，减少对日伪治安力量的依赖。

——钱端升：《山海关之收回》，载《益世报》1934年2月11日，第1版。

2月1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用洋人与迷信洋人》。

该文评论的是国民政府内部热衷于聘请外籍顾问现象，写于国联顾问团抵达平津前夕。钱端升的核心观点在于，洋人不是不可用，但迷信洋人则万万不可，使用外籍顾问需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所用的外籍顾问能够绝对接受中国的指挥；第二，外籍顾问有显然的需要；第三，外籍顾问的薪水应保持在必要的限度，不能太高。对于外籍顾问的必要性这一点，钱端升特别指出，“好的洋工程师及洋医生到了中国后仍是好工程师、好医生，但洋教育专家及洋行政专家到了中国不见得仍是教育专家及行政专家。洋人不懂我国国语，更不知我国国情，故欲望其能提出改良中国的教育及行政的办法，宁不等于问道于盲？”钱端升指出，“我们并不反对用洋人，但洋人必须有其用”，“无用的洋人实可不必再请”，只要满足上述三条件的洋人才是可以用的。

——钱端升：《用洋人与迷信洋人》，载《益世报》1934年2月12日，第1版。

2月1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读汪蒋真电感言》。

钱端升这篇社论写于汪精卫、蒋介石“真电”之后。对此电文，钱端升有如下评价：第一，汪蒋在电文中强调各省与中央亲密合作，但凡是政治有

方的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合作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央可命令、可协助，地方可受助、应服从；而就中国实际，除军阀割据地方外，地方长官均由中央派去，但中央不能指挥如意。中央需要反思的地方更多，首先在选人用人方面应慎重考虑，其次应实事求是，慎发法令。第二，汪蒋真电只强调国人与政府合作，而不做变法改制之谈，而实际上，改善政制与救亡图存并不冲突，中央政府虚设机关太多，中央政治会议大而无当且不能吸收国内优秀人物意见，需要改良以提高整治效率的地方甚多，人民与政府合作是重要，而政府对人民改良建议的吸纳更重要。钱端升亦指出，政府热衷于剿共，但比剿共更重要的是建设；建设绝不是修几条路、设几个卫生试验所所能济事，建设一定要树立在平民的基础上，改良农村，兴办实业，厉行节约，鼓励储蓄，另外还要使公众知悉建设计划，以便知所赞助。

——钱端升：《读汪蒋真电感言》，载《益世报》1934年2月13日，第1版。

2月17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国际环境与外交路线》。

钱端升在这篇社论中评析了当时中国内外交困下，外交方面可能的几个突破口：依靠国联、依靠苏联或依靠日本。在钱端升看来，国联本为国际友谊组织，目标为维持和平，但脆弱复杂，力量有限；苏联方面，除非日本压迫其存亡，不会轻易对日宣战，放眼将来日俄关系剧变者均为庸人自扰；而日本方面更是思路一条，表面上的亲善、提携，掩盖不了侵略的野心，各种说辞不外乎掩耳盗铃。而钱端升更可哀痛者，是国内精神力的缺乏，即无忍辱负重的观念，稍有血气者铤而走险，阿谀用世者则不惜觊颜事敌，国民心理之不堪，实在让人看不到希望。在这种情况下，钱端升认为：“吾人处此窘境，不有坚决牺牲之精神，以待欧美必然之反响，前途不必论矣！”

——钱端升：《国际环境与外交路线》，载《益世报》1934年2月17日，第1版。

2月1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怎样可以促进我们国家的近代化》。

这篇社论讨论中国近代化的问题。钱端升之所以用近代化，而非救国，有意与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等教条保持距离。在钱端升看来，要中国成为一个近代国家，最低限度要做到如下两点：第一，国民要有坚强意识；第二，国民要有雄厚的经济力量，至少在食品、毛纺织业、煤钢化工及金融等领域有基本的自足。钱端升认为，上述最低限度的两点，即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即无内患、无外祸、无天灾等等，也需要具有新知识的人十五年以上的埋头苦干。对于如何通过努力使环境趋于理想，钱端升提出：第一，我们需要一个中心势力，一改以往一盘散沙局面；第二，尊重新知识、新技术及新人物；第三，全国人民忧勤惕厉，刻苦耐劳。在钱端升看来，精神比计划更重要，若没有近代化的精神，近代化的计划要么没有，即便有亦无从实施。

——钱端升：《怎样可以促进我们国家的近代化》，载《益世报》1934年2月18日，第1版。

2月1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裁军问题与中国》。

这篇社论写的是欧洲因裁军问题而引发的乱局。钱端升提出，欧洲问题多如牛毛，但大问题只有三个：赔款、法国安全及裁军。这三个问题既与德国和法国直接相关，德法关系反过来也影响了这三个问题的解决。钱端升陈述裁军及德国退出国联的前因后果之后，坦陈中国对欧洲大局并无影响力，但欧洲大局却与中国息息相关，“欧局愈乱，则愈无制裁日本之力，此其一。各国扩军愈速，则大战亦愈近，此其二。以我们现在的国势论，我们万万不能望有大战，因为在大战中，无论胜负谁属，中国的地位只有愈低落；我们万无侥幸的可能。然我们既无力延缓世界的大战，则我们惟有努力求成为一

个近代国家。我们如再不争气，则今日无法解决的裁军问题直接固会引起大战，间接且将加速我中华民族的灭亡”。

——钱端升：《裁军问题与中国》，载《益世报》1934年2月19日，第1版。

2月20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英日间的商战》。

钱端升在这篇社论中纵论英日之间有关纺织品倾销而引起的纠纷，其落笔则在提醒读者，日本与列国的商战足以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前途：第一，如果日本的倾销政策成功，当列国向日本求和时，日本必提政治要求，这于中国不利；第二，日本如能永据华北、东北，北方人工将为日本更廉价的劳动力，这只会提高日本在世界经济市场上的地位；第三，日本的倾销政策如受挫折，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将更高，日货输入亦将更多。钱端升在结尾中指出，近年来我国纺织业的衰落凋敝为人所共知，如国家不予扶植，日货之倾轧势必将有增无减，“只有扶植自己的制造业，民族才有出路”。

——钱端升：《英日间的商战》，载《益世报》1934年2月20日，第1版。

2月2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统一中国的途径》。

该文系接1934年2月18日《怎样可以促进我们国家的近代化》一文而作。钱端升之所以续写此文，是因为他认为，统一是中国近代化的先决条件，统一则事半功倍，不统一则事倍功半。在这篇社论中，钱端升提出如下层层递进的观点：第一，统一需要有中心势力，而在当时政坛相关中心势力非国民党莫属，当然附加条件是国民党必须有所改善。第二，国民党内，有关中心势力的意见并不一致，民主、集权乃至党的领袖合议制等都有，但钱端升指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成功的独裁在其开始之初并不明显独裁，其

独裁程度因其建树而提高，故在中国，谁能认清途径、埋头苦干又能领导群众，谁将成为最有力的领袖。第三，关于中心势力如何引领中国统一，钱端升亦进一步提出：第一领导应该身先忧患；统治者对自身应有严明纪律；统治者应有大公精神来应付现有局面；统治者对外需有牺牲精神，对内需做出几件快意之事，尤其是在肃清贪腐、禁绝鸦片、废除苛税、绥靖盗匪等方面应有所作为；对于统一中国而言，武力是必要的，但徒有武力则万万不能，只会延缓统一或者是统一永远不能。

——钱端升：《统一中国的途径》，载《益世报》1934年2月21日，第1版。

2月2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中日问题果能解决么？》。

钱端升在该文中再次讨论中日问题。钱端升指出，国家与国家关系可以分为三种：不相往来，无所谓好坏；平等共存，略有冲突；强弱对峙，弱肉强食。而在钱端升看来，中日关系则只有第三类一种可能，势不两立，决一死战迟早无可幸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所能图者惟有增强力量，备战于将来。但既然如此，钱端升认为东北问题更无解决的可能，纵然中国就东北问题向日本做出大量让步，日本方面亦不会自足于东北，而放任中国内地发展。这种情况下，搁置争议的做法亦无意义，“然国际形势无论如何变化，如我这种不争气的国家必占不到便宜。故搁置等于死，我们以为万万不可”。那么，在这种进亦忧、退亦忧的难局中，对日政策究竟该如何定位？这个问题钱端升留待下一篇社论解决。

——钱端升：《中日问题果能解决么？》，载《益世报》1934年2月22日，第1版。

2月2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对日应采何种策略？》。

文接上篇，进一步讨论对日策略问题。钱端升提出如下对日策略的要点：第一，应振兴民族。第二，应强化抵抗心理，强化原有之同仇敌忾心理，而不消沉堕落、心灰意懒；另外，应明确表示毫不屈服，“在一切形式上仍应认东北为我们的领土，东北同胞为我们的人民”。第三，纵然国联、苏联及日本三大外交路线都有困难，但除日本外，国联、苏联及其他国家如美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的外交工作还是应该抓紧，为中国的复苏赢得喘息的时间和空间。第四，在原则上反对亲日政策的同时，可以适当采取对日和缓的办法，准备决战但不高喊打倒日本，少用日货而不提抵制日货，仇恨日本而犹可虚与委蛇，在这些范围内对日缓和，同样赢得喘息之机。第五，当局及留居华北的军人相忍为国；但华北人民应有牺牲的精神和准备。钱端升总结说：“中日问题是我民族空前的大难，但我们绝不可气丧而自馁！”

——钱端升：《对日应采何种策略？》，载《益世报》1934年2月23日，第1版。

2月2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复兴民族几个必备条件（上）》。

钱端升此文重回民族复兴问题，提出民族复兴的三条件：树立民族中心信仰与中心势力；恢复民族自信力与原始建国精神；彻底改革现在社会风气习尚。2月24日的社论为上篇，重点论述民族中心信仰与中心势力的树立问题。钱端升认为，我国政府与民众“显如一盘散沙，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诈虞相尚，私利是图”，“今日中国民族正如海上一叶孤舟，暴雨狂风，灯昏月暗，而无一罗盘针以指其方向与归途。鲜有不覆亡者！”对此情形，钱端升提出的对策如下：“首先必须在国人心脑中，树立一个中心信仰，标以一种切合时代国情之主义，使举国有所宗；同时在政治上必须组织一个有主义、有计划之党国，此中更应有几个伟大人格之领袖，有多数坚贞、忠实、信义、仁勇之团员，严格其训练，铁化其纪律，以此为国民力量之中心，方

能领导发动全国国民，以共赴此中心信仰，信仰与力量之中心具备，吾族乃不致如今日之颓废零散，毫无生气，今后必能同心合力，齐一步骤，以戡内乱，以御外侮，以建国家。”

——钱端升：《复兴民族的几个必备条件（上）》，载《益世报》1934年2月24日，第1版。

2月2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复兴民族几个必备条件（下）》。

文接上篇，钱端升此文另论复兴民族的其他条件：

第二，恢复民族自信力与原始建国精神。钱端升举古今中外历史，坚信“全民族人人心中充满一‘有我在，中国决不亡’之信念，则任何艰苦，可以肩负，任何环境，可以征服，此心理上之基石一定，甚至无坚不摧，无敌不克”。

第三，彻底改革败坏浅薄之社会风尚。钱端升指出：“今日之中国社会，简言之，实一病态之社会。整个社会所表现者，为自私、怯懦、欺诈、虚骄、偷惰、苟安，无公德心、无责任心，有小我而无大我，重家族而轻社会，此实中国民族堕落颓沉最可痛之现象也。”钱端升由此对方兴未艾的“新生活运动”表达了赞赏，提出多方改进社会风气的建议：一方面，政府主动以政治力量改良制度，提倡善良风俗；另一方面，政府领袖诸人以身作则，彻底改变私人生活习惯，树立新风气为天下先。而在民众方面，则应由知识分子、中坚人士及组织团体，互相策应，检查各种病象，一一列出有必要摒除的缺陷，同时保留旧有美德，参考西洋的优良习惯，融合贯通，创立既合时代又合国情的新道德、新风气，借此发动民众，风行全国。

第四，应维持民族最低限度的温饱。钱端升指出，中国社会阶层要么在“奢侈线”以上，要么在“饥饿线”以下，两极分化极其严重，不少民众因为饥寒交迫而为汉奸，单纯“道德论”完全不足以谈民族复兴，“今日当国者，必须为此颠沛流离、贫弱无告之劳苦大众，先谋一回苏喘息之生机；至

少至少，应将其生活从‘饥饿线’上提到‘温饱线’上。”在钱端升看来，“必待温饱，而后可以有力量、有生机；亦必待有力量、有生机之民众，而后可以谈复兴，谈建国”。

——钱端升：《复兴民族的几个必备条件（下）》，载《益世报》1934年2月25日，第1版。

2月2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二次大战在酝酿中——对国际情势综合的观察》。

钱端升在本文中对欧洲战局乃至世界形势作了综述，得出结论认为，眼下的诸多缓和措施，“只能延长战争爆发的时日，不能根本阻止战争不爆发”。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处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头，内忧外困，“灭亡的警钟，已响彻云汉”，所以我们应该攘外与安内并举，“攘外固必先安内，然安内之时，绝不能忘记攘外”。政府方面应该以建设求统一，但建设须在民众身上；培养国力须生产，但生产必先铲除障碍，政府应当彻底实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早作准备，在抗日与利民两大主题下努力前行！

——钱端升：《二次大战在酝酿中——对国际情势综合的观察》，载《益世报》1934年2月26日，第1版。

2月27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冀中学毕业会考》。

该文主题为教育问题，且讨论河北省内的毕业会考，题目偏，而题材小，在钱端升前期的社论中似未曾见到。在文中，钱端升讨论了毕业会考委员会的人选问题、命题标准问题和会考学生奖励问题。对于毕业会考委员会的人选问题，钱端升认为不应邀请大学校长或者教授入内，而应从具有中学教育经验的人选中选出；对于命题标准，因为教科书出版得混乱，钱端升认为除国文外，应多给题目以便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同时多出简易的测验式问

题；对于奖励问题，钱端升认为缺乏奖励机制是教育部《会考规程》的败笔，教育当局应非正式出台奖励机制，对于毕业会考成绩优异的考生给予免试入学的机会，另外发放奖学金予以奖励。

——钱端升：《冀中学毕业会考》，载《益世报》1934年2月27日，第1版。

2月2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奥国问题的危险性》。

钱端升的这篇文章讲述奥地利在欧洲政坛中极其特殊的位置，担心它既能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亦可能会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奥地利国小人少，国力有限，不得不合纵连横于欧陆各国，反而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社会不容小觑。钱端升故建议英法两国应努力工作，防止奥地利成为德国或者意大利的附庸国。

——钱端升：《奥国问题的危险性》，载《益世报》1934年2月28日，第1版。

3月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长春今日的傀儡战》。

该文针对溥仪称帝而写，核心观点与1月13日的社论《溥仪称帝前后应有之防范》基本一致，要点如下：第一，称帝事件本身无足轻重，在我国有实力收复前，不会改变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与战略格局；第二，明知抗议无效，依然应做最强有力的抗议，对内可以唤醒国人亡国之痛，对外则可防止友邦承认伪国；第三，严防日本通过通邮、通商等逼中国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

——钱端升：《长春今日的傀儡战》，载《益世报》1934年3月1日，第1版。

3月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宪法初稿评议》。

这篇社论专门评价国民政府立法院刚刚对外发布的宪法草案。钱端升开宗明义即指出，宪法的价值贵在能够实行，而在中国，人民既未具有运用政权的能力，政府亦没有令出必行的实力，“宪法即使美轮美奂，无瑕可击，又安能必其实行？”而从合于国情、较少瑕疵的角度看宪法草案，钱端升认为这份宪法草案差强人意，较之吴经熊版本草案的分编及民族编的措辞，已先进很多。但在钱端升看来，新草案在总统与行政院长的权责分配方面大有改进，但依然有一些问题，比如国民大会的权限太大、五院制与国民政府同设、五院并立的弊端等，还需要进一步斟酌。

——钱端升：《宪法初稿评议》，载《益世报》1934年3月2日，第1版。

3月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白银问题（上）》。

该文因美国提高白银价格而起。钱端升认为该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第一，就外贸而言，白银价格提高，可以增加外货对华之倾销，中国人超将增加；第二，外国倾销加剧，不但使人超增加，对国内新型工业发展亦有消极影响；第三，鉴于我国银本位的状况，银货大量流出流入对金融有重大影响。

——钱端升：《白银问题（上）》，载《益世报》1934年3月3日，第1版。

3月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白银问题（下）》。

该文继续讨论美国提高白银价格对中国的影响：第四，从积极方面看，白银价格提高可以因为进口税的增加，而对中国财政予以补助。但钱端升更为清醒地认为，美国提高银价之举，并非真要采取复本位制，只不过是利益集团左右，或者敷衍利益集团之举，这类政策不大可能长久。从中国对策而

言，钱端升认为尽管形势不甚明朗，但有关对策必须要自动，且必须可行而有效，“能自动然后事自我主，能可行而有效然后可于我有动”。

——钱端升：《白银问题（下）》，载《益世报》1934年3月4日，第1版。

3月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德奥与欧洲》。

该文继续讨论欧洲局势。钱端升再次重申其观点，欧洲政局表面纷繁复杂，但实际上德奥问题为其核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逐渐崛起，及至希特勒登台，强化其两大信念：“有决心有狂热即能打破一切困难，达到最后胜利”，“大德意志之实现，须借国社党国际化之力量为之促成”，转为欧洲各国所不安和紧张。而就奥地利形势而言，2月28日的《奥国问题的危险性》社论已有详述，尽管社会党变乱已被肃清，但多福斯之准独裁的失败、意大利之覬觐等，都会使奥地利在未来欧洲政局中占更重要的地位，间接亦会对远东产生影响。

——钱端升：《德奥与欧洲》，载《益世报》1934年3月5日，第1版。

3月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剿匪”工作的进展》。

这篇社论围绕蒋介石所提出的“治标莫急于剿除‘匪军’，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讨论当时军政界的头等大事。该文在当时政治正确，钱端升之论述亦以评述各区军事进展为主，惟提醒政府在完成“剿匪”重任的同时亦应未雨绸缪，计划裁军事宜。

——钱端升：《“剿匪”工作的进展》，载《益世报》1934年3月6日，第1版。

3月7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教部派员视察高等教育》。

该文写于教育部派员视察华北、两湖高校，受派专家即将抵达天津之际。钱端升指出，尽管近年来高等教育所受批评极多，但平心而论，舆论批评不无过头之处。在钱端升看来，现代中国最有势力的四种人中，较之军人和旧文人，留学生及大学生“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最坏者；不但不是最坏者，而且还是比较优秀者。国家社会的纷乱他们虽也不能逃咎，但他们所负的责任绝无第一种及第二种人之多”。钱端升更进一步表示，固然大学生有颇多可以批评的地方，但不尽是办学者的罪过，学生的堕落大部分应归罪于政治的不良，办教育者仅负较小的责任。

而对于高等教育现存缺点，钱端升认为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学风、教风俱差，学生多不好学，教师亦心猿意马于教育；第二，学校的设立及编制毫无系统，叠床架屋者甚多；第三，学校质量极坏，文科全靠讲义为教授张本，设备简陋的理工科院校亦比比皆是。就上述三点，钱端升指出，教育当局近年来整理各院校的大方向是对的，文法专业当然不可偏废，但从中国建设的角度来说，理、农、工、医等确实需要提倡，“好的文法学院，仍须留着，而坏的理工学院则须受严厉的制裁”。钱端升还建议教育部，“坏的学校不可不裁，不裁坏者，学风及质量俱无从提高。好的学校，不能不予扶掖，经费困难者尤应予以补助。”就华北教育而言，钱端升认为华北高等教育中，平津占据重要地位，但平津高等教育院校太多，重复盛行，整理不力，彻底改革方案则有望于教育部专家的视察了。

——钱端升：《教部派员视察高等教育》，载《益世报》1934年3月7日，第1版。

3月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内蒙的自治》。

该文评论内蒙的自治问题。钱端升在1月20日曾发表相关社论，但因天津《益世报》年久散佚，此文不可得。在3月8日这篇社论中，钱端升对于国民政府的涉蒙政策，给予了委婉的批评，认为国民政府息事宁人之态度

太明显，通过高度自治也给了内蒙古闭关自守的可能，这将导致蒙、汉的隔绝，蒙古的政治、经济在未来亦无明显提高，“从全民族的利益看起来，这诚是憾事”。钱端升建议，中央应该在现有框架内，通过蒙古地方自治指导委员会长官派员参加自治政委会会议、纠正或撤销政委会命令或行政行为的权力、每月代中央给予政委会5万元经费的权力等，“一方能博得蒙古王公的好感，一方又以缓和而坚决的手段指导政委会，使其自动地欢迎汉人的移植，并使蒙古的教育及农业赶早发达，以充实全民族的力量”。

——钱端升：《内蒙的自治》，载《益世报》1934年3月8日，第1版。

胡适自河北到天津，与钱端升等餐叙。

【七点，梁大夫与梁女士来接，到福德饭店吃饭，在座有何廉、柳无忌夫妇、黄子坚夫妇、徐敦璋夫人、马□□女士，两家兄妹三人、钱端升。】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81页。

3月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傀儡僭号与西南态度》。

该文针对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3月6日发表通电斥责国民政府“纵容叛逆、误国殃民”，复要求国民政府对于叛逆僭窃如何补救对国民表态一事而写。钱端升再次重申了他以前的观点：中日问题难以解决，现阶段对付日本只能不屈辱、不刺激，“我们不能屈辱，因为屈辱并不能填满日本的欲壑，且转足以加增其鄙视，同时更磨灭了国人的志气。我们也不必去刺激日本人，因为刺激可使日人多一种借口，同时于我也毫无益处”。按照这种观点，钱端升认为溥仪称帝为无足轻重之事，为表不屈辱起见表达抗议即可，“中央之不肯提出抗议未免太嫌畏怯，但对于它之不肯下令讨伐则认为大致不足的”。钱端升认为，蒋介石、汪精卫政府纵然千般不是、万般不足，但对日之忍辱负重、不肯采取剧烈手段，囿于国力所限，则无可厚非。基于此，钱端升对于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3月6日的通电实在“不

是抹杀事实，便是专门对人”，“他们如要切实表示，他们实应于会议席上求得之，通电子此事毫不相关”。钱端升由此进一步申言，中国当务之急最需要者莫过于统一，统一后政府和人民依旧需要努力，但不统一一切便无从谈起；钱端升建议西南方面以统一为重，免除无谓的分裂及吹毛求疵，“分裂及吹求徒然足以使外人益信我为无组织的民族”。钱端升悲叹：“我们经过这几年这样大的教训，我们还不长进一点，还是这样任性使气，脱不了私人恩怨的漩涡，那只有坐待他人亡我了。”

——钱端升：《傀儡番号与西南态度》，载《益世报》1934年3月9日，第1版。

3月1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何以弭贪污豪夺之风？》。

该文讨论贪腐问题。钱端升认为当时“有官皆贪，无吏不污”，“这个国家乃堕落到今日不可收拾的地步！”钱端升提出，社会基础在于群己权界、公私分明，由此才有社会的公平可言，但中国社会贪腐之风盛行，社会基础已被巨大的社会分化所动摇了，民族的经济亦因此而风雨飘摇，“整个社会失了公平的原则，失了法轨的维系，失了是非曲直的裁判，集各方面的乖戾怨毒之气，总结酝酿而成”。鉴于此，钱端升认为恢复社会公平的第一步，就是澄清政治、树立法轨，以雷霆万钧之力来铲除社会上盛行的贪腐豪夺之风，恢复社会原有的公平之道。而消弭贪腐的具体办法，钱端升提了三点：第一，改变现行社会制度，由政府用法律的规定、政治的力量来限制私人财产，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第二，由政府用严刑峻法来将贪污豪夺者绳之以法；第三，民众本身要发挥古代侠义之风，制裁贪官污吏。钱端升固然为一代政治学大家，但其法治观念之淡泊，于此文亦可窥其一二；尤其是以侠义之风纠除贪官污吏之见，实在荒诞不经。

——钱端升：《何以弭贪污豪夺之风？》，载《益世报》1934年3月11日，第1版。

3月1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所谓承认伪国谣言》。

该文针对连日来列国要承认伪满洲国的谣言而写。钱端升认为，谣言的突然盛行，无疑出自日方的宣传；而宣传的突然启动，要么是宣传者认为可以达到宣传目的的时间已经到来，要么是宣传活动到了一定程度，多少也会产生实际效果。基于此，钱端升提醒读者对此给予适当的重视。而钱端升的核心观点在于，列强承认满洲国之说，现在是谣言，并不意味着永远是谣言，还是应该未雨绸缪，切勿过度乐观，急速进行国际宣传与外交工作，同时尽早准备万一——两国突然宣布承认伪满洲国后的预案。

——钱端升：《所谓承认伪国谣言》，载《益世报》1934年3月12日，第1版。

3月1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天津救国基金用途之商榷》。

在该文中，钱端升针对新近成立的天津市救国基金的新保管委员会成立，并对天津救国基金的来龙去脉做了介绍，同时提供了自己的建议。天津市救国基金来源于抵制日货运动期间“以征代禁”而所产生巨款。钱端升提出，利用此基金成立之毛织工厂，应通过招商方式找人承办，而不是由保管委员会自己经营；而国货研究所的工作亦不应停止，而应委托平津工商学术机关或聘任专家，从事各种国货研究，定期公布结果，呈送党政当局通令实行，由此真正改良方法，将提倡国货之口号落实。钱端升还主张，救国基金应该永久封存，只用其利息；当务之急，则是从利息中划拨一些经费，送天津市学生一两名出国学习航空，通过更有效的方式参与航空救国运动，“以最少数之金钱，获最大之代价”。

——钱端升：《天津救国基金用途之商榷》，载《益世报》1934年3月13日，第1版。

3月1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当前几个政治问题》。

这篇社论并无明显时事背景。钱端升有感于国民党人身处澎湃之地，逐渐成熟老练，不说大话，埋头苦干，为民族谋出路，表示“我们站在民众的‘立场’，对政治的态度，始终一秉大公。过去对于政府不怕严厉的指责批评，可是在政府本身，也确有其可指责可批评者在。我们并无别的用意，只出于一片爱护期望的热忱。现在我们的态度，依然如此。政治上如有可指责批评之处，我们仍然要指责批评，不过对于政府的期望始终如一”。钱端升甚至表示：“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除非是丧心病狂，谁还希望内乱？所以中国目前唯一的出路是统一，是安定，是小康。有了统一、安定、小康的机会，我们才能缓过一口气来，才能着手于生产建设，总能准备应付未来的世界危机。”钱端升疾呼：“国人听着！国民党人听着！这是我们民族最后的、唯一的一个复兴奋斗生存的机会，失了这次机会，恐怕再没有我们翻身的机会了。”

而对于目前的政治问题，钱端升认为，主要是建设问题、边疆问题和废除苛捐杂税问题。就建设问题而言，钱端升指出，现代国家的建设，需要通盘设计、整体考虑，而建国工作的先决条件则是统一与安定。而就边疆问题而言，钱端升认为，因为缺乏力量，尚难以通过严格的方式来巩固边陲之地，只能做的则是一方面表示宽大精神，赋予相当自治，怀柔远人；另一方面则征集国内青年志士，服务边陲，为各族服务的同时，逐渐同化各族。对于废除苛捐杂税问题，钱端升提出这是复兴农村的大前提，各地应仿照江西，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其损失由中央补贴；而中央政府通过加征关税、开征遗产税等方式来弥补，待农村彻底复苏。除此之外，钱端升认为废除苛捐杂税还应该裁兵，制止各地借新政之名对农村进行搜刮和剥削。

——钱端升：《当前几个政治问题》，载《益世报》1934年3月14日，第1版。

3月1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由儿童想到育婴和优生》。

该文发表背景是：教育部设1934年为儿童年，进而图谋对儿童教养做根本改造。钱端升站在民族未来的角度，对此十分赞成，但亦提醒读者与政府，仅有儿童教育的改良远远不够，还应进一步加强社会对育婴的培训和设置建设，另外以法令提倡优生学。

——钱端升：《由儿童想到育婴和优生》，载《益世报》1934年3月16日，第1版。

3月17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英兵侵入滇边事件》。

该文借英军入侵云南边陲事件，再论边疆政策的改良。钱端升指出，英军入侵云南，表面上是图云南之矿藏，实际上是构筑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蝎型”侵略政策。此时此刻，政府之划界固然可以解决问题于一时，但长远来看，划界本身并不能止其侵略之心。中央真正该抓紧做的是抓紧修通西南边陲与内地的交通，一方面可以宣扬中原文化，另一方面则为戍边之用。另外，钱端升指出，中央政府过去之大错在于不明边情，为边民所选之官，亦横征暴敛者居多，边民因仇视官僚而仇视中央，更易受到敌国之蛊惑。另外，边陲各地生活习惯信仰各有不同，政府一方面应因民设官，另一方面则应因势利导，随性教化，改良边民之生活习惯，输入以现代常识，教之以汉语，使其心悦诚服，进而同化归服于中央。

——钱端升：《英兵侵入滇边事件》，载《益世报》1934年3月17日，第1版。

3月1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

钱端升在这篇社论中，承2月24、25日的社论《复兴民族的几个必备条件》，针对方兴未艾的新生活运动，提出了具体的原则与“根义”：第一，“新生活运动”顾名思义，人民须先有生活，但当时中国半数以上民众生活在温饱线以下，饥寒交迫、不得温饱，如果此问题不解决，所谓“新生活运动”则根本失其意义。第二，“新生活运动”应该从上层居民开始，尤其是社会上有学识、有声望的人士和政府官吏，只有他们以身作则，告别过去纸醉金迷的生活，为民众之先，“新生活运动”才有可能成功。第三，实行“新生活运动”应有相应的强制力，中国国民性素来被动、懒惰、保守，如无强制力，“新生活运动”难以推进。细言之，官吏方面应该严订规范，违反者将受严厉制裁；社会方面应有赖于中坚人士组织团体，严订规范，树立道德准绳，明确社会制裁的范围和力度。

——钱端升：《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载《益世报》1934年3月18日，第1版。

3月1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意奥匈成立三角协定》。

这篇社论评论的是意大利、奥地利及匈牙利新签署的三角协定。对于这一事件，钱端升有两点看法：第一，三角协定的签署是墨索里尼外交的成功，可以略微制止德国吞并奥地利；但钱端升亦指出，德国吞并的步伐不会因此止步，法国亦对多瑙河流域虎视眈眈，欧洲不会就此天下太平。第二，三角协定的签署，是中欧诸国经济集团形成的第一步，在当时具有破天荒的意义，协定对三国均有好处，对欧洲各国经济亦会有大小不一的影响。

——钱端升：《意奥匈成立三角协定》，载《益世报》1934年3月19日，第1版。

3月20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对日外交之东西两向》。

这篇社论聚焦于苦闷之外交局面，纵论了对日外交东西两向各自的优缺点。

就西向外交而言，钱端升认为“以夷制夷”固然不错，但国联已仁至义尽，日本已受环球谴责，似积极乐观；但西向外交也只能止于此，“国际对我同情为一事，国际之实力援助为另一事；列强对日冲突为一事，冲突后我国之得祸得福为另一事”。钱端升并不讳言：“假使列强果起而向日作总攻击，更假定大战之后，日本溃败无余，彼时我国之遭遇如何，殊非任何人所能预料。盖国际虽有可以运用的形势，而我国苦无运用的资格。譬犹沧海狂流，破舟一叶，乘之者殊难作乘风破浪之豪想。”

而就东向外交而言，对日谨慎退让，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进一步交涉、妥协并解决中日问题，则颇有异想天开的味道。钱端升指出，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非但合作之理想不可能，即进行交涉亦苦无从着手”，若要中日合作，前提是日本不侵略中国，但日本之侵略中国举世皆知；而要解决中日问题，必先解决东北问题，但伪满洲国成立后，东北问题亦已经不可能和平解决；即便中国将东北拱手相让，能否满足日本贪天之胃口又是另一个问题。

职是之故，钱端升指出，中国对日外交的方针表面上条条大路，实际上东、西向都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希望在于，“今日之外交家既不必如合纵连横之苏秦张仪，亦不必效甘负汉奸恶名的李鸿章，而必能忍辱负重，谨慎明敏，于不损失国家地位之范围中，为国家图目前之安定，以为内部建设之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国民不必苛责政府，政府对民众亦应以诚相见，无须粉饰委蛇。

——钱端升：《对日外交之东西两向》，载《益世报》1934年3月20日，第1版。

3月2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有新环境然后有新生活》。

该文承3月18日之《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继续纵论“新生活运动”的推进之道。钱端升的观点并未改变。他认为要推进“新生活运动”，需要做到者至少有两点：第一，肃正纲纪，整顿官风，“欲求人民生活之简朴清廉、整饬勤慎，当先以此责之官吏”；第二，奖励勤慎，使社会有大体公道可言，使有志为之青年得其应得之出路，勤慎辛劳的民众亦能享受其报酬。

——钱端升：《有新环境然后有新生活》，载《益世报》1934年3月21日，第1版。

3月2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生产建设应如何着手》。

该文纵论经济建设之道。钱端升分农业、工矿及交通三者分别论及：就农业而言，苛捐杂税仅为障碍之一，更主要的障碍则为国际市场的影响；故钱端升建议，恢复农业、增加产量之要图，一方面固然在废除苛捐杂税，而另一方面则在于组织产销贸易，与国际市场对接。就工矿而言，钱端升认为无论新旧，均困于债务，“整个企业，濒于破产。原来资本，或本是干股，并无实物；或历年亏蚀，早已无存；现有者除固定债务外，仅些微之流动资金而已。”钱端升因此提出，既然债务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那么，“整理工矿，扩充产量，除改良生产方法，减轻运费捐税外，莫急于清算债务”。而至于如何整理，则取决于企业与银行间的决心与努力程度。就交通问题而言，钱端升认为从经济建设的意义上来说，交通的最大作用在于货物流通；但近年来之交通建设，尤其是公路建设，“所患者不问需要之缓急，又无具体之计划，以致公路之经济效用为之大减。至于建造铁路，以经略如工矿等等，则呆资过多，设备又费，即使无军事政潮，铁路为应付债务，运价势难大减”。基于此，钱端升认为，中国生产建设之阻碍，表面上是苛捐杂税、运价太高、技术太差、管理太坏，而根源却在无组织、无计划、无确实投资；职是之故，解决之道则在于通盘筹划，农业领域先组织，工矿领域先清债，而交通领域先计划。

——钱端升：《生产建设应如何着手》，载《益世报》1934年3月22日，第1版。

3月2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建设与工程教育》。

这篇社论站在人才角度，继续讨论建设问题。钱端升对于工程教育，提出如下主张：“于大学之前，须注意青年之环境及中学生之科学训练；大学之外，须有与工科大学并立之工艺学校，以收纳可以造成良匠之人才；大学之中，课程之结构，须注重基本学识，使工科毕业生具有稳固而且扩大之基础；最后且最重要，则在大学之后，尚应有长期之实习机会，俾工科毕业生不特学得其用，且由实习而获得更合于实用之学识与经验。”

——钱端升：《建设与工程教育》，载《益世报》1934年3月23日，第1版。

3月2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论宪稿中人民代表机关的保守性》。

该文承3月2日《宪法初稿评议》，继续讨论宪法草案的成败得失。概而言之，钱端升对于国民大会的构成及权限设计批评甚多，认为这个大会“殆将变成苏俄或苏联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一样，济济一堂的代表，静听政府各机关的报告，鼓掌欢迎几个出席报告的领袖，通过几条赞扬政府的决议，高喊几个口号而已”。至于监督权的行使，必然不像西方国家议会对政府那样苛责，而反过来政府对此监督亦将不甚重视。而国民大会闭会期间，监督权将由国民委员会行使。钱端升认为，如按照现在的初稿组成国民大会，由于代表系按照每县一人的比例组成，中国农村人口庞大，最终选出的代表将无视城市的发展增大，其政见将日趋保守；而国民委员会委员年龄须在45岁之上，亦会使得国民委员会的政见日趋保守。钱端升痛惜：“吾国代表民众监督政府的两个机关，其一则只代表农民间的保守势力，且监督政府之权

事实上运用不灵，一则年龄的限制如斯之高，将来政治之保守、之落后，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钱端升：《论宪稿中人民代表机关的保守性》，载《益世报》1934年3月24日，第1版。

3月2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日美关系的转变》。

该文评论日本与美国关系的改善。由于天津档案馆藏《益世报》原件中有一大段模糊不清，我们只可约略知道钱端升的意思。钱端升大意为，日美间关系的短期改善不足为虑，但长此以往，则可能的结果是美国承认伪满洲国，焦急、叹息均没用，中国还是应加强自身努力。

——钱端升：《日美关系的转变》，载《益世报》1934年3月25日，第1版。

3月2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孙殿英与刘桂堂》。

该文评论的是当时中国面对的部分内乱。钱端升开篇即陈明对内乱的基本态度：如果内乱者有组织、有纪律，内乱只因政见不同或领袖派别之争，则为避免生灵涂炭，顾全国家实力，双方都应容忍，通过谈判等政治方法解决，万不得已再用兵平定；如果内乱者漫无组织、纪律，拥兵自重，政府方面则应予以讨伐，毫不姑息；而对土匪盗贼则只有全力清剿一途。对于孙殿英内乱事件，钱端升指出中央政策前后不一、进退失据，酿成今日苦果，至今只有武力平定，然后或遣散或改编一途。而对于刘桂堂匪患，钱端升认为数千人能够纵横四省数千里而未遇到任何实质性剿灭，地方和中央军事当局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央和地方的军政部门应再派精兵，不分省界剿灭刘桂堂，否则迟早会促进华北的沦亡。

——钱端升：《孙殿英与刘桂堂》，载《益世报》1934年3月26日，第1版。

3月27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中美修改商约》。

这篇社论论及中美修订商约时应持的基本态度和策略。钱端升指出，中美商约起于1904年1月13日，此后1914年、1924年两度按条约规定的十年期换约，囿于旧政府颀预无能，照章全收，如今迎来第四次换约，中国应有所作为。钱端升提出有所作为，是因为外交部顾虑提出修改原则会伤害美国的感情，仅有口头交流，尚无具文提出。钱端升指出，这是我们绝对不该有的恐惧，“我们一方面固应积极联络美国，同时我们更应坚持我们的正当要求。能争也能示好，这才是真正的外交”。钱端升指出，对美交涉坚持修约十分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将成为中英、中日修约的基础，不但涉及中美关系，更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据钱端升归纳，1903年中美商约核心条款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关税和厘金、矿务、内河及沿海航行、领事裁判权，综而言之，关税已自主，自定税率权亦已实现，重点在后三个方面。而在这三个方面中，矿务、内河及沿海航行较为容易实现，可以据理力争；领事裁判权谈判较难，但亦应在修约时坚决要求废除，重申旧日主张，否则的话，无谓的沉默只会被理解为放弃旧日主张。而作为交换，钱端升提出中国的大市场可以给予美国若干便利，以换取美国在修约中的让步。

——钱端升：《中美修改商约》，载《益世报》1934年3月27日，第1版。

3月2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经济委员会的过去与未来》。

这篇社论臧否新近成立改组的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钱端升认为全国经济委员会改组极其失败，无甚大意义，但因其对未来中国经济建设影响甚大，故进一步予以讨论。在钱端升看来，全国经济委员会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本身组织未能合理化，工作有限，机构庞杂，洋人太多，薪

给过高；第二，经委会职权过于复杂，既涉及教育改良，亦涉及行政改进；第三，精神气质过于洋化，与中国农工商业之近代化相去甚远；第四，经委会的事业太偏于都市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农民则关注不多。而为图补救，钱端升提出两点建议：第一，经委会的组织应该大幅度精简，经费开支方面亦需要节约；第二，建设事业应以整个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通盘筹划。

——钱端升：《经济委员会的过去与未来》，载《益世报》1934年3月28日，第1版。

3月2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西南与中央》。

这篇社论讨论中国西南政局与统一问题。钱端升综述西南政局后，认为西南与中央改善关系的时机已到，并就此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西南的执行部及政务会等政治设施应该直截了当地无形撤销，既避免在广东的中委自发通电，也避免中央直接电令撤销；军分会亦不必设立。第二，西南各省直隶中央后，在国防上应与中央合作，在财政上应与中央打成一片。第三，纵然胡汉民“度量狭窄，怨隙难容”，还是应该给予其合作的可能。

——钱端升：《西南与中央》，载《益世报》1934年3月29日，第1版。

3月30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废除苛捐杂税》。

该文再论废除苛捐杂税问题。钱端升的观点一以贯之，认为苛捐杂税问题产生于地方发展教育、民团等事业，但往往为地方官吏所利用，巧立名目，巧取豪夺，政治越黑暗，则苛捐杂税越多。鉴于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已通令各省呈报苛捐杂税，政府方面因区分轻重，一方面整理田赋，一方面废除苛捐杂税，尽最大可能纾解民困。钱端升认为，地方废除苛捐杂税后，中央给予地方财政适度补助是可行的方案，“废除苛捐杂税不难，而难在没

有决心。……政府如能努力，则一年之内凡隶中央之省均可废除苛捐杂税。政府如不能努力，则废除苛捐杂税运动又将如裁厘运动一样历久无成”。

——钱端升：《废除苛捐杂税》，载《益世报》1934年3月30日，第1版。

3月3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国联改组问题》。

钱端升此文讨论国联改组方案背后各国各自的利益诉求。他的结论是比较悲观的，认为在当时的情境下改组国联无望，裁军会议失败与否对之影响不大。而从中国角度看，钱端升认为中国更不必希望国联改组或者解体。

——钱端升：《国联改组问题》，载《益世报》1934年3月31日，第1版。

4月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论宪草中的人权章》。

该文承3月2日的《宪法初稿评议》、3月24日《论宪稿中人民代表机关的保守性》，继续评论宪法草案。这篇社论聚焦于其中与人权相关的条款。钱端升指出，各国宪法对人民的权利义务大都有详略不等的规定，但详细比较的话，“关于义务者大都为空泛不落实，或消极无甚意义的条文；而关于权利者则有三类不同性质的权利的分别，即自由权、公民权及受益权”。就有关义务的规定而言，钱端升认为义务的多少与有无，更多取决于国家的相关法律，而不是宪法本身，职是之故，宪法规定权利是有意义的，而义务则是无意义的。就三类人权来看，钱端升认为自由权最值得重视和注意，但类似参政权这样的条款，依旧需要法律的进一步规定；而受益权的实现与否则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及预算状况；就自由权来说，其确定了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的范围，自有意义，现代国家权力常变，需要通过修宪方式来决定，修改之前则自由权恒定，从这个意义上说，钱端升认为宪法草案过于含

糊，且过于囿于各国成例，他建议不妨在宪法中确定自由的范围。

——钱端升：《论宪草中的人权章》，载《益世报》1934年4月1日，第1版。

4月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南行》。

这篇社论围绕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黄郛将于4月3日晚上南下前往南京展开，实际上讨论的是对日方针及内政问题。就对日方针来说，亲日派认为日本对华欲望有限，达到目的便可止步不前，妄图以让步来求得永久和平。而钱端升坚信日本人的对华欲望无限，一定会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最后目标在于彻底制服中国。职是之故，当下中日关系无从谈到亲善或者妥协，所能做到的最大亲善便是口头上的客气，而与伪满洲国的通邮、通商则万万不可，只会给人以变相承认东北独立的口实。具体来说，华北对日外交只有一个秘诀，即不割让实际权利，只是通过表面上的亲善与日本高层联络，稍微制止一下日本军人的肆无忌惮。而按照这种方针，钱端升认为就华北内部问题而言，黄郛此次进京或要求更大的实权，但在华北政务有根本起色之前，中央应极其谨慎，这一点亦防止日本通过挟持黄郛而获取华北地区更大的权益。

——钱端升：《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南行》，载《益世报》1934年4月3日，第1版。

4月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戴宋西巡与开发西北》。

该文借戴季陶、宋子文次第视察西北，而纵论西北之建设事业。钱端升从历史、地理、卫生、社会等诸多因素出发，论述西北之种种特殊之处，并建议政府方面慎重决策，注重实效。

——钱端升：《戴宋西巡与开发西北》，载《益世报》1934年4月4日，

第1版。

4月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河北的内政》。

该文论及河北的建设问题。钱端升开门见山地指出，河北为华北最重要的省份，比当年的辽宁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日据辽宁尚有条约限制，日占河北则无拘无束，“如我们态度太软，则日人更可任意宰割；如我们态度太硬，则日人恼羞成怒，容有进一步的举动”。钱端升承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近日之谈话，而从农村救济、废除苛捐杂税、军队调防、改编伪军、禁毒、整顿吏治及改善市政等诸多“俱非不可能之事”，一一提出建议，期待河北省在于学忠治下有所改进。

——钱端升：《河北的内政》，载《益世报》1934年4月5日，第1版。

4月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唐山工潮》。

该文针对近期爆发之开滦煤矿工潮。钱端升略述经过概要之后，指出唐山工潮之所以严峻，因为其首领赵大中为汉奸，如其得逞，则战区一切工人都在赵的掌握之下。故处理此次工潮之法，治标莫过于逮捕赵大中，治本则莫过于为战区之劳资纠纷安排一妥当办法；地方官吏在过去处理工潮时未能当机立断逮捕赵大中，为此次工潮的发生当负一定责任。另外，此次工潮提出停止一切党组织的活动，排挤官方工会，背后具有日本之影子。钱端升提出，地方官吏处理此事应该秉公执法，不必畏惧日本人，“彼如无开衅之意，彼决不会因他方枝节小事，而与我起战。彼如蓄意开战，则无论我如何柔顺，则亦徒然增日人之鄙视，并鼓励汉奸之蜂起耳”。

——钱端升：《唐山工潮》，载《益世报》1934年4月6日，第1版。

4月7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请中央政府严剿刘桂堂》。

这篇社论是继1934年1月10日《刘桂堂部之南窜》、1934年3月26日《孙殿英与刘桂堂》之后，第三度讨论刘桂堂匪患的剿灭问题。钱端升坦言，刘桂堂系跳梁小丑，中央不闻不问或许即出自此因，“不但堂堂政府，即我们舆论界的人也何尝天天登着小丑自由跳梁的新闻，更一而再、再而三地讨论剿灭小丑的重要。然而小丑扰民的新闻竟日有传来，而小丑的历久不衰，更迫得我们不得不再三大声疾呼，请求政府注意”。钱端升直陈：“中央军事当局！我们仅为华北人民请愿，请愿你们用牛刀来杀这一般祸民善窜的土匪。”在这篇社论中，钱端升毫不隐讳地指责了中央和地方军事当局的各种颓废、失职与渎职，笔锋之犀利令人叹为观止。

——钱端升：《请中央政府严剿刘桂堂》，载《益世报》1934年4月6日，第1版。

4月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广田召驻外日使回国》。

该文再度评价对日政策。撰文的缘起则是日本新任外相在大力交好各国的同时，把对华策略从“焦土政策”悄然转到“不战而胜”，不日将召集各驻外大使回国商谈新外交政策。钱端升指出：“我们常常督责政府早定一适当的政策，日本是我们的强邻，而我们对日却从无一定的政策——甚且除零星应付外从没有一个政策——那真是笑话。九·一八事变而后仍无政策，那更是笑话。我们现在希望政府立即定一对日政策，不亢不卑，不惹日本，也不畏日本的政策。我们如能定义不屈辱的政策，而广为宣传，示以决心，则对于行将在东京举行的外交首脑会议一定可有于我有利的影晌。这是我们愿政府再三致意的。”另外，钱端升也勉励华北人民和政府，所谓日本再度入寇的谣言多为汉奸制造，按照日本外交政策的转变，短期内日本将不会有军事侵华之担忧，“若因这种谣言而惴惴不安，那是庸人自扰。若因这种谣言而窃望政府屈服，那是懦怯。若因这种谣言而以权利拱手让人，那是误国。华北人民！挺起身子来！不要害怕！政府当局！张开眼睛来！不要瞎让！”

——钱端升：《广田召驻外日使回国》，载《益世报》1934年4月8日，第1版。

4月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对日要不卑不亢》。

这篇社论继续讨论中国对日政策。钱端升评价了前后两任中国外长：前任罗文干于外交方面是外行，单打独斗，空洞无物，一事无成；而汪精卫兼任外长后，“日本通”们除了拼命讨好日本、一味退让以防止中日决裂外，死抱以事事退让换取对方适可而止的信条，委曲求全，亦一事无成。钱端升指出，“我们是不唱高调的，我们更不想沽名钓誉，我们仅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呼号”，“我们对于政治及军事最高当局一番的苦心孤诣，无有不努力求谅解的”，但谅解归谅解，钱端升认为对日方略概括起来还应做到不卑不亢：在不亢方面，应停止一切口号标语式或党部不切实际的抗日活动，大力从培养国力及联络友邦着手，与日本当局亦可客客气气、周旋周旋；在不卑方面，不能因为中国而使得日本的侵略果实获得法律或条约依据，更不能割让政治、经济上独立有妨害的权利。而就具体方法，钱端升重申其对与伪满洲国通邮、通商的反对，另外主张政府方面可以公布日方要求，让国人来讨论讨论，集思广益，“如办理对日交涉之徒，一方护守秘密，一方专门吓人（放出不妥协日本便将如何大举一类的空气），一方又事事奉顺日人，那真将误尽中华民族！我们瞻望前途，不寒而栗；所以谨以至诚向领袖们、当局们进苦口的忠告，万不要让一班奔走流通的人胡来一切”。

——钱端升：《对日要不卑不亢》，载《益世报》1934年4月9日，第1版。

4月10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日本之外交策略》。

这篇社论再度盘点日本外交策略方面的新变化。钱端升慨叹：“日本本

处孤立之国际环境，尚图设法冲破之，国际情势本利于我，我不善用之，欲束手待毙，任人宰割耶？”

——钱端升：《日本之外交策略》，载《益世报》1934年4月10日，第1版。

4月1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康藏间的纠纷》。

该文继2月2日《藏事不可忽视！》一文后，再论西藏问题。钱端升阐述康藏问题的来龙去脉后，对中央政府的康藏政策提出如下建议：第一，不主张对西藏用兵，藏兵经过英国接济后，战力猛增，武力收复则两败俱伤，而且只会使西藏更为倒向英国、印度；第二，对西康问题，则不能任藏人攻城略地，至少应守住现有疆界，已失诸地需图通过和平手段恢复；第三，中央应与拉萨方面多加亲善示意，加强与拉萨的亲密关系。

——钱端升：《康藏间的纠纷》，载《益世报》1934年4月11日，第1版。

4月1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论中日问题告日本人》。

该文借青年学生对《益世报》社论主张对日策略的质疑，进而直接向日本人喊话，这也是这篇社论比较有特色的地方。钱端升的观点要旨如下：第一，日本制服中国的梦想绝对做不到，日本强力侵略的最终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第二，中日能否亲善，取决于日本而非中国，如果日本真有意亲善，应该退还国土，放弃操纵中国政治，不妒忌中国的强盛，亦不中伤中国的统一和进步。鉴于上述第二点日本绝难办到，故钱端升认为中日间终将有一死战。

——钱端升：《论中日问题告日本人》，载《益世报》1934年4月12日，第1版。

4月1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通车通邮之害》。

该文专论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之弊端。相关观点在其他社论中曾屡次提及，但这次专门讨论通车、通邮。钱端升认为，通车、通邮除了事实上可能给外人以中国承认伪满洲国的误解外，通车对于铁路和主权的影响甚大，更便利日方向关内运兵，而通邮能够方便关内外同胞，但万国邮协尚因中国主权问题而拒伪满洲国邮政，而中国邮政与之通邮，于事于理都不通。钱端升更进一步指出，通车、通邮事项日本外务省尚未正式提出，各种传言都是通过非正式交往中口头提出，我们更不可仰人鼻息，随便允诺，希望“中央认清事件的真相，不便随便让步为要”。

——钱端升：《通车通邮之害》，载《益世报》1934年4月13日，第1版。

4月1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读戴传贤请禁发掘古墓电感言》。

该文对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视察西北，通电禁止发掘古墓之行为，作了体无完肤的批评。钱端升认为，我们身在20世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努力维新，尚且有力有不逮之顾虑，而戴季陶身为考试院院长，不顾国弱民贫，大力尊崇念经修庙，祭陵保墓，“诚中华民国之厄运，而中华人民之不幸矣！”钱端升甚至拿戴季陶的字名号做起了文章：他固然弃“天仇”而自号“传贤”，但与中华民族实有不共戴天之仇。钱端升一一反驳戴季陶请禁发掘古墓之电文，谓考古家之爱国不后于任何人，爱国者亦多赞成考古，考古掘墓与爱国并无直接关系；考古亦为有用之学，念经修庙才是谬种流传。钱端升批评戴季陶执掌考试院，而不思为国家选纳人才，花费150万元办两次高考，最终录取者不过200人，直接导致“试政”的失败，“故戴氏之长尸高位实为国家之大不幸，而为国民党所不能不及早纠正者也”。此外，

钱端升更做进一步引申，国家之大患，提倡迷信、肆意复古、反对科学等实要负起重责，“我国苟不维新则已，如欲维新则此种反动心理务须除去”。

——钱端升：《读戴传贤请禁发掘古墓电感言》，载《益世报》1934年4月14日，第1版。

4月1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华北对日外交的方略》。

该文再论及华北的对日外交事宜。钱端升有感于华北对日外交形势的严峻，开篇先重申其“不卑不亢”之策，既不唱高调误国，也不妄自菲薄祸国，如日本继续侵略则明知失败而继续抵抗，如日本停止侵略则可通过其他手段解决枝节问题。而华北对日外交的危局，在钱端升看来问题主要出在华北当局总是担心日方十分强硬，因而畏首畏尾，不敢有所交涉，对日本此时不欲华北激变的大政方针亦视而不见。钱端升提出三个应对方略：第一，坚决不承认伪满洲国，塘沽协定的大错不可再犯，更不能进一步承认伪满洲国；关于通邮、通车，日本方面并未强硬要求，可以搁置不理。第二，关于战区问题，需要和日本进一步交涉，敦促日本人遵守塘沽协定的精神，限制其自由侦查之权力，战区内由中国派治安力量维持治安，同时限制日本人在停战区域内的一应权利。第三，日本如能答应中国有关战区的要求，中国亦可在不承认伪满洲国、不丧权辱国的前提下，答应日本的其他枝节要求，甚至主动给日本人以若干的便利。钱端升坚信，东北问题无法解决，但华北问题经过努力，至少在短时期内可以一揽子解决；如果日本方面不放弃征服中国，则中国政府除了被动应付日方的外交外，还应该制定一个整体的方略来和日人折冲交涉。

——钱端升：《华北对日外交的方略》，载《益世报》1934年4月15日，第1版。

4月1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宋孔组银公司》。

该文评论国民政府行政院财政总长孔祥熙和宋子文合组金融公司，图谋绕开日本对国联投资中国的干涉，而吸收外资，用于投资中国经济建设的新闻。钱端升指出，金融公司的便利显而易见，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容易引起政府干涉，危险性亦极大，而投资金融机构则稳妥很多；另一方面，外国公司投资目标不明确，常有漫无目的之感，而金融公司则立足中国，通盘筹划，优点明显。但钱端升也提醒，上述两大便利，取决于两大条件：第一，主持人要大公无私，富有远见；第二，日本人不做十分强烈的捣乱与反对。因相关章程及计划均未发表，钱端升只是泛泛希望孔、宋等以中央银行为鉴，避免薪水高、人浮于事的弊端，另外也建议政府方面设置金融机构，专注于把大都市里的过剩的资本集中用于农村建设事业的投资。

——钱端升：《宋孔组银公司》，载《益世报》1934年4月16日，第1版。

4月17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教部关于高等教育的设施》。

钱端升此文纵论高等教育的改造问题。钱端升认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既有质的问题，也有量的问题，但后者主要基于国力，姑置之不论，而质的问题体现在如下四方面：第一，学风太坏，办学者营私作孽，为学者亦志不在学；第二，名不副实，虽号称大学专科，但图示设备几乎为零，不如外国之中学；第三，野鸡大学遍地，要么揽钱，要么出名；第四，缺乏系统，缺乏合作。基于此，钱端升一方面厚赞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长后的种种改造努力，另一方面更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教育部能够对高等教育的整顿有个通盘计划，再根据计划而对照实际，在若干年限内，政府方面尽全力来关闭不符合计划的劣质高校，以期最终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除此而外，钱端升对于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亦有建议：对于学位问题，钱端升认为并不需要急切决策，至少博士、硕士对中国并非急需；大学毕业会考实务必要，还不如取消高中毕业会考，而举办大学统一入学会考，进而从源头上保证高等教育生源的质

量；取缔不良学校，裁并院系，集中财力于部分高质量的学校。

——钱端升：《教部关于高等教育的设施》，载《益世报》1934年4月17日，第1版。

4月1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银行应借钱给河北农民》。

这篇社论讨论涉农金融的问题。钱端升开篇引用汪精卫发言，引申修明政治乃不急之务，而更要紧的事情是拯救农村经济，鉴于河北省为华北最重要之省，故亦专论河北农村的救济。钱端升指出，河北农村衰落破产已到极致，如果不做改进，则民不聊生，盗贼蜂起，汉奸辈出，外交亦会一败涂地，故欲救河北，必先救农村。钱端升进而指出，河北农村的凋敝，一方面是由于苛捐杂税，另一方面则是源于筹码不足。尤其是对于后者，往昔庄号为农村提供金融支持的环境已不再，农村的金融周转便亦发生极大的困难，最终因为现金流的断裂而陷入破产之境。而对此困局，钱端升的主张便是满足河北地方人民的吁求，在河北各地广设农民贷款机关；另外，钱端升还呼吁各大银行加大对河北农村投资的规模，设立普及全省的借贷机构，甚至由各大银行共同开设一河北农民贷款公司。当然，钱端升亦清醒地指出，农贷事业的复兴，取决于政治的修明，亦取决于省政府的长远规划和银行家因爱国而贷款给农民的觉悟。钱端升认为，这种对于河北农村金融机构复兴的观点，大体亦可推行于全国。

——钱端升：《银行应借钱给河北农民》，载《益世报》1934年4月18日，第1版。

4月1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黄郛与华北》。

这篇社论承袭4月3日的《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南行》，继续讨论黄郛及华北对日交涉问题。钱端升的原则很清楚，即对日交涉不必有空

梦，中日问题在近期内绝无可以解决的方法，“纵使中国希图安逸，想和它谋个解决，对它大大让步，日本亦绝不会满足的；纵使日本外务省有相当的计划，但日本的军部，尤其那些军人、浪人，他们争想建功立业，他们的野心绝没有止境”。鉴于此，钱端升提出如下数点建议：第一，“对付日本，我们只有打定主意，决定一个限度，斩钉截铁，凡是超过那些限度，我绝不让步，不论日本用怎么大的压力来压我。日本如用武力来强蛮行事，万一我们抵抗不住，便任它强蛮行事，我们总是不给予合法的承认。世界大势是不断在变迁的，只要我们积极地消极地努力下去，他们强蛮劫夺的结果终结是非抛弃不可的”。第二，坚定不移地贯彻不承认主义，在政治上绝不受日本人左右，在经济上严定让步的界限，防止华北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第三，中央对策决定之后，应该严令黄郛绝对遵守，禁止黄郛超过授权范围，与日本军人、浪人私下交涉，相关属下应受到严格管束和裁汰。第四，黄郛的权力已足够，中央不可扩大黄郛对日交涉的权力，防止日本人收买黄郛，在华北数省造成更大的伪满洲国。第五，黄郛如能勉为其难，忍气吞声，不求速效，不求有功，尽可以继续努力，而如果贪恋权力，或者体弱不堪，则行政院应取消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改派精干特派员交涉华北涉日的零碎问题，外交大计由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直接接洽。

——钱端升：《黄郛与华北》，载《益世报》1934年4月19日，第1版。

4月20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日本的恐吓政策》。

钱端升这篇社论中，重申其对日本侵华政策本质的认识。钱端升指出，无论是焦土政策还是协会外交，日本对华政策的本质都是制服中国，支配中国的政治及经济；倘若中国尚有一丝不屈服，日本迟早便会通过武力来强迫屈服。不战而胜的方略，并未脱此窠臼。而妨碍日本实现此目标的两大障碍，主要是国际形势及“直到如今还没有死干净的一点点的民气”，故而日

本或联美亲英，或阻止中国求助国联，或诱惑中国对伪满洲国做通邮、通车等事实上的承认，或利用中国人贪生怕死的心理而施以恐吓，均以消灭这些障碍为目的。钱端升再次重申，鉴于国联为中日事件特设的顾问委员会将于5月15日开会，中国更不能通过通邮、通商等事实上的承认伪满洲国的措施，而致使国际机构无从为中国说话。而对于日本的最终目标，钱端升甚至直截了当如下痛斥：“你们蛮横无理地欺我侮我，我因无力复仇，故此时也不谈复仇。但要我认你做朋友，而放弃一切已经做了朋友的人，或者可以做朋友的人，那是万万不行的。你尽可以杀了我，但你不能要求我恩怨不分。”钱端升希望外交部下次对外声明时，向日本、向世界均表示较大决心，“惟有大决心才足以挡住日本的恐吓”。

——钱端升：《日本的恐吓政策》，载《益世报》1934年4月20日，第1版。

4月2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再论日本的东亚政策》。

这篇社论继续讨论日本的对华政策。钱端升接着昨天的话题，认为中国的对日政策仅有决心还不够，还必须积极地有所动作；从中国的角度而言，无论是否有所作为，日本都会压迫中国，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有所作为。

接下来，钱端升仔细分析了日本的东亚政策：日本东亚政策以“并华、驱俄及东亚门罗”为主，三位一体，互相关联，目标一致。就并华而言，日本侵占东北、华北后，暂时调整策略，优先用政治手段、经济手段迫使中国屈服，经济上既使中国成为其原料产地，也为其工业化提供巨大的市场；政治上既反对中国与列强交好，更不愿中国有国防，军事手段放在最后；职是之故，现阶段日本对华将进一步从经济上、政治上威吓利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欲妥协，也无法妥协；既欲亲善，也无法亲善。我们只有一方向国内外宣传日本的用心，而一方则严予拒绝”。就驱俄而言，钱端升认为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已略有成功，首先将俄国的势力赶出朝鲜，继而在

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中国东北；固然日本最终的目标是将俄国赶出东亚，尽早征服中国将有利于日本实现此目标，但钱端升认为日本最终将一败涂地。在这种情况下，钱端升认为中俄应联手抗日。而就东亚的门罗主义或者保护主义而言，钱端升认为日本可以得到实质上的成果，各国虽然不会满意于日本独吞中国的政策，但也不会实质性地反对日本的保护主义，尤其是在日本动辄以武力恐吓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主要国家将会袖手旁观；但即便如此，尽最大可能联络欧美及国联，依然是中国外交领域必须的动作。

——钱端升：《再论日本的东亚政策》，载《益世报》1934年4月21日，第1版。

4月2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国际形势的鸟瞰》。

这篇社论分别站在日本、俄国、德国及英、美、法、意等国的角度，分析了当时的国际政治。描述世界大势后，钱端升指出，中国的外交策略还是应紧跟国联、英法，积极和美俄联络，对日外交则几无空间可言，“如非你向日本投降，日本总是不会满意的。所以日本如因我们有朋友而要用武，而我则惟有准备再抵抗一下”。

——钱端升：《国际形势的鸟瞰》，载《益世报》1934年4月22日，第1版。

4月2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蒙古自治政委会成立》。

该文对蒙古自治政委会的成立表达了欢迎之意，同时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内蒙应在地方长官带领下，努力自卫，坚决抗敌，“绝不可树立缓冲地带之亡国心理，尤不可对整个外交上，妄抒意见。能知以中华民族利益为对外前提，庶能免受野心家之利用”。第二，内蒙自治之目标，在树立统一政权，谋地方建设与民众利益的共赢，故中央与内蒙应和衷共济，从中央层面

多予以蒙古经费与人才支持，内蒙方面亦应欢迎汉人屯垦及协助。第三，蒙古政治向来贪腐风行，自治后诸王公应以“真正解除人民痛苦为前提”，革新政治，结束汉蒙仇视。钱端升希望上述诸点有助于汉蒙一家、休戚与共，双方共同期待新蒙古的出现。

——钱端升：《蒙古自治政委会成立》，载《益世报》1934年4月23日，第1版。

4月2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西南与对日问题》。

该文承袭1934年3月9日社论《傀儡僭号与西南态度》，继续对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批评。钱端升指出，国难当头，对日外交应该不卑不亢，不唱高调，“无论如何要拥护中央政府，要爱惜中央的威信，要谅解中央所处的困难，要相信中央的公忠谋国”，“一切批评，无如如何严厉，要出以善意”。鉴于抗战形势险峻万分，钱端升提出，中国如应对得法，或可逃过一劫，这种情况下，妨碍或减损政府权力的行为不能再有，——钱端升所指，就是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乱发通电诋毁中央之事。按照钱端升的观点，上述两机关均为党及政府的组成部分，按照党纪国法，应听中央党部及中央政府的命令，而不是乱出主张、肆意攻讦；就政治统一言，两机构偏安一隅，动辄反对，更非爱党护国之举；再退一步，上述两机关可以向中央陈述意见，而不应乱发通电，煽动公众。反过来，钱端升指出，中央亦应努力防止西南通电所担忧的种种问题，华北当局更应停止与日本“乱七八糟”的交涉，放弃中日问题可有根本解决的看法，谨慎将事，既免去西南攻击的口实，也省了中央的麻烦。

——钱端升：《西南与对日问题》，载《益世报》1934年4月24日，第1版。

4月2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我们不能孤立》。

该文针对日本宣布的“保护主义对华策略”而写。日本认中国为其保护国，不希望中国有国防，也不希望中国有工业，甚至因此设法禁绝其他国家从军事上或经济上对中国的援助。钱端升指出，国际活动的目的要么在求物质援助，要么在求精神援助；对于中国而言，鉴于当时的战局及实力，物质援助为不急之事，但精神援助则极其必要。钱端升建议，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尽管明知国际活动会使得日本极其不满，但不应慑于日本威吓而甘于孤立，我国应积极在国际范围内活动，既防止日本更加肆无忌惮地欺侮，也防止列国有我默认日本为保护国的误解。

——钱端升：《我们不能孤立》，载《益世报》1934年4月25日，第1版。

4月2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美国与中日问题》。

这篇社论承袭4月25日的社论，继续讨论对日策略及国际活动的问题。钱端升计划通过三篇社论，次第论及美、英、俄三国与中日问题的互动与博弈。这篇先讨论美国与中日问题。

根据钱端升的观察，美国远东政策有两大基础：第一，不许东方种族移民到美国；第二，愿与远东各国和好亲善，以便发展对外贸易，传播基督教文化。基于此基本政策以及中、日的实力，美国通过1924年《移民法》而禁止中国、日本人移民美国；而在远东本土，美国畏惧日本，但对中国则采取门户开放主义。现在随着日本对中国的逐步侵略，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政策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但钱端升分析，美国对日绝对不会采取攻势，而且最近二十多年来美国也越来越惧怕日本，在这种心态下，美国如何既避免与日本冲突、又维持门户开放主义，则越来越挑战外交智慧。在钱端升看来，只要日本不彻底要求美国放弃门户主义，美国是不会主动和日本开战的；如果日本独霸中国，则美国为保护自身安全和利益，会和日本不惜一战。

在这种背景下，钱端升指出，中国的外交态度和活动的努力程度，会给美国一定的影响：如果中国有决心，则会争取美国的同情心，同时力促美国尽《华盛顿九国条约》主盟者的责任；如果中国毫无决心，甘于孤立，则美国亦会越来越冷淡。职是之故，钱端升提出，中国应该加大对美国宣传日本外务省声明的力度以及日本独霸中国的危险，积极和美国政府取得联络，让美国知道如果放弃门户开放政策，美日之战将不可避免。

——钱端升：《美国与中日问题》，载《益世报》1934年4月26日，第1版。

4月27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论日本外务省与军部》。

在该文中，钱端升有感于华北当局与日本浪人、军人蝇营狗苟之无章法外交，主张对日外交常态化，由中国外交部与日本外务省及日本驻华使馆为外交交涉的唯一正式平台。国内“日本通”常谓日本外务省为军部劫持，使馆不见得能代表政府，与外交部门交涉而不与军事当局交涉是舍近求远；钱端升通过其对日本政治运行的观察，认为日本外务省与军部之间有冲突是事实，但利益一致，亦能在日本特殊政治下达成一致与妥协，日本的元老政治、财阀政治及政党政治运行小有瑕疵，大体稳固。职是之故，钱端升认为无论伪满洲国及侵华日军如何狡猾，中央政府还是应致力于使中日外交常态化，“而勿让关东军之常得对华北外交当局作无厌之求也”。

——钱端升：《论日本外务省与军部》，载《益世报》1934年4月27日，第1版。

4月2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建设西北》。

这篇社论承袭4月4日的社论《戴宋西巡与开发西北》，继续讨论西北的开发与建设问题。钱端升认为，建设事业既应有目的，亦应有计划，目的

方面须以造福平民为标志，而计划方面则须轻重有别。基于此，钱端升认为宋子文在西安宣布的四点开发西北计划，包括水利、筑路、农业改良和卫生在内，“尚是切要而顾及民生的。这是一种进步，是可喜的现象。我们甚祝其能实行无阻”。

——钱端升：《建设西北》，载《益世报》1934年4月28日，第1版。

4月2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英国与中日问题》。

该文承4月26日社论《美国与中日问题》，进一步讨论英国在中日问题中的地位及中国应有的对策。据钱端升的分析，英国的远东政策有两大基石，一是保存印度帝国，二是促进远东贸易的发展；而就促进远东贸易发展而言，英国一方面不能容忍任何国家闭关自守，也不能容忍任何国家独占某国，另外希望中国、日本等国都能安定繁荣。按照这种原则，钱端升认为可以合理解释英日关系为何一度较好，甚至因为俄罗斯危及英国在印度的利益，而有联日反俄的举动。整体而言，钱端升认为英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大体一致，其政策重心在于发展贸易，故期望中国繁荣安定，在中国积贫积弱时维持最低限度的门户开放主义。但钱端升也指出，美国畏惧日本，而英国则友爱日本，英国不会和美国一样反日袒华，英国既不愿意日本侵华，不愿日本破坏门户开放，但也不愿因维持门户开放而直接与日本冲突；囿于近期的形势，英国对日政策有受美国影响的迹象，如果美国带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诸国，则英国一样会反日，“英国是不愿因中日问题而与日本破裂的，但英国更不会因中日问题而丧失自治地的好感的。以中国与日本比，英国宁愿亲日远华；以日本与英加等比，则应该绝不能远日而亲同文同种，且多数尚属于一王的国家”。另外，英国骨子里面应该不愿意因为门户开放而得罪日本，但英国也不愿意放弃远东市场。钱端升认为这种连锁关系将会在英国对日政策中发挥巨大影响，我们唯一所做就是善加利用，持一决心，步步抵抗，宁亡不辱，进而引起中国市场的破坏，再利用英国对市场的需求而使其不忍坐视。

——钱端升：《英国与中日问题》，载《益世报》1934年4月29日，第1版。

4月30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天津纱业的救济》。

在这篇社论中，钱端升纵论天津纱业在全国的份额及其现在所处的窘境，指出东北市场的丢失、日本棉纺的倾销以及农民购买力的衰退，均是天津纱业凋零的主要原因；若不思振作，不远的将来，天津纱业将在日本的威胁下倒闭殆尽。对此，钱端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天津市纱厂与全国其他华商纱厂应组成托拉斯，达成谅解，互相扶助，以与日货竞争；第二，国营铁道及轮船公司应给予华纱若干便利，降低其运输、推销成本；第三，纵然不能用华纱保护税，但应不顾日本反对，采用退税方法，提高日货的成本，给予华纱适当的补贴。

——钱端升：《天津纱业的救济》，载《益世报》1934年4月30日，第1版。

5月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俄国与中日问题》。

该文承4月26日《美国与中日问题》、4月29日《英国与中日问题》而写，为“三部曲”之三。遗憾的是，由于天津市档案馆所藏《益世报》残缺不全，大部分内容难于辨认，钱端升的观点亦不得其详。

在可辨认的篇幅中，钱端升申述，俄国早年主张世界革命，以意识形态划分世界，唯恐天下不乱。如今力主计划经济，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要发展轻重工业，要以成功的社会主义来证明资本主义的错误，更借以促成资本主义的灭亡，故已绝口不谈世界革命；谈世界革命者被视为异端邪说之徒，而受到放逐的严刑”。俄国在东西两面均树敌，西为法、奥、德、波诸国，受欧洲分裂影响，俱不足为患，而在东边则有日本。钱端升认

为，日俄如果不对立，中国无足轻重，而日俄对立的话，中国则成为两边都拉拢的对象；俄罗斯甚惧日本侵占西伯利亚，东北沦陷后，日俄接壤线扩大，俄罗斯则更惴惴不安。

——钱端升：《俄国与中日问题》，载《益世报》1934年5月1日，第1版。

5月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一句余来的日本外交》。

在这篇文章中，钱端升综述了日本两周来各种自相矛盾论调的外交陈词——部分有利于我，部分侵华更甚，进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钱端升表示，政府及国人均应注意，只要日本不停止在东北的军事占据，我们便不能因为外交层面的表述而误以为日本会有所觉悟；听到日本打算兼并中国而日本外务部有所缓和的论调，我们还是应该保持警惕性，“在日本能还我东北以前，我们认为日本的侵华政策，即有缓急之风，仍无性质之别”。遗憾的是，由于天津市档案馆所藏《益世报》残缺不全，部分内容难于辨认，这里综述整理的钱端升的观点亦不甚全面。

——钱端升：《一句余来的日本外交》，载《益世报》1934年5月2日，第1版。

5月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菲律宾的独立》。

钱端升在该文中综述了菲律宾独立的来龙去脉，以及美国和菲律宾政界因为菲律宾独立问题而发生的种种交涉。在向读者综述这一过程的同时，钱端升亦提醒读者，菲律宾地处中日之间，对于东亚局势非常重要，加上日菲关系转暖，我们亦应高度重视中菲关系的改进与提升。

——钱端升：《菲律宾的独立》，载《益世报》1934年5月3日，第1版。

5月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对日外交与内部统一》。

该文再次评论对日外交的统一与国内政局的统一问题。文内含如下几点意见：第一，中国各部分必须统一起来应付对日外交，而不能因为对日外交而引起比眼下还严重的分裂。第二，中央决定对日政策时，必须关注公众舆论，因而亦不能因为对日外交政策罔顾民意而引发比眼下更严重的分裂。第三，西南地区民气深厚，其乱发通电固然值得批评，但其主张不能一概因之被抹杀。第四，对于立法院的意见，不能因为部分立委属于胡汉民系，外交部不能因此而彻底忽视。第五，胡汉民等应尽早觉悟，回到中央立场，与中央共克时艰，而不是发空言、放空炮，于事无补，于国无益。

——钱端升：《对日外交与内部统一》，载《益世报》1934年5月4日，第1版。

5月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论新生活运动》。

该文评论的是当时方兴未艾的新生活运动。钱端升指出，新生活运动自开展以来，成绩有目共睹，所遭遇的批评大致有两点，一个是轻重倒置，一个是官样文章。斥之为轻重倒置者，认为新生活运动应该在廉洁勤劳上下功夫，而时人所倡导的则大多为细枝末节之事，重细节而忽大节。斥之为官样文章者，则言新生活运动为蒋介石力倡、党务工作人员及其他社会名流等趋炎附势而跟风，远离大众，数量有限，因而曲高和寡。钱端升认为，上述两类批评各有一定道理，同时举北平在颐和园开会要求女学生60名做服务员等陋规，认为主持者应该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虚心听取，勤做反省，虚心改进，尽力避免形式化之危险。

——钱端升：《论新生活运动》，载《益世报》1934年5月5日，第1版。

5月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中国能和日本妥协吗?》。

钱端升在这篇社论中，重申了对日妥协的弊端和害处，由此强调对日绝对不能妥协的道理。钱端升重申，不服从日本的结果是日本动武，即便日本动武的可能性很大，也不能妥协，如此即便亡国亦如同被杀而死，“被杀而死，其死或尚可免，因为如挣扎一下，日本未必即能杀了我们”；服从日本的结果，势必是实亡名存，最终亡国，如同饮鸩而死。钱端升重申，日本如真想跟中国讲妥协，必先还我河山、尊我国格；我方除非想投降，否则根本没资格同日本讲妥协。钱端升认为，如果中国方面同日本讲妥协，于民气方面会有两种后果：其一是民气更为消沉，哀莫大于心死；其一是民气激愤，最终激发革命，推翻政府。于政局方面，妥协的后果也十分明显：第一，西南与中央的分裂会越深，统一越发遥遥无期；第二，中央政权会因对日外交而产生政争乃至内斗，倾轧政局；第三，妥协外交与政治外交互相博弈，各派之间进一步内斗；第四，在野各派对在朝政局普遍不满，无序状况更为突出。而于国际方面，如果中国一味妥协，则外国友邦则更不愿意因中日问题而表态发言，日本则会更加肆无忌惮。综上所述，钱端升得出结论：“不，我们绝对不能和日本妥协。如果日本要和我们交涉，那请它先归还我东北土地，尊我独立国格，……我们不能怕日本人怕得来连东北二字不敢向日人一哼。日本如能交还东北，我们才有和它交涉的可能。如果于抢了东北之后，而还要我承认伪国，而还要我准它在华北有独占的投资权利，而还要我放弃和别国做朋友的自由，如果这是交涉，那就是亡国的交涉，那就会引起上述种种悲惨的结果。在此忍辱负重及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十字路口，愿当局慎之又慎！”

——钱端升：《中国能和日本妥协吗?》，载《益世报》1934年5月6日，第1版。

5月7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五七纪念告中日国民》。

该文写于五七国耻日19周年之际。钱端升指出，五七国耻乃独立国家的奇耻大辱，而五七国耻之后，国人不知卧薪尝胆，反而兵祸连天，政制不修，最终导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甚至更有最近日本不许中国与其他国家自由交往的声明，耻辱一次比一次深重。钱端升更是提醒，如今而后，国人如不思进取，苟安忘耻，势必还有更大的耻辱在前头；国人如能告别苟安懒惰，有所改进，19年来的国耻则可就此终止。至于努力的方向，钱端升提出，对内修明政治、选贤与能、清除贪腐等，发展经济与国防；对外则应广交朋友，冲破日本限制；对日本则严词拒绝其无理要求，也摒弃中日亲善的妄想。

另外，钱端升亦忠告日本人，五七国耻实际上也是日本的耻辱，中日将来一旦爆发大战，日本亦将成为受害者；长远来看，中日和好有利而无害，日本各界应约束军人，感化军人，还我东北，“觉悟应为日本国策的基础。不觉悟则远东战祸终不可免”。

——钱端升：《五七纪念告中日国民》，载《益世报》1934年5月7日，第1版。

钱端升、林徽因访胡适。

【今天钱端升、林徽因来谈。】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14页。

5月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蒋委员长对于军队的期望》。

该文评述蒋介石于5月7日在南昌行营总理纪念周上的发言。在该发言中，蒋介石提及军队国家化、军队应为民剿匪以及军队应为国御侮等三点意见。钱端升对这三点意见极为赞成，他进一步提出：国家化、裁军及训练三者无所谓前后，必须同时进行才能有所推进；而于国内互信而言，中央与地方应同时裁军，进而将军队收归国家、收归中央；在剿匪方面，全国军事长

官应不遗余力，不给割据以任何可乘之机；对日方面，蒋介石收复失地的豪言壮语应使人感到欣慰，应时刻为念，并阻止一切与此相反的外交交涉。

——钱端升：《蒋委员长对于军队的期望》，载《益世报》1934年5月8日，第1版。

5月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论所谓“直接交涉”》。

这篇社论再度讨论对日交涉问题。在钱端升看来，通常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交涉是常态，不交涉是变态；交涉中直接交涉是常态，而请第三者调停是变态，但在中日之间，问题不是直接交涉还是请国联居中的问题，而是交涉与不交涉的问题。钱端升认为，如果日本方面提出交涉，中国的态度要么是拒绝，要么是从东北问题开始，因为如果避开东北问题，这样将使得日本占据东北的事实被默认，如此割让领土、丧权辱国的交涉，压根就不应该开始。鉴于日本方面叫嚣如果论及东北问题就拒绝交涉，那么除非政府决定做大让步，否则就不应该启动交涉，借东北问题而使日方闭嘴。至于提出东北问题，是否会激怒日本，钱端升认为，如果日本试图占领华北，中方提不提东北问题都没区别；如果日本暂时不打算占领华北，则中方提出亦不会有不良后果，反而能够向日本表示中国的独立国格、人格。鉴于上述，钱端升认为对日交涉问题，务必得牢守条约，极其慎重。

——钱端升：《论所谓“直接交涉”》，载《益世报》1934年5月9日，第1版。

5月10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如何改进有娱乐性的艺术》。

该文论及文艺管制事宜。钱端升大体认同文艺的重要性，认为军事政治及社会经济的革命，必然会带来文艺革命的必要，“中央改革并统制文艺的用意是无可非议的”。但至于改革的方法、目标及步骤，钱端升则认为应该

适当，既不过于保守也不过于激进，既不过于严厉，也不过于放任。尤其是对于娱乐性的艺术，钱端升认为消极的取缔与积极的提倡应齐头并进，消极的取缔方面应依靠刑法的禁止性条款且严格执行，而积极的提倡则比消极取缔更重要，提倡的内容也应超越“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旧道德，而加上合群心、工作神圣、民族利益高于家庭利益等新观念。而对于完全娱乐性的戏剧电影，钱端升认为任其自然即可，过多的正面宣传会使听众、观众彻底厌倦，由此对任何宣传都失去兴致。对于外人涉及辱华的电影，所谓“辱”不过要么辱国民之穷，要么辱国民无知，多少是事实，不如听之任之。钱端升最后还指出，如果确实要统制，必须要确保统制权的统一，政出多门只会使文艺事业处处受限，无法发达。

——钱端升：《如何改进有娱乐性的艺术》，载《益世报》1934年5月10日，第1版。

5月1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国人应多去日本游历考察》。

钱端升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如题所示。钱端升认为，纵然在地理上日本与我国最为接近，但中国人对于日本的了解程度，远远不如对欧美各国的了解；这里面既有国人看不起日本的态度，也有留日学生的日文实在太差之故。但从长远看，钱端升指出我们应该改变对日观点，“力求通晓日本情形”，深自警惕。钱端升进一步建议，中国应该多派出工商界巨子、学者团体和与日本要人有私交的人前往日本，一方面承担疏通舆论的责任，另一方面则带回与华有益的资料。另外，钱端升也认为可以适当派遣学生去日本，除了留心学科范围之内的事情之外，可以注意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日本舆论尤其是对华舆论；第二，日本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第三，日本人民爱国苦干的情绪；第四，日本大中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及对社会的贡献。

——钱端升：《国人应多去日本游历考察》，载《益世报》1934年5月11日，第1版。

5月1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日本反对中国与外国合作》。

该文评论的是日本反对中国寻求国际援助的侵华政策。钱端升对于日本方面认为国联的财政与技术援助将加大中国人民负担的说辞，给予了坚决的反驳。钱端升指出，无论现在国联给予中国哪种形式的援助，不管是技术支援还是金融投资，日本都将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纵然眼下欧美列强不太可能来中国做实际投资，但中国依然须明确表达其对境外来中国投资的需求，一方面了断日本人妄图使中国永远不求助于境外投资的妄想，另一方面也保持中国与欧美列强沟通渠道的畅通，而不使日本代理中国吸收外援和外资。钱端升认为，无论是为保持国格，还是为维护实际的利害，中国都应发表声明，拼命抵抗日本的各种图谋；另外，中国固然是弱国，但毕竟是独立国家，中央政府还应通过外交途径，敦促日本政府约束其文职外交官的言行。

——钱端升：《日本反对中国与外国合作》，载《益世报》1934年5月12日，第1版。

5月1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毕业会考应严厉实行》。

该文论及中小学的毕业会考问题。钱端升认为，中国中小学教育的大患在于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和教学效率太低；而为了纠正这两点，毕业会考是相比之下最为有效的办法。在这个前提之下，有三个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第一，毕业会考能否达到整齐毕业生及改进教学效率的两大目的？第二，毕业会考是否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整齐及改进办法？第三，教育部的会考规程是否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对于第一个问题，钱端升给予了非常肯定的回答，“毕业会考可使毕业生的程度整齐，也可使教学效率改进”；对于第二个问题，钱端升认为教育家们提出的如通过严订校长任命规程、编制完善课程标准及教科书等措施，来整齐学生程度、改进教学效率，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状

况之下，实行势必将极其艰难。对于第三个问题，钱端升认为会考规程可商榷之处比比皆是，诸如委员会的组织、计分的方法等，均可谋进一步改进；另外比如命题不当、计分没有明确标准以及时间不相宜等，亦为需要救济的缺点，但这些俱非根本问题，只是技术问题，可以徐图改进。在结论中，针对部分地方私立学校的罢考风潮，钱端升勉励教育行政部门：“我们既信会考为现状下，取缔劣等学校的最好办法，我们自然希望各地教育当局能严厉地执行会考。罢考及类似罢考的要求及风潮，无论形势如何严重，必须严厉制止。如果各地教育当局有因循畏难的形势，则教育部须严厉地执行其监督之权。”

——钱端升：《毕业会考应严厉实行》，载《益世报》1934年5月13日，第1版。

5月1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评拉西曼报告并论技术合作的将来》。

钱端升在此文中评述国联派驻中国的技术合作代表拉西曼的工作报告。就其内容而言，钱端升认为并不能从中发现过于惊世骇俗的建议，但中肯指点却不少，尤其是结论中的三点最为值得注意：第一，外籍专家因不明中国文字及社会背景，隔膜甚多，故来华专家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应作为重要的决策因素；第二，研究计划应多请现成的研究机关代写；第三，在邀请外国专家来华的同时，亦应派出中国专家外出学习。对于其中减少不中用的外国专家、奖励有出息的中国专家的建议，钱端升认为很有参考价值，“经委会如能一方采用拉西曼关于任用专家的建议，一方又注意于真正有裨民族经济的工作，则国联的技术合作自然万无停止之理”。而对于日本极力反对国联援华，钱端升认为唯一的方针就是不顾；职是之故，钱端升提出，国联技术合作既然无停止之理由，国联方面又无问题，所以要出问题，一定是出在中国方面，政府方面需要通过正式抗议来驳斥日本意在阻止国联援华的非正式的宣言。

——钱端升：《评拉西曼报告并论技术合作的将来》，载《益世报》

1934年5月14日，第1版。

5月1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努力禁烟毒》。

该文讨论国民政府禁毒问题。开篇钱端升即毫不讳言地指出，“鸦片及其代用毒物的流行为国民政府最大的耻辱，当然也是中国国民最大的耻辱”，1917年英国停止对华输出鸦片，十多年后反而烟毒遍地，“真是国民政府的奇耻大辱，而也是当局者大负中山先生之处”。钱端升一方面对蒋介石4月底发布的严禁毒品的政策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呼吁政府继续严格禁止烟毒，国人亦应共同努力。当然钱端升也提出，蒋介石的毒品新政中严苛的态度值得赞赏，但不合法制的地方尤多，比如，平民不应受军法审判，禁毒条例名义上亦应由政府颁发，故钱端升建议，蒋介石应利用其自身影响力，一方面促进政府禁毒条例的通过并由法院执行，另一方面则促进该项法令的实行。钱端升更进一步指出，蒋介石的毒品新政虽然严苛，但依然有更加严苛的必要：第一，国内的鸦片种植必须禁止；第二，毒品进口必须禁止；第三，中国境内的毒品运输必须禁止；第四，应该立即放弃鸦片特税，“特税一日不放弃，即政府一日无决心；政府一日无决心，任何严厉的办法不能实行”；第五，严禁制造毒品；第六，严禁吸食毒品，政府应颁布法律，要求吸食者在一定年限内禁止吸食，进而复吸者依据上述条例执行死刑，公务员吸食毒品则直接革职；第七，颁布新的禁毒法，改变原有禁毒法律偏宽且相关法令过于琐碎的状况。钱端升末尾继续疾呼：“烟禁废弛本为政府过去的大污点，愿政府急图自赎！”

——钱端升：《努力禁烟毒》，载《益世报》1934年5月15日，第1版。

5月1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国联与通邮问题》。

钱端升此文再论与伪满洲国通邮问题。文章缘起于国联中日问题委员会下属不承认委员会讨论英国提出的通邮问题；该委员会决议继续其不承认原则，但保持日常邮件往来的畅通，而由分委员会拟具具体报告。对此事件，钱端升分析认为，分委员会势必不会让伪满洲国加入万国邮政会，也不会让各国与伪满洲国单独订立条约，而最终发生承认伪满洲国的效果，——可能的解决办法，则是安排各国驻伪满洲国领事与伪满洲国邮政达成暂行清算办法，避免任何承认的嫌疑。由此，钱端升指出，国联各国与日本及伪满洲国无怨无仇，如此小心翼翼避免承认的态度，是对日本违反国际条约的基本立场，中国应该一方面表示感佩，另一方面则继续保持对日强硬，绝对避免承认伪满洲国，坚定不移地贯彻不承认主义。

——钱端升：《国联与通邮问题》，载《益世报》1934年5月16日，第1版。

5月17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政府与教廷应该互换使节》。

这篇社论写于梵蒂冈派遣蔡宁主教来华担任教廷驻中国代表一事前后。钱端升指出，鉴于如下三点理由，中国政府与教廷应该升格外交关系，互相交换使节：第一，从教宗方面，中国为东亚大国，若能派遣公使，即可对外表明教宗既重视中国天主教会，亦重视中国本身；第二，从中国方面，派遣公使常驻教廷，可以与教皇这位“全世界最有权威的个人”永通使节，相互达意，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大有裨益；第三，从天主教本身而言，梵蒂冈和任何国家都有互换使节的必要，借此提高教会地位，发挥其巨大的号召力。

——钱端升：《政府与教廷应该互换使节》，载《益世报》1934年5月17日，第1版。

5月1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山海关通车问题》。

该文再次就通车问题建言当局。钱端升一以贯之的观点是反对通车。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随着殷同等地方官僚与日伪方面的交涉，山海关通车问题似乎箭在弦上、板上钉钉，钱端升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再次命笔讨论此问题，“我们的反对固然未发生效力，但我们亦未敢因此而灰心，因此而放弃我们代表民意，督促政府的天职”。

钱端升的观点分为两层：第一层，他希望通车问题的交涉彻底停止，“我们最诚恳地希望政府能悬崖勒马，停止通车的交涉”，钱端升认为，停止交涉最坏的结果无非是长城各口仍为日伪占据，但通车后停战区域内的主权依然并不完整。而第二层，如果通车交涉无法停止，或者通车必须实现，钱端升又提出如下三个意见，“我们现在所要主张的实已是低无可低的调子，愿政府毋再漠视”！这三个意见分别是：第一，通车办法交涉必须避免承认伪国；第二，反对通车问题在不明不白的环境下解决，应由中央直接办理；第三，如果通车交涉势在必行，政府有义务公之于众，“让国人知道其大概，而裨以批评的机会”。临了，钱端升依然不厌其烦地勉励政府：“日人的蛮横及我国的无力，我们绝无不知；我们更不是好唱高调者流。我们现在所望于政府者实在已是到了最低的限度。高调固足以误国，屈辱亦足以亡国。愿今日政府勿过分信仰妥协主义。”

——钱端升：《山海关通车问题》，载《益世报》1934年5月18日，第1版。

5月1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合理化的节约运动》。

该文承5月5日的社论《论新生活运动》，继续探讨勤俭与节约问题。钱端升认为，节约运动并不仅仅是袁世凯时代的俭德，也不仅仅是少用或不用洋货、多用或专用国货，节约运动要真有补充于国民经济，则必须力求其合理化，以富国裕民为目的，以增加民族经济力量为目的。为实现此目的，钱端升提出政府及人民应分头或共同做到的四件事：第一，减少一切无裨实际益处

的消耗；第二，增加对奢侈品的进口税率；第三，使各种职业的薪给保持相对公允的比例；第四，政府及社会应提倡以兴办各种事业为目的的储蓄会。

——钱端升：《合理化的节约运动》，载《益世报》1934年5月19日，第1版。

5月20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战区的内政外交》。

该文再次论及停战区域内的内政外交事宜。在钱端升看来，停战区域民生凋敝，汉奸横行，而日伪浪人及军队又出没无定，使得战区治理成为全国最难治的县份；而治理稍有不周，日伪势力则可向关内膨胀，中日悬案又将增多，故改进停战区域内的内政外交刻不容缓。

对于修明战区内政问题，钱端升提出如下五点：第一，务必减轻人民负担；第二，战区治安应格外注意；第三，汉奸必须断绝根株，不能因循纵容汉奸在停战区域为非作歹；第四，停战区域内的烟毒和赌博两大公害必须祛除；第五，停战区域的交通，尤其是公路电话必须有急速发展。钱端升指出，要完成这些工作，必须要：第一，打破旧有观念，配备精明强干的长官；第二，保障充足的经费，如省政府无力增加，中央政府应通盘筹划、予以补助。

对于改善战区的外交问题，钱端升提出如下四点建议：第一，中国政府应将日方履行塘沽协定所规定各项义务作为进一步交涉的先决条件；第二，保安队开进战区为协定所允许，日本之阻挠无合理依据，中国应坚持；第三，古北口等地邮局已在事实上与伪满洲国通邮，严重违反中央命令，特别是迁就日伪，应予以立即叫停，以后一律严禁；第四，战区的外交无论如何应有两国外交当局为对手，而不是降格给一些闲杂人等或地方政府。

——钱端升：《战区的内政外交》，载《益世报》1934年5月20日，第1版。

5月2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财政会议之所应努力者》。

这篇社论写于全国财政会议开幕之际。钱端升根据会议的四大议题，分别陈述意见如下：第一，关于田赋整理，在1月27日《论整理并减轻田赋》一文中已有详述，问题不在税率轻重，而在于税率不公平、附税名目多、中饱私囊者太多及预征太严重；为解决这些问题，钱端升提出必须从清丈、分等开始，另外下令各地取消附加税，统一田赋。第二，关于废除苛捐杂税，钱端升指出此为国人一致主张；但需要注意的是，苛捐杂税的范围极广，意义也不甚一致，但至少应该废除一切关于田地及农产品的苛捐杂税，已废的苛捐杂税不可复征，也要明令禁止一切名非苛捐杂税，实际上仍然是苛捐杂税的新税。第三，关于地方收支的适合，钱端升提出，“真正统一国家的中央财政应以国民经济的平均发展为重，而以各省的收支相抵为轻”。既然中央财源远富于地方，那么中央对于贫瘠省份就应有补偿措施，以便襄助贫瘠省份废除苛捐杂税，这是“革命的财政，是向前看的财政，或不能求实现于目前”。第四，关于征收手续的改进，钱端升指出，中国征收机关一向腐败而低效，地方征收机关则更为腐败、更为低效，因此，征收手续亟待改良，征收机关亟待归并，政府应多用大中学毕业生为征税官吏，另外对于贪腐应严加惩办。

在上述四点的基础上，钱端升进一步提出，财政要真正有解决办法，还需要：第一，推进以所得税及遗产税一类的直接税；第二，税率须采取累进的原则。钱端升认为：“惟有使富者纳税率较高的税，税收才可以旺，协助贫省才有余力，而全民族的经济状况才可以改进。”

——钱端升：《财政会议之所应努力者》，载《益世报》1934年5月21日，第1版。

5月2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黑田案件及日本政局》。

该文分析持续发酵的黑田事件对日本政坛的冲击及其影响。在钱端升眼中，“日本政治离清明尚远，贿案弊案则如家常便饭”。钱端升对黑田事件分析后认为，斋藤内阁是否最终倒台，既取决于斋藤内阁的自信而不辞职的程

度，更取决于少壮军人及法西斯派是否有组阁可能。钱端升得出结论，无论此次日本政潮如何演化，日本少壮军人及法西斯派的危险程度，无论是对日本政局还是对东亚和平，都是在持续增加的。

——钱端升：《黑田案件及日本政局》，载《益世报》1934年5月22日，第1版。

5月2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远东运动会的灭亡》。

该文评论的是已有21年历史的远东运动会宣告解散事件。远东运动会早年为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越南五国发起，早在上届日本即图谋拉拢小国，最终邀请伪满洲国加入远东运动会，造成各国对伪满洲国事实上的承认。囿于原章程要求新会员加入必须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原则，中国自绝对不可能同意伪满洲国加入，故日本遂拉拢菲律宾，要求修改章程中这一全体一致条款。由于印度尼西亚及越南代表返国，中国代表愤怒离席，该修改章程的会议遂因达不到法定票数而无法进行，日本与菲律宾遂宣告远东运动会就此解散。钱端升认为，日本此举首先是一种不合法、不顾国际信义的行动；其次，日本在保护伪满洲国、助力其取得独立国家资格方面不遗余力，无所不用其极；最后，菲律宾虽为独立国家，附庸日本实在荒谬，可耻、可鄙且更不智。钱端升指出，这次远东运动会的纷扰虽然是政治纠纷，但不应该视为打击，“日本是我仇敌，伪国绝须消灭，东北总得恢复，日本在承认方面愈获胜利，则我们愈应惕厉，自奋以图雪耻”。而就具体对策，钱端升认为中国应联合印度尼西亚西和越南，维持远东体育协会，以与日本、伪满洲国及菲律宾新成立的东亚体育协会对抗。

——钱端升：《远东运动会的灭亡》，载《益世报》1934年5月23日，第1版。

5月2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萨尔瓦多为日本作伥》。

该文评述在日本的引诱下，中美洲小国萨尔瓦多宣告承认伪满洲国一事。钱端升指出，日本虽然千方百计买来萨尔瓦多的承认，但其并不足以损害中国的地位，亦更不足以改变伪满洲国的面貌，萨尔瓦多的承认只会降低自己的地位，增加日美间的纠纷。细言之，钱端升指出：第一，萨尔瓦多贵为国联会员，而违反国联决议，承认伪满洲国，必将受到国联的谴责；第二，萨尔瓦多名义上是共和国，实际上是军人政变上台，因此而受到美国抵制，承认伪满洲国之举将加深美国对其的恶感；第三，日本试图交欢于美国，但因利益冲突，常使美国难堪，这次借承认伪满洲国而离间萨尔瓦多与美国的关系，势必将使美日关系亦受消极影响。而站在中国政府角度，钱端升认为：第一，将来如有大国承认伪满洲国，中国应采取经济自卫手段，抵制该国货物；第二，政府对萨尔瓦多承认伪满洲国一事应有鲜明表示，既应斥责萨尔瓦多的荒谬，亦应声明我国对于伪满洲国的一贯态度，减少被外界误解的可能。

——钱端升：《萨尔瓦多为日本作伥》，载《益世报》1934年5月24日，第1版。

5月2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美国的复兴工作及其批评者》。

该文再论及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按照罗斯福新政的政策，美国自1933年6月16日根据《全国实业复兴法》而组成实业复兴局。在近一年时间内，实业复兴局为了促进生产，在劳工问题、物价问题及生产数量方面均有不少动作：在劳工问题上，实业复兴局推动各行各业订立行规，提高工人待遇，支持工会事业，但在实践中低级别工人工资增加幅度较大，高级别工人工资增长有限，罢工潮依然暗流涌动；而在物价问题上，复兴局推出的新政颇使批发商获利、零售商吃亏；就生产数量来说，农产品生产过剩严重，工业尚可维持正常……鉴于种种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实业复兴局颇受各方诟病，罗斯福总统不得不组织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复兴工作。近期该复兴调查委员会

发布报告，对复兴调查局工作多有批评，亦引起复兴局内部的冲突。钱端升得出结论认为，复兴政策的成败不在复兴一局，“复兴局不能单独解决失业问题，也不能单独统制生产。最重要的关键仍为国际贸易的增减及货币金融的管理”。

——钱端升：《美国的复兴工作及其批评者》，载《益世报》1934年5月25日，第1版。

5月2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有吉回任与中日外交》。

该借日本驻中国大使有吉明回国述职后又返华，再次述评中日外交的未来。在钱端升看来，有吉明的所谓“水鸟外交”，可以分为四点：第一，在政治、军事上，限制中国做任何不利于日本的行动甚至准备工作；第二，在经济上，增进并维持日本的繁荣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目的；第三，在外交上，中国必须与日本维持最亲密外交关系，而不应该与其他第三国有亲密交往；第四，在中日交涉方面，不到万不得已则不轻易用兵，主张温和手段。钱端升认为，这一政策表面上为协和外交，骨子里依然是焦土外交，最终目的依然在求对中国从政治、经济上的彻底征服。

具体到有吉明的返华，钱端升认为除了通车、通邮事宜外，日本方面在如下三个方面当有动作：第一，阻止外国财团对中国金融机构有巨额投资；第二，清扫包括税率在内一切阻止日货倾销中国的障碍；第三，包办华北投资事宜，控制中国经济命脉。至于日本人口口声声提及的债务清理问题，不过是难为中国、逼迫中国让步就范的借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呢？在钱端升看来，形势很清楚，如果中国答应日本的要求，至少可以得到片刻的安宁，但在这片刻的安宁中，中国既不可能统一，更不可能整饬内政、发展实业，“因为日本绝不愿我们统一，也绝不愿我们强盛。日本是得寸进尺，得尺进丈，顺了它上述的三点，必定还有更进一步的要求，非至我国完全屈服不止。所以苟安的结

果，徒然使人心益死但绝不能救亡”。但如果中国拒绝日本的要求呢？钱端升认为，或许会立即发生更进一步的武装侵略，或许不会立即发生，甚至好久都不发生，这取决于日本内政的变化、中国的应对技巧及国际大形势。职是之故，钱端升重申：“我们并不否认拒绝日本要求要发生极大的危机，但我们更不信苟安可救中国。”但就当时形势而言，中国在服从日本与毅然拒绝之外，没有第三种选择，职是之故，钱端升认为，我们只好鼓起勇气挣扎一下，一方面努力于整顿政治、发展实业及巩固国防，另一方面则拒绝一切足以丧国权、妨碍中国经济的要求。钱端升表示，如果因为各种牵制，拒绝之后并未发生迫在眉睫的兵祸，那实在是万幸；如果有近在咫尺的侵略，那中国也只有准备牺牲，“我们敢倡言牺牲，因为我们深信如果迁就了日本的对华政策之后，亡国更是必然的结果”。

——钱端升：《有吉回任与中日外交》，载《益世报》1934年5月26日，第1版。

5月2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财政会议的成绩》。

该文接5月21日《财政会议之所应努力者》一文，借全国财政会议闭幕之日，讨论这次财政会议的成绩。钱端升指出，尽管财政部列举了六大议案，但在他看来，最重要者不外乎下列五案：第一，限期废除苛捐杂税案；第二，限制附加田赋案；第三，改良田赋征收手续案；第四，土地陈报纲要案；第五，印花税及烟酒牌照税的拨归地方。至于其他各案，要么过于空洞，要么旧案重提，重要性可略过不提。而在该文正文中，钱端升则分析了苛捐杂税的废除及田赋附加的废除的难度及重点。

——钱端升：《财政会议的成绩》，载《益世报》1934年5月28日，第1版。

5月2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中俄关系应更密切》。

该文写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与中国驻俄大使颜惠庆在天津会面之际，当时距离中俄复交不过半年。钱端升指出，中俄之间除了欲订而未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外，更为紧要的则是商约问题。而商约的订立则取决于双方能否有智慧地处理中东路问题——钱端升认为，鉴于我方尚未收回东北，俄罗斯出卖中东路问题无法强人所难，但中国最关心的伪满洲国之承认问题，应要求苏联即便出售中东路，也应对外宣布不承认伪满洲国问题。而在商约之外，针对中国朝野各方长期以来对苏联宣传赤化的恐惧，钱端升指出，宣传赤化已非俄国今日国策，“只消我们对于自己的政治有相当的办法，尽可不必因俄为共产国家而怕与往来”。钱端升认为，一旦消除这方面的隔膜，中俄之间的关系自可迅速改善，商约亟待订立，而商务关系亟待推荐，惟其如此，中国西北的商务才可得到开发，苏联急需的农产品如茶叶亦将得到正常供应。另外，钱端升还提出，只要日本不改其黠武主义，远东地区最大的和平保障便是中俄武力的雄厚，因此，固然不能指望中俄在政治上、军事上结合，但双边关系的改善势必有利于确保中俄对日本的威慑力量，进而确保远东地区的和平。

——钱端升：《中俄关系应更密切》，载《益世报》1934年5月29日，第1版。

5月30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海军军缩会议预备会》。

该文评析的是1935年即将召开的伦敦海军军缩会议预备会前后的军缩形式。钱端升指出，日本为此次预备会议能否顺利召开的关键因素；日本表面上试图突破《华盛顿条约》及《伦敦条约》的限制，但实际上则是增加与各国讨价还价的砝码，包括试图阻止该预备会议将远东形势纳入讨论范围。

——钱端升：《海军军缩会议预备会》，载《益世报》1934年5月30日，第1版。

5月3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塘沽停战协定的一周年》。

该文写于《塘沽停战协定》签署一周年之际。钱端升在文章开头完整引用了该协定的文本，指出中国已履行相应义务，但日本却背信弃义而继续维持其对华北的占据与骚扰。在这种国耻时刻，钱端升为当局提出三点意见：第一，中国应努力于战区的改善，选贤与能，使人民悦服，不给汉奸、浪人可乘之机；第二，愿政府将《塘沽停战协定》视为最大的让步，从此之后切勿再做让步，通邮、通商本为无稽之谈，应绝对避免；第三，中国应对收回东北失地有自信心。

——钱端升：《塘沽停战协定的一周年》，载《益世报》1934年5月31日，第1版。

6月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裁军会议的末日》。

本文再次论及裁军会议的前途问题，钱端升通过对国际政治的分析，对于裁军会议的前途抱极为悲观的态度。职是之故，钱端升提出，既然裁军的目的完全不可能达成，还不如放弃裁军目的，转而按照苏联外长李维诺夫的观点，将裁军会议改组成为一个专门处理安全问题的国际机构。

——钱端升：《裁军会议的末日》，载《益世报》1934年6月2日，第1版。

6月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不承认主义”与萨尔瓦多》。

这篇社论承5月24日的社论《萨尔瓦多为日本作伥》，继续讨论萨尔瓦多承认伪满洲国问题。除再次详述萨尔瓦多及中美诸国之间互相承认的区域政治外，钱端升更是重申，萨尔瓦多承认伪满洲国既是对美国的报复，也是

日本多方运作的结果；萨尔瓦多固然为蕞尔小国，但或许会有其他国家步其后尘。职是之故，钱端升建议，中国一方面要设法防止其他国家承认伪满洲国，一方面要使萨尔瓦多因其承认行为受到适当制裁，中国应要求国联依据章程将萨尔瓦多除名，同时通过外交渠道表达抗议，声明今后凡敢于承认伪满洲国的国家，除违反其国联义务外，还应视为对中国不友好的行为，应对外交及商务的不良影响承担完全责任。

——钱端升：《“不承认主义”与萨尔瓦多》，载《益世报》1934年6月3日，第1版。

6月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改革汉字之商榷》。

鉴于《益世报》社论均不属名，这篇文章是否是钱端升亲笔所写，从语气及写作习惯看，稍微存疑。文章对汉字简化运动未置可否。作者提出，汉字简化从实用方面或有其益，但其成本亦极高，而汉字简化能否推动文化进步，亦是个大问题。作者亦提出，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小则寓意，大则寄托精神，而国人文化程度越来越低，如果一任汉字简化，文化亡国或者不远。

——钱端升：《改革汉字之商榷》，载《益世报》1934年6月4日，第1版。

6月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参观铁展后的几个感想》。

该文评述当时方兴未艾的铁路展览会。是否为钱端升亲笔所写存疑。文中提出三点：第一，从铁展陈列单位之杂乱，即可看出中国铁道事业最大弱点，比如国营，比如各个方面由于债务问题而引发的千差万别。第二，铁展中农产品多而工业品少，但后者极受欢迎，机械化、工业化是中国发展的大方向，如不图改进，舶来工业品依然将源源不断。第三，铁展一类教育价值

很大，各参办方应提高认真程度，精心设计，以使其教育价值最大化。

——钱端升：《参观铁展后的几个感想》，载《益世报》1934年6月5日，第1版。

6月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中国建设银公司之展望》。

该文评论当时成立的金融机构中国建设银公司。钱端升在该文中指出，中国公私事业的发达，离不开资本，而资本招募则又极其费劲，银行贷款亦十分不易，大量呆坏账亦使得银行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的成立能够“集合各银行之资本，集中于投资一途，业务既长，则对于请求借款企业之计划及希望，必较为明了，投资之数目，必较有弹性，而联合资本，共同担负盈亏之风险，使国内银行，一方得发挥其固有之业务，如商业，如储蓄，他方又因此而失投资之机会，裨益于公众及银行者，至为明显”。钱端升提出，衡量投资优劣与否，主要有三个标准，包括安全、利润机会及捐税，只有三者平衡，企业才能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成立的金融机构亦应注意这三方面的平衡。

——钱端升：《中国建设银公司之展望》，载《益世报》1934年6月6日，第1版。

6月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游资集中与经济建设》。

该文承6月6日之《中国建设银公司之展望》，继续评议中国建设银公司未来应该注意的问题。钱端升认为，中国建设银公司面临的问题不光在于如何吸收游资，而且在于如何利用游资，“今日金融界之患，不在于存款之不多，而在于放款之无术”。针对此问题，钱端升提出，中国建设银公司“利用此项资金实行经济建设”一节，尚需要细化：第一，该资金的用途，必须限定于狭义的生产事业，而不应该扩大于广义的一切建设事业；第二，

该银公司的投资政策必须完全按照商业原则做出，而不能受政治或者其他外力影响。钱端升认为只有做到这两点，中国建设银公司才能不蜕变成官商合办的资本衙门。

——钱端升：《游资集中与经济建设》，载《益世报》1934年6月8日，第1版。

6月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裁军之现阶段》。

该文结合英国政治家路易·乔治的《欧洲战云弥漫》一文，纵论国际形势：第一，各列强对裁军毫无诚意，裁军会议势必无果而终；第二，裁军会议后，各列强因利益而重新站队，军缩会议难以为继。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在伦敦召集海军会议，“据吾人之论断，此次谈话，难免不与日内瓦之军缩会议，限于同样悲惨之命运，正如一患隐病之人，病已深入膏肓，一经医士诊断，全盘托出，病状虽已无法医治，然其隐病不得不暴露也”。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国难日重，“当局者及人民绝不可再作偷生苟安之妄想，应如何抱定坚决牺牲之意志，渡此国难，对外政策，当知所以抉择矣”。

——钱端升：《裁军之现阶段》，载《益世报》1934年6月9日，第1版。

6月10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监察院木框公布弹劾案》。

该文结合监察院在院门置木框公布弹劾案的新闻，纵论监察权的来龙去脉及其行使。钱端升指出，中国政治腐败的原因甚多，但最核心的因素是权责不清，政府体制中名实不符的组织比比皆是，有的徒有其名而无实权，有的大权在握却无其名，“组织重复错乱，权责混杂不清，以致有责者不能行其职权，专其责任，于是政事废而国势弱”。钱端升进一步提出，既然监察院的设置为国民政府自愿主动成立，则国民政府应全力支持监察院行使其职

权，“以专监察之责，务必求其名实相符，然后可收实验之效，绝不应使之徒拥虚名，而无实权，机关在而职责亡，每年徒耗国民之脂膏若千万，而又令吾民深信政府之公正自励，于官吏督察之严也”。钱端升还提出，权责不清是中国政治之大病，而其背后的原因则是中国恶劣的政治习惯，即重责权而轻制度，“吾国举凡政治中人，不问其所在机关之制度，及己身职权之如何，胥皆视事实上握统治权者为其主宰，依其志意志趋向，举废一切事务。而握统治权者又常不能超越出‘家天下’观念之外，屡视同僚及下属若一己之雇员，不问制度之统系，机关之是否属我所辖，权柄之应否为我所有，只须事之为我认为应干预者，干预之；举办者，举办之；禁止者，禁止之；他人权责之侵犯，国家制度之破坏，于我无与也。是以县区之行政，按法则为县知事之职责，然军党二实力，往往不经行政高级机关之手续而干涉之。判听词讼，按法为法院之职权，而省主席可直接处理之。财政部属吏犯有营私舞弊罪者，按法应由财政部，或行政法院，或政务官承接委员会审判惩罚，而均是最高机关可调解究办之。凡此种种皆足以表现我国重实权轻制度之恶习，是以权责不清，制度破坏，政治紊乱，在上者日有滥权之失，在下者时有避责之念，监察院今日所处之地位，实足以代表一斑”。职是之故，钱端升认为西方诸国政治之所以清明，权责界限划分清楚是关键因素，因此就监察院的设置，政府应重新审查是否应让监察权之独立及监察院应否继续设置，如能设置则请勿妨害监察院之行使职权。

——钱端升：《监察院木框公布弹劾案》，载《益世报》1934年6月10日，第1版。

6月1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暑期军训之认识》。

该文评论即将开始的暑期学生军训。钱端升在文章中提出，民族进化成绩，取决于国防建设，更取决于经济建设、民族努力好学及创造力的发挥，但最终取决于刻苦奋斗之风气；中日之差异，根在学风，职是之故，“学生

生活，如不予以合理的改造，国民生活将永无以根植其巩固之基；所谓新生活运动，将永不能获得预定的收获”。由此，学生军训是新生活运动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以军事训练振奋青年学子之精神，更以此为契机，而复苏整个国家的灵魂，则吾民族前途，庶乎有救”。

——钱端升：《暑期军训之认识》，载《益世报》1934年6月11日，第1版。

6月1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中日悬案与东亚和平》。

该文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放言中日悬案将有彻底解决而起笔，鉴于中国外交当局“态度颇属沉默”，钱端升认为“实况如何，尚难揣测”，但“中日关系之转入一新阶段，或非绝不可能之事矣”。钱端升指出，中日外交之繁重困难一目了然，当局措施不易，国民当报以同情之理解，少点苛责非难，但中日关系之难素来难解，而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外交当局应对多为失策或无策之败笔，钱端升闻有吉大使之豪言壮语，难免惶惑。在钱端升看来，中日悬案能否解决，实在是很大的未知数，因为中日两国立场差距实在太大：日本之野心在于全面侵华，提携口号只是掩饰，“所谓中日提携必以中国之完全屈服为条件，所谓解决悬案者必以我能顺从彼之意旨为原则”，而中国方面则认为，“日本之黠武政策不变更则一切和平之呼声悉成诳语，日本对我之野心不改则一切之提携口号皆为侵略之掩饰，东北之问题不竭则一切之悬案尽无从解决矣”，“两国之立场相异如此，外交妥协，夫岂易言”。而中日国力悬殊，欧美列强自顾不暇，中日之根本冲突火烧眉毛，以让步换和平无非是误国，中国所能采取者，也就只有以“石头外交”对抗“水鸟外交”。

——钱端升：《中日悬案与东亚和平》，载《益世报》1934年6月12日，第1版。

6月1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北平大学生群殴之风》。

该文系针对北平朝阳学院、中国学院大学生分省群殴的两件时事而写。钱端升表示，闻此新闻后神经上颇受打击与愤恼，“不在中国失去东北四省以下”，“要是中国的一般青年大学生，在这样恶劣环境之下，还不明了国家危机所在，犹如此醉生梦死，私斗群殴，不仅东北四省无法去收回，连整个的中国恐怕也没有希望了”。钱端升由此论及北平学风的沦丧，以及北平学生肯南下请愿对日宣战，而不愿意参军入伍，甚至山海关炮声一响即率先逃难，实在是让人气馁；职是之故，群殴事件不光使社会人士感到痛愤与厌恶，也为北平教育界开了个恶风。钱端升检讨说，互殴事件的发生，有两个病态的背景：第一，各学校里省籍观念比较发达，虽然有优点，但抵不过缺点；第二，北平各学校当局对学生管理之放任、规则之松弛，的确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鉴于此，钱端升在文章末尾，“我们要在此严重地忠告中国最高的教育行政当局与全国教育界学者名流：中国的大学教育，到了这样田地，您们都负有不可恕的责任”，同时提出两点对策：第一，解散各校同乡会，铲除封建省界遗毒；第二，整饬北平学风，实行严格军训，使学生生活规则化、纪律化、刻苦化，充分灌输培养民族精神与合作意识，必要时可以动用国家最高制裁权。

——钱端升：《北平大学生群殴之风》，载《益世报》1934年6月13日，第1版。

6月1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论卷烟改税》。

该文评论新近实施的纸烟统税。对此改革措施，钱端升指出两点：第一，如果政府方面改订税则的目标是淘汰烟酒商，禁止人民吸食，那么国内鸦片遍地的状况远急于对纸烟的禁绝；第二，政府方面此次卷烟增税与其他面粉、水泥等百货增税同步，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增加财政收入。

而就税则修订来说，钱端升指出其要点有三：第一，税制由三级改为两级，以每万支售价300元上下分界；第二，为防止偷税漏税，烟厂仅允许在

上海、汉口、天津及青岛设置，其他地方烟厂应限期迁移，逾期则由政府收购；第三，新设烟厂注册资本必须在50万元以上。这些改革方案中，钱端升认为最核心的为第一点，其实质为对低档烟增税，而所增加成本则由厂商负担，由于洋商多生产高档烟而华商多生产低档烟，而且洋商多难以就范，增税的直接受害者将主要为华商烟厂。

基于此，钱端升认为尽管财政部会对华商有30万元补助的措施，但如下三点更为要紧：第一，卷烟应禁，但毒品更应禁，后者更急切；第二，政府应通过外交手段取缔外籍烟厂，而将其余华商烟厂改组为政府经营，由此改良品质、调节消费且增加财政税源；第三，如果前两条做不到，至少应该在可能范围内，让华商、洋商均担税率上涨之负担，而不应该使洋商独享租税特惠。

——钱端升：《论卷烟改税》，载《益世报》1934年6月14日，第1版。

6月1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欧美间之战债问题》。

该文论及英法等国停止偿还欠美国的战债问题。战债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向美国借贷的粮食及军火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英法诸国均通过各种方式暂缓偿还。钱端升表示，战债违约问题，既非纯国际信用问题，亦非道德问题，甚至也不全是偿付能力问题，而是掺杂政治、经济、军事各种因素的复杂问题；眼下各国都在集中财力恢复经济、提升军备，“战债之偿还，乃成为似重而实轻，似急而实缓之问题。彼此僵持，不得解决，或任其僵持而不解决，非独债务国如此，即债权国亦另有所急，静待事变”。

——钱端升：《欧美间之战债问题》，载《益世报》1934年6月15日，第1版。

6月1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上海各银行投资农村之计划》。

这篇社论嘉奖上海各重要银行开始计划在农村投资，分信用、合作、生产、仓库等数种业务，来转移城市闲置资金。钱端升指出，由于内地连年来的天灾人祸，大量资本流入城市，而城市土地、不动产及公债吸收了大量游资，但近年来这种增长趋势难以为继，存款多来但放款无术，银行闲置资金需要寻找新的出口。而就农村来说，由于天灾人祸等各种原因，入不敷出，资本极其缺乏，这催生了遍布大江南北的各类高利贷。钱端升指出，上海各银行若能够投资农村，实在是双赢的结果，既能解决资金闲置问题，亦能使农村有所复兴。钱端升进一步建议，政府应负起责任，免除一切沪上金融机构投资农村的制度障碍，同时协助银行压制各地以高利贷为基础形成的“利益集团”。

——钱端升：《上海各银行投资农村之计划》，载《益世报》1934年6月16日，第1版。

6月17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十省最近施政报告》。

这篇社论评价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对十省最近施政详情的报告。钱端升提出，中国政治的改进，应该从地方政治入手；而改进地方政府，一方面需要得人，另一方面需要改进政制。就地方政制而言，十省施政报告所强调的如合署办公、精简机构、主席负责制、取消府厅改为两级制、酌量设置参事名额及核减经费等，被钱端升认为能代表现在省制改革意见，应予以重视，但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省政府应该由委员制改为省长制，由省政府负省政全责，付以充分的权能。另外，除了改善省政，也要改善县政，尤其改进法令如牛毛、表册满天飞的现状，增进施政的实际效能，减少形式主义的手续。

——钱端升：《十省最近施政报告》，载《益世报》1934年6月17日，第1版。

6月1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意德成立新谅解之检讨》。

该文评述当时成立之德国、意大利新谅解的意义。钱端升指出，鉴于德国近年来在欧洲越来越孤立，法国对德国之包围圈越来越明显，而德国亦需要外交出路来未雨绸缪，同时缓和德奥矛盾。而根据德国、意大利会谈之结果，双方承诺在重大问题上互相合作、同意订立普遍协定、促进多瑙河沿岸各国贸易、尊重奥地利独立以及在德国军备平等条件下德国重返国联等，既有希特勒让步之成分，亦有意大利助德国达到军备平等的国际义务精神，德国可以说收获颇丰。而在这种情形下，不仅欧洲对垒形势明显，其对远东的影响势必亦将逐步显现出来。

——钱端升：《意德成立新谅解之检讨》，载《益世报》1934年6月18日，第1版。

6月1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提倡国货”运动》。

该文借中山公园提倡国货演讲竞赛，再论“提倡国货”问题。钱端升指出，“提倡国货”固然是老生常谈的口头禅，但是实际上国货的销路依然一天差似一天，国货的前途也一天比一天暗淡。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洋货多为工业制品，由于“西洋生活习惯潮流的接触，国人消费的程度，迎头赶上了欧美，而生产的能力和办法，还是保留着中世纪的制度。于是乎种种新时代的消费，不能不让给于舶来品”。钱端升进一步指出，欧美制造方法日新月异，而国内制造方法则依然故步自封，不光新兴制造业无望赶上，就连瓷器、茶叶等中国传统特产的生产，也有让步给西洋工业的趋势。由此种种，钱端升冷峻地指出，国货洋货之争的背后，是一种战争，空谈呐喊、利用感情均无用处，唯一的方法还是提高国货本身的优点，使之做到“物美价廉”，各方面都还需要埋头苦干，提高国货的生产，尤其注意于方法的改进、数量的增加、成本的减少以及品质的优良，“生产有进步，国货自然有畅销之一日；空谈呐喊提倡国货的消费，再提倡十年，恐怕还是无济于事”。

——钱端升：《“提倡国货”运动》，载《益世报》1934年6月19日，

第1版。

6月20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县长任用办法与刷新庶政》。

该文围绕修正县长任用法，并对于县政改革略有建言。钱端升提出，“县治为布政之始，县长为亲民之官，故在政制及职位上，县治与县长之地位，虽至为低微，然在庶政上其重要乃不可忽视”。但近年来县长制度改革，尽管通都大邑县长职权部分转给司法人员，但在稍微边缘贫瘠的地方，县长职责依然犹如昔日县官，“今日之县治，仍为全国政治之基本组织耳，基本组织优劣与否，对于全国政治之重要，无烦吾人词费”。而尽管县治如此重要，过去多年间朝野各方对县治之漠视、对县长人选之随意，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在钱端升看来，改革之途可分为如下步骤：第一步，登庸人才，以公开考试制度为选拔人才的途径，变县长为事务官，延长其任期，成就其事功。第二步，县长人才选拔应该以新教育、新知识为基础，另外亦多注意于人才培养方法的改革，逐渐使全国县治近代化。第三步，明立县长责任，提高其地位，逐渐摆脱视县长若下属的积习，吸收人才而纳入布行庶政之机关。

——钱端升：《县长任用办法与刷新庶政》，载《益世报》1934年6月20日，第1版。

6月2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告大专毕业生》。

该文针对即将走出大学校园的毕业生们而写。钱端升指出，中国社会一向是：社会需要大专毕业生，却找不到合适的人；而大专毕业生需要工作，却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克服此事的办法，需要从两方面来说。从大学生的方面，大专毕业生们对于国家毕业保持绝对的、永远的乐观，对自己亦不可以悲观失望，必须脚踏实地往前走，一方面服务国家社会，一方面实现自己的志愿。为了做到这些，大专毕业生必须戒除身上的两大缺陷，一个是好

高骛远、不切实际，一个是养尊处优、讲求享受。而从社会的方面，社会须绝对信任新人物，尊重新人物，但不能溺爱新人物，“读书人不可做成一特殊阶级，社会也不应视他们为特殊阶级”。

——钱端升：《告大专毕业生》，载《益世报》1934年6月22日，第1版。

6月2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再论暑期军训》。

该文承6月11日《暑期军训之认识》，再论学生暑期军训问题。钱端升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暑期军训的目的必须明确，那就是培养下级军官，而非培养一般士兵；第二，既然军训的目的在于培养下级军官，则训练的学科应随之调整，军姿训练固然有用，但其他必备之知识更应加大训练力度；第三，暑期军训时间仅有三周，实在过短，应予以延长，至少应有两个暑假的训练；第四，训练必须集中，且训练纪律必须严格，“拔诸学校特殊环境之中，破其养尊处优之习，养起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之德，此则军训之意义也”。

——钱端升：《再论暑期军训》，载《益世报》1934年6月23日，第1版。

6月2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论遗产税法草案》。

该文专门评介五月全国财政会议议决通过并转立法院审议的《遗产税法草案》及《遗产税法施行细则草案》。对于遗产税开征本身，钱端升十分赞成。除介绍该二草案之核心内容外，钱端升亦提出若干意见如下：第一，遗产税之立法及实施，尤其应该注意重复征收及遗漏征收；关于这一点，钱端升认为中国为中央集权国家，相比而言可以少受重复征收及遗漏征收之扰。第二，遗产税免税额及遗产率，亦为核心问题，此无一致办法，需要视国内情况酌情而定；钱端升认为5000元之起点可以接受，但税率还可以再提高，

累进之度亦可以再增加。第三，遗产税实施困难主要难在遗产之调查及估算；相关草案对此语焉不详，钱端升认为，立法院应该审斟社会情形，详细拟定相关规定，尽早完成财产登记办法，次第推行于全国，使遗产税之调查便于进行，也使遗产税之征收不至于与实际情况相差甚大。

——钱端升：《论遗产税法草案》，载《益世报》1934年6月24日，第1版。

6月2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大学毕业生出路问题》。

该文评论“毕业即失业”难题。钱端升指出，大学毕业时无出路的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教育制度本身有缺陷，文科学生过多；其二是社会收容力薄弱。对此两个原因，尤其是教育制度本身的缺陷，钱端升一方面予以承认，但另一方面指出更大的原因是后一个，“假使此种社会情形，不能根本改善，既不能以增进生产为中心，而使社会繁荣者，即完全停止文科招生，使各高等教育机关尽化为实科，吾知大学毕业生之供过于求，乃与今日毫无二致”。而在这种“青黄不接之秋”，大学毕业生“惟有各自深刻认识环境之本质，明了非国家与社会先有出路而后，吾等个人绝不能有真正之出路。于是大家以吃苦努力、择善而从之精神，共同推进社会，推进政治，使迅赴高远之的。……切勿妄自尊大，以为我在大学毕业，即已高人一等，国家与社会，对我等有赋予一定职业之义务，否则我等有提出要求之权利”。

——钱端升：《大学毕业生出路问题》，载《益世报》1934年6月25日，第1版。

6月2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西南与“剿匪”》。

该文以乐观的口吻，综述剿袭江西匪患的进展。文章提出，9月底或许能剿灭赣匪，“长此以往，即使国军不图进取，恐匪军的溃散或坐毙亦不出

一二年间”。这种乐观，源于西路军、南路军均改善与中央关系，一改以往南路及西路湘赣边境防堵不充分的缺陷。钱端升更进一步建议，借助“剿匪”期间的通力合作，西南的有关机构应自行取消，而同一归附于中央，“过去的半分裂既贻笑中外，更妨害内政”。双方均应“报之以诚”、“刻苦谋建设”。

——钱端升：《西南与“剿匪”》，载《益世报》1934年6月26日，第1版。

6月27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大学校长可挂名乎?》。

该文评论燕京大学意图邀请时任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担任校长一事。钱端升对此持完全的反对态度，其理由有如下几点：第一，从政府角度而言，兼职为中国政治之恶习，而孔祥熙在公职之外，兼职已甚多，故应“知财政部长职务之繁重，与夫兼差风气之不可长，而毅然拒却燕大校董会之要求”。第二，从大学教育而言，拥戴要人、名人挂名校长亦为不忠实、不健全之行为，“必有不可告人之苦衷”，而教会大学邀请政要出任校长则是规避《大学组织法》中大学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的伎俩。钱端升指出，无论是从政府角度还是大学角度，邀请要人、名人出任校长，都非所宜，还应三思而后行。

——钱端升：《大学校长可挂名乎?》，载《益世报》1934年6月27日，第1版。

6月2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日本要求减税》。

该文评论日本要求中国片面降低对日货的税率事件。钱端升指出，中国自1928年取得关税自主权以来，关税自主本来就是主权的一部分，亦为各国条约所明确承认，日本的要求极不正当。一方面，日本的商业并未因为中国的税法受到不良影响；另一方面，日本单纯要求我国降低税率，于法于情

都不通，唯一合理的手段是通过友好协商来谈判，但东北山河破碎，中日之间亦谈不上友谊可言。钱端升表示：“我们是最好和平不过的国民，我们的政府更是不难说话。我们现在无它求，我们但求日本于要求减低关税时能诚意地拿出些具体的、相当的交换条件。”“日本本无不满我国的收税率的权力，如果它不以相当的条件为交换，而定欲变更我税率，则正当的办法亦只有干脆拒绝，……硬着头皮挨打也总比低着脑袋受辱为愈。”

——钱端升：《日本要求减税》，载《益世报》1934年6月28日，第1版。

6月2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平沈通车以后》。

该文评议日伪与关内通车事宜。此事在各方角力一年多后，终成事实。钱端升先前曾多次反对，但最终收效寥寥。当此即将通车之际，钱端升忍不住再向各方建言：第一，外交理论上应由中央办理，通车事件交涉的失败，更证明地方以后不应谋揽外交之权；第二，细微地方事件，可以由地方处理，但必须有中央之预先授权；第三，在对外交涉的磋商中，解决方案应当相当公开，引入外界的督责及批评，进而尽量减少误差。而就通车本身，钱端升亦提出两点：第一，维持沿路治安问题，务必高度重视，防止日人借此再生事端；第二，双方议定的办法于中方已大大不利，必须督促日本严格遵守。

——钱端升：《平沈通车以后》，载《益世报》1934年6月29日，第1版。

又：这篇社论发表之后，估计与当局有相应冲突。故次日社论之后，又有更正之语：“按本报素主张外交应统一于中央，故对今后外交有所规劝。至于对已成事实之通车交涉，则并无诋……中央命令办理之意。为尊重当局意见，特将昨日社论中凡可视为……中央地方分离开之语意者，一律予以撤销。”

——《本报声明》，载《益世报》1934年6月30日，第1版。

6月30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中学生的出路》。

该文承袭前文讨论大学生的未来，而论及中学毕业生的出路。据钱端升估算，1934年当有6.5万中学生毕业，而初中毕业生所能做的事情极少，在大城市尚可投入工商业，而在农村则无路可走；高中毕业生更是高不成、低不就，既不屑于做底层职员，中上层又几乎无路可走。钱端升认为，要解决中学生出路问题，与大学生则完全不同，救济办法有二：第一，减少中学的数量；第二，将过剩的中学改办为切实有用的职业学校。当然，即便如此，钱端升并未否决中学生依然应该“认清他们是社会的中坚人物，所以对于社会、国家及世界大势务须有彻底的认识”。

——钱端升：《中学生的出路》，载《益世报》1934年6月30日，第1版。

6月

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出版《德国的政府》。扉页有“献给异”字样，待考。该书各章目录如下：

- 一、宪法史。
- 二、德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 三、政党。
- 四、莱希总统。
- 五、莱希政府及莱希行政。
- 六、莱希院。
- 七、经济院。
- 八、国会。
- 九、国会的职权。

十、法律及法院。

十一、联邦制度。

十二、各邦政府。

十三、地方政府。

——钱端升：《德国的政府》，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

【1930 年秋，我再度回到清华教书，同时在北大兼课，直到 1934 年初离北平去天津《益世报》为止。这期间，除教书备课之余，我还撰著了《德国的政府》一书，此书原为译述 1919 年威玛宪法下德国政制和政治生活而作，参考德文资料和德文原著较多，基础较厚，在我所著浅薄不足称道的书籍中，尚不失为有价值的一本。】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66 页。

7 月 2 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新闻纸与政府》。

这篇社论承袭 6 月 30 日的“本报声明”，而对此次社论事件余波稍有辩解与微词。在该文中，钱端升明确指出，媒体的自由本是出版自由最重要的部分，但新闻自由“在我国本是谈不到的事情”。

钱端升进一步提出，无论是哪个党派还是社会办媒体，都需要做到“传播准确消息”、“主持正当论调”两种工作：

从媒体的角度，钱端升提出报纸既然是传播消息的机构，那么一切重要的消息或人民可以发生兴趣的消息，都应该详尽且翔实地刊登，“详尽”可能取决于人力、物力、财力，而“翔实”则无论大报小报都应有同等程度的认真，“即或因环境的不同而不愿登载不利于某方面的消息，但所登载者则必须是可靠的消息，而不是无稽的流言，更不是恶意的谣言”。而在持论方面，除了以推翻政府为目的的报纸外，普通报纸的持论应满足如下四个条件：第一，要为全民福利着想，以事实为根据；第二，有深远明透的眼光；

第三，有实行的可能性，论调切勿过高；第四，主持笔政者应对于学问有极高造诣，对于实际政治有相当认识，而且要有大公无私的居心，“一方面要胆大，要敢说话，要不怕得罪人，但一方面也不能意气用事”。另外，对人的议论应限于对被议之人对公行为的评议，对事不对人基本不可能，但论人时不应有恶意攻击，更不应牵扯私行为。

而从政府的角度，钱端升认为政府的职责不在于保障报纸的自由，而在于给实践上述各点以相应的机会或可能，比如为了使消息详尽，则政府一方面应积极地提供消息，另一方面应消极地不干涉消息的刊登，“要使新闻维持正当，则政府应虚衷受教，不要一见批评，便即愤愤不平。明是非、辨善恶的能力政府尤不能不具”。另外，对于新闻检查，钱端升认为在可能的范围内，政府应废止刊行前的检查，而图事后的救济；或者说，出版法应比较严格，但新闻检查则应完全取消，而通过刑法、出版法中的相应条款予以调整。钱端升指出，新闻检查只有在战时才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其最大问题在于检查绝对不能合理化，换任何人都无法避免不合理的检查。

钱端升最终又回到平沈通车社论指出，最后的希望还是在于大家都“反求诸己”。新闻报纸当然负有极其重大的职责，而完成职责则既取决于新闻界的努力，更取决于政府当局的关爱呵护。

——钱端升：《新闻纸与政府》，载《益世报》1934年7月2日，第1版。

7月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德国未成的政变》。

该文讨论希特勒主持德国政权后的6月30日的清党政变。钱端升指出，党外无党与党内无派极难并存；国社党的大肆扩张及对其他政党的打压，导致党外无党，全民皆可入国社党，但如此一来，“愈是独裁的政党，愈是不免有派别”。钱端升指出，即便希特勒现在已经打倒反对派，但反对派能否

就此彻底肃清则是很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政权能否长存，既取决于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更取决于其建设的业绩。

——钱端升：《德国未成的政变》，载《益世报》1934年7月3日，第1版。

7月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日本齐藤内阁的辞职》。

该文分析了齐藤内阁辞职前后日本的政坛情况。钱端升认为平庸的齐藤内阁能够支撑两年多，既是因为其平庸，最终也毁于平庸。而在将来，继起组阁者，尚不太可能是法西斯主义者，因为在日本，法西斯主义不大可能脱离军部而独立存在，而军部对法西斯主义并无太大兴趣。而除了法西斯主义内阁，接下来也不可能出现一个政党内阁，政党内阁就算不为军部所喜欢，而一时三刻也找不出可以力挽狂澜的政党。职是之故，下一步最可能的情形还是混合内阁、过渡内阁，内务大臣山本可能奉命组阁，齐藤也有可能重新组阁，新内阁与旧内阁势必还是同一色彩、同一性质。

——钱端升：《日本齐藤内阁的辞职》，载《益世报》1934年7月4日，第1版。

7月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省府合署办公》。

该文承2月6日《省长制与委员制》，继续讨论省级政制问题，而提出问题的由头则是南昌行营颁布《省府合署办公办法大纲》14条。钱端升指出，首领制与委员制之间可以有多种制度，而现在的省制则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更接近首领制；但无论如何，不管是委员制还是省长制，其利弊常常因时而异、因地而异。钱端升认为，就我国国情而论，要改进省制，最核心的要点在于：第一，缩小省区；第二，厘分省县权限；第三，以省县担负的职务而改变省县的组织，使公文行政的组织简单化，而事业行政的组织技术

化。另外，钱端升对于蒋介石不骤然改革、不迷信任何制度、鼓励尝试的做法，亦极表示赞同。但钱端升对于依照合署办公办法改进后的省政，能否因合署办公而敏捷，省政能否因而改良、经费能否因而节省，持审慎的态度——在他看来，在新制度之下，省主席的地位比以前更为重要，而人选亦将影响于省政，故“改制事小，人选事大”，精神比形式更重要。一方面希望省政得人，另一方面希望省府及各厅都能缩小公文的行政组织，而扩大事业的行政组织。

——钱端升：《省府合署办公》，载《益世报》1934年7月5日，第1版。

7月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日本政局的展望》。

该文承7月4日《日本齐藤内阁的辞职》继续讨论日本政局的新变化。钱端升认为，新内阁总理冈田起介在诸多方面与齐藤相像，故无论是人事还是内外政策，俱不会有大的变化；尤其就日本外交政策而言，亲英、和美、仇俄、侵华的大方向亦不会改弦更张，因军部在新内阁中的势力并未大举扩张，故对华政策亦不会有明确变化。钱端升还特别提及，按照日本的政制，日本内阁总理常由元老向天皇举荐，故声望如日中天的西园寺公望过世之前，元老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力依然会岿然不动，“日本的政治多少仍可留着一稳定的因素”。

——钱端升：《日本政局的展望》，载《益世报》1934年7月6日，第1版。

7月7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平沈直达车中的日警》。

该文承袭6月29日《平沈通车以后》，继续纵论平沈通车之后的外交问题。在前文中，钱端升提出，当局既应注意沿线治安，也应督促日方严格遵

守协议。而平沈通车之后，不仅发生了炸弹袭击事件，更发生过日本警察随车巡逻的事件。

钱端升认为，日警随车的性质比炸弹事件更为严重，“随车日警虽为数有限，而丧失国权之处则极大，警权为主权的一部分，不能让给别人”。钱端升痛批殷同轻易答应日方试办一周的要求，要求殷同在辞职之前，“斩钉截铁地告诉日方，自明日（八日）起日警不能再行随车”，如果日方坚持要派警察随车，中方则只有停止通车——钱端升认为，日本固然强横，但也还没到中国停止通车而日本自动开车的地步，否则平津主权早已易手日方。而从宏观层面，钱端升则勉励当局，“以后遇到同样事情时，当局务须明了国际法，明了主权，而严予拒绝”。钱端升更是表示：“无论我们怎样对日人委曲求全，最后一拼的决心我们仍是不能不有。所以不可让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让。我们宁可容忍他们的强抢。如果所抢者不仅是面子，而且也是命脉，则我们惟有和他们一拼。没有这种精神绝不能应付日本的问题。”

而在文章末尾，钱端升更是警告日本人见好就收，“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人是可以永久侮辱的民族，不要因一部分人的易于说话，而忘了全民族的志向。我们固然是富于忍耐性的民族，但我们民族中也还不乏悲愤填胸的壮士。怨仇宜解不宜结，而信义尤为任何有自尊心的民族之所应重”。

——钱端升：《平沈直达车中的日警》，载《益世报》1934年7月7日，第1版。

7月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全国矿冶地质展览会开幕》。

该文写于实业部、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矿冶地质展览会开幕之际。钱端升指出，在林林总总的各类展览会中，矿冶地质展览会尤其值得重视，因为中国要发展经济，要近代化，离不开工业的近代化，而要工业近代化，矿冶工程则不能不先予发达。钱端升引述展览会主办方的陈述，认为此次展览会有三重意义：第一，中国矿产丰富，但多不为人所知，矿学知识的匮乏是主要

原因，展览会正可增长知识；第二，中国矿冶技术落伍，有矿藏而无法开采、精炼，导致外国货及外资长驱直入，此次展览会尤其注重冶炼方法的展示，普通观众和专家等都可受教；第三，煤的缺乏本为工业化障碍，而此次展览会有关燃料及试验的资料甚多，亦是亮点。在这些展览基础之上，同时开幕的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年会暨中美工程师协会年会同时召开，相得益彰。钱端升更进一步谈及清末采矿救国之说，指出北平地质调查所及中研院地质所等对中国地质状况的勘探，实在是中国矿藏知识增长的两大功臣，隐然强调学术机构的极端重要性。

——钱端升：《全国矿冶地质展览会开幕》，载《益世报》1934年7月8日，第1版。

7月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扩大县政府组织之商榷》。

该文承7月5日《省府合署办公》中对省制改革的议论，再论县政的改进。钱端升提出，充实县政的要务除了增加经费之外，更重要的任务有三：第一，培养县政人才。钱端升指出，长期以来，县长难为，既困于经费短缺，也受地方土豪劣绅之凌虐，频繁受上级政府之政令滋扰，而且缺乏上升空间，忠厚之人多视县长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考试制度对培养治县人才固然可以有所助益，但真正的人才还是需要专门培养，各国立、省立大学应斟酌情形，注意县政人才的教育。第二，提高县长地位。钱端升认为，在吏治体系中，县长人微言轻，缺乏上升渠道，吸引力不够。应该在任命高级官吏时，以是否具有基层县政经验为提拔的条件之一，如此则吸引人才安心从事县政治理。第三，确定县府职责。钱端升认为，省县关系应该重构，长期以来省以节制、监督为主，而县则奉行措施，缺乏自主权；在改革中应该赋予县政府一定的“自动建树”之权。而在县政府内部，应该明确县之科局为县府之补助机关，不能脱离县政府而独立，县长综理地方筹划治理事宜。

——钱端升：《扩大县政府组织之商榷》，载《益世报》1934年7月9

日，第1版。

7月10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论整理旧债》。

该文评议数十年来拖沓无果的中国外债整理及偿还事宜。当时的整理事业，除了外债确数无法知道外，外债偿还问题也在财政部、铁道部及交通部之间推诿扯皮。钱端升指出，中国的外债大抵为三种：赔款、政治及普通借款、事业借款。这三部分中，赔款多因战败而起，以海关盈余为担保，数目明确，还款办法亦清楚；而政治及普通借款则出于各种考虑，本利确数、合同条件等都未闻其详，甚至有的借款连合同文本都不宜得；而事业借款，多用于邮政、铁路等事业，无论是建筑本身还是材料赊欠，尚可清楚。对此一团乱麻般的外债，钱端升指出其解决步骤应如下：第一，外债问题关乎国家信用，其范围远超出一般院部，故应由新成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通盘筹划，权衡缓急，转由各机关分别偿付；第二，外债之对外交涉，应区分性质、来源、用途及数额，与债权人展开商谈，尽量减轻债务负担；第三，事业借款之偿还必须设法减轻成本，提高营业水平，改进事业组织，引用确当人才，而不是一任军人政客充斥铁路机关。

——钱端升：《论整理旧债》，载《益世报》1934年7月10日，第1版。

7月1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宪法草案修正稿评议》。

该文评议立法院宪法起草委员会新近公布的修正稿。1934年3月1日立法院公布草案之初，钱端升曾参与宪草臧否，那么从他的角度又是如何看待这份草案的修正稿呢？或者说，钱端升的先前的批评与建议，有多少得到了立法机构的回应甚至采纳？在钱端升看来，这次宪草修正案与原文不同之点甚多，形式、内容俱有大变，而其中最重要者有三点：

第一，关于国民大会，有两点：其一，民意代表改称为国民代表，依然以一县一代表之法选出；钱端升对此不敢苟同，认为现有的县份参差不齐，绝非孙中山心目中理想的大小均等的县份，而且孙中山理想中的民意代表必须待各省自治后方能选举；其二，国会职权依然太大，在人民尚不能行使民权的中国，人民权力应以有限制为安。

第二，关于国民大会委员会的职权，原草案只限于弹劾要员及对行政院院长投不信任票，而修正案则有复决权及对总统的质询权及试行罢免之权，人数也从21人增加至百余人，由国民代表分省选举。钱端升认为这是很大的进步。

第三，关于行政机关体制，钱端升对于修正稿从内阁制变为总统制，并不完全认同。钱端升指出，不管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成功之要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至少在中国的实践中，内阁制既未完全失败，也未完全成功，但在林森这位模范主席的执掌下，中央政局两年半未发生内乱，实在是很大的成绩。职是之故，钱端升倾向于认为内阁制更适合于中国。

——钱端升：《宪法草案修正稿评议》，载《益世报》1934年7月11日，第1版。

7月1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监察院弹劾顾孟余案》。

该文评议顾孟余弹劾案风波。此事起于山西铁路修筑，而监察院在缺乏切实证据的情况下轻率弹劾铁道部长顾孟余，顾孟余又公开答辩进而引发政争，陷入僵局。钱端升对论辩双方各打几十大板：在监察委员刘侯武一方，轻率弹劾、信口指责、查无实据，实在是不知自重；监察院审核亦糊里糊涂，实欠高明。而在顾孟余一方，钱端升认为顾孟余公开发表谈话，尽管值得同情，但对事端扩大亦有责任。而归根结底，钱端升认为还是监察体系的问题，“监察院过去最大的毛病即在妄效御史，乱上弹章”，御史尚有君主制裁，而监委则不对任何人负责，而互相监察的制度又形同虚设，如果监委不

自尊自重，在法律体系内竟然毫无救济途径。钱端升因此指出，尽管五权宪法是孙中山的遗教，但如果监察权不宜独立寄托于一个机关，还不如另想其他办法。

——钱端升：《监察院弹劾顾孟余案》，载《益世报》1934年7月12日，第1版。

7月1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欧洲和平运动的新趋势》。

该文讨论欧洲军缩会议及安全保障条约的近况。在英、法、苏联等国的努力交涉下，本来濒于破裂的军缩会议又有了新的转机，各方的利益和诉求也在妥协的前提下各有所满足。而区域安全条约能否真正签署，——进而推迟欧洲大陆的战争，则完全取决于德国是否愿意加入该条约。对此钱端升也只能寄希望于法国“有方法劝说德国加入区域安全条约”。

——钱端升：《欧洲和平运动的新趋势》，载《益世报》1934年7月13日，第1版。

7月1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如何救济水旱两灾》。

该文针对夏天水旱灾害的泛滥，为当局及社会提供了若干应对意见：第一，长江沿线诸多省份的粮食问题，政府应及早通盘筹划，防止因为灾害而导致粮价飞涨；第二，防止灾民因为歉收或者灾害而陷入贫穷，农村合作制度应用心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应尽早成立；第三，轻徭薄赋的传统救济措施亦需要及早实施，尽早举行平糶措施；第四，灾荒之后往往有疫情，政府卫生部门应及早准备应对措施。而对于各地流行的迷信求雨之举，钱端升则大为反对，“我们愿当局再勿容忍此种反时代、反文明的迷信，我们更望南中党部及地方官吏能向老百姓解说求雨的愚蠢而停止一切迷信行动。我们愿全国上下以求雨的诚心来预备救灾之道”。

——钱端升：《如何救济水旱两灾》，载《益世报》1934年7月14日，第1版。

7月1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外债与建设》。

该文承7月10日《论整理旧债》，继续讨论举借外债以助力建设问题。钱端升指出，外债不是不可借，但过去举借外债教训多多，此次再有举借外债之议，于如下四个方面应尤其注意：第一，举借外债的目的必须限定为经济投资，而不应带有任何政治意味；第二，建设外债绝对不能挪用；第三，生产事业应逐步进行，视必要举借外债，而不应骤举巨债；第四，须先有事业目标，确定详细计划，再举借外债。总之，钱端升认可举借外债助力建设的重要性，但深望此轮举借外债能够克服北洋时代的种种积习与弊病。

——钱端升：《外债与建设》，载《益世报》1934年7月15日，第1版。

7月1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国税与经济政策》。

该文对新近公布之海关新税则提出委婉批评，建议政府就新税则中有欠深思熟虑的棉织品、机器及海产三类货物的税率，仿照欧美国家“随时修订”的惯例，予以修订。钱端升指出，第一，此次改订海关税率的动机是增加财政收入，但棉布等税率改轻对财政收入并无益处；第二，经济统制重在全国联系，而关税运用为其重要工具，但政府一方面收购华商存纱救市，另一方面调低进口棉货税率，与经济统制政策完全背道而驰；第三，棉制品及海产品的税率调低，受害者为日本商人，而非中国商人。综上所述，钱端升认为以上不妥之处应随时纠正，关于税则问题的对日交涉亦应与日本等价交换，否则税率则应予调整，“外交固贵运用有方，然经济政策，则不能轻易迁就他人，此政府之尤所不可不审者也”。

——钱端升：《国税与经济政策》，载《益世报》1934年7月16日，第1版。

7月17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安定政局》。

该文承7月12日社论《监察院弹劾顾孟余案》，再次站在汪蒋合作、安定政局的角度，奉劝参与各方以大局为重，各退一步，继续促成汪蒋更深入的合作。钱端升表示，“我们一方愿顾及汪方勿因弹案而多冲动，而消极，又一方则愿监院方面亦平心静气，以国家为重，而停止一切任性使气的行为”。尤其在监察院方面，钱端升深望监察院谨慎行使弹劾权，不授人以柄，而对于审计权的行使方面，则不妨脚踏实地进取。钱端升勉励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亦以大局为重，“抑止一切类似意气用事的行为”。

——钱端升：《安定政局》，载《益世报》1934年7月17日，第1版。

7月1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苏联将入国联》。

该文评介苏联同意加入国联的背景、重要性及其积极影响。在钱端升看来，就其积极影响而言，第一，国联将因生力军的加入而发生一种新的兴奋，告别最近弥漫的悲观氛围；第二，德国、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因为苏联加入国联而稍微松弛；第三，苏联被攻击的危险可以大大减少。职是之故，钱端升认为：“苏联的加入国联实是于世界和平有补的一件大事。因此，我们翹望苏联的加入能早成事实。”

——钱端升：《苏联将入国联》，载《益世报》1934年7月18日，第1版。

7月1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斥自杀》。

该文斥责自杀泛滥的社会现象。钱端升分门别类分析了导致自杀的七类原因：第一，经济压迫；第二，家庭纠纷；第三，忧国、嫉世与愤俗；第四，殉情、殉友、殉主或殉船；第五，求学或事业失败；第六，多病或衰老；第七，恋爱不遂。而在此基础上，钱端升又对导致自杀的每一种错误观点逐一作了驳斥，陈言无论自杀的原因为何，亦无论自杀者是否值得同情，“自杀总是不应该有的行为”，“我们希望全国舆论能一致地加以指斥，同时对于造成各种自杀的社会环境亦能因舆论的督促而有所改善”。

——钱端升：《斥自杀》，载《益世报》1934年7月19日，第1版。

7月20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华北高等教育的改进》。

该文算是对3月7日社论《教部派员视察高等教育》的跟进评述，发表的背景则是教育部根据视察员的报告，对北平、天津、保定及山东的21所公私专科以上学校，发出针对性的训令，“指出应行改进的要点”。钱端升指出，鉴于教育部对视察的重点已有侧重于经费、校舍、图书仪器、教员配备、学生、院系及课程设置、训育等指示，故“我们苟于二十一个训令中不能发现任何大刀阔斧的改革，那也是应有的结果”。而结合这21个训令，钱端升指出华北高等教育共有的如下缺点：第一，教授兼任风气太盛，应予严格取缔；第二，图书仪器普遍缺乏；第三，行政开支比重极大。而除此之外，钱端升亦指出教育部的整改措施薄厚不一，对文、法、商高校措施严厉，而理、工、农、医各系则失之宽宥。而对于视察本身，钱端升则表达了十分欢迎的态度，认为纵然舆论中伤甚多，但视察完毕后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现状已有一定认识，“我们盼望此后教部对于各校能每年作一总的视察”。

——钱端升：《华北高等教育的改进》，载《益世报》1934年7月20日，第1版。

7月2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监察院与监察权》。

该文固然与先前言及的顾孟余弹劾案有关，但钱端升开篇即声明“吾人兹所讨论者为根本问题”。全文围绕监察院为何不能行使监察权展开。关于五权宪法监察权的起源，钱端升坦言系孙中山会通西方议会之质询弹劾权与中国御史的言事权而成；而考西方议会之质询弹劾权，民选议员、议会无权，议员之弹劾质询才有威慑力，而中国言官既无自由言事，又无自由弹劾之权。职是之故，钱端升认为，五权宪法体系下监察权的有效行使，既需要监察机构有力，更需要监察机构负责，有力则需要监察员民选，而负责则需要监察机构及监察员受民意监督，做不到这一点，纵然跻身五院之一，不过形同虚设而已。由此，钱端升认为，“监察院之失败，与其归罪于监察委员之失职，毋宁归罪于制度之不良。民权不立，则监察院绝不能行使监察之权”。

那么，退一步说，监察院是否应该撤销？钱端升未置可否。站在五权宪法角度，五权未成，监察、考试等均得撤销；而站在政治稳定角度，废两院必起政潮，不如暂且存之。但在这种悖论中，钱端升提出，监委不能不自明其身份，接受中央政治会议的绝对领导；而于工作重心上则以审计工作为努力方向，弹劾事宜则由协助行政、司法机关之精神，既不聊博虚名，更不存心捣乱。钱端升概括地指出：“在五权宪法未成立以前，监委本无实行监察权之可能。故与其滥行弹劾而自堕信用，尚不如脚踏实地，而做些实在之工作为愈也。”

——钱端升：《监察院与监察权》，载《益世报》1934年7月21日，第1版。

7月2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会考结果与中等教育》。

该文借各地会考成绩揭晓之际，纵论会考机制问题。钱端升勉励当局，对于考试的功用，尤其是其局限，应该有清楚的认识，更不可因为会考的风行，诱导各校以预备会考为教学教育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教育行政机构应结合考试与视察两种方法来考核相关学校；另外，会考的技术层面尤其是命题

方面，应该力求改进，教育当局更不应以严峻考核或者不及格学生数量作为衡量办教育者认真与否的指标。钱端升进一步言之，会考结果的落花流水，也揭穿了中学教育的骗局，尤其是中学师资的不良与不专心，“教员不以教育为事业，这是中等教育的致命伤”。作为对策，钱端升建议教育行政当局除了会考之外，更应抓好中学师资的配备，严订中学教员检定法规，而在积极方面则保障中学教员生活，提高中学教员的地位，“使有志教育者，得以中等教育，为其终身事业”。

——钱端升：《会考结果与中等教育》，载《益世报》1934年7月22日，第1版。

7月2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海军预备会议的停顿》。

该文借海军军缩会议预备会议的开开停停，分析各国的诉求与目标。钱端升认为，海军军缩会议能否开成，取决于日本能否放弃其独霸太平洋的野心，尤其取决于英美能否联合起来促醒日本放弃其非分之想。

——钱端升：《海军预备会议的停顿》，载《益世报》1934年7月23日，第1版。

7月2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上海市政公债之畅销》。

该文评论上海新近发行市政建设公债而在半日之内被抢购一空之事。钱端升指出，上海市政公债畅销的原因有二：第一，上海市政公债的信用可靠，条件优越；第二，内地经济崩溃，内地资本流向上海等大都市，但正当投资之途拥堵不堪。职是之故，钱端升闻上海市政公债之畅销，而“惊心于都市资金之拥塞，工业希望之几微，而对于中国经济前途抱莫大悲观也”。

——钱端升：《上海市政公债之畅销》，载《益世报》1934年7月24日，第1版。

7月2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职业运动大同盟》。

该文评论北平各大学毕业生所组织的“职业运动大同盟”及向教育部请愿时提出的四点意见：第一，设青年职业介绍机关；第二，扩大“中央研究院”，使得青年有深造机会；第三，合理统制未来教育人才，供需结合；第四，设法录用现在的毕业青年。鉴于前两点无关宏旨，钱端升重点对第三、四点作了展开论述。

就各机关录用大学毕业生之提议，钱端升举双手赞成，他认为：第一，大学生固然有陈义甚高等弊端，但较既未受过新式教育、又无专门技术的大部分公务员，还是高下立见，“中国如果要进步，要具备一个近代国家的资格，各机关再不能不广用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人”。第二，古今中外的经验都已经证明，考试制度是最好的选拔人才的方式，而考试院工作不力，实在对国家不起。第三，在考试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当口，教育部、交通部等可先尽可能组织考试招录大学生。而对于教育统制本身，钱端升表示这是向来所提倡的，但难处在于政府权力不够充厚，由于全国尚未统一，中央权力亦不能达到各地。

——钱端升：《职业运动大同盟》，载《益世报》1934年7月25日，第1版。

7月2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荣氏棉纱面粉事业之善后》。

该文评介荣氏棉纱面粉事业俱极为拮据时请政府接济事宜。钱端升分析了荣氏事业萧条之根源，即在于盲目扩张、大肆举债、市场波动、不思改良等。钱端升指出，此时政府如以公债形式援助荣氏事业，则需要附加严苛的条件：第一，荣氏事业应将旧债大为削减，为复苏创造机会，这涉及荣氏与金融机构对各自损失的接受程度；第二，荣氏事业应缩小范围，过于老旧及

效率不高的工厂应立即停办或者缩减，而牵涉的劳资问题比较棘手，政府如援助，应以债权人身份妥善处理；第三，荣氏方面应整顿设备，改良技术及产品，以适应国内市场，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第四，政府方面应利用关税，酌情保护，减轻捐税。除此之外，钱端升还建议政府应为任何工业的援助及援助办法制定标准。

——钱端升：《荣氏棉纱面粉事业之善后》，载《益世报》1934年7月26日，第1版。

7月27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所谓大连会议》。

该文分析大连会议之前因后果。钱端升表示，尽管反对华北外交由地方主导，但此次会议参与方已表明此次交涉还将有地方主导，而其所讨论的问题不外乎三类：第一，中方要求日方履行之事件；第二，塘沽协定之取消；第三，日方要求中方履行之事情。而进一步细言之，中方应向日方要求之事甚多，日本越不遵守塘沽协定，中国所应要求之事则越多。钱端升指出，因国势不振，凡此种俱不能算是要求，“我如国势稍振者皆可单独执行，初不必征日方之同意。徒以国势微弱，而负责者又每事迁就，遂不得不婉转向日本求情矣”。而平沈通车以来，取消塘沽协定之说甚嚣尘上，钱端升指出，塘沽协定丧权辱国甚大，日本方面获得的长城线及停战区域无中国军队为其核心，其用心不在停战，因为华北的中国军队早已无作战能力及意志，日本所要求者则在使中国对日本之侵略行为点首承认，并使得中国难于在停战区域内行使主权，因此，“向日方要求取消停战协定盖不啻与虎谋皮，虽三尺竖子亦知其不可”。而对于日方所要求中方之事，官方讳莫如深，钱端升亦只好陈列耳闻信息，但坚信大连谈判席上日本对传言中的全部或者部分，“必持之甚坚，主之甚烈”。在这种艰难情形下，尤其是日本方面欲壑难填，钱端升认为中国唯一的对策，便是“取消塘沽协定之奢望固不必存，然在日人履行塘沽协定之前，我方固绝无应允日人任何要求之必要。愿折冲者能因

通车涉税之无所获，而非再作进一步之上当也”。

——钱端升：《所谓大连会议》，载《益世报》1934年7月27日，第1版。

7月2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奥总理被刺后》。

该文论奥地利总理多福斯被刺事件对欧洲政局的影响。钱端升前已言及，奥地利尽管地理上为蕞尔小国，但对欧洲的局势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战如此，一战结束后亦如此。而奥地利的立国，对于欧洲各国，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关系影响甚大，此次多福斯被刺事件发生，法国、意大利尤其震惊，各方稍有不慎即可使欧洲形势失控。职是之故，钱端升提议，为爱好和平计，法、意、德都能平心静气，一切出以镇静，一方努力协助多福斯的余党，维持奥地利政局的安定，一方亦严重警告试图作乱者，使此次多福斯被刺事件保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以内。

——钱端升：《奥总理被刺后》，载《益世报》1934年7月28日，第1版。

7月2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军官训练团》。

该文评介庐山军官训练团事宜。钱端升指出，中国军队的不良，不在于数量太少，而在于质量太差；而质量之太差，不在于士兵素质的低下，而在于军器的腐败、给养的不足、教练的缺乏、国家观念的薄弱，当然还有军队长官不配为长官。由此出发，钱端升认为中国军队的改良之道，则必须要从改良军器、充实给养及训练官兵三方面出发。进一步言之，北伐以来中国军队的军器、给养已大为改观，而当务之急则是“淬砺现有士兵的志气，给他们以智识上的修养及道德上的准则”。在这个背景下，蒋介石自去年以来组建的军官训练团，则可以被视为“六七年来蒋氏改良中国军队工作的最重要

的一步”。钱端升进一步建议，当局在训练军官过程中，有两点尤其需要强调：第一，特别注意唤醒受训军官尤其是北方军官的民族意识，“如果军官能充满了民族意识，则军队也自然爱国，自然能有敌忾心”。第二，特别注意使军官熟知时代的需求，亦即“国家处于此时代中所应具有的条件”，“要发展国民经济，则内战、割据以及无为政治均在不容之列”，鉴于军队向为割据及内战的主角，故使军官们知道内战割据祸国殃民，更使他们知道中国未来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则军队将不至于成为进步的阻挠者。对于劳而无功的军民分治，钱端升指出，“与其劳而无功地谋以文人代武人，不如使武人稍知时代之需要；那么国家要迎向前走时，武人可不致在后面拖曳”。

——钱端升：《军官训练团》，载《益世报》1934年7月29日，第1版。

7月30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台湾开了对岸会议以后》。

该文讨论的是台闽问题。新闻的背景是7月中旬以“领事官会议”名义在基隆召开的“对岸会议”，所讨论的重点内容则是日本在闽粤的所有活动，——日本人、台湾人及各类汉奸在福建本来就已无法无天，除了各类商业活动外，在政治上、军事上俱蠢蠢欲动，而在文化生活上亦把赌博、鸦片、妓女等各类东西带到福建。钱端升认为此次对岸会议的召开，已公开的议决案甚多，而未公开的更不知凡几，国人及当局不能不有所警惕。钱端升认为，政府方面的应对之道有两点：第一，不轻易许诺，更不大献殷勤；第二，改进厦门、福州等地的市政。钱端升希望中国当局能够因日人的积极，而有所作为，思图自救。

——钱端升：《台湾开了对岸会议以后》，载《益世报》1934年7月30日，第1版。

7月3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再论安定政局》。

该文承7月17日《安定政局》，继续讨论政局安定问题。钱端升重申，当务之急在于完成“剿匪”工作，实现真正统一，安抚流亡人民，增厚国民实力，建设自卫军备，进而维持中国的独立，无论世界大战是否在近期爆发，中国都应尽早准备。在这种背景下，“凡是认定这目标而去做者，我们均应予以赞助，蔑视这目标而只顾私利者，我们均应斥责”，“我们对于现政府的设施未必能事事赞同，而现政府的主要领袖亦非全人，然而我们赞助拥护的热诚初不减低者，正因他们对于救国的目标看得甚清楚，而他们也最能努力求该项目的实现——虽则他们的办法有时也甚多可以商酌之点”。而细言之，钱端升从两个方面提出意见：从国人方面，应尽力避免门户之见，以全力拥护执政的领袖，使“剿匪”、建设、整军、经武等工作均有较敏捷的成功，“当局的设施纵不免有可以批评之处，批评的目的仍不容稍含恶意，更不应以破坏安定、攫取政权为批评的目的”；从当局方面，也应扩大胸襟，容纳批评，“中国为未上轨道的国家，一切章制尚未具备，即具备亦未能完全实行。为政者自应竭诚欢迎批评，不稍存批评必有恶意之心。如果无人批评，则日积月累，鲜有不酿成重大错误，甚或激起反感者”。在这两个前提下，钱端升进一步建议中枢政治做如下改进：第一，行政院应本着充实内部的目标有所改组，人尽其职；第二，行政院经改组后，实力亦应有所增加，一切行政之权均应集中于行政院；第三，蒋介石应常驻南京，常常出席中央政治会议，使一切政治自然推行。钱端升总结说：“我们所希望者，即政局能安定，行政能锐进，而自卫的能力能早日具备。国人固不应妄思变动，但政府也应虚衷受谏，力图自振。”

——钱端升：《再论安定政局》，载《益世报》1934年7月31日，第1版。

7月

专著《法国的政府》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

目录如下：

- 一、宪法及宪法史。
- 二、政党。
- 三、总统。
- 四、内阁及中央行政组织。
- 五、参议院。
- 六、众议院。
- 七、国会职权的行使。
- 八、法律及法院。
- 九、地方政府及属地政府。

——见钱端升：《法国的政府》，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8月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奥大利问题的演化》。

该文再次论及奥地利前总理多福斯被刺之后的欧洲政局。钱端升重申，多福斯遇刺后，如果现在的政府勉强维持，新首脑的色彩政策与旧政府相比并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则多福斯之死就不会危及欧洲和平，“多福斯虽死，政府的色彩则未变，故谓新阁即旧阁的继续”。而就下一步形势言，钱端升认为意大利将试图使奥地利法西斯化，而希特勒将试图使奥地利希特勒化，而奥地利当局惟有维持奥地利政局，一方面取缔国社党的暴动，另一方面则限制内卫军，防止其法西斯化；英法等国维持奥地利独立的诺言也应落在实处。

——钱端升：《奥大利问题的演化》，载《益世报》1934年8月1日，第1版。

8月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撙节公帑以救灾难》。

该文再论赈灾问题。钱端升指出，对于救灾，所能做的无非统制粮食、

借钱给农民、减免田赋、防止疫病等，这方面部分工作已着手。但进一步而言，救灾还应要求政府一方面减少消耗，另一方面停止一切不急的土木工事及建设事业，进而举所有财力以救灾。对此减少消耗及停止不急之事，钱端升提出如下几点：第一，宴会及庆典应停止；第二，一切出洋考察费用，除非考察与外交或国防有关；第三，政府公署的建筑应停止；第四，与国防及治安无关，而又不是可以直接推动生产的建设事业，可以先行搁置。除了政府方面，钱端升指出社会层面亦应节约，迎神、求雨等最不经济的消耗均应停止，政府既可强令民众节约，公众自身亦应力求节俭。

——钱端升：《撙节公帑以救灾难》，载《益世报》1934年8月2日，第1版。

8月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悼兴登堡总统》。

该文专门悼念新近谢世的德国总统兴登堡。钱端升指出，兴登堡之所以大得人心，主要在于其爱国无他、见识远大以及大公无私，能够俯顺大势，无偏无私。钱端升认为，国社党与希特勒之所以未放弃和平，在德国未能再兴风波，兴登堡之顾全大局实有重要功劳。而兴登堡逝世后，希特勒出任总统，对德国政局的消极影响将逐步显现，“兴登堡如在，当可较易维持大局，使无大乱。今既无兴登堡，则政变来时，德国大局便毫无把握。此则我人于痛国际和平少一支持之余，尤不能不为德人悲者也”。

——钱端升：《悼兴登堡总统》，载《益世报》1934年8月3日，第1版。

8月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统制教育与职业运动》。

该文系钱端升大学毕业生系列社论之第5篇，其他4篇分别为：6月22日的《告大专毕业生》、6月25日的《大学毕业生出路问题》、6月30日的

《中学生的出路》及7月25日的《职业运动大同盟》。该社论再次围绕该问题而展开。钱端升开篇即指出，大专毕业生的出路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这个问题自身不可能单独解决，最根本的方法则要去统制经济中寻找，“如果国民经济生活能有统制，则失业问题根本可不存在”。钱端升认为，经济统制问题解决后，则需要解决教育统制，“如果人才的培植悉依需要为尺度，则供过于求的现象应不发生”。

而就统制教育与学生职业问题，钱端升在表明观点前先做了两点声明：第一，他并不认为教育统制的时机已经成熟，只是先提倡，由政府分地区分批次实施；第二，统制教育尽管可以帮助解决学生求职问题，但其根本目标则在于增进民族的智识及生产能力。

而在这两个大前提下，钱端升则提出，统制教育的范围极其广大，原则上今后的教育应分为国民教育、技能教育与学人教育。就国民教育而言，国民教育是指全体国民所应受的最低限度的教育，受过以后才可以成为健全国民；而要发展国民教育，一方面要培养师资，另一方面则是保障经费，钱端升建议未来国民教育的经费不少于军费的三分之一。而就技能教育而言，则重在技能训练，“如果教育真正发达，则全体国民，除了少数学人以外，应令全有技能，军人及妇女也不是例外。如果人人有一专技，则民族自然会走向光荣的途上”。技能教育应该通盘筹划，今后应将大学之外的所有学校都称为技能学校。就学人教育而言，钱端升认为该种教育应无职业性，完全为研究性，“大学应为完全研究学问的地方，而不是造就专门人才的地方”。大学性质改变后，即可以减少大学数目，消除各类野鸡大学的生存空间。

而就上述言之，钱端升亦指出，统制教育将可以使得以前“学而优则仕”的劣等心理自然消灭，学人能够安于研究学问、教授学问，而有技能者则分任包括政府机关在内的各类职务，有政治能力者人人皆可为之。钱端升认为惟有如此，中国才会成为近代国家。这绝非易事，政府方面可以从训练国民教育师资、改良大学性质及计划技能教育的系统化三方面着手。

——钱端升：《统制教育与职业运动》，载《益世报》1934年8月4日，

第1版。

8月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愿国人注意民族健康》。

这篇社论一方面欣喜于体育产业的发达、体育文化之传播，而另一方面则痛惜于中华民族之积弱。在钱端升看来，中华民族之积弱，原因大抵有四个方面：风尚文弱、缺乏营业、摄生不善及毒物戕害。钱端升表示，体育进步固然值得欣喜，但国人如图救国，政府如图救国，均应秉持欲救国家、先救民族这个信念，只有共同努力，才能廓清有害于民族健康的重重障碍。

——钱端升：《愿国人注意民族健康》，载《益世报》1934年8月5日，第1版。

8月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广九铁路修约及其重要性》。

这篇社论及中英之间围绕港九铁路所产生的交涉。钱端升认为，从港口的角度，如广州黄埔能加以整顿，各方面都将远胜于九龙，无需广九铁路，即能成为华南重要的出海口。而广九铁路如果不能和粤汉铁路联通，则仅为短程客运铁路，发展空间有限；如广九铁路与粤汉铁路联运后，如果黄浦港口不加疏浚，则九龙将完全成为华南出海口，“广州及华南之繁荣，不独将来无望，即现在地位亦难维护”。职是之故，钱端升提醒政府方面，切勿因为借英国庚款完成粤汉铁路及广九铁路加赠成数等小恩小惠，而忽略联运之重要，更不要认为联运仅是技术问题，而忽略华南政治经济的百年大计。至于广九铁路修约的文本，钱端升认为政府方面更应尽早公布，“备社会人士之研讨”。

——钱端升：《广九铁路修约及其重要性》，载《益世报》1934年8月6日，第1版。

8月7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农村合作事业》。

该社论再次论及推行农村合作事业的观点。类似的观点钱端升在《益世报》以往各期的社论中，曾不止一次地论及。钱端升认为，合作运动的本质是免除商人阶层的中间环节，而使生产者与生产者、生产者与消费者、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发生直接联系，共同合作、共同担负一切利害。在这个背景下，农村合作则不过是合作运动的支流。但尽管如此，农村合作依然举步维艰，即便发达国家的农村合作，也多集中于消费合作和信用合作。职是之故，钱端升建议在中国亦从推动农村信用借贷合作为起点，一方面能稍微舒缓农民阶级的经济压迫，另一方面则为推动农村合作事业的深化而积累经验。钱端升指出，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资金，因为缺乏资金，借贷利率便节节攀高，而大城市里的金融机构则远离农村，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个人与其他金融机构发生债务关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构思中的农民合作组织，则“联合就地勤恳的农民，成为一个团体，再以团体的名义与团体的信用，向金融机关借款，分贷于需要资金之团员。只要团体的组织健全，借款的用途正当，信用合作的确可以打破农村高利贷的制度，而局部的解决农村的经济问题”。钱端升亦谆谆告诫当局，在农村信用合作构建中，需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办事人需要有服务精神，不可使合作机关官场化；第二，办事手续必须严格依照商业原理，以免合作基础动摇；第三，合作社最终的目的是农民自办，故要千方百计养成农民自办的能力。

——钱端升：《农村合作事业》，载《益世报》1934年8月7日，第1版。

8月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考试制度之推行》。

该社论由大专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切入到考试制度之推行，钱端升认为，“既国家官吏悉由考试而来，亦绝不能使无业之毕业生者尽有位置。然考试制度能多实行一分，失业学生亦决可多减少几个，此我人所敢断言者”。钱端升进一步分析了孙中山五权宪法下考试权的原意，进而指出，“际此考

试制官方在萌芽之时，一切应求近易”，既应发扬孙中山设置考试制度的价值，也应优先安排可行的考试往下推进。钱端升认为，考试院成立四年多来，花费甚多，但成效有限，理应被责备；但考政萧条，又不能全怪考试院，其他各用人机关对考试精神之尊重、对贤能之举任等均成问题。钱端升更进一步申言，推行考试制度，必须明了考试的意义，——今天的考试制度与古代的科举制度有天壤之别，在古代，科举是知识分子唯一出路，也是皇家笼络人才的唯一途径，而今天考试则只是用人的一种制度，“应出以凡常，初不必故为诡譎，视同法事……手续愈平易，则举办愈不难，而考试愈可望普遍”。另外，钱端升还指出，考政之不兴，各用人单位应反思并改进，“用人经考试者在中央究为极不普遍之习惯，而在地方更不多见。我人之意，以为用人单位第一应负责淘汰最不胜任之旧吏，逢有用人之必要时，如考试院所考录之人员合用则用之，不合则单独举行考试，至少应出以公开之荐举”。钱端升认为，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服务于政府机关的大学生亦大为增加，但数量依然极为有限，“是以欲求政治之进步，则各机关非每岁登庸大批新人不为功。苟能从我之言，一方淘汰一部分最不称职之旧人，一方从考试中引用新进，则少减于大专毕业生之失业者外，尚可大有助于政治之刷新也”。

——钱端升：《考试制度之推行》，载《益世报》1934年8月9日，第1版。

8月10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战区之整理》。

该文分析了战区之病源，钱端升认为这是整理战区的第一步。而在钱端升看来，战区民智闭塞、民力穷困及按照《塘沽协定》不得驻兵等问题，一时三刻难以解决，而明显但又有望解决的问题则包括：

第一，战区权力极不统一。这种不统一既由于日伪捣鬼，更主要由于中国政治组织之不健全。钱端升建议，外交大计归于中央，琐事交涉付诸地方官吏，故应取消负责战区外交事务的督察专员，而改设交涉专员，改隶属于

政务整理委员会；政务整理委员会绝对不能治理战区，亦不得直接干涉战区内政，否则会人为造成河北与战区的分裂，“不啻自认战区为特殊区域，不啻自坠日人之计”。第二，战区保安力量极为不足，新编之特种警察应及早入驻。第三，战区地方官吏精通日语但胆小怕事。钱端升指出，战区18县县长中，有10人有日本留学经历，其余亦精通英语，但钱端升强调，“夫通晓日语本一佳话，通晓日事，更属优点；但对日交涉初不因能说日语而可占便宜，为政则更与日语无关。战区任官者贵在能据理力争，不闹事，亦不让步”。钱端升建议当局，无论是河北省政府还是政务整理委员会，都应“以勇于负责不怕事及治民能力为取材之标准，通日语与否可不问也”。第四，战区浪人及汉奸太多，相依为命，狼狈为奸，当局应“不露声色，严法以绳，亦只有增其敬我、畏我之心，绝不致因此而招其兵戎。如能将浪人尽数驱逐，则更是计之得者”。钱端升认为，上述四事是战区整理的急务，而修建马路、铺设电话、改进行政、减轻赋税等，都是有利之图，以此于5月20日社论《战区的内政外交》遥相呼应。

——钱端升：《战区之整理》，载《益世报》1934年8月10日，第1版。

8月1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大学毕业生之失望与失业》。

该文写于国内各大学招考新生的热潮泛滥之际。钱端升在文中概括，中学生毕业之后之所以还要上大学，不外乎五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家里主张；第二，目前中学教育仅为高等教育之预备，本身难以独立成段，不升学与半途而废毫无二致；第三，青年自身视大学毕业为最佳“出路”；第四，青年视大学教育为服务国家社会之训练；第五，青年视大学为增进知识、研究学术之唯一机关。而这五个原因，归纳起来不外乎图自身名利、对社会热心及对学术之兴趣三类。钱端升指出中学毕业生少年气盛，富于进取心本是好事，但还需要为这些中学毕业生进一言：大学教育非解决青年出路问题之

唯一途径，今日之极大希望在他日很容易变成极大失望。正如8月4日社论所言，大学仅为从事“学人教育”的机构，故视大学为求取功名的途径或想练就一身经世致用的技能，恐怕无论文理，最终都难逃失望。

钱端升更勉励中学生切勿视大学为青年可靠的出路，理由如下：第一，社会及政治均未上轨道，用人尚不可能人尽其才；第二，历年大学毕业人数渐多，用人机关却用人极少；第三，大学毕业生大多“抱负不凡”，但眼高手低，不愿屈就，最终辗转延误，不得其所；第四，高材生中不乏天纵之才，但毕业后除非继续从事学术工作，否则难有出路；第五，大学毕业之“门户”不高，缺少奥援，进而觉得怀才不遇；第六，学生所肄业之学校本非上选，或因求学时代之懈怠，难以毕业。以上种种，都会促成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钱端升认为：“青年苟视大学为立功名或谋衣食之途径，则其求学之眼光，略近于商人之贸易。贸易可赢可亏，则于大学中求出路者亦无完全之理。”钱端升指出，这些陈说纵然难免消极，但“就全国情形观之，此种逆耳之言，或于青年进退取舍之间不无小补也”。

——钱端升：《大学毕业生之失望与失业》，载《益世报》1934年8月11日，第1版。

8月1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论生产教育》。

该文针对社会上风行一时的“生产教育”口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钱端升认为，民生凋敝，提倡生产是当务之急，教育为生产服务，也算合理，但务必认识清楚，“教育不能直接生产，生产亦非教育之全部”，社会舆论更不能以学校不专授生产技术而苛责学校。对于生产与教育之间关系，钱端升认为，“有生产教育，不必即能有生产事业；有生产事业，则生产教育，必然兴起”。囿于教育部对理、工、农、医诸多专业的鼓励，社会上弃文从理风气兴盛，对此钱端升指出如下两点：第一，理、工、农、医教育贵在班小课严，实验勤谨，而各大学理、工、农、医学生陡增数千，设备不足，教授

乏人，“不幸而理工医农之教育，亦专靠书本，则生产教育之前途危矣”。第二，各省会考表明中学成绩数理最差，而大学招考时则理工报名人数最多，这种现象只会导致理工学生竭力招录，而学生则亦削足适履，以合时尚，最终只会导致滥竽充数的教育，“生产教育之促进，不在某某科目之鼓励，某某科目之限制；有充实之设备，相当之师资，则生产教育，自有效果，无充实之设备，相当之师资，则生产教育，将为画饼，为口头禅，为书本上的故事矣”。

——钱端升：《论生产教育》，载《益世报》1934年8月12日，第1版。

8月1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美国宣布白银国有》。

该文评述美国财政部于8月12日宣布白银收归国有政策的来龙去脉。钱端升指出，白银问题在美国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美国为世界主要产银国，而产银州的参议院在美国政坛呼风唤雨之能力尤为强劲；而从罗斯福新政的角度而言，白银收归国有政策是罗斯福新政促进通货膨胀、刺激物价上涨并助推经济振兴的主要举措，其心理效果更大于实际效果；至于白银收归国有对国际白银市场的影响，尤其是全球白银会不会尽数流入美国，则完全取决于美国政府执行此政策的决心和力度。钱端升最终落笔于中国，指出中国白银近期出口惊人，表面原因是贸易失衡，而根本原因则是美国白银政策的改弦更张；由于中国采用银本位制，在看得见的将来，无疑影响会更深，但“国人过去之患，在头痛医头，足痛医足，痛患稍减，辄复淡忘”，钱端升论及数月以来中国对美国白银政策改革的盲目应对，“深引以为痛也”。

——钱端升：《美国宣布白银国有》，载《益世报》1934年8月13日，第1版。

8月1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论所谓既定的对日方针》。

该文盘点了近半年来政府的对日方针。而这种盘点的背景则是半年来政府的对日方针极少宣布，而偶尔所宣布者不外“不变既定方针”之类的套话。钱端升对政府的对日方针并提供建议如下：第一，对伪满洲国事宜搁置不提。钱端升认为，这为政府过去的设施，已不容作出相反的主张，但在将来伪满洲国或者日本有新的侵略行为时，依然应该严正抗议，并庄严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不信空言可以救得东北，但为表示我们不忘东北，且也不容日本长占东北起见，应时的空言仍不可少”。第二，对华北情势但求相安无事，为达目的可以放弃若干在感情上不应放弃的立场。钱端升认为，对此唯一的出路是整饬内部，统一华北各省，“听命中央、据理力争”，使得“关于一切的悬案，尽可按照国际公法及中日条约而力争，尽可不必因关东军的强横及浪人的滋扰而有所畏忌”，由此力保主权，遇事不屈，对外保国格、起尊严，对内树立楷模。第三，对日的经济让步视日本方面要求强烈与否而定，缺乏统一方针。对此，钱端升提出两种办法：可以预先划出可以让步的范围，进而在让步的范围内外决定允诺还是拒绝，或者亦可以经济让步换取对方的经济让步。第四，对日本取“极意和谐”的态度。对此，钱端升认为必须多论，“日本真欲求相安，和谐亦未尝不可，但不必过分”。第五，停止一切可能会招致日本忌恨的国际交往。钱端升认为此大可不必，“国际风云变化最快，此时若自行摈斥于国际集团之外，则大难到头之日，必将悔亦无及”。

除了对上述五点对日政策基本方略逐条臧否外，钱端升亦有两点建议：第一，庐山会议拟就既定的对日方针发表宣言，宣言可以空泛，但“在骨子里，政府万不可离开了不卑不亢的立场”；第二，实行政策与决定政策同样重要，“如果决定政策者有过一番苦心与孤诣，而实行政策者却马虎了事，或竟任意增损，则其结果鲜有不背决定政策人的原意者”。职是之故，“我们希望对日政策既有正确的决定之后，更继以忠实的执行”。

——钱端升：《论所谓既定的对日方针》，载《益世报》1934年8月14日，第1版。

8月1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关于宪法草案的根本问题》。

该文从国民大会的一再推迟，论及宪法颁布的时机问题。钱端升认为，宪法起草问题背后的根本问题，是中国“此时”究竟应不应该有宪法的问题。钱端升的结论很明确：“中国此时尚不需要宪法，也不宜有宪法，且不能有宪法。”当然，这里的“宪法”是指保障民权、限制国权的民主宪法，“如果宪法是早令可以夕改的法律，或是三章约法式的文件，那当然另当别论”。钱端升提出，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宪法，而是安定的政局、统一的国民意志和有利的政府，“我们要靠着政府以增加民族的经济力量，并以恢复民族的地位。如果有安定的政局，则表面上的统一是不难期的”。在这种背景下，钱端升提出，要真正的统一，尤其是国民意志的统一，政府内部既需要自行改善，更需要做几件可以收拾人心的大事。钱端升认为，正是因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宪法，故宪法“实在是并不需要”，“宪法不特不能帮助现在的政府走上那条路线，或产生可以走那条路线的政府，而且适足以引起种种不应有的纠纷”。钱端升提出，“吾人以为没有宪法则已，有宪法则不能不提倡民权。如真提倡民权，则中国一班的人民又未具有行使民权的能力。给予民权徒然形成一切的虚假，并产生一切废法、违法的事件而已。所以宪法非特不需要，且也不宜有，不能有”。钱端升更进一步表示，在当时的中国，不但宪法无用，就连国民参政会一类的机关也不需要、不宜有，“如果参政会是民选，则人民无选举的能力。如果参政会是官派，则又何贵乎有它？如果说由职业团体选举，则职业团体的组织至今仍未健全……”钱端升在结论中重申，“我们觉得在今日的中国，根本不必谈到宪法或民权。我们应先协助现政府使统一国民的意志”。

——钱端升：《关于宪法草案的根本问题》，载《益世报》1934年8月15日，第1版。

8月1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日苏冲突的尖锐化》。

该文分析了日苏关系的演化趋势。钱端升指出，日本的侵略野心是独霸东亚大陆，相邻国家无论强弱自必不安，强者积极布防，弱者吞声饮泣，苏联即属于前者。在这种情况下，日苏关系的恶化将难以避免。不过苏联亦准备就绪，除将西伯利亚铁路变成双轨外，亦在赤塔各地经营国防工业，同时利用空军使海参崴成为重镇，使日本觊觎西伯利亚的机会大为降低。而在这种大背景下，东铁出卖问题无关紧要，仅可作为观察日苏关系的晴雨表，日本以破坏满洲国治安名义逮捕苏联籍东铁员工 29 名，则成为两国角力的最新平台。

——钱端升：《日苏冲突的尖锐化》，载《益世报》1934 年 8 月 18 日，第 1 版。

8 月 19 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海会声中之军备战》。

该文从海军会议预备会之几近破裂落笔，纵论国际形势。作者得出结论，鉴于各国都在默不作声扩军备战，和平难保之局势已比较明朗，但战争爆发的时机早晚则尚难以推测；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各列强都在磨刀霍霍。钱端升感叹，中国为太平洋争霸问题的核心，但国贫民弱，竟然未有参加海军会议预备会的资格；而眼前强邻稍事偃旗息鼓，国内苟安空气又起。钱端升特别提醒，在世界列强逐鹿的过程中，日本的重心暂时已不在中国，而在列强，因为日本早在九·一八之后就明了，日本称霸东亚不取决于中国，而取决于列强。在这种背景下，钱端升认为中国应利用短暂的和平，而为将来的剧变做好准备，“假使乔治乐观之论，幸而言中，则十年之中自强机会正多，万不可因循错过，自陷于永无兴复之地”。

——钱端升：《海会声中之军备战》，载《益世报》1934 年 8 月 19 日，第 1 版。

8 月 20 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外国一致提高日货关税》。

该文评述各国一致针对日货的泛滥而提高关税之近况。钱端升分析认为，1929年之后世界经济普遍陷入萧条之中，通货紧缩，民众消费能力降低，而日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其物美价廉抢占市场；而日本放弃金本位造成日元贬值，更是造成日货价格的下降，间接助成日货的风行。钱端升认为，世界各国不约而同提高关税，限制日货，只会刺激日本采取更激烈的方式来蚕食各国市场，经济冲突极有可能成为战事的导火索。在这种背景下，日货在全球越受排挤，则对中国市场的仰赖必将越强烈；而中国经济不兴，底层大众事实上亦需要物美价廉的日货，“我们于观察各帝国主义经济冲突之余，对于我们自己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不禁悲痛随之”。

——钱端升：《外国一致提高日货关税》，载《益世报》1934年8月20日，第1版。

8月21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德国的总投票》。

该文评论希特勒通过全民公决而集总统与总理于一身之事。尽管国社党宣传甚力，戈林、希特勒甚至兴登堡总统的后人们等先后发表演说为其站台，但投票人数比以往投票仍然少了150万，而赞成票率则从92.1%下降到89.9%，反对票率则从7.9%上升到10.1%，钱端升认为这确实属于希特勒“胜利中的失败”。钱端升进一步申言，按照德国宪法，总统制绝非名义元首，而是负有实际的政治责任；希特勒公投成功后，事实上在德国废掉总统制、建立独裁制度了。而从独裁制度建立的角度来说，钱端升指出：“独裁制所要的民众拥护比与普通实行议会制度的国家所要的民众拥护，还要更进一步。独裁制不但要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并且要全体民众的拥护。借这种拥护，独裁者便可独断专行。”而为了达到全体民众的拥护，独裁者除了消灭一切的反对势力外，更要全体人民出来投票，“德国人民的选举权事实上已经由一种权利而变成一种义务”。钱端升指出，在此次投票中，有700万人反对希特勒，其中200万人拒绝投票，400余万人投反对票，而100万

人则投废票，“经这样的宣传，这样的威胁，而不赞成者仍如此之多，这诚是希特勒誉望消灭的一证”。钱端升认为，既然希特勒已成为德国唯一的元首，那么他“只有负起全副的责任，力图改良德国内部的经济状况，才能得到人民的真正拥戴。如果狃于去年十一月的较大成功，而以为唯强硬外交可以保地位，则直接结果固将陷全世界于不安，但间接亦终将毁了他自己，毁了国社党”。钱端升真乃预言家也！

——钱端升：《德国的总投票》，载《益世报》1934年8月21日，第1版。

8月22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政治设施应从切实简单着手》。

该文从邵元冲在总理纪念周发言中提及的“政治设施应从切实简单着手”而引申开来。钱端升提出如下六方面的观点：第一，眼下的政治设施消极的比积极的更重要，肃清匪患、保障治安、防疫救灾等消极的政治设施，压过了兴办教育、从事建设等积极的政治设施。第二，对于消极的政治设施，当局者应抱着除恶务尽的态度，未雨绸缪，认真落实，不可因循敷衍、彼此推诿。第三，消极设施应求切实，但不能简单，“应行办理者必须办理，无所谓简单，也无所谓繁难”；而积极的设施则应从切实简单着手，量力而行。第四，简单即等于择要，应挑选几件最重要的事情，合理计划，集中财力、物力先予办理。第五，鉴于财力、人力均甚重要，当局则一方面应该开发财源、培植人才，而另一方面则应爱惜财力、爱惜人才。第六，积极事业多为新事物，新事物需要新人才，故为爱惜人才计，政府应多方调查、多方罗致新人才，不称职的旧人则应逐步淘汰。

——钱端升：《政治设施应从切实简单着手》，载《益世报》1934年8月22日，第1版。

8月2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贫民法律扶助会》。

该文以青岛律师公会成为“贫民法律扶助会”而展开申述。钱端升本着国家法律分为公法、私法两大部分，行文思路分两大部分：

就公法而言，他认识到“完全的法治国家本应具备一切法律，也应实行一切法律”，但就国内状况及人民修养而言，钱端升认为倡言公法方面的法治是“瞎唱高调”，“民国二十余年来没有一个宪法或约法能实行，没有一年度能实行预算法，审计、弹劾或陈诉等法也没有一个能生效力（即使生效，也极微末）。这都是实际政治及人民程度尚不容许公法方面法治的明证。有了法律不能遵守，有了法律任意破坏，还不如少些法律。与其法律详备而不实行，还不如章则简要而可以实行。我们不提倡宪政，不提倡不可能的，曲调太高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方法，并不因为我们不要法治，实因我们重视法治、爱惜法治”。

就私法而言，钱端升认为实行法治“绝对无可通融，我们不能因迁就实际政治，而将民法、商法也迁就不予严格执行”。钱端升指出，“私法的执行固然多少也受政治的影响，政治清明，私法也易于执行，政治纷乱，私法也难于执行，但私法究竟比公法较可离政治而独立。只消执政者不任用私人为法官，不干涉审判，不断绝法院经费，则无论整体为民主或为独裁，领袖为甲或乙，为文人或为武人，私法仍可依常态而进行。所以我们虽不混统的提倡法治，但私法方面的法治，则我们不敢稍稍放松”。

钱端升进一步申言，囿于私法的专精，律师对于私法法治的实行“所负的责任极为重大”，包龙图公平裁断一切案件的迷信在当今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尽管律师在现代社会如此重要，却不是每个人都能请得起律师，“法律不平等，必引起社会上的反动；贫民如请不起律师，又绝不能获得法律上的平等”，职是之故，钱端升对青岛律师公会设立贫民法律援助会之举大加赞赏，同时殷切期望各地律师公会能够闻风响应，律师们亦能在扶助会中为贫民服务。

——钱端升：《贫民法律扶助会》，载《益世报》1934年8月23日，第1版。

8月2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学会与进步》。

本文由近来之各学会召开年会热起笔，论及学会繁荣与国家学术繁荣之间的关系，“大概一国的学会越是众多，历史越是长久，活动越是有力量，则它的学术也越是发达。”钱端升借助学会在西方各国的发展史，斥中国传统的书院为死亡的，而学会所代表者为生，进而提出中国各学会注意如下事项：第一，学会的目的在于纠合同行，共同研究，讨论发明，“学术的空气自以越浓厚为越好，学会不患世人不知道，而患本身无成绩。所以出版固是重要，但必须有值得出版的东西；如为出版而出版，则未免多此一举。年会或讨论会也是应开，但必须有讨论的问题，如为开会而开会，则也未能免俗”。第二，大多数学会与国家经济建设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故各学会应该秉持“学以致用”之说，注意各种学问的实用，请他们常常想到各种实际的问题，“现在报纸上常看见的某种或某种计划大都不由专家草拟，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第三，政治及经济建设及专门学问俱有不可分的关系，“专门学者对于官吏也用不到另眼相看，更用不到引以为荣”。由上述诸端，钱端升循循善诱诸学会“埋头上进，不要忘了它们与未来社会的关系，但也不要太关心于目前的虚荣。社会已知重视学会，愿学会也要不负社会的重视”。

——钱端升：《学会与进步》，载《益世报》1934年8月25日，第1版。

8月26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五全大会与其使命》。

本文论及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集一再因西南的反对而展期事宜。钱端升提出，愿以胡汉民为代表的西南元老们以党的利益为重，而以私人成见为轻；如果继续反对，中央则应依然不顾，而全国舆论也应大加挞伐。而就五全大会的召集问题，钱端升提出，关于政治方面，尤其应以安定

二字为核心议题，“政局须安定，政府可以充实，但不可以大更动。……凡足以掀动政局的提案我们以为最好一概不提。宪法首贵合乎国情。现在的中国既尚无采用宪法的准备，强定的宪法非但不能实行，反而可以扰动政局，则又何贵乎提出制宪议案”。而至于国民大会及国民参政会等一类代表机关，钱端升认为也应以安定二字为标准而讨论其价值，“现在国民所需要这，为太平，为强有力的政府，为对外的准备，而参政权等等则在其次。国民之有参政可能者，如银行家等等，固早已参政。其他人民则即有参政机关，亦不见得能以获选。所以参政机关，即使设立，亦决不能与民治有多少关系，它的正面价值实极微小。但如选举及召集稍不得法，则证据的安定便成问题。故我们实不愿有所鼓吹”。钱端升提出，中央政治当然有改良必要，但改良应以充实人才、增加权力为原则，而不应危及安定。

——钱端升：《五全大会与其使命》，载《益世报》1934年8月26日，第1版。

8月28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日本与海军会议》。

本文承接7月23日社论《海军预备会议的停顿》而写，继续讨论日本对世界各海军国家能否达成军缩条约的重要影响。钱端升指出，日本既害怕讨论国际层面讨论政治问题，亦急于抛弃《华盛顿公约》对日本海军军力和活动范围的限制；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日本担心在独霸东亚的过程中，遭遇美苏联手进攻。钱端升奉劝日本，“黠武绝不是安全的最好保障。将来大战的胜负则不仅靠军力，而也须靠政治上的势力。……与其求海军强，毋庸求政治上多助。惟有移转方针，改向和平，才足以助海军会议的成功，而维持日本长久的安全”。

——钱端升：《日本与海军会议》，载《益世报》1934年8月28日，第1版。

8月29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英自由党与自由主义》。

本文结合英国自由党最近就劳资问题分发小册子，而论及自由党的历史及其在 1931 年之后的分化。钱端升对此小册子颇觉得失望，认为自由党的将来实在不能令人乐观。

——钱端升：《英自由党与自由主义》，载《益世报》1934 年 8 月 29 日，第 1 版。

8 月 30 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救灾与粮食运销局》。

本文为财政部即将筹设粮食运销局为由头，而分别论及粮食统制的必要性、粮食统制的具体步骤等。就粮食统制的步骤，钱端升提出如下几点：第一，要全国有充足的粮食，且不必过剩；第二，既有充足粮食后，应分地储藏，以便流通各地；第三，分储各地后，运销局应随时将粮食自最近的中心运到需要粮食的地方；第四，粮食的价格应十分低廉，承销商只能获得基本的手续费，采办者、主持运销者则应绝对廉洁。

——钱端升：《救灾与粮食运销局》，载《益世报》1934 年 8 月 30 日，第 1 版。

钱端升自天津返，造访胡适。

【钱端升来谈天津《益世报》被剥夺邮权的事。】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 7 卷，联经出版公司 2004 年版，第 138 页。

9 月 2 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工业化之途径》。

本文再次论及工业化的具体途径，该主题事实上已谈论过多次。钱端升提出：第一，中国工业的发展，在短期内不应该有争霸世界的雄心和野心，而应该以满足本国市场需要为主。第二，中国工业化的步骤，空谈发展重工业无意义，应该先致力于发展轻工业。第三，轻工业中最先着手的，应该先

限于中国的天然物产及传统的具有技能优势的领域。第四，任何国家的工业不可能单独发达，政治腐败、人民破产及社会黑暗都是工业化的大忌，应该特别加以注意。

——钱端升：《工业化之途径》，载《益世报》1934年9月2日，第1版。

9月3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日本与东亚战机》。

本文由日苏关系的恶化展开，重申日本问题。钱端升断定，就眼前的形势而论，亚洲开战的可能性要比欧洲大，而亚洲如果开战，日本将负有最大的甚至是完全的责任。这是因为日本有三大敌：苏联、美国和中国。囿于中国国势衰微，短期内不足为日本之患；而日本、苏联接壤数千里，日本对东西伯利亚又是磨刀霍霍，且苏联在北满与日本亦有利益冲突，故日苏冲突在所难免；日本与英国关系向好，而日美间则处处冲突。这样下来，日本既要征服中国，又要击退苏联，还得防备美国，于是日本便成了世界上最穷兵黩武的国家。钱端升断定，“日本的干法将使东亚大战迟早无可避免。现在保障和平的方法不是日本人民自己觉悟，便是美苏等国联合起来对付日本，使它永远地不敢轻于一试。”

——钱端升：《日本与东亚战机》，载《益世报》1934年9月3日，第1版。

9月4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公文式的行政与实在的行政》。

本文论及行政机关的文风：公文式的行政比比皆是，而实实在在的行政则乏善可陈。钱端升提出，在近代国家，大部分行政应为实在行政，而公文式行政应为极小部分了；但实际上，中国大部分行政是公文式行政，任何机关十之八九的职员忙于公文往来，而设计、督察及执行等职员则寥若晨星。

而在钱端升看来，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科举精神，“废除科举虽将近三十年，但科举的精神则仍弥漫于今日的中国。官吏喜等因奉此，咬文嚼字，而很少知道近代政治的实质”。除此之外，中国人之间好说冠冕堂皇的应酬话，上下级之间层层转递，敷衍马虎，亦为行政公文化的原因之一；衙署中新式人物极少，不光同化了志在革除官样文章的新人物，亦促进了公文式行政的盛行。对于上述弊病，钱端升建议：第一，改良公文程式，使之简单化；第二，在法令中明确规定执行人，落实执行责任；第三，政府机关应多用受过新式教育的新人物；第四，行政要有计划、有目的、有办法。

——钱端升：《公文式的行政与实在的行政》，载《益世报》1934年9月4日，第1版。

9月5日

在《益世报》发表社论《招商局的整理改进》。

本文从交通部所辖的邮、电、水航及空航入手，论及航政的改良问题。钱端升指出，交通部所辖四政，航政最难，而且航政很难与官商合办的招商局分清关系。招商局“具有中国官吏及商人的一切劣性，所以便成为一切罪恶的渊藪；效率低到无存，而开销大不可言，且复负债累累，竟止翻不过身来”。钱端升指出，招商局的不易整理主要有三大原因：负债太多、闲员太多及可驶之船太少；故整理招商局，也得从整理债务、裁撤闲人及改进事业三个方面同时入手。

——钱端升：《招商局的整理改进》，载《益世报》1934年9月5日，第1版。

9月

钱端升离开《益世报》主笔职位。

【我到《益世报》本为宣传抗日，因撰写社论笔锋触及对日妥协派，不得不于1934年9月被迫离去。】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6页。

【就写文章而言，较富有政治性的，自然要首推我所主持或负责编辑过的那些日报和期刊。……我还曾一度担任天津《益世报》主笔，专写社论，不编新闻。《益世报》当时是北方两大报之一，罗隆基曾为主笔，由于批评蒋介石而被驱走。后来该报聘我就任“主笔”，并希望我稍变罗隆基的文调，以求“保全日报”。不料后来蒋介石终因我的一篇社论《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南行》大为恼火，并立即勒令邮局对《益世报》停邮，使我在该报呆了八个月写了百七十篇社论后被迫离去。】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7页。

夏红按：笔者对《益世报》文献的掌握，主要依据2006年前后在天津市档案馆复制的情况，部分版面有缺漏，部分日期亦有缺憾。而且当时只复制了1934年1月1日-9月5日的天津《益世报》头版。但钱端升这段自述，值得推敲的地方至少有两点：第一，《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南行》针对的华北对日妥协派，蒋介石为何对此“大为恼火”并“立即”勒令邮局停发《益世报》，存疑。第二，《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南行》发表时间是1934年4月3日，而钱端升被迫辞去“主笔”是在9月，其间《益世报》一直在正常出版，社论版亦是高见迭出。

9月10日

在北平香山完成《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一文。

本文聚焦于1934年的制宪问题，所依据的文本为7月9日立法院发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审查修正案》。作者交代，写作此文最初的目的是批评修正案，但起笔之际，觉得讨论中国现在究竟是否需要立宪、人民是否有实行宪制的能力等，都需要先予答复，而后才能对该修正案有的放矢地批评。鉴于此，本文试图回答如下四个问题：第一，中国现时究竟应不应该

立宪？第二，如果不立宪，那么政府组织法应该如何改善？第三，如果要立宪的话，应该注意哪些原则？第四，宪法草案初稿审查修正案究竟如何？

——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载《东方杂志》1934年10月1日，第31卷第19期，第5-14页。

10月1日

在《东方杂志》发表《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一文。

本文的写作背景已如上述。文章本身共分为如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中国当下应不应该立宪的问题。钱端升从立宪的目的入手讨论此问题，立宪目的在于实现民主政治、奉行民权主义或树立法治局面。

对于从民治角度是否应该立宪，钱端升重申了其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中提出的衡量民治成功与否的五点标准：第一，人民在法律上一概平等；第二，国家权力有限，个人保留部分自由权；第三，人民依照平等原则，选出代议机关；第四，议会有两个以上政党存在，互相监督、轮替执政；第五，政府采取分权制。钱端升进而表示，“上述的民治本不是宜于现代国家的一种制度，……现代的经济民族主义不容国家在生产方面进行迟缓，而通常所谓的民治则不利于高速度与大规模的生产”。钱端升表示，中国要成为现代国家，“万无绕道民治的理由……即使民治宜于中国，中国人民现在也实在没有实行民治的能力。”钱端升特别强调，“成功的民主宪法皆先有民治而后有宪法，先于民治的宪法皆为失败的宪法”，纵然立宪的目的在于民权，但立宪绝不是达到民权目的的正当工具，“正当工具应为安定政局以实施训政”。

那么，从法治角度看，中国在1930年代究竟要不要立宪？钱端升指出，民治与法治大相径庭，民治可以不需要，但对于任何政体，法治都不能没有；当然，法治也绝非一纸宪法可以建立，私法方面的法治中国已不算落后，而公法方面的法治则需要尊重法院的权力、慎选法官方面多花功夫；纵然一纸宪法可以将各机关的组织、职权及关系理顺，但“令法律迁就实施

易，而令实施遵随法律难”。职是之故，钱端升指出，如果要为树立法治而立宪，所立宪法必须切合国情且简明扼要，否则“如果有法而不能实行，不被人所遵守，则离法治更远，不如无法”。

由此种种，不难得出结论，钱端升对于中国在1930年代立宪持十分反对的立场，“这里所说的宪法实不够宪法的资格，而仅是一个或几个组织法，……能简要，能切合国情，不涉理想，也不夸大。为实在起见，我们最好不将他们叫做宪法”。

第二部分讨论政府组织法的改善问题。钱端升认为国民政府现有组织里，中央政治会议、军事委员会和五院的规模等，需要改革之处甚多。就中央政治会议而言，人数太多、权责太杂，为其痼疾，导致出席人数不固定，所议亦多为无关紧要之事，“因为政治会议患了以上两种弊病，于是重要的委员不一定全出席，而出席者不一定是重要委员；重要的事情不由政治会议讨论，而讨论者转多为例行事件”。钱端升提出补救之策在于将政治会议限缩为一个不多于28人的团体，另外将其职责调整为专负责宏观、重要事件，而将鸡毛蒜皮的琐事交由职能部门决定。就军事委员会而言，名为委员会，实行委员制，但实际上又是首领制，所以应该修改现行法令，设置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以一切军权交给长官，除军事预算及宣战仍得政治会议的同意外，其余他可便宜行事”；禁毒等事亦可交由军事机关；其他事宜则交由行政院负责。就五院制规模来说，五院应做独立试验，没必要设置同样庞大的组织，司法、考试及监察三院最好裁废，不能裁废亦必须缩小组织。钱端升指出，这种最简易的改良，依据组织法即可，而没必要凑成宪法，因此不主张在当时立宪。

第三部分钱端升阐述了宪法的几个原则：其一，宪法应尽量以三民主义为依据，但文字上应少采国民党的特有名词，以减少人民的反感。其二，人权在中国尚无保障办法，基本权利及义务更无实行可能，故相关章节应诚实地表示未来的理想。其三，政治制度部分应力求适应中国国情，一方面不设置难于行使的条文，另一方面显著流弊应立即纠正，而不能获得宪法根据。

其四，民选机关人数越少越好，选举次数亦越少越好。其五，宪法修改越容易越好，一方面使违宪的可能性越小，另一方面使宪法越少被蹂躏。

第四部分则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评议宪草修正稿。钱端升认为该宪草修正稿在总纲、人权、积极的权利义务、财政及军事、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委员会、行政机关的体制、总统、五院、中央与地方、地方制度、宪法的解释及修正等方面，均有大大小小的问题，钱端升也一一提出了修正建议，同时明确表示，“能不颁行宪法最好，如果定要立宪，则愿制宪者能采用上述的许多意见”。技术性细节在所多有，此处不赘，感兴趣的读者不妨移步原文。

——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载《东方杂志》1934年10月1日，第31卷第19期，第5-14页。

10月

陈之迈在《清华学报》发表书评，评介钱端升的《德国的政府》一书。

陈之迈在这篇书评中，对《德国的政府》评价甚高，指出尽管魏玛宪法本身已被希特勒束之高阁，但其新颖的条文、独创的制度仍为各方所关注，“阐明该宪法的书籍虽有如汗牛充栋，但一方面解释宪法，一方面注意该宪法十数年来实行的经验的著作则尚少见”，故这篇书评中所评价的钱端升著《德国的政府》和 Herbert Kraus 的 *The Crisis of German Democracy*，均为这方面的“可足庆幸的佳作”。陈之迈指出，钱端升的《德国的政府》写作始于四年前，而成书之际魏玛宪法已被束之高阁，巧合地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的专著”。陈之迈指出，“此书的取材异常丰富，关乎书后所附十七页的参考书目，便知作者学问的渊深，除法律命令等材料外，德法英文中的重要典籍几浏览无遗，实为我国著作界中所罕见。”陈之迈对钱端升行文中的脚注及表格，亦评价甚高，认为这些“均为吃力工作的结果，极便于参考”。

当然，陈之迈也清楚地指出钱端升这本《德国的政府》的缺点，即“对于材料的采择似乎过于平均，次要的事实收集得太夥，叙述得过于详细，

读起来觉得艰难，且有湮没政制特点的危险”。而从内容上来说，陈之迈认为钱端升未能对1849年法兰克福宪法和1871年帝国宪法对魏玛宪法的影响做详细说明，亦未能指出三者的关系，不无遗憾。另外，陈之迈对于钱端升将德国国会政府制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各党间不能合作、不能产生一多数的团结等，还有将希特勒运动归因于德国国会政府制的失败，均持保留的意见。陈之迈还坦率地指出了该书中存在的编校错误。

——陈之迈：《德国的政府》，载《清华学报》1934年10月，第9卷第4期，第1014-1018页。

【书评有刘崇鋐 *Becker, Modern History*。朱自清《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钱端升，德国的政府》等。】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159页。

年末

钱端升重新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

【后乃远适南京，再度就聘于中央大学。中央大学法学院教师中，不少曾是我早年的学生，因此，校长罗家伦希望我去法学院有助于加强学术空气。谁知中央大学依然派系林立，到了1936年至1937年一年，我除偶尔不得不代理法学院院长职务外，只能倾全力于政治系附设的行政研究室工作，并组织该室同仁在一年内完成了两卷本《民国政制史》。】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6页。

10月18日

在南京写成《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一文。

本文是对10月16日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民国宪法最终草案的评论。钱端升认为，纵然此草案为代表立法院的总集意见，但作为国民依然有纠正、批

评的义务，“我们现时如尚不需要宪法，我们应请愿五全大会将颁布宪法的日期延缓下去。我们现时如需要宪法，我们也应趁国民大会未召集以前，主张一种较健全、较适合国情的草案，庶几国民大会所采纳的宪法，于颁布后，一不至不能实行，二不至实行而有害”。

——钱端升：《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载《东方杂志》1934年11月1日，第31卷第21期，第5-10页。

11月1日

《清华校友通讯》登载钱端升近况。

【我之近况：我于9月初离开了天津益世报。现在中央大学教课。】

——钱端升：《我之近况》，载《清华校友通讯》1934年11月1日，第1卷第9期，第62页。

在《东方杂志》发表《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一文。

本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重申其暂缓立宪的观点：“我以为如为实现民主政治而立宪，则大可不必，因为民主政治本身不见得适宜于现代的国家，而且中国人民也没有运用民治制度的能力。如为奉行民权主义，或树立法治局面而立宪，则犹御车者置车与马之前，而欲车行。要奉行民权，先得训练人民如何行使政权。要树立法治，人民先得有制裁违法的当局者的实力。要是人民不能行使政权，也没有制裁的力量，则纵有宪法，民权及民治仍是无法存在。”钱端升指出，无论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还是站在普通国民的立场，“宪法均是不急之务”，“政府现在最大最急的任务在维持国内治安，增进行政效率，发展国民经济。要做到这些，则有待于执政者及各界领袖的觉悟及奋发，有了宪法不特不能有所帮助，且转恐因采用宪法与夫改制时所引起的纠纷而多所阻碍”。

第二部分舍根本问题，而谈草案本身。钱端升认为三读草案尚不及7月9日发布的修正案，是退步而不是进步，谈不到适合国情，更谈不到完美，

“国民党如果于短期内定欲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则三读案实在不宜作讨论的根据”。这部分内容对三读草案与二读草案做了详细对比，尤其是国民大会及国民大会委员会、立法院、监察院、五院制及宪法修正等五个方面。

第三部分言辞甚短，重申其对宪法的悲观论调，“就中国目前的情形而论，无论如何仔细考虑，总不易有完美的宪法。即使有了合乎理论的宪法，也不见得即有实行的可能。所以我总望今之当国者，不急于宪法的完成，而努力于政治及经济的改进。如果为满足国内一部分人的要求而立宪，则亦须能真正立宪，才能消灭反对”。

——钱端升：《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载《东方杂志》1934年11月1日，第31卷第21期，第5-10页。

12月3日

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文章，反驳钱端升的独裁论。

【十二月三日有“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一文。大意是：

上（原作“本”，胡颂平注）月二十七日汪精卫、蒋介石两先生联名通电全国，电尾有这样的一句话：

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也。

同日蒋介石先生答复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访问时，也有这样的一句话：

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

在今日有不少的政客与学者公然鼓吹中国应采取独裁政制的空气里，上述两句宣言是值得全国注意的。

先论中国今日没有实行独裁的“必要”。

近年来主张中国有独裁政制的必要的学者，要算蒋廷黻先生和钱端升先生。……钱先生的大目的——沿海各省的工业化——本身就是很可怀疑的问题，因为沿海各省很少具有工业区域的基本条件（如煤铁的产地）的。况且

在现时国际形势之下，一个没有海军的国家是无力保护他的沿海工业的，所以先见的人都主张要建设内地的经济中心。况且中国工业化决不是单靠政府的力量。……政府有了极度的权力，就能有资本了吗？就能有人才了吗？就能有原料了吗？单说人才一类，苏俄五年计划，就需要一百五十万个专家。这不是有了独裁的极权就能变化出来的。所以如果独裁的要求只是为了“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我们不信独裁是必要的。

蒋廷黻先生所以主张独裁，是义务那要统一政权。……所以他主张用个人专制做到武力统一。这些议论，我们从前已经讨论过了。（《独立》八五号）总括起来，问题不是蒋先生看的这样简单。蒋先生自己也说过：

毛病不在军阀，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

……两个月前平了桂系，六个月打倒了阎、冯，然而中国至今还是不曾统一。这五年的教训还不够清楚吗？这里面的真原因就在所谓“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了。……蒋先生说的……“打倒专制”的口号可以使统一不能成功，这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新意态的力量，不是刘邦、朱元璋的老把戏所能够应付的了。……在今日这些新意态已成不可无视的力量时代，独裁决不是统一政权的方法。所以从统一政权的观点看，我们也不信独裁制度是必要的。

其次，我们可以讨论中国今日没有独裁的“可能”。

我在《独立》第八二号里曾提出三点来说明独裁政治在中国今日的不可能：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独裁的人，或能独裁的党，或能独裁的阶级。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第三，我不信中国民族今日的知识经验够得上那需要高等知识与技术的现代独裁政治。

这三点，我至今不曾得着一个满意的答复。这三点之中，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是那第三点。我说：……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多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我这个看法，

换句话说，就是说：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现代式的独裁可以说是研究院的政治。……试看美国的民主政治，那一方面不是很幼稚的政治？……而到了近年的大危机，国会授权给大总统，让他试行新式的独裁，这时候大家才感觉到“智囊团”的需要了。……这正可以证明民主政治是幼稚的，而需要最高等的专门技术的现代独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院政治。

所以我说，我们这样一个知识太低、经验又太幼稚的民族，在这最近的将来，怕没有试行新式独裁政治的资格。新式的独裁政治，并不是单靠一个领袖的圣明的，——虽然领袖占一个绝重要的地位，——乃是要靠那无数专门技术人才的。……苏俄自从实行五年计划以来，据官方的统计，需用一百五十万专家。……这种骇人的统计是今日高谈新式独裁政治的人们万万不可忽视的。……新式独裁政治不但需要一个很大的“智囊团”做总脑筋，还需要整百万的专家做耳目手足：这种需要是不容易供给的。……所以钱端升先生期望的那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蒋廷黻先生期望的那个开明专制，在中国今日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时候，不少的学者和政客鼓吹独裁的政治，而他们心目中比较有独裁资格的领袖却公然向全国宣言：“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只此一端已可证中国今日实无独裁的可能了。……

我们很诚恳的赞成这个宣言，并且很诚恳的希望作此宣言的人不要忘了这样严重的一个宣言。

——《独立评论》一三〇号】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281-1283页。

12月9日

胡适撰写《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再次提及钱端升的独裁论，并做了反驳。

【十二月九日有《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大意是：

东方杂志社为明年元旦号征文，出了一个“过去一年之回顾”的题目。我想这个题目太大了，我只能挑出一个范围比较不大的题目来谈谈。

这一年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了好几个人的讨论，因此引起了不少的注意，这个问题，钱端升先生在《东方杂志》里称为“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但在别处，我们泛称“民治与独裁”的问题。说的具体一点，讨论的中心是“中国将来的政治制度应该是独裁呢？还是民主立宪呢？”这个问题至今还是我们眼前急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借《东方杂志》征文的机会，把这一年来讨论的要点，收集在一块，做一个提要；遇必要时，我也加上一点批评的意见。

以下是说这个问题的发生：最初是蒋廷黻发表了一篇“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八零号）之后，先生（胡颂平对胡适的称谓，夏红注）发表了两篇答辩。第一篇“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八一号），第二篇“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八二号）。

以上的讨论，都在民国二十二年的年底。二十三年一月中，出来了三篇拥护独裁的文字：

（一）钱端升先生的“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

（二）蒋廷黻先生的“论专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八三号）

（三）吴景超先生的“革命与建国”（《独立评论》八四号）

……总之，钱先生的概论部分，我们初看了都觉得很动人，细看了就不能完全叫人心服。他把“民主政治”的定义下的太狭窄了，所以他不能承认欧战后的民治主义的发展。他又把“经济的民族主义”看得太普遍了，故无端“不论在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免统制经济，也就不能幸免独裁的政制了。……

（蒋先生、吴先生的两篇文章）都主张武力统一，所以我在《独立》第八十五号发表了一篇“武力统一论”答复他们两位。……在几个月之后，我在“中国无独裁之必要与可能”（《独立》一三〇号）一篇里重提这个问题。……

我至今还相信这种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国家统一的最有效方法。

常燕生先生在太原读了《独立》上的讨论，写了一篇“建国问题平议”（《独立》八八号），他不赞成武力统一，也不赞成专制与独裁。……他劝中央实力派学故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秘诀，把人民当作天子，善用民心民意来做统一的工具，这话好像是迂腐，其实是很近情理的议论。我说的国会制度，也就是实行这个意思的一个方法。有位署名“寿生”的青年人发表了一篇“试谈专制政治”（《独立》八六号），他指出现代的独裁政治其实都是他所谓“旨趣专制”，而不是古代的权力专制。……我也曾说过，今日的中国实在没有一种有魔力的“旨趣”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感情与理智；所以独裁政治的无法成功，只是因为今日大家口头背诵宣传的强迫小孩子记诵的一些主义都没有成为全国人民的信仰的魔力了。……中国的社会构造是经过二千年的平民化了的，加上二千年的“天高皇帝远”的放任政治养成的“无治主义的民族性”，这都是近于民主政治，而甚远于铁纪律的独裁政治的。以此种种原因，我绝对相信常燕生先生的从民权伸张做到国家统一的议论。……但在今日的一切状况之下，一切歌颂独裁的理论都是不切事实的梦想。

……在这一年中，有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是党部人员公然鼓吹“领袖独裁政治”，而一方面又是政府郑重的进行制定宪法的工作，正式准备开始所谓“宪政时期”。已公布的“宪法草案”，是经过一年的讨论与修正的结果，这几天就要提交五中全会去议决了。然而“领袖独裁”的喊声并不因此而降低。最近（十月二十日）北平出版的《人民评论》第五十七期上有“斥胡适之自由思想”一文，有这样的议论：

吾人主张党政一体由党产生党魁以宜宣布独裁，乃救时之良剂。时至今日，已届非常之变局，急起救亡，惟在领袖独裁制之实现。

同一期里，又有“为五权大会代表进一言”一文，其中有这样的建议：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行将举行，我人对此早有一根本之建议：即由党产生党魁以宣布独裁，……为党国造一新局面。

然而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汪精卫、蒋介石两先生联名通电全国，其中却有

这样一句重要的宣言：

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也。

同日蒋介石先生发表他答复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谈话，其中也有这样一句重要的宣言：

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

我国人当然是欢迎汪、蒋两先生这种宣言的。他们承认中国今日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这种见解，很可以对一般求治过急的人们下一点忠告。在这个国家和平统一最有希望的时机，在中央政府将要正式实行民主宪政的时期，这种郑重宣言是最需要的。

——《东方杂志》三二卷一号，新年特大号】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286-1288页。

12月18日

胡适在“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中，再次提及钱端升。

【十二月十八日有“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大意是：

丁在君先生的“星期论文”……我仔细阅读了两遍，很感觉失望。他对于英、美的民主政治实在不很了解，所以他不能了解我所说的民治是幼稚园政治的话。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他能使那大多数“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每“逢时佳节”都得到选举场里想想一两分钟的国家大事。平常人的政治兴趣不过尔尔。平常人的政治能力也不过尔尔。然而从历史上看来，这班阿斗用他们……的余闲来参加政治，也不见得怎样太糊涂。即如英国，那些包办“骗人的利器”的人们，当真能欺骗民众于永久，岂真能长期把持政权了吗？……美国的全国财权当然是操在共和党手里，然而我留学以来，不过二十四年，已看见民主党三度执政了。可见这班看棒球新闻……的阿斗，也不是永久可以欺骗的啊！所以林肯说得最公允：“你可以欺骗民众于一时，而不能欺骗他们于永久。”英、美国家知道绝大多数的阿斗是不配干预政治，

也不爱干预政治的，……只要他们“逢时逢节”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这正是幼稚园的政治，这种“政治经验”是不难学得的……

现代的独裁政治可就大不同了。独裁政治的要点在于长期专政，在于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所以现代的专制魔王想出了一个好法子来，叫一小部分的阿斗挂一个专政的招牌，他们却在那招牌之下来独裁。俄国的二百万共产党，意大利的四百万法西斯党，即是那长期专政的工具。这样的政治与民主政治大不同之点在于过度利用那班专政阿斗的主人；不但“逢时逢节”去干画诺投票的事，并且天天以“干部”自居，天天血脉奋张的拥护独裁，压迫异己，诛夷反动。

换句话说，民治国家的阿斗不用天天干政，然而逢时逢节他们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以为专政，然而他们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

在君先生难道闭了眼睛，不堪见独裁国家的“靠政治吃饭的人”也充分利用的“骗人的利器——宣传”吗？……在西欧选举权普遍的国家，……终无法叫那绝大多数的阿斗不画一个NO字。而在独裁国家里，就不容易制造出这么一个NO字来。同是骗人的利器，其效用不同，如此而已。

……独裁政治的成绩的大小，和独裁政制之下民众与国家受的福利或祸害，往往系于这二百万或四百万的“专制阿斗”的程度与经验。这是一个国家的生死关头。学者立言，为国家谋福为生民立命，在这种紧要关头，是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岂可以用“实行独裁政治所需要的条件或者不至于如此的苛刻”一类的模棱论调轻轻放过吗？

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钱端升先生说：“我们更要防止残民以逞的独裁之发生。”丁在君先生也说：“大家要打倒的是改头换面的旧式的专制。”我可以断断的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独立评论》一三三号】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290-1292页。

12月

在《外交评论》“中国对于未来世界战争之方针”专号发表观点。

《外交评论》这个专号专门就“中国对于未来世界战争之方针”征文，并组成由周鲠生、杨端六、程天放、俞大维、张忠绂、谢冠生、吴颂皋组成的评委会，评出28个奖项，除奖金外还赠阅《外交评论》一年。据卷首语消息，这次征文得到社会各界的踊跃参与，其中既有73岁的老先生，也有12岁的小学生，数千名在校大学生热切响应。这期“中国对于未来世界战争之方针”专号即从获奖的28篇征文中，选出10篇，同时向包括钱端升等94位学者征集的意见。意见无标题，按照顺序编号排列，共计94篇，钱端升的“意见”为第11篇。

钱端升的“意见”分如下几大部分：

第一部分，弱国外交的原则。钱端升开篇即提及，中国是弱国，故外交的原则分两点：在消极方面，避免受强国的进一步侵略，以便对内有整理、发展的可能；而在积极方面，则应利用列强的互相敌视，解除其中所有束缚的部分或者全部。钱端升坦诚，实行本原则不易，但知难而行，中国外交必有胜利的一日，应付将来的世界大战，亦必须坚持此原则。

第二部分，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因素。计有：第一，距离大战爆发期的远近；第二，在大战爆发以前，中国能否取得显著进步；第三，参战国对峙的形势；第四，远东是否将会作为作战地带。

第三部分，中国究竟如何介入世界大战。钱端升指出，不管是世界大战还是日俄开战，而且开战期间距离现在甚近，中国则需要加入俄方。钱端升认为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抛弃国耻，助日攻俄，中国西北必然为俄国占据；助俄攻日，则华北、沿海则为日本所陷。但就结局而言，中国助日本

而日本败，中国白受牺牲；助日本而日本胜，中国依旧是日本附庸。而助俄而俄胜，则中国可以获得相对有利的结果。钱端升还指出，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是战事发生的时机及地点，如果战事不先在远东爆发，或者战事爆发前中国已经成为强国，则中国自可选择早加入晚加入以及加入何方。钱端升认为，日美间发生战事的可能性远小于日俄战争。

第四部分，大战如何发生、何时发生。钱端升认为大战的爆发将有如1914年的情形，一定不会由两大国公然宣告，毕竟国际间和平组织日有进步、国际舆论的制裁力也在增加。钱端升预测，世界经济恐慌估计还能持续三四年时间，而列强中最不受经济危机影响的日俄尚未开战，其他国家开战更是会晚，故接下来三四年的形势，大战多半不致爆发，而日俄对峙及德法对峙的情形将一直存在。钱端升指出，日本是中国的敌人，故凡是日本的敌人而又不蓄意侵华者，皆可引为友邦；钱端升认为政府对日缓和政策不甚合理，而亲美亲俄的工作亦万不容缓。

——钱端升：《中国对于未来世界战争之方针》，载《外交评论》1934年12月，第3卷第11、12期合刊，第241-246页。

1935年(35岁)

2月1日

在《半月评论》创刊号发表《论极权主义》一文。

本文从“权力国家”与“极权主义”的区分说起，钱端升重申了他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中提出的民治五原则，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针对民主政治的反动，极权主义的表现诸如人民不平等、无自由、无代议机关、一个政党、不分权等，都是针对民治的反动，历史事实亦证明了这一点。钱端升指出，极权主义与民主政治的优劣不可一概而言，应该辨别极权主义与独裁的异同，“极权主义包含着国家的权力应有极度的发展，而这无限制的权力国家又有敏捷且利便的方法以行使的意义，而独裁则仅为行使这

权力的一种方法”。职是之故，“仅仅提倡独裁不免失之肤浅，但是为极权而主张独裁则又是一件事情”。钱端升认为，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在现代潮流下，民治和极权究竟哪个更实用？钱端升当然站在极权的一边，“民治已有深长基础的国家，固然不必太急急于改制，但民治尚未实现的国家，尽可向极权主义的道上走去。欲实现极权主义固是不易，但凭空建筑民治，其困难更大。如果为应付现代国际及经济局势起见，极权主义较宜于民治。”而就中国的需要而言，钱端升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应努力培植一个极权国家，以图立足于世界之上。我们不必抄袭民治的陈义，以自陷于无力量的低下地位。”钱端升深信，“国家的权力愈大，则独裁的需要也愈大”，当然独裁可能是一人独裁，更可能是一党独裁，讨论这两者哪个更佳，还不如明确“认清极权国家的必要，而枉费时间于民治的提倡”，“我深愿国人先集中视线于极权国家的善成”，而不必纠结于一人独裁还是一党独裁的枝节。

——钱端升：《论极权主义》，载《半月评论》1935年2月1日。

7月14日

胡适欢迎钱端升夫妇。

【七点，与冬秀钱送张真如、徐耀辰、刘叔雅、孙云铸、俞大缜女士；并欢迎钱端升夫妇。】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60页。

8月4日

在《独立评论》发表《对于六中全会的期望》一文。

钱端升开篇即提及，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九一八事变的产物，而几次全会的召开都与国难息息相关。既然如此，箭在弦上的六中全会将于九月下旬召开，钱端升提出，“国难日深，西南的局势亦迄未有明显的改善，我们万不能再让六中全会蹈以往几次全会的覆辙；我们必须扶助六中

全会，使有成绩；我们应趁此两月间，有勇气地、不自私地提出一些有实行性的建议；空洞地督责六中全会是没有用的，公正的、有力的、有实行性的建议才是一百六十余个中央委员们所需要的粮食。”

钱端升的建议分为三点：第一，党内各派应在同一领袖之下团结起来；第二，领袖不应独裁；第三，中央决议机关应有力量、有效率，议决与执行应分离。惟其如此，才能指望统一有力中央政府的出现，才能谈到解除国难。

就领袖问题，钱端升指出眼下确实需要最高领袖，但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一，党内有没有人配做这样一个领袖；第二，党内是否团结到可以让这个人做领袖。钱端升认为，在中国做领袖，需要党内各派一致拥护，也需要党外各派的一致承认，蒋介石固然是党内最有实力的领袖，但多年来党内的分裂端在于反对蒋介石居于最高领袖地位，这一点迄今未变，六中全会完成大团结的使命可能性很小；但钱端升退一步指出，蒋介石自己及拥护他的党员应能相当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舆论方面亦应一致督促各派放弃成见，而以共赴国难的精神拥戴蒋介石为领袖，使得反蒋各派能够失去反蒋或不拥护蒋介石的理由及依据。

而就独裁与否的问题，钱端升认为中国不应该实行独裁制，蒋介石也不应该为独裁者，理由如下：第一，蒋介石独裁，党内必然不团结；第二，独裁之获得，要么出于武力方面的惊人成功，要么出于法律授权，如今两者都不具备；第三，国际形势亦不容许中国有一实至名归的领袖，尤其不希望实至名归的领袖来复兴国家。由此种种，钱端升对蒋介石不为鼓吹独裁运动所动，且明确否认其需要极适当的行为，表示十分赞赏，“我以为真正爱护蒋先生者此时不应再炫于希特勒辈在国外所享的虚荣，而应积极地助他发展他的救国的势力，消极地使他少受国内外的责难，好意地指陈他的缺点。微特他自己此时不要独裁，即使独裁制度此时即能实现，亦仅足以增加各种的纠纷而已”。惟其如此，钱端升认为，既然此时中国不应有独裁、蒋介石也不打算独裁，则蒋介石在各方面看来都是中国最合适的党国最高领袖。

而就中央政制而言，钱端升坦言，中国当时的政制是蒋介石与中央政治会

议分治的政治：军事及蒋介石处理的其他事项，归蒋全权处理，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不过是形式；而此外的事项则全由中央政治会议处理。钱端升提出，中央政治会议因为人数过多、出席者太不重要、议决及执行不分立、中央政治委员实际上不平等原因，极不健全，六中全会应加以改组，使之成为15-20人以内的组织，成员多数应为中央执监委员，少数为国内其他领袖，名单由党内决定，非党员领袖可以特别赋予党籍；而这之后，蒋介石应为最高军事长官，留意于大政方针的贯彻及国民自卫力量的充实，充分信任他人来主掌各部的行政。

钱端升深信，在国难日重一日的当口，维持党政府的系统为最方便的改良内政之道，“充实党的中枢，增加中枢应付外侮的能力，实为当今的急务，而为六中全会所可努力做到者。”

——钱端升：《对于六中全会的期望》，载《独立评论》1935年8月4日，第126号，第5-9页。

8月24日

《华年》周刊转载《对于六中全会的期望》一文。

——钱端升：《对于六中全会的期望：团结、领袖、改制》，载《华年》1935年8月24日，第4卷第33期，第643-648页。

10月19日

在《华年》发表《中央政制的改善》一文。

本文的写作从政制改善应持的原则谈起。作者以考试制度改善为例，认为讨论政制改善，不能太理想化，也不能太现实，“太偏重理想则很少实现的可能，太迁就事实则不易有所改善。”钱端升认为民国以来的立宪论者陈义甚高，“因为宪政从无在中国实现的可能”，而当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肯求整个的治疗，并忽视学者们及冷眼观察者的意见”，属于另一种极端。钱端升提出，“我们以为正当的改革，应介于二者之间，一方面不应过于理想，至实现无方，又一方面亦不应过于迁就，以至无进步可言。我们应

根据目前的事实，加以合理的纠正或补充。这种纠正或补充或不为一部分人所欢迎，但他们的反对不应大至于无法克制的程度。如果大至于无法克制的程度，则又必是陈义太高之过了”。这是钱端升对于政制改革基本的态度。

而就中国在党治、民治、独裁、立宪甚或自由之间的抉择，钱端升认为当务之急是对上述各种名词的意义及相互关系有所了解。钱端升归纳出如下几点：第一，党治与民治对立，与立宪不相容，也不能是自由国家，但不一定是独裁，也不是极权国家；第二，极权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可以相容。有鉴于此，钱端升认为中国为一“无宪法、无自由、非民治的党治国家。独裁已有趋势，但极权则相距尚远。一部分人非不欲独裁，但环境等尚不能容许其实现。在理论上极权亦非与党治有所冲突，但民族的组织力亦尚不够资格去实行极权主义。”

由此种种，钱端升指出，在中国党治依然有必要继续维持，因为此时此刻不实行党治，找不到其他替代办法，个人独裁、他党党治及民治均行不通。既然要实行党治，民治则无法实行，立宪及自由亦无须多谈，而极权亦仅仅停留在原则上赞成的层面，因为社会各种组织不健全，欲极权而难得。而对于独裁，钱端升亦认为鉴于独裁人选不易形成共识，贸然独裁更会使得形势恶化。职是之故，钱端升认为此时应维持党治，不言民治、立宪及自由，可以渐进于极权，亦可在条件合适时拥护独裁。

钱端升提出，按照这种方案，改善中央政制则需要中央层面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批评、讨论、策划及决议的机关。钱端升结合其先前发表的观点，认为应对中央政治会议予以改组，将其改组为一二三十人的小机构，成员由党产生，同时分开议决及执行。在这个基础上，合理分配蒋介石与中央政治会议的权限，各司其职，进而达到改善政制的效果。

——钱端升：《中央政制的改善》，载《华年》1935年10月19日，第4卷第41期，第3-8页。

11月1日

在《半月评论》发表《国宪与党章》一文。

本文写于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开幕之前，所涉依旧是立宪与否、立什么样的宪法、要不要维持党治、政制如何改造、党治如何改造等问题。钱端升认为，这些问题背后的元问题，则是国民党究竟应不应该放弃一党专政。

对于这个问题，钱端升从两个角度做了回答。从国民党自身角度，训政未完成，没有放弃执政的理由；而从实力上来说，“没有人能抢走政权，自然不放弃政权”；从责任心的角度，国家生死垂亡，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团体领导，而舍国民党外无它。而站在一般国民的立场，国民更关心的是假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形势能否比现在更好。钱端升列了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后的五种可能：第一，国民党为主、其他政党为辅；第二，国民党与其他政党轮流执政；第三，国民党分裂，军人主政；第四，国民党分裂，财力最强的集团主政；第五，群雄并起，一盘散沙。钱端升逐次分析后指出，“可见取消党治后，其继起的局面，实难令我们希冀其有进步的可能。既然如此，此时取消党治的理由自不存在。要取消党治，仍得待到训政完成之后，或一个较好的局面可以继起之时。”

钱端升进一步申言，既然党治不可取消，那么紧要问题当是如何改善党的宪法，而不是如何成立国家宪法。钱端升指出，及时立宪论者大体可分为四种：第一，笃信宪政的宪呆子，不懂实际，空想宪政；第二，主张国民党如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第三，有政治野心但不愿意加入国民党，藉宪法而开放政权；第四，国民公敌，借宪法推翻党治。钱端升指出，上述四种人中，第一种人看法既错，亦毫无具体措施，“事先漫无准备，而虽一脚走入立宪之道，就等于向暗中一跳”。第二种人的言论值得考虑，但此时应以国家利益至上，遵守诺言与否取决于立宪准备是否完成。第三种人值得同情，一方面国民党不值得尊重，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自命不凡，“不敢低首下心履行入党手续”，“他们的看法实在错误了，气量也太狭小了”。钱端升认为，“在此国难严重的时间，国民党究是国内唯一的重心，而且用心也极佳。为国家计，他们与其站在党外作活动，因而分散这中心势力的力量，毋宁不问

面子好看不好看，大智大勇地加入国民党共同活动。同时，在国民党的方面，党自然也应有礼贤士的气度，凡可为三民主义努力者，无论其过去对于党的批评如何苛刻，俱应迎之入党，共商国是，国民党若仍不改过去一种骄浮不能容人的习气，那真是误党而又误国。”第四种人的意见不足置喙，只须有自尊之心，昂首不理，或直接加以取缔。

鉴于此，钱端升再次提出，当务之急不是立宪，而是修订党章，改善党治。钱端升提出如下几点修改原则：第一，党章必须要能实行，不能实行的应立即删改；第二，党内应尽量吸收国内优秀分子为党员；第三，组织方式可以继续民主集权，也可以实行领袖制；第四，党应有一个二十人规模的最高权力机关。钱端升指出，这些修改的目的都是在“使党有较广的基础，较严密的组织，较有发挥党治的能力。如党能健全，则党治尚可有进步的希望，颁布一纸宪法，则只等于向暗中一跳。”

——钱端升：《国宪与党章》，载《半月评论》1935年11月1日。

1935年(35岁)

完成《政治活动应制度化》，发表与否不详。

本文简论人治与法治之争。钱端升认为：“在理论上，我们本应提倡法治，……但我们不主张空喊法治的口号，因为法律贵有信用，如果有法而不能守，则此后便可永久失了实行的可能。与其空言法治，而使人民对于法治失信，毋宁在可能的范围内，逐步推行法治。脚踏实地，步步前进，为实行法治的第一要着。”钱端升的观点与先前观点类似，认为在私法领域积极行使法治，而在公法领域暂缓行使法治；在公共领域应该使施政行为制度化，不是不要法治，而是鉴于尚未到提倡高度法治化的时机，预期立法而不能实行，还不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使相关行为逐渐趋于制度化，为法治做准备。

——钱端升：《政治活动应制度化》，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936年（36岁）

1月1日

在《中国新论》发表《论中日关系》一文。

本文共分为三部分：

在第一部分，钱端升着重论证中日亲善之不可能。钱端升全文援引他于1934年2月22日在《益世报》发表的社论《中日问题果能解决么？》一文，特别强调，“上面一番议论，不但三十四个月的经过不能改易其一丝一毫的真实，即再过了三十四年，其真实亦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变动”，民族主义、经济竞争等因素，导致中日之间只能是一强一弱，后者高高在上、前者寄身附庸的关系，什么中日亲善之类都是谎言，历史上日本亦从未安分过。钱端升指出，中日间历史上不易亲善，在日本进入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时代后，亲善的可能更是不复存在，与这样的国家讲亲善无异于“与虎谋皮”。

在第二部分，钱端升对中日问题的解决方案做了探索。钱端升先提出中日问题四种可能的思路：完全屈服、让步求和、消极抵抗、积极抵抗四种，但这四种思路中，中间可能几乎为零，中日问题只有降与战两个思路。钱端升进一步指出，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中日之间的和平绝对不可能，真要有可能，割地求和、承认满洲国等都可考虑；但是，“我纵勾践，人非夫差”，日本志在全面占领中国，除非中国整个降服，否则依然是欲壑难填。在这种背景下，钱端升认为对日妥协派“抛糖喂鲨”的策略完全不可行，这一点他在1934年4月3日《益世报》社论《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南行》中已有评述。职是之故，既然求和不能而又不甘屈服，钱端升认为中国只有下定牺牲的决心，积极抗战，维持民族最终的生存，战时生灵涂炭、四分五裂等，都只能忍痛受之，“中日的问题，不是玉碎与瓦全的问题，而是玉碎与瓦碎的问题。如果尚有瓦全之道，自然可暂求瓦全再说。如果只有一碎，则玉碎当然愈于瓦碎。如有玉碎的决心，天下事正未可限量，结果亦不一定是

碎。如果希冀瓦全，而结果是瓦碎，那才是碎得不值一文钱”。钱端升指出，妄冀瓦全，终将瓦碎，此为今日中国所处的处境。

钱端升在第三部分，则聚焦论述如何置之死地而后生。钱端升坦言，积极抵抗容易形成共识，但积极抵抗的时期和步骤，则需要进一步探索。钱端升提出，有效的抵抗取决于三个因素：国内形势、日本形势和国际形势。就国内形势而言，经济凋敝，军力孱弱，战事越往后越有从容准备的时间；但如不积极抵抗，民气将消失殆尽，汉奸亦将越来越多，安内亦将越来越难，因此，就国内形势言，早日决战是上策。就日本形势而言，即战与缓战无区别，而日本方面对于军事侵华亦有忧疑，故即日抵抗亦是上算。就国际形势而言，欧美各国均经济凋敝，但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我们此时似正宜利用列强对我的好感，而向日本表示不低头的精神。我们此时如不即采取抵抗的态度，则国联的立场及九国公约的立场，不久势须放弃”，故就国际形势而言，暂缓作战的理由不应成立。综上所述，钱端升认为毅然决然地立即抵抗是上策，而且也是唯一应采取的对策，政府方面有如下几点意见应予考虑：第一，尽早决定最大的让步尺度，与日本展开外交谈判，内统国民意志，外使日本知所进退，其他国家亦明了中国立场。第二，可以做极大的让步，但中国作为独立国家、中国人作为独立国民的风度必须维持，主权与土地绝对不能放弃，傀儡戏不能考虑，断送国联及九国公约的立场亦不能考虑；中日之间是仇敌，纵然无力抵抗，但不能腆颜说亲善。第三，积极前往欧美，在外交层面争取更多友邦的支持，借以维持国家独立，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综上所述，钱端升认为就中日关系而言，唯一的上策是即日积极抵抗。

——钱端升：《论中日关系》，载《中国新论》1936年1月1日。

1月1日

在《民族》杂志（上海）发表《孙中山先生的宪法观念》一文。

本文聚焦于孙中山的宪法观念，非泛泛而谈，而是致力于“指出先生关于宪法的主张的前后不同之处，而断定何者为最后的主张”。大体分为如下

几个部分：

第一，有关宪法成立，钱端升认为孙中山主张成文宪法毫无疑问，而成文宪法所需要经验，则来自于训政及宪政时期。至于宪法成立以前革命政府的预备时期、制宪的机关、制宪权与立法权是否区分等，钱端升指出孙中山1905年的《军政府宣言》1922年的《中国之革命》、1924年的《建国大纲》等，均有不同的流变与沿袭。

第二，有关宪法的内容，钱端升亦综述了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国之革命》等文本中对国民大会、五权制度、元首存废、代议制的产生、弹劾权、考试权、地方中央分权、人民权利义务等方面的诸多变化。

钱端升得出结论：“可见孙中山先生关于宪法的主张，并非历久不变，亦并未事事有指示。”钱端升更是喊话后来的制宪者，能够“熟知先生所处的环境，严守先生整个遗教的精神，而不为文字所拘泥，则伸缩的余地自极可观。伸缩的余地既极广大，则求于遗教不生冲突，尚非难事，而于不违遗教的范围中，求一适合国情的宪法，才是难事。”钱端升坦言，各种宪草与总理遗教的冲突纵然有，亦非不可解决的困难，最为困难者，是才智之士求其如何能适合国情。

——钱端升：《孙中山先生的宪法观念》，载《民族》1936年1月1日，第4卷第1期，第41-49页。

1月

《图书展望》杂志“新书提要”栏目报道钱端升译《英国史》。

【英国史】

钱端升译

国内出版关于英国专门史书殊罕见，此书原本（Tvevelgan 原著）为极负盛誉之作，今由钱端升氏译出，殊值得吾人注意。书共六卷，第一卷为种族的混合，述自最古以迄诺曼人之征服；第二卷为民族的造成，其时期为自诺曼征服以迄宗教改革；第三卷为文艺复兴以及海权建立时期；第四卷为国会获

得自由及海外发展时期；第五、第六二卷则述工业革命及民主政治。全书注意文化与政治之共同发展与其相互影响，叙述极为详尽。（商务·六元）】

——佚名：《新书提要》，载《图书展望》1936年1月，第4期，史地专号，第66页。

5月15日

在《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月刊》创刊号发表《世界资源重行分配问题》一文。

本文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世界资源重行分配的必要性。钱端升指出，一方面世界资源分配之不平均，是酿成国际冲突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就现代国家之间的冲突来说，经济原因究属次要，直接原因多为政治因素，只有在不良政治空气刺激下，经济原因才促成战争的爆发。经济原因中，只有国际投资、关税、金银储存及市场倾销等，可能比资源分配问题更容易影响世界大局。另外，很多时候资源的增减并不能使国家的生产力随之增减。职是之故，我们应重视资源分配的重要性，但不应过分高估。

第二部分讨论世界资源应该如何重行分配。这里面既涉及资源的定义，也涉及资源分配的标准、目标及分配机构。因此，要达到资源重新分配的目的，促进国联地位的提高及实力的增加，为先决问题；另外对重行分配的各种困难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和估计，尤其反对一二强国借资源重行分配而欺凌弱国。

第三部分陈述中国立场。钱端升指出，原则上我们应该绝对拥护资源的重新分配，但办法上反对由列强主持分配，操切行事，在分配中以人口或工业需要为标准，应该由国联来主持相应的分配事宜，而不应有强国、邻国肆意侵占。

——钱端升：《世界资源重行分配问题》，载《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月刊》1936年5月15日，创刊号。

7月

陈之迈在《社会科学（北平）》发表书评，评介钱端升的《法国的政府》。

陈之迈在该书评中表示，钱端升的《法国的政府》是其1929年出版的《法国的政治组织》的扩大本，体裁与1934年出版的《德国的政府》“完全相同”。陈之迈认为，这部书如果作为非法国学生的大学生用书，“这部书的事实似乎过于丰富繁多，解释事实的地方似乎太少”，陈之迈列举了四本普莱斯等大家有关法国政府的著作，指出“拙见以为后者比较上能适合他们的胃口”。陈之迈指出，“偏重事实分析与叙述而不着意于事实的解释是本书一个鲜明的特色”，并举例有关选举制问题，陈之迈指出钱端升“分析现制不厌其详，但法国人所以对单选区制及复选区制不知所从的原因……都缺乏明显的说明”了；有关两院议事规程，“虽曾加以仔细的分析，委员会的跋扈嚣张、质问的雷厉风行以及两者对于内阁制所发生的影响，都甚为简略”；陈之迈更是指出钱端升对法国最复杂难懂的政党政治分野，“只采用由右而左一一叙述的方法，似难让读者明了法国政党政治的光怪陆离情形，本书第48页短短半页的解释，毋乃太简”。

但陈之迈也指出，这只是供钱端升指正的浅见，“在中文书里现在还没有法国政府良好的教材，这本书是足以补此缺憾的”。陈之迈更指出，这本《法国的政府》里没用像《德国的政府》那样采用太多原始材料，但英法文的普通书籍及专门著作“几被参考无遗”，长达13页的参考资料，有90%以上都是法文材料，取材广博，再加上钱端升“为学严谨的态度”，使得此书所述事实完全可以信赖，“即此一端即使这本书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与他给《德国的政府》一样，陈之迈在这篇书评中也无一例外地吐槽了编校排版错误。

在评述邱昌渭的《议会制度》后，陈之迈又对两本书做了总评：“总之，钱端升先生的《法国的政府》和邱昌渭先生的《议会制度》，都是不可

多得的佳搆。虽然我们觉得它们有时不是适宜的教材，但适宜的教材，并不就是好书，好书更不必一定是适宜的教材。有了这两部书，我们可以随手得到许多非鞞服及可靠的材料。”

——陈之迈：《书评：法国的政府；议会制度》，载《社会科学（北平）》1936年7月，第1卷第4期，第1145-1151页。

12月

王世杰先前独著之《比较宪法》，经过钱端升增订后，以两人名义出版。

目录：

第一编：绪论

第二编：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

第三编：公民团体

第四编：国家机关及其职权

第五编：宪法的修改

第六编：中国制宪史略及现行政制

——王世杰、钱端升：《增订三版序》，载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936-1937

钱端升致力于《民国政制史》的编撰工作。

【谁知中央大学依然派系林立，到了1936年至1937年一年，我除偶尔不得不代理法学院院长职务外，只能倾全力于政治系附设的行政研究室工作，并组织该室同仁在一年内外成了两卷本《民国政制史》。】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6页。

清华学人研究成果中，钱端升比较显著。

【法学院各系教师的研究与发表情形，以社会系为最佳，法律系次之，

政治与经济二系较差。社会系以潘光旦、陈达、傅尚霖等教授之著作最丰，其他教授如吴景超、李景汉、李济与讲师许地山等在伯仲之间，全系发表率为63%，为法学院最高的一系。政治系以陈之迈、邹文海、钱端升成绩最佳，张奚若也不错。后来成名的萧公权，此时尚在起步阶段。】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第123-125页。

【政治系，钱端升教授出版专著4部，论文1篇，编译4篇，书评0篇，总排名第三位，仅次于陈之迈、邹文海。】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6页。

1937年（37岁）

1月6日

胡适收到傅斯年致信，谈及从钱端升处了解的时局。

359页。

——傅斯年：《致蒋梦麟、胡适、周炳琳》，载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2月5日

在《行政研究》发表《论官等官俸》一文。

本文从四个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为绪论。钱端升开篇即提出，政治优良与否，取决于政策、法治和官吏三要素。而就官的要素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有如下四点：第一，官的出身；第二，官的出身评定及官吏资格的正式承认；第三，官的待遇；第四，官的管理。钱端升指出，这四个因素中，出身问题最重要，但改良最难；要论改良的必要性和容易程度，则官等官俸无疑是最首当其冲的。

第二部分论及中国现行的官俸机制。钱端升指出，尽管包括铨叙部在内俱承认有从立法角度来规定官等官俸问题的必要，但事实上立法院至今寸功未建，其难度可见一斑。钱端升历数民国以来各时代的官等官俸办法的演变，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民国以来近二十年，官等官俸问题大体一仍旧贯，未有大的更改；第二，立法机关迄今未能立法规定，现在或许是比较彻底革新的时机。钱端升进而历数暂行文官等官俸表，除特任、简任、荐任及委任外，还有一般雇员；另外，文官中尚有司法官、法院书记官、监所职员、使领馆及警察官等五种公务员。除此之外，还有海关、邮政、电力、铁路四类公司及学校的教职员等特定主体。

第三部分对现行官等官俸制度“稍作批评”：第一，现行分等方法不合理；第二，分等方法不通与不当；第三，现行分等方法重官阶而轻职务。这种现状又导致了如下若干问题：第一，官吏等级的高下与职务轻重难易不发生直接关系，按等级付酬亦难免失之公平。第二，高级官吏俸给过高，而低级官吏俸给过低，高下极其悬殊。第三，中央和地方之间，中央官吏的俸给过高，而地方官吏的俸给过低。第四，就中央公务员而言，一般公务员的俸

给太低，而海关、铁路、邮电三类职工的俸给又太高。第五，以教育人员与政府公务员比，公务员俸给过高，教育界的俸给过低。第六，就文职与武职而言，文职人员俸给太高，而武职人员除空军外则俸给太低。钱端升指出：“官吏俸给的多少影响于社会者甚大。如官吏的俸给低于一般的职业，则政府不能罗致优秀人才，而政治不易有生气。如官吏的俸给过高，则一般的职业必将有材难之感，而政治引诱力之过大，亦绝非政治之福。故官俸的厘定实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政策，不仅涉及官吏本身的报酬而已。”

第四部分则是对策。钱端升提出如下诸点：第一，将官吏另行分等，以可推行为宜，不必求过分的精细与新颖。钱端升建议参考英国，将一般公务员分为行政与专门、执行、文书及财务、抄录与机械四大类，每类分为若干级若干门，确保总数在三四百种之内，以满足现实需要。第二，关于俸给，应遵从如下原则：各职人员，无论文武，待遇应相当，不宜有厚薄高下之分；每类官吏的俸给可以分为若干级，每年晋级并在若干年内达到最高；因职位关系，俸给较低之人亦可命令俸给较高之人；海关、铁路、邮政四类人员俸给应逐步与公务员看齐；公费一律取消，使领官可以领取外勤费；办公经费另定详细办法。至于改革具体的步骤，钱端升提出应由中央政治会议先制定若干官等官俸原则，再交行政院和铨叙部合组调查机关，半年内完成合理可行的方案，并在一定期限内将此方案上升为法律；新法推行若干年后，再求成立一较为精细固定的分类法，“而导中国的人事行政于最新式的方向”。

——钱端升：《论官等官俸》，载《行政研究》1937年2月5日，第2卷第2期，第97-104页。

4月

在《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发表《苏联新宪法》一文。

这篇长文详实地评介了苏联新宪法。纲目如下：

一、苏联宪法史。

二、苏联宪法的条文分析。苏联宪法共有13章、146条。计有社会组织、国家组织、苏维埃最高机关、联邦共和国国家权力最高机关、苏联国家行政机关、联邦共和国国家行政机关、自治共和国国家权力最高机关、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法院及各检察署、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选举制度、国徽国旗及国都、宪法修改手续等。

三、新旧宪法的区别以及苏联宪法与其他国家宪法的区别。关于新旧宪法的区别，钱端升归纳了五点：第一，承认私有财产；第二，选举制度有所改善；第三，权力机关的简单化及合理化；第四，立法权集中于最高苏维埃，三权分立趋势明显；第五，共产党正式入宪，取得公法地位。

关于苏联宪法与其他国家宪法的区别，钱端升同样归纳了五点：第一，苏联新宪法继续标榜社会主义；第二，苏联宪法中的人权因其社会主义属性，与其他国家人权不同；第三，苏联宪法继续维持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第四，苏联行政与立法机关的分离极不明显；第五，苏联宪法中的民族政策及民族自决原则，为一般国家宪法所无。

——钱端升：《苏联新宪法》，载《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7年4月，第7卷第3号，第523-559页。

5月7日

钱端升、胡适等餐叙。

【晚上与段书贻、慰慈、钱端升、刘馥万同吃饭，吃的最为畅快。】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12页。

6月16日

钱端升撰写《民国政制史》一书序言。

根据该序言，中央大学法学院于1936年秋设置行政研究室，同时招聘各大学毕业生，与政治系教授合作研究中国行政问题。当时的目标是“在三

四年内，能将民国各种行政问题，择其较重要、较易知、较与前代无关联者，一一加以研究。如能有成，然后再研究较艰难而与前代较多关连之诸问题。行有余力，则更及较不重要之问题。凡他处已经研究得有成绩之问题，则同人当力避重复。”按照该计划，钱端升遂与萨师炯、郭登皞、杨鸿年、吕恩莱、林琼光、冯震等同事一道，合作编撰《民国政制史》。

鉴于民国政制卷帙浩繁，钱端升等则从行政问题入手，中央、地方并重，对1912年到1936年25年间的中央地方各种制度，“无论合法非法，俱当有所述及”。这里面的例外，主要有三方面：第一，蒙藏地方制度，需要专门研究；第二，中共革命根据地政制，资料难以获得；第三，各实验县，略述意义不大，详述篇幅太大。而从内容上来说，钱端升等在这本书中主要侧重于各级政府机关之法定组织及其权力，而非其实际运作，另如中央及地方之分权、国家权力机构如行政、立法、司法等宪政机构的权限，亦未具体展开。而就编制而言，这套《民国政制史》则按照中央、省、县、市的顺序，先后详述了各级行政机构的组成及权限。而依据的核心材料，则是各级政府机构发布的公报和报章杂志相关文献。

在该序言中，钱端升详述了前述作者团队的分工情况：第一编中央政府，由萨师炯与郭登皞合作完成；第二编省制，主要由杨鸿年编撰；第三编县制，由吕恩莱主笔；第四编市制，由林琼光完成。而冯震则完成各编中有关选举资料的搜集。由于民国政制史本身的复杂性及不同作者的学术禀赋，最终各编之间也只能达成最低限度的统一，比如中央制度与市制两编，每章分述制度，或者按照时间先后分章；而另如省制、县制，则又每章每节按时期先后分述相关制度变迁；至于司法制度，囿于其复杂度，不得不暂时在各编之内分述。

《民国政制史》全书上下两册，共计67.1万字，于1938年春出版第一版。1944年4月钱端升等对该书做了大规模重订。4月出版增订版。

2008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民国政制史》。

2017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隆重出版陈夏红编《钱端升全集》，

其中收入《民国政制史》。

6月20日

钱端升、胡适等谈话、餐叙。

【下午，周枚荪来谈，孟真来谈，王雪艇、周鲠生、钱端升来谈。

在“皇后”吃饭，主人为亮功、剑修。有书贻、志希、枚荪、端升、鲠生等。

饭后又到大三元，主人为吴之椿夫妇。

到雪艇家谈到半夜。】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20页。

7月1日

钱端升重返北大。

【1937年夏，我返北大，刚到北平一周，“卢沟桥事变”突发，8月13日日本又在上海挑起战争……】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6页。

7月20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钱端升留守北大。

【从七月十五日到月底教职员一共在松公府大厅（现在的子民纪念堂）集了三次会：第一次是十五日下午四时，议决通电表明态度。公推我和建功草拟电稿。第二次是二十日下午六时，公推钱端升、曾昭抡和我起草宣言，大意约分三点：（一）申述我国国民素爱和平的本性，（二）指出现在的情形，（三）预测将来的责任。陈远庵先生（垣）并提议发表在国际间有利于我们的新闻。于是又公推张子纓（忠绂）、叶公超和钱端升联络各方面，组

织对外宣传团体。那晚一直延到九时才散会。在我们开会的期间，四郊的炮声一个劲儿的隆隆响着！第三次是三十一日下午三时，那时北平沦陷已经三天了。大家在凄凉惨痛的氛围中仍旧主张镇静应变，共维残局。】

——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载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1页。

7月

在《清华学报》发表书评，评论徐道邻的博士论文 *Die Verfassungswandlung*。

本文评介徐道邻以“宪法的变动”为主题的博士论文。钱端升开篇即提及，近十年中国人关于公法的博士论文不少，但在国外多写中国题材、介绍中国思想、事件或人物，写得极好的凤毛麟角；而徐道邻的博士论文则是在外国写的一篇“不用中国题材的好论文”。钱端升强调，宪法的变动与宪法的修改有别，多由于规律与事实的不一致引起，徐道邻建设性地在其导师 Smend 三种类型的基础上，细化为四种类型：第一，有事实而无规律，即宪法未禁止的实施；第二，有规律而无实施，即由宪法条文但未施行；第三，事实与规律俱抵触，即违宪的实施；第四，事实给规律新的解释，即因解释而生的变动。钱端升认为，次举证明徐道邻“其精确处已青出于蓝”。当然钱端升也批评徐道邻，只引用德国各邦宪法，而未引用其他各国宪法中更贴切的例证。徐道邻在前篇中，除叙述四种变动关系外，还逐一详细讨论了四个问题：第一，宪法的缺陷；第二，宪法失效的部分；第三，宪法实质上的修改；第四，宪法解释的意义。钱端升指出，徐道邻在下篇，更是用精湛的篇幅讨论并驳斥了三种比较流行的宪法变动理论，由此得出结论，宪法变动由于如下诸种原因：第一，国家的动态生活；第二，宪法的三种特性，即宪法的不完全性、国家的自成目的性及宪法的自限性；第三，宪法变动为国家的一种权利。钱端升概括指出，宪法变动的性质本身十分抽象，公法学家极少讨论，而多重视宪法变动的背景及影响，很少讨论宪法变动的法理或性

质，“宪法变动的问题根本上不易作抽象的讨论。但如任这问题有作抽象讨论的可能，则徐博士的论文是一本佳作，因为其所引各家（尤其是德国学者）之说是很详尽的，而其分析辨别之力亦很强显的”。

——钱端升：“Hsü, Die Verfassungswandlung”, von Dr. Hsü Dau - li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32. S. 182, 载《清华学报》1937年7月号, 第12卷第3期, 第649-651页。

在清华大学主办的《社会科学》(北平)发表书评,评Finer的Mussolini's Italy。

该书由伦敦Victor Gallonez出版社于1935年出版,共564页。钱端升指出,Finer的书总是十分坚实,尽管他的书多半是为学生而写,但作为参考书极好,不适合教学,这本Mussolini's Italy亦如此。钱端升转引著者原话,Finer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趣主要在其政制,尤其在于它如何统治人类、领导人类,而不在于其经济与社会;但钱端升认为,这本书本身主要内容在于墨索里尼与法西斯党,而不在于法西斯政制。

——钱端升:评Finer的Mussolini's Italy,载《社会科学(北平)》1937年7月,第2卷第4期,第737-739页。

在清华大学主办的《社会科学》(北平)发表书评,评Schneider的The Fascist Government of Italy; Bornhak, Das Italienische Staatsrecht des Fascismus。

该文中钱端升表示, Schneider著《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为“近代欧洲政府”丛书中的一本,于1936年由纽约Van Nostrand出版社出版,篇幅共173页。钱端升指出,这本书就政府的部分而言,并无特殊之处,亦无Finer的Mussolini's Italy详尽,较之其他同类书亦逊色,但该书虽然略于政治,在劳工问题方面则极其详尽,其中论述法西斯经济政策的一章,将意大利法西斯上台以来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为其中的亮点。钱端升还提及,作者对“极权主义”几乎避而不用,保持绝对中立。

而Bornhak的Das Italienische Staatsrecht des Fascismus在钱端升看来,虽然于1934年由莱比锡的一家出版社出版,早于Schneider的The Fascist Gov-

ernment of Italy，但其参考价值仍在后者之上。钱端升认为此书胜在言简意赅、资料完备，在政治制度的论述方面亮点尤多；但钱端升也指出，作者作为年近八十的老法学家，对法西斯主义及国社会主义的袒护比较明显，“亦有不甚自然之处”。钱端升指出，作者曾拥护民主政治，拥护平等，视人权为宪法权利；但在这本书中，将人权视为行政权利，行政机关可以生杀予夺；作者更附和法西斯教义，指出罗马法、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及社会主义等，均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而法西斯主义则以整个民族为出发点，“凡有益于全民族者皆可为之”。钱端升还指出，作者在序言中将法西斯主义与专制主义并列，认为专制主义是结束封建主义者，而法西斯主义则为结束立宪主义者，“著者之意向可见一斑”。

——钱端升：评 Schneider 的 *The Fascist Government of Italy*；Bornhak 的 *Das Italienische Staatsrecht des Fascismus*，载《社会科学（北平）》1937年7月1日，第2卷第4期，第739—742页。

在清华大学主办的《社会科学》（北平）发表书评，评 G. Salvemini 的 *Under the Axe of Fascism*。

这本书于1936年由伦敦 Victor Gallonez 出版，篇幅共445页。据钱端升介绍，作者本为佛罗伦萨大学教授，现执教于哈佛，是最负盛名的三个流亡在外的意大利政论家之一。钱端升转引作者自述，本书并未泛泛谈论法西斯经济、社会及政治制度，而是以法西斯主义自命已解决了的劳资关系问题，论述解决劳资关系问题的机构。钱端升指出，尽管这本书大多取材于官方文献，但读来依然十分有趣，因为作者善于安排，为数不少的数字、表格、引语，并未使本书难以卒读。据钱端升归纳，作者往往先提出问题，然后将相关问题的各种官方文献、讲话及新闻一一罗列，最终指出其间的破绽及可以驳斥的资料。作者指出，在法西斯主义下，工人与资本家绝对不平等，法西斯对资本家多有宽容放任，而对工人则管束甚严，工人的待遇也大不如前。

——钱端升：评 G. Salvemini 著 *Under the Axe of Fascism*，载《社会科学

(北平)》1937年7月1日,第2卷第4期,第743-745页。

8月9日

钱端升和罗常培等在欧美同学会晤谈。

【(接上)但是自从七二九以后大家的精神实在已经逐渐涣散了。城陷的那天,逵羽就躲入了德国医院。上午十时我到第二院巡视只碰见了郑毅生,章矛尘(廷谦),梁实秋和潘光旦。十一时到第一院,听说卢吉忱曾经来过一会儿,后来连工友的影儿都不见了。到了八月七日平津试行通车,海道可航,于是逵羽便首先离开了北平。第二天河边率日军入城,分驻天坛,蟒坛寺和铁狮子胡同等处,人心更加浮动。八月九日毅生,树人,公超,端升和我在欧美同学会晤谈,一部分便主张早立危城。于是十一日清晨公超、树人,实秋和姚从吾就陪同胡适之太太离平赴津。在张皇失措中从吾还给胡太太丢了一只箱子。】

——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载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1-152页。

【宓至西交民巷大陆银行,以适由中孚银行取出之八月清华薪金\$400存入摺中。次至欧美同学会,遇叶崇智、钱端升、饶毓泰等多人。由叶企孙招待众人及宓同午饭。宓既饥且渴。饭时,尚忆在柏林与彦登被叶、饶诸君请宴情景!饭后,饮茶甚多。】

——吴宓:《吴宓日记》卷六,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1页。

8月13日

全面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要胡适、钱端升以及张忠绶三人出使英美做非正式的外交使节。

【1937年夏,我返北大,刚到北平一周,“卢沟桥事变”突发,8月13日日本又在上海挑起战争,于是南京政府特促胡适、张忠绶和我等北大三教授赴美、法、英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的援助,……】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6页。

【全面战争发生后不久，蒋委员长要先生（胡颂平对胡适的称谓，夏红注）和钱端升、张忠绂等三人到英、美去做非正式的外交使节。但先生表示，他不愿意在国家危险的时候向外跑。他要留在南京，与城共存亡。中间经过许多朋友二十多天的劝说，始终没有劝得动。那时大家都认为先生在国际上的声望，只要先生能出去替国家讲话，对于抗战前途有很大影响的。最后由于傅斯年的竭诚劝说才答应下来，已是九月初旬了（雪艇先生与编者谈起）。】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613页。

9月6日

胡适致电江冬秀，告诉其出行消息。

【我日内就要出门，走万里路，辛苦自不用说，但比较国内安全多了。一切我自保重，你可放心。同行的伙伴有端升、子纓。】

——胡适：《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32页。

9月7日

高宗武、程沧波为胡适、钱端升一行饯行。

【晚上高宗武、程沧波为我们饯行。】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36页。

9月8日

胡适、张忠绂、钱端升动身从南京去武汉。此即正式出发，出使欧美。

【九点半到英大使馆访 Blackburn 参赞，谈时局。他说，英国海军太弱，在中国海只有四支巡洋舰，其中 Cape Horn 被困在长江，Sufforx 搁浅受损伤，只余两只船，有何力量？

关于英美关系，他是不信美国对远东有积极办法的。

见 B. Gage 秘书，小谈。

十点到铁道部宿舍，见汪精卫先生，他正在国防会议，嘱我小待。待至十一点半他才散会。谈次，我劝他不要性急，不要太悲观。

十二点到高宗武家，只我们二人同饭，久谈。我也劝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我说：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作战至少对外表明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

两点回寓，西服赶成了，三点送来。飞机票也送来了。

理行装。希圣、慰慈、书贻、陈立夫、志希、雪艇诸君来话别。

晚上八点半，正料理上船，空袭警报又起了。有翁咏霓、陈布雷、孟真、枚荪、之椿、慰慈诸人和我们父子两人同坐在黑暗中静候到“解除”的笛声，——我独自走到外边，坐在星光下，听空中我们的飞机往来，心里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有许多朋友的首都。

九点出门上船，慰、枚、椿送我们（端升、子纓、祖望）上船。布雷也一定要送上船，后来书贻也来了，劭力子、彭浩徐也来了。

十二点开船。同船的熟人很多，有蒋百里、王梵生、陈岱孙、之遇等。】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37页。

9月9日

胡适以藏晖为名，写信给郑天挺。

【……弟与端（钱端升）、纓（张子纓）两弟拟自汉南行，到港搭船，

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事不利，姑尽人事而已。】

——胡适：《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33 页。

【弟与端（钱端升）、纓（张子纓）两弟拟自汉南行，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事不利，姑尽人事而已。】

——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载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54 页。

夏红注：

此信应担心被日寇截获，颇多隐语。如“往国外经营商业”即指三人前往美国宣传国民政府之抗日，博取各方之同情；而“明知时事不利，姑尽人事而已”则道尽胡适等人心中的绝望而不失希望的心情。

9 月 10 日

午后三点船到九江。

胡适日记。

9 月 11 日

下午两点半，船到汉口。

胡适日记。

9 月 12 日

在汉口休息一天。

胡适日记。

9 月 13 日

胡适、钱端升一行登机出发。

【上午大雨，十一点到机场，十一点四十五分机由西安飞到，我与端升

上机，与送行之一涵、馭万、子婴、李得庸、庶为、太侔诸友告别。十二点几分，飞机起飞。

两点到长沙，停十分钟，经农、月涵、逵羽、皮皓白都来话别。五点四十五分到香港。

老同学郭铁如来接；中国旅行社邓宗弼来接。住半岛饭店，与端升同房。在铁如家吃晚饭。】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0页。

9月18日

胡适与钱端升因为飓风滞留香港。

【昨夜得报，台风即到香港，故今天还不起飞。

今天是第七个“九·一八”，我与端升在饭厅上吃晚饭，我说，这七年之中，今回总算用飞机炮火来纪念“九·一八”了，我们应该庆祝一次。我们就叫了一瓶白葡萄酒，举杯祝福前方的士兵。

同旅馆的有樊泽培君同他去年新婚的夫人，饭后我们四个人在楼下大厅上喝酒谈天。樊夫人甚美，是一种东方画中美人的美。樊君是矿冶工程师，我前两三年在火车上遇着他，我见他手中拿着的是 *Ivan the Terrible* 一书，颇诧异这个工程师的兴趣不狭窄。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我到他家去过，藏书都很有选择。】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2页。

9月19日

继续滞留香港。和陈伯庄夫妇餐叙。

【晚上陈伯庄夫妇与孙铁生（谋）夫妇邀我们到“国民酒家”吃海味饭，全是鱼，烹调甚好。此地有两处“全海味”馆子，一处是在 Repules Bay，

一处即此地，地不甚佳，而菜甚佳。

今夜是中秋，雨后月光不好。时时听爆竹声，是拜月亮的。】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2页。

9月20日

胡适、钱端升离开香港，抵达马尼拉。会见菲律宾总统。

【五点半起来，六点早饭，六点半出发，在机场等候机件验看完毕，直到九点卅五分才起飞。

同行者，我与端升之外，有应尚才与逾逢汉二君（铁部）。

从香港到吕宋，不是China Clipper，是Hong Kong Clipper，机为Sikorsky式，可坐十多人。今天机上客人只有五个人。

下午三点到达Manila，总领事涂允檀来接，他是北大英文系毕业的，后改学政治。到Manila Hotel，陆续来谈的有薛敏老兄弟，李清泉君（Lee C. Chuan），有各报访员，有学生会代表。

李君说，菲律宾总统寇桑曾说，如胡适到此，他愿留他住他家中。我说，见他一见亦无妨。李君打电话去，约了即见。我们去到总统府见他，小谈，喝了一杯酒，即辞出。他见了我，颇有点做作。端升说他没有架子，其实架子已很大了！天下政客多不过尔尔。】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2—443页。

9月21日

继续行进。

【昨夜到Oriental Club，赴国人领袖聚餐，说了几句话，即辞归睡觉。

一点半起来，两点吃早饭，到机场时还不到三点，四点半上China Clipper即起飞。作小诗记（早行）。

棕榈百扇静无声，海上中秋月最明。

如此海天如此夜，为谁万里御风行。

下午六点半，到 Guam 岛，共飞了 1589miles。

晚饭后，与端升散步海边，回到旅馆，侍者说，有一个中国人要见，我见名纸上写的是 A. B. Wong Pat, Wen. I. Maxwell School, Sumay, 请他来见，始知他是那个小学堂的校长，年二十八岁。他曾读《我的信仰》一文，故愿见我；我们的侍者即是他的亲弟弟。他们的父亲是一位美国海军里的仆人，就被带到此地，娶了土人为妻，就留在此。此岛共有两万人，日本人约二百，中国人只有三家。】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3—444页。

9月22日

继续行进。

【早起天未明起飞，下午日落时到 Wake 岛，共飞了 1508 miles。

这岛是一个珊瑚岛，满地是细纱，洁白如积雪。】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4页。

9月22日

继续行进。

【五点起飞，下午三点半到 Midway Island, 飞了 1185 miles。

这岛也是珊瑚岛。岛上多鸟。】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4页。

【在此得檀香山太平洋学会 Loomis 及梅总领事电，要我明晚作公开演说，复电允之。】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5页。

夏红注：

原日记如此。

9月23日

继续行进，抵达旧金山。

【早五点起飞，飞了1300英里，下午三点到檀香山。Mr. Loomis、梅景周总领事来接。得旧金山 Commonwealth Club 一电，Paradee Lowe 一电。

住 Moana Hotel。此间长者邀吃晚餐。饭后八点到 Dillingham Hall，人已挤满，无站立之地。

Frank Atherton 为主席，我说了整一点钟，态度似尚得体。

今天到此请林医生诊视，他说前天的热是由于喉咙受刺激，他给了我几种药。

Moana Hotel 在 Waikiki 海滨，夜深窗下的潮声荡人心魄，我竟不能睡。半夜后，明月照海上，更使我想起北戴河、秦皇岛与在君同住海滨消夏的生活！】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5页。

9月24日

天气不好，滞留一天。

【飞机又因太平洋东岸天气不好，停留一天。故我们只能偷闲玩一天。

上午访 Mrs. Benigna Green (Thurston Ave.)。

在留余斋吃中饭，饭后回馆休息。三时半以后梅总领事邀我们出去游览。到的地有 Punch Bowl、Pali View、Cocoa Head，景致都很好。

在留余斋大号吃晚饭，与李绍昌、陈荣捷、梅总领事诸人久谈。

回寓后，与端升闲谈到一点钟。】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6页。

9月25日

胡适与钱端升约别人来吃早饭。

【昨晚约 Dr. Min H. Li 来吃早饭。他与端升在 N. Dakota 同学，今天他们相聚甚高兴。他是一个最有成绩的医生。

Li. Col. Robert Candee (of The Air Corps of U. S. Army) 来谈，他是 Cornell 一九一五，与我同学四年，别后在北京见一次，在康桥见一次，这回见三次。他前晚来听我演说。

十一时到机场，十二时起飞。

梅领事来送我们行，托他发二电：

(1) 王儒堂大使：廿六偕钱端升兄到旧金山，是否即须来美京奉谒，或应在西岸稍留数日，均听尊裁，乞电黄朝琴兄转告。

(2) 黄总领事朝琴兄：廿六到。前次蒙侨胞盛大欢迎游行，此行为国难来，万不可招摇，务乞预为阻止至感。久飞甚劳苦，亟需稍息，在西岸留久暂，均听儒堂大使电示，故不能多做公开讲谈，务希预为留意。】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6—447页。

9月26日

从檀香山到旧金山。

【自檀香山到旧金山，约2400英里，中间无地可停，故这一夜在机上睡。睡铺也还不恶。

昨日傍晚，机升到万尺以上，完全在云上飞。这两天云多，望去真是千里无边际的白云海。

傍晚时云海有各种彩色，有黑山，有赤霞峰，有云海。今早起来时，我们还在云海上飞，全是白茫茫的云海。旧时游人所记黄山云海、庐山云海，何可比拟这种绝伟大的万尺以上云海！

上午十点到 San Francisco，黄总领事夫妇与各团体代表来欢迎，有中国飞机三四双在空中欢迎。到中华会馆茶会，小有谈话。

午饭后到大中华戏院演说，说了一点多钟，赵九畴君翻译。

晚上到两处宴会，甚疲倦了。】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7页。

9月29日

上午胡适发表演说。

【在 Commonwealth Club 午餐演说。题为“Can China Win?”，他们说，这是空前的大会。】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8页。

9月30日

继续行进。

【上午七时出门，到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早餐，有三十分钟演说。

到大学中见着 Prof Kerner 及 Prof Gettell。

又访 Prof Ralph Chaney。

到 International House，见着吴健雄及王伯琨女士。

在 U. C. 午餐，主人为副校长 Dr. Dentoch，见着雷兴等教授。谈中国学生事。

到马如荣先生家中小坐。

回到旧金山后，换了礼服，Mrs. Mclanghlin 来接我们到 Stanford Universi-

ty 赴校长 Wibur 先生夫妇的招待会。

回寓时已半夜，还没有吃晚饭，匆匆吃了一顿，一点后开始写我明晚广播演稿，直到天明。】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8页。

10月

钱端升去美国之后，钱太太住在林徽因家。

【临行的前夜一直弄到半夜三点半，次早六时由家里出发，我只觉得是硬由北总布胡同扯出来上车拉倒。东西全弃下倒无所谓，最难过的是许多朋友都像是放下忍心的走掉，端公太太、公超太太住在我家，临别真的是说不出地感到似乎是故意那么狠心地把她们抛下，兆和也是一个使我顶不知怎样才好的，而偏偏我就根本赶不上去北城一趟看看她。】

——林徽因：《致沈从文·四》，载林徽因：《林徽因诗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93页。

10月1日

应酬。

【上午五点半才睡，睡到八点，又醒了，只好起来。

午刻 General Gilmore 邀往 Boheimian Club 吃饭。这个 Club 是世界最讲究的一个俱乐部，我从前来过，今天遍览各层，更觉得这里面的设备布置真是讲究。

Gen. Gilmore 曾在 Cornell 作军事教官，至一九一二年才离开。

我们畅谈旧事，甚欢。

下午 Pardee lowe 来说，广播电台嫌我的讲词太厉害，要我修改。我大生气，告诉电台中人，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后来他们倒更客气了。

七点四十五分，到 Columbia 广播电台说了十三分钟。

十点到卧室，已得到王大使与 M. I. Brown 夫妇的贺电，可谓神速。】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8-449页。

10月5日

继续行进。

【午刻离寓，马君夫妇的车子送我们到飞机场。黄总领事夫妇都等来送。一点起飞。

过 Salt Lake City 以东，山高，飞机很不平，震动的很厉害。我还可支持，端升大吐。

在 Cheyenne 换睡车。

今天在上飞机之前，得读 Roosevelt 总统之芝加哥演说，欢喜赞叹，不能自己！】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9页。

10月6日

继续行进。

【早晨机停 Cleveland 时，因东方天气不好，故等了一点钟。本应八时五十七分到，直到十点始到 Newark 机场。共飞了二千六百五十英里，费时十八点钟！

于焕吉总领事、孟治、顾毓瑞三君来接。】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9页。

10月7日

赴华盛顿。

【半夜后两点上车，赴华盛顿。于焕吉君同我们行。】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50页。

10月8日

抵达华盛顿。

【一早到美京。住 Mayflower。

十点到大使馆，见儒堂大使。与他谈了约半点钟。

他开口就诉穷，说他的薪水每月只剩一百九十元，如何够用！见着馆中应尚德、谭绍华、崔□□诸君。

在馆中遇陶行知、林霖。】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50页。

10月9日

终日未出门。

【终日没有出门，看两日的各地报纸议论。在 The Nation 上读了两篇好文字。】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50页。

10月11日

傅斯年致电胡适。

【见到端升给京友两信，知到美后大忙。】

——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5页。

——傅斯年：《致胡适》，载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候候端升兄。】

——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9页。

——傅斯年：《致胡适》，载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10月18日

应酬。

【李国钦邀了四十个工商业、银行的领袖，如 Thomas Lamont 之类吃午饭，饭后他要我谈话三十分钟。

Roger S. Greene 来谈。

晚上孟治邀了十位朋友同饭，有 Dewey, Chamberlain, Malory, Stevens, Goodrich, Greene 诸人。饭后，他们问，我答话，颇痛快。】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50-451页。

10月19日

应酬。

【到 Garrison, Y. Y. 看 Dr. Paul Monroe, 与他一家同饭，下午回来。此公老了，平庸之至。

写信给陶行知，给冬秀，给雪艇及段、周、传诸人。】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51页。

【冬秀：

我九月廿六飞到美国，在西岸住了八点，又飞到美国东部。在华盛顿住了七天，现在到纽约，要住一两个月。】

——胡适：《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36页。

【(接上)此次飞机上飞了前后九天,走了一万二千英里,约有中国里三万九千里,我一点不觉得苦。端升有一次大吐,吐了一小桶,还吐了一地!他说,从今以后,不坐飞机了。你们可以放心。】

——胡适:《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37页。

夏红注:

此后直到1938年1月胡适日记散佚。

10月24日

王世杰致信胡适、钱端升。

【适之、端升两兄:

前接自旧金山发来电,知兄等已抵美;嗣接华盛顿发来第一电,知已抵美京。尊电均经转送介公阅过。今日复接端升兄十月四日航空函,知旧金山展览会系于1939年举行;但前电则被译作“本”年举行,以1939号码依“化密”本为“本”字也。当时以时间短促,万无方法参加,故弟复电未应允。兹既在1939年,则于接到请求后,弟当正式提请政府考虑,惟届时战争未了或和平秩序未恢复,则即政府已有预议,亦将不能实行。故政府之正式答复恐不能不稍缓。如兄等觉有从早予以原则应允之必要,即请兄等联名致一电于介公(由弟转致),弟当请其酌复。

战事情形,兄等从报章料可知其梗概。华北之挫折,大半由于无国防工事(我国防工事起自豫晋)与廿九军。晋军及万福麟等部之训练不足。上海方面,我军过去作战,真可动天地而泣鬼神。现时各军士气之盛有增无已,如国际形势日佳,当可持久。

九国公约会议,日方似已决定不参加。但无论日方参加与否,会议终必提出一种调解案。此案之内容如不将停战与撤兵并提,中国势难接受。中国如拒绝,则又不免减损国际同情。故为避免此种危难起见,以调解案中提出停战日期暨双方撤兵日期与撤兵地点于我为便。前日致兄等一电已略述此

意，想可收到（系由纽约领馆转）。

兄等在美谒晤罗斯福及其他人士详情，盼以飞函见示。美大学界能托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发起，邀人联名主张制裁否？手此，即颂
近祺

弟 世杰敬启

十月廿四日

刘君馭万自鄂返京，已见过。适之兄所嘱之事，因部款减发，不免微感困难。现决定由教部及公博所主持之宣传部，仍共凑足五千元之数，即日交刘君。附闻。】

——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369 - 370 页。

10 月 28 日

王世杰致胡适、钱端升。

【适之、端升兄：

日报近来颇假孟禄博士之名作关于中日战争之宣传。劭力子兄今晨送来情报一则，嘱烦兄等就近告知孟禄，并希望孟氏有所表示。兹将邵函及其附件附奉，请两兄酌之。

即颂

近祺

弟 世杰敬启

十月廿八日】

——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503 页。

11 月 9 日

傅斯年致胡适、钱端升长信一封：

【适之先生、端升兄：

上次的航空信，当早已收到了？花了我八元三角五，破我寄信之纪录。昨读端兄信，似尚未收到此信，甚怪，我是寄到纽约领事转的。

先作一报告：军事。平汉路自保定溃后，几不能战，直到□河，方才有千里而来之汤恩伯、关麟征来抵抗。General给关电云，北上皆军，你独无功，不必回来见我。关遂于漳河上消灭日军（半似闽变）数千，但日内安阳已失守了（彰德府）。宋哲元到此自告奋勇，蒋谓勉力试此最后一机会。近日邯郸一带有“反攻”传闻，大约如此。宋近驻大名及我的家乡一带。津浦路自开战以来，死得二千人！即未当打过之□□□。韩与倭贼大有互不侵犯之神威，精将团练均收在黄河之南。故山东省中黄河北境民不聊生，六个高丽兵杀了高庚孙，又走了（我家之北四千里）。山东省城之机关学校，大多迁往黄河之南。就山岙。似韩未与日立约，然彼此不打，韩坚拒中央军不入，盖“互不侵犯”、“心照不宣”也。目下桂军守陇海，大约长城即是此矣。

山西之吃亏，一由于刘汝州之不抵抗，致失天险。白在娘子关者，右翼为邓錡侯两师驻守，战二时即退，致中央方面不能持。今太原在包围中矣。山西军肯打而不能打，□□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此次北方将帅中，仍幸有阎、傅传二人乎。

上海方面，以血肉对飞机大炮，死伤之重，及大兵之勇超过世界的纪录。闸北之退，由于小南翔一带一师战斗（即将死力）之不足。……】

——《北大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162页。

11月10日

傅斯年致钱端升信件一封：

【端升吾兄：昨天给兄与适之先生信，希望此信与之同到。上月的信，花了我八块多，至今□□，盖由于无发外国航空信之经验，故纸与信封皆太厚。昨天之信内容更多，反而稍廉，可见经验哲学之有益——希望以此一意

告适之先生。

德国出头调停之一说，我所知道者如下：德国曾在南京试探空气。Trautmann 一晚请汪先生吃饭，饭后拉到一间中谈了些，大意是劝中国适可而止，并以德国在大战中之经验为言，谓当时早不乘机下台，至于不可收拾。……至于是否说明自己愿出头则汪未说。汪云，如他无政府训令，决不至有此谈话。此言是也。至于此外有无试探，我们不知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大着急，次日送一意见书，昨信中之第三附件是也。

德国方面，想来未必是放空气于列国间，尤其荒谬者，为程天放。程也跑到北京，由顾介绍见 Davis。Davis 问德国调停一说。程云，“未接到政府训令，然而他想不至于”。程又连问，北京会议失败为何，Davis 乃大教训他一番，大意谓你们政府应图其成功，不当专使想其失败。

汪告我时，亦谓此举太荒谬了。今日所谓“参议会”，我说，请兀傲脚步教训程某一下子，至少也到（一）申斥；（二）立即返柏林。会中无人反对。汪答应去说。

然而甚可怪者，即政府中多数意见，友人中多数，皆遇不重视德国也。夫德国固不应该忽略，与德之交情，只有经济，此一路上□□。若使德国影响我们的外交，即无异使德意影响我们的外交，即无异断送英美一路。中国人无论何事——外交与政治——每每不能守分寸，可欺。幸而此事老蒋似甚明白，七日即有一声明，□——不过为什么派蒋百里去德国呢？

国内政治亦有恶化，未见清明——此亦战时使然，诸公不见遇于忧国也。国家到这个田地，自然万分危险，亦惟有在此万分危险中，可以有高兴的兴致。

我们的外交，吃“结构”的亏很大，至于主张，大体上不至于错了。

希望三公多多尽力，此自不待说者也。友人生活大皆可乐。自上月中旬以后，敌未入城大炸，城外则损失不小，这一由于□□□□□□很进步了。一由于战线上激烈也。今日又入城炸，此为二十日来第一次也。雪艇又受居正之损逆，教育界前途甚不乐观，要之，一切战后算总账乎？

弟斯年

十一月一日】

——《北大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夏红注：

此时钱端升、胡适、张忠绶一行当已经在路上甚至在美国。傅斯年向钱端升报告程天放之无识，诚可谓切中肯綮。

至于傅斯年信中对于德国调停一说之论述与反驳，诚可从中窥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大事的关切与焦灼。

11月29日

胡适致江冬秀信中提及钱端升。

【你这封信写的很好，我念了几段给钱端升、张子纓两位听，他们都说，“胡太太真能干，又有见识”。你信上说，“请你不要管我，我自己有主张。你大远的路，也管不来的”。他们听了都说，“这是很漂亮的白话信”。

张子纓太太临走时，把他的书箱存在会馆里。后来警察沿门警告大家不可寄存违禁的书。会馆里的人发了急，就把书箱打开，把书都烧了。子纓很伤心。】

——胡适：《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39页。

12月17日

胡适致江冬秀，收到钱端升家信。

【今早九点醒来，门缝里有信，看了才知道是钱先生的家信，没有你们的信。（钱端升出门旅行了）】

——胡适：《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0页。

12月30日

胡适致江冬秀，提及钱端升。

【取过之后，我不曾寄钱给你，因为我走时，彭学沛说，他按月送钱给枚荪。大概后来兵荒马乱，老彭也没有送钱，枚荪也没有寄钱给你。

本来我们这回出来，除了每人一千五百元国币做安家费之外，我们都预备实支实销，此外不支薪水。后来我看张先生家中有病母病妻，钱太太又要生产了，所以我决定每人每月支两百美金的薪水，可以寄作家用。他们都寄了一点钱回去了。我因为你久没有信来，所以没有寄钱。现在我要汇四百美金给你。由新六或良才转，不够的时候我再多寄。】

——胡适：《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2页。

附记

张忠绶记述胡适、钱端升在纽约情形如下：

【编者附记：此时先生和钱端升、张忠绶在纽约的情形，据张忠绶的记述，附录如下：

他（适之）在美国活动的期中，心中念念想到的是国力的不足，与同胞的牺牲，很想以政治家负责的态度尽可能促成和平。某次纽约外交政策协会（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请他演讲。他一向喜欢说老实话，在演讲及答问中，他表示只要日本退兵，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那天晚间前国务卿史汀生亦在座。会后他邀适之和我到他家中楼下酒吧间内闲谈（我们曾在酒吧间墙上题名），我还记得很清楚，史汀生右手扶在适之的肩上，很诚恳的说，“你怎么能代替东北三千万人说这种话？”适之当时也很感动，只点首无言。嗣后政府退出南京，他却速电政府，主张“苦撑”。他向我说，我们此时不能求和，不得不对政府打气，可见适之是一个真正爱国的读书人。那年除夕晚上（民国二十六年），他坐在我的房间里，向侍者邀了一杯威尔忌酒，一边慨叹说：

“这般胡闹得人（指一般权贵），若果我国获得胜利，功臣必仍属于他们。”可见他早看到政府的是非赏罚怎么一回事，他在兴奋中拿起笔来，在他照片上题了几个字，送给我。作为他心情苦恼时共度除夕的纪念（张忠绶：《迷惘集》，页一一七，香港田风印刷厂承印，一九六八年出版）。

这时驻美大使王正廷（儒堂），他因急于为政府借款，和美国许多“混混”接洽。驻纽约总领事也加入奔走。一九三七年冬某日晚，余峻吉来旅馆看适之谈起此事，适之和我都请他转劝儒堂大使说，要借款，必须与正式银行家接洽，不宜假手于政客。余氏似不以为然。第二年王大使去职，即系因借款事出了问题。（张忠绶：《迷惘集》，页一二四）】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625-1627页。

1938年(38岁)

1月3日

钱端升从纽黑文回到华盛顿。

【端升从 New Haven 回来了。】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56页。

1月4日

胡适与张忠绶、钱端升等谈话。

【与端、纓久谈。端升甚不耐我们这种不活动的生活，但我们谈了许久，也想不出什么活动的方式。两点半方才散。】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57页。

1月13日

在纽约。

【与钱、张同去旅顺楼吃饭，约的朋友有 Lilian Taylor、Professor & Mrs □□共十人同饭。

饭后到 Lilian 住处喝茶，又大谈。这是一个北京朋友的聚会，大家都带一点苦中作乐之味。

半夜回去，我们三人找晚报和早报看。今天消息有美国派巡洋舰三只赴新加坡参加二月十四日的海军演习一事。最使人兴奋。】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64页。

【他（适之）和端升先到纽约，住在 Ambassador Hotel，端升住的房间只有八元一天。适之的客人多，需要一点空间，作客人的坐起，他只选了一个十元一天的房间，并没有其他像其他的正式或者非正式外交使节，动辄在旅馆中租一层楼（Apartment），至少也得租一个附有客厅的里外间。

谈起来很惭愧，适之、端升和我，我们三人所住的旅馆房间，以我住的最大最贵。原因是，我在汉口耽搁了两星期，抵达纽约时，Ambassador 旅馆里只有一间十四元一天的房间。我让给适之，他嫌麻烦不肯搬，住了几天后，有便宜的房间空出，我预备搬，但适之不叫我搬。他说，花钱有限，搬远了不方便，而且你管电报文件等，房间大一点也好，可见他待己薄而待人宽。

又如，纽约大旅馆门口经常有侍者伺候，代你叫汽车，开汽车门，你就得给他两角五；少了拿不出，且“有损国体”。适之和我们外出时，总不肯在旅馆门口叫汽车，承愿走街口或转一个小弯，不让旅馆侍者看见，然后再叫汽车，……可代公家省二角五分美金。那次我们三人同去美国，一切费用原是实报实销，而且根本不用记账。我很怀疑，换了另外一位像适之这样身份的，肯像他这样为国家人民省钱吗？

我们三人那次去美国，经费是由政府交给适之的，到了美国，适之要端

升和我每月拿几百元的薪金作为国内家中用度，此外个人在美国费用，实报实销，不用记账。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端升和我也都谢绝领取月薪，……嗣后我在政界服务期中，所见的长官能如适之清廉或稍能望其项背的极为少见，也许我所见的不广，但其能言行如一而不爱财的长官终属有限。……】
(张忠绶：《迷惘集》，第120-121页)

1月14日

中午坐车去华盛顿。

【午车往 Washington D. C.】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65页。

1月16日

回纽约。

【(凌晨)两点的车回纽约，太晚了，睡的不够。】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66页。

1月17日

钱端升生病。

【端升病了。】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66页。

1月22日

胡适与钱端升、张忠绶商议行进计划。

【与端、纓久谈。他们都想回去。子纓近日稍好，他想到 Washington 去

写文章，我不甚热心，因为他写文章太平凡，怕没有发表之处。

端升总恨无可立功，此念使他十分难过。他说，我们去年初到旧金山时，黄总领事背后问他是否我的秘书，他听了“差不多可以哭出来”，只好装作不懂，搪塞过去。

他今天说此事，我听了真“可以哭出来”。我们二人同行，同为国家做事，外人问这句话，有何可耻，何必要哭出来！

我深知中国士人不甘居人下，故事事谦逊，从不敢以领袖自居。但此种心理实在是亡国的心理。】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68页。

1月24日

胡适西行，钱端升、张忠绶送别。

【十点半上车，钱、张两位与潘□君送到车站。】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69页。

1月27日

胡适在芝加哥接张忠绶电，张忠绶因家电不得不归。钱端升亦有归意，胡适颇不高兴。

【得张子纓一电，说他得家电不得不归，今日就走了。我不知他走何路，也无法慰问他。

他去年早因家事想走，我也不劝他留，后来他决定不走了。

端升总嫌没工可做，今年病后也想回去。

我对他们说：本来深知来此无事可做，无功可立，所以当时不肯来。既来了，必须耐心住下去，有事就做事，无事就留心研究。

端升自信太大，自恃过高，总觉得来此无人赏识，无用武之地，故很牢

骚。子纓则因家事，心甚焦急。】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71页。

2月2日

胡适在明尼苏达发信给钱端升。

【车上发信给马如荣、黄朝琴、端升。】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75页。

2月3日

胡适致孙洪芬、叶良才、林伯遵信，提及近况：

【我在外五个月，全无成效可言，但既已来了，却又有不能不多住一些时的需要。同行之张子纓兄已因家事匆匆赶回国去了。剩下我们二人，更走不掉了。】

——胡适：《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4页。

2月4日

胡适接到钱端升长信一封。

【端升有长信来。英伦回电：“May preferred, letter follows.”】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76页。

2月21日

胡适向江冬秀报告行程：

【我这回出行，共须走一万多英里，现在已经走了六千英里了。昨夜离

开洛杉矶（即好莱坞所在地），明天回到西雅图，后天（二月廿三）出美国境，到加拿大。在加拿大本定住十四天，现在改成十八天，三月十三日回到美国境内。英国人要我五月去讲演，现在暂时决定不去了。】

——胡适：《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46 页。

2 月 28 日

胡适在加拿大路上。写信给钱端升。

【写信与 A. Stampar、Max Lerner、端升。】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 7 卷，联经出版公司 2004 年版，第 491 页。

3 月 18 日

钱端升等在纽约接胡适从加拿大回。

【早八点半到 New York。端升、于竣吉、许仕廉来接。】

【与端升谈甚畅快。】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 7 卷，联经出版公司 2004 年版，第 512 页。

3 月 28 日

胡适与钱端升谈。

【早晨从李家回纽约。

与端升谈。得孟真的长信，甚喜。】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 7 卷，联经出版公司 2004 年版，第 516 页。

3 月 30 日

胡适与钱端升、张彭春一道到大使馆吃饭。

【晚上与张彭春、端升到大使馆吃饭，稍谈。

回到旅馆与彭春久谈。】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17页。

夏红注：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未知钱端升、张彭春此次相聚，是否想起清华校长之事？

4月3日

钱端升与胡适等一起吃饭。

【与端升诸人在 Canton Village 吃饭。】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20页。

4月5日

胡适写了几封信给钱端升带往英国。为钱端升饯行。

【写了几封信给端升带往英国。

晚上为端升饯行。

今天战讯不佳，台儿庄已失守。敌军侵入江苏境。此次徐州战事已近三个月，成绩虽不劣，然牺牲精锐太多，念念寒心。】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21页。

4月6日

钱端升出发前往英国。

【今天端升坐 Queen Mary 船往英国，我送他上船。今天忽飘雪，送别殊难为怀。】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21页。

4月7日

胡适致信江冬秀：

【同行的两位，张先生一月底回去了，钱先生昨天上船往英国去了。昨天忽然大冷，有雪，下午下了五六寸雪。四月雪中送客，我很觉得寂寞。同行三人，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胡适：《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7页。

4月9日

是日钱端升致胡适信件一封：

【适之兄：

今天总算还平靖，趁早给你写信。

昨天是够兴奋的了。一清早起来，见 *Ocean Times* 载汉口消息，王师大败日人于台儿庄，斩伐二万人，俘枪一万多千（应为杆，夏红注），重炮三十，坦克、军车称是。小弟于是乎雀跃，我兄现不同行，只有找生人喝酒以贺，有如半岛酒店大祝九一八纪念之情况。我到船第一天遇见一位哈佛1928在汉多年之商人某，第二天又遇哈佛1929在宁多年之商人某，可惜昨天均没有碰到，于是乎酒也没喝成。而大西洋之恶风浪浪行真正扰人清兴，现打破了无数的磁器玻器及一大钢琴，又跌坏了好几个人。我下午在大沙发上午睡，也连人带椅的滚了出来，在地上一泻十五尺，幸而有仁人君子以洋大腿将我抵住，不然只（至，夏红注）少也将有破镜之危。船是慢下去了，须礼拜一深晚到 *Southampton*，当晚火车也不开了。今日仍有浪，料想不到目的地不会休止。小弟虽没有去过一顿饭，也没有吐，但如自比关公之遇华佗，处之泰然，那是大大的吹了。昨晚已经睡着了，约在11:30，前电来了。我翻

了第一字台，第七字捷，便不翻了。今天再翻，因是我想到的“台儿庄空前大捷！”毕竟我们均受了经传纲目及三国志式的名字熏陶乎？我想你老兄一定有机会喝几杯酒罢！

别来的是孤单单的。浪太大，兴趣也不佳。不但不能写报告，连看书也不大起劲。搭汕头的人也不多。两位小同学还不差。前晚更与一加拿大人及一纽西兰人乱谈，各人请了一道酒，实在无味。加人严守中立，纽人则一股英国式的胜人气及伪辩气，硬说中国人被杀被打是中国人人口太多又不肯战的结果。实在无味。所以今后与人讲话，也不能不先相面也。敬祝

旅安

端升 四九午

船明晨先到 Southampton，拟将此信寄掉，再发一电告平安。据报济南有战，离上海 50 米已有王牌军；四五月内丢汉口，成了杞忧，弟为□□，国家之庆也。

十日 晚

林先生及作述及一总领事之致意】

——《北大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1 页。

4月18日

是日钱端升致胡适信一封：

【适之兄：

船上二信一电，计达。多时伙计，忽告分离，在船上固极恋思，至今亦仍觉怅然。复初数次言过，云将函复兄，并请来英一游。兄如能来，望早电告复初，并告以行程之大概，俾事先稍做准备，则于接洽采访方面，可获较好之结果。以弟私意言之，固极云于骝先在欧时，兄能渡海一行；但孙哲生辈兄殊无遇见之必要，此时来欧，容有不便。如哲生客气地表示教意，则自当别论。

复初活动能力自远在王儒堂之上，但人缘亦不佳。大使真不易做。程沧波现已返国。闻程对之极有微言。但程亦殊多 Complexes。复初对 P. C. 感想颇佳，一班英人对 P. C. 亦似不恶，但有识者，无论中英，多笑 P. C. 而轻之。人民政府之王礼锡在此已久，熟人亦较多，识见亦不恶，非陶行知之所能及。渠对复初尚能有公平之判断。

骊先之来，英德均无多消息。有疑为将替程天放者，我意必不至于。

孙哲生一行，于去苏格兰前，于复初处吃饭时见之。彼无论公私谈话，均痛诋国联及民主政治之无用，而盛称苏联，街头大而思维索然，弟甚虑之。闻彼之俄行，无所谓成，亦无所谓败，因苏联已决定资助军火，非孙之所能增减。关于大使，闻廷黻天放均□□处于找人不见，人不来找之情形。廷黻返俄国之可能极小。孙荐孙夫人，蒋谓俟廷返国再议，今尚未见下文也。复初告我苏联助华已达三万万之数，足供机械化二十师之机械已首途去华。复初比我踴更乐观。彼以为华侨每年当有二或三万之法币之流入，再加以苏方不要钱之军火，我人尽可膨胀通货，而不虞有他。但即军火不花钱，我政府之军费政费以弟计之，每年仍需八万万（现值）左右，专靠华侨及膨胀，仍恐不敷。

工党甚弱。张伯伦之意约，似乎是骗英国人的。英国人的确可怕；如美国人不主正义，英国人总有一天牺牲我们，出卖我们。俄军火大部仍由港越。现越仍通，如港断越亦必断。美国外交之重要，即在使英国永远不致牺牲正义，出卖我国，以求妥协；是兄清意及之。

复活节中英国人均跑了，后日起始有人见，如有影像，当再函告。

纽约报如尚未定，请于定时书明，寄交程大使收；盖寄交我，德人或仍予以没收，看不到也。敬祝

旅佳

弟

端升 四，十八晚】

——《北大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2 页。

4月24日

胡适接钱端升电。作长信寄钱端升。

【晚七点回纽约。

端升有电来，说骊先之欧行改期，故他想回去了。

作长信寄端升，颇带规劝之意。】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32页。

4月26日

胡适致电陈布雷，阐述他和钱端升的主张。

【发一电与布雷，说我与端升都主张：此次国联 Council 开会，英国提承认意大利在 Ethiopia 主权，中国代表应投反对票。

作长函与梦麟诸同人。】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33页。

5月2日

胡适买一份报纸寄于钱端升。

【读五月的 Harper's，有一篇 Herbert Herring's "Where Are You Going, Mr. President?"，是一篇很详细的美国远东政策概述。他收到材料很详细，故他的结论与我的结论大致相同。他是不赞成这种政策的，他所焦虑正是我所最期望。因为他不赞成此政策，故他的结论可以作我的结论的印证。

另买一份，寄与郭复初、钱端升。】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36页。

5月3日

赵元任致信胡适。

【见端升及孟保罗兄，乞代致意。】

——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3页。

5月10日

钱端升致胡适英文电报一份：

【HBNLD SZ288

GENECE 36 9 1814

NLT DOCTOR HUSHIN AMBASSADOR NY

WILL STAY ENGLAND UNTIL END MAY OR JUNE IF LATTER WILL
ATEND LEAGUE UNION MEETING DENMARCHI EARLY JULY THEN HOME-
WORD KOOQUO HERE FOR WEEK WIRE GENEVA IF DICIDED TO COME
CHIEN】

——《北大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5月16日

胡适在印第安纳，接到钱端升电报。

【今天得 Geneva 来电是端升的码，我未带来，故决定回纽约去了。

晚上十一点上车。】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44页。

5月30日

胡适接到翁、傅电，要他去英国。

【得翁、傅一电，要我赴英国，并出席八月 Zurich 的史学会。】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53页。

6月7日

胡适发电、写信于钱端升。

【发电与 Greene，与端升。发昨拟电。

写长信与端升。】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56页。

6月11日

钱端升致胡适英文电报一份：

【NT74 CABLE = LONDON 14 11/1010A

LC HUSHIH (HUSHIH CARE THE AMBASSDOR HOTEL) =

AMBASSADOR NEWYORK (NY) (PARK AVE 51 ST & 52STS) =

TEMPERLEY REQUESTS ZURICH LECTURE ON HISTORICAL SUBJECT

WIRE REPLY =

CHIEN】

——《北大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6月14日

钱端升致胡适英文电报一份：

【SUBJECT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CHOSEN = CHIEN】

——《北大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6月17日

钱端升被遴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丁、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丁）项遴选者：
……钱端升……】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67-68页。

1938年4月之《国民参政会条例》第3条：

【第三条：国民参政会置参政员，总额一百五十名，其分配如左：

（甲）由曾在各省市（指行政院直辖市而言）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之人员中，共选任八十八名，各省市所出参政员名额，依照附表之所定，并以有该省市籍贯者为原则。

（乙）由曾在蒙古西藏地方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著有信望或熟谙各该地方政治社会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选任六名（蒙古四名，西藏两名）。

（丙）由曾在海外侨民居留地工作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熟谙侨民生活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选任六名。

（丁）由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选任五十名。】

——《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7页。

1938年6月16日《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3条修正全文：

【第三条：国民参政会置参政员，总额二百名，其分配如左：

（甲）由曾在各省市（指行政院直辖市而言）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之人员中，共遴选八十八名；各省市所出参政员名额依照附表之所定，并以有该省市籍贯者为原则。

（乙）由曾在蒙古西藏地方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著有信望或熟谙各该地方政治社会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遴选六名（蒙古四名西藏两名）。

（丙）由曾在海外侨民居留地工作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熟谙侨民生活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遴选六名。

（丁）由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

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遴选一百名。】

——《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修正全文》，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邹韬奋评国民参政会中的教授派：

【以前所谈过的党派，多少是有群众性的，即在他们的后面有群众，讲到所谓教授派，这一点是没有的。参政会中有十几位大学教授，他们因为平日往返比较接近，对于政治多多少少有一些共同点或共同兴趣，于是在开会期间，他们每有他们的小组聚会，交换各种问题的意见，在提案中互为声援，形成教授派的力量。这一派的人物有罗隆基、罗文干、陶孟和、周炳琳、傅斯年、张奚若、杨振声、钱端升、任鸿隽诸先生。】

——邹韬奋：《“来宾”中的各党派人物》，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71-72页。

6月20日

胡适寄钱、发电与钱端升。

【寄四百元与端升。发一电与他。】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61页。

6月29日

胡适发电给钱端升。

【发三电：一与端升，一与郭复初，一与顾少川。】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65页。

7月6日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开幕，钱端升未能到会。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于7月6日上午在汉口两仪路上海大戏院开幕。】

——《会议日志》，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页。

7月17日

胡适致江冬秀：

【后天（十九）我可以到法国，钱先生在那边等我。他见了我，就要动身回国了。

我托他带一只手表给你，这是我自己出去买的。只怕我不内行，不见得合用。你用用看，将来我见着合式的手表，再给你买一只。表带是可以伸缩的，你最好到一个表店去教他们教你用。】

——胡适：《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1页。

7月19日

钱端升接胡适。

【早到 Cherbourg。

端升早六点上船来，同吃早饭，七点同下渡船。特别火车专为船上客人开的，九点开，下午一点十分到 Paris。

顾大使与馆员四人来接。住 California Hotel，在 Rue de Berri。

下午五点，英王与英后来到巴黎，法国人民狂热的欢迎，甚有意义。我与端升也在大街上趁热闹，很有趣。英法之联结，是最大的和平力量。五月中捷克问题所以不成大战导火线，都由于英法的联合，此次英王、后之来，是这联结的一个表示。】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74页。

7月20日

胡适得蒋介石电，要其做大使。未定。

【下午得纽约转来一电，是蒋先生签名的，其意要我做驻美大使。此电使我十分为难。下午与端升谈此事，亦不能决。】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75页。

7月21日

胡适送别钱端升。

【在巴黎。

蒋先生电中说，“已由孔院长专电敦劝，”此电至今未到，故我未复蒋电。

与端升谈。下午五点，送他上车，他明早搭“*Aramis*”船回国去了。】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75页。

7月25日

钱端升致胡适：

【适之兄：赤堡与巴黎三日，久别，重逢，话旧，谈新，甚乐之。可惜这样一来，乘船后又有登“玛利后”之感，怅然难释，迄至今日仍然。甚盼一二月内兄即返国一行，再图长谈数日。

头等仅我一个唐人，二等有一 *St. Johannes* 粤人（留美，自费生），及一娶德女之桂人，三等则学生卅余（当中留美者，十余，为最多），故我做了“三等舱上行走”。学生中有不少极好的，有几位（在美即深知之）我深望翁部长能用之于建设事业，不知他有此自由否？这几天左眼红肿，不敢看书，幸而能谈天，不然太寂矣。洋人中有一比人夫妇，将返津，与顾湛然熟，亦早知湛然之恶耗；对中国内政及国际情形亦尚熟悉。

明日到 *Port Said*，可游开罗；但华人无去者，又热又贵，我亦懒于行，不想去矣！

华府事盼国内已有电来，而兄亦能早允回去。

敬祝

旅英顺利

端升】

——《北大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

夏红注：

从该信可推知钱端升上次痛苦万状之旅行系乘坐“玛利后”号轮船。

7月26日

顾维钧派钱端升给胡适转蒋介石的电报。

【这时候，蒋委员长有电报给先生（胡颂平对胡适的称谓），征求先生出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意见。这个电报到达美国时，先生已经动身了，驻美大使馆知道先生坐的船经过法国夏浦 Cherbourg 港口时会停的，于是把电报转到巴黎中国驻法大使馆去。驻法大使顾维钧要钱端升带了这个电报到 Cherbourg 港口去接先生。先生看了电报后，在港口和顾维钧通了一个电话，就坐原船到英国去了。到了伦敦，又和驻英大使郭泰祺、王景春等商量。隔了好几天，蒋委员长的第二个电报又到了。先生一向不肯做官的，他慎重考虑了一个多星期之后，觉得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只有同意。他复蒋委员长电报的大意这样说：“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这个电报复了之后，有一位朋友来问：“胡先生，蒋委员长给你的电报，你怎么不复呢？”先生说：“我已答应了，电报也复了。”这位朋友说：“我知道你复的是他的第二个电报；我问的是他第一个电报。”先生说：“我已同意了，还要复他的第一个电报吗？”这位朋友又说：“在官场里，委员长给你的第一个电报，你总得要谦辞一番；你怎么没有经过谦辞的手续就答应下来呢？”

但先生就没有这样做。

(参见胡颂平：“从适之先生的墓园说起”，载《传记文学》四卷二期)】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638-1639页。

胡适在1962年1月7日回忆起此段往事：

【先生为了郭亮宇辞职的事，胡颂平谈起行政界的官样文章，先生因而说了他自己的一个故事：

“廿七年八月里，我在国外替政府做非正式的外交工作。蒋先生那是还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不是总统。他打电报到纽约去给我，征求我当驻美大使的意见，那时我已经离开纽约，坐船到英国去，驻美大使馆知道我的船经过法国夏浦（Cherbourg）海口会停的，于是把电报转到巴黎中国大使馆去，顾维钧大使请钱端升带了这个电报到夏浦海口去接我。我看了电报，在海口和顾维钧大使通了一个电话，就坐原船回到英国去了。到了伦敦，又和郭泰祺大使、王景春先生几个人商量。隔了好几天蒋委员长的第二个电报又到了。我慎重考虑了一个星期，觉得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只有同意。我复了蒋委员长一个电报，大意是这样的：‘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这个电报复了以后，有一位朋友来问我：‘胡先生，蒋委员长给你的电报，你怎么不复？’我说：‘我已答应了，电报也复了。’这位朋友说：‘我知道你复的是他的第二个电报。我问的是他第一个电报，你还没有复。’我说：‘我已同意了，还要复他的第一个电报吗？’这位朋友说：‘在官场里，委员长给你的第一个电报，你总得要谦辞一番；你怎么没有经过谦辞的手续就答应下来！’我就没有这样做。”】

——胡颂平编：《胡适之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69-270页。

胡适由美国抵达伦敦，最后决定出任驻美大使。

【回寓后又修改此电，半夜后始决定，此时恐无法辞却；既不能辞，不

如“伸头一刀”之为爽快。故最后修改电文为接受此事。】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79页。

7月30日

胡适致江冬秀：

【钱端升先生七月廿二日从法国启程回国了。我托他带上一只小手表，值不了多少钱，但还不讨厌。那表带可以伸缩的，你试试看就知道如何带了。】

——胡适：《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4页。

8月18日

胡适得一电，似乎是钱端升的。

【得香港一电，似是端升来的，全不能译，似有误。到大使馆，与田成之同看此电，也不能译。】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90页。

8月20日

胡适译出钱端升的电报。

【译出端升电，云：

儒堂给假两月，应代办。尊事未公开，似有鬼。请勿有所举动，俟到□后，再告。……

我复电云：greatly amused。】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91页。

8月24日

张忠绂致信胡适。

【再端升兄前由美寄弟舍间之六百元，除一部分为弟之旅费外，尚余中洋一千一百元左右（银行按法定兑换率付给）。此款本为弟报告国情之用。但返国后，弟感觉弟因对实际情况隔膜，无法做真实报告，此款迄今尚存弟处，将来恐亦用不到。是否应存弟处，候先生返国后再说，祈赐知。此款数目过小，似不便重行寄呈。惟既为公款，此款自应将将来呈交先生转还公家。敬请旅安。

弟 张忠绂谨上 八月廿四】

——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9页。

8月26日

新六飞机失事。钱端升致电胡适。

【早饭后得端升电，说没“新六兄闻无恙，尚待证”。我深愿其确。】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94页。

夏红注：

从胡适日记来看，钱端升此消息不可靠。几乎同时法文报已经报道此事，死者一为徐新六。张慰慈来电亦云新六死。胡适“发电与梁璠立，说此事与一年前袭击英大使案同例，应向国际公法学会提出”。日记七，第595页。827日记确定新六死讯。

8月29日

陈之迈致胡适。

【子纓先生回来时所述尤详。端升先生回国后尚未见到。】

——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9页。

9月4日

胡适收到新六绝笔信。提及钱端升。

【得香港空邮两封，一封是新六八月廿三日的信，次日他就死了！这是他的绝笔遗书，其中为我计划甚周到。他自己是为国事死的。我看此信后始知之。

他劝我不必与小人闹争。

兄复端升谓 *greatly amused*，兄意弟甚了解。弟意兄仍佯为不知，任其自然演变。如仍请兄担任，务勿推却。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也。

良友良言，以后何可再得？】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601页。

9月13日

胡适正式担任驻美大使。

【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今天下午王亮畴有电来贺。

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606页。

罗加伦在1956年2月9日口述《胡适之出任驻美大使经过》中有两段关于钱端升的记述：

【这时候胡先生在欧洲，同他一道旅行有协助他任务的是钱端升。据钱端升告诉我，胡先生接到这电报以后，考虑了一个整夜几乎没睡。当然他一方面感觉到责任的重大，另一方面又不忍放弃他为学而不从政的宿愿。最后他决定干了，复电回国，政府自然表示欣慰。】

——罗加伦：《胡适之先生出任驻美大使的经过》，载罗久芳：《罗加伦

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胡先生仍然抱着一种独来独往的态度，不愿意自己带人帮忙，只调了当时芝加哥的总领事陈长乐担任大使馆参事。可是因此得罪了钱端升。不幸陈长乐又是一个毫无办事能力的人，于是使胡先生累得不堪。后来我为他设法从英国郭泰祺大使处调了刘锴去代陈，方才减少了若干琐事的麻烦。】

——罗加伦：《胡适之先生出任驻美大使的经过》，载罗久芳：《罗加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夏红注：

此二段资料很有意思。钱端升与胡适的交往是否果如罗加伦先生所说？此待考胡适日记中对和钱交往的相关记载。更加有意思的是，就这一点，是否可能为钱端升在1949年后跟随中共的号召批判胡适先生留下了伏笔？但愿夏红乃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

当然由此亦引发一点，就是钱端升和罗加伦的交往，亦应给予一定的重视。

夏红再注：罗加伦此说不甚妥。具体可参胡适725至818之间的日记。

9月

钱端升前往西南联合大学执教。（确切日期？）

【……及至1938年返国时，北大已与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校址先在长沙，继在蒙自，最后落脚于昆明。自此以后到抗战胜利结束第二年返回北平，我一直在西南联大任教。抗战期间，我除努力教书，宣传抗战，抨击弊政外，曾于1943年撰著了《战后世界之改造》一书。】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6页。

9月16日

钱端升致胡适信一封。

【适之兄：

到汉后，二十三日发一明电，昨又发一密电（恐今日始发得出），计达。这几日来，新六等之死耗常缠绕于脑际，万分的不高兴。昨日下午在布雷处有人来报告，说新六未死，于是电中带及，欲有以慰兄。昨晚又知新六确死，欲将原电一改，则骊先又谓不必改了，让适之高兴一下罢！如果新六真能泅水而出，躲在乡下人家，那岂不佳哉？

昨由布雷陪觐。布雷先告我，蒋回彼即告儒堂给假事，又告蒋我在香港亦听见一些传说。蒋谓：“我不知道，催孔快征同意发表，适之先生我决借重”，继又谓：“王大使不能再留。”布雷请其于致函孔时亲自提及之，蒋颌首，and with a knowing smile（并作一会意的微笑）。盖近来“侍密印”之电又不甚吃香，与家族中往来之电文，须亲笔书始灵，蒋亦知之也。又布雷并告蒋：“我已请端×××电适之××”（即明电云云），蒋曰好极。我见蒋，其精神颇佳，且作极愉快状，所谈者俱不相干。我自己极高兴，因为有机会讲到自身行止，告以北大欲我回去继枚荪之事。彼即曰很好。继问布雷钱××是否参政员，布雷曰然，此更满足了他位置人之苦衷。此次孟邻至诚，我即应为教授。既而畏此间有麻烦，因允接枚荪院长名义，冀可少些拉扯。但自蒋处出来，布雷大感其窘，盖布雷曾受人之托，欲另为我设法者也。骊先亦不以返滇为然。但我既得老总面云，有布雷为证，当可不受拉扯，得意者盖在此也。

近日南岸战事极烈，恐将不支。

回国最感痛苦者，即国人之散漫及无组织。香港高等华人之享乐挥霍无论矣，此间大员亦多如是。老孔事情抓不起，老总不好亲来，乱而不举，我国之谓也。但一般精神尚不差。

我在此无事，距接着期尚早，距开学期更早，拟去重庆一看。一有飞机票即行。敬祝

旅佳

端升

(九月)十六日】

【慰慈兄：廿二日短函悉。以后未接信。二航函俱收到否？近无钱颇窘。新六究如何？与适之函仍乞阅后转□。端升】

——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1—382页。

10月5日

罗加伦致胡适信一封，提及钱端升：

【端升在此。孟真前日由昆明来。】

——《北大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10月9日

在《新民族》发表《论外交根本政策》一文。

钱端升开篇即提及，“我们过去从没有一个眼光比较远大的外交政策。我们现在急需建立这样的—个外交政策”。钱端升结合英美法荷比瑞士等大小国家的历史，将外交政策“历久可以不生多大变动”的稳定性，视为“比较兴荣、比较稳定”国家的标配；认为巴尔干、中南美及亚洲多“政乱民贫”，因此没有基本外交政策；而德国、日本属于第三类国家，即地势及土地使得他们有望成为“比较兴荣、比较稳定”的国家，“但因缺乏远大的外交政策，以致盛衰无常”。钱端升更认为中国百余年来外交史，也是缺乏—定的外交政策，“我国近百年来外交之缺乏定策，诚是莫可讳言之事”。在这种情况下，钱端升提出，中国现在意志统一，该制定基本的外交政策，以脱整乱民贫之讥讽或盛衰无常之恐惧。

在钱端升看来，中国外交政策应从如下诸层展开：

就日本问题而言，我们的目标如下：第一，彻底摧毁日本的武力；第二，宽大对待日本人民，帮助日本成为民主国家；第三，帮助国联提高权

威，赋予国联强有力的制裁能力。

就四邻旧有属地而言，应要求国联及早成立一个保护弱小民族、给予弱小民族自决权的政策，使之广泛适用于全世界，而不是高丽、缅甸、越南等中国邻国，由此使得“毗邻我国的许多小民族必可得公平的待遇，而我与列强之间也可免除发展的冲突”。

就散居南洋及美洲的侨民而言，如何一方面厚待侨民而另一方面又不使得荷兰等国不安，也值得未雨绸缪。

就世界局势而言，如果中日战争结束时世界大战尚未开始，中国应全力防止世界大战的爆发；如果大战不可避免，则中国应竭尽全力以最大的武力或经济力来援助被侵略者。

就国联而言，中国应以信义和平为国际信条，联合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拥护国联、光大国联，发挥国联的实力，善于“拥护和运用国联”，甚至在国联中采取新的积极政策，除了关于中国事情取得国联援助外，有关公益的事情亦可在盟约范围内联络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提出于大会，在国联中博得“富于理想主义”的赞词。

钱端升申言，上诉建议绝非空想，而有利于抗战，尤其有利于消除台儿庄战役后欧美人士对中国胜利后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的担忧和恐惧，使之可以毫无保留地帮助中国。而出此政策之外，“我敢说，和平及国联的政策为唯一的康庄大道，其余的或等于无策，或则绝难成功，更绝无永久的可能”，“只有和平堪作长期的外交政策”。

——钱端升：《论外交根本政策》，载《新民族》1938年10月，第2卷第13期，第1-3页。

10月20日

在成都写完《建设期内的行政改善》一文。发表于11月16日《新经济》创刊号。

——钱端升：《建设期内的行政改善》，载《新经济》1938年11月16

日，创刊号，第9-12页。

10月

在《时事月报》“捷克问题与国际局势论丛”发表《慕尼黑协定与欧洲的和平》一文。

钱端升开篇表示，随着《慕尼黑协定》的签署，捷克问题已暂时解决，德国一时不致再有任何明显的压迫，而捷克更不可能对德国做任何反抗，这使得欧洲的局面暂时稳定，也为英德法意一般人民所热烈欢迎。但钱端升同样指出，从欧洲前途来看，这种解决方案无异于饮鸩止渴，“不可免的大患则正伏于是”，欧洲的真正和平，或者说世界的真正和平，必须以资源公平分配及国际贸易充分发达为基础，但要建立这种基础，国际条约需要尊重，而国际纠纷亦必须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评价《慕尼黑协定》，则需要看该协定究竟是促进和平，还是使得和平更加艰难；钱端升表示，如果希特勒由此知道英法更可欺压，肆无忌惮，欧洲战火终将难免，四国协定亦会成为罪人。而希特勒究竟如何不可预测，但钱端升强调，德国当时的版图及势力，距离希特勒《我的奋斗》所揭示者尚远。

——钱端升：《慕尼黑协定与欧洲的和平》，载《时事月报》1938年10月，第19卷第5期，第17-18页。

10月28日-11月7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召开，钱端升出席。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开幕。】

——《会议日志》，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页。

11月1日

钱端升附署之胡景伊等提拥护蒋委员长持久抗战宣言案二件。

其一：

【会议并案讨论了陈绍禹、陈嘉庚、王造时、胡景伊、张一麟等，关于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强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反对妥协投降的五项提案，提出并通过了《拥护蒋委员长决议案》；通过了胡景伊等关于电慰德安作战部队及坚守牯岭孤军，以励士气的议案。】

——《会议日志》，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311页。

提案原文：

【胡参议员景伊等四十四人提拥护蒋委员长持久抗战宣言案

同人等于参政会开会之日，适读最高领袖告全国国民之重要文书，用意殷肯，以持久抗战相勸勉，聆诵之下，感奋无极！自抗战开始之初，我最高领袖即以持久战、全面战、主动战三义诰诫国人。一年半以来，敌人以猛烈之炮火全力攻我，但一加检查，除焦土死城外，敌人所得于我者几何？而我则愈战愈强，愈打愈坚。敌人之军力被我歼灭者达数十万，其经济资源之耗挫，更难以数计，此皆我最高领袖用兵神武，艰苦领导之所致。今者羊城虽失，武汉虽陷，而我之长期抗战之人力物力，则犹是充优无比。吾人须于最高领袖率导之下，勇力以赴，则抗战建国之目的，终有达成之一日也。同人等敬念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教义，除非少数无耻之汉奸外，百分之九十九决无愿做奴隶牛马者；苟有之，必以死御之。

提案人：胡景伊 马乘风 张元夫 何永信 韩克温 沈钧儒
吴玉章 于明洲 李永新 陈锡珖 齐世英 郭英夫
周士观 张一麟 王卓然 李中襄 罗衡 秦邦宪
陈绍禹 刘百闵 王启江 张炽章 王亚明 钱端升
陈希豪 张彭春 陶希圣 陈博生 王志莘 张肖梅
李鸿文 孔庚 高惜冰 姚仲良 徐柏园 王世颖
居励今 麦斯五 罗文干 李仙根 郭任生 杨端六】

——《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胡景伊等提拥护蒋委员长持久抗战宣言

等案及决议》，载《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8—99页。

——胡景伊等：《拥护蒋委员长持久抗战宣言案》，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页。

其二：

【王参政员造时等六十六人提议：

参政会应发表宣言，拥护蒋委员长告全国国民书，并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奋起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

提案人：王造时 章伯钧 张申府 张元夫 林祖涵 张炽章
 王冠英 林 虎 杨子毅 张竹溪 张肖梅 杭立武
 王卓然 陇体要 冷 僑 罗文干 张剑鸣 罗 衡
 李仙根 荣 照 马 亮 周士观 王志莘 齐世英
 骆力学 吴绪华 李永新 张一麟 李元鼎 张彭春
 程希孟 韩克温 史 良 张 澜 李鸿文 陈绍禹
 席振铎 邵从恩 郭英夫 仇 鳌 高惜冰 罗隆基
 董必武 沈钧儒 李元鼎 马乘风 吴玉章 陈启天
 胡景伊 左舜生 于明洲 杨赓陶 秦邦宪 何永信
 刘百闵 王亚明 王启江 陈博生 陈锡珖 陶希圣
 周 览 陈其业 钱端升 于 斌 陈希豪 陆鼎揆

决议案文：

本会同入读蒋委员长本日告国民书，至为感奋，全体一致拥护，并于同日将胡参政员景伊等四十四人所提拥护蒋委员长持久抗战宣言案；张参政员一麟等四十一人提为抗战到底，宜由本会决议宣言，请政府明令公布，以防反间而定人心案；陈参政员绍禹等七十三人提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案；王参政员造时等六十六人提参政会应发表宣言拥护蒋委员长告国民书，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奋起继续抗战案等案，合并讨论。决议：拥护蒋委员长所宣示全面抗战持久抗战争取主

动之政府既定方针。今后全国国民应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决抗战，决不屈服，共守弗渝，以完成抗战建国之人物。决议通过。

（原载 1938 年 11 月 2 日《新华日报》）】

——《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胡景伊等提拥护蒋委员长持久抗战宣言等案及决议》，载《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2 - 103 页。

11 月 2 日

钱端升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提议设立特种委员会审查外汇与外贸交易。

【会议根据钱端升的提议，决定设立特种委员会审查管理外汇与对外贸易。】

——《会议日志》，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11 页。

钱端升提案，《管理贸易及外汇方法改进案》。

【重要提案目录：

.....

（四）关于财政经济事项建议案

.....

2. 管理贸易及外汇方法改进案 钱端升等】

——《重要提案目录》，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24 - 327 页。

11 月 15 日

张奚若、钱端升访吴宓。

【午饭时，张奚若、钱端升等来。饭后，奚若谈参政会议谐闻。俗士捧腹，而有心人感伤矣。】

——吴宓：《吴宓日记》卷六，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8页。

11月16日

在《新经济》发表《建设期内的行政改善》一文。

写作本文的立意是在对战后的国家做事先种种筹划，而种种筹划中又以行政改善为要；行政改善则是技术问题，需要得人、得法，而且需要长期努力才能见效。与行政改善相比，大计的树立则需要围绕三民主义，“谁能真正实行三民主义，谁即可为领导的政党”。就外交政策而言，钱端升认为中国取得生存独立后，以和平的理想、温和的态度与四邻相处，赞助一切和平组织，参加一切和平运动，最终促成世界的真正和平。就经济政策而言，核心在于平均地权及节制资本。就民权政策而言，全民行使政权是最终理想，政制演变亦须顺应民权化的趋势。钱端升指出，上述诸多大计，确定不难，关键看能否得人、得法，钱端升指出，“姑且不论抗战期内的行政，即以未战以前的数年而论，行政人员与行政方法已不能担负当日的政事”，“我敢说战事初结束后的起初几年内，政治上最严重的问题，决不是宪法议会等一类富有政治性质的大问题，而是怎样训练并录用新的行政人员，怎样改善行政组织及行政方法等一类不具多少政治性质的行政问题”。

钱端升列出如下五个方面的行政问题：第一，战后的行政组织中，应充分发展独立、半独立的业务法团，与普通行政机关有别，以法人的形式处理工商管理等公共事务。第二，应广为采用半司法性质的机关及方法，充分允许利益相关者做充分抗辩，改善官民关系。第三，应减少中央直属机关的数量，同时适度允许其组织上的差异化。第四，等战事结束，重订省区的地理面积及职权，适度允许省与省之间的差别化。第五，基于上述改革意见，建设期内法律人才将严重匮乏，应未雨绸缪，及早准备，“我国素向缺乏优良的法律学系，法院的法官既呈江河日下之势，地方政府则向少有过法律训练的公务员。我们此时如不一洗轻视文法及马虎办法律系的精神，而加紧法律人才的训练，则不特我上面所述的新式团体及地方政府将无法进行，恐现有

的法院及行政机关亦将缺乏必要的法律家，而永不跑上轨道，永不能改进”。

——钱端升：《建设期内的行政改善》，载《新经济》1938年11月16日，创刊号，第9-12页。

11月26日

钱端升担任战区学生救济及寒苦学生贷金委员会委员。

【（4）改组战区学生救济及寒苦学生贷金委员会。请樊际昌、潘光旦、朱自清、杨石先、叶公超、李继侗、钱端升、赵友民、陈总、江泽涵、邱椿、张泽熙为委员，并请樊际昌为召集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

【聘请樊际昌、潘光旦、朱自清、杨石先、叶公超、李继侗、钱端升、赵友民、陈总、江泽涵、邱椿、张泽熙诸先生为本校二十七年度战区学生救济及寒苦学生贷金委员会委员，请樊际昌为召集人。〈通知、公布〉】

——《第九十五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11月30日

钱端升发起办刊，邀请朱自清等讨论刊物名称。

【晚钱端升请。钱发起办刊，讨论期刊名称，结果倾向于叫《中论》。】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61页。

12月1日

在《世界政治》发表《论国联政策为唯一正大而有利的政策》一文。

本文写于“自主外交论”甚嚣尘上之际。钱端升开篇即批评中国外交领域两种根本不成政策的政策、不成办法的办法：第一，随便应付与中国

无利害关系的国际事件，消极对待，错失为国家争地位、博名誉、交朋友的好机会；第二，遇到与中国利害攸关的事件而自身又不能或武力爽快解决，便做单相思依赖他人，想当然地要出奇制胜、合纵联横。钱端升指出，“我们应有，我们也只配有，讲信义、爱和平的正派外交政策”，“最正当最自然的外交政策当然是拥护国联的外交政策”。鉴于此，钱端升指出，尽管国联政策眼下对中国抗战难堪大用，但依旧须坚持，“凡于我有利的外交行动，无一不可与国联政策相辅而行，而且可以相得而益彰”，而“与国联政策不相容者，只有接近德意及与日妥协的两种政策。这种政策俱是要不得的”。钱端升坦言，抗战爆发后国联对中国援助有限，但这不是国联之过，而是国际形势所造成，纵向看国联对中国的援助略有进步，因此中国馆“正应以全力促援助的加增，而不可轻易改辕易辙。……为用久的将来，我们更应放大眼光，以大民族自居，有大理想，而以建立世界和平的责任自任”。

——钱端升：《论国联政策为唯一正大而有利的政策》，载《世界政治》1938年12月1日，第3卷第9期。

12月13日

钱端升应邀代表西南联大参加与北平图书馆合作的中日战争史料委员会。

【十三日请钱端升、冯友兰、姚从吾、刘崇鋳代表本大学加入与北平图书馆合作之征辑中日战事史料委员会为委员。】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

【本校与北平图书馆合作之征辑中日战事史料委员会
委员 冯友兰 钱端升 姚从吾 刘崇鋳】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二、议决事项：

（一）请钱端升、冯友兰、姚从吾、刘崇鋮四先生为本校代表，加入本校与北平图书馆合作之征辑中日战争史料委员会为委员。】

——《第九十七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12月16日

朱自清日记载，钱端升所办刊物名称定为《今日评论》。

【参加钱的晚餐会。会上讨论周刊的名称，花去三个小时，最后大多数人同意定名为《今日评论》。】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页。

12月27日

钱端升当选联大校务会议教授代表。

【二十七日（1）本大学教授会开会。推选二十七年度本大学校务会议教授、副教授代表。计选朱自清、陈总、叶企孙、陈福田、钱端升、张奚若、刘崇鋮、叶公超、杨石先、庄前鼎、查良钊等十一人为代表，潘光旦、汤用彤、罗常培、曾昭抡、李辑祥、邱椿为候补代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页。

【一、报告事项：

（一）梅主席报告：据本校校务会议司选委员会主席吴有训先生报告，本届本大学校务会议依照校务会议组织大纲，应由本校教授、副教授互选代表十一人参加。兹已票选竣事，计共收到选举票八十四张。开票结果计当选为本届本大学校务会议教授、副教授代表者十一人为：朱自清、陈总、叶企孙、陈福田、钱端升、张奚若、刘崇鋮、叶公超、杨石先、庄前鼎、查良钊诸先生；候补当选代表者六人为潘光旦、汤用彤、罗常培、曾昭抡、李辑祥

(工学院)、邱椿(师范学院)诸先生。〈通知〉】

——《第九十九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二、议决事项

.....

(十一)国立北平图书馆所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章程”，本大学未经接受。关于征辑中日文之史料，可由本校图书馆担任，整理工作由本校历史社会学〔系〕及政治学系依照本校教师姚从吾先生所拟办法办理。并已由本校与北平图书馆合组一“征辑中日战事史料委员会”，本分工合作之旨共策进行。所有本校事务组转来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先生函请本校为该会备办文具桌椅事，因本校限于经费碍难照办。〈通知〉】

——《第九十九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1-82页。

【12月27日，召开联大教授会。推选本年度联大校务会议教授、副教授代表。计选朱自清、陈福田、钱端升、刘崇鋳、叶公超等11人为代表，潘光旦、汤用彤、罗常培等为候补代表。】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18页。

【晚餐后，钱先生谈及选举大学评议委员会事，他认为现在这种选举颇不适宜，并建议事先应做好充分准备，使人选的分配更合理些。根据目前情况，清华应有七个名额，北大应有两个名额，南开只有一个名额。他还建议全体教职员代表也采用这种复选提名的方法。】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66页。

夏红注：

具体情形当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中相关会议记录。

12月29日

钱端升致胡适短信一封：

【适之兄：

十月十六、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一日各函，是否均已收到？

渝中来函，谓兄在纽约病；后又来函，云已告痊，且云兄极乐观，至慰。朋友均谓酒不可多喝，亦不宜太晚睡。留得好身体做些事，是一件重要大事。以兄勇气之大，当尚能与多酒少睡之魔断友谊。敬翘企以请顾也！再不然，请太太渡洋，也是办法。

汪先生之走，令人只见甚愚，不见甚智。有谓蒋汪二公唱双簧者，我未敢信。美方空气对此事当至恶劣，但尚未有所闻。

奉上去了编的新刊一份，希望兄能赐一关于大事之大文。孟真已到，但尚忙于院务及采消息，未深读也。

敬祝：

一切如意。

端升

二七、一二、二九】

——《北大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1939年（39岁）

1月1日

钱端升在《世界政治》发表《国联政策的实施及运用》一文。

在《世界政治》1938年12月1日第3卷第9期发表的《论国联政策为唯一正大而有利的政策》结尾，钱端升已埋下伏笔，“以上所说明的为国联之应拥护，国联政策之兼利于将来及目前，及其他政策之无一可。至于我们应如何

拥护国联，远以谋国联的成功及和平的建立，近以谋抗战时的助力，则容下期另作一文以述之”。而接下来这篇《国联政策的实施及运用》便是锦上添花之作。

对于国联政策的实施及运用，钱端升认为应做的事情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关于国联本身的威力，需要做到如下几点：第一，为了维持国联的威信，恢复国联的威信，培养国联的威信，对于制裁应有忠诚的主张，并力求相关主张的贯彻。第二，为增加国联实力，应该劝诱美国加入国联，同时赞助苏联继续成为国联的忠实会员国。第三，国联的成败取决于各国军备的缩减或扩充，国联应提出合理的军缩计划，并要求会员国、非会员国共同奉行。第四，国联在军缩之外应致力于世界资源的重行分配，促进各民族经济欣欣向荣的发展。第五，我国应积极忠实履行国联的义务，及时缴纳会费，积极执行相关决议案。

第二类是我们应做且与中国和国联都有联系的，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中国应广为搜求若干人才，使之服务于国联秘书处及劳工局，提高国联各机关负责人对中国人的好感与器重。第二，国联同志会应该扩大组织、增加活动。第三，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核心，运用国联取得援助，增强抗战实力。钱端升亦将之分为三类：第一，财力较富有的国家应直接向中国借款；第二，对日本有军火输出的国家应立即停止；第三，社团组织比较发达的国家应组织对华救济事业。

钱端升归纳说：“国联政策的成功与否，为我兴亡所系。而要国联成功，我们尤须有远大的眼光、高尚的理想及浅近的利国之图。没有前者，我们不能为人所重，亦不会有不顾一切的大勇。没有后者，则无以应付目前的大难。所以两者实不可偏废。”

——钱端升：《国联政策的实施及运用》，载《世界政治》1939年1月1日，第4卷第1期。

《时代文选》正式创刊，钱端升在创刊号发表《统一与一致》一文。

该文实质上论及思想统一问题。钱端升开篇指出，中国自晚清以来的时代主题无不是追求独立统一；独立与统一本非一事，但基于中国特定的时空

背景，两者合二为一，密不可分，“不独立固讲不到统一；不统一亦绝难言独立。惟独立才能使统一有意义，亦惟统一才能保独立。为民族争生存计，维持已有的统一，并使这统一益趋巩固，当然是中华民族的要图，且其重要与抗日并无二致。凡是足以妨害统一的言行，当然应设法消除；凡是有裨于统一的言行，亦应设法倡导”。钱端升坦言：“统一的重要性是无法过言的。但统一的方法则不可不出以谨慎。”

就全国朝野各方热衷的统一潮流，钱端升指出，习俗礼仪上的统一无关紧要；求宗教的一致更是会发生极大的纠纷；而政制上的统一则比较重要，但亦没必要强求一致，以免“不但不能巩固统一，凡足以阻滞统一”。钱端升指出，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思想一致的问题。

就思想统一而言，钱端升对此保持审慎的态度。他认为思想一致在事实上做不到，在理论层面思想统一也是不必提倡的事情，如果以思想一致来求国家民族的统一，无异于是缘木求鱼，效果适得其反。钱端升强调，中国现在确实需要巩固统一，但“求思想的一致，决不是促进统一的方法。统一与一致决不是一件事；统一固然要紧，但一致不是统一的基础。凡是足以妨害统一的言行，政府本有予以防止消灭的义务。统一的言论，根本不在思想自由及意见自由的正当范围以内，所以不能以自由为凭借，政府亦务须加以严厉的限度及取缔。但政府如利用国家的权力来强迫人民具同一的思想，表同一的意见，则政府取缔不正常思想意见的权利，在道义上便受了减损。不负责任的言论固有害于统一，强人民为一致的言论也有害于统一”。钱端升特别指出：“我们对于完成统一的努力不敢后人，但我们以为思想自由与意见自由也是真正统一的必要条件。”

——钱端升：《统一与一致》，载《时代文选》1939年1月1日，创刊号，第25-26页。

【1月1日，钱端升《统一与一致》，冯友兰《论导师制》，叶公超《文艺与经验》，朱自清《新语言》，载《今日评论》第1卷第1期（本刊为联大教授所创办）。】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1月15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对于六中全会的企望》一文。

本文写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六中全会即将于1939年1月20日在重庆召开的前夕。作者指出，过去七个多月间国内外发生诸多影响民族命运的大事，有利者多、有害者少，故钱端升寄望于六中全会，对有利的进展应督责政府全力促进，对不利的事件应督责政府尽力防阻或补救。钱端升认为六中全会急切应做的事情有如下几点：第一，随着民族自信力及军力的增加，政治、财经方面的改善亦应同步改进。第二，需要最大程度地扶植民主势力，最殷勤地养成民主的习惯。第三，应尽力避免无谓的摩擦与无谓的纠纷，节省时力、应付大事。第四，宣传政策应有新思维，以便养成人民民主的力量，增加人民知己知彼的能力。第五，要就加大外交与国际宣传力度，促进友邦对中国的援助，期待抗日战争的尽早成功。钱端升指出，上述诸点“仍不出抗战建国纲领的范围，但俱系针对我们最急之需而言者，且又比较具体”，故赤忱奉献于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

——钱端升：《对于六中全会的企望》，载《今日评论》1939年1月15日，第1卷第3期。

1月24日

钱端升致胡适信：

【适之兄：

数函华府，有平信有挂号信，但均由航机不识，有收到者否？兄之病□方有人谓兄已愈。文伯来信则云 K. L. Li. 告□□仍在病中，究如何，甚使弟等□念不已，望有以教之。

周书楷事第二次问及，刻用文电，杭立武问究竟，弟对此事绝无强兄之

意，但甚望兄能囑一同僚告弟以可与不可，以便由杭电复周，至此了此一案。

汪事甚可伤心，弟不赞同汪之办法，更不赞成汪之主张。但一班人骂汪为汉奸为卖国，亦诚胡闹至于极点。汪初意□以为离国而虽主和，或可促蒋之反省，但对国力之大小蒋汪之估计相差太远，对日人之看法，二人亦有疑信之分，故汪之主张绝不能得蒋之赞同。汪对共党亦愤激之至，此亦为促成出走之一因。弟信汪先生必不至于铤而走险，统一局面必无问题，惟汪之走，或更增进大小事揽于之手之趋势乎？

自英美借款事宣布后，国人对美之辄存无限之奢望，弟现对欧美情形，因无书报之故，异常隔膜，即 K. C. Li 所印之物亦已久无所得，故不敢轻下断语，但以最近中立法暂不更动的消息而言，恐美之孤立派仍是不可侮之势力，不识然否？

最近敌谋□甚力，惟最近三四日北海方面突无消息，此中不知有何把戏，或者敌正进取、我正力拒？一切消息未便公布欤！

参政会二月十日左右开会。蒋自为议长。我辈读书人或□可视为攻孔之良好机会。弟等大概下月七八日即须去渝。联大方面参政者仅公布奚若及弟三人参加，孟和及孟真便五人矣。枚荪近亦在此省视太太，惟枚荪日内或即与孟邻去渝。孟邻之去，则为极是。

P. C. 及于均由孔派出，众疑 P. C. 有覬覦复初及兄之缺之意，孟真怒而问雪艇，复函云蒋不知 P. C. 出详，事关 P. C. 到英，甚为奇怪。

余仅陈敬请

交安

弟 端升

二八、一、二四】

——《北大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4 页。

1 月 25 日（农历，公历似为 3 月 15 日）

张忠绶致信胡适。

【弟返国时，端升兄寄来剩余之款一千数百元，前拟交端升兄保存，但端升兄未肯接受，此时因外汇关系，又无从寄呈，只好候他日归还。如先生在国内拟购何物托人携美，则弟可照办。如需汇款给夫人，则请示知夫人住址，当以此款寄呈。如何之处，均请示知。】

——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0页。

1月27日

《今日评论》召集晚餐会。

【晚，参加《今日评论》社餐会，被推为文艺编辑。】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1月28日

《今日评论》编委会开会。钱端升否决了陈岱孙的文章。

【《今日评论》编委会下午开会，钱否决了岱孙的文章《治与政》。】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1月30日

胡适致王世杰电报，提及钱端升：

【（文密）极密。亲译。十九电悉。弟感电布雷请其抄转吾兄。此电后段论孤立派问题，关键在实事演变，在政治领袖，而不在舆论。当威尔逊对德宣战前一星期，内政部长派人去中部探察民意，回报尚未主战与反战约各半数。然此不足阻止参战也。此意弟去年与端升（钱端升）讨论多次，端谓民意最重要，弟不谓然。倘领袖这不能领导舆论，则美国四十年来参与世界政治各次均必不可能矣。最近两三月中之事，更可为明例。如对日两次严重通牒，如对华借款，如对德召回大使，如对法许其购买军用飞机，而对日则

劝阻军火飞机之售日，此皆政府领袖决心为之，孤立派与和平派亦无可如何。弟非抹杀民意，但谓外交着眼自有射马擒王之必要。至于舆论与国会方面，弟亦不欲忽略也。贱恙心脏微伤已复原，血压回升如常，每日能看公事、见客，但尚未许出医院，须月初始能回馆。此后若不滥用精力，或尚可工作二三十年。友人询及，乞以告之。适。卅。】

——胡适：《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69页。

2月10日

《今日评论》召开编辑会。

【下午参加《今日评论》编辑会。】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2月12日

在《时代文选》发表《政治的制度化》一文。本文亦发表于《今日评论》1939年2月12日。

本文接傅斯年的文章《政治之机构化》，而就政治运行的制度化再行引申。钱端升指出，“这‘制度化’一道手续，这‘制度的基础’一个基础，实在是古今中外任何有进步性的国家所不可不经的一道手续，所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础，而尤为当前的中国所应努力以求者。问题是十分重要，……”钱端升申言，政治进步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累积，一个是革命，而“要望日常的政治设施能累积起来，则又非靠政治制度化不可”。钱端升纵论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人类历史无不是革命与累积互相辉映、相互为用，凡是重视通过政治的制度化而收累积之功，最终便取得进步；凡是忽略政治的制度化，放纵政治的个人化，则多出现正道衰落、人亡政息的悲剧。钱端升指出，1928年《中央日报》创刊时即有政治制度化的呼吁，此后呼声络绎不

绝，但难以掩盖的事实是“政治之未能制度化则前后十年，似未有若何变更。这是近十年来我国政治上最可引为遗憾之事！”钱端升指出，这种局面的出现，全国人民尤其与政治有关及于政治有兴趣者，尤其是大大小小的“在上者”，都得承担一定的责任，“推究政治未能制度化的原故，全国人民，尤其与政治有关及于政治有兴趣者，都得负责。在上者往往因人治有若干的便利，不能耐烦地努力于制度的树立。在被用之人，则亦往重视对人的服从，而轻视对法的服从。再进一步，则法为人立，人改法改；于是一切制度不是虚设不予实行，便是朝令夕改。制度既无一能有相当的永久，且能有真实的试验，则其宜与不宜，或应否有所纠正改善之处，自亦无从测知。更进一步，则大家对于制度之为物，便根本不能重视，不能有敬意了”。

而应对之道，钱端升提出有如下几个方面：政府应深切知道制度化的可贵及必要；国人尤其是可以国事表态的国人必须以最负责的态度来督促政府，“凡合于政治化的设施应同声诤赞之；凡不合者应同声抗言之，……民国的政治本全国人之事，须全国人知制度化的可贵与必需，务须各人能以魏征事唐太宗之法来对付国家，中国的政治才能由人的基础，而进于制基制度化”。

——钱端升：《政治的制度化》，载《时代文选》1939年第2期，第20—21页。亦载《今日评论》1939年2月12日，第1卷第7期。

2月12日—2月21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召开，钱端升前往参加。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于二月十二日上午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开幕。】

——《会议日志》，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21页。

2月15日

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第三次大会上，钱端升等质询孔祥熙。

【2月15日下午，举行第三次大会。议长蒋中正、副议长张伯苓及参政员一百三十六人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等。

会议宣读了第二次大会记录；听取了秘书处会议报告，立法院工作报告，司法院工作报告，考试院工作报告，监察院及审计部施政概要，财政部兼部长孔祥熙的财政报告和交通部长张嘉璈的交通报告。

会议讨论了财政、军政、外交、经济、交通、内政、教育七部和侨务、赈济、蒙藏三委员会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案，还讨论了参政员杭立武等四十人“拟请组织特种委员会将本会一、二两届会议决议各案实施情形加以检讨”的临时动议。】

——《会议日志》，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21—422页。

【有些询问案很引人注意。例如第一届第三次大会第三次会议，财政部长孔祥熙作财政报告后，参政员钱端升、周览、陈博生、张忠绂、傅斯年等五人询问：“请问财政部长，伪联合银行准备银行发行之伪币，据调查所得，已有若干？此项伪币流于华北五省及江、浙二省各位若干？我方能否用外交或其方法使在沦陷区内（尤其是上海）外国银行商得各该行之同意，拒绝以伪币为交易媒介？如售卖外汇及存款等等，关于此点，英外次十四日答 Sir-pitrick Hanuon 之询问已有何研究及对策？”

孔部长当场口头答复改用书面答复说：“查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钞，据调查报告，截至现在约九千余万元，多数流通于华北五省，江、浙两地尚少侵入。虽伪组织希图以种种方法抑贬法币，推行伪币；但以人民信仰法币，故伪钞价值始终在法币之下。在伪钞发行之初，本部即已咨请外交部照会各国使馆通告侨商钓鱼台对于伪币不得收受行使。近又咨请外交部照会英大使馆，依照施行法币时英皇颁布之命令，禁止侨商一律不收受伪钞，所有售卖外汇存款均包括在内。同时并向英、法各国同样照会。故最近英大使、法代办先后赴津，与各该国侨商交换意见。两使俱有决不放弃

法币必须维持之表示。再通告侨商，不得收受伪钞。至英外次答复 Sir-pitrick Hanuon 之询问，与英皇命令不符，似有错误，如果属实，政府当续提抗议，予以纠正。”

此种书面答复，四平八稳，无懈可击，颇能维持财政部得立场。有的询问词锋十分犀利，使人难以招架。】

——马起华：《国民参政会——战时中央民意机构》，载《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608页。

2月18日

钱端升附署、周鲠生等提出的请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得以通过。

【四、关于内政事项者

.....

4. 请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周览等】

——《提案目录》，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40页。

【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大会周览等提请确立民主法治 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

(1939年2月18日通过)

我国政治之应以民主及法治为基础，允诚建国之原则，亦为国人所共晓。值此抗战日益有列，建国正在开始之际，我人尤宜淬励民主法治精神，确立民主法治之制度，以期训政早有实质的成就，而为宪政预立稳固的基础。兹谨举理由如下：

(一) 我国政治习惯，凡改进之事类，皆自上而下。现在不但国家有空前之统一，而且全国有共戴之领袖，苟能乘此时机，由领袖奠定民主法治之基础，树立国家恒久之制度，其事甚易，其效亦宏，机不可失，此其一。

（二）民主及法治基础之树立，至少须有十年乃至二十年之功夫。国人提倡民主及法治，虽已有四五十年之历史，但从无五年不断之推行。我人此时既有共戴之领袖，则正应赶速为最大之努力，于此后一二十年中，使中国得有民主及法治之稳固根基，并进而成为一理想的近代自由国家，时不可缓，此其二。

（三）我国过去十年来，举凡政治、军事，皆有显著之进步。但此进步实为少数人之毅力所造成了；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应有之制度既从未确立，守法之精神亦至不普遍。为国家之永久计，一切设施，必须早日使之制度化，此其三。

（四）我国近年来国家日趋统一，政府之权力亦日益扩大，凡向日属私人活动范围以内之事，而今归政府处理者，不知凡几。如人民参政之权力，不能与政府权力之扩张，亦步亦趋，势必造成一个极权国家，于整个民族之前途，有异常不良之影响。故此时不能不急求逐渐增加人民参政之权力。此其四。

（五）世界各大国，正在形成民主与反民主两大集团，即英相张伯伦，似亦无力阻止此两大集团之形成。我人此时如能努力树立民主法治之初步基础，则同气相求，同声相应，近之可以增加民主集团对我抗战之同情协助，远之可以为世界和平谋共同之奋斗，此其五。

（六）各级公务人员之责任心，须经启导培养，方能自动发挥。故如何使公务员能负责任，系于政治之风气，尤关居上位者如何使其能负责任。至于法治，须先以守法之精神立其根，守法固应为上下一致之习惯，而在位者之大员，尤应以身作则。负责为民治之根本，守法为法治之前提，此二者，盖皆待早日培植者也，此其六。

基于上述种种理由，同人谨为下列建议：

（一）政府行为应法律化。我国既以法治为理想之目标，政府今后一切行动，须绝对以现行有效法律为根据。若行动自行动，而法律自法律，则法律既不足以示信上下，即不能养成守法之习惯。此后一切法律，一经由合法

机关与合法手续订立公布后，在该法未经正式修改前，政府行动之有关者，应以之为准绳，而不可以一时人事之方便，颇所违反之，忽略之，或曲解之。

(二) 政府设施应制度化。我国现值改革时期，政治经济各方面之一切制度，实质上多未具备。过去一切设施，诸如用人等等，多随主其事之长官为转移，以致事无定轨，官无定职，职责不分，系统不明；长官对之信任，则可任其越权，长官与之无旧，则求食粟而已。此乃旧时国家之幕府制，非近代国家之文官制也；此乃一时集合之人治，非国家久远之法治也。此风足以长逢迎，不足以培植责任心也。故今后政府一切设施，务须求其制度化，务使政府之整个组织成为一健全之机能，一经发动，则各部门均能尽其最大最善之效能，使此整个之机能，合乎近代政府行政之原则。兹择其有关制度应行之重要改革，述之如下：

甲、吏治制度必须建立。国家用人必须以才能为标准，然后始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历史上我国官场中用人每每非亲即故，以长官之好恶亲疏，为进退人员之标准。此故数千年之积习，今已颇有改正，惜其去清除犹远也。除此之外，似莫要于在一切部分中，均实施吏治制度（又名文职服务制），此制普遍推行后，在消极方面，既可以限制滥私，则在积极方面，自可以发挥公正，鼓励贤才。此纳民轨物之大道也。

乙、公务人员权责必须分明。在今日我国政界中，公务人员或者有权无责，或者有责无权，结果所届，往往一事无人负责，亦无法责某人负责。此后应划清权责，使有责者必须其权足以相称，然后人人皆能尽心力而为之，而成败之责任，亦有攸归。

丙、机关系统必须清楚。一事决不宜交由若干机关执行，否则将无一机关背负全责，能负全责，甚至彼此冲突，一事不成。且中国政府机关多各自为政，彼此甚少联系，如遇某事必须与其他机关合作者，亦往往不能获得应有之合作。是以各机关间之关系，必须划清，以收分工合作之效。

(三) 政府体制应民主化。我国政治之应以民主为密度，本为上下一致

的要求。故目下所讨论者，不在此目的，而在以如何办法使此目的得渐进的、稳妥的达到也。兹谨拟办法如下：

在我国未实行宪政以前，政治之应受中国国民党领导，与夫政治之应由中国国民党组织，已为全国人民所公认，当然不应求其变更。然由党所组织，且受党所指导之政府，仍应向国民负责；国民如依法对政府表示不满后，政府仍不能设法满人意时，党应分别轻重，加以改正或改组。

党应以现有之国民参政会，或改善加强后，更有代表人民性之参政会为民意机关，并用渐进的方式，使之具有依法监督行政之权力。以上建议，是否有当，静候公决。

提案人

周 览	马君武	钱端升	黄炎培	卢 前	罗文干	陈裕光
胡元挈	陶孟和	陈 时	张 澜	杨端六	欧元怀	吴玉章
邵从恩	高惜冰	余家菊	周炳琳	杭立武	胡景伊	傅斯年
许德珩	陈启天	茹欲立	李元鼎	范 锐	李 璜	伍智梅
黄同仇	曾 琦	孔 庚	林 虎	张奚若	黄元彬	左舜生
颜任光	罗隆基	张忠绶	常乃德	奚 伦	冷 儒	黄建中
沈钧儒	褚辅成	张申府	王幼侨	邹韬奋	王志莘	张君勱
王近信	杨振声					

（原载 1939 年 2 月 24 日重庆《中央日报》）

——周览等：《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大会周览等提请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载《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0—124 页。

3 月 3 日

《今日评论》召开编辑会。

【下午开《今日评论》编辑会，……】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页。

3月12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抗战致胜的途径》一文。

在该文中，钱端升指出：“战争的胜败基于两方实力的消长。这是古今中外皆然，无庸多道，近代的战争更受国际关系的影响，国际的环境可以助此而抑彼。这也是有识皆知之事。我们如就这三项因素——敌国力量、我国力量，及国际环境——观察抗战的将来，则上述的乐观无疑是不实在的，因为这乐观无疑地是建筑上两种不可靠的基础上——即帝国的衰退崩溃，二即英美的大力援助。”

就敌国情况而言，钱端升明确指出：“但我确实知道两件事：第一，敌国尚未发生粮食的恐慌，第二，敌国内部的秩序尚佳，政府维持秩序，执行法令，并强迫服从的力量尚未削减，敌国人民对战事固不热心，年事较长的知识阶级在衷心上固然反对战事，但反战高潮等等则尚绝对谈不到。敌国如果目前有崩溃的征兆，那一定是在财政、对外贸易，与制造原料方面，而一定不在民食、军力及社会秩序方面。”就敌国崩溃因素而言：“所以将敌国崩溃算作我们抗战致胜的把握之一，实在不是一件怎样可靠可必之事。长期抗战下去，敌国当然得崩溃，但这期限或许未免太长了。”

就外国援助而言，钱端升分析了英美的政局，认为“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不能靠敌人的崩溃与英美等国的援助以取得胜利，固然敌人实力的减灭与英美同情的日增均是有益于我们的因素”。

通过上述比较，钱端升特别得出结论，“要抗战胜利，主要的仍须靠自己”。“总言之，我们于估计作战双方的力量时，务须避免掺入敌人行将自毙与友邦行将助我的心理。我们务须力求增加自己的力量，以对付这长期的抗战。往昔国人的抗战的心理没有十分坚强时，宣传敌方实力之如何脆弱，如何衰落，友邦同情之如何热烈，以及国际形势之如何好转，或均有其必要。但国人现在既已一致有抗战到底的决心，百折不挠的意志，我们实在不能再

忽视求其在我的工作。最高统帅尝谓在二期的抗战中，政治重于军事。我们深望国人能一扫依赖友邦与诅咒敌人的心理，而先以大力来推动我们的政治；并在良好的政治环境之下，培养我们的抗战实力”。

——钱端升：《抗战致胜的途径》，载《今日评论》1939年3月12日，第1卷第11期。

3月19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抗战致胜的政治》一文。

——钱端升：《抗战致胜的政治》，载《今日评论》1939年3月19日，第1卷第12期，第5-7页。

3月24日

未开《今日评论》编委会。

【今天下午未开《今日评论》编委会，……】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3月26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捷克灭亡后的欧局》一文。

钱端升对于《慕尼黑协定》后的欧洲局势有如下观察：“依我们的观察，欧洲于十五六个月内，很难避免一战；这一战或许竟发生于最近的将来。在战时初发生的若干月内，我国必感受种种重大的不便。敌人必将乘大战勃发，英法无无力兼顾远东之时，极力破坏西南的国际交通线，而必需的交通材料及工业势将不易运入。如果军械军火的存储亦尚不敷，则困难更将增加。所以我国应立即为种种未雨的绸缪。即使大战不起，这种绸缪也是应有的。”

——钱端升：《捷克灭亡后的欧局》，载《今日评论》1939年3月26

日，第1卷第13期。

3月30日

下午《今日评论》召开编委会。

【上午去学校。《今日评论》编委会开会。】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4月1日

在《改进》创刊号发表《英美法制日助我的最近形势》一文。注明转载自《今日评论》。

钱端升指出，抗战发生以来，英美法均同情甚至襄助于中国，但并不总为国人所理解。在钱端升看来，英美法的基本政策在中日开战以来未尝大变，要点有二：第一，维持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太平洋局面；第二，极力避免战争，或者可以引起战争的手段来维持这一局面。

钱端升纵论英美法三国形势后指出：“无论英美法三国的步骤如何变化，我们绝无悲观的理由。美国近方有志于整军经武，海陆空军的预算皆有庞大的增加，对于中太平洋自夏威夷，经中岛、威克岛、关岛，以及菲律宾，以及在阿拉斯加以西的阿路与群岛，似乎皆将增加海防或要塞的设备。这种扩军，这种设备，除了对日外，哪能有他种意义？美国势力愈强，而日本实力消耗愈大时，亦即美国愈可有动作，而愈少牵入战争的危險之时，至于英法的情形亦大致相若。所以我们目前的最要之着，仍是如何改善我们的外交内政，一面以促进我与英美法间彼此的认识，一面更以增加我们抗战的效率。抗战的支持力愈大，国际援助的范围与效力亦愈大。至于在最近期内，则逢到国际形势稍有进步时不必过分高兴，逢到稍有退步时亦不必过分丧气。”

——钱端升：《英美法制日助我的最近形势》，载《改进》1939年4月1日，第1卷第1期，第23-24页。

4月4日

钱端升出席第三次校务会议。

【时间 二十八年四月四日下午三时

地点 龙翔街本校办公处会议室

出席者 刘崇鉉 吴有训 陈岱孙 叶公超 陈序经 杨振声
朱自清 王明之 钱端升 施嘉炀 黄钰生 沈履
叶企孙 冯友兰 梅贻琦 蒋梦麟 杨石先

主席 梅贻琦 记录 冯友兰

报告事项

（一）主席报告常务委员会所决定本年度预算编制原则。

（二）工程处王明之先生报告校舍建筑工程进行状况。

（三）蒋梦麟先生报告全国教育会议状况。

议决事项

（一）调整本校行政机构以增进效率案。

议决：由主席制定五人组织委员会研究具体办法。

琦】

——《第三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59页。

4月16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侵略集团与防侵略集团》一文。

钱端升开篇即提及，“最近若干日欧洲形势的变化，颇有可以令我们稍稍获得安慰之处。这就是防侵略之集团的开始组织”。但钱端升也悲观地看到，“但这集团的行动太消极了。这集团仅仅以消极的防止侵略行动扩大为目标，而并无根本铲除侵略根源的意向，尚不够资格做‘反侵略集团’”。基于种种因素，钱端升预测，“在现时英法与德意均谋扩大集团的形势下，

大战一时或可不致爆发。然而侵略的势力既未消灭，大战的根源也当然依旧存在。经过短期的拉拢喽啰工作，与摩拳擦掌后，战事仍不可幸免”。职是之故，钱端升认为，“欲避免战事，或欲化大战为小战，我以为只有组织反侵略集团，根本将侵略加以制裁，加以打击”。

而就制裁而言，钱端升认为应该依靠国联：“说到制裁，我们总觉得反侵略最好的最有效的方法仍应利用国联的机构，而不是仅仅组织防守同盟就可以了事。利用国联有下列许多优点或方便之处：第一，各国倾向理想主义及和平主义者，连美国的在内，均可乐于拥护；反之，英国现在推动的制度则仍是维持均势的传统方法。第二，上月六强宣言之所以流产乃由于波兰等国对于苏联仍有疑虑不放心之处。但任何防侵略或反侵略的制度，离了苏联决不能有其应有的效力。现在的办法对于苏联面子不甚好看，和慕尼黑协定之不与苏联面子同样不好看。固然，据我所知道，英政府目下甚欲得苏联之助，并无摈斥苏联在集团之外的意思。但要得苏联的诚意合作，而又不虞波兰的反对，更何如就利用苏联四年来热诚拥护的国联的机构？第三，如利用国联以发动经济制裁，美国尚可参加。如有各关系国，如英波等，发动经济制裁，则美国势难加入。”

在上述背景下，钱端升对于中国的立场也有所思考，“至于我国，则除了继续抗日外，对于整个反侵略的行动，也实在应有所努力，因为我国仍不可不防大战之随时爆发。我们在本刊上已说过多次，大战初爆发时，我们将蒙受种种打击，摇动抗战决心，或希冀早日结束抗战局面，绝对不是避免这种打击的办法。要避免这种打击，我们务须努力成为反侵略集团的中坚分子，努力使人们也以中坚分子视我”。

——钱端升：《侵略集团与防侵略集团》，载《今日评论》1939年4月16日，第1卷第16期。

4月20日

《今日评论》召开编委会。

【《今日评论》编委会下午开会。】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4月23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几件战时的不急政事》一文。

该文后来亦发表在《时代文选》1939年第3、4期合刊，第16-17页。

钱端升开篇即先声夺人，“‘胜利第一’应为战时一切措施的最高原则”。而围绕这个原则，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应做什么便一目了然。钱端升有感于政府方面会议频频，尤其是非军事性质的会如全国教育会议、地方金融会议、全国生产会议、内政会议等，“不是不必开，便是不应开。开而无大结果，或即有些许结果而此结果可不从开会得之者，属于不必开之列。开而必无结果，徒然劳民伤财，甚或使地方行政大员长期跋涉公路颠沛空中，而致庶政皆废者，属于不应开之列”。钱端升认为，战时行动贵在迅捷，地方官更不应轻易离开地方，而且中华民族好开会但不善开会，很多建议并非一定要通过会议的方式才能得到。据钱端升分析，之所以会议频繁，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行政当局喜欢热闹，热衷于宣传、排场等形式。第二，上面以成绩要求，而下面只由通过开会来凑报告。第三，行政机关彼此效仿、相习成风。钱端升甚至认为，不光行政机关的会议如此，国民参政会也是一样。而除了大而无当的国民参政会，各种非军事学的训练亦使得地方官员不胜其扰。会议训练之外，还有卷帙浩繁的行政计划与行政报告，乱作计划、勉做计划，而又不能实行，徒然浪费精力和时间。钱端升指出，战时无不求人力物力财力的最大限度节省，我国财力人力有限，更应用之于军事、外交和国防，“我们次日即须节省一寸一刻的光阴，与一分一毫的金钱，以应付抗战，……就行政而论，最必要的急务是在如何使中央行政机构能实现事权集中、指挥灵敏及专任负责等三个原则，而不是多开会议，随便训练，样样计划，天天报告，以及一切类似的不急之务”。

——钱端升：《几件战时的不急政事》，载《今日评论》1939年4月23日，第1卷第17期。

5月15日

胡适写信给钱端升、傅斯年。

【写信与孟真、端升。】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651页。

5月16日

钱端升出席第四次校务会议。

【时间 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下午四时

地点 龙翔街本校办公处会议室

出席者 梅贻琦 查良钊 刘崇鋈 陈序经 杨石先 施嘉炆（李辑祥代）

陈岱孙 樊际昌 张奚若 杨振声 黄钰生 叶企孙

钱端升 朱自清 冯友兰 沈履

主席 梅贻琦 记录 冯友兰

议决事项：

（一）教务通则第五十二条修正案。

议决：照教务处所提修正案修正通过。修正文如下：

学生如有品行不端或违规违章者，即分别记小过、大过，或开除学籍。小过三次作一大过算。积满大过一次者，于一年内停止其领受贷金、奖金、救济金等权利，并不得当选为学生会社职员。积满大过二次者，令其休学一年，积满大过三次者，开除学籍。

（二）教务通则第五十二条施行细则案。

议决：本条所指一年以学生记过时之一学期及下学期合计为一年。

（三）审议学生会社管理规则案。

议决：照原案修正通过。

琦】

——《第四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0页。

6月1日

《今日评论》召开编委会。西春辞去。

【参加《今日评论》编委会。西春终于辞去了。】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6月6日

钱端升参加第五次校务会议。

【时间 二十八年六月六日下午四时

地点 龙翔街本校办公处会议室

出席者 王明之 蒋梦麟 杨振声 叶企孙 钱端升 朱自清 黄钰生
沈履 杨石先 陈序经 樊际昌 刘崇鋳 陈福田 吴有训
梅贻琦 冯友兰 查良钊 庄前鼎

主席 梅贻琦 记录 冯友兰

报告事项：

（一）教育部令关于学校行政系统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于下学年起实行。

（二）教育部令就环境需要酌量增设有关边疆之科系。

（三）教育部令关于训导处分组规则。

（四）学生自治会组织成立情形。

议决事项

（一）审定本校二十八年度校历案。

议决：原案通过。

(二) 审议本校二十六年度及二十七年度经费决算办法案。

议决：照常委员会所定办法通过。

(三) 审议本校二十八年度岁出预算草案。

议决：第二项第五目第一节改为每月三千六百元，第七项改为四百三十一元，余照原案通过。

(四) 审议本校出版组组织大纲案。

议决：原案通过。

(五) 审议本校出版组营业实行规则案。

议决：原案通过。

(六) 图书馆应即改隶于教务处，由教务长负责指导案。

议决：通过。】

——《第五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0-461页。

6月8日

朱自清在钱家参加生日晚餐会。

【在钱家参加生日晚餐会，菜甚佳。】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6月12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大学昆明办事处第二次教务会议。

【教务会议（第二次）

时间：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四时

地点：才盛巷二号会议室

出席：叶公超 张景钺 孙云铸 江泽涵 陈雪屏 赵迺抃 汤用彤

姚从吾 蒋梦麟 罗常培 钱端升 樊际昌 曾昭抡

列席：薛德成 主席：樊际昌 记录：薛德成

甲、报告事项：

一、北大本年度在联大注册人数计二百三十一人，其中本年度应毕业生计七十七人。（附件一，系毕业生名单，从略）

二、联大常务委员会廿八年六月三日致北大办事处函关于本届毕业生成绩，仍由各原校分别审查，惟应尽量注意联大本年度之课程表准。（附件二，联大常务委员会致北大函，夏红从略）

乙、议决事项：

一、本校学生在他校借读年限，应如何规定案。

决议：本年度四年级借读生，依照本校课程表准审查各该生过去一年或二年之借读成绩，以定准否毕业。其一、二、三各年级学生，一律令其于廿八年度开始时返校复学，不得继续或另行申请在他校借读；如因特别事故，不能返校复学者，应当作为转学。

（本年度毕业生遇有在他校借读者，于其文凭或证明书上分别注明借读年限及校名）】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121页。

6月15日

钱谓冯先生在《云南日报》人面前攻击他。

【一时就寝。钱谓冯先生在《云南日报》人员面前攻击他。】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6月25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抗战的目的》一文。

钱端升提出：“我们此次对日作战，为自卫的抵抗，其意义本尽人皆知。但以自卫为作战的目的，尚嫌其不够积极，尚不足以激起人民宗教的热烈。我们务须使人民皆信抗战成功可以建树一种新的伟大秩序或制度或文化，在这整个世界快要形成侵略集团与反侵略集团，极权国家与民治国家的当儿，我们更须效法威尔逊，提出一种有中心思想的高大思想，以资号召，以资共信共守。”

钱端升进一步表示：“我先提出成立此抗战目的时我们应有的考虑。第一，这目的须合于高尚的理想。理由上面已说过，就是非高尚理想不足以激起一种宗教的热烈。第二，上面所谓高尚理想必定要有根据，要抓得住人心，而不涉及瞎吹和空洞。即如威尔逊所赶的民主政治，实在是协约国所共同关切的理想与制度，既不空洞，复不瞎吹。第三，这高尚的理想不但须能使中国人民的热血沸腾起来，而也能使外国人民发生同情并感觉着亲切。”

——钱端升：《抗战的目的》，载《今日评论》1939年4月23日，第2卷第1期。

6月29日

《今日评论》召开编辑会。

【《今日评论》编辑会在家召开。】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7月4日

钱端升参加第六次校务会议。

【时间 二十八年七月四日下午四时

地点 龙翔街本校办公处会议室

出席者 张伯苓 庄前鼎 杨振声 叶企孙 叶公超 查良钊 朱自清
王明之 钱端升 张奚若 吴有训 陈岱孙 沈履 杨石先

樊际昌 施嘉炆 蒋梦麟 梅贻琦 冯友兰

主席 梅贻琦 记录 冯友兰

报告事项：

（一）常务委员会会议决本校暂不办研究院，三校得酌量本分工合作原则各办研究所。

（二）教育部准拨建设费七万元。

（三）教育部令设有有关抗战各科目。

（四）教育部令统一招生成绩较差学生应令其留级。

（五）教育部令修正大学研究院暂行章程第十条。

议决事项

（一）复议本会第二次会议议决案第二项案。

附抄议决案第二项：自民国二十八年度起，本校全年学程凡可于一学期内授完者，应尽量改为学期学程；凡可以一学期为段落者，应尽量分为学期学程。

议决：原议案撤销。

（二）本校应如何疏散案。

议决：本校工作地点仍设昆明近郊，对于员生之安全及图书仪器之保管应责成总务处、工程处及校舍、防空两委员会尽力筹划疏散办法，以策完全。

琦】

——《第六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462页。

7月6日

《今日评论》编委会集会。

【《今日评论》编委会在钱家集会。】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7月9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抗战中国际形势的转变》一文。

钱端升提出：“根据近年来国际形势的演变，以及今后抗战的需要，我们建议三事：第一，加紧民主化我们的政治；第二，外交上要有大国的风度，要努力居间调和英苏的利益与冲突；第三，向英美要注意宣传，而宣传要注重实在的经济情况与抗战情绪。我们的总目的则在取得英美两国较大的经济助力，以助我支持长期的抗战，并在取得英美法苏的重视，俾使我们在两大集团日后总清算时，占得有利的地位。”

——钱端升：《抗战中国际形势的转变》，载《今日评论》1939年7月9日，第2卷第3期。

7月13日

《今日评论》举行茶会。

【下午参加《今日评论》的茶会，到客甚少。】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8月6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英美对日外交的新变化》一文。

该文讨论英美对日外交的新变化，尤其是英日东京谈判中英方的屈服。钱端升认为，传统上“英美人民对于中日战争的态度，自战事开始以来，一向是渐渐地亲中国，袒中国，敬服中国，远日本，抑日本，憎恶日本。这种左右袒的趋势是一贯的，虽则十分缓进，却是久而久之，其进步也很可观。若就英美两国的人民比较，英国因为在远东利益要大些，被日本糟蹋也要大些，所以其人民助华抑日的趋势也大些”。但钱端升亦表示，“这次英日东京谈判中，英国的屈服，可以代表英政府目光之短，而并非由于英国人民对中

日态度有所变更。”钱端升甚至还幸灾乐祸地指出，“英政府的行为，骤看起来，固应使我们失望，并且因为有卖友的嫌疑，使得我们愤慨。但仔细研究一下，则到现在为止，英日双方七月二十四日所发表的英日议定书，其对于英国的损害，实无止十倍百倍于对我的损害。”

钱端升就此预测，“至于于英美两国的平行政策是否因此次东京谈判的初步妥协与美之通知废约，而可以加紧或放弛，则也须看张伯伦之是否可教。如果可教，他自然应当步武罗斯福的后尘，向日本进逼，逼至他不能继续侵略而止。如果不可教，则英国固不敢进逼，连美国也将有不断的顾虑，而不敢迈步前进。因此我们更需要向张伯伦提出些明显而合理的要求，以促其猛省。”

——钱端升：《英美对日外交的新变化》，载《今日评论》1939年8月6日，第2卷第7期。

8月9日

钱端升致胡适信一封：

【适之兄：

前托馭万兄携归致孟邻兄之函，附致孟真之函，及复孟邻、孟真及弟之函，均已读悉。

送弟 Beard 之现代美国，谢谢。邮寄甚慢，或尚需若干时才到。

李国钦先生前些时有过一信，云兄已复原，至慰。我辈中年人之身体，离家易多病之类，今嫂夫人既留国，兄自当格外小心。弟如此言，因自五月初眷属来后，实觉舒服得多也。

国事方面，军事似已撑住，无甚胜负。汪不得了，也不要脸，在平津大受吴子玉奚落□□事实。财政经济方面颇见严重，而法币问题尤有急切之危险。对此问题，国内意见不一致，关键则在沦陷区是否维持固定汇价问题。如维持，则政府即须供给外汇。以弟观察，最近总须维持一下，然后徐图根本解决。要暂时维持亦须靠外债，而美方不热心，其困难盖在此。

美国情形似较好转。闻重广数次之炸恢复了美人不少之注意，然否？

Allied 近亦为我宣传，八月底 Look 上亦将有反日宣传，其中有一幅画，且为中机误炸之片，而诬为日机。由此可见美人反日比前更见时髦。但不知是否可由此进而禁运军火，恐需□□日耳。

抗战二年，行政组织及 Civilian 之精神依然固我，毫无进步。

联大方面，秩序及日常工作进行尚称顺利，惟少 Rushing force。下半年各部门恢复研究院者甚多，但除孟真之文史外，恐少实际性。但中山大学且办研究院，则他人当然也可办。所以讲到教育，不特物质远逊，即精神方面亦初未因抗战而有进步也。

暑假已一月，以杂事至今未得休息。二旬后又须去渝开会。朋友们倒均安好，不念。惟南开黄子坚之夫人作古，弥可惜。敬颂

暑安

弟 端升
八、九】

——《北大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5 页。

8月11日

《今日评论》编委会开会。

【《今日评论》编委会今天下午开会。钱谈及重庆在外币兑换政策方面的不同意见。宋子文支持提高兑汇率，孔祥熙则主张听其自然发展。】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 页。

8月13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欧洲各国的军备及战略》一文。

——钱端升：《欧洲各国的军备及战略》，载《今日评论》1939年8月13日，第2卷第8期。

8月18日

《今日评论》召开编委会。

【在家开《今日评论》会。】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8月25日

《今日评论》召开编委会。

【《今日评论》编委会今天下午开会。S. C. 王将负责下一期的编辑发行工作。】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9月1日

《今日评论》召开编委会。

【《今日评论》开会。】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9月3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苏德新条约及世界新局面》一文。

——钱端升：《苏德新条约及世界新局面》，载《今日评论》1939年9月3日，第2卷第11期，第164-165页。

9月8日

《今日评论》编委会开会。

【《今日评论》编委会今天下午开会。】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9月9日-9月18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召开。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于9月9日上午，在重庆大学礼堂开幕。】

——《会议日志》，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562页。

9月18日

钱端升被选为宪政期成会委员。

【九月十八日 下午三时参政会闭幕式。议长在宣读闭会词前致词，谓本届议案最重要为通过川康建设方案，及组织宪政期成会促成宪政两事。即提出期成会委员名单：张君劢、张澜、周炳琳、杭立武、史良、陶孟和、周览、李中襄、章士钊、黄炎培、左舜生、李璜、董必武、许孝炎、罗隆基、傅斯年、罗文干、钱端升、褚辅成，召集人黄炎培、张君劢、周览，全体通过。（期成会会员名额副议长决定二十五名，增推梁上陈、胡兆祥、王家桢、章伯钧、马亮、李永新。十月十七日秘书处通知。）】

——黄炎培：《国民参政会日记》，载《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542页。

【根据大会所通过的《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议长蒋介石指定张君劢、张澜、周炳琳、杭立武、史良、陶孟和、周览、李中襄、章士钊、黄炎培、左舜生、李璜、董必武、许孝炎、罗隆基、傅斯年、罗文干、钱端升、褚辅成为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委员。黄炎培、张君劢、周览为召集人。】

——《国民参政会纪略》，载《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9页。

9月20日

钱端升参加宪政期成会第一次会议。

【本会于二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开第一次会，根据第四次大会授予协助政府促成宪政之使命，决议请政府早日颁布召集国民大会公布宪法实施宪政之明令，并请秘书处按照单开，搜集关于宪法草案之各项资料，以便讨论。】

——王云五：《国民参政会躬历记》，载《传记文学》1965年9月，第7卷第3期，第28页。

【三时，宪政期成会第一次会在油市街四号国民参政会举行。余主席，公决：（一）本决议案在政府未表示接受以前先为假设的研究；（二）请政府明令最好在双十节；（三）公布宪法期间，以速为宜，至迟不过参政员现任期满九个月；（四）明令发表以后，再召集本会公定进行程序表。】

——黄炎培：《国民参政会日记》，载《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542页。

10月13日

钱端升当选二十八年度校务会议教授代表。

【本大学教授会选举二十八年度出席校务会议教授代表。选举结果：周炳琳、潘光旦、陈雪屏、叶企孙、杨石先、郑天挺、陈总、王裕光、叶公超、陈福田、罗常培、张景钺等当选为代表；张奚若、刘崇鋳、李继侗、郑华炽、钱端升、姜立夫、丁佶、燕树棠、李辑祥、罗廷光、张泽熙、陶葆楷等当选为候补代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309页。

10月24日

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确认钱端升当选校务会议教授候选代表。

【一、报告事项

.....

(二)梅主席报告:本大学教授会书记潘光旦先生来函报告,本月十三日教授会选举本届出席校务会议代表结果。计周炳琳六十七票,潘光旦六十一票,陈雪屏五十六票,叶企孙五十六票,杨石先五十五票,郑天挺四十七票,陈岱孙四十五票,王裕光四十五票,叶公超四十二票,陈福田四十二票,罗常培三十九票,张景钺三十七票。以上十二人均当选为代表。又:张奚若三十七票,刘崇鋮三十七票,李继侗三十五票,郑华炽三十三票,钱端升三十二票,姜立夫三十一票,丁佶二十九票,燕树棠二十九票,李辑祥二十八票,罗廷光二十三票,张泽熙二十票,陶葆楷十二票。以上十二人当选为候补代表。】

——《第一二四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14页。

10月30日

钱端升、周鯁生到纽约。

【钱端升、周鯁生两兄飞到，同往 Ambasssdor 旅馆。】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720页。

10月31日

胡适与钱端升等会谈。

【与骏人、鯁生、端升三人谈。】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721页。

11月4日

钱端升等访胡适。

【端升、鲛生来了，住我寓中。】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722页。

11月10日

张忠绶致胡适信一封，提及钱端升：

【适之兄均鉴：骏人先生及鲛生、端升二兄来美，想已晤见。】

——《北大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11月16日

胡适致江冬秀。

【刘馥万先生和周鲛生、钱端升同出来，先坐船，船几乎坏了，改坐飞机来了。他们没有法子可以带东西。欠刘先生的五十港洋，我自当还他。】

——胡适：《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96页。

11月24日

第二次宪政期成会召开，钱端升缺席。

【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二次会议听取秘书处报告国民党中央全会对于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之决议及许参政员孝炎报告国民政府二十五年五月五日颁布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及办理代表选举之经过。决议征集各方对于宪法草案等件之意见，汇合研究。先推参政员左舜生、董必武、褚辅成、罗隆基、许孝炎拟具下次会讨论。】

——王云五：《国民参政会躬历记》，载《传记文学》1965年9月第7卷3期，第28页。

12月1日

胡适读钱端升文章，给予较高评价。

【读端升的“China's Unity: an examination”是一篇很有材料的文字，见解大有进步。他文中说：

中国人口438million，其中只有26million是non-chinese，此26million之中，约有17million居滇、黔、桂三省，其中多有汉化了了的。

以言语论，438million人口中，
330million说“国语”，
80million说中国语系之方言，
26million说非中国语系之言语。

端升说，中国统一虽由于我们本来是一个统一的民族，然国民党之功亦不可没。他说，国民党之功有三：

- ①Evolution of a central political organ.
- ②Various administrative reforms.
- ③Creation of a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三者中③为最不能成立。①近是；若改作the creation of a system for the peaceful transfer of political power，则更确。为最有理，他指出国民党统治下，行政改革有三大端：

- (1) 财政改革：预算制度(?)
 统一国税
 财政人事改善
- (2) 军事行政：军械管理集中
 军饷管理改善
 政治部

(3) 民政改革：行政督察专员制

地方自治自卫（？）

中央政权抬高】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728页。

12月7日

钱端升和梅贻琦抵达纽黑文。

【7日到火车站接钱端升和梅贻琦，住元任家。】

——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47页。

12月10日

胡适与钱端升等长谈。

【早上与端升、鲠生、馭万长谈。】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730页。

12月17日

胡适四十八岁生日。钱端升等同贺。

【四十八岁满了！

鲠生、端升、馭万、孟治都来贺生日。】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733页。

1940年（40岁）

1月6日

王世杰致胡适、周鲠生、钱端升。

【适之、鲠生、端升诸兄：

迩来迭接鯁、端两兄来书，以事杂未复。且邮程大都须十七八日，亦使人不愿做函。盖函到之日，鯁、端两兄又不知已往何处也。近日我军在桂粤两地，确已使敌方大受挫折，惟敌方亦如我方，势不能再有大溃败，故增援顽抗之状，亦有增无已。目前对外关系，以对苏外交为最艰窘（苏政府欲吾在国联行政院对制裁苏联案投反对票）。某党近日举动上亦多越轨，但介公终当能控制之。罗总统复介公函（即七月二十三日函）于适之兄信赖倍至，弟阅之不胜快慰。鯁、端两兄家中均好。化龙桥房子已好。如松已与立武商妥由英庚会请其往华西大学任物理讲座。端兄家用已嘱德芳垫寄，请均勿念。参政会约于三月底集会。鯁、端两兄于集会前返国当不为晚。亮畴款收到后请复彼数字。匆匆，即颂

近祺

弟 世杰

廿九年一月六日】

——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9页。

1月15日

钱端升等拜访胡适。

【鯁生、端升两兄来谈，我们畅谈国家大势、世界大势，直到夜半。海外不易得此种乐趣。

我说：我今日有两个大希望：一为日本的海军被毁灭。一为此次世界大战后，有一个国际新秩序，可以真正使爱和平的国家如丹麦、瑞典平安生存！】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8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0页。

2月5日

胡适致江冬秀。

【你信上说的过生日情形，比我热闹多了。我过生日，客人有馆中同事，和周鲠生、钱端升、刘馥万、孟治各位。刘先生和孟先生闹酒，刘先生醉了。客人有打麻将的一桌，有外围“桥”牌一桌，有一桌外国棋。我看还有许多客人不加入，所以我拿了一副骨牌，开牌九给大家打。果然人人都加入，都很高兴。但老实说，那一天，我心里只感觉不好过，并不高兴。】

——胡适：《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01页。

3月3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一九四〇年的美国》一文。

——钱端升：《一九四〇年的美国》，载《今日评论》1940年3月3日，第3卷第9期。

3月5日

傅斯年致信胡适，言及钱端升已经回到昆明。

【此信系在昆明发，下周赴重庆，端升返。知近况甚好，盖生活有定，仍乞多注意耳。端升说一切甚快也。又白。】

——傅斯年：《致胡适》，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3月10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一文。

——钱端升：《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载《今日评论》1940年3月10日，第3卷第10期，第46页。

3月11日

钱端升、梁思成等请宴，钱 Winter 北归。吴宓参加。

【7:00 至冠生园，赴钱端升、梁思成宴，钱 Winter 北归。诸人谈说，皆刻虐。宓所不喜。与 F. T. 等同步归。F. T. F 拟聘张骏祥，而殊不喜钱锺书。皆妾妇之道，为之感伤。】

——吴宓：《吴宓日记》卷七，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40 页。

3月17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中日战争与美国今后的行动》一文。

——钱端升：《中日战争与美国今后的行动》，载《今日评论》1940年3月17日，第3卷第11期，第157-159页。

3月20日-30日

钱端升参加宪政期成会第三次会议。

【本年三月二十日第三次会，收到（一）在昆明参政员罗隆基、罗文干、陶孟和、周炳琳、傅斯年、钱端升、张奚若、杨振声、任鸿隽等提出：“五五宪草”修正草案。】

——王云五：《国民参政会躬历记》，载《传记文学》1965年9月，第7卷3期，第28页。

【对宪草之讨论方法，取五五宪草依其条文先后汇合各方意见，次第讨论。本会会员二十五人，除参政员周览因公出国外，一致出席。同人勇于使命之严重，既不敢轻率从事，并无人固执成见，自二十日至三十日，尽十日之力，经过慎重之手续就原案或存或改，或补或删，将八章一百四十七条，改为八章一百三十八条，名曰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之修正草案。同仁发表意见，有特关重要者，分别列为附记，以供参考，所有在讨论中认定之原则及若干重要理由，具详于说明书。】

——王云五：《国民参政会躬历记》，载《传记文学》1965年9月，第7卷3期，第28-29页。

具体讨论内容，可见王云五上述文章转引材料。有四页之多。

3月24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欧战与美国今后的行动》一文。

——钱端升：《欧战与美国今后的行动》，载《今日评论》1940年3月24日，第3卷第12期，第180-182页。

3月28日

钱端升应蒋介石召拜谒。

【到君劭家，偕君劭及周枚荪、张表方、钱端升、李幼椿、褚慧僧、罗钧任、罗努生、左舜生同应蒋公召入谒，谈宪政问题。余述连日讨论宪法之经过，同人发言皆极精彩。表方与余兼谈及川政，幼椿谈及党务。蒋公态度极恳切开朗。】

——黄炎培：《参政会日记》，载《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543页。

4月1日-4月10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召开。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于4月1日上午，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开幕。】

——《会议日志》，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674页。

钱端升出席并提交两个提案。

【六 关于财政经济事项者

.....

13. 调整运输机构提高运输效率以利货运而平物价案 钱端升等

.....

15. 设法利用国人存放国外之资金以增厚金融力量而平抑物价案

钱端升等】

——《提案目录》，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698页。

4月24日

吴宓遇钱端升。

【晨8-9上课。遇钱端升，赞宓神色好。归舍，出考题。】

——吴宓：《吴宓日记》卷七，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9页。

4月28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欧战的推演与中国的地位》一文。

——钱端升：《欧战的推演与中国的地位》，载《今日评论》1940年4月28日，第3卷第17期，第259-261页。

5月12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论战时的行政机构》一文。

该文从抗战的形势入手。钱端升指出，日本在侵华初期是军事侵略，妄图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并占领政治、经济要点，中国作为防御方，沉着应对，彻底击败了日军速胜论，迫使日本不得不转换战略，从军事侵略过渡到经济进攻战，在如下三方面着力甚多：第一，积极开发沦陷区资源，以战养战；第二，竭力破坏中国财政、金融及经济机构；第三，扶持傀儡组织，便利其经济开发。钱端升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全力抵抗敌人的经济进攻，同时预备将来敌人可能的外交进攻。但钱端升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清醒指出，中国经济及外交的行政机构较之军事行政机构所差甚远，如今正处经济战的紧要关头，举凡物价、外汇、税收、运输、外贸、财务等，“百弊丛生，万病皆来”，故如果试图抵御敌人进攻，必须要改善经济行政机构，使之“系统明、权力大、责任专”。

钱端升提出如下改革思路：经济方面，为财政、金融、生产、运输、外贸及资源方面，各设置专门机构，同时慎选贤能，使负专责，以便决胜经济战；外交方面，则任用有魄力、有大志、细心者为外长，令之负外交全责，并赋予大权，以便在外交领域“应付有方、运用自如”；待经济、外交机构改善后，可以军事委员长、经济委员长及外交部长及参谋总长一人，组织战时内阁，避开叠床架屋的会议。钱端升强调，“要致胜须改组行政机构，尤其是经济的行政机构。”

——钱端升：《论战时的行政机构》，载《今日评论》1940年5月12日，第3卷第19期。

5月19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今后的外交》一文。

——钱端升：《今后的外交》，载《今日评论》1940年5月19日，第3卷第20期，第307-311页。

5月26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制宪与行宪》一文。

该文开头即声言：宪法在战时本不应成为问题，但因七八月来各党派的活动，而不得不谋一合理的解决。钱端升此时的观点稍变，认为既然以民国立国，各党亦主张民治，故立宪乃顺理成章，所余问题为如何入手、如何实施、有无先决条件及有什么样的先决条件。

钱端升重述孙中山《建国大纲》中有关训政和宪政的论述，指出在七七事变前四五年间，国人绝大多数同意一面立宪、一面训政，政府方面草拟宪法等举动亦是执行此办法；然而七七事变打乱了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的计划，宪政问题亦不得不有新的解决思路。钱端升指出，对于任何战时国家，胜利第一、一切第二，就政制而言，独裁与民治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哪个好就用哪个。中国抗战以来，朝野各方都试图往民治方向走，以便增厚

抗战力量，减少无谓摩擦，同时也尽可能获得友邦的同情。在这种背景下，钱端升认为，没必要继续七七事变前的制宪事业：第一，制宪不仅不必要，而且有害；第二，应树立制度精神，加强民意机关。钱端升援引国民参政会上周鲠生等提案的重点，包括：其一，政府行动应以法律授权为准，由此养成法治之风；其二，政府设施以制度为准，避免过多人为因素，使政府组织化；其三，扩大民意机关权力，增加民意成分，使政府对民意负责，认为如果这些可以实现，则可在国内外增色不少，政府方面“不谙党义及政治形势”之讥讽实在不必要。钱端升指出，党和政府既然决定早立宪法，无可反对其之余，“我们惟有在既成事实下找寻一条比较走得通的路径”。

钱端升坦言：“立宪问题在今日已不是要不要宪法的问题，因为政府已决定要，决不能又说不要；也不是何时要宪法的问题，因为十一月十二日这个日期既经决定，最好不再变更；也不是由何人制定宪法的问题，因为政府已决定以多年前选出的国民代表为宪法会的会员，即使反对也少实效，而且此时举行总选也不相宜；而是何时实施宪法，及何种宪法最为相宜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形下，确定宪法日期尤其重要。钱端升的观点是“与其名义上实施而实际上不能实施，毋宁不实施；与其早日实施而实施不了，毋宁缓日实施”。而进一步，既然宪法不能立即实施，那么即将颁布的宪法可以有两种：一种是事无巨细，不厌繁详，无论是平时还是抗战结束，都需要随时修订；还有一种是条文务必求简单，凡若干年后可能会变更之事，都不做明文规定，这种简略的宪法可以确保任何时候实施都不至于有不适应之处。职是之故，钱端升认为现在有关宪草的讨论，都是枝节问题，政府方面最好的办法是“暂不谈百年大计的正常宪法，而由依期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几个与法国1785年三大宪律相似的大法，而即予实行”。钱端升指出，这迫切需要制定的宪律包括：第一，规定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应于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召集，确定永久宪法；第二，规定以国民政治会议为最高统治机关，兼有国防最高委员和国民参政会权力，人数在一百之内，人选由蒋介石圈定；第三，规定国民政府及五院的组织及职权。钱端升认为上述宪律的实施，“不特将

大有助于抗战，且对永久宪法的形成及总选举的举行也可作一番有效的准备工作”。

——钱端升：《制宪与行宪》，载《今日评论》1940年5月26日，第3卷第21期。

6月9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论党》一文。

本文从一党与多党制度的优劣长短入手，同时强调两个事实：第一，中国国民党十余年来统治中国；第二，最近二三年来中国国民党承认异党存在的事实及颁布宪法实行宪政的诺言。钱端升指出，国民党对于一党专制局面的形成负有主要责任，但多年来国民党纵然未能避免空前国难，纵然未能使国家臻于理想，但其功绩不容抹杀。在这种背景下，钱端升认为在将来中国应实行多党制，而在抗战期内各民主党派应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而暂时不进行政权之争。而在多党制情形下，三民主义应被提升为中国的立国之道，而不是国民党一党的党义；在这种情形下，各党的主义及人民的政治活动都不能与三民主义相违背，而国民党党部所担负的工作，则应区分党务、国务，将包括宣传部的外宣、审查、登记、检查，训练委员会的训练以及组织部调查内奸等公务，都完全移交政府。由此，一党制度可以停止，多党政治即可开始。在各党公开后，国民党如依旧想维持其优胜地位，则需要忧勤惕厉，以与其他各党一决胜负，由此在竞争的空气中恢复当年奋斗时的大力。而就中共问题，钱端升认为应分为三点：第一是苏联的问题，第二是红军及边区政府的问题，第三是共产主义与思想的问题。这三个问题中，苏联问题另当别论，在外交层面解决；而红军及边区政府问题，应取消其特殊组织，实现军队国家化；而共产主义与思想问题，在三民主义、严禁叛乱等国家法律之下，除不能宣传暴动外，可以准予其自由，尤其是共产党本身亦接受三民主义。钱端升认为，各党公开后，愈努力者愈得势，优胜劣败，顺其自然即可，对国家的将来更是毋庸忧虑。

——钱端升：《论党》，载《今日评论》1940年6月9日，第3卷第23期。

6月16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大学往何处去》一文。

钱端升开篇即指出，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学教育与专门教育混而不分，“我们只有专门教育而无大学教育，所谓大学也只是数个专门学校的集合体。”钱端升进而也提出，如果我们不愿意长期学术落后，则务须认识大学的使命，“真正的大学绝不能对于‘实’、‘不实’的科目之间有轻重之分。科学是重要的，但科学之中，纯粹科学与实用科学有同样的重要……文史哲、法政经，也与科学有同样的重要。”鉴于大学不可速成，所需财力、人力巨大，钱端升建议，鉴于抗战前夜国内大学中配称大学者不过两三家，而且这两三家因数度迁徙，标准已大为降低，所以要想将大学办好，政府应全力辅助这少数大学，使其设备充实、师资胜任、学生优良，使之在最近的将来就能够跻身世界大学之林；而对其他所谓大学，实际上距离大学甚远，可以改为各种专科学校或者毅然停办。钱端升还提出，要培植大学之道，最重要的是养成自由言学的风气，而不能稍加统制；而专门学校则志在造就人才，需要因时而异，因地而异，针对社会紧缺之人才办学，甚至政府亦可开设各种专科学校，聊胜于无。

——钱端升：《大学往何处去》，载《今日评论》1940年6月16日，第3卷第24期。

6月18日

西南联大行政研究室规程修改，校务会议决定聘请钱端升为联大行政研究室主任。

【二、议决事项：

.....

（九）本大学行政研究室规程第三条条文应修正为“本研究室主任由本大学于本校政治学系教授中选聘之”。〈通知〉

（十）聘请钱端升先生为本大学行政研究室主任。〈公布、通知〉】

——《第一四六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6月23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法国崩溃后的欧战》一文。

——钱端升：《法国崩溃后的欧战》，载《今日评论》1940年6月23日，第3卷第25期。

钱端升被聘请为西南联大行政研究室主任。

【（5）请钱端升为本大学行政研究室主任。】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页。

7月7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抗战的三周年》一文。

——钱端升：《抗战的三周年》，载《今日评论》1940年7月7日，第4卷第1期，第3-5页。

7月14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书评《孤立的美国》一文。

——钱端升：《孤立的美国》，载《今日评论》1940年7月14日，第4卷第2期，第24-30页。

7月28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竞选期中的美国内政外交》一文。

——钱端升：《竞选期中的美国内政外交》，载《今日评论》1940年7月28日，第4卷第4期，第52-54页。

8月

钱端升被聘为清华第五届（1940）留美考试西洋通史科目之命题人。

【钱先生英文造诣甚深，生平苦嗜西方史学名著，尤其欣赏崔维林（G. M. Trevelyan）文章的秀洁典雅。他不惜投入大量精力完成崔氏名著《英国史》的翻译。中日战争时期钱端升执教西南联大，被聘为清华第五届（1940）留美考试西洋通史科目之命题人。吴保安得95分，我得94分，这是我和钱先生唯一的书面学术“接触”。】

——何炳棣：《读史阅史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8月14日

傅斯年致信胡适，就胡适驻美大使传言转达钱端升建议。

【实则我们之选与不选，先生之就与不就皆不相干，此一纠纷之故，乃在美使一任之时在议论中，而尤在孔之始终反对先生也。孔自先生初任时，一至于今，不断地说，“适之不如儒堂”，中间闻有一段稍好些，但不久又变矣（去年合众社一电纠纷，他都不从落井下石）。故孔之反对先生，是一大动力，此外则各方之传言也（王儒堂尤力，曾致介公大怒）。端升亦云，先生亦不妨稍敷衍去美之吾国人。我以为既为国家办事，此等事亦不妨稍有损焉。】

——傅斯年：《致胡适》，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页。

9月1日

在《读书通讯》（半月刊）发表《浅说民权与极权》一文。

钱端升从世界大战的形势入手，指出这场大战是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的火并，而我们在民主与极权之间必须要有所抉择，不能稍存惰性，不敢骑墙徘徊，“我们不在这边，定在那边，没有骑墙徘徊的余地及余暇，因而以最坚决的态度，协助甚或领导民主国家，打倒极权国家，则我们所可发挥的力量可以极大。”钱端升甚至豪情万丈地表示，“我们容或可以一举而贯彻三民主义于整个世界，我们容或可以一举而建设三民主义的新的世界秩序。”而钱端升认为，在这种抉择中，中国既不能有惰性，也不能有投机，“不能因为我们讲了民治已有三四十年之久而不敢毅然放弃，也不能因为德国最近有空前的胜利而趋炎附势。”钱端升申言，民主政治六七百年的历史未能解决两大问题：既未能平衡自由与平等的问题，也未能建立一个博爱的世界秩序；而极权政治正好就建立在民主政治的缺陷之上，对民主政治势必巨大影响，甚至能战败民主国家而消灭其势力，使民主政治永不存在。钱端升预言，即便民主国家胜利、极权政治失败，为了防止将来极权政治的复萌，也因为在抵抗极权过程中民主国家的自我调整，民主政治在将来都有大变。但无论如何，钱端升乐观地详述，极权政治或许一时强于民主政治，甚至能消灭民主政治，但绝无将民主政治取而代之的可能，届时人类将另谋出路以自存。而在钱端升看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人类当今的生”，三民主义既尊重个人尊严，也能使国家有充分权力，还能推动社会极大发展，可以补救民治的短处。

——钱端升：《浅说民权与极权》，载《读书通讯》1940年9月1日，第9期，第4-5页。

9月11日

钱端升等聘为西南联大行政研究室委员会委员、主席。

【二、议决事项：

.....

(八) 聘请钱端升、周世述、龚祥瑞、戴修瓚、秦瓚诸先生为本校行政

研究室委员会委员，并请钱端升先生为该委员会主席。〈通知、公布〉】

——《第一五五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

9月20日

林徽因致信费慰梅，告诉钱端升等在昆明的生活状况：

【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的农舍中安下家来。它位于昆明市东北八公里处一个小村的边上，风景优美而没有军事目标。邻接一条长堤，堤上长满如古画中的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我们的房子有三个大一点的房间，一间原则上归我用的厨房和一间空着的佣人房，因为不能保证这几个月都能用上佣人，尽管理论上我们还请得起，但事实上超过了我们的支付能力（每月七十美元左右）。这个春天，老金在我们房子的一边添盖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体就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可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出乎意料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的高三倍的钱。所以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境之中（我想这种表述方式大概不大对头）。在建房的最后阶段事情变得有些滑稽，虽然也让人兴奋。所有在我们旁边也盖了类似房子的朋友（原文脚注曰：当时在龙头村自建这种土坯小房的还有原中央博物院考古学家李济、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钱端升等——夏红注），高兴地互相指出各自特别啰嗦之处。我们的房子是最晚建成的，以致最后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根钉子而奋斗。为了能够迁入这个甚至不足以“避风雨”——这是中国的经典定义，你们想必听过思成的讲演的——屋顶之下，我们得亲自帮忙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匠。】

——林徽因《给费正清 费慰梅·十二》，载林徽因：《林徽因诗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12页。

这段材料在费慰梅著作译本中似稍微简略点：

【我们现在住在离昆明城里8英里的中等规模的村子尽头新建的一所三

居室的住宅里。它周围风景还不错，没有军事目标。我们的住宅包括三间宽敞的屋子和小巷尽头的一间厨房，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还有一间佣人的房间直到现在还空着。春天里老金在我们的住宅尽头处加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京总布胡同集团现在就齐了，但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许许多多的朋友包括（钱）端升也在这里筑了小房子。我们的房子是最后盖的，所以结果我们就只好为了所需要的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头和每一颗钉子而奋斗，还得参加运送材料和实际的木匠活和石匠活。】

——[美]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曲莹璞、关超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37页。

9月29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国家今后的工作与责任》一文。

该文展望国家今后的工作。钱端升认为，今后若干年内的工作不外乎抗战与建国，两者之间水乳交融，共同推进。就抗战而言，需要完成两大工作，即抵抗日寇本身及助日为虐加害于中国的其他敌人，和战后的善后工作。就建国而言，需要完成三大工作，即国防的充分布置、国富的努力增加和人民民族意识与大同理想的普遍灌输。

——钱端升：《国家今后的工作与责任》，载《今日评论》1940年9月29日，第4卷第13期。

10月11日

钱端升当选为校务会议教授代表。

【十一日本大学教授会开会，选举本大学第三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结果周炳琳、叶企孙、陈福田、陈雪屏、罗常培、王裕光、陈总、潘光旦、钱端升、张景钺、张奚若、郑华炽十二人当选为代表。叶公超、萧蘧、雷海宗、赵迺抃、姚从吾、崔书琴等十二人，当选为候补代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

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316页。

【10月11日，召开西南联大教授会，选举第三届校务会议代表。陈福田、潘光旦、罗常培、钱端升等12人当选为代表；雷海宗、叶公超、汤用彤、姚从吾等12人当选为候补代表。】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

10月13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一文。

钱端升提出，中国当下需要的政治制度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要能担负起国家今后的作用；要有实行可能；要合乎民族性而可以久长。而就这三个条件来看，旧式官僚政客所半把握半放任的政制、英美式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都不能承担起抗战和建国的任务，中国需要的是拥有大权力、能够发挥大效率，而且能够尊重人民的人格与尊严的政府。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权主义便是符合这个要求的最好架构。而就政制发展而言，囿于抗战大背景，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从训政到宪政的步骤需要重新考虑；在找到最适合的方式之前，国民需要授权蒋介石完成两件大事：第一是改组国民党，加强党的实力与作用，负起训政大任；第二是成立一个辅佐民意的机关，使蒋介石永远不能成为独裁者。

——钱端升：《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载《今日评论》1940年10月13日，第4卷第15期。

10月15日

西南联大公布第三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名单，钱端升列其中。

【西南联大第三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名单

(1940年10月15日)

查本大学第三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经于本月十一日由教授会开会选

举，兹将选举结果公布于后。

计 开

周炳琳 四十票 叶企孙 三十六票 陈福田 三十三票
陈雪屏 三十二票 罗常培 三十票 王裕光 三十票
陈岱孙 二十九票 潘光旦 二十八票 钱端升 二十六票
张景钺 二十五票 张奚若 二十三票 郑华炽 二十票

以上当选

叶公超 十九票 萧 蓬 十八票 雷海宗 十八票
杨武之 十八票 杨石先 十五票 庄前鼎 十五票
汤用彤 十五票 燕树棠 十三票 戴修瓚 十票
赵迺抟 九票 姚从吾 四票 崔书琴 三票

以上候补】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108页。

10月16日

钱端升出席西南联大校务会议第三届第一次会议。

【日期 廿九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七时半

地址 西仓坡五号

出 席 周炳琳 查良钊 陈雪屏 陈福田 施嘉炆 杨石先
吴有训 张景钺 钱端升 叶企孙 郑华炽 陈岱孙
梅贻琦 蒋梦麟 潘光旦 罗常培 郑天挺 冯友兰

主 席 梅贻琦 记 录 冯友兰

报告事项

- （一）教育部近发教师资格审查暂行规程施行细则并令于本年開始办理。
- （二）派员赴川勘查校址经过，并已接黄、樊二君到沪来电。
- （三）三校研究院招生办理经过。

(四) 本校师范学院被轰炸善后办法。

(五) 拟定预防空袭注意事项。

琦】

——《第三届第一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9-470页。

10月20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一党与多党》一文。

该文从两个角度说明多党制的不合时宜：第一，从人类政治制度的演化而言，多党制已到了代谢的时候，一党制遵循和平及渐进的途径代替多党制，是大势所趋。第二，从中国今后的需要看，一党制亦为无可避免的制度，多党政治根本不适合今日中国。

——钱端升：《一党与多党》，载《今日评论》1940年10月20日，第4卷第16期。

10月23日

西南联大常委会确认钱端升等当选消息。

【一、报告事项：

(一) 梅主席报告：本大学第三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经于本月十一日由教授会开会选举，其结果业由教授会书记潘光旦先生来函报告计：周炳琳四十票，叶企孙三十六票，陈福田三十三票，陈雪屏三十二票，罗常培三十票，王裕光三十票，陈岱孙二十九票，潘光旦二十八票，钱端升二十六票，张景钺二十五票，张奚若二十三票，郑华炽二十票，以上十二人当选。又叶公超十九票，萧蓬十八票，雷海宗十八票，杨武之十八票，杨石先十五票，庄前鼎十五票，汤用彤十五票，燕树棠十三票，戴修瓚十票，赵迺抃九票，姚从吾四票，崔书琴三票，以上十二人当选为候补代表。】

——《第一五八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

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4 - 155 页。

10 月 27 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论自由》一文。

钱端升在开篇即提及，自由问题在西方争论亦十分久远，但所争论者为自由的范围问题，而不是自由的需要与不需要的问题。就自由本身而言，钱端升提出两点意义：第一，从人类本性来说，自由是成年完好的必须具备的若干种必不可少的行动及思想上的自由；第二，因为自由是人类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国家不应攫为己有，而应力加保护。就中国而言，今后应力加保护者，意见自由首当其冲，应受绝对的保障。战时对自由可以有必要限制，但“限制的法律不妨求其严，但濫用法律的可能则又务必求其小”。

——钱端升：《论自由》，载《今日评论》1940 年 10 月 27 日，第 4 卷第 17 期。

11 月

梁思成致信费慰梅，他将和林徽因随营造学社迁到四川李庄，而钱端升等都将留守昆明。

【思成在一封信里说，“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我们已经有了十年以上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去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他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哪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但是我想英国的情况还要糟得多。”】

——[美] 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曲莹璞、关超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 年版，第 139 页。

11 月 3 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三国同盟后的世界局势与苏联地位》一文。

——钱端升：《三国同盟后的世界局势与苏联地位》，载《今日评论》

1940年11月3日，第4卷第18期，第276-277页。

钱端升参加西南联大第三届第二次校务会议。

【时间 廿九年十一月三日

地点 西仓坡五号

出席 蒋梦麟 罗常培 施嘉炆 陈序经 陈福田 张伯苓（杨石先代）

张奚若 吴有训 郑天挺 郑华炽 钱端升 陈岱孙

张景钺 陈雪屏 周炳琳 查良钊 冯友兰 梅贻琦

主席 梅贻琦 记录 冯友兰

报告事项

（一）本校派员在泸州、叙永一带查勘校址经过。

（二）与运输统制局接洽代征商车经过。

（三）常委会拟定本校就地疏散到晋宁、澄江办法经过。

琦】

——《第三届第二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0页。

11月10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罗斯福当选与今后的美国》。

——钱端升：《罗斯福当选与今后的美国》，载《今日评论》1940年11月10日，第4卷第19期，第292-294页。

11月12日

钱端升致胡适、周鲠生。

【适之、鲠生兄：

前上一函计达。鲠生兄前有大选后回国意，不知尚可留美多久，此时料未起行也，念念。

敌人夏季炸重庆，上月炸昆明。最近二周，撤兵，停炸，放和平空气。国内人心颇不安。虽有外部本月七日之辟谣，但国内总疑心有什么事在进行似的。因为政府要人讳莫如深，即使弟等亦感不甚舒服。外部辟谣在罗公当选之后，故罗公之当选尚能使人心稍趋安定。

南进事颇不易测。屯大军于海南，如不南进，似太不值。但南进困难甚多，由越进泰极不易，由泰进缅稍易，但亦不易。如用海军，则海军必须冒险。国内日本通，有谓海军主南进者，有谓海军反对者，亦莫衷一是。

此间二十六、七即传日苏已于二十二有不侵犯协定。但一字不能泄漏，问重庆要人，亦不肯复。如诚有之，国共之争必然恶化。弟个人意，苏联我们必须曲意承欢。但苏联定欲欺我压我，则亦惟有放弃唾面自干之政策以对待之。

国内政治无可言者，大致上颇不像有战事。各省省参议抢参政员极烈，大概乃因地方绅士欲借参政员名义以凌本省各厅长之故。

毕德门去世极可惜，如 George 继，不知将与总统合作否？

鯉生兄寄刘馭万之书，刘前来函谓已擅寄弟处，但逾二月无书来。最近昆明见不到外国印刷品，可怜极矣。即请

近安

弟 端升

十一月十二日】

——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492 - 493 页。

11 月 18 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我们需要的经济政策》一文。

该文重提建国三要件：国防的充分布置、国富的努力增加和民族意识与大同理想的普遍灌输。而这三条件合并一起，亦即意味着国防经济与民生经济并重，尤其在短期内不应有轻重之分。钱端升认为，要国防经济与民生经

济并重，需要做到四点：第一，须有一适当的人口政策以培植人力；第二，须有一稳健现实、不涉高调的农业政策；第三，须有可以移动的人口充当国防工业的劳力；第四，须将资本集中于国家；第五，须确定国防政策。

——钱端升：《我们需要的经济政策》，载《今日评论》1940年11月18日，第4卷第20期。

11月24日

钱端升致胡适。

【适之兄：八、九日前曾作一涵，絮絮话国内近事，计达。

此间人心，颇为奇怪。敌机如连日来，大家叫苦。如多日不来，则又轻信和平谣言。联大同事，亦未能免此。至以空袭损失而言，同仁所受者尚不算大。惟 Pollart-Urgnhut 逃警报，为汽车撞伤，三日内中毒而逝；丁佶因逃警报，至一浮水池，次日乃去浮水，竟没顶以死；又一学生为防空部队击死；斯均无妄之灾耳。同事逃警报不一其道。梅月涵有报始走，孟邻住乡下，除开会应酬外不进城，其别之大者也。教授中，有远走高飞，并一周之课于一日者；有至今住乡下，未肯上课者，联大饶树人、云大徐敦璋均为显例。第三四日住城，三四日住乡，尚可称常人。陈福田等住一度被毁，旋告修复之城居，几日日去学校，则又高弟一等矣。公超为其叔理产，在沪被其庶婶所陷，入日人之縲继，一月余备受刑责，今虽释放，犹不能离沪，则言之至可痛心。

联大经四月扰攘，现仍定不迁。唯一年级在川召集。此事亦不甚妥。联大内部亦因此事发生 morale（风纪）方面许多不良影响，可惜也。附件拟请抽暇一阅。如可能，乞向洛氏基金方面吹嘘。弟既无书可读，又苦无事可做，致有此尝试。兄得无笑其少不更事，无苦讨苦耶？敬颂

旅祺

弟 端升

二九，十一，二十四

附函恳转游君为感。】

——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3-494页。

11月25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我们需要的教育政策》一文。

钱端升提及，教育政策首先需要与中国今后数十年的重大工作相协调：巩固国防、国家独立强盛、减少贫穷愚昧、人民充裕有力；政党宽博有力、尊重人格，政府既重视国权也重视民权。就教育精神而言，人民须将“八德”与民族观念并重，兼顾二者。但钱端升亦强调，教育精神的贯彻不能以设置精神教育、修身或伦理等科目了事，一方面教育者应以身作则，另一方面应从国文史地中间接灌输。教育精神确定后，具体学校教育应分为国民教育、升学教育、大学教育及技术教育四类，各有所重，以求革新。

——钱端升：《我们需要的教育政策》，载《今日评论》1940年11月25日，第4卷第21期。

12月1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我们需要的世界政策》一文。

钱端升认为，我们对于国际政策发言甚少，既源于国弱，也源于未意识到国际政策的重要性。钱端升预言，中日战争，中国必胜；世界大战，中美英必胜。在这种大前提下，应构建如下新的世界秩序：就共同组织而言，应按照如下五点作为组织世界新秩序的原则：第一，民族自决；第二，区域各成员组织；第三，区域内落后民族，归区组织代管；第四，全世界组织内仍由各区的领导民族居领导地位；第五，世界新秩序采取实验主义，开始时陈义不必过高，将来再达到世界大同。这五点原则可申论如下：第一，民族自决并非人类最高理想，但是当前必需；第二，国联之败于无区域主义，固区域主义乃是补国联短板；第三，各区内均有弱小民族，必须应有区组织代

管；第四，区组织之上设置世界组织，采取联邦方式；第五，对于世界新秩序的最后期望依然是大同理想的实现。

而就中日和平办法而言，需要注意三点：第一，就领土及疆域变更而言，七七事变前疆土应全部恢复；第二，就日本军备而言，应受到严格限制；第三，日本数十年掠夺文物应全部退还；第四，中国应就赔偿问题提出合理要求。

——钱端升：《我们需要的世界政策》，载《今日评论》1940年12月1日，第4卷第22期。

12月8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日伪订约》一文。

——钱端升：《日伪订约》，载《今日评论》1940年12月8日，第4卷第23期，第359-361页。

12月11日

钱端升参加校务会议第三届第二次会议。（疑为第三次之笔误——夏红注）

【日期 廿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四时

地点 西仓坡五号

出席 梅贻琦 张景钺 吴有训 冯友兰 郑华炽 钱端升

张奚若 陈序经 杨振声 周炳琳 陈雪屏 王明之

郑天挺 蒋梦麟 查良钊 黄钰生

主席 梅贻琦 记录 冯友兰

报告事项

（一）教育部令发教职员米贴办法，惟施行日期，系定自十一月起，本校已呈部请照前请，仍自一月起发给。

（二）教育部拨本校本年经常补助费二十四万元。

（三）常委会前次决定前往澄江、晋宁之议，因无必要，已取消。

(1) 现定一年级叙永上课。

(2) 叙永分校设分校主任及分校校务委员会。

(3) 一年级学生，已于十一月中通告令于十二月十日起在叙永春秋祠报到。

(4) 现报到者已有七十人，定一月六日上课，添置家具等事已在办理。

(四) 校历改定办法。

议决事项

(一) 修正校历

议决：如常委会议决校历改订办法尚未公布应照下列办法重行改定：

(1) 第一学期上课延至二月十二日结止。

(2) 二月十三日至十九日举行学期考试。

(3) 一月一日新年放假一日。

(4) 一月廿七至廿九春节放假三日。

(5) 二月廿至廿四放寒假五日。

(6) 二月廿五第二学期开学，三月三日起始上课。

(7) 原定春假取消。

(8) 第二学期考试延至六月廿至廿六举行。

(二) 二十六年度长沙临时大学决算，二十六年度、二十七年度本校决算审议案。

议决：原案通过。

琦】

——《第三届第二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0-471页。

12月22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大战的趋势》一文。

——钱端升：《大战的趋势》，载《今日评论》1940年12月22日，第4

卷第25期，第388—389页。

12月23日

钱端升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

【丁、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丁项遴选者……钱端升……】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785页。

1940年9月26日《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修正：

【（丁）由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遴选一百八十名。】

——《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768页。

时间待定

钱端升担任西南联大行政研究室委员会主任。

【主任委员 钱端升

委员 钱端升 戴修瓚 秦 瓚 周世述 龚祥瑞】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1941年(41岁)

1月8日

吴宓与钱端升等在冠生园聚餐。

【归舍。6—10偕省身等至冠生园，赴端（钱端升）、总（陈总）、田（陈福田）、侗（李继侗）、奚（张奚若）五人招邀，陪宴郑麀（新华银行行

长)。汪一彪。又同步归。】

——吴宓：《吴宓日记》卷八，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页。

1月12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民国三十年度的工作》一文。

——钱端升：《民国三十年度的工作》，载《今日评论》1941年1月12日，第5卷第1期。

1月15日

吴宓与钱端升一道前往徐锡良招宴。

【6-10偕钱端升、陈总、陈福田至大观新村七号马宅，赴徐锡良、陈玉英招宴。遇梁琰小姐，知为杨宗翰之妹。向宓自陈身世，并商招翰出之策。以宓为兄。宓甚爱其人，亦以妹视之矣。】

——吴宓：《吴宓日记》卷八，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页。

1月19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日本的南进》一文。

——钱端升：《日本的南进》，载《今日评论》1941年1月19日，第5卷第2期。

1月21日

钱端升致胡适。

【适之兄：

一年来信八九发，庶书明寄兄，或书明寄鯉生兄，由彼转达，计当一一收到。去岁宋子文去美出白宫与兄合影，曾见诸《字林西报》，颇丰硕，为之一慰。此时无他祝，弟祝健康，有了健康，以兄之明德，一切事功俱可迎刃而解，不劳弟等关心也。

十一月廿五，曾以请款于洛氏基金事有所奉恳，以后马敏生兄函中又提及此事。兄在外为国效劳，国内事（尤其与小我有关者）恐扰清神，不敢一一直告。但质言之，国内大学俱少生气，即联大亦然。弟既蓄志教书，自不能不想法求工作，以求有前进之可能。于是乃有行政研究室。而校中不起劲，不拨款，于是乃向外请款。然此时如无丝毫外汇，进修亦极困难。于是乃想到向日所不习为之办法，即请款于洛氏。但全依外人太不成话，于是有一半由政府补助之议。今政府已允设法照拨，但又坚持洛氏亦拨半数为条件。洛氏不拨款，不特弟认为工作不易出色，即政府亦将袖手旁观。故弟颇急于知道洛氏之意向。洛氏在沪代表为 M. C. Balfour，此间无人熟悉，意必为 Gunn 一类人，则弟非南开、燕京，将有何指望哉？弟意兄如以个人名义向纽约洛方主持人（择一熟者）一言，其效当大。万一不便，亦请烦及时令弟知之，以便搜索枯肠，另想他法也。

国内有三大事，即国共争，物价涨，日又有侵入滇省模样。然弟所见，最糟者仍是政治无进步。自号进步者无论共或反共，均是 totalitarian（极权主义者），亦是不愿入轨道者，其余更可知，奈何。即颂

旅安

鯉生兄均此。

弟 端升

卅年一月廿一日】

——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508 - 509 页。

3月1日-3月10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召开。

——《会议日志》，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32 页。

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内国民党员分组名单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内国民党员分组名单

第二组 周览……钱端升……】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内国民党员分组名单》，载《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页。

3月19日

钱端升被推选为中英文化合作宣言起草人。

【十九日（1）中英文化协会接获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教授关于中英文化合作宣言，函征本大学各教授意见。本大学推定冯友兰、钱端升、陈福田起草宣言，函由中英文化协会转寄，以示响应。】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页。

【一、报告事项：

……

（二）梅主席报告：中英文化协会为送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教授关于中英文化合作宣言，请征集本大学各教授意见，并推定二三人起草响应文字寄会，以便转寄，以示合作而敦邦交来函。】

——《第一七一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二、议决事项：

……

（八）推定冯友兰、钱端升、陈福田三先生起草响应牛津、剑桥两大学教授关于中英文化合作宣言文字。〈通知〉】

——《第一七一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3月26日

钱端升参加西南联大校务会议第三届第三次会议。

【时间 卅年三月廿六日下午五时

地点 西仓坡五号清华大学办事处

出席 蒋梦麟 施嘉炆(李辑祥代) 查良钊 梅贻琦 罗常培

郑天挺 钱端升 陈雪屏 陈岱孙 叶企孙 陈序经 周炳琳

张奚若 张景钺 陈福田 樊际昌 冯友兰 吴有训 黄钰生

主席 梅贻琦 记录 冯友兰

报告事项

(一) 本学年本校财政状况及增发教职员生活津贴办法:

(1) 近三月来教部拨款计有: 学生空袭损失救济费一万元。(他方补助有赈委会四千元, 孔院长贰万元, 齐鲁大学学生自治会七千余元。已由训导处支发, 余存校。)

(2) 学生贷金十一万元, 教职员工友膳食补助费二万六千元。

(3) 拨到行政院补助建筑费十五万元, 部垫四万元免予归垫。

(4) 二十九年研究补助费不发。

(5) 最近拨到一月份薪俸补助贰万五千元, 建设费五万元, 加班费十七万元, 附中经费四万元。

(6) 本年一月起发全薪以后同仁薪额调整办法: 50元以下加20元, 55-75加15元, 80-100加10元, 105-125加5元。但以服务满一年者方照加。讲师每小时每月加五元。学生助理改55-35元(应再改55-25元)。

(7) 学生贷金及米贴定为32、16、14、7元四种。

(8) 常委会最近决定, 同仁生活津贴(三月起)办法。

(二) 部令自行招生, 竺、罗两校长来电提议联合招生, 如同意请派代表赴渝会商。

议决事项

(一) 规定本校成立纪念日案。

议决: 定十一月一日为本校成立纪念日。

（二）取消出版组案。

议决：取消出版组，印刷讲义由图书馆负责办理。

（三）修正图书馆教职员借书规则案。

议决：照常委会原案修正通过。附件一

（四）下年分校应否继续设置案。

议决：

（1）下学年二年级学生均在昆明上课。

（2）本校以不舍分校为原则。（七票）

（3）本校为吸收一年级新生及预防时局骤变计，下年度应仍设立分校，至分校地点所在，俟相加考虑后，再行决定。（七票）

（五）本校本学年招生应否与别校联合办理案。

议决：

（1）不与别校联合办理。（八票）

（2）与别校联合办理。（八票）

主席赞成与别校联合办理，第二提案“与别校联合办理”通过。

（六）叙永分校组织简则请审议案。

议决：照审查意见通过，文字由本会秘书加以润色。

琦】

——《第三届第三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2-473页。

4月5日

钱端升与梅贻琦、张奚若等人一道拜访张君勱。

【七点赴冠生园方矩成新夫妇饭约。饭后与张、钱二君往商务酒店访张君勱谈甚久，十二点始别归。

归途天气转冷，半月西沉，颜色暗赭，恐明日又有风沙之袭。】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4月13日

在《今日评论》发表《论党务》一文。

本文论及国民党党务的改进问题。钱端升提出四点意见：第一，三民主义的阐释应该具有必要的精彩度和灵气，而且其出发点应是全民利益；第二，党员发展应既重视数量更注重质量，多吸收全国最富有政治意识的优秀分子入党；第三，党的组织与经费不求其大，但求能脱离政府而自给自足；第四，党政分开，使政党和政府分属不同体系，不可错综混合。钱端升认为做到这些，才能革新党务，使国民党更健全，使政治上轨道。

——钱端升：《论党务》，载《今日评论》1941年4月13日，第5卷第14期。

4月18日

钱端升访吴宓。

【10:00 警报至，宓醒，即出城。先遇珏、绂等。旋于苏家堂附近，遇琼，与徐行敏医士及其妻 Anne 抱孩偕行。旋钱端升亦来。同至苏家堂北左山上坐息。食白糖米糕。1:00 后，至苏家堂饮茶，而雷雨。依屋墙与端、琼并坐。雨甚大，衣帽等尽湿。2:30 回新校舍南区。】

——吴宓：《吴宓日记》卷八，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3页。

5月4日

钱端升与梅贻琦、莫泮芹、陈雪屏、罗常培、郑天挺等一道便餐。

【八点半回冠生园与蒋夫妇及莫、钱、陈、罗、郑便餐。】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5月15日

钱端升与钟天心、周枚荪、查勉仲、姚从吾、陈雪屏等请西南联大同

仁，谈党及请大家入党意愿。

【晚七点钟天心、周枚荪、钱端升、查勉仲、姚从吾、陈雪屏合请校中同仁三桌。饭后谈党及请大家入党的意思，发言者为周、蒋、贺、周、钟。十点半散。】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6月

钱端升接受西南联大六月份膳食补助。

职别	姓名	成人	5岁以下儿童	标准
.....	16.8
政治系教授	钱端升	3	1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9月4日

在《中央周刊》发表《新中国与一党制》一文。

该文纵论战后中国的政局。钱端升指出，战时问题多，战后问题更多，中国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立下极高的理想，成为大国强国；要么自暴自弃，得过且过，成为新的侵略的牺牲者。钱端升表示：“我的理想如下：我们早日产生一个贤能当道的强有力政府，由他来为人民谋普遍的福利，为国家尽雄伟的力量；近则抵制个别的侵略，远则保障世界的和平。”钱端升进一步表示，要实现上述理想，国家须有权，人民须有自由。而国家有权的前提就是坚定不移地实施一党制，无党制、多党制均不适合；在一党制下，人民赖以维持尊严的言论自由必须受到保障。钱端升指出，“为使新中国的国权完整起见，只有一党制度是相宜的制度；为保护新中国的新自由起见，多党制

度并无必要”，钱端升甚至预言说：“英美等国战后亦将采取一党制以建新英国、新美国。”鉴于国民党长期以来的执政地位，钱端升坦言，在新中国、新世界，国民党依然应是中国的执政党，长此以往其他政党必将失去存在的理由与可能，“一方面接受三民主义，而一方面又与国民党对立，这局面我以为是不忠实的，也是难以持久的。”

——钱端升：《新中国与一党制》，载《中央周刊》1941年9月4日，第4卷第4期，第2-3页。

9月27日

在《三民主义周刊》发表《三民主义的阐扬与宣传》一文。

本文纵论三民主义的解释与宣传问题。钱端升开篇即点题：“国民党在中国虽然有很悠久的历史，但三民主义的宣传尚属不够。”钱端升举外交部部长郭泰祺在美国演讲中将英国《大宪章》、美国《独立宣言》与中国三民主义相提并论，认为此类对三民主义的有力宣传实在太少。钱端升进而细考孙中山晚年言论，认为保留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将来治国训练党的干部及充实并宣传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晚年三大宏愿，但其意外逝世使得三民主义丧失了一个最有力的宣传者。而最近多年党治的进展，使得三民主义的宣传趋于恶劣，钱端升分析原因如下：第一，党内解释主义者的气度过于狭窄，对三民主义的理解过于肤浅；第二，党外知识分子要么缺乏政治意识，要么缺乏宽宏大量；第三，党内知识分子过于消极缄默，对三民主义外未作恰当的宣传。钱端升认为，“党八股”的泛滥，主要是因为党内的解释主义者要么是老同志，国学渊博但治学方法带有科举时代的色彩，对于西洋文化知之甚浅，而党外知识分子虽然不公然反对三民主义，但吹毛求疵者比比皆是，党内文人缄默无言纵容了这种谬种流传。钱端升指出，如果需要使得三民主义被人民广为了解，必须要改变宣传方针：我们对三民主义首先应有一个合理看法，尤其是明了孙中山先生的学诣、所处的时代及《三民主义》的成书背景。钱端升认为，抗战已见曙光，新中国、新世界的建设行将开始，

正宜及时宣传三民主义，以做建设的指南。

——钱端升：《三民主义的阐扬与宣传》，载《三民主义周刊》1941年9月27日，第2卷第1期。

9月

在昆明，写完《建国途径》一书短序。

【在二十九年的冬月，我尝在《今日评论》发表过关于建国途径的七篇文章。这七篇文章包含颇广，无论政治、经济、教育、外交，均有所论及。然而他们都有一个中心目标。这就是怎样在短期内完成新中国的建设。我的理想不算低，但同时也还是可以实现的理想。

我今将这几篇文章依原文汇印成书，而以“建国途径”为总题。建国途径诚有切实讨论的必要。引起切实的讨论就是我去年写文，今年又汇印的目的。】

——钱端升：《〈建国途径〉序》，载钱端升：《建国途径》，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版。转引自孙宏云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6页。

10月4日

在《三民主义周刊》发表《三民主义与新世界的建设》一文。

该文主要论述三民主义的国际宣传问题。钱端升开篇即指出，三民主义虽然崇高，但实行困难，缘于三大障碍，即愚、私和暴力；而在国际层面，极权主义尤其是三民主义的最大的障碍。钱端升认为，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宣言，大体与三民主义一致，“世界上最进步的思想一定将以三民主义为依归；或说得客观一些，一定将于三民主义相谄合”。但钱端升也清醒地认识到，说明全世界的开明思想正在走向三民主义是一回事，而阐扬并推行三民主义于全世界，又是另一回事，“但我们若以‘三民主义的世界性’、‘英美政治家皈依三民主义’一类的题目为题乱写文章，恐怕于三

民主义不特无益，而且有害。我们可坚信全世界将循三民主义的大道以前进，但我们却要顾到任何民族都当有虚骄的心理，我们可尽力以求英美等国与我平行前进，却万不可说他们追着我们。”钱端升认为，当务之急有两点：第一，对外宣传三民主义；第二，在民权、民生方面做切实实践。尤其是在宣传三民主义时，“应尽量顾到美英开明政治家所有的主张，以求增加思想的接近。”

——钱端升：《三民主义与新世界的建设》，载《三民主义周刊》1941年10月4日，第2卷第2期。

11月1日

《新经济》编辑后记提及钱端升。

【关于政府、公司的理论，本刊以前曾登过钱端升、张纯明及吴半农诸先生的文章。现在吴先生对于这个问题，再加以系统的探讨，可以说是替办理国营事业的人，解决了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的。……】

——佚名：《编辑后记》，载《新经济》1941年11月1日，第6卷第3期，第17页。

11月17日-11月26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召开。

【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礼堂开幕。】

——《会议日志》，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965页。

11月30日

朱自清参加郭太太邀午餐，见到钱太太。

【郭太太邀午餐，客有陈梦家夫妇及钱太太。话题为谈清华大学女生，

甚有趣。钱太太喋喋不休，致不注意别人谈话。三时左右回城。】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12月11日

朱自清在钱家午餐。

【在钱家午餐。我在餐桌上又被钱太太让得进食逾量！】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12月17日

朱自清路遇钱端升。

【归途中遇端升。】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12月19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未遇。

【访钱君，他尚未归来。】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1942年（42岁）

1月9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又访端升。】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1月14日

朱自清邀钱端升等下周二中午聚餐。钱端升谢绝。

【邀请岱孙、叔玉、继侗、端升、毓柎、心恒、了一夫妇、奚若夫妇下周二七时在冠生园午餐。端升谢绝，岱孙将飞往重庆为清华借钱。】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1月25日

钱端升、朱自清、顾毓秀等一道前往拜访梅贻琦。

【餐后去端升处和一樵同见梅校长，又同到司家营研究所。然后，乘梅的汽车到蒋太太家用晚餐，有鱼头豆腐。】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2月15日

朱自清访了一与端升。

【访了一与端升。前者告诉我关于张德章坏脾气的事，后者谈及北大的政策。】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3月

以《今日评论》系列文章汇编的《建国途径》一书由重庆国民出版社出版。

【目次

一、我们的任务——国家今后的工作与责任

二、政治制度——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

三、一党与多党——一党与多党

四、自由新论——论自由

五、经济政策——我们需要的经济政策

六、教育政策——我们需要的教育政策

七、世界政策——我们需要的世界政策】

——钱端升：《〈建国途径〉序》，载钱端升：《建国途径》，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版。转引自孙宏云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6页。

4月3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访端升，参加陈君夫妇晚餐会。烫面饺很好吃，菜肴亦好，我很满意。】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4月10日

朱自清在钱端升家午餐。

【在钱家午餐，面和菜均佳。钱君对政治和军队之贪婪殊感愤慨，特别对高级军官之奢侈生活愤愤不平。因此，他主张战后必须来一次革新，但他并未提出革新之中心。共产党对此当然不能负责。他的想法，中心可能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内的部分知识阶级。然而，知识阶级既对抗战的贡献很少，它的声望又不大，这些都是必须看到的。】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

164页。

4月17日

朱自清午间访钱端升。

【访端升，惊扰其午睡，悔之。】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4月25日

钱端升等访朱自清。

【今甫、枚荪、端升、华恽夫妇及饶太太来访。今甫指责清华不委任宗岱为西语系文学与语言教授。】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4月

在《美国政治学评论》发表英文论文 *War-time Government in China* (《论中国的战时政治体制》)。

——钱端升：《钱端升主要著作目录》，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0页。

5月12日

钱端升与朱自清长谈。

【去地坛，借二书。端升晚餐后留此长谈，培源认为我可能会捎信给钱太太，我应下决心不去访问周家。】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

5月22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等人。

【访了一、梦家与端升。了一告以昨日教授会上发生之事。讨论敌人之进攻，做出某些建议。与端升共进晚餐。】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

6月9日

朱自清入市购买点心等。钱端升委婉地批评。

【晚入市购点心作明日茶会用。端升谓有钱应多为子女营养计，语甚是。】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

6月28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晚饭后访钱、王。】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7月27日

钱端升被遴选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四、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丁项遴选者：

.....

钱端升.....】

——《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

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0页。

1942年3月16日修正之《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

【第三条 国民参政会置参政员,总额二百四十名,其分配如左:

.....

(丁)由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遴选六十名。】

——《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9-1050页。

7月29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大学昆明办事处第四次教务会议。

【教务会议(第四次)

时间:卅一年七月廿九日下午六时半

地点:才盛巷二号

出席:张景钺 罗常培 樊际昌 燕树棠 杨振声 莫泮芹 饶毓泰
江泽涵 孙云铸 汤用彤 钱端升 曾昭抡 赵迺抃

主席:樊际昌 记录:薛德成

报告事项:

一、本校三十年度参加联大学生(共卅三人),人数如下:

(甲)本科:

1. 四年级计廿八人。其中经四一人由部准其在光华大学借读毕业,三人(外、经、国各一)注册后休学,一人(生)总考一科不及格,一人(经)须补半年,计应毕业生廿三人。

2. 三年级计四人(国、外各一人,经济二人)。

3. 二年级计二人(经济二人)。

(乙)研究生:

理科研究所二人

文科研究所十七人

法科研究所二人

议决事项：

一、三十年度毕业生，其体育不及本校规定（二年）者姑准毕业；但如教部不予核准时，仍应返校补习。

二、本校卅一年度各年级（包括四年级）复学生选课时，必须修习体育，否则不予毕业。

三、卅一年度本校学生选课除四年级学生仍可依照本校原定标准外，其他各年级学生，应一律以现行部颁课程为标准。

四、史学系学生王思治能否毕业，由史学系决定办理。

五、下列各生准予毕业：

数学系：丁家乐

物理系：李金镔

化学系：郅如茂

地质系：谷德振 李毓樟

生物系：刘运亨

史学系：游任逵 杨翼骧 李善继 王思治

中国文学系：李松筠 董竞民

教育学系：肖厚德 孙谛知

政治学系：刘春生 岳养德

经济学系：李锡杰 郭勋 苏为良 陈忠经

余世箴 沈增礼 宋景仁

以上共计应准毕业生廿三人。

昌

卅一年七月卅一日】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123页。

8月13日

朱自清参加钱端升的晚餐会。

【参加钱的晚餐会。】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8月中下旬

费正清自美国返回中国，见到钱端升等人。

【在那里，清华的同事们和我们在北京时的其他亲爱的朋友们都到联大热烈地欢迎他。他把他们一行人用美国军用吉普送到8英里外的龙头村，钱端升和他的家人就住在那里由徽因设计的一座住宅里。在乡村小径的另一头，和它相邻的是梁氏夫妇自建的住宅，他们在离开时还恋恋不舍的。】

——[美]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曲莹璞、关超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51页。

8月23日

朱自清下午访钱端升。

【下午访T.S.并在那里晚餐。我们随意畅谈，但一位客人多少会妨碍正常的家庭生活。药锅因女仆不小心而熬干。T.S.将学术成就分为四个等级：1.描述性，2.分析性，3.解释性，4.创造性。】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夏红注：

此处T.S.系钱端升应无疑问。朱自清日记中前面部分似还有这样的简写，应再核查一遍。

另外，钱端升的英文名字为 Chien Tuan - sheng，日记中有的居然把 Chien 先生翻译成了“陈先生”，结果就出现了“陈先生和钱太太”这样的笑话。

8月25日

陈了一请客。钱端升夫妇、朱自清等赴宴。

【参加了一的晚餐会，客人有钱夫妇与我，菜甚美，还有烤鸭。】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9月6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下午访钱，王与秦、钱谈及胡适博士辞职，并对魏道明表示厌恶。正义得不到伸张。在钱家晚膳，家常面，不好。】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9月20日

费正清等访问钱端升，并与钱端升、金岳霖等回城。晚上与梅贻琦等一起吃饭。

【张奚若，清华大学政治学家，阖家住在秦家祠堂，“他自己睡在供满灵位的祠堂正殿里，殿外四周是一个绿树成荫的幽静园子。”然而，我们的老朋友、北大政治学家钱端升则住在5英里外的乡下，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夫妇也住在昆明，但后来随中央研究院北迁至四川。星期日这天，张奚若担任我们的导游，海顿博士借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

我们出发了，吉普车上坐着六个人，我驾驶着车，沿着到处是坎坷不平的石子马路穿过城市，不时要敲打车身两旁的铁板，促使搬运货物的脚夫让

路，左拐右折地在手推车和小贩们中间穿来穿去，警察挥着手让我们通过，我不停地揪着喇叭，发出呜咽的嘟嘟声。汽车开出了城区，沿着木排路在乡间原野上盘旋曲折驶向它的边缘，最后开进了龙头村，那是当地人给龙泉取的别名。我把吉普车停在一座寺院门前的小树林里，穿过几条小路，到达钱端升家。钱家靠近梁思成家的住房，两家的住宅都是林徽因设计的。他们开创了居住乡下以避空袭的风尚。租地造屋的条件是在土地上造房子不付地租，5年后房子归产权地主所有。

最后，我们带着金岳霖、钱端升一起回城，8个人挤坐在吉普车里，舒服地挨在一起……一道到梅贻琦博士家，参加晚上7时的宴会。梅博士有一幢宽敞的住宅，以主人的情谊款待全校教授和有学衔的行政人员，他们大多数住在顶楼上，无法接待来访者。据鲍勃·温德说，梅博士月薪不足600元，而这次宴会费用决不下1000元。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他才一英寸高的一瓶专治疟疾的阿的平药片，它应当能够换回这1000元。】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221页。

钱端升与费正清、梅贻琦等共进晚餐。

【晚饭 F、H 二君便饭，并约温德、杜乐文、张奚若、钱端升、金龙荪、陈岱孙、潘光旦、雷伯伦、陈福田，谈叙颇畅。】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夏红注：

F. 为 Dr. John K. Fairbank，即时任驻华“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的费正清；H. 为 Dr. Hayden (Mich, Univ)。根据梅贻琦日记载，二君于9月19日到达西南联合大学访晤。

9月23日

费正清写报告给美国，为改善钱端升等生活条件而呼吁。

【 [致阿尔杰·希斯函附件]

清华教授

摘要：美国培养的昆明的清华大学教授，代表了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他们面临着濒于灭绝的威胁，亟应寻求援救他们的措施。

资料来源：本报告系根据同下列诸位教授的谈话整理而成。他们是英语系主人陈福田，在夏威夷出生的美国公民；政治系主任张奚若（陈、张两教授都是大学评议会成员），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国民参议会成员钱端升，西南联大和作为联大组成部分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这几位是清华大学中曾经留学美国的教授们的领袖，自1933年以来我一直同他们相识，当时我在蒋廷黻主持下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担任讲师一年。此次在昆明逗留的一个星期期间，我访问了清华教授们所居住的5-6个宿舍，与12位教授交换了对形势的看法。

一、清华大学特别体现了美国的在华权益，因为美国退还的“庚款”有数百万美元投入了清华。像任何主要大学一样，教授是学校投资比较重要的部分，由于清华大学所拥有的学术名望和财务资源，该校教授是从留美归国的优秀分子中精选聘任的。

总的看来，这些人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学术界人士中间的精英，因此可以说是美国教育势力起一定作用的代理人。鉴于清华的校舍与设备已落入日本人之手，这些教师是美国政府30多年来从事投资所剩留下来的一切。他们的处境理应受到我们的特别关注。

二、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博士，在谋求严密统治中国文化知识界生活的进程中，长期以来想方设法推行控制清华及其他大学的办学方针，然而在清华大学各院系里，他遇到了留美归国而资历比较深的教授们的极其明确而坚决的抵制，结果是双方持续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教育部和国民党当局的权力，并以他们的财政金融为后盾，另一方是决心力图维护美国式学术自由的教授们，两方进行着较量。这是一场双方实力不相等的斗争，因为教授们的财物资源（所积存的书籍衣物，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而把这些东西出

售)，很快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非得到援助，否则这场斗争只能得到如下的结局——为支持在教育上实现美国自由信念而挺身奋斗的教授们继续遭受营养不良和患病，导致情绪低落，直至死亡、离散或堕落。

三、具体地说，国民党与教育部所力图开展的活动采取如下的形式：年轻的教师们被拉拢入党；凡对此表示有兴趣的人都获得当局的款待，并且受到重庆方面的特殊照顾和青睐。在中国，政府拨给各所大学的经费（大体上也适用于西南联合大学），总是少于按其国内学术地位的理应得到之数，各校经费系按照学生人数发放，而不是按照教学质量。在昆明，省立云南大学学生众多，经费也就比西南联大宽余得多，尽管西南联大三校（南开、北大、清华）的教师集中了中国学术界的精华。

四、此类斗争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这里不必浪费笔墨去描写大学教授们如何住在空无所有的阁楼上，卖书典衣，欠了一身债，患了营养不足所导致的疾病。不管他们是官方故意的还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事实始终明摆在眼前，尽管他们既对中国有益，又对美国有益，他们却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援助。

我们曾明白宣布我们投入当前这场自由与专制的全球性战争，如果承认在这场全球性战争中，中国也是一个战场，那么显而易见，由于我们未能及时地援助这些人，致使美国在参与这场斗争的记录中留下了一个可耻的污点。】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227页。

9月27日

钱端升、朱自清赴陈了一午饭。

【上午访了一、端升，应了一邀午饭。】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9月30日

钱端升撰写《战后世界之改造》序言。该书于1943年11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相关内容梗概，可以参看1943年11月相关条目。

钱端升在该短序中指出，“获取胜利不易，获取和平更难”，为了在战胜轴心国之后尽早树立永久和平，有必要未雨绸缪，因此写下了这本《战后世界之改造》。钱端升指出，和平所包括的问题极其繁复，对相关可能涉及的问题应及早展开讨论，准备好方案对策，以便为将来之用。钱端升同时交代，除了供中外读者展读的《战后世界之改造》外，他还计划另外写本书，专门讨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钱端升：《战后世界之改造》，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抗战期间，我除努力教书，宣传抗战，抨击弊政外，曾于1943年撰写了《战后世界之改造》一书。】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6页。

10月7日

钱端升和冯友兰起草宣言，响应反侵略宣言。

【七日（1）推冯友兰、钱端升起草宣言，对在英国同盟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之谴责轴心国家摧残教育之罪恶，并向各被侵略国教育家致敬宣言，表示响应。】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页。

【二、议决事项：

（六）关于在英同盟国大学教授联合会谴责轴心国家摧残教育之罪恶并向各被侵略国教育家致敬宣言一案，本大学应予以响应，推冯芝生先生、钱端升先生起草。〈通知〉】

——《第二三五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255页。

【10月7日，联大常委会推定冯友兰和钱端升起草宣言，对在英国同盟国大学教授联合会谴责轴心国家摧残教育之罪恶，并向各被侵略国教育家致敬宣言表示响应。】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10月22日-10月31日

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会议召开。

【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会议于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开幕。】

——《会议日志》，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7页。

钱端升协助安排，为费正清获得一张本次国民参政会的旁听证。

【我在重庆非军事性质的社会各阶层所从事的调查工作取得的圆满成就，就是有幸列席国民参政会的一次会议。它是1941年国民政府为履行筹组代议制度的诺言而成立的机构。它的权力仅仅是属于咨询性质的，但其成员却实实在在是非党知识分子的代表。我的朋友，来自昆明的钱端升是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为我取得了一张列席会议的入场许可证。

会议厅并不很大，约莫两层楼高，顶上装着吊扇，洁白，朴素。张伯苓和其他一些人坐在后排座位上，参政员们坐在安放椅子的一边，来宾和许多军人坐在另一边。很多出席者看来精神饱满，妇女们夹杂在男子们的中间，席次由抽签决定。

就我所见而言，我怀疑国民参政会只是电影中一瞬而过的一个镜头。参政员们看来都似有一种自尊自大的感觉，许多人饶有把握地看待它将来的发展。

事实证明：这种想把代议制政体移植到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开明愿望，后来终于不幸流产了。来自杰出的统治阶层的有识之士汇集一堂，成为联系公众、偶尔产生作用的机构，但作用亦仅此而已。正统性继续导源于安全组织系统，它拥有暴力手段胁迫持不同政见者和消灭敌对分子的实际权能。戴笠压倒了国民参政会。自由主义的价值准则，恰似信奉自由主义的大学教授们一样，正日益趋于失势而衰落。】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283页。

11月上旬

顾维钧回到国内，和钱端升有一次谈话。

【钱端升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国际问题专家。在同他的一次谈话中，他表示中国对英国在缅甸失败的指责是比较片面的，他指的是拟向中国出席太平洋学会会议的代表团发出的指示。这个会议即将在加拿大召开，指示要求在会上评述缅甸战役的失败原因并指出英国人缺乏准备、按兵不动是造成战役失败的原因。他说，就缅甸局势而言，中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会上英国人也一定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在缅甸战役中，中国第六军的表现也不好。他们用在当地征用的汽车做买卖，他们甚至还以一些缅甸僧侣充当日本第五纵队为理由，焚烧了一些缅甸寺庙。】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6页。

11月26日

钱端升当选为联大第五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

【二十六日 本大学教授会开会，选举本大学第五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计：周炳琳、张奚若、陈雪屏、潘光旦、罗常培、陈总、陈福田、钱端升、燕树棠、萧蓬、张景钺、李辑祥十二人当选为代表。李继侗、杨振声、王信

忠、郑华炽、刘仙洲、陈省身、冯文潜七人当选为候补代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

【11月26日，召开联大教授会，选举联大第5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选出12人，其中文学院潘光旦、罗常培、陈福田、钱端升当选。杨振声等7人当选为候补代表。】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

11月28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访端升，并在彼处午膳。】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12月2日

西南联大校务会确认钱端升等当选教授会议代表消息。

【一、报告事项：

.....

（三）梅主席报告：本大学第五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经于上月廿六日由教授会议开会选举，结果计周炳琳、张奚若、陈雪屏、潘光旦、罗常培、陈岱孙、陈福田、钱端升、燕树棠、萧遽、张景钺、李辑祥十二位当选。又李继侗、杨振声、王信忠、郑华炽、刘仙洲、陈省身、冯文潜七位当选为候补代表。】

——《第二四三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12月4日

西南联合大学发布第五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名单，钱端升列其中。

【西南联大第五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名单

（1942年12月4日）

径启者：兹述上本大学第五届校务会议名单一纸，即希察照为荷。
此致。

启

计开

周炳琳	六十四票	张奚若	六十票	陈雪屏	六十票
潘光旦	五十七票	罗常培	五十二票	陈岱孙	五十二票
陈福田	四十六票	钱端升	四十四票	燕树棠	四十二票
萧 蘧	四十票	张景钺	三十八票	李辑祥	三十四票

以上十二人当选为代表

李继侗	三十三票	杨振声	三十二票	王信忠	二十六票
冯文潜	二十六票	郑华炽	三十票	刘仙洲	二十九票
陈省身	二十八票				

以上七人当选为候补代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12月25日

钱端升再次到美国。

【蒋梦麟、钱端升、张君勱、宁恩成、杨云竹、吴文藻、邵玉麟诸君自国内飞到。今早相见。甚快慰。】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8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07页。

12月26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上午访端升、梦家并理发。】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夏红注：

难道钱端升分身不成？或者朱自清访钱端升不遇？此处显然与胡适日记冲突。待考证。

日期待考

《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停刊五年后复刊。

钱端升在《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复刊号发表书评若干。评如下各书：

1. *A History of National Socialism*, by Konrad Heiden; *The Nazi Dictatorship: A Study in Social Path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Fascism*, by Frederick B. Schuman 等2本。

2. *The Fall of the German Republic: A Political Study*, by R. T. Clark.

——钱端升：《书评》，载《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42年第8卷第1期，第226-229页。

1943年(43岁)

1月23日

朱自清、钱端升等招待多德斯教授。

【然后我们招待多德斯(Dodds)教授，晚餐精美。饭后进行有趣的讨论，钱提出一问题：希腊是否有零这个概念。多德斯在逻辑问题上说不清楚。钱认为前置词“太初有道”与希腊语中包含“Logos”的句子有同样意义，都具有尊严之意，而英译文为“开始，世界很光明”。但多德斯之处，“世界”这个词在他们心目中引起的反应比我们想象的要重。然而，“Logos”既有

“思想”又有“世界”的含义，即比英语“World”一词含义丰富。钱与冯告多德斯：中文之“道”恰有二义。钱还提及《雷雨》，认为此剧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雷雨》之主题来自希腊悲剧，但写作失败。他不理解为什么希腊生活一致的东西竟不适合于我们。我们讨论哲学与语言之间的关系，钱不同意语言与哲学同源。】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

1月30日

在《世界政治》发表《新世序与世界公务员》一文。

本文有感于战争胜利的曙光，乐观预期战后必将有一“伟大规模、广泛职务且有雄厚力量的世界组织”，而在这样一个新组织之下，新的公务员制度将十分必需，钱端升预估将有2万到20万人的规模。钱端升指出，世界公务员比国内公务员更难募集树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不分国界，而不是按照国家大小分头供给，或者至少折衷：一方面，含有政治性的工作应从各有关国家人民中选任；另一方面，工作全为技术性者，则应全凭能力，不问国界。而征募世界公务员，钱端升提出三个标准：第一，教育条件不应低于各国征募国内公务员，至少应受过大学教育或高等专门教育；第二，语言条件，应以可能的世界语或者英语为主；第三，应信仰世界组织、忠于世界组织，注重所谓“公务员中立”，对各国不做偏袒。而就中国人是否能够担任世界公务员，钱端升指出，如果这按照上述条件，中国人将不易大量获选，对此可以不做计较，当务之急与其斤斤计较于条约规定，不如多多训练人才，以便新组织成立时可以有巨数人民入选世界公务员。

——钱端升：《新世序与世界公务员》，载《世界政治》1943年1月30日，第7卷，第19、20期合刊。

1月31日

朱自清参加钱端升晚餐。

【参加端升晚餐会，菜好。我仪态欠佳，要留心于此！

听关于战争的英语讨论三小时有余。在彼处晚餐。秦、周、钱与我谈及青年。我有意识地抑制自己不去过分批评与攻击他们，免得我可怜的学识使自己显得可笑。】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

1月（待确认）

费正清请求美国陆军特种服务部拨款5000美元，作为聘请中国教授为驻昆明美军演讲的酬劳。钱端升和费正清合作演讲一次。

【在为驻昆明美军安排的一系列演说中，我曾有一次跟张奚若教授协作，另一次跟钱端升教授协作，完成教学任务，还曾邀请过军医署署长林少将讲演“中国军人的作战效能”。】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227页。

2月4日

朱自清与钱端升等讨论译诗。

【讨论我与浦、闻、钱等合译的一首诗之意义，他们都给我很好的解释。从未想到我理解英文诗的能力如此可怜。】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2月6日

朱自清访问钱端升等人。

【访游、陈、钱先生，遇吴之椿夫妇。他们正要来看望我。】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

224 页。

2月6日

浦江清访问钱端升。

【饭后，至棕皮营陈梦家、游泽承及钱端升、金岳霖诸家，均有茶点。归时，余戏咏“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之句。】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6—237页。

2月7日

朱自清访问钱端升。

【访钱，并在此晚饭。】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2月15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下午访陈、钱、游，取回新诗集。】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2月28日

在《大路》发表《新世序的设计》一文。

该文纵论新世序的设计问题。钱端升援引国内的行政三联制改革，亦即一切设施均有设计、执行及考核三个步骤，认为将来新的世界秩序亦需要设计。在钱端升看来，新世序的设计需要注重两个问题，一个是政策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平机构的问题。就政策方面的问题而言，钱端升认为，任何一

种都会连带发生某一类的问题，应事先假定某政策的必要，使得研究者可以着手，最终确定政策以“合于世情，有利于我国”。钱端升进而言之，无论是政策原则讨论，还是政策的选定抑或是各类问题的研究，都需要适当的机构。钱端升指出，相关机构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主持政策的讨论、假定和确定，另一个主持研究工作的分配、汇集和考核。前者应人数不多，以参与国家大计或军政、外交、经济主要负责人出任，直接向最高当局负责并保持密切联系；后者则应为人数较多委员会，委员囊括各相关部门的第一流专家学者并兼容并包，人数维持在15个人左右。而承担研究者则不以身份为限，有关研究机构的成果亦可合理地援引使用；有鉴于新世序的建立涉及数百个专门问题，预计有150-300个，故研究委员会的设置刻不容缓。研究报告应以英文、俄文发表，以便及时获悉国内及国际舆论的反响，以便使得中国的和平计划对内获得国人拥护，对外有实现可能。研究人员应事先获知政府的意向，一方面政策引导研究，另一方面研究影响政策。

——钱端升：《新世序的设计》，载《大路》1943年2月28日，第8卷第6期。

3月6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下午访钱与陈，在钱家晚餐，遇李约瑟（Needham Joseph）博士，据说他对中国着迷。】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3月15日

在《三民主义半月刊》发表《新世序的建设》一文。

该文讨论新世序的目标与原则。就目标而言，钱端升指出新世序应该达到如下目标：第一，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或人类政治单位之间，应有

永久和平；第二，各民族、各国家或各政治单位能够在新世序下集中全力追求精神及物质上的进步，不受外界干涉，不受战争威胁；第三，各民族、各国家或各政治单位应有共同的努力或国际活动，以增进共同的相互福利。为了完成上述目标，钱端升进一步提出五大原则：第一，新世序应有包括一切国家或政治单位在内的组织；第二，世界组织应具有国际武力或制裁破坏和平者的可能；第三，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应建筑在平等、合作及互助的基础上；第四，对待昔日敌人应尽量宽大；第五，殖民地制度应有彻底的、合理的、建设性的清理。

——钱端升：《新世序的建设》，载《三民主义半月刊》1943年3月15日，第2卷第6期。

在《东方杂志》“复刊号”发表《罗斯福四大自由之知与行》一文。

该文论及，美国人向以善呼口号知名，而“四大自由”为其最近的例子。钱端升在阐释四大自由的精义后指出，我们尊崇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与四大自由不特在精神上一致，而且在目的上亦复相同”，这是“一件值得中华民族欣慰的大事”。在知之外，更贵于行，中国须实现三民主义，美国亦须实现四大自由，“然后两国贵能诚信相处，共为光明的前驱者，共为世界和平的柱石”，中美两国如此，其他国家亦不例外，“必须个个国家能完全尊重四大自由或实行三民主义，然后世界新秩序可以建立”。

——钱端升：《罗斯福四大自由之知与行》，载《东方杂志》1943年3月15日，第39卷第1期，第6-7页。

3月18日

钱端升访朱自清。

【下午 T.S. 来，谈仲达事。参加预备班教学与考试回忆。在彼处晚餐，尝弓鱼。】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5月2日

朱自清访问钱端升。

【访陈太太与钱、秦，在钱家晚餐，谈秦郁文事，但未尽言。】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5月16日

在《当代论坛》发表《国际的经济分工合作为和平基础论》一文。

在该文中，钱端升提及，国际冲突的化解之道有治标、治本之分，治标则惩罚侵略国家解除武装，使好战者无从发动战争；而治本则需要消灭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原因。在钱端升看来，工业革命之前政治原因多为冲突主因，而1850年以来经济原因则往往成为冲突主因，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民族主义，则成为导致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钱端升指出，经济民族主义的危险性坊间已多有论述，但克制之道惟有经济合作一途。钱端升将经济合作细分为如下六点：第一，资源的分配；第二，国际投资；第三，国际劳工政策；第四，国际贸易政策；第五，国际货币及金融政策；第六，生产的分工合作。在钱端升看来，生产的分工合作将成为其中决定性的因素。而生产分工合作的要义，则在使各个经济体放弃自给自足主义，而有所协调，钱端升的方案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其生产应求调整，而不需速度的更张，而不可强其停滞于农业经济的阶段，单位较小的国家应以专门若干种产业为原则，单位较大的国家则应以发展大多数都属于日常必需品的生产为原则。”钱端升认为，世界各地如能有合理的生产分工，资源分配不成问题，则其他方面的合作亦易如反掌。

——钱端升：《国际的经济分工合作为和平基础论》，载《当代论坛》1943年5月16日，第1期。

5月22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下午访端升。】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6月1日

叶公超向顾维钧报告，说钱端升曾给英国政界人士写信批评重庆政府。

【据叶公超说，克里普斯曾给委员长写过一封长信，阐明中国政府需要民主化。克斯普斯还给叶公超看了钱端升教授的一封来信，钱说国民党和中国军人都是反英的。叶告诉我，钱还曾给首相和英国政府的其他一些人写信，批评重庆政府。】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3页。

6月6日

朱自清晤钱端升夫妇并赠送礼品。

【参加冠英夫妇的午餐会，菜佳。谈及远走高飞的五名学生，其中有冠英的儿子。向钱、陈赠礼品。】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6月13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晚饭后访梦家、端升。】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6月15日

在《中国青年》发表《现代化》一文。

该文论及现代化问题。该文文章较长，大体分为三部分：

首先，钱端升分析了“现代化”的内涵。钱端升认为，从哲理上来看，现代化指的就是古代思想的解放，思想解放产生了三个积极结果：第一，科学发达；第二，自由传统的养成；第三，相信进步。而现代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则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法律上的平等普遍建立；第二，知识大规模普及；第三，君权神授学说被彻底推翻；第四，行政改革力度前所未有。现代化在物质方面的表现，则体现在：第一，产业革命；第二，经济单位的扩大；第三，有闲阶级的出现。钱端升认为，现代化必然是哲理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全面现代化，三者缺一不可。

其次，钱端升论述欧美各国现代化的情形，其中提及英美、西欧、苏联和日本。

最后，钱端升以欧美国现代化为背景，臧否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得失。钱端升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条件有好有坏。从哲理上来说，中国所受传统思想束缚不多，解放容易，但在积极方面，系统化不够，缺乏从积极方面推崇人的尊严。从政治上看，要能够现代化的表现，需要国家安定，政治上轨道。从经济上看，中国现代化的条件尚可乐观。综上分析，钱端升认为，现代化要有远大的眼光，各方面需要齐头并进，平均发展，夯实基础；如果急功好利，有所偏重，使某一方面在短期内突飞猛进，但也容易导致基础不稳，一不小心便分崩离析。

——钱端升：《现代化》，载《中国青年》1943年6月15日，第10卷第6期。

6月17日

在《中央周刊》发表《建国完成的期限》一文。

该文讨论建国完成的期限问题。钱端升提及，人类的努力可分为两类：一种借积累而成，不以时间长短论，而以风物教化论；另一种以借计划而成，以日程计，日有所进，终成大业。钱端升认为我国的建国大业，必须争

取时间，速求其成。而建国大业的完成，钱端升认为有三个条件：必要的工业化、国民教育与国民保健的普及及学术研究的提高。钱端升坦言，短期内赶上英美的工业化不可能，唯一可效仿法、日那样的工业化，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奋发向上。就人的因素而言，主持者为总裁，工作干部将为一群30-50岁而受过专门训练之人，主持者固然不能见此计划的完成，亦必须将国家带上正轨。计划在执行中可以修正，但不可大改；主持之人不到万不得已不得轻易换人。而就环境因素而言，需要国民革命成功的新年，和战后和平的空气尤其是英美盟国的同情。鉴于上述，钱端升指出，完成建国的期限应在抗战胜利后25-30年之间，不可再短，亦不应再长。就实现此目标而言，钱端升认为战后急务便是减少各种障碍，对内要比抗战期内有更完全的集中意志，对外则要比抗战期内采更与盟国协调的政策，由此获得必要的国内外环境。

——钱端升：《建国完成的期限》，载《中央周刊》1943年6月17日，第5卷第44期，第46—322-324页。

6月20日

朱自清读钱端升的论文，评价甚高。

【读钱的论文，不错。】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页。

6月30日

在《东方杂志》发表《论战后国之大小》一文。

该文论及，政治单位的大小不外乎三种：城市国家、民族国家与大一统。而除了希腊、罗马采行城市国家，并在末期变为联邦外，钱端升认为：“大一统之制在前，而民族国家之制在后，这是政治进步中的一个奇特现象。”钱端升也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国家不能成为人类政治组织的最后单位，过去数百年来的纷扰战争已显而易见，人类文明及人类自身终将会毁于战

争；而进步之道，便在于增进民族间的合作，树立世界永久和平，引导各民族以进入大同社会——在钱端升看来，大同社会才是一种大一统单位。钱端升进而申言，大同社会、基督帝国和中华帝国同为大一统思想，但帝国重在抹杀民族存在，不能兼顾全人类的幸福，吸取全人类的文化，民族主义反而是一种进步；但大同社会以民族主义为出发点，“不特不抹杀民族的存在，而以融通一切民族的文化，兼顾一切民族的利益为目的。故与民族主义相比，又进一步”。按照这种观念，即大同社会是民族国家的较高层次，钱端升指出，现有民族国家和志在成为民族国家的群体共有一百多，“以百余民族而欲一蹴成一统的大同社会，是不可能的。必定地域文化相接近的小国互相联合起来成为较大的单位，这较大的单位又互相联合起来成为更大的单位，然后大同的社会可得而脱胎”。综上所述，钱端升认为，负改造战后世界之责者，则应尽全力鼓励国家的合并，而防止民族的分裂、小国的独立。钱端升意识到这又会与民族自决政策冲突。钱端升判断，战后以大同世界为最后目标而小国合并者，与根据民族自决原则而让各民族尽量自由建国者，将各有千秋；在这种对抗中，钱端升当然是支持大同世界一方，“我们务须放大眼光，以伟大的气魄，于战后尽力阻止无须要的分裂及无须要的建立小国。我们最好此时即立下若干成国的条件”，以人口、地理、文化、治安等条件衡量，负责战后世界改造的大国于此时对此有充分准备及宣传，“免得战事结束，独立的要求一经提出后，不及措手”。

——钱端升：《论战后国之大小》，载《东方杂志》1943年6月30日，第39卷第8期，第1-2页。

7月

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英文文章 *New China Demands*（《新中国的要求》）。

——钱端升：《钱端升主要著作目录》，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0页。

8月5日

顾维钧陪在英国访问的宋子文拜访了阿奇博尔特·辛克莱先生。辛克莱提及钱端升给他写信的事情。

【我们又去拜访了阿奇博尔特·辛克莱，他谈话很坦率，但在谈话中有些傲慢。他提到有个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主任叫钱端升的，给他写过一些信。辛克莱说，钱和他素昧平生，但他的信却很有意思，见多识广。不过，他对英国打算先击败希特勒的政策，颇多责难。】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9页。

8月14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夫妇。

【下午访陈与钱太太，在城内耽搁过久。必须抓紧时间，必须集中精力。】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

夏红注：

此处“陈”可能为 Chien 的误译。

8月15日

在《国际编译》发表《战后应否有一国际人权宣言》一文。

钱端升在该文中提出，大战结束后，民族国家的性质将会遭遇重大变化，大同之治由此开始。中美英苏四大国应就如下三点发布宣言：第一，个人地位应予尊重。第二，放弃战争经济，采取福利经济。第三，各民族在国际关系上无论种族、大小，一律平等。钱端升指出，上述荦荦三点，原则上四大国均可接受，应以之订立国际人权宣言，或者直接放在国际盟约的开端，冀其发生无限量的道义力量。

——钱端升：《战后应否有一国际人权宣言》，载《国际编译》1943年8月15日，第1卷第2期，第1-6页。

8月21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上午访钱太太，交付八百元。陈招待午餐。】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夏红注：

此处“陈”可能为 Chien 的误译。

8月29日

朱自清借钱在此交付钱太太。

【承梦家情，借二千七百元交钱太太。】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

9月7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访陈先生及钱太太。陈招待午餐。】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

夏红注：

此处“陈”可能为 Chien 的误译。

9月18日-9月27日

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召开。

【九月十八日 上午 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开幕。】

——《会议日志》，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4页。

9月25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访钱太太、陈先生。】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

夏红注：

此处“陈”可能为Chien的误译。

10月11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访端升，应邀在其家晚饭，并倾谈。菜佳。】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11月12日

钱端升参加宪政实施协进会成立会议。

【十一月十二日十时，宪政实施协进会在军事委员会开成立会，蒋主席致词，对于促成民意机关，宪草研究运动，言论自由开放，皆主早办，恰合人民期望。出席会员三十六人，余被指为常务会员兼召集人。午，会餐，蒋主席领餐。餐毕接开全体会，孙科一案，褚辅成一案，孙科、黄炎培、王世杰一案，李璜、左舜生、陈启天、张之让一案，钱端升一案，王造时两案，王云五一案，内除关于国大选举一案保留缓议，关于改进司法，关于实行提

审法，关于江苏省参议会，均通过外，余交常会。】

——黄炎培：《国民参政会日记》，载《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558页。

11月18日

钱端升访朱自清。

【晚端升来。】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

11月17日

西南联大第六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选举，钱端升榜上有名。

【十七日(1)本大学教授会开会，选举本大学第六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计罗常培、陈总、张奚若、叶企孙、潘光旦、萧蘧、周炳琳、杨振声、刘仙洲、钱端升、燕树棠等当选为代表；李继侗、雷海宗、郑华炽、王裕光、朱自清当选为候补代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页。

11月24日

钱端升等当选信息得到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确认。

【一、报告事项：

.....

(十一)梅主席报告：本大学第六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经于十一月十七日由教授会开会选举，结果计罗常培、陈岱孙、张奚若、叶企孙、潘光旦、萧蘧、周炳琳、杨振声、刘仙洲、钱端升、燕树棠诸先生当选。李继侗、雷海宗、郑华炽、王裕光、朱自清诸先生候补当选。】

——《第二八一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

11月27日

钱端升等当选代表名单正式公布。

【西南联大第六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名单

（1943年11月27日）

径启者：兹送上本大学第六届校务会议教授名单一纸，即希查照为荷。此致

启 卅二年十一月廿七日

计开

罗常培 陈岱孙 张奚若 叶企孙 潘光旦 萧 蓬 周炳琳

杨振声 刘仙洲 钱端升 燕树棠

以上当选

李继侗 雷海宗 郑华炽 王明之 朱自清

以上候补当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11月

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战后世界之改造》一书。

这本《战后世界之改造》由商务印书馆于1943年出版，共139页，分为绪论、媾和、政治的处理、疆土的处理、经济的处理、区域组织、国联武力与制裁、国际法院、经济秩序、殖民地之国际化、劳工与人口、少数民族与种族问题、共同与殊别等14章。

在钱端升的学术作品中，这本书是比较特别的。他的大部分学术作品，都侧重于相关政治制度的评介，如《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法国的政治组织》、《民国政制史》等，以详实的资料、有条不紊的介绍而让人

印象深刻，属于政治学领域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这本《战后世界之改造》，则对战争结束后的诸多问题，未雨绸缪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对战争的原因，钱端升认为是民族主义和工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对1919年巴黎和会所缔结的和平不到二十年即告失败，钱端升认为主要原因是和平的建筑者未能充分地指出战争的原因并消灭这些原因，所以“必须直接爽快地防止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并改变工业文化的本质为和战目标，然后真正的和平才有实现的可能”。钱端升提出六点原则，作为联合国作战的最终目标：第一，人群自决；第二，未能自决的人群，由国际组织共同管理至其能自决之日，各国殖民地一概取消；第三，成立区域的及全世界的组织；第四，废除各国军备，至少缩减至其不能抵抗国际组织武力的程度；第五，任何国家及地域都应增进人民经济福利，提高生活标准；第六，各国主权应有限制，国际组织高于国家主权。这本《战后世界之改造》的主体，则是从这六点原则出发而展开的。

对于媾和问题，钱端升界定了休战协定和和约的区分。认为休战协定应规定如下问题：第一，敌军撤退日程表及联合国军逐步接防；第二，释放俘虏；第三，东京、柏林、罗马由联合国占领；第四，敌国的治安、救济、粮食、卫生等机构，应听命于联合国的指挥。钱端升提出，休战协定的执行，在欧洲应由英苏负责，而亚洲则由中国负责。休战属于临时性质，而休战协定之后，仍需尽快召开和平会议，缔结永久和平。钱端升进一步建议，和会召开国必须为和平理想最发达、能为各主要国家信任、最为有力且必须为交通的中心，故美国首都华盛顿是最理想的地方。和平会议消极的任务在于收拾战争残局，而积极的任务则在于树立永久和平及世界秩序。钱端升建议和会代表选择上，既应有政府派出的外交代表，亦应保障人民团体派遣代表的权利，还应有各国共推的国际代表。钱端升认为，就和会的人数而言，巴黎和会将不同国家分为四等，代表人数不同，极为失败，新的和会应各国平等，每个国家代表不超过5人，每个国家每次会议出席的代表不超过2人。如能有四大领袖亲自参加，成功的把握则更大。而就组织而言，应沿

袭巴黎和会，分为全会、领袖团会议及各种委员会。而和会的工作则分为三项：第一，若干重要原则的决定；第二，关注收拾战局条款的订定；第三，关于世界新秩序条款的订定。这些工作应该先由委员会筹议，最终提交全会决议。和会的结果除条约外，钱端升建议亦可有一些其他文件。

对于战败国政治问题的处理，钱端升提出，应付德国战后政局，除了简单的禁条外，“不必涉及苛细，也不宜有积极的指示”。禁条包括国社党的解散、领袖的放逐、反对和约政党的禁止等，而战后德国的政制，则应由德国人自决，其越具有充分的和平意志，则在新的世界秩序内越享有平等地位。钱端升认为意大利与此类似。但对于日本，钱端升则认为，法西斯主义虽然猖獗于日本，但日本并无明显的法西斯政党，军人、文人均有法西斯思想，禁止某一政党或几个人执政毫无意义，更重要的出路是彻底的革命，必要时甚至应该推翻提倡军国主义的日本皇室。但钱端升也提出，教育问题固然重要，但管制教育困难重重，更多还应靠德国、日本人民自身觉悟，吸收和平思想。而对于那些敌占区伪政权，钱端升认为，一经战事结束，势必将如摧枯拉朽，一扫而空；比较困难的是如何处理半仇敌国家的反动政权，比如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对于这类政权，钱端升认为在其和平理想发达丰满之前，应该拒绝其在新世界秩序中享受平等的权利。而在钱端升看来，战后诸多其他战败国问题的处理也应有条不紊地展开：第一，条约问题，应区分完全政治性质的条约、轴心国所废止的条约和侵害联合国利益的条约，前者应该依照国际法原则宣告失效，而第二类应该坚持条约神圣而必须维持，第三类则正式作废，具体规定恢复已损的主权。第二，轴心国战时攫取的文书、档案、簿记、图表等，应归还原有国家。第三，俘虏及拘禁的敌侨双方均应释放，被轴心国强制迁徙的人可以返回原籍。第四，敌占区的治安需要继续维持，相关人民亦需要救济，粮食、医药、住宅、交通、农工业重建等，应有通盘筹划。

对于战后疆土问题的处理，钱端升指出，彻底纠正过去不公正的疆土划分极其困难，但不对疆土问题做合理处理，亦极其危险。战后应处理的疆土

问题包括四大方面：战败国与战胜国间、战胜国与中立国间、因人群自决而发生的疆土移转或者独立国家的诞生以及殖民地的国际化。钱端升在阐述基本原则后，对欧陆各国的疆土争执问题做了详细梳理。

对于战后的经济问题，钱端升提出三个具体分支：赔偿的问题、敌产的处理和联合国战债问题。就赔偿问题而言，钱端升认为传统的赔款办法极不名誉，亦反时代，最终的结果反倒是成了对侵略的奖赏；但在赔款之外，必要的补偿亦是必须的，但应明确补偿什么。钱端升提出应宽大为怀，补偿只限于四个原则：第一，平民及政府非军用损失；第二，损失为地方战斗行为之外行为的直接结果；第三，损失以在敌国境内或者敌占区为限；第四，损失以能确实估计为限。而帝国财产及敌侨财产的处理，钱端升提出应分别为普通财产和侵略性财产，对前者保持尊重，对后者则归还原主。而联合国间的互欠债务，如果债权国坚持清偿，势必将导致联合国间以赔补为名，将债务转移至战败国肩上，历史势必重演；所幸美国已不做硬性赔偿要求，成为战后新经济秩序的助推器。

对于新国际组织，钱端升既指出了国联的种种不足和对其失败的惋惜，亦对新的国际组织提出了若干建议。钱端升认为仅有区域性的组织，无法完成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亟待建立的是新的国际组织，最急切的任务是维持世界和平。而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削减国家武力，设置国际武力，加强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对于这个新的国际组织，钱端升认为不仅可能沿用国联的成规，亦可勇敢地沿用国联的旧称。但与国联体系不同的是，钱端升建议战后成立新国际组织时，国际层面与地区层面应齐头并进。而关于新的国际组织领导权问题，钱端升认为奢谈平等而忽略大国实际力量无意义，还是应该以人口与经济力量为核心，让强国居于领导地位。新的国际组织应该设大会和理事会，前者各会员国可以平等参加，而后者则以四五个大国及区域代表为限。此外，新的国际组织还得设立秘书厅，以执行大会和理事会的决议。

对于区域组织，钱端升认为，区域组织不但在某种限度内代国联排忧解难

纷，更可代表国联增加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谅解。至于区域的大小，钱端升认为一个区应考虑土地面积、人口和国家数量；按照这三个因素，欧、亚、美三洲应独立成区，苏联独立成区，而中东国家可成立一区，英联邦等原有组织可以继续存在。

对于新国际组织的武力与制裁问题，钱端升认为，可以分为三种境界：上策是国联有武力而国家无武力，中策是国联及国家均有武力，下策则是国联无武力而国家有武力。钱端升认为，最理想状况当然是上策，即便退而求其次，也应寻求中策的实现，即一面设置具有武力的国联，一面对各成员国的军力限制到尽可能低的程度。

对于国际法院，钱端升结合国际常设法院的设置及弊端，提出了若干改进意见：第一，一切国家均应参加国联，而新国联法院对一切国家均有约束力；第二，国联法院法官最多9人，应有国联理事会秉公遴选；第三，国联法院法官任期9年，每3年改选1/3；第四，相关涉诉国家可以派出一个临时法官参加审判；第五，新法院的职权应大大扩张，除需要通过立法或者民族自决、少数民族等问题外，其他国际纠纷，都应交由法院裁断，必要时法院亦可对重大事项出具咨询意见书；第六，不允许私人针对国家在国联法院提起诉讼；第七，国际公法应该法典化，各国齐心协力编订《国际公法》。

对应战后经济新秩序，钱端升指出不应再以“力”的经济、“战争经济”为其经济目标，而应以人民福利为其出发点，发展工商业，使人民的享受得以普遍增加，人民得以享受较高的物质生活，余闲较多，且有修养机会较丰的精神生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各国经济发展则需要从自足制过渡到分工合作，合理解决资源、资本、劳工、生产数量以及如何生产等问题。钱端升亦建议，国币货币的需求越来越紧迫，出于可操作性考虑，可以让新的国际货币与美元维持一定比例，利用美国卓绝的金融单位，促进国际货币的诞生。除了国际货币，钱端升还建议设立国际银行，总行在国联所在地，而分行则在各金融中心，使得国际银行成为各国央行的央行，举凡国际债务、国际贸易、国际投资、长短期国际资本移动等，都由国际银行负调整责任。此外，

钱端升还提议恢复发展国际贸易，严禁过去若干年盛行的贸易统治如贸易壁垒、定额制、以货易货、清算协定等，设置贸易合作机构，分生产会议、生产政策和贸易习惯等部门，在国联内部按期召集，共同商讨研究国际贸易政策。

对应殖民地之国际化，钱端升提出，根本消除殖民地是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其他无论是重新分配、国际监视还是代管，都难以消除国际不公，留下新的隐患。钱端升提出，殖民地可分为四种，按照不同思路解决：第一，凡是土壤与独立国家相连或相近，甚至原来本就是相关国家领土，则就近并入该国；第二，殖民地有资格成为自决的区域，则自决独立建国或加入其他国家；第三，尚不宜自决的殖民地暂时由国联代管，加速进步，促成自主；第四，绝对不应独立的区域如南北极，则应成为国联领地。

对于劳工与人口问题，钱端升追溯了巴黎和会设置国际劳工组织的初衷，进而提出改进方案。在劳工标准上，钱端升举每周工作时间为例，建议应该采取分等制度，在共同立法原则下，由各国根据本国具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相应的标准。而在另外一些领域，比如禁止奴役、禁止包身工、禁止幼童劳动等，可以设置统一规定，由各国同样遵守。

对应少数民族与种族问题，钱端升分析了少数民族问题产生的成因，提出少数民族往往会使一个国家政治机制七零八落，除较大的人群可以给予自主权外，零碎小群的少数民族应该在道义上予以同化。除此之外，少数民族除与多数民族维持公平和好的关系外，其母族亦应有光明态度，不对国外的少数民族采取煽惑、操纵、利用，只在他们受到虐待时表达正当的关心与同情，以便各国少数民族都能与多数民族和好相处。而对于种族问题，钱端升反对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全世界舆论都应反对，而联合国的政客们亦不宜有赞同的表示。

在最后，钱端升以大同社会为目标，讨论了共同与特殊的问题。钱端升提出，一致不应是大同世界的必要条件，如以此为条件，大同世界反而不易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语的诞生或可加速大同社会的实现，但编造世界语的尝试并不成功，反倒不如英语之广受欢迎。除了语言问题，度量衡、国

际知识、国际版权等，亦应是世界大同进程中需要合理安排的问题。

《战后世界之改造》已收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的《钱端升全集》中。

——钱端升：《战后世界之改造》，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抗战期间，我除努力教书，宣传抗战，抨击弊政外，曾于1943年撰著了《战后世界之改造》一书。】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6页。

12月

在美国《太平洋季刊》发表英文文章 *Wartime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中国战时地方政府》）。

——钱端升：《钱端升主要著作目录》，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0页。

1944年（44岁）

1月16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出城。访陈与钱太太，在钱家晚餐。】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

夏红注：

此处“陈”可能为 Chien 的误译。

1月20日

在《中央周刊》发表《战后和平会议的展望》一文。本文似为《战后

世界之改造》中的一部分。

钱端升开篇即乐观预期：“战争必有终止的一日，现有的战争，虽其凶猛空前，要亦不能为例外。”钱端升指出，和议之前，必有休战，但像1918年那样与敌国分别成立休战协定的必要或场合当不致发生，但鉴于德国、日本的特殊性，对德国和日本可能需要分别成立休战协定。钱端升提出，休战协定应该提出如下内容：第一，敌军依一定的日期表步步撤退，联合国的军警则步步接防。第二，释放战俘。第三，东京、罗马、柏林应有联合国军警占领若干年时间。第四，帝国的治安机关、救济机关、粮食机关及公共卫生机关，应听命于联合国委派的救济委员。

——钱端升：《战后和平会议的展望》，载《中央周刊》1944年1月20日，第6卷第23期，第47—293—296页。

2月

重庆商务印书馆再版《战后世界之改造》一书。

——孙宏云：“编者注”，载孙宏云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4页。

3月8日

朱自清日记载钱端升移居事。

【昨日端升谓将移居，并说了些其他事情，未予传播，此第三次矣。今日又提出陈、李是否向我传闲话，余对前者微笑，而后者加以肯定。还有一例，传说将以我的屋子作餐室，这使我颇为难：沉默则痛苦，饶舌又可笑。为此，我宁肯倾向避免后者，避免与人谈及此事。】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3月19日

钱端升、李复初约梅贻琦吃饭，梅未能赴约。

【晚卢开瑗夫妇请客，钱端升、李复初之约未得往。】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4月1日

王铁崖在《读书通讯》半月刊撰文，评介钱端升的《战后世界之改造》。

在这篇书评中，王铁崖立意颇有未雨绸缪之意，“一切事情，必须在事先缜密准备，才能处理得当。战争之前不准备战争，一旦战争爆发，就有战败的危险。和平也必须事先准备，战事还在进行之中，就要准备和平，因为战争总要结束的，如果不充分准备，则在战争结束之时很难成立确定的和平，很难得到维持多年的和平。上次大战以后的和平局面还维持不了二十年，其原因是和平还不健全，而和平所以不健全，大部分是因为准备不够。有了一次的经验，这次大战进行不久，各国政府及有识之士早就开始研究讨论战后和平问题。”但王铁崖指出，我国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相关研究极少；现有部分文章尽管也讨论战后和平问题，但“包含学理与实际两方面研究的著作实不多见。在我们所读到的文章书籍当中，恐怕只有钱端升先生这一部新著——《战后世界之改造》，不仅讨论详细，并且他的讨论显然是深刻研究的结果”。王铁崖忆及，1942年中国政治学会第三届年会以战后和平问题为讨论问题之一，钱端升提出的大纲曾在该年会上有热烈而有兴趣的讨论。王铁崖的书评介绍了钱端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结论，尤其特别就敌国政权的改变和武装的解除、新国际组织与战后新世界秩序、国际法院和国际武力在新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战后的经济秩序等内容，做了详细展开。王铁崖在书评末尾，明确表达了希望国人以这本书为大纲，讨论战后和平问题的殷殷期待。

——王铁崖：《钱端升著：战后世界之改造》，载《读书通讯》1944年4月1日，第87期，第13-15页。

4月

撰写《民国政制史》一书增订版序言。

钱端升在该序言中介绍,《民国政制史》脱稿于1937年,而出版于1939年。当时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均已沦陷,交通阻隔,此书出版后亦未能在内地流传,发行量严重受限。香港沦陷后,商务印书馆主人试图在内地重振,而决定将之前在上海、香港等地出版而未能在内地流通的出版物重印,《民国政制史》在这种情况下入选重印书目。为了增强时效性,由萨师炯先生独立完成了该书的增订任务,尤其增加了1937年到1943年之间的政制变迁材料。钱端升表示,原书的编制未曾改变,而立言的态度亦一以贯之,即“只是客观地叙述变迁经过,分析法制要点,而不参以赞否之意见。其所以然,乃因本书之旨在欲有裨于中国政制与行政问题之研究,而不在提供任何方案也!”

5月7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午后在六索坡钱先生家见到姚嘉椿和蔼坤,情绪甚好。】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

5月18日

王力夫妇约饭,梅贻琦、钱端升等均参加并谈时事。

【晚赴王力夫妇饭约于粤秀中学,饮桂圆酒颇好,刘振寰君与周、钱、张大谈时事。】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5月23日

钱端升参加刘振寰约饭。

【晚饭为刘振寰之约,在新村26号某医师家,有召亭、端升、枚荪、奚若、了一及褚慧老同座。】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5月29日

钱端升访朱自清。

【下午数起客人来访。送一只鞋去修。晚读徐中舒的《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钱端升来访，他预言朱家骅将出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将任内务部长。】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页。

梅贻琦约杨耿光便饭，兼约罗隆基、钱端升等人。

【晚约杨耿光（杰）便饭，兼约努生、奚若、枚荪、端升、毅生、伯伦、之椿、光旦、岱孙及陈勋仲、朱键飞会谈，谈后使人对于国内战局益觉无把握耳。】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6月24日

钱端升自重庆归来。

【下午参加正之茶会，粽子很好。端升自重庆归来。今日有二错：一是应避免听端升与岱孙谈其私事。他谈话时拐弯抹角，怕我听了外传。二是不应在奚若谈端升对华莱士看法时提出问题。】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

6月25日

钱端升等访朱自清，局面颇不快。

【下午到云大看华莱士之侧影。端升、正之等来，谈宪政研究会之华莱士欢迎会。端升对华氏欲自由听取意见而梅先生对此毫无察觉表示遗憾，而正之则为梅辩护，端升为此甚恼火。可能是由于继侗说了讽刺话或尖锐的

话，致使端升认真起来。为此甚不快。我想，保持沉默是必要的。】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页。

7月3日

梅贻琦约钱端升等吃饭。

【晚约 Mr. Langdon, Mr. Sprause, Mr. And Mrs. Parker 及奚若夫妇、端升、岱孙、光旦，郁文因尚不适，未入座，祖彤代陪。】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8月22日

梅贻琦约美国财政部代表吃饭，钱端升等在座便饭会谈。

【晚约美财部代表 Mr. Irving S. Friedman 及 L. S. 二领事，潘光旦、张奚若、陈岱孙、伍启元、沈蕪斋、张慰慈、华秀升、钱端升、徐锡良便饭会谈。】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9月5日-9月18日

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召开。

【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于九月五日上午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举行开幕式。】

——《会议日志》，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0页。

钱端升提案，《请刷新政治案》。

【四、关于内政事务者

.....

（三）请刷新政治案 钱端升等提】

——《目录提要》，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7页。

钱端升等提交之《请政府刷新政治以慰民望而奠国基案》：

【请政府刷新政治以慰民望而奠国基案

钱端升 等提

理由：

抗战军兴，我以积弱之国，挡强敌之压迫，七年苦战，仅克支撑。目今轴心之势日蹙，胜利在望，诚宜于胜利来临之前，竭尽全力以争光荣之胜利；胜利既得之否，竭尽全力以建设现代化之国家。顾我今日之情形，殊未足以语比。以言军事，则兵力衰竭，军纪废弛，反攻虽为当务之急，而整军犹未开始。以言财政，则政策无定，唯应付是尚，国库之收入未裕，民间之疾苦迭增，牟利之奸商，在在皆是，贪污之官吏，迹犹未尽。其他方面，无办法无进步之情形辄复类是。现状如此，如无彻底之改革，不特建国难期，胜利亦将因之而迟缓。但不言改革则已，如欲改革，首宜刷新政治，改造风气。政风不变，凡有举措，或不能发生实效，计划只为计划，功令徒成具文；或不能贯彻原意，立意尽可至善，而举行者，上下其乎良法转成恶政。抗战以来，远之如二十七年之抗战建国纲领，近之如政府提出之施政方针，本会历届之建议事项，论其内容与文辞，无不头头是道，件件皆通。苟其中有十分之一二真获实施，情势必远胜于今日，而隐患亦可以不萌，无如良法未能执行，制度未能建立，言机构则机构不灵，言业务则业务勿振，此无他，政府执行之力量太微弱，因之所悬之鹄的，实不能达一二耳。为今之计，惟有刷新政治，排除人事上之障碍，不分畛域，以人民之力量，为政府之力量，用全国之贤才，为政府之管理。靠人民，则一切设施，于未行之先，可得普通之宣传；既行之后，可获有力之督责，于是政府之力可以大增。用贤才，责一切应举之事可以毕举，一切不宜举或不能举之事可以不举，而行政之绩效可以大著，诚能如是，则今日之危局尚不难转而为安，而胜利之获取，与建国之成功，乃较有把握，兹谨提五事，作为改变政治作风，充实政治力量之起点，以建议于政府。

办法：

一、广开言路。除有关战事进行之军事机密外，一切言论均许自由发表，不受检查。其有妨碍自由者，无论妨害者为官吏或为党派社团，一律予以有效之制裁，言论之有违法者，可依刑法处罚之。

二、人民许取得合法之政治结社权。

三、扩大参政会及省各级民意机关之职权。并增加民选名额。凡省区之未受敌人蹂躏者，省及省以下之参议会应于一年内做到完全民选，并许取得一般人民代表机关所具之权利。参政会依此原则，扩充其权力，并增加民选参政员之额数。

四、广用有才能、有操守之新人，以增加行政实际力量。凡备位中枢，成绩平庸，或名声不佳，久为人民所指责者，应及早更换，勿令长居要津。凡失职、贪污及违法之人员，绝不再于优容。

五、实行分层负责之制，大小官员各赋以应有之权利，应负之责任，力革越级请示，越级训令之办法，庶几责任分明，推诿搪塞之风可以少戢，而人才培养，用尽其才，蔚成风气，效力亦必大见发挥。

(1944年9月提交第三届第三次会议)】

——钱端升、周炳琳：《请政府刷新政治以慰民望而奠国基案》，载《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188页。

9月13日

钱端升当选为第七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

【(5) 本大学教授会开会，选举本大学第七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结果张奚若、燕树棠、叶企孙、钱端升、潘光旦、闻一多、陈雪屏、刘崇鋳、刘仙洲、陈总、朱自清等当选为代表，冯文潜、李辑祥、杨武之、张景钺为候补代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页。

【下午开联大教授会，由余报告数事，后请蒋校长讲述湘桂视察（为红十字会）观感，后举行选举，结果书记为闻一多，校务会议代表为闻一多、叶企孙、陈岱孙、张奚若、钱端升、燕召亭、潘光旦、刘仙洲、陈雪屏。晚开常委会，通过研究生奖助金暂行办法、教职员眷属宿舍管理委员会及管理原则及各部分职员裁减原则。】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

9月16日

钱端升被遴选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四、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丁项遴选者：

.....

钱端升

.....】

——《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6页。

1944年9月16日修正之《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

【第三条 国民参政会置参政员二百九十名，其分配如下：

.....

（丁）由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遴选七十五名。】

——《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5-1416页。

9月20日

钱端升当选第七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消息得到西南联大校务会确认。

【一、报告事项：

.....

(三) 梅主席报告：本大学第七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经于本月十三日由教授会开会选举，结果计张奚若、燕树棠、叶企孙、钱端升、潘光旦、闻一多、陈雪屏、刘崇鋮、刘仙洲、陈岱孙、朱自清诸先生当选。冯文潜、李辑祥、杨武之、张景钺诸先生候补当选。】

——《第三一一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0页。

9月29日

钱端升当选为西南联大第七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公布。

【西南联大第七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名单

(1944年9月29日)

计开

张奚若 燕树棠 叶企孙 钱端升 潘光旦 闻一多 陈雪屏

刘崇鋮 刘仙洲 陈岱孙 朱自清

以上十一人当选

冯文潜 李辑祥 杨武之 张景钺

以上四人候补当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10月3日

朱自清、钱端升等晤面。

【下午至晚听端升讲重庆新闻。】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

10月15日

钱端升邀朱自清早饭。

【端升邀早饭。】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6页。

10月17日

张奚若访朱自清，谈及钱端升。

【奚若来，述奚若之事件。】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6页。

10月18日

钱端升被聘为中英文化协会为英国文化专题讲座昆明区讲师。

【一、报告事项：

.....

（四）梅主席报告：中英文化协会为英国文化专题讲座昆明区讲师，一部分业已聘定钱端升、伍启元、许烺光、费孝通诸先生担任，请就近商洽并排定讲演日期来函。】

——《第三一三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页。

10月28日

钱端升访朱自清。

【T. S. 钱下午来访。赠室内诸君食品若干。他欲取回他的炊具，我想帮他从小厨房拿出来，但认不出哪些是他的，后来岱孙去拿给他。钱对我，特别是对岱孙表示歉意，但说着就走了嘴。】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页。

11月5日

钱端升夫妇邀朱自清等早餐。

【在乐乡饭店早餐，主宾系钱君夫妇。】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页。

1945年(45岁)

1月15日

《学生杂志》推介钱端升著《战后世界之改造》。

该杂志编者撰写的新书介绍中指出，战争起源于很多原因，“如果世界上一天不铲除这悲剧的泉源，人类将永远不能享受和平的生活。”而战争的原因，和整个世界的构造有关，“我们如果要获得世界永久的和平，就非彻底改造这世界不可，非绝对消灭战争不可。但是树立永久和平的艰巨，与其牵涉范围的广阔，不难想见，初学者实在是没有办法得到研究的头绪。”该杂志编者表示：“本书的作者，钱端升先生是我国一位著名的政治学者。最近著为此书——《战后世界之改造》，以简单的词句，明晰的理论，说明整个复杂的问题，并且提出著者个人对于树立永久和平的意见。读完此书后，当可获得整个问题的梗概，实在是研究树立战后世界永久和平的一本不可多得的著作。”该杂志编者表示：“当此1945年开头，光明胜利快要到临的时候，编者谨将此书很热烈地介绍于各位读者。”

——编者：《（一）战后世界之改造》，载《学生杂志》1945年1月15日，第22卷第2期，第89-90页。

1月22日

钱太太邀朱自清等晚宴。

【参加钱太太晚宴，菜佳。多食，致不能入睡。】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页。

2月17日

钱太太邀朱自清早餐。

【钱太太邀早餐。】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页。

2-3月

钱端升去美国，与赵元任等聚会。

【2-3月，胡适、萨本栋、蒋梦麟、周鲠生、周培源、钱端升等先后来剑桥，访问哈佛大学，都来元任家做客。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议论局势。3月20日，武汉大学校友在赵元任家聚餐，祝贺周鲠生校长生日。】

——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7页。

春，某日

钱端升和何炳棣见面，并对何有所指点，对蒋廷黻有所评价。何炳棣对此印象甚深。

【1945年春，某日午前十一时左右，我自地坛历史系办公室准备去联大新校舍里行政研究室去找朋友稍事聊天，再进城吃午饭。不期看见钱端升先生迎面走来，向我招手叫我同到他那间小办公室谈话。他讲的话大意如下：你们这一辈人学问基础在国内就已打得比我们（在国内时）结实，而且你们出国的时候就比我们那时要成熟得多。所以你们出国深造前途不可限量。要

紧的是，不要三心二意，一边教书，一边又想做官。你看蒋廷黻多可惜，他如果不去行政院，留在清华教书，他在外交史方面会有大成就。我希望你能专心致志地搞学问，将来的成就肯定会超过我们这一辈的。

清华及联大师友们对钱先生的印象是他的政法根基深厚，英文写作能力很强（我个人觉得政治学系老师辈里以王化成和钱先生为最好，而王的英文口语之流利，声调之铿锵，视英、美一般政治学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虽不能说与人落落寡合，但也不太容易和人亲近。最难得的是这样一位自视甚高、受人尊敬的前辈学者，不但对后辈黽勉有加，而且敢于追认自己一辈早期学习的不够成熟，进而坦诚宽厚地预测后辈必有青出于蓝者。事后我越回味钱先生的话，越感到他治学为人之可敬；因为只有真正具有安全感的人才敢于讲出自己的不足，才有胸襟容纳、欣赏成就业已或行将超过自己的人。半个世纪以来，每一忆及钱先生赞勉之语，心中感动难以言喻。但同时总不免仍有点怀疑：钱先生只批过我第五届清华留美考试西洋通史的卷子，怎会即能对我做出那样肯定性的预期呢？他所说“你们这一辈”究竟还有谁最具代表性呢？苦索穷忆后的回答是：联大行政研究室钱先生指导下的陈体强。】

——何炳棣：《读史阅史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4月7日

朱自清听钱端升讲课。

【至西仓坡听钱君讲课，彼强调欲建新中国，必须国共和解。】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341页。

4月24日

朱自清邀钱端升夫妇等到青年会晚餐。

【邀钱、罗氏夫妇及卓到青年会晚餐。菜甚平常。】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

4月27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访钱，商谈停办国民图书公司事，彼提议收回《经典常谈》之版权需慎重考虑。】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

6月5日

朱自清等访钱端升。

【与蒋、陈共访P. S. 钱，余述天口山事件时，钱打断之，相比彼已知此事，故不加评论。余设法若无其事地中断余之谈话。】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

夏红注：此处P. S. 钱可能是T. S. 钱之笔误，故录之。

7月7日-7月20日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召开。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于七月七日上午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开幕。共产党参政员没有出席。】

——《会议日志》，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5页。

7月18日

钱端升、周炳琳对国民大会问题审查意见发出声明。

【对于国民大会问题审查意见的声明】

钱端升 周炳琳

(1945年7月18日)

关于国民大会的意见，有若干点端升、炳琳未能与多数一致，谨列举如下，并请提出大会作为委员会之少数报告。

一、国民大会召集日期之先后，为次要问题；首次国民大会之职权，限于制宪亦兼及行宪，亦为次要问题。主要之点在代表人选必须依立宪国家通例，由普选产生。在普选有可能以前，国民大会如须召集，关于大会召集有争执之问题，各方须以协议先求解决，求大会勉能反映广遍之民意。

二、协议可采取设立政治委员会之方式。在实际政治上，关于国民大会着急之争执与其他争执彼此牵连，不能分离。为便于前一种政治之解决期间，政治解决委员会应对一切政治争执均有讨论协议之权。

三、无论国民大会何时召集，如何召集，人民身体自由、言论自由及政治结社自由，政府务须立即作出最确切、有效之保障。

(原载1945年7月20日重庆《新华日报》)

——钱端升、周炳琳：《对于国民大会问题审查意见的声明》，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2页。

8月3日

应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之邀请，晚上七点在西南联大演讲《参政会与今后中国政治》。演讲稿先由《新华日报》、《民主周刊》等刊载，下文详述。

——孙宏云：“编者注”，载孙宏云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5页。

8月5日

在《新华日报》第2版发表8月3日的演讲稿，题为《中国需要联合政府，除了各党派联合起来，参加领导权，没有第二种更好的方法》。

——孙宏云：“编者注”，载孙宏云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5页。

9月1日

在《民主周刊》发表8月3日演讲记录稿《僵局如何打开——论中国政治的前途》一文，记录者天凡。

该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纵论新中国的轮廓。钱端升提出，新中国一定要为全体人民谋利益，世界潮流如此，中国亦应把眼光集中到平民身上去，尤其要在农民身上下工夫，一方面减轻农民的痛苦，提高其生活标准，保障最低生活标准；另一方面解决荒年问题，改良水利，扩充交通。工业方面，应奖励家庭工业、手工业，实现从农民出发的工业化。

第二部分论述新的政治领导。钱端升认为，从大多数农民的角度考虑，现政府的政策要不得，需要一个新的、真正代表全国的政治领导，新领导应该年轻、进步，以便新的政策得到执行。这样做的话，需要允许反对派参加政权，或者是建立联合政府。而这种思路，钱端升认为联合政府更符合中国，国共应该就此展开谈判，达成协议。

第三部分阐释政治解决委员会和联合政府问题。钱端升认为，国民参政会成立八年，但四不像，越来越让人失望，尤其国民大会成为国共两党争执焦点，解决不好，“国家前途不堪设想”，国民党坚持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更是招致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其他党派反对。对于产生新领导的方法，钱端升认为只有召集一个由各党各派及其他具有政治意见的人共同参加的会议来产生，可以命名为政治解决委员会，让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一起参加，待国共和谈达成协议，即召开国民大会。钱端升还特别提及，要协议成功，既需要当政的国民党诚诚恳恳同意该协议，也希望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百分之百同意该协议。

——钱端升：《僵局如何打开——论中国政治的前途》，载《民主周刊》

1945年9月1日，第2卷第7期。

【《民主周刊》编辑认为：“在这演讲中提出组织政治解决委员会与联合政府两项具体建议，以为打开中国政治僵局的方案，对当前问题的认识及解决途径之寻求颇有参考价值。”】

——孙宏云：“编者注”，载孙宏云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5页。

9月8日

钱端升当选为西南联大第八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候补代表。

【八日(1)本大学教授会开会，选举本大学第八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结果钱端升、张奚若、陈总、陈雪屏、郑华炽、闻一多、冯文潜、燕树棠、汤用彤、吴大猷、朱自清、李辑祥等当选为教授代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346页。

9月13日

钱端升等当选消息得到西南联大校务会确认。

【一、报告事项：

.....

(六)周代主席报告：本大学第八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经于本月八日由教授会开会选举，结果计钱端升、张奚若、陈岱孙、陈雪屏、郑华炽、闻一多、冯文潜、燕树棠、汤用彤、吴大猷、朱自清、李辑祥诸先生当选。】

——《第三四六次会议》，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3页。

9月15日

钱端升当选西南联大第八届校务会议教授候补代表公布。

【西南联大第八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名单

（1945年9月15日）

计开

周炳琳	六十七票	潘光旦	六十一票	陈雪屏	五十六票
叶企孙	五十六票	杨石先	五十五票	郑天挺	四十七票
陈岱孙	四十五票	王裕光	四十五票	叶公超	四十二票
陈福田	三十七票	罗常培	三十九票	张景钺	三十七票

以上十二人当选为代表

张奚若	三十七票	刘崇鋮	三十七票	李继侗	三十五票
郑华炽	三十三票	钱端升	三十二票	姜立夫	三十一票
丁 佶	二十九票	燕树棠	二十九票	李辑祥	二十八票
罗廷光	二十三票	张泽熙	二十票	陶葆楷	十二票

以上十二人当选为候补代表

（清华大学档案）】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110页。

9月28日

朱自清邀钱端升等晚餐。

【晚邀张东泉到榕园晚餐。菜一般。到客有一多及端升。】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

傅斯年致信周炳琳、钱端升，请求调解与张奚若之关系：

【奚若兄，弟多年敬畏之友人，而立意不与弟谈话，弟虽竭力设法，亦无是何，此为弟赴昆明信中一大疙瘩，盼大为一说。数年以来，“吾甚惭于孟子”，然彼必惊弟之无他也。昨雪屏示弟，奚若谓弟之办法，有甚妙者，有甚糟者，不可悉听，听时有 discrimination。诚哉是言。深知我者也。专颂

教安！

弟 斯年 二十八日

端升兄同此不另。】

——傅斯年：《致周枚荪》，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9月29日

钱端升访朱自清，征集公开信签名。

【上午钱来访，请我等在对当前政局申述意见之电报上签名，内容谈及蒋（介石）之独裁统治。我同意签名。】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

10月1日

钱端升等西南联大十教授致信蒋介石、毛泽东。

【西南联大张奚若等十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毛电文

（1945年10月1日）

重庆国民政府文官处分转蒋介石先生、毛泽东先生大鉴：

日本投降，先生等聚首重庆，国人方庆外既除，内争可泯，莫不引领企望协商早得结果，统一早成事实，新中国之建设早获开始。顾谈商逾月，外间第传关于地区之分辖有异议，军额之分配有争执，而国人所最关切之民主政治之实施及代表此政治之议会之召集，转未闻有何协议，诚所传非虚，则谈商纵有结果，亦只是国共两党一时均势之获得而已，既不能满足全国人民殷殷望治之心，亦不足以克服国家目前所遭遇之困难。奚若等内审舆情，外察大势，以为一党专政固须终止，两党分割亦难为训。敢请先生等立即同意召集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政治会议，共商如何成立容纳全国各方开明意见之联合政府，再由此联合政府于最短期内举行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

定期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根本大法，以产生立宪政府。必如此，一切政治纠纷乃可获致圆满之解决，而还政于民之口号乃不至徒托空言。在立宪政府成立以前，国共两党既为今日中国力量最雄厚之两大政党，先生等又为其领袖，故刷新政治、改正方向，先生等实责无旁贷。今当除旧布新之际，有数事应请特别注意，并立即施行者：

十余年来，我国政权实际上操于介石先生一人之手。介石先生领导抗战，矢志不渝，自为国人所钦敬。唯十余年来政治上之种种弱点，如用人之失当，人民利益之被漠视，以及贤者、能者之莫能为助，其造因为何？诚宜及时反省。今后我国无论采用何种政制，此一人独揽之风务须迅予纠正，此其一；

十余年来，由于用人之专重服从，而不问其贤能与否，遂致政治、道德日趋败坏，行政效率日趋低落，即自日本投降以来，收复区人事之布置，亦在使人惊讶失望。今后用人应重德能，昏庸者、贪婪者、开倒车者均应摒弃，庶我国可不致自绝于近代国家之林，而建国工作乃能收效，此其二；

军人干政，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皆为祸乱之阶。今后无论在中央或在地方，为旧军人或为新军人，隶国民党之军人或隶共产党之军人，皆不应再令主政，此其三；

奸逆叛国，其罪莫道，政府纵恻隐为怀，不将大小伪官一一加以惩处，而元凶巨慝及直接通敌之辈，绝不可使逃法外。须知过于姑息便损纪纲，忠奸不分何以为国！此其四。

以上四者皆属今日当务之急，亦为国家根本之图，先生等领导国内两大政党，倘刷新政治改变作风之决心一经表明，目前政治上之纷乱局面可立归于澄清，而来日宪政之实施亦可大减其阻力。

抑更有进者，民主制度之所以能风靡全世而战胜反动集团、消灭法西斯主义者，乃因其能以全国人民之意志为国家之意志，以全国人民之力量为国家之力量，故真正民主国家，其政府对于个人之价值，与夫个人之人格与自由，莫不特别重视；对于全体人民之智慧，亦莫不衷心依赖。先生等领导大党，责逾寻常，务望真心诚意，循宪政之常轨，以运用其党力，诚能以实际

之措施求人民之拥护，藉人心之归向作施政之指针，则一切纠纷自然消弭矣。夫导国家于富强康乐之域，其道自尊重人民始，而树立宪政，规范心理之因素，尤为重要。奚若等向以教学为业，目击政治纷乱所加于人民之损害，亦既有年，值此治乱间不容发之际，观感所及，不容缄默，率直陈词，尚乞察纳。

张奚若 周炳琳 朱自清 李继侗 吴之椿
陈序经 陈岱孙 汤用彤 闻一多 钱端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206页。

【同日，张奚若、朱自清、闻一多、陈岱孙、汤用彤、钱端升、周炳琳、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10位联大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并提出三点建议，其中第一条：鉴于“十余年来，我国政权操于介石先生一人之手”致使“人民利益之被漠视，以及贤者能者之莫能为助”，故而建议：“今后我国无论采用何种政治，此一人独揽之风，务须予以纠正！”】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10月3日

云南发生政变。钱端升访朱自清。

【发生政变，省长被撤。第五军发布戒严令。不时有枪声。钱来，谴责蒋做事太绝，因龙已表示愿下台。彼认为最好有德高望重者出面调停。然此处诸君对其意见颇冷淡。】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页。

10月12日

梅贻琦探望钱端升夫妇。

【夕至才盛巷访枚荪久谈，兼晤钱端升及其夫人。久病初愈尚甚弱也。】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10月17日

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长，致信即将出任校长的胡适：

【2. 延聘教员：这非早下手、大下手不可，旅费（回国）大约可请，至少
骝先在任中时，最好每人能带二三元之设备费（理科），然恐不易请。文科
方面说，张其昀似已早下手，我们要努力。理科方面，乞与饶树人商之。原来
标准甚好，但亦须补充。法科方面，原来竟是一塌糊涂，恐非先生自下手不
可，枚荪无请教员之能力，今日更甚于昔。端升则从不以北大事为意。】

——傅斯年：《致胡适》，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第295页。

10月23日

梅贻琦邀请钱端升夫妇等午饭。

【阴。中午在寓请蒋太太、傅孟真、杨今甫、钱端升夫妇、樊逵羽夫妇、
周枚荪、查勉仲、沈蕩斋、章矛尘、毕正宜，菜为罗厨所做，颇受称奖。酒
则甚佳，客人多欲一醉，惜午间不宜多饮耳。】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11月2日

陈序经约饭，钱端升、梅贻琦等在座。

【阴有小雨。晚序经饭约，座客尚有孟真、今甫、枚荪、端升夫妇及贡
予夫妇、朱小姐。】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11月25日

钱端升参加西南联大等高校的时事晚会，与费孝通、伍启元等教授一道

呼吁民主。当局开枪示警，引发学生罢课，导致“一二·一”惨案，进而引发了规模宏大的“一二·一”运动。

【11月25日，联大、云大、中法大学、英专4大学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起反内战时事晚会，在联大新校舍草坪举行，参加者6000余人。费孝通、钱端升等教授演讲，因特务捣乱，会议遭破坏，几所大学酝酿罢课。】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页。

费孝通回忆：

【我坐下来，听报告。叶市长和谭局长讲到了北平特务活动的情况。我的神经突然紧张起来，记起了几年来在反动统治下参加各种大会的情况。坐在我旁边的是钱端升先生，昆明“一二·一”运动开始发动的那天晚上，我们也坐在一起。轮到我上台演讲时，联大校舍四周围枪声突起，子弹在头顶掠过。这种景象和现在一比，真是地狱和天堂之别。这个差别在哪里呢？今天我可以安心地在会场里听讲和发言，有的是融融一堂的温情，没有枪声来威胁了。为什么呢？很明白的，反动派的武装被解除了，反动派的活动被镇压了。这是专政，一点也不错。有这些专政，才有我们在会场里的民主。没有这些专政，我们的会场又会变成西南联大的草坪了。我于是又点头了，领会了民主和专政是怎样的合起来的。】

——费孝通：《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新华社1949年9月7日电，载《北京观察》2009年第Z1期，第20-21页。

朱自清日记载：

【晚军警取缔学生之时事晚会，枪炮之声，时闻于耳。】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6页。

罗荣渠日记载：

【晚，时事晚会举行，钱端升讲《对现在政治应有之认识》，伍启元讲《从经济与财政看内战必须避免》，费孝通讲《内战与美国》。中有二十八团

体之宣言，与王姓老百姓（查宗藩）之插曲。虽在枪林弹雨中，然成绩极佳。】

——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0页。

何兆武回忆：

【1945年11月25日晚上，在西南联大草坪上举行一个会议，反内战，争民主，还请了四位先生讲话，其中有费孝通、钱端升。当时我在宿舍里，离得不远，突然听见重机枪声音大作，“咔咔咔”打得非常厉害，仿佛就在耳边上。我记得我的同学说：“不好，要出事。”大会当然没法开了，第二天早晨，据官方宣布，说是发现了匪情，他们在剿匪。其实大家都知道不是这样，什么土匪，他们就是针对这个大会的，这种借口实在恶拙之极。同学十分激愤，把上课的钟卸了下来，开始罢课，这就是“一二·一”运动的开始。】

——何兆武口述，文靖整理：《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95-196页。

阿古什之《费孝通传》记载：

【1945年11月25日晚上，他参加了要求停止内战的群众大会，并作了讲演。大会的头一天，昆明的党、政、军当局发布告示，禁止一切集会。但大会的发起者联大、云大及其他院校的学生会坚持要求开，云大校领导迫于国民党的压力，拒不借礼堂给他们，于是大会改在联大校园举行，有数千人参加，大多数是大专院校的学生。第一个讲话的是曾在美国留学的政治学教授钱端升，他呼吁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第二个讲话的是经济学家伍启元，他警告内战可能导致国民经济破产。虽然他们两人批评了政府，但他们都是国民党员，并不是激进分子。在他们讲话时，校外已响起枪声。

然后费孝通登上讲台讲话，他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助长了国民党打内战的决心，这种政策不代表全体美国人民，而是代表美国金融寡头和军方的利益，他呼吁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一起，制止美国的军国主义政策和中国的内战。在他讲话时，枪声越来越近，灯熄灭了，子弹从头顶呼啸而过，他写道：

我站在高高的讲台上。这是一个暗无星光的夜晚。大约有五千名学生席地而坐，形成动人的场面。场外军警林立。机枪和小炮向我们头上开火。电灯熄灭了，后来在讲话的人旁边挂了汽灯。死亡临近我们，子弹从头顶上飞过。我尽量镇静自己，继续讲话（实际上我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这样可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会场的任何骚动都会招来一场大屠杀。

他在热烈掌声中结束讲话。第四位讲话的是潘大逵，他呼吁成立联合政府、撤退美苏军队。最后通过决议，抗议政府发动内战，要求美军撤出中国。会后，士兵们阻挠学生们回家，第二天，各报均刊登中央社消息：军队向在联大附近抢劫的武装暴徒开火。】

——大卫·阿古什：《费孝通传》，董天民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141页。

11月29日

钱端升等教授召集罢课学生，劝同学复课。

【三、四时许，全体教授召[同学]训话，劝复课，先后有叶企孙、潘光旦、钱端升、张奚若、周炳琳、闻一多诸氏发言。罢委会代表回答：坚决罢课。

教授二次起草抗议书致政府当局。

“无党无派”狐尾渐露，中央报谓彼等反罢课，社论《五四精神不可复见》一文荒谬绝伦。】

——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页。

12月6日

朱自清与钱端升等参加评议会。

【下午参加评议会，傅任主席。会议伊始，端升与芝生就因误解而大吵起来。端升提起评议会代表及四个谈判人所受到的批评，他在与会者面前解释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故当他说是吴和萧批评谈判人时，芝生就大喊莫名其妙！此语将端升惹火了，他跳起来就往外走，我们将其拉住，傅一再说好话也无济

于事。最后芝生向他道歉并同他握手，端升才勉强接受，但局面仍十分尴尬。】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页。

12月13日

梅贻琦约钱端升等谈话。

【晴（前二日曾连雨，昨晚始晴）。早七点起，八点以后约端升、企孙来谈。芝生、蕩斋、鸣歧先后来。】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1946年（46岁）

1月12日

钱端升访朱自清，问其对时局宣言意见。

【上午端升来询《时局宣言》起草要点，所提各点均表示接受，而今甫及汤则表示不同意。】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1月15日

在《文化展望》发表《华北——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一文。

据文末注，该文系钱端升为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撰写的文章，由“颂学”翻译成中文。

从美国国务院文森1945年10月20日在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发言写起。在该发言中，文森提及，希望中国成为美苏在远东合作的桥梁；钱端升指出，美国国务院持这种政策值得庆贺，但惨淡的现实是中国也可能成为美苏冲突的“桥梁”。钱端升指出，在战后随着各国力量的演化，华北的重要

性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尤其是对美苏而言；在钱端升看来，“美苏是目前争霸世界仅有的实际竞争者”。钱端升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便是使得美苏在以前苏日争霸的华北碰头，“如果美苏开战，华北将为决定的因素”，无论是战略地位还是人口、资源，华北对美苏都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即使在该地区没有内战，我们也有充分理由，对它的未来感觉不安，这不幸将是由列强竞争引起的。”随着内战的扩张，钱端升认为美苏双方政府也已明了，“在中国内战中支援一方或他方，我们或可增强其在华北的地位”。钱端升预言，虽然中国自身无法避免华北的巴尔干化，但美国却掌握着绝对主动权；美苏联合对中国国内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可以有成功的希望的”。钱端升认为，只有美国撤退其海军陆战队，让美国对中国人民及苏联保证其无意直接、间接帮助一边，让杜鲁门与斯大林合作，对中国各个集团施加压力，引导各方在一个中国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合作，“华北也可避免迅速变为或将燃起美苏冲突，而最后导引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了。”

——钱端升：《华北——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载《文化展望》1946年1月15日，第1卷第1期，第10-11页。

1月16日

今甫约饭，梅贻琦、钱端升等前往。

【阴。中午今甫约在厚德福，晤 Fairbank 太太、张太太、龙荪、端升、光旦夫妇（奚若因病未到）。】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1月18日

某“博士”与朱自清谈，提及钱端升。

【归途中博士告以不能参加明日晚餐会，并告端公将宴请费正清，商谈梁太太移居昆明问题。归根结底，博士是在为自己辩解。】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

386 页。

1月20日

钱端升向学生发表演讲“政治协商会议能使中国进步吗？”

【下午钱端升教授讲演“政治协商会议能使中国进步吗？”】

——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7页。

1月21日

罗荣渠听“西洋社会史课”。在1952年回忆时曾提及钱端升对三民主义的批评。

【开课。晚旁听西洋社会史课，甚佳。[按：此课由张奚若教授讲授。据罗荣渠1952年笔记手稿回忆：“听了张奚若讲西洋政治思想史，主要是讲马克思的思想。我差不多是在课堂外的墙角下旁听他的课的，而且还记了笔记。张奚若的讲课使我受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启蒙教育，我开始借《共产党宣言》来读。同时我在他的课里第一次听到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批评（也可能是从钱端升先生的课里听来的）。这引起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注意，但在潘光旦先生的课堂上，又听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7页。

1月30日

梅贻琦约钱端升等来谈推荐教授特别研究补助金名单。

【晴暖。下午三点约汤、叶、钱、施来商量推荐教授特别研究会补助金受款人（82人，每人五万元）名单。】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2月（春）

林徽因和费慰梅返回昆明，见到钱端升夫妇等人。

【她到达昆明之后，张奚若和他的夫人坚持要她开始几天住在临近的他们的家里。飞行的紧张和疲劳使她只能卧床休息，但在长期分离之后又有亲爱的老朋友环绕着，又使她狂喜不已。钱端升夫妇，当然还有老金，也都在围绕着她床边进行没完没了的谈话的亲密朋友之列。】

——[美]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曲莹璞、关超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75页。

【抗战胜利那年的冬天，母亲离开了李庄，先在重庆暂住，但她总在想念昆明，特别是那里的老朋友们。1946年春，她终于如愿以偿，带病乘飞机再访昆明，住在圆通山后一座花园里。同老朋友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人的重聚，使她得到了几年来最大的快乐，可惜高原缺氧的昆明对她的肺病却很不利。】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载杨永生编：《记忆中的林徽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2月4日

朱自清与钱端升一起外出。

【下午与端升一起外出，见到他申斥女佣。】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9页。

2月21日

钱端升访朱自清。

【采芷来。端升对浦说黄浦系对CC系可能在搞阴谋，借口东北问题破坏国民党对其他党派的协议，这必将给苏联提供对政府施加压力之机会。苏联现已采取强硬态度，因美国人要派军队去东北帮助日本人撤退。】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页。

3月12日

钱端升访朱自清。

【端公来访，继侗误解了企孙的话，因而反应强烈，企孙对此颇难忍受。】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6页。

3月16日

钱端升等极力奔走，准备“一二·一”死难者出殡事宜。

【晴热风。一日间勉伸来三次，告学生明日出殡准备情形。端升似亦奔走，力使勿于明日更生枝节也。】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3月20日-4月2日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召开。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会议于1946年3月20日上午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开幕。共产党参政员没有出席。】

——《会议日志》，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7页。

4月3日

钱端升等访晤梅贻琦。

【午前企孙、光旦、端升先后来谈。】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

5月

西南联合大学正式解散，钱端升辗转回到北平。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在1946年5月正式宣布解散。】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6-567页。

5月17日

钱端升邀朱自清等餐聚。

【赴钱的餐会。】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3页。

6月21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访石荪、中舒、李夫妇、张、谢、钱。】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9页。

秋

钱端升辗转回到北平，继续在北大执教。

【我于同年秋回到北平，仍在北大执教。】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6-567页。

10月19日

钱端升与胡适一道前往南京。

【飞去南京，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

与援庵同行。端升同行。】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8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

257 页。

11 月 18 日

朱自清、钱端升参加系内教职员子女委员会会议。

【参加系内教职员子女委员会会议，推选 T. S. 钱为主席。】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32 页。

11 月 24 日

钱端升访朱自清。

【下午 T. S. 钱来访，对岱孙备加称赞，余甚同意。】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32 页。

12 月 1 日

北大举行纪念昆明“一二·一”惨案一周年大会。钱端升莅临并发表演讲。

【钱端升氏谈争自由】

今年在北平北大纪念昆明“一二·一”学生惨案一周年的时候，教授钱端升氏在纪念会上曾发出要争自由的呼声，他说：“我们因纪念而想到两桩事：第一是言论自由不可不争。受教育的人而不争言论自由，中国必将沦亡，必将没有前途和希望。对政治局面应该批评，就是发生了惨案也要批评。第二是既批评就可能遇到‘一二·一’同样的情形，因为去年是李宗黄限制言论自由，既能有一个李宗黄，就会有一百个、一千个李宗黄。我们要言论自由，又要避免像四位同学这样的牺牲，这是个大冲突。固然这冲突要靠年轻人善以自处，而我们的责任当然更大，我们要使这社会不发生这种冲突，有危险应当自己来担当。”（见上海《文汇报》）】

——《钱端升氏谈争自由》，载《新文化》1946年12月21日，第2卷第11-12期合刊，第45页。

12月21日

《新文化》(半月刊)根据上海《文汇报》的报道，摘编了钱端升有关争自由的演说。

——《钱端升氏谈争自由》，载《新文化》1946年12月21日，第2卷第11-12期合刊，第45页。

1947年(47岁)

1月7日

钱端升等呼吁行动起来，支援学生。

【平市各大学教授绝大多数都表示义愤，同情学生们的正义行动。据天津益世报三十日载：清华大学教授及助教百分之九十九均赞成罢课抗议，百分之九十赞成示威游行，清华大学教务长吴泽霖表示：“抗议是应该的，学校决不至强迫学生上课，这种污辱不仅是某一个同学、某一校的事，而是全中国人民的事。”清华张奚若教授说：“事情不能孤立看，这是一连串事实的继续，非彻底解决不成！彻底解决非美军撤出中国不可！”何汝楨、吴晗、朱自清、赵诏熊等教授都发出同样主张，并望同学与教授及外界社会各阶层连络行动。北京大学钱端升、向达、季羨林、邓嗣禹、闻家驷、吴之椿等教授也都大声呼吁，要大家不再沉默，行动起来，不断力争，并要求学校当局惩罚特务“学生”。】

——《大学教授大声疾呼不再沉默行动起来》，载《人民日报》1947年1月7日。

1月13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后访陈先生夫妇。】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页。

夏红注：此处“陈”可能系Chien之误译。

1月

《今后世界民权建设之展望》一文被收录到中山文化教育馆民权组编：《民权建设中的世界与中国》，于1947年1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该文指出，1920—1970年这五十年的世界史，是民权发达过程中空前绝后的危险时期，同时也是最光荣的时期。钱端升提出五个有待完善的问题：第一，人民代表之如何产生；第二，人民与其代表者之间的关系；第三，少数与多数间的关系；第四，国家权力与人民自由之争；第五，国家权力对外的限度。钱端升指出，战后任何国家循民治大道前进毋庸置疑，而如此则必须回答上述五个问题。

——钱端升：《今后世界民权建设之展望》，载中山文化教育馆民权组编：《民权建设中的世界与中国》，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

3月1日

在《观察》发表《教师与进步》一文。

该文隐隐然鼓励教师多发进步之论调。钱端升认为，在此危急存亡之秋，进步不易，需要一班人来鼓吹进步，但政客们、生产家们、农民、工人等或许都知道中国急需进步，但无法发声，“只有教师们，知识高于农工，时代的趋势及中国所遭遇的危机也该明了，又没拥有像企业家们所拥有的既得利益，说说话应该可以没有危险。这样说来，教师们该有资格来说明进步并提倡进步了。”然而，钱端升亦提出，教师们能否出来说明进步并提倡进步，取决于其是否故步自封于士大夫的传统里，依附政治势力；亦取决于其是否接受近代思想，放弃对统治势力的依附，决心为全社会的公益努力。钱

端升坦言，有足够因素说明教师群体是不易终止彷徨而担负起倡导进步大任的，“我们当然十二分希望这大多数的教师能终止他们的彷徨，能为中国人民的推而至于为全人类的进步而努力。如果他们不拿起进步的旗帜，目前国内将更无另一群人能负起这重担。”“如果教师这一群人能提倡进步，歌颂进步，代表进步，进步的力量一定可以很快地压倒不进步、假进步和反进步的力量。”

——钱端升：《教师与进步》，载《观察》1947年3月1日，第2卷第1期，第7-9页。

3月15日

在《观察》发表《世界大势与中国地位》一文。

该文核心在论述中国的对苏政策。钱端升指出，国际政治富含现实性和进步性，两者互相融合，美苏关系中双方都“狂于现实，难于自拔”。而由此论及中国的对苏政策，钱端升认为随着美苏关系的恶化，中苏关系势必受影响，而且受成见影响，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钱端升指出，中苏关系不和谐取决于若干因素，比如国内的国共之争、中苏之间存在许多非俄非汉的小民族、苏联试图攫取若干沙俄从清室挖去的东北利益。钱端升认为，我们应从大处着眼看中苏关系，审慎评估我们是否非得反苏、是否非得开战。钱端升认为，如果美苏开战而中国贸然附骥美国，只会使得中国国土成为战场，田舍成废墟，人口当弹灰。职是之故，钱端升指出，第一，国际政治的变化不容中国将美苏视为敌对国家；第二，就过去是非曲直，中国没理由偏袒美苏任何一方；第三，从中国利益出发，我们不可联美反苏，“我们惟有兼亲美苏，才能因世界的安全而获致中国的安全，才能因两国之资助而致力国内的建设。”而且，中国要执行此政策，尚需要先求和平统一而非武力内战。

——钱端升：《世界大势与中国地位》，载《观察》1947年3月15日，第2卷第3期，第3-6页。

3月22日

在《观察》发表《唯和平可以统一论》一文。

作者提出，在此时主张和平，属于不识时髦、不识相，但真理既不讲时髦，也不识俗相。该文篇幅较长，约略分为如下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论及和平统一的条件：第一，国共两党共同接受一种纯粹政治争权的方式，以代替过去武力争权的方式；第二，国共两党重视国家统一的重要，各愿缩减其势力范围至无争的程度；第三，国共两党中的一个能重视国家统一到极高程度，因而为求取统一，“连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取消自己以救倒悬，也所甘心。”钱端升指出，上述三条件中，也就第二、第一约略有希望，但和平统一在最有希望之际，也因为国共彻底决裂而成为泡影。

第二部分论及武力不能统一中国。钱端升举出四点理由：第一，军事方面，国共两党短期内都无法将对方打垮。第二，经济方面，全面长期内战消耗甚大，经济濒临崩溃，国民政府方面吃亏尤胜于延安，双方来来往往决一死战，最终导致全民毁灭。第三，外交方面，中国三五年内必须兼善美苏，但内战后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做到这一点。第四，政治方面，内战不但做不到统一，而且也是一条瞬息走进的绝路。钱端升认为，共产党假使占据军事上风，则国民经济早已溃烂，全国生灵涂炭，届时政治之改良将极其困难。而国民政府如要武力实现统一，则必须刷新政治，做到如下几点：第一，收拾民心；第二，争取国际同情及赞助；第三，维持队伍的作战及补充力量；第四，产生足够军事及行政事业的经济力量；但内战一日不停，国民政府一日难做到上述任何一点。

第三部分钱端升论及战争与和平的结果。就战争的结果而言，可能初期国民政府尚把握优势，但难以迅速解决对手；而对手越失利，越会利用破坏手段来阻止进攻，故战事越长，痛苦越大，越需要人心大归附。而拉锯式的作战使得双方都占不了便宜。如果中共获胜，但其建国前景亦不容

乐观，中国穷且糜烂的烂摊子使得内部复兴几乎不可能。而如果和平的话，第一，人民生命可以保全，社会资源可以避免毁灭；第二，战事停止，数党存在，人民自由便可增加；第三，国共双方可在其主张范围内实施不同的经济政策；第四，有了和平统一，中国才能真正作为世界五强而实施独立自主的外交。

第四部分论述和平统一之路。钱端升认为一条路是国共双方共同接受民主政治，以政治争权的方式来代替武力争权；另一条路减少争持的范围，由争持而变为互不侵犯的合作。但第二条路困难在于：第一，国民政府号令如何在与犬牙交错的解放区边缘实施；第二，交通如何办理；第三，对外政策如何达成一致。而第一条路1946年政协曾尝试过，未能成功，联合政府之路或许将来还可以试验，但需要双方共同接受民主政治，以政治斗争代替武力斗争，“必须联合政府根据各种有关的协议以成立一个民选的立宪政府，然后中国可有真正民主，而国共可有和平争政的方式，国共以外的党派也可有和平争政的方式。”

——钱端升：《唯和平可以统一论》，载《观察》1947年3月22日，第2卷第4期，第3-7页。

3月29日

《观察》登出“本刊特约记者”的《北平护权运动的侧面观》，其中提及钱端升。

该报道起源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月初在莫斯科召开的四国外长联席会议上，将中国问题列入议程。消息传来，引来舆论的分裂，《北平护权运动的侧面观》即对相关舆论进行报道。涉及钱端升的内容，在“北大的教授”小标题下。内容如下：

【钱端升教授的话尤其分析得清楚，钱先生说：

“就学理说，所谓‘干涉’必须见诸行动，有强迫之意。如果只是讨论该国内政，提供办法，调解争执，而不以武力强迫执行的话，不能谓之‘干

涉’。既非干涉，被讨论之国家就不应该反对。”

“就实际说：此次莫斯科会议讨论中国内政，‘讨论’与‘干涉’不同，应否反对，稍加判断就可知道；就是要反对，也应该由王外长提出抗议。我想王外长这样做，莫洛托夫怕会笑他没常识。再说：该会讨论中国问题，也是为了美苏在欧洲问题的解决上便利起见，他才提出的，不必如此重视，更无须加以‘干涉’之名，而大肆反对。我怀疑这是去年政协后‘反苏反共’的再翻版，结果想来也差不多，反对得太凶了，连马歇尔也会说不出话来。”】

——本刊特约记者：《北平护权运动的侧面观》，载《观察》1947年3月29日，第2卷第5期，第19-20页。

4月1日

投书《观察》编辑部，就刊物发表内容未经本身审阅做出声明。

【编者先生：

本刊二卷五期北平通讯有关我的记载，当系根据我应学生访问时的谈话。今所记者与我原所言者，辞意均有出入，应向读者声明。

对于我自己写作的文字或经我校阅过的演讲谈话记录，我绝对负责。但年来报纸刊物所记我的讲演谈话，我不能尽知；如有不准确处，自亦无从一一更正，因例不请求更正。此次对于本刊所记，因为我是本刊撰稿人之一，义应负责，因破例作如上的声明。

钱端升

三六·四·一】

——钱端升：《钱端升先生来函》，载《观察》1947年4月10日，第2卷第7期，第13页。

4月10日

在《观察》发表致编辑部的一封信。

——钱端升：《钱端升先生来函》，载《观察》1947年4月10日，第2卷第7期，第13页。

4月19日

《观察》登出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对于钱端升先生所拟“联立之路”的意见》。

有个叫杨中顺的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投书《观察》，表示北京大学政治系同学集体讨论了钱端升的《唯和平可以统一论》，并最终达成了一致的结论，兹将讨论内容寄往《观察》，“贵刊持论公正，兼容并蓄，如承赐刊，不胜感荷。”

《观察》编辑部刊登该意见前，亦加编者按如下：“杨中顺君寄来了这篇北大政治系同学对于钱端升先生的《唯和平可以统一论》一文的意见书。这篇意见书的主要结论是拥护走‘联合之路’（即‘政协之路’），反对走‘联立之路’。这个结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这篇意见书对于钱先生原文似有误解之处：第一，意见书中似乎认为钱先生是主张走‘联立之路’的。我们核按钱先生原文，可以看出原文作者也是拥护走‘联合之路’的，不过‘联合之路’既然没有走通，所以他另外提了一条‘联立之路’出来，供大家讨论。第二，意见书中认为钱先生忽略了国共双方以外的力量，即第三方面的力量。我们核按原文，钱氏明明认为‘政协的缺点，乃在政协本身之未能充分表示国共以外大众人民的力量’。他且进一步说，‘如果今后的和平仍须遵循政协之路，则政协的参加者，国共而外，须有大量可以代表非国非共不附国也不附共的中立分子。’钱氏之重视国共以外的力量，极为明白。不知意见书中何以有此误解？”

该编辑部另起一段表示：“我们认为钱端升先生的那篇《唯和平可以统一论》，是最近国内几篇重要政论中很重要的一篇。他提出了一个为过去大家没有提过的新方案。四月十二日大公报所刊王洁非先生等九人《我们对于当前时局之建议》（见本期观察文摘），也有与钱先生类似的建议，可见钱

氏所拟方案，国内亦有人抱持同样的意见。我们认为钱氏原议应该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和讨论，所以我们乐于发表这篇讨论文字。”

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所拟意见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重述了钱端升的基本观点，并展示了他们对于“联立之路”的理解，同时提出“中华联邦”的概念。

第二部分指出，“联立之路”仅仅要求一种松懈的邦联组织，而且是一种比普通邦联意义更为贫乏、更狭窄的邦联组织。在此基础上，这些学生提出“中华联邦”尽管意义亦贫乏，但其并非毫无意义，其意义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统一的象征；第二，负责共同的外交；第三，区域间交通之处理。

第三部分提出，“中华联邦”出现的条件有三：第一，双方欲求和平，接受民主政治，放弃兵戎相见，从事政治争论；第二，双方皆从事实上得到教训，明知军事行动解决不了政治问题，因而放弃武力斗争的方式；第三，在战争中双方军事力量都受到重大损失，事实上非修正不可，因而暂时放弃战争。北大政治系学生认为，钱端升似乎完全忽略了争执双方以外的力量，尤其是各阶层民主人士、自由分子、第三方面的力量。在这些学生看来，中国政治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政协之路，亦即联合之路。

——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对于钱端升先生所拟“联立之路”的意见》，载《观察》1947年4月19日，第2卷第8期，第13-14页及第21页。

5月20日-6月2日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会议召开。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于1947年5月20日在南京林森路国民大会堂举行。】

——《会议日志》，载《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9页。

5月27日

署名“小凤”的人在《新上海》周报发表文章《周炳琳·钱端升·许德珩：三位书呆的和平运动》，批评钱端升等的亲共立场。

【参政员周炳琳、钱端升、许德珩三人，曾因致函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主张派机往迎中共参政员出席大会而引起全国人士的注意，这三位参政员的和平运动，不过在文字上说说而已，依照现实政治情形看来，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这三位参政员的出身外人知者尚少，约略记述如下：

周炳琳，浙江黄岩人，北京大学教授，早年亦系北大学生，曾参加五四运动，为最热烈的人员之一，后曾赴美留学，政治主张前进，颇与中共合流。

钱端升，现任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一向喜在民主刊物上撰述民主文章，据他自己说，他的文字主张是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可是，依照我们看来，他的主张，总有点和民盟合流，他的言论处处为中共张目更是显而易见。

许德珩，现任北京大学教授，曾在北平主编《人民与真理》，为文主张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在北大极能获得学生的拥护，北平著名十三教授的宣言，他是领衔的第一人。许德珩在这三个人当中，是最会活动而最具有实干精神的一个。】

——小凤：《周炳琳·钱端升·许德珩：三位书呆的和平运动》，载《新上海》1947年5月27日，第70期，第3版。

6月2日

钱端升参加北大“六·二”运动并发表演讲。

【“六·二”终于到了。《平明日报》第一版的大标题是“全国本日盼祷平安”；再翻开《经世日报》一看，赫然入目的竟是“渝穗汴汉蓉军警捕人竟演成流血惨剧，津渝沈昨宣布戒严”、“渝警备司令部昨逮捕千人，包括教授学生记者”等惊人标题，使人悲愤不忍卒读。

起草《再致行辕抗议书》。

9时赴民主广场开追悼大会，一路上的沙包警戒依然未撤。据住在红楼的同学说，昨晚街上整整闹了一夜，现在全校电话已经不通。报载：“今日商号不开门者，当局决予停业处分。”《华北日报》则大吹“游行在鼓动中，北大清华等校各领津贴一亿多”云云；经济系某位同学算了一下，这笔巨款今日北平的任何银行都拿不出来，真是造谣造得也太蹩脚了！

校内贴满了红绿漫画和标语，漫画也是油印的，画的不外是“共产党的尾巴”之类。不过昨夜张贴时“棍子们”心虚得很，过于慌张，弄得满地都是遗弃得标语漫画。一些同学甚为开心，连呼：“好便纸！好便纸！”

挽联、花圈及李、闻二先生和四烈士的相片都陈列出来了。最精彩而简单明了得挽联要算“独裁千古，民主万岁”一联了。

行礼如仪后，有祭文诗得朗读，“一二·一”到现在各地惨案的报告。报告惨案的那位女同学说得声泪俱下，悲愤满腔。唱挽歌后，胡适校长演讲，他对此次运动的工作及措施夸奖了一番，并更正前日报上发表的他的谈话内容，还说今日陈继承总司令已通过电话对于此次戒严向他表示道歉。

其次是周炳琳教授演讲；他先说今天的大会称为“为内战而死难的军民及反内战而牺牲的烈士追悼会”，其中军民并提不当，他对于为内战而死的兵士开追悼会不感兴趣；接着他指出以逮捕共产党的名义捕人不合法；最后他说：我们除悼念闻一多先生外，没有忘记李公朴先生是很正确的。

钱端升、吴之椿先生也相继发表演讲。】

——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4-135页。

6月29日

罗荣渠购得钱译《英国史》一部。

【在东单书肆购得钱译《英国史》一部，去洋三万元。】

——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45页。

7月

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战后世界之改造》一书。

——孙宏云：“编者注”，载孙宏云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4页。

9月7日

朱自清访钱端升。

【在端升家午餐，他甫自南归。游颐和园。】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0页。

10月底

钱端升应费正清之邀，赴美讲学。

【1947年10月底我应邀赴美，在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一年。在此期间，我以讲课的内容编著了《中国的政府与政治》（英文本）一本，主要是评述辛亥革命以来的南京政府，由于资料所限，我当时无法将解放区的政府与政治写入书中，每念及此，总以为憾。该书195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7页。

12月

费正清邀请钱端升赴美讲学。钱端升于12月份抵达坎布里奇。

【当时在这方面能得到的帮助之一，是请我们的老朋友钱端升教授从昆明来坎布里奇作客讲学。他从1947年12月来到坎布里奇，直到1948年9月方回到中国。他当时是一个访问学者，在哈佛讲授中国政府和政治学，同时他也在为太平洋关系协会完成他关于同一课题研究的英文手稿。这项研究是以他和其他学者的中文著作为基础的，当然对外国读者来说，它的英文版是一部集大成的新著。端升先生工作非常努力，他得到了一个热心的美国秘书的协助，维尔玛（即费慰梅，夏红注）和我也帮着审阅了原稿。这本书是一

部关于国民党政府的非常客观而又资料详尽的记述。但当哈佛大学出版社1950年出版这本书时，它的作者已回到北京在新政权下工作，没有要求寄书给他。他回去时，曾预料会在一场可能发生的大屠杀中被国民党分子杀害（1946年〔应该为1945年，夏红注〕他在昆明西南联大的一次反内战集会上演讲时，他们曾向他头上开枪射击）。但他活下来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起用，作为一个民主人士、政法学院的领导人以及友好代表团的成员出访国外。我们一直保持通讯联系，直到1951年末中美在朝鲜的战争爆发才中断。不用多说，我们各自后来都因相互认识而受到了指控。自由主义在竹幕的两边都成了嫌疑犯。】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90页。

1948年（48岁）

1947年—1948年间

罗伯特·斯卡拉皮诺与住在费正清家的钱端升熟识。

【1947—1948年，我和费正清家的一位常客熟识了，他叫钱端升，来自北京大学。钱在哈佛大学教中国政治。我成了他的助教，他把家人留在了中国，因此很多时间我们都在一起。他属于“第三力量”，反蒋，但同时又对中国共产党保持相当的保守态度，认为中共似乎执行的是苏联的主义和政策。我感觉约翰深受他的观点的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不谋而合的。】

——〔美〕罗伯特·斯卡拉皮诺语，载保罗·柯文、默尔·戈德曼编：《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张晓阳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62—63页。

1月24日

吴景超告诉胡适，将与钱端升一道办刊物的事情。

【吴景超来谈。他说，钱昌照拿出钱来，请他们办一个刊物。邀吴半农主编，景超任社会，刘大中任经济，钱端升任政治，萧乾任文艺。】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8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351页。

3月27日

钱端升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人文组（社会科学）28人

吴敬恒 金岳霖 汤用彤 冯友兰 余嘉锡 胡适 张元济
杨树达 柳诒徵 陈垣 陈寅恪 傅斯年 顾颉刚 李方桂
赵元任 李济 梁思永 郭沫若 董作宾 梁思成 王世杰
王宠惠 周鲠生 钱端升 萧公权 马寅初 陈达 陶孟和】

——张建伟、邓琮琮：《中国院士》，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夏红注：

张建伟等著作仅提及“3月”。胡适1948年3月27日日记云：“中研院选举‘院士’的结果，——先后五次投票的结果——选出‘院士’八十一人。”（《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第353页）

5月6日

朱自清、钱端升出席教授会议。

【出席教授会议，钱建议组织一个教授社团。】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

6月14日-25日

钱端升与赵元任等朋友在剑桥聚。

【在剑桥一住12天，常与朋友钱端升、任之恭、丁声树、杨联陞、林家翘、黄鸣龙、Holcombe教授夫妇、Gardner教授、任以都、瞿承瑞等来往，晚上经常与来思一块儿弹钢琴，“Enjoy being back in Cambridge”。】

——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1页。

9月21日

钱端升与赵元任在赵办公室会晤。

【9月21日，在办公室与钱端升会晤，并陪他到学校参观。】

——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4页。

9月25日

赵元任接钱端升在其家小住。

【25日接钱来家小住。吴有训回国途中又一次来，并与钱同时住赵家。元任劝他们留下，他们还是决定回国。】

——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4页。

秋

钱端升有感于国内令人快慰的形势发展，决定回国。

【新中国诞生前夕，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1948年秋，国内解放战争进展十分迅速，形势发展令人快慰。当时，虽有美国友人劝我暂时留美教书，但我已经看见新中国的曙光，决心回国，经多方设法，在旧金山觅得船只回国。】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7-568页。

10月14日

钱端升、吴有训打算坐军舰回国。

【“端升正打算坐军舰走”(10月14日)。】

——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4页。

10月18日

吴有训未听劝阻，还是决定和钱端升一起回国。

【“tried to persuade Y. H. Wu to stay, but he still decided to go back”(18日)。】

——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4页。

10月21日

钱端升、吴有训正式离开美国。

【10月21日，开车送朋友到码头。由于战后商船还没有完全恢复，吴、钱乘的是美国海军运输船P115号，他们住的船舱一间48人，就这样走了。钱和吴走后晚上显得冷静了。（“In even all were quiet with Chien and Wu gone.”）】

——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4页。

11月

钱端升回到北平。

【1948年11月终于回到北平。】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8页。

11月6日

北大法律系向胡适请愿，要求罢免周炳琳代兼系主任职务。此为后来钱端升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埋下伏笔。

【中午听说法律系大请愿，要求胡校长取消周炳琳代兼法律系主任职务。

同学们闹得很凶，胡氏看见威吓不能了事，终于答应同学请求，说只要周氏提出辞职，他可以准许。】

——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91页。

11月

在美国《太平洋季刊》发表英文文章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Chinese Government*（《军事在中国政府中的地位》）。

——钱端升：《钱端升主要著作目录》，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1页。

待考

钱端升被推选为北大法学院院长。

【1948年11月终于回到北平。不久我被推为北大法学院院长。此时，北平即将解放，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并配合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同学做好了一切护校准备。】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8页。

12月4日

胡适等公宴钱端升。

【晚上公宴钱端升，主人是北大的行政首领居多，故我们大谈。我最后说，我过了十二月十七日（五十周年纪念），我想到政府所在地去做点有用的工作，不想再做校长了。不做校长时，我也决不做《哲学史》或《水经注》！

至于我能做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8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371页。

12月5日

凌其翰与钱端升的学生田保生在蒋廷黻举办的茶会上见面。

凌其翰描述田保生时提及钱端升，如下：

【田保生是我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他青年时代肄业于清华大学，为钱端升教授的高足，后来应第一届高等文官外交官的考试，录取后分配在国民党外交部欧美司。当时在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办事处工作。他为人质朴诚实，素为我所器重。他于返美前特到我寓辞行，谈到国内时局，竟呜咽失声。于是我劝慰道：

“譬如我们走错了路，走上一条黑暗的道路，我们不必惊慌，只要改弦更张，弃暗投明，才是我们的出路。”

“你千万不要悲伤了，须知黑暗已到尽头，光明就在面前，到了关键时刻，必须果敢地行动起来，抛弃旧世界，追求新世界，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果然，新中国诞生了，当时钱端升教授去美国，暗中劝田回国，他毅然辞去了驻联合国办事处的职务，奔归新中国。现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知识，继就分配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担任国际法的编译工作，埋首苦干，举凡奥本海国际法巨著，希金斯和哥伦波斯合著的海上国际法等英文原著译成中文，都有他的一份辛劳。不幸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初期，又遭受严重的冲击，1966年8月28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凌辱，与夫人双双含冤而死。1979年8月28日才获昭雪。】

——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203页。

谢泳文章“钱端升的一个学生”云：

【钱端升是中国知名的法学家，当年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培养过许多学生，这些人后来多数成了中国法学界的名教授，比如龚祥瑞、楼邦彦、王铁崖等。但也有一个学生不很知名，最近我为了完成一篇“反右”和“文革”时期学者自杀情况的论文，查阅了一些有关的资料，指导了钱端升还有一个学生叫田保生，他的经历正好能证明一个时代、一个知识分子的全部人生。关于田保生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很多，主要情况是从一位老外交官的回忆录中了解的，这

本书的名字是《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田保生当年曾和凌其翰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凌其翰说，田保生出身清华，是钱端升的高足，后来参加第一届高等外交官的考试，录取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欧美司工作，40年代末在联合国办事处工作。凌其翰对田保生的评价是：“为人质朴诚实，素为我所器重。他于返美前特到我寓辞行，谈到国内时局，竟呜咽失声。”凌其翰劝他：“你千万不要悲伤了，须知黑暗已到尽头，光明就在面前，到了关键时刻，必须果敢地行动起来，抛弃旧世界，追求新世界，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对于一个处于彷徨中的知识分子，凌其翰的这些话肯定影响了田保生。1948年，钱端升在美国讲学，许多人劝他留下来，胡适也劝过他，但钱端升还是放弃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回到了中国，不仅他回来了，还劝他的学生田保生也回来。学生一般都听老师的话，田保生毅然放弃了在联合国办事处的工作，奔归新中国。回来后在外交学会担任国际法的编译工作。凌其翰回忆说：“他埋首苦干，举凡奥本海国际法巨著，希金斯和哥仑伯斯合著的海上国际法等英文原著译成中文，都有他的一份辛劳。”可惜后来田保生和钱端升一样，都成了右派，十年浩劫中，田保生和妻子一同自杀，后来才获昭雪。从“反右”到“文革”，知识分子中夫妻自杀的情况很普遍，当钱端升知道田保生的遭遇后，他将是怎样的感受呢？我查阅了一些钱先生的传记资料，包括许多他的朋友和学生的会议文章，但都没有提到这件事，钱先生对他学生的命运，我想不仅是悲痛，而是一种无言的叹息。事已至此，还能说什么呢？】

——谢泳：《钱端升的一个学生》，载谢泳：《大学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142页。

1949年（49岁）

1月

北平和平解放，钱端升积极投身于新政权建设。

【1949年1月，终于迎来了北平的解放。】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8页。

2月13日

钱端升等接受新民主主义教育。

【（新华社北平十一日电）解放后的北平数万大中学生，正在热烈地学习革命理论和自由地组织各种社会活动。现在虽是寒假期内，北平各大、中学校内都挤满了学生。他们现在可以公开地赶制宣传品了。彩色的标语、画像，在北平城内到处飞扬。扭秧歌也不再被认为是“危险”的事。锣鼓声成天不绝，学生们正在教市内的职工们扭秧歌。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今年元旦新华社“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正被大量地复印着。小组讨论已成了学生们学习的主要方式。学生们非常关心时局的发展。北京大学曾召开时事座谈会，由钱端升、樊弘、许德珩等教授分别讲演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听讲学生达一万余人。一向钻在书本子里的学生也都出来参加活动了。清华、燕京两校同学参加集体生活的有百分之九十五。久遭国民党特务匪徒压迫的中国大学学生，更深感解放的欢快。他们已经成立了二十多个社团，自由地参加各种进步的活动。包括一百零七个单位，代表七万大中学生的北平市学生庆祝北平解放联合会，于一日正式成立后，现正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中法大学、铁道管理学院、汇文中学、贝满女中等十三个驻会学校，担负起领导全市大中学生的动员、组织、宣传、学习工作。】

——《北平数万大中学生 热烈学习革命理论》，载《人民日报》1949年2月13日。

3月4日

钱端升应邀参加了一个欢迎会。

【教授：张奚若、许德珩、陆志章、邓初民、庐于道、黎锦熙、钱端升、李达、费青、费孝通、裴文中、钱三强、曹靖花、黄国璋、萧采瑜、张

国藩。】

——《出席欢迎会者共一百二十人》，载《人民日报》1949年3月4日。

3月24日

钱端升等集会呼应世界和平大会。

【北平各大学教授张奚若、许德珩、黎锦熙、徐悲鸿、钱端升、罗长培、杨振声、俞平伯、陆志韦、吴晗、钱三强、费青、费孝通、严景耀、雷洁琼、向达、樊弘、曹清华、袁翰青、闻家驷、楼邦彦、李广田、钱伟长等一百一十四人，于昨（二十四）日下午三时在北京饭店举行茶会，讨论中国文化界拥护世界和平宣言及出席和平大会事宜，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亦被邀参加，茶话会由张奚若、许德珩、吴晗三位教授主持，首由张奚若教授致词：“由于美国帝国主义疯狂挑拨新的世界战争，世界和平正遭受着威胁，世界著名文化工作者已发起召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以粉碎新战争挑拨者的阴谋，我们北平的大学教授热烈拥护这一号召，坚决和全世界著名文化工作者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坚决地予新战争挑拨者以打击！”继由吴晗教授宣读中国文化界拥护世界和平宣言，全体出席教授一致拥护。董必武同志讲话指出：“苏联是世界和平的强大支柱，今天苏联和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即将全部完成，我们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亦即将获得最后胜利，全世界人民的政治觉悟也日益提高。拥护世界和平的力量是空前的强大，只要全世界拥护和平的力量团结在苏联的周围，一定能制止新的世界战争！”继有陆志韦、李广田、唐希风、严景耀、樊弘、袁翰青等教授讲话，一致表示反对美帝国主义挑拨新的世界战争，反对向爱好和平的苏联进攻的大西洋公约，拥护世界和平。最后全体到会教授一致推选张奚若、许德珩为北平教授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代表，并踊跃签名，中国文化界拥护世界和平宣言，当时签名者计有一百零四名。】

——朱汉：《北平各大学教授集会 响应召开世界和平大会 推选张奚若许

德珩出席巴黎大会》，载《人民日报》1949年3月25日。

4月4日

钱端升等声援南京血案。

【(又讯)南京惨案的消息引起了平市教授学生无限的愤怒。

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抗议，认为这一血腥的屠杀证明了国民党反动派所谓“和平”是一种地道的阴谋，证明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人民是怎样渴求脱离国民党反动黑暗统治，渴求和平，又是怎样英勇地为真和平而斗争。“四一”的血债必须写在一定要严惩的战犯的账上。清华同学一听到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这一暴行，马上贴出海报：“反动派一日不消灭，这血腥的行为一日不会终止！”费孝通、李广田教授除对国民党一贯的残暴手段表示愤怒外，还指出：“这是反动派对和平没有诚意的表示。在北平进行的谈判，非要坚决根据毛主席的八项条件不可，绝不能放松一步。”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三校政治系师生正举行联欢会，会上钱端升、楼邦彦等十三名教授和同学，一致通过除对南京同学表示支援和慰问外，誓以行动来支援，粉碎假和平的看法。学生自治会也发出了抗议书。

师范大学自治会、铁道管理学院自治会，发出了同样愤慨的抗议书，要求血债血还，严惩凶手。燕京大学火炬社、改造社等社团及新闻系等纷纷贴出壁报，支持南京同学的正义英勇行动。

师大附中同学的一个同学悲愤地说：“读到这恐怖的消息，一字一针地刺痛了我的心，反动派假和平的面具破了，露出了残破的刀枪剑戟，他害了我们无辜的青年同伴，也就是把一笔新仇加在我们的旧恨上，我们一齐举起拳头，拥护真和平的口号会喊得更响，苟延残喘的杀人刽子手，你们的末日到了，多放一枪，就多一笔债，不要忘了血债是要血还的。”汇文中学的一个学生说：“国民党反动派前面吃斋，后面动刀，耍他妈的什么把戏骗人。”北平学生是遭受过血的教训，再也不会上当的了，正如男一中、二中的同学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要受它（指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骗

啊，它的假和平的诡计现在被它的血手所揭穿了。”此外，铁道管理学院、市立一中、市立二中、汇文中学的师生在惨案发生后均有类似的行动和表示。】

——《平市工人学生教授们 愤怒抗议南京血案 持惩办杀人的战争罪犯 全部实现毛主席八项条件 血债要用血来还!》，载《人民日报》1949年4月4日。

4月8日

钱端升等中国文化界人士发表宣言，响应召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

【（新华社北平八日电）中国文化界发表宣言，响应召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原文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未及四年，酷刑的战祸还未完全消灭，多数被压迫民族尚在争取解放独立和平民主而作着流血斗争，狂妄的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又在鼓噪着新的世界战争了。

在二次大战中，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尽了最大的力量，击溃了法西斯轴心联盟，拯救了全世界人类。这一丰功伟绩，在世界史上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坐享其成，在战争中获得了暴利的美帝国主义，在战争结束后，却一反手便以苏联和全世界争取人民民主的进步集团为自己的敌人，到处扶植反革命势力压迫人民，庇护法西斯的德国和日本的重建，以供自己的爪牙，扩充广泛的军事基地网，拒绝与苏联进行和平谈判，拒绝裁军，拒绝原子武器的禁用和原子能的管制，蹂躏联合国的宪章，岌岌不可终日地策动各种各样海盗式的联盟，所谓西欧联盟，泛美集团，地中海国家公约，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公约，北大西洋公约，太平洋公约，向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伸出了巨大的魔掌。

新战争的威胁，的确是存在着。全世界又划为了两个森严的营垒，一边是承继了法西斯衣钵的以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一边是争取人民民主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集团。侵略与和平不能两立，我们为了保卫和平，必须坚决地

反对侵略。我们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百年以来不断地进行着残酷的流血斗争。远者且不必缕说了，近者我们以八年的艰苦抗战击溃了日本帝国主义。但不期前门去虎，后门进狼，日本帝国主义刚被击溃，而美帝国主义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位置，全力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唆使从事反革命内战，悍然在我国境内驻兵并建立海陆空军事基地，更积极扶植日本反动派，使其复兴。三年以来，我中国人民的处境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无法享受和平的幸福。美帝国主义的倒行逆施，唯利是视，我们中国人民正为之受着切肤之痛。我们中国人民正因为渴望和平，故不能不扫除和平障碍，以全力从事革命战争。我们必须肃清国内的反动派，并视美帝及一切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为我们当前的死敌。

我们在三年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基本上击败了美帝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全面胜利的到来为期不远了。我们正为着和平幸福的行将实现而感受无限的振奋，我们决不愿行将获得的和平重受威胁，更不愿在和平中喘息未定的全世界各兄弟民族重遭惨酷的战祸。故我们中国人民正感受着负有双倍的责任。我们一面以革命战争争取本国的和平，一面更必须保卫世界的和平。中国的和平如能赢得，世界的和平也就得到了一重保障。世界的和平得到保障，中国的和平也就可以长久持续了。我们坚决地相信：这双重的目的是可以达到的。我们中国人民愿意与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团结奋斗。全世界的人民都不需要战争，需要战争的只是少数贪得无厌的战争贩子，全世界的人民不仅有保卫和平的希望，而且有保卫和平的实力。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二次大战后，东欧已成立了多数人民民主的国家，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国家内被压迫人民，已有了高度的觉醒和组织，只须加强团结，积极斗争，已有充分的力量可以克服战争的危机。而在另一面，帝国主义国家在二次大战后已逐一衰微，未受战祸的美帝国主义虽然嚣张跋扈，不可一世，但实外强中干，遭遇着严重的内在矛盾。疯狂的战争挑拨者们，妄想以战争维持其繁荣，以“援助”掩饰其侵略，实不啻饮鸩止渴，自掘坟墓。任何狂暴的帝国主义，我们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任何

险恶的军事侵略和政治阴谋，我们相信是可以粉碎的。我们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三年内战中已经获得了充分的经验。我们相信，美帝国主义终不外重走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而已！因此，我们中国人民要坚强地加入保卫世界和平的行列，我们要以总力来克服新战争的危机。

是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正积极发动着。伟大的苏联人民领袖斯大林，于本年一月三十日和二月二日，叠次宣示了坚定不移的和平政策，表示苏联愿与美国协商，并表示愿意与杜鲁门会晤。不幸这些受全世界热烈赞扬的提示，竟遭受了美帝的拒绝。一月二十六日，苏联外交部关于北大西洋公约已有详尽的声明发表，彻底地揭露了侵略集团的战争诡计。各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最近也均有反对新战争的热烈的声明发表，保卫和平的呼声已响彻全世界了。今天正是我们应该巩固阵营，检阅力量的时候。我们很兴奋读接了二月二十四日世界文化工作者保卫和平大会国际联络委员会、国际妇女联合会、和著名的文化、科学、艺术工作者联合发表的宣言，提议在本年四月召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我们对于这一建议，站在文化工作的岗位上，愿表示彻底的支持。我们决计派遣我们的代表参加大会，借以表达我们全中国人民的意志，贡献我们的经验和力量，坚决地迎接战争挑拨者的挑战。伟大的苏联人民领袖斯大林的声明就是我们今天的火炬：“上次战争的惨象，各国人民的记忆犹新。主张和平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对进行侵略的邱吉尔门徒们来说，是如此的强大，他们战胜不了这种力量，不能将这种力量转向新的战争去。”是的，人民力量是无比强大的！我们坚决地相信，只须要全世界保卫和平的力量，加紧团结，提高警觉，不受虚声恫吓，彻底实事求是，为了反对侵略贡献我们一切的智慧，发挥超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战争的危机是一定可以克服的。谁如要狂妄地发动新的世界战争，我们要和我们强大的盟友，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和一切兄弟民族，紧结成一条战线，像在二次大战中粉碎了德意日轴心国家一样，把一切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们连同着战争，一道送进坟墓里去！

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力量团结起来！

以坚强的自信消灭战争!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

打倒新法西斯——美帝国主义!

全世界人民民主胜利万岁!

签名者:(以姓氏笔划多少为序)

丁瓚、千家驹、于力、于世胄、于鸢天、王春、王亢之、王汝弼、王冶秋、王金璐、王芸生、王纯方、王炳照、王绍先、王达仁、王钧衡、王鸣祯、王遵明、王宪钧、王临乙、王铁崖、孔德祉、戈宝权、方亮、方与严、申又彬、史林、史国衡、白家麟、田汉、田公炜、田保惠、古维进、向达、江横、伊葆芳、安岗、安娥、朱九思、朱玉安、朱世民、艾青、艾中信、汪暄、汪子齐、何其芳、何其超、何星海、何海生、杜任之、沈元、沈同、沈重、沈湘、沈三玉、沈志远、沈金波、沈宝基、沈体兰、祁开智、沙可夫、宋云彬、宋镜羸、吴晗、吴之椿、吴作人、吴恩裕、吴荣培、李麦、李伯钊、李军、李钧、李桦、李翼、李千峰、李可染、李丕济、李光荫、李苦禅、李宗义、李金泉、李金鸿、李亚群、李贯英、李绍鹏、李景均、李瑞年、李广田、李德滋、李宪之、李继侗、邢其毅、余逊、余心清、余冠英、余嘉锡、尚玉、芮沐、林庚、林洪、林朗、林耀华、周游、周扬、周令钊、周作仁、周建人、周培源、周洁夫、金岳霖、季陶达、季羨林、洪深、胡绳、胡笛、胡风、胡世华、胡愈之、茅盾、柳亚子、柳湜、计鸿宽、范瑾、范志超、范长江、殷学复、俞敏、俞平伯、施复亮、韦江凡、韦启美、孙一青、侯外庐、孙宗慰、孙昌煌、孙承佩、孙承诺、孙起孟、孙国华、孙云铸、孙楷第、孙毓棠、唐钺、唐兰、唐长风、唐远之、宦乡、高玉倩、高名凯、浦江清、马叙伦、马彦祥、梁小鸾、梁思成、夏康农、袁勃、袁震、袁志诚、袁牧之、袁复礼、袁翰青、徐愈、徐英超、徐悲鸿、徐铸成、翁偶虹、翁独健、殷野、殷金振、殷葆茶、容肇祖、张维、张子高、张宗炳、张志让、张岱年、张星烺、张宗贤、张席禔、张云波、张景钺、张汉槎、张维正、张龙翔、陈桢、陈占元、陈兆衡、陈此生、陈定民、陈其璜、陈叔通、

陈波儿、陈新民、陈家康、陈梁生、陈瑾昆、陆宗达、陆志韦、章容、曹禹、曹本熹、曹靖华、常任侠、黄卓明、黄国璋、黄维德、黄警顽、黄觉非、黄丽泉、许广平、许德珩、许维通、屠守锷、盛家伦、梅龚彬、劳君展、冯至、冯法祀、冯景兰、郭沫若、郭毓彬、费青、费孝通、傅彬然、傅种孙、汤用彤、汤佩松、游国恩、曾觉之、焦菊隐、华世香、杨赓、杨刚、杨人梗、杨兆麟、杨秀峰、杨振声、邹佩珠、闻家驷、叶丁易、叶浅予、叶圣陶、叶麟祥、董希文、董渭川、雷洁琼、雷镇邦、楚图南、廖泰初、楼邦彦、赵人俊、赵承信、赵访熊、赵紫宸、赵诒熊、赵超构、赵德勋、赵锡麟、赵树理、刘文、刘白羽、刘仙洲、刘育和、刘念渠、刘俊峰、刘尊棋、刘炽晶、樊弘、郑昕、郑之蕃、郑天挺、郑守燕、郑佩宜、郑振铎、邓之诚、邓以蛰、邓初民、潘光旦、蒋兆和、蒋风之、蒋荫恩、鲁世英、鲁宝重、翦伯赞、黎锦熙、钱三强、钱俊瑞、钱伟长、钱端升、卢于道、冀贡泉、薛愚、韩寿萱、戴浩、戴泽、戴文赛、戴爱莲、瞿希贤、罗当培、严仁荫、严景耀、萧淑芳、龚祥瑞。】

——《中国文化界发表宣言，响应召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载《人民日报》1949年4月9日。

5月4日

钱端升接受采访，回忆五四运动。

【北大政治系教授钱端升说，三十年前的“五四”，我正在清华高等学堂四年级读书，“五四”运动我是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是五月四日下午的事，我们清华同学五五才进城的，贴标语与北平学生会联系。整个的五月都是在动荡中，五四运动当时在北平有两个高潮，六月三日清华学生全体进城游行宣传，这次被捕的人很多，光清华就有二十多人，被关在北大理科大楼里，后来又一起关到北大法科大楼（现在的三院），被监禁的一共有一千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一直到八号我们才由清华全体同学迎接回校。六月十五日在上海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北平也派代表许德珩等出席。

最后，钱先生说，三十年来，就青年知识分子比较，五四时领导人太看重自己，因此当时学生运动搞的不够普遍，今天的学生运动要比较坚实多了。】

——柏生：《几个“五四”时代的人物访问记》，载《人民日报》1949年5月4日。

5月5日

钱端升参加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座谈会。

【（本报讯）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于五日下午三时假北京饭店举行学术界座谈会，到有梁希、范文澜、马叙伦、汤用彤、陆志韦、沈志远、严济慈、袁翰青、张志让、沈体兰、曾昭抡、周建人、胡先骕、潘菽、胡愈之、黎锦熙、杨振声、杨人楩、李宗恩、张子高、吴晗、夏康农、钱端升、费孝通、樊弘、费青、钱伟长、向达等学术界人士共二百余人。周恩来同志亲临讲话，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盛会。座谈会开始，周扬同志致开会词后，前南京中央大学农林学家梁希讲话称：科学界愿意学习革命理论，希望人民政府组织科学界为人民服务，并实行计划科学，沈志远先生报告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工作概况后，周恩来同志在掌声中讲话，他详细地讲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和教训，分析了新民主与旧民主的区别，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最后，鼓励学术界、科学界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工作，使科学真正为人民服务。之后，袁翰青教授报告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情况，并提出筹备召开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建议，继有樊弘先生、范文澜同志讲话，至七时散会。】

——《中国学术界举行盛会 周恩来同志讲话 鼓励参加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工作》，载《人民日报》1949年5月6日。

5月6日

钱端升被任命为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委以及北大法学院院长。

【（本报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三校自北平解放，经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以来，迄今已历数月，各校接收工作，早告完竣，管理与改革亦逐步进行。训导处已一律取消，训导人员均已分别安置与处理。各校课程为适应新的需要已开始实行某些改革，例如北大法律系取消十三门旧的法律课程，增加五门新的课程；清华的社会调查一课，用新的方法在海甸进行农村调查。各校性质相同的各系，均已分别举行联席会议，讨论课程教学方法等问题。

各校已决定开设政治课，北大已实行每周革命理论的系统讲演。关于院系调整及学制等问题，各校师生均展开讨论。各院系与有关机关亦逐渐发生联系，如北大医学院与卫生部门，清华北大理工学院与企业部门等，均已有业务上的联系。师大自市立体专、中国大学理学院等并入该校以后，校务亦有所改进。各校教授对改进课程教学表示热心。学生除文法学院有多人参加南下工作团及投考华大革大等校外，现在人数，北大有二千三百六十六人（文法学院九四七人，理、工、农、医学院一三四二人，专科生等七七人），清华有一千八百二十四人（理、工、农学院一四〇二人，文法学院四二二人），师大有一千三百〇八人。学生学习政治及业务的情绪普遍提高，并开始采用新的学习方法，如小组讨论等。职员工警也都组织了学习。各校薪金及人民助学金已经公布调整。文管会为加强各校的集体领导，以便更有力的推行与改进校务，特决定三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提请任命汤用彤等二十三人、叶企孙等二十一人、黎锦熙等十九人分别为北大、清华、师大三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同时并发表各校新的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及图书馆长等行政负责人选，其名单如下：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单

汤用彤（常委兼主席）、许德珩（常委）、钱端升（常委）、曾昭抡（常委）、袁翰青（常委）、向达（常委）、闻家驷（常委）、费青、樊弘、饶毓泰、马大猷、俞大绂、胡传揆、严镜清、金涛、杨振声、郑天挺、俞平伯、郑昕，讲助教代表二人（中一人为常委），学生代表二人（中一人为常委），

共二十三人。教务长曾昭抡，秘书长郑天挺，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理学院院长饶毓泰，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工学院院长马大猷，农学院院长俞大维，医学院院长胡传揆，图书馆馆长向达。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名单

叶企孙（常委兼主席）、陈岱荪（常委）、张奚若（常委）、吴晗（常委）、钱伟长（常委）、周培源（常委）、费孝通（常委）、陈新民、李广田、施嘉炆、汤佩松、冯友兰、戴芳澜、刘仙洲、屠守锷、潘光旦、张子高，讲助教代表二人（中一人为常委），学生代表二人（中一人为常委），共二十一人。教务长周培源，秘书长陈新民，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学院院长陈岱荪，工学院院长施嘉炆，农学院院长汤佩松，图书馆馆长潘光旦。

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名单

黎锦熙（常委兼主席）、汤噪真（常委）、陈兆衡（常委）、傅种荪（常委）、郝人初（常委）、张云波、焦菊隐、黄国璋、董渭川、王汝弼、叶丁易、鲁宝重、徐英超、李俊甫、武兆发，讲助教代表二人（中一人为常委），学生代表二人（中一人为常委），共十九人。教务长傅种荪，秘书长陈兆衡，文学院院长焦菊隐，理学院院长黄国璋，教育学院院长董渭川（代理），图书馆馆长张云波，附校委员会主席兼附中校长郝人初。

各校新的校务委员会成立以后，即依新的行政机构进行工作。文管会原派驻各校军管代表及联络员同时撤销。】

——《平市北大清华师大三校 新校务委员会成立 各校行政负责人亦同时发表》，载《人民日报》1949年5月6日。

5月14日

胡适日记附5月10日《大公报》三则剪报，其中一则宣布共产党对大学的接管后大学改革的进行。其中和钱端升有关者：

【各种课程已开始实行某些必要及可能的改革。北大法律系已取消十三

门旧的法律科目，增加五门新的科目。清华的社会调查一科，改为在附近进行农村调查。各校性质相同的各系，均已分别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改进课程与教学法等问题。各校已决定增设政治课，北大每周有关于革命理论的系统讲演。关于院系调整及学制等问题，各校亦在进行研讨中。】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8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02页。

【（新华社华北八日电）北平军管会所属文化接管委员会为将强各学校的集体领导，以便更有力地改进校务，特决定于北京、清华、北平师范三所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并拟定打散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及新的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及图书馆馆长等行政负责人选，提请主管机关批准。各校新的校务委员会成立以后，即依新的行政机构进行工作，文管会原派驻各校军管代表及联络员均同时撤销。各校校务委员、教务长、各院院长、图书馆馆长等的名单如下：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汤用彤（常委兼主席）、许德珩、钱端升、曾昭抡、袁翰青、向达、闻家驷（以上六人为常委）、费青、樊弘、饶毓泰、马大猷、俞大绂、胡传揆、严范清、余涛、杨振声、郑天挺、俞平伯、郑昕。讲助教代表二人（中一人为常委）、学生代表二人（中一人为常委）。教务长曾昭抡，秘书长郑天挺，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理学院院长饶毓泰、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工学院院长马大猷，农学院院长俞大绂、医学院院长胡传揆，图书馆馆长向达。】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8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03页。

5月17日

钱端升主持参加法学院教育方针座谈会。

【（本报北平讯）北大、清华、燕京三校法学院于十七日下午二时假北大子民堂举行法学院教育方针座谈会。出席沈钧儒、王明、周扬、谢觉哉、

何思敬、陈瑾昆、李木庵、张曙时、杨绍萱、王斐然、沈志远、南汉宸、郭任之、王笑一、章乃器、左宗纶、冀贡泉、张志让、费青、芮沐、陈芳芝、曾炳钧、王铁崖、楼邦彦、钱端升、陈岱荪、刘炽晶、饶毓苏、赵人俊、戴世光、千家驹、赵乃搏、樊弘、陈振汉、赵承信、林耀华、严景耀、雷洁琼、潘光旦、陈达等四十人。

由钱端升主席，他检讨过去大学法学院教育的缺点是：观点不正确，对社会需要缺乏合理的配合，教材多偏于外国的东西，与中国实际脱节；说明今后应采取有效的方式，矫正以往的缺点，确立正确的教育方针。

接着各出席人热烈发言。

周扬

周扬说明今后大学教育应密切配合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需要，不但为国家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并且要组织现有专家各以自己的专门学识来积极参与国家当前的建设工作，并在自己教学研究工作中获得新观点、新方法。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与基本政策的知识，在大学教育中应有其一定的位置，这全靠党与非党的学术工作者在这方面共同努力。

沈钧儒

沈钧儒主张教育方针一定要切合实际需要，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学来的东西能够实用。

王明

王明对法律系教育方针，提供了许多意见，他说北大法律系废除十三种旧课程，新开五门课程，是正确的、适时的。新开的五门课程代表了一个方向。即是表示师生们选择了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方向。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各学院都可以学习的。此外，法律系还要学习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知识与各种法律知识，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司法制度与司法技术知识，学习新法律原则。同时必须进行对旧法律批判，学习新的法律理论。必须与人民政府的立法工作与司法工作实

践密切联系起来。他建议发起组织新法学研究会，团结平津及全国法学界以及一切愿意研究新法学的人们做研究新法学的工作，协助人民政府的立法和司法工作，并在人民中帮助政府进行普及法律知识工作。

陈瑾昆

陈瑾昆讲了自己到解放区后的见闻及自己经过自我学习及亲身实践后思想的改变。他说法律服从政治。法律是保护阶级利益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意义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少数反动分子。新法律的目的是为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服务。

张志让

张志让认为现在大家一方面要吸收新思想，建立新观点，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发挥过去所学的东西，使之能为新社会服务。陈达、赵承信、芮沐、王铁崖、严景耀诸教授各就法学院各系有关问题提出意见。樊弘提议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以加强教授的自我学习。谢觉哉、南汉宸作了有关司法与经济的发言。会上当场发起组织新法学研究会，签名参加发起者极为踊跃，当推定张志让、冀贡泉等参加筹备，并由王明负责召集筹备会。此外，并推定钱端升、樊弘、费青、沈志远等筹组马列主义研究会事宜，以樊弘为召集人。】

——《北大清华燕京三大学 座谈法学院教育方针 王明周扬同志均出席讲话 筹组新法学及马列主义研究会》，载《人民日报》1949年5月19日。

5月22日

钱端升参加新教联成立大会。

【（本报讯）北平院校教授研究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于前（二十二）日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这个会议代表着北平十五个院校与研究所的七百余名大学教授及研究员，这是北平教授空前大团结的一次盛会。在这个会上正式成立了北平院校教授研究员联合会（简称为北平教研联）。出席此次大会

的代表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辅仁大学、铁道管理学院、协和医学院、北平研究院、私立中法大学、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北平私立铁路专门学校等十一个单位（燕京大学、华北大学、人民革命大学、地质研究所等四单位代表缺席），共到张子高、费孝通、费青、钱端升、楼邦彦、冯至、罗常培、焦菊隐等二十九人。会中推选清华大学教授张子高为临时主席，北京大学费青教授为书记。首由北大教授钱端升报告筹备经过，他说，这次代表大会是由北大、清华、师大、燕京四校联合发起的，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大家既为北平教授应首先坚强地连系起来，建立一个健全的组织。到会代表热烈讨论了会章，每个教授都是极其认真地发言。最后通过会章如下：

北平教研联合会章

（一）定名为北平院校教授研究员联合会。（二）该会以联络感情，共谋福利，研究学术，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宗旨。（三）凡北平各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的专任教授与副教授及专任研究院、研究所的研究员与副研究员（或同等职位者）均得通过各该组织单位为该会会员。（四）组织：代表大会：以各院校教授会或教授联谊会、各研究院、研究所研究委员会等为组织单位。各单位每二十人得推代表一人，不满二十人者以二十人论。由所推代表组织代表大会，为该会最高权力机关。每半年开会一次，于必要时得由干事会或代表十人以上之提议召开临时大会。代表任期由各该单位自行规定。干事会：由代表大会互选干事七人组织之，任期一年，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处理一切会务。干事会设书记、总干事各一人。由干事互推之。（五）会费：各单位根据会员人数缴纳会费，每一会员半年暂定缴纳会费小米一斤。会上并票选北大二人，清华、燕京、师大、北平研究院、辅仁各推一人为干事会干事。最后并决定在六月初举行一次全体会员庆祝教研联成立的联欢大会，并发表成立宣言，同时发表抗议法国政府迫害居里教授书。】

——柏生：《平各院校教授研究员 成立教研联》，载《人民日报》1949年5月24日。

胡适给赵元任夫妇信中提及钱端升：

【香港《大公报》五月十日登出北平三大学（北大、清华、师大）已组成校务委员会，北大是汤用彤主席，另常务八人，其中学生代表一人，助教代表一人，余六人为许德珩、钱端升、曾昭抡、袁翰青、向达、闻家驷。

.....

周枚荪已辞去法学院，端升代他。】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094页。

5月25日

钱端升等前往北平车站，迎接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归来。

【（新华社北平二十五日电）北平市工人、学生、各界市民及卫戍北平的人民解放军约十万人热烈欢迎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胜利归国的中国代表团。代表团郭沫若、马寅初等一行三十七人，于本日（二十五日）下午五时由沈阳乘专车经天津返抵北平（代表团副团长刘宁一已于日前先期抵平，代表钱俊瑞、陆瑾、吴青留欧洲，丁玲、古元留东北）。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维汉等，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黄炎培、蔡廷锴、马叙伦、茅盾、彭泽民、李章达、李锡九、吴晗、钱端升等，各人民团体代表李立三、蔡畅、周扬、冯文彬等及北平市叶剑英市长、平津卫戍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暨平市各界人民代表二千余人，前往北平东车站欢迎。代表团在悠扬的音乐声中下车。各界人民代表纷纷趋前与代表团各位代表握手，向代表团献花，并高呼欢迎口号。代表团下车后，即由各界人民代表陪同前往天安门，参加平市约十万群众的盛大欢迎会。会场正中、天安门的城楼上飘扬着十面大红旗。城墙上，在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像之间，悬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绿底白鸽的会徽。当代表团莅场时，欢迎代表团胜利归来的口号声与掌声经久不息。欢迎大会在九门大炮齐发四十五响的礼炮声中开始。首由叶剑英市长及平市职工会筹备会主任萧明

代表北平人民和人民团体致词，欢迎代表团胜利回国，并庆祝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伟大成功。

继由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副团长马寅初及代表张奚若、许德珩、李德全、萧三等讲话。

郭沫若在雷动的掌声和欢呼中讲话。他说：我们这次能胜利归来，是英明的人民领袖毛主席，英勇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和努力生产支援前线的全解放区的同胞给予我们的，一切的胜利和光荣，属于人民和属于人民领袖毛主席。接着他叙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所给予和平大会的极大鼓励，他说：全世界的人民把中国的胜利当成自己的胜利，当成争取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他继又介绍了代表团此次途经和平堡垒苏联时所见苏联的伟大的和平建设以及参加苏联“五一”劳动节的盛况。最后他说：我们的重大工作还在后面，我们要遵守大会的宣言和决议，在和平堡垒苏联领导下，用全中国人民的力量来和全世界人民密切合作，争取和平事业最后的成功。

代表团副团长马寅初在讲话中说，在这次大会上，充分证明了中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特别是予今天正在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战斗的各民族以极大的鼓励，给予他们增加了无限的勇气和信心。他介绍了世界人民对我国代表的热烈欢迎及对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衷心爱戴的情形，曾经有位非洲代表说：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而且是非洲人民的救星。

张奚若在讲话中着重说明：这次大会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贩子们的一种示威，世界人民表现了空前团结与伟大的力量。大会的成功是初步的成功，我们还要把大会的决议逐步实施，把保卫和平的组织推广到全中国。

许德珩讲话时叙述了和平代表团出国期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使代表团受到了无比的荣誉，使中国人民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他说明争取世界和平与我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一致性，中国真正的和平如不能实现，远东的和平就没有保障。因此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必须把中国的革命战争进

行到底。

李德全在讲话中叙述了苏联与各新民主国家、各殖民地国家的妇女姊妹们对我国妇女的英勇奋斗，表示欣慰和敬佩。

萧三在讲话中说明和平大会决定成立永久委员会，以动员及联合一切和平的力量，来保卫世界和平，中国人民应在永久委员会领导下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最后全场高呼口号，大会于八时散会。】

——《我和大代表团胜利归来 平十万人盛会欢迎》，载《人民日报》1949年5月26日。

6月1日

钱端升被任命为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

【（平市讯）华北人民政府为统一实施高等教育方针、计划，指导学术改进及图书文物之管理，决定设立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已于六月一日颁布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组织规程”（附后），并任命董必武为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奚若、周扬为副主任委员；董必武、张奚若、周扬、马叙伦、李达、许德珩、钱俊瑞、曾昭抡、吴晗等九人为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郭沫若、吴玉章、徐特立、马寅初、黄炎培、范文澜、成仿吾、邓初民、张志让、汤用彤、梁希、郑振铎、钱端升、蓝公武、杨秀峰、叶企荪、陈岱荪、陆志韦、张东荪、雷洁琼、黎锦熙、徐悲鸿、李宗恩、严济慈、裴文中、晁哲甫、于力、刘鼎、乐天宇、恽子强、胡锡奎、周泽昭、沈体兰、黄松龄、张宗麟、张子丹、张国藩、邓拓、俞大绂、冯乃超为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张宗麟为该会秘书长。】

【（平市讯）华北人民政府于六月一日公布，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组织规程，原文如下：

第一条：华北人民政府为统一实施高等教育方针、计划，指导学术改进

及图书文物之管理，设立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

第二条：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由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二人，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暨委员四人至六人组织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由华北人民政府任命之。

第三条：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设秘书长一人，承主任委员之命，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秘书长由主任委员提请华北人民政府任命之。

第四条：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每两月开会一次，常务委员会每半月开会一次，由主任委员召集之。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

第五条：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之职权如左：

- 一、关于高等教育方针政策之拟定事项；
- 二、关于大学、专门学校暨学术、图书、文物机关之设置指导等事项；
- 三、关于国立及华北设立之大学、专门学校暨学术图书文物机关之组织编制、经费审核、人事管理等事项。

第六条：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设下列各处室：

- 一、秘书室；
- 二、高等教育管理处；
- 三、图书文物管理处；
- 四、研究室。

第七条：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得视工作需要，组织各种专门委员会。

第八条：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办事细则，依华北人民政府办事通则另订之。

第九条：本规程如有未尽事宜，由华北人民政府修改之。

第十条：本规程自公布之日施行。】

——《统一实施高等教育方针 华北高等教委会成立 董必武张奚若周扬分任正副主委》，载《人民日报》1949年6月3日。

6月6日

钱端升参加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首次集会。

【（本报讯）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昨（六日）在六国饭店举行第一次会议，到会董必武、张奚若、周扬、马叙伦、李达、许德珩、曾昭抡、吴晗、郭沫若、吴玉章、徐特立、马寅初、范文澜、成仿吾、邓初民、张志让、汤用彤、郑振铎、钱端升、蓝公武、杨秀峰、叶企荪、陈岱荪、陆志韦、张东荪、雷洁琼、黎锦熙、徐悲鸿、李宗思、严济慈、裴文中、晁哲甫、于力、刘鼎、乐天宇、周泽昭、沈体兰、黄松龄、张宗麟、张国藩、俞大绂、冯乃超等四十二位委员。会上正副主任委员董必武、张奚若说明了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的意义与任务。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扬与黄松龄委员，分别报告平津各大学接管以来工作进行情况。继就大学学制、课程改革、私立大学之管理、秋季招生、本期各大学毕业生训练与分配等工作，广泛交换意见，讨论甚为热烈。会议一致同意授权常委会对所讨论诸问题继续研究并分别筹组各种专门委员会，提交将于最近召开的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以利工作进行。】

——金凤：《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首次集会讨论学制等问题》，载《人民日报》1949年6月7日。

6月8日

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常委会议决钱端升等负责学制改革。

【（本报讯）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于昨（八）日下午三时召开首次常务委员会议。出席常委董必武、张奚若、周扬、马叙伦、许德珩、曾昭抡、李达、吴晗及秘书长张宗麟等。会中主要决定：

（一）成立华北国立大学招生委员会。原则上规定统一领导、分别招生，自愿联合招生者亦可。责成招生委员会拟订具体办法。

（二）为加强平津各大学本届毕业生政治教育及便于统一分配工作，决定成立平津各大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

（三）为研讨有关私立各大学问题，决定设立私立大学研究委员会，并推定马叙伦、张志让、陆志韦等九人组成。

(四) 为研讨文、法、教育学院学制课程改革事宜, 决定组织历史、哲学、文学、法律、政治、经济、教育等七组分别进行, 并推定范文澜, 艾思奇、周扬、何思敬、钱端升、李达、张宗麟七人为以上各组召集人。

(五) 筹组文物保管委员会推定专人负责进行。】

——柏生:《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 常委决议五项工作 统一招生及研讨改革学制等》, 载《人民日报》1949年6月9日。

6月11日

钱端升等参加北平市教职联筹委会。

【(本报讯) 北平各院校教研联、教职联筹委会、新文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 筹委会等三团体为筹备成立北平市专科以上院校教职员联合会, 昨(十一)日下午三时假中共北平市委办公室举行联席会议, 出席教研联吴晗、钱端升、罗常培、费青、杨宗翰、柴德赓、教职联筹委会谭元堃、楼邦彦、赵承信、王玠、魏真、王序、卢念苏、张澜庆、赵琏、黄有莘, 新文建筹委会陈定民、陈明绍、许京骥、裘克安、于效谦、蔡善昌、尹绍鸿、邓艾民、杨贵贞等二十五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同志也被邀参加。首先由谭元堃宣布开会, 并提议教研联吴晗为主席。继由主席吴晗报告开会意义后, 各团体相继发言, 都感到今天各院校的教授、讲助、职员间的团体分散重复。为了增进彼此间的团结, 一致同意由到会三团体联合发起筹备本市专科以上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并就其组织性质、成分, 及筹备步骤展开讨论。钱端升、费青、陈定民、赵承信、许京骥、陈明绍、张澜庆、吴晗、谭元堃、赵琏等相继发言。

关于联合会的性质, 大家都认为应是过渡到成立职工会的一个组织。彭真同志亦说明“脑力劳动者的教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它的联合组织, 将来应该参加总工会”。

关于会员入会的自愿原则问题, 会上有热烈的争论,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 这一组织的最后目标, 应争取各院校全体教职员参加, 但个别不愿参加

的，不应勉强。

至于公认为不能参加的反动分子，应该拒绝其加入。关于组织形式与筹备步骤，经初步交换意见结果，一致同意各院校应有教职员联合会，并以之为基础组织平市总的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同时通过由各校教授会、讲助会、职员会，各派代表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其筹备工作。并决定昨日与会的三团体负责人为当然筹备委员，另推吴晗、许京骐、谭元堃三人为下次会议召集人。负责邀请未与会各单位推派代表参加筹备工作。并定于下星期日（十九）日上午九时在北大子民堂举行第一次筹备委员会。各与会代表将返校广泛征求同人意见，带至会上讨论，以作更进一步的决定。】

——超祺：《平市三教职员团体开联席会 筹组专科以上教职联 彭真同志指出该组织应参加总工会》，载《人民日报》1949年6月12日。

6月19日

钱端升参加北平教职员联合会第一次筹备会，并当选为筹备会委员。

【（本报讯）北平市院校教职员联合会筹委会，昨天（十九日）上午九时在北京大学子民纪念堂召开第一次筹委会议，讨论各院校教职员联合会的组织范围、组织程序，并选举筹委会常务委员进行经常工作等。到会共有华大、清华、师大、北平研究院、燕京、北大、辅仁、中法、艺专等十五个院校，共四十六位委员。

由吴晗主席，会中决定，教职员联合会的组织范围，包括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教员、职员、工警、除少数反动分子外，会员在自愿原则下参加。并决定除此会出席之四十六位委员外，增聘吴玉章、刘澜涛、汤用彤、许德珩、张奚若、叶企孙、陆志韦、黎锦熙、徐悲鸿、乐天宇、陈凤桐十一人为筹备委员。此外推选十八位常务委员，当选者有：吴晗、许京骐、张澜庆、杨宗翰、赵承信、翁独健、卢念苏、王玠、钱端升、罗常培、费青、杨贵贞、沈承昌、谭元堃、尹绍鸿、何戊双、温宏庚、王序。吴晗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常委会分为秘书处、联络部、学习部、康乐部四部。分别由

四位副主席罗常培、许京骐、何戊双、张澜庆担任之。筹委会之经费由出席筹委酌量向各该校暂借。常委会将发通告使各院校尽快成立教职员联合会筹备会，组织方式自行决定，并由筹委们用最大努力促成各校迅速成立。俟各院校成立教职员联合会已在三分之二以上，及各院校参加人数达三分之二以上时，即宣布教职员联合会成立，并结束筹备会。】

——纪清：《平教职员联合会筹委会首次会议 讨论组织工作 增聘吴玉章等为筹委 选出常委会进行经常工作》，载《人民日报》1949年6月20日。

6月26日

钱端升参加新法学研究会发起人集会，被推选为委员。

【（本报特讯）中国新法学研究会发起人大会于六月二十六日假华北人民政府会议厅召开。发起人九十余人，除原尚未至北平者外，几乎全体到会（全部发起人名单附后）。会议日程是：（一）报告开会意义；（二）报告及讨论暂行简章草案；（三）推举筹备委员会。会议由沈钧儒主席，并报告开会意义，他说明：“新法律的建设，目前已十分迫切，我们在军事上已经把反动军队打垮，但为了要有一个巩固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和安宁的社会秩序，就需要建立人民自己的法律。”他着重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需要新法律，必须要有新的观点，才能创造真正为人民所需要的法律。”因此，他号召一切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们，尤其是学过反动的六法全书的人们，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社会观、国家观与法律观，认真地研究新法学，批判旧法学，以便改造自己的思想，为人民服务。他指出：新法学研究会的发起，正是为使法学界同人能有各种自我学习研究的机会。继由陈绍禹报告中国新法学研究会暂行简章草案（简章草案全文附后）。他逐条说明简章草案各条文的内容涵义，尤其着重说明一、二、三、四各条的内容涵义。使到会人对于中国新法学研究会的定名、性质与任务以及会员入会条件的规定，对于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社会

观、国家观与法律观的必要，对于研究新法学批判旧法学，并将研究所得为人民服务的办法，得到清晰的共同认识；对于新法学研究会各种组织及工作的说明，尤其是可能设立新法学研究院以及办理读书问答处与法学函授工作等的说明，更使到会人觉得法学界同人学习研究的机会颇多，甚感兴奋。旋即展开对暂行简章草案的讨论，许德珩、周新民、陈瑾昆、王昆仑、钱端升、王乃堂、蒯晋德、冀贡泉、何思敬、杨绍萱、贾潜、关世雄、邢之襄、吴昱恒、史良、谢道仁、孟庆树、王越成、安志诚、张德含等均先后发言，并不少发言两次至三次者，并有许多以书面提出意见者，大家除提出对某些条文文字修改意见外，均一致表示同意通过中国新法学研究会暂行简章草案，一方面作为将来向成立大会提供的简章草案，另一方面即作为筹备委员会进行工作的根据。各位发言人对新法学研究会的组织及工作，尤其热烈地发表了各种提议和意见。林伯渠发言特别对参加新法学研究会同仁努力学习研究新法学，以便帮助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立法工作、司法工作与法学教育工作表示关切。

闭幕前，董必武赶到并致词，他大意说：“旧的反动法律和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社会格格不入，今天，我们宣布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但要在思想上完全粉碎旧法律的思想体系，则还须加以彻底的批判，只有这样，才能完全消灭它的影响。目前我们虽无所谓完备的法典，但解放区已有很多单行条例、纲领、命令、法律大纲、决议等提供我们研究学习。”他希望大家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社会观、国家观与法律观，共同努力建设新法律的完整体系，从理论到条文都表现出新法学的特点。会议至此，决定将对简章草案所提的意见，交选出的筹委会加以考虑修改。次即推选新法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当推出王之相、王炳南、王昆仑、王笑一、王斐然、史良、左宗纶、沈钧儒、沙千里、李克农、李木庵、李达、李六如、吴昱恒、吴传颐、林伯渠、孟庆树、周新民、南汉宸、许德珩、许之桢、马锡五、陈绍禹、陈瑾昆、陈达、徐永祚、郭冠杰、张曙时、张志让、张锡彤、楚图南、董必武、邓颖超、邓初民、潘震亚、钱端升、冀贡泉、谢觉哉、罗瑞

卿、庞荇青、严景耀四十一人为中国新法学研究会的筹备委员会委员。宣告中国新法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即散会。】

【（又讯）中国新法学研究会筹委会于六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时仍假华北人民政府会议厅召开第一次会议。由谢觉哉主席。当推举沈钧儒为筹备委员会主席，陈绍禹为副主席。又为便于进行筹备简章上所列各项任务，筹委会决定成立常务委员会，除正副主席为当然常务委员外，又推出史良、李达、张志让、王之相、孟庆树、庞荇青、冀贡泉、吴昱恒、钱端升为常务委员。并推定陈绍禹为常务委员会主任，谢觉哉、史良为副主任。】

——陆灏：《中国新法学研究会发起人会 讨论建设新法律 通过暂行简章成立筹委会》，载《人民日报》1949年6月30日。

【新法学研究会发起人名单

（以姓氏笔划多少为次序）

千家驹、王子宜、王之相、王斐然、王铁崖、王笑一、王增润、王汝琪、王怀安、王乃堂、王悦尘、王昆仑、王炳南、左宗纶、史良、安志诚、朱婴、朱绍文、汪暄、沈钧儒、何思敬、沙千里、李达、李木庵、李郁文、李六如、李光夏、李伯勋、李育英、李克农、狄超白、吴昱恒、吴传颐、邢之襄、芮沐、孟庆树、周新民、林伯渠、林亨元、林仲易、南汉宸、胡绳、查人伟、徐永祚、俞钟骆、马锡五、徐光达、张志让、张曙时、张锡彤、张友渔、张定夫、张德含、张奚若、郭任之、郭冠杰、陈绍禹、陈刚、陈瑾昆、陈达、陈守一、陈传纲、陈岱孙、黄觉非、黄松龄、许之桢、许德珩、许用康、闵刚侯、陆鸿仪、曹杰、乔松山、邹大鹏、彭昌祯、费青、董必武、贾潜、杨绍萱、杨奇青、杨清源、楚图南、赵鸿翥、蒯晋德、刘笃、邓颖超、邓初民、潘震亚、冀贡泉、钱端升、楼邦彦、谢觉哉、谢道仁、韩幽桐、庞荇青、罗瑞卿、严景耀、龚祥瑞。】

——《新法学研究会发起人名单》，载《人民日报》1949年6月30日。

7月7日

钱端升参加“七七事变”十二周年集会，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

【（新华社北平七日电）北平市二十万余人热烈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并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大会在七日下午八时于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出席参加。会场布置壮丽辉煌。天安门城楼上高悬七个大官灯，插着三十面红旗。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巨幅画像之间，是一巨大红星，闪耀夺目。下午虽然阴雨连绵，参加大会的仍然人山人海，到有北平市的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及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六十五个单位，及各界市民共二十万人。

大会在“七七”四十九响礼炮和义勇军进行曲军乐声中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董必武、薄一波、聂荣臻、彭真、叶剑英、李锡九、许德珩、吴晗、韩卓儒、萧明、李连山、张晓梅、钱端升、薛成业、许立群、古奇踪、杨伯箴、鲍国宝、刘一峰等组成主席团。接着，全体与会者起立，向抗战中死难烈士静默致哀。继由主席团主席彭真致开会词，他说：刚才有炮声，十二年前的今天北平也有炮声；但是那时是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炮声，今天却是人民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成立，庆祝人民民主新中国开始建立的炮声。我们十二年来渴望着的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现在开始实现了，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伟大胜利，我们要热烈地庆祝我们的胜利。

开会词毕，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北平市长叶剑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总主席郭沫若、九三学社代表许德珩、北平市民盟支部代表吴晗、北平市总工会筹委会主任萧明等相继讲话。在讲话中毛主席偕周恩来将军于九时二十分莅会，全场上二十万人顿时掀起了连续不断的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也领导全体高呼：“中国人民万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等口号。在巨雷般的掌声与口号声中，毛主席、朱总司令、沈钧儒，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新政协筹备会，接受大会献旗。

毛主席在全场热烈的欢呼中，又领导大家高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反动派！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签订对日和平条约！争取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全国人民团结万岁！”等口号。这时，雨虽愈下愈大，参加大会的二十万人却情绪愈益热烈地在滂沱大雨中跟着毛主席欢呼口号。

大会在通过通电及向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的两个致敬电后，十时半宣布散会。是时，几十盏水银灯照遍全场，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恩来将军站在主席台上检阅雄壮的群众队伍。二十万人在倾盆的大雨里，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在喧天的秧歌鼓声中，高歌着，欢呼着。】

——《平廿万人冒雨集会 纪念“七七”十二周年 并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 毛主席朱总司令亲临参加》，载《人民日报》1949年7月9日。

7月14日

钱端升参加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发起人集会。

【（平市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发起人会议，定于今（十四）日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发起人包括全国各地的哲学、经济、政治、法学、史学等部门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共二百三十余人。会期预定自十四日至十七日。在此次会议中，将商讨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俾能于最近期间召开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成立永久性的组织，团结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致力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建设。

发起人名单

该会发起人名单如下：（以姓氏笔划为序）

千家驹、于树德、于光远、王冶秋、王重民、王子野、王学文、王昆仑、王稼祥、王亚南、王炳南、王思华、王寅生、王之相、王笑一、王斐然、王怀安、王铁崖、王伯祥、王悦尘、方毅、尹达、石兆棠、白寿彝、史

良、左宗纶、向达、艾思奇、朱洁夫、吕振羽、吴玉章、吴晗、吴泽、吴清友、吴昱恒、吴传颐、吴茂荪、吴理平、吴承禧、吴觉农、吴敏、阮慕韩、宋云彬、宋劭文、杜守素、杜任之、李达、李一氓、李木庵、李克农、李六如、李伯勋、李敷仁、李富春、李德全、李则钢、沈钧儒、沈志远、沙千里、邢西萍、何封、何思敬、何干之、辛志超、林伯渠、狄超白、余嘉锡、周恩来、周谷城、周予同、周扬、周伯棣、周新民、尚铨、金仲华、金灿然、金岳霖、金兆梓、邵循正、范文澜、范醒之、侯外庐、马衡、马寅初、马锡五、马特、孟用潜、孟庆树、胡乔木、胡愈之、胡子婴、胡绳、芮沐、俞钟骆、南汉宸、柯伯年、施复亮、翁独健、梁思成、梁蔼然、容肇祖、唐兰、高崇民、孙冶方、孙晓村、孙承佩、宦乡、姚依林、姜君辰、徐特立、徐永祚、徐寿轩、徐雪寒、秦柳方、陶孟和、陶大镛、夏康农、黄松龄、黄鼎、黄炎培、黄敬、黄觉非、许宝驹、许宝骥、陈绍禹、陈垣、陈家康、陈伯达、陈唯实、陈传网、陈云、陈穆、陈岱孙、陈翰笙、陈达、陈述、陈瑾昆、郭沫若、郭冠杰、郭大力、郭任之、许德珩、许涤新、许之桢、梅龚彬、陆鸿仪、陆定一、张志让、张如心、张天麟、张奚若、张东荪、张仲实、张锡昌、张雪岩、张曙时、张友渔、张铁生、张锡彤、张云波、章伯钧、章汉夫、章乃器、贾拓天、贾潜、曾山、闵刚候、曹孟君、曹葆华、曹杰、乔木、嵇文甫（范文澜代）、华岗、傅铜、彭康、汤用彤、冯文潜、冯宾符、裴文中、费孝通、费青、傅彬然、樊弘、赵平生、楚图南、杨绍萱、杨献珍、杨东莼、杨明轩、董必武、翦伯赞、黎锦熙、雷洁琼、邓初民、邓以蛰、邓子恢、潘震亚、潘汉年、潘梓年、骆耕漠、叶丁易、叶蠖生、叶季庄、阎宝航、郑振铎、郑天挺、郑昕、郑易里、郑伯彬、楼邦彦、赖亚力、钱端升、钱杏邨、钱俊瑞、卢心远、齐燕铭、钟潜九、冀贡泉、冀朝鼎、苏仪、谢觉哉、薄一波、薛暮桥、韩寿萱、谭惕吾、庞盖青、罗常培、罗克汀、罗瑞卿、罗隆基、饶毓苏、严景耀、严信民、顾准。】

——《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 发起人今集会 团结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 致力新民主主义建设工作》，载《人民日报》1949年7月14日。

7月15日

钱端升参加李、闻烈士纪念活动。

【(平市讯)昨天(十五日)是中国民主同盟殉难先烈纪念日。上午九时,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暨北平市支部在北京饭店六楼礼堂,联合举行纪念会。到会的除民盟盟员多人外,有林伯渠、李维汉、李济深、郭沫若、彭泽民、史良、谭平山、蔡廷锴、陈其尤、朱学范、沈雁冰、张奚若、谢邦定、齐燕铭、阎宝航,陈劭先、陈此生、李锡九、欧阳予倩、许德珩、薛愚、钱端升、翦伯赞、叶圣陶、容肇祖、宦乡、王璉、臧克家、孙起孟、柯灵、白杨等二百余人。闻一多夫人高贞、李公朴夫人张曼筠亦到会。曾伟夫人吴平已于日前抵平,因身体不适,未能到会。

纪念会开始,向烈士行礼默哀后,由沈钧儒任主席,报告六位先烈的生平及殉难经过:李公朴是民盟中执委兼民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被匪特枪杀于昆明。闻一多是民盟中执委兼昆明市支部宣传部部长,后李公朴三天亦被匪特枪杀于昆明街头。陶行知是民盟中常委兼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同月的二十五日早晨因脑溢血病逝于上海。杜斌丞是民盟中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委,一九四七年十月七日被蒋介石胡宗南匪徒枪杀于西安。黄竞武是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兼上海市支部委员,曾伟是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两人同在上海解放前被蒋匪特务绑架后杀害。沈氏又宣布,民盟已组织一委员会,负责办理纪念公墓,纪念馆以及筹募家属生活费及子女教养费等事情,以慰先烈,而尽后死者的责任。

李维汉首先被邀起立讲话。他认为今天这个纪念日不止是民盟的纪念日,殉难的先烈是为了人民事业而牺牲的,一切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都要纪念他们。民盟从抗日战争以来,牺牲了的不仅是李、闻、陶、杜等六位先生,数目一定还多,他建议应该有一个详细的调查。接着他说,他对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杜斌丞诸先生或者与之相熟识,或者知道他们的经

历，他指出他们的精神有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首先就是他们和群众有联系的，不是跨在群众之上的。在他们心目中，第一位是群众，不是个人，不是小团体。他们是在群众中往来，随着群众一道前进的。一个人看到群众，看到人民，从人民大众出发，这个人就可能是伟大的。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一个人倒下去了，成万的人站起来。”假如一个人只能看见到自己的鼻子，眼睛，那么他一定是渺小的。先烈的伟大，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在于一直是在人民中间生长起来的，把自己贡献给人民。他们的思想不是停止在一个地方的，不是停止在过去所受的教育上，不是停止在他的出身上，也不是停止在他过去已有的成就上，他们的思想一直是在前进着的。他们思想上的前进又是因为和人民结合在一起的缘故，因为只有群众才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和群众结合在一起的，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思想就一定会不断的前进。正因为这样，在政治上，在许多人还在摇摆不定的时候，他们清楚的分别出敌和友，在历史转变的关头没有迷失方向，在历史行进中成为了一个先进的战士。李维汉最后说，敌人快要全部垮台了，但还有残余力量，还有帝国主义，今后在建设上还有许多困难，我们要学习李闻陶杜几位先生的精神，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思想上要不断的前进，分清敌友，团结起来，共同努力。

李济深继起讲话对于后死者的责任，加以说明。在今天全国快要解放的时候，他指出更加紧密的团结是更为重要的。古语有一句道：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可是我们要在胜利的时候，比过去苦斗的时候更能团结。先烈们的牺牲小我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死者的景仰和学习。

郭沫若的讲话把会场空气兴奋激动起来了。郭先生说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参加纪念会的。他指出先烈们是超过了个人的死，渡到人民的永生。在全国就要胜利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这是光荣的日子。郭先生说，前年在上海，去年在香港，他很沉痛的流出了滚热的眼泪。可是今年我们要拿积极进取的精神，自我牺牲，为人民服务，我们没有了悲痛。郭先生接着说明，人

究竟是有弱点的，牺牲自我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套上了自私自利的超度的显微镜就会把原是渺小的个人看得比宇宙还要大，把一个人看得比四万万七千万还要多。他要求今后大家要学习先烈们的榜样，把自我看得小一点，再小一点，以便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接着与会者先后讲话。刘王立明讲李、陶两先生几件具体故事对她的影响。臧克家朗诵了闻一多先生的诗：“一句话”，说明闻先生二十年前的预言现在都成了事实。王璉代表自然科学会致词后，李伯球讲述曾伟先生的生平事迹，韩兆鹗希望学习杜斌丞先生的政治道德。纪念会于十一时散会。】

——《民盟殉难烈士纪念日 隆重纪念李闻诸先烈 李维汉李济深等均往参加》，载《人民日报》1949年7月16日。

7月17日

钱端升成为中苏友好协发起人。

【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名单

(平市讯) 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名单：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以下依姓氏笔划为序) 丁里、丁玲、丁华、丁瓚、丁浩川、丁燮林、于伶、于立群、于光远、于树德、千家驹、天宝、方方、方与严、尹达、尹赞勋、孔德祉、孔罗荪、王瑞、王子野、王亢之、王之相、王任叔、王冶秋、王式廓、王汝淇、王笑一、王亚南、王悦尘、王淦昌、王绍鏊、王斐然、王炳南、王稼祥、王怀安、王荫溥、王庆元、王昆仑、王学文、王铁崖、毛岸英、水华、巴金、戈宝权、甘泗淇、石西民、石振明、包文静、包达三、史良、史洛文、史东山、田方、田间、田汉、田朝凡、田秀娟、白杨、丘金、丘哲、立波、古元、冉瑞武、江丰、江上峰、朱丹、朱其文、朱先煌、朱早观、朱俊欣、朱语今、朱富胜、朱德海、朱学范、朱智贤、朱洁夫、安岗、安娥、安子文、任虹、任弼时、江青、任修权、向明、向达、成仿吾、光未然、艾青、艾思奇、吕炯、吕瑛、吕荧、吕骥、吕正操、吕振羽、吴青、吴雪、吴德、吴晗、吴敏、吴垦、吴襄、吴玉章、吴印咸、吴有训、吴冷西、

吴清友、吴茂荪、吴德峰、吴耀宗、吴羹梅、何理、何礼、何士德、何其芳、何香凝、何思敬、何启君、何干之、保泽慧、沈浮、沈鸿、沈元晖、沈志远、沈其震、沈其益、沈兹九、沈钧儒、沈粹缜、沈霁春、狄超白、沙飞、沙千里、沙可夫、杜任之、杜君慧、杜延庆、辛志超、克力更、宋汀、宋一平、宋之的、宋任穷、宋劭文、宋养初、宋云彬、宋新怀、李昌、李强、李康、李荒、李达、李普、李贻、李涛、李桦、李一氓、李之华、李子健、李木庵、李文宜、李立三、李先念、李六如、李何林、李志中、李克宏、李克农、李伯钊、李宗恩、李早然、李秀真、李秀珍、李培之、李明哲、李德全、李章达、李纯青、李绍鹏、李家齐、李富春、李维汉、李启新、李莲山、李汇川、李广田、李颀伯、李锡九、李济深、李凤莲、李丽莲、李怀英、李烛尘、李霁野、邵力子、邵井蛙、邵循正、邱椿、季方、竺可桢、周文、周扬、周惠、周颖、周立三、周信芳、周建人、周培源、周新民、周惠明、周寿昌、周巍峙、金人、金仲华、金岳霖、金直夫、孟波、孟少农、孟用潜、孟秋江、孟庆树、林平、林彪、林枫、林仲易、林伯渠、林汉达、林砺儒、林锵云、尚钺、尚佩秋、阿甲、阿英、芮沐、屈元、岳志坚、晁哲甫、易礼容、亚光、柯灵、柯在铄、柯仲平、柯伯年、茅盾、洪深、柳湜、帅孟奇、姚静、姚克方、姚依林、胡风、胡绳、胡一声、胡子婴、胡永畅、胡耐秋、胡乔木、胡厥文、胡愈之、胡传揆、胡锡奎、胡绩伟、胡济邦、范文澜、范长江、计苏华、施复亮、俞平伯、俞寰澄、韦君宜、郁文哉、彦涵、南汉宸、姜松龄、郝人初、祝志澄、侯外庐、侯俊岩、马特、马达、马衡、马骏、马文昭、马明芳、马思聪、马寅初、马叙伦、马纯古、马彦祥、马辉之、马健翎、马凡陀、涂长望、宦乡、晏福民、夏衍、夏康农、徐冰、徐平、徐盈、徐驰、徐迟、徐弦、徐特立、徐侍峰、徐硕俊、徐纬英、徐悲鸿、徐寿轩、徐迈进、浦熙修、浦洁修、袁勃、袁牧之、袁翰青、高林、高岗、高棠、高集、高沐鸿、高长久、高祖文、乌兰夫（云泽）、秦元邦、秦柳方、孙文淑、孙玉振、孙承佩、孙起孟、孙学文、唐兰、唐韵超、陈垣、陈郁、陈云、陈达、陈桢、陈毅、陈爵、陈少敏、陈白尘、

陈此生、陈劭先、陈其尤、陈其瑗、陈伯达、陈克寒、陈岱孙、陈秀山、陈叔通、陈康白、陈绍禹、陈望道、陈家康、陈铭枢、陈传网、陈瑾昆、陈翰伯、陈学昭、陈唯实、陈震中、陈慧清、栗再温、草明、翁独健、容肇祖、连阔如、习仲勋、盛丕华、盛家伦、康生、康永和、康克清、许之桢、许立群、许永瑛、许世平、许广平、许德珩、许德瑗、许涤新、许宝驹、曹禹、曹若茗、曹孟君、曹靖华、曹葆华、章萍、章乃器、章文晋、章伯钧、章汉夫、梅益、梅兰芳、梅龚彬、郭大力、郭任之、郭则沉、郭冠杰、郭春涛、陆平、陆诒、陆瑾、陆定一、陆志韦、陆万美、梁希、梁广、梁永福、梁思成、梁蔼然、常乾坤、符定一、张文、张凡、张本、张冲、张庚、张琪、张毅、张晔、张澜、张力克、张友渔、张印方、张治中、张光岱、张仲实、张昌绍、张金保、张东荪、张恩德、张奚若、张启凡、张志让、张宗麟、张性初、张秀岩、张瑞芳、张云波、张炯伯、张振铎、张福林、张淮三、张琴秋、张致祥、张曼筠、张曙时、张维桢、张国藩、张锡昌、张锡钧、张际春、张毓芬、张磐石、张晓梅、张骏祥、张铁弦、阳翰笙、区棠亮、区梦觉、贺诚、贺龙、贺绿汀、粟裕、傅钟、傅连璋、傅学文、傅彬然、傅作义、恽子强、恽逸群、曾山、曾昭抡、曾宪植、乔冠华、彭真、彭慧、彭子冈、彭德怀、彭泽民、黄敬、黄华、黄薇、黄佐临、黄宗甄、黄松龄、黄炎培、黄若暾、黄洛峰、黄振声、黄操良、黄慧珠、黄药眠、黄鹤楨、冯至、冯燊、冯乃超、冯文彬、冯光灌、冯白驹、冯雪峰、华君武、焦菊隐、汤用彤、汤桂芬、程今吾、程砚秋、舒强、舒绣文、费青、费振东、费孝通、裘祖源、甄荣典、塞克、楚图南、葛一虹、葛志成、闻家驷、雷洁琼、贾潜、贾拓夫、董昕、董必武、董渭川、杨文、杨述、杨晦、杨刚、杨诚、杨之华、杨立三、杨尚昆、杨伯箴、杨美珍、杨绍萱、杨耕田、杨静仁、杨涤生、杨蕴玉、杨献珍、叶丁易、叶企荪、叶浅予、叶圣陶、叶剑英、叶维民、叶蠖生、赵丹、赵敏、赵烽、赵子温、赵占魁、赵国强、赵望云、赵广增、赵树理、廖井丹、廖似光、廖沫沙、廖承志、廖梦醒、熊复、裴文中、凤子、适夷、邓拓、邓刚、邓小平、邓子恢、邓戈明、邓初民、邓裕志、邓

颖超、邓宝珊、刘佳、刘鼎、刘晓、刘子久、刘大超、刘王立明、刘玉厚、刘永生、刘白羽、刘伯承、刘芝明、刘长胜、刘亚楼、刘英源、刘修正、刘道生、刘清扬、刘宁一、刘皑风、刘尊棋、刘剑涛、刘澜涛、郑昕、郑天挺、郑坤廉、郑振铎、潘梓年、潘汉年、潘震亚、蒋金涛、蒋南翔、乐天宇、臧克家、齐一丁、齐仲桓、齐笑尘、齐燕铭、滕代远、黎锦熙、楼邦彦、樊弘、翦伯赞、谢邦定、谢雪红、谢觉哉、钱三强、钱志道、钱俊瑞、钱海华、钱端升、钱伟长、蔡畅、蔡仪、蔡翹、蔡廷锴、蔡若虹、蔡楚生、蔡树彬、卢鋈、卢于道、赖少其、赖亚力、欧阳山、欧阳钦、欧阳予倩、欧阳祖润、薛愚、薛公绰、薛成业、薛暮桥、薄一波、阎宝航、冀贡泉、缪朗山、韩黎、韩天石、韩兆鹗、韩武城、韩幽桐、韩寿萱、钟敬文、钟潜九、魏曦、魏荒弩、戴爱莲、萨空了、萧三、萧明、萧华、萧彩峰、聂真、聂绀弩、聂荣臻、聂维庆、聂毓禅、罗烽、罗毅、罗琼、罗常培、罗叔章、罗隆基、罗瑞卿、罗荣桓、饶斌、饶漱石、谭平山、谭震林、谭惕吾、庞盖青、严文井、严信民、严济慈、严镜清、严景耀、苏井观、酆云鹤、顾亮、顾苾璋、龚澎、龚普生（共六百九十八人）】

——《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名单》，载《人民日报》1949年7月17日。

8月9日

钱端升参加北平市各界代表会，入选大会主席团。

【（平市讯）北平市各界代表会已于昨（九）日开幕。会议于上午九时举行开幕典礼，下午由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报告军管会和市政府半年来的工作。到会代表共三百一十二人，连同来宾、列席者、旁听者共约四百余人。

会议在庄严的音乐声中宣告揭幕，大会选举叶剑英、张友渔、彭真、赵振声、余心清、吴晗、韩卓儒、许德珩、许立群、萧明、宋凤祥、朱长江、柴泽民、刘同恩、萧松、古奇踪、张晓梅、薛成业、钱端升、诸福棠、高存信、王普、孙孚凌、刘一峰、马玉槐、陈铭德、贺绿汀、张奚若、梁思成等

二十九人为主席团。并推选叶剑英、张友渔、彭真、吴晗、余心清、韩卓儒、许德珩、许立群、萧明等九人任主席团常务主席，彭真为召集人，薛子正任主席团秘书长，李公侠、杜任之、崔月犁、郭则忱等四人任副秘书长。叶剑英市长致开幕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主席、来宾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民主同盟沈钧儒、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相继讲话，最后由中共北平市委代表赵振声讲话。

自由演讲开始后，有中国民主同盟北平市支部主委吴晗、工人代表袁峙、农民代表施德海、北平市妇联暨中小学教职员联合会代表田纶、北平市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代表徐悲鸿、蒙古代表巴根、医界代表余贻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平分会筹委会主任余心清、中国农工民主党北平市党务整理委员会主委韩卓儒、工业界代表张俭堂等相继讲话。

叶剑英市长在开幕词中说明各界代表会的任务为团结北平各阶层人民，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进一步建设人民的新北平。叶市长说：“今天北平的人民已真正做了北平的主人，各界代表应该负起人民政府主人翁的责任，对人民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朱总司令在讲话中号召北平市各界人民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尤其是要努力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打下建设新北平的基础。】

——《团结各阶层人民建设新北平 平各界代表会开幕 朱总司令指示发展工业生产 叶剑英报告半年来军管市政工作 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致电祝贺》，载《人民日报》1949年8月10日。

8月14日

中苏友协北平分会成立，钱端升当选常委。

【（平市讯）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市分会筹备会成立会，昨（十四）晚八时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该筹备会是由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全体代表签名提议并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举手通过而产生的，筹备会成立会由许德珩主席，致开会词，说明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市分会筹备会的意义，他痛斥美

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及破坏中国人民建设事业的阴谋，他指出中苏两国人民必须联合起来，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次由萧松报告筹备经过，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钱俊瑞、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等相继讲话。

钱俊瑞代表总会祝贺北平市分会筹备会的成立，并指出：社会主义苏联是我们中国最好的老师，我们应当向苏联学习，我们要巩固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友谊。

彭真的讲话热情奔放，他庆祝北平市各界代表会的胜利闭幕和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市分会筹备会的成立，特别指出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是一家，苏联人民一直是援助中国人民，反对中国的反革命者。所以两国人民一定要团结起来。市职工总会筹委会向大会献旗一面，文为：“增进中苏两国人民友谊，学习苏联宝贵建国经验。”

最后，由彭真领导全体呼口号。会后由东北文教队演出歌剧“立功”等节目助兴。】

【（又讯）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市分会筹备会已正式成立，一百零五位筹备委员昨天（十四日）下午七时在中山堂举行第一次筹备会，推选彭真、赵振声、张友渔、余心清、吴晗、韩卓儒、张奚若、许德珩、钱端升、樊弘、梁思成、萧明、柴泽民、许立群、张晓梅、萧松、薛成业、古奇踪、贺绿汀、孙孚凌、诸福棠、刘一峰、马立槐等二十三人为常务委员，并推萧松为秘书长，即日开始进行筹备工作。】

【（平市讯）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市分会筹备会筹备委员名单如下（以姓字笔划为序）

巴翰干、王甫、王大鲁、王乐天、王金荣、王率从、王向宸、孔厥、古奇踪、丘锺仑、安岗、任彬、吴晗、余心清、余怡侗、李公侠、李佩之、李如衡、杜任之、宋凤祥、何戊双、邢赞亭、孟绍江、林鉴生、林葆骆、周文龙、马玉槐、马约翰、马志远、马思聪、柳湜、梁思成、徐悲鸿、浦洁修、柴泽民、连阔如、翁独健、孙孚凌、张奚若、张友渔、张秀岩、张晓梅、张

曼筠、张乃更、高存信、许宝揆、许德珩、许立群、贺绿汀、曹志麟、庄志辉、郭则忱、崔月犁、陈鼎文、陈铭德、彭真、叶剑英、叶浅予、叶企荪、叶运高、叶盛章、费青、费孝通、汤用彤、华南圭、曾昭抡、程秋原、程宏毅、惠赐礼、傅华亭、杨伯箴、杨蕴玉、杨保俊、闻家驷、董渭川、赵振声、赵聪、赵承信、黎锦熙、裴文中、廖沫沙、刘仁、刘岗、刘同恩、刘一峰、刘清扬、邓拓、樊弘、郑昕、诸福棠、乐松声、晓波、钱三强、钱端升、薛子正、薛愚、薛成业、韩卓儒、韩诵裳、萧明、萧松、萨空了、罗常培、谭政文、严济慈共一〇五人。】

——《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分会筹备会正式成立 彭真同志等廿三人任常委》，载《人民日报》1949年8月15日。

8月14日(?)

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闭幕，钱端升做自由发言。

【接着大会举行闭幕式，各界代表自由讲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平市分会筹委会曹志麟，中国民主同盟北平市支部陈鼎文，中国农工民主党北平市党务整理委员会韩卓儒，九三学社许德珩，工会代表王士秀、阎世钟、虞志英、郝淑敏，农民代表曹建荣、高明，民主妇联代表陈文润，学联代表古奇踪、吴璞，中小教联代表孟昭江，院校教联钱端升，医协代表罗桂珍，卫戍部队代表张乃更，少数民族代表马玉槐，私营工商业代表孙孚陵、陈荫棠、张献庭、刘一峰，曲艺界代表连阔如及其他代表华南圭、汤用彤等二十五人相继讲话。曹志麟说：“从施政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民政府在艰难困苦中，为人民做了许多人民所要做的事情，会后我们回去应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在毛主席领导下，生产支前，建设人民的新北平。”工人代表阎世钟说：“要肃清工厂中的特务，才能保障生产的进行，我是铁路工人，我们不但要实行大会决议，节约支前，更要加强铁路运输，打破敌人的封锁。”郝淑敏表示会后一定将宝贵的经验带回工厂去，增加生产，以早日完成解放战争。农民代表高明说：“我们要增加生产，支援前线，将蒋根彻底刨掉，

我们的日子就更好过了。”学生代表吴璞说：我们能够在这里开民主大会，这是解放军打出来的，是工人的双手造成的。我们回去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中小学教联代表孟昭江代表全市六千中小学教员向大会保证：决定将大会有关教育的决议老老实实的努力去作，全心全意为工农服务。院校教联代表钱端升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个会的更大成功是可预期的，我们一定为二百万市民而执行大会的决议，与全体市民共同努力，使毛主席再收到市民信件时，是一封最愉快的信！”军队代表张乃更向大会保证下半年要配合治安机关肃清特务，以巩固北平的革命秩序，同时节约生产，发扬人民解放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并帮助政府来推动和开展成人教育及经济建设卫生等工作。少数民族代表马玉槐说：“此次大会不但是民族团结大会，并且是民族平等大会。”私营工商业代表都一致说出由此次大会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共产党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决心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而努力。大华窑业公司经理陈荫棠说：“我们要利用游资投到生产中去。”利华酱油公司经理张献庭说：“今后我们私营工厂应该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并使物价平稳，民族资本家要多设工厂解决工人失业问题，劳资要团结合作，使产品的质量好成本低，将北平建设为生产城市。”北大教授汤用彤说：“这次大会是团结大会，是从全面来考虑问题的，这正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真正亲民的表现。”曲艺界代表连阔如说：“从前国民党反动派的参议会是在说瞎话，现在我们人民的代表在说真话。”继由工会代表萧明致闭幕词，他着重指出要按照毛主席给我们最宝贵的指示，由现在协商性质的各界代表会议，过渡到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并群策群力，解决人民经济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他更指出，在克服困难建设我们新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中，我们将学习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进行建设，和在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恢复和发展工业的经验。同时我们也愿意学习苏联建设他们美丽的国都莫斯科的榜样，来建设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大国的新首都。大会至此，乐声悠扬，掌声四起，全

体代表高呼：

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胜利万岁！

新北平建设成功万岁！

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团体团结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各界代表热烈发言生产节约支援前线》，载《人民日报》1949年8月15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始终积极关心国内政治生活，并热心参与各项社会活动。1949年8月我出席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被推选为北京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9页。

8月26日

钱端升参加驳斥美帝白皮书座谈会。

【（本报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于昨日午前九时假北京饭店举行座谈会，讨论美国国务院所发表的对华白皮书。到会者有林伯渠、沈钧儒、郭沫若、邓初民、李达、侯外庐、吴恩裕、张奚若、张志让、楼邦彦、钱端升、陈垣、胡愈之、张雪岩、刘良模、柯永年、何思敬等五十余人。首由主席林伯渠同志致词，他说：自从美帝国主义者发表了对华白皮书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都纷纷加以驳斥，今天我们希望从历史、哲学和国际法等各方面，去进一步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阴谋，帮助广大中国人民认识美国的真面目。接着先后发言者有刚从美国回来的刘良模、张雪岩两先生和杜任之、钱端升、杨刚、柯柏年、邓初民、何思敬、赵承信、张奚若诸先生。

.....

钱端升

钱端升先生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指出：我们今天要打破对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幻想。

.....】

——《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 座谈美帝白皮书 林伯渠同志望从历史、哲学和国际法方面揭露美帝阴谋》，载《人民日报》1949年8月27日。

8月27日

钱端升、赵承信、罗常培等向北平院校教职员联合会筹委会传达了本市人民代表会议议决案。

【（本报讯）昨（廿八）日晚七时，北平院校教职员联合会筹委会假辅仁大学礼堂召开会员大会，由钱端升、赵承信、罗常培等传达了本市人民代表会议议决案。到会会员一致通过议案，认为这次各界代表会议是完全成功的，这次会议充分发挥了民主团结进步的精神，对新北平的建设，作出了完全正确的决议；并表示热烈拥护这些决议，将一致努力把这些决议变为行动。

最后由何戊双号召院校教职联同人踊跃参加中苏友好协会。】

——《院校教职联传达决议 号召参加中苏友好协会》，载《人民日报》1949年8月29日。

8月30日

钱端升在新华社广播电台发表演讲，谈参加北平市各界代表大会感受。

【同胞们：

我们北平市在半个月以前召开了一个各界代表会议。同胞们大概都已知道了，它是一个极盛大的会议，也是极成功的会议。我今晚要报告大家：这个会议，不但它本身是大大的成功，而且它的成功保证了中国人民可以顺利

地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

北平已经解放半年多了。半年来，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员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曾经召集过很多次的座谈会，和各界代表商谈有关的问题。譬如关于房租问题，市委和人民政府曾召集过两次政治座谈会，广泛的征求各界人士对于房租的意见后，政府才颁布房租条例。但是这种座谈会欠缺普遍的、全面的代表性，所以政府便决定召集各界代表会议。

在召集之前，北平当局曾和北平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或代表人，作过多次协商，其目的，一在使代表名额的分配得以恰当，二在使会议的组织得以合理。各方面提供的良好意见，当局无不倾心采纳。他们没有一点的成见。他们决心要把代表会议搞好，要使会议能真正的代表北平各界人民。我曾经以北平院校教职员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代表的资格，参加过协商。所以当局在协商过程中所采取的诚恳的、虚心的态度，是我自己体验到的，不是听来的。

各界代表会议共有代表三百三十二人。其中：

当然代表 十五名

党派代表 二十四名

团体代表 一百六十九名

军队及机关工作人员代表 二十五名

少数民族代表 四名

其他各界代表 九十五名

当然代表由军管会及人民政府首长担任。党派代表由六个党派的市级组织推派，中国共产党只是其中之一。团体代表名额占总名额半数以上，均由各人民团体选派。其中，北平市工会代表七十名，郊区农民代表三十名，其余六十九名则分配于北平市的青联、妇联、学联及各级学校的教职联等等。军队及机关工作人员的代表，只代表工作人员，而不代表军队或机关，也由工作人员自行选派。少数民族代表四名，代表了回民及蒙族藏族，由政府遴选。我在会议中认识了藏族代表多杰才旦先生，他是一位方自西藏来平的青

年。多杰才旦先生能够参加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象征了我们新的、好的民族政策，也保证了全中国一切民族的团结。所以我特别要提出来一谈。至于其他各界代表，有四十五名是由政府聘请的工商界代表，三十九名是由政府特别邀请的爱国民主人士。工商界代表产生的方法和工农青教等代表不同，这是因为工农等已正式成立了团体。所以，可以自行推选代表，工商界尚未正式成立团体，所以暂时只能由政府遴选。

要请大家注意，代表名额的分配是十分恰当的，公平的。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代表自然应比任何其它一界多些。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主要的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农民的代表自然也应相当众多。北平是一个大都市，繁荣都市的经济，工商界负有重要责任，工商界代表的名数所以要居第二位。北平又是一个文化城，学校多，教职员及学生也特别多，所以学生及教职员的代表加起来有三十八人，居第三位。名额的分配符合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原则，又反映了北平市的个性，实在是恰当极了，公平极了。

其次要报告各界代表会议进行的概况。会议一共连续了六天。五天开大会，听取政府首长的报告，并讨论这些报告，最后则讨论代表自己的提案。六天之内，有一天不开大会，而由各界代表分别举行小组集会，讨论各种报告。无论是开大会或是开小组会议，讨论报告，或是讨论提案，发言者态度的诚恳，和情绪的热烈，都是值得标出。我们的工人农民本来文化水准较低，但是他们讲话十分踊跃。尤其在毛主席亲临大会讲话，宣读市民给他的信件，提出物价高涨、捐税繁重两个问题交代表讨论后，代表们个个都在高涨的空气中，欢愉的心情中，发表意见，以求解决问题。

会议的收获，是十分丰富。二百四十八个提案包括北平市一切的问题，最重要的提案则集中在下列四个问题。第一是肃清反革命分子，严惩匪特；第二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使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第三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并特别为工农大众及工人子弟增设学校或它种学习便利；第四为精简节约，眷出财力来努力支援前线，努力建设。此外，各界代表复认定了中

苏深厚友谊有在人民大众中普遍建立的必要，所以即在大会中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分会筹备会。短短六天之内，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能正视了以上各种工作的重要性，接受了政府的报告，提出并通过了适当的提案，完成了各界代表会议的重要任务。

同胞们，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无疑地是大大的成功，也无疑地会得到全国同胞们的称赞。但是，会议本身的成功虽极可观，而会议最大的贡献，是保证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顺利建立，是给了我们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信心。

怎样说呢？因为第一，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做到了人民的民主。在现阶段的中国，人民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都参加了各界代表会议，并且在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了。各界代表会议中，工人代表，由于他们发言的热烈、诚挚、有力，和他们主张的富有内容，的确起了领导的作用，使其他的代表钦佩、拜服、信赖，并力求看齐。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于人民内部，将给予各种自由之权。在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中，言论自由的确达到了高度的发展，什么人都可以说话，什么话也都可以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确做到了。

人民的力量也的确表现出来了。各界代表个个以北平人民政府为自己的政府。因而，个个代表都认识了建设新北平的任务，是他们和全市人民的任务。个个了解了肃反工作、生产工作、文教工作和精简节约的重要性。因为有了正确的认识，所以于讨论报告和讨论提案时，都显出了共同努力的精神。

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中所表现的民主，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是不可以比拟的。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是自由、是和协、是团结、是全体代表都把政府看做自己的政府，和政府同心协力去从事建设。他们的所谓民主主义是不自由、是冲突、是分裂、是少数人操纵政府，多数人民受政府压迫。我们的是民主，是真民主，他们是假民主，是反民主。

第二，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也做到了人民的专政。各界代表，对于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表示了深仇和宿恨，决心要镇压他们，要实行独裁。尤其对于特务匪徒，代表们愤怒，代表们要求严行检举，严厉惩治。

当然，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尚不能和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相比。今后条件成熟，由普选而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将为更有力量的机构，将更能代表人民，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各界代表会议是过渡到人民代表大会的一座桥梁，所以北平二百万市民在代表会议闭幕之后，要热烈的接受会议的决议，要互相勉励，要保证代表会议决议案的全部执行。

同胞们，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所表现的民主是新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是人民对自己不折不扣的民主。我本人对于各国的政治制度有过一些研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主义也有过目击与耳闻。我可以老实地告诉同胞们，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会，和我自己这次所亲身参加的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相比，我们的才配得上称做民主，而他们的国会仅仅是财主，有财有钱的人做了主人。不但我本人得着这样的结论，同我一样有机会参加北平市各界会议，也有机会观察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会的代表们，也得到同样的结论。

同胞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是成功了。其他各地的代表会议，保证可以成功，人民民主专政也保证可以在中国顺利地建立起来。这是我个人因为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而得到的信心和结论。

（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八月三十日七点五十分广播）】

——《从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 瞻望人民民主专政——北平各界代表会议院校教授联合会代表，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播讲》，载《人民日报》1949年9月1日。

8月31日

钱端升被北平院校教职筹委会选举为出席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代表。当

天，钱端升与何戍双、罗常培、杨贵贞、费孝通、胡原陵、严济慈、赵承信、翁独健、徐悲鸿、赵珽、王玠等十二位该会议代表，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针对时局的感想。

【这次由北平院校教职筹委会选举出席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代表一共有何戍双、罗常培、钱端升、杨贵贞、费孝通、胡原陵、严济慈、赵承信、翁独健、徐悲鸿、赵珽、王玠等十二人，会后发表感想，原文如下：

我们对北平各界代表会议感想

关于北平市军管和市政各方面的工作报告，出席各首长的指示，各党派领袖的言论，和彭真同志对于这次会议的总结，在各报纸上已经详细刊载，我们不愿再重复报告，现在只是反映一些对于这次会议感想。

第一，我们在会场上首先听到的就是军管会和市政府各部分半年来的施政报告。这些工作都是照预定计划，稳步进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但是在这些报告以前军管会和市政府的这些计划并没有公开发表大吹大擂。他们并不是没计划的，只是愿意做了再说，却不愿意说了不做；只愿意如数兑现，而不愿意多开支票，尤其没开过空头支票。回顾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时期怎样呢？他们每逢节日或纪念日总有皇皇的文电发表，每一机关大官的更迭总有洋洋大观的计划宣布，结果却是“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只有计划，并无工作；只有预算，并无报销。专就这一点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的确实践了“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的古训。这绝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所能赶得上的。

第二，在这次会议里，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董主席等，都提出发展生产的号召；代表们的提案也有十二件是提倡发展生产的。我们十二人也提出“请鼓励学校机关人员参加生产”一案，由大会通过，交有关机关团体协商办理。会场的情绪几乎一致响应这个号召，努力把消费的北平变成生产的北平，好把这个人民民主联合政府的新国都做成全国各大都市的典型。朱总司令的讲词中特别郑重提出：“从前的人以不事生产为清高，现在的公教人员必须同时兼营生产。”这的确可以叫我们这班教育文化工作者痛切的深省。

我们提案的旨趣正和朱总司令的号召不谋而合。我们恳切希望知识分子能够贯彻“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精神，仿照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二年延安实行精简节约，得到丰衣足食的好榜样，努力参加生产，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第三，八月十三日下午五时二十分毛主席亲莅会场，对于代表们加以指示，希望现在这个各界代表会议一俟条件成熟就可执行北平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建立全市人民的最高政权。最后他拿出一封一个市民的信来，交给大会讨论。他郑重提出希望代表们能够答复这个市民乃至所有北平市民的问题。毛主席离场后，立刻展开热烈的讨论。最后由彭真同志作总结，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很困难的时期。不过这种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是进步中的困难。要想克服这种困难，第一要努力支前，消灭残余的反动势力；第二要发展生产；第三要严格管理金融。北平市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必须咬牙渡过这个难关。……谈到“努力支前”，我们这班教育文化工作者得要深切的了解，现在前线还有四百多万武装同志正在为扑灭残余的反动势力、解放全中国而奋斗。他们每人每月需要三百三十三斤小米。平均五十个农民才可以养一个兵。在以前，已经由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万农民支持了三年的解放战争，现在还得继续倚靠他们。他们不单支持了前线，而且还得供给我们。照现在的薪给标准，一百五十个农民才能养一个教授，八十个农民才能养一个讲助，四十个农民才能养一个职员。所以我们必须严格地厉行节约支前，才算对得起农民，才算对得起前线四百万英勇的战士！

第四，周副主席在“把革命进行到底建设新中国”的报告里特别提出：“建设新中国所依靠的就是由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我们不单要扩大这个战线，而且要保持它的巩固，要求内部的合作和批评。”这次的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大成功。它的主要目标就在“团结四个朋友，消灭三个敌人，完成两大任务”。由这局部大团结，已经树立了全国大团结的基础。代表的阶级，自工、农、小资产阶级以至于民族资本家；代表的年龄从八十几岁到十五岁；像这

样各界人民的大团结真是亘古未有的盛事！开会时大家热烈辩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去追求真理；却又无时无地不融融泄泄地团契像一家人。尤其使我们知识分子兴奋的，就是工农代表们力量的充实，感情的真挚，意志的坚定，真叫我们这班脑力劳动者相形见绌。所以脑力劳动者应该常向体力劳动者看齐，才不会犹豫动摇，变成红娘子里的李信，或艾奇逊白皮书里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我们应该团结“四个朋友”，争取犹豫动摇的中间分子，让他们丢掉幻想，不受帝国主义者的蛊惑，毅然决然参加广大人民的反帝斗争。在这次会议中，各代表一致赞成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分会，就是响应这个号召的表示。】

——《北平院校教职筹委会代表对各界代表会议感想》，载《人民日报》1949年8月31日。

——原文含标题亦见：何戍双、罗常培、钱端升等：《我们对北平各界代表会议感想》，载《北京观察》2009年11月15日，第Z1期，第23页。

9月2日

费孝通发表个人感想，提及钱端升。

【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一共开了六天会，对我来说是上了六天课，这六天课里学到的抵过了过去六年，甚至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来我所追求的梦想，在这六天里得到了。这是什么呢？是民主。我很早就听说过这民主两个字，五四运动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学生。但是究竟怎样才算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呢？我不明白。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一路遇着各期的学生运动，我跟着跑，为什么呢？为民主。民主究竟怎样的呢？不明白。没有经验，怎能明白呢？长大了，碰着抗战。

从国外回来，抗战已经进入第二年，反动的势力已经在后方高涨起来。我和许多朋友一样，看不惯这局面。怎么办呢？要求民主。民主究竟是怎样的呢？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是不太明白。六年前，我到美国去做文化联络工作，我开始研究这问题。从反动政权底下到罗斯福时代的战时美国，的确

感觉到气象不同。在这时我接触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这种民主比我们当时的封建独裁是好得多。我在美国住了一年，回国以后写了一本书叫《初访美国》。我当时以为我明白了民主了，但是再看看又不太对劲了。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不能调和的矛盾。于是我想我所追求的民主，大概并不完全如此的罢。过了一年多，我又有机会到英国去，那时工党初上台，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我当时希望在工党的英国可以给我看到民主的究竟了。战后的英国给我的印象的确很深，刚从官僚资本统治下的区域出来看到有条不紊的配给制度，印象怎能不深？住了三个月回来又写了一本书：“重访英伦”。我那时说，美国的民主成分很浅，英国则差不多了。但是往下看，又不对劲了。殖民地统治一天比一天加强，军备在扩张，外交上当了美国的伙计，不像一个民主国家应当做的样子。——我们知道民主这个名词已经三十多年，我追求要了解民主也已经有六年多，但是所得到的还是似是而非的东西。最近这六天，我上了一课民主课，所得到的多过于过去的五年，甚至三十多年。

让我更坦白的说，这是出于我意外的。解放以来，我对于共产党钦佩的地方是苦干、负责、谦虚、有办法、不怕麻烦。我爱它，因为许许多多我熟悉的，我爱好的青年朋友，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个个都拼命的工作，中国有希望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已在我眼睛面前完全证实了，但是共产党要实现民主，我很老实说，在参加代表会议之前，我是不敢太相信的。

我不相信共产党会实行民主，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过去所了解的民主是形式的，不是本质的，好像必须投票，必须大吹大擂的竞选，必须像英国的巴力门一般有着“陛下的反对党”之类的节目才算是民主。解放之后，并没有这套形式。第二是我过去所了解的民主是抽象的，形式逻辑的，不是辩证的。民主了，这个社会就不包括专政，两者不能同时存在。因之，我看见解放后的政权有专政的成分也就不能相信会民主了。这些思想上的包袱，感谢这次代表会议，它给我解除了。

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

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带瓜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而他们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望着会场前挂着大大的“代表”两字，不免点起头来。代表性呀！北平住着的就是这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果全是一个样子的人在这里开会，那还能说是代表会么？这许多人并不是由市民普选来的，形式上不够我以往所了解的民主，但是试问英美那一个议会能从普选中达到这样高度的代表性呢？我们要的是选举的形式，还是高度代表性的事实呢？选举是一个手段，如果这手段能提高代表性，那是要得的，如果不能，那就要不得。会场墙壁上挂着的口号里有“实事求是”四个字，我也领会了。这是我的第一课。

我坐下来，听报告。叶市长和谭局长讲到了北平特务活动的情况。我的神经突然紧张起来，记起了几年来在反动统治下参加各种大会的情况。坐在我旁边的是钱端升先生，昆明“一二一”运动开始发动的那天晚上，我们也坐在一起。轮到我上台演讲时，联大校舍四围枪声突起，子弹在头顶掠过。这种景象和现在一比，真是地狱和天堂之别。这个差别在哪里呢？今天我可以安心的在会场里听讲和发言，有的只是融融一堂的温情，没有枪声来威胁了。为什么呢？很明白的，反动派的武装被解除了，反动派的活动被镇压了。这是专政，一点也不错。有这些专政，才有我们在会场里的民主。没有这些专政，我们的会场又会变成西南联大的草坪了。我于是又点头了，领会了民主和专政是怎样结合起来的。这是我的第二课。

我上了六天课。很惭愧的，我对于会议本身的贡献实在谈不上，但是却满载而返，多少年来没有搞通的，在这段经验中我得到了启示。我怎能不衷心的感谢这会议？

回到家里，把几天的报补看了一整天，碰着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在这白皮书里口口声声说中国已经进入独裁政治。如果我没有去参加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可能还会信他的一套胡言。真巧，太平洋的那端闭了眼睛混说的时候，太平洋的这一端却在事实上答复了中国是不是已走上了民主的道

路。我可以做见证：在我们开步走的起点已经超过了美国现有的民主程度，何况，他们每天都在向后退呢？

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只是中国民主的起点。它教育了我。我愿意许多像我一样背有思想包袱的朋友，都能有机会参加这类会议，更进一步在事实中去认识新中国的本质。

（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八月三十一日十九点五十分广播）】

——费孝通：《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载《人民日报》1949年9月2日。

9月5日

钱端升等北大教职员联名发表宣言，痛斥美帝白皮书。

【（平市讯）北京大学教授、讲师、助教、职员顷联名发表宣言，痛斥美帝“白皮书”，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迫使美帝国主义者发表白皮书，公开招认援助蒋介石反动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与破坏中国主权的侵略政策全盘失败，同时揭露其失败之后还要继续发动反对中国人民的新阴谋。尽管白皮书如何歪曲事实诬蔑真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早有认识，今天是加深这种认识了。尽管美帝国主义者还不死心，玩弄花样，企图贯彻其一贯的侵略政策，而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更会团结一致，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新阴谋。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中国人民一定要把它的侵略势力完全肃清。

我们对于美帝国主义援助反动政府，干涉中国的内政与破坏中国主权的种种暴行，曾迭次提出抗议。过去有些人对于美帝国主义还多少存着幻想，白皮书的发表，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使这些人相继抛弃幻想，认清敌友，先后走入中国人民反帝的阵营。同时广大人民，更加巩固地团结起来，展开对美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

现在美帝还妄图分化中国人民的阵营，来反对中国人民民主政权，这是

美国国务院的梦想，艾奇逊的呓语。我们深切了解美帝国主义决不愿放弃其梦想，也一定要尽其阴谋毒计之能事。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觉，加强团结，继续教育自己，揭发侵略阴谋，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和世界人民一道，予美帝国主义以最后的打击。

于永忠、于石生、于道泉、于仙筹、于学文、于德仁、于绍和、弓清源、王达津、王树芬、王寿仁、王铁崖、王岷源、王鸿祯、王春芮、王嘉荫、王大纯、王敬修、王梦麟、王文魁、王叔曼、王希光、王琬坪、王宏德、王克昌、王希祐、王树檀、王学明、王企久、王幼忻、王良佑、王锡英、王英华、王会庵、王懋蔚、王锦江、王铎、王振声、王咏、王森、王淑芳、王利器、王文起、方亮、文重、尹文厚、尹壮华、尹钟毓、孔祥莹、卞之琳、戈乃锸、田德望、石肇彬、左增选、申又彬、任翹青、朱玉珂、朱华安、朱光潜、朱云搏、向达、安美兰、江泽涵、江泽培、吴恩裕、吴之椿、吴国林、吴汝敏、吴钟荣、吴燕宝、吴素萱、李荣、李经熙、李度容、李英敏、李宜燮、李鲸石、李秀贞、李琬、李绍鹏、李文达、李泽咸、李石僧、李永年、李肇特、李之和、李芳、李育民、李志鹤、李哲浩、李美瑜、李秉元、李耀祖、李载平、李由义、李伯时、李覬高、李由义、杜恒俭、余光庭、余厚慈、余叔通、何歆贤、吕德申、沈从文、沈克琦、沈霭如、沈承昌、汪暄、汪克平、汪篔、宋琦、佟志树、冷生明、周祖谟、周炳琳、周作仁、周白吾、周礼威、周彬、周定一、金克木、金文海、金忠厚、金允洁、金恒孚、金维诚、金鉴吾、金岩、金鹏、林大诚、林振网、林芳、林仁涛、林仪一、林书闵、邵克忠、孟昭威、孟广铎、孟国瑞、季羨林、芮沐、姚殿芳、姚淑玉、胡世华、胡钟达、洪继英、施稼、施松卿、苗华殿、俞铭传、俞平伯、俞大缜、侯恩钊、范惟明、姜媛长、姜景熙、涂继武、孙云铸、孙亦梁、孙毓椿、孙树本、孙贯文、孙承谔、高春生、高之秋、高信曾、马毓泉、马玉淇、马文英、马联第、马文昭、马香涛、马坚、马杏垣、马寿枏、马理、马芳若、唐英、唐振芳、唐兰、祝聪骧、祝濂、徐世诏、徐叙蓉、徐福男、徐保定、徐衍、徐宝騷、徐

御良、秦视浩、袁翰青、袁炆、郝诒纯、郝天和、殷元章、耿济安、容肇祖、倪颖庄、梁濂、梁世通、梁廷焜、梁东汉、梁思睿、张克强、张亚强、张文秀、张昌颖、张春华、张书珍、张绍沂、张树槐、张立仁、张润英、张英济、张光则、张炳午、张宜兴、张鑫全、张馥君、张绣鸾、张龙翔、张文波、张敏、张锡瑜、张禾瑞、张宗燧、张友仁、张怀礼、张祥保、张景钺、陈占元、陈鹤龄、陈慧英、陈文炳、陈翠微、陈峥宇、陈汝箴、陈晋、陈崇明、陈厚嘉、陈士林、陈景明、陈振汉、黄邦焕、黄长庆、黄觉非、黄竹坡、黄明信、宿白、曹德彬、陆思泽、陆峻岭、章廷谦、陶宏、郭汝嵩、郭沂曾、郭松年、郭寿康、郭时钦、郭成才、常凤琢、崔文刚、崔德玉、崔季五、许建中、许德珩、许意儒、许淑娴、盛钰、庄圻泰、庄孝德、康伯藩、区学派、阴法鲁、戚世祥、程耀庭、贺麟、曾昭抡、冯至、冯文炳、喻世长、彭瑞聪、彭鉴、彭清杰、童静娴、游国恩、闵庆全、费青、汤用彤、叶藕胥、杨人楩、杨秀善、杨起、杨瑞、杨士廉、杨存忠、杨葆荣、杨贵珍、杨东泽、杨振声、杨翼骧、杨翼振、杨永秀、董愚德、董石如、董乃祥、董同嘉、邬天民、贾嘉瑞、贾惠德、赵广增、赵西陆、赵荣普、赵全章、赵隆勳、赵连璧、赵乃搏、赵竹君、赵梦云、赵耆寿、赵锡霏、赵传珍、赵圭身、赵振声、赵起绪、赵德安、赵思训、赵宝煦、熊正文、管玉珊、翟明德、翟久熙、闻家驷、荣震、臧玉淦、齐声乔、齐长年、齐良骥、刘兰田、刘裕中、刘开祥、刘世泽、刘宝德、刘芝馨、刘文濂、刘椿年、刘永库、刘曾复、刘春芳、刘廷桢、刘广田、刘文桢、刘大眉、刘芝莲、刘禹昌、刘次元、刘冠军、刘寅生、潘惠人、潘家洵、蔡亦平、蒋光远、郑天挺、郑华炽、郑文华、郑昕、郑启佑、邓广鉴、邓志昌、楼邦彦、樊弘、鲁公辅、鲍楠年、卢锡锬、卢植森、卢延荣、卢遇庚、钱顺之、钱学熙、钱端升、阎文儒、龙季和、戴文魁、谢邦杰、谢本善、缪朗山、韩春萱、韩树人、韩春霖、韩镜清、薛琴访、萧维恒、魏建功、魏执权、魏璠、魏毓龄、聂叔明、蓝文卿、关朴、关曼君、关淑贞、关天宠、谭以明、谭承泽、谭元坤、谭曾振、罗常培、罗士苇、庞礼、苏勉曾、苏瑞昌、严镜清、顾崇书、顾适亨、饶毓泰、

龚祥瑞、龚明信、栾汝书】

——《北大教职员联名发表宣言 痛斥美帝白皮书》，载《人民日报》1949年9月5日。

9月8日

钱端升参加北大中共总支等五单位举行的中苏友好座谈大会并做了发言。

【(本报讯)中共北大总支、青年团北大总支、北大教职联、北大学生会、北大工警工会五单位于九月八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联合召开中苏友好座谈大会。参加大会的约有二千左右的师生员工和来宾，礼堂的窗口外都挤满了人。会场的布置朴素庄严。主席台上，在苏联国旗与人民解放军军旗之间悬挂着列宁、孙中山、斯大林、毛主席的巨像，象征中苏人民的团结。大会主席中共北大总支书记叶向忠首先说明了举办大会的目的在于认识苏联，学习苏联和巩固与发展中苏友谊。接着他从中国已由反动派统治的国家变成人民民主国家这一基本形势的改变简短具体地说明了为什么要站在苏联一边以及为什么要认识苏联，学习苏联和巩固中苏友谊。大会讨论分三节进行：(一)中苏关系；(二)学习苏联；(三)中苏友好协会。师生员工发言热烈紧凑，直到主席宣布停止讨论时，还有许多举了好久的手才勉强放下来。最后被邀莅会的陈绍禹同志作了两个半钟头的总结发言。

讨论中苏关系时，大家指出十月革命以前的帝俄对中国的关系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关系；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对中国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苏联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和导师。北大出版部工友列举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援助中国人民的事实，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苏联的强大存在分不开。最后由王铁崖先生总结了大家的发言。

关于学习苏联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苏联和中国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兄弟国家，革命先进的苏联的道路便是中国人民的道路。在回答向苏联学习什么这一问题时，一位工友用坚强的语气肯定的说：要学习苏联怎样把落后的

农业国建设成先进的工业国。他的话被以后的发言人多次引用。一位同学说：我们常说要向老解放区学习，要向工人阶级学习。苏联是世界的老解放区，苏联的工人阶级正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所以我们应该向苏联学习。他简短有力的发言获得了大家一致的鼓掌。后来吴清友先生作了这一部分发言的总结。他特别指出需要学习苏联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及国际主义精神和刻苦耐劳、自力更生的建设精神。

关于中苏友好协会的讨论，先后请了许德珩、钱端升、樊弘、汤用彤四先生发言。许先生号召大家要踊跃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及其各种工作。钱先生说明了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的意义在于有系统有组织地学习苏联，加强对于苏联的认识。樊先生指明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有相互友好的坚实基础和充分条件。汤老先生指出：今天的大会是全北大向苏联学习的开始，以后要有系统地、深刻地从各方面学习苏联，才能做苏联的一个好学生。

大会休息了五分钟以后，在台下的热烈鼓掌中陈绍禹同志开始作总结发言。他首先详尽分析苏联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直接的与间接的、有形的与无形的各种伟大援助。接着说到为什么要学习苏联和学习些什么，他说明，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革命之经验号召中国人民要以俄为师，毛主席指示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路”。现在世界上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经过社会主义走进共产主义的路，就是各国广大人民群众解放幸福以及全体先进人类解放幸福的路；另一条是英美资本家的路，就是广大劳动人民贫困死亡和极少数资本家发财致富的路。同时他从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各方面比较两条路的优劣，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在各方面都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他号召大家热诚地学习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他勉励大家要学习苏联人民英勇奋斗与艰苦建设的精神。并指出：中苏人民的友好团结是一件具有伟大意义的事情，是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重要保障。

最后他称赞北大全体师生员工在大会中表现的团结一致的精神和大会的有组织与有纪律的现象。他希望大家一致遵照毛主席指示：抱着老老实实和恭恭敬敬的态度，向苏联学习，踊跃地参加中苏友好协会。

陈绍禹同志在长久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他的发言。最后由大会主席号召北大全体师生员工从这个会后有系统地经常不断地认识苏联，学习苏联，踊跃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巩固与发展中苏友谊。并报告了化学系与医预系两系全体同学发起参加中苏友协的签名运动。

大会一直进行到深夜十二时，到会的以及挤在窗外的师生员工都一直保持着兴奋、愉快的情绪，会场没有一点松懈的现象。这是北大党总支第一次公开地和群众团体联合举办的一个大会，大会在热烈的欢呼“巩固中苏友谊”，“向苏联学习”，“斯大林万岁”，“毛泽东万岁”声中结束。】

——北大通讯组：《北大中共总支等五单位举行中苏友好座谈大会 二千余人热烈讨论学习苏联 陈绍禹同志出席作总结发言》，载《人民日报》1949年9月12日。

9月18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

【（新华社北平十九日电）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十八日在平成立。该会发起人会议于昨日上午举行，出席者计有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陈毅、高岗、马明芳、聂荣臻、黄克诚、张奚若、章伯钧、谭平山、王昆仑、罗隆基、钱端升、沙千里、王炳南等共一百二十人。由林伯渠主席。

林伯渠致开幕词说：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成立的目的是要团结全国从事新民主主义政治研究和实际政治工作的朋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研究中国社会和国家性质，研究中国的政治史和政治制度。林伯渠在分析中

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于中国，形成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之后说：“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政治理论与实际，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和努力参加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

接着阎宝航报告发起人会议筹备经过，王昆仑报告新政治学研究会暂行简章初步草案后，会议通过筹备会组织办法，并选出于振瀛、王炳南、王昆仑、吴茂荪、吴觉农、汪季琦、沙千里、林伯渠、周恩来、金仲华、宦乡、高崇民、陆定一、章伯钧、孙晓村、陈绍禹、张东荪、张奚若、许宝驹、曹孟君、梅龚彬、闵刚侯、乔冠华、雷洁琼、杨明轩、杨刚、潘震亚、潘汉年、邓初民、赖亚力、齐燕铭、钱端升、阎宝航、谭惕吾、罗隆基等三十五人为常务委员，并推举林伯渠为正主任，陆定一、张奚若、王昆仑、高崇民为副主任；阎宝航和赖亚力、吴茂荪分任正副秘书长。

会议中，周恩来副主席曾讲话，上海市市长陈毅报告了上海行政工作经验，张奚若、章伯钧、谭平山等也都作了讲演。】

——《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在平成立》，载《人民日报》1949年9月20日。

9月20日

钱端升入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四〇、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陈伯达、陈绍禹、范文澜、谢觉哉、邓初民、王学文、艾思奇、何思敬、翦伯赞、侯外庐、张志让、阎宝航、钱端升、樊弘、吴觉农

候补代表：李木庵、胡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载《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日。

9月21日

钱端升在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成立。包括钱端升在内，共有来自46个单位的代表662人参加此次政协会议。

【解放不久，我就以社会科学界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由中国共产党召集的，有各民主党派、团体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大家共商建国大计。】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8页。

9月22日

董必武做“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报告，提及钱端升。

【（新华社北平二十二日电）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第二日，董必武代表人民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作了“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董必武首先报告起草经过说：

本组组长、副组长和组员一共二十五人，参加筹备会的二十三个单位，除了文化界民主人士以外，均有代表参加。六月十八日举行第一次小组全体会，广泛的交换了意见，并推举张志让等七人准备讨论提纲。七月八日本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就根据提纲起草委员会所提“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基本意见趋于一致，并推定了董必武、张奚若、阎宝航、王昆仑、张志让等五人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起草委员会先后开会三次，并征询了钱端升、王之相、邓初民等专家的意见，写成了政府组织法的草案初稿，又于八月十七日召开本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了组织法的初步草案，提交新政协筹备会的常务委员会。八月廿七日第四次常会指定了黄炎培、马叙伦、张奚若、李立三和本人对初步草案再研究修改一次。九

月十三日第五次常务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作文字修改后，在九月十七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作了原则的通过。

董必武继对组织法草案的几个问题加以说明。他说：

一、国家名称问题：我们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二、国家属性问题：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所以必须把今天人民民主专政中阶级间的关系讲清楚。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和四个阶级的联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特质，这是大家所同意的了。

三、政府组织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它具体的表现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即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与旧民主主义三权分立的原则相反。旧民主主义的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中当权的一部分人容许另一部分的少数人，所谓反对派，在会议讲台上说空话，而当权者则紧握着行政权柄，干有利于本身统治的工作。这是剥削阶级在广大人民面前玩弄手腕，分取赃私，干出来一种骗人的民主制度。司法名义上是独立，实质上同样是为当权的阶级服务的。我们不要这一套，我们的制度是议行合一的，是一切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

四、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

全体会议，即本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出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出的全国委员会即成为国家政权以外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协议机关。

五、政府组织法草案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有十项职权，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

六、政府组织法草案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并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

接着，董必武说明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的若干个别问题。董必武说，草案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选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并由政府委员会互选秘书长一人组成。不设常务委员会，政务院的主管人员称为总理。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务院的提议，任免或批准任免各大行政区及省市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及主要的行政人员。这里，用“批准任免”的字样，因为有的行政区和省市的人民政府，其主席、副主席如果是选举出来的，则中央人民政府只批准其任命。

董必武最后说到政务院的组织问题，按照政府组织法草案，政务院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总理一人，副总理若干人，秘书长一人，政务委员若干人组成之。政务委员得兼任各部的部长及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政务院总理主持政务院全院事宜，政务院副总理及秘书长协助总理执行职务。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及三十个部、会、院、署、行。上述四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指导与其工作有关的部、会、院、署、行。对此，董必武解释称：

一、政务委员得兼任各部部长及各委员会主任，这就是说，部长和主任委员不一定是政务委员。我们政务院下有三十个部、会、院、署、行，如果他们的首长都是政务委员再加不管部的政务委员则政务委员人数太多，政务

会议也就不易开好。

二、政法、财经、文教等三个委员会列为一级，以便协助政务院，联系和指导有关的各部门工作。各部门的工作受双重领导，即一方面受政务院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受其所属的指导委员会的领导。

三、人民监察委员会是监察行政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的，与检察署不同，隶属政务院比直接隶属于中央人民委员会更能与行政机关接近，熟习实际情况，便于执行职务。

四、政务院下设的专管行政部门共有三十个，这因为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应转向建设，不能不多设几个部门去管财政经济的工作。我们在草案中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于政务院的各委、部、会、院、署、行、厅于必要时得决议增加减少或合并之的规定，有了这样有弹性的条文，政府便好办事了。】

——《董必武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拟的经过及基本内容》，载《人民日报》1949年9月23日。

10月1日

钱端升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开国大典，心情万分激动。

【1949年10月1日，我荣幸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看到象征着张洪国真正独立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见《义勇军进行曲》威严的声音，不禁热血沸腾。我意识到，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昌盛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将会不知疲倦地从事祖国需要我做的工作。】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8页。

10月2日

钱端升进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会主席团。

【(新华社北京二日电)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会主席团名单如下:

宋庆龄、郭沫若、林伯渠、刘宁一、马寅初、李德全、钱俊瑞、陈家康、柯在栎、萧三、张奚若、邓初民、丁瓚、许德珩、宦乡、许广平、吴耀宗、李立三、朱学范、李时良、周颖、李凤莲、张晔、刘玉厚、戎冠秀、蔡畅、陆瑾、张琴秋、沈兹九、曹孟君、范小凤、沈雁冰、周扬、田汉、洪深、郑振铎、曹禺、夏衍、梅兰芳、马思聪、丁玲、廖承志、冯文彬、钱三强、龚澎、高棠、李秀贞、范文澜、陶孟和、钱端升、李达、翦伯赞、金仲华、扬刚、梁希、竺可桢、林砺儒、叶圣陶、吴羹梅、俞寰澄、赵朴初、刘良模、李承乾、白扬、赛福鼎、奎壁、吴鸿宾、陈嘉庚、陈其瑗、刘思慕、陆志韦、吴贻芳、邵力子、卫小堂、马宁、徐特立、陆定一、何香凝、余心清、赖亚力、周新民、辛志超、胡愈之、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马叙伦、周建人、雷洁琼、彭泽民、张云川、沙千里、千家驹、章曼筠、谭平山、陈铭枢、王昆仑、陈此生、陈其尤、袁翰青、谢雪红、马明方、薄一波、陈毅、高岗、黄克诚、张云逸、黄敬、杜国庠。】

——《宋庆龄郭沫若林伯渠等百零五人为大会主席团》，载《人民日报》1949年10月3日。

10月6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召开常委会议。

【(北京讯)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于六日下午七时在该会会址(御河桥二号)召开常委会议。出席常委彭真、张奚若、钱端升、余心清等二十余人，会上推定彭真为临时主席，继由秘书长萧松报告筹备工作。最后决定本月九日下午三时假中山公园中山堂开成立大会，同时邀请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参加。大会将听取筹备工作报告，并通过会章，产生第一届理事会。晚间在音乐堂举行晚会，邀请苏联红军歌舞团及出国文工团演出。】

——《北京中苏友好协会明开成立大会 将邀苏联代表团参加》，载《人

民日报》1949年10月8日。

10月9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

【大会在奏中苏两国国歌后，选出了彭真、聂荣臻、张奚若、张友渔、赵振声、余心清、韩卓儒、许德珩、钱端升等三十二人为主席团。大会由彭真致开幕词。他在讲话中指出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自筹备以来，到目前已成为京市最大的群众团体之一，这说明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有深厚的基础的，这种友谊是任何中外反动派的挑拨、离间、诬蔑、破坏所不能动摇的。他着重指出：学习苏联，加强中苏友谊与合作，就是中国人民最高的利益。破坏中苏友好就是危害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指出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总的任务是沟通中苏两国文化，介绍苏联各种工作经验，特别是经济、文化建设上的经验。当前的具体的工作是：（一）广泛进行中苏友好的教育，彻底肃清敌人的各种欺骗宣传所残留的影响；（二）继续发展会员；（三）在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成立分会、支会，每个分会、支会要有专门负责会务的工作人员；（四）开展学习俄文运动；（五）大量设立图书馆、阅览室，介绍苏联报纸杂志和书籍；（六）组织苏联的电影、歌舞、戏剧的演出。接着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友渔讲话。他说：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成功、革命的胜利，以及目前的建设，都是由于得到苏联最大的帮助的结果。现在和将来的建设工作，更需要苏联友人的帮助。他警告大家说：中苏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是要尽一切力量来破坏中苏人民的团结友爱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大大地宣传中苏友好关系，一方面要打击破坏中苏友好关系的敌人。】

——《彭真致开会词，号召推行中苏友好教育彻底肃清敌人欺骗宣传继续发展会员成立支会》，载《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0日。

【（北京讯）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选出之正副会长、理事名单如下：

会长一人：彭真

副会长十一人（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之相、吴晗、余心清、张友渔、张晓梅、张奚若、许德珩、曹靖华、黎锦熙、刘仁、萧明

理事一百四十七人（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仲三、王文斌、王学珍、王率从、王坚章、王乐天、王斐然、王甫、方亮、巴乾、孔厥、田伦、左奇、古奇踪、丘谔仑、安岗、多杰才旦、李乐光、李伯钊、李连山、李佩之、李如蘅、李复生、李锐、李桦、宋风祥、宋国藩、宋如芬、何戊双、吕应中、邢赞亭、邢其毅、余贻侗、周仁、周文龙、林鉴生、林葆骆、季克、孟昭江、柳湜、柴泽民、岳玛莉、胡秀魁、段宝林、徐英超、徐悲鸿、徐楚波、晁涌光、翁独健、孙以恕、孙孚凌、马玉槐、马约翰、郝人初、高存信、高云超、张鸿舜、张大中、张秀岩、张月霞、张曼筠、张文奇、张澜庆、张维、张傲、张永山、张云波、陈铭德、陈君平、陈昆惕、陈文润、陈鼎文、崔月犁、崔映国、许宝骥、许宝騄、许立群、郭则忱、梁柯平、梁以俦、陆志韦、曹志麟、冯佩之、冯法祀、曾平、曾昭抡、贺绿汀、贺冀张、黄浩、华南圭、傅种孙、费青、费孝通、程宏毅、程秋原、汤用彤、杨蕴玉、杨宝俊、杨葆嵩、杨造新、杨伯箴、路懋、董谓川、雷洁琼、叶浅予、叶企孙、宁泽、赵振声、赵聪、赵紫宸、浦洁修、熊天荆、翟林栋、廖沫沙、裴文中、刘清扬、刘俊英、刘一峰、黎哲闲、樊弘、诸福棠、邓拓、萧松、萧靖、钱端升、钱三强、钱伟长、韩诵裳、韩卓儒、薛子正、薛成业、萨空了、戴爱莲、谢道渊、聂荣臻、谭政文、谭元坤、罗三都、罗常培、罗文芳、魏学信、严镜清、严济慈、苏民、饶毓泰、顾德。】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 正副会长及理事名单》，载《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0日。

【（北京讯）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于九日上午在中山公园内中山堂举行成立大会。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代表与苏联专家的出席，更使大会自始至终充满着兴奋愉快和中苏两国人民亲切逾常的友爱。大会在进行每

项程序以后，“毛泽东主席万岁！”“斯大林大元帅万岁！”的欢呼声和掌声响彻全场。出席大会的有彭真、张友渔、余心清、许德珩、钱端升、梁思成、柴泽民、张晓梅、萧松、薛成业、古奇踪、孙孚凌、刘一峰、刘仁、薛子正、马玉槐等四百一十人，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工人、学生、农民、妇女、工商界及北京中苏友好协会各分会、支会的代表。出席大会的苏联友人有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代表苏联生物科学博士斯托列托夫、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远东部副部长马尔柯夫、新任苏联北京代理总领事谢列金及市政专家等二十一人。当苏联友人鱼贯入场时，全场代表都鼓掌欢迎，历久不息。】

——《巩固发展中苏友谊沟通两国文化 北京中苏友好协会成立 彭真王之相等当选会长副会长》，载《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0日。

10月16—17日

北大教联成立，钱端升被选为出席北京市院校教联代表之一。

【（本报讯）北大教职员联合会（简称北大教联）经过了三个多月的筹备，于十五、十六两日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北大教联系由北大教授会、讲助会、职员会合并而成。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罗常培在开幕词中指出：教联的成立表示了北大教职员的空前大团结。教联的任务是：团结全体教职员加强政治学习与业务，确立工人阶级的立场和观点；进一步团结工艺，准备参加工会；并不妨碍国家社会的利益下谋取同人的福利。大会在两日的议程中讨论并通过了教联的章程、教联的工作方针及代表提案三十余件，选举了季羨林、费青、谭元垚等廿三人为教联执行委员及钱端升、向达等四十六人为出席北京市院校教联代表，通过了教联成立宣言及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并祝贺广州大捷的通电。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高教会副主任钱俊瑞、吴晗、市总工会筹委会主任萧明、北大校委会主席汤用彤均应邀出席大会讲话。吴玉章说明了各阶层人民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团结与组织的重要，并勉励大家注意清除官僚主义的倾向，彻底走群众路线。钱俊瑞指

出教联应团结广大教职员，加强自我教育与改造，确立工人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成为一支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而奋斗的战斗队伍。萧明指出北大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密切关系，继而报告了北京工运概况。最后建议教联加强组织，将来加入市总工会。中共北大总支委会、青年团北大团委会、北大学生会、北大工警工会均派代表出席致贺词并向大会献旗。“新北大”墙报出大字报表示对于教联成立的热烈庆贺，指出教联的成立是师生团结与展开新民主主义学习的有力保证。】

——北大通讯组：《团结教职员加强学习 北大教联成立 吴玉章等出席大会讲话》，载《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8日。

10月19日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委员名单公布，钱端升入选其中。

【（新华社北京十九日电）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人选如下：

主任：

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副主任（四人）：

马叙伦（中国民主促进会），

陈伯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克思列宁学院副院长），

陆定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沈雁冰（作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委员（四十二人）：

周扬（文化部副部长），

丁燮林（文化部副部长），

钱俊瑞（教育部副部长），

韦恂（教育部副部长），

李德全（卫生部部长），

- 贺诚（卫生部副部长），
苏井观（卫生部副部长），
李四光（科学院副院长），
陶孟和（科学院副院长），
竺可桢（科学院副院长），
胡乔木（新闻总署署长），
胡愈之（出版总署署长），
徐特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柳亚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张东荪（中国民主同盟，教授），
费孝通（中国民主同盟，教授），
吴晗（中国民主同盟，教授），
刘清扬（中国民主同盟，北京新中国女子职业学校校长），
潘光旦（中国民主同盟，教授），
李达（无党派民主人士，教授），
符定一（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字学家），
沈志远（中国人民救国会，教授），
陈此生（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理事），
蒋南翔（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副书记），
沈兹九（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宣教部部长），
谢邦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欧阳予倩（作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丁玲（作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田汉（作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阳翰笙（作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巴金（作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钱三强（自然科学工作者，教授），

陈鹤琴（教育工作者，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院长），
 江恒源（教育工作者，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
 李步青（教育工作者），
 艾思奇（社会科学工作者，教授），
 翦伯赞（社会科学工作者，教授），
 侯外庐（社会科学工作者，教授），
 钱端升（教授），
 曾昭森（教授），
 雷洁琼（教授），
 沈体兰（教授）。】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委员名单》，载《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0日。

10月21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钱端升担任委员。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电）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今天上午举行成立会。出席的有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副主任马叙伦、陈伯达、陆定一、沈雁冰和委员三十五人。缺席的委员七人。

郭沫若主任在宣布文化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时说，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后，将担负新中国文化教育建设的重任，望全体委员一致努力，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接着由胡乔木说明文化教育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该草案将于日内征集各委员意见修正后送政务院核准。文化、教育、卫生三部，科学院，新闻、出版两总署的负责人随后分别报告各该部门的机构和人事的现状。会议决定各部、院、署应即迅速筹备成立。会议程序的最后一项是讨论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宣传问题。会议决定由沈雁冰、陈伯达、胡乔木、胡愈之、李德全、贺诚、周扬、沈志远、陈此生、钱俊瑞、艾思奇、吴晗、钱端升、费孝通、侯外庐等十五人组成小组对这个工作加以专门讨论，并以

沈雁冰为召集人。】

——《政务院所属四委员会昨举行首次会议 文化教育委员会郭沫若主任号召全体委员 迎接新中国文化建设高潮》，载《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2日。

10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观察》复刊号当天出版，实际上根据《观察》复刊号标注的日期，复刊号出版日期为1949年11月1日。

钱端升发表《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一文。

【北京社址：北京交道口大街北吉祥胡同二号

电报挂号：六〇三四

上海社址：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七二号内一号

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 本社同人

专论

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 钱端升

共同纲领中的经济政策 樊弘

世界和平与中苏友好关系 翁独健

怎样把我们的经济学习提高到毛泽东阶段 吴大琨

建议与方案

中央各部会内部组织的原则与方式 龚祥瑞

学术与研究

孙中山从美国走到苏联 胡绳

介绍与翻译

苏联经济制度的轮廓和神髓 观察编辑部

观察通讯

上海解放以后金融、轻重工业、商业情况的总报导 观察上海通信组集体执笔

解放以后的开滦矿区

观察记者

附录

观察社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迫害经过追记

集体执笔

欢迎批销定阅

本刊半月一期，逢一日、十六日出版。每份售人民币五百元。欢迎各地同业汇款批销，七折优待提前寄刊。

纪念复刊，优待读者，在十一月底以前直接向本社定阅者，三个月六期收费二千四百元，半年十二期收费四千八百元。平寄免邮，挂号每期另加挂号费二百元。】

——《观察 复刊号·今日出版》，载《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8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举行第三次政务会议。钱端升等被周恩来指派研究政府各机关外国文字译名问题。

【（新华社北京二十八日电）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今日举行第三次政务会议，出席者周恩来、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谭平山、谢觉哉、薄一波、滕代远、章伯钧、李立三、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会议由周总理主持。议程第一项为报告事项。首由董副总理报告紧急防疫会议情形。政务会议决定加派政务委员黄绍竑参加中央防疫委员会。继由周总理报告政府各机关外国文字译名问题，会议决定指派李立三、罗隆基、邵力子三委员及张奚若、钱端升、乔冠华等进行研究。会议第二项议程为讨论事项。通过《政务院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并决定限令所属各机关根据该通则制定组织条例草案，于十一月五日以前呈送政务院，由政务院交法制委员会先行审议。关于接收前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人员、档案、图书、财产、物资问题，会议通过《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限令该委员会从速成立，开始工作，并决定该委员会在政务院内办公。议程第三项为任命事项。会议一致通过绥远省人民政府名单，呈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任命。最后，通过任命政务院参事三十二人。】

——《政务院开第三次会议 通过所属各机构组织通则 任命四委员会秘书长及各局局长 呈请主席批准任命绥远省政府名单》，载《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9日。

11月1日

《观察》复刊号正式出版。钱端升发表《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一文。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钱端升以社会科学界代表的身份，参加这一盛会。钱端升后来即以这次政协会议的观感为主，为“说明人民政协的意义和记录人民政协的成果”，撰写《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一文，“以政治学家的身份阐发新中国的政治设想”。

该文大纲如下：

- 一、人民政协与继往开来。
- 二、统一战线与大团结。
- 三、人民的政权与民主集中制。
- 四、共同纲领与稳步前进的建设。

这篇文章是钱端升独立署名发表的第一篇赞颂新政权的文章。其结尾数段话，即可以看到他的欣喜之情于文风的巨大变化：“凡此种种，大家都明白，均得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新民主主义适应了中国革命的需要，也照顾到中国全体人民的利益。人民拥护了共产党，共产党也依靠了人民。在领导的党与人民相互结合之下，统一战线组成了，人民政权建立了，建国纲领也有了共同的方案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这是毛主席的伟大。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再比如，“建设新中国今后不是没有困难的。但建设的困难终将为中国共产党所克服，为毛主席所克服，为中国人民所克服。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做了继往开来的工作。统一战线内的各个阶级，各个分子，今后必将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以群众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诚如毛主席所说：‘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

者，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这是可以预期的。”

——钱端升：《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载《观察·复刊号》1949年11月1日，第6卷第1期，第6-9页。

11月13日

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备委员会，钱端升担任临时主席并入选主席团。

【(北京讯)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备委员会已于昨(十三)日正式成立。该会由院校教联、中小学教联与各院校中小学工警分别选出筹备委员二百六十四人组成，昨日在中法大学礼堂举行第一次筹备委员全体会议。临时主席钱端升宣布开会后，即推选出钱端升、罗常培、何戊双、张云波、许京骐、薛成业、孟昭江、陈乃甲、温塞江、张仲玲、张衡钧、刘勇、赵广济、张德福、王鸿轩等十五人为主席团，并推定罗常培、薛成业、张德福三人为执行主席。继通过筹委会组织条例，并就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章程草案初稿作初步讨论，经一致决议交各院校与中小学广泛展开讨论，将修正意见交筹委会常委会整理，拟成正式草案。会议继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 凡北京市院校教联会员，各院校工警会会员，及中小教联会员一律作为本会会员，不再重行登记，其不愿参加工会者可声明不参加。(二) 北京市教育工作者第一届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四百五十至五百人，每会员四十人选举代表一人，尾数在二十人以上者可加选一人。每个工会，其会员人数在四十人以下而满二十人者亦得推代表一人。(三) 代表大会会期、地点授权筹委会常委会决定。(四) 第一届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基本任务为：讨论并通过本会章程；依据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文教政策讨论本会当前工作的方针与任务；讨论并通过代表提案；选举本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合各地教育工作者，发起组织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工会。根据以上任务授权筹委会常委会

拟定代表大会议程草案。北京市总工会筹委会主任萧明致词中指出：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委会的成立，是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大团结的表现。他并说明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组织在一起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这种团结，将在保证首都文化教育计划的完成上有很大的意义，并将在全国起推动作用进而起模范作用。他代表市总工会筹委会预祝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备工作的胜利完成。继又对即将在北京市举行的亚洲、澳洲工会会议的性质和任务，作了详细的说明。并宣布已得中华全国总工会通知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备委员会应推选院校教联员与中小学教联员代表各一人，参加亚澳工会会议。萧明讲话后，经过分组讨论一致选举罗常培、张杰为出席亚澳工会会议代表；吴玉章、何戊双、赵征夫、钱端升、谭元堃、张澜庆、胡原凌、张云波、严景耀、蔡善昌、王玠、徐悲鸿、王序、张锡钧、萧雷南、卢稚宗、叶笃庄、傅倩、韩碧文、尹肇竑、郝金禄、（政法大学一名保留）薛成业、梁以侗、伟英高娃、金魁之、温寒江、孟昭江、杜光天、王恺庭、宁泽、田纶、陈君平、汪金丁、韩焕堂、翟林、张杰、陈乃甲、张廉云、张仲玲、常寿保、朱丹、李成吉、王静、赵广济、韩师忠、张德福、赵凤山、王靠义、王文顺、孙书元、王鸿轩、尹山、王玉秀、丁维忠、刘魁、梁锡侯、刘启祥、屈清泉、张衡钧、刘勇、阎林、李佐、瑞光明、张敬一等六十五人为筹委会常务委员。最后由钱端升致闭会辞后散会。】

——《教育工作者工会京市筹委会昨成立 将联合各地发起筹组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工会》，载《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4日。

11月15日

余叔通发表文章，谈改制中的北大法律系，提及钱端升。

【暑期中，北大法律系便酝酿着进一步的改制。上学期，由于他们全体师生的努力，曾经作了一次初步的急需的改革，停开了很多法律科目，增加五门新课程；因此率先推动了各大学文法学院中广泛的课程改革，收获了一定效果。这些改革在当时虽然是必要的，但却还是没有很详细的系统的研

究，同时也自始便准备在半年试验后根据发现的优缺点来作更完善的改革。六个月来，他们便一直在细心摸索着，因此，当高等教育委员会邀请专家组成课程改革研究小组开始工作时，北大法律系便有可能提出较成熟意见，和提供有意义的经验供研究小组参考了。在这一段期间，系里教授、讲助、同学总结了上学期临时课程改革的工作，认为是有成绩的，在刚解放的形势下，这样的改革起了它一定的作用，但当学习环境比较安定了，要求课程的比较正规化时，上学期的改革便显得不够了。大家都觉得上学期：一、过分强调了集体学习，一下子组织了三四个讨论班没有重点地去掌握一两门功课，吸取经验，这样，讨论之先没有充足的准备，而领导上因为照顾不来而显得松弛，结果任何一门也不易搞好，使大家对集体学习容易失去信心；二、废止了大部分业务课，在当时是需要的，但从长期来看，还应该分别课程之应改造和应废止的加以不同处理，另一方面，政治课程应该占主要地位，但不应等于包括全部课程；三、在新课程学习中没有领导大家联系实际，因此部分出现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或经院式的学习。

由于这些认识，大家又分析了今天法律教育问题所面对的基本情况是：反动的法律已经废止，人民自己的法律体系又正在草拟创建中，现行法令不多，新的教材和师资是缺乏的；其次，同学们一般地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还很不够，特别是马列主义的国家观、法律观、社会观，必须作为一切业务学习的基础明确地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师生从旧社会带来的旧思想意识，应该在学习中不断地改造，才有可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民法律干部；而且旧的教学方法已经证明不能适应今天的学习了；大家又估计到现在由于革命形势的急遽开展，各地需要法律干部很迫切，因此同学必须在学习中准备有足够的基本知识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便能随时胜任地走上工作岗位。

根据这些条件和这样的了解，北大法律系遵照了当时还在作最后讨论修改中的《高等教育委会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经过广泛征求同学意

见和两次系务会议的详细讨论后，正式布置本年度的学习。

依照这个规定的原则，结合北大的具体情况，他们规定了：

一、全系必修政治课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并指出目的在于通过这科目的学习来改造思想，破坏旧的思想，培养马列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逐步地建立共产主义人生观。

二、政策与法令为各年级必修，教授全体参加指导这门功课。旧的学习法律是把法律孤立起来，用的从概念到概念的方法，是要摒弃的。正确掌握党的政策法规的精神是对新的立法司法干部的最基本要求，要学好法律，做好法律工作，就必先认真地学习政策法规，这一门课并试行采用新的教学方法。

三、增开马列主义法律理论，马列主义名著选读和政治经济学分别为各级的必修或选修科目，前两门后来请何思敬教授来校讲授，并适当地组织讨论，但不规定作定期讨论，以免讨论班太多了。

四、业务课时间加以压缩，尽量依据新的司法经验和立法材料来讲授，科目是依照高等教育委员会规定就各年级学生程度开设为各年级必修或选修科，并特别着重指出要批判地学习。

五、普遍地号召同学选习俄文，以为接受并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先进法学理论的准备。

这样的课程公布后，同学们曾存在着不少思想问题，疑问很多。例如有人以为政治课太重了，或者问政策法规中能找到什么法律学？有些同学完全不信任集体学习，认为浪费时间，于事无补；有的说北大是正规大学，不能用华大、革大那一套教学方法。积极的同学觉得能够聘很多新教授，开很多新课最干脆、最理想，却不知道新的法律教育的经验还得大家埋头认真地摸索创造。大部分的同学在最初不大相信师生互助、教学相长的原则。有一些同学片面地认为要建立新的，必须钻研高深，先搞好旧的。也有人不同意批判地接受与研究的提法。对政治课的看法也分歧得很，有人是自封彻底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己思想已经不必改造了，或者以为上学期已经念过社会发展史和新哲学，尽可不学了；另外一些人则以为不这样，就得念些大部头的

马列、哲学书籍、社会学等，不肯承认或不了解这改造思想课程的目的和重要性。

系会首先开了联欢会，由行政负责人报告了课程计划，先在同学思想上作酝酿，并鼓励大家明确选习政治课的意义。同时，暑期参加党训班学习时的、参加工厂工人教育工作的、参加法院审判实习的同学，分别报告了学习方法和心得，说明了掌握政策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性。并随后在同学中展开关于新民主主义学习的讨论，根据系方课程及系会的学习具体计划，在小组中结合本系所开课目、内容、教学方法来进行检讨，以便作积极建议及计划；在迎新大会上，用漫谈方式从很多学习上、生活上、行政上的实际问题谈起，最后归结拢来解决几个在同学思想中还不够明确，还有怀疑的问题。这样，依靠了行政上、教授、讲助、全体同学的共同努力，大家都进一步了解这个课程规定的精神，要贯彻这精神，必须做些什么？必须怎样做？大家都知道单纯从课程名目上来估量这个规定是不够的。应该：1. 保证政治课学习能真正地联系思想实际，暴露思想，改造自己的思想，学好政治课是最主要的。2. 必须师生结合，才有可能师生互助，教学相长，坚持了这样的原则，便容易解决横梗在旧大学眼前的师资教材的困难和一改从前刻板的填鸭的教学方式。3. 要在业务课中，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思想、理论进行斗争，批判地接受正在改造中的业务课。4. 政策法令要多花时间去学，并以此为起点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学好政策法令，才能学好其他业务课。5. 要好好理解并采用“自学为主，集体为辅，教员从旁协助”的方式，既反对关门的完全个人学习，也反对没有准备的、没有自学基础的形式主义的集体学习，同时要去除依靠教员、依赖报告的想法。

很快地，同学的小组建立起来了，今年同系级的同学都集中住在一起，开讨论会、检查学习、互助都有很大方便；小组是依照寝室划分，并把生活小组和学习小组结合起来，使领导统一，纠正了把生活和学习机械地分割开的错误，生活是为了保证学习，也唯有生活得愉快安定和有规律才能学习得

更好、更有效率。为了使师生结合，一道学习，全系教授、讲助、研究生每人都分别参加一个小组，最初好些人不赞同这样的做法：有些教授深恐时间不够，妨碍自己学习；有些教授觉得到学生宿舍去不方便；也有人认为这样一定不容易开好讨论会。可是，经过两周试验后，大家看法都改变了。系主任说同学们提出很多的问题原来是自己连想也没有想到的；一位教授说原来不很同意这样做，但参加小组后觉得时间用来参加同学的小组不但不可惜，而且对自己进步帮助很大，自己也年轻起来，而且纠正了自己很多自高自大的想法；另一个小组因为学习中接触到很多专门问题，立刻有教授给解答了，觉得蛮满意，个别的教授主动地找小组同学在课外谈话，讨论问题。本来，北大法律系教授在教学之外，还都多少协助政府做一部分立法工作，时间忙迫，但参加小组还是异常热烈，这一点对于同学也鼓励很大，有一个同学说不应该不好好准备呵！这种新的师生结合的方式在旧制大学中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在北大法律系的初步试验，证明是可以采用的。

政策法规课除了全部教授参加外，同学也参加了领导学习，这是一门新的课程，既没有现成教材，也没有现成师资，更没有很完整的经验可供参考。系里便先成立包括教授、讲助、研究生、同学的工作委员会，进行搜集资料，剪报，制索引，拟订学习进度、题目、重点等。这一个学期准备学习的是：1. 城市政策：包括城乡关系、城市政权组织形式、工商业恢复与发展等问题；2. 乡村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减租减息、民主建政、城郊土地处理等问题；3. 财经政策：包括金融、贸易、外汇、财政等问题；4. 劳工政策：包括劳资关系、劳工立法、工会工作、劳动保险等问题。下学期才学习新司法制度、婚姻法令等。方法是首先指定主要资料发给同学阅读，然后由负责该题目的教授作启发报告，拟发大纲小组讨论，根据会报中的问题归纳作解答，每一阶段学习完毕后，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负责人员来校作总结并解答还没有解答的问题，在这样的学习中充分运用新的教学方法，实现“师生互助、教学相长”的原则。目前已经先进行了两个多星期关于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学习，邀请了张志让、何思敬、许德珩、钱端升、樊弘、袁翰青、王

铁崖、楼邦彦等教授分别作共同纲领各章报告，每一次报告礼堂都挤满了人，小组讨论热烈，把政协文件作为正课学习，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旧大学是在一步一步的改进中，大家应该更努一把力。

政治课在听完艾思奇同志关于学习目的与方法的报告后，小组及大班的讨论上关于自学的问题，关于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问题，关于先要有正确立场来学马列主义还是学习马列主义来建立正确立场问题，都被提出来并卷入讨论和争辩中。个别小组互相保证一定要学好政治课，渐渐明白思想改造的必要。系主任自己担任政治课教员，第一堂他便说我也是来学习的，我的思想也要改造，这门课要搞好要依靠大家共同努力；有些小组已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有些同学对讲授得不适当的地方和教学法不完善的，都通过小组提出意见，教授们也有自动征求同学对他所授课程的意见的，这种情形在解放前是没有的，就是在改制前也很少有这样的事情，今天，大家对学习负责了，只有在不断的改进，才能够使正规大学真真担起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责任。在学习中，同学提供很多积极的建议，谁都知道要把教育办好，教得好，学得好，必须行政、师生来个大合唱。

最近的一次系务会议上，初步地改变了以往的繁琐事务主义作风，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是讨论学习问题，听取了同学学习情况的反映，并且就可以立刻解决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检查关于贯彻规定和教学方法的情形，和同学不细心自学，只依靠集体学习的偏向；对于教授参加小组作了很久讨论，议决加强大课领导，吸收同学系会学习干事参加学习领导机构等，这虽然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在旧大学里系务会议上，好好地进行研究同学学习情形，并讨论如何更好地领导学习，而不是只作一些行政事务的争论，这转变在整个教育的改造过程中，是值得重视的。

经过了改制，法律系的同学学习情绪空前地高涨，小组会除了病假外很少缺席的，晚上不是上课便是讨论会，要不便是自修；张志让先生的宪法原理因事请假，同学要求在礼拜天也给补课，同学们又要求大量地供给更多参考书籍和学习资料，讨论会中发言普遍是热烈的，准备不足的受到了批评，

有自动点名的，有成立互助小组监督并互助学习的，有互订学习计划的，大家都有信心地要努力训练自己为一个有用的镇压反动阶级，维护劳动人民利益，巩固人民民主国家机器的人民法律干部。

从这一段改革中，可以看到在执行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课程规定时，就要求各院系要真真地掌握这规定的精神，采取其他适当的必要的步骤来保证这一规定的真正目的的实现；党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每一个在文化教育工作岗位的人员，都应该耐心地认真地贯彻“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方针，有步骤有计划地来改造旧教育旧学制，哪怕是一点小小的收获，积累起来，推广开去，便有可能最终地攻破并夺取旧的文化堡垒。其次我们应该看到行政上明确地了解政策精神对改制工作是很重要的因素，同学应争取行政进行有益的改革，行政上又须经常研究和解决同学的问题。在改革中党团员应起积极带头作用，帮助并发动同学来解决学习上的问题，保证政策的贯彻。同时，在执行改革之先，要深入了解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结合自己院系的具体情况来执行上级规定，另一个应该归结到的经验教训是：一定要动员群众思想，了解为什么这样改，改了有什么好处；并时刻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困难，不坚持群众路线，便只好等待失败。

迅速依照高教会的课程暂行规定的精神，改革旧教育，已是各大学迫切的课题，反对只满足于表面的课程名目的相符，要经常不断地改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接受他校的经验教训，摒弃坏的，发扬并巩固已有成果，尽快地改造旧教育，准备迎接人民祖国的文化建设高潮！】

——余叔通：《改制中的北大法律系》，载《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5日。

11月16日

京首届各界代表会协商委会开二次全体会，钱端升报告“财政税收”小组讨论情形。

【（北京讯）北京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昨（十六）日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由协商委员会主席彭真主持，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准备向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出的《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暂行组织大纲》两草案，会上由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报告“财政税收”小组讨论情形，并决定按市府所拟财政税收提案，另组“营利事业所得税和营业税”和“农业累进税”等两小组，再加以详细研究。其他关于救济失业员工和开办业余补习学校等问题，定于下次协商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再行讨论。会议并讨论与通过了市政府所提邀请代表名单，并决定于最近期间召开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京首届各界代表会协商委会昨开二次全体会 讨论通过准备召开二届各界代表会要案多起及邀请代表名单》，载《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7日。

11月19日

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名单公布。

【院校教职员代表十六人

钱端升、罗常培、徐悲鸿、严济慈、费孝通、翁独健、赵承信、何戊双、杨贵贞、赵珪、王玠、胡原凌、叶笃庄、王芳荃、赵征夫、高言藻】

——《代表名单》，载《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9日。

11月20日

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钱端升入选主席团。

【（北京讯）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昨（二十）日会议一致通过由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提出的主席团二十九人，全部名单录后：（以姓氏笔划多少为序）

王文斌、王甫、古奇踪、朱长江、余心清、马玉槐、梁思成、徐悲鸿、柴泽民、翁独健、陈铭德、张友渔、张致祥、张奚若、张晓梅、许德珩、彭真、傅华亭、杨伯箴、闻家骊、刘仁、刘一峰、刘同恩、黎锦熙、钱端升、

薛成业、韩卓儒、聂荣臻、萧明】

——《主席团名单》，载《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1日。

京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委会常委会召开，钱端升当选副主席。

【（北京讯）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委会常务委员会于本月二十日在国立北京大学举行首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北京市各研究院、所与大、中、小学工会组织工作的决议”；并建立常委会的经常工作机构。为具体推动组织工作，筹委会常委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八人，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二人，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教部、章程起草委员会与方针任务起草委员会。并一致选举吴玉章为主席，钱端升、赵征夫、张澜庆、薛成业、田纶、赵广继、刘启祥、刘勇为副主席。谭元堃为秘书长。温寒江为秘书长。蔡善昌为组织部长。张云波为宣教部长。严景耀等十人为章程起草委员会委员。钱端升等九人为方针任务起草委员会委员。并决议以主席、副主席、正副秘书长、秘书长、组织与宣教部长共十五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并拟定十二月中旬召开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大会。各工作部门日内即可开始具体领导各院、所、校、区的工会组织工作，会址暂设沙滩北京大学。】

——《京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委会常委会吴玉章当选主席 建立执行机构即开始全市组织工作 定下月开全市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载《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4日。

11月22日

钱端升当选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北京讯）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委员，已在二十二日的各界代表会议上选出，全部名单如下：

主 席 彭真

副主席 刘仁、钱端升、梁思成、余心清

委 员 聂荣臻、张友渔、罗瑞卿、邓拓、吴晗、韩卓儒、许德珩、许

立群、萧明、朱长江、宋凤祥、何凤亭、柴泽民、刘桐恩、张晓梅、萧松、古奇踪、梁以俅、田纶、徐悲鸿、费孝通、杨贵贞、傅华亭、浦洁修、刘一峰、诸福棠、陈铭德、张致祥、王甫、李伯钊、马玉槐、罗旺、赵紫宸、张奚若、黎锦熙、陆志韦、张东荪、费青、陈垣、潘龄皋。】

——《北京市协商委员会正副主席及委员名单》，载《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3日。

12月1日

读者投书《观察》杂志，讨论《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一文，钱端升公开回应。

【编者先生：

读《观察》复刊号钱端升先生的《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一文后，发生疑问。钱先生说：“代表大会固然可以变更人民政府委员会所通过的法律及决议，人民政府委员会也可以变更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法律及决议（共同纲领除外）。”人民政府委员会也可以变更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法律及决议，那么代表大会不是等于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咨询机关了吗？这样，国家的最高政权机关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了？……上面的问题，编者先生能否代为解答？或者请钱、樊二先生直接解答？

成纪

十一、七、北京市
市总工会宣教处

（另有天津居恕先生来函，问题相同，从略，编者）

钱端升答复

编者先生：

关于成纪及居恕两先生询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有否变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法律和决议一事，我要感谢他们给了我一个纠正错误的机会。

我在原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暂为人民政协）和人民政府委员会既然都是最高权力机关，两者的权力自然相等。代表大会固然可以变更人民政府委员会所通过的法律及决议，人民政府委员会也可以变更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法律及决议（共同纲领除外）。所不同者，代表大会产生了人民政府委员会，所以代表大会在开会之时，人民政府委员会便不能享有最高权而已。”

中央人民政府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大会未召开前为人民政协），对之须负责并报告工作。他的行动自须在代表大会说作的一切决定的范围以内。因此，一般的说起来，他没有权变更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法律和决议，除非代表大会交了这个权给他。例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可以修改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所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就是因为该法第三十一条明白有此规定之故。

钱端升

十一、十七】

——佚名：《问题与答复》，载《观察》1949年12月1日，第6卷第3期，第29页。

12月4日

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委会上，钱端升当选为北京市总工会执行委员候选人之一。

【（北京讯）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委会各项筹备工作积极展开。根据该会筹委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京市各研究院、研究所与各大学、中学，按院、所、校成立工会，小学按区成立工会，每校成立分工会或工会小组。本市院校共十九个单位，城区中学共八十四校，小学分二十个区，共将成立一百二十三个工会，约有会员一万八千人。郊区中学数目亦正在调查中。该会常委会根据各院校、中学与小学具体情况，决定在筹委会组织部与宣教部下，分别建立各种工作机构，具体领导与推动各院校、中学及小学的工会筹备工作。目前除组织、宣教两部分别推动工会组织与进行学习外，该

会章程与方针任务起草委员会，亦正搜集会员意见，进行起草工作。此外，该会常委会曾于本月四日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选出钱端升、汪金丁、孙书元三常委，为北京市总工会执行委员候选人。】

——《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委会决议按院所校区组织工会 共将成立工会一百廿三个》，载《人民日报》1949年12月9日。

12月12日

钱端升表态支持发行胜利折实公债。

【（本报讯）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后，全国各地一致表示拥护和支持。上海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六日特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保证动员全沪工商界力量，响应政府号召。电文并称：“这是我们全沪工商界应尽的义务，也是我们无上光荣的任务。”该会主任委员盛丕华、副秘书长胡子婴一致认为这是克服胜利中的困难应采的措施。上海钱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沈日新、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项叔翔、中信商业银行总经理毛嘯岑、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及包达三、简玉阶、张元济、胡铭绅、刘靖基等均发表谈话，表示拥护。

北京各界继续就中央人民政府发行胜利折实公债一事表示拥护。北京市郊区农会筹委会主任柴泽民号召全郊区四十万农民，加紧生产节约，坚决拥护这一措施。北京市金城银行副理张企权、国华银行经理潘墨冰、北京大学教授钱端升、樊弘、清华大学教授王亚南、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师范大学校委会主席黎锦熙、工商界政协代表孙晓村均表示拥护政府的这一决定。】

——《全国各界坚决拥护发行胜利折实公债》，载《人民日报》1949年12月12日。

12月15日

钱端升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新华社北京十五日电）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十五日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

到何思敬、邵力子、梅汝璈、周鲠生、胡愈之、许德珩、王铁崖、张奚若、李克农、章汉夫、陶孟和、乔冠华、王昆仑、张东荪、黄琪翔、冀朝鼎、罗隆基、张炯伯、叶景莘、唐悦良、廖承志、李立三、王炳南、钱端升、翁独健、费孝通、楼邦彦、梅龚彬、严信民等共九十余人。大会推张奚若为主席。

首先由主席致辞，说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的宗旨，主要是团结全国对国际问题有研究素养或有实际外交经验的人士，根据新的科学方法，研究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国际问题，普及国际知识，并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供有关外交的具体意见，以协助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外交政策。继由钱端升报告筹备经过，并对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简章草案加以说明，此项简章草案经讨论修正后，全体一致通过。

乔冠华报告了国际形势，周鲠生、邵力子、罗隆基、刘王立明、张炯伯、冀朝鼎、黄琪翔相继作了发言。

接着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出席讲话，详细解释了新民主主义的外交政策。

大会于推选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及理事会（名单见另条）后散会。】

——《协助政府实现新中国外交政策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载《人民日报》1949年12月16日。

【（新华社北京十五日电）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及理事名单如下：

名誉会长 周恩来

会 长 张奚若

副会长 周鲠生、胡愈之、钱端升、乔冠华

秘书长 吴茂荪

理 事 王炳南、王铁崖、沈端先、何思敬、邵力子、金仲华、柯柏年、徐永焕、宦乡、翁独健、章汉夫、黄琪翔、费孝通、费青、张东荪、张明养、张炯伯、陆瑾、杨刚、廖承志、刘宁一、樊弘、赖亚力、钱俊瑞、冀朝鼎、罗隆基、龚澎。】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秘书长及理事》，载《人民日报》1949年12月16日。

12月18日

京市各界四万人集会庆祝亚洲妇代会成功，钱端升入选大会主席团。

【（新华社北京十八日）北京市各界人民庆祝亚洲妇女代表会议胜利成功大会于今日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到有各工厂、机关、部队、学校、团体等三百多个单位约四万人。太和殿前的白石栏杆上高悬着三十一面参加亚洲妇代会各国代表的国旗。主席台上，在耸立着的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巨像中间装置着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象征着和平和自由的会徽。

大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声中开始。蔡畅、聂荣臻、李立三、冯文彬、张晓梅、萧明、柴泽民、许德珩、钱端升等十二人及亚洲妇代会主席团国际民主妇联总书记瓦扬·古久里夫人等十三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接着，由北京市民主妇联主席张晓梅致开会词，她代表北京二百万人民热烈祝贺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成功，并对代表们八天来的辛劳致亲切的慰问。她指出：亚洲妇代会的胜利成功，更有力地告诉了全世界：全亚洲的妇女已经团结起来了！这个会议加强了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也大大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势力。她说：“我们的斗争是彼此支援、彼此鼓舞着的。苏联妇女姊妹们的成就，给全世界妇女指出了幸福的光明的道路。”

继由聂荣臻市长讲话，他祝贺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成功，并向正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亚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致敬。他指出：亚洲妇女的解放与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分不开的。他说：“帝国主义是不甘心自己死亡的，它们无时不在想挑拨新的战争。他们必须动员全亚洲妇女和全世界的妇女来制止这个战争。”

来宾中首先由国际民主妇联总书记瓦扬·古久里夫人讲话。她指出：和平阵营是没有地理上的界限的，她说，这次亚洲妇女代表会议所作的共同决定就是要加强我们的斗争，来完成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所决定的和最近在莫斯

科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所通过的一切行动纲领。她说：一切困难的战斗在等着我们，但我们不怕，我们所用的力量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继续讲话的有苏联代表团团长巴菲诺娃、法国来宾金耐特·凡尔米什、捷克代表荷第罗瓦、西非来宾克利巴利、美国来宾罗伯逊夫人、印度代表米特拉、越南代表胡德明等。她们一致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致敬，说明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对战争贩子们的一个重大打击，并且也是民主阵营力量的增长，并一致地表示只有以苏联妇女为首的全世界妇女密切团结，才可以赢得胜利。这些讲话都获得了全场热烈的鼓掌。会场上并不时地高呼“庆祝亚洲妇女代表会议胜利成功！”“国际民主妇联万岁！”“全世界劳动人民领袖斯大林大元帅万岁！”“中国人民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大会为庆祝亚洲妇代会的胜利成功，特向国际民主妇联献旗，旗上写着：“全世界妇女团结起来，为争取持久和平、人民民主，民族独立与妇女儿童的权利而奋斗。”北京市各区劳动妇女并向亚洲妇代会各国代表献上自己做的椅垫、织花手帕、骨花等礼物。大会又通过向国际民主妇联致敬电及向斯大林大元帅祝寿电。当通过向斯大林大元帅祝寿电时，全场起立表示敬意。最后，大会在高呼口号和奏《国际歌》声中散会。】

——《京市各界四万人集会庆祝亚洲妇代会成功 大会通电向斯大林大元帅祝寿》，载《人民日报》1949年12月19日。

12月16-18日

钱端升参加北大师生代表会议。

【（本报讯）国立北京大学师生代表会议于十六日举行开幕式，十八日胜利闭幕，历时三天。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在开幕词中说明此次会议召开的目的是：“总结学习经验，巩固学习成果，把学习提高一步，并庆祝北大五十一周年的校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以“继续改造我们的学习”为题，在大会上作报告。钱副部长首先指出北京解放后，改造学习的主要收获在于：（一）添进和加强了革命的政治学习，废除了反动的

课程。北大在这方面做得是有成绩的。(二) 逐渐地走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三) 初步着手改进自然科学的理论与应用课程, 如北大工学院和医学院四年级已初步实行精简课程, 获得很大成效。其次, 钱副部长明确指出进一步改造学习必须继续加强政治学习, 这是目前课程改革的重点。应合理地精简课程和加强对教学的领导。同时说到教学中的设备问题, 因国家财政困难, 应厉行节约, 防止浪费。最后他说: 改造学习的关键是要在思想上丢掉包袱, 明确认识对人民的责任, 并在正确方针的指导下, 勇猛地和团结地前进。代表们听了钱副部长的报告后, 晚间即分组展开讨论。十七日, 全体会议上, 由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教务处、各系分别作了政治课学习总结、业务课学习总结、典型经验总结报告, 肯定了本学期在政治课学习、业务课学习、改革及精简课程、改进教学方法与内容、加强师生联系等方面初步的成绩, 同时也指出了学习中存在的缺点, 交流了各院系学习的经验。全体代表于当晚分组讨论了这些报告, 一致表示同意。十八日全体大会上, 全体代表认真地讨论并通过了四项决议: (一) 关于钱俊瑞副部长报告的决议; (二) 关于政治课学习总结报告的决议; (三) 关于业务课学习总结报告的决议; (四) 关于提案的决议。在提案的决议中, 共分: 加强行政对于教学的领导、课程与教学、政治课学习、业务课学习、学习计划性、师生关系、群众组织保证学习、考试方法、温书运动等九项, 大会都作了具体的决定。提案讨论结束后, 全体代表在热烈掌声与“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的电文。该校教授代表汤用彤、钱端升、向达、马大猷、李西山等一致指出这次会议总结了本学期的学习、解决了一系列教学中的重要问题; 并保证认真地传达并执行会议的决议。最后由主席团王学珍代表致闭幕词, 号召代表们动员全校师生贯彻会议的决议。全校同学将在本周政治课讨论时间内学习师生代表会议的各项报告与决议, 结合各系级具体情况拟定计划, 逐步贯彻师生代表会议的决议, 进一步在校内开展新民主主义的学习。】

——北大通讯组:《总结学习经验 巩固学习成果 北大师生代表会议闭幕 钱俊瑞副部长作专题报告》, 载《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0日。

钱端升全集

- 第一卷 比较宪法
- 第二卷 法国的政府·法国的政治组织
- 第三卷 德国的政府
- 第四卷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英文版）
- 第五卷 民国政制史（上）
- 第六卷 民国政制史（下）
- 第七卷 议会委员会（英文版）
- 第八卷 文选（上）
- 第九卷 文选（中）
- 第十卷 文选（下）

- 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上）
- 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下）



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

陈夏红 编撰

The Chronicles of
Prof. Chien Tuan-sheng Vol. II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

下

陈夏红
编撰

The Chronicles of
Prof. Chien Tuan-sheng Vol. II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北京

不以欲而害学。学者，吾唯一之希望也。

——钱端升

目 录

· 下 册 ·

1		1950 年 (50 岁)
64		1951 年 (51 岁)
132		1952 年 (52 岁)
177		1953 年 (53 岁)
193		1954 年 (54 岁)
267		1955 年 (55 岁)
319		1956 年 (56 岁)
351		1957 年 (57 岁)
444		1958 年 (58 岁)
453		1959 年 (59 岁)
455		1961 年 (61 岁)
456		1962 年 (62 岁)
458		1963 年 (63 岁)
458		1964 年 (64 岁)
460		1965 年 (65 岁)
464		1966 年 (66 岁)
464		1967 年 (67 岁)
464		1968 年 (68 岁)

2 | 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下）

464 | 1969 年（69 岁）

464 | 1970 年（70 岁）

465 | 1971 年（71 岁）

465 | 1972 年（72 岁）

467 | 1973 年（73 岁）

475 | 1974 年（74 岁）

479 | 1975 年（75 岁）

483 | 1976 年（76 岁）

486 | 1977 年（77 岁）

488 | 1978 年（78 岁）

492 | 1979 年（79 岁）

497 | 1980 年（80 岁）

504 | 1981 年（81 岁）

509 | 1982 年（82 岁）

518 | 1983 年（83 岁）

530 | 1984 年（84 岁）

538 | 1985 年（85 岁）

542 | 1986 年（86 岁）

551 | 1987 年（87 岁）

552 | 1988 年（88 岁）

554 | 1989 年（89 岁）

554 | 1990 年（90 岁）

555 | 参考文献

561 | 后 记

1950年（50岁）

待考

钱端升著《中国政府与政治》（英文本）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947年10月底我应邀赴美，在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一年。在此期间，我以讲课的内容编著了《中国政府与政治》（英文本）一本，主要是评述辛亥革命以来的南京政府，由于资料所限，我当时无法将解放区的政府与政治写入书中，每念及此，总以为憾。该书195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7页。

钱端升著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中国政府与政治》）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结论是：国民党初期改组后，本有可能使国民政府演变成为民主法治的政府，因“三民主义”已具备权力制衡的理论架构和实现宪政的步骤，此项建立民主政制企图之失败，不得不归罪于蒋介石的个人野心和军事独裁。由于他一贯的民主信念，无论当国民党晚期或中共开国之后，钱端升的政治抱负都未能实现。】

——何炳棣：《读史阅史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夏红注：根据英文书评来看，该书在英语学界有一定影响。在中国大陆，则因为几十年音讯不通而未曾与闻，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本著作的存在。商务印书馆曾于2011年影印重版了此书。该书亦已收录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的《钱端升全集》中。

1月6日

北京市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成立，钱端升担任常委。

【（本报讯）北京市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在京市人民政府领导下，已于昨（六）日下午在市府成立，并举行了首次常务委员会议。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以吴晗副市长为主任委员的十五名常务委员人选及联络、宣传、经收、秘书四组组长人选；计划成立工商界、地方人士、工会、机关、教育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十余分会。首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了一次认购公债，但可以在三个月内分期付款的办法。吴副市长及委员等相继讲话，发言者一致拥护政府发行公债的措施，并对京市公债推销的组织、宣传、分配等工作提出具体办法。该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十五人为：吴晗（主任委员）刘仁、余心清、薛子正、程宏毅、萧明、周子键、傅华亭、刘一峰、钱端升、刘仲华、董汝勤、浦洁修、赵子尚、贾星五。委员韩涌裳、闻家驷、张云川、许德珩、唐庆永、许立群、张晓梅、梁以俦。工商业界十五人：凌其峻、王富晋、诸福棠、尚小云、邢詹亭、贺孔才、缪秋杰等共四十七人。】

——《上海、北京公债推销委员会成立 汉口工商界预购四十余万分》，载《人民日报》1950年1月7日。

1月10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政协二次会议，专门就公债推销发言。

【（北京讯）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昨（十）日举行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一九五〇年度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如何分配、推销及市政府一九五〇年度施政方针两个重要问题。关于公债的分配与推销问题，全体同意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指示的精神及京市实际情况，分配工商业户一百七十万分；地方人士、殷实富户及退職文武官吏七十万分（以上均采取公平合理办法分配）；余下的分数由各界自由认购，不分配具体数字。公债推销方法，为照顾交纳方便，采取一次认购、分次交纳、按期完成的方法；并交由市政府领导的市推销委员会组织各界分会，进行推销。会议由协商委员会主席彭真主持。吴晗副市长报告京市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

组织经过后，大家对推销公债问题纷纷发表意见。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主任委员傅华亭起立发言，代表全市工商业界表示完全接受这个任务，并希望各界从多方面予以协助。院校教职员联合会钱端升代表北京市的教育工作者说：相信北京市大、中、小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一定能够自动地、不取任何强迫的方式认购相当大的数目字。在程宏毅副主任补充报告京市公债推销各界认购的现况后，北大教授费青很兴奋地说：市政府工作人员很艰苦，但现已认购了二万分，这次京市公债推销一定能够完成并超过任务。他希望学生能利用寒假进行适当的宣传工作。】

——《京市协商委员会二次会议公平分配推销公债 各界代表一致保证踊跃认购 京市今年施政方针 首先是发展生产》，载《人民日报》1950年1月11日。

1月24日

钱端升等表态拥护中央政府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并参加联合国工作。

【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备会副主席钱端升教授说：我中央人民政府最近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并参加联合国工作，我们中国人民对这项任命是热烈拥护的，联合国设置的基本精神是维护世界和平而不是奴役人民，更不是使好战分子作为挟持的工具。美帝集团穷极无聊死拖着残余匪帮的“代表”蒋廷黻，意图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不但狡恶无赖而且根本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无疑地它将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反对而遭到可耻的失败。】

——《周外长致联合国照会 京各界坚决拥护 感谢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对我支持》，载《人民日报》1950年1月24日。

1月28日

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于二十六日就泰国政府虐待和杀害华侨问题向泰国

外交部所提出的严重抗议。钱端升等拥护李克农声明。

【清华大学钱端升教授说：“李克农副部长致电泰国反动政府，抗议迫害我侨胞，是说出了全中国人民要说的话。泰国政府四十年来一直是帝国主义的爪牙，虐待华侨无所不用其极，尤以奎披汶为首的反动政府最为凶残蛮横，我们坚决要求泰国政府立即停止几十年来继续不断的欺侮华侨的暴行。”】

——《李副部长抗议泰国虐待华侨 首都各界齐声拥护》，载《人民日报》1950年1月28日。

2月2日

北京市首届工代会开幕。钱端升等热情赞誉。

【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委会副主任钱端升说：京市首届工代会开幕，京市总工会将正式成立，从此工人的力量，会有更大的发挥，工人的利益，将有更好的保障，教育工作者能参加工代会使我们感到特别兴奋；我们十五个代表，有教员、工友，但大部分是脑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同聚一堂，据我所知这还是第一次；我们一定要向工人学习，力求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间的距离，逐渐消除。】

——《京市召开工代会 工人咸表兴奋 将更好地团结起来发展生产》，载《人民日报》1950年2月2日。

2月3日

钱端升入选工代会主席团。

【（北京讯）京市首届工人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如下：

彭真 萧明 刘莱夫 许立群 杨伯箴 毛树多 孙以恕 王文斌 凌必应 苏瑞 孟金声 朱长江 路懋 王谦 英永兴 宋凤祥 黄伯金 苏一夫 任彬 杨蕴玉 宋汀 崔映国 李光禄 钱端升 赵振邦 王国兰 刘克勤 李敬祥 邹德馨共二十九人。】

——《彭真萧明等二十九人为京市工代会主席团》，载《人民日报》

1950年2月3日。

【张友渔副市长致词时，举出市政府今年工作计划中与工人阶级有关系的四件重要工作：第一是恢复与发展生产。这是今年北京市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要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主要的要依靠工人阶级，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改进技术，为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与减低成本而努力。第二件和第三件是即将开始执行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所通过的救济失业员工决议案和成立业余补习学校决议案。第四件是改善工人医疗设备。政府将帮助各大工厂设备医务所，在劳动民众多的地方设立诊疗所，与公私立医院接洽，对工人看病，予以优待。张副市长说，这四件工作，希望大家帮助和监督实行。

接着由代表讲话，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钱端升说：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在一起开会，在过去反动统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事。我们一定要逐渐缩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距离。脑力劳动者的任务是实施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政策，但是文教工作如果不能为生产和劳动人民服务，一定不能完成任务。】

——《张副市长致词 举出市府四件重要工作 希望工人帮助监督实行》，载《人民日报》1950年2月3日。

2月6日

钱端升入选北京市总工会委员。

【（北京讯）北京市首届工人代表大会，昨（六）日选出北京市总工会委员六十三人、候补委员十人；经费监察委员九人、候补经费监察委员二人。名单如下：

（一）市总工会委员：

彭真 刘仁 萧明 刘莱夫 张鸿舜 杨蕴玉 宋汀 任彬 苏一夫 许立群 彭思明 李晨 崔德清 张春久 祖田工 许平 杨伯箴 陆禹 周仁 贺翼张 崔映国 王纯 苏瑞 王淑贞 孟金声 施璐怡 焦常海 凌必应 宋凤祥 高峰 黄伯金 李国瑞 毛树多 张

万德 王文斌 李寿祺 孙以恕 安朝俊 朱长江 英永兴 黄慕之 路懋 王谦 孙景鲁 苏贵臣 王忠和 金云珍 赵振邦 黄林茂 王志万 李光禄 赵聪 苏寅生 齐文秀 钱端升 陈君平 焦百先 邹德馨 郑学文 吕静平 袁峙 高福 李淑玉】

——《北京市总工会委员名单》，载《人民日报》1950年2月7日。

2月5~6日

钱端升出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新华社北京七日电）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于本月五、六两日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该会一九五〇年工作计划的草案。这个草案将于提请政务院通过后实施。

会议于本月五日上午九时开始，出席主任郭沫若，副主任陆定一和沈雁冰，委员周扬、丁燮林、钱俊瑞、韦恂、李德全、贺诚、苏井观、陶孟和、竺可桢、胡乔木、胡愈之、费孝通、吴晗、刘清扬、潘光旦、符定一、蒋南翔、沈兹九、谢邦定、欧阳予倩、田汉、阳翰笙、钱三强、翦伯赞、侯外庐、钱端升、曾昭森、沈体兰、柳亚子、张东荪、陈鹤琴、雷洁琼等三十五人。列席者文教委员会所属各部、院、署的厅司局长以上负责人九十余人。政协全国委员会及人民监察、政法、财经各委均派代表参加。董必武副总理亲临指导。会议第一日由沈雁冰副主任任主席，董必武副总理报告最近国内军事、政治、外交情况，郭沫若主任报告文教委员会工作计划要点，各部院署首长分别作了三个月的工作报告，胡乔木秘书长报告文教委员会一九五〇年度事业费岁出总概算草案。第二日的会议由陆定一副主任任主席。会议在四小时的讨论后通过了文教委员会一九五〇年工作计划草案，并通过了沈体兰委员等关于在各大行政区设立师范大学或师范学院的提案，决定交教育部研究办理。】

——《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会议 通过今年工作计划草案》，载《人民日报》1950年2月8日。

2月7日

钱端升等发表声明拥护苏联审判裕仁的声明。

【(北京讯) 首都各界一致拥护苏联政府审讯日本法西斯细菌战犯的提议, 坚决主张严惩日本天皇裕仁等战犯, 并痛斥美帝国主义者包庇日本法西斯战犯的罪行。……

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副主席钱端升说: 一大群日本法西斯的细菌战犯在伯力审讯中已招供了他们自己的罪状, 并招供了日本裕仁天皇是使用细菌这个罪行的发号施令者。为了惩罚这些穷凶极恶的战犯, 警诫新战争的挑拨者, 应当早日成立特别国际军事法庭, 审讯以裕仁为首的一群战犯, 治以应得之罪。所以我们坚决拥护苏联的提议。】

——《日寇裕仁等细菌战犯必须受审 京津各界拥护苏提议 痛斥美帝包庇日本法西斯战犯》, 载《人民日报》1950年2月7日。

2月15日

中苏友协理事会开会, 钱端升做了发言。

【(北京讯)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会昨(十五)日下午八时举行全体会议, 庆祝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会议并决定于本月十八日十二时在天安门广场召集该会广大会员和各界人民举行庆祝大会。出席这次理事会的有该会会长彭真、副会长张奚若、许德珩、刘仁、萧明、张晓梅及理事和总支会、支会代表八十余人。首由许德珩副会长兼总干事致开会词说: “这个条约的签订, 是划时代的, 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 由于这个条约的签订, 远东和平更加巩固, 世界和平的力量也因而更加强大了。这一事实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一切谣言, 证明苏联是真正爱好自由与和平的民族, 中苏两大民族和世界人民的携手合作, 一定能够粉碎帝国主义者挑拨新战争的一切阴谋。”继由彭真会长讲话。彭真会长首先愉快地说: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两项协定的签订, 不仅是在反对侵略与保护和平上的兄弟同盟, 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合作。”他并指出签订这三个条约, 不仅对于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 而且对于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繁荣, 有极大的帮助; 它不仅巩固了远东和

平，而且对于保卫世界和平及民主事业有极大的意义。伟大的斯大林、社会主义苏联是中国人民最真挚、热情无私的朋友，在无数次的事实证明之后，又一次极大的证明。彭真会长号召该会各级组织和全体会员以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意义，巩固与扩大中苏友好的运动，来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彭真会长讲话之后，张奚若副会长、钱端升理事、北京电业局工会代表朱长江、该会铁路总支会代表尤淑静、曲艺界代表连阔如等相继讲话，都一致表示拥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并感谢斯大林大元帅和毛主席对中苏两大民族友好合作所作的这一伟大贡献。张奚若副会长和钱端升理事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两项协定的签订，保证了中国人民顺利地走上自由幸福的大道。张奚若副会长说：“中苏两大民族的合作，真正是兄弟之邦一般的友好，我国要学习苏联建设的经验，来建设新中国。”会议决定于本月十八日十二时在天安门广场召集该会广大会员和各界人民举行庆祝大会。最后，由许德珩副会长报告该会成立四个月来的工作状况。】

——《京中苏友协理事会决定 本市后天举行大会庆祝中苏缔结新约 彭真号召扩大中苏友好运动》，载《人民日报》1950年2月16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北京讯）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昨（十五）日在市府举行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到会委员三十一人。会议由协商委员会主席彭真主持。彭真主席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长路、旅大问题等协定的订立与内容作了简单扼要的报告，并指出了它的伟大的历史意义。他的报告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全体委员兴奋异常。会议继由吴晗副市长报告京市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的情形：截至二月十三日止，京市工商业界认购的一百七十万分，已有一百三十一万九千一百三十五分具体分配到各户，工商业界争取在春节前完成购买二分之一以上的任务。地方人士方面，各区推销支会已成立，认购数字已具体分配到各区，共七十四万分，其中已认购的计二十八万分。机关、部队、工会、妇联、教育工作者、郊区工商业、医

务工作者、摊贩等方面，据不精确统计，共认购五十四万三千四百九十二分，已超过协商委员会上原分配四十万分的任务。人民银行截至十四日止，共售出公债一百万零八十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地方人士分会主任乐松生亦曾到会报告地方人士推销公债情形。吴副市长报告后，会议继续第三次协商委员会未了议程，讨论京市人民政府一九五〇年工作计划纲要及一九五〇年岁入岁出概算草案。市府财政局赵子尚局长报告了京市一九四九年度财政支出概况。相继发言的有费青、许德珩、钱端升、浦洁修、刘一峰、张云川等委员，都一致拥护该两项草案，并提出一些在执行中的问题。彭真主席对这些问题作了解释。最后一致通过，准备提交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后实行。会议决定于本月二十二日召开京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代表会议。并通过了由各单位提出的代表变动名单等。】

——《京各界代表会议协商委会昨开会 彭真报告中苏缔约伟大意义 吴晗报告公债推销情况；会议定廿二日召开第二次各界代表会议》，载《人民日报》1950年2月16日。

2月26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二届二次各界代表会议，审查市府计划和概算，经热烈讨论通过决议，任执行主席。

【（北京讯）北京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天（二十六日），大会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北京市人民政府一九五〇年度的工作计划和财政收支概算的决议”。出席会议代表共三百七十七人，主要议程为讨论聂市长和张副市长的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沈钧儒院长于上午十时莅会讲话。说明为了减收市人民法院的上诉的案件，并更适当地处理一般的诉讼案件，拟设立区人民法院执行初审（讲话摘要见另条）。上午会议由梁思成、费青、张东荪、张晓梅、柴泽民、梁以俦、傅华亭任执行主席，下午会议由刘仁、钱端升、陈垣、张致祥、朱长江、古奇踪、诸福棠任执行主席。讨论聂市长和张副市长的报告时，代表们发言极为踊跃。民主党派代表

曾昭抡、凌其峻、张云川、许宝騄，工会代表杨开文、朱长江、仇方域、胡泉桂、胡光锦、刘亚洲、高金铎、郭景岩、何凤亭、农民代表刘桐恩、王金珍（女）、曹建荣、孙正民，妇女代表胡一哉、吴曼华、曾昭懿、刘清扬、王韵华，青年代表李淑敏（女），学生代表古奇踪，中小学教联代表徐楚波，院校教联代表胡原凌，工商业代表傅华亭、赵宜之、张献庭、侯儒林、左广玉，医务工作者代表李鉴，军队代表罗文坊，特邀代表樊弘、陈垣、钱三强、乐松生，少数民族代表杨明德（回）、博音德力格尔（蒙）、杨益三（回）、张清贵（回），文艺界代表连阔如，烈、军属代表康老太太等四十三人先后发言，一致表示同意聂市长和张副市长的报告。北京市人民法院王斐然院长在大会中报告人民法院即将在北京市各区设立人民法院，以初步解决民事、刑事纠纷。大会讨论完毕后，全场一致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所起草的“关于北京市人民政府一九五〇年度的工作计划和财政收支概算的决议”。大会进行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分部、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支部、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北京市九三学社、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等分别向大会致电祝贺。】

——《京市二届二次各界代表会议 审查市府计划和概算 经热烈讨论通过决议》，载《人民日报》1950年2月27日。

2月27日

北京市二届二次各界代表会议闭幕。

【（北京讯）北京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三天，已于昨（二十七）日下午五时半胜利闭幕。昨天会议的主要议程为讨论提案。大会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对一百二十件提案审查与处理的意见，并通过《关于北京市设立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通过向毛主席和向斯大林大元帅致敬的两件电文。大会主席彭真作《一九五〇年度市政工作计划和财政收支概算讨论的总结报告》之后，代表们纷纷发言，热烈拥护彭真主席的报告，坚决表示要为实现北京市人民政府一九五〇年度的工作计划和财政收支概算而

努力。最后由许德珩教授致闭幕词。会议在雄壮的口号声中宣告闭幕。

昨日出席会议代表共三百二十九人。大会执行主席上午为余心清、萧明、钱端升、徐悲鸿、费孝通、黎锦熙、马玉槐；下午为聂荣臻、张友渔、吴晗、浦洁修、赵紫宸、刘一峰、陈铭德。上午讨论代表提案时，首由提案审查委员会总召集人张友渔报告：“大会共收到提案一百二十案，计政法、公安类五案；财政、经济类三十一案；市政、建设类三十九案；文教、卫生类二十七案；社会福利及其他类十八案；另有五案因迟到不及整理未予审查，可由提案人将来送协商委员会处理，或径送与政府及其它有关部门洽办。一百二十案中，有七十八案皆不合提案规则。但以提案规则在本次会议未经明白宣布，而此类提案内容多富于积极建设性，故经审查委员会决定，一律从宽予以审查，但今后不得援例。”继由提案审查委员会各小组召集人董汝勤、程宏毅、梁思成、余心清、马玉槐等五人分别就政法公安、财政经济、市政建设、文教卫生、社会福利及其它等五类提案的审查意见作了报告。经大会讨论后，全体代表先后一致通过审查委员会各小组对提案审查的意见，包括“号召市民及各机关、工厂、学校利用空地种植菜蔬”、“继续调整劳资关系，以保证完成一九五〇年生产计划”、“请工业局、商业局、银行，并协同工商联联合会有计划地诱导游资走向生产”、“街道合作社应改善经营，多备生活必需品”、“请政府继续储存食粮，以稳定粮价而维民食”、“业余学校成立，政府应有计划的于短时期内消除文盲”、“请公共卫生部门特别注意石景山区域环境卫生”等全部提案一百二十案。】

——《京各界代表会议胜利闭幕 决议设区人民代表会 通过对一百二十件提案的审查意见 大会电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致敬》，载《人民日报》1950年2月28日。

2月27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座谈。

【（北京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于二十七日晚七时举行庆祝中苏友好同

盟互助条约座谈会。到会员胡愈之、史良、雷洁琼、翁独健、费青、曾炳钧、王昆仑、章汉夫、连贯、刘王立明、张炯伯、唐悦良、黄琪翔、叶景莘、乔冠华、柯柏年、樊弘、董越千、王铁崖、宦乡、杨刚、龚澎等九十余人。首由该会会长张奚若致开会词，指出在庆祝中苏条约声中，该会应负起研究与宣传的任务。继请该会会员李立三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地阐明了中苏条约之划时代的意义，强调指出：把中苏条约仅仅看作中国外交的胜利是错误的；中苏条约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苏联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胜利。中苏条约是巩固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随后，钱端升、邵力子、陶孟和、罗隆基、何思敬、梅汝璈、刘泽荣相继发言，一致赞扬中苏条约对于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的伟大成就，并对斯大林大元帅和毛泽东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最后，会议由该会秘书长吴茂荪简略报告会务后，在欢欣热烈的情绪中结束。】

——《人民外交学会座谈 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赞扬它对于和平的伟大成就》，载《人民日报》1950年3月2日。

3月16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业余教育工作委员会成立座谈会。

【（本报讯）据京市新闻处消息：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去年十一月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在北京开办工人和机关干部的正常业余学校。这个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积极筹备，现在已经普遍开展。北京市人民政府特于日前发柬邀请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彭真主席、刘仁副主席、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廖沫沙、市总工会萧明、刘莱夫、祖田工、市文教局翁独健、侯俊岩、薛成业、市工业局牟泽街、市劳动局马光斗、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工委杨伯箴、北京市民主妇联张晓梅、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钱端升、温寒江等，于十六日下午二时在市府会议室开会，正式成立北京市业余教育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市业余教育工作，决定方针，审查工作计划。会议决定以被邀出席的各方面人士任该委员会委员，并推举

吴晗为主任委员，廖沫沙、翁独健、刘莱夫、张晓梅为副主任委员。】

——《京各界人士组成委员会 领导业余教育工作 全市已建业余学校二十一处 入学工人干部已达万五千人》，载《人民日报》1950年3月18日。

3月18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学生二届代表大会。

【(本报讯)据北京市新闻处消息：北京市学生第二届代表大会已于昨(十八)日上午在中法大学礼堂开幕。到本市大、中学一〇九个单位的代表三九六人。来宾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吴晗副市长、文教局翁独健局长及各校负责人等共一百一十三人。大会通过主席团后，市学联主席古奇踪致开幕词，说明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并解决如何进一步开展学习的问题及课余生产、学生会组织等。继由来宾吴晗副市长、翁独健局长、清华大学校委会主席叶企孙、女一中校长梁以俸及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委会副主席钱端升相继讲话。】

——《京学生二届代表大会开幕 吴晗副市长等报告业务学习课余生产等问题》，载《人民日报》1950年3月19日。

3月25日

钱端升当选为某会议常委。

【会上选出了常务委员二十一人，全部名单如下：彭真、刘仁、萧明、刘莱夫、张鸿舜、苏一夫、任彬、杨蕴玉(女)、宋汀(女)、彭思明、凌必应、钱端升、孙以恕、路懋、李光禄、朱长江、毛树多、李国瑞、吕静平(女)、李晨、陆禹。】

——林沫：《常委名单》，载《人民日报》1950年3月25日。

4月18日

钱端升等座谈婚姻法并做发言。

【（本报讯）北京市民主妇联、市总工会、青年团市工委及民主青联筹委会昨（十八）日假民主妇联会址，邀集京市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三十余人，座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史良、训练司副司长王汝琪，全国妇联妇女服务部部长曹孟君，京市人民法院院长王斐然等均应邀参加。座谈会由张晓梅主持。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委会主席钱端升首先发言：“婚姻法本质上是革命的建设的，它是共同纲领第六条的具体化。”】

——《京市妇联等单位座谈新婚姻法》，载《人民日报》1950年4月19日。

4月20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组织的中苏经济合作座谈。

【（新华社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于四月二十日晚七时举行中苏经济合作问题座谈会。出席李济深、陈叔通、张治中、陶孟和、张炯伯、乔冠华、梅汝璈、叶景莘、樊弘、柯伯年、梅龚彬、王铁崖、雷洁琼、陈体强、宦乡、杨刚、萨空了、陈家康、刘尊棋、吴茂荪等七十余人。首先由张奚若会长说明开会意义后，即由该会会员章汉夫报告。章汉夫在报告中对于中苏经济合作三协定签订之意义及影响，作了很详尽的解释。继由张治中讲话。他报告了新疆的许多实际情况，证明中苏经济合作对于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意义。后由刘泽荣、钱端升、邵力子、罗隆基、李济深相继发言，都一致认为中苏经济合作不仅是平等互利，而且是对新中国的建设极为有利的。最后由主席张奚若作总结，他希望大家对于中苏经济合作问题，多作宣传解释的工作，使一般人都能了解。】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座谈中苏经济合作》，载《人民日报》1950年4月23日。

4月25日

钱端升参与成立北京市救济失业工人委员会。

【(本报讯)为着有组织有领导地支援上海等地的失业工人,北京市总工会昨日(二十五)上午特邀请市政府、中共北京市委、华北军区政治部、市劳动局、市公安局、团市工委、市妇联、市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委会等单位开会,成立京市救济失业工人委员会。会议决定在自觉自愿的原则下,发动部队、机关人员每人捐助二斤米或一天的薪资(工人的捐献运动已展开)。并决定各单位捐款务须于五月十五日以前缴到,缴款地点决定后,另行在报上发表。

会议推选萧明(市总工会副主席)、吴晗(京市副市长)、程宏毅(市商业局局长)、赵凡(市委办公室主任)、张致祥(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万一(市劳动局副局长)、张明河(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晓梅(市妇联主任)、杨伯箴(团市工委副书记)、钱端升(市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委会副主任)等十人组成京市救济失业工人委员会;萧明为主任委员。】

——《劳动部定明日举行会议讨论救济失业工人办法 京市救济委员会成立》,载《人民日报》1950年4月26日。

4月30日

钱端升担任《世界知识》编委。

【(本报讯)据新华社讯:《世界知识》周刊自五月一日起迁京出版。为了革新内容,适应干部、学生学习国际问题和外交知识的需要,该刊决定了今后革新的计划,并扩大了编辑委员会的组织,聘任胡愈之、乔冠华、钱端升、周鯁生、柯柏年、刘尊棋、胡绳、宦乡、杨刚、邵宗汉、黄操良、陈翰伯、费孝通、梅汝璈、王铁崖、金仲华、刘思慕、张铁生等七十余人作为编委。】

——《〈世界知识〉迁京出版并扩大编委会组织》,载《人民日报》1950年4月30日。

5月5日

钱端升参与全国教育工作者工会工作委员会,筹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

者工会代表大会。

【（新华社五日讯）中华全国总工会已决定今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大会。关于召开这一大会的通知已于今日发出。

通知首先指出：为了要把文化落后的中国，变为文化先进的中国，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是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为了使中国的教育工作者能够胜利的负担起并完成其历史使命，首先就要组织起来。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包括大、中、小、社的教职工警及教育行政人员在内）的总人数大约有七十万左右。教育工作者绝大多数都是依靠工资（薪水）收入为自己生活资料的全部或主要来源的脑力雇佣劳动者。因此，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应当是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教育工作者工会也应当是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的一个重要的工会组织单位。为此，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于本年八月一日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大会。

通知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大会主要讨论并解决以下五个问题：

1. 目前教育工作者工会的方针任务问题。
2. 制订教育工作者工会的章程。
3. 教育工作者工会的基层组织问题。
4. 教育工作者的学习问题。
5. 教育工作者的福利事业问题。

通知宣布：全国总工会已成立全国教育工作者工会工作委员会，负责进行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大会的各种筹备工作。这个委员会以吴玉章、钱端升、刘子久、钱俊瑞、薛成业、萧采瑜、葛志成、王仁忱、张澜庆、温寒江、李广铸、叶维民、李扬、盛瑾、张潮、费振东、孙起孟、雷洁琼、刘皑风、杨静仁等二十人组成。以吴玉章为主任，钱端升、刘子久为副主任。】

——《中华全国总工会通知 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大会定于八月一日在

北京召开》，载《人民日报》1950年5月7日。

5月6日

钱端升等迎接李四光回来。

【（新华社七日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于六日抵京。赴车站欢迎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李济深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陶孟和、竺可桢副院长、科学院各局负责人及钱端升教授等。当晚七时，郭沫若院长特设宴欢迎。应邀作陪者有李济深、陆定一、马叙伦、胡乔木、丁燮林及科学界人士多人。

李四光副院长前年赴英国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年会，去年被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代表大会筹备会推选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方威胁，妄图要李氏否认，但均经严词拒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李四光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副院长在海外听到祖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全国胜利后，无限兴奋，即于去年离英经瑞士转香港返国。李副院长抵达国门后，看到祖国种种新新气象，认为中国科学事业前途有无限光明。据李副院长谈，我国在海外研究科学的留学生无时不在热望返回新中国，为人民服务。】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昨抵京》，载《人民日报》1950年5月8日。

5月14日

钱端升出席中央美院工会成立大会。

【（本报讯）中央美术学院工会于十四日成立。成立大会由主席团代表徐悲鸿院长致开幕词。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俞铭传、北京大学工会代表钱端升等相继讲话，该院沈宝基报告工会筹备经过。最后进行选举。全体会员二百余数十人，选出执委十九名。大会在严肃而愉快的气氛中顺利结束。】

——美院通讯组：《中央美术学院正式成立工会》，载《人民日报》1950年5月15日。

5月20日

钱端升出席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并做发言。

【（京市新闻处讯）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二十日下午三时在中山公园该会会议室举行第六次会议，听取了第六第七两区关于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市人民法院关于清理积案工作的报告；讨论与通过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检查干部作风与纪律及召集京市党、政、群干部动员大会的建议。会议对京市调整工商业问题，听取了市财经委员会的报告，并决定由协商委员会成立工商、税收、劳资关系和失业救济及区代会议等四个组。

李锐、宋汝芬、王斐然报告：

筹开区人民代表会议和法院清理积案情况

北京市第六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锐和第七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宋汝芬先后在会上报告第六、第七两区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工作进行情况。两个区都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宣传，并举行座谈会收集区内人民的意见，展开群众团体代表和街道居民代表的选举工作。由于这一工作在京市尚属首创，干部与群众都缺乏经验，因而曾发生过宣传工作不够深入、个别干部作风不够民主及方式生硬等缺点，现已在纠正中。

继由市人民法院王斐然院长报告清理积案的进行情况。这项工作从本月十五日正式开始以来，每天清理的案件已从最初的每日清理三十件增到现在的八十件，预计下周每天可清理一百件。参加工作的干部在工作过程中，逐渐取得经验，开始克服了繁琐的文牍主义，提高了工作效率。

张友渔副市长报告：

将以六、七两区为重点开始检查干部作风纪律市人民政府张友渔副市长报告最近市政府准备进行一次检查干部作风与纪律的运动。为了突破一点，取得经验，准备以即将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两个区为重点，首先进行检查，待取得经验之后，再在全市普遍展开。

张副市长报告之后，协商委员会彭真主席即征询到会委员的意见，委员许德珩、费孝通、钱端升等相继发言，一致同意张副市长的建议。

在会议进行中，许德珩委员、梁思成委员、钱端升委员等曾提出目前北京市交通秩序又趋紊乱，车祸增多的问题，提请政府加以注意，对交通警察应加强负责，在市民中应进行宣传，对汽车司机和三轮车、人力车工人，亦应加强行车规则的训练。市公安局罗瑞卿局长当即表示接受这个建议，并且说明市公安局正在研究这种情况。现在除了继续强调说服教育，并同时开始执行必要的罚则以外，正在拟定重新整顿北京市交通秩序的具体办法。

市财委会副主任程宏毅报告：

工商业调整问题及政府措施

最后由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程宏毅就目前北京市工商业调整问题及政府的措施作报告，他在分析了目前北京市工商业基本情况之后，说：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京财委会已作了初步研究，并与工商界人士广泛反复地交换了意见，目前市政府准备采取的措施，总的方针是继续贯彻中央人民政府平衡收支、稳定物价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使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转变期中，减少困难，目前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加强工商业方向的指导，并普遍建立劳资协商会议，由劳资双方协力，积极设法渡过目前的难关。同时，组织公私力量，吸收游资，向有益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办理贷款。在税收方面，要做到公平合理，并简化手续，市税务局对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工商业税滞纳户，其确系负担过重者已酌予减征或免征，因目前货物滞销，资金一时周转困难者，已按情况分别准予缓期缴纳。除以上一些措施外，市政府为了集中力量，公私配合，有效地解决目前北京市工商业中存在的困难，已自财委会等财经机关调集干部，与市工商联筹委会的代表共六十余人，组成六个临

时工作组，分头到困难较多的几个行业及工商业户中，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动员劳资双方的积极性，在工商业者自身努力的基础上，协助解决目前可能解决的问题，在得到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与经验以后，再在全市工商业各行业中加以普遍推广。

在程宏毅副主任报告之后，彭真主席曾就此一问题发表意见。他说：这是目前北京市最重要、最中心的问题。总的方面，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要统筹兼顾，特别是在公私关系问题上。国营经济是国家领导经济，与私营经济两者间是有所不同的，但政府对待公营和私营却应当一视同仁。我们应本着这样的方针，来处理调整工商业问题。

最后会议通过成立工商、税收、劳资关系和失业救济、区代表会议等四个工作组，并指定张友渔、钱端升、刘仁、吴晗等为各组召集人。】

——京市新闻处：《市协商委员会举行会议 听取了调整公私工商业问题等报告 通过市府关于检查干部作风的建议》，载《人民日报》1950年5月22日。

5月25日

钱端升出席青年团中央举办的欢送苏联青年代表团宴会。

【（本报讯）据新华社二十五日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二十五日晚举行盛大宴会欢送前来参加中国青年节的苏联青年代表团回国。到会者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副书记廖承志、蒋南翔，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北京大学汤用彤、钱端升，清华大学叶企孙、张奚若，全国文联周扬，全国妇联帅孟奇、康克清，全国青联钱三强、吴晗，以及北京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学生代表和青年团工作干部等三百余人。苏联大使罗申夫妇亦应邀与会。宴会开始时，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冯文彬致欢送词（全文另发），继由苏联青年代表团团长米哈依洛夫致答词（全文另发）。会上，充满着中苏青年的友谊气氛，宾主频频为斯大林大元帅、毛泽东主席、中苏两国人民及青

年的团结而干杯。】

——《青年团中央举行盛大宴会 欢送苏联青年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0年5月26日。

6月21日

钱端升参加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二次会议，并做发言。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今日继续进行大会讨论。今日在大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维族），老同盟会员熊克武，起义将领、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唐生智，上海地方协商委员会代表刘鸿生，保护工厂的模范女工赵桂兰，全国委员会委员、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起义将领刘文辉，绅耆李根源，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藏），全国委员会委员刘长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作家舒舍予，起义将领、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陶峙岳，起义将领裴昌会，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起义将领、云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卢汉，全国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周叔韬，起义将领邓锡侯，全国委员会委员胡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李章达，绅耆、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凤随，司法界人士梁聚五（苗族）。】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二次会议 昨日继续进行大会讨论 马叙伦等二十二人相继发言》，载《人民日报》1950年6月22日。

钱端升的发言如下：

【京市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的发言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文如下：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代表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发言。

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首次召开尚在人民政协召开以前。我们遵照了

毛主席亲自给予的指示，后又依据共同纲领第十四条，于去年十一月召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即选举了我们自己的市长、副市长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从那时起，在短短六个月期间内，人民自己的政府完成了郊区二百八十多个村庄的土地改革，制定了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并以服务于劳动人民的市政建设文教卫生事业为重点的一九五〇年度工作计划，编定了基本上做到收支平衡的一九五〇年度收支概算，又召开两个区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开展民主建政的工作。我们所以能够获得这些优良成绩，首先是由于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的、就近的领导，同时也是由于北京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民族能够团结与合作。我们北京市的各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领导之下，已经结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统一战线。我们的统一战线在过去因为遵守共同纲领有了成绩，我们相信今后必可做出更好的成绩。

毛主席、刘副主席及政府各位首长所作的报告，鼓舞了我们，鼓舞了全中国的人民。从北京市的工作中，我们亲切地体验到：我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怎样忠诚地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努力，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无论在民主建政方面，在军事方面，在外交方面，在财经方面，在文教方面，在司法方面，八个月来的成绩都是辉煌而巨大的。我们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设施，表示最热烈的拥护。

我们拥护毛主席指示，以土地改革问题为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我们一致认为土改是解放农村生产力，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的最基本的条件。我们完全同意刘副主席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

今后的土地改革，诚如刘副主席所说，必须完全按照政府的法令及决定，“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去进行”，“不能容许混乱的现象发生”。正因为“土地改革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所以领导机关，必须“切实地掌握运动的领导”。在京郊土地改革中，我们亲身体验到这一点很重要。京郊土地改革所以没有发生混乱现象，正确的领导是一个决定的关键。

在干部中普遍进行有关土地改革政策的学习，使干部，特别是一些新参

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正确地了解掌握政策，对于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关系甚为重要。我们在京郊土地改革的实践中也充分证明这一点。

执行土地改革政策，必须依靠贫农雇农中坚并且巩固的团结中农，组成有力的队伍，必须依靠农民协会、农民代表会，依靠由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和农民协会相结合，依靠农民群众来进行。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土改顺利完成，而且可以建立与保持农村的革命秩序，防止乱捕乱打乱杀及其他混乱现象。这一点，对于我们一些没有土改经验的朋友们，开始时也许很难理解，但有些朋友凡是到京郊实际参加土改以后，都很快地了解了这一真理。

在农村建立人民民主的革命秩序，是一件极其伟大的工作。广大农民长期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下，现在一翻身就要诉苦，甚至要报复，这本是很自然的。但是一些地主阶级也许觉得农民翻身，就是无秩序，因此他们要想保持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秩序，那是不可能的。只要不乱捕乱打乱杀，不发生混乱，这就是很好的秩序。

关于富农，保存富农经济的原则是正确的。京郊土地改革的经验也证明了今后一般地不动富农土地财产这一政策原则是正确而可行的。

京郊土地改革还有一个经验值得提出。在土地改革进行中，有几百个大学生和教授也参加了工作。他们帮助向农民讲明土改政策；他们帮助做调查和登记的工作。对于土地改革工作的进行，他们有过一定的贡献。在实际的工作中，知识分子自己也取得了比较坚定的阶级立场，抛弃了过去自以为是超阶级而实则是依附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他们能够进一步的向劳动人民大众靠拢，晓得怎样依靠群众，怎样走群众路线，因而改进了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在这一两个月的实际工作中，知识分子所得到的改造，远过于一年半载留在学校中所能获得的改造。由于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实际与理论一致这个合乎真理的教育方法乃有了具体的证明。

京郊这一个经验对于土地改革的进行，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造，两有利益，值得适当的加以推广。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完成土地改革这一伟大的革命事业，是争取国家

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最必要的条件。让我们全体委员同志们，号召统一战线中的每一个单位，号召全国人民，来协助政府，为实施将要公布的土地改革法，为完成土地改革而奋斗！】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50年6月22日。

6月28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第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京市新闻处讯）京市第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昨（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开幕。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友渔、吴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到会指导。张副市长和钱端升副主席并曾即席致词。昨日会议由第一区区长和公安局内一分局局长作工作报告。

张副市长在致词中着重说明了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于进一步建设人民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并代表市政府，就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三项主要问题——检查干部作风，增进居民福利，修缮房屋等问题分别提出指示。希望全体代表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踊跃提供意见，协助人民自己的政府和工作人员更好地进行各项建设事业。

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在发言中强调指出这次会议和不久以前召开的第六、第七两个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样，对于北京以至全国各大城市的民主政权建设，将有很大的贡献。他勉励全体代表共同努力把这个会开好。

第一区区长苏捷报告了第一区区公所一年来的工作。关于今后半年的工作方针和计划，他指出：除了有重点地、适当地改善区内的环境卫生，加强对生产工作的领导，发展社会教育，并特别着重解决劳动人民及其子弟的失学问题外，并将开展夏季卫生运动防止疫病流行，以房屋问题为重点，迅速清理调解科的全部积案。公安局内一分局局长赵濂报告了一年来的治安工作，说明今后除在市公安局直接领导下进一步巩固革命秩序外，并将加强防

火工作，教育公安人员，改善公安人员的工作作风。

昨日来宾中有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代表李乐光，京市工商联合会筹委会代表凌其峻，市妇联代表刘俊英，他们都相继向会议致词和祝贺。】

——京市新闻处：《第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 苏捷区长报告一年来的工作》，载《人民日报》1950年6月29日。

7月2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行座谈会并发表声明抗议美帝侵略暴行。

【（新华社三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于七月二日举行座谈会，讨论“美帝在东方武装侵略的新形势”。出席会议钱端升、胡愈之、罗隆基、张友渔、吴晗、连贯、陶孟和、曾昭抡、黄琪翔、萨空了、宦卿、区棠亮、张明养、梅汝璈、冀朝鼎、王任叔、翁独健、王铁崖等，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外交组委员陈叔通、钱昌照、谢邦定等共九十余人。首由该会会长张奚若致词后，陈家康报告最近一般形势发展的情况。甫自欧洲返国的该会理事刘宁一报告了许多国外见闻。他详细分析了美国的经济危机，从而断定美国目前的暴行必然失败。该会副会长周鯨生从法理上说明美帝国主义破坏联合国，在程序上与实际上都是完全违法的。接着孟宪章、李儒勉、樊弘、雷洁琼、刘王立明、邵力子、曾昭抡、陈叔通相继发言，一致严厉驳斥杜鲁门的非法声明和美帝的武装侵略暴行。最后由该会副会长乔冠华作了总结，并全体一致通过了反对美帝在东方的武装侵略的声明。】

【（本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为反对美帝在东方的武装侵略发表声明。

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这一新的侵略行动是毫无道理的。谁不知道台湾是我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谁不知道美帝国主义进攻朝鲜人民是一种无法无天的犯罪行为？谁不知道保大和季里诺是帝国主义的百分之百的傀儡，而美国对于他们的军事“援助”是公开干涉越南和菲律宾的内政，妄图阻止越南和菲律宾人民的解放斗争？

美帝国主义这一新的侵略行动是毫无法律根据的。美国政府企图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来掩盖它的侵略罪行，但谁都知道，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和苏联代表的参加，安理会的决议是完全非法的。

声明称：美帝国主义这一新的侵略行动是吓不倒人的。美国政府采取了这一新的冒险行动，正是说明它过去那一套通过其傀儡以霸占亚洲的阴谋失败了。只有自己公开出场，进行直接军事侵略。但“老鼠过街，万人叫打”。美帝国主义这只“老鼠”既然显出原形在亚洲的大街上，招摇过市，其结果必然是引起全亚洲人民的“万人叫打”。帝国主义不得不显出原形的时候，就是帝国主义走近坟墓的时候。

声明严重抗议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并号召全中国一切爱国的人民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自己的祖国，奋斗到底！】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行座谈会 分析美武装侵略必然失败 发表声明抗议美帝侵略暴行》，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5日。

7月20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大会，入选主席团。

【（京市新闻处讯）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大会于今（二十）日上午开幕，这次大会将总结过去八个月来的筹备工作，正式成立教育工作者工会北京市委员会，并选举出席全国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共五百二十六人，代表着一万八千九百余会员，这个会议标志出北京市教育工作者的团结，标志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已经团结起来，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

在这次大会召开前，各校区工会大部分举行了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听取召开这次大会基本精神的传达，欢送代表，并讨论向大会提出的议案，迄今大会筹备处收到的提案已有四百六十余件，这充分反映出会员们对大会的关心。

昨天下午在全体代表参加的预备会上，已选出吴玉章、成仿吾、王琳、

焦百先、钱端升、俞铭传、张子高、严景耀、张云波、叶笃壮、光未然、乐天宇、柴德赓、徐悲鸿、茅以升、褚大告、张锡钧、李麟玉、张克明、方奇、任苏、印森、王鸿轩、彭文、梁以休、韩桂丛、侯恩巨、伟英高娃、温寒江、何森荫、韩焕堂、贺诚、刘启祥、陈君平、王静、舒恩恒、郭智、王朝向、倪坤、白钺、张仲玲、张敬一、刘勇等四十三人为大会主席团，并通过市委员会委员等选举办法及大会议事日程等。】

——京市新闻处：《京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大会今日开幕》，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20日。

【（本报讯）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大会于本月二十日正式开幕，出席代表四六二人，并有教育界首长及各团体代表来宾百余人。主席钱端升致开幕词后，首由教育部长马叙伦讲话，马部长指出半年来各校工会获得了不少的成绩与经验，希望今后能保证高教会议决议和高等学校课程改革草案的实施，应与教育行政密切配合，搞好学校。继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局长翁独健讲话，他说明北京市的教育今后是巩固与提高的阶段，提出几个具体问题：（一）提高教师的政治业务水平，（二）提高教学效果，（三）加强领导私立学校。全国总工会文教部长刘子久致词中指出北京教育工作者参加工会的已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基本上已组织起来了，工作已进入正常发展阶段，工会亦将由发展而进入巩固，今后的任务一面保证教学工作的完成；另一面则应注意福利，谋会员生活的安定。市总工会副主席萧明致词也指出大家团结，保证教学。在大会进行中有小学及幼稚园儿童献花，基层工会献旗等，大会于下午一时在热烈气氛中休会。

二十日下午举行第一次大会，听取筹委会工作总结报告，提案审查委员会提案审查报告，议事组组织问题的报告，及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等，晚间代表分组讨论候选人参考名单等。】

——《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大会首次大会 听取筹委会报告工作》，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22日。

7月23日

钱端升参加大会闭幕式。

【（京市新闻处讯）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大会，自本月十九日起举行了五天，已于二十三日胜利闭幕。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宣告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筹委会的总结报告和五百多件提案、选举了市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出席全国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

大会于本月二十日正式开幕，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马叙伦部长、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翁独健局长，莅会讲话，均希望工会能与行政密切配合，搞好教学。中华全国总工会，文教部刘子久部长、北京市总工会萧明副主席在致词中均明确提出工会的基本任务是保证教学工作的完成。对这些讲话各代表小组均曾进行讨论，明确了工会的任务应面向教学。为了做好并不断的改革、提高教学工作，目前的基本关键是会员们加强政治、业务、文化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水平。在二十二日下午的大会上，各小组代表发言，一致对此表示热烈拥护。

大会于二十三日进行选举。由各小组及主席团、小组长联席会反复讨论后，提出候选人名单，当日选出教育工作者工会市委员会委员吴玉章、钱端升等三十五人，候补委员方奇等十人；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韩焕堂等五人，候补委员刘裕中等二人；出席全国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大会代表何戊双等十五人，候补代表梁以俸等五人。

大会闭幕式于二十三日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出席来宾、代表及会员等约四千人。全总刘子久、教育部刘皑风、北京市人民政府张友渔副市长、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李乐光、青年团中央许立群等，及上海等地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应邀参加。

大会首先讨论由大会发表通电，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案，代表多人相继发言，对美国侵略罪行表示无限愤怒。新法学研究院代表尹肇竑、九区中心小学的教员苏文瑛和竞存女中教员王文珩都表示：要在自己岗位上进行广

泛的宣传，撕破美帝国主义的阴谋面目；并决心教育第二代成为坚决保卫和平的战士。学校工人阎林和刘勇伸出了拳头说：“北京市教育工作者的大团结，是争取和平的巨大力量。全世界的人民都这样团结和组织起来，帝国主义就会完全孤立而被打倒。”

大会对于正在与美帝进行英勇斗争的朝鲜人民深致关切之意，一致通过了向朝鲜人民军致敬的电文。继由市总工会主席彭真讲话，他指出：这次大会是有成绩的，第一，正式成立了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第二，总结了过去的工作；第三，决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与方向，就是把学生教好，把自己提高，把福利搞好；第四，对于开大中小学代表在一起的大会有了经验。彭真同志继就大会几个具体问题加以说明，最后并讲述了国际国内的形势。主席团钱端升致闭幕词，他指出这次大会是北京市教育工作者空前的大团结，是有很大收获的。在大会进行中，有市妇联及许多大中小学的工会等六十余单位献词、献花、献礼。上海教育工作者工会朱隐逸代表上海、广州、武汉、昆明、西安、迪化、济南、太原、张家口、大连、沈阳、长春等地教育工作者工会，市医务工作者工会主席王亚曙、市学联副主席方生等先后致词，对大会表示庆贺。大会最后并通过向毛主席致敬电。

大会向毛主席的致敬电称：

“我们决遵照您所指示的教育方针，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而努力，搞好教学工作，加强学习，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业务水平，更好地做好我们的工作。”

大会声援朝鲜人民军的电文中说：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朝鲜人民一定要解放全朝鲜。我们两国人民都有力量有把握粉碎美国疯狂的侵略行动。中国革命的胜利经验与你们英勇斗争胜利的事实，已经充分地证明了，任何外国的武装干涉者都阻挡不住亚洲人民的解放。我们北京市全体教育工作者坚决地表示，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与朝鲜的英勇人民军站在一起，团结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难，粉碎美国的侵略行为，巩固亚洲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

向你们致以热烈的兄弟的敬礼！”】

——京市新闻处：《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大会闭幕 市教育工作者工会成立大会电毛主席致敬并声援朝鲜人民》，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25日。

7月26日

胡适日记存香港《星岛日报》载新华社北京21日电一条。提及钱端升：

【（新华社北京21日电）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三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的各项名单如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今日继续进行大会讨论。今日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8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05页。

夏红注：

黑体为胡适所加。

7月30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协商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京市新闻处讯）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于三十日下午三时在中山公园该会会议室举行第七次会议。出席委员三十二人。会议由协商委员会彭真主席主持，听取并讨论了市人民政府准备向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所做的半年工作报告，通过了“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单位代表变动名单”，并决定于下月三日再举行一次协商委员会会议，以便听取与讨论市政府半年来财经工作的报告和协商委员会关于救济失业员工、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

本次会议由张友渔副市长作了关于《市政府执行一九五〇年度工作计划》的报告，吴晗副市长作了关于《执行一九五〇年度业余教育、文教卫生

工作计划》的报告，并由薛子正秘书长、郊区工作委员会柴泽民主任、市人民法院王斐然院长分别作了关于《执行一九五〇年市政建设计划》、《辅华矿药厂爆炸事件的处理》、《土地改革、农业生产、生产救灾工作》及《法院清理积案工作》等报告，会议对这几项报告做了初步的讨论，相继发言的有：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余心清、钱端升及委员陈铭德、傅华亭、刘一峰、诸福棠、张云川、古奇踪等，一致认为北京市这半年来的建设工作有很大成绩，充分表现了人民政府与人民伟大的力量。同时对市政建设、文教卫生等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京市新闻处：《京市协商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 听取各项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31日。

8月3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京市新闻处讯）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昨（三）日举行第八次会议。这次会议继续进行第七次会议未了议程，听取与讨论了张友渔副市长关于“市政府半年来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协商委员会刘仁副主席关于“救济失业员工工作”的报告，和钱端升副主席关于“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会议决定于本月八日召开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在原则上通过大会议事日程。

昨日会议由协商委员会彭真主席亲自主持，出席委员二十四人。在讨论各项工作报告时，先后发言的，有：傅华亭、张云川、陈铭德、许德珩等委员。】

——京市新闻处：《北京市协商委员会昨举行第八次会议 决定召开第二届三次人民代表会议》，载《人民日报》1950年8月4日。

8月8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式。

【（本报讯）据京市新闻处讯：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昨（八）日上午九时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开幕。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市人民政府执行一九五〇年度工作计划的各项报告，和协商委员会关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救济工作的报告及关于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会期预计三日。昨日出席代表三百三十四人，执行主席上午为彭真、余心清、陈垣、李伯钊、诸福棠、浦洁修、黎锦熙、许立群、朱长江；下午为刘仁、许德珩、徐悲鸿、何凤亭、古奇踪、梁以俦、刘一峰、萧松、柴泽民。

.....

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作“关于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钱副主席把第一、五、六、七等四个区召开代表会议的经过，反映和主要经验说明之后，指出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应该在全市普遍推行。他说：“有的区提案竟达两千七百余件之多，这一铁的事实证明，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十分必要的。”他进一步说明：“从这个会议所产生的结果和所得到的反应来看，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一个区有一二十万人口，人民在区代表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和意见这样多，开这样的会议是很有必要的。这样不仅可以更多地集中人民的意见，更密切政府和人民的联系，使人民来协助政府办事，因而使政府的方针和计划更容易贯彻，并且使政府和干部都得到人民的监督与批评，因而迅速克服了很多工作中的缺点，提高了工作的效能。这样不仅加强了干部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给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以很大打击。同时，也更易使人民从实际的民主生活体验中迅速提高主人翁的自觉。”】

——《京各界三次代表会开幕 会议主要是听取市府各项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1950年8月9日。

钱端升报告全文如下：

【关于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

京各界代表会协商委会 钱端升副主席

关于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问题，市协商委员会根据第二届第二次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拟定了“北京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经本届第五次市协商委员会与市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报请政务院批准后，已于五月十六日公布施行。现在，一、五、六、七等区已经先后召开了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试行结果，成绩很好。其他各区也正在进行筹备工作，如果大会同意的话，即将陆续召开。

第六区在五月三十一日召开第一次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一七一名；第七区在六月六日召开会议，代表一四三名；第一区在六月二十八日召开会议，代表一八二名；第五区在七月十五日召开会议，代表一六八名。会议时间多的是三天半，少的是两天半。代表名额是根据各区居民分布的特点，由筹备委员会协商后，报请市人民政府决定的。

各区在召开会议前，都由区政府邀集各界人士成立了筹备委员会，负责进行有关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和代表选举等项筹备工作。这些筹备工作的好坏，对于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本身的工作进行，是有很大影响的。

这次各区人民代表会议所收集的提案和意见，是很多的，第六区有一、二七二条，第七区有一、四九二条，第一区有二、七四六条，第五区有八〇〇条。这些提案和意见，有些是由代表直接提出来的，有些是在会议前或在选举过程中经过座谈会或访问居民的形式收集起来的，有的是居民用书面交来的，有的是由他们口头提出由筹委会记录下来的，就是说我们没有拘泥于任何机械规定的形式，而是采取了各种便于人民表达意见的方式集中起来的。从形式上看来，这种做法，好像很不正规，但从提案和意见的内容来看，它却真正地集中了各区人民的切身要求和真实意见。

这次各区所收到的提案的内容，主要的是关于居民福利问题，特别是公共卫生、市政建设等，其次是对于政府工作人员的批评和意见，绝大多数是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有关的。有的区提案竟达两千七百余件之多，这一铁的事实证明，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十分必要的。

在会议进行中，代表们的情绪是很热烈的。他们在会议中听取了区政府的工作报告，了解了政府替人民办了许多事情，同时也认识到现在的政府，

的确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他们又在会议中处理了所有的提案和意见，实现了毛主席所说的“凡有意见都可发表，凡有提案都可付审议”的指示。有许多代表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政治生活，他们现在以人民代表的身份来参加了这样名实相符的人民代表会议，使他们感觉到“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没有的”，特别是对于政府工作人员作风的批评与检查，更使代表们十分兴奋，发言热烈，他们对政府工作人员提了很多批评，同时也对他们表示了很大的关切与爱护。

会议之后，代表们一致认为会议开得好，“真是民主”，能解决问题。开始他们很感拘束，甚至有人说：“到了会场里不晓得怎么站。”经过会议之后，有人说：“我参加了这个会，才知道代表会议是怎么一回事，往后对政府领导办的事，再也不观望了。”也有人说：“过去我没有把区代表会看得怎么重要，没有想到这次会解决这么多问题，本来我不想说话，但我看到这样民主，很高兴，也就说话了。”

从这个会议所产生的结果和所得到的反应来看，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一个区有一二十万人口，人民在区代表会议上提的要求和意见这样多，开这样的会议是很有必要的。这样不仅可以更多地集中人民的意见，更密切政府和人民的联系，使人民来协助政府办事，因而使政府的方针和计划更容易贯彻，并且使政府和干部得到人民的监督与批评，因而迅速克服了很多工作中的缺点，提高了工作的效能。这样不仅加强了干部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给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以很大打击。同时，也更易使人民从实际的民主生活体验中迅速提高主人翁的自觉。

自然，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北京还只是开始建立，干部和群众对这样的会议，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因此还有许多缺点。但是在几个区试行的结果，足以证明：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应该在全市普遍推行的。

从这四个区的代表会议中，我们得到一些什么经验呢？现在为了说明上的简便，从正面提出我们的意见。

第一，在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无论宣传、选举、开会，一切都

应以便利群众和不多浪费群众的时间为原则。必须充分估计到群众的时间是宝贵的，必须尽量少耽误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时间。自然，在会议前，应根据区代表会议的组织通则和政府准备在代表会议中解决的中心问题，尽可能向人民说明为什么要召开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要怎样选举，会要怎样开，要解决些什么问题，使人民积极参加并向代表会议提出他们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切不要企图在群众从未开过区代表会议毫无实际体验之前，左一个会，右一个会，用“沿门解释”、“挨户走访”的方式，做到“家喻户晓”之后，再来选举，再来开会，致使群众不胜其烦，我们这次有个别区就犯了这种毛病。

第二，在选举代表时要采取简便的办法，不要铺张，不要追求形式。从几个区的经验来看，在目前的情况下，关于代表的选举方法，除团体和机关、党派代表由各单位自行选派外，其他居民代表的选举，目前决不可能过早的按照公民个人为基础，来实行普选，一般的还只能按户口为基础来推选。现在，只有这样才能行得通，同时这样办也并没有坏处。事实上一户之内的家庭成员间在区代表会议目前所要解决的问题上，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利害关系，以户为单位来产生代表，是可以大体代表他们的意见的。

第三，在会议中的提案这样多，是一种很好的现象，这不仅表示了人民对于区代表会议的迫切需要，而且表现了人民的政治的积极性，政府对于这些提案，必须认真的分别加以处理。凡是区有权决定和能够办的应该认真办理（七区能办的约占提案总数百分之四十五）。凡是区自己不能决定不能办理的应该报请市人民政府解决。不能办的，应向代表解释清楚，说明不能办的理由。

第四，应该有重点地解决问题。在已开的几个区的代表会议，都是有计划、有重点地领导群众集中力量解决若干福利问题及对干部作风进行检讨。自然群众要求解决和应当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但这只能按照我们的主观力量 and 问题的缓急轻重来逐渐解决。决不可能在一次会上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第五，检查干部作风是这次区代表会议一项重要的任务，通过区代表会

议，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发动群众，检查政府工作人员作风，以及个别分子的贪污、腐化，克服我们政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能大大改进我们的工作，使人民和自己的政府保持更直接、更密切的巩固的联系。有些区的代表在会后说：“现在政府干部有了错，我们可以管了。”“政府真是我们自己的。”有些代表在听取了区长的自我批评以后深受感动，认为：“这是一件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事情。”这都说明用民主的方法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进行自我教育的良好方法。

第六，成立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协商委员会，并使协商委员会成为经常联系人民的机构，是很必要的。有些区在开过会以后，群众有了事就找协商委员会来商量。这说明这样的组织是很适合人民的要求的。因此，不仅要设立区协商委员会的机构，有固定的人负担日常工作，并且要在协商委员会之下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如清洁卫生、修缮房屋等，以便经常联系群众，进行各种工作。

这就是协商委员会关于区人民代表会进行情形和经验总结的报告。请大会讨论并作最后决定。】

——钱端升：《关于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0年8月10日。

8月10日

北京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幕，钱端升担任执行主席。

【（京市新闻处讯）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九日进行小组讨论与提案审查，十日继续举行大会，讨论并通过市政府与市协商委员会工作报告以及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结果报告。最后由市协商委员会彭真主席作总结，于下午六时半闭幕。

昨日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三百十一人。执行主席上午为钱端升、张友渔、陆志韦、罗瑞卿、张致祥、宋凤祥、刘桐恩、傅华亭、杨贵贞；下午为聂荣臻、邓拓、张东荪、吴晗、陈铭德、萧明、田纶、王甫、罗旺。

十日大会于上午九时开始，讨论市政府与市协商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各项工作报告。代表们发言十分踊跃，下午三时开会后继续讨论，先后讲话的共有三十四人。他们的意见有代表团体的，有代表小组的，也有个人发言的，都一致认为政府半年来的工作，在各种困难的情况下，不但完成而且超过了计划，执行了上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代表们纷纷表示同意与拥护，并对政府今后工作也提供了许多积极的建议。代表们发言的直率、热诚，充分表现了各界人民对人民政府衷心的热爱，也表示了人民政府与各界人民间密切的联系。会场情绪热烈，掌声时起。

大会讨论结束后，全场一致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在全市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关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救济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全文另发）。

大会继由提案审查委员会总召集人张友渔副市长报告提案审查结果；此次会议收到提案九十八件，经原提案人申请撤销者一案，剩九十七案。其中：政法公安类七件，财政经济类十五件，市政建设类三十三件，文教卫生类十六件，社会福利及其它类二十六件。大会于讨论后，在掌声中一致通过审查委员会对九十三案的审查意见，即：处理、办理者四十二件，斟酌办理者二十二件，研究参考者二十六件，保留否决者三件。此外，政法公安类关于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提案两件，由提案审查委员会提请大会讨论结果，一致同意大会主席团的意见，全体举手通过《关于继续展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的决议》（决议全文另发）。文教卫生类关于照顾工人子弟入学和扶植私立学校两案所提内容，文教局实际已在进行，原提案人对某些具体情况不甚明了，文教局翁独健局长特在会上作了说明。

大会最后由协商委员会彭真主席作总结报告，受到代表们的热烈鼓掌欢迎。彭主席的报告对大会讨论中所提到几项重要问题，作了详尽的说明。他的报告包括：调整工商业问题，文教卫生、失业救济、区人民代表会议、房屋问题、地方附加问题和整顿干部作风。报告中有原则性的方针问题，也有具体的指示（报告摘要另发）。代表们听完他的报告，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大会在欢声中闭幕。】

——《京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幕 通过关于各项工作报告的决议 决继续展开和平签名运动反对美国侵略》，载《人民日报》1950年8月11日。

8月12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当选副主席。

【（新华社十六日讯）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于十二日上午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推选吴玉章为全国委员会主席，刘子久、钱端升、方明、郎洁华为副主席；马叙伦、黄静涛、汪金丁、雷洁琼、萧项平、萧采瑜、陶廉、陶淑范、于达、车向忱、刘泽如、曾广济、潘佛章、潘大逵等十九名为常务委员。全国经费审查委员会推选孙起孟为主任，俞铭传为副主任。

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

吴玉章、马叙伦、刘子久、雷洁琼、汪金丁、黄静涛、萧项平、叶维民、陶淑范、吴天石、于达、吴富恒、王亚南、吴容、操震球、吴有训、方明、萧太初、刘庆云、李广琦、萧采瑜、王仁忱、钱端升、何戊双、王俊英、陶廉、董遂平、苏和、卢金堂、郎洁华、郑文华、潘佛章、张江明、尚友、孟夫唐、曾广济、孟兰生、朱剑农、刘绪贻、杨新月、刘彦忠、胡波黎、吴宗骥、车向忱、张如心、李光年、高永龙、周太喧、李松涛、吕敬先、李钟庆、杨士林、潘大逵、李忻、饶博生、李朝璧、粟纯熙、冯泽生、刘泽如、马汝邻、吕赞襄、艾沙尼牙孜、张德芪（保留西藏、台湾各一名）】

——《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名单》，载《人民日报》1950年8月17日。

8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结合整风运动 开好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引

用钱端升先生的报告。

【开好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对各级政府工作干部作风的检查与批评，这是克服政府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密切政府与人民联系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整风运动中，经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来整顿政府工作人员的作风，更是必要的。

北京市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和经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在向毛主席报告北京市关于整党工作的情况和计划中，说到区级干部的整风情况时曾指出：“今年五月以来，已有四个区经过区人民代表会议，进行了检查干部作风和检查纪律的运动，主要是检查命令主义和贪污腐化。再有一个月，城区的区人民代表会议可以普遍开一次。”北京市协商委员会钱端升副主席向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人民代表会议所作“关于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对于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这方面的成就和收获，肯定地指出：这种会议“使政府和干部得到人民的监督与批评，因而迅速克服了很多工作中的缺点，提高了工作的效能。这样不仅加强了干部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给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以很大打击。同时，也更易使人民从实际的民主生活体验中迅速提高主人翁的自觉。”

目前北京市又有四个区已举行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未开而即将召开的只有一个区。凡是已经召开的，都进行了对干部的作风检查，效果都是很好的。事实业已证明，北京市所进行的这一个整顿政府工作干部作风的方法是正确的。这个方法不但适用于城市，而且适用于乡村；不但适用于区级，而且适用于各级的人民代表会议。因为，通过了这种方法，才可以使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与自上而下的检查与总结工作结合起来。只有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才能够由广大人民来直接行使政权，在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普选前代行代表大会职权的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听取政府的工作报告，并审查政府工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作风；也只有当着我国广大人民能够实际管理政权，因而热爱自己的政权，痛恨着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并敢于向它作坚决斗争的时候，官僚主义及一切其他的歪风才会

失却其存在的社会基础。

为了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能够切实而认真地进行对政府工作人员作风的检查与批评，就要在会前好好地去发动群众对政府工作及政府干部的作风提意见，并且用各种便于群众表达意见的方式来进行，然后再集中到会议上。在会议上要充分发扬民主，使每个代表都有权说话，并且敢于批评政府工作和政府干部工作作风的缺点和错误。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也有明确的指示：“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地步。

有了会前的发动群众和会议的充分民主，就使群众性的批评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但还不是足够的条件。足够的条件是要使群众感觉到批评是有效的；而且不会因为批评了干部的作风而遭受到个别干部的报复。关于前者，就必须各级政府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在人民代表会议上虚心接受来自群众及代表的批评；尤其对正确的批评，要立即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在会议上进行深刻的检讨。关于后者，向群众或代表采取报复行为的个别干部，那是犯了原则性的严重的错误，如有发现，各级政府应立即进行处理，对犯了错误的干部给以应有的处分，并将处理经过向人民代表会议或在代表会议休会期间向协商委员会提出报告。这样既保障了群众和代表合法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又鼓励了群众和代表的积极性。这样，群众性的批评自然就会顺利地展开起来。当群众性的监督与批评顺利开展的时候，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及一切其他的歪风，也就无处藏身了。

人民民主的政权制度，保证了我们能够充分采取这种民主的方法来进行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与改造。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早已具体而明确地给我们指示了这条道路。他说：“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

而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毛主席又说：“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即根据共同纲领，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惟一正确的方法。”

既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代行代表大会职权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行使政权的机关，是人民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我们又有了在人民内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民主的方法，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那么，只要我们把这种优良的人民民主制度，和正确的自我改造的方法，紧密地结合起来，并正确地充分地加以运用，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坏习惯和坏影响，如目前在一部分政府干部工作作风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倾向，必然会逐渐地缩小地盘，以至于最后消灭。

目前我们应该把民主建政工作和整风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开好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一步普遍地整顿我们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

——《结合整风运动 开好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载《人民日报》1950年8月22日。

9月27日

钱端升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尽速制止美国暴行。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曾在美国留学人士张奚若、马寅初、钱端升、罗隆基、赵紫宸等二十三人于九月二十七日致电联合国，反对美国侵略，原文如下：

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

我们，曾经在美国留过学，目前正在新中国从事各种工作，谨向联合国呼吁制止美国对于中国、朝鲜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侵略行为。这类侵略行为危害了世界和平与联合国的生存。

美国使用其武装部队侵略中国的台湾，并袭击中国东北辽东省的和平村庄。它进攻和蹂躏朝鲜，并以各种方式广泛扩张其侵略行动于亚洲其他地

区。这类行为无一不是对于联合国宪章的明显的违犯，然而这类行为却无一不是在盗用联合国名义之下进行的。

所有这些美国侵略行为不但构成对于法纪道德的破坏和世界和平的威胁，即对于以杰斐逊、林肯和罗斯福所代表的美国优秀传统，也是一种可悲的背叛。

我们和愤怒的亚洲人民，一致要求联合国立即采取下列断然行动：

（一）制止美国在联合国掩护下扩展其侵略行动。

（二）命令美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台湾撤退，并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的军事挑衅行动。

（三）促使美国立即赔偿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七、二十九两日与九月二十二日在辽东省对中国领土无故非法袭击所造成的一切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并充分保证今后此类野蛮行动不致重演。

（四）命令美国侵略部队立即从朝鲜撤退，并采取有效步骤，防止美国对亚洲其他地区再有干涉和侵略行动。

我们郑重要求联合国尽速采行这些步骤。美国在亚洲的行动正使联合国的声望陷于国际不义与战争的污泥中。联合国必须为和平与正义而行动。

签名者：张奚若（清华大学教授）马寅初（浙江大学校长）钱端升（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罗隆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政治局委员）赵紫宸（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吴贻芳（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陈裕光（南京金陵大学校长）陈序经（广州岭南大学校长）竺可桢（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侯德榜（科学家，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老舍（作家）曾昭抡（北京大学教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教务长）梁思成（建筑工程师）金岳霖（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清华大学教授）吴耀宗（基督教政协代表）涂羽卿（全国基督教总干事）刘王立明（女）（中国妇女节制会会长）金宝善（公共卫生专家）沈克非（医生）章元善（前华洋义赈会总干事）凌其峻（仁立实业公司经理）】

——《曾在美国留学人士张奚若等二十三人致电赖伊 要求尽速制止美

国侵略罪行》，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28日。

10月13日

钱端升等北大师生反对美国裹胁联合国侵略朝鲜。

【(本报讯)北京大学师生对美帝操纵联大，非法通过英、澳等八国提案，以遂美帝扩大侵朝战争的阴谋，表示万分愤慨，一致拥护我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在指出美帝一直在用各种方法破坏安理会中五大国一致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以遂其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后，说：“我们要积极准备力量，不能让它继续扩大战争的火焰。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已经把美帝操纵表决器通过非法提案的问题，说得很明白了。我们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坚决反对美帝的侵略战争！”中文系杨晦教授说：“美帝这种威胁与挑衅行为，对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说来都是不中用的。一方面我们有和平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保卫和平的决心和力量。”理学院张景钺院长说：“朝鲜与我国仅一江之隔，威胁了朝鲜人民的安全，也就是威胁了中国人民的安全。我们要加强警惕。”法律系助教张鑫说：“美国战争贩子操纵联合国机构非法通过的提案，是全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所最不能忍受、最坚决反对的。”中文系牛广业同学说：“我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不仅是对美帝的一种警告，而且表示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坚决粉碎美帝扩大战争的阴谋。”】

——北大通讯组：《中国致公党发表声明反对美帝扩大侵朝战争 北大师生坚决拥护外交部发言人声明》，载《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3日。

10月26日

钱端升等参加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集会。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在京委员与参加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的各人民团体代表及各民主党派

代表，今日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会议通过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及“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委员会”合并改组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重要决议。

参加联席会议的计有郭沫若、彭真、陈叔通、黄炎培、马叙伦、张治中、邵力子、章伯钧、彭泽民、许德珩、蔡廷锴、朱学范、邓颖超、廖承志、司徒美堂、罗隆基、史良、陈其瑗、沈雁冰、胡乔木、华罗庚、赵紫宸、丁瓚、李宗恩、李秀贞、吴有训、邢西萍、周建人、竺可桢、徐悲鸿、许广平、陆志韦、张奚若、陶孟和、曾昭抡、汤用彤、叶企孙、萧三、钱端升等一百零八人。】

——《加强反对侵略保卫和平运动 我国和大委员会与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合并 组成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载《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7日。

钱端升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全国委员。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全国委员名单（共一五八人，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玲、丁瓚、于振瀛、天宝、王芸生、王昆仑、田汉、白寿彝、史良、巨赞、司徒美堂、朱学范、艾青、艾思奇、多杰才旦、李立三、李四光、李宗恩、李秀贞、李达、李德全、李贻、李烛尘、吴有训、吴茂荪、吴贻芳、吴羹梅、吴鸿宾、吴耀宗、邢西萍、何思敬、沈志远、沈兹九、沈雁冰、沈钧儒、辛志超、余心清、周士观、周炳琳、周建人、周扬、周苍柏、周颖、金仲华、孟宪章、邵力子、林士笑、林汉达、林铿生、林励儒、易礼容、竺可桢、胡子婴、胡仲持、胡乔木、胡愈之、胡兰生、范小风、范文澜、范长江、洪深、施复亮、俞寰澄、侯外庐、侯德榜、韦恂、马杰、马坚、马俊、马思聪、马叙伦、马寅初、徐悲鸿、孙起孟、袁雪芬、倪斐君、乌兰夫、陆定一、陆志韦、陆瑾、张治中、张志让、张奚若、张炯伯、张云川、张曼筠、章乃器、章伯钧、陈其尤、陈其瑗、陈垣、陈叔通、陈望道、陈铭枢、陈嘉庚、许立群、许广平、许德珩、许宝驹、郭沫若、郭则沉、崔月犁、区

棠亮、梅汝璈、梅兰芳、曹孟君、曹禺、梁希、陶孟和、彭真、彭泽民、黄炎培、黄振声、黄琪翔、曾昭抡、冯宾符、程砚秋、汤用彤、费振东、华罗庚、杨刚、杨卫玉、叶企孙、荣高棠、廖承志、赵仲池、赵紫宸、赵树理、赵朴初、熊瑾珏、蔡廷锴、蔡畅、蒋南翔、刘王立明、刘良模、刘宁一、刘鸿生、邓初民、邓颖超、郑振铎、翦伯赞、黎锦熙、萧三、萧明、钱三强、钱俊瑞、钱端升、薛愚、谢邦定、谢雪红、赛福鼎、戴爱莲、简玉阶、谭平山、罗隆基、严希纯、严济慈、龚澎】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全国委员名单》，载《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7日。

10月29日

钱端升入选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名单。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名单如下：

团长：郭沫若

团委会委员：马寅初 邓颖超 章伯钧 蔡廷锴 刘宁一 廖承志 盛丕华 萧三 钱端升 欧百川（苗族代表）赛甫拉己夫（维吾尔族代表）

秘书长：刘宁一

副秘书长：冯乃超 吴茂荪 丁瓚

团员：易礼容 张静 郝尔孝 黄灯明（工）钱三强 袁雪芬 龚澎 梁耕（以上为青年代表）李德全 康克清 陆瑾 曹孟君 草明（以上为妇女代表）钱俊瑞 巴金 金仲华 石联星 任德耀 黄宗英（以上为文化界代表）严济慈 周培源 涂长望 袁翰青（以上为科学界代表）吴耀宗 赵紫宸 邓裕志 刘良模（以上为宗教界代表）伟英高娃（云曙碧，内蒙代表）多杰才旦 黄祥（以上为藏族代表）王克 马培清（以上为回族代表）龙介仁（阿西族代表）林三良（台湾高山族代表）库尔班艾力（哈萨克族代表）

工作人员：陈定民 胡韦德 彭迪 袁水拍 刘群 陈正青 薛沁冰 孙岱 王振基

阎明智 盛愉 陈慈爱 何理良】

——《出席二届世界和大的中国代表团名单》，载《人民日报》1950年10月30日。

11月1日

钱端升等签名上书毛泽东，决心反侵略并为祖国贡献出最大力量。

【（本报讯）北京大学教员以愤怒的心情发起上书毛主席的签名运动，抗议美帝侵略，表示愿意并且决心献出最大的力量，为保卫祖国而奋斗。截至一日晚，签名的已有汤用彤、曾昭抡、王鸿楨、饶毓泰、钱端升、马大猷等三百七十六人。这个自发的签名运动是在十月二十七日该校化学系教学研究指导组教员讨论美帝侵略台湾朝鲜与我们应持什么态度时发起的。当场大家情绪很高，有人建议发起签名上书毛主席，表明自己的态度。第二天化学系贴出墙报，并通知各系征求签名。这一庄严的爱国举动，迅速得到了全校教员的热力支持。现在差不多全体教员都已经签了名。他们给毛主席的信和三百七十六人的签名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大学中的教育工作者，在今天美国帝国主义正在扩大侵朝战争，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安全的时候，愿意向你表示一点意见：

我们清楚的了解，美国帝国主义者妄想用战争来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解决他的外在和内在的矛盾与困难，来巩固独占资本的地位，并取得世界统治。美国帝国主义这样的侵略政策，正在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

由于过去经历，我们现在更加深切地认识到美国帝国主义在不断地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民主和自由，对于进步民主力量采取着法西斯镇压，对于和平人民施行血腥屠杀、掳掠和奸淫。这些帝国主义的罪行，比之日本法西斯强盗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朝鲜人民正在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正义卫国战争中，表现出无比坚决勇敢

的英雄气概。我们相信胜利是属于人民的。可是美国帝国主义疯狂地扩大战争肆行侵略，直接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我们大学的教育工作者，爱好和平，而且需要和平，以恢复发展我们的文化教育事业。然而，在祖国安全受到威胁，迫使我们所进行的事业受到阻碍的时候，我们也决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

我们现在向你表示：

我们坚决拥护周总理的报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我们完全相信你的领导，在你的领导下，我们愿意并且决心献出最大的力量，为保卫祖国而奋斗。

谨致

最崇高的敬礼！

曾昭抡、孙承谔、蒋明谦、邢其毅、唐敖庆、张龙翔、唐景一、张锡瑜、刘若庄、韩德刚、容庆新、黄彭年、苏勉曾、武永兴、谭曾振、孙亦梁、恽琬、李琬、黄仕永、庞礼、卢锡锬、文重、黄竹坡、陶宏、王寿仁、吴鸣镛、刘世泽、孙树本、王湘浩、李经熙、陈杰、翟有梁、魏执权、陈藻莘、聂灵沼、李克群、江泽涵、王建华、刘开祥、许宝騄、范景援、冷生明、彭清杰、郭辅臣、赵仲哲、谢邦杰、申又彬、庄圻泰、恩俊、曹立凡、苗华殿、张禾瑞、江泽培、栾汝书、赵凯华、沈克琦、徐叙琮、陈景明、张宗燧、郑华炽、赵广增、林克椿、郭汝嵩、江丕桓、薛琴访、于敏、李若璠、让庆澜、倪颖庄、谭承泽、饶毓泰、朱光亚、李汝祺、李秀贞、陈德明、刘次元、王淑芳、王希祐、李伯时、廖友桂、王庆天、孟庆哲、潘玉芝、张宗炳、刘作模、钱存柔、郝天和、丁延淑、陈阅增、刘寅生、童愚得、沈霭如、武建勋、罗士苇、吴素萱、李覬高、马毓泉、朱澄、王守德、吴相钰、赵广良、高信曾、刘义春、冯午、张文波、张景钺、冯国材、祁文斌、唐英、於崇文、张鹏飞、郝诒纯、臧哲昌、杜恒俭、郑之英、傅锬、王嘉荫、邵克忠、王文魁、王大纯、李文达、潘钟祥、张炳燿、王鸿楨、高

之秋、马杏垣、吴利仁、杨起、张咸恭、杨晦、刘禹昌、赵西陆、孙毓椿、姚殿芳、冯文炳、俞平伯、游国恩、周祖谟、萧雷南、吕德申、章廷谦、唐兰、罗常培、杨振声、魏建功、蔡金和、汤家瀚、陈玉龙、李裕森、张礼千、袁有礼、陈炎、陈干祥、黄敏中、范宏科、昌瑞颐、秦德才、秦森杰、凌瑞拱、季羨林、郭应德、马超群、殷洪元、李森、马学良、李启烈、金克木、王世清、今西春秋、刘麟瑞、杨人楩、商鸿达、郑天挺、向达、金毓黻、戚佑烈、张政烺、全逊、朱庆永、杨翼骧、邓广铭、汪篔、汤用彤、许宝騄、任继愈、王维诚、贺麟、郑昕、黄柚森、齐良骥、杨祖陶、王太庆、梁东汉、孙钺、于石生、蓝文卿、李育民、戴文魁、刘钧仁、孙贯文、刘慧达、梁廷焜、崔季五、张立仁、韩国屏、张鋈如、李如、白松海、邢继祿、杨志明、杨佩霖、叶振、田余庆、汪子嵩、陈绍业、韩寿萱、王重民、李克珍、王利器、阴法鲁、万希芬、胡先晋、孙云畴、黄觉非、汪暄、余叔通、蔡枢衡、芮沐、欧阳本先、张鑫、费青、李由义、宁汉林、程筱鹤、刘志扬、楼邦彦、赵宝煦、张国华、钱端升、周仁、龚祥瑞、许德珩、吴恩裕、吴之椿、赵乃搏、刘心铨、樊弘、罗志如、周作仁、熊正文、严仁赓、范家骧、周炳琳、周复恭、闵庆全、蒋光远、汤友竹、弓清源、刘冠军、张敏、金岩、王阔明、于绍和、管玉珊、龚明信、于德仁、赵振绵、刘士英、虞积刚、高步昆、黄熊、刘翰生、袁恩熙、陈士骅、周卡、杨曾艺、陈致忠、黄仕琦、陈明绍、滕智明、吴明德、陶葆楷、白守知、邵一麟、王和祥、金涛、李颂琛、张任、刘长祿、金国藩、李西山、钟一谔、彭秉璞、李麟谟、方崇智、张世民、王树枫、庞家驹、万嘉鎧、池去病、曹继贤、李世忠、冯俊凯、王补宣、孙可宗、邹致圻、钟寿民、程宏、马大猷、康书香、吴震春、韩丽瑛、李学智、王明惠、杨秉寿、冯子良、周汝璜、陈克元、余谦六、高景德、李桂华、郑学坚、朱达铭、王之轩、胡筠、王寄淦、周以直、唐培坤、傅鹰、严克信、陈廷蕤、唐伟英、李成林、刘朴、傅举孚、陈国符、宋泊、赵正之、王之英、陈文澜、刘鸿演、王炜钰、周永康、李承祚、金承藻、卢绳、戴志昂、赵荣普、赵隆勳、常凤璋、张祥

保、曾觉之、王岷源、冯至、李绍鹏、陈占元、袁民宝、朱光潜、袁家骅、田德望、俞铭传、尹绍鸿、闻家驷、施松卿、叶汝琏、俞大缜、潘家洵、郭麟阁、王德华、卞之琳、范其光、齐声乔、蔡思克、蒯淑平、赵全章、林筠因】

——《北京大学教员三百七十六人签名 上书毛主席决心反侵略 愿为保卫祖国献出最大力量》，载《人民日报》1950年11月4日。

11月8日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市分会成立。钱端升出席。

【(本报讯)据京市新闻处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八日下午二时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成立大会。出席有京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工人、学生等代表共约七百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副主席彭真、陈叔通曾亲自到会指导。

大会首先通过下列十一人为主席团：张奚若、刘仁、吴晗、许德珩、曾昭抡、舒舍予、宁武、李乐光、林汉达、凌其峻、丘得仑。】

【(京市新闻处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市分会成立大会通过“拥护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决议”，全文如下：

美帝国主义者正袭用着当年日寇侵略中国的故技，不顾中国人民屡次的严正抗议和警告，把侵略朝鲜战争的火焰扩大到中国边境，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全国人民现已广泛地热烈地掀起了志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不仅拥护同时也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我们竭诚的拥护，并誓以实际行动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狂妄侵略行为，以达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的目的。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市分会成立大会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八日】

【(京市新闻处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市分会

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及工作部门负责人名单：

一、主席副主席

主 席 张奚若

副主席 刘仁、吴晗、曾昭抡、舒舍予

二、常务委员（四十三人）（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纯、王静、王梓仲、古奇踪、丘锬仑、余心清、吴晗、李宗恩、李金泉、李乐光、林汉达、林励儒、林铿生、胡锡奎、徐悲鸿、高尚仁、凌其峻、柴泽民、陆志韦、陈文润、陈哲文、陈垣、许德珩、张致祥、张奚若、张晓梅、曾昭抡、汤用彤、舒舍予、傅华亭、杨伯箴、杨德亮、宁武、叶企孙、廖沫沙、闻家驷、刘仁、刘火、刘英源、邓拓、萧明、钱端升、薛愚

三、工作部门负责人

秘书长 李乐光

副秘书长 崔月犁、曾平、孙孚凌、沈一帆、萧松

宣传部长 廖沫沙

副部长 莫艺昌、李何林、余世光

组织部长 林汉达

副部长 彭思明、古奇踪、浦洁修】

【（京市新闻处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委员名单（共一九四人，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文、王子纲、王纯、王梓仲、王甫、王镇武、王维民、王景铭、王静、毛树多、古奇踪、丘锬仑、田纶、白锐、成安玉、宋石如、宋汝桢、宋凤祥、宋国藩、朱长江、余贻佃、余心清、吴璞、吴晗、吴德昌、沈一帆、何凤亭、吕学勤、吕莲英、门士林、李宗恩、邢赞亨、邢其毅、余世光、李凤楼、李金泉、李何林、李乐光、李汉唐、李伯钊、李锐、李岩、李作斌、李龙、李文彬、李国瑞、李长胜、李荣春、李天祥、李大用、李桦、林彤、林汉达、林砺儒、林铿生、林葆骆、周仁、周子健、周家骅、周永生、周文斌、周克敏、宛耀宾、武世泽、孟金声、俞秀嵩、姚敏智、胡楠卿、胡锡

奎、胡光、徐楚波、徐悲鸿、徐炳鑫、马玉槐、马黎元、高峰、高尚仁、高振德、孙以怒、孙孚凌、孙景鲁、凌必应、凌其峻、凌云从、凌瑞骥、侯儒林、连阔如、浦洁修、柴泽民、袁克新、翁独健、梅兰芳、陆明贤、陆志韦、陆乃震、崔映国、崔月犁、梁思成、梁以依、麻建础、常浦、郭则忱、曹志麟、曹靖华、陈文润、陈垣、陈坤惕、陈哲文、陈铭德、莫艺昌、许德珩、许宝騫、许立群、张大中、张秉忠、张奚若、张晓梅、张东荪、张宗平、张云川、张云波、汤用彤、汤绍远、舒舍予、傅华亭、宁武、杨葆俊、杨丙华、杨伯箴、杨敬时、杨嵩山、杨德亮、叶企孙、叶浅予、温国梁、费孝通、费青、贺晓初、贺翼张、裴文中、曾平、曾昭抡、黄浩、云华、彭思明、彭真、彭望钺、彭继贤、程贤策、雷洁琼、董振梅、董权三、董渭川、赵紫宸、赵云沾、华南圭、廖沫沙、闻家驷、刘一峰、刘仁、刘火、刘玉三、刘英源、刘莱夫、刘桐恩、刘珍甫、刘清扬、刘超、刘景熙、刘新、鲁文、邓拓、乐松生、诸福棠、潘龄皋、冀克、萧明、萧松、萧静、钱三强、钱端升、钱伟长、龙云、霍兆麟、韩诵裳、薛愚、戴爱莲、魏彬、罗常培、罗旺、严镜清、苏民、饶毓泰、顾德】

——《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市分会昨日正式成立 代表二百万人民的意志坚决抗美援朝 通过决议拥护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载《人民日报》1950年11月9日。

11月11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市分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

【(京市新闻处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市分会，于十一日上午举行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到会的有该会主席张奚若，副主席刘仁、吴晗、曾昭抡、舒舍予，常务委员王纯、王静、古奇踪、李宗恩、林汉达、林砺儒、胡锡奎、徐悲鸿、高尚仁、凌其峻、柴泽民、陈文润、陈哲文、陈垣、张晓梅、汤用彤、杨伯箴、杨德亮、宁武、叶企孙、廖

沫沙、闻家驷、刘火、萧明、钱端升、薛愚及各工作部门负责人等共四十一人。

会议决定：加强分会各项工作机构，统一领导北京市人民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由宣传部邀请各有关单位举行宣传会议，成立宣传委员会，统一领导和组织各方面宣传力量，在广大市民中深入宣传反对美国侵略；由组织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工厂、学校等单位举行组织会议，成立组织委员会，领导并帮助全市爱国人民进行各项志愿活动。此外，会议并决定在常委会下设立秘书处，进行日常工作。该会会址暂设本市御河桥二号。】

——《保卫和平反对侵略委员会京市分会常委会首次集会 决定加强工作机构统一领导全市人民进行各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活动》，载《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2日。

11月23日-24日

钱端升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继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闭幕之后，于波兰首都华沙召开理事会议。钱端升担任理事。

【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成立于一九四六年，它是各国法学工作者和职业的科学的法学专家们团体的国际组织，现任理事会主席是普利特（英）、副主席德拉契纳（意）、秘书长诺德曼（法）、副秘书长莫斯加（波）。

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的组织目的，在协会的会章上这样规定着：

“（一）在使各国法律工作者和职业的科学的专家们团体，便于密切联系和交换意见，并发展他们的互相了解和友谊的精神。

（二）在研究和比较各国的法律，以为法律科学的进展而工作，在研究各民主国家间普遍国际法的形成，并且赞助国际法的发展。

（三）在为实现联合国的目的而合作，并且要求法律工作者们的共同行动，以便：

1. 在法律上和在实际，恢复、保卫和发展联合国所指示的民主权利与

自由；

2. 促使国内的和国际的履行关于处罚战犯的计划，并在国内法上和在国际法上根绝法西斯的残余和其他反民主的思想；

3. 把法律工作者的力量和一切其他团体的力量联合起来，俾在每一国家内保卫民主原则，在国际关系上尊重法律，并建立坚强和永久的和平；

4. 增进全世界民族的独立，并且反对在法律上无论国内的和国际的及在实际上对于这样独立加以任何的限制。”

从一九四六年以来，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就始终不懈地为自己的组织目的而战斗着。协会提出了庄严而响亮的口号：“用法律维护和平！”，号召它的会员——各国的法学者团体，团结一切法学工作者为世界和平与人民民主服务。协会在为维护联合国宪章、雅尔达协定与波茨坦宣言的法律地位，在保护世界和平与人民民主权利的每一个斗争中，揭露并抗议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侵略集团的疯狂的战争计划、蹂躏人民的基本权利、干涉与压迫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罪行，声援这些国家的人民争取和平民主与民族独立运动，为这些国家的和平民主战士与政治难民的被迫害事件进行正义的辩护。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和它的会员曾经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抗议美国武装干涉朝鲜；曾经致函纽伦堡军事法庭，控诉美帝国主义及其各国帮凶们的罪恶的战争活动，要求纽伦堡军事法庭的法官们同意布达佩斯宣言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原则；曾经抗议西德和日本占领当局不顾全世界亿万人民的愤怒，不顾联合国宪章的尊严，为着另一个侵略战争的目的，重新武装西德，武装日本，大量释放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罪犯；曾经抗议那个蹂躏基本人权、把美国引向法西斯化的恶名昭著的蒙特、麦加伦法案；曾经抗议希腊君主法西斯政府以虚拟的罪名监禁屠杀成百成千个自一九四〇年来为希腊的独立自由与纳粹德国及美英干涉者血战的爱国志士的暴行。

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的工作，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和平战士，它的“用法律维护和平”的正义行动，是与人类命运、人的良心血肉相连的，它以国际民主法学工作者团结的力量，为世界和平与人民民主权利辩护，也就

是为人类免于另一次毁灭性的战争灾难，为创造社会物质文明的人类真正的进步力量——劳动人民的基本权利辩护。因之协会的工作受到世界亿万人民的拥护和尊敬，而和平人类的公敌，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及其各国的帮凶们也就更加仇视协会，并用种种卑鄙手段去迫害它。被美国帝国主义篡夺的联合国，污蔑协会为维护法律、维护和平的一切努力系“滥用咨询权”，而可耻地取消协会作为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的咨询机关的权利；随着，法国政府禁止协会在巴黎设立总部。联合国和法国政府无理地拒绝了协会与它的各国会员团体以及国际学生联合会等抗议关于协会的违法决议与禁令，再一次证明了：帝国主义集团及其帮凶们对协会的攻击和迫害，实际是攻击和迫害联合国宪章，攻击和迫害人类和平与民主权利。

但是，世界各民族人民维护联合国宪章，保卫和平与民主的意志与毅力是颠扑不破的，它正在世界和平堡垒——苏联的周围日益巩固地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巨大的战斗力量！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用法律维护和平”的斗争，也在世界和平大会的旗帜下继续发展着。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继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闭幕之后，于波兰首都华沙召开理事会议，参加理事会议主席团者有苏、中、英、美、法、意、波、印、伊朗和南美国家等国的代表。我国出席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代表钱端升教授代表中国新法学研究会参加了理事会议，并为主席团之一。

协会理事会华沙会议要求各国会员团体团结最广大的——一切赞成民主与和平的法学工作者，为实现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决议与协会理事会华沙会议决议而奋斗。

中国新法学研究会于一九四九年参加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员。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将近五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她在国际事务中有着异常重大的影响，因之协会秘书长诺德曼与莫斯加在华沙会议上曾多次表示要求我会与协会加强联系，加强文化交流，要求我会首先在亚洲民主法学工作者为和平与民主的事业中做更多的工作。

中国新法学研究会在传达讨论协会华沙会议的决议时，深切地认识到当前全中国人民以强大的决心与雄伟的姿态所进行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是世界人民为和平与民主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中国新法学研究会为了认真地执行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华沙会议决议，要求它的会员团结一切爱和平爱祖国的法学工作者，和全国人民在一起，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保卫中国人民的胜利，保卫世界和平！】

——沈钧儒：《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为和平斗争》，载《人民日报》1951年4月14日。

12月20日

钱端升等抵达沈阳。

【（新华社沈阳二十日电）我国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代表团一行四十四人，在郭沫若团长率领下，于二十日上午九时到达沈阳。前往车站欢迎者有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副主席高崇民、文化部长刘芝明、教育部长车向忱、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东北总工会主席张维桢、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东北委员会书记韩天石、沈阳市长朱其文及各界代表三千余人。代表团下车接受献花后，随即参加车站上盛大的欢迎会。会上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和平大会的代表中，包括肤色不同信仰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的弟兄。华沙和平大会的胜利是全世界善良人民团结一致的胜利。我们要求和平，就要反对侵略，首先要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美国侵略军滚出朝鲜去。接着该团副团长马寅初也在会上讲了话。上午十时三十分，代表团即登车离沈赴北京。】

【（又讯）和大代表团中李德全等四人应邀留齐齐哈尔，钱端升等五人应邀留哈尔滨，丁瓚、康克清二人应邀留沈阳，他们将分别向上述三地各界人民报告世界和大的成就。】

——《保卫和平反对侵略委员会昨开工作会议定今晨欢迎我和大代表团

归来 朝红十字会负责人金世光在会上报告朝鲜情况 和大代表团过沈阳时受到热烈欢迎》，载《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1日。

12月25日

钱端升等五百留美学生发表声明，痛斥奥斯汀诬蔑中国人民。

【（新华社讯）中国留美学生五百余人发表对于奥斯汀无耻演说的声明。全文如下：

美国战争贩子奥斯汀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安理会上无耻的演说中，提到有一万个中国学生，曾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并列举美国在中国办了许多学校医院等，来证明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友谊”。我们，就是奥斯汀所说曾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对奥斯汀的诬蔑，感到万分的愤慨。奥斯汀不敢回答无法抵赖的美帝对我国台湾的侵略事实，却说了一些对中国人民的所谓“友谊”，这样，奥斯汀就使美帝文化侵略的面目更彻底暴露无遗了。

必须指出，美帝在中国办学校，是破坏中国的文化教育主权的行爲，他企图以“小恩小惠”毁灭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而且其办学校和办医院所用的钱，比之美帝从中国人民手中劫夺讹诈去的大量“赔偿”真是微乎其微；而其目的，原是为了对中国进行杀人不见血的文化侵略。

必须指出，美帝的大量招收中国留学生的政策，以“赔款”的极小部分，作为中国学生留学经费，并一般地欢迎中国学生前往留学，其目的是妄想以所谓“美国生活方式”培养一批效忠于美帝的“人材”，以便更进一步地侵略和奴役中国。

必须指出，战争贩子的目的，是要把血腥的侵略，说成恩惠的礼物来对我们进行中伤，挑拨和分化，妄想从中国人民中间，把我们孤立起来。

我们要明白告诉美国的战争贩子们，你们错了，你们失败得太可耻了！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曾经在中国受过被美帝所控制的各种院校的教育，正因为我们曾经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我们对美国的认识也就特别清楚，我们

以亲身的体验，认识美帝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我们懂得望厦条约的“利益均沾”的帝国主义特权，就是美帝所谓的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我们懂得美帝企图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共同侵略和削弱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就是美帝所谓的对中国人民的“友谊”！

我们知道在英法联军，在中日战争，在俄、法、德三国干涉归还辽东半岛的时候，美帝如何帮助英、法、日本进行对中国的侵略，这样的“友谊”在历史上数不清。

我们要问，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是谁把废铁、汽油、军火供给日本的？解放战争中，是谁以六十亿美元和军火供给蒋介石匪帮来屠杀中国人民的？今天又是谁阻止我们进入联合国，是谁阻止我们解放台湾？是谁用飞机无数次轰炸我领土，屠杀我人民，炮轰我商船？是谁用海陆空军侵占朝鲜，狂妄地向我们国境鸭绿江推进？这一切恰恰不是别人，而是口口声声喊叫对中国人民有悠久“友谊”的美帝国主义！

同时必须指出，我们中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我们深信美国人民同样需要和平，而和平的破坏者就是今天我们所反对的美帝国主义。中美两国人民必须共同努力，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战争贩子，为争取美好的将来而斗争。

日暮途穷的战争贩子们必须明白，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政府，我们要以加倍的努力，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在我们的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工作。

签名（依姓氏笔划为序）

刁开智、丁声树、丁雪、丁延玠、王旭芹、王作民、王爱华、王文靖、王锡钧、王国章、王裕禄、王梓仲、王毓铨、王国祯、王湘浩、王岷源、王重民、王宗淦、王之轩、王补宣、王正中、王培祚、王琇瑛、王珏、王民泉、王俊奎、王焕如、王遵明、王国周、王成组、王志均、方善桂、方嗣耀、方迪槐、方赋予、毛礼锐、申又彬、申恩荣、田贵奎、田保生、白和

懿、白家祉、艾维超、史国衡、孔繁霖、江先群、江泽涵、牟作云、任理卿、任华、池际尚、朱启平、朱本源、朱启贤、朱铭麓、朱光亚、朱弘复、朱希亮、余瑞璜、余肇池、余谦公、李增德、李飞生、李彭龄、李肇特、李靖国、李时尚、李明德、李铿、李道揆、李欧丽阁、李景汉、李汝祺、李西山、李嘉祥、李德沛、李铭新、李耕田、李德芹、李学禧、李朝增、李朝肇、李信纯、李辑祥、李庆海、李继侗、李孝芳、李赋宁、沈治平、沈长慧、沈慧、沈其益、沈同、沈履、沈有鼎、沈增祚、吕方、吕时平、吕秀英、汪衡、汪坤仁、汪明瑀、汪瑄、汪振儒、武兆发、武迟、邢其毅、吴承明、吴承洛、吴景超、吴瑞萍、吴素萱、吴之椿、吴京、吴振英、吴英恺、吴安然、吴柱存、吴新、吴亭、吴柳生、吴寒坎、吴达元、吴良镛、宋俊祥、宋耀林、何兹全、何观清、何广扬、何基、祁开智、杜度、唐钺、唐悦良、唐嘉、唐庆永、唐敖庆、唐学乾、唐冀雪、马约翰、马启伟、马大猷、马德音、高平、高尚仁、高凤山、高步昆、高崇熙、徐献瑜、徐仁言、徐广华、徐锡良、徐华舫、侯浚吉、侯学煜、侯祥麟、夏煦、夏翔、夏震寰、夏同光、翁独健、翁品嘉、范翊华、范志超、梁思庄、梁思成、梁植权、秦学圣、凌其峻、倪钟焕、耿耀西、浦寿海、时昭涵、袁宏、涂光炽、韦固安、林久明、林鸿荪、林徽因、林达光、林戊荪、林传鼎、林耀华、林汉达、林启武、林传光、林巧稚、周庆岐、周一良、周卜颐、周家骅、周廷儒、周步光、周思敬、周作仁、周炳琳、周卡、周许淑文、周钟岐、周家炽、周珏良、周金黄、周华康、周先庚、金岳霖、金涛、金荫昌、金希武、孟广照、孟宪民、孟昭英、邵爽秋、易鼎新、邵循道、邵循恪、岳毓常、芮沐、洪深、洪达琳、段学复、段连城、段兆麟、胡先骕、胡定、胡先晋、胡志彬、俞大绂、俞秀葛、梅汝璈、姚曾荫、南国农、施嘉炆、竺可桢、姜文钊、孙越崎、孙云铸、孙世铮、孙承谔、孙令銜、孙国华、孙毓棠、孙绍先、孙绍芳、曾昭抡、曾炳钧、贺麟、温光钧、诚冠贻、恽魁宏、彭清源、彭淮源、程义法、程民德、华罗庚、劳远琇、万迪钧、万晋、汤用彤、汤佩松、汤季芳、冯锡良、冯友兰、冯景兰、冯大麟、冯新德、冯俊凯、冯家升、傅鹰、

傅举孚、褚圣麟、裘祖源、裘维藩、葛庭燧、邹致圻、邹德华、袁复礼、屠守锷、叶企孙、叶恭绍、叶子纲、雷洁琼、雷海宗、雷雨篁、董树屏、董浩、杨振声、杨慕冯、杨绛、杨式德、杨美真、杨达浚、杨绳武、杨友鸾、杨葆昌、杨德馨、杨文骐、冈嗣鹤、项宗沛、崔书香、陆志韦、陆懋德、陆崇玮、曹鼎汉、曹继贤、郭太炎、郭开兰、郭圣铭、郭懋安、郭毓彬、陈光旭、陈友松、阿慧、陈新民、陈天智、陈裕生、陈光谦、陈大受、陈泗柱、陈振汉、陈德明、陈鸿舜、陈意、陈芳芝、陈景磐、陈致忠、陈中熙、陈关铎、陈世忠、陈乃隆、陈岱荪、陈达、陈桢、陈梁生、陈占祥、陈祚修、陈国梁、陈同度、陈克元、张奚若、张子高、张炳禧、张龙翔、张伟韬、张守仪、张道真、张增年、张淑仪、张天民、张陶玲、张宗炳、张宗燧、张志让、张定命、张赓虞、张汝辑、张建侯、张怀、张景钺、张乃初、张璠、张作干、张重一、张德润、张锦、张永懋、张昌颖、张光炎、张光斗、张云鹤、张中元、张祥年、张之一、张锡钧、张学德、张任、张孝骞、陶葆楷、陶佩霞、许勇三、许英魁、庄前鼎、娄是俊、常回、毕季龙、黄国璋、黄启汉、黄叔善、黄鸿辉、黄瑞弼、黄志秋、黄乙武、黄新奇、黄培哲、黄仁勋、黄瑞纶、黄大器、黄青云、黄子卿、廖泰初、应廉耕、黎希干、寿振黄、管梅谔、管玉珊、熊大仕、郑作新、郑林庄、郑汝湛、郑家铤、郑桐荪、郑吉士、郑永福、刘承钊、刘静和、刘焕东、刘书元、刘修业、刘玉素、刘思职、刘心显、刘儒珍、刘仙洲、刘祖慰、刘炽光、诸长福、诸福棠、赵寿瑞、赵承信、赵紫宸、赵乃搏、赵广增、赵萝蕤、赵占元、赵人隽、赵以炳、赵访熊、赵曾久、赵增辉、赵鸿举、赵锡禹、赵振声、赵诏熊、潘光旦、潘锡麟、潘钟祥、蔡镛生、蔡如升、蔡衡芳、钱端升、钱伟长、钱崇澍、冀朝鼎、霍秉权、欧阳采薇、欧阳湘、卢乐山、卢广绵、骆涵素、骆美轮、蒋荫恩、蒋明谦、齐思和、翦伯赞、邓以蛰、邓巽保、邓家栋、钟香驹、钟士模、储钟瑞、储一石、邝平章、薛培元、薛贻源、薛鸿志、关瑞梧、关夏亭、环惜吾、谢书文、谢琏造、谢荣、谢义炳、戴世光、戴芳澜、戴汉笠、戴志昂、罗常培、罗士苇、罗念生、罗福祯、罗宗贤、罗

隆基、罗静宜、罗真瑞、罗志如、罗时钧、聂毓禅、聂崇政、谭锡畴、阚冠卿、苏汝江、萧嘉魁、萧健、萧逸鸿、饶毓泰、饶毓苏、严镜清、严仁赓、严仁荫、严楚江、严景耀、韩寿萱、顾平勃、Iealul J. Groom、Bettha Hiutou、David Cvooh.】

——《我国五百余留美学生发表声明痛斥奥斯汀诬蔑中国人民》，载《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5日。

12月29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第二届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京市新闻处讯）北京市第二届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昨（二十九）日下午二时开幕，出席代表三百零八人。执行主席为：刘仁、钱端升、余心清、傅华亭、陈垣。

会议听取了聂荣臻市长“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吴晗副市长“关于失业救济和普遍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两项工作的报告”（全文见今日本报第三版），公安局罗瑞卿兼局长“关于一年来镇压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报告”（全文见今日本报第三版）。最后，由吴晗副市长代表协商委员会在会上作了关于“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产生办法草案”的说明，他说：这个办法草案是依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之“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制定的，由于一年多来本市新成立了一些人民团体，原有的人民团体也比以前更为健全。因此，新的代表产生办法草案的主要精神是使大部分代表的产生方式，由选派进到通过选举大会或选举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把人民民主从形式上与内容上再提高一步。

大会今日的议程：上午为小组讨论，下午大会讨论聂市长的时事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产生办法。】

——京市新闻处：《京二届四次各界代表会议开幕 昨听取聂市长吴副市长罗兼局长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0年12月30日。

吴晗副市长在京市第二届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及钱端

升曾做过的报告。

【各位代表：

这次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主要是讨论时局问题和下届代表会议代表产生办法。因此，我不打算报告三个多月中间，市人民政府所做的一般工作，只是把上次会议特别作出决议，交给市人民政府办的两项重要工作——即失业救济和普遍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进行情况，简要报告一下。（另外还有公安局罗局长关于一年来镇压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报告）

首先，报告失业救济工作：

.....

其次，报告普遍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

自上次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根据市协商委员会钱端升副主席的报告，通过了普遍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后，城内各区即先后召开。到八月底，各区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都已开完。事实证明：普遍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后，进一步发扬了人民民主，更加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使政府和人民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使人民的意见可以更及时地反映上来，而且也使政府的政策经过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更深入地贯彻到群众中去。同时，经过了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及其干部在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下，也改善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

这些收获，主要表现在人民政府对决议案的执行上。全市九个区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收到提案两万一千四百一十件，其中除了批评干部作风的一千一百三十二件外，绝大部分都是有关公共福利的提案。这些提案经会议通过后，各区人民政府（即区公所）都抱着严肃认真负责的精神，努力执行。需要市人民政府做的，则转请市人民政府执行。截至现在，全部提案中凡是政府能办的，绝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有些甚至超过了原提案的要求；一部分正在继续办理；少数不能办的，也都向代表和原提案人做了解释和说明。例如第三区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案中，经决议要政府办理的二百零六件，已经办理了二百零四件。经决议转给各有关部门参考的，有二百七

十四件，现在也办理了一百四十六件。执行有关公共福利的各种提案的结果，就修整道路来说：第七区五个多月来一共修整了土路七十八条，占全区全部道路的百分之二十七。第三区原计划修整九十六条，结果修整了一百二十一条。就修缮房屋来说：仅第一、七两区即修缮了五千六百二十二间，占该两区应修缮房屋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五。在解决失学儿童入学方面：仅第四区今年秋季即增设正式小学二处，五十个班，学生一千五百五十人。在其他市政建设方面：全市在偏僻地区添装路灯二千盏，修建秽水池四百零一座，修建公共厕所一百零八所。并在没有自来水的地区安装了自来水管，修筑了自来水站，仅第七、九两区就安装了自来水管七千二百多公尺，修筑自来水站五十二处，改造私人水井三十三处。所有这些在短时期内便实现了的有关公共福利的市政建设，满足了广大市民的最迫切的要求，因而也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他们纷纷反映：“政府真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决议”，“我们的话有效了，我们的要求实现了”，“我们真正当了家，做了主人”，“真是‘人民’‘民主’政府”。

获得以上的工作成绩，是和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及广大人民的积极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也是和做好群众组织工作分不开的。例如在整修道路方面，各区都组织了以区街代表为主的修路委员会，去动员和组织各街道的市民亲自动手修整道路。仅第七区即前后发动了四五千人，修整了约六千公尺的土路。在修缮房屋方面，各区都是通过房屋修缮委员会，召集房东、房客双方共同协商解决，收获很大。例如第六区房屋修缮委员会共受理了一千七百余件房屋纠纷，经过调解，双方协商解决的就有一千六百余件。如果不依靠群众来解决。单单依靠政府去进行调解，那就不会得到这样迅速的处理。在增设小学、成人夜校方面，区街代表纷纷热心协助政府找校舍、借桌椅。例如第四区的孝友小学，第五区的南河沿小学，都是在区街代表的努力帮助下，解决了校舍问题而成立起来的；在增设渗水井方面，区街代表也曾发动群众作了不少事情，例如第二区群众自己动手，添挖了简易渗水坑七百三十个，解决了三千五百多户无处倾倒污水的困难。其他如注射预防针

等工作，也同样是依靠代表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所完成的。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巩固革命秩序的工作上，也经常地得到了人民的协助。这就证明：由各阶层人民推选出来的代表是能够代表各阶层人民的意见的；在区协商委员会之下，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如房屋修缮委员会、卫生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社会救济委员会等，通过这些委员会，吸收大批积极分子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各项市政建设和公共福利工作，也是正确的，成功的。但有个别的区对于区协商委员会重视不够，没有把政府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提到协商委员会来讨论研究，没有很好依靠协商委员会及其所属各种专门委员会去进行工作，这是今后应当注意纠正的。也有个别的区把代表当做一个行政干部来使用，过多地向他们布置工作，因而使得有些代表感到当代表是一个负担，这也是亟待纠正的。其次，有些代表和积极分子身兼数职，工作忙不过来，也影响和限制了更多的代表和积极分子来参加工作。因此，代表和积极分子以参加一个专门委员会为最好。

在各区的代表会议上，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作风所进行的检查和批评，对于纠正干部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是有很大作用的。各区第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批评干部作风的提案已经分别处理；有的干部已在代表大会上向代表承认了错误；有的干部在事后，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向群众公开进行了自我批评。其中，错误比较严重的，都已分别受到了处分；少数站在人民头上，欺压群众，贪污腐化的分子已分别撤职惩办；事出误会的，事后经过调查，也向群众做了解释和说明，通过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于干部的教育和提高是有效的，一般干部都加强了对人民、对工作严肃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比过去更加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使工作大大提高了一步，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更加改善了。因此，最近在各区召开的第二次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代表们纷纷反映干部的作风变好了。上次会议时各区关于批评干部作风的提案共有一千一百三十二件，而这次关于干部作风的提案仅有二百十三件，并且其中有表扬干部的提案八十五件。代表们对干部冒雨抢救倒塌的房屋，努力帮助失业员工就业

等模范事迹都进行了表扬。但也有少数干部因受到了批评，而在工作中表现出不敢负责，放松工作的现象。这是一种错误。经过检讨与教育后，已逐步改正。

最近，各区都曾召开第二次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除了解决适应各区自身情况和要求的具体问题外，一般，是把下面三个问题作为中心议题：（1）搜集与讨论市民对于公共福利方面的意见，以便帮助市人民政府拟定明年的市政建设计划；（2）继续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检讨与改善区人民政府的工作和干部作风；（3）讨论加强镇压反革命的工作，进一步巩固首都革命秩序。现已陆续开完，比较上次会议有更好的表现更多的收获。

各位代表！这就是我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失业救济和普遍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两项工作的报告，请大会审查与批评。】

——吴晗：《失业救济和普遍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两项工作》，载《人民日报》1950年12月30日。

1951年（51岁）

1月25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京市新闻处讯）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二十五日上午十时举行第十一次会议，由彭真主席主持，讨论关于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办法与名额分配的问题。会议通过刘仁副主席关于这一问题的说明；决定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名额为四百九十八人，除政府代表和邀请代表外，国营工矿企业和专科以上学校的代表直接由选举大会产生，人民团体的代表则以召集一次全市性的选举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此外，由于此次选举是采取混合选举办法，会议决定：一人只能在一个单位作为候选人。

会议决定成立全市的选举委员会，统一领导各单位的代表选举工作。委

员会由下列二十三人组成：吴晗（主任）、钱端升（副主任）、薛子正（副主任）、李乐光、廖沫沙、宁武、凌其峻、林健生、林汉达、薛愚、崔月犁、张致祥、张鸿舜、柴泽民、杨蕴玉、张大中、古奇踪、傅华亭、李伯钊、余贻侗、徐楚波、董汝勤、马玉槐。】

——《京市协商委员会集会 决定三届代表会议代表选举办法 成立领导各单位选举工作的机构》，载《人民日报》1951年1月27日。

钱端升等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召开座谈会，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二十五日晚召开“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阴谋座谈会”，出席者有张奚若、张闻天、周鲠生、邵力子、罗隆基、廖承志、章汉夫、范长江、钱端升、张炯伯、乔冠华、梅龚彬、连贯、樊弘、梅汝璈、刘泽荣、冀朝鼎、曾炳钧、刘王立明、柯柏年、宦乡、杨刚、董越千、陈家康、陈体强、叶景莘、吴茂荪、周鲸文、孟宪章等一百二十余人。

会议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主持。他在致词中说：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中遭到惨败以后，正在加紧策动单独对日媾和，企图像在西欧武装西德那样，在远东进一步武装日本。最近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的奉命赴日，就是美国这一阴谋的具体表现。张奚若指出，美国这一阴谋，是对远东与世界和平的直接威胁。因此，中国人民应联合世界各国人民，展开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与武装日本的运动，粉碎美国的阴谋。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对日和约小组负责人、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继起发言。他指出，美国早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就曾策动对日单独媾和。去年九月十四日，杜鲁门政府又指令美国国务院进行对日单独媾和的活动。杜鲁门政府妄以为在它野蛮地镇压日本进步势力之后，便可以压迫其仆从国家，追随美国之后，与日本缔结单独的对日和约，并准备在单独媾和遭到强烈反对时，即片面地宣布与日本结束战争状态。梅汝璈强调说，美国单独对日媾和与武装日本的阴谋活动，是完全违背国际协议的，是非法的。美国这一威胁中国安全和远东和平的非法行动，必将引起世界人民，特别是曾遭日

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日本问题专家庄涛从日本经济方面，说明日本正被美国拖上战争体制的道路。庄涛指出，日本去年的钢材年产量，估计已达三百万吨，超过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的钢材产量的总和，接近了日本战时（一九三八年）钢材的年产量。日本的炼油工业，亦复如此。日本经济的战争体制化，结果首先遭受危害的是日本人民。由于美国占领者在发动侵朝战争抢购军事物资的结果，日本的通货膨胀又已开始，物价从去年六月到九月，上涨了百分之十五，而工人工资则正相对激剧下降。此外，由于去年年底美国禁止日本向中国输出的结果，使日本产业界损失一百五十亿日元（约合四千七百万美元）。这种情况，造成了日本许多中小资本家的严重困难与破产。美国武装日本的结果，将使日本和平经济陷于窒息状态，并使日本走上毁灭的道路。日本广大人民必将起而坚决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与武装日本的阴谋。

日本问题专家郑森禹发言指出，美国对日单独媾和的中心目的，在于进一步武装日本。实际上，美国已在利用日本人力、物力进行侵略战争。这种情况是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也是日本人民所反对的。在美国侵朝战争失败后，日本人民已经更加明了，日本追随美国进行侵略，只有在亚洲人民强大的反侵略力量面前遭受毁灭的命运，因此日本人民反对重新武装的运动已经更加广泛地发展了起来。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乔冠华指出：我们应扩大中朝人民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彻底击败美帝国主义在东方武装日本的阴谋。我们应与欧洲人民热烈展开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西德的广泛运动配合起来，加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使帝国主义挑拨新战争的阴谋根本不能实现。

国际法专家周鲠生指出：美帝国主义现在突然加强进行单独对日媾和及武装日本的阴谋，是他感觉到在日本维持现状已很困难，而在朝鲜战场上遭到惨败后，美帝国主义认为今后如果进行侵略亚洲的战争，必须利用日本人民作炮灰。但是千千万万曾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国家的人民，必将

起而坚决反对美国这一阴谋。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邵力子指出：对日和约的缔结应该导致和平，但是美国对日单独缔和的目的，却是导向战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应共同起来反对美国对日单独媾和和重新武装日本的阴谋。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罗隆基认为在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反对武装日本的运动中，应继续深入并加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他主张全国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界人民一致参加到这一运动中来，并与日本人民联合起来，争取这一运动的成功。

在会上发言的尚有张闻天、樊弘、曾炳钧等人，他们一致痛斥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阴谋，并表示希望远东各国人民联合起来，粉碎美国的阴谋。

会议最后由张奚若作总结。他指出：中国人民应当展开一个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与武装日本的运动，并要求迅速缔结全面的对日和约，结束美国在日本的独裁统治。他在结束讲话时说：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完全有力量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美国侵略者终必遭到可耻的失败。】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召开座谈会 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载《人民日报》1951年1月27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中等教会学校干部会议。

【（本报讯）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于二十五日召开京市中等教会学校干部会议。并邀请各校校长参加。会议讨论了如何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教会学校中文化侵略的影响。

主席钱端升说明开会意义后，温寒江代表市工会讲话，号召工会会员在寒假中，结合目前胜利形势和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方针的决定，进一步深入的进行反对美帝侵略的爱国主义学习。各校可通过听报告、漫谈先进行酝酿，再结合各校具体条件和需要，适当用控诉会、诉苦会等方式，进一步启发思想，然后根据教职员的自觉和自愿，领导其作一次思想回忆、思想检讨，以达到进一步铲除帝国主义、首先

是美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所遗留下来的政治影响。这一号召获得各校行政和工会一致赞同。】

——《京市中等教会学校校长工会干部集会 讨论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 京中小学教员准备在寒假加强时事政治学习》，载《人民日报》1951年1月30日。

2月4日

钱端升等各界表态拥护周恩来外长关于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政府的操纵之下通过诬蔑中国的提案声明。

【（本报讯）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政府的操纵之下，非法通过美国诬蔑我国的提案，引起各界人民的无比愤怒，并一致拥护周外长关于这一诽谤案的严正声明。民主建国会发言人对美帝诬蔑我国的提案发表声明称：我们民主建国会全体会员坚决拥护周外长这一义正辞严的声明。我全国工商界由此更可认识到美帝是中国人民不可饶恕的死敌！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拥护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彻底执行爱国公约，增加生产，稳定物价，扩大慰劳救济工作。我们还要特别提高对美帝侵略阴谋的警惕，根本消除对美帝妥协和平的思想；要下最大的决心把美帝彻底击溃而后已！九三学社为此发表书面文告称：我们对于周外长的声明竭诚拥护。我们对美帝国主义强盗这种扩大侵略战争、破坏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阴谋绝对不能容忍。我们要号召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计划。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拥护周恩来外长的庄严声明，坚决抗议美帝国主义颠倒黑白诽谤我国提案。声明称：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起，更加坚决地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行动起来，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北京市总工会负责人发表谈话，代表北京市全体工人坚决拥护周外长的声明，并号召全市工人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北京邮区工会于三日下午为此举行了临时委员会议，通过决议，代表全区四千余邮工坚决拥护周外长的声明，痛斥美帝的无理措施，并号召各基层工会，组织职工座谈会，

讨论周外长的声明。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教授认为美帝自发动侵朝战争以来，早已不顾及联合国宪章上的任何条文的约束，并表示热烈拥护周外长的声明。该校学生会主席程贤策说：北京大学的同学完全拥护周外长的声明，我们完全有力量粉碎美帝扩大侵略的阴谋。清华大学机二、机三、地质、社会等系同学均对周外长的声明进行了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代表全体同学发表了抗议书。辅仁大学三日正选举出席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见到本报刊登的周外长的声明后，当场即宣读起来。全场师生对这一诬蔑我国提案极为愤慨，对周外长的声明一致拥护。陈垣校长当场宣称：“美帝操纵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诬蔑我们的议案，我们是坚决反对的！”该校全体师生员工并发表拥护周外长声明宣言。北方交通大学北京铁道学院同学对于周外长的严正声明进行了学习，有些班级并举行了座谈。该校全体同学通过痛斥美帝国主义蓄意扩大侵略战争的宣言。河北高中师生认为：无论美帝玩弄什么花样，也绝对阻止不了我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正义行动和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决心。】

——《各界人民拥护周外长声明 坚决反对美帝诬蔑我国的提案》，载《人民日报》1951年2月4日。

2月12日

钱端升等代表人民政府接收燕京大学。

【（新华社十二日讯）接受美国津贴三十二年的燕京大学，已于十二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接收。该校全体师生热烈地集会庆祝。

在全校庆祝大会上，校长陆志韦首先宣布：“从今以后，不论在名义上、实际上、经费来源上、教学的观点方法上，燕京大学都完全是并且永久是中国人民的大学了。”陆志韦在讲话中并宣读了他在十日接到纽约“美国在华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的第二封电报。这封电报说明美帝国主义到今天仍以欺骗和利诱的手段，妄想达到它继续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侵略的目的。他表示对这个电报置之不理，并当场把电报交给了马部长。全场立即响起了热

烈的掌声。

接着由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讲话，他指出：美帝国主义这只纸老虎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已经被戳穿了，但，它在中国文化侵略的遗毒，还须要彻底地加以肃清。他希望燕京大学师生员工努力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最后，他宣布政务院任命陆志韦为燕京大学校长。并宣布教育部派刘皑风、周钟岐、高尔柏、力易周、沈一帆等五人组织接收小组，以刘皑风为小组长，协同陆校长办理接收事宜。

继由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曾昭抡讲话。钱副部长首先指出，燕京大学回到了伟大的人民祖国的怀抱，是一件莫大的喜事。他说：鉴于燕京大学曾长期受美帝国主义分子司徒雷登把持，全体师生员工今后不但要在经济上和美帝国主义断绝联系，而且要从思想上肃清美帝国主义的一切思想毒素。他希望全体师生员工不分宗教信仰，在伟大的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办好人民的燕京大学。曾副部长在讲话时勉励大家加强校内和校外的团结，同心协力，使燕京大学逐步改造为一个新型的大学。

到会来宾，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代表钱端升、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师范大学校长林砺儒、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都先后讲话，一致祝贺燕京大学的新生。燕大工会代表蒋荫恩、学生会代表夏自强在讲话时一致表示拥护人民政府的接收，并表示决心加强工作和学习，为肃清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遗毒而奋斗。

为了庆祝燕京大学新生，该校于当日下午及晚间举行各种体育表演、游艺和火炬游行。】

——《中央教育部接收燕京大学 该校师生集会庆祝决心肃清美帝文化侵略遗毒》，载《人民日报》1951年2月13日。

2月13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教会中学反美爱国大会。

【（本报讯）北京市十九个教会中学一千一百个教职员工友学生，于十

三日下午在辅仁大学礼堂举行反美爱国大会，总结寒假爱国主义学习的成绩，并通过了六项爱国公约。

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主席钱端升、京市文教局翁独健局长的讲话，都谈到京市教会中学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工作的情况，并号召随时随地警惕美帝文化侵略思想毒素，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办好自己的学校，彻底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

京市教会中学爱国公约

一、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加强团结，克服困难，保护校产，办好学校，彻底肃清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的影响。

二、继续加强爱国主义的政治学习，分清敌友，肃清亲美、崇美和恐美的思想。

三、努力学习业务，改进教学，贯彻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

四、执行政府的文教政策，进一步改革学校教育，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和经济力量而服务。

五、做好时事政策的宣传工作，坚持并扩大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运动，积极支援中朝人民部队。

六、反对美国武装日本。】

——《京十九个教会中学举行反美爱国大会》，载《人民日报》1951年2月17日。

2月18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招待中国教育工会第一届第二次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全体代表座谈会。

【民进招待全国教育工会代表

中国民主促进会于十八日招待各地来京参加中国教育工会第一届第二次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全体代表，并举行座谈。该会马叙伦主席、许广平秘书长

与各地代表刘子久、钱端升、刘泽如、高永龙、刘绪贻、吴容、熊大仁、李广铨、萧项平、董秋斯、雷洁琼、李燮华、吴研因、葛志成等相继发言，一致认为在美帝积极武装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紧急关头，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贯彻爱国主义教育，是一切爱国人民，特别是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并保证彼此紧密团结，为加强抗美援朝运动，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贯彻爱国主义教育，从事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共同奋斗。】

——《文化生活动态》，载《人民日报》1951年2月23日。

2月28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第三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担任会议执行主席。

【（京市新闻处讯）北京市第三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二十八日继续举行大会后，于下午八时圆满闭幕。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副主席曾亲临大会，并作重要指示，受到与会者热烈的欢迎。

出席昨日会议的代表共四百七十四名。执行主席上午为：余心清、林汉达、凌其峻、彭泽民、曾昭抡、杨造新、刘仁、萧明、聂荣臻；下午为：马玉槐、柴泽民、张友渔、张大中、宁武、钱端升、刘一峰、薛愚（依姓氏笔划为序）。

上午大会，选举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首由执行主席余心清说明：各民主党派和各单位代表在小组讨论时曾分别协商、提出候选人。主席团向大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共二十九人，其中除蒋光鼐是由主席团向大会推荐外，其他二十八个候选人都是经由十个以上单位提出来的。全体代表一致拥护主席团的意见，会议在举手通过主席团所提候选人名单后，随即进行投票选举。下午，主席团宣布选举结果：彭真当选为市长，张友渔、吴晗当选为副市长；聂荣臻等二十六人当选为市政府委员（全部名单另发）。会场立即掀起了热烈兴奋的掌声。】

——京市新闻处：《京三届一次各界代表会议闭幕 彭真当选北京市市

长 刘少奇副主席曾到会作重要指示》，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1日。
钱端升参加选举委员会。

【自北京市第二届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产生办法》后，由第二届市协商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推定吴晗、钱端升、薛子正等二十三人，组织选举委员会，负责进行本届会议的代表选举工作。选举委员会于一月二十六日成立，并由全体委员分工组成党派、机关部队、人民团体、工商界、工会及国营工矿企业、专科以上学校、区域等七个选举小组，负责推动与指导有关单位的代表选举工作。自一月二十七日开始，各选举单位大部分按系统先后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展开选举工作，截至二月十六日，除政府代表及邀请代表外，经由选民直接选举和由代表会选举产生的代表四百三十一名，已全部选出。

本届代表总数为五百十九名。其中，由选民直接选举和代表会选举产生的四百三十一名代表，约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三；直接选举产生的国营工矿企业职工代表及专科以上学校代表共一百十五名，约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这比第一、二两届代表会议代表的产生办法在民主形式和内容的充实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次参加直接选举的，是国营工矿企业和专科以上学校，这次经验证明他们现在即可实行直接选举。但有些较分散的小工厂和作坊的工人及其他各阶层人民，目前还很难由全体选民来直接选举。例如：有一部分工人代表、全部农民代表和工商界代表此次均系由选举代表大会所选出；此外，区域代表则系由区人民代表会议所选出。这次选举之后，有些当选的代表，就接到了选民的提案，有的选民要求代表开会回去要好好传达。这样就加强了群众对代表的监督，并使代表能更广泛地更直接地联系群众，将群众的意见更迅速地集中起来，将代表会议的决议，更好地贯彻到各界人民中间去。

这次选举工作证明：经过民主协商提出候选人是很好的方式。它能够充分集中群众的意见，使提出的候选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关键是协商必须充分和民主，因为协商实际上就是选举的酝酿准备过程，一定要“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反复地多方地协商，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精神，使大家的意见达到真正的一致；反之，如果协商候选人时，没有在群众中进行酝酿，就会引起群众对选举工作的不满：“不知道候选人是从哪里来的？”例如北京大学最初提出的候选人，没有经过广泛讨论，所以大家对选举表示冷淡。以后，从新自下而上地分组讨论候选人，然后将意见集中起来，再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就获得了大家一致的重视与拥护。又如市政府秘书厅等部分机关在初选时，未提出候选人名单，结果使票数太分散，以致有的当选人，得票不及五分之一，因此不得不重选。这都是值得汲取的教训。这次选举中的协商工作，作得较好的，有区域、文教和教育工会及部分国营工矿企业和专科以上学校等单位。这些单位因为事前酝酿协商得较好，整个选举工作也都做得较好。

选举委员会由于缺乏经验，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缺点：

第一，开始时，强调了限期完成，而期限又只一个星期，且时当春节与寒假前后，没有照顾到各选举单位工作繁忙的情况和群众的生活习惯，又加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对选举工作不够重视，既未进行必要的宣传教育，又没有经过很好的酝酿协商，只图按期完成选举，因此，一部分代表选得比较草率。如清河制呢厂，只开了十多分钟的会议，就进行选举。有若干单位或因学生正在考试，或因春节关系，都使选举工作受了影响。选举委员会发觉这些情况之后，当即按实际情况，延长了选举时间，使各单位能及时进行宣传教育和民主协商的工作。如工会及国营工矿企业在代表选出后，又进行了一周的民主建政的宣传，并召开座谈会，由当选代表直接向选民征集意见。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等，选举前就进行了较充分的宣传和协商，北大等单位，为慎重起见，且重行布置了选举工作，因而也做得较好。

第二，没有做有计划的有系统的宣传，除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社论之外，没有印发宣传材料，在报纸上的宣传做得很不够，因此，各单位负责选举工作的人员，一般感到缺乏宣传内容。这样，就不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宣

传。事实证明：凡在群众中进行过普遍而深入宣传教育的单位，选举工作就做得好，如人民印刷厂在讨论选举工作时，结合了历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市人民政府的工作成绩，举出许多群众亲身受益的事实，如在该厂所在地白纸坊一带修路、安电灯、建厕所等实例，经过宣传后，有的工人就说：“这可是大事，选举可得慎重点儿。”清华大学在选举前，由选举委员会吴晗主任向全校作了有关政府两年来的工作报告，使选民知道政府的具体工作成绩、代表会议的作用和代表的具体任务，加强了群众对政府的热爱与对代表会议的认识，选民对选举就非常重视。没有进行普遍而深入宣传的单位，选举也就办得不好，参加选举的人数也较少。其次，选举的时间必须注意不要和业务时间冲突，这次石景山钢铁厂选举时，因为和生产时间相冲突，到会参加选举者只占全厂职工总数百分之五十七。

第三，组织机构不健全，有好些单位未及时成立选举委员会，更没有建立宣传机构，组织必要的报道。市选举委员会对各单位的选举工作也缺乏检查和帮助，没有及时地具体指导，致使各单位感觉到上级选举委员会交代不清楚，处理问题时无所依据，增加了选举工作的困难。

总的说来，这次选举工作的意义很大，扩大了选举的民主范围，为北京市人民民主生活的继续前进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同时，在工作的过程中，也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经验证明：今后进行选举工作，必须深入地宣传动员，经过充分的酝酿协商，还应有充分的准备时间，急于求成，反会使工作受到损失。

在这次选举工作中，证明北京市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普遍地提高了，是能够有效地行使民主权利的；同时，也证明了这种多样的混合的选举方式，在目前是较妥善的选举办法，是能够密切联系群众，使广大人民享受民主权利的有效办法。】

——《北京市吴晗副市长关于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工作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1日。

钱端升担任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主席：彭真

副主席：（四人）

刘仁 钱端升 梁思成 宁武

委员：（六十三人，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之相 王宝初 毛鹤龄 古奇踪 田常青 申葆和 朱长江 吴晗

余心清 余贻偶 李伯钊 李乐光 宋凤祥 林汉达 林铿生 林砺儒

侯俊岩 马玉槐 徐悲鸿 凌其峻 浦洁修 陈垣 陈铭德 张友渔

张奚若 张致祥 张鸿舜 曹言行 曹宪波 梁思成 许德珩 彭真

彭泽民 汤用彤 程宏毅 冯佩之 冯基平 曾昭抡 陆志韦 傅华亭

杨伯箴 杨造新 杨振北 杨蕴玉 董汝勤 费孝通 宁武 闻家驷

邓拓 赵复三 赵紫宸 叶企孙 刘仁 刘一峰 刘桐恩 黎锦熙

钱端升 薛愚 薛子正 聂荣臻 罗旺 罗瑞卿 苏民

秘书长：薛子正

副秘书长：（六人）

廖沫沙 崔月犁 张文松 曹志麟 李健生 孙孚凌】

——《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名单》，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1日。

3月4日

钱端升等联名发表宣言，誓为缔结和平条约而奋斗。

【全文如下：

我们坚决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宣言和决议。我们誓为缔结和平公约做坚强的奋斗。我们认为，五大国举行会议并缔结和平公约是巩固世界和平与保障国际安全的迫切必要的步骤；五大国的任何一国政府都没有丝毫理由拒绝签订这一和平公约，无论任何政府拒绝签订这一公约，就完全证明它是不和平，坚持侵略战争，因而也就是我们全人类的公敌。我们坚决反对美帝武装日本和西德发动新战争的阴谋。我们充满信心，相信世界人民的力量是

伟大的，一定能够制止侵略战争，争取保卫世界持久的和平！

许德珩……钱端升……】

——《北大教职员联名发表声明，誓为缔结和平公约做坚强的奋斗》，载《光明日报》1951年3月4日。

3月25日

钱端升等北大南开教授发表谈话，拥护镇压反革命活动。

【（本报讯）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政治系主任王铁崖、教授许德珩、娄邦彦、吴恩裕等顷发表意见，拥护政府惩治反革命的措施。

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教授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反革命活动，必须惩治反革命分子，对于‘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必须严厉惩办；这早已在共同纲领中有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只要能正确地执行共同纲领，我们决不会过于严，或过于宽，更不会‘宽大无边’。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即使在平时，也是极严重的错误，当美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进行侵略战争的时期，尤其需要立即加以彻底的纠正。我们全中国人民一定要热诚拥护新近公布实施的‘惩治反革命条例’，而拥护的具体表现，便是提高我们每一个人的政治警觉性，积极帮助政府揭露潜伏着的反革命分子。”】

——北大通讯组：《北大南开教授发表谈话，拥护镇压反革命活动》，载《光明日报》1951年3月25日。

3月28日

钱端升参加高等学校课改小组委员会集会，担任政治学组组长。

【（本报讯）中央教育部为了研讨修改文、法学院的课程草案和指定编撰教材的计划，使课改工作向前推进一步，于本月二十八日下午在该部召集中国语文学、外国语文学、哲学、历史、政治、法律、社会等七个系的课改

小组的委员举行会议，到五十余人。曾昭抡副部长、高教司张宗麟副司长和高尔柏处长都在会中讲了话，说明这次修改课程草案和制定编撰教材的计划的意义和精神。

高等学校的文、法学院的课程草案，自公布实施以来，发现了仍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同时，教育部据各方面的反映，大家都感觉到教材缺乏，妨碍了课程的进行，急迫地希望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又各校的一定的设备，亦为实行课改的必要条件，需要教育部拟定一个标准，以为各校设法添置的最低目标。因此，教育部特召集这次会，希望各课改委员根据解放以来课改的经验，参考苏联的资料，把现有的课程草案加以修改。这一项工作预定在暑期以前完成，俾使下半年既可以开始实施。其次，他们准备制订一个编撰教材的计划，然后再聘请专家共同进行工作，以编撰一些主要课程的教材，有一些课程暂时还无法编撰教科书的，则编定教学大纲和参考资料。张宗麟副司长等在讲话中，曾特别强调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希望大家把爱国主义精神贯注到各种课程中去。

会上，盛澄华、杨晦、王铁崖、张东荪、陈垣、王斐然、罗常培等多人亦发表了有关工作进行的意见。

从四月起，各小组即将分别陆续进行会议，以研讨这一重要的课题。以后，并将广泛征求各方有关课程、教材的意见。

又：文法学院经济系的课程草案的修改工作已开始进行，教育系的则将归并于讨论师范大学课程里面去讨论。

……

政治系 组长：钱端升（北大），副组长：王铁崖（北大），委员：许德珩（北大），张奚若（清华），何干之（人大），何戊双（人大），杨秀峰（河北省人民政府），楼邦彦（北大），张友渔（北京市副市长），邓初民（山西大学），曾炳均（清华），乔冠华（外交部），陶希晋（政法委员会）。】

——《高等学校课改小组委员会集会》，载《光明日报》1951年3月

30日。

4月7日

钱端升参加英中友好协会年会，被英国政府拒绝入境。

【(本报讯)据新华社布拉格七日电：被邀出席于四月七日至八日在伦敦举行的英中友好协会年会的中国人民访英代表团，竟被英国政府无理拒绝入境。该团七日在布拉格招待记者，发表声明，对英国政府这种蓄意破坏英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的卑劣行动，提出强烈的抗议。同时，并致电英中友好协会秘书长杰克·德里邦先生。该团声明原文如次：

英国英中友好协会订于四月七、八两日在伦敦举行周年大会，并曾电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团体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团体应英中友好协会之请，派遣了由李一氓、钱端升、王铁崖、曹日昌及杨承芳等五人所组成的中国人民访英代表团赴英参加。代表团于三月十九日即向英国政府交涉入境签证，经过多次催询，英国政府始于四月四日正式答复，用拒绝访英代表团一部分代表入境的形式，拒绝了整个访英代表团的入境。这样，英国政府又一次沿用了去年十一月他们拒绝在英国设菲尔德召开的第二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代表们进入英国的故技，企图卑鄙地阻挠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交往。这只是说明了英国政府对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极其恐惧，因而不得不采用这种极其无理的手段来予以破坏。中国人民对于这种无耻无理地拒绝中国人民访英代表团进入英国的措施，感到十分愤懑。中国人民深信，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断非这种卑劣手段所能阻挠和破坏，中英两国人民将更加团结起来，为保卫世界持久和平而奋斗。

致英中友好协会秘书长德里邦电如次：

伦敦英中友好协会秘书长德里邦先生：

我们十分遗憾地通知你，关于我们来英参加你们的周年大会问题，经过十七天的拖延之后，英国政府在四月四日才正式通知我们，给我们一部分人入境签证，而拒绝给另一部分人签证。这就使得我们不能来参加你们的这次

大会。

英国政府这种极端横暴而无理的手段，显然是有意阻挠我们前来和英国人民见面，有意破坏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因为英国政府是十分恐惧我们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与巩固的，这种友谊是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持久和平斗争中的一个重大因素。

我们虽然不能来参加你们这次年会，但是我们深知，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绝不会因为英国政府这种卑鄙无耻的阻挠而受到影响。恰恰相反，英国政府的这种横暴拙劣的措施，只会更加暴露他自己的丑恶面目。我们深信，中英两国人民将加强团结，为反对侵略战争及维护世界持久和平而共同奋斗。敬祝英中友好协会年会成功。

中国人民访英代表团团长李一氓】

——《英政府无理拒绝我人民访英代表团入境 我代表团发表声明对这卑劣行动提出强烈抗议并致电英中友好协会深信中英人民将加强团结》，载《人民日报》1951年4月8日。

4月9日

钱端升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二届理事会副会长。

【（新华社九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及工作机构负责人名单如下：名誉会长：周恩来。会长张奚若。副会长：周鲠生、陈翰笙、胡愈之、钱端升、乔冠华。秘书长吴茂荪。理事：王炳南、王铁崖、伍修权、沈端先、何思敬、邵力子、金仲华、柯柏年、徐永煊、宦乡、陈家康、翁独健、章汉夫、黄琪翔、梅汝璈、费孝通、费青、张明养、张炯伯、陆瑾、杨刚、廖承志、刘贯一、刘宁一、樊弘、赖亚力、钱俊瑞、冀朝鼎、罗隆基、龚澎。

研究委员会主任：罗隆基。副主任：柯柏年、冀朝鼎、王铁崖。

编译委员会主任：乔冠华。副主任：宦乡、陈体强、冯宾符。

图书资料室主任：胡愈之。副主任：张炯伯、杨刚、龚澎。】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二届理事会及工作机构负责人名单》，载《人民日报》1951年4月10日。

4月21日-22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教育工会、学生举行抗美援朝联合代表大会，并做关于“北京市各学校深入和普及抗美援朝运动的工作报告”。

【北京市教育工会、北京市学生抗美援朝联合代表大会于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举行。会上总结了半年来全市各校抗美援朝运动，圆满地解决了今后深入和普及抗美援朝运动的问题，并通过“北京市教师、学生、职员、工友爱国公约”。大会由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冯文彬、北京市人民政府张友渔副市长讲话后，听取了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主席钱端升关于“北京市各学校深入和普及抗美援朝运动的报告”，和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的报告。另有十一人作典型发言，其中有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报告个人参观土地改革的收获，北京大学教授张景钺报告个人参加农村宣传的收获，人民大学等四校及全市小学教师介绍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以及学生、工友对美、日帝国主义暴行的控诉等。大会代表一致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决议。大会最后通过“抗议美国片面制订对日和约草案”的通电，及向毛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金日成将军等的致敬电文。】

——《北京市教育工会、学生举行抗美援朝联合代表大会通过“北京市教师学生职员工友爱国公约”》，载《人民日报》1951年4月26日。

4月25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行的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和约草案座谈会并做发言。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于二十五日晚举行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和约草案座谈会，讨论美帝国主义最近积极进行的单独对日媾和、

重新武装日本的阴谋活动。出席座谈会者有：张奚若、邵力子、陶孟和、陈翰笙、胡愈之、钱端升、黄琪翔、何思敬、乔冠华、梅汝璈、李纯青、屈武、叶景莘、刘贯一、吴茂荪、王铁崖、张明养、曾炳钧、郑森禹、孟宪章等一百余人。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主持下进行。

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首先说明美国阴谋单独对日媾和的经过。他说：美国早在一九四七年起就开始了这种阴谋活动。美国在发动侵朝战争后，感觉人力不够，因此就加紧进行这一活动，企图利用日本人充当侵朝战争的炮灰。最近美国发表了片面制订的《对日和约草案》，又公然表示要把日本拉入太平洋侵略集团。美国这个阴谋，我们应当坚决反对。

接着，日本问题专家李纯青对美国片面制订的《对日和约草案》的非法性与反动性，逐条地加以分析。他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对日和约问题有重要的发言权。为了保卫我们八年艰苦抗战的胜利果实，为了保卫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和平生活，为了帮助日本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人民必须反对美国片面制订的《对日和约草案》。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邵力子继起发言说：中苏两国在打败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出力最大，美国排除中、苏两国单独对日媾和完全是非法的。美国的和约草案，是暴露美帝国主义凶恶面目的最现实的材料，我们必须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加强抗美援朝运动。

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陈翰笙在发言中指出：美国的和约草案的目的是要使日本殖民地化，并利用日本人当炮灰，在东方侵略其他国家。美国这个草案首先将给日本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我们要联合东方各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一致起来反对这个草案，使美国的阴谋无法实现。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黄琪翔说：美国的和约草案是与它准备发动第三次大战的计划分不开的。美国竟不征求中苏两国的意见而片面制订《对日和约草案》，我们中国人民决不容许它实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法学家何思敬说：美国的和约草案就是它的罪恶的

自供状。这个条约对日本人民是一个亡国条约。草案中有许多充满火药气的条款，它将原来的盟国变为敌国，将原来的敌国变为盟国，其中包含着极大的阴谋！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胡愈之指出：美国企图重新武装日本侵略亚洲，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动员全国的力量来反对。同时，美国要实现这一阴谋有很多困难，主要是日本人民不愿充当美国的侵略炮灰。中日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阴谋，美国一定要失败。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升说：从美国的《对日和约草案》中可以得到利益的，仅是一小撮美、日反动派，甚至对美国的仆从国家都无利益可言。我们要向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充分揭露美国的阴谋。

清华大学国际法教授陈体强说：美国的和约草案是要使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一切利益归美国。即使对它的仆从国家的利益，也一律加以排斥。因此，美帝国主义是十分孤立的。

此外发言者尚有：张炯伯、李儒勉、刘泽荣、陈家康等。大家一致认为：美国的《对日和约草案》是美国在亚洲和世界扩大战争的阴谋的一部分。日本问题之不能早日解决，美国应负全部责任。这一草案对中国人民极其有害，对日本人民则是亡国条约。我们要进行广泛地宣传，揭露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阴谋，同时并联合日本以及全亚洲各国人民，一致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日本问题的决议，积极展开反对美国单独媾和与武装日本的投票运动。】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行座谈会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和约草案（一致认为这个草案是美国在亚洲和世界扩大战争阴谋的一部分）》，载《人民日报》1951年4月28日。

4月28日

钱端升前往机场迎接前来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典礼的英国人民访问中国代表团。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前来参加我国五一劳动节庆祝典礼的英国人民访问中国代表团一行九人，已于今日下午一时飞抵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者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秘书长刘贯一，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洪深，北京大学教授钱端升、王铁崖，清华大学教授周培源，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涂长望，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曾宪植，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理事孟用潜，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吴茂荪，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陈少敏，中国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副主席丘金，中国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安力夫，国际新闻局英籍顾问史平浩、夏庇若，英国工人日报驻北京记者魏宁顿等数十人。

在机场举行的简短欢迎仪式中，英国人民访问团接受了各团体代表的献花。随即由刘宁一代表我国各人民团体致辞，对英国人民访问团的到临表示热烈的欢迎。他指出，正当全世界人民一致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反对美国重新武装西德和日本、反对美国对日单独媾和的时候，英国人民访问团的到达，又一次证明了各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和平事业而坚决斗争的意志。英国人民访问团的来临，必将大有助于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我们相信，中英两国人民将更加团结，为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而努力。

英国人民访问团团长凯恩致答辞时，首先感谢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邀请，并表示他作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英国人民的访问团团员而感到无限荣幸。他说，代表团来华的目的，首先是庆祝中国人民所获得的伟大的建设的胜利，并参加庆祝这个胜利的盛典。他着重说：我们访问团的任务是促进与加强世界和平，我们的国家需要和平和中国的友谊。英国人民已经展开一个广大的运动，反对英国卷入对中国的战争，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他指出：英国的繁荣，需要与中国的贸易和友谊。他说，访问团回英以后，将向英国人民报告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绩。凯恩表示，无论有什么障碍，英中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一定会不断地发荣滋长。他最后高呼：英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万

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晚间八时，由全国总工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对外文化联络局等单位联合组成的英国人民访问团招待委员会欢宴访问团全体团员。】

——《参加我国五一劳动节庆祝典礼英国人民访问团昨日抵京 全国总工会等人民团体代表前往机场欢迎》，载《人民日报》1951年4月29日。

5月6日

钱端升在《光明日报》发表《反对美国订立亡日祸亚条约》一文。全文如下：

【反对美国订立亡日祸亚条约

钱端升

美国政府最近递交构成远东委员会的十三个国家和蒋匪帮的所谓“对日和约草案”，绝对不是和约，而是硬把日本变做美国殖民地的条约，是积极准备向中国，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的条约，也是妄图独霸亚洲，奴役亚洲人民的条约。简单言之，它是亡日祸亚条约草案。

一、“和约”的缔结程序与内容

这个所谓“对日和约草案”的荒谬、非法、奸诈、凶恶，都是亘古所未有的，到了顶点的。

依照国际惯例，签订和约之先，必须召开和会。美帝国主义一手写好了一个文件，威吓他的仆从国家接受，命令它的日本傀儡批准，即可成立和约。这样地由战争而进入和平的过程，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而且，自从一九四二年元旦，中、苏、美、英等廿余个国家发表“联合国共同宣言”，承诺对日作战的盟国间存在着很多国际协议，规定对日和约必须是全面的。这就是说，同盟国中的一个或几个不能单独的或片面的和日本缔结停战协定与和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理由是很明显的。只有在完全战胜敌人，彻底消灭敌人的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上缔结停战协定与和约，才能

导致真正的和平。为了保证同盟国赢得真正的胜利与和平，同盟国自然必须共同缔结停战协定，共同缔结和约。美国惧怕中苏两国必将坚决地要求以切实执行一切国际协议，以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以撤退占领军，以整肃战犯和法西斯分子、摧毁军事潜力、禁止重行武装和恢复军事工业，但允许日本发展和平工业诸重要项目为和约的基础，因而横暴地撇开中苏两国，不顾一切地要和日本单独媾和。

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波茨坦公告和同年十二月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公报，也无可误解地规定了：对某一敌国的和约必须由参加外长会议而又在投降条款上签字的国家共同起草。理由是：这些国家即是在战争中曾经负起主要任务的国家，也即是最有力量和决心去肃清敌人的法西斯主义、防止其再起，并巩固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国家。因此，对日和约必须由中、苏、美、英四国共同起草。但是，美帝国主义要的不是和平而是侵略，所以它就撕毁一切国际协议，排斥中苏两国，而独自起草“和约”了。

在媾和的程序上，美国的行动既然是这样荒谬、非法，它所起草的所谓“和约”的内容，自然也就充分暴露它的凶恶、奸诈的本质及其反动性。

“对日和约草案”共分八章，二十二条，加上一个前言，也不过四千个字。这是近代稀有的简短和约。一八九八年十二月结束西、美战争的巴黎和约也比这个“草案”要长得多。但是，这寥寥二十二条所包藏着的却尽是明抢暗偷的无耻勾当。这又一次证明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必然同时是强盗，是窃贼，也是骗子。

特别可以指出下列六点来说明“对日和约草案”所包藏的祸心。

第一，“草案”第三条关于朝鲜、台湾及澎湖列岛的处理是荒谬的，是违反了开罗宣言的。“草案”只说日本应放弃对这些领土的权利，却没有规定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也没有说到朝鲜的自由独立。这种非法的、横暴的规定，和美帝国主义霸占台湾、澎湖和奴役朝鲜的计划是完全符合的。

第二，“草案”同条关于将琉球、小笠原等原朝鲜廿九度以南的群岛变

为由美国管理的联合国托管地，而且在联合国作出决议以前，即由美国统治的规定，也是荒谬绝伦、史无前例的。这说明了美帝国主义打定主意，要将它的侵略的魔掌伸到远离美国本土五千公里的亚洲人的海岸。

第三，“草案”暴露了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的罪恶阴谋。一九四五年七月波茨坦宣言明明白白规定要将日本的军国主义彻底肃清，但“草案”第七条却说，“盟国承认为主权国家的日本具有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单独或集体的，自然应有的自动卫权，并承认日本可以自愿地参加集体安全的一个或几个协定，其中有一个或数个盟国参加者。”这就是说，日本可以无限制地武装，可以和美国订结军事同盟，也可以参加美国正在策动组织中的太平洋侵略同盟。要日本武装来干什么？就是去帮助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侵略中国，侵略苏联，侵略全世界！

第四，“草案”第八、第九、第十三等条树立了美帝国主义在日本的经济统治。从此，美国的独占资本家可以通过了商约、民用航空协定和其他的双边或多边协定，完全控制日本的航空业、民航业及一切工商企业，并且还可以豢养一批日本残余财阀，让他们来分享美帝国主义吸血鬼的唾余，并对日本人民去进行更残酷的榨取。

第五，美国为了向日本人民表示伪善期间，不惜慷他人之慨，将盟国对日本赔偿的要求一笔勾销了（第十四条、第二十条）。这是极端奸诈的。这意味着，单独媾和之后，日本成了美国的殖民地，只有美国可以无限制地剥削日本，旁的国家却连正当的赔偿要求也不许再提出了。

第六，“草案”第十九条为保障美帝国主义的独占利益起见，又规定：“对任何未经签字、批准或加入本条之国家，本条约将不给予任何权利、法律基础或利益。同时，本条约任何的规定不得为有利于未经签订、批准或加入本条的国家，而削弱或损害日本的权利、法律基础与利益。”用通俗的话来解释，这就是说，日本是美国的殖民地，所以日本的利益只许美国及其仆从国家染指；不参加美制“和约”的国家，尽管对日作战最力的国家，尽管是经济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却必须被排挤在外。

此外，草案尚有许多其他条文，如第十一条关于日本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一项，如第十二条关于日本战犯们的赦免、减刑等的规定，第十四条关于日本或日本国民在盟国境内的权益的处理，同条关于一个盟国自另一个盟国领土上取得日本或日本国民的工业性的财产权益的说法等等，也都是违反已有的国际协议，而企图损害中苏两国的权益，或是阴谋破坏世界的和平的。

二、缔结“和约”的目的在武装日本

美国为什么要这样无法无天地企图订立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条约呢？理由也是很明显的。

美帝国主义自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宣布所谓“杜鲁门主义”以来，一直在公开地进行侵略，并积极地准备发动反苏反共的世界大战。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苏俄为首的整个和平阵营的力量的无比壮大，使蓄心与全世界人民为敌的美英战争贩子们的侵略计划，受到严重的打击。美帝国主义早已决定要使日本成为进攻中国和苏俄的基础。如果能用比较隐藏的或伪善的方式去进行侵略阴谋，那自然是它所愿望的。但是，当它的罪恶意图已经被揭露无余，并已遭受挫败的时候，它就悍然采取了最丑恶的，也是最露骨的，公然违背国际协议的方式。

美帝国主义不是不知道单独媾和是违法的，必然会引起无可辩解的斥责的。所以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它最早建议由远东委员会的构成国家共同召开对日和约的预备会议。这个建议违反了和约须由中、苏、美、英四大国外长起草的国际协议，为苏联所严厉驳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这个侵害中苏两大国权益的阴谋自然更没有实现的可能。目前美帝国主义正遭遇着这样一种情况：侵朝战争正在节节失败，可以抽调的军队几乎已全数调到了朝鲜战场，而更大的失败正在期待着侵略者。在这样严重的关头，美帝国主义妄想挽救灭亡的命运，乃采取单独媾和这一笨拙的、穷凶极恶的办法，企图于今夏与日本订立“和约”。即使别的国家都不予批准，美国和日本间的“和约”，于“日本批准后九个月内，仍

例如：菲律宾反动政府对于“对日和约草案”是不满意的。菲律宾反动政府本来企图向日本索取八十亿美元的巨额赔偿，以满足其贪污无厌的私囊，并稍纾其民穷财尽的经济情况。但是美帝国主义因为要保护日本财阀，要向日本人民表示伪善，擅自“认为日本无力”赔偿。这样便一笔勾销了各国对日本的正当赔偿要求，而把一切利益据为己有。

例如：澳大利亚和纽西兰的人力物力，在上次大战中，曾经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日本的侵略军几乎侵入了澳国的本土。它们害怕重新武装起来的日本有可能再度发动战争，再度威胁它们的安全。它们对美国武装日本的计划深表疑惧。虽然美国已允许与澳、纽反动政府缔结所谓太平洋“安全”公约，但是澳、纽反动政府在人民的压力面前，至今还未能完全消除他们的“顾虑。”

“草案”中关于经济方面的条款，使被“马歇尔计划”所侵蚀的，并为备战而陷于极度贫困、民怨沸腾的英国统治集团，也感觉不安。在战前，日本独占资本家，靠了超额剥削工人而发展起来的纺织业，已经威胁了英国纺织品在印度和东南亚的市场。“和约成立之后，美日独占资本者，操纵了这个纺织业，更进而操纵了航运业，势将使英国的纺织品市场益趋狭小。这是英国统治集团的致命伤，也是英国反动政府所不能不顾虑到的地方。”

此外，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印尼等国的政府，由于各国人民的觉醒，由于新中国的成长，也不会欣然地接受美制“对日和约草案”。

当然，美帝国主义对其仆从国家，可以进一步使用威胁利诱的手段，强迫它们就范，强迫他们接受“草案”。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国家的反动政府的基础都是脆弱的。当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因反动政府服务于美帝国主义的备战侵略政策而日益降低到不能忍受的程度时，他们的愤怒和反对将变成实际的行动和强大的力量，将使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各国统治集团愈来愈沉重地感到困难。

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和广大劳动人民，坚决地为反对美国单独媾和而斗争。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中苏两大国参加的全

面和约才真正能终止日本今日所处的战争状态，也只有中苏两大国参加，日本人民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独立民主的、爱好和平的政权，才有可能发展和平工业，并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认识到：如果和美国单独媾和，或只同美国及其仆从国家媾和，日本便将成为不折不扣的美国殖民地，在美国的殖民者和他们的日本法西斯帮凶们的双重统治之下，日本人民将长期遭受残酷的压迫。这是日本人民所绝对不能忍受的。他们将展开激烈的斗争，要求实现缔结全面和约，实现日本人民的和平民主。

尤其重要的乃是：中苏两国人民坚决地有力地反对美帝国主义企图以单独媾和来进行其奴役日本人民和准备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中苏两国人民有一切国际协议做依据，有铁一般坚、钢一般硬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做基础，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做后盾。因此中苏两国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我们的正义斗争将使日本人民奋起，将使全亚洲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得到鼓励，将使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及其一切侵略计划归于完全失败。】

——钱端升：《反对美国订立亡日祸亚条约》，载《光明日报》1951年5月6日，第1版。

5月7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欢迎英国代表团茶会。

【（新华社七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于七日晚举行茶会，欢迎英国人民访问团。到会的有英国人民访问团的全体团员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张奚若、陶孟和、陈翰笙、胡愈之、钱端升、周培源、曾昭抡、翁独健、梅汝璈、费孝通、冀朝鼎、吴茂荪、王铁崖、陈体强等五十余人。

茶会开始时，首先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致辞。他首先对英国人民访问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中、英国人民友谊的增进，将对世界和平有很大的贡献。”张奚若最后希望英国人民访问团回国后继续努力促进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

英国人民访问团团长凯恩在致辞中对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他赞扬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并保证要为加强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民主而奋斗。】

——《我保卫和平反美侵略委员会举行茶会欢迎英国人民访问团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亦举行茶会欢迎》，载《人民日报》1951年5月9日。

5月16日

钱端升在《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市各学校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工作报告”上半部分。发言全文如下：

【北京市各学校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工作报告

——在北京市教育工会、市学生抗美援朝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主席 钱端升

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我们北京市各学校的教师、学生、职员和工友，承继“五四”和“一二·九”的光荣的爱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去年十月中旬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的爱国运动。这个运动的规模是巨大的，几乎包括了全市所有的学校；时间是持久的，连续进行了半年没有中断。我们的热情始终十分饱满，我们的工作一直是向着普及和深入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所获得的成绩也是辉煌的。总结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今后的方向，把抗美援朝运动坚持下去、普及下去、深入下去，这就是今天我们开会的目的。

北京市各学校的抗美援朝运动，经过了时事学习，到市区、工厂和农村进行宣传，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展开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拥护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宣传，订立爱国公约，已经一步一步地走向更扩大更深入的阶段。各学校的教师、学生、职员、工友捐献了慰问袋两万多个，写了六万五千多封慰问信。有两万多同学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各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参加了时事学习，目前又在讨论订立爱国公约。各校师、生、员、工组成的四万人的大规模的宣传队，两次到市

区、工厂和农村，对一百万以上的群众进行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广大的教师、学生、职员、工友在这些工作中都表现了忘我的工作热情，很多人通夜工作，有的人喉咙哑了还要演戏，有的人脚生了泡也不休息。清华一个拐脚的同学，冒着大风雪，一天之内跑到三个村子去演戏；北大有的教授抱病下乡宣传；师大到小工厂去工作的宣传队，为了适合工人的时间，常常忘记了自己吃饭；交大的宣传队在门头沟装了广播器，自编自演对口唱、相声，并做时事报告。市立四中的宣传队下乡后，学习人民解放军的作风，替老乡挑水、扫院子，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八中在四月普及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中创作了九十多件文艺作品，宣传和访问了三万多居民。市区各小学通过家长座谈会等方式进行宣传；郊区各小学向老乡讲解图片，搞屋顶广播等已成形一种经常的制度。特别是这次宣传工作中，很多教师、职员和同学一起宣传，一起演戏，北大医学院和协和医学院的教授到各村进行宣传时，还同时给老乡治病，像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很多学校动员起来缝制慰问袋，慰劳志愿军，以致有些学校变得“像工厂一样”。师范大学有一位教授写了一百多封慰问信；有很多如同学把所有可以捐献的衣物都捐了出来。报名参加军校的，有很多学校的同学，天还未亮就排队在报名处等候报名；有的报了名，没取上就哭了；录取名单在各校公布时，同学立即游行庆祝、放鞭炮、扭秧歌，如同节日一样；被录取的同学表现了极大的决心，“勇敢的走向自己的岗位，坚决服从祖国的需要，被分配那里就到那去。”最近各校讨论订立爱国公约时，全市教师、学生、职员、工友回忆过去，和今天新中国的情形相对照，愈益感到祖国的伟大可爱，庄重的通过爱国公约，作为今后的行动纲领。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规模如此广泛深入，以致有许多从不问政治的师生也卷入了运动；有些反动、落后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学校，在这次伟大的爱国运动中也翻了身，和其他学校一样，成为抗美援朝中有力的队伍。

.....

我们在这个空前广阔的大运动中，有些什么收获呢？

（一）首先是我们的政治觉悟空前地提高了，我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不够关心，也不了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个伟大运动的意义。有的人埋头读书不问外事，一心一意要迎接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有的人根本不关心时事，对于美国侵略军在朝鲜的侵略行为很少理会。有的人认为美国侵略朝鲜与中国无关。有的人认为援助朝鲜就要破坏我国的和平建设，同时由于美帝国主义者长期侵略所遗留下的思想影响，很多人存在着恐美和崇美的错误心理。有的人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援助朝鲜，是没有信心的，一听说志愿军去了朝鲜就不敢往下想了；有的人被唯武器论所俘虏，怕原子弹，怕美国飞机、大炮。有的人被美国侵略者的欺骗宣传所蒙蔽，崇拜美国的物质文明，说美国什么都好，甚至有个别分子崇拜美国生活方式到了发狂的程度，恨不得自己投生为美国人。此外，还有极少数具有亲美思想的人，乘机散布“美国之音”，颠倒是非，无条件地做了美帝国主义者的应声虫。

针对着各个学校的这种思想状况，我们组织了普遍的时事学习和讨论，举行了控诉，检查美帝国主义者在我们的思想上所种下的毒害，批判了崇美和恐美的错误思想，打击了亲美思想，在这样的自我教育与反对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斗争中，在朝鲜前线不断传来的胜利声中，在参加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斗争中，使那些政治觉悟不够或头脑不清醒的人得到了很大的教育。很多人都自动批判了自己的思想，并深深地感谢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使自己走向为人民服务的光明的道路。同时，广大师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大大提高了，爱国主义热情发扬起来了，因而深刻而具体地感到祖国的伟大可爱，“中国真的站起来了”。“祖国就是胜利，作为中国人民是光荣的、骄傲的”。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再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着活显显的具体内容，当我们想到祖国两字的时候，就立刻想到毛主席，想到英勇的解放军，想到勤劳勇敢的智慧的广大人民，想到伟大壮丽的山河和丰富的物产，“没有这一切就没有祖国”。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祖国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竟是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样思想觉悟和政治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我们积极地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实际工作，特别是为了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我们担负起向工厂、农村、街道进行宣传的重大任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担负人民的宣传员的任务，应该是责无旁贷的。我们每一个教师、每一个学生都已经自觉到这是自己的责任，而且我们的工作确实也做得很好，广大的个人、农民、市民接受了抗美援朝的宣传，认识和觉悟都大大的提高了。

（明日续完）】

——钱端升：《北京市各学校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工作报告——在北京市教育工会、市学生抗美援朝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上篇，载《光明日报》1951年5月16日，第3版。

5月17日

钱端升在《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市各学校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工作报告”下半部分。

【北京市各学校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工作报告

——在北京市教育工会、市学生抗美援朝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主席 钱端升

这是我们很大的收获。

（二）还有另一个重大的收获，值得我们特别重视，那就是我们和这些劳动人民广泛接触的当中，我们从工人和农民得到很多生动具体的教育与启示，因而把我们自己的思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我们从劳动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控诉中，了解到工人和农民与帝国主义者结下了血海深仇，了解到工人和农民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坚决性与顽强性，因而大大坚定了我们自己的斗争决心，提高了我们自己的觉悟。我们真正体会到劳动人民的伟大，体会到“翻了身的农奴，在面临着威胁时所发挥出来的无比坚强的力量。”当我们听到工人们对于原子弹威胁的坚定回答时，我们不能不惭愧。我们有人反省：“工人说：‘原子弹顶多炸毁我们的生命，但决不能炸毁工人阶级的意志；’

我却认定：原子弹虽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却可以决定我的命运。”同志们，同学们，难道这不是我们从工人体会到的伟大的启示么？拿我们自己和工人相比，难道不显得太渺小了么？我们与工人接触以后，懂得了“为什么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我们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学习工人阶级的立场、决心，学习工人阶级的忘我的牺牲精神”。有些同学发现农民将毛主席的像贴胸放着，或者在家里当神位供着；一个病危的农民还嘱咐他的儿子：“好好向毛主席报恩”。我们的同学真是感动极了，现在才真切体会到劳动人民对毛主席与共产党的热爱是多么深刻，因此有很多先生和学生，纷纷下定决心要向工厂学习，为工农服务。医学院的医生曾经怀疑中央卫生部大量培养中等医务人才的政策，但是看到农村中医疗条件的困难，看到农民对于普通医生和妇婴保健人员的迫切需要之后，思想大大的改变了，现在认识到大量培养中等医务人员的方针是正确的，而且认为医务工作者应该快些下乡。

我们经过这一次运动的实际锻炼，更深刻地体会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理，找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体会到什么是群众观点，什么是群众路线，认识了人民伟大的力量，因而更加明确了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的决心。我们要到群众中去锻炼，到实际斗争当中去锻炼，以此来丰富我们实际斗争的知识，“这种锻炼是课本上学不到的”，是“思想上的大革命”。

（三）最后，还应该特别指出的，在抗美援朝的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四月的普及和深入宣传工作中，全市师、生、员、工空前团结，一致行动，克服了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工作配合不够的现象，使工作顺利地展开。年龄较高的教授也热烈地参加，有些学校教授参加工作的占百分之九十左右，有的徒步下乡、有的抱病参加、有的年纪很大，受到同学劝阻，便赶到城门送同学下乡。有些中小学校几乎百分之百的教师参加了工作，有的还向同学挑战。在共同工作中，师生互相团结更紧密，了解更深刻，有些教授感到课程太重，有些内容并不适合建设祖国的需要，主动向同学提出要改革课程。市立男八中在如何结合课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已经创造了初步的经验。这样不但加强了师生团结，而且给今后工作创造了更良好的条件，我们

希望这次师、生、员、工的联合代表大会能更加促进师生间的团结，搞好教学和各项工作。

.....

目前，有些人以为抗美援朝运动，花费的时间太多了，影响到功课和学习。是的，我们的抗美援朝运动确实影响到教学计划，使它不能如期完成。但是我们要比较一下，究竟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学习的收获大，还是没有抗美援朝运动时学习的收获大？我想是谁都会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这两种学习其实并不是互相矛盾的，抗美援朝运动同时也是搞好教学的动力，只要把这个工作做好了，要教好、学好功课是不成问题的。事实是最好的证明，凡是抗美援朝运动开展的比较好的学校，教员就努力提高教学，同学就积极学习，职工也努力工作，学校就呈现了一片新气象。相反的，凡是抗美援朝运动开展的比较不好的学校，师生就比较散漫、松懈，教学效果就比较差些。因此，以为抗美援朝运动与学习相矛盾的意见，是和实际情况不符合的。但是，确实也有这样情形：由于我们有时工作布置太多，同时也没有很好地帮助各学校解决工作上的苦难，在有些学校中，还有政治活动过多的情况，以致影响学生的健康和学习。这是很大的缺点，需要我们逐步加以解决。另外也有一些学校课程负担太重，以致有些同学一天学习十二小时，甚至开夜车直到深夜一两点钟还是做不完功课，使同学们很少时间参加政治活动，进行政治学习，又大大地影响同学们的健康。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也必须加以解决。

现在美帝国主义在朝鲜虽然遭受了决定性的失败，但是中朝人民要最后打败美帝国主义，还要经过一段艰苦的斗争。同时各学校的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还是不平衡的，在运动开展的比较好的学校中还有小部分人没有卷入运动；个别学校中甚至潜伏着少数反革命残余分子，继续进行各种反动活动；帝国主义的长期的文化侵略对我们思想上所造成的毒害，也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扫除，我们中间还有些人不认识美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的严重危害，认为美国在中国办学校、设医院在客观上多少对我们有好处，还有人仍然盲目地崇拜美国物质文明；而我们在学校里所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也还没有普

遍、经常和系统地进行起来。因此，抗美援朝还是中国人民的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应该进一步把抗美援朝普及深入下去。

那么，我们今后的工作是什么呢？

首先，是我们大家要进一步加强反美爱国的时事政治学习，要做到人人学习，经常学习，跟随着迅速发展的国内外形势，认识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和自己的斗争方向，并积极参加到全国人民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来。我们要继续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继续检讨、批判残留的崇美和恐美思想，提高民族自尊信（应为“心”，夏红注）、自信心，进步的同志们要带动觉悟不够的同志们，进步的学校要帮助落后的学校。

其次，要使运动经常持久，必须把爱国热情贯彻到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去，成为推动教学和各种工作的动力，我们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的任务，就是努力办好人民的教育事业。教师要把爱国主义的思想贯彻到教学中去，并按照祖国建设的需要，改革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同学要努力学习，把自己培养成为建设祖国的人才；职工要努力工作，创造教学的良好条件。

再次，向广大市民，特别是劳动人民，进行宣传工作，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但应当是利用课余时间来进行，避免使参加宣传的人过分疲劳。

最后，为了巩固与提高我们的爱国热情，我们要订立与执行爱国公约，大家互相鼓励督促使其真正成为我们的行动纲领。

全体代表同志们，让我们全市教师、学生、职员、工友在伟大的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前进，为继续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而持久努力吧！

（续完）】

——钱端升：《北京市各学校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工作报告——在北京市教育工会、市学生抗美援朝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下篇，载《光明日报》1951年5月17日，第3版。

5月22日

吴宓日记1951年5月22日记：

【上午9:30乘中胜汽车\$6100入城，七星冈下。和众进豆浆、四小馒头\$1900。至胜利大厦（今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招待所）登簿，求见漱公登。坐候至正午，漱公偕黄良庸学习毕，出见。

已而午饭，毕，得见（一）周士观（二）冯文潜（三）钱端升、施嘉炀。旋请午睡休息。漱公独留久谈，述一年来之游踪及著作。对宓去京留渝问题，未置可否。

近2:00别出。】

——《吴宓日记续编》，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0页。

夏红注：

吴宓和钱端升在清华时期交游甚多，钱端升的名字亦数次出现在吴宓日记之中。但是在1949年之后，粗略读《吴宓日记续编》第一卷，钱端升名字仅出现一次，而且考虑到二人经历，恐怕以后九卷中出现的可能性亦不是很大。

钱端升为什么在1951年5月现身重庆？查陈文秋编订之《钱端升先生年谱简编》，1951年下记载“参加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团到四川大邑县，回校向政治系师生谈心得体会”句，可以推定此次钱、吴会面势必是钱端升在土改间歇期间前往重庆而后发生的。

此段经历可再查《光明日报》关于土改相关报道，或可旁证。钱、吴此次会面具体内容仅如引文，未知其详。

10月24日

钱端升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列席人名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列席名单：

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二十人，兼全国委员会委员及请假者未列入。）

陈毅、李立三、叶剑英、何香凝、吴玉章、薄一波、聂荣臻、徐特立、刘格平、高崇民、习仲勋、彭泽民、李烛尘、李章达、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负责人

（一百四十四人，凡兼全国委员会委员和政府委员者、请假者及不在京者未列入。）

1. 政务院政务委员，副秘书长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负责人和驻外使节

（九十八人）

谢觉哉、罗瑞卿、滕代远、李富春、陈伯达、刘景范、齐燕铭、孙起孟、辛志超、屈武、陶希晋、张唯一、罗叔章、武新宇、李木庵、周鲸文、刘王立明、郭则沉、许宝驹、林仲易、刘澜涛、叶季壮、陈郁、朱学范、南汉宸、孔原、戎子和、何长工、钱之光、薛暮桥、宋劭文、曹菊如、孙晓村、范子文、钟林、梅龚彬、俞寰澄、吴羹梅、千家驹、程子华、胡子婴、周荣鑫、徐寿轩、钱俊瑞、韦恂、苏井观、竺可桢、胡愈之、费孝通、刘清扬、潘光旦、沈志远、欧阳予倩、阳翰笙、艾思奇、翦伯赞、钱端升、雷洁琼、舒舍予、叶恭绰、吴有训、邵荃麟、张秀岩、张慕尧、郭任之、许立群、帅孟奇、萧明、李世璋、安子文、章汉夫、伍修权、王绍鏊、姚依林、雷任民、刘澜波、陈维稷、杨卫玉、龚饮冰、王新元、武竞天、石志仁、季方、杨显东、张林池、李范五、李葆华、张含英、毛齐华、邢西萍、李楚离、李铁民、庄希泉、王少春、范长江、萨空了、杨放之、曹祥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出席列席名单》，载《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4日。

11月6日

钱端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努力改造思想，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教师！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一文。

**【努力改造思想，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教师！为改造
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钱端升)

从解放到现在，时间过得不算短，但是我的进步是很小很慢的。我现在体会到，这是由于我对学习不够重视，而且还采取了不正确不虚心的态度。

我有一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至于资产阶级的教育的影响，对于我可能比一般旧知识分子更要大些。但在不久以前，我是麻痹的。我自以为在七八年前，我已经抛弃了旧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解放以后，我自以为一心一意地在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我所需要的只是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书籍，多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多学习共产党员的作风而已。于是解放之初，我单单想读新书，以后工作影响了我的读书时，则单单想从工作中求进步。我满以为这样做便可稳步前进地自我改造。

可是我错了，我大大地错了。像我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决不是这样的容易改造得过来的。旧的不先除掉，新的是进不来的。而什么是旧的、坏的，自己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在土地改革的革命实践中作了比较深刻的反省后，我才比较深刻地认识了解放以前我犯过的错误，和解放以后仍然遗留着的缺点。这种错误是不应当以“环境使然”或“动机良好”等等没出息的理由来自宥的；这种缺点也是不应当被自以为正在进步的错觉所蒙蔽，而不及时发掘并迅速纠正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我愈勤反省，愈多发觉，愈增惭愧，但对于很多缺点，我自己是常常感觉不到的。到了土地改革工作将要结束，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我才开始认识到这种缺点。举一个例子：我向来自以为是一个责任心很重而并不主观的人，但很多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公开地批评了我的主观时，我就感觉到我有好坚持己见的严重毛病。我体验到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的锐利后，我懊悔我未能及早地学会使用这一武器，我更恍然大悟，不但单单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是学院式的，脱离实际的；单单想从工作中改善作风也是不能成功的，两者都不是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有效的学习方法。必须读书而能联系自己，联系实际，又采用了批评与

自我批评的方法，以求暴露缺点，才能真正分辨新旧，分辨是非，分辨好歹，方能真正改造自己，取得进步。

我是在这样一个可说是初步觉悟的基础之上来欢迎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运动的。我衷心地接受了周总理给我们所作报告中的一切指示，尤其是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的使用。

应当承认，不但在解放以前我的教学工作基本上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是遵循着资产阶级的思想道路的，客观上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那在解放以后，因为我的旧思想意识仍然存在，我在北京大学的工作，在很多的方面，仍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思想和作风。

作为人民教师的最起码条件之一是认真教课，但我没有认真将功课教好。解放以来，我教过“新民主主义论”（政治课），“中国政府”（应当正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和“资本主义国家”等课。我没有尽我的能力以使教材充实，没有以大力帮助学生自学，也没有严格地执行预定的教学计划。我是不够对学生、对人民负责的。

我没有好好地联系群众。我和同学同仁间的联系都是很不够的；对于他们的思想情况，我的了解是间接的，也往往是片面的。同学们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上的要求，我是不够了解的；同事们对工作上的需要，无论在图书设备方面，或和政府业务部门的联系方面，我或者是不了解，即使有些了解，也从没有积极地、贯彻地为他们解决问题。既然脱离了群众，也无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

我没有好好地团结同仁。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三个系——法律、政治、经济——个个系内部闹不团结，系与系之间也缺乏联系和互相照顾。我经常觉得这些不团结对于我是一种麻烦，因此对于团结的工作，总是采取一曝十寒的态度，缺乏耐心，更不坚持。有时我内心里上还会自高自大，不但不去解决问题，反而瞧不起人家的闹不团结。在有一个时期，我自己和经济系樊弘主任之间也闹意见。我认为他的固执和本位主义是不和洽的原因，我从不反躬自省，问一问我自己是否也有态度不好或者主张不合理的方面。而且即使我

是处处合理（当然决不能是这样），我也从没有耐心地去说服樊弘主任。

我对法学院院长一职坚持辞去不干也近一年之久。尽管我当时提出种种自以为是充分的理由，要求学校和教育部允许我辞职，但在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以前，我从没有问过自己，是不是个人的兴趣这一老家伙又在作祟。我自以为自从前年夏天有一位朋友严正地批评了我的“退让”后，我已经能够不考虑兴趣而接受上级所交给我的或是人民团体所要我担任的一切职务了。但是，在土地改革期中我既已发觉我有着许许多多思想上虽然坚决要改掉而行动上又往往表现仍然存在的缺点，我就不能不联想到个人兴趣问题可能就是我要辞去法学院院长的真实原因。关于这一点，我自己至今尚不能分辨清楚，我要求我的同事们对我提出严正的批评。不管我的动机是怎样，因为我坚持辞职，在一年中，即使是在京的时候，也不过问院务，忍令法学院招致工作上的损失，是我的不可宽宥的错误。

从我对于北京大学的校务的处理中，我也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不良的思想和作风。在今夏以前，校务委员会是负责领导校务的，而我是常务委员之一。我不是一阵热，便是一阵冷；不是急躁，便是消极。我暴露了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弱点。我不联系群众，我不坚持真理，以致对校务的稳步改进没有起应起的作用。

在这里，也应当指出，比我负有更大的责任的是前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向来是明哲保身的，与人不争的，对疑难之事也轻易不表示可否的。在他的领导之下，北京大学长期存在着的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没有被纠正的。汤先生自任副校长以来，作风已有些改善，但也还不够。我如果一向真正能对人民负责，我早应当面或公开地批评他，指出他的缺点，要求他加强领导，使得校务的改进可以多些快些。但是为了面子，为了顾虑私人情感，在此以前，我从没有这样做过。这也说明了我是怎样一个旧的知识分子。

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谓“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长期地保留

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人民的思想和学术是应当自由的。但是，在蔡先生掌校的时候，思想自由的具体表现是“兼容并包”，更具体的表现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统治的地位。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大学中，如果有人企图以当年占着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来和工人阶级的思想分庭抗礼，是不是可以的呢？我想是不可以的。至于“学术自由”，不但一开始就和实际脱离，以后更演变为院系各自为政，以及学术与政治对立，技术与政治对立，为学术而学术等种种严重的而且至今还没有肃清的错误思想。

北京大学毕业的人们和在北京大学工作多年的人们容易为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所迷惑。应当问，除了“五四”以外，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究竟在哪里？是的，在一二·九、一二·一和一九四六年底的反抗美军暴行运动中，以及其他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中，我们北京大学的同学都是站在战线的前列的。但是，其他一些学校的同学难道不是同样站在前列的么？即以“五四”而说，它诚然是在北京大学首先发动的，北京大学领导或参加的师生也特别多，但要承继“五四”的光荣传统，我们教师们首先应当分清“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分子的反动思想。我们除了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应该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这思想所遗留在我们中间的影响。

从上面所指出的我在解放后在北京大学的工作中所已发现的缺点中，已经可以充分看出我的旧作风是怎样严重地存在着，也可以充分说明我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旧思想是怎样在作祟。当然，这些缺点只是存在着的缺点中的一部分。更深刻的自我检讨和别人的批评将会揭发更多的更严重的缺点。我要不顾面子不断地作自我检讨，不但检讨我在北京大学工作中的缺点，更进而检讨我在解放以前所犯过的严重错误。我应当欢迎别人对我提出无情的尖锐的批评。我并希望能够同样地批评别人。我深信相互批评就是相互帮助，也就是改造思想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为了求自己的进步，为了改革高等教育，更为了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毛

主席，让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师们以最热烈的情绪卷入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的高潮吧！】

——钱端升：《努力改造思想，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教师！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载《人民日报》1951年11月6日。

11月20日

1951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钱端升的文章《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全文如下：

【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

从解放到现在，时间过得不算短，但是我的进步是很小很慢的。现在体会到，这是由于我对学习不够重视，而且是采取了不正确、不虚心、不踏实的态度。

我有一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至于资产阶级的教育的影响，对于我可能比一般旧知识分子更要大些。但在不久以前，我是麻痹的。我自以为在七八年前，我已经抛弃了旧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解放以后，我自以为一心一意地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我所需要的只是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书籍，多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多学习共产党员的作风而已。于是解放之初、我单单想读新书，以后工作影响了我的读书时，则单单想从工作中求进步。我满以为这样做便可稳步前进地自我改造。

可是我错了，我大大地错了。像我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决不是这样的容易改造得过来的。旧的不先除掉，新的是进不来的。而什么是旧的、坏的，自己往往是认识不清的。在土地改革的革命实践中作了比较深刻的反省后，我才比较深刻地认识了解放以前我犯过的错误，和解放以后仍然遗留着的缺点。这种错误是不应当以“环境使然”或“动机良好”等等没出息的理由来自宥的；这种缺点也不是不应当被自以为正在进步的错觉所蒙蔽，而不及及时发掘并迅速纠正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我愈勤反省，愈多发觉，愈增惭愧，但对于很多缺点，我自己是常常感觉不到的。到了土地改革工作将要结束，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我才开始认识到这种缺点。举一个例子：我

向来自以为是一个责任心很重而并不主观的人，但很多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公开地批评了我的主观时，我就感觉到我有好坚持己见的严重毛病。我体验到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的锐利后，我懊悔我未能及早地学会使用这一武器。我更恍然大悟，不但单单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是学院式的，脱离实际的；单单想从工作中改善作风也是不能成功的，两者都不是正确地学习态度而有效的学习方式。必须读书而能联系自己，联系实际，又采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以求暴露缺点，才能真正分辨新旧，分辨是非，分辨好歹，才能真正改造自己，取得进步。

我是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初步觉悟的基础之上来欢迎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运动的。我衷心地接受了周总理给我们所作报告中的一切指示，尤其是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的使用。

应当承认，不但在解放以前我的教学工作基本上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是遵循着资产阶级的思想道路的，客观上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即在解放以后，因为我的旧思想意识仍然存在，我在北京大学工作，在很多的方面，仍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思想和作风。

作为人民教师的最起码条件之一是认真教课，但我没有认真将功课教好。解放以来，我教过“新民主主义论”（政治课），“中国政府”（应当正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和“资本主义国家”等课。我没有尽我的能力以使教材充实，没有以大力帮助学生自学，也没有严格地执行预定的教学计划。我是不够对学生、对人民负责的。

我没有好好地联系群众。我和同学同仁间的联系都是很不够的；对于他们的思想情况，我的了解是间接的，也往往是片面的。同学们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上的要求，我是不够了解的；同事们对工作上的需要，无论在图书设备方面，或和政府业务部门的联系方面，我或者是不了解，即使有些了解，也从没有积极地、彻底地为他们解决问题。既然脱离了群众，也就无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

我没有很好地团结同仁。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三个系——法律、政治、经

济——个个系内部都闹不团结，系与系之间也缺乏联系和互相照顾。我经常觉得这些不团结对于我是一种麻烦，因此对于团结的工作，总是采取一曝十寒的态度，缺乏耐心，更不坚持原则。有时我内心里上还会自高自大，不但不去解决问题，反而瞧不起人家的闹不团结。在有一个时期，我自己和经济系樊弘主任之间也闹意见。我认为他的固执和本位主义是不和洽的原因，我从不反躬自省，问一问我自己是否也有态度不好或者主张不合理的地方。而且即是我处处合理（当然决不可能是这样），我也从没有耐心地去说服樊弘主任。

我对法学院院长一职坚持辞去也近一年之久。尽管我当时提出种种自以为充分的理由，要求学校和教育部允许我辞职，但在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以前，我从没有问过自己，是不是个人的兴趣这一老家伙又在作祟？我自以为自从前年夏天有一位朋友严正地批评了我的“退让”后，我已经能够不考虑兴趣而接受上级所交给我的人民团体所要我担任的一切职务了。但是，在土地改革期中我既已发觉我有许许多多思想上虽然坚决要改掉而行动上又往往表现仍然存在的缺点，我就不能不联想到个人兴趣问题可能就是我要辞去法学院院长的真实原因。关于这一点，我自己至今尚不能分辨清楚，我要求我的同事们对我提出严正的批评。不管我的动机是怎样，因为我坚持辞职，在一年中，即使是闲的时候，也不过问院务，忍令法学院招致工作上的损失，是我的不可宽宥的错误。

从我对北京大学的校务的处理中，我也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不良思想和作风。在今夏以前，校务委员会是领导校务的，而我是常务委员之一。我不是一阵热，便是一阵冷了；不是急躁，便是消极。我暴露了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弱点，我不联系群众，我不坚持真理，以致对校务的稳步改进没有起应有的作用。

在这里，也应当指出，比我负更大作用的是前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向来是明哲保身的，与人不争的，对疑难之事也轻易不表示可否的。在他的领导之下，北京大学长期存在着的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没有被纠正

的。汤先生自任副校长以来，作风已有些改善，但也还不够。我如果一向真正能对人民负责，我早应当面或公开批评他，指出他的缺点，要求加强领导。使得校务的改进可以多些快些。但是为了面子，为了顾虑私人情感，在此以前，我从没有这样做过，这也说明了我是怎样一个旧的知识分子。

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谓“思想自由”和“学习自由”——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人民的思想 and 学术是应当自由的。但是，在蔡先生掌校的时候，思想自由的具体表现是“兼容并包”，更具体的表现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统治的地位。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大学中，如果有人企图以当年占着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工人阶级的思想分庭抗礼，是不是可以的呢？我想是不可以的。至于“学术自由”，不但一开始就和实际脱离，以后更演变为院系各自为政，以及学术与政治对立，技术与政治对立，为学术而学术等种种严重的而且至今还没有肃清的错误思想。

北京大学毕业的人们和在北京大学工作多年的人们容易为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所迷惑。应当问，除了“五四”以外，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究竟在那里？是的，在一二·九、一二·一和一九四六年底的反抗美军暴行运动中，以及在他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中，我们北京大学的同学都是站在战斗的前列的。但是，其他一些学校的同学难道不是同样站在前列的么？即以“五四”来说，它诚然是在北京大学首先发动的，北京大学领导或参加的师生也特别多，但要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我们教师们首先应当分清“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的反动思想。我们除了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应该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这思想所遗留在我们中间的影响。

从上面所指出的我在解放后在北京大学的工作中已发现的缺点中，已经可以充分看出我的旧作风是怎样严重地存在着，也可以充分说明我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旧思想是怎样在作祟。当然，这些缺点只是存在着的缺点

的一部分。更深刻的自我检讨和别人的批评将会揭发更多的更严重的缺点。我要不顾面子不断地作自我检讨，不但检讨我在北京大学工作中的缺点，更进而检讨我在解放以前所犯过的严重错误。我应当欢迎别人对我提出无情的尖锐的批评。我并希望能够同样地批评别人。我深信相互批评就是相互帮助，也就是改造思想的唯一方法。

为了求自己的进步，为了改革高等教育，更为了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毛主席，让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师们以最热烈的情绪卷入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的高潮吧！

(原载1951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

——《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五十年代出版社1952年版，第70—75页。

12月1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扩大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在全市展开反贪污运动的问题。

【(北京市新闻处讯)北京市属各单位，为了贯彻执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决议，一个月来，正分别进行准备工作，拟订具体计划，展开一个增产节约和反贪污浪费的运动。

本月一日，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扩大联席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在全市展开反贪污运动的问题。

会议首先由彭真主席说明开展反贪污运动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人民政府是廉洁的政府，可是少数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仍然是严重的。从北京解放到现在，市属各单位经过两次大检查和整风学习运动，已经发现和处理的贪污案犯共有六百五十人，尚未发现的会比这个数目多。为了进一步铲除贪污现象，树立巩固的廉洁的风气，各单位领导同志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进行系统深入的检查，并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进行群众性的检举，大张旗鼓，在全

市范围内展开反贪污运动。

到会的市协商委员会委员、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各单位负责干部听了彭真主席的发言，即相继发表意见，一致拥护开展反贪污运动。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郑芸说：“现在我们来开展一个反贪污运动，就会使人民更加信任自己的政府。”市协商委员会委员舒舍予认为要杜绝贪污，一是制度要严，二是有些人家庭负担重，应当设法照顾他们。傅华亭说：“我们工商界一定热烈参加这个运动。我们工商界还有向工作人员行贿引诱的现象，我们认为彭市长指出行贿人和受贿人一样治罪是非常对的。我们工商联愿意来自已进行教育，克服这种恶劣现象。”雷洁琼、陈铭德、曾昭抡、钱端升、朱长江等均主张大张旗鼓地展开反贪污斗争。梁思成对展开反贪污运动表示热烈赞同，他说：“这样做，不但不会损害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威信，正好是更加提高政府和党的威信。”张奚若指出贪污是旧社会所留下的不良现象，人民政府是不能容许这种现象存在的。他说：“保障人民政府不腐化、不贪污的是两条：事前教育，事后严办。”陈垣提出使贪污的人不敢贪污、不能贪污、不至于贪污和不必要贪污的四条办法，他说：“严办，使他不敢；制度，使他不能；教育，使他不至于贪污；还有些人家庭儿女负担重，生活困难，适当的调整他们的待遇，就可以使他们不必要贪污了。”

为了反对贪污浪费，市人民政府所属各单位最近都已作了一些准备工作。各部门负责人在发言中，都认为目前开展反贪污运动是十分必要的，他们保证认真地、负责地做好这个工作。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程宏毅说：“这个运动，在财经部门特别需要。财经部门的负责干部，一定要认识这个反贪污运动的政治意义，切实把运动领导起来，发动群众检举和机关内部严格检查，清除一切贪污分子。”市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王纯报告合作社系统最近进行初步检查的情况，他说：“合作社中的贪污现象是很严重的。据最近检查的材料，第九区区联社一百三十二个工作人员中，就发现了三十九个大大小小的贪污分子，第六区合作社一百五十个工作人员中，就有三十四人贪污。这是由于我们缺乏教育，缺乏检查。希望在这次反贪污运动中，能得到群众

的检举和监督，帮助我们改造合作社的工作人员，真正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作风。”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行长贾星五、市工商局副局长张锦城都说：“除了内部发动工作人员坦白、检举以外，还希望广大人民协助，大家来检举贪污。”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说：“我们欢迎广大市民对公安人员的贪污行为进行检举，不要有任何顾虑。”市人民法院院长王斐然分析法院处理的一百五十三件贪污案，其中只有一件是因为生活困难而挪用公款，其他都是因为生活腐化、被人引诱和勾结工商业中的坏分子进行贪污。

最后，彭真主席综合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今天我们对反贪污的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大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过几天，我们市协商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将再开一次联席会议，来订出一个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反贪污浪费运动的具体计划，经过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来作全面布置。我们相信，经过这次大张旗鼓的反贪污斗争，将给予贪污分子以致命打击，更圆满地树立人民政府廉洁的作风和进一步转变社会上残留的坏风气。】

——北京市新闻处：《北京市协商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 讨论开展全市规模反贪污运动 彭真同志号召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铲除贪污现象》，载《人民日报》1951年12月5日。

12月5日

美国的费正清在五角大楼受到审查委员会的十一项指控，其中第九项和钱端升有关。

【“第九项，1943年你的妻子要求把钱端升写的一篇文章的稿费寄给她，并由她转寄给在中国的钱先生。”（确有其事，这笔100美元的稿费帮助了他养家糊口。）】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20页。

12月8日

龚祥瑞发表文章《彻底清算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教学思想》，针对钱

端升。

【彻底清算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教学思想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龚祥瑞）

钱端升先生说：“不久以前……我自以为在七八年前，我已经抛弃了旧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现在他“恍然大悟”，知道“错了，大大地错了”。他又说：“像我这样的一个旧知识分子决不是这样的容易改造得过来的。旧的不先除掉，新的是进不来的。而什么是旧的、坏的，自己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见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钱先生是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同时是政治学系的一个教授。他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也是法学院教师们共同的问题。因此，我想就钱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来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今天我就只揭露一些政治学系的缺点，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展开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解放前的政治学系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政治学系，为英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垄断。在那里，人们学了柏拉图的“理想图”，洛克、卢梭等的“契约论”，孟德斯鸠、边沁、弥尔等的“议会制度”，英、美、法、德、瑞（士）等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宪法”、“行政”和“外交”等等。就政治学系来说，所谓“旧民主主义”，指的就是这些。

十二年前，王铁崖、楼邦彦、吴恩裕和我从英国留学回来，那正是国内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最尖锐的时期，即是疯狂的法西斯主义最猖獗的时期。我们和老师一样，只知“生吞活剥地搬外国”。我们把帝国主义所豢养的走狗工党拉斯基的漫天谎话从英国搬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我们宣传了那种英美垄断资产阶级用来欺骗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我们使不少可能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禁闭在所谓“经济—平等；政治—自由”的公式里。就是这样，我们替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完成了一个可耻的任务：就是以那冒牌的“社会主义”与假民主主义为旗帜，“安慰”了、麻痹了动摇的、惧怕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拉着他们倒退”，和我

们一道面向帝国主义一边，面向反动派一边。我们也就这样替国民党反动派培养了一批官僚、特务走狗。政治学系的教育就这样一代比一代更为具体地体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文化思想的侵略。

我们从西洋贩了假东西和“鸦片烟”回来，毒害青年，这是和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分不开的。拿我来说吧。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徒的家庭里，父母是城厢的雇工，我幼年受到了封建主义的压迫。在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先进分子所预备的道路，就是解放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同时也解放自己的道路；一条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所预备的道路，就是“先把自己铸成大器”、然后去剥削和压迫人们的道路。我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所谓“先把自己铸成大器”，依我当时的了解就是“出人头地”。所谓“出人头地”，依我现时的了解无非就是爬到人民的头上，做人民的统治者，用剥削和压迫的方法来解决我一己的贫困，满足我一己的“安富尊荣”。由此出发，我就被帝国主义和他在中国的走狗所俘虏了：我依赖美国教会，苦苦求读于一个教会学校；我考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我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我投靠过反动统治阶级；我曾一度充当反动派的官僚。至此，我和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完全一致了，我从一个被剥削、被压迫者变成一个剥削者、压迫者。于是我完全迷失了自己的前途。

像我这样的人是不算少的，他们口头上说的是“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一切为了自己——个人主义。这是很多留学生从思想到生活的公式。这公式体现了解放以前的政治学系教授的思想。

解放以来的两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人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两年来，人民期待着我们的觉醒，学生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课程改革，我们自己也感到有重新学习的必要。

解放以后我们的教学内容东西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是那个骗人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了，而应该是这个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胜利和幸福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大家都明白了的。因此，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学校的领导下，政治学系的课程有了一些改革。

但两年来，我们进行了一些什么样子的改革呢？

第一，课程的名称改了，而课程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变革或者很少变革。“西洋政治思想史”改为“国家学说史”，但所讲的仍旧是柏拉图、亚理斯多德、卢梭的故事；“比较政府”改为“资本主义国家”，但所讲的主要部分仍旧是英国、法国、美国的政党政治和政府组织，而对于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建筑在这个经济基础上的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没有加以揭露；“行政学”改为“行政组织与管理”，但所讲的仍旧是关于组织、人事、文书、物料的一些零碎的片面的知识。其他的课程如“国际公法”、“宪法”，在内容上仍然保持着旧的一套。

第二，在教学上我们只能从书本上生吞活剥地搬用一点东西，而所搬的也是可怜得很，没有系统。有时，甚至拿人民的敌人拉斯基等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所写的东西来做所谓“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作。

第三，在课程改革的进行中，我们开列了不少新课程，如“马列主义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地方人民政府”，等等。但这些课程，不是没有人来教，就是教的人对它没有很好地进行过研究。

政治学系的改革工作进行得这样的慢和这样的少，是有原因的，它和北京大学旧的历史传统分不开的。

但是有些教授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他们认为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得相当的快，相当的多，并且有了很好的成绩。我以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以为这个思想障碍如不去除，我们是不能前进的。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对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是陌生的，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彻头彻尾是资产阶级的，我们至今或多或少地还服膺着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新鲜事物还缺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能力。我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我们应该承认，两年来我们所做的改革工作仅仅是一些形式主义的改革。人民所需要的

不是这样子的改革，而是彻底的改革。

一个郑重地对待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应该是谦虚的谨慎的。但是我们系里的有些教授对自己的所谓“外国知识”却抱有一种不正确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虽然没有革命的斗争经验，对中国问题不了解，但是却有“外国知识”，搞外国问题是有办法的。因此以国际问题的“理论家”自居，并在同学中提倡什么“英国专家”、“法国专家”……人民不要像我们这样的“理论家”。人民所要的是真正的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家。

毛主席早就对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指出了—个办法：“回到实际研究中去。”（见“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第七页）两年来我们联系实际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是由于满足于那种形式主义的改革，有些教授对政府业务部门一年来所给予我们的协助是不加以重视的；对于如何培养国家政权工作干部的问题也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他们认为那是短期训练班的任务。

口头上说理论要和实际—致，而在行动上却服膺着那条资产阶级的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这便是政治学系教授的思想现状。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政治学系的教学工作改进得这样的慢和这样的少，关键决不在于“没有教材”。关于国家的学说，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宝库里是丰富极了。关于政权工作也是这样。问题在于我们对新东西不喜欢学习，或者不善于学习，或者学得不够努力。

问题的关键决不在于“没有可聘的教授”（久经锻炼的革命家在我们的国家里是很多的），而在于我们把自己的“学术权威”估计得过高，把革命斗争经验估计得过低。系里除钱端升院长、许德珩教授和吴之椿教授外，其余教授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生，都曾到过英国留学，又都是拉斯基的—门生。就是这样，我们结成了一个小小的宗派。我们不欢迎校外的人士和新力量加入到我们系里来。我们看不起人家。我们关起门来读自己的书，希望“只此一

家，别无分店”。同时，这里还必须指出，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宗派里，曾长期存在着无原则的纠纷，各怀“心思”，影响了工作。在这一点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要负责的。

问题的关键决不在于“得不到联系实际的机会”。人民政府已为我们准备了种种条件。例如，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彭真副主任在《关于政法工作的情况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中，就有“对各大学政法学系课程改革，应予以协助”一条。因此，我反对“等待政府来团结我们，我们不主动与之联系”的那种实际上是拒绝改革的思想。

问题的关键也不在像法学院钱端升院长所说：“旧的不先除掉，新的是进不来的。”我们不是机械的阶段论者。旧东西是不会简单地自行消灭的，新东西也不是简单地自流自发生长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进行思想改造上。

根本问题是我们的思想问题。因此，我完全同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的意见。他说：“如果高等学校的教师们还是服膺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还是固执着自己的个人主义、客观主义和宗派观点，而得不到确实的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诸如院系的调整、课程的改革、教学法的改进等等，都是难于进行和贯彻的，一切关于改革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难免成为具文。”（见学习第五卷第一期）两年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经验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龚祥瑞：《彻底清算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教学思想》，载《人民日报》1951年12月8日。

12月13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行的“近、中东问题”座谈会。

【（新华社十四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十三日晚举行“近、中东问题”座谈会。会议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周鲠生、邵力子、胡愈之、钱端升、梅汝璈、冀朝鼎、周培源、涂允檀、张

炯伯、刘泽荣、雷洁琼、黄药眠、廖梦醒、屈武、徐寿轩、冯宾符、梁纯夫、孟宪章、高集、吴茂荪等一百三十多人。主席宣布开会后，首先由曾经留学埃及的北京大学教授马坚扼要地介绍了近、中东和北非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概况，他在发言中强调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于埃及人民和近、中东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鼓舞作用。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国际法专家周鲠生继起发言，他在简要地回溯法、英帝国主义者相继掠夺埃及的历史后说：埃及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奴役的斗争与整个近、中东问题有密切的关系。这一斗争必然会推动阿拉伯国家人民的斗争，使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为打倒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而斗争。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邵力子在发言中指出：近、中东人民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我们中国人民对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都寄予无限的同情与关怀。我们完全支持这些国家人民的斗争。埃及人民的斗争还只是一个开端，严重的斗争任务正摆在埃及人民的面前。埃及人民今后还须准备克服一切困难，长期地坚持下去。我们深信他们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胡愈之、钱端升相继发言，他们一致指出：近、中东人民反帝运动的新高涨，是发生在美英帝国主义战争集团正在东西两方加紧准备战争，特别是在地中海和中东方面企图组织所谓“中东司令部”，把中东各国变为侵略基地，并驱使中东人民充当炮灰的时候，其意义是非常巨大的。这一斗争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无疑地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事业是有贡献的。我们应采取一切方法给他们以援助，特别是介绍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经验以及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具体情况。这将更有效地揭穿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和挑拨，从而更加强和平民主力量的团结。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梅汝璈等，梅汝璈介绍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关于近东和中东的决议。

最后，主席张奚若在总结发言中着重指出：近、中东和北非人民的反帝斗争，增强了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斗争虽然艰苦，但前途必然是胜利的；中国人民完全同情并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

——《我人民外交学会举行“近、中东问题”座谈会 大家发言一致表示支持埃及等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载《人民日报》1951年12月15日。

12月18日

钱端升担任“北京市教育工作者政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本报讯）据北京市新闻处讯：北京市中、小学教育工作者一万零四百余人，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和北京市教育工会的直接领导下，在十一月初旬展开了以改造思想、改革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学习方法是通过阅读文件和听报告，联系各人的具体思想和各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时间定为两个月，在课外进行，不妨碍正常的教学工作。

两年多以来，北京市教育工作者，经过了各种学习，又经过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在政治思想上已有了不少的进步，学校教育工作也得到了改革和提高。但是这种进步和改革还远赶不上国家建设的需要，也落后于学生的要求。有些教育工作者仍有超阶级超政治的思想和单纯业务观点，甚至有人还存在着封建、买办和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残余。这些思想严重地阻碍着北京市教育工作的改进。因此，这次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对各种错误的思想进行严格的批判，对各种反动的思想加以彻底肃清，使全市教育工作者初步站稳革命的立场，以便进一步改革和提高我们的教育工作。

为了具体领导这个学习运动，“北京市教育工作者政治学习委员会”已经成立，由吴晗副市长担任主任委员，廖沫沙、翁独健、钱端升、侯俊岩担任副主任委员。各中学和各区也分别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各小学以工会基层组织为基础成立了“基层学习委员会”。校、区学习委员会受市学习委员会领导，基层学习委员会受区学习委员会领导。

学习开始前，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曾向北京市全体教育工作者作了一次报告。他对人民教师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存在的思想问题作了详尽的说明和适当的批判，给全体教育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这个学习运动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得到了一些成绩。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部分教师还作了公开的检讨。有些教职员由于政治思想提高了一步，已经积极地在改进工作，学校里也出现了新的气象。但是还有少数人对学习采取冷淡的态度，抱着过关的思想；也有少数人对有关思想改造的若干基本问题认识还不够清楚。针对这些问题，市学习委员会在十二月一日请邓拓同志对全市教育工作者作了《论思想改造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必须是一个自觉的运动，因此每一个人应根据自己的条件，规定在这次学习中所要达到的标准，下定决心，努力改造自己。这个报告使大家明确地认识了学习的自觉性和思想改造的标准等问题，更加坚定了大家改造自己的信心。】

——《北京市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改造思想的学习运动已有初步成绩》，载《人民日报》1951年12月18日。

12月23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担任学校选举委员会负责人。

【（北京市新闻处讯）北京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委员会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出席有主任吴晗，副主任李乐光、薛愚、董汝勤、张鸿舜，委员杨蕴玉、王松声、钱端升、古奇踪、郑芸、田常青、贺翼张、顾德、傅华亭、马玉槐、苏民、崔月犁等十七人（缺席二人：余心清、凌其峻）。会议决定：

一、建立各级选举委员会。依据各单位具体情况由市选举委员会各委员分别负责筹备建立以下八个选举委员会分会：

- （一）党派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薛愚；
- （二）群众团体选举委员会负责人：杨蕴玉、王松声；
- （三）工人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张鸿舜；
- （四）学校选举委员会负责人：钱端升、古奇踪、田常青、郑芸；
- （五）区域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董汝勤、顾德、贺翼张、苏民；
- （六）工商界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傅华亭、凌其峻；
- （七）机关部队选举委员会负责人：余心清；
- （八）宗教界、少数民族、烈军属选举委员会负责人：马玉槐。

在以上各分会下，另根据各单位具体情况成立选举支会。

二、各级选举委员会，尽快于两三日内成立，并将选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市选举委员会汇报，以便商讨解决。

此外，并已设立市选举委员会办公室，下设秘书、组织联络、宣传三组，即日起在中山公园市协商委员会秘书处办公。】

——北京市新闻处《北京市建立各级选举委员会 筹备第四届各界代表会议选举工作》，载《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6日。

12月28日

罗常培发表《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提及他和钱端升之间关系的紧张。

【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兼中国语文学系教授 罗常培）

解放以来，我对于自己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也曾发表过一些言论或文字。起初，我曾经自己以为抱着“超阶级”的思想，并且丝毫不懂从发展看问题。只知道固步自封地保守着所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北大传统”，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精神，简直是茫昧的。后来经过群众的教育和勉励，学习初步的政治理论，又自以为了解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建立了群众观点，懂得了民主集中制和统一战线等问题。

自从知道了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后，更大言不惭地说：“恢复了阶级意识，确认了阶级立场。”其实，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既不是这么容易，也不能这样速成。这次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展开政治学习，先后听到了周总理和彭真同志诚恳、深刻的报告，又读了毛主席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会词，越发使我觉得过去两年只是口头说说，笔下写写，并没能实事求是地联系自己的行动和具体的工作来切实改造自己。认真检讨起来，我过去和现在的思想意识中还存在着许多很严重的问题。

抗日战争前一年，日本人知道我是满洲人，想利用狭隘的民族主义包围我作汉奸。在我的班上充满着日本拓殖大学一类学校的毕业生，千方百计地引诱我，可是我并没有背叛了中华民族。北京沦陷后不久，我就随着北京大学迁到衡山、长沙、昆明、蒙自，在当时我很以为有了爱国思想和民族立场。但是真正有民族立场的爱国主义者不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不但要反对投降日本的汉奸，而且要反对一切勾结帝国主义出卖祖国的民贼；我固然抛妻弃子地脱离了日伪的统治，可是又糊里糊涂地投入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圈子；苦熬了七年之后，一经美国大学邀请，又高高兴兴地自以为得到“国际荣誉”，实际却跑到了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沾润了洛克菲勒剥削美国劳动人民的余沈，并且妄想在那里寻求“民主”。这就说明了我存在着敌我不分的糊涂思想。

能够严格分清敌我的人才会有明确的人民立场。我过去总以为一向在学校教书，或者作研究工作，并没有陷入政治的漩涡。其实一切教育和学术是离不开政治的，在反动政府主持下的学校或研究机关工作，除了少数参加革命的以外，直接或间接都起了一些反人民的作用。拿我自己来说，在北京，在昆明，一向对自己标榜着“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对学生一方面鼓励他们竞争官费留学生的考试，一方面劝告有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多念书少管“闲事”！况且，一九四二年我为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曾经搭顾毓琇的便车到过一次大理，后来伪教育部又发表我作“东方语文专门学校”的委员，我虽然没

参加过任何筹备工作，可是昆明的朱家骅党徒恐怕我被CC拉去，曾经拿国民党中央党部边疆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头衔来引诱我，劝我入国民党，当时被我骂退了。随后，朱家骅又接二连三地写信劝我入国民党，利用小资产阶级喜欢受人奉承的弱点，经他百般恭维，我就虚与委蛇。以后，我虽然没填表，没宣誓，没交党费，没参加过任何活动，也从来没登记，又没答应朱家骅拿调查少数民族语言作饵，引诱我到新疆，但是，对于入党的事并没公然地严词拒绝。无可讳言地，我在皖南事变后，当斗争很尖锐的时候，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两年我还给西南联大国民党支部办过两次文史讲演会。我对他们虽然提出了条件：一、不给国民党作宣传；二、不得干涉讲演内容；三、不得限制讲员人选。但也替他们号召一部分青年来听讲，起了帮闲的作用。

一九四三年春天，昆明各大学的十位教授应李根源先生的邀请到大理“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去讲演，我也在内。这十个人现在大部分参加了人民的行列，可是其中也有一个现在不知去向的中统特务蔡维藩。再从所谓“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本质来看，团长由蒋匪介石自兼，宋希濂兼教育长，完全是一个反动派统治下的军事特务机构。我的目的虽然想借机会调查少数民族语言，讲演的范围也没出了本行以外，可是在作用上又一次给反动派壮大了声势。所以在解放前，我确乎给反动统治阶级起了几次帮闲的作用，既然不能算是“超阶级”，更不该自命“清高”！

解放以后不久，我颇以为懂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意义，不过没有实际斗争的经验，一遇到具体的问题就会露出马脚。现在让我举两个例子：第一，在抗美援朝运动还没有正式揭开的时候，曾有两位同志来问我的意见。我当时一方面不了解敌我的情况，没有坚决的革命乐观主义；另一方面搬出毛主席过去所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几句话，完全没能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发挥新爱国主义，并且多少含有“恐美”的情绪，和希望“太平”的思想。第二，从前我也晓得反动的外国传教士是帝国主义的先遣队，可是，当我审查马学良所作“撒尼彝语研究”序文时，对于其中的严重错误竟自熟

视无睹，让它照样付印，以致两人同样犯了很大的错误！不但如此，正在那部书快要出版的时候，我还利用耶稣会教士何大化替汤若望辩解的文件作了一篇“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补”，题目中的“贡献”两字既不妥当，文章里又把那份文件叫做“昭雪汤若望文件”，对于杨光先斗争汤若望的经过又题作“杨光先诬陷汤若望案的概略”……尤其犯了认敌作友的错误。那篇文章虽然没有公开发表，可是由此很可以看出我自己思想混乱的一斑。假若我有明确的人民立场，划清敌我界限，无论处理事情，运用材料，都不会发生上面所说的那样结果。

至于工人阶级的立场是我们这次学习的目标，更要经过严格的思想斗争，长期的实践、锻炼才可以达到，并不能一蹴而就的。解放以前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思想意识，解放以后又自以为从十八岁起就以脑力劳动所得作主要生活的来源，因而俨然以工人阶级自居。其实，划分了阶级成分不等于改变了阶级意识。因为工人阶级应该大公无私，互助互爱，不应该尔诈我虞，互相猜忌。过去两年来，我对于汤用彤先生主持北京大学前校务委员会时期所表现的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能发挥计划性、积极性的敷衍、拖延的作风，心里很不满意，可是并没抱着互助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当面劝告，却在背后乱批评他。这完全是自由主义的旧习气，绝对没有工人阶级的修养。我想正在改造中的旧知识分子如果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镜子自己照一照，一定有好些位可以发现和我有类似的面孔，或许更丑恶一点儿。此外，我和钱端升先生共同办过一次北京大学教职员联合会，一次北京大学工会，我们俩不单没发生过阶级友爱，反而减低了旧日的交情。原因是他既主观，我也自大，而又不能彼此说服、帮忙，以致两年来除在公共场所见面外，没有互相访问过，也没通过一次电话。这样不合作的主席和秘书长，如何能搞好工会呢？至于我在北京大学中国语文系，对于唐兰教授过去处理系务的作风不满意，但是不能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来批评他，帮助他，反而用轻薄的口吻去打击他，尤其是无原则的纠纷，犯了狭隘不能容人的错误。

工人阶级是应该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但是我经北京大学教职员联合会推举作福利部长的时候，却一再坚辞，后来虽经群众说服，勉强担任，终于没做出什么有关本阶级利益的事情来。工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从各方面，尽一切方法，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福利部正是可以发挥这种巨大作用的机构，而我所以要坚辞，无非怕因为担任这件有关集体利益的工作，妨碍了个人的业务，影响了个人的身体。这纯粹是从个人出发，没有组织观念的具体表现。

工人阶级应该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伟大的胸怀和气魄。他们看清楚了社会发展的前途，追求着人类光明的远景，为着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且准备着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斗争；同时，他们的理想虽然远大，工作却非常切实；遇到困难设法克服，有了问题冷静地分析、解决，绝没有狂热、急躁、灰心、失望的毛病。至于个人的地位、名誉，眼前的鸡虫得失，微末的身边琐事，在有修养的工人阶级哪里还有工夫计较呢？但是，我自己主要的病根就是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解放以前如此，解放以后还没消除。我喜欢别人奉承，因此解放前曾经误入歧途；不肯虚心接受批评，因此得不到群众的真正意见。好跟别人计较高低，由于地位的私欲作祟；好逞能、好表现，由于好名的孽根未拔。稍有所得，就沾沾自喜；小不如意，便盛气凌人。对于青年干部有封建家长和旧式塾师的作风，只能强迫命令，很少说服教育。对于一般同事往往“以讦为直”，恶语伤人，而不能从原则上帮助他们去克服弱点，改正错误。至于教书和办事，从表面上看，好像是颇能认真负责；仔细检讨起来，却处处没能忘我。因为是我教音韵学、语言学，所以总想比别人教得好，因为是我领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以总想比别人有成绩。最近听见有人批评我说：“如果北大跟别的机构有矛盾时，他一定站在北大一边；文科研究所跟北大其他单位有矛盾时，他一定站在文科研究所一边；一旦语言研究所跟文科研究所发生矛盾时，他就会站在语言研究所一边了。”这种本位主义的私心，我的确还没克服掉。一九五〇年国庆节为了各少数民族语言录音

事，我跟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季羨林主任发生争执，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假如大家工作的目标都是为人民服务，又何至于彼此误会呢？还有急躁、褊狭是我第二个严重病根，无论在说话、作文、处事、接物的哪一方面都表现着这种毛病；就是高血压的病征也是跟褊急的性情互为因果的。有了工人阶级修养的人，眼光远，胸襟宽，遇事对人可以应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去观察、分析、解决，哪里会急躁褊狭呢？

工人阶级应该继续不断地研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了革命事业随时增进自己的理论和能力。我呢，只有在北京大学担任政治课的一年，在“师生互助，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下，读了一些初步的政治理论书，作了几次背诵教条、不能联系实际启发报告；以后总因为业务占了大部分时间，没能继续不断地研究政治理论。直到现在，不单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一类的经典著作还没敢摸，连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连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没能结合各种文件去仔细精读！要想改造自己，而不能有计划地研读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随时联系到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那怎么能够有预见地教育后一代或领导研究工作呢？

因为立场站不稳，自然就不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照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所分析，我应该属于“为着个人的生活，而为人师”的一类。过去也偶尔发生一些正义感，不满意于反动统治和自己的境遇，但是没有反抗的决心，并且多少在客观上推行了国民党的反动教育。有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地位还会不知不觉地维护旧制度。这正如斯大林与威尔斯的谈话中所说：“旧制度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站在自己方面，给自己服务，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拥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这一类的知识分子在不至于根本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限度内，有时也许表示相当的反抗，一到反动政权快要推翻，影响了个人的生存地位的时候，反倒有所顾惜，不再表示反抗。汤用彤先生作自我检讨时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足见这是我们旧知识分子的通病。我在昆明的一段，一方面跟国民党反动派若即若离，一方面也跟闻一多先生等领导五四文艺晚会，推动了进步的空气，这正可以表现我极端矛盾

的思想意识。恩格斯说：“在任何时候，没有谁可以把矛盾长期掩蔽起来。矛盾须由斗争来解决。”这次展开学习以来，我不断地反省、自讼、实行思想斗争，现在坦白地暴露出来，更希望得到群众的帮助，使我可以向前推进一步。

思想意识是跟阶级性分不开的。在我所揭发的许多思想意识中，像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动摇、急躁、惧怕严重的斗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至于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和个人英雄主义那就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性了。从前我总以为从十八岁起就靠作速记技士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后来也一直在中学或大学教书，到现在还是一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市民，而且三代以内都是“吃钱粮”的军人，并没作过大官；照阶级成分来划分，自认可以算是一个脑力劳动的工人，即使作过多年的教授，生活比较优裕，顶多也不过是个小资产阶级，哪里来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呢？要是冷静地分析一下，就不然了。从前满洲人管钱粮叫做“铁杆儿庄稼”，因为农民的收获还怕旱涝蝗虫，而旗人不论年成好坏，都可以按月有饷，按季有米。这句谚语充分可以表现我的上辈曾经是不劳而获的。我所残余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就是从这个根源孽衍出来的。四十年来受了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在我的青年时代老存着自卑心理。那时曾经给人写信说：“余以孤臣孽子之意结，时存力争上游之壮志”。这足以表现我因为受压迫而极力想往上爬的情绪。及至后来靠着一些跟改善人民生活无关的知识，爬到了相当的地位，那种自卑心理又一变而为自尊心理，这样一来，更助长了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这种思想意识绝对不是工人阶级所应有的。

我们如果不能坚定革命的立场，以正面的革命行动来彻底澄清以上这些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不单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作个很好的人民教师或科学工作者，就连这次学习也恐怕不能深入。要想决心改造，我们就先得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毫无留恋地否定过去，丢掉包袱；然后有系统地研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深入群众中体验劳动人

民的生活，依靠组织，接近革命人民，坚定地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我们在教学上引导下一代走上更发展的前途，在科学研究上随时配合着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并且要有迎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见。我们不要妄想作尼采所假设的“超人”，也不要妄想作易卜生所描写的“人民公敌”；我们只应该向群众学习，在革命的伟大事业中作一个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的“无名的细胞”。必须如此，我们脑力劳动者才可以名副其实地转换成工人阶级。不过这次学习只是我们除旧更新的转折点，要想彻底改造还得靠着以后许多实际工作来长期考验。假若有人在实践上经不起考验，那就表明他并没认真学习，并没完成思想改造的任务！】

——罗常培：《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载《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8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第三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了“关于提案审查的报告”。

【（北京市新闻处讯）北京市第三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昨（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开幕。这次会议内容，主要是讨论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问题；经过这次会议，进一步动员全市人民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大会开始后，由市协商委员会主席彭真作报告，彭真主席首先报告了今年全市的增产节约成绩。他说：全市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已经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做出很多成绩。仅据二十个国营工厂和矿场的统计，共已为国家节约了三千六百三十五亿元的财富。私营工业增产数量也在三千多亿元以上。市郊农产一般较去年多收了半成到一成。关于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问题，彭真主席说：北京市群众性反对贪污、反对浪费运动已初步展开，有些有贪污行为的工作人员已在本单位坦白，市人民政府已经收到不少检举贪污的信件；工商界已开始发动反贪污、反行贿的运动。运动的规模是很大的。但是作为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说，这个运动在目前还是不够深入和普遍的。彭真主席在报告中并分析了产生贪污现象的原因，

指出了对于贪污现象应抱的正确态度。他说：我们决不能纵容贪污，我们只能坚决消灭它。关于如何进一步开展运动，彭真主席提出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同级机关互相检查和发动各方面群众检举等办法。彭真主席说：有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有大批久经锻炼、廉洁奉公的干部作骨干，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是一定能够把贪污现象铲除的。此外，彭真主席还对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危害性进行了分析。他说：生活上的铺张浪费是接近于贪污的，而官僚主义作风就是产生贪污、浪费现象的温床，都必须在这次运动中加以肃清。彭真主席号召有贪污浪费现象或行贿行为的人，自己坦白，自己检讨。他号召全市人民检举贪污分子，协助人民政府，彻底消灭贪污浪费现象。

彭真主席报告之后，市抗美援朝分会主席张奚若作了关于北京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报告。他说：全市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受到了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教育。签名拥护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有一百六十九万五千五百三十八人。投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有一百六十九万四千五百六十三人。签订爱国公约的有一百四十万二千四百八十五人。各界人民的武器捐献计划已经超额完成。到十二月二十五日为止，实际缴款的已达一千二百七十一亿元，可买战斗机八十四架，超过原来认捐数目百分之二十二强。张奚若主席在会上宣布：捐献工作已胜利结束。他希望各单位认真总结这一工作，吸取经验，以便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他说：为了继续加强抗美援朝，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必须继续广泛与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检查修订爱国公约；做好优待烈属、军属等工作；最主要的是大规模地展开增产节约运动。

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晗在会上作了“关于筹备北京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工作的报告”。他说：市选举委员会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成立后，已经开始工作，根据去年代表选举工作的经验，决定：第一，要提早准备选举工作，在新年以前，普遍建立各级选举委员会，各单位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可以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从容

地进行选举工作；第二，各级选举委员会都要建立宣传机构，运用报纸、电台广播和报告会等方式，结合国家的中心任务和首都的各项建设工作，有计划有系统地大力宣传代表会议的职权和代表的任务；各级选举委员会不但要做好选举工作，而且要通过这项工作，进一步提高广大市民的政治认识，加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人民首都建设事业的关怀；第三，健全各级选举委员会，加强领导，要求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建立定期的汇报制度和检查制度。

市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在会上作了“关于提案审查的报告”。他说：为了更缜密地审查提案和节省大会时间，这次会议采取了会前征集提案、由协商委员会组织专门小组准备审查意见的办法。这次会议共收到提案九百零一件，将性质相同的案件合并后，成为二百九十四件。审查提案时，协商委员会的各专门小组和审查委员会均与主管部门反复协商，然后提出审查意见。对于提案的处理，审查委员会建议：凡涉及重大问题的案件，提交大会讨论；应当办又可能办的案件，分别送请市人民政府、市协商委员会核办；应当办而不能即办的案件，分别送请市人民政府、市协商委员会注意、参考；不能办的案件即一律不送交市人民政府。

接着，由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思成提出了关于首都建设计划的初步意见，在他发言之后，大会即休会。下午举行分组讨论。今日上午继续分组讨论，下午举行大会。

昨日大会出席代表共三百九十三人，大会执行主席为聂荣臻、刘仁、余心清、林汉达、林砺儒、陈垣、朱长江、杨蕴玉。来宾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邵力子等。】

——北京市新闻处：《讨论开展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运动 京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 彭真主席号召全市人民检举贪污分子》，载《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9日。

12月30日

北京市第三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幕。

【（本报讯）据新华社讯：北京市第三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历时三天，已在三十日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全市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决议。大会主席彭真在总结报告中又反复说明必须发动群众大张旗鼓进行这个运动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了分别不同情况处理贪污、行贿分子的办法。在大会进行期间，石景山钢铁厂工人进城向大会报告了提前超额完成本年生产任务的喜讯。

会议在二十八日开幕。全体代表以一天半的时间分组深入讨论了各界特别是工商界如何开展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有四十一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交流了各方面对开展运动的要求和办法。各国营企业单位的代表报告了各该单位的增产节约的成绩和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情况。工商界代表在发言中揭发了许多不法工商业者的行贿漏税行为，和偷工减料骗取国家财产的行为，号召各行业的负责人亲自负责推动本行的坦白和检举。工人代表对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极为痛恨，他们表示一定要在这次运动中把这些不良倾向一齐扫除。五金业工会有的工人代表提出设立检举箱，以便人民群众进行检举。农民代表在发言中揭露了市郊农村中存在着的贪污现象和某些村干部的贪污行为。并指出在郊区农村中浪费现象也是很严重的，应该坚决反对。青年、妇女和文化教育界的代表也纷纷表示要进一步开展这个运动。妇女代表号召妇女群众一致行动起来，规劝有贪污、行贿行为的父兄、丈夫、子弟赶快向人民坦白。（发言摘要见第三版）

大会主席彭真根据大会讨论逐一做了总结。他对北京市抗美援朝工作做了概况的估计后，并指出必须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目前是要做好武器捐献结束工作。关于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问题，彭真说：市、区代表要一同选举，这样做可以省时省力，便于领导。在选举时要充分宣传酝酿，充分发扬民主。

彭真在总结中指出：增产节约是我们明年最中心的任务。他说：北京今年增产节约虽然有很大成绩，但是各国营企业潜在能力还很大，因此限定各

厂最近订好明年具体的增产节约计划，以便在下次各界代表会议上讨论。郊区农业增产要注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种稻的要向第十三区西苑农民许德明每亩产稻一千零六斤看齐；种棉的要向第十三区大钟寺棉农狄桂林每亩旱地产棉四百一十五斤看齐；种花生的要向第十四区黄军营村农民王桂敏每亩产花生六百五十二斤看齐；种白菜的要向第十三区东冉村农民沈铎每亩产白菜两万零九百七十七斤看齐。私营企业同样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过去有些资方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只强调增产节约，而不积极扩大生产和注意改善工人生活。因此他指出：要劳资双方根据“两利”原则，具体解决私人企业中的增产节约问题。又因为已发现有的私立学校以节约为借口，降低学生生活的情形，因此他特别指出，在厉行节约中必须同时注意不影响工作不损害身体健康的原则。

彭真强调指出：从会议上四十一个代表的发言中，充分证明毛主席的指示的英明。对于贪污和浪费现象，我们的态度只能是坚决消灭，不能是别的。根本消灭贪污的办法，是开展群众性的反贪污运动，我们现在要号召有贪污、行贿行为的人赶快坦白；并给他们一个自动悔改求得宽大处理的机会。并指出坦白要老老实实地把全部问题交代清楚，真正悔改。这样政府即可从宽处理；拒不坦白的，政府将依法严加惩罚。彭真说：工商界中以行贿收买税务人员漏税的，凡是自己坦白的，可以只补征今年的漏税，不再罚款；拒不坦白的，除追缴解放以来全部漏税外，并将照章处罚。前者是只补不罚，后者是又补又罚。对于行贿后偷工减料、骗取公家财物的工商业者，也要同样按这个原则处理。最后，彭真说：市代表会议后，各区马上召开区人民代表会议和街道，农村的群众会议，深入展开宣传，做到家喻户晓，动员全市各阶层男女老少，检举贪污分子，坚决彻底消灭贪污浪费现象，完成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

这次会议还能过了市抗美援朝分会主席张奚若关于北京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报告、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关于提案审查意见的报告、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关于下届会议代表选举工作的报告。

会议作出了关于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和开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决议。此外，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张晓梅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北京市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专题发言。】

——《京市三届三次人民代表会议闭幕 彭真主席号召发动群众坚决消灭贪污浪费 提出分别不同情况处理贪污行贿分子办法》，载《人民日报》1951年12月31日。

1952年（52岁）

2月7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欢迎亚马多和吉里安招待会。

【（新华社七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七日晚举行欢迎会，招待前来我国访问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得奖人、巴西著名作家亚马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古巴诗人吉里安。出席欢迎会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员周鲠生、陈翰笙、邵力子、钱端升、梅汝璈、张炯伯、屈武、刘贯一、吴茂荪、孟宪章、马坚、金克木等一百四十余人。首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致词，对两位著名的和平战士的来临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中国人民与巴西、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之间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亲密友谊必将因亚马多和吉里安的来访而获得进一步发展。接着由亚马多和吉里安分别报告了巴西、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争取和平、民主与民族独立的斗争的情况。吉里安并朗诵了所作名诗——“一个黑人在纽约歌唱”和“中国之歌”。郭沫若当场和诗一首并亲自朗读。欢迎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结束。

亚马多和吉里安自一月三十一日抵京后，曾访问了北京近郊农村与翻身农民晤谈并赴首都各名胜区游览。】

——《我国人民外交学会欢迎亚马多和吉里安》，载《人民日报》1952

年2月8日。

2月13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二周年座谈会。

【（新华社十三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十三日晚举行座谈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二周年。到会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员张志让、周鲠生、陈翰笙、邵力子、胡愈之、钱端升、王昆仑、曾昭抡、梅汝璈、周培源、屈武、张炯伯、涂允檀、马坚、季羨林、孟宪章、郑森禹、吴茂荪等一百五十多人。

座谈会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主持。张奚若首先阐明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于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重大意义。他强调指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不但把中苏两国人民已有的友谊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也把两国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向共同的目标前进。

继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陈家康报告“中苏同盟与亚洲和平问题”。陈家康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一个制止战争、保卫和平的条约。条约第一条规定：“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两年以来，中苏两国对确保世界和平的事业的确充分贡献了力量。换一句话说，就是这个条约自签订以来就发生实际效力了。

陈家康接着详细分析了中苏两国根据中苏同盟的精神以和平政策处理亚洲诸问题的事情。他说：在日本问题上，中苏两国不断地为缔结全面对日和约和反对重新武装日本而斗争；在朝鲜问题上，中苏两国都为和平解决朝鲜战争而斗争。他指出：中苏两国和世界人民的斗争，使疯狂备战的美帝国主义日益孤立，暴露出它的外强中干。

陈家康最后说：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周年纪念的今天，我们要提高胜利的信心。帝国主义阵营的弱点一天天地暴露出来。只要我们

在国际活动中充分贡献我们的力量，我们必能获得胜利。

接着发言的有：周鲠生、孟宪章、陈翰笙、梅汝璈、周培源、张炯伯、邵力子和郑森禹。他们分别说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于保卫世界和平、打击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和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的意义和作用。大家一致认为：两年来，中苏同盟的力量空前地壮大起来，成为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堡垒。中苏两国人民团结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奋斗，一定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阴谋。】

——《我国人民外交学会举行座谈会 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二周年》，载《人民日报》1952年2月14日。

2月21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欢迎文幼章集会。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二十一日晚举行演讲会，请最近前来我国访问的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文幼章先生讲“加拿大人民为和平而斗争”。出席者有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外交组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员李济深、陈叔通、沈钧儒、邵力子、司徒美堂、李四光、陶孟和、许德珩、许宝驹、周鲠生、陈翰笙、胡愈之、钱端升、梅汝璈、曾昭抡、张炯伯、吴茂荪等二百多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首先致欢迎词。他指出：文幼章先生不仅是世界和平的战士，而且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接着，文幼章即以流利的中国话发表演说称：加拿大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是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现在，美国垄断资本对加拿大经济的控制日益加紧。但是，尽管美国在加拿大进行各种鼓吹战争的宣传，加拿大的和平运动仍然日益扩大，文幼章最后代表争取和平的加拿大人民满怀信心地说，世界和平是可以保持的，而和平力量必将战胜战争。

演讲会始终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我国人民外交学会 集会欢迎文幼章》，载《人民日报》1952年

2月22日。

3月8日

钱端升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我们一定可以打败美国强盗的细菌战》。

【我们一定可以打败美国强盗的细菌战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钱端升

美国侵略者一向是吃人的野兽。这个灭绝人性的野兽经不起中朝英勇部队的打击，既能战，又不愿和，于是大量撒布细菌和苍蝇、蚊子、跳蚤等各种奇形怪状的毒虫。他们妄图以最野蛮的细菌战，来挽救他们在炮火战中所遭受的惨败。但是他们的失败是注定了的。

我们要警告美国侵略者，我们中朝部队和中朝人民，有力量打死你们这些灭绝人性的野兽，也一定有力量打败你们这些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我们中朝部队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广大人民做后盾，不管你们是吃人的野兽也好，是害人的细菌毒虫也好，我们一定将完全的彻底的消灭你们，以确保朝鲜的、亚洲的、全世界的和平，以伸张人类的正义。】

——钱端升：《我们一定可以打败美国强盗的细菌战》，载《光明日报》1952年3月8日，第3版。

3月9日

钱端升发表文章《扑灭散布细菌的美国侵略者 坚决扑灭美国侵略者细菌战的毒焰》。

【扑灭散布细菌的美国侵略者 坚决扑灭美国侵略者细菌战的毒焰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钱端升）

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前线与后方大量散布细菌毒虫的同时，最近竟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扩大到我东北地区，妄图挽救其最后的惨败。这一行动又一度暴露了美国侵略者是极端野蛮的，也是万分脆弱的。

细菌战是为有美国参加的一九二五年日内瓦公约所禁止的。在过去，连

魔鬼希特勒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进行细菌战；连万恶的日本军阀也不敢公然进行，而只能偷偷地进行。美国侵略者今日竟敢在朝鲜和我东北疯狂地进行细菌战，不但说明了美国侵略者比纳粹德国，比日本军阀更要野蛮，更没有在国际社会中过生活的起码条件，也说明了美国侵略者已涉灭亡，所以狗急跳墙，最后要乞灵于蚊子、苍蝇、跳蚤、毒虫，要倚靠这些“救兵”来保全他们的狗命。

英雄的中朝人民有信心也有决心扑灭毒虫，并进而扑灭依靠毒虫的美国侵略军。我们要警告杜鲁门、李奇微、范佛里特等等一群恶魔，你们是逃不了全人类的正义的裁判的。】

——钱端升：《扑灭散布细菌的美国侵略者 坚决扑灭美国侵略者细菌战的毒焰》，载《人民日报》1952年3月9日。

3月20日

钱端升前往车站欢迎国际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

【（新华社二十日讯）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派往朝鲜调查美国侵略者暴行真相的调查团，在胜利完成调查工作后，已于二十日抵北京。

前往车站欢迎的有：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筹备会筹备委员沈钧儒，谢觉哉、史良、张志让、钱端升、王昆仑、雷洁琼、楼邦彦，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秘书长刘贯一，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国际工作部副部长廖梦醒等三十人。】

——《国际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抵京 北京中外记者团抵沈阳调查美帝国主义在东北撒布细菌的罪行》，载《人民日报》1952年3月21日。

3月22日

钱端升参加首都各界代表欢迎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座谈会。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北京市法律工作者和各界人民代表在二十二日晚集会，欢迎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派往朝鲜调查美国侵略者暴行的调查

团以及和调查团一起到中国来的朝鲜最高检察所副检察总长蔡圭亨。欢迎会由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筹备会主持。

参加欢迎会的有首都法律工作者、各人民团体代表、教授、学者、专家和卫生医药工作者沈钧儒、谢觉哉、陈叔通、马寅初、贺诚、史良、蓝公武、张志让、张奚若、钱俊瑞、钱端升、吴溉之、胡愈之、萨空了、雷洁琼、楼邦彦、沈兹九、廖梦醒等六百多人。

以布兰德魏纳为首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朝鲜最高检察所副检察总长蔡圭亨在掌声中进入会场。

欢迎会开始后，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筹备会筹备委员、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沈钧儒致欢迎词。他首先代表中国法律工作者对调查团为了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全不辞艰苦进行调查，表示感谢和崇敬。他指出：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是对全人类的一个严重威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一致起来大力制止这种滔天罪行。调查团在朝鲜的调查和调查结果所将发生的影响，就是制止这种罪行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调查团即将前往我国东北调查，这对于制止这种罪行，将有更多的贡献。

调查团团团长、奥地利法学教授布兰德魏纳致词。他说：调查团在朝鲜就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事实进行了调查，并已经得到了不可辩驳的证据。他指出：美国侵略者的这种行为违反了海牙公约和日内瓦议定书，违反了代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保卫和平大会的宣言。美国的这种罪行是对全人类犯下的罪行。他最后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调查，会对朝中人民的为和平、自由和正义的斗争有所贡献。

调查团副团长、意大利著名律师卡瓦莱里在讲话中详细地报告了美国侵略军使用毒气的事实。他指出：美国侵略军不仅使用毒气而且还使用细菌武器对付和平人民。他说：应该向全世界揭露美国侵略者的这种罪行，并设立法庭来审判这些违反国际法的人。

调查团团员、巴西法学教授狄布里托在讲话中痛斥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罪恶行为。他指出：现在人类前途遭受了威胁，

民主法律工作者必须团结全世界人民，为和平而斗争。

英国律师加斯特尔发表了动人的演说。他说：我在朝鲜看到了美国侵略者的许多恐怖、野蛮的兽行，但仅仅看到是不够的，只有全世界人民起来制止杀人犯的手，否则恐怖和野蛮是要扩大的。我们必须积极地为保卫和平而斗争。

法国律师贾斯盖说：美国侵略者的罪行不仅违反国际法，而且违反了全世界的良心。整个世界现在已经受到威胁，我回到法国后，要向一切诚实的人民报告我所看到的和证实的事实。

比利时律师莫伦斯夫人报告了她在朝鲜所看到的强烈对比：美国侵略者的野蛮残暴和朝鲜政府对人民的爱护和照顾。她赞扬朝鲜人民的英勇和乐观主义精神，并指出：这样的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波兰法律工作者华西尔考夫斯卡夫人代表波兰法律工作者和波兰妇女向中国人民致敬，并对美国侵略者的罪行表示抗议。她说：美国侵略者一定会被各国人民的团结力量击败，战争罪犯必将在正义的人民法庭前受到应得的惩罚。

朝鲜最高检察所副检察总长蔡圭亨最后讲话。他指出：美帝国主义为了想征服朝鲜人民，进行了残酷的破坏和屠杀，但是朝鲜人民没有被征服。于是，它违反国际法、违反人道，使用了毒气和细菌。可是，就是这样，朝鲜人民也还是不可被征服的。朝鲜人民紧密地团结在金日成将军的周围，一定要争取最后的胜利。

欢迎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会后，由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演出文娱节目招待调查团。调查团即将前往东北，调查美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

——《欢迎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 首都各界代表昨举行盛会 布兰德魏纳团长谴责美国撒布细菌的罪行》，载《人民日报》1952年3月23日。

3月26日

钱端升担任北京市人民法庭审判员。

【(本报讯)据新华社讯: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二十六日举行会议,讨论在“五反”运动中和“三反”运动中建立人民法庭的问题。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会议首先决定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成立处理“五反”运动中违法案件的市人民法庭,并在城内九个区各设立一个分庭、市郊七个区共设立一个分庭,来处理“五反”运动中工商户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案件以及其他应经审判程序处理的案件。会议通过了市人民法庭及其分庭审判长、副审判长和审判员的任命。

同时,为了处理“三反”运动中应经审判程序处理的案件,会议又决定:在市人民法院领导下,按地区和行政系统设立十五个临时分庭。

北京市人民法庭由审判长王斐然;副审判长张鸿舜、乐松生;审判员钱端升、程宏毅、浦洁修、杨伯箴、杨蕴玉、亚子周、李超、吕岱等十一人组成。

(北京市人民法庭及其分庭的审判长、副审判长和审判员全部名单见今日本报第二版)】

——《处理工商户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等案件 北京市人民法庭正式成立 人民法院领导设临时分庭处理“三反”案件》，载《人民日报》1952年3月27日。

【北京市人民法庭

- | | | |
|---------|-----|-------------------------------------|
| 审 判 长 | 王斐然 | 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 |
| 副 审 判 长 | 张鸿舜 | 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 |
| | 乐松生 | 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
| 审 判 员 | 钱端升 | 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
| | 程宏毅 | 北京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
| | 浦洁修 | (女)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
| | 杨伯箴 |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书记。 |
| | 杨蕴玉 | (女)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

亚子周 店员。

李 超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秘书主任。

吕 岱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科长。】

——《北京市人民法庭及其分庭的审判长、副审判长和审判员名单》，载《人民日报》1952年3月27日。《光明日报》3月27日第1版亦刊登此消息。

3月28日

钱端升前往车站迎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为全世界人民所瞩目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在我国东北完成调查美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使用细菌武器罪行的工作后，已于二十八日下午六时十分返抵北京。

到车站欢迎的有法律工作者和人民团体代表沈钧儒、陈叔通、钱端升、阎宝航、刘贯一、廖梦醒等。

调查团在到达我国东北后，紧张地进行调查工作，已收集到美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使用细菌武器的充分罪证。该团即将提出报告，向全世界人民揭露美国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调查团在东北完成任务后返京》，载《人民日报》1952年3月29日。

4月1日

钱端升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欢送国际民主法协调调查团集会。

【（新华社一日讯）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派到朝鲜和我国东北调查美国侵略者暴行的调查团，定于二日离北京返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特于一日下午七时半举行宴会欢送。随同调查团到中国来的朝鲜最高检察所副检察总长蔡圭

亨，和正在我国访问的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文幼章夫妇等也应邀参加。

出席欢送会的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副主席彭真，以及首都法律工作者、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代表林伯渠、何香凝、吴溉之、张志让、蓝公武、谢觉哉、王昆仑、章伯钧、马寅初、张奚若、梁希、章汉夫、陈瑾昆、李四光、吴晗、钱端升、史良、施复亮、老舍、朱学范、许广平、雷洁琼、冯文彬等八十多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首先致欢送辞。他说：你们为了调查美帝国主义者细菌战的罪行，不辞跋涉与辛苦，在朝鲜、在我国东北先后进行工作，得到确凿证据，完成调查任务。现在诸位代表先生要回国去了，我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对你们这种崇高的精神与成就，表示最大的敬意与感谢。你们回去之后，必会把你们亲眼看到的美国侵略者所犯的罪恶事实，公之于全世界人民面前，使他们更深切明白对美帝国主义的罪行如不立即加以有效的制止，同样的灾难，明天也将会落在全世界和平人民头上。诸位代表先生们，你们在暴露美帝国主义罪行的工作中可能也会遇到帝国主义分子恫吓和诬蔑，但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也会不惧一切困难，勇敢地斗争下去，因为正义支持着你们，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支持着你们，一定会使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严厉制裁。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副主席彭真说：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疯狂无耻地进行细菌战，这不仅是对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严重的进攻，而且是对全人类正义的宣战。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得到了许多确凿的证据，完全证明了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滔天罪行，也就证明了美国侵略者是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敌的。美国侵略者所给予朝鲜人民的灾难是极为深重的。如果听任美国侵略的火焰继续扩大，而不有效地加以制止，那么，全人类将会遭受多么残酷的祸害？但是我们可以断定，美国侵略者的一切罪恶阴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的。罪恶滔天的美国侵略者，决不能逃脱全世界爱好正义和平的人民所给予的严厉惩罚！在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我们中国人民愿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制止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和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我们相信我们这种团结的力量将成为我们战胜人类公敌——美国侵略者的最大的保证。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筹备会筹备委员、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沈钧儒，在致辞中代表我国法律工作者对调查团的伟大而艰辛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谢，并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调查团团团长布兰德魏纳和副团长卡瓦莱里先后致答辞。布兰德魏纳指出：我们调查团人员在朝鲜和中国东北所得到的关于美国侵略者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将作为铁的事实公诸全世界人民的面前。美国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受国际法的保护，并使用国际法作为武器和美国罪犯们作斗争。我们相信勇敢的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一道，必定能战胜世界上任何敌人。卡瓦莱里说：我们调查团人员快要回去了。我认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只有在回国之后才开始。虽然我们回国之后工作有着种种困难，但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要把我们亲眼看到的中国和朝鲜的情况，以及美国侵略者的暴行告诉本国人民，使那些还未相信的人们相信美国是侵略者。

宴会始终在热烈、友好、团结的气氛中进行。】

——《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欢送国际民主法协调查团 陈叔通、彭真、沈钧儒致词欢送、深信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必将严惩美国细菌战罪行》，载《人民日报》1952年4月2日。

4月4日

钱端升等前往机场欢送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返国。

【（新华社四日讯）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团团长布兰德魏纳、副团长卡瓦莱里，团员加斯特尔、莫伦斯、华西尔考夫斯卡五人，已胜利完

成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调查美军罪行的任务，在四月四日早晨六时乘机离京，将经莫斯科返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钧儒、陈叔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副主席彭真，以及首都法律工作者、人民团体代表张志让、钱端升、史良、阎宝航、刘贯一、柯柏年等亲至机场欢送，参加欢送的还有朝鲜最高检察所副检察总长蔡圭亨、波兰驻华大使馆新闻专员罗步曼等人。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团员狄布里托和贾斯盖已在四月二日离京返国。】

——《国际民主法协调查团昨天乘飞机离北京》，载《人民日报》1952年4月5日。

4月9日

钱端升前往机场送沈钧儒等出席国际法协理事会会议。

【（新华社九日讯）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沈钧儒、理事柯柏年等一行，在九日上午六时搭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维也纳出席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会议。到机场送行的有首都法律工作者和各人民团体代表谢觉哉、史良、张志让、钱端升、吴溉之、张奚若、陶希晋、罗叔章、阎宝航、闵刚侯、廖萝醒、吴茂荪、袁葆华等多人。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会议定于四月十六日到十八日举行。会议将听取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关于美帝国主义者对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报告，并将根据报告作出结论，和通过发表这个报告以及根据调查团的结论采取行动的决议。】

——《出席国际法协理事会会议沈钧儒等赴维也纳》，载《人民日报》1952年4月10日。

4月19日

钱端升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我贡献出一切力量以实现全国工学

院调整方案》。

【我贡献出一切力量以实现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钱端升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去年十一月所拟定的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已经由政务院批准公布，并且正在付诸实施。为了培养大量的高级技术干部，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这是必要的、贤明的措施。我不但热烈地拥护，而且作为一个高等学校的工作者，我要全心全意地为实现这个方案而努力，进而为更全面的院系调整、更深入的教育改革竖立更好的基础。

郭沫若副总理曾经指出，“在五六年内全国经济建设所需高等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十五万人左右。”要培养这么多的建设干部，旧中国的工学院，因为旧，因为乱，因为理论脱离实际，是决不能胜任的；解放以来，高等学校，固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也还不能负起这个任务。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进行高等教育的改革，争取较大较快的进步，而合理的调整院系尤有急迫的需要。依照中央教育部的方案，调整后，工学院一九五二年的新生即可自一万五千名增至二万九千名。仅这一点便可充分说明调整的必要和方案的优越性。而且经过调整之后，师资和设备既然充实了许多，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方面也自然可进有急迫需要的改革，使我们的工学院有更好的条件来培养国家建设干部。今天公布的调整方案，主要的固然以工学院为主，但也涉及文、法、理各院。在文、法、理各院方面，方案中所规定的调整也同样是必要的。为了人民，为了祖国，我保证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以积极实现方案中的每一条规定。】

——钱端升：《我贡献出一切力量以实现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载《光明日报》1952年4月19日，第3版。

5月5日

钱端升出席彭真举办招待来我国观礼和参观的外宾酒会。

【（新华社五日讯）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五日晚举行酒会，招待来

中国参加“五一”节观礼和参观的外宾。出席酒会的有五百多人。

应邀出席的外国工会代表团和工会代表有：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考里班诺夫和桑顿，以谢甫钦科为首的苏联工会代表团，以爱丽娜为首的罗马尼亚工会代表团，以阿伯尔为首的丹麦“五一”节观礼代表团，以赛南德为首的瑞典工会代表团，以尤莱·逊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会代表团，以海尔比希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会代表团，以杨白莲为首的越南工会代表团，以海渥德为首的英国工人代表团，以沙氏、波拉、米特拉为首的印度工会代表团，以莱特为首的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以朴孝斌为首的朝鲜工会代表团，以米笃夫为首的保加利亚工会代表团，以波德哥尔尼克·约瑟夫为首的匈牙利工会代表团，以德洛日支为首的波兰工会代表团，以冈波苏仑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会代表团，以德钦钦素为首的缅甸工会代表团，伊朗工会代表，以慕撒·勃拉汉姆为首的阿尔及利亚工会代表团。

应邀出席的还有：来北京出席四大文化名人纪念会的法国和意大利著名人士法奇及夫人、罗阿及夫人、班菲、潘齐尼、德·桑蒂、智利画家何塞·万徒勒里及夫人和出席国际经济会议之后来我国参观的澳大利亚、英国、锡兰、印尼、缅甸、印度等国的代表也出席了酒会。

应邀出席的还有来中国表演的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

由全国各大行政区来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的劳动模范代表五十多人也应邀出席。

出席作陪的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友渔、吴晗，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刘仁、钱端升，委员彭泽民，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各局、处首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北京市分会主席张奚若、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老舍、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林砺儒、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叶企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以及北京市各人民团体负责人。

应邀作陪的有：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副部长姚依林，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周扬、丁西林，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曾昭抡，中央

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洪深，出席国际经济会议的我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团员冀朝鼎、章乃器、陈翰笙、樊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许德珩、许宝驹、罗隆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刘宁一，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副主席沙千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郑振铎、沙可夫、李伯钊、曹禺等人。

酒会开始时，彭真市长致词说：“今天我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全体人民来欢宴来自各方面的外国朋友们，并且欢送将要离开北京的各位外国朋友们。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人民认为外国朋友们的光临和参加我们的‘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大家在这里团聚不是偶然的，它表示着我们之间的友好精神和坚固团结，表示着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力量的强大不可战胜。我们应该祝贺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友谊和亲密的团结，祝贺我们保卫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日益强大。”彭真接着说：“战争贩子们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我们的友好、团结、合作。现在战争贩子和强盗们为了挽救它们的惨败局面，竟然可耻地乞灵于昆虫、细菌，赤裸裸地违犯人类正义和国际公法使用细菌作战。我们全世界人民应该一致起来制止战争贩子的罪行，只要我们能够万众一心地团结起来，和平的力量一定能够战胜战争。让我们手携手地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之间的团结、友谊与合作，进一步开展保卫世界和平民主事业而斗争。”彭真最后举杯祝来宾的健康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与保卫和平事业的胜利。

酒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会后由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演出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招待全体外宾。】

——《北京市人民政府彭真市长昨举行酒会 招待来我国观礼和参观的外宾》，载《人民日报》1952年5月6日。

5月6日

钱端升应邀参加印度大使举行的招待印度文化代表团的酒会。

【(新华社六日讯)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在六日晚举行酒会,招待印度文化代表团。

应邀参加招待会的还有我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周扬、丁西林,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教育部副部长韦恂、曾昭抡,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其他负责人及北京文化界人士:马寅初、蔡廷锴、张奚若、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李四光、陶孟和、邢西萍、余心清、范长江、陈克寒、陈家康、钱端升、许广平、许德珩、欧阳予倩、沙可夫、洪深、郑振铎、李伯钊以及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共二百余人。

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以及我国前赴印缅文化代表团副团长李一氓也应邀参加招待会。

参加招待会的还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匈牙利驻华大使夏法朗柯、保加利亚驻华大使彼得科夫、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伊沙·玛蒂、越南代表团临时代办周亮、丹麦公使馆临时代办迈思妥、芬兰公使馆临时代办勃朗斯坦特、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古拉,以及荷兰政府谈判代表范德普、挪威政府谈判代表高兰等。

缅甸文化代表团也应邀参加了招待会。

招待会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印度大使举行酒会招待印度文化代表团 朱德副主席等及北京文化界人士应邀参加》,载《人民日报》1952年5月7日。

钱端升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行招待会欢迎印度文化代表团招待会。

【(新华社六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于六日下午举行招待会,欢迎印度文化代表团,并邀请代表团团长潘迪特夫人讲演。

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主持。参加招待会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员周鲠生、邵力子、陈翰笙、张志让、钱端升、何思敬、陶孟

和、罗隆基、王昆仑、许德珩、曾昭抡、梅汝璈、连贯、陈家康、刘尊棋、周培源、雷洁琼、翁独健、赖亚力、唐悦良、樊弘、陈翰伯、吴茂荪、邵循正、季羨林等一百余人。

参加招待会的还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以及我国前赴印缅文化代表团团长丁西林、副团长李一氓和在京团员多人。

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及印度大使馆参赞高尔也参加了招待会。

张奚若首先致欢迎词。他对代表团表示热忱的欢迎。他指出代表团的来访我国，必定有助于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谊关系。中印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增进，对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事业都是有帮助的。

继由潘迪特夫人演讲。她首先说：“我相信我们两国之间的互相认识和了解是重要的，这不仅是通过过去的联系，而且是通过目前贵我两国正在创造中的新的与重要的联系。”她说：“我们很可以回顾到我们两大邻邦两千年来和平相处而感到快慰。”她继即详细地介绍了印度宣布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情况。在提到印度的粮食问题时，她代表印度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去年运给印度五十万吨粮食的慷慨而及时的帮助，表示热诚的感谢。他最后强调印度拥护世界和平及各国之间的平等。她并引用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话说：“我们在为全世界各国人民获得自由与幸福的伟大任务中寻求你们的友好合作。”】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行招待会欢迎印度文化代表团并请潘迪特夫人讲演 全国民主妇联欢宴潘迪特夫人和代表团女团员》，载《人民日报》1952年5月8日。

5月7日

钱端升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举行招待印度文化代表团酒会。

【（新华社七日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在七日晚举行酒会，招待以潘迪特夫人为首的印度文化代表团。

招待会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主持。参加招待会的有：司法部部长史良，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教育部副部长韦恂，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出版总署副署长周建人、陈克寒，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余心清。

参加招待会的还有各大学的负责人和教授吴玉章、叶企孙、陈垣、孙晓村、钱端升、翦伯赞、雷洁琼、冯至、科学界人士陶孟和、吴有训、涂长望、严济慈、华罗庚，文学艺术界人士沙可夫、周立波、老舍、赵树理、李伯钊、欧阳予倩、马彦祥、曹禺、梅兰芳、史东山、蔡楚生、马思聪、齐白石、江丰，以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等一百五十余人，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及我国前赴印缅文化代表团副团长李一氓和在京团员等也参加了招待会。

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和大使馆外交人员也应邀到会。

沈雁冰部长首先致欢迎辞。他指出：中印两国人民有悠久的友谊和文化关系。近百年来，两国人民同样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样经历了长期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更加深了两国人民彼此间的互相了解和友谊。他说：中印两国互派代表团，一定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事业。

代表团团长潘迪特夫人致简短的答辞。代表团团员贾·阿玛拉达先生接着代表印度文化代表团讲话。他首先对代表团所受到的招待，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来访问你们这一伟大的国家，对于我们全体是一次丰富的经历，仅从书本上我们是得不到这些的。我们已密切地接触到中国文化生活的各方面。我们作为寻求学问者来到这里，来寻求关于你们伟大的过去以及今日更伟大的成就的知识。我们印度人和中国人一直是好朋友。我们热切地希望：我们的联系，在将来由于互相了解和友好而更加密切。”贾·阿玛拉达先生致辞毕，潘迪特夫人复举杯祝贺中印两国万岁。

招待会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昨举行酒会招待印度文化代表团》，载《人

民日报》1952年5月8日。

5月8日

钱端升出席北京市各界欢迎印度文化代表团集会。

【（新华社八日讯）北京市各界代表于八日晚集会，欢迎印度文化代表团。

参加欢迎会的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秘书长薛子正，副秘书长柴泽民，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刘仁、钱端升，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廖沫沙，文教局局长翁独健，外事处处长马振武，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北京分会主席张奚若，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李伯钊，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张晓梅及北京市各界代表共九百余人。

印度驻华大使馆参赞高尔等也应邀到会。

会上，彭真市长致欢迎词。他首先代表北京市全体市民向印度文化代表团表示欢迎之忱。他指出：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国境毗连，在文化上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两国人民之间一直有着深厚而长久的友谊。他说：去年我国政府应印度政府邀请，派了一个文化代表团到印度去访问，他们把印度政府和人民的珍贵友谊带给了我们。现在，以潘迪特夫人为首的印度文化代表团来到了我们的北京，我们相信也一定会把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真诚友谊带回印度去。建筑在相互平等及相互尊重的两国人民间的友谊访问，无疑的将会大大促进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信任和友好关系。让我们两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巩固和发展我们之间的友谊，为争取和保卫亚洲及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

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潘迪特夫人致答词。她说：过去当我们谈到你们伟大国家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时，北京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中的城市。当时，我们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会有机会来访问你们，并且看到使这个古国恢复青春的新生。她说：虽然我们是初次来中国，但是我们并不感到在这里是陌生人。

古代文化的联系，在今天是像过去一样的密切。你们对我们的欢迎，在我国友谊之链上又增加了一环。她接着指出，代表团在北京虽然只有几天，但是已经看到了许多动人的事情。北京的古老的宫殿、可爱的湖泊、公园、清洁的街道、改进市民教育和健康的努力以及可爱的孩子们，都使代表团感到愉快和感动。她说：我们来此时对于你们的友好与善意的愉快记忆，回国时将更加丰富。她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招待表示感谢，并祝北京市繁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前进。

会后，由梅兰芳等演出精彩京剧节目招待印度文化代表团。】

——《北京市各界欢迎印度文化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2年5月9日。

5月10日

钱端升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我们一定能够粉碎美国在远东的战争阴谋》。

【我们一定能够粉碎美国在远东的战争阴谋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钱端升

美帝国主义者自从在侵略朝鲜战争中节节失败，看到了中朝人民无比壮大的力量以来，就妄想到利用日本人民做炮灰，随后并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全面挽救它最后的惨败。美国政府自去年九月起和日本吉田傀儡政府非法单独签订了一连串的所谓“对日和约”、“美日安全条例约”和“行政协定”，又唆使这个傀儡政府和蒋介石匪帮签订了所谓“和平条约”。并于今年四月二十八日专横地宣布同时“生效”。

但是，就在那些“和约”、“协定”等等被它专横宣布“生效”后的第四天，日本人民举行了空前盛大的“五一”示威，三百万日本劳动人民喊出了“反对重整军备，争取民族独立”的响亮口号，严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者重新武装日本的侵略阴谋。

美帝国主义灭绝人性进行细菌战，因为做贼心虚，一味狡赖掩饰，经过

中国人民所组织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和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所派遣的调查团的调查和报告，现在又有了美国战俘伊纳克和奎恩的口供，铁证如山，即使无赖透顶像艾奇逊之流也将没有可能再企图抵赖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已经认清了美国野兽的狰狞面目。全世界的人民将要裁判美国细菌战犯的罪行。而且，中朝人民的智慧和勇敢也已经有效地约束了细菌武器的危害作用。所以，美国野兽们固然是凶恶万分，但是在伟大的中朝人民之前，仍然是注定了要失败的。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决心要进一步地搞好教学工作，和全国人民一道，以具体行动回击美国侵略者。诚如周恩来部长在《关于美国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生效的声明》中所说：“中国人民深信，只要中国、苏联和亚洲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团结一致，把维护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那就一定能够制止美国在远东的战争阴谋，保障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钱端升：《我们一定能够粉碎美国在远东的战争阴谋》，载《光明日报》1952年5月10日，第2版。

5月12日

钱端升等致电抗议奥地利政府迫害布兰德魏纳教授 同时致电布兰德魏纳教授表示关怀和敬意。

【（新华社十二日讯）北京各大学校长和法学院教授共四十八人，致电奥地利政府教育部部长，严重抗议奥政府迫害布兰德魏纳教授，解除他在格拉茨大学教授职务的非法行为。各大学校长和法学院教授并同时致电布兰德魏纳教授表示敬意。电文如下：

致奥地利政府教育部部长电

奥地利政府教育部部长：

我们中国首都的大学校长们和法学院教授们，对于奥地利政府顺从美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迫害布兰德魏纳教授，解除他在格拉茨大学教授职务的非

法行为，提出严重的抗议。布兰德魏纳教授曾经领导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忠实地调查并勇敢地揭露了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所进行的屠杀和破坏，及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所进行的细菌战等各种严重违反国际公法的罪恶行为。他的行动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热烈拥护。你们必须立即纠正摧残学术自由、迫害布兰德魏纳教授的非法行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坚强意志和一致行动是不可战胜的。

致布兰德魏纳教授电

奥地利和平理事会转布兰德魏纳教授：

我们极为愤怒地听到奥地利政府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指使下，对你进行迫害，解除你在格拉茨大学的教授职务的消息。我们已向奥地利政府教育部严重抗议这一个摧残学术自由的蛮横无理的行动。

由你所领导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按照严格的法律方式，调查并证实了美国侵略者在朝鲜进行屠杀和破坏，及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等各种严重违反国际公法的罪恶行为。你的行动获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拥护。你所完成的工作对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我们紧紧地和你站在一起，誓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到底。我们谨向你表示深切的关怀和衷心的敬意。

在上述两电电文上署名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奚若，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叶企孙，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林砺儒，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燕京大学教务长翁独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成仿吾，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主任何思敬，北京大学副校长汤用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德珩、张志让、钱端升、费青、蔡枢衡、楼邦彦、吴之椿、龚祥瑞、吴恩裕、樊弘、严仁赓、周作仁、周炳琳、赵乃搏、姚曾荫，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培源，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岱孙、邵循恪、赵人隽、余肇池、萧嘉魁、陈达、潘光旦、费孝通、吴泽霖、苏汝江、张莘群、史国衡、李有义，燕京大学教授雷洁琼、严景耀、赵承信、郑林庄、饶毓苏、项冲，辅仁大学教授赵锡禹、张重一。】

——《北京各大学校长和法学院教授致电抗议奥地利政府迫害布兰德魏纳教授 同时致电布兰德魏纳教授表示关怀和敬意》，载《人民日报》1952年5月13日。同日《光明日报》第1版刊登此消息。

5月15日

钱端升出席北京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委员会。

【（本报讯）北京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委员会于十五日举行会议。出席有：该会主任吴晗，副主任李乐光、张鸿舜、董汝勤及委员钱端升、傅华亭等十五人。

会议听取了各界选举工作进行情况的汇报后，决定全市各界人民代表的选举工作自即日起广泛展开，预计在五月底选举完毕。

为了加强干部对选举工作的认识，会议并决定在日内召开扩大的选举工作干部会议，由吴晗主任作有关选举工作的报告。】

——《京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工作即日起广泛展开》，载《人民日报》1952年5月16日。

7月1日

钱端升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共产党教育了我》。

【共产党教育了我

北京大学教授 钱端升

“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是数不尽的。”这句话表达了翻身中农民的心情，这句话也表达了思想正在改造中的知识分子的心情。

对我来说，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真是数不尽的。首先，我因为获得解放而感激党。解放以前，我忙碌了半生，都是徒劳而无功。说到国家，则长期在动乱危机中，看不到统一，更谈不到繁荣。说到个人，我不但对工作感觉到空虚，连对生命也感觉到不安全。解放终于给中国带来了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给我自己也带来了安全和希望。焦虑的、悲观的心情，

一变而为安宁的、乐观的心情。我感激党，因为我的痛苦解除了。

再是我感激党的对我厚，待我好。初解放时，我觉得我二十多年中对革命事业，不但没有起一点帮助作用，有时还起了相反的作用。我又觉得我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缺少学习，我的理论水平太低。所以在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我怕担任任何工作，而只想用功读书。我幻想这样比较可以使我取得进步。这样看法当然是错误的。要是我照着这样做，充其量，我能够默诵些教条，但我决不能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下，我很快地改变了这种错误的看法；在党的不断的培养之下，我承担了学校的、人民团体的，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些工作。在这些工人岗位上，我有了更多的更好的机会向共产党党员学习，并使我认识中国人民的伟大和祖国前途的光明，对祖国和人民有了热爱。这时候，我更感激党，感激它待我太厚了，太好了。

我现在认识到，上两阶段中我对党的感激虽然是真诚的，却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解放时，我感激党，因为党解除了我的痛苦。解放后两年余中我感激党，因为党照顾了我的工作。这样地感激党，只能使我在政治上靠拢了党，但不能使我在思想上也靠拢了党。一个觉悟不高的人是不可能真正靠拢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

自从去年夏天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秋天参加教师老实学习运动，以后又通过“三反”、“五反”，忠诚老实学习运动，我的觉悟逐步有了提高以来，我才认识了过去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动的思想，怎样的妨害了我接受党的思想上的领导，也妨害了我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有了这一认识之后，我的思想改造才真正有了开始。

在整个思想改造运动中，我感觉到党是伟大极了。党是做到了“爱人以德”。党不但解放了我们，照顾了我们工作，使我们学习为人民服务，党更要求全体人民，包括工人、农民、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店员、工商界在内，以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对于我们知识分子，毛主席曾经说过：“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

们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主要条件之一。”党要帮助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任何人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因为党是要求每个人能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制度，以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

在一系列的思想改造的运动中，特别是三反运动后期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阶段中，我体验到党的伟大和正确。我过去存在着浓厚的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名位思想。这一个坏思想使我在政治上犯了许多错误。在开始检讨时，我对这些错误是认识不够的；群众所提尖锐的意见，我也不能一开始即虚心接受。党正确地耐心地教育我，并帮助我正视我的错误，要求我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批评自我批评。党是严肃的，但也是温暖的；党是对我有一定的严格的要求的，但也是经常给我以鼓励的。

由于党的正确的领导和耐心的教育，一年以来，我在下列三个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第一，我初步地以人民的大学的教师 and 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自居，总以为早已分清了敌我界限。但通过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和忠诚老实的学习，我才真正地走上了分清敌我的方向。第二，我初步地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以检讨我过去的错误。这对我是颇为困难的，因为我的自高自大妨害了自我批评，也使我不易接受批评。但由于党的教导和群众的热心帮助，我终于初步的学会了运用这些武器。第三，我和群众的关系有了初步的改善。也因为我的自高自大，我既不接近群众，群众也觉得我不易接近。这样，我便有了浓厚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由于初步掌握了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我和群众也开始接近起来了。这些思想上的收获尚不是一年来的全部收获。但是，没有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改造世界的大气魄，我是不会有机会得到改造的；没有党的正确的领导和耐心的教育，我这个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也是不会这样的顺利的。我将继续地负荷了沉重的包袱而自己不知道。这沉重的包袱阻碍了我的进步，而我也不能知道。只有在党的慈母式的教育之下，我才有可能经过了土地改革，经过了三反运动，经过了忠诚老实的学习，不但对于祖国有无限的忠诚和热爱，而我自己也感觉到年轻了，学习并吸收新事物的能力增加了，工作的信心勇气也增加了。

感谢毛主席，感谢党，治了我的病，救了我，更教育了我，使我有可能是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我将以不断地自我改造，彻底地自我改造，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目前为搞好院系调整工作——来报答党，报答毛主席。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主席万岁！】

——钱端升：《共产党教育了我》，载《光明日报》1952年7月1日，第5版。

大卫·阿古什所著《费孝通传》曾对费孝通的朋友如金岳霖、冯友兰、钱端升等人与费孝通做了对比，提出：

【在1951年和1952年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的紧张气氛中，知识分子受到严密的控制，他们在1949年和1950年获得的权利被缩小了。思想改造和大学改革运动激烈地进行着，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惊恐不已。

费孝通的朋友、1943年至1944年与他一同赴美的金岳霖声称自己是“美国文化侵略的工具”，说他已陷入“资产阶级颓废哲学的深渊”；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称自己以前的作品“罪恶地反对人民”；考古学家罗常培说“我恨自己”；受过美国教育、在昆明西南联大那次群众大会上与费孝通同台演讲的政治学家钱端升说“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治好了我的病，拯救了我的灵魂”。费孝通可能受到不同的对待，没有像其他知识分子那样在广大群众面前作卑躬屈膝的检讨，他仍继续身居各要职，而且还出任几个新职。但是他未能出版更多的著作，这对一个宣传鼓动家是一个打击。从1951年至1953年，他只出版了关于少数民族的几部作品，其中大部分是平淡无奇的，持以前作品的老调子。】

——大卫·阿古什：《费孝通传》，董天民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7月

在《中国建设》发表英文文章 *How The People's Government Works*（《人民

政府如何运作》)。

——钱端升：*How The People's Government Works*，载《中国建设》1952年7月，第4期。

8月11日

钱端升出席北京市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入选主席团。

【（新华社十一日讯）北京市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十一日开幕。这次会议将选举市长、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委员，讨论和通过北京市今年的工作计划和财政收支概算。

会议首由彭真市长致词。彭真市长总结了过去一年半的工作之后，着重地提出了当前要进行的几项中心工作，其中主要的是进一步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和速成识字运动。会议还听取了副市长张友渔、副市长吴晗、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仁、市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廖沫沙分别作的关于本市财政收支、增产节约运动、卫生运动、速成识字运动的报告。

出席本届代表会议的代表的名额共五百五十五名，比上届增加了三十四名；其中由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名额也增多了。本届代表会议除和上届一样有回、蒙、藏等少数民族和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界代表外，并且增邀了满族和道教代表。

经大会选出的主席团名单如下（按姓氏笔画多少为序）：安朝俊、吴晗、余心清、余贻佃、李健生、马玉槐、梁思成、凌其峻、柴泽民、徐乃明、张友渔、张奚若、张晓梅、许德珩、郭树德、舒舍予、彭真、冯佩之、冯宾符、黄润萍、傅华亭、杨伯箴、杨蕴玉、闻家驷、刘仁、刘一峰、钱端升、蒋光鼐、薛子正、薛愚、聂荣臻等共三十一人。】

——《北京市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开幕》，载《人民日报》1952年8月12日。

8月14日

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幕，钱端升仍担任政协副主席。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北京市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从十一日起开会四天,已于十四日胜利闭幕。会议选出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名单另发),选出了北京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名单另发),讨论与通过了北京市本年度财政收支概算、政府各项工作报告和计划。

在会议进行过程中,中央人民政府朱德副主席曾亲莅大会讲话,对北京市当前各项中心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到会全体代表,对彭真市长和市人民政府各项工作报告,进行了三天的小组和大会讨论,一致拥护彭真市长所提出的进一步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和速成识字运动,以及其他中心工作,并由大会作出决议,号召各界人民为实现这些中心任务而努力(决议全文另发)。

会议一致通过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提案审查意见的报告。在彭真市长作了总结报告和舒舍予委员代表主席团致闭幕词后,会议胜利结束。

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名单

市长:彭真

副市长:张友渔 吴晗

委员:

刘仁、薛子正、张晓梅、聂荣臻、罗瑞卿、萧明、程宏毅、王文斌、雷洁琼、傅华亭、彭泽民、梁思成、舒舍予、王斐然、柴泽民、郭树德、安朝俊、徐楚波、蔡廷锴、牟泽衍、翁独健、马玉槐、李国瑞、严镜清、郑芸、黄润萍、隋经仁、乐松生、薛愚、朱兆雪

北京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名单

主席:彭真

副主席:刘仁、钱端升、梁思成、蒋光鼐

委员:(名次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之相、王宝初、王梓仲、王明之、毛树多、文重、田常青、巨赞、朱长江、吉合群、吴晗、余心清、余贻佃、李伯钊、李君武、李乐光、吕乃

君、林砺儒、周致远、周凤鸣、邵宗汉、侯俊岩、胡泉桂、胡一声、高晓亭、徐乃明、马玉槐、凌其峻、浦洁修、陈垣、张友渔、张奚若、张锡钧、曹言行、曹宪波、梁思成、许德珩、庄俊、彭真、彭望钺、彭泽民、汤用彤、程宏毅、冯佩之、冯基平、冯宾符、曾昭抡、傅华亭、劳君展、费孝通、杨伯箴、杨造新、杨蕴玉、杨仲兰、杨德亮、叶企孙、董汝勤、载涛、闻家驷、赵复三、蒋光鼐、刘仁、刘一峰、霍凤岐、钱端升、薛子正、聂荣臻、罗旺、罗瑞卿

秘书长：李乐光

副秘书长：廖沫沙、崔月犁、陈铭德、李续网、李健生、孙孚凌】

——《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幕》，载《人民日报》1952年8月15日。

8月18日

钱端升等参加座谈，拥护司法改革。

【（本报讯）北京、清华、燕京、辅仁四大学政法学系的教授于八月十八日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关于政法教育工作者如何肃清旧法观点，积极参加这次司法改革运动，彻底改造自己。

会上，钱端升、费青、曾炳均、严景耀、陈体强、芮沐、蔡枢衡等教授都曾作了扼要的发言，一致表示热烈拥护这一运动，并着重指出：过去教反动法律课的，思想上固然直接与反动的六法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法权学说有联系，即教政治学或社会学之政法学系的教师们也是与反动的旧法观点分不开的，因之政法学系的教师们都应该也必须参加司法改革运动，不能把司法改革视为局限于司法机关部门的运动，自己置身事外。教授们在会上的发言，具体说明了陈腐反动的旧法观点直接阻碍了大学政法学系中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的工作，“神圣契约”、“自由意志”等一套反动的、唯心的资产阶级法学理论也支配着某些教授整个思想体系。辅仁大学教授戴克光说：他虽然不教法律课，但因受旧法观点的严重影响，在“三反”开始时，即曾觉得领导上只

说已掌握材料，而不把人证、物证拿出来就打“老虎”是不应该的。觉得惩治特务、恶霸、匪首等反革命分子没有遵照“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则是不大适当的。此外，如蔡枢衡教授也承认自己过去一直就在培养反动的“六法干部”。

会上的发言表示出某些教授在不久以前对自己的严重的旧法观点也是认识不足的。如有些政治系的教师就认为只有法律系的教师才有旧法观点。其实这种思想本身就是受了法律与政治无关的旧法观点影响的结果。也有个别教授觉得自己在解放以前教法律，解放以后已经不教法律了，因而认为检查旧法观点有困难。经过大家座谈之后，大部分教授都认为这种困难是不存在的，问题的关键倒在于自己有没有勇气正视错误，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

——《北京、清华、燕京、辅仁四大学政法学系教授进行座谈，表示积极参加司法改革运动》，载《光明日报》1952年8月25日，第1版。

9月

教育部致函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请示成立北京政法学院，钱端升被提名为北京政法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政法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

主任委员：钱端升

副主任委员：韩幽桐

委员：陈传纲 朱晏 戴铮 刘昂 费青 严景耀 于振鹏 程筱鹤 夏吉生】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成立北京政法学院的请示》，载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主编：《法大记忆：60年变迁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9月12日

钱端升等拥护司法改革。

【（本报讯）北京、清华、燕京、辅仁四大学政法教授钱端升、费青、芮沐、王铁崖、严景耀、雷洁琼、曾炳均、于振鹏、戴克光等三十八人，联

名发表书面意见，表示热烈拥护司法改革运动。全文如下：

轰轰烈烈的司法改革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是在伟大的“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为了使人民司法工作能够进一步巩固和健全起来，而进行的反对旧法观点和整顿司法机关的一个具有高度斗争性的运动。这个运动并且要推动整个政法工作的改进，尤其要肃清旧法观点在政法教育工作中的严重影响。

我们是大学政法教育工作者，解放三年以来，我们固然在理论学习中，在三大运动，尤其是土地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地要求改进自己，经过了伟大的“三反”运动，我们与吆喝一般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初步划清了界限。但是，对于和我们业务工作有着决定性关系的学术思想还没有予以深入抽查，这就是：对于在反动统治时期所受教育和所从事工作中长期侵蚀着我们的旧法观点却始终没有加以系统的和彻底的批判。解放之初，我们虽然坚决拥护党和政府废除国民党“六法”的决定，并且在政法课程中废除了“六法”的部分。但是我们并没有认识到“六法”的废除并不就等于旧法观点的肃清，更没有认识到旧法观点给我们毒害得既深且钜。因此我们三年来的教学工作，无论我们主观上怎样要求改革，基本上却一直受着旧法观点的支配，不仅我们学术思想的改造是枝枝节节的，是理论脱离实际的，是教条主义的，所以不能够满足学生的要求和适合国家的需要，甚且我们还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旧法观点直接毒害了学生，间接危害了人民政法工作。

党和政府这次关于司法改革的英明号召，使我们觉悟到过去的错误和三年来所走的弯路。在这次司法改革运动中，我们要大胆暴露自己的错误思想和这些错误对人民的危害，我们要依靠群众，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挖掘我们错误思想根源。在肃清旧法观点之后，我们才能做好我们的政法教育工作和建立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人民新法学。

我们四大学现正在进行着革命性的院系调整，簇新的政法学院将在调整中建立起来，但是组织的整顿必须和思想改造相结合。所以司法改革运动，正是我们政法学院的基础。

我们热烈地拥护司法改革运动，并预祝这场运动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和成功。】

——《北京四大学政法教授拥护司法改革运动》，载《光明日报》1952年9月12日，第2版。

9月14日

钱端升出席北京市人民政府举办的模范教育工作者颁奖大会。

【（本报讯）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十四日举行模范教育工作者颁奖大会，由吴晗副市长代表市人民政府发奖，获奖的模范教育工作者共一百三十人。

这次受到奖励的模范人物，包括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中小学的教师、职员、校长、工友及工农业余学校的教师。他们当中，有些是忘我地工作，积极钻研业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改进提高教学方法；有些是密切联系群众，处处为群众着想，深入了解学生思想情况，启发学生自觉学习；有些是工作很忙，又要照顾家庭生活，但他们在政治热情鼓舞之下，自愿兼任业余学校的教员，并始终坚持工作。例如第四中学化学教员沈松源，热爱学生，时刻关心学生的思想进步和健康状况，他讲课生动，通俗易懂，还善于结合正课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启发学生爱国热情。北京师范学校音乐教员曹试甘，利用旧木头和极简单的材料，创造了律木、活动音符等许多种音乐教具，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丰台区同合庄小学校长贺淑蓉，在她刚当该校校长时，学校基础很差，教师业务水平低，学生纪律坏，由于她依靠群众，努力工作，在短时间内，学校面貌改变了，教师的业务有了改进，学生的成绩大大提高。原来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功课不及格，但第二学期全校算术平均达九十四分，国语平均八十三分。东四区职工业余学校教员张兰馨，晚上教课，白天到机关、工厂去了解每个学员的情况，给成绩较差的学员补课，并虚心向工人学习，不断改进教学方法。第一文化馆成人夜校教师张怀志，一家六口的生活全靠他在合作社缝纫和担任缝纫教师的收入来维持，工作很忙，生活很苦，但她还自愿担任街道成人夜校

的义务教师，两年多来，坚持工作，从不迟到早退，受到学员的敬爱。

吴副市长在讲话中指出，本市解放三年来，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学校教育改革工作有了显著的成绩，大规模扫除文盲工作就要开始。这些成就是和全体教师，特别是模范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他希望模范工作者要力戒骄傲自满，不断前进，争取把工作做得更好，保持已得的荣誉。全体教育工作者，应该学习他们的优点，克服缺点，改进工作，争取将来做模范。

会上，市教育局翁独健局长、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主席钱端升也讲了话。】

——《北京市模范教育工作者一百三十人获奖》，载《光明日报》1952年9月20日。

9月24日

全国院系调整基本完成，钱端升奉命组建北京政法学院。

【在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我被抽调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作为第一任院长，我的宗旨是全力为新中国培养及输送高质量的政法人才。】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8页。

【同时在北京新设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工业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机械化农业学院、中央财经学院、北京政法学院等专门学院。】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基本完成》，载《光明日报》1952年9月25日，第3版。

9月27日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致函政务院，报请核批成立北京政法学院，再次确认成立“北京政法学院筹备委员会”，由钱端升担任主任委员，主持筹备

工作。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报请核批成立北京政法学院的函》，载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主编：《法大记忆：60年变迁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9月30日

在《世界知识》杂志“拥护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专题发表《为了人民的教育事业而争取和平》一文。

——钱端升：《为了人民的教育事业而争取和平》，载《世界知识》1952年9月30日，第39期，第8-9页。

10月2日

老舍和钱端升担任我国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代表。

【（新华社二日讯）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南汉宸和丁玲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已改由老舍和钱端升担任。】

——《老舍和钱端升担任我出席和平会议代表》，载《人民日报》1952年10月3日。

10月6日

教育部就清华等大学政法系科人事调整问题致函北京政法学院筹备委员会，钱端升名列“留北京政法学院”。

——《教育部关于清华等大学政法系科调整人事名册的函》，载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主编：《法大记忆：60年变迁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10月12日

钱端升致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请毛泽东为北京政法学院题写

校名。

——《钱端升给林伯渠的信——请毛主席为北京政法学院题写校名》，载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主编：《法大记忆：60年变迁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10月13日

彭真欢宴和平会议全体代表，钱端升出席作陪。

【（新华社十三日讯）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为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胜利闭幕，于十三日下午七时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参加和平会议的全体代表。到会的有六百余人。

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三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应邀参加宴会。这三十七个国家是：澳大利亚、缅甸、加拿大、锡兰、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以色列、日本、朝鲜、寮国、黎巴嫩、马来亚、墨西哥、蒙古、新西兰、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叙利亚、泰国、土耳其、美国、苏联、越南。

应邀参加宴会的还有：列席和平会议的法国、巴西的代表，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澳联络局、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国际学生联合会、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和教育工作者工会国际等八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和平会议特邀来宾四人。

出席作陪的有：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刘仁、钱端升、梁思成，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北京市分会主席张奚若，北京市人民政府各单位负责人，以及北京市其他人民团体代表等。

中山公园挂遍了五颜六色的电灯和旗帜。从公园大门口到宴会地点——中山堂的道路两旁，站满了青年学生和市民，他们捧着鲜花、挥舞着手帕，热情地迎接前来参加宴会的各国和平使者们。

宴会自始至终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席间宾主频频为和平会议的成

功，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伟大团结而干杯。参加宴会的各国代表一再用中国话和本国的语言高呼“和平万岁”，并高唱保卫和平之歌。

宴会结束时，各国和平代表们聚集在中山堂前的广场上，载歌载舞，热情奔放，历半小时之久。

宴会后并举行晚会。各国代表在离开中山堂前往参加晚会时，伫立在路旁的群众纷纷和代表们握手、拥抱、欢呼，代表们依依不舍，情绪极为热烈。】

——《彭真欢宴和平会议全体代表》，载《人民日报》1952年10月14日。同日《光明日报》，第1版。

10月16日

钱端升出席中印友好协会欢宴印度和平代表团。

【（新华社十六日讯）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副会长陈翰笙于十六日在北京设宴招待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印度代表团。应邀出席的有印度代表团团长克其鲁、副团长杰安·昌德、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副秘书长罗米西·钱德拉及印度代表团团员四十余人。

应邀出席的还有印度驻我国大使赖嘉文和公使高尔。

应邀出席的还有：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李德全、罗隆基、吴蕴初、陈文贵、钱端升、老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孙晓村，北京大学副校长汤用彤，清华大学教务长周培源，中缅友好协会会长郑振铎，以及文艺界、音乐界、科学界代表和中印友好协会理事等四十多人。

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洪深也应邀出席。

丁西林会长在致词中，代表中印友好协会全体会员，祝贺印度代表团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所作的巨大贡献。丁西林指出：在这次和平会议召开的前夜，印度人民曾经普遍地展开“亚洲周”及“亚洲日”运动，

并曾在印度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地区性的和平会议，选出了有着广泛代表性的代表团，这充分表现印度人民对于和平的热爱和对这次和平会议的重视。

克其鲁团长在答词中强调印度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他说，如果印度的三亿五千万人民和中国的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团结在一起，不但能保卫亚洲的和平，而且也可以对保卫世界和平有巨大贡献。

昌德副团长希望中印人民友谊的加强。他说，在保卫和平运动中，中印友谊会起很大的作用。

赖嘉文大使说，我今晚不以一个外交人员的身份讲话，而以一个新来北京的印度人的身份讲话。我相信参加和平会议的代表们回到印度去时，不但把和平会议的影响带回去，而且也把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带回去。

宴会自始至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中印友好协会欢宴印度和平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2年10月18日。

10月

在《世界知识》发表《为了人民的教育而争取和平》一文。

——钱端升：《为了人民的教育而争取和平》，载《世界知识》1952年10月，第39期。参见钱端升：《钱端升主要著作目录》，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0页。

11月2日

钱端升等前往车站欢迎苏联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和苏军红旗歌舞团。

【（新华社二日讯）以吉洪诺夫为首的苏联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和苏军红旗歌舞团一行二百九十人，在二日下午抵达北京，受到各界人民热烈欢迎。

前往车站欢迎的，有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宋庆龄、吴玉章、李济深、郭沫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钱俊瑞，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

会副主席陈叔通，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李兆炳，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主席廖承志，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茅盾、周扬，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金子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张奚若、刘仁、钱端升，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首都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及首都各界人民四千五百多人。

前往车站欢迎的，还有苏联驻我国大使馆代办顾德夫和现在北京的苏联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团员叶菲莫夫。

苏联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和苏军红旗歌舞团全体团员分乘两列车，在下午二时五十分、三时十分先后抵达北京车站。吉洪诺夫和苏联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苏军红旗歌舞团的全体团员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下车，接受一百五十个少年儿童队员的献花。

在车站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台上矗立着毛泽东主席、斯大林大元帅的巨幅画像。欢迎会在《莫斯科—北京》的乐曲声中开始。郭沫若致欢迎词，吉洪诺夫致答词。欢迎群众深为他们的讲词所鼓舞，不断地挥动花枝和彩旗，欢呼：“毛主席万岁”“斯大林万岁”“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

郭沫若在致欢迎词中首先代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中国人民向不辞劳苦、远道而来的苏联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和苏军红旗歌舞团致热烈的欢迎。他说：“我热烈欢迎你们，因为你们是中国人的最忠实的朋友——苏联人民的使节，你们是伟大的斯大林大元帅派来的使节，通过你们，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将获得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他说：中国人民从自己的长期的亲身经历中，深切地体会到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始终不渝的兄弟般的友情和援助，深切地体会到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对于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创造自由幸福的新生活的重大意义。伟大的中苏友好同盟是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他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

路。中国人民在即将开始大规模建设的今天，特别需要进一步学习苏联、特别需要进一步加强中苏友谊。苏联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和苏军红旗歌舞团的到来，对于中苏伟大友谊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必然会起重大的作用。郭沫若预祝代表团在促进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合作的工作中获得辉煌的成就。郭沫若最后高呼：“中苏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大元帅万岁！”

吉洪诺夫在致词中首先说：“请让我代表苏联艺术科学工作者、苏军红旗歌舞团和苏联人民向中国人民致以最亲切的、最崇高的、兄弟般的敬礼！我代表光荣的莫斯科向光荣的新中国的首都北京致最亲切的敬礼！”吉洪诺夫说：“我们正处在两件大事的照耀的日子里。这就是不久以前庆祝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纪念和不久就要庆祝的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三十五周年纪念。从十月革命起，已经经过很长的时间了。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支‘突击队’了，和我们并肩在一起的，还有勇敢和强大的中国‘突击队’。我们两国人民是久经考验、友情深厚的亲密朋友。”吉洪诺夫接着说：苏联国内和国外的生活都遵循一个原则：一切为了保卫和平。苏维埃政权诞生后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关于和平的法令。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一切事业，文化、艺术和科学都是为和平服务的。吉洪诺夫说：“我们今天能作为苏联文化的使者来到中国，感到很荣幸。我们将尽一切力量，以便更多的看到中国的情况，看到它的成就，并向中国人民介绍苏联人民的生活和艺术、科学方面的成就，以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吉洪诺夫在结束他的致词时高呼：“中苏两国人民不可战胜的友谊万岁！”“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万岁！”

致词毕，少年儿童队员们再次代表首都各界人民，向吉洪诺夫和苏联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苏军红旗歌舞团全体团员献花。

欢迎会在《全世界人民心一条》乐曲声中结束。

晚八时，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钱俊瑞设宴为苏联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和苏军红旗歌舞团洗尘。

苏联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的另三位团员——乌兰诺娃、康德拉托夫和查伊采娃，日内即可由莫斯科乘飞机抵北京。】

——《苏联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和苏军红旗歌舞团昨日抵达北京 我国各界人民热烈地欢迎我们最亲密的朋友》，载《人民日报》1952年11月3日。

11月8日

钱端升出席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联合欢宴现在北京市工作的苏联专家。

【（新华社十一日讯）为了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和“中苏友好月”揭幕，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在八日下午联合欢宴现在北京市工作的苏联专家。晚间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晚会。

应邀参加宴会和庆祝晚会的有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副院长耶果洛夫、市政建设专家土曼副卡娅和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苏联医学专家及医务人员。

宴会和庆祝晚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友渔、吴晗和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张奚若、许德珩、刘仁、孙晓村、曹靖华、王之相主持。出席作陪的有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蒋光鼐和各人民团体负责人。

庆祝晚会首先由吴晗致词，他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首都人民，向具体帮助首都各方面工作的苏联专家祝贺伟大的节日，并感谢他们在加速首都生产建设事业上所作的努力。耶果洛夫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亲切地叙述了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里中苏医务人员友好合作的情景。晚会演出川剧和晋剧，招待苏联专家。】

——《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苏友协联合欢宴苏联专家》，载《人民日报》1952年11月12日。

11月10日

钱端升复函林伯渠，就毛泽东允诺为北京政法学院题写校名，代表北京政法学院全体员生致以衷心感谢。

——《钱端升给林伯渠的信》，载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主编：《法大记忆：60年变迁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11月20日

钱端升致函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齐燕铭，请齐催促毛主席尽早题字，以便11月24日开学典礼能够使用。

——《钱端升给齐燕铭的信》，载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主编：《法大记忆：60年变迁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11月23日

林伯渠复函钱端升，告诉钱毛泽东已为北京政法学院题写校名。

——《林伯渠给钱端升的回信》，载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主编：《法大记忆：60年变迁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11月24日

北京政法学院举行成立典礼大会。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内务部长谢觉哉、中共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秘书长陶希晋、北京大学副校长汤用彤、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等莅临。钱端升以院长身份发表讲话。

——《钱端升院长在北京政法学院成立典礼大会上的讲话》，载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主编：《法大记忆：60年变迁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9页。

教育部致函北京政法学院筹备委员会，表示教育部与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及华北行政委员会商议后，同意钱端升担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已另函中

央人事部转呈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钱端升本人“先已到职”。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钱端升等人职务的通知》，载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主编：《法大记忆：60年变迁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

12月3日

钱端升出席彭真市长盛宴欢送吉洪诺夫等宴会。

【（新华社三日讯）北京市人民政府彭真市长三日晚举行盛大宴会，欢送行将离京的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吉洪诺夫，团员别洛沙普柯、格鲁森科、查哈罗夫、叶菲莫夫，苏联艺术工作团团员米哈伊洛夫、盖达伊、聂恰耶夫、乌兰诺娃、康德拉托夫、柯岗、梅特尼克等十二人。

北京市人民政府吴晗副市长代表彭真市长主持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吴玉章、李济深，总干事钱俊瑞，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张奚若、许德珩、萧明、孙晓村、曹靖华，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各局长和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首都文化界人士周扬、李四光、范文澜、翦伯赞、艾青、田汉、欧阳予倩、李兆炳、何其芳、陈荒煤、赵沅等。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顾德夫，参赞司高磋、李海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茹克福，苏联驻华商务副代表那维琪等。

吴晗副市长致词，他首先代表首都的政府和人民，对来自远方的最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月来在我国为巩固与发展中苏友谊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他说：“在‘中苏友好月’的活动中，苏联各个代表团的同志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在我国人民中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并已成为鼓舞我们在各项工作上和各方面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动力。无疑地这对于巩固与发展中苏友好，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他说：“‘中苏

友好月’作为一个群众性的大规模的运动，即将胜利地结束了。但中苏两大国的深厚友谊的巩固与发展则是永远没有止境的。请你们把中国人民对于苏联人民的敬意，把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同志的热爱，传达给苏联人民吧。”

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吉洪诺夫致答词。（全文另发）

宴会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宾主频频举杯，为中苏两国人民强大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干杯，为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健康干杯，为全世界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斯大林健康干杯。席间，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钱俊瑞提议，全场举杯，为庆贺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长、苏联著名诗人、伟大的和平战士吉洪诺夫五十六岁寿辰干杯。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在宴会后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赠送礼品，包括中国乐器、乐谱、美术作品、象牙雕刻、大磁瓶、缂丝屏条以及复制唐代陶俑等。】

——《彭真市长盛宴欢送吉洪诺夫等 吴晗副市长代表彭真市长主持宴会并致词》，载《人民日报》1952年12月4日。

钱端升参加中印友好协会欢迎来中国访问的印度国会议员高温德·达斯等晚宴。

【（新华社四日讯）来中国访问的印度国会议员高温德·达斯等一行三人，在本月二日晚抵京。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和副会长陈翰笙在三日晚设宴欢迎。参加宴会的还有中印友好协会理事吴作人、洪深、胡愈之、张明养、刘尊棋，前我国赴印文化代表团团员郑振铎、叶丁易、钱伟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钱端升及文化学术界人士多人。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应邀作陪。

宴会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印度议员三人来我国访问 中印友协设宴欢迎》，载《人民日报》1952年12月5日。

12月9日

教育部致函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提请任命钱端升为北京政法学院

院长。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提请任命钱端升为北京政法学院院长、武振声为副院长的函》，载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主编：《法大记忆：60年变迁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12月18日

钱端升出席彭真欢送苏联艺术工作团部分团员和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全体团员宴会。

【（新华社十八日讯）北京市人民政府彭真市长十八日晚举行盛大宴会，欢送行将离京的由楚拉基领导的苏联艺术工作团一部分团员和以费道罗夫为首的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全体团员。宴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代表彭真市长主持。出席宴会的有：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吴玉章、李济深，总干事钱俊瑞和在京的理事、干事，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萧明、孙晓村，华北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代表李之乾，北京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北京市人民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和北京市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首都文化艺术界人士周扬、阳翰笙、田汉、郑振铎、熊复、张仲实、曹禺、李伯钊、周巍峙、吴雪、王阑西、蔡楚生、史东山、田方、汪洋、罗光达、李兆炳等。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顾德夫、华士诺夫、司高磋、李海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茹克福，苏联影片输出公司驻中国总代表史福德和苏联驻中国商务副代表那维琪等。

吴晗副市长在宴会上致词。他首先代表首都的政府与人民向苏联艺术工作团和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的同志们致衷心的感谢和最大的敬意。他说：一个多月来，在我们全国范围内所热烈展开的“中苏友好月”的各项活动中，我们最亲爱的苏联朋友们的到来和在中国各地的工作，大大丰富了活动的内容，不仅进一步发展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大大促进了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并使我国人民集中地、普遍地受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实

际教育。人们已经完全懂得：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就必须遵循苏联人民的已经胜利走过的途径英勇迈进，因而学习苏联已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了一个空前高涨的热潮。吴晗在致词中最后希望苏联朋友们把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敬意，对斯大林同志的热爱，传达给苏联人民。

苏联艺术工作团领导人楚拉基在宴会上致词说：我们访问中国为时将近两月，对中国有了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每天每时都看到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浓厚友谊的表现。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青年们眼中所闪现的幸福的光芒，这是由于他们能够自由地建设他们的美好生活；我们更身临其境地感到中国人民的劳动中所具有的巨大的创造力量；我们更看到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合作的成果，看到学习和推广苏联先进经验正在以巨大的规模进行着，这将使中国在较短期间内，走完苏联所走过的道路，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苏联艺术家们能够为中苏友好贡献一份力量，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团长费道罗夫致词说：我们在中国访问期间，和中国观众们动人的会见的场面，将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认识了并且熟悉了中国人民的劳动和生活，也认识了中国在工业、农业、文化、艺术上的成就，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形象。中国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们预祝中国人民超额地完成这个建设计划，如同苏联人民完成斯大林五年计划一样。我深深地感谢中央人民政府、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所给予我们的帮助。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吴玉章在宴会上讲话。他对于苏联友人在中国的辛勤工作以及他们对于加强中苏友好所作的巨大贡献，表示感谢。他说：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所说的“走俄国人的路”的指示，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是和苏联友人的帮助分不开的。我们就要开始新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我们将继续“走俄国人的路”，胜利地走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致词中特别感谢苏联艺术工作者所给

予中国文化艺术工作各方面的巨大帮助。苏联艺术工作团团员奥布拉兹卓夫，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团员拉迪尼娜、契尔卡索夫等相继在宴会上讲话，他们一致称赞中国人民丰富的艺术遗产和艺术工作的成就，感谢中国人民给予他们的殷情接待和赠送他们许多礼物，并且表达了他们即将离开中国时的依依惜别之情。他们动人的讲话使宾主双方深深地沉浸在一种融洽深厚的友好情感中。

宴会自始至终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席间宾主频频为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健康，为世界劳动人民的导师、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斯大林同志的健康而干杯。

宴会完毕，由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演出荣获斯大林奖金的著名歌剧《白毛女》招待嘉宾。】

——《彭真市长昨晚举行盛大宴会欢送苏联艺术工作团部分团员和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全体团员》，载《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9日。

1953年(53岁)

1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署任命状，正式任命钱端升为北京政法学院院长。

——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主编：《法大记忆：60年变迁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插图第1页。

1月16日

教育部通知北京政法学院，中央人事部1953年1月5日函称政务院第165次政务会议通过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钱端升为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希望本人先行到职视事”。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政务院批准任命钱端升为院长、武振声

为副院长的通知》，载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主编：《法大记忆：60年变迁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1月18日

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任命钱端升为北京政法学院院长。

【三十、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副院长名单

院长 钱端升 曾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副院长 武振声 曾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副院长。】

——《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任命的各项名单》，载《人民日报》1953年1月19日。

2月13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组织的慰问团，前往各个医院慰问志愿者。

【据新华社讯：春节前夕，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联合组织了二百五十多人的慰问团，慰问在北京各医院休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伤病员。参加这一慰问团的，有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北京市人民政府房产管理局、劳动局、教育局等局局长；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秘书长李乐光等人。抗美援朝总会及北京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也派代表参加。

慰问团共分七个慰问团，分头到各医院去慰问。慰问团的慰问，对休养员有莫大的鼓舞。每当慰问团员到达一病房时，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休养员们兴奋地告诉慰问团员们，他们的身体是怎样在全国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日益健康起来的。所有的休养员一致表示：要更好地安心休养，以便提早回到抗美援朝和保卫国防的前线上去。】

——《北京市组织慰问团到各医院慰问志愿军和解放军休养员》，载《人民日报》1953年2月13日。

3月3日

钱端升等表态拥护选举法。

【（新华社三日讯）首都和天津各界人民热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公布。

……

北京各大学的教授们，也都拥护这一选举法。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说：“这一选举法完全适合中国情况，可以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实行这一选举法，可以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更加顺利地进行。我们将以无比的热诚为实行选举法而贡献出力量！”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主任孟昭英、水利系教授张光斗、石油系教授吴迟，也一致认为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选举法是民主的、切实可行的。】

——《北京和天津人民热烈拥护选举法》，载《人民日报》1953年3月4日。

3月5日

钱端升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慰问斯大林病情。

【（新华社五日讯）北京市各界人民在获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的关于斯大林主席病况的公报后，纷纷向苏联驻华大使馆表示深切的关怀和慰问。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日晚由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偕同副市长张友渔、吴晗和市委副书记刘仁等前往苏联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使，向他表达北京市全体人民和全体共产党员对斯大林主席病情的关怀与慰问，衷心祝望斯大林主席早日恢复健康，并请他把这个心情转达给斯大林主席和苏联全体人民。北京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等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也在五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向顾德夫参赞表示对斯大林主席的病情的慰问之意。

截至五日晚十时止，北京市各机关、工厂、学校、团体和广大市民派遣代表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慰问或写信、打电话给大使馆表示慰问的络绎不绝。】

——《我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前往苏联大使馆慰问斯大林病情》，载《人民日报》1953年3月6日。

3月6日

钱端升等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哀悼斯大林逝世。

【北京市党政负责人前往苏联大使馆吊唁】

（新华社六日讯）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副书记刘仁，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友渔、吴晗及市人民政府全体委员，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及全体委员，北京市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在六日下午先后到苏联驻我国大使馆，对斯大林主席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吊唁。】

——《哀悼我们最敬爱的导师和朋友斯大林同志的逝世》，载《人民日报》1953年3月7日。

3月15日

钱端升等到捷驻华大使馆，吊唁哥特瓦尔德逝世。

【据新华社讯：我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首长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北京市各界人民，十五日纷纷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驻我国大使馆，沉痛吊唁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同志的逝世。

……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副书记刘仁，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友渔、吴晗，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及北京市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在十五日先后到捷克斯洛伐克驻我国大使

馆，对哥特瓦尔德总统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吊唁。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北京大学副校长江隆基等也前往捷大使馆吊唁。】

——《首都各界和各国驻华使节等到捷大使馆吊唁哥特瓦尔德逝世 华东区和上海市党政负责人到捷总领事馆吊唁》，载《人民日报》1953年3月16日。

3月16日

钱端升以中国政治与法律学会代表身份前往悼念哥特瓦尔德逝世。

【（新华社十六日讯）我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首长，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北京文化艺术界人士以及各国驻我国使节，十六日继续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驻我国大使馆吊唁哥特瓦尔德总统的逝世。

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首长前往吊唁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陈伯达，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潘震亚，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农业部部长李书城，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代主任程子华，中国人民解放军工兵司令员陈士渠，炮兵副司令员邱创成等。

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前往吊唁的有：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致公党代表黄鼎臣，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陈炳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叔通，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康克清，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代表钱端升等。】

——《我政府各部门首长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北京各界人民 继续前往捷大使馆吊唁哥特瓦尔德逝世》，载《人民日报》1953年3月18日。

4月21日

钱端升等前往机场欢迎芬兰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前来我国参观的芬兰文化代表团于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乘飞机抵达北京。

（代表团名单略）……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陈翰笙、钱端升，秘书长吴茂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周扬，秘书长沙可夫，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方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荣高棠，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冀朝鼎，作家曹禺，电影工作者于蓝，前赴芬兰中国人民杂技团副团长张梦庚等到机场欢迎。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副局长陈忠经和外交部交际处副处长沈平也到机场欢迎。

前往机场欢迎的还有芬兰驻华公使克诺林夫妇及使馆人员。】

——《应邀前来我国参观的芬兰文化代表团到京》，载《人民日报》1953年4月22日。

4月22日

钱端升担任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主席。

【（新华社讯）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大会选出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史良、许德珩、张志让、钱端升、张苏、吴德峰、马锡五等二十人为主席团。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筹备会主席董必武致开幕词。接着林伯渠、柯柏年、马锡五和钱端升相继讲话。苏联法律专家苏达里可夫也应邀讲话。会议在通过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和成立宣言后，选出董必武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主席，沈钧儒、谢觉哉、王昆仑、柯柏年、张志让、钱端升为副主席，史良、高崇民、许德珩、王之相、费孝通、周鲠生、吴德峰、马锡五、张曙时、董鲁安、魏明等三十八人为理事。】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载《人民日报》1953年4月27日。

钱端升出席张奚若欢迎芬兰文化代表团晚宴。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于二十二日下午七时在北京设宴欢迎以吉科宁夫人为首的芬兰文化代表团到京团员。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陈翰笙、胡愈之、钱端升，中国人民学校校长吴玉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茅盾、周扬，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国际工作部副部长廖梦醒，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秘书长刘贯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荣高棠，中华医学会秘书长方石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冀朝鼎及首都文学艺术界曹禺、于蓝、草明、赵淑、张梦庚、劳动模范刘英源等多人。

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卢绪章、外交部交际处副处长沈平也出席了宴会。

应邀参加宴会作陪的还有芬兰驻华公使克诺林与使馆人员及前来我国谈判贸易的芬兰贸易代表团代表。

会上张奚若会长首先致词说：“中芬两国虽然相隔遥远，但是，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并没有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自中芬建交以来，这种友谊更加发展了。”他指出，中芬两国间文化和贸易关系的发展对于两国人民相互间的了解和相互友谊的增进，以及对促进世界和平，无疑地将起很大的作用。

吉科宁夫人致答词说：“我们是第一次访问中国，我们带来了芬兰人民对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友谊。让我来祝贺这两个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合作逐年增长，我们代表团将尽一切的努力来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接着由代表团副团长毛里·卢玛和芬中协会秘书长劳里凯南夫人代表芬兰文化代表团向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赠礼。

席间宾主频频为芬中友好、为芬中文化与贸易关系的巩固与发展而干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设宴欢迎芬兰文化代表团到京团员》，载《人民日报》1953年4月23日。

4月25日

钱端升出席芬兰驻华大使馆招待芬兰文化代表团午宴。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芬兰驻华公使克诺林夫妇于二十五日中午在北京设宴招待以吉科宁夫人为首的芬兰文化代表团到京团员。

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交际处副处长沈平也应邀赴会。

应邀赴会的还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周鲠生、陈翰笙、钱端升，秘书长吴茂荪，理事会理事梅汝璈、罗隆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荣高棠，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国际工作部副部长廖梦醒，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冀朝鼎，中国人民杂技团副团长张梦庚等。

芬兰文化代表团到北京以后，已于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分别游览了北京名胜古迹北海、颐和园，参观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谢觉哉部长并为代表团举行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问题的座谈会。】

——《芬兰驻华公使馆设宴招待芬兰文化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3年4月26日。

4月26日

钱端升等赴机场迎接瑞典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我国参观的瑞典文化代表团今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名单从略）……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陈翰笙、钱端升，秘书长吴茂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沙可夫，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国际工作部副部长廖梦醒，中华医学会秘书长方石珊，农学家沈其益，建筑家朱兆雪，宗教界王梓仲，新闻界廖经天及曾赴瑞典演出的中国人民杂技团副团长张梦庚等人。

前往机场欢迎的还有瑞典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修尔德等使馆人员。】

——《应邀来我国参观的瑞典文化代表团抵北京》，载《人民日报》1953年4月27日。

4月27日

钱端升出席人民外交学会欢迎瑞典文化代表团晚宴。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二十七日晚设宴欢迎以卡尔-艾力克·梅克奎斯特为首的瑞典文化代表团。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陈翰笙、钱端升，秘书长吴茂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沙可夫，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国际工作部副部长廖梦醒，中华医学会秘书长方石珊，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孙晓村，农学家沈其益，建筑家朱兆雪，作家曹禺等人。

张奚若会长在宴会上致词，对瑞典文化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代表团团长梅克奎斯特随后致词答谢，并祝瑞中两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事业的胜利而携手并进。

席间宾主频频为中瑞两国人民友谊的巩固和发展而干杯。

瑞典文化代表团并在宴会上向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赠礼。】

——《我人民外交学会设宴欢迎瑞典文化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3年4月28日。

5月6日

北京市选举委员会成立。钱端升担任委员。

【北京市选举委员会在六日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委员会由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副书记刘仁任主席，蒋光鼐、吴晗、冯宾符、彭泽民、孙晓村、薛愚、李乐光、张大中、冯佩之、柴泽民、张晓梅、舒舍予、王纯、傅华亭、钱端升、余涤清、杜若、马玉槐、载涛、刘福二十人任委员。

会上，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柴泽民作了选举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

并研究了成立选举委员会办公室等事项。

北京市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议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后，就积极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选举法公布后，即在重点街道进行调查，草拟了选举法实施细则草案，郊区农村划乡的计划方案也已拟出。在选举委员会领导下，选举干部的训练、选举试验与划乡试验等工作即将开始。】

——《北京市选举委员会成立》，载《人民日报》1953年5月7日。同日《光明日报》，第1版。

5月8日

钱端升出席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

【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在八日召开座谈会。出席座谈的有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吴玉章，副主席刘子久、钱端升、郎洁华，常务委员车向忱等，以及来京参加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教育工作者代表。出席座谈的还有应邀前来我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典礼和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苏联工会代表团团员、阿塞拜疆共和国中小学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德·麦·奥鲁杰娃。

会上，由德·麦·奥鲁杰娃介绍了阿塞拜疆共和国中小学工会的工作情况。她指出：党、行政和工会必须密切配合进行工作，工会必须是党和政府的政策的推行者。工会的职责是检查和督促工作，并想办法改进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阿塞拜疆共和国中小学工会经常讨论有关学校生活、如何提高教师的思想水平、教师的劳动保护、社会保险、如何减少教师患病率等问题，以及其他在实际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在检查工作中发现了缺点，工会中央委员会就要召开全体会议来进行讨论，在会上要作出决议，制定出改进办法，并提交有关单位负责解决。她并说明苏联工会的工作从基层到中央都是有步骤并按计划进行的。

刘子久在会上也简述了中国教育工会的组织系统。】

——《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召开座谈会 邀请参加中国工会代表大会的中苏代表座谈》，载《人民日报》1953年5月10日。同日《光明日报》，第1版。

6月5日

钱端升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在北京举行的欢宴以吉科宁夫人为首的芬兰文化代表团酒会。

【（新华社五日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于五日下午七时在北京举行酒会欢宴以吉科宁夫人为首的芬兰文化代表团。

出席酒会作陪的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茅盾、周扬，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周鲠生、陈翰笙、钱端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孙晓村，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荣高棠以及文学、艺术界代表田汉、欧阳予倩、郑振铎、徐悲鸿、曹禺、蔡楚生、史东山、赵树理、沙可夫、冯至、赵汾、白杨、戴爱莲等一百五十余人。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洪深和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交际处副处长沈平也出席作陪。

应邀参加酒会的还有芬兰驻华公使克诺林及使馆人员。

席上郭沫若主席致词说：中芬两国距离虽然很远，但人民文化的交流是早就有的。希望今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更加强起来。正当代表团在中国访问之际，恰逢中、芬两国政府之间签订了贸易协定。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贸易关系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促进一样，是增进两国人民福利和维护持久和平的很好的条件。

吉科宁夫人致答词说：“我们在中国作客的六星期中得到很丰富的经验，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学校、工厂和建设现场，到处都看到建设的热情。我们回

国以后将回忆起你们是爱好正义，爱好和平的人民。”

席间，郭沫若向芬兰文化代表团赠礼。宾主并频频举杯为中芬友好而干杯。

酒会后，中国杂技团演出精彩节目。】

——《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欢宴芬兰文化代表团 芬兰文化代表团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载《人民日报》1953年6月6日。

6月6日

钱端升前往机场送别芬兰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六日讯）以吉科宁夫人为首的芬兰文化代表团于六日晨乘飞机离北京返国。

到机场欢送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陈翰笙、钱端升，秘书长吴茂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络部部长洪深，全国委员会委员曹禹；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国际工作部副部长廖梦醒；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荣高棠；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冀朝鼎；前赴北欧各国演出的中国人民杂技团副团长张梦庚等。

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交际处副处长沈平也到机场欢送。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芬兰驻我国公使克诺林及使馆人员。】

——《芬兰文化代表团离北京返国 行前发表声明感谢我国政府和人民的真挚友谊》，载《人民日报》1953年6月7日。

6月9日

钱端升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欢送瑞典文化代表团宴会。

【（新华社九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于九日下午七时在北京举行宴会，欢送以卡尔-艾力克·梅克奎斯特为首的瑞典文化代表团全体团员。

出席宴会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鯁生、陈翰笙、钱端升，秘

书长吴茂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周扬、秘书长沙可夫，联络部部长洪深；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国际工作部副部长廖梦醒；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冀朝鼎及首都文化界与宗教界人士孙晓村、叶圣陶、欧阳予倩、赵沅、张梦庚、王梓仲等。

张奚若会长在会上致词说：通过这次瑞典文化代表团到中国的访问，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和瑞典人民将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之下，使中、瑞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在已有的基础上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席间，许多代表们都曾发言，赞扬新中国在各方面的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

瑞典文化代表团团长梅克奎斯特最后致答词：他表示，代表团在回国后将尽力在瑞典传播关于在新中国的见闻，并为加强瑞、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和平、自由与民主而工作。

席间，宾主频频为瑞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为毛主席的健康而干杯。

宴会后，并由中国杂技团演出节目。】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设宴欢送瑞典文化代表团 瑞典文化代表团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载《人民日报》1953年6月10日。

7月31日

钱端升等首都文教界人士拥护停战协定签字。

【北京政法学院钱端升院长说：三年多的战争，两年多的谈判，终于使朝鲜停战协定签了字。这是中朝人民的伟大胜利，也是和平力量的伟大胜利。

朝鲜停战协定是在战胜了美国好战分子和李承晚集团的多次阻挠破坏之后，才获得的。我们应该庆幸朝中人民军队的胜利和我们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终于赢得了战争，赢得了停战，也赢得了导致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但我们务必警惕美国好战分子及李承晚破坏停战，重新燃起战争之火。只有我们人民经常保持最高的警惕，准备随时粉碎一切破坏停战的阴谋

与挑衅，才能使停战协定不遭受破坏。

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贯主张两大阵营可以和平共处，国际争端可以和平解决。由于世界人民和平运动的高涨，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愿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美国政府是否能够履行保证李承晚忠实执行停战协定的诺言，将要成为他的第一块试金石。

中朝人民要加倍警惕，使得美国好战分子和李承晚不能破坏停战。我们希望美国人民也加倍努力来监督他们的政府执行停战协定。】

——《首都文教界人士发表谈话 热烈拥护朝鲜停战协定签字》，载《光明日报》1953年7月31日，第3版。

7月31日~8月1日

钱端升率团慰问正在北京休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据新华社讯：北京、沈阳、重庆、西安、武汉、广州、南京、太原、哈尔滨、迪化、归绥、乌兰浩特各界人民，在“八一”建军节前后，热烈进行了拥军优属活动。

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联合慰问团在“八一”建军节，代表首都二百多万人民，慰问正在首都休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参加慰问团的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区人民政府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与工作人员。慰问团由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吴晗，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等率领，于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分别到八个医院进行慰问，除对休养员们作口头慰问、举行座谈会外，还组织了文娱晚会，发送了慰问金。】

——《全国各地纷纷进行拥军优属活动》，载《人民日报》1953年8月3日。

9月16日

钱端升等前往机场迎接法中友好协会代表团。

【(新华社十六日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首次来我国作友谊访问并参加我国国庆典礼的法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一行十二人,由团长亨利·塞尼率领,于十六日下午乘机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陈翰笙、钱端升,秘书长吴茂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沙可夫,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庄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国际工作部副部长邹得心,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北京科学界代表梁思成、沈其益及宗教界代表等多人。】

——《应邀来我国访问并参加我国国庆典礼 法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到达北京》,载《人民日报》1953年9月17日。

9月17日

钱端升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招待法中友协代表团宴会。

【(新华社十七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于十七日晚在北京设宴欢迎以亨利·塞尼为首的法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全体团员。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陈翰笙、胡愈之、钱端升、秘书长吴茂荪,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沙可夫,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国际工作部副部长邹得心,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工人日报副总编辑曲跻武,以及著名的文学界、科学界、教育界人士萧三、曹禺、华罗庚、梁思成、裴文中、方石珊等多人。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致词向由远道而来的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法中友协代表团的来临,意味着热爱自由与和平的中法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日益增进。他说,在保卫和平的伟大事业中,中国和法国人民过去曾经是,今后也必然会极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说,通过代表团这次访问,中法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关系,一定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代表团团长亨利·塞尼致答词。他说,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缩短了

中法两国人民间的距离。他赞扬中国人民在解放后所取得的民主独立自由和巨大的成就以及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他说这一切将使代表们更增强他们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信心。他表示代表们将尽一切努力来促进两国人民间文化和经济的交流。

席间，宾主一再为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世界和平干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招待法中友协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3年9月18日。

10月5日

钱端升担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第一分团副团长。

【总团：团长贺龙，副团长邢西萍、章伯钧、蔡廷锴、章乃器、朱学范、陈沂、吴晗、刘芝明、康克清、梅兰芳、老舍、赵寿山、王维舟、吴克坚、邵式平、平杰三、张维桢、哈丰阿，秘书长陈沂（兼），副秘书长崔月犁、曾昭生、刘汉、王敏昭、于北辰、蒙定军、犹凤岐、朱辉、王焕宇、刘洪涛、鲁伯、边亭。

第一总分团：团长邢西萍，副团长陈其瑗、钱端升、侯德榜、黄琪翔、詹东堪穹（藏族）、洪深、史东山、马思聪、金城，秘书长于北辰，副秘书长曹孟君、吴平、谭惕吾、葛志成。】

——《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及各总分团团、副团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载《人民日报》1953年10月5日。

10月20日

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及各总分团负责人因工作关系有所变动，但钱端升依旧担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第一分团副团长。

【（新华社沈阳二十日电）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及各总分团负责人因工作关系有所变动，现将全部名单补正公布如下：总团：团长贺龙，副团长邢西萍、章伯钧、蔡廷锴、章乃器、朱学范、陈沂、吴晗、刘芝

明、康克清、梅兰芳、老舍、赵寿山、王维舟、吴克坚、邵式平、平杰三、张维桢、哈丰阿、周信芳。秘书长陈沂(兼),副秘书长崔月犁、曾昭生、刘汉、王敏昭、于北辰、蒙定军、犹凤岐、朱辉、王焕宇、刘洪涛、张凯、边亭。

第一总分团:团长邢西萍,副团长陈其瑗、钱端升、侯德榜、黄琪翔、洪深、史东山、马思聪、程砚秋、金城。秘书长于北辰,副秘书长曹孟君、吴平、谭惕吾、葛志成。】

——《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及各总分团补正名单》,载《人民日报》1953年10月20日。

1954年(54岁)

1月8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扩大会议。

【(新华社八日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八日下午举行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扩大会议。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长贺龙将军在会上作了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的工作的报告。

到会的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副主席彭真、陈叔通,常务委员司徒美堂、李四光、沈雁冰、邵力子、章乃器、许德珩、许宝驹、梁希、彭泽民、蒋南翔、刘宁一、萧三、罗隆基,秘书长刘贯一,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华北抗美援朝总会主席聂真,各人民团体代表栗再温、钱三强、张文浩、廖梦醒、伍云甫等。

到会的还有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长贺龙,副总团长邢西萍、章伯钧、蔡廷锴、朱学范、陈沂、吴晗、刘芝明、康克清、梅兰芳、周信芳,第一总分团副团长陈其瑗、钱端升、侯德榜、黄琪翔、洪深、史东山、程砚秋、金城,第五总分团团长邵式平等。

会议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副主席彭真主持。

贺龙总团长在报告中报告了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朝鲜对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工作，以及给予朝鲜人民和朝、中国人民军队的鼓舞。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朝鲜的慰问，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中、朝人民的友谊团结，鼓舞了志愿军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决心。

贺龙总团长报告后，慰问团副总团长朱学范、第五总分团团长邵式平、第一总分团副团长洪深、总团副团长陈沂等，相继在会上作了发言。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全文另发）。

最后，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讲话。他在讲话中，对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表示感谢。并勉励作好传达工作。】

——《抗美援朝总会举行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 贺龙将军作赴朝慰问团工作报告 会议通过关于赴朝慰问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载《人民日报》1954年1月9日。

2月5日

钱端升被选入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直属总分团。

【据新华社讯：根据二月五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会联席扩大会议关于组织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的决议，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总团组成；全国各大行政区也相继组成了总分团，慰问驻各大行政区的人民解放军；中央各机关、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及华北、北京市的代表也组成了总分团，慰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属各机关、学校和各特种兵驻京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也选派出代表组成了总分团，随总团分赴边防、海防部队进行慰问。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总团长、副总团长、秘书长名单及各总分团团长、副团长、秘书长名单如下：

总团

总团长：董必武

副总团长：陈叔通、滕代远、张鼎丞、彭泽民、茅盾、廖承志、梁希、蒋光鼐、邓颖超、乌兰夫、李烛尘、史良、高崇民、王从吾、谢有法、蔡树藩、何长工、谭余保、张启龙、张友渔、许广平、袁任远、栗再温、张苏、黄松龄、杨明轩、梅兰芳、胡克实

秘书长：廖承志（兼）

直属总分团

团长：滕代远，副团长：彭泽民、邓颖超、张友渔、聂真、陈其瑗、曾昭抡、钱端升、侯德榜、洪深、梁思成、康永和、史东山、王之相、刘莱夫。

秘书长：于北辰

第一总分团（志愿军）

团长：谢有法，副团长：王永年、原星、李钢、严庆堤、聂济峰、刘春山、张秀川、齐威。

秘书长：王永年（兼）】

——《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总团长、副总团长、秘书长名单及各总分团团团长、副团长、秘书长名单》，载《人民日报》1954年2月17日。

2月7日

《新建设》杂志改国营，钱端升担任编委会成员。

【（本报讯）《新建设》杂志经有关各方面协商，并取得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的同意，已自一九五四年第一季度起改为国营，成为光明日报社事业的一部分，并由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聘请费青担任总编辑。

《新建设》杂志原为统一战线的学术性的综合刊物，其任务为团结全国学术界人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探讨学术方面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各种问题，以期对于学术的研究和提高有所贡献。在今后编辑工作中，《新建设》将为更好地实现这个任务而努力。

《新建设》杂志为了更广泛地联系文化学术工作者，决定扩大原有的编

辑委员会。现在参加编委会的，有千家驹、王亚南、王良仲、王赣愚、向达、李正文、李广田、宋云彬、周太玄、金岳霖、胡绳、邵宗汉、林传鼎、孙晓邨、孙承佩、侯外庐、范文澜、袁翰青、陈翰笙、陈垣、陈此生、马特、夏康农、张志让、傅彬然、高天、梅龚彬、陶大镛、费孝通、费青、冯素陶、华岗、雷洁琼、楚图南、楼邦彦、闻家驷、樊弘、郑昕、邓初民、潘光旦、潘静远、翦伯赞、钱伟长、钱端升、储安平、谢觉哉、严景耀、关梦觉（以姓氏笔画为序）等人。并经推定吴晗、邵宗汉、袁翰青、张志让、陶大镛、费青、费孝通、雷洁琼、钱伟长（以姓氏笔画为序）等九人为常务编委，由吴晗任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新建设》杂志二月号定于二月八日出版，本期主要内容有：孙晓邨、芦鸿麟：《论我国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千家驹《论国家资本主义》等篇关于学习总路线的文章，和关梦觉：《学习〈斯大林全集〉第二卷》，钱伟长：《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照耀下高等工业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梁思成：《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黄药眠评《三千里江山》等篇文章。】

——《〈新建设〉杂志改为国营并扩大编辑委员会》，载《光明日报》1954年2月7日，第3版。

2月17日

钱端升前往车站、机场欢送慰问解放军代表团总团代表出发。

【（新华社十七日讯）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总团代表、志愿军代表一部和各慰问剧团、技术团、文艺工作团人员，共一千二百多人，十七日分别离京赴各地慰问人民解放军。

到车站和机场欢送的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邢西萍、易礼容、周新民、辛志超，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秘书长刘贯一，副秘书长吴茂荪、崔月犁，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宣传部副部长黄远，各民主党派代表邵力子、罗隆基、陈其瑗、

许宝驹、蔡廷锴、胡愈之、严希纯、杨美真，各人民团体代表刘子久、李沾吾、曾宪植、倪斐君、胡兰生，华北和首都各界代表聂真、平杰三、曾昭抡、钱端升等。】

——《慰问解放军代表团总团代表出发》，载《人民日报》1954年2月18日。

2月20日

钱端升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慰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大会。

【据新华社讯：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在二十日下午隆重地举行了慰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大会，向朱德总司令和英勇可爱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表示深切的慰问和敬意。慰问大会在北京怀仁堂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出席了大会。出席大会的还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贺龙、陈毅、聂荣臻、粟裕、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萧华、甘泗淇，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总后勤部副部长周纯全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各部、院首长陈赓、萧克、李涛、杨立三、李聚奎和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参加大会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政治委员吴法宪，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副政治委员崔田民，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副政治委员邱创成，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副政治委员向仲华，工兵司令员陈士榘，防空部队司令员周士第，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李天焕和各特种部队首长以及在北京的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和各级干部、战士代表。

出席大会的有：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总团长董必武，副总团长滕代远、彭泽民、廖承志、梁希、邓颖超、李烛尘、张启龙、张友渔、许广平、袁任远，直属总分团副团长聂真、陈其瑗、曾昭抡、钱端升、侯德

榜、洪深、梁思成、康永和、史东山、王之相、刘莱夫；还有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全国各大行政区派来的代表：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第一总分团副团长刘春山，第二总分团副团长李敷仁，第三总分团副团长廖苏华，第四总分团团长张鼎丞，第五总分团副团长李明灏，第六总分团团长张苏，第七总分团副团长温建平。

出席大会的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副主席彭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京常务委员陈劭先、朱蕴山、余心清、王昆仑、罗隆基、周新民、楚图南、章伯钧、马寅初、符定一、许德珩、张轸、刘子久、易礼容、沈兹九、李范一、李四光、樊弘、叶圣陶、王芸生、潘震亚、李承干、费振东、马坚、钱昌照、李书城、何瑀时、陈瑾昆、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邢西萍、许宝驹、萧三等。

出席大会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何香凝、吴玉章、徐特立、刘格平、柳亚子，中央人民政府各部、会、署首长王首道、陈郁、胡愈之、孔原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朱学范、李德全、钱三强、吴晗、田德民等。

出席大会的共一千三百多人。

大会开始，由慰问团代表向朱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等献花。

董必武总团长在会上致慰问词。（全文另发）

董必武总团长讲话后，慰问团代表向人民解放军的创造者、组织者、领导者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者、指挥者朱德总司令敬献锦旗和全国人民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呈献的礼物。在热烈的掌声和乐声中，朱总司令亲自接受了锦旗和礼物。接着，董必武总团长为朱总司令、贺龙将军、陈毅将军、聂荣臻将军佩戴了慰问纪念章，慰问团副总团长滕代远、张鼎丞、邓颖超、许广平向到会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副

主任以及各兵种司令员赠送慰问纪念章。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代表向慰问团献花致谢。会场中充满了人民和自己的军队之间的亲密热烈的团结气氛。

朱总司令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答词。（全文另发）

朱总司令致答词后，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的代表向慰问团献赠礼物。

大会在雄壮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乐声中结束，会后举行慰问演出和答谢演出。】

——《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举行大会 隆重慰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向朱总司令和英勇可爱的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致敬》，载《人民日报》1954年2月21日。

2月21日

钱端升参加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直属总分团慰问军委各部首长和工作人员。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直属总分团团团长滕代远，副团长彭泽民、张友渔、聂真、陈其瑗、曾昭抡、钱端升、侯德榜、洪深、梁思成、康永和、史东山、刘莱夫及代表团代表，在二十一日分别慰问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和总财务部。

出席各次慰问大会的有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粟裕、黄克诚，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总参谋部各部首长李涛、阎揆要、万毅、吕正操、王诤、王尚荣、苏静、邹大鹏、童陆生；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萧华、甘泗淇；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总后勤部副部长周纯全、张令彬；总财务部部长杨立三，以及各部门首长和工作人员五千多人。

在各次慰问大会上，分别由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直属总分团

团长滕代远，副团长彭泽民、聂真、张友渔代表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致慰问词，并向各部敬献锦旗、礼品和纪念章。在慰问大会上，参加大会的各部人员一再鼓掌答谢全国人民的关怀和热爱的深情。

在各次慰问大会上，分别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粟裕，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总后勤部副部长周纯全，总财务部部长杨立三代表各部致答词。他们在讲话中，一致感谢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及全国人民对人民解放军的关怀和慰问。并代表各部向代表团提出，将继续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为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人民军队，为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为保卫祖国国防安全和远东及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在各次慰问大会后，均由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直属总分团各剧团举行慰问演出。】

——《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直属总分团慰问军委各部首长和工作人员》，载《人民日报》1954年2月22日。

2月22日~23日

钱端升参加慰问团热烈慰问解放军各兵种领导机关。

【据新华社讯：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在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分别慰问了人民解放军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空部队、工兵、公安部队、铁道兵领导机关，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训练部和军校管理部的全体人员。代表团总团副总团长滕代远、彭泽民、廖承志、邓颖超、张友渔，直属总分团副团长聂真、陈其瑗、曾昭抡、钱端升、侯德榜、洪深、梁思成、康永和、史东山、王之相、刘莱夫率领代表们向他们分别传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及全国人民对他们的深切关怀和慰问。

人民解放军各兵种首长刘亚楼、吴法宪、陈锡联、邱创成、许光达、向

仲华、周士弟、成均、谭家述、罗舜初、方强、李天焕、崔田民、李寿轩、刘克、徐德操，各部首长萧克、孙毅等，都分别出席了慰问大会。

在最近几日内，解放军驻京各机关、部队，像欢度节日一样，张灯结彩，迎接亲人。许多部队的俱乐部出现了“欢迎亲人”的专刊墙报。有的墙报上用大字写着“你用什么行动迎接慰问团？”下面张贴着许多干部、战士的学习、工作计划和决心书。海军、空军和炮兵、装甲兵、防空部队等驻京机关的干部和战士们连夜赶制献给代表团的珍贵礼物，以及介绍部队战绩及建设成就的图片。

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的慰问活动，大大鼓舞了各部干部、战士们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强大国防军的热情和保卫祖国、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坚定意志。装甲兵女坦克手、二等功臣张希和说：“毛主席和全国人民派人来慰问我们，使我感到作一个人民战士是何等光荣。我向亲人们保证，我要更加提高技术，加强学习来回答亲人的慰问。”空军飞行中队长王文臣和飞行员联名写信给慰问团，表示将警惕地保卫祖国领空，保卫祖国建设。】

——《慰问团热烈慰问解放军各兵种领导机关》，载《人民日报》1954年2月25日。

2月24日~3月1日

钱端升参加慰问团直属总分团慰问解放军驻京各部队。

【据新华社讯：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直属总分团副团长张友渔、聂真、陈其瑗、曾昭抡、钱端升、侯德榜、洪深、梁思成、史东山、刘莱夫率领总分团代表，在二月二十四日到三月一日，分别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各机关、院、校和人民解放军驻京各兵种、部队进行慰问。

慰问团代表全国人民向人民海军驻京部队致敬，感谢人民海军在保卫祖国的斗争中的卓越的贡献和保护海岸线和岛屿以及渔民生产的成绩。人民海军驻京部队代表表示，他们将更加速建设现代化人民海军的工作，更加警惕地保卫祖国海防。

慰问团向警惕地保卫着首都、警卫着首都天空的人民空军驻京部队致敬。代表们并参观了机场，还和许多英勇的飞行员、机械员、地勤人员和指挥员进行了亲切的晤谈。人民空军的日益强大，给代表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慰问团慰问了装甲兵驻京部队，并访问了装甲兵的指挥员、战斗员，参观了部队的课堂、宿舍和演习场。装甲兵驻京部队为欢迎祖国人民的使者并举行了射击表演和坦克表演。人民装甲兵现代化的雄伟阵容和指挥员、战斗员们卓越的技术和学习成绩，深深感动了代表们。

慰问团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首都人民向驻京公安部队和北京市公安总队的指挥员、战斗员和工作人员表示深切的感谢和慰问。这些部队日日夜夜守卫在自己的岗位上，警惕地保卫着中央机关的安全，保卫着首都各界人民，使他们安静地生活和顺利进行生产工作，几年来建树了许多功绩，出现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

慰问团还慰问了人民解放军的工程部队，向正在参加祖国建设的工程部队的干部和战士们表示深切的敬意和感谢。

慰问团代表同时慰问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讯部和驻京通讯部队，其他部、局、处、厂等机关和院、校；还慰问了总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八一”制片厂、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军乐团等单位。慰问团还慰问了各部队医院的医务工作人员和在休养中的人民解放军伤员和病员。

慰问团直属总分团各剧团曲艺团、杂技团，也积极进行了慰问演出。】

——《慰问团直属总分团慰问解放军驻京各部队》，载《人民日报》1954年3月2日。

3月12日

钱端升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举行的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

【（新华社十二日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十二日上

午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由郭沫若主任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关于召开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事项。

郭沫若主任在说明了召开全国文教工作会议的意义和筹备情况后指出，这次会议将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讨论和确定一九五四年文教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以及一九五四年文教事业计划和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使文教工作完全遵照总路线并有效地为总路线、总任务服务。

陆定一副主任、习仲勋副主任、李德全委员、翦伯赞委员、列席会议的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杨秀峰、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潘梓年都相继发言，一致认为召开全国文教工作会议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这次会议将使我们的文教工作紧紧跟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进展，坚决地为实现毛主席所指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而斗争。

最后，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召开全国文教工作会议。

出席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的有：郭沫若主任，陆定一、沈雁冰、习仲勋副主任，委员周扬、丁西林、钱俊瑞、韦恂、李德全、贺诚、李四光、竺可桢、胡愈之、柳亚子、费孝通、吴晗、刘清扬、潘光旦、李达、符定一、沈志远、陈此生、沈兹九、欧阳予倩、阳翰笙、钱三强、陈鹤琴、艾思奇、翦伯赞、侯外庐、钱端升、雷洁琼、沈体兰、任鸿隽、叶恭绰、吴有训。

列席会议的有中央各文教部门和各大行政区文教委员会负责人十二人。】

——《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 批准召开全国文教工作会议》，载《人民日报》1954年3月13日。

3月中旬

应中共中央邀请，钱端升、周鲠生出任宪法起草委员会法律顾问，专门研究宪法草案，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

——雷磊主编：《法大群英：参与共和国立法的法大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3月25日

钱端升参加中央文教委员会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二十五日举行了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

会议根据全国文教工作会议的意见，同意补充和修改《一九五四年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全国文教工作会议的总结》以及《一九五四年度全国文化教育事业计划草案》，并一致通过将上述报告和计划草案呈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审核和批准。此外，会议还布置了传达全国文教工作会议的事项。为了保证贯彻全国文教工作会议的精神，会议对进一步增强全国文教队伍的团结，充分交换了意见。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郭沫若主任，陆定一、沈雁冰、习仲勋副主任，委员钱俊瑞、韦恂、李德全、竺可桢、柳亚子、费孝通、吴晗、刘清扬、潘光旦、李达、符定一、沈志远、陈此生、蒋南翔、沈兹九、阳翰笙、钱三强、陈鹤琴、翦伯赞、侯外庐、钱端升、雷洁琼、沈体兰、任鸿隽、叶恭绰、吴有训等三十人。

列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各文教部门负责人、各大行政区、省、市文教委员会负责人。】

——《中央文教委员会举行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载《人民日报》1954年3月26日。

4月5日

钱端升前往吊唁梁思永先生。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因积劳成疾，久治无效，不幸于四月二日下午四时四十分在北京逝世。遗体于五日下午在东郊人民公墓火葬场举行火葬。参加吊祭和葬仪的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陶孟和、张稼夫、竺可桢、吴有训和我国著名科学、

教育界人士张奚若、范文澜、钱端升、翦伯赞、向达、尹达、刘大年、钱三强、曹日昌等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

梁思永先生生于一九〇四年，广东省新会县人，从事考古事业已经二十多年。他曾领导和参加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安阳后岗、济南龙山镇等墓葬和遗址的发掘工作及热河、黑龙江等处的考古调查工作，写有不少关于考古学的论文、著作。主要的有《城子崖》、《后岗发掘小记》、《小屯龙山与仰韶》、《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昂昂溪史前遗址》等。

梁先生于一九五〇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对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极为关心和重视，在卧病期间，仍不断计划和指导田野调查发掘和室内的研究工作。解放后数年来，中国考古研究工作方面的成就和发展，是和梁先生的努力分不开的。

中国科学院准备在最近期间举行纪念会，并将指定专人整理他的遗著。】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逝世》，载《人民日报》1954年4月6日。

4月18日

钱端升参加梁思永先生纪念会。

【中国科学院在十八日举行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纪念会。

参加纪念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负责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文化部等单位的代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教授和学生、梁思永先生生前友好等三百多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参加了纪念会。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致悼辞说：梁思永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位卓越的热情的学者，他三十年来在学术上的忘我的艰辛的工作，对中国考古事业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永先生虽然久病，身体衰

弱，但仍然以极大热情领导考古工作，并有了很多成就。梁思永先生这种热爱祖国科学事业的献身的精神，将永远成为鼓舞中国科学工作者前进的力量。

历史学家尹达在会上介绍了梁思永先生生平的学术活动和成就。梁思永先生生前友好郑振铎、钱端升、裴文中、苏秉琦先后在会上讲话。

最后，梁思永先生家属代表梁思成先生在会上讲话。他对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在梁思永先生患病期间所给予的热情的关怀和慰问表示深切的感谢。】

——《中国科学院举行梁思永先生纪念会》，载《人民日报》1954年4月21日。

4月26日

钱端升前往机场迎接挪威人民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挪威人民文化代表团一行十二人由团长古托姆·耶辛、副团长拉格纳·福贝克率领，在二十六日乘飞机到达北京。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会长周鯁生，副会长陈翰笙、钱端升，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金子明，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方明，中国建筑工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张进和文化界、宗教界人士洪深、郑振铎、华君武、蒋翼振等人。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挪威政府驻我国的建交谈判代表高兰。】

——《挪威人民文化代表团到京》，载《人民日报》1954年4月27日。

4月27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办的欢迎挪威人民文化代表团宴会。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会长周鯁生于二十七日在和平宾馆举行宴会，欢迎应邀来我国访问的挪威人民文化代表团。

挪威人民文化代表团团长耶辛教授、副团长福贝克牧师及代表团全体团员都参加了宴会。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陈翰笙、胡愈

之、钱端升，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秘书长刘贯一、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金子明和文艺界、医学界、宗教界人士洪深、郑振铎、方石珊、蒋翼振等人。

周鲠生在宴会开始时致词，对挪威人民文化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中挪两国人民长久存在着友谊，这个友谊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最后说：挪威人民和中国人民同样爱好和平，挪威人民文化代表团的访问中国，意味着中挪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的增进。

耶辛团长和福贝克副团长也在宴会上先后发表演说，耶辛说：挪威代表团是由不同政治和宗教信仰、不同职业的人组成的，但是都抱着同样的心情来访问新中国。他表示，代表团回国后，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给挪威人民，以此作为对世界和平运动的贡献。

宴会在友好气氛中进行。】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欢宴挪威人民文化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4年4月29日。

5月3日

钱端升担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于五月三日在北京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选出了理事一百一十六人。常务理事二十九人。同时还选出了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名单如下：

理事：

丁玲、丁里、丁西林、于蓝、王亚平、王芸生、方纪、田汉、田德民、白希清、白寿彝、安尼瓦尔、平错旺阶、老舍、任白戈、艾大炎、艾思奇、朱伯深、伍云甫、李桂森、李颀伯、李德全、李敷仁、李沾吾、余心清、吕骥、何其芳、何成湘、吴文焘、吴化之、吴冷西、吴茂荪、吴学谦、吴耀宗、邵宗汉、孟波、竺可桢、周扬、周立波、周巍峙、洪深、哈丰阿、茅

盾、柯仲平、胡愈之、范文澜、范长江、马思聪、马寅初、孙晓村、袁水拍、袁雪芬、草明、夏衍、涂长望、徐平羽、倪斐君、唐明照、柴泽民、郭沫若、郭朋、陈宇、陈沂、陈忠经、陈荒煤、陈翰笙、陆瑾、曹禺、曹日昌、曹孟君、梅益、梅兰芳、张仲实、张奚若、张铁生、许广平、区棠亮、黄现璠、阳翰笙、华君武、华罗庚、贺绿汀、黑丁、傅连璋、焦菊隐、楚图南、董越千、赵汎、赵复三、赵朴初、齐白石、廖承志、熊复、熊向晖、荣高棠、郑拓、刘白羽、刘开渠、刘尊棋、刘宁一、刘贯一、郑振铎、欧阳予倩、赖少其、钱俊瑞、钱伟长、钱端升、冀朝鼎、蔡若虹、蔡楚生、戴爱莲、谢冰心、薛樵、萨空了、瞿希贤、萧三

常务理事：

丁西林、丁里、白希清、老舍、艾思奇、吴耀宗、竺可桢、洪深、胡愈之、范长江、陈沂、陈忠经、陈翰笙、陆瑾、张奚若、区棠亮、阳翰笙、华君武、楚图南、董越千、赵汎、廖承志、荣高棠、刘宁一、刘贯一、郑振铎、冀朝鼎、萨空了、萧三

会长：楚图南

副会长：丁西林、阳翰笙、洪深

秘书长：陈忠经】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名单》，载《人民日报》1954年5月5日。

5月6~22日

全程参与宪法起草座谈会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对宪法草案提出若干修改意见。

——雷磊主编：《法大群英：参与共和国立法的法大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7-48页。

5月27日

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主持此次会议。钱端升对

宪法草案（初稿）序言和第一章再次提出若干意见。

——雷磊主编：《法大群英：参与共和国立法的法大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5月28日

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主持此次会议。钱端升对宪法草案（初稿）第二章的第一节和第四节提出若干意见。

——雷磊主编：《法大群英：参与共和国立法的法大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5月29日

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主持此次会议。钱端升对宪法草案（初稿）第二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提出若干意见。

——雷磊主编：《法大群英：参与共和国立法的法大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5月31日

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主持此次会议。钱端升对宪法草案（初稿）第二章的第四节和第三章提出若干意见。

——雷磊主编：《法大群英：参与共和国立法的法大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6月8日

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主持此次会议。钱端升对宪法草案（初稿）修正稿全文提出意见。

——雷磊主编：《法大群英：参与共和国立法的法大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49页。

6月11日

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此次会议。钱端升对宪法草案中武装力量的称呼问题提出意见。

——雷磊主编：《法大群英：参与共和国立法的法大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

6月22日

钱端升发表《用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来迎接宪法草案的公布》一文。

【用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来迎接宪法草案的公布

钱端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已经公布了。这标志着年轻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向着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稳步前进。我以兴奋、感激的心情来迎接宪法草案的公布。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我感激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在他们正确领导之下，我们国家才具备了举行普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的必要条件。是在他们领导之下，我们才获得了这样一个能够充分反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和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的宪法草案。

我参加革命很晚，在歧途彷徨的年月里，我还有过不利于革命的言行。建国以来，我为人民服务也还不够全心全意。但是我终于参加了人民革命的事业，参加了四年多以来改革社会的一些大规模的斗争。宪法的任务之一是巩固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和建国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新胜利，也就是要巩固任何人对于人民事业所做出的一切或大或小的贡献。宪法是保卫全国人民的革命利益的武器，也是保障个人为人民效力的武器。宪法草案使我又一度体会到个人的利益是和国家的利益、全体人民的利益完全相结合的。在这样的认识上，我深切感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是百分之百的我所需要的

宪法。

作为一个政法教育工作者，宪法草案的公布和不久以后宪法的颁布，使我感觉到我的任务更光荣、更艰巨了。宪法的制定标志着人民民主制度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备。随着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人民法制也将有进一步的发展，以适应国家新的需要，以保障经济建设的胜利完成。因此，政法教育工作者必须宣传宪法，宣传宪法的精神和内容，也必须宣传在国家有计划建设时期逐步健全和运用法制武器的重要性，更必须宣传人民守法、干部忠诚行法的必要性。必须培养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政法干部。这就要加强政法院系的学生们的思想教育、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要求他们划清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政策，学习苏联在政法工作方面的先进经验。而政法教育工作者必须首先教育自己，所以在改进政法教育工作的同时，便必须加强自己的学习。我们的国家正在向前迈进，人民法制也随着向前迈进。因此国家需要更多的、更好的政法干部。这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将要随着宪法的颁布而落到我们的肩上。我愿意用欢欣鼓舞而又兢兢业业的心情来承担这个任务。

在大革命以前的年月里，我曾经醉心于英、美资产阶级的“宪法”，迷恋于“天坛宪法草案”等，当然我过去所盼望的宪法和我所进行教学的宪法，是资产阶级的宪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本来丝毫没有实现的可能。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公布了。这个宪法草案的初稿是中共中央提出的，既总结了我国人民革命的经验和建国以来的建设经验，又为我国人民指出了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正确道路，既吸收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宪法的先进经验，又符合于我们国家现阶段实际情况。这个宪法必然能保证我们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不但如此，我还因为宪法草案之将在全国人民中展开讨论而受到鼓舞。在我自己参加讨论初稿的过程中，我一方面深刻地认识了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本质，另一方面又亲切地体会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国的根

本大法是通过怎样的民主讨论过程而得出来的。凡是参加讨论的人都是以主人翁的态度，反复讨论了初稿，不严求详。毛主席所领导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真是虚怀若谷，大家所提出的邮件，无不加以考虑，凡是合用的意见无不加以采纳。现在宪法草案就要在全国人民中展开讨论了。全国人民的意见也必定会得到宪法起草委员会同样的或更多的重视。这样而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将一定是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宪法，一定是全国人民所乐于遵守的宪法。】

——钱端升：《用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来迎接宪法草案的公布》，载《光明日报》1954年6月22日，第3版。

6月29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对政法教育方针任务的一些体会》一文。

【对政法教育方针任务的一些体会

（北京政法学院院长 钱端升）

要巩固革命政权，就必须加强政法工作；要加强政法工作，就必须培养胜任的政法工作干部。如此，政法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是不难认识的了。但我发觉，我对政法工作和政法教育的认识还很不够。直到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政法教育会议，我才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

政法工作的特点在于它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政策性。因此，它必须紧紧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必须掌握在忠实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干部的手里。而政法工作者的任务，则在于不断强化国家机器，为保障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政法工作的特点给政法教育带来了相应的特点。

第一，政治法律科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政策性，旧的政法思想体系代表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旧的政法教育是为反动统治阶级培养服务工具的。因此，人民的政法教育必须在彻底否定旧的政法思想体系，彻底批判旧的政

法理论的前提下建立新的政治法律科学；必须在密切结合政法建设实际的基础上进行教学。任何因循旧制和忽视实际的想法和作法，都会给政法教育带来损害。

第二，政法教育必须特别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政策的教育，使学生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明确认识国家发展的方向，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成为维护党和政府的方针、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国家法纪的鼓动者、宣传者及战士，积极为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服务。

第三，政法教育必须特别加强全体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教育，使学生具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品质和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思想作风，使学生具有丰富的政治热情、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良好的组织性、纪律性。

过去我没有真正认识到政法工作的重要性。我有着相当严重的客观主义的思想，对于我自己作为一个政法教育工作者的要求则是不够严格的。在正确地认识了政法工作和政法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它们的意义之后，我将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纠正我过去的缺点。

二

为实现过渡时期政法工作的总任务，在今后两三年内采取以短期轮训在职干部为主，并切实注意培养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的方针，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大量培养与提拔工农干部和有计划地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使他们成为各项建设事业中的骨干，乃是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从政法工作来看，依靠具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和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的工农干部，更具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些干部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对党和国家有过很大的贡献，并且在政治上受过严格的锻炼。在最近几年的恢复和建设事业和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中，他们继续站在斗争的前列，为人民作出许多的成绩。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正是政法工作的骨干。但他们的弱点是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较低，对政策、业务不够熟悉，如采取短期

轮训办法，迅速提高他们，则他们在今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政法学院负有短期轮训和长期培养相结合的双重任务。就北京政法学院目前条件来说，任务无疑是艰巨的。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认识短期轮训为主的重要意义，并善于组织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至于对较长年制的本科学生的培养，我们同样认识到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补充新的力量，壮大政法工作者的队伍，适应国家日益发展和日益提高的对于政法工作者的要求。

在全国政法教育会议上，经过座谈讨论，使我得到启发的是：要贯彻短期轮训为主的方针，不但需要对这个方针有清楚的认识，还必须在思想感情上和工农打成一片，才能努力克服困难，完成这一重要任务。我在这一方面过去做得还不够，因而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损失。这是我今后应该努力的一点。

在本科学生中增加工农学生比重，这又是培养方针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另一方面，也是高等学校教学改革标志之一。因为政法工作既然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政策性，则工农学生在掌握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高了政策思想水平和学习了政治法律科学之后，就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快地锻炼自己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骨干。

工农成分学生入高等学校学习，一开始是会有不少困难的。这就要求我们采取各种办法帮助他们，满腔热情地去关怀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注意克服领导方面和教学人员可能产生的漠不关心或轻视他们的错误态度。

三

为了实现政法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必须进一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针。在学习苏联问题上，我的思想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虽然我原也认识到一切工作都要学习苏联，但过去总觉得有些工作可以先学多学，至于短期轮训和二年制专修科则有学不上之感，得首先从现有基础上摸索。但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

扭转了我的片面认识。重视中国实际，密切联系实际，在总结实际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丰富我们的政治法律科学，这无疑是完全对的；同时我也认识到：中国的实际——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和革命法制，如《一九五四年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文件中所指出的，正在和将要迅速地发展。为了保障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实现，继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后，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最近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又召开了审判工作座谈会；通过上述会议，不仅各项工作的方针任务更加明确，各项业务也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些发展情况表明：我们结合中国实际，并不单单结合现有的，更重要的是要能适应这种发展趋势，以求能够结合已经萌芽的在新任务面前必将大大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情况，而全面地、系统地、不懈地学习苏联先进的政治法律科学，就能帮助我们总结自己的实际经验，使人民民主法制日益健全完备。

当然，学习苏联，系统地进行政治法律教学，目前困难是不少的。但我们必须有创造条件积极克服困难的精神，争取在四五年内为政法教育树立巩固的基础。就政法学院来说，最近四年，也就是政法学院第一班本科生的学习时期，将是我们的最艰苦的日子，因为我们在教师、教材方面还有些困难。但是，只要我们能够胜利地度过这一个时期，我们的政法教育便有了有利的发展条件。中国人民大学一开始时，困难也是不少的，四年来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就是不断克服困难，并不断纠正各种思想偏向的结果。

在贯彻执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针的同时，必须揭露批判反动的政法理论，以进一步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这是在建设新法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工作。我自己沾染旧政法理论较深，思想改造也更是艰巨，但是努力做好这一工作，仍然是我们每一个政治法律科学工作者的责任。

四

加强工人阶级思想领导，加强集体领导，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加强团结，是完成政法教育基本任务的决定关键。我过去在这些方面是有不少缺点的。首先是没有能够认真钻研和深刻体会党的政策指示，在工作中切实加以贯彻；同时我在工作中还未能很好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今后我一定在党的领导下努力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法学理论的学习，揭露批判资产阶级法学，继续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作风，以进一步团结全体教师，发挥其最大的力量和创造性，同时也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作用。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提出了强化国家机器的重要性。几年以来，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从而在各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出以后，我们的任务更为重大了，而全国政法教育会议又已明确地提出和解决了方针任务、培养目标等重要问题，今后我们应该满怀信心地办好我们的政法教育，为完成这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

——钱端升：《对政法教育方针任务的一些体会》，载《人民日报》1954年6月29日。

6月29日

钱端升出席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会在六月二十九日举行第一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理事会主席董必武、副主席沈钧儒、谢觉哉、张志让、钱端升，理事史良、朱其文、周鲠生、梅汝璈、许德珩、潘震亚等二十八人。

会议首先听取了我国出席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会议代表团朱其文的报告。报告说，从六月五日到七日在德国来比锡举行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会议，讨论了关于国家主权与国际安全问题、“麦卡锡主义”问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试验问题等三个议题；我国代表团就国家主权与国际安全的问题作了发言，受到出席大会的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和赞同；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上述问题的三个决议，号召世界民主法律工作者和各国人民，努力保卫国家主权以确保国家安全；反对法西斯的麦卡锡主义；要求禁止使用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这次会议还致电声援日本松川事件的无辜受害者。

会议在听取了上述报告后，接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进行了讨论。在主席董必武讲话之后，沈钧儒首先发言，他说：从满清末年起，中国人民就曾经不断地向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要有一个人民的宪法；但是，从光绪皇帝到蒋介石匪帮，他们所立出来的“宪法”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骗人把戏。五六十年以来，我梦寐以求的大愿望之一，就是能够看到中国人民自己制定出来一部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宪法。在今天，我终于亲眼看到了这个宪法草案的公布，并且还曾经荣幸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参加了这个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他又说：我国人民有了自己国家的根本大法之后，在我们从事法律科学研究的学术工作者面前，提出了很多新的重大课题，需要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百倍地努力来研究和阐扬我们人民宪法的原理和原则，从理论上总结我国在建立和健全人民民主法制方面的丰富经验，以便对于我国今后日益发展的立法工作、司法工作和政法教学研究工作的，提供有益的贡献。他最后说：根据宪法草案的精神，向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和从事法律工作的国际朋友们，阐扬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阐扬我国人民在国际事务中坚定不移地“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的坚强意志，是十分必要的。接着，张志让、史良等都在会上发言，对宪法草案一致表示拥护。

会议最后通过了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决议号召全体会员和全国政法工作者认真和深入地研究宪法草案，积极参加讨论，向群众广泛宣传；并通过这次研究、讨论和宣传，来提高政法工作者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进行。】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会举行会议听取了我国出席国际民主法律

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会议代表团的报告，通过了拥护宪法草案的决议》，载《人民日报》1954年7月2日。《光明日报》7月1日第1版报道与此大同小异。

7月10日

钱端升前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高中毕业同学做升学指导。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了帮助今年高中毕业学生做好升学的准备，定于七月十二日到七月十六日每天十九点三十分到二十点举办高中毕业学生升学指导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燃料工业部副部长徐达本，地质部副部长许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姜椿芳以及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校长张锡涛，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中央体育学院副院长徐英超等向高中毕业生的讲话；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等学校的同学谈自己学习的体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高中毕业学生升学指导节目》，载《人民日报》1954年7月10日。

【和高中毕业的同学谈谈学习政法

北京政法学院院长 钱端升

总路线和宪法草案所规定的社会主义这一个伟大的理想和现实，鼓舞着全国人民，成为前进的动力。可是我们的敌人却不喜欢社会主义，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造成许多障碍。这就是：国外帝国主义的包围，国内阶级敌人的破坏，将被消灭阶级的反抗；此外还有人民中某些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违法行为等。的确，我们必须多建几个工厂，多开几个矿山，多修几条铁路。但这样，是不是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呢？不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立社会主义，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来领导和保障。同学们都热爱着各种巨大的新型的机器，知道他们对于生产的重要意义；而我们的国家却正是一部由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所凝成的最大的机器，叫做“国家机器”。这部机器发动着全国人民的力量，调节着各个方面的工作，我们必须依靠

它，运用它，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我们的敌人千方百计想破坏削弱我们的“国家机器”。同学们试想一下：如果“国家机器”受到损害，或者让敌人混进像鞍钢这样重要的基地区进行破坏，那会给人民带来多么严重的损失！那还谈得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吗？机器需要有熟练工人操作，“国家机器”也同样需要有大批忠实的干部来操作和掌握它，来爱护和加强它。政法工作是管理“国家机器”、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工作，所以从事政法工作也就是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伟大的斯大林曾说过：经济胜利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事业包括无遗，不能因经济胜利造成政治上的盲目和麻痹，必须把经济上的胜利和政治工作的胜利结合起来。这些教诲是值得我们深刻地汲取和领会的。

政法专业所要培养的人才就是：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热爱祖国、体格健全、具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掌握先进政法科学、熟悉专门政法业务的工作干部和法学家。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站在最前面，负有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而又重大的使命。政法专业所要学习的课程主要是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等基本理论课，关于国家与法律的理论课、历史课和各种国家法课程，以及苏联和中国各种专业课如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此外还学习一些重要政策课和语文课。学习时间是四年。学政法后担任的工作主要将是人民法院的审判员、检察机关的检察员，一部分将是其他国家机关工作干部及科学研究人员等。审判员要根据政策、运用法律，处理婚姻、财产、债务、窃盗等案件，镇压反革命活动，承办不法资本主义国家的“五毒”行为等；检察员要维护法制的统一，加强法纪的作用，与一切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所有这些工作，一般人容易误解为仅是“和坏人坏事打交道”，麻烦而意义不大。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处罚坏人坏事是为了保护好人好事，为了推进生产建设。既然有坏人坏事存在，难道我们还能熟视无睹，让它发展吗？只有运用像宪法和法律这样重要的武器打击了坏人坏事，才能保护国家的利益、人民的权利并提高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和生

产热忱。因为这些事情和人民切身利益血肉相关，所以不能认为是小事。解放以来有些地方由于仍被坏分子把持操纵，人民抬不起头，当镇压了这些反动分子以后，人民高呼“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认为是第二次解放，这不是很具体生动地说明了政法工作的意义吗？审判工作并不只是简单地判罪杀人，整个政法工作也不只是“和坏人坏事打交道”，它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加强守法教育，提高人民的觉悟，巩固革命秩序；尤其是要加强和健全人民民主制度，吸引广大劳动群众来管理国家、当家作主。这种教育人民和健全国家制度的作用，对推进国家建设的积极意义，不是很明显吗？

既然政法工作如此重要，和经济建设、人民利害如此息息相关，就应该掌握在忠实于人民事业的干部手里。在一九五二年司法改革运动以前，由于当时许多法院组织不纯、思想不纯、坏人把持，按国民党反动派的六法观点办事，结果使人民群众受到许多损害，反动分子却逍遥法外，为所欲为，人民曾极端不满，把这些法院叫作国民党法院。这种现象是极端严重不能容忍的。这种情况说明：在政法工作战线上，我们必须依靠老干部作为骨干。但这也不是说，只要老干部做就可以了，还必须培养补充一批新的年青干部，培养一批未来的专门人才和法学家。今年召开的全国政法教育会议规定要恢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法律系，规定政法学院改二年制为四年制本科，并明确地解决了方针、任务、培养目标等问题，以求更好地培养政法建设人才。这样政法教育就将随着经济建设的进展，政法工作的加强，而稳步地发展和扩大。面对着祖国这一迫切的需要，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青年，应该本“舍我其谁”的精神立志担当起政法工作这一重大而光荣的任务。

同学们：你们也许知道政法工作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政策性，这样你们一定关心政法是不是难学的问题。当然政法工作除要有丰富的业务知识外，还要求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明确的阶级立场，但这不等于说政法专业就比其他专业难学。因为作为社会主义的战士，无论从事哪一项工作都需要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明确的阶级立场，要不然就什么也不容易做好；所以尽量提高

自己的政治水平，更好地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更大的力量，这是每个青年都应该不断努力的。只要你们善于向革命英雄们学习，不仅要求自己成为一个专家，而且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那你们就一定可以使自己成为祖国需要的德才兼备的干部。这样，学习政法也就无所谓难学不难学，好学不好学了。

高中毕业的同学们：你们都有着丰富的理想和高度的热情，希望轰轰烈烈地为祖国作一番事业，负更多的责任。美丽的青春所发射出来的这种光辉的力量是十分可贵的，祖国当然希望你们都成为英雄和模范。每项建设工作都是重要的，都需要辛勤艰苦的劳动，都需要有埋头苦干的精神；而且只有辛勤的劳动所获得的成绩，才能得到人民给予的信任、鼓励和荣誉。人民要求每个岗位都出现更多的英雄模范，人民给予各种有贡献的工作者以永远的光荣和鼓励，并根据他们的德才和贡献委托以相适应的责任。同学们：人民掌握政权的今天，为我们开创了广阔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个政法工作者或法学家，他和其他建设岗位的工作者一样，负有同样重大的责任，享有同样的荣誉，有着同样伟大的前途。】

——钱端升：《和高中毕业的同学们谈谈学习政法》，载《光明日报》1954年7月22日，第2版。

7月30日

钱端升发表《参加宪法草案（初稿）座谈会的体会》一文。

【参加宪法草案（初稿）座谈会的体会

钱端升

我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所组织的宪法问题分组座谈会。这对于我是一次内容极其丰富、教育意义极其深刻的学习。

一、学习总路线和学习宪法草案

在座谈，也就是在讨论、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过程中，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毛主席说“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

塔”这一英明指示的重要性。

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目的是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宪法必须反映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特点，必须充分表述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要求，也必须指出我国人民为了实现这个要求而奋斗的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宪法草案正是反映了这一个特点的，表述了这一个要求的，指出了这样的道路的。可以说，我国第一个宪法的基本任务就是为了争取总路线的贯彻、总任务的完成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实现。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如果我没有学习过总路线，我必然不能领会宪法草案的这一基本精神，也必然不能理解宪法草案中的若干条文，特别是“总纲”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那两章中的一些规定。

但是，我的领会、我的理解仍然是不够深刻的、透彻的。这是因为我对于总路线的学习还不够系统、深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遵守宪法是每一个公民的业务，因此我更有必要继续不断地学习总路线。因此，我也深信：划清工人阶级的与非工人阶级的思想界限，在工作中贯彻总路线，不但目前对于宪法草案的学习，并且将来对于宪法的运行，都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一次参加宪法草案（初稿）座谈会的人一共有五百多人，加上全国各地参加讨论的人，一共有八千多人。就我所知道的，很多很多的人同我一样地感觉到，总路线的学习有力地帮助了宪法草案的学习。现在，宪法草案的宣传、学习和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展开了。我相信，在前一个时期的关于总路线的学习也一定将成为全国人民学习宪法草案的有利条件。时时刻刻记住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且以贯彻总路线的要求来要求学好宪法草案，那么，宪法草案的精神实质也一定可以通过学习而领会得到的。

二、学习宪法草案的思想感情

在宪法问题分组座谈会上，人们无论在谈感想时，在提问时，或者在提出修改意见时，都洋溢着对于祖国、对于人民、对于党和毛主席、对于苏联

的无限热爱。这充分反映了我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思想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胜利。

将近五年以前，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们也曾对当时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共同纲领草案作了多次的分组讨论。这些代表或者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华侨的领导者，或者是各阶层有代表性的人士。当时的讨论也是很认真而且热烈的。但是，这一次宪法问题座谈会上所普遍显示出来的人民的感情曾经鼓舞了每一个参加座谈会的人。

对祖国，人们都有着无比的热爱。宪法草案（初稿）对祖国的疆土并没有用条文来规定，而且我们国家并不是像苏联那样的联盟国家，本来也无须在宪法中规定疆土。但是，由于人们对台湾尚待解放是牢牢记在心上的，便有许多人要求将各省区列举在宪法草案之内，因而也可以将台湾是我国的领土写在宪法草案上。人们就是这样的关心着祖国的一切，关心着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对广大人民群众，大家的热爱是难以言语来形容的。“序言”是以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的英勇奋斗开始的。人们想到百余年来我国人民壮烈伟大的奋斗时，便要求在“序言”中具体地多写一些。尽管因为宪法的序言必须有高度的概括性，不能太长，不可能这样写，这一要求却说明了人们对于革命的伟大胜利有着怎样的珍视。

因为热爱人民，人们也热爱人民民主制度。在宪法草案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了保证它是这样的一个机关，人们对于它的职权表现了无比的关心，唯恐列举得不够周密。有的建议增添这样一项职权，有的建议增添那样一项职权，归根结底，他们的目的都在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更见充实。

热爱人民，也就必须由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对他们实行专政，并且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对这些，宪法草案（初稿）本已有了充分的规定。但是人们在座谈过程中也提出了不少的修改意见，总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

对党 and 毛主席，人们在座谈中表示了无限的信赖和爱戴。在宪法草案（初稿）全文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两次的提到。人们则希望更多的提到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一致认为只有毛主席应担负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因而便要求以更大的荣誉、以更多的职权给毛主席。人们也对宪法草案（初稿）表示无比的拥护和满意，认为这是中共中央提出的，毛主席亲自领导起草的，是不会有错的。

对于苏联的热爱，在座谈会中，也有着敏锐的反映。我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建国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新胜利是和苏联无私的援助分不开的，我国同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也将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在座谈会上纷纷要求把我国和苏联的友谊写得更突出些。这说明了正在遵循着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满怀信心地向前迈进的中国人民对苏联是有着无比的信赖和热爱的。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和领袖、热爱苏联：这些完全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的思想感情使所有参加座谈会的人们深深地感觉到，我国人民不仅是伟大而且也是无比的坚强，同时也深深地感觉到这几年来在人民中间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使我们每一个人有了提高。

三、学习宪法草案是光荣的政治任务

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我们国家将用经济计划来指挥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完成，宪法草案也就给了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种新的任务。

每一个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和公共生活规则，必须担负宪法所规定的各种义务。这些是最起码的条件。作为一个好公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妇女、私营工商业者还必须遵循着宪法所指出的道路，自觉地、积极地为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

每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这些也是最起码的条件。作为一个优秀的人民勤务员，他还

必须根据宪法所提示的总的精神，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使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充分的保证，使人民的事业得到最大可能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建设得以胜利实现。

宪法草案所以必须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广泛热烈的宣传和讨论，就是为了使大家能够明了宪法的主要内容、明了宪法和每个人本身的关系，使大家能在宪法颁布之后严格地遵守宪法。因此，每个人也必须好好地积极地参加宪法草案的学习和讨论。这是非常必要的。

同样，现在所公布的还只是宪法草案。苏维埃宪法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所以是真正民主的宪法，就因为他们制定、颁布以前都经过了全国人民的热烈的讨论，并且宪法起草委员会也采纳了人民群众所提出的可以采纳的意见。我们国家的宪法也将是这样一个真正民主的宪法，所以也要依靠人民群众对于宪法草案提出意见，以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根据其中可以采纳的意见，再次对宪法草案作出必要的修改，然后再将修改草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通过。因此，人民群众对宪法草案提出意见是必要的。

有人也许会这样想：“宪法是专门性的文件，不是一般人所容易了解的。”在宪法问题座谈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参加座谈会的五百多人中，大多数的人也的确曾经有过这种顾虑。但是，当我们响应了党和毛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号召，有了好好学习的决心后，这个顾虑便很快地被消除了。我们中间很多人在业务上向来是很少有机会触摸法律的，但这并不妨害我们对宪法草案（初稿）进行比较深入的学习。在座谈的过程中，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积累了关于宪法的丰富知识，不仅对宪法草案（初稿），而且也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都有了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我们都能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宪法草案（初稿）提出了意见。由五百多个人组成的十七个组，经过了一共二百六十次的座谈会之后，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和问题。通过了阅读、讨论、提出意见、再讨论等等的步骤，我们不但提出了见得到的和想得到的意见，而且我们对宪法草案（初稿）也取得了比较全面正确的了解。这

说明了，学习宪法草案的困难是不难克服的。相反地，只要我们将宪法草案的学习和讨论当作每一个公民的政治任务来对待，只要我们认识到制定宪法这一事件的巨大政治意义，那么，不但在宣传和讨论宪法草案的现阶段中，我们可以提出意见，而在宪法颁布之后，我们也必定可以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为实现宪法所要实现的总目标——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钱端升：《参加宪法草案（初稿）座谈会的体会》，载《光明日报》，1954年7月30日，第3版。

8月7日

钱端升等致电美共总书记和艾森豪威尔总统。

【（新华社九日讯）中国政治科学研究者十九人在八月七日分别致电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和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丹尼斯，祝贺丹尼斯五十岁生日。中国政治科学研究者也在同一天致电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抗议美国政府迫害丹尼斯和其他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美国进步人士，并要求立即释放丹尼斯和其他政治犯。

中国政治科学研究者在给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电文中祝贺美国共产党在争取和平和美国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斗争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电文并附有致丹尼斯的贺电和致艾森豪威尔的抗议电的全文。

致丹尼斯的电文说：“亲爱的丹尼斯同志：在美国政府横蛮迫害的政策下面，您已经在亚特兰大监狱里被无辜地囚禁了三年多。美国政府为了推行对外侵略政策，乃对内实行法西斯化的统治，正在抛弃美国人民的民主自由的传统，疯狂地迫害着美国一切有思想的、善良而且正直的进步人士，包括美国工人阶级的先锋——美国共产党的党员和领袖们。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不仅受到美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且也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进步人类的反对。我们中国的政治科学研究者对于您和您的战友们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所进行的英勇的斗争，表示崇高的敬意、深刻的关怀和同情。欣逢您五十寿辰，谨电祝贺并致慰问，全世界人民是永远和您、和美国人民站在一起的。”

致艾森豪威尔的抗议电说：“值此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尤金·丹尼斯五十寿辰之际，我们中国的政治科学研究者严重抗议美国政府的继续非法囚禁丹尼斯和其他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美国进步人士。我们要求你停止对美国进步人士的迫害行动，立即释放丹尼斯和其他政治犯。”

在电文上签名的有：沈钧儒、王昆仑、张志让、许德珩、蓝公武、潘震亚、王斐然、周鲠生、王之相、戴修瓚、陈体强、朱其文、钱端升、费青、雷洁琼、梅汝璈、何思敬、王铁崖、楼邦彦。】

——《我国政治科学界和宗教界人士祝贺美共总书记丹尼斯五十岁生日 并电艾森豪威尔抗议美政府迫害丹尼斯和其他进步人士》，载《人民日报》1954年8月10日。

8月14日

钱端升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招待英国工党代表团宴会。

【（新华社十四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八月十四日举行酒会，招待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以克·艾德礼先生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

出席酒会的，有：代表团团员安·比万先生、埃·萨末斯基尔夫人、韦·伯克先生、摩·菲利普斯先生、塞·华生先生、哈·厄恩萧先生、亨·弗兰克林先生和代表团翻译林迈可夫妇。

出席欢迎酒会的，还有英国驻我国代办杜维廉。

中国方面出席酒会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陈翰笙、胡愈之、钱端升、乔冠华，秘书长吴茂荪等。

出席酒会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陈叔通，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政务委员谢觉哉、曾山、滕代远、章伯钧、陈劭先、邵力子、黄绍竑以及所属各委、部、会正副负责人叶季壮、沈雁冰、黄敬、傅作义、李德全、乌兰夫、陈其瑗、雷任民、何长工、吕正操、李葆华、杨秀峰、韦恂、贺诚、魏文伯、安子

文、丁西林，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伍修权，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等。

出席酒会的还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邓子恢、廖承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蔡廷锴、罗隆基、孙起孟、马寅初、许广平、彭泽民、陈其尤、许德珩、李纯青、罗毅等。

出席酒会的，还有：科学、教育界人士李四光、梁希、钱三强、华罗庚、陈达、蒋南翔、汤用彤、周培源、叶企孙、金岳霖、陈岱孙、周炳琳、朱光潜、梁思成、傅种孙、金宝善、戴芳澜、李宗恩、张孝骞、严景耀、楼邦彦、潘光旦、茅以升、陆志韦、方石珊，文艺、新闻界人士周扬、老舍、欧阳予倩、曹禺、田汉、张庚、赵树理、赵沅、马可、华君武、刘开渠、马彦祥、叶盛兰、杜近芳、邓拓、梅益、吴文焘、陈用文、沈建图、浦熙修，工会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刘宁一、朱学范、李颀伯、刘子久、张维桢、李永、刘英源、郝建秀、杭佩兰、陈素兰、刘德珍、马六孩、郭树德、谷发明，工商界人士沙千里、王志莘、乐松生、凌其峻，少数民族代表平措汪阶、朋斯克、甘春雷、柯吉义，宗教界人士吴耀宗、陈见真、陈崇桂、赵紫宸、王梓仲、蒋翼振、赵复三、达浦生、马松亭、巨赞，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钱俊瑞、楚图南、冀朝鼎、伍云甫、刘贯一、梁漱溟、章士钊、刘王立明、钱昌照及各人民团体负责人等。

出席酒会的各国驻华使节有：缅甸大使吴拉茂、巴基斯坦大使罗查、印度大使赖嘉文、瑞典大使魏斯特朗、罗马尼亚大使郭佐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柯尼希、丹麦公使格瑞杰生、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代办周亮、捷克斯洛伐克临时代办石密茨、匈牙利临时代办察托尔道伊、保加利亚临时代办格利郭洛夫、芬兰临时代办谢列克、瑞士临时代办崔礼、蒙古临时代办罗布桑楚勒图姆、波兰临时代办古拉、苏联驻我国大使馆参赞司高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我国大使馆参赞徐哲、荷兰谈判代表司曼、挪威谈判代表季茂登。

出席酒会的还有现在北京的各国新闻记者。

出席酒会的共有四百多人。

酒会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设宴招待英国工党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4年8月15日。

钱端升等前往机场迎接英国工党代表团。

【（新华社十四日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克·艾德礼、安·比万、埃·萨末斯基尔、韦·伯克、摩·菲利普斯、塞·华生、哈·厄恩萧、亨·弗兰克林等一行八人在八月十四日上午十二时乘飞机到达北京。

代表团翻译林迈可勋爵夫妇已于数日前先到北京。

到飞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周鲠生、陈翰笙、胡愈之、钱端升、乔冠华，秘书长吴茂荪，理事罗隆基、王铁崖等。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郭沫若、陈叔通，副秘书长邢西萍，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廖承志、章伯钧、陈劭先、孙起孟、许广平、黄琪翔、陈其尤、李纯青、区棠亮、李德全、刘宁一、楚图南、吴耀宗、傅连璋、舒舍予、伍云甫、冀朝鼎、钱伟长，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欧非司司长宦乡、交际处处长王倬如，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中国赴英贸易访问团团团长曹中枢等。

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也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

代表团人员下机后，接受了首都少年儿童的献花，并与欢迎者一一握手。】

——《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我国访问英国工党代表团到达北京》，载《人民日报》1954年8月15日。

8月15日

钱端升等陪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觐见周恩来。

【（新华社十五日讯）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在十五日上午接见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以克·艾德礼先生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并于接见后同进午餐。

在座的，有：英国工党代表团团员安·比万先生、埃·萨末斯基尔夫人、韦·伯克先生、摩·菲利普斯先生、塞·华生先生、哈·厄恩萧先生、亨·弗兰克林先生和代表团翻译林迈可勋爵夫妇。

中国方面在座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邓小平，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周鲠生、钱端升，外交部欧非司司长宦乡。】

——《周总理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4年8月16日。

8月16日

钱端升陪英国工党代表团赴周恩来宴会。

【（新华社十六日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八月十六日在北京怀仁堂设宴招待应邀来我国访问的以克·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

代表团团员安·比万、埃·萨末斯基尔、韦·伯克、摩·菲利普斯、塞·华生、哈·厄恩萧、亨·弗兰克林和代表团翻译林迈可夫妇都出席了这次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英国驻我国代办杜维廉。

中国方面出席宴会的，有：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邓子恢、乌兰夫、刘格平、马寅初、高崇民、沈雁冰、蔡廷锴、彭泽民、傅作义、章伯钧、龙云，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政务委员谢觉哉、曾山、滕代远、陈劭先、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部长李先念、叶季壮、李四光、黄敬、蒋光鼐、朱学范、梁希、李德全、安子文，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章汉夫、伍修权，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萧华、

甘泗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张苏，最高人民检察院署副检察长高克林，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贾拓夫，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常务委员杨秀峰、刘宁一、吴耀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陆定一、廖承志，候补中央委员马明方、刘澜涛，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士陈其瑗、吴晗、孙起孟、许广平、黄琪翔、许德珩、陈其尤、李纯青、胡耀邦等。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周鲠生、陈翰笙、胡愈之、钱端升、乔冠华，秘书长吴茂荪，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中缅友好协会会长郑振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冀朝鼎以及其他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北京各高等学校负责人和北京的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宗教界和少数民族代表等。

出席宴会的各国驻华使节有：缅甸大使吴拉茂、巴基斯坦大使罗查、印度大使赖嘉文、瑞典大使魏斯特朗、罗马尼亚大使郭佐文、印尼大使莫诺努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柯尼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崔一、芬兰公使孙士敦、丹麦公使格瑞杰生、苏联临时代办华司考、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代办周亮、捷克斯洛伐克临时代办石密茨、匈牙利临时代办察托尔道伊、保加利亚临时代办格利郭洛夫、瑞士临时代办崔礼、蒙古临时代办罗布桑楚勒图姆、波兰临时代办古拉、荷兰谈判代表司曼、挪威谈判代表季茂登。

出席宴会的，还有现在北京的外国记者。

出席宴会的共有三百多人。

周恩来总理和艾德礼先生在宴会上先后致词（全文另发），全场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

宴会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宴会后，举行了京剧晚会。】

——《周总理设宴招待英国工党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4年8月17日。

【1956年，我又奉命接待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来访，为增进中英双方的互相了解和发展关系尽心尽力。】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9页。

8月17日

钱端升被选为上海市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据新华社上海十八日电：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八月十六日开始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是选举上海市应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第一天，上海市选举委员会秘书长刘季平向代表们报告了关于上海市应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协商经过。到会代表对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及各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上海市各人民团体反复协商联合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进行了反复的酝酿和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这个名单既从全国整体要求出发，又照顾了上海市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充分体现出人民民主大团结的精神，因此一致表示支持和拥护。

十七日下午，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庄严隆重地选举了六十三名上海市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代表。代表们都以无限信任和自豪的心情，投票选举“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获得者、杰出的和平战士宋庆龄，选举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沈钧儒，选举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当会议执行主席宣布选举结果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鼓掌声，当选的代表除宋庆龄、沈钧儒、陈云以外，还有陈毅、王禹、王志莘、王性尧、王淑贞（女）、王菊生、王树森（回族）、白杨（女）、江丰、朱顺余、吴靖（女）、吴克坚、吴若安（女）、吴梅生、吴耀宗、沈克非、沈志远、沈德建、贝时璋、金仲华、杭佩兰（女）、周信芳、林汉达、孟宪承、计浩然、胡子婴（女）、胡厥文、胡愈之、袁蓉（女）、袁雪芬（女）、夏衍、马

彦祥、郭棣活、陈石英、陈建功、陈望道、张祺、张方佐、张元济、陆阿狗、盛丕华、项叔翔、汤桂芬(女)、汤蒂因(女)、贺绿汀、黄佐临、冯德培、杨之华(女)、杨逸棠、裔式娟(女)、叶企孙、赵祖康、荣毅仁、刘靖基、刘鸿生、潘汉年、黄延芳、钱端升、魏如、瞿希贤(女)等。选举结果显示,联合提名的代表候选人全部以全票和极高票数当选,表现了代表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衷心拥护。

会上,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宋季文向代表们作了上海市一九五三年财政决算和一九五四年财政预算的报告。宋季文在报告中指出:一九五三年上海市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市公、私营工业生产总产值按一九五二年不变价格计算,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七点二五。其中国营、地方国营增长百分之三十九点二六,合作社营增长百分之八十二点零四,公私合营增长百分之三十九点八二,私营工业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五五。而私营工业中为国家加工、订货、收购、包购的产值已占私营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九点八一。全市公、私商业销售总额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三点九二。在一九五三年财政决算的报告中还指明:大部分费用投入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教育等事业方面,而且,收支相抵还有结余。报告指出:在一九五四年财政预算中,来自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的企业收入续有增加,已由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五八增到百分之三十点二七。在今年预算分配中,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教育等事业方面的费用将比一九五三年增加,而行政管理费的拨款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已比一九五三年降低。代表们审查和讨论了宋季文的报告,一致认为报告中提出的一九五三年财政决算和一九五四年的财政预算和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今年的预算应予坚决贯彻执行。】

——《上海市举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宋庆龄等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载《人民日报》1954年8月19日。《光明日报》同日相关报道稍有差别。

8月18日

钱端升等参加全国政协欢迎英国工党代表团宴会。

【（新华社十八日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十八日下午六时举行盛大欢迎会和宴会，欢迎应邀来我国访问的以克·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

欢迎会和宴会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郭沫若、陈叔通分别主持。

出席欢迎会和宴会的英国工党代表团人员有：克·艾德礼、安·比万、埃·萨末斯基尔、韦·伯克、摩·菲利普斯、塞·华生、哈·厄恩萧和代表团翻译林迈可夫妇。

英国驻中国代办杜维廉也应邀出席。

中国方面到会的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沈钧儒，秘书长李维汉，常务委员蒋光鼐、章伯钧、黄炎培、章乃器、杨秀峰、沈雁冰、梁希、邵力子、罗隆基、马寅初、许广平、黄琪翔、许德珩、陈其尤、蒋南翔、李四光、盛丕华、李德全、吴耀宗和在京各位委员。

到会的还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邓小平，中央委员贺龙、陆定一、廖承志、王稼祥，候补中央委员张际春、马明方、吕正操、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于振瀛、李世璋、陈劭先、陈其瑗、梅龚彬、宁武、蔡廷锴，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周新民、潘光旦、周鲸文、胡愈之、沈志远、李文宜，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常务委员李承干、周士观、孙晓村、孙起孟、浦洁修、凌其峻、章元善、张炯伯、杨卫玉、杨美真、刘一峰、陈维稷，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理事葛志成、严景耀、林汉达，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彭泽民，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张云川、王人旋，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严希纯、黄鼎臣，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袁翰青、劳君展、杨肇熾、潘菽、薛愚、魏建功、严济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罗毅、区棠亮、章泽。

到会的还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周鲠生、陈翰笙、钱端升、乔冠华，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朱学范，中华全国民

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章蕴，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吴晗，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关若鸾，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周扬，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黄长水、胡子昂，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吴有训，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竺可桢、茅以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副会长丁西林，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张启龙、孟用潜，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萧华，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钱俊瑞，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秘书长伍云甫，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马松亭，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巨赞，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任陈见真、陈崇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冀朝鼎。

到会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伍修权，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副部长雷任民，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教育部副部长韦恂，卫生部副部长贺诚以及北京的科学、教育、文艺、新闻界著名人士和少数民族代表。

现在北京的各国新闻记者也应邀出席了这次欢迎会和宴会。

出席这次欢迎会和宴会的共有六百多人。

欢迎会会场悬有中英两国国旗。欢迎会开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郭沫若首先致词（全文另发）欢迎。接着，英国工党代表团克·艾德礼先生和安·比万先生都讲了话（全文另发）。

在接着举行的宴会上，宾主双方不断起立举杯，祝中英友谊的发展。

欢迎会和宴会在友好空气中进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盛会并欢宴英国工党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4年8月19日。

8月20日

钱端升陪同英国工党代表团飞赴沈阳。

【（新华社沈阳二十日电）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以克·

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陪同，在二十日上午十一时由北京乘专机飞抵沈阳。

到飞机场欢迎的有辽宁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雪轩，沈阳市人民政府市长焦若愚、副市长张力克、邵凯，沈阳市工会联合会主席朱维仁，辽宁省和沈阳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沈阳市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界人士。

代表团人员下机后，接受了沈阳市少年儿童代表的献花，并与欢迎者一一握手。】

——《英工党代表团到沈阳 焦若愚市长设宴欢迎》，载《人民日报》1954年8月21日。

8月24日

钱端升出席英国驻我国代办杜维廉举行招待英国工党代表团宴会。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二十四日晚，英国驻我国代办杜维廉举行宴会，招待正在我国访问的以克·艾德礼先生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

中国方面出席宴会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郭沫若、秘书长习仲勋，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等。

中国方面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钱端升、乔冠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冀朝鼎。

英国工党代表团出席宴会的有：克·艾德礼、安·比万、埃·萨末斯基尔、韦·伯克、摩·菲利普斯、塞·华生、哈·厄恩萧、亨·弗兰克林和代表团翻译林迈可夫妇。

出席宴会的还有：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

宴会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英驻我国代办招待英工党代表团 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总理等出

席宴会》，载《人民日报》1954年8月25日。

8月25日

钱端升出席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欢送英国工党代表团酒会。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二十五日晚在北京中山堂举行酒会，欢送即将离京去上海等地访问的英国工党代表团。

出席酒会的有：英国工党代表团克·艾德礼先生、安·比万先生、埃·萨末斯基尔夫人、韦·伯克先生、摩·菲利普斯先生、塞·华生先生、哈·厄恩萧先生、亨·弗兰克林先生和代表团翻译林迈可爵士夫妇。

出席欢送酒会的，还有英国驻我国代办杜维廉。

中国方面出席酒会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陈叔通，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高克林，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政务委员谢觉哉、曾山、章伯钧、陈劭先、罗隆基、邵力子、黄绍竑以及政务院所属各部门正副负责人李先念、刘景范、黄敬、章乃器、朱学范、傅作义、李德全、楚图南、陈其瑗、徐子荣、雷任民、何长工、吕正操、杨秀峰、贺诚、丁西林、叶圣陶、萨空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伍修权等。

出席酒会的还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廖承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蔡廷锴、高崇民、孙起孟、马寅初、许广平、彭泽民、陈其尤、许德珩、李纯青、罗毅等。

出席酒会的还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陈翰笙、胡愈之、钱端升、乔冠华，秘书长吴茂荪，以及各人民团体中央机关负责人刘宁一、章蕴、区棠亮等。

出席酒会的还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友渔、吴晗，北京市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梁思成，北京市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刘莱夫、张晓梅、张大中、徐乃明、老舍、乐松生等。

出席酒会的还有：科学、教育界人士梁希、华罗庚、蒋南翔、周培源、金岳霖、陈岱孙、傅种孙、张孝骞、严景耀、楼邦彦、茅以升、陆志韦、傅连璋，文艺界人士郑振铎、曹禺、赵汎、谢冰心、华君武、刘开渠、马彦祥、戴爱莲、李少春、叶盛兰、杜近芳、侯宝林、连阔如、谭富英、张君秋，新闻界人士邓拓、王芸生、沈建图、范瑾、浦熙修，劳动模范李永、刘德珍、刘世梅、侯德成、殷维臣，工商界人士沙千里、殷玉昆、凌其峻、孙孚凌，少数民族代表朋斯克、甘春雷、柯吉义、阿不列孜，宗教界人士赵紫宸、王梓仲、赵复三、达浦生、马松亭、李恕、巨赞，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钱俊瑞、伍云甫、梁漱溟、刘王立明、钱昌照等。

出席酒会的还有现在北京的各国新闻记者。

出席酒会的共有四百多人。

酒会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北京市彭真市长举行酒会欢送英国工党代表团去上海访问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等出席酒会》，载《人民日报》1954年8月26日。

8月26日

钱端升陪工党代表团离别北京，抵达上海。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以克·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在八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乘机离京，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陪同，前往上海等地访问。

代表团翻译林迈可夫妇也同机离京。

到飞机场欢送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周鯁生、陈翰笙、胡愈之、乔冠华，秘书长吴茂荪。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郭沫若、陈叔通，副秘书长邢西萍，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廖承志、罗隆基、陈劭先、章乃器、王绍鏊、黄琪翔、陈其尤、许德珩、李纯青、区棠亮、刘宁一、李德全、楚图南、傅连璋、于北辰、冀朝鼎、曹禺、

赵复三，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欧非司司长宦乡、交际处处长王倬如，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中国赴英贸易访问团团团长曹中枢等。

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也到机场欢送。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

(新华社上海二十六日电) 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克·艾德礼、安·比万、埃·萨末斯基尔、韦·伯克、摩·菲利普斯、塞·华生、哈·厄恩萧、亨·弗兰克林八人以及代表团翻译林迈可夫妇，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陪同，在二十六日下午二时许由北京乘专机到达上海。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上海的理事金仲华、夏衍等。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第一副书记潘汉年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徐平羽、外事处代处长俞沛文等也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上海市协商委员会和各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上海市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上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和新闻界人士等。

代表团人员下机后，接受了少年儿童的献花，并与欢迎者握手。】

——《英国工党代表团离北京到达上海访问》，载《人民日报》1954年8月27日。

钱端升陪英国工党代表团参加陈毅晚宴。

【(新华社上海二十七日电) 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二十六日晚在国际大饭店设宴欢迎以克·艾德礼先生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

克·艾德礼先生和安·比万先生、埃·萨末斯基尔夫人、韦·伯克先生、摩·菲利普斯先生、塞·华生先生、哈·厄恩萧先生、亨·弗兰克林先生以及代表团翻译林迈可爵士夫妇都出席了宴会。

陪同英国工党代表团前来上海访问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等也参加了宴会。

上海市方面出席宴会的有：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汉年、许建国、刘季平，外事处代处长俞沛文，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上海的理事金仲华、沈端先，上海科学界、教育界、文化界、艺术界、新闻界、工商界、宗教界及少数民族、华侨等方面人士孟宪承、彭康、冯德培、沈克非、颜福庆、巴金、梅兰芳、周信芳、刘思慕、徐铸成、赵超构、荣毅仁、郭棣活、江长川、崔宪祥、杨士达、伍特公、董寅初，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各部门、上海市协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各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上海市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等共一百四十多人。

现在上海采访的英国记者也参加了宴会。

宴会上，陈毅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对英国工党代表团来上海访问表示热忱的欢迎。他说：五年来，上海人民为了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曾进行了很多的工作，你们在此次与上海各方面人士的广泛的接触中，当能见到上海人民这种劳动的成果，它是怎样深刻地改变着我们这个城市的面貌。同时，你们也会感到上海人民热爱和平的共同意志是多么地强烈。我们相信，英国工党代表团这次访问，将会对中英友谊和世界和平起积极作用。

艾德礼致答词中，对主人的接待表示感谢。他说：我们和你们都非常希望促进和平，我们觉得促进和平最好的办法是不同的人民在一块儿合作，使大家彼此多了解。他说：我今天在上海非常高兴。从窗口望出去，好像在伦敦一样。上海和伦敦都是商业很发达的城市，这使我想到了中、英两国应该大规模地通商。我们这次来访中国最大的希望，就是由此促进中英友谊和世界和平。

宴会自始至终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上海市长陈毅设宴招待英国工党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4年8月28日。

8月27日

钱端升陪英国工党代表团在上海进行参观访问。

【(新华社上海二十七日电)二十七日,英国工党代表团人员在上海市分别进行参观访问。

克·艾德礼先生上午游览了市区和郊区。艾德礼先生以很大的兴趣参观了黄浦江边的码头,这个码头上停泊着好几只轮船,搬运工人们正在把货品卸下来。以后,又到南京路参观了我国最大的国营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和中国食品公司上海市公司第一门市部。在那里,他看到了很多的顾客在选购供应丰富的糕点、水果、衬衣和其他各种货品。

埃·萨末斯基尔夫人、韦·伯克、摩·菲利普斯、塞·华生、哈·厄恩萧、亨·弗兰克林上午参观了密丰毛绒厂。韦·伯克和哈·厄恩萧接着又参观了纶昌纺织印染厂。

安·比万先生上午游览了上海西郊。

晚间,英国工党代表团人员出席了音乐晚会。】

——《英国工党代表团在上海进行参观和访问 印度驻上海总领事招待英国工党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4年8月29日。

8月28日

钱端升陪英国工党代表团参加印度驻上海领事晚宴。

【(新华社上海二十八日电)印度驻上海总领事摩鲁盖升,在二十八日下午举行酒会,招待以克·艾德礼先生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

出席酒会的有英国工党代表团全体人员。

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许建国、刘季平,秘书长徐平羽,外事处代处长俞沛文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上海的理事金仲华、沈端先等人,也出席了酒会。陪同英国工党代表团来上海访问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也出席了酒会。

酒会在友好空气中进行。】

——《英国工党代表团在上海进行参观和访问 印度驻上海总领事招待英国工党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4年8月29日。

8月29日

钱端升陪工党代表团抵达杭州。

【（新华社杭州二十九日电）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克·艾德礼、安·比万、埃·萨末斯基尔、韦·伯克、摩·菲利普斯、塞·华生、哈·厄恩萧、亨·弗兰克林以及代表团翻译林迈可夫妇，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陪同，在二十九日下午五时二十分由上海乘专车到达杭州。

到车站欢迎的有杭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吴宪，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李丰平，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顾春林，中国共产党杭州市委员会副书记王子达，杭州市工会联合会主席孙文成，杭州市协商委员会、浙江省和杭州市各民主党派、杭州市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杭州市科学、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宗教等各界人士和劳动模范等。

代表团人员下车后，接受了杭州市少年儿童的献花，并和欢迎者一一握手。】

——《英国工党代表团到杭州访问》，载《人民日报》1954年8月31日。

8月31日

钱端升陪英国工党代表团乘飞机离开杭州抵达广州。

【（新华社杭州三十一日电）以克·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三十一日晨乘飞机离杭州前往广州。在机场欢送的有：杭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吴宪、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李丰平和各界代表。

英国工党代表团在杭州游览了著名的西湖和苏堤、白堤、灵隐寺等名胜。

英国工党代表还谒了岳飞墓。岳飞是我国宋朝（十二世纪）时抵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后被卖国贼害死。这座墓是后人为纪念这位爱国英雄而建

筑的。

哈·厄思萧还参观了地方国营杭州绸厂、公私合营虎林丝厂和钱塘江大桥。在工厂里，他向厂长和工会主席详细询问了解放后的发展情况，并参观了全部生产过程。

杭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吴宪三十日晚在西湖旁的大华饭店设宴欢送英国工党代表团。

(新华社广州三十一日电) 以克·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陪同，三十一日下午由杭州乘飞机到达广州。

到机场欢迎的，有：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何伟、广州市工会联合会主席廖立民、广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曹若茗等。

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易秀湘、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李心清、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代局长林林等也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广州市协商委员会和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工商、宗教界人士等。

代表团人员下机后，接受了少年儿童的献花，并与欢迎者一一握手。

当日下午，代表团参观了广州市容。

七时三十分，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何伟设宴招待代表团。代表团全体人员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陪同下出席了宴会。广东省人民政府代主席陶铸也出席了宴会。出席宴会的还有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易秀湘，广州市工会联合会主席廖立民，广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曹若茗和各界代表许崇清、丁颖等六十余人。】

——《英国工党代表团飞离杭州到达广州》，载《人民日报》1954年9月1日。

8月

在《人民中国》发表 *China-British Friendship* (《中英友谊》) 一文。

——钱端升：*China-British Friendship*，载《人民中国》1954年8月。参

见钱端升：《钱端升主要著作目录》，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0-581页。

9月1日

钱端升送别英国工党代表团。

【（新华社广州一日电）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克·艾德礼、安·比万、埃·萨末斯基尔、韦·伯克、摩·菲利普斯、塞·华生、哈·厄恩萧、亨·弗兰克林和代表团的翻译林迈可夫妇一行十人于一日上午十一时五十分由广州乘专车前往香港。到广州车站欢送的有：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何伟、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易秀湘和各界代表三十多人。

英国工党代表团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广州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副处长王岚等陪同下，下午三时二十四分抵达深圳。代表团人员下车和送行的人员一一握手告别，然后上车前往香港。】

——《英国工党代表团昨日离广州去香港》，载《人民日报》1954年9月2日。

9月4日

钱端升为上海代表团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王志莘、王性尧、王禹、王淑贞（女）、王菊生、王树森、白杨（女）、朱顺余、江丰、吴克坚、吴若安（女）、吴梅生、吴靖（女）、吴耀宗、宋庆龄（女）、沈克非、沈志远、沈钧儒、沈德建、贝时璋、周信芳、孟宪承、杭佩兰（女）、林汉达、金仲华、胡子婴（女）、胡厥文、胡愈之、计浩然、夏衍、袁雪芬（女）、袁蓉（女）、马彦祥、张方佐、张元济、张祺、郭棣活、陈石英、陈建功、陈望道、陈云、陈毅、陆阿狗、盛丕华、汤桂芬（女）、汤蒂因（女）、贺绿汀、项叔翔、冯德培、黄佐临、杨之华（女）、杨逸棠、叶企孙、裔式娟（女）、荣毅仁、赵祖康、刘靖基、刘鸿

生、潘汉年、黄延芳、钱端升、瞿希贤(女)、魏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载《人民日报》1954年9月4日。

9月20日

钱端升参与起草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票通过。

9月29日

钱端升担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

【主任委员：张苏

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

甘泗淇、何世琨、何遂、吴昱恒、周新民、周鲠生、邵力子、武新宇、俞寰澄、高克林、梅汝璈、章蕴、许德珩、许宝驹、张云川、陈其尤、陈铭枢、黄绍竑、黄琪翔、雷洁琼、刘子久、刘斐、卢汉、钱昌照、钱俊瑞、钱端升、薛暮桥、谢雪红、韩幽桐、蚁美厚、罗隆基、罗毅。】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名单》，载《人民日报》1954年9月29日。

10月14日

钱端升等首都各界人士发表声明，拥护中苏联合公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北京政法学院院长 钱端升

我国同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不但是中国人民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保证之一，不但是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保障，而且是完全为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服务的。这次中苏两国政府代表的会谈产生了一系列的内容极为丰富的协议，更进一步地发展

和巩固了中苏两国间的兄弟友谊。只有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原则上的友谊才能是这样地伟大，这样地全面，这样地同时有利于缔约的中苏两国，有利于全世界人民，有利于全人类的进步！中苏两国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在两国间日益发展的全面合作方面和对于国际形势的各项问题上，两国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完全符合于进步人类的要求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的。这种友谊也必然是日益发展的。】

——《首都各界著名人士热烈拥护中苏会谈公报》，载《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4日。

10月19日

钱端升前往机场迎接尼赫鲁。

【（新华社十九日讯）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在我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和印度驻我国大使赖嘉文的陪同下，于十九日十二时二十分乘飞机到达北京。随同尼赫鲁总理访问我国的，有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印度外交部长纳·鲁·皮莱和印度外交部副秘书长巴哈杜尔·辛格以及墨·勒·盖思德、克·弗·鲁斯滕吉、纳·克·塞善等九人。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彭德怀、贺龙、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郭沫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华侨著名领袖陈嘉庚，北京市市长彭真，京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夫人。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任罗瑞卿、史良、薄一波、章乃器、叶季壮、王鹤寿、黄敬、陈郁、蒋光鼐、贾拓夫、朱学范、廖鲁言、梁希、傅作义、沈雁冰、杨秀峰、张奚若、李

德全、各部副部长、各委员会副主任雷任民、吕正操、王首道、郑振铎、蔡廷锴、刘格平、李任仁以及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乔冠华、办公厅副主任阎宾航、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情报司司长龚澎、交际处处长王倬如。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粟裕，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吴晗，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刘仁。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马寅初、邵力子、张治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程潜、中央委员龙云，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央常务理事周建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彭泽民，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副会长陈翰笙，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宁一，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廖承志，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田德民，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阳翰笙，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鯁生、钱端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吴耀宗，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以及在京的西藏人士赤江·罗桑意西、噶玛巴活佛、索康·旺清格来、阿沛·阿旺晋美、计晋美、尧西·泽仁卓玛、柳霞·土登塔巴、纳旺金巴，我国佛教界著名人士巨赞和曾访问印度的中印友好协会代表团团员。

正在我国访问的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印度科学院院士、印度国会议员萨希布·辛格·索克，印度加尔各答市市长慕克吉先生，印度全国工会大会友好代表团人员以及印度驻我国使馆人员和印度侨民也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各国驻我国使节和外交人员有：缅甸大使吴拉茂，巴基斯坦大使罗查，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康萨拉，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黄文欢，蒙古大使奥其尔巴特，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柯尼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崔一，苏联大使尤金，保加利亚大使迪莫夫，阿尔巴尼亚大使纳赛，匈牙利大使希克拉丹，芬兰公使孙士敦，丹麦公使格瑞杰生，瑞士公使贝努义，英国代办杜维廉，挪威临时代办季茂登，瑞典临时代办哈马孝尔德，罗马尼亚临时代办孟天努，荷兰谈判代表司曼以及各国使馆人员。

在机场上欢迎的还有首都各界群众一万多人。

机场上悬挂着印度和中国国旗。

尼赫鲁总理下机后，和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欢迎人员亲切握手。乐队高奏印度和中国国歌。接着，尼赫鲁总理检阅了仪仗队，并接受了首都儿童的献花。

尼赫鲁总理在机场上发表了谈话（全文另发），然后，走到在机场上欢迎的群众行列的前面，向欢迎者举手致意。这时欢迎人群不断鼓掌和高呼“欢迎尼赫鲁总理！”“印中友好万岁！”“亚洲和平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等口号，并向尼赫鲁总理献花。

当尼赫鲁总理由周恩来总理陪同乘敞篷汽车由机场前往迎宾馆经过市郊公路和市内街道时，受到沿途二十余万首都工人、市民、机关工作人员、青年学生和儿童们的热烈欢迎。】

——《应我国政府邀请来我国访问印度总理尼赫鲁到北京 受到首都各界二十多万人的热烈欢迎》，载《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0日。

钱端升参加周恩来招待尼赫鲁晚宴。

【（新华社十九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十九日下午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

随同尼赫鲁总理访问我国的，尼赫鲁总理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印度外交部秘书长纳·鲁·皮莱和印度外交部副秘书巴哈杜尔·辛格等九人也

应邀出席了酒会。

出席酒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云、邓小平、邓子恢、贺龙、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秘书长习仲勋，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任谢觉哉、罗瑞卿、史良、钱瑛、薄一波、章乃器、曾山、叶季壮、王鹤寿、黄敬、赵尔陆、陈郁、蒋光鼐、贾拓夫、沙千里、章伯钧、朱学范、廖鲁言、梁希、傅作义、沈雁冰、杨秀峰、张奚若、李德全，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伍修权，以及各部副部长、各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市长彭真，京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

出席酒会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委员王昆仑、王维舟、李书城、李烛尘、邢西萍、周建人、周纯全、邵力子、胡乔木、高崇民、徐特立、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韦国清、马明方、马寅初、张治中、张难先、张苏、许广平、许德珩、陈劭先、陈嘉庚、陆定一、程子华、程潜、黄绍竑、彭泽民、廖承志、熊克武、刘长胜、刘格平、刘宁一、刘澜涛、蔡廷锴、龙云、罗隆基。

出席酒会的，还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粟裕，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甘泗淇，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国防委员会委员林遵、阿沛·阿旺晋美、许光达、马鸿宾、高树勋、陈奇涵、陈明仁、陈赓、陈锡联、曾泽生、冯白驹、裴昌会、刘文辉、刘斐、邓兆祥、邓锡侯、邓宾珊、苏振华，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等。

出席酒会的，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黄琪翔、陈其尤，委员李明灏、李明扬、梁漱溟、唐生智。

出席酒会的，还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吴玉章，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副会长陈翰笙，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胡耀邦，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章蕴，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刘导

生，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田德民，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周扬，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钱端升、乔冠华，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钱伟长，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吴耀宗，中国佛教协会代理会长喜饶嘉措、副会长赵朴初，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马松亭及其它人民团体的负责人。

出席酒会的，还有科学界人士张稼夫、陶孟和、吴有训、范文澜、华罗庚、陈康白、侯德榜、茅以升、周培源、钱三强、林巧稚，教育界人士胡锡奎、聂真、蒋南翔、江隆基、汤用彤、陈垣、傅种孙、刘仙洲，文艺界人士老舍、梅兰芳、程砚秋、阳翰笙、金克木、柯仲平、冯雪峰、洪深、谢冰心、赵树理、吴作人、马思聪、江丰、袁雪芬、华君武、郭兰英、田华，新闻界人士邓拓、吴冷西、王芸生、梅益、陈用文，以及各兄弟民族代表和曾访问过印度的中印友好协会代表团团员。

正在我国访问的印度科学院院士、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印度国会议员索克先生，印度加尔各答市市长慕克吉先生，印度全国工会大会友好代表团人员，也应邀出席了酒会。

应邀出席酒会的，还有缅甸政府贸易代表团人员和来我国访问的各国记者。

应邀出席酒会的，还有印度驻我国大使赖嘉文和使馆官员，以及各国驻我国使节和外交人员：缅甸大使吴拉茂，巴基斯坦大使罗查，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康萨拉，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黄文欢，蒙古大使奥其尔巴特，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柯尼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崔一，苏联大使尤金，保加利亚大使迪莫夫，阿尔巴尼亚大使纳赛，匈牙利大使希克拉丹，芬兰公使孙士敦，丹麦公使格瑞杰生，瑞士公使贝努义，英国代办杜维廉，挪威临时代办季茂登，瑞典临时代办哈马孝尔德，罗马尼亚临时代办孟天努，荷兰谈判代表司曼等。

参加酒会的共有五百多人。

酒会在热烈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周总理招待尼赫鲁总理》，载《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0日。

10月20日

钱端升等陪同尼赫鲁在北京参观游览。

【(本报讯)二十日，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偕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和随行人员，在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等陪同下，在北京西郊参观游览。

上午九时二十分，尼赫鲁总理到中央民族学院参观。穿着各民族服装的学生在校门前列队欢迎。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苏克勤、费孝通等陪同尼赫鲁总理等参观了供信仰佛教学生用的经堂、供信仰伊斯兰教学生用的清真食堂、小型剧场、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室和台湾高山族文物图片展览室，以及一部分教室和宿舍。尼赫鲁总理在参观了包括四十七个民族、一千二百多个学生的学院以后表示，这里洋溢着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友爱的气氛，使他获得很深刻的印象。临别时，尼赫鲁总理等并和学院一部分师生合影留念。全院师生热情地送别了来访的贵宾们。

十时四十分，尼赫鲁总理等前往颐和园游览。他们参观了谐趣园、万寿山和长廊等名胜。尼赫鲁总理对佛香阁的壮丽建筑很感兴趣。中午，尼赫鲁总理等去听鹂馆进餐后，并乘船游昆明湖。

下午一时四十分，尼赫鲁总理等又前往西郊公园参观。他们很高兴地看到了尼赫鲁总理本人在一九五三年五月间赠送给我国儿童的一只名叫“阿萨”的大象。一年多来，“阿萨”在中国又长高了半尺，它为尼赫鲁总理作了表演。】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北京参观游览》，载《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1日。

10月23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各界欢迎尼赫鲁盛会。

【据新华社讯：北京市各界人民二十三日下午在中山公园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应我国政府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欢迎大会由北京市市长彭真主持。参加欢迎会的有两万多人。

欢迎大会在下午四时四十分开始。尼赫鲁总理由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陪同，在全场起立鼓掌声中登上主席台。随同他们登上主席台的有印度驻我国大使赖嘉文夫妇和随同尼赫鲁总理访问我国的英迪拉·甘地夫人、纳·鲁·皮莱先生和巴哈杜尔·辛格先生。

在主席台上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国务院副总理贺龙，秘书长习仲勋，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吴晗，北京市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刘仁、钱端升、梁思成、蒋光鼐以及北京市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

欢迎大会开始时，乐队奏印中两国国歌。接着，彭真市长致欢迎词。彭真市长代表北京市全体市民向尼赫鲁总理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通过他向德里的市民和印度全体人民表示衷心的敬意。

尼赫鲁总理接着致答词。他的讲话由扩音器传播到园内各处。在他讲话结束时，满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在尼赫鲁总理讲话以后，彭真市长代表北京市全体人民向尼赫鲁总理献旗，旗上绣着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印度驻我国大使馆举行的印度国庆庆祝会上的祝词。彭真市长并且代表北京市人民将其他许多礼品赠给尼赫鲁总理。

欢迎大会在五时二十分结束。

会后，尼赫鲁总理和欢迎群众在一起游园。】

——《北京各界盛会欢迎尼赫鲁总理》，载《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4日。

10月27日

钱端升等在机场送别尼赫鲁。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在二十七日上午八时乘飞机离北京,将在华东、华南等地参观后返国。随同尼赫鲁总理访问我国的英迪拉·甘地夫人、纳·鲁·皮莱、巴哈杜尔·辛格、墨·勒·盖恩德、克·弗·鲁斯滕吉、纳·克·塞善等九人同日飞离北京。同机陪送尼赫鲁总理的有印度驻我国大使赖嘉文和我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

到机场欢送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邓子恢、贺龙、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郭沫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北京市市长彭真,京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夫人。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任罗瑞卿、史良、薄一波、章乃器、叶季壮、王鹤寿、黄敬、陈郁、蒋光鼐、贾拓夫、滕代远、朱学范、廖鲁言、梁希、傅作义、沈雁冰、杨秀峰、张奚若,各部副部长、各委员会副主任雷任民、王首道、郑振铎、贺诚、刘格平、李任仁以及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亚洲司司长陈家康、交际处处长王倬如。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司徒美堂、吴玉章、李书城、周建人、邵力子、徐特立、韦国清、张治中、张难先、张苏、陈劭先、程子华、黄绍竑、刘宁一、刘澜涛、龙云。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粟裕、黄克诚,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吴晗,北京市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刘仁、梁思成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们。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马寅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王昆仑，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高崇民，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彭泽民，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副会长陈翰笙，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刘导生，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田德民，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阳翰笙，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鯁生、钱端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以及在京的西藏人士赤江·罗桑意西、噶玛巴活佛、索康·旺清格来、阿沛·阿旺晋美、计晋美、尧西·泽仁卓玛、柳霞·土登塔巴、纳旺金巴，我国佛教界著名人士巨赞和曾访问印度的中印友好协会代表团团员。

到机场欢送的各国驻我国使节和外交人员有：缅甸大使吴拉茂，巴基斯坦大使罗查，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康萨拉，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黄文欢，蒙古大使奥其尔巴特，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柯尼希，苏联大使尤金，保加利亚大使迪莫夫，匈牙利大使希克拉丹，芬兰公使孙士敦，丹麦公使格瑞杰生，瑞士公使贝努义，英国代办杜维廉，挪威临时代办季茂登，瑞典临时代办哈马孝尔德，罗马尼亚临时代办孟天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李忠翼，阿尔巴尼亚临时代办雅沙，荷兰谈判代表司曼以及各国使馆人员。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印度驻中国使馆人员。

机场上悬挂着印度和中国国旗。尼赫鲁总理由周恩来总理等陪同进入机场后，乐队奏印度和中国国歌。

尼赫鲁总理检阅了仪仗队，接受了北京儿童的献花。

尼赫鲁总理在机场上发表了谈话。他说：

各位朋友，我不揣冒昧这样称呼你们，因为在过去一个星期里，我在这里结识了很多朋友。因此我认为我可以这样称呼你们。

我现在就要离开了。我满怀着记忆和我对于你们的款待和热情的谢意。我将牢记不忘，我相信这不是一件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伟大的国家更加接近，为了这个原因，我更加欢迎这一切。我相信印度人民非常感激你们对于作为他们的代表的我所给予的光荣。我非常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我愿意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感谢。】

——《印度总理尼赫鲁离开北京 将在华东、华南等地参观后回国》，载《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8日。

12月1日

钱端升前往机场欢迎缅甸总理吴努。

【（新华社一日讯）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来我国访问的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和夫人由我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我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和缅甸驻我国大使吴拉茂陪同，在一日下午四时三十分乘飞机到达北京。

随同吴努总理访问我国的，有缅甸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吴敏登、总理秘书兼内阁秘书吴温佩、总理秘书吴丹、陆军部参谋昂季上校、总理侍从武官毕梭上尉、总理私人秘书都庆素等九人。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彭德怀、贺龙、陈毅，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钧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国人民解放军京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任谢觉哉、罗瑞卿、史良、薄一波、章乃器、叶季壮、王鹤寿、李四光、滕代远、傅作义、沈雁冰、杨秀峰、李德全，各部副部长和委员会副主任徐子荣、张玺、雷任民、汪道涵、杨卫玉、朱理治、范式人、丁西林、夏衍、汪锋、庄希泉，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以及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陈家康，交际处处长王倬如。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北京市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刘仁。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蒋光鼐、邵力子、施复亮、黄琪翔，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彭泽民，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学社副主席梁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胡耀邦。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钱伟长和理事，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刘导生，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田德民，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阳翰笙，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陈翰笙、钱端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副会长洪深，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王梓仲，中国佛教协会代理会长喜饶嘉错、副秘书长巨赞、郭朋，和前我国到缅甸访问的文化代表团团员。

缅甸驻我国大使馆全体人员也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有：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康萨拉，波兰大使基里洛克，印度大使赖嘉文，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黄文欢，蒙古大使奥其尔巴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柯尼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崔一，苏联大使尤金，保加利亚大使迪莫夫，阿尔巴尼亚大使纳赛，匈牙

利大使希克拉丹，芬兰公使孙士敦，丹麦公使格瑞杰生，瑞士公使贝努义，英国代办杜维廉，荷兰代办司曼，挪威临时代办季茂登，瑞典临时代办哈马孝尔德，罗马尼亚临时代办孟天努，巴基斯坦临时代办苏尔唐·穆罕默德·汗，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一等秘书维约维尔多约及各国使馆人员。

在机场上欢迎的还有首都各界群众五千多人。

机场上悬挂着缅甸和中国国旗。

吴努总理下机后，和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欢迎人员亲切握手。乐队奏缅甸和中国国歌。

吴努总理检阅了排列在机场上的仪仗队，并接受了首都儿童的献花。

吴努总理在机场上发表了书面谈话（全文另发），然后，走到在机场上欢迎的群众行列的前面，向欢迎群众举手致意。这时，欢迎的人们不断鼓掌和高呼欢迎口号，并向吴努总理献花。

最后，吴努总理由周恩来总理陪同，乘车到迎宾馆休息。】

——《应我国政府邀请来我国访问 缅甸总理吴努到达北京》，载《人民日报》1954年12月2日。

12月2日

钱端升参加周恩来欢迎吴努总理宴会。

【（新华社二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二日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应我国政府邀请来我国访问的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和他的夫人。

随同吴努总理访问我国的缅甸最高法院法官吴敏登、总理秘书兼内阁秘书吴温佩、总理秘书吴丹、陆军部参谋昂季上校、总理侍从武官毕梭上尉、总理私人秘书都庆素等九人都应邀出席了宴会。

缅甸驻我国大使吴拉茂和使馆人员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中国方面出席宴会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

出席宴会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秘书长习仲勋，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任谢觉哉、罗瑞卿、史良、钱瑛、薄一波、章乃器、曾山、叶季壮、赵尔陆、陈郁、刘秀峰、蒋光鼐、贾拓夫、沙千里、滕代远、章伯钧、梁希、沈雁冰、杨秀峰、张奚若、李德全，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伍修权，各部副部长和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市长彭真。

出席宴会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委员王昆仑、司徒美堂、吴玉章、李书城、李雪峰、林枫、周建人、周纯全、邵力子、胡乔木、施复亮、高崇民、徐特立、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韦国清、马明方、马叙伦、张苏、陈劭先、程子华、黄克诚、彭泽民、刘格平、刘澜涛、罗隆基、谭政。

出席宴会的还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龙云，委员于学忠、王世泰、王宏坤、王秉璋、王震、李明扬、阿沛·阿旺晋美、张宗逊、陈士榘、陈奇涵、陈赓、陈锡联、彭绍辉、杨成武、杨勇、万毅、廖汉生、刘亚楼、郑洞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甘泗淇和高级将领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也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黄琪翔、陈其尤、钱三强，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严希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胡耀邦。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钱伟长和理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刘导生，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田德民，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阳翰笙，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钱端升、乔冠

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王梓仲，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马松亭，中国佛教协会代理会长喜饶嘉措、副秘书长巨赞、郭朋及其他人民团体的负责人。

出席宴会的还有：科学界人士张稼夫、吴有训、范文澜、潘梓年、华罗庚、陈康白、侯德榜、涂长望、周培源，教育界人士胡锡奎、江隆基、何锡麟、傅种孙、孙晓村，文艺界人士丁玲、老舍、梅兰芳、程砚秋、谢冰心、刘白羽、陈白尘、吴作人、蔡楚生、陈其通，新闻界人士吴冷西、王芸生、梅益、陈用文、常芝青、范瑾等，以及各兄弟民族代表和前我国到缅甸访问的文化代表团团员。

出席宴会的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有：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康萨拉，波兰大使基里洛克，印度大使赖嘉文，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黄文欢，蒙古大使奥其尔巴特，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柯尼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崔一，苏联大使尤金，保加利亚大使迪莫夫，阿尔巴尼亚大使纳赛，匈牙利大使希克拉丹，芬兰公使孙士敦，丹麦公使格瑞杰生，瑞士公使贝努义，英国代办杜维廉，荷兰代办司曼，挪威临时代办季茂登，瑞典临时代办哈马孝尔德，罗马尼亚临时代办孟天努，巴基斯坦临时代办苏尔唐·穆罕默德·汗。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来我国谈判我国在印度尼西亚的侨民的国籍问题的代表和正在我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农业考察团、越南民主共和国交通代表团人员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共有七百多人。

宴会开始前，周恩来总理曾介绍吴努总理同我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各部门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各方面人士见面。

宴会上，周恩来总理首先致词（全文另发），他在致词结束时，举杯祝缅甸联邦巴宇总统健康。乐队奏起缅甸国歌。

吴努总理接着致词（全文另发），他在致词结束时，举杯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健康。乐队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宴会是在热烈和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周总理盛宴欢迎吴努总理》，载《人民日报》1954年12月3日。

12月5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市各界人民欢迎吴努大会。

【（新华社五日讯）北京市各界人民五日下午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访问的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和他的夫人。欢迎大会由北京市市长彭真主持。

在欢迎大会的会场上，洋溢着友谊和欢乐的气氛。主席台的天幕上挂着中缅两国国旗，台前满布盛开的鲜花和常青的棕榈。在主席台的对面挂着一幅巨大的金字横幅标语，上面用中文和缅文写着“中缅友好万岁”。会场里坐满了从工厂、学校、机关、团体、街道前来参加欢迎会的男女工人、学生、工作人员和市民。

下午二时三十分，吴努总理和他的夫人由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陪同登上主席台。这时，全场起立，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随同登上主席台的有缅甸驻我国大使吴拉茂和夫人，以及随吴努总理访问我国的缅甸最高法院法官吴敏登，总理秘书兼内阁秘书吴温佩，总理秘书吴丹，陆军部参谋昂季上校。

在主席台上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秘书长习仲勋，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北京市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刘仁、钱端升、蒋光鼐以及北京市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

欢迎大会开始，乐队奏起缅甸和中国国歌。

彭真市长首先致欢迎词（全文另发）。他代表北京市全体市民向吴努总理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通过他向仰光的市民和缅甸全体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吴努总理接着致答词（全文另发）。在他讲话结束时，全场热烈鼓掌，向这位中国邻邦的代表表示欢迎。

欢迎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在欢迎大会以后，由中央歌舞团和中央实验歌剧院演出了歌舞节目，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等演出了京剧《贵妃醉酒》。】

——《北京市各界人民举行大会 欢迎缅甸联邦吴努总理》，载《人民日报》1954年12月6日。

12月12日

钱端升等在机场送别吴努总理。

【（新华社十二日讯）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来我国访问的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和他的夫人，在十二日上午九时乘飞机离开北京，将在华东、华南等地参观后返国。随同吴努总理访问我国的缅甸最高法院法官吴敏登、总理秘书兼内阁秘书吴温佩、总理秘书吴丹、陆军部参谋昂季上校、总理侍从武官毕梭上尉、总理私人秘书都庆素等九人同日飞离北京。同机陪送吴努总理的有缅甸驻我国大使吴拉茂和我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我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

到机场欢送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邓子恢、贺龙、陈毅，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国人民解放军京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任罗瑞卿、史良、薄一波、章乃器、叶季壮、蒋光鼐、廖鲁言、傅作义、沈雁冰、杨秀峰、李德全，各部副部长和委员会副主任雷任民、赖际发、武竞天、朱理治、范式人、毛齐华、丁西林、蔡廷锴、庄希泉，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以及外交部部长助理陈家康、交际处处长王倬如。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邵力子、张治中、施复亮、马寅初、黄琪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龙云，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彭泽民，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胡耀邦。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钱伟长和理事，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田德民，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阳翰笙，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周鲠生、陈翰笙、钱端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吴耀宗、常务委员王梓仲，中国佛教协会代理会长喜饶嘉错、副秘书长巨赞、郭朋，和我国曾经访问缅甸的文化代表团团员。

缅甸驻我国大使馆人员也到机场欢送。

到机场欢送的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有：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康萨拉，波兰大使基里洛克，印度大使赖嘉文，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黄文欢，蒙古大使奥其尔巴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柯尼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崔一，苏联大使尤金，保加利亚大使迪莫夫，阿尔巴尼亚大使纳赛，匈牙利大使希克拉丹，芬兰公使孙士敦，丹麦公使格瑞杰生，瑞士公使贝努义，英国代办杜维廉，荷兰代办司曼，挪威临时代办季茂登，瑞典临时代办哈马孝尔德，罗马尼亚临时代办孟天努，巴基斯坦临时代办苏尔唐·穆罕默德·汗，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一等秘书维约维尔多约。

机场上悬挂着缅甸和中国国旗。

吴努总理走进机场后，乐队奏起缅甸和中国国歌。

吴努总理检阅了仪仗队，接受了北京儿童的献花。

吴努总理在临行前发表了书面谈话（全文另发）。】

——《吴努总理离京去华东等地参观》，载《人民日报》1954年12月13日。

12月23日

钱端升等集会拥护周恩来外长声明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并担任大会主持。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首都各界人民二十三日集会拥护周恩来外长声明、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参加大会的有各人民团体和各民主党派北京市地方组织的代表，有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学生、少数民族、宗教界、工商界等共一千二百多人。

大会由北京市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主持。他说：北京市各界人民衷心拥护并且以全力支持周恩来外长关于美蒋条约向全世界的郑重声明。我们坚决反对侵略，坚决反对美蒋条约，一定要解放台湾，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意志。

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张友渔在会上作了报告，他严正指出：美蒋条约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条约和战争条约，我们首都人民坚决拥护和支持周恩来外长义正辞严的声明，一定要为解放台湾奋斗到底。如果美帝国主义胆敢阻挠我解放台湾，对我国实行武装干涉，就一定会受到无情的惩罚和严重的回击。全市人民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努力加强国防力量和经济力量，像支援解放战争、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一样来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

各民主党派北京市地方组织的代表蒋光鼐在会上说：我们北京市各民主党派的成员，誓和全国人民一起从各方面加强工作，把保卫祖国、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的神圣职责担当起来。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刘莱夫代表全市工人表示要进一步开展劳动竞赛，争取全面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并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为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贡献出所有的力量。

北京市劳动模范、石景山钢铁厂二高炉值班工长侯德成在会上说：我们全市工人对美帝国主义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感到无比愤怒，我们钢铁厂的全体职工，决心要在今年年底以前多给国家生产一万五千吨生铁。北京市农业劳动模范、黄土岗乡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殷维臣代表全市农民说：我们要积极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争取丰收，大量出卖农产品给国家，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关世雄代表全市青年说：我们全市青年要积极劳动，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准备随时响应祖国号召。林巧稚代表全市的妇女和母亲们说：我们妇女是爱好和平的，首都妇女坚决反对准备战争的美蒋条约，一定要为解放台湾苦难的妇女和儿童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文艺界代表焦菊隐说：我们文艺工作者要发挥出更大的力量，坚决粉碎美蒋条约。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乐松生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蒋介石卖国集团统治大陆时期对工商业者的摧残和掠夺，全市工商业者要分清敌我，遵守国家政策法规，服从国家计划，积极生产经营，为解放台湾贡献力量。

大会最后一致通过了决议。决议中说，美蒋条约是美帝国主义无耻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露骨表现，已经被中国人民唾弃了的蒋介石卖国集团，绝对无权对外签订任何条约。我们北京市各界人民坚决反对这个条约，准备随时回答敌人的任何挑衅行为。】

【（新华社讯）北京市各界人民在拥护周恩来外长声明、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大会上，一致通过了“拥护周恩来外长声明、坚决反对美蒋条约、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议。决议全文如下：

美帝国主义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严重的战争挑衅，是美帝国主义无耻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露骨表现。我们北京市各界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这种罪恶行为，异常愤慨。我们完全拥护周恩来外长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我们反对战争，但是决不为战争威胁所吓倒；我们要求和平，但是决不拿领土作代价来乞求和平。如果有人敢于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一定

要给他以严重的惩罚！

已经被中国人民唾弃了的蒋介石卖国集团，绝对无权对外签订任何条约。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我们北京市各界人民坚决反对这个条约，和全国人民在一起，警惕地注视着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阴谋，准备随时回答敌人的任何挑衅行为。我们再一次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誓以加强团结、克服困难、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国家建设计划的实际行动，来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以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北京各界举行反对美蒋条约大会 通过拥护周外长声明、解放台湾的决议》，载《人民日报》1954年12月24日。

12月26日

钱端升担任政协全国第二届常务委员。

【名誉主席：毛泽东

主席：周恩来

副主席（十六人）：

宋庆龄、董必武、李济深、张澜、郭沫若、彭真、沈钧儒、黄炎培、何香凝、李维汉、李四光、陈叔通、章伯钧、陈嘉庚、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鲍尔汉

秘书长：邢西萍

常务委员（六十五人，按姓名笔划排列）：

王芸生、王宗槐、王首道、王从吾、王稼祥、史良、吉雅泰、安子文、朱学范、朱蕴山、吴晗、吴溉之、吴鸿宾、吴耀宗、吕正操、李六如、李纯青、李葆华、李德全、李烛尘、沈雁冰、车向忱、周叔韬、周建人、邵力子、施复亮、唐生智、孙起孟、马叙伦、马寅初、高崇民、康生、张治中、张奚若、张经武、张际春、梁希、章乃器、许广平、许德珩、陈少敏、陈正人、陈伯达、陈其尤、陈铭枢、陈毅、傅作义、彭泽民、盛丕华、程潜、黄

琪翔、杨尚昆、楚图南、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刘文辉、刘晓、蔡廷锴、邓小平、邓初民、郑位三、卢汉、钱端升、龙云、罗隆基、谭震林】

——《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名单》，载《人民日报》1954年12月26日。

12月24日~29日

钱端升率领科学院代表团前往新德里出席印度科学大会协会第四十二届年会。

【据新华社新德里讯：应印度政府和印度科学大会协会邀请前往出席印度科学大会协会第四十二届年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代表团已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晨乘飞机离京，二十九日到达新德里。代表团由首席代表钱端升，代表侯德榜、狄超白、汪胡桢、薛愚等组成。

印度科学大会第四十二届年会将于一九五五年一月四日到一月十日在巴罗达举行。出席年会的将有来自印度各地的科学和同科学有关的组织的代表和特邀代表，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著名科学家。

印度总理尼赫鲁将主持年会的开幕式。】

——《我国科学院代表团到新德里》，载《人民日报》1955年1月2日。

12月31日

钱端升等拜会印度教育部长。

【（新华社新德里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出席印度科学大会第四十二届年会代表团首席代表钱端升和全体代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申健陪同下，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拜会了印度教育部长毛拉纳·艾卜尔·卡拉姆·阿扎德。】

——《我科学院代表团拜会印教育部长》，载《人民日报》1955年1月4日。

1955年(55岁)

1月4日

钱端升等参加印度科学大会第四十二届年会开幕式。

【(新华社新德里六日电) 印度科学大会第四十二届年会四日在巴罗达开幕。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会上致开幕词。出席会议的有四千多个印度代表。列席会议的有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美国、日本、瑞士等国的五十个外国代表。中国代表团由钱端升率领。

据印度新闻处报道, 年会主席、印度科学大会会长米特拉致词时强调印度必须有计划地实行工业化。他说: “如果印度希望达到富足国家的地位, 它就必须采取充分利用它的自然资源和使用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政策, 那就是说它应该工业化。”

会上宣读了中国科学家的贺电。中国和苏联代表以许多关于它们国家的科学发展的书籍赠给印度科学大会。苏联代表还带了大批矿物和岩石标本, 准备赠送给印度科学机构。

年会在举行全会以后将分成十三个小组, 分别听取和讨论关于各门科学的论文。

印度科学大会成立于一九一四年, 是印度历史最久的全国性科学团体。】

——《印度科学大会第四十二届年会开幕 中苏两国代表赠给大会有关中苏科学发展的书籍》, 载《人民日报》1955年1月7日。

1月9日

钱端升等参加印度科学大会闭幕式。

【(新华社新德里十二日电) 全印科学大会第四十二届年会举行了四天会议后已经在九日闭幕。

印度及各国科学家在会议期间作了学术性的报告。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团

长钱端升向大会报告了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概况，有巴罗达大学的师生共约二千人到会旁听。

中国代表侯德榜、汪胡楨和薛愚还分别在小组会上作了关于新法联合生产合成氨肥及碱、新中国五年来的水利建设、关于中药的专题报告。他们的报告受到听众的欢迎和重视。

印度著名科学家索克少将在大会报告了访问新中国的观感。

会议结束后印度政府替中国代表团安排了参观日程。代表团已经离开巴罗达到阿麦达巴、孟买、浦那、德里、加尔各答等地参观科学研究机关、工厂、水利工程，同时将在各地作一些科学报告。】

——《全印科学大会第四十二届年会闭幕 我国代表曾向年会作专题报告并将赴各地参观》，载《人民日报》1955年1月14日。

1月18日

钱端升等离开印度，抵达卡拉奇。

【据新华社新德里十九日电：中国科学家代表团首席代表钱端升、代表薛愚和随员一人在十八日离开新德里，前往巴基斯坦参加全巴基斯坦科学促进会第七届会议。代表侯德榜、狄超白、汪胡楨应印度政府邀请留在印度参加印度共和国国庆典礼。

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在参加印度科学大会第四十二届年会以后曾到孟买、阿麦达巴和浦那等地访问。代表团在十六日从孟买到达新德里。

我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申健十七日晚举行招待会欢迎我国科学家代表团。印度政府很多部门的官员和印度各界人士等都应邀参加了招待会。】

【（新华社十九日讯）喀喇蚩消息：应邀参加全巴基斯坦科学促进会第七届会议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首席代表钱端升和代表薛愚等三人在十八日抵达喀喇蚩。在机场欢迎的有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临时代办郑为之及大使馆馆员，巴基斯坦外交部交际司官员和旅巴华侨代表等。】

——《应邀参加全巴科学促进会会议 我科学家代表团到达喀喇蚩》，见

《人民日报》1955年1月20日。

【1955年1月我率团参加印度第四十二届科学大会，在新德里就中国的新宪法做了主题报告，并拜会尼赫鲁总理，之后，又到巴基斯坦喀喇蚩参加巴基斯坦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会议。】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9页。

3月17日

在《科学通报》发表《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印度的报告》一文。

——钱端升：《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印度的报告》，载《科学通报》1955年3月17日，第5期，第64-68页。

4月9日

钱端升发表文章《亚非国家人民的正义事业必然胜利》。

【亚非国家人民的正义事业必然胜利

(出席印度、巴基斯坦科学家会议中国科学家代表团首席代表钱端升)

十八个亚洲国家人民的代表正在印度首都举行亚洲国家会议。有二十九个亚非国家的政府参加的亚非会议，也就要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这两个会议虽然不同，一个是各国各阶层人民的代表的集会，一个是各国政府的会议，但讨论的问题同样是符合这一地区各国人民的愿望，受到各国人民热烈的欢迎的。

最近，为了出席印度、巴基斯坦科学家所召开的科学年会，我曾经访问过印度和巴基斯坦，中途也曾经经过锡兰。在两个科学年会中，我会见了缅甸、印度尼西亚、日本、埃及等亚非国家的科学家。无论是在科学家或是其他人中，我都深深地体会到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这些国家的人民都要求增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都要求独立自主，不再受西方国家的干涉和侵略，都要求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自己的国家。

中印、中缅之间，有着悠久的友好往来的历史，印度、缅甸人民对我们表示十分友好是很自然的。我高兴地看到：巴基斯坦人民也同样欢迎我们，同样亲善地对待我们。虽然有不少巴基斯坦人问及宗教自由的问题，但他们是没有成见的。曾见到过一九五二年达浦生先生所率领的朝圣团（这本来是去麦加朝圣的，因受美帝国主义的阻挠，只到了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人，是不怀疑新中国的宗教自由的。

深厚的友谊，也存在于印、巴人民之间。尽管美帝国主义不断地从中制造不和，不但印、巴科学家之间有着亲如一家人的关系，普通的印度人和普通的巴基斯坦人之间也是没有隔阂的。我曾经看到四五千个印度人来到拉合尔看印、巴间的板球比赛。拉合尔的居民除自己尽了大力招待印度人外，并要求政府放宽入境的限制，免去旅客报户口的手续。我也看到虔诚的巴基斯坦回教徒和来巴游览的印度锡克族人（信锡克教）亲切地互问生活情况。由此我相信印、巴人民间自然的友谊，决不是人为的纠纷和美国组织军事集团的活动所能离间、摧毁的。

在我们和缅甸、日本、埃及科学家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友好的关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曾经给中国、缅甸的人民以莫大的祸害，但是在印度科学年会上，当中、缅科学家主动地向日本科学家表示友好时，日本科学家也就不感到拘束，并同意各国科学家之间应争取相互访问。埃及科学家且希望得到我们具有高度抗锈性能的“碧玛一号”小麦品种做研究。

亚非各国人民普遍经历过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受尽了帝国主义压迫的苦难，因此都十分珍视独立自主，都有高度的自尊心。爱好和平的印度人民是这样，长期向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埃及人民是这样，就是在和美帝国主义订有军事条约的巴基斯坦，人民也是这样。在巴基斯坦科学年会上，有一自称是农业专家的美国人傲慢地教训巴基斯坦人，说巴基斯坦不宜过速地用机器种地，以避免发生农村失业问题。他的狂妄的论调引起了听众和报纸读者的不满。更狂妄的是另一美国“专家”。当巴基斯坦科学家讨论某地区的灌溉问题，并论述到多种水——河水，雨水，地下水

的利用时，他竟斥责他们，说水只有一种。听众中当即有人报以嘘声，并讥笑地问“一种水”是否就是指氢二氧一？巴基斯坦人告诉我，美国人在巴基斯坦都成了老爷，在巴基斯坦人民中引起了反感。

亚非各国人民对种族主义，即优良种族论，更特别不能容忍。印度人民痛恨南非联邦对南非印度居民的歧视。巴基斯坦人民也有着同样的痛恨。有一个在东非经商的资本家的眷属告诉我说，她虽然是“上层社会”的人，虽然喜欢旅行，也到过非洲许多地方，但她决不去南非。南非政府歧视有色人种的政策固然是罪恶的，但是泛滥着三K主义的美国才是种族主义的大本营。在印度科学家的年会上，一个据说是很有名的名叫保林的美国生物化学家竟公开地说：“美国人的血球中的血红蛋白分子分两极，可以极化，是‘非均一体’，是‘正常’的，对疾病的抵抗力很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血球的血红蛋白分子不分两极，是‘均一体’，是‘不正常’的，对疾病的抵抗力很弱，因之印第安人和黑人死亡率大，寿命短。”这真是比纳粹种族主义更高一等的“科学”！真正的科学绝对与之相反。索克将军反驳他说：“我在八九年前早就研究过血红蛋白分子问题，我研究的结果证明我们印度人和美国人，虽然住在不同的地区，吃不同的饭食，可是印度人血球中的蛋白分子和美国人血球中的蛋白分子确实确实是完全相同，毫无区别。”

进行经济建设也是我在南亚各国所看得到的共同特征。当然，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实际情况下，经济建设的方向和速度是有所不同，但无论在印度、巴基斯坦或锡兰，经济建设是在进行中。印度的农业生产已有所增加，电力、灌溉事业也有发展。苏联援助建立的钢厂和印度自己扩建的钢厂将使印度钢铁产量大为增加。巴基斯坦人民极其关心水利建设和可耕土地的增加，以便增加粮食的生产。纺织工厂也在开始建立。巴基斯坦本缺乏可以炼成焦煤的原煤矿，科学家正在试图用去掉硫质的办法使坏煤能应用于工业。科学家这种辛勤的劳动正博得了人们的敬佩。正因为巴基斯坦工业还少，所以巴基斯坦人民对工业建设的要求特别的迫切。在锡兰，我听说投入经济建设的资金也有相当的增加，主要是为了扩大农业生产和发展对外贸易，也为

了适当地增建一些轻工业。拿今天的科伦坡和十多年前的科伦坡相比，也的确可以看出在市区、郊区都有了进步，看出锡兰人民是在进行建设工作。

已经取得了或者正在争取独立的并进行经济建设的人民，必然爱好和平。印度人民、锡兰人民以及我所遇到的缅甸、印度尼西亚、日本、埃及的科学家，一致要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亚非和世界的和平；巴基斯坦的人民也有同样的要求。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企图以“帮助”巴基斯坦建立原子研究机构、开展原子能研究为藉口，来搜刮巴基斯坦境内可能蕴藏的放射性元素的矿产。但巴基斯坦人民和科学界只希望发展原子能来供给巴基斯坦目前还缺少的动力。他们和印度人民一样反对原子武器。

在南亚各国的访问和对这些国家的人民和亚非不少国家的科学家的接触，更加强了我的信念，即亚非国家的人民对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具有强烈无比的要求，因为只有和平共处，才能增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发展文化上、经济上的互助，为提高人民的生活而进行建设。尽管美帝国主义不会停止制造各国间的纠纷，挑拨各国间的关系，借“援助”的幌子进行对内政的干涉，在亚非国家中组织侵略集团，并通过这一些罪恶活动来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为它的战争政策服务，但亚非国家人民保卫和平的意志是坚决的，声音是响亮的。在亚洲国家会议和亚非会议上，他们将为发扬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巩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钱端升：《亚非国家人民的正义事业必然胜利》，载《人民日报》1955年4月9日。

5月5日

钱端升参加世界文化名人纪念会。

【（新华社五日讯）世界文化名人席勒、密茨凯维支、孟德斯鸠、安徒生纪念大会，五日晚在北京隆重举行。

纪念大会是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联合主办。

大会主席台正面的帷幕上挂着席勒、密茨凯维支、孟德斯鸠和安徒生的巨幅画像，台上布着盛开的鲜花。

在主席台上的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副会长阳翰笙，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主席张志让、钱端升，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罗隆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郑振铎、全国委员会委员叶圣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老舍，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副主席洪深。

在主席台上的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德国艺术学院院士、一级国家奖金获得者布莱德尔，波兰华沙大学教授、文学历史家布泽克，丹麦文学教授、研究安徒生的专家克里斯坦逊。

参加纪念大会的有：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代表，著名的和平人士、诗人、作家、戏剧家、法律工作者、演员、艺术家以及其他各界人士。

参加纪念大会的外宾有：在京的各国和平人士和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们。

参加纪念大会的外宾还有：波兰驻我国大使基里洛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我国大使柯尼希，丹麦驻我国公使格瑞杰生以及各国驻华使馆人员。

纪念大会由楚图南主持，并致开会词。

茅盾在会上以“为了和平、民主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为题作了报告，介绍了四位文化巨人的生平和著作。

茅盾说，德国伟大诗人席勒，他的重要作品早就有了中文译本。席勒的一生正处在德意志人民寻求民主、和平、统一的年代；他的作品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精神。今天，德国人民正处于席勒当年的境地。诗人的不朽的著作，响亮的语言，永远像是进军的号角。这号音不但鼓舞了德国人民，也鼓舞着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大踏步前进！

茅盾说，波兰的伟大的人民诗人密茨凯维支逝世已经一百年了。早在将近五十年前，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就把诗人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从那时起，诗人从心深处发出的人民的声音，也开始激励着中国人民的渴望自由的心灵。密茨凯维支是波兰的人民诗人，但全世界都飞遍了他的歌声。

茅盾又说，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十八世纪法国杰出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孟德斯鸠逝世二百周年。一提到他的名字，我们就想起了五十年前就已译成中文的“法意”，曾经怎样地鼓舞了我们的先辈为了打倒封建王朝的专制政权而斗争，正像“法意”在当年怎样地鼓舞了法兰西人民。

茅盾接着说，伟大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生在一八〇五年。他终身不懈地追求着光明。他热烈地把他的希望寄托在未来的一代。而他的作品也确实是为全世界的孩子们所爱好的。

茅盾最后指出，这四位文化名人的事业是为人类的，全世界人民永远纪念着他们的不朽的劳绩。我们中国人民对于产生了这样的文化巨人的德意志、波兰、法兰西和丹麦的人民，怀有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友谊。

布莱德尔接着讲话。他说，席勒体现着德国人民最好、最高贵的道德，他曾是一个顽强反抗、热情地为自由和人类尊荣而斗争的天才青年。他在他的剧本里、故事诗里塑造历史的冲突，这也是他的时代的冲突。他写的每一行、每一个字都在鼓舞人民向着国内国外的压迫者进行正义的斗争。他说，对德国人民来说，如要保持和平和文化，如要成为一个统一自由的民族，最后而永久地战胜自己身边军国主义的魔鬼，在今天，席勒是最为迫切需要的。

布泽克在会上讲话时，介绍了伟大的波兰人民诗人密茨凯维支战斗的一生。他说，我们祖国解放十周年几乎正是我们的先知者逝世一百周年。今天，诗人的愿望正在我国不断地成为事实，并且已经达到想来是他所认为不可达到的境地。最后，他表示，今天的聚会象征着我们波中两国团结的特别动人的纪念。

最后，克里斯坦逊讲话。他说，安徒生是一位面向前进的作家，一位幻

想家，同时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在一个童话里曾对未来的二十世纪的新世界作了预言，就在这个时代里，世界各国人民的力量和传统，从古到今的世界各地的时代精神，将会结成一股巨大无比的文化火焰。他说，由于新中国已经诞生，我们今天的确看到欧亚两洲的文化洪流汇合在一起了。他指出，这种汇合将大大地丰富人类的文化。

他们的讲话都受到了热烈欢迎。】

——《世界文化名人纪念会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1955年5月6日。

5月15日

钱端升前往机场迎接埃及政府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尔。

【（新华社十五日讯）应我国政府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埃及政府宗教事务部部长艾哈迈德·哈萨尼·巴库尔和开罗大学教授穆斯塔法·卡迈尔，在十五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吴克坚，国务院副秘书长常黎夫，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静仁，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马玉槐、达浦生，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马松亭，以及教育界人士李恕、苏克勤、周鯁生、钱端升、马坚等人。】

——《埃及政府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尔等到京》，载《人民日报》1955年5月16日。

5月16日

钱端升参加中印友好协会成立三周年庆祝会。

【（新华社十六日讯）中印友好协会十六日晚在北京举行庆祝会，庆祝中印友好协会成立三周年。

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和使馆人员应邀出席了庆祝会。

应邀出席庆祝会的还有：正在我国访问的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和印度著名语言学家拉古·维拉等。

出席庆祝会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外交部部长助理陈家康。

出席庆祝会的还有：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副会长陈翰笙和理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副会长赵毅敏、阳翰笙、洪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胡愈之、钱端升，以及其他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曾先后赴印度访问的我国各个代表团代表，首都科学、教育、文艺、新闻、宗教界人士。

主席台正中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普拉沙德总统的画像，两旁悬着中印两国国旗。会场里还陈设着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中国访问的照片，以及印度政府和人民赠送给访问印度的我国各个代表团的礼品。

庆祝会由陈翰笙主持。

丁西林和赖嘉文相继在会上讲话，他们谈到了中印两国友好关系在过去几年来的发展，并祝贺中印友好关系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会后，最近访问印度归来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表演了中、印歌舞。】

——《中印友好协会举行成立三周年庆祝会》，载《人民日报》1955年5月18日。

5月26日

钱端升在机场迎接印度尼西亚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及其他随同来华访问的人员，由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和夫人、我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陪同，在二十六日下午二时十五分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邓子恢、

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董必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马叙伦，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各部部长谢觉哉、罗瑞卿、章乃器、叶季壮、陈郁、蒋光鼎、贾拓夫、朱学范、廖鲁言、傅作义、马文瑞、杨秀峰、张奚若、李德全，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以及其他各部副部长和各委员会副主任杨奇清、张玺、王世泰、孔原、吕东、曹祥仁、吕正操、李连昌、李范五、钱俊瑞、郑振铎、蔡廷锴、杨静仁，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陈家康，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洪深，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柯华，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冯基平。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京津卫戍司令员杨成武。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邵力子、张治中，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农工民主党秘书长黄琪翔，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涂长望，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刘导生。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章蕴，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吴晗，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田德民，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阳翰笙，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马玉槐、达浦生，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马松亭。

印度尼西亚驻我国大使馆全体人员和印度尼西亚侨民也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有：缅甸大使吴拉茂，波兰大使

基里洛克，印度大使赖嘉文，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黄文欢，瑞典大使魏斯特朗，罗马尼亚大使郭佐文，蒙古大使奥其尔巴特，苏联大使尤金，保加利亚大使迪莫夫，阿尔巴尼亚大使纳赛，匈牙利大使斯克拉丹，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格里哥尔，巴基斯坦大使阿哈默德，丹麦公使格瑞杰生，瑞士公使贝努义，荷兰代办司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金贵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代办葛鲁特纳，芬兰临时代办谢列克，南斯拉夫临时代办米里切维奇，英国代办处参赞艾惕思。

在机场上欢迎的还有首都各界群众六千多人。

机场上悬挂着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国旗。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下机后，和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欢迎人员亲切握手。乐队奏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国歌。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检阅了仪仗队，并接受了首都儿童的献花。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在机场上发表了谈话，然后，走到在机场上欢迎的群众行列的前面，向欢迎群众举手致意。这时欢迎的人们不断鼓掌和高呼“欢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万岁！”“亚洲和平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等口号，并向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献花。

接着，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由周恩来总理陪同，乘敞篷汽车到迎宾馆休息。在经过市郊公路和市内街道时，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受到了沿途十多万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到北京 受到首都各界十多万人民的热烈欢迎》，载《人民日报》1955年5月27日。

5月27日

钱端升参加周恩来欢迎印尼总理晚宴。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二十七日

晚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应我国政府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他的夫人。

随同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访问我国的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莫诺努图，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亚洲—太平洋司司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和夫人，印度尼西亚驻印度大使巴拉，印度尼西亚驻苏联大使苏班德里奥，印度尼西亚国家计划局局长朱安达，印度尼西亚经济部对外经济关系司高级官员哈苏诺·雷克梭阿莫佐等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人员。

中国方面出席宴会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

出席宴会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秘书长习仲勋，各办公室主任罗瑞卿、林枫、贾拓夫、王首道和各办公室副主任，各部部长谢觉哉、钱瑛、章乃器、叶季壮、张霖之、陈郁、蒋光鼐、滕代远、朱学范、廖鲁言、杨秀峰、李德全，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章汉夫、姬鹏飞和各部副部长、各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各直属机构的负责人，北京市市长彭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

出席宴会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委员周建人、邵力子、胡乔木、张邦英、张苏、黄克诚、黄绍竑、熊克武、蔡廷锴。

出席宴会的还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委员王宏坤、王秉璋、王新亭、王震、洪学智、许光达、张宗逊、陈士矩、陈再道、陈赓、彭绍辉、杨成武、刘亚楼、郑洞国、卢汉、苏振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和高级将领。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何香凝，常务委员王从吾、安子文、吴溉之、李六如、孙起孟、康生、张际春、钱端升，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黄琪

翔，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涂长望，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刘导生。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章蕴，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吴晗，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田德民，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周扬，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孟用潜，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杨静仁、马玉槐、达浦生，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白寿彝、马松亭，中国佛教协会代理会长喜饶嘉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王梓仲及其他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达赖喇嘛驻京办事处处长顿旺·坚赞札巴，班禅额尔德尼驻京办事处处长孙格巴顿，内蒙古自治区驻京办事处处长官保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

出席宴会的还有：科学界人士吴有训、潘梓年、钱三强、曾昭抡、丁西林、侯德榜、茅以升、陈凤桐，教育界人士蒋南翔、江隆基、邹鲁风、何锡麟、傅种孙，文艺界人士郑振铎、老舍、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江丰，新闻界人士邓拓、朱穆之、王芸生、常芝青、范瑾，以及其他社会人士翁文灏、卫立煌等。

出席宴会的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有：缅甸大使吴拉茂，波兰大使基里洛克，印度大使赖嘉文，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黄文欢，瑞典大使魏斯特朗，罗马尼亚大使郭佐文，蒙古大使奥其尔巴特，苏联大使尤金，保加利亚大使迪莫夫，阿尔巴尼亚大使纳赛，匈牙利大使斯克拉丹，芬兰大使孙士敦，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格里哥尔，巴基斯坦大使阿哈默德，丹麦公使格瑞杰生，瑞士公使贝努义，荷兰代办司曼，挪威临时代办季茂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金贵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代办葛鲁特纳，南斯拉夫临时代办米里切维奇，英国代办处参赞艾惕思。

出席宴会的共七百多人。

宴会开始前，周恩来总理介绍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同我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各部门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各界人士和各国驻华使节见面。

宴会上，周恩来总理首先致词，他在致词结束时，举杯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总统健康。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接着致词，他在致词结束时，举杯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健康。

【宴会在热烈和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周恩来总理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载《人民日报》1955年5月28日。

5月28日

钱端升前往机场欢送戈登夫人返国。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应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欧仁妮·戈登夫人和法国妇女巴朗蒂尼夫人、亚历山大夫人、维尔德美夫人在二十八日乘飞机离京返国。

前往机场欢送的有，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副主席李德全、章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康克清，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秘书长刘贯一，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以及首都各界妇女等多人。戈登夫人等曾赴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参观。在离京前夕，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曾设宴欢送。】

——《国际民主妇联主席戈登夫人回国》，载《人民日报》1955年5月29日。

6月9日

钱端升入选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

【一、团长：茅盾

二、副团长：陈叔通、廖承志

三、团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芸生、王深林、王仪（女）、白寿彝、朱宪彝、朱世纶、朱子奇、沙梦弼、李忆兰（女）、李一氓、吴耀宗、吴贻芳（女）、吴茂荪、邵力子、林汉达、周炳琳、胡子婴（女）、胡仲持、马约翰、马明基、唐明照、陈翰笙、陈体强、焦菊隐、曾宪植（女）、温建平、喻宜萱（女）、杨士达、彭子冈（女）、楚图南、蔡廷锴、刘宁一、刘长胜、刘贯一、刘开渠、刘清扬（女）、刘麟瑞、廖盖隆、郑森禹、钱端升、鲍尔汉、罗隆基

四、秘书长：刘宁一（兼）

五、副秘书长：刘贯一（兼）、吴茂荪（兼）】

——《中国代表团名单》，载《人民日报》1955年6月9日。

【同年6月我又前往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为增进中国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使者的交流尽力。】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9页。

6月13日

钱端升以人大代表身份在上海视察粮食工作。

【（据新华社上海十三日电）在上海市视察工作的一部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正深入视察工业生产和粮食工作等方面的情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胡厥文、曹靖华等十四人在国营上海机床厂进行了三次视察，代表们了解到这个工厂在解放前只制造过最简单的农具，解放后，已出产了十二种精密的磨床，供应全国几百个工矿企业和科学研究机关应用。代表们还详细询问了有关生产技术、财务管理和工人生活福利等方面的情况，并对机床的维护保养等方面存在的缺点提出了意见。在代表中，交通大学副校长陈石英还特别询问了大学毕业生在厂中是否根据所学专业分配

工作等问题；劳动部劳动保护司副司长李文宜调查了劳动保护和生活福利等方面的情况，并对厂中旧厂房的光线和照明设备等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在上海市视察粮食工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庸、金仲华、吴耀宗、杨逸棠、钱端升等十三人，大都深入里弄、机关、工厂、粮库、面粉厂、碾米厂、饭店、食品工厂、粮食店及郊区进行视察。根据视察的结果，代表们向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提出了改进粮食工作的意见，他们认为，上海市还应进一步加强节约粮食的宣传教育工作，有些居民订的购粮计划偏高的现象应该改变；对有“宽打窄用”思想的伙食单位应该加强教育、检查和监督。对全市市民粮食的实际需要量还应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调查。代表们还一致提出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是经常性的事情，要防止“一阵风”的做法。代表们还就有关粮食保管、加工、供应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改进的意见。现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准备将代表们所提意见，分别向有关领导机关报告；其中立即可行的，准备立即通知有关部门执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继续深入视察工作》，载《人民日报》1955年6月14日。

7月16日

钱端升出席郭沫若等招待各国和平代表宴会。

【（新华社十六日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鲍尔汉，在十六日晚设宴招待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约旦、苏丹、阿根廷、加拿大七个国家的和平代表们。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龟田东伍和万徒勒里、在京的日本和平人士中村玩右卫门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作陪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廖承志、常务委员沈雁冰、吴耀宗、邵力子、许德珩、许宝驹、罗隆基、秘书长刘贯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秘书长张玉珍，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白寿彝、马松亭，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

曾宪植，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陈翰笙、钱端升，以及首都社会各界人士等。

我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在京的全体代表今晚也和各国和平代表们共桌欢聚。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在宴会上致词，欢迎经过一万多里路程来到中国访问和参观的和平朋友们。他说，我们诚恳地希望各位朋友在参观访问时多给我们一些批评，我们等待着各位朋友们的宝贵意见。郭沫若最后请大家为和平朋友间的美好友谊而干杯。郭沫若致词时，会场上不断响起热烈的掌声。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鲍尔汉代表中国穆斯林向和平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他高呼“中国人民和阿拉伯国家人民及各国人民的友谊万岁！”“世界和平万岁！”

约旦代表伊布拉欣·哈巴斯涅代表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友人讲话时，会场上响起一阵又一阵的欢迎掌声。

他说，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友好情谊，使我们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感到，我们和中国人民是一个大家庭的子女，我们就像长久的分别以后，现在又团聚在一起了。

哈巴斯涅说，中国人民奋斗的史实，告诉所有被奴役国家的人民，只有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才能获得解放，而只有在已取得民主自由的国家中，和平生活才能得到保证。

哈巴斯涅有力地表示，在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是和中国人民永远站在一起的。

哈巴斯涅说，春天来了，燕子要来报春。我们阿拉伯国家的和平代表就像春天的燕子，象征着阿拉伯国家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传统的友谊将很快得到恢复，并将更加发展。他高呼：“阿拉伯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在宴会以后，各国和平代表欣赏了中国杂技团的艺术表演。】

——《郭沫若和鲍尔汉设宴招待各国和平代表》，载《人民日报》1955

年7月17日。

7月19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行第三次会员大会。

【(新华社二十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十九日举行第三次会员大会,出席会员二百多人。大会由会长张奚若主持。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会务报告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新的章程。大会一致拥护周恩来总理继续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并选出张奚若为会长,周鲠生、陈翰笙、胡愈之、钱端升、乔冠华、罗隆基为副会长,吴茂荪为秘书长,王任叔等六十九人为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选举结束后,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对目前国际形势作了报告。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三届理事会接着举行会议,推举王铁崖、夏衍、梅汝璈、张明养、陈家康、杨刚、冀朝鼎等二十一人为常务理事,并推举段伯宇、刘进中为副秘书长;黄华为研究部主任,陈体强为副主任;徐永瑛为编译部主任。】

——《我国人民外交学会举行第三次会员大会》，见《人民日报》1955年7月22日。《光明日报》7月21日亦就此报道。

7月27日

钱端升参加首都各界拥护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集会。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首都各界人民五千多人二十七日晚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拥护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和各项建议。

在作为大会会场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内,坐满了参加会议的人们。他们当中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部分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在京全体代表,以及首都各界人民。

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后来我国访问的叙利亚、伊拉克、日本、阿根廷、巴

西、古巴、哥伦比亚、墨西哥、乌拉圭、澳大利亚的一部分代表和在京的各国和平人士也应邀出席了大会。

八时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团长茅盾、副团长陈叔通等和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日本和平人士大山柳子、叙利亚和平委员会委员阿赫玛德·阿巴扎和他的夫人、叙利亚和平代表阿伊达·米让、澳大利亚全国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威廉·戈兰、巴西代表团团长达·科斯塔·法尔康和他的夫人登上主席台。这时，全场热烈鼓掌表示欢迎。

同郭沫若等一起登上主席台的，还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廖承志、蔡廷锴、马寅初、邵力子、罗隆基、李德全、刘宁一、吴耀宗、楚图南、钱端升、胡愈之、赵毅敏、华罗庚、李一氓，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章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胡克实。

今天的大会，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主持，他在致开会词中说，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有六十八个国家的一千八百多位代表参加，代表性非常广泛。这表明了几年以来和平运动的基础确是日益雄厚，保卫和平的力量确是日益壮大了。

郭沫若在谈了会议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后说，世界人民为了全面实现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的号召必须更进一步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我们六亿中国人民愿意和世界人民一道为达成这一目标而作不懈的奋斗。

郭沫若指出，今天有不少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参加了今天的大会，他向所有参加大会的外宾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感谢，并通过他们向他们所代表的各国人民和各国和平组织表示崇高的敬礼。他说，各位和平友人们，你们在今天一定可以看到，你们在世界和平大会上辛勤劳动的成果是怎样地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中国人民都知道，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和平保卫事业是分不开的。

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团长茅盾向全体到会者传达了具有历史意

义的世界和平大会的情况和成就。茅盾在题为《向持久和平和友好合作的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全文见第二版）中，分析了这次大会召开时的国际局势，指出了参加大会的代表的广泛性和大会受到的广泛热烈的支持。茅盾在谈了大会的各项重大成就以后，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努力争取进一步缓和国际局势和保卫世界和平。

茅盾的报告结束以后，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副团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讲话，他叙述了对世界和平大会的感想。

陈叔通说，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是在和平力量与战争势力进行长期斗争过程中，国际局势出现了新的缓和时机中召开的。因此，它对团结和扩大和平力量以推动和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促使国际局势的进一步缓和，具有重大的意义。出席这次大会的有空前广泛的不同政治、宗教信仰的六十八个国家各阶层社会人士，这再次有力地表明了对国际局势发展日益起着重大作用的和平力量正在一天比一天壮大起来。大会通过自由讨论及交换意见，对当前所有各项重大的国际问题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和各项建议，充分表达了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强烈的和平要求。

陈叔通谈到了不久前在取得了积极成就之后宣告结束的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他说，会议虽然没有能根据苏联一再的建议讨论亚洲局势，特别是台湾地区以及印度支那局势问题，令人感到很大的遗憾，但这次会议已为国际局势的缓和及增进国际间的互信合作，作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希望这种协商精神能够保持并扩大，那就会继续促进国际局势缓和下去，使和平事业的维护获得保证。

陈叔通最后说，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所提出的一切主张是我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今后争取和平的重要指标，我们必须用全力来促使这些主张的完全实现。

茅盾的报告和陈叔通的讲话，受到全场热烈的欢迎，在他们讲话时，人们不断为这次世界和平大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热烈鼓掌。

在大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胡克实、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章蕴也讲了话。他们分别代表全国的工人、青年、妇女，表示完全拥护和支持世界和平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和各项决议。

赖若愚讲话时，首先对世界和平大会的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中国人民，对于保卫和平负有重大责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每一项成就，都是对于和平事业的贡献。当我们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成功的时候，也就是世界和平最有保证的时候。为了保卫和平，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来说，最实际的行动就是坚决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忠实地、模范地执行兵役法，就是积极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就是提高警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对于中国工会工作者来说，就是更加深入、具体地组织劳动竞赛，就是更加亲切、周到地关心职工群众的生活，就是更加认真地、实实在在地帮助职工群众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中国工人阶级将更加紧密地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设我们的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胡克实说，我们青年的确是世界和平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因为我们懂得：只要全世界的青年不上战争贩子的当，只要我们把和平战士的责任勇敢地担当起来，战争贩子的一切打算，都是要落空的。因此我们中国青年一定为世界和平大会的宣言、为大会的各项建议的实现而奋斗。

胡克实说：保卫和平，也就是要保证每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我们中国青年坚决反对殖民主义，我们中国青年决不会忘记自己的神圣的领土台湾，还为美国侵略势力所庇护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所盘踞。我们说，我们一定要为解放这一片领土奋斗到底。

章蕴说：我们中国人民和中国妇女一向是坚决拥护人民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并为扩大世界和平力量而奋斗不息。为了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防止和平的敌人企图继续掀起冷战和争取持久和平，我们中国妇女将坚决响应世界和平大会的号召，永远忠实于和平事业，为实

现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童蕴在发言中并指出，最近召开的世界母亲大会代表了全世界母亲们的要求和愿望，也是与世界和平大会精神完全一致的。它的目的是：“保卫儿童，反对战争，争取实现裁军，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中国妇女愿为实现世界母亲大会的四大号召而努力。同时，将以此作为人类共同的信念，教育子女、儿童，使新中国的新生一代，从幼年时就树立起热爱和平的崇高美德。

当来自日本、叙利亚、巴西和澳大利亚的和平朋友们应邀讲话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说，赫尔辛基大会，在六十八个国家代表参加之下，向全世界的人民作出决议说：各国政府应该努力通过协商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在舆论压力日益高涨的基础上，国际间的紧张局势是一定能够得到缓和的。最近四国首脑会议的成功首先证实了这个决议的正确性。

大山郁夫说，日本人民衷心欢迎世界和平大会，日本人民全面支持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的决议，他们正在要求日本政府开始和中国谈判，使两国的国交正常化。日本人民特别欢迎赫尔辛基大会订八月六日为禁止原子武器和裁减军备的国际性纪念日。为了执行这一项决议，目前正在筹备八月六日在日本的广岛举行一个要求禁止原子武器的国际性大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已经表示准备派遣代表参加广岛的大会。我要在这里对中国人民的这种努力和友谊表示感谢。中日两国的一切和平工作者将和亚洲及全世界的爱好和平的人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同心合力，为完全实现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的决议而向前迈进。

叙利亚和平委员会委员阿赫玛德·阿巴扎接着讲话。他说，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你们在和平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胜利，正如我们曾经看到你们在国际方面所获得的和平胜利一样。

他说，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和各项建议，是世界和平力量的伟大胜利，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将支持大会的宣言和各项建议。

阿巴扎最后高呼：“各国人民的友谊万岁！”“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伟大中国人民万岁！”“世界和平万岁！”

巴西代表团团长法尔康代表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来我国访问的拉丁美洲各国和平代表在会上讲话。他说，我们来到北京像回到自己家庭里一样，像回到自己的兄弟中间一样。我们回到本国后，将更加坚强地为和平而斗争，因为在中国我们更好地了解到和平事业的意义，我们将把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告诉本国的人民。法尔康说：中国应该得到它在联合国的地位，台湾应该归还中国，拉丁美洲人民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他并代表拉丁美洲人民向中国人民致敬，祝贺中国人民在争取自己祖国的解放和保卫和平的斗争中获得的成就。

澳大利亚全国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威廉·戈兰在会上的讲话中着重指出，我们必须和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一道，共同完成我们这一代所面临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从世界上永远消灭战争。我保证澳大利亚的和平运动在这个斗争中完成它的任务，把这一斗争坚持到底，直到最后胜利。

在这些讲话结束以后，全场一致举手通过了拥护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宣言和各项建议的决议。决议通过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大会结束以后，由中国杂技团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首都各界人民举行盛大集会 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宣言和建议》，载《人民日报》1955年7月28日。

7月30日

钱端升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出席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一千零九十名代表，三十日上午举行会议。会议研究了各国议会联盟章程，决定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各国议会联盟的人民代表团”加入各国议会联盟。

到会的全体代表一致选出由宋庆龄、董必武、林伯渠、彭真、林枫、李

济深、程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李烛尘、马寅初、陈嘉庚、赛福鼎、廖承志等十五人组成会议的主席团。

林伯渠代表向会议介绍了各国议会联盟的组织和工作情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各国议会联盟的人民代表团”筹备成立的经过。

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各国议会联盟的人民代表团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各国议会联盟的人民代表团章程。

会议选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各国议会联盟的人民代表团执行委员会。选举的结果是：彭真为人民代表团主席，程潜、林枫、赛福鼎、陈嘉庚、章伯钧、马寅初、李烛尘、廖承志等八人为副主席，吴克坚为秘书长，王芸生、史良、朱学范、吴玉章、吴贻芳、宋庆龄、李一氓、李四光、李纯青、李雪峰、李维汉、李德全、李济深、沈钧儒、沈雁冰、邢西萍、周建人、周鲠生、屈武、林伯渠、邵力子、侯德榜、胡愈之、胡耀邦、乌兰夫、马叙伦、高崇民、区棠亮、张治中、张闻天、张难先、章蕴、许广平、许德珩、郭沫若、陈劭先、陈其尤、陈叔通、陈其瑗、陈绍宽、傅作义、喜饶嘉错、彭泽民、黄炎培、黄绍竑、黄琪翔、达浦生、荣毅仁、熊克武、赵朴初、刘长胜、刘宁一、潘菽、蔡畅、蒋光鼐、蒋南翔、邓颖超、赖若愚、钱端升、鲍尔汉、罗隆基等六十一人（按姓名笔划排列）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按：各国议会联盟是各国议会议员之间的国际组织。一八八九年成立。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苏联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先后决定参加各国议会联盟。七月二十四日，即在联盟第四十四届大会将在八月二十五日举行的一个月前，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秘书长彭真曾分别致电各国议会联盟主席斯坦斯盖特子爵、秘书长布隆内先生和各国议会联盟第四十四届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法格霍姆先生，通知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将组成人民代表团，参加各国议会联盟，并将选派代表出席联盟第四十四届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举行会议决定组成人民代表团参加各国议会联盟》，载《人民日报》1955年7月31日。

8月2日

钱端升前往机场欢迎英国和平委员会会长普里特。

【（新华社二日讯）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邀请，来我国访问的英国和平委员会会长、“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得奖人、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主席普里特和他的夫人在二日乘飞机抵达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主席沈钧儒、张志让、钱端升，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罗隆基、秘书长刘贯一，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曹孟君。】

——《英国和平委员会会长普里特和夫人到北京》，载《人民日报》1955年8月3日。

8月20日

钱端升参加欢迎英国访华友好代表团宴会。

【（新华社二十日讯）应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邀请前来中国访问的以英国各界人士组成的英国访华友好代表团全体人员今晚出席了一个招待宴会，和中国各界的许多知名人士见面。

这个招待宴会是由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为欢迎代表团来华访问而联合举行的。宴会由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主持。

楚图南在会上致欢迎词说：这次英国访华友好代表团应郭沫若先生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是中英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发展上的一件可喜的事情。我们中国有句古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正说出了我们今天在这里欢迎诸位的心情。

楚图南向客人说，中国人民正在为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努力。你们在访问我国的期间，将看到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和努力

进行和平建设的许多事实。他又说，我们建国才五年多，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才不过两年，我们的困难很多，缺点也很多，我们必须虚心地学习，特别是要向你们来自工业技术发达的国家的朋友们学习。因此，我们诚恳地希望各位在访问的过程中多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这对于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相信，通过各位这次的访问，将会进一步加深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英国访华友好代表团团长莫里斯·奥巴奇致词，对郭沫若邀请他们来到“这个美丽的国家”访问和参观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来到中国短短几天，就已看到中国人民有着一种生活的前进力，为了祖国的建设，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和希望。”他说：“我们向中国人民带来了英国人民的祝贺、善意和友谊，也带来了和平的愿望。”他为巩固英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实现保卫和平的共同愿望而举杯祝贺。

出席今晚宴会的，有中国社会各界知名人士陶孟和、赵毅敏、阳翰笙、廖承志、许宝驹、刘贯一、朱学范、李德全、吴晗、陈翰笙、胡愈之、钱端升、邓辰西、冀朝鼎等。

宴会后，宾主们还一起欣赏了中国杂技工作者的精彩表演。】

——《科学院、对外文化协会和我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设宴招待英国访华友好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5年8月21日。

8月21日

钱端升随中国出席各国议会联盟第四十四届大会的代表团即将离开北京。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中国出席各国议会联盟第四十四届大会的代表团早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各国议会联盟的人民代表团执行委员会于本月初选出：彭真为代表团团长，程潜、廖承志为副团长，朱学范、吴文焘、吴贻芳、李一氓、李纯青、周鲠生、胡愈之、南汉宸、陈翰笙、雷洁琼、蒋南翔、钱端升、罗隆基等人为团员，李一氓为秘书长。本届联盟大会将于本月

二十五日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各国间的真正和平共处”为本届大会的主要议题。中国代表团已筹备就绪，即将出发。秘书长李一氓、代表吴文焘已于十九日由北京飞往芬兰。】

——《我国出席各国议会联盟大会代表团将出发》，载《人民日报》1955年8月22日。

钱端升前往机场欢迎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访华团。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以久原房之助为首的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访华团一行六人，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我国访问，在二十一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秘书长吴茂荪，副秘书长刘进中，以及在京的日本人士龟田东伍、金子健太、中村玩右卫门。

晚间，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设宴欢迎。出席作陪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钱端升、乔冠华，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等。】

——《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访华团到京 久原房之助在北京机场发表谈话》，载《人民日报》1955年8月22日。

8月28日

钱端升前往机场欢迎日本国会议员访苏代表团。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应苏联最高苏维埃邀请的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一行四十二人，在第一团长北村德太郎和第二团长野沟胜率领下，由前往广东深圳迎接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吴茂荪陪同，已于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先后乘飞机到达北京，并即将转往苏联访问。

当客人们到达北京机场时，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钱端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廖承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胡兰生，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秘书长伍云甫，以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委员

卢绪章曾前往欢迎。

苏联驻我国大使馆参赞顾悌克夫也到机场欢迎。到机场欢迎的还有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访华团团员马岛侃、小田忠良和在京日本人士龟田东伍、金子健太、中村玩右卫门。】

——《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在赴苏途中到达北京 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书面声明》，载《人民日报》1955年8月29日。

钱端升前往机场欢迎斯德哥尔摩市议会议员雅尔马·利奥·麦尔。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市议会议员雅尔马·利奥·麦尔及其夫人，在二十八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他们在机场上受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等和瑞典驻华大使馆人员的欢迎。】

——《斯德哥尔摩市议会议员雅尔马·利奥·麦尔和夫人到京》，载《人民日报》1955年8月31日。

8月30日

钱端升参加张奚若招待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晚宴。

【（新华社三十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在三十日晚举行宴会，招待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

张奚若会长在宴会上首先致词，向客人们表示欢迎。他说，中国人民一向主张各国之间应该和平相处和友好合作。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包括国会议员间的直接接触，是有助于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合作的。相信此次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的访问苏联和路过中国，将有助于中日和苏日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进一步的友好合作。

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第一团长北村德太郎、第二团长野沟胜接着相继讲话，日本各党派议员代表也相继发言，他们一致感谢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对他们在路过中国时的良好安排和热情招待。并表示要努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他们认为，日苏、日中关系的正常化，

不仅完全符合日本、苏联、中国三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对亚洲和世界和平都有很大帮助。

今晚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陈翰笙、胡愈之、钱端升、罗隆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廖承志，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及夏衍、伍云甫、冀朝鼎、卢绪章、曹孟君、梅汝璈、胡兰生等。

在京的日本人士龟田东伍、金子健太、中村玩右卫门也出席了宴会。】

——《南汉宸张奚若分别招待日国会议员访苏团》，载《人民日报》1955年8月31日。

8月31日

钱端升等在机场欢送日本议员访苏团。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在北京逗留了两天半以后，已在今日早晨乘飞机去苏联访问。

二十九日下午，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馆。

在这两天半内，客人们还分别访问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渔业协会的负责人，参观了京郊农村、全国少年儿童科学技术和工艺作品展览会和儿童医院，游览了颐和园、故宫等首都名胜。

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中共产党议员须藤五郎和其他党派的议员共十二人，并前往已故的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德田球一遗骨安放处献花致哀。

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在离开北京时，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钱端升、秘书长吴茂荪，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副会长胡兰生，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冀朝鼎，以及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秘书长伍云甫等都到机场欢送。

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顾梯克夫等也到机场欢送。在机场欢送的还有在京日本人士龟田东伍、金子健太和中村玩右卫门。】

——《日本议员访苏团离京去苏》，载《人民日报》1955年9月1日。

9月1日

钱端升参加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举行的欢迎以罗西夫人为首的意大利妇女代表团宴会。

【(新华社一日讯)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今晚举行宴会欢迎以罗西夫人为首的意大利妇女代表团。

全国妇联副主席李德全在宴会上致词。她首先代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对来自意大利的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她说：意大利人民在反对战争和保卫和平的事业中已经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让我借着这个欢聚的机会，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意大利人民致敬！并请你们转达中国妇女对意大利妇女姊妹般的友谊和关怀。

罗西夫人在致词中代表意大利几百万城乡劳动妇女向中国妇女致最热烈的敬礼。她说：在意大利劳动人民的心目中，中国人民是一支重大的进步力量。让中意两国妇女手携着手共同走向进步、自由、和平、幸福的生活。

著名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彼特罗·南尼的女儿、意大利国会议员朱利安娜·南尼、意大利妇女联盟书记、国会议员卢契安娜·维韦安尼和意大利妇女联盟书记布鲁娜·康蒂也在会上讲了话。

席间，宾主亲切地交谈，频频为中意两国人民和妇女的友谊干杯。

宴会结束后举行了电影晚会。

出席今晚宴会的有：全国妇联副主席章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康克清，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胡愈之、刘贯一、钱端升、阳翰笙，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主任张晓梅和首都各界妇女代表等。】

——《全国妇联设宴欢迎意大利妇女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5年9月2日。

9月12日

钱端升参加郭沫若欢迎英国访华友好代表团晚宴。

【（新华社十二日讯）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在十二日晚接见了英国访华友好代表团团长莫里斯·奥巴赫，并举行宴会欢送英国访华友好代表团。

英国访华友好代表团是在华东各地参观后于十一日返回北京，并即将离京返国。

在宴会上，郭沫若致词说：“你们把英国人民的友谊带给了中国人民，你们在新中国了解了不少情况，给我们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有几位学者还作了许多学术报告，我们对此深表感谢。”郭沫若又说，代表团这次访问中国，对中英两国友谊的加强是有贡献的。他希望代表团回国后，能把中国人民对英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带给英国人民，他并希望今后英国各界人士能继续不断地到中国来访问。他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访问和经常接触，不仅能增强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而且可以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莫里斯·奥巴赫接着致词，对主人的诚意表示感谢。他说：“我们在中国，有许多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常常在我们的眼前展现。我们不管在工厂、农村、学校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都看到你们在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作巨大的努力。”他说，代表团见到中国人民变水害为水利，特别是“变黄河这个悲哀的河流为愉快的河流”而努力的情况，都深为感动。他说，代表团即将结束在中国的访问，但是它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它还要把勤劳而勇敢的中国人民，为祖国的工业化，为美好的未来生活而努力的情况，转告给英国人民。他说：“中国曾经有过悠久而著名的文化艺术历史，现在他的人民又在创造新的历史，创造更出色、更有名的文化艺术。”他提议为创造历史奇迹的中国人民而干杯。

出席今晚宴会的有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廖承志、许德珩、许宝驹、刘贯一、董昕、李德全、钱端升、陈康白、冀朝鼎以及政法、文艺、宗教界人士等。】

——《陈毅副总理接见英国访华友好代表团 郭沫若设宴欢送英国访华友好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5年9月13日。

9月19日

钱端升参加郭沫若和沈钧儒欢宴普里特和布伦姆夫人宴会。

【(新华社十九日讯) 两位国际著名和平人士、“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获得者——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主席、英国和平委员会会长普里特和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兼书记处书记、比利时布伦姆夫人，十九日晚在北京出席了一个隆重的欢迎宴会。

这个宴会“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获得者、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和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主席沈钧儒联合举行的。

出席今晚宴会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廖承志，常务委员沈雁冰、邵力子、马寅初、许德珩、许宝驹、罗隆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主席张志让、钱端升和理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史良、许广平，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胡愈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赵毅敏，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章伯钧、蔡廷锴、李一氓、侯德榜、梅汝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龟田东伍、万徒勒里，委员艾黎。

宴会结束后，宾主一起欣赏了中国的杂技表演。】

——《郭沫若和沈钧儒欢宴普里特和布伦姆夫人》，载《人民日报》1955年9月20日。

9月29日

钱端升前往机场欢迎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的邀请，并得到周恩来总理去函欢迎前来中国访问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意大利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和他的夫人、女儿等一行五人，在二十九日下午四时三十分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副主席陈

叔通、廖承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邢西萍，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兼书记李一氓，理事蔡廷锴、胡愈之、陈翰笙、钱端升、侯德榜，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沈雁冰、马寅初、许宝驹、罗隆基，秘书长刘贯一，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负责人邵力子、梅龚彬、章伯钧、史良、周建人、许广平、李烛尘、孙起孟、黄琪翔、许德珩、严希纯、李纯青、朱学范、李德全、吴晗、南汉宸、雷洁琼等人。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龟田东伍、万徒勒里，委员路易·艾黎，现在北京的意大利妇女代表团团长罗西夫人等也到机场欢迎。】

——《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到北京》，载《人民日报》1955年9月30日。

10月2日

钱端升出席彭真招待六个国家的艺术家宴会。

【（新华社三日讯）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二日晚举行联欢晚会后，接着举行宴会，招待来中国访问演出的六个国家艺术家们。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以梅库尔·柴拉中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以吴温为首的缅甸联邦文化代表团，以松尾国三为首的日本歌舞伎剧团，以沃尔瓦中校、拉特科夫斯基上校、鲁达上校为首的波兰军队歌舞团，以斯·弗·尼基什金为首的苏联艺术家代表团，以奥·斯科夫兰为首的南斯拉夫“科罗”民间歌舞团。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缅甸大使吴拉茂、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苏联大使尤金、阿尔巴尼亚大使纳赛、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

彭真在宴会上致词，他首先向到会的六个国家的艺术家们演出卓越而丰富多彩的歌舞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我们和北京市民们有机会欣赏你们的

表演感到十分荣幸。你们的演出，对于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我们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于发展和巩固我们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将产生有益的影响。他建议：为了在座的各国艺术家们演出的成功，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为了和平和友好，干杯！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代理部长钱俊瑞、副部长郑振铎、夏衍，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文化部部长陈沂，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赵毅敏，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王昆仑、冯基平、程宏毅、贾庭三、乐松生，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副书记范儒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余心清，北京市各部门、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首都文学艺术、教育、新闻界人士。

出席宴会的共一千多人。】

——《彭真市长设宴招待六个国家的艺术家》，载《人民日报》1955年10月4日。

10月7日

钱端升出席郭沫若欢迎英国公谊代表团宴会。

【（新华社七日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在十月七日设宴欢迎英国公谊会代表团。参加宴会的有华北公理会王梓仲牧师、卫理公会牧师、燕京协和神学院教务长李荣芳博士、燕京协和神学院副教务长、中华圣公会会长赵复三、公谊会冯光杰牧师、中华基督教会殷继增牧师、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陈文润、干事郑瑞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常务委员罗隆基、许德珩、许宝驹、秘书长刘贯一、委员周炳琳，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曹孟君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张福生等。

宴会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郭沫若设宴欢迎英国公谊会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5年10

月8日。

10月9日

钱端升出席郭沫若欢送南尼宴会。

【（新华社九日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九日晚在北京举行盛大酒会，欢送即将离开北京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意大利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和他的夫人、他的女儿卢契安娜·托马西、意大利社会党执行委员潘齐埃里和意大利全国食品工会书记昂萨奈利。

酒会上，郭沫若向南尼等赠送象牙雕刻及齐白石的花卉画等礼品。

出席酒会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王昆仑也出席了酒会。

出席酒会的，还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邢西萍、邵力子、马寅初、章乃器、许宝驹、罗隆基，秘书长刘贯一，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蔡廷锴、胡愈之、李一氓、钱端升、陈翰笙、侯德榜，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梅龚彬、史良、孙起孟、许广平、黄琪翔、严希纯、许德珩、李纯青，各人民团体负责人朱学范、李德全、吴晗、张奚若、阳翰笙、雷任民，以及首都科学、教育、政法、文艺、贸易、新闻、宗教界人士和在京的日本和平人士。】

——《郭沫若举行盛大酒会欢送南尼 南尼等在北京同各界人士广泛进行交谈》，载《人民日报》1955年10月10日。

10月10日

钱端升等前往机场送别南尼。

【(新华社十日讯)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意大利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和他的夫人、他的女儿卢契安娜·托马西,意大利社会党执行委员潘齐埃里和意大利全国食品工会书记昂萨奈利在十日晨乘飞机离京返国。

到机场欢送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廖承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马寅初、许宝驹、罗隆基,秘书长刘贯一,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蔡廷锴、李一氓、钱端升、陈翰笙,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邵力子、胡愈之、许广平、孙起孟、黄琪翔、许德珩、严希纯、李纯青,各人民团体负责人朱学范、李德全、雷任民,政法界人士雷洁琼,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黄华,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王昆仑以及在京的各国和平人士。

南尼和他的夫人等在上飞机前接受了献花。他们和送行者亲切地拥抱、握手,并在机窗里向送行者频频挥手告别。】

——《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等离北京回国》,载《人民日报》1955年10月11日。

10月11日

钱端升等前往机场送别英国和平委员会会长普里特。

【(新华社十一日讯)英国和平委员会会长、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主席、“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得奖人普里特和他的夫人在十一日离京返国。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主席张志让、钱端升,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秘书长刘贯一和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沈兹九等到机场欢送。

十日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和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主席沈钧儒曾设宴欢送普里特夫妇。】

——《英国和平委员会会长普里特离北京返国》,载《人民日报》1955

年10月12日。

10月22日

钱端升出席张奚若欢迎法国议员代表团晚宴。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在二十二日晚举行宴会欢迎以丹尼埃·麦耶为首的法国议员代表团。

张奚若会长在宴会上首先致词，向客人们表示欢迎。他说：中国人民一向主张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相处和友好合作，中国人民对于爱好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人民，从来就怀着敬意和友谊。相信法国议员代表团这次来访问中国将有助于中法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最后，张奚若建议：为增进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干杯！

丹尼埃·麦耶团长首先对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和款待表示感谢。他相信通过这次代表团亲自来中国的访问，会增加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这种友谊不仅会在经济和文化上发生作用，也将会在政治上发生作用。

出席今晚宴会作陪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钱端升、乔冠华、罗隆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张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曹孟君、林巧稚等人。】

——《张奚若设宴欢迎法国议员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3日。

10月25日

钱端升等出席欢迎日本教职员工会教育考察团晚宴。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吴玉章在二十五日晚举行宴会，欢迎以团长小林武为首的日本教职员工会教育考察团全体人员。

出席今晚宴会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李颀伯、董昕，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刘子久、钱端升、方明和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刘皑风、教育部副部长柳湜，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清

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北京实验中学和小学负责人胡志涛、陶淑范，以及首都教育工作者，在京的日本人士龟田东伍、金子健太。

宴会开始，吴玉章致词，代表中国教育工会，向日本客人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这次考察团来到中国，说明中日两国教师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你们可以相信，在这次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一定会得到中国广大教师和各方面的协助和支持。

考察团团长小林武接着致词，对主人的盛情招待表示谢意。他说，日本教育工作者都认为教育应属于人民，并决心为真理，为和平而奋斗。日本教师们将决心使受教育的孩子们，都成为同中国友好的孩子，热爱世界和平的孩子。他说，考察团愿通过这次访问中国的机会向新中国学习。

席间，宾主频频为中日两国人民和教育工作者的友谊，为两国的学生和青年少年儿童们的健康，为远东和世界的和平而干杯。】

——《吴玉章欢宴日本教职员工会教育考察团》，载《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6日。

11月2日

北京政法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在院长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本报讯）北京政法学院学习苏联高等学校的先进经验，从本学期起成立了院学术委员会。新成立的学术委员会将帮助领导上进一步面向教学，成为该院教学工作及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心，并将在院长的直接领导下起集体领导作用，保证院长负责制的实现。

该院学术委员会已经制定一个全学期的工作计划，通过了本年度的教学工作计划，并确定了进一步开展该院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和有关措施。

在该院工作的苏联专家，十分重视学术委员会的工作。对学术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都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北京政法学院成立学术委员会》，载《光明日报》1955年11月2

日，第2版。

11月4日

钱端升出席彭真招待法国议员宴会。

【（新华社四日讯）北京市市长彭真四日晚宴请法国议员代表团团长丹尼埃·麦耶和团员莫里斯·富尔、让-雷蒙·弗吕希埃、雷纳·库恩。在宴会前，丹尼埃·麦耶向彭真赠送了礼品。

彭真在宴会上首先致词。他说，中法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你们这次访问中国，将会促进中法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彭真最后举杯祝法国议员代表团代表们健康。

丹尼埃·麦耶接着讲话。他说，我们回国以后，一定把我们在中国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客观地忠实地介绍给法国人民。丹尼埃·麦耶最后表示他代表巴黎市，也代表全法国，特别是一七八九年和一九四四年的法国，向北京市，向彭真表示感谢。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周鲠生、胡愈之、钱端升、乔冠华、罗隆基，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吴晗、薛子正和北京市各人民团体负责人。】

——《彭真市长设宴招待法国议员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5年11月5日。

11月9日

钱端升前往机场迎接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

【（新华社九日讯）由团长、前日本首相、“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主席片山哲，副团长、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主席藤田藤太郎率领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一行二十七人，九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访华团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中国参观访问的。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

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齐燕铭都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钱端升、乔冠华、罗隆基，秘书长吴茂荪，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宁一、朱学范，书记处书记李颀伯、董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鲍尔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秘书长刘贯一，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章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李烛尘，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赵毅敏、阳翰笙，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首都各界人士赵朴初、王梓仲、谢南光、廖梦醒、郑森禹、冯乃超、马纯古、谢冰心、方明、倪斐君、赵安博等人，以及在京的日本人士龟田东伍、金子健太。

日本客人们下机后同欢迎者亲切地握手，并且接受了献花。

在机场上，张奚若致词，对日本客人来到中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各位这次来我国访问，带来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珍贵的友情。对于这种友情，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且相信通过各位同我国各方面人士的广泛接触，一定会使我们之间的友谊更加亲密，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更加增进。

团长片山哲接着致词，对访华团能受邀请到中国访问并且受到热烈欢迎表示谢意。】

——《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到北京 团长片山哲在北京飞机场发表谈话》，载《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0日。

11月10日

钱端升出席张奚若欢迎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宴会。

【（新华社十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在十日晚举行宴会，欢迎以片山哲为首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全体人员。

在宴会前举行的酒会上，张奚若介绍出席今晚宴会的中国各方面人士同日本客人见面。

出席宴会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鲍尔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吴玉章、李烛尘、马寅初、蔡廷锴，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齐燕铭，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陈翰笙、胡愈之、钱端升、乔冠华、罗隆基，秘书长吴茂荪和部分理事都出席作陪。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宁一、朱学范，书记处书记董昕，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秘书长刘贯一，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副主席雷任民、冀朝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赵毅敏，以及首都科学、教育、文艺、政法、新闻、宗教界人士。

在京的日本人士龟田东伍、金子健太也出席了宴会。

宴会开始，张奚若首先致词，对访华团全体人员表示欢迎。他说：“我们中日两国是近邻，我们两国之间有着悠久的文化和经济的联系，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今后应该日益发展。我想这是符合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的。我们相信，这次以片山哲先生为首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前来访问我国，一定能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加深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并为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和维护亚洲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片山哲接着致词。他对主人的隆重招待和热烈欢迎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实现恢复中国和日本邦交的问题。”他说，在日本正展开一个反对日本重新武装和禁止使用原子弹的国民运动，并力使通过此一运动实现中日邦交的恢复。片山哲并表示，希望通过这次访华团来中国的访问，能进一步具体地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他说：“中日两国间不要等待邦交的恢复，就应马上开始文化和经济的交流。”他希望中日两国共同为世界和平，特别是亚洲的和平和人类的幸福而努力。

宴会后，放映了访华团带来的影片。】

——《我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设宴欢迎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

会”访华团》，载《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1日。

11月13日

钱端升出席彭真招待日本访华团体酒会。

【（新华社十三日讯）北京市市长彭真十三日晚举行盛大酒会，招待以片山哲和藤田藤太郎为首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和以小林武为首的日本教职员工会教育考察团全体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出席了酒会。出席酒会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鲍尔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各部部长谢觉哉、史良、章乃器、沙千里、廖鲁言、梁希，文化部代理部长钱俊瑞，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章汉夫，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刘皑风，教育部副部长柳湜和其他各部分副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王维舟、李烛尘、邢西萍、竺可桢、邵力子、马寅初、张苏、许德珩、黄绍竑、熊克武、蔡廷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李纯青、陈其尤、陈铭枢、卢汉，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王昆仑、薛子正、冯基平、程宏毅、贾庭三、乐松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主席刘仁，副主席蒋光鼐、余心清。

出席酒会的，还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周鲠生、陈翰笙、胡愈之、钱端升、乔冠华、罗隆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宁一、朱学范，书记处书记张维桢、栗再温、董昕、张修竹，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吴玉章，副主席刘子久、方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章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副主席雷任民、冀朝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赵毅敏，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主席张志让，以及首都各界人士蒋南翔、胡锡奎、艾思奇、陈垣、郑振铎、夏衍、老舍、谢冰心、欧阳予倩、蔡楚生、赵朴初、李君武、赵紫宸、达浦

生、吴冷西、梅益、王芸生、范瑾、陈用文、梅汝璈、伍云甫、廖梦醒、翁文灏、卫立煌等。

在京的日本人士龟田东伍、金子健太、前田荣之助、佐佐木良作也出席了酒会。

出席今晚酒会的共四百多人。】

——《彭真市长举行酒会招待日本访华两团体》，载《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4日。

钱端升出席彭真送别德国乐团宴会。

【（新华社十三日讯）北京市市长彭真十三日晚举行宴会，欢送即将离开北京回国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吹奏乐团团长保尔·库茨巴赫和全体团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人员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彭真在宴会上致词，他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吹奏乐团在中国所作的精彩演出和耐心地帮助中国音乐干部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示感谢。他说，你们的演出，进一步增进了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

保尔·库茨巴赫在讲话中说，我们在中国到过的七个城市中，受到了中国人民都像老朋友一样的接待，对此，我表示感谢。我们在临别时得到丰富的礼品，其中最宝贵的礼品就是中国人民对于德国人民的友谊。我们深深知道，在我们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中，有着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这样强大的朋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埃弗哈而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代理部长钱俊瑞也讲了话。

出席宴会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代理部长钱俊瑞、副部长郑振铎、夏衍，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李兆炳，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第二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主席刘仁，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副书记郑天翔、范儒生，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王昆仑、薛子正、程宏毅、贾庭三、乐松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余心清，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副主

席王炯，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林巧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第二书记王照华，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老舍和首都政法、文学、艺术、新闻界人士。】

——《彭真市长设宴欢送民主德国吹奏乐团》，载《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4日。

11月15日

周总理接见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钱端升陪同。

【（新华社十五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十五日下午接见了以片山哲和藤田藤太郎为首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全体人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陈翰笙、钱端升、乔冠华、罗隆基，理事陈家康、冯乃超、赵安博，秘书长吴茂荪，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宁一、书记处书记李颀伯、国际联络部部长马纯古，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副主席廖承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副主席雷任民、李烛尘，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赵毅敏、阳翰笙。

接见后，访华团还向周恩来总理赠礼。】

——《周总理接见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 访华团连日在北京进行各种访问活动》，载《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6日。

11月16日

钱端升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和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秘书长就促进中日两国恢复邦交问题发表联合公报签字仪式。

【（新华社十六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吴茂荪和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秘书长大野幸一在十六日发表联合公报，全文如下：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以日本拥

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主席片山哲先生为团长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全体团员。周恩来总理和片山哲团长在融洽友好的空气中就促进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的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根据下述基本精神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周恩来总理和片山哲团长一致认为，国家和国家之间应该和平相处，并且应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彼此间的争端和悬案，而不应该诉诸武力。坚持和平政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尊重日本人民宣布永久放弃战争手段的和平愿望。中日两国人民愿意保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以有利于保障远东的和平和安全。

在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史中，中日两国在长时期内，曾经是和平相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由于相同的遭遇使中日两国人民在感情上发生了并且正在经历着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深切地理解日本人民的处境。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在新的环境和基础上建立长远的友好睦邻关系，并且首先应该为促进中日两国邦交的恢复而共同努力。

中日两国间的一切问题应该而且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解决，绝不应该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日本人民为和平而进行的反对重整军备的运动和拥护和平宪法的运动，对促进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是非常有利的。

特此发表如上。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 吴茂荪

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秘书长 大野幸一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新华社十六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吴茂荪和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秘书长大野幸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团长、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主席片山哲交换意见的结果，在十六日发表联合公报。联合公报签字仪式在十六日下午十时半于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举行。

吴茂荪和大野幸一各自在中文本和日文本上签了名，并交换了文本。

参加签字仪式的中国方面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陈翰笙、胡愈之、钱端升、乔冠华，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宁一，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副主席雷任民、李烛尘，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赵毅敏、阳翰笙，理事夏衍，秘书长陈忠经，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赵安博，副秘书长刘进中。

参加签字仪式的日本方面有：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团长、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主席片山哲，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团员远藤三郎、中村哲、高桑纯夫、石原宪治、猪俣浩三、中崎敏、石垣绫子、伊藤圀夫、吉井千贺子、小仓康男，秘书村冈久平，记者小川信一。】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和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秘书长就促进中日两国恢复邦交问题发表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7日。

11月17日

钱端升陪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访问东北。

【据新华社讯：以片山哲为首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陪同，在十七日晚乘火车离开北京去东北参观访问。访华团团员高桑纯夫在同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经广州返国。】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邀请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座谈》，载《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9日。

11月26日

钱端升参加全国政协邀请片山哲讲演。

【据新华社二十六日讯：二十六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邀请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团长沙山哲发表讲演。

首都各界一千五百多人出席听了片山哲的讲演。

上午十时十分，片山哲和访华团团员远藤三郎、中村哲、石原宪治、中崎敏、吉井千贺子、大野幸一、小仓康男、村冈久平、小川信一，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负责人郭沫若、沈钧儒、邢西萍、张奚若、罗隆基、刘宁一、廖承志、钱端升、吴茂荪等陪同，在主席台上就座，受到全场热烈鼓掌欢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郭沫若在会上首先致词，向以片山哲为首的访华团表示衷心的热烈的欢迎。他说：我们相信通过访华团的友好访问，将进一步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

郭沫若谈到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和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秘书长发表了的联合公报时说：这个联合公报对于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和保障远东和平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同时，我们欢迎访华团的各位先生为了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所作的努力。

郭沫若又说：在日本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为了和平、民主所进行的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我们相信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的事业将获得进一步的成就和发展。

片山哲在会上以“日本宪法与和平主义”为题作了报告（全文见第三版）。

出席讲演会的，有在京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北京市组织、北京市各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中央和北京市各机关工作人员。】

——《政协全国委员会邀请片山哲团长讲演》，载《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7日。

【作为对外友协成员，我曾多次接待来访的外国客人，较重要的一次是为争取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而于1955年11月接待前首相片山哲率领的全日本保护宪法联盟代表团。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彭真等领导人出席了由我主持的宴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参加了双方签署的联合公报仪式。】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9页。

11月27日

钱端升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日本工会代表团就有关工人运动各项问题协议签字仪式。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中华全国总工会和访问中国的日本工会代表团今日就有关工人运动的各项问题达成的协议举行了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在下午九时半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举行。

中国方面在协议上签字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宁一，书记处书记李颀伯。

日本方面在协议上签字的，有日本工会代表团团长藤田藤太郎、秘书长浅井正弘、团员今井三男。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刘子久、董昕、张修竹，执行委员会委员陈宇，国际联络部部长马纯古，中国教育工会主席吴玉章、第一机械工会主席康永和、农业水利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何英才、煤矿工会主席金直夫、重工业工会主席赵国强、邮电工会主席李景韩、公路运输工会主席安力夫、建筑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张天民、石油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张兆美、海员工会副主席张子夫、电业工会副主席黄民伟、第二机械工会副主席贺瑞林、林业工会副主席刘健农、纺织工会副主席邵井蛙、盐业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郑仁、轻工业工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夏菲、铁路工会秘书长范辉、店员工会办公室主任赵正之，工人日报社社长陈用文，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陈翰笙、钱端升、罗隆基，中国人民对外

文化协会副会长赵毅敏、阳翰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吴茂荪，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秘书长陈忠经。

日本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日本工会代表团团员桥田正武、洼田钧一、五十岚三郎、田村民藏、谷沿嘉瑞、丸山久雄、稻村明喜、横手真夫、松井繁松、樱井政由。】

——《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日本工会代表团就有关工人运动各项问题达成协议》，载《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8日。

钱端升出席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就有关文化交流各项问题协议签字仪式。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今日就有关文化交流各项问题达成的协议举行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在二十七日下午十时半于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举行。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方面在协议上签字的，有赵毅敏、阳翰笙、老舍、欧阳予倩、马思聪、刘开渠、蔡楚生、戴爱莲、陈忠经。

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方面在协议上签字的，有藤田藤太郎、中村哲、千田是也、稻村明喜、中崎敏、石原宪治、猪俣浩三、浅井正弘、大野幸一。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夏衍、吴化之、吴茂荪、华君武，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胡愈之、陈翰笙、钱端升、罗隆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宁一，书记处书记李颀伯、董昕，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中国文艺界著名人士陈白尘、于非暗、孟波、孙维世、黄玉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赵安博、刘进中，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陈宇，国际联络部部长马纯古。

日本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主席、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团团长片山哲；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

华团团员石垣绫子、吉井千贺子、今井三男、桥田正武、洼田钧一、五十岚三郎、田村民藏、谷沿嘉瑞、丸山久雄、横手真夫、松井繁松、樱井政由、小仓康男。秘书村冈久平、记者小川信一。】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就有关文化交流各项问题达成协议》，载《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8日。

11月28日

钱端升出席毛主席接见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仪式，并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欢送访华团晚宴。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半到七时接见了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团长片山哲，副团长藤田藤太郎，秘书长大野幸一，团员远藤三郎、猪俣浩三、中崎敏、石垣绫子、伊藤圀夫（千田是也）、中村哲、浅井正弘、今井三男、石原宪治、吉井千贺子、稻村明喜、横手真夫、洼田钧一、桥田正武、田村民藏、丸山久雄、谷沿嘉瑞、松井繁松、樱井政由、五十岚三郎、小仓康男，秘书村冈久平，记者小川信一。

接见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也在座。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董必武、彭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钱端升，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宁一，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赵毅敏、阳翰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二十八日晚举行盛大宴会，欢送以片山哲和藤田藤太郎为首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

宴会开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董必武首先致词。他谈到了日本朋友这次和中国有关方面发表的联合公报和协议。他说，这些

都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并且为了建立今后中日两国长远的友好睦邻关系作了良好的开端。

董必武说，中日两国之间的和平相处，两国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开展，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早日恢复，将不仅符合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将有利于东方和世界的和平。

董必武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力量，为了和日本建立长远的友好睦邻的关系而努力。

片山哲接着致词。他对访华团在中国受到的热烈欢迎和对主人今晚的盛情招待表示感谢。他说，我们在中国看到了无数的建设，看到了燃烧着希望的中国人民在建设，心中实在感动。

片山哲说，访华团在本月十五日承周恩来总理接见，今天又承毛泽东主席接见，毛主席的“爱好和平的谈话，深深打动了我们的心”。片山哲说，这次发表的联合公报和在文化交流方面、工会方面达成的协议，将是访华团带回日本很好的礼物；而各位对我们温暖的友情，中国人民为了远东和世界和平而对我们的友好和善意的接待，是更大更好的礼物。他表示，访华团回国以后，一定根据这次联合公报和其他协议，为恢复两国的邦交，为加深两国间的友好亲善关系而不断努力。

出席今晚宴会的，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秘书长邢西萍，常务委员朱蕴山、吴晗、吴溉之、孙起孟、许德珩、陈其尤、傅作义、邓初民、罗隆基，副秘书长梅龚彬、申伯纯、辛志超、郭则沉、刘孟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胡愈之、钱端升、乔冠华，秘书长吴茂荪，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宁一，书记处书记李颀伯、董昕，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秘书长刘贯一，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赵毅敏、阳翰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副主席雷任民，首都各界人士张志让、周培源、金岳霖、谢南光、梅汝璈、赵朴初、王梓仲、李伯钊、孙维世、吴雪、范瑾、卫立煌等。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齐燕铭，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也出席了今晚宴会。

应邀出席的还有在京的日本人士龟田东伍和金子健太。】

——《毛主席接见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 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盛大宴会欢送访华团》，载《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9日。

1955年

钱端升在北京政法学院《教学简报》第5期发表文章，《更加努力地工作和学习，争取新的胜利》。

1956年(56岁)

2月2日

钱端升以对外和平友好团体身份，进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名单。

【对外和平友好团体

王稼祥、刘泽荣、吴茂荪、周炳琳、范长江、涂允檀、凌其翰、彭真、楚图南、郑振铎、冀朝鼎、钱俊瑞、钱端升、阎宝航、宋庆龄（女、请假）、陈翰笙（请假）】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委员名单》，载《人民日报》1956年2月2日。

2月21日

钱端升入选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常委。

【据新华社讯：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届中央委员会21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出沈钧儒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章伯钧、罗隆基、马叙伦、史良（女）、高崇民为副主席；丘哲、叶笃义、刘清扬（女）、吴晗、李文宜（女）、李相符、沈志远、辛志超、周新民、周鲸文、陈望道、胡愈之、徐寿

轩、马哲民、许杰、许广平（女）、郭则沉、郭翹然、彭泽民、曾昭抡、华罗庚、费孝通、闵刚侯、黄炎培、黄药眠、杨明轩、楚图南、潘大逵、潘光旦、邓初民、钱端升、萨空了、韩兆鹗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选出主席、副主席和常委》，载《人民日报》1956年2月23日。

2月22日

钱端升入选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中央委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千家驹、寸树声、双清、王越、王国松、王深林、王统照、王德滋、王毅斋、丘哲、史良（女）、叶笃义、田一平、申葆文、刘开渠、刘承钊、刘思慕、刘清扬（女）、刘王立明（女）、关梦觉、朱裕璧、何公敢、吴晗、吴作人、吴执中、吴景超、吴鸿宾、宋云彬、成柏仁、李士豪、李子健、李文宜（女）、李方训、李伯刚、李伯球、李相符、李敷仁、李馥清（女）、杜光预、汪世铭、沈志远、沈兹九（女）、沈钧儒、沙千里、沙彦楷、苏步青、车向忱、辛志超、周建人、周新民、周鲸文、孟秋江、孟宪荃、季方、岳劭恒、林兆侗、林植夫、罗子为、罗忠信、罗涵先、罗隆基、邵均、金岳霖、金锡如、陈仁炳、陈先舟、陈此生、陈敏之、陈望道、陈新民、陈荫南、姜震中、柳亚子、胡一声、胡愈之、范乐成、范朴斋、徐伯昕、徐寿轩、马哲民、马叙伦、高一涵、高尚荫、高崇民、张文、张大煜、张云川、张江树、张志和、张国藩、张曼筠（女）、张毕来、梁思成、章伯钧、莫乃群、许杰、许广平（女）、许德瑗、郭则沉、郭翹然、陆士嘉（女）、喻传鉴、喻德渊、彭文应、彭迪先、彭泽民、曾昭抡、曾庶凡、童第周、华罗庚、费孝通、费振东、闵刚侯、冯友兰、冯素陶、黄艮庸、黄炎培、黄琪翔、黄药眠、杨一波、杨子恒、杨子廉、杨希尧、杨明轩、杨荣国、楚图南、廖世承、闻家驷、潘大逵、潘光旦、潘慎明、邓初民、钱伟长、钱端升、萨空了、韩兆鹗、鲜英、储一石、戴爱莲（女）、聂国青、萧敏颂、萧

华清、魏曦、顾光中

候补中央委员：

丁是娥(女)、王文光、丘克辉、任谦、刘儒、刘明水(女)、刘良模、吴春选、李康、李化方、李则纲、李健生(女)、杜棻、杜任之、杜孟模、杜迈之、齐坚如、林仲易、邵宗汉、陈仰之、陈秋安、陈新桂、陈鼎文、胡良智(女)、徐雪尘、浦熙修(女)、高天、张纪域、张琴南、张广标、张锋伯、梁若尘、章振干、陶大镛、陆钦墀、曾伯雄、舒军、黄执中、贾国藩、赵善欢、郑文华】

——《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载《人民日报》1956年2月22日。

3月5日~8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举行第二次年会，被选为副会长。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在3月5日到8日举行的第二次年会上，选举董必武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第二届会长、沈钧儒、谢觉哉、鲍尔汉、吴德峰、张志让和钱端升为副会长；史良、许德珩、周鲠生等115人为理事。

年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学会理事朱其文作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学会今后工作应该进一步团结和推动全国政治法律工作者向法律科学进军；进一步配合和支持法律为和平服务的国际活动，开展我国同世界各国法学界的学术交流。年会上还通过了新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

——《政治法律学会举行第二次年会》，载《人民日报》1956年3月14日。

3月14日

钱端升等到波兰驻华大使馆吊唁贝鲁特。

【据新华社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的负责人，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北京市党政负责人和各界人民，14日到波兰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吊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兰人民共和国全国阵线全波委员会主席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同志的逝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委员前往波兰驻中国大使馆吊唁的有：宋庆龄、郭沫若、王维舟、吴玉章、李书城、李雪峰、邵力子、胡愈之、马明方、马寅初、张难先、张苏、许广平、陈劭先、黄绍竑、杨明轩、刘格平、刘澜涛、邓颖超、邓初民、陈其瓖。

国务院副总理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前往波兰驻中国大使馆吊唁的有：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习仲勋、罗瑞卿、贾拓夫、王首道、谢觉哉、史良、薄一波、曾山、杨一辰、王鹤寿、黄敬、张霖之、陈郁、刘澜波、李聚奎、刘秀峰、蒋光鼐、沙千里、滕代远、朱学范、廖鲁言、傅作义、马文瑞、沈雁冰、杨秀峰、张奚若、章汉夫、姬鹏飞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高克林等也前往吊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前往波兰驻中国大使馆吊唁的有：叶剑英元帅、聂荣臻元帅、黄克诚大将、谭政大将、陈赓大将、许光达大将、张宗逊上将、李克农上将、宋任穷上将、王宏坤海军上将、傅秋涛上将、萧向荣中将、万毅中将、向仲华中将、张令彬中将、成钧中将、王宗槐中将、苏静中将、谢有法中将、吴法宪空军中将、王辉球空军中将、王尚荣中将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负责人先后到波兰驻中国大使馆吊唁的有：副主席李维汉、李四光、陈叔通、章伯钧和秘书长邢西萍。

中国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前往波兰驻中国大使馆吊唁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程潜、蔡廷锴、熊克武，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副主席罗隆基、高崇民，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周建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秘书长黄琪翔，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副主席梁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

席谢雪红、副主席李纯青，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罗毅、章泽。

中国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到波兰驻中国大使馆吊唁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吴晗，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钱俊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胡兰生，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阳翰笙，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侯德榜，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竺可桢，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张启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以及其他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代表。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第二书记刘仁，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王昆仑、贾庭三和各民主党派北京组织、北京市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也到波兰驻中国大使馆吊唁。

今天前往波兰驻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北京市工人、机关干部、学生，有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宗教、新闻界等方面的人士。】

——《首都各界人士和各国驻华使节到波大使馆吊唁贝鲁特逝世》，载《人民日报》1956年3月15日。

3月29日

钱端升等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代表启程。

【1956年春天，我和刘宁一、程潜、傅作义等人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代表大会特别会议。】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9页。

【（新华社29日讯）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北京。

随机同行的有越南代表团黎廷探、阮春水等五人和日本代表龟田东伍。

这次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定四月五日到九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讨论当前全世界人民所关切的裁军和禁止核子武器以及各项有关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

中国代表团名单如下：

团长：陈叔通

副团长：刘宁一

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李一氓、陈翰笙、邵力子、罗隆基、吴耀宗、侯德榜、钱端升

特邀代表：程潜、傅作义、伊明·马合苏木、荣毅仁、施如璋（女）、唐明照、朱子奇

秘书长：刘宁一（兼）

前往机场欢送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副主席廖承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张苏，国防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等。】

——《我国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的代表团启程》，载《人民日报》1956年3月30日。

4月24日

钱端升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并发言。

【（新华社24日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今天通过一项决议（见第四版），积极响应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所提出的为争取早日实现普遍裁军和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以及为加强国际和平力量而斗争的号召，并且表示中国人民愿意同各国人民合作，共同为达到上述目的而努力。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这个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曾经率领中国代表团出

席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还表示希望亚非各国人士能为加强彼此间的友好往来和合作以及巩固亚非地区的和平，举行一次聚会。

陈叔通在会上报告了这次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的情况和它所取得的成就。他说，这次特别会议所通过的文件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意志。这些决议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各国人民谋求持久和平和国际合作的事业。因此，这次会议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陈叔通说，尽管这次到会的各国代表中，有许多人的观点和意见很不相同，但经过五天的大会和四个小组委员会会议的自由和热烈的讨论后，终于取得共同的认识，使会议顺利通过了七项有关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及扩大和平运动的决议和建议。这是和平运动的一个胜利。

陈叔通特别介绍了世界和平运动的范围日益扩大的情况。他说，“可以说这次到会的代表的成分比任何一次理事会会议都更为广泛”。

陈叔通还介绍了中国代表团在特别会议期间的活动情况。

陈叔通特别指出，中国人民是珍爱和平并积极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我们一向主张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一向赞成裁军、禁止原子武器以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因此，我们中国人民热烈支持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的号召和决议，并愿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为促使这次会议的各项决议的彻底实现而努力。

在今天的会上，中国代表团团员程潜、钱端升也就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的情况和成就发了言。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主持了今天的扩大会议。他对中国代表团这次胜利完成中国人民所付托的任务表示慰问。

中国各界著名人士廖承志、达浦生、张奚若、李烛尘都在会上发了言，积极支持和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的各项决议和号召，并表示愿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关于响应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的号

召的决议。】

——《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决议 响应争取裁军和禁止原子武器以及加强和平力量的号召》，载《人民日报》1956年4月25日。

5月25日

钱端升参与筹组中巴友好协会并当选副会长。

【（新华社27日讯）中国十二个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为了促进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二十五日在北京发起筹组“中巴友好协会”。

这十二个发起的团体是：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

各发起团体的代表在二十五日下午举行了筹备会议。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主持会议。他在会上指出，中巴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和文化关系在最近几年来，特别是亚非会议之后，不断得到发展。中巴友好协会的成立，将有助于中巴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联系的进一步发展。

筹备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巴友好协会的章程，并且选出了刘格平为中巴友好协会会长，伊敏诺夫、钱端升为副会长。会议选出的理事三十二人是：王传斌、方石珊、文士楨、刘格平、刘清扬、朱世纶、伊敏诺夫、李文涛、李梦华、吴鸿业、沙汀、郑伯奇、拉希达、陈明、陈经畲、侯德榜、官乃泉、罗静宜、欧阳山、马加、马纯古、马腾骧、袁勃、康巴尔汗、章靳以、黄甘英、张杰、张茜、张明养、杨静仁、钱端升、钟惠澜。

筹备会议以后，中巴友好协会随即由副会长钱端升主持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议，推选出理事罗静宜为协会总干事，并且商讨了今后的会务工作。

中巴友好协会将定期举行成立大会。】

——《十二个全国性团体筹组中巴友好协会》，载《人民日报》1956年5月28日。

5月27日

北京政法学院举行第一次科学讨论会，钱端升到会并发言。

【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在该院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说：“党和政府要求科学研究，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在法学方面，这就要求我们在十二年内接近世界最先进的法学——苏联法学——的水平。我们有责任和全国法学家一同担负起并且完成这个任务。”

这次科学讨论会是5月27日举行的。在科学讨论会上讨论的科学论文共有九篇，这九篇科学论文都是论文的 authors 辛勤劳动的成果。在分组会上讨论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的论文作者张子培，过去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但是在他自己艰苦努力，并且经过两次较大的修改后终于写出了这篇科学论文。在全会上讨论的该院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研室吴恩裕写的《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科学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兴趣。参加讨论会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政法干校等院校以及有关单位的代表四百余人，在会上参加讨论的有四十多位法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工作者。他们奔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北京政法学院讨论了九篇科学论文》，载《光明日报》1956年6月8日，第2版。

5月29日

钱端升参加彭真招待雅加达市长苏迪罗晚宴。

【（新华社29日讯）北京市市长彭真今晚举行宴会，欢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特别市市长苏迪罗和他的夫人、副市长达努布罗托以及随行人员。

下午八时，彭真市长和他的夫人、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王昆仑、薛子

正、冯基平、贾庭三、乐松生等热烈地欢迎客人。在宴会前举行的酒会上，彭真介绍主人们和客人见面。其中有外交部副部长袁仲贤，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副会长胡愈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曹孟君，中共北京市委员会第二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主席刘仁，中国人民解放军京津卫戍司令员杨成武上将，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各部门、北京市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首都文艺、教育、新闻、宗教界人士。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萨尼和正在中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劳动代表团人员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彭真在宴会上致词说，我们两国同样都有悠久的历史，我们都曾经受过殖民主义者的压迫，我们曾经一道和共同的敌人作过战，我们都经过长期斗争获得了独立和解放，现在我们两国都在进行着各方面的建设，我们两国利益的一致，没有利害的矛盾，这一点在万隆会议中完全表现出来了，也在我们两国总理、两国政府代表和人民的访问中表现出来了。我确信，苏迪罗市长和夫人以及他的同事们的这次访问，一定能进一步增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苏迪罗在宴会上讲话说：我在报刊上看到了很多关于中国建设的消息，但是正如你们国家成语中所说的“百闻不如一见”。我们在贵国已经看到了一小部分情况，虽然我不是这个国家出身的，但是也感到自豪，因为我是亚洲人。苏迪罗说，作为一个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雅加达市长，我很希望学习你们如何解决城市市政建设中的房屋、就业、交通和娱乐等一些基本问题。苏迪罗希望在亚非会议中已经锻炼出来的亚非精神，不仅保障亚非地区的独立，而且能增强世界的和平。在酒会和宴会举行前，彭真接见了苏迪罗和副市长达努布罗托以及其他随行人员，苏迪罗向彭真赠送了礼品。】

——《雅加达市长苏迪罗等到北京 彭真市长举行宴会欢迎贵宾》，载《人民日报》1956年5月30日。

5月30日

钱端升出席周总理接见两个国家的伊斯兰教代表会议。

【(新华社30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下午接见了以西·阿巴斯和阿里·阿克巴尔为首的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代表团, 以大毛拉·埃特沙穆尔·哈克和赛义德·侯赛尼·依玛木为首的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代表团。

接见的时候, 在座的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努尔·穆罕默德·达浦生、秘书长穆罕默德·阿里·张玉珍, 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哈志·阿不都来里木·马松亭、秘书长阿里·甘春雷,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哲玛伦丁·李恕,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尤苏夫·霍流, 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副会长胡愈之, 中巴友好协会副会长钱端升。

接见的时候,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 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章文晋也在座。】

——《周总理接见两个国家的伊斯兰教代表并接见了叙利亚议会议员鲁斯托姆》, 载《人民日报》1956年5月31日。

6月8日

钱端升出席并主持中巴友好协会成立仪式。

【据新华社8日讯: 中国巴基斯坦友好协会今天在北京成立。协会会长刘格平在成立大会上指出, 这“是在新的基础上加深中巴两国人民间友谊的表现”。刘格平还表示: “我们热诚地期待着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阁下能早日来我国访问。”他说, 两国间的友好往来将大大促进中巴两国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 并且进一步发扬万隆会议的精神。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哈默德在会上说: “中国人民衷心诚意要求和平, 你们以这样的真诚和热心创立了这个协会, 也就是给世界上一个重要地区的和平奠定了基础。”

应邀来访问的巴基斯坦新闻工作者访华代表团出席了今天的成立大会。出席成立大会的，还有中巴友好协会负责人和理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等全国性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各部的负责人，中国伊斯兰教人士、访问过巴基斯坦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飏也出席了大会。

大会在中巴友好协会副会长钱端升宣布协会成立后开始。刘格平接着在会上讲话。

刘格平说，中巴友好协会是以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为宗旨。这个宗旨继承了两国悠久的历史友好关系的传统，并且符合今天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要求。

他说，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友好的邻邦，两国人民间历来就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两国人民又都有反对殖民主义、摆脱经济落后、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自己祖国的共同愿望。这些不仅构成了彼此友好相处的基础，而且提供了发展经济、文化联系及相互学习的广泛的可能性。

刘格平接着叙述了几年以来中巴两国间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发展，两国人民间友谊的日益增进等事实。他说，中巴友好协会就是在中巴两国友好关系的这种新的发展中诞生的，它将在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巴基斯坦人民的关怀与合作下，满怀信心地为达成它的宗旨而努力前进。

接着，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哈默德在会上讲话。他说，今天这个友好协会成立，有力地体现着巴基斯坦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和亲善正在增长。它意味着从今天起，我们两国人民要比过去有着更好的机会，从群众的立场来了解彼此的文化、文明、艺术、文学、各自的问题和困难。

阿哈默德说，记得在万隆会议上，巴基斯坦和中国代表们跟其他国家一致同意并决定采取更多的步骤以促进亚非各国人民间的文化联系。他说，我们都是望着共同的目标前进，这就是和平和进步的目标。只要是在这个共同目标的鼓舞和指导下，其他思想上的不同就不能在我们两国人民密切合作的道路上造成障碍。

阿哈默德接着追述了巴中两国悠久的和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的事实，并祝贺中巴友好协会的成立。

会后举行了茶会。与会者还参观了中巴友好图片展览。还放映了纪录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巴基斯坦等事迹的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纪录影片。】

——《中巴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9日。

6月14日

钱端升出席刘少奇接见五位巴西众议员。

【（新华社14日讯）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的邀请，前来中国访问的巴西众议院议员热罗尼莫·迪克祖伊特·罗扎多·马伊亚、利库尔戈·勒伊特·菲尔荷、埃斯塔西奥·贡卡尔维斯·索乌托·马约尔和他的夫人、拉希德·萨尔顿哈·德尔集、热图利奥·巴尔博扎·德毛拉一行六人，在十四日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常务委员胡愈之、许广平，代表荣毅仁、李维光、胡文耀、罗叔章，副秘书长吴克坚、屈武，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丁西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

——《刘少奇委员长接见五位巴西众议员》，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15日。

6月21日

钱端升前往机场欢迎芬兰议会访华代表团。

【（新华社21日讯）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刘少奇委员长的邀请，芬兰议会访华代表团一行十三人在芬兰议会议长维埃诺·约翰奈斯·苏克舍拉宁的率领下，在二十一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在下午两点二十分降落在悬挂着芬兰和中国国旗的机

场上。刘少奇委员长同副委员长郭沫若、彭真、陈叔通在飞机前面欢迎他们。维埃诺·约翰奈斯·苏克舍拉宁团长和代表团全体人员接受了献花，并且被介绍和欢迎者见面。

今天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格平，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端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马明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和典礼局局长，政府有关各部部长、副部长，各人民团体负责人，曾经访问芬兰的人士和北京市副市长，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等人。】

——《芬兰议会访华代表团到达北京 刘少奇委员长接见代表团全体人员》，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22日。

6月26日

钱端升出席中巴友好协会招待巴基斯坦新闻工作者访华代表团宴会。

【（新华社26日讯）中巴友好协会会长刘格平今晚举行宴会，招待以费兹·艾哈迈德·费兹为首的巴基斯坦新闻工作者访华代表团。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和使馆人员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刘格平在宴会上致词，欢迎巴基斯坦新闻工作者访华代表团，并且对代表团即将离开中国表示惜别。刘格平说，代表团的访问中国，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中巴两国的友好关系，他相信代表团回国后将会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给巴基斯坦人民。

费兹团长表示对代表团有机会参加中巴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和今晚的宴会感到荣幸。他说，中巴两国的接触和了解正在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增进将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从而有助于巩固世界和平。费兹最后祝中巴友好协会在促进中巴两国友好和文化交流的工作中获得成功。

出席今晚宴会的，有中巴友好协会副会长伊敏诺夫、钱端升和理事，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的负

责人。】

——《中巴友协会长设宴招待巴基斯坦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27日。

7月5日

钱端升参加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讨论百家争鸣的座谈会，并做了发言。

【编者按：7月5日下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召集盟员中的全国人民代表、各地文教界的著名人士四十多人，座谈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座谈会本来是分两个组进行，因为争论的问题太多，其中一个小组，又自动地形成了好几个小组在辩论。到晚七点钟，在晚餐的餐桌上，许多人还兴趣盎然地争论着。

我们这里所记载的，只是一部分意见。

许多人不同意“鸣得好、争得好”和“譬如是一个交响乐队”的意见

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6月1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提出“百家争鸣”要“鸣得好、争得好”。在7月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演奏出雄壮的交响曲”的文章，提出“百家争鸣”譬如是一个交响乐队“万种乐器齐奏或叠奏，但总要按照着一定的乐谱”。

对于这两点意见，许多人很直率地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或反对的意见。

上海新闻日报总编辑刘思慕说：“争要争得好，鸣要鸣得好。这种提法，会使人意识为：‘争得不好就不能争’，‘鸣得不好就不能鸣’。交响乐队的譬喻也不恰当，交响乐队百乐齐鸣，听起来是和谐的。学术上的争鸣，总有相反的意见，调子不一定会和谐。郭院长的意见，有消极限制的一面，我是不敢苟同的。”

四川大学校长彭迪先谈了自己的一些意见之后，最后他说：“对‘百家争鸣’有如‘交响乐’的譬喻，是很不好理解的。我体会，交响乐是要和谐的。要是要求‘争鸣’中‘和谐’，实在是办不到的事。”

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说：“我很反对郭沫若院长的说法。他认为

‘百家争鸣’不要乱鸣。事实上‘百家争鸣’开始的时候，不可能没有一些乱的。同时，也不能说：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说。要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任何人都需要一辈子不断学的。我认为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如何创造条件，保证大家‘鸣’，不能提出任何限制。”

历史学家宋云彬说：“看了郭沫若的主张，就使得许多人不敢争，不敢鸣。”

经济学家沈志远反对把“百家争鸣”这个口号拆开来咬文嚼字地谈论。他说：“应该从百家争鸣的这个方针的主要精神去理解它，不应该事先限定一个框子。”

有人同意郭沫若的意见。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说：“鸣得好、争得好，这个意见的正面是有积极的意义，我是赞同的。当然，如果有人反面加以推敲，得出‘鸣得不好，便不能鸣’的引申，那是另一回事了。”

对于“管弦乐队演奏交响乐”的譬喻，展开了热烈争辩

在座谈会的一个小组里，有人提出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里，把“百家争鸣”譬喻为管弦乐队，表示不同意。罗隆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争辩得很热烈。

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说：“百家争鸣不可能是同一个调子，目前要争鸣，就一定有杂音，只要不是反革命的言论，都可以的。”

罗隆基对他的比喻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我那次发言，有一部分是针对陆定一部长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里几位科学家写的一封信所说的，必须长期钻研真正成为家然后能鸣的说法，表示我不同意见。我认为把百家争鸣比作管弦乐队，是适当的，因为乐队可以演奏各种各样的音乐，音乐家有各种各样的派别，作曲家可以写出各种各样不同的乐谱，然而，在演奏的时候，乐队就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拉提琴的，吹喇叭的，都必须服从领导指挥，而后音乐才能有和声、有节奏，而后才能演奏出人民喜欢听的音乐。那就是说，在百家争鸣中，大家的共同目标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沈志远反对罗隆基的这个看法，他说：“百家争鸣的目的，是通过学术思想上的自由讨论和自由争鸣，来发掘真理和发展真理。因此，自由争论决不能是一个调子，争鸣时有辩论，有分歧，调子是杂乱的，经过一段较长久的时间之后，才能求得真理。”

罗隆基说：“管弦乐队演奏交响乐的譬喻，没有什么不妥，乐队每场演奏，不止一个乐谱，它要演许多乐谱，那就无所谓一个调子。交响乐章的内容，是存在着很多矛盾的，有高音、低音、粗音、细音，但是统一于和谐，所以说，交响乐是许多矛盾的高度统一，正足以说明百家争鸣。”

这是，沈志远接着就说：“交响乐一定是一种和谐的调子，但是百家争鸣不可能达到如交响乐那样的和谐地步，因为社会永远是存在着矛盾的，争鸣到一定程度，大家的意见在某些问题上比较接近了，原来的矛盾（意见的分歧）解决了，但又会有新的矛盾，新的争论出现。”范朴斋说：“在指挥棒下演奏交响乐的比喻，意思等于是说，要在有安排之下来个百家争鸣，这种说法会阻碍百家的争鸣。”

罗隆基又说：“我们必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是集体主义社会，今天祖国是政权统一，组织坚强的国家。在今天，‘百家争鸣’必定是有共同目标的‘争鸣’；倘有人希望回到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回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都是违背时代精神的空想。”

反对任何限制性的意见，反对扣帽子

钱端升在发言中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百家争鸣”时，（1）我们每个人讲出的，不论对和错，都要以负责的态度来发言。（2）“争鸣”的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他说：“我认为这两点是重要的。这两个月里，有不少人对百家争鸣提出不少限制性的意见。对所有限制性的意见，我是一度反对。我们要充分信任争鸣之士，不要有任何限制。”他又说：“批评和反批评也是争鸣，当然也不能限制。”他一再强调说：“总之，我是反对任何限制性的意见。”

雕塑家刘开渠一度提出反对一些空洞扣帽子的批评，他举了某些美术批

评文章为例，他说：“这些文章中，只是说：你这一点不对，那一点是错了。至于作者对问题的具体意见，一点也没有提到。给别人扣了一些空洞的帽子，不讲自己的正面意见，使被批评的人想辩论也无从辩论。”他说：“我认为在学术性的讨论上，批评别人，要讲道理，要指出别人所以错的道理，最好也能讲出自己的正面意见。乱扣空洞帽子的批评，有害于‘百家争鸣’的。”

费孝通说：“据我所了解，很多人对学术上的批评，是不怕的；怕的是有些批评不是以理服人，硬扣帽子，这就使人口里无言，心内不服。批评一顿也没有什么关系，怕的是有些人强拉硬缝，引申到政治问题上去，这就麻烦了，尤其是社会科学，争到终了，不可能不涉及政治。目前，有些人写历史文章，越远古越有人写，越近代越没有人写，原因就在此。”

此外，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初民和黄药眠等人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问题，以及陈望道等人对“百家争鸣”的体会和对其他问题，都发表了许多意见。】

——《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召开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座谈会 对贯彻“百家争鸣”展开热烈讨论》，载《光明日报》1956年7月9日，第1版。

7月6日

钱端升出席周恩来接见阿根廷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巴西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智利法律工作者代表团仪式。

【（新华社6日讯）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以弗·姆·皮塔为首的阿根廷法律工作者代表团，以德莫拉·比顿科尔特为首的巴西法律工作者代表团，以维库纳·富恩特斯为首的智利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交谈。

三个代表团的负责人在谈话中都表达了本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周恩来总理说，我们的和平友好愿望是共同的，但是发展这共同愿望是逐步的。他请三个代表团分别向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人民转致中国人民对他

们的友谊，并且向他们表示中国希望同这三个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在会见的时候，巴西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团员、著作家奥斯尼·德华蒂·彼里拉把他的著作《我们与中国》一书赠送给周恩来总理。他说：在这本书里描写了中国人民过去的斗争事迹，周恩来总理在这个斗争中所起的杰出作用也被写了进去。这是自中国解放后在拉丁美洲第一部描写中国人民斗争的书。周恩来总理对他表示感谢和高兴。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张志让、吴德峰、钱端升，常务理事朱其文、陈体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曹孟君，外交部美澳司司长徐永瑛。

这三个来自拉丁美洲的代表团在六月上、中旬先后到达中国后，曾经在北京、沈阳、鞍山、抚顺、南京、杭州、上海、天津等地参观访问。阿根廷和巴西的代表团还访问了武汉和广州。

昨天晚上，三个代表团都应邀出席了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会长董必武招待他们的酒会。】

——《周总理接见三个外国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6年7月7日。

7月9日

钱端升参加阿根廷法律工作者代表团举行庆祝阿根廷独立纪念日酒会并致词。

【（新华社9日讯）中国社会各界著名人士同阿根廷的友人们今天在北京共同庆祝阿根廷国庆日——1816年独立纪念日。

酒会的主人——阿根廷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弗·姆·皮塔向来宾致词说，阿根廷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对于今天有机会同中国、巴西和智利的朋友们一起庆祝阿根廷正式宣布独立的这个节日，感到极大的愉快。他举杯祝中国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幸福，祝中阿两国的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并且希望中阿两国早日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钱端升接着致词。他指出阿根廷人民在1816年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以来的一百四十年中，为了独立和自由，为了美好幸福的生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钱端升请代表团回国后向阿根廷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并且祝阿根廷人民繁荣和幸福。

智利的弗里亚斯，代表巴西和智利两国的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向阿根廷友人们致贺。

参加今天酒会的，还有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张志让、吴德峰，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曹孟君，以及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各界著名人士。】

——《阿根廷法律工作者代表团举行酒会庆祝阿根廷独立纪念日》，载《人民日报》1956年7月10日。

7月

在《世界知识》发表《今日的比利时》一文。

——钱端升：《今日的比利时》，载《世界知识》1956年第7期。参见钱端升：《钱端升主要著作目录》，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1页。

8月16日

刘锴电话胡适，告诉其钱端升参加加拿大一个会议的消息。

【刘锴大使从Ottawa打电话来说，听说钱端升近到Canada的Nova Scotia的一个美国人Cyprus Eaton的庄子上，参加会议。Canada Gov't 特许他入境。】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9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36页。

8月28日

钱端升出席张奚若招待英国议员访华团酒会。

【（新华社28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今晚举行酒会，欢送英国各党议员访华团。

在酒会上，客人和主人友好地交谈着，愉快的笑声洋溢在明亮的客厅里。国务院周恩来总理请客人们，为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为议员先生们的健康，为客人们再来中国干杯。

英国各党议员访华团，今天轮到英国工党议员兰金作团长，他代表全体团员提议为中国，为毛泽东主席，为周恩来总理，为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干杯。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议院自由民主党议员施万也出席了今晚的酒会。他同周恩来总理谈到对中国的观感。他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他说：“我回去以后，要好好报道我在中国所看到的一切。我一定要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互相谅解，扩大经济文化交流，以致最后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总理举杯祝中德人民友好。

酒会进行得越来越热烈了。英国工党议员兰金再一次代表全体团员对中国这样好的招待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明天就要向你们告别了，祝你们人民继续繁荣，祝你们一切愉快，祝你们铺满了花朵的道路成为和平的道路。”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对客人们说：“你们这次访问对中英两国相互了解和友谊的增长有很大帮助。”

出席今晚酒会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维汉、陈叔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乔冠华、罗隆基和社会各界人士。

英国驻中国代办欧念儒也应邀出席了酒会。】

——《张奚若酒会欢送英议员访华团》，载《人民日报》1956年8月29日。

9月2日

钱端升等发表声明，反对西德联邦法院对德共的非法判决。

【（新华社2日讯）中国著名法学家沈钧儒、吴德峰、张志让、梅汝璈、钱端升以“抗议西德联邦宪法法院的非法判决”为题，撰文抗议西德联邦宪法法院最近在阿登纳政府的压力下，对德国共产党所作的非法判决。全文如下：

西德联邦宪法法院在阿登纳政府的压力下，终于宣传德国共产党为非法，并随即拘捕了大批的德国共产党领袖和干部，中国法律工作者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无比的愤慨。我们对于这一蛮横的迫害行为，表示强烈的抗议！

德国共产党一向是德国民主权利和民族利益的忠诚捍卫者。它一向为维护联邦宪法所应保障的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为要求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德国所作的努力，是完全符合德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的。德国共产党理应受到联邦宪法的充分保护。

但联邦宪法法院竟然遵照美帝国主义指使的阿登纳政府的意志，为了进一步推行军国主义化，把德国推上复仇的战争道路，进一步迫害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德国共产党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作出了诬陷性的判决。这是1933年国会纵火案故技的重演。这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判决。这是联邦宪法法院公然践踏德国人民的宪法权利，公然违反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保障德国一切民主政党和民主秩序的非法判决。这种行动阻挠着德国的和平统一，危害着德国的民族生存。这种行动是对主张和平民主的德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

我们中国法律工作者为了维护人类正义，严整斥责这个判决，全力支持德国人民反对禁止德国共产党的抗议和斗争。我们同全世界一切正直的法律工作者一样，坚决主张：禁止德国共产党的非法判决必须撤销！德国共产党的宪法权利必须恢复。】

——《我国著名法学家沈钧儒等撰文斥责西德联邦宪法法院对德共的非法判决 全力支持德国人民反对禁止德共的斗争》，载《光明日报》1956年9月3日。

9月3日

钱端升参加郭沫若祝贺齐白石获得国际和平奖金宴会。

【(新华社3日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郭沫若今晚宴请齐白石,祝贺他荣获1955年度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出席宴会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评议委员会副主席茅盾,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邵力子、罗隆基、钱端升,中国美术界人士陈半丁、溥雪斋、于非暗、叶浅予和叶恭绰等多人。齐白石的家属也出席了宴会。】

——《郭沫若宴请齐白石祝贺他荣获国际和平奖金》,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4日。

9月4日

钱端升参加郭沫若招待比利时和平代表团宴会。

【(新华社4日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今晚举行宴会,欢迎前来我国访问的以让·尼昂教授为首的比利时和平代表团全体人员。应邀作陪的有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丁西林,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张志让,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许宝驹,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乐松生以及我国科学、文化、艺术、宗教、贸易和新闻等各界人士。

郭沫若在宴会时讲话说:中比两国人民过去已有深长的友谊,希望这种友谊今后进一步得到新的发展,这不仅符合中比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比利时和平代表团团长尼昂在讲话中祝贺中国的进步和成就,他还说,比利时和平代表团虽然包括了各方面的人士,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但对中国的友好和保卫和平的意志是一致的。他还表示希望中比两国不久能建立正式的邦交。

我国作家李伯钊和代表团团员毕加也相继讲了话。最后,代表团人员向

郭沫若献了礼。郭沫若致谢说，友谊与和平是宝贵的，一定要把这些礼品和友谊与和平一样，永远保存下去。】

——《郭沫若欢宴比利时和平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5日。

9月7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扩大），他应美国伊顿的邀请，在8月间前往加拿大参加国际问题讨论会的情况。

【（新华社7日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举行第二十八次会议（扩大）。

在会上，常务委员史良报告了今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她应邀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妇女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时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常务委员钱端升报告了他应美国伊顿的邀请在今年8月间前往加拿大参加国际问题讨论会的情况。全国委员会委员刘王立明也在会上报告她到西德参加世界基督教妇女节制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的情况。

会议在听了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梅龚彬的说明后，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交常务委员会负责同有关部门协商处理和审核办理的提案的处理意见。】

——《政协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听取委员们访问外国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8日。

【常务委员会在1956年9月7日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听取和讨论了史良委员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报告；钱端升委员访问加拿大的报告和刘王立明委员关于参加世界基督教妇女节制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的情况的报告。】

——陈叔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6日。

9月22日

钱端升参加刘少奇会见比利时国会代表团。

【（新华社22日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今晚接见了以卡米勒·胡斯曼为首的比利时王国国会代表团。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陈叔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许广平、副秘书长张苏、余心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端升等。】

——《刘委员长接见并欢宴比国会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23日。

9月29日

钱端升参加毛泽东接见比利时国会代表团。

【（新华社29日讯）毛泽东主席今天晚上接见了以卡米勒·胡斯曼为首的比利时王国国会代表团全体人员。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国务院副总理陈云、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余心清、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端升。】

——《毛主席接见比利时国会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30日。

10月3日

钱端升前往机场欢送比利时国会代表团。

【（新华社3日讯）比利时和平代表团在3日离京返国。他们在我国逗留了一个月，先后访问了北京、沈阳、鞍山、抚顺、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并在北京参加了国庆观礼。

今天在机场欢送他们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许宝驹和各界人士钱端升、乐松生、吴作人等多人。】

——《比利时和平代表团离京返国》，载《人民日报》1956年10月4日。

10月19日

钱端升参加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主席团。

【（新华社19日讯）今天在首都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主席团由各界人士八十五人组成。名单如下（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西林、王任叔、王芸生、王昆仑、韦恂、叶圣陶、叶恭绰、田汉、邓颖超、老舍、刘开渠、刘白羽、齐白石、孙伏园、江丰、吕骥、萧三、李四光、李济深、李德全、李霁野、李桦、沈钧儒、何其芳、何香凝、阳翰笙、吴玉章、吴作人、吴组缃、邵力子、竺可桢、周建人、周扬、周信芳、林枫、罗隆基、陈半丁、陈叔通、陈垣、陈赓、欧阳予倩、陆定一、胡乔木、胡愈之、胡耀邦、茅盾、郑振铎、柳亚子、范文澜、赵树理、马叙伦、马思聪、马寅初、徐伯昕、徐特立、梁希、夏衍、郭沫若、许广平、许德珩、曹禺、曹靖华、章乃器、章伯钧、陶孟和、张天翼、张奚若、黄炎培、黄药眠、傅钟、冯至、冯雪峰、程砚秋、杨之华、杨秀峰、杨献珍、臧克家、赖若愚、钱俊瑞、钱端升、鲍尔汉、蔡楚生、谢冰心、戴爱莲、钟敬文。】

——《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主席团名单》，载《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0日。

10月21日

钱端升、刘格平拜会苏拉瓦底总理。

【（新华社21日讯）中巴友好协会会长刘格平、副会长钱端升，今天晚上七点钟拜会了苏拉瓦底总理，并且同苏拉瓦底总理共进晚餐。

拜会的时候，在座的有中巴友好协会理事张杰、张茜等。

刘格平会长代表中巴友好协会向苏拉瓦底总理赠送了清朝光绪年间名画家任伯年的彩墨画一幅、白玉石盆景、景泰蓝花瓶、木刻彩印画册等礼品。】

——《刘格平和钱端升拜会苏拉瓦底总理》，载《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2日。

11月11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人民支援埃及反抗侵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担任委员。

【(新华社11日讯)今天举行的中国人民支援埃及反抗侵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委员会的各个工作机构,负责动员与登记志愿去埃及支援埃及人民反抗侵略战争的军事人员、医务人员、工程技术和交通运输人员,征募与收集支援埃及的各项物资,继续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以实际行动支援埃及反抗侵略的运动。

会议建议全国各省市成立当地人民支援埃及反抗侵略委员会,以负责领导当地人民支援埃及反抗侵略的运动。

会议一致通过郭沫若为中国人民支援埃及反抗侵略委员会主席,陈叔通、包尔汉、廖承志为副主席。

会议还通过成立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负责领导日常工作。

中国人民支援埃及反抗侵略委员会委员名单

(新华社11日讯)中国人民支援埃及反抗侵略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共167人;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西林、卫立煌、万泰和、于振瀛、方方、方石珊、王一帆、王之相、王光英、王志杰、王芸生、王梓仲、王深林、王琇瑛、王绍鏊、巨赞、邓初民、邓拓、邓裕志、包尔汉、甘泗琪、史良、田汉、丘金、司徒攀、乐松生、刘宁一、刘西元、刘王立明、刘清扬、朱子奇、朱伯琛、朱学范、朱德宝、朱蕴山、孙晓村、庄希泉、庄明理、严希纯、严信民、严济慈、伍云甫、伊明·马合苏木、李四光、李伯球、李伯渔、吕叔湘、李宗恩、李君武、李烛尘、李纯青、李德全、李德培、李维光、吴玉章、吴有训、吴冷西、吴英恺、吴学谦、吴茂荪、吴耀宗、邵力子、邢西萍、拉西达、达浦生、沙千里、周建人、周叔迦、周炳琳、周培源、周鲠生、孟鞠如、陈文贵、陈凤桐、陈劭先、陈此生、陈其尤、陈其瑗、陈叔通、陈坤惕、陈崇

桂、陈嘉庚、陈模、陈琏、陈翰笙、金仲华、罗隆基、罗毅、林汉达、郑昕、郑森禹、劳君展、竺可桢、胡子昂、胡启立、胡兰生、胡愈之、侯德榜、南汉宸、茅以升、茅盾、姚溱、浦化人、马玉槐、马约翰、马寅初、马叙伦、马纯古、马补臣、马寒冰、马坚、马鸿宾、马腾霄、唐明照、翁文灏、郭沫若、郭则沉、陶淑范、莫艺昌、许广平、许宝驹、许德珩、张志让、张奚若、张淑义、黄炎培、黄凉尘、黄琪翔、黄鼎臣、康克清、曹孟君、梁希、梅汝璈、梅兰芳、梅益、章元善、章乃器、曾昭抡、冯雪峰、喜饶嘉措、傅作义、傅连璋、杨士达、杨明轩、杨宗瑞、杨静仁、杨慧琳、雷任民、雷洁琼、赵望平、赵朴初、赵毅敏、廖承志、熊瑾玎、蔡廷锴、噶喇藏、翦伯赞、冀朝鼎、赖若愚、钱学森、钱端升、薛愚、阎迦勒、谢雪红、谭惕吾、萨空了、饶毓蔡。】

——《支援埃及反抗侵略委员会成立各个工作机构登记志愿人员，征募援埃物资并建议全国各省市成立地方委员会》，载《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11月12日

钱端升参加彭真招待叙利亚访华团宴会。

【（新华社12日讯）北京市市长彭真今晚举行宴会，招待以阿里·布佐为首的叙利亚议员访华团。

宾主们围桌而坐，畅叙友谊。彭真在宴会上说，叙利亚是我们亲爱的兄弟，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在各方面息息相关。他说，中国人民以及北京市人民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的反抗英法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他提议为叙利亚的繁荣，为中叙两国的友谊，为中国阿拉伯人民间的友谊，为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大团结，为世界各民族永远共存，为各国和平共处而干杯。

阿里·布佐团长在会上讲话，代表访华团向主人盛情招待表示感谢。他提议为叙中两国友谊的日益增长和两国团结的日益加强而干杯。

访华团团员、叙利亚复兴社会党领导人之一阿卜杜勒·哈利姆·卡杜尔

讲话说，从我们到这个友好国家后，我们就感受到非常多的友情和温暖，就感觉到我们是在非常了解我们的朋友之中。他说，中叙两国的友谊是为了密切合作和保卫和平。因为，世界和平事业有赖于亚非各国人民的团结。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间的团结就是保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保卫和平的巩固基础。他又说，访华团这次访问中国将有助于阿拉伯人民和中国人民间的友谊。他提议：为各国人民间首先为叙利亚同中国间的友谊，为慷慨好客的北京市长和北京市人民干杯。

出席今晚宴会的，有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乐松生，政协北京市委员会主席刘仁，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周鲠生、钱端升、罗隆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马玉槐以及北京各界人士等。】

——《北京市彭真市长举行宴会招待叙利亚议员访华团》，载《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3日。

钱端升入选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主席团。

【（新华社11日讯）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主席团名单如下：毛泽东、卫立煌、王芸生、王葆真、邓小平、邓拓、包尔汉、史良、叶恭绰、叶剑英、龙云、华罗庚、达浦生、刘少奇、刘仁、何香凝、余心清、冷遹、吴玉章、吴晗、李六如、李书城、李先念、李济深、李富春、李维汉、沈雁冰、沈钧儒、邢西萍、陈云、陈劭先、陈叔通、陈其尤、陈其瑗、陆定一、周恩来、周震麟、林伯渠、邵力子、罗隆基、侯德榜、柳亚子、胡乔木、胡耀邦、范瑾、茅以升、凌其峻、乌兰夫、马叙伦、马湘、高崇民、康生、张友渔、张际春、张治中、张奚若、张难先、张鼎丞、梁希、许德珩、章伯钧、郭沫若、傅作义、彭真、彭德怀、程潜、程砚秋、贺龙、董必武、廖承志、熊克武、蔡畅、赖若愚、钱三强、钱端升、赛福鼎、钟惠澜、聂荣臻。】

——《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主席团名单》，载《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11月26日

《光明日报》报道北京政法学院领导带头将住房让给学生的事迹，提及

钱端升。

【（本报讯）北京政法学院师生员工发扬了艰苦朴素的作风，积极克服房屋不足的困难，学校行政和党的领导人亲自带头把自己的住房腾出来让给学生住。

北京政法学院原有学生七百五十人，今年增加五百人，而房屋面积增加很少。按定额房屋面积应增加一万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但实际只兴建四千多平方公尺的校舍，而且到现在还没有完工。为了克服学校教学和生活用房不足的困难，学校领导上非常重视解决这个问题。学校党委首先在党内做了动员报告，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又做了一次动员报告，号召全院师生员工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挖掘学校房屋的潜力，合理调整教学和生活用房，尽量在原有住房中增加一些床位，发挥房屋的最大利用率，来解决目前房屋不足的困难。接着，全院就进行了房屋的调整工作。全院行政和党的领导人都积极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克服困难。除院长钱端升未住在学校外，副院长刘镜西、李进宝和党委书记王润，总务主任修恒生等同志都带头将自己的住房腾出来，搬到办公室里去住。在他们的带动下，许多行政人员也都把自己的住房腾了出来。这样，就节省了住房，让出了一幢二千四百多平方公尺的宿舍大楼来给学生住，解决了学生的住房问题。另外，学校还把阅览室和会议室改做教室，解决了教学用房问题。】

——《领导人员带头腾出住房 全院员工发扬艰苦朴素作风 北京政法学院用房问题解决得好》，载《人民日报》1956年11月26日。

12月15日

钱端升前往机场欢迎英国上议院议员斯坦斯盖特。

【（新华社15日讯）英国上议院议员斯坦斯盖特子爵和他的夫人，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斯坦斯盖特是在参加今年11月间在曼谷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第四十五届会议之后，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中国作友好访问的。

今天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秘书长吴茂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张苏等。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也到机场欢迎。】

——《英议员斯坦斯盖特到京》，载《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6日。

12月16日

钱端升参加张奚若欢迎斯坦斯盖特宴会。

【（新华社16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今天下午举行酒会，欢迎英国上议院议员斯坦斯盖特子爵和他的夫人。

出席酒会的还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秘书长吴茂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廖承志、张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德全、李一氓、周培源、梅汝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卫立煌，委员翁文灏、冀朝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王梓仲等。】

——《张奚若设宴欢迎斯坦斯盖特》，载《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7日。

12月18日

钱端升参加郭沫若接见斯坦斯盖特。

【（新华社18日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今天上午接见了英国上议院议员斯坦斯盖特子爵和他的夫人。

接见时在座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张苏、廖承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秘书长吴茂荪。】

——《郭沫若接见斯坦斯盖特和夫人》，载《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0日。

12月23日

钱端升参加郭沫若宴招斯坦斯盖特。

【（新华社23日讯）郭沫若副委员长和夫人今晚举行宴会，招待英国上议院议员斯坦斯盖特子爵和他的夫人。

郭沫若在会上致词，对斯坦斯盖特和夫人来中国访问表示欢迎。他希望通过他们这次访问能增进中英两国人民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的发展。

斯坦斯盖特说，在二十二年前他和他的夫人曾来过北京，这次重访北京看到北京有了很大变化。他说，北京有着美丽的建筑和宏伟的宫殿，新中国既注意保存了这些悠久的历史古迹，又照顾了工人们的需要，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作了努力。

在谈到新中国在国际间的地位和作用时，斯坦斯盖特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势力，一种是企图分裂中国、分裂世界的恶势力，一种是主张世界团结的善良势力。他表示，英国许多议员都是主张世界团结、世界和平和反对战争的。他还说，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出席宴会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周建人、张苏、廖承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钱端升，以及各界著名人士李德全、许德珩、楚图南、黄琪翔、卫立煌等。】

——《郭沫若设宴招待斯坦斯盖特》，载《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4日。

12月26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并被增选为常务理事。

【（新华社26日讯）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会今天举行第五次会议。楚图南在会上报告了中国艺术团访问智利、巴西、乌拉圭、阿根廷等四个国家的情况，会议并加选了包尔汉、马玉槐、刘格平、依敏诺夫、钱端升、周建人、周叔迦、达浦生、钱伟长等九人为常务理事。】

——《对外文化协会加选九位常务理事》，载《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7日。

1957年(57岁)

2月24日

钱端升出席张奚若欢迎西班牙政论家瓦约酒会。

【(新华社24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今天举行酒会，欢迎名政论家西班牙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瓦约先生和夫人。

出席酒会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陈翰笙、钱端升、罗隆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会长邓拓、副会长王芸生等。】

——《张奚若举行酒会欢迎名政论家瓦约》，载《人民日报》1957年2月25日。

3月22日

钱端升等中巴友好协会举办电影招待晚会庆祝巴基斯坦国庆。

【(新华社22日讯)中巴友好协会今天晚上在北京和平宾馆举行电影招待晚会，庆祝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共和日(3月23日)。

巴基斯坦影片《苏拉瓦底总理访问中国》、《巴基斯坦民间歌舞》在晚会上受到热烈欢迎，晚会上还放映了中国故事片《沙漠里的战斗》。

中巴友好协会会长刘格平、副会长钱端升，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张杰，以及首都各界人士三百多人出席了电影晚会。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阿哈默德和夫人以及大使馆人员应邀出席了晚会。】

——《中巴友协举行电影晚会庆祝巴基斯坦国庆》，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

4月

千家驹撰文，提及钱端升等曾参加一个科学讨论会，讨论记录将发表在《争鸣》5月号上。

【我们为什么要办“争鸣”？】

千家驹

“争鸣”月刊是为响应党和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在去年10月创办的，当初只在中国民主同盟内部发行，现在为了扩大读者影响，决定自今年4月份起公开发行了。

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要办这一个刊物呢？我国刊物的种类还不够多吗？学术研究方面有各种“××研究”和大学学报，给青年们看的有“中国青年”，给妇女们看的有“中国妇女”，辅导干部学习的有“学习”半月刊，综合性的学术杂志有“新建设”等等，甚至“象棋”，“集邮”都有专门性刊物，你们的“争鸣”究竟是属于哪一类性质的呢？读者的对象是些什么人呢？

的确，“争鸣”是不属于上述性质中任何一类的。我们所以要办“争鸣”，理由很简单，就是要让我们的学术界思想界多一“争鸣”的园地。自去年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我国思想界还不能说已经毫无顾虑，尽量地“放”，尽情地“鸣”起来了，在半年以前，尤其如此。要“鸣”，必须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供给他们以“鸣”的园地。一般的刊物总有它一定的风格，为一定的读者对象服务，同时也就负有对这一部分读者宣传教育的使命。有些文章，它们是不适宜于刊登的。这几年来，高级知识分子中有话不敢说，写成文章不敢往外拿，即令拿了出来也没有地方发表的情况还不能说是个别的。“争鸣”月刊，顾名思义，就是要鼓励大家来争鸣，它是一种综合性月刊，专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服务，内容包括哲学、史学、经济、政法、教育、文艺、自然科学各个方面，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可以来争鸣一番。我们不要求每篇文章的观点、立场

都正确，我们的目的只在提倡一种自由争辩的风气，使学术界、思想界活跃起来，即使野草闲花，我们也欢迎到这儿来放一放，里面也许可以放出香花来。过去几期，我们就是本着这种方针办事的。即使在试办时期，虽未公开发行，里面许多文章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向我们索阅的很多。例如我们曾经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国画、美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是不是有矛盾等问题的争鸣文章。又如2月号我们发表了胡敦元同志《战后美国经济危机问题》一文，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否正确是大可讨论的，但是他列举许多材料，提出他自己对美国经济危机的看法，他基本上反对把1946年和1948年美国生产减退视为经济危机的看法，并对今后美国经济提出比较乐观的估计。像这样一篇文章，在一般刊物上就不见得有机会发表。这篇文章也已经引起了我国研究国际经济问题者的注意，认为是一个值得争鸣的问题。此外，我们还通过了民盟的组织，利用了座谈会的方式，有计划地组织高教文化界对当前一些重要的文教问题进行座谈。当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以后，我们约集了一部分社会科学家座谈如何展开学术界的争鸣问题，参加的有沈志远、吴景超、陈达、邓初民、彭迪先、潘光旦、孙毓棠、岳劫恒、范朴斋等十多位同志，他们之中就有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座谈记录已发表在4月号“争鸣”上）。又如关于科学体制问题，我们也邀请了一部分科学家举行座谈，参加的有钱学森、钱伟长、曾昭抡、童第周、张景钺、李宗恩、褚圣麟、马大猷、陈士骅、张维、钱端升、翦伯赞、吴景超、费孝通、孙渠诸同志，讨论了中央和地方科学研究机构之间、科学院与高等学校之间、科学院与中央各业务部门所领导的科学研究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占比重等问题（座谈记录在“争鸣”5月号中全文发表）。他们的意见有一致的，也有不一致的，也就是说，其中一定有正确的，也有部分不正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引起大家的争鸣，由争鸣中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来。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引发大家对当前重大的科学文化政策的讨论。此后我们并拟继续举行关于文教措施、学术思想等方面的座谈。据我们这两次座谈的经

验，科学界高教界朋友对国家文教措施不是没有意见的，而且也愿意说出来，但还不能说已经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了。这自然还要经过一个过程。像这样一些座谈会，比之于由政府来召开也许要敞开一些，自由一些。这对于党的制定政策，考虑问题是会有帮助的。

此外，我们办这个刊物还有一个小小的目的，那就是想提倡一种新的文风：短小精悍，开门见山，实事求是，少说废话。我们在征稿简约中要求来稿文长一般不超过三千字（虽然目前我们还未达到这要求）。我们认为，一个作者如果肯对读者的时间负责，有明确的主题和主题，文字写得简练些，有三、四千字一般是可以说明一个问题的。自然，对某些学术讨论是不能限于三、四千字的。“争鸣”月刊既不是一个专门学术性的学报，同时也不是一个政论刊物，它既不想指导思想，也不希望变成政治论文的讲坛。但希望通过“争鸣”，活跃学术界的空气，并且通过“争鸣”，逐步地提高我们知识分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其次我们还想提倡一个素朴的作风，有人说，我们的封面太“寒怆”。不错，我们是有意这样“寒怆”的。难道目前出版界用道林纸印套色画的刊物还不够多吗？素朴一些，大方一些，又有什么不好呢！

以上是我们办“争鸣”的一点简单的动机。自然，过去几期我们的缺点是太多了，文章质量既不高，校对错字又多。这是由于最初几期还在试办阶段，经验不多，稿源不丰。既未公开发售，一般读者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刊物，因此，我借此机会把我们办“争鸣”的目的说明一下，并且希望全国读者来支持，全国知识分子来争鸣。我们的园地是公开的，芝兰芳草，我们固然欢迎，即使是野草闲花，也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放一放，我们编辑部只守住一条线，这条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就是社会主义。】

——千家驹：《我们为什么要办“争鸣”？》，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7日。

4月27日

上午，钱端升主持北京政法学院第二次科学讨论会。

——见《政法院讯》1957年5月11日，第1版。

4月30日

钱端升参加张奚若招待马格里勃议会访华代表团晚宴。

【（新华社30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昨晚设宴欢迎马格里勃（摩洛哥）国民协商议会访华代表团。

张奚若会长在宴会上致词对代表团这次来中国访问表示欢迎。他说，代表团这次来访必将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了解。我们希望两国之间不但友谊日益增进，文化经济接触更加广泛，而且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代表团团长哈吉·穆罕默德·布阿姆拉尼先生在宴会上致词说，代表团此行的目的不仅在于参观访问，而且要把对于马格里勃有好处的经验和知识带回国去。他说，马格里勃希望能够成为和平中立的国家。马格里勃刚刚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因此热忱地欢迎任何不打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国家的技术援助。他又说，我们的目的是同所有的国家友好，争取各国人民的安全和世界和平。他并且建议为反对殖民主义而团结在一起的各国人民干杯。

出席作陪的，有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罗隆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阿布都拉希姆·马松亭，前中国赴马格里勃贸易代表团副团长于黎光，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柯华等。】

——《欢迎马格里勃议会访华代表团 张奚若昨晚举行宴会》，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5月1日

钱端升参加周恩来接见瓦约。

【（新华社1日讯）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西班牙名政论家胡利澳·

阿尔瓦雷斯·德·瓦约。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钱端升、乔冠华，秘书长吴茂荪。】

——《周恩来总理接见西班牙名政论家瓦约》，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4日。

5月3日

钱端升参加林伯渠接见马格里勃议会访华团。

【（新华社3日讯）林伯渠副委员长今天上午接见了马格里勃（摩洛哥）国民协商议会访华代表团。接见的时候，沈钧儒、陈叔通副委员长和张苏、张奚若、钱端升、吴茂荪也在座。】

——《林伯渠副委员长接见马格里勃议会访华团》，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4日。

5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钱端升接受该报记者叶迈的采访，谈他对整风运动的感想。

【最近记者走访了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先生，请他谈谈对整风运动的感想。

一喜一惧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是钱先生对他的感想的总结语。透过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钱先生瞻望到了更好的新的党与非党关系的出现。他说：“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十六个字的口号，反映了我国当前社会的一种局面，一种实际需要；特别是后面八个字，有可能使我们由自发变为更自觉地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与非党的关系，创造出一种新的我们自己的经验。从这方面讲，整风是十分需要的。”这是钱先生感到喜欢的一面。惧的是，“从总路线的提出到目前的整风

为止，愈来愈感到大家的责任重了，负担重了，尤其是经过整风，可以预期到党员的活动会更有组织些，非党的民主人士在国家机关和社会上的活动也将有增加而更丰富了，因而担心自己跟不上必然增加的任务”。所以，钱先生认为，“除严格要求共产党之外，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也应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多花一些力量，多想一些办法，加强自己”。

过去对老教授和老司法人员尊重不够

话题接着转到了钱先生的本行政法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他认为：“立法是当前的一件紧要工作，法院和检察部门都需要有法可依，目前也有条件来搞，可是现在搞得嫌慢些，不够大胆和放手。”在司法工作方面——他说，办案质量是一个关键性问题，1954年办案质量有较快的提高，但同社会进步相比还是不相称的。而要提高办案质量，首先要提高有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和业务水平，但目前由于教育力量太小，高等政法院系还不够多，所以目前应注意培养合乎规格的教师，增设院系和函授班。他认为：“目前应把与教学不大相关的研究工作放在次要地位，不要为研究而研究，轻重倒置。”此外“应采取快而有效的方法把法律教科书编写出来，使广大教师有更多时间来教课”。

政法部门党与非党关系上存在的缺点，钱先生认为：一是有些党员干部遇事同党外人士商量不够，一是对于老的司法人员和老教授缺乏必要的信任和尊重。他举出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商量不够的，譬如，上面提到的立法工作——钱先生说，如果能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就可能搞得快些。我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因不是专职就过问得较少，党员负责同志的确辛辛苦苦地作了许多具体工作，但在工作方法和原则等问题上也没有很好商量，连刑法总则草案最近是否提出一事，我还是从另外一个干部口中知道的。再一个是关于对老教师不大信任的，楼邦彦教授在北京政法学院时，钱先生曾提出让他担任一个教研室的副主任，但前后说了三次才得到解决。“所以对老的政法干部和老教授信任和尊重不够，”他说：“则是由于过去强调法律的阶级性、斗争性强，对于政法干部特别注重政治条

件，这当然是对的，但也往往因此而把参加党团与否，作为衡量一个人政治上是否进步的界限。这样一条线，容易使政法部门的人变成清一色。1954年北京政法学院的毕业生，有些不是党团员的就没有分配到政法部门工作，或本来可以考虑当审判员的让他们当了书记员。1955年以后比较好些，司法部门中的非党人员增多了，并由一些非党人士担任司法厅局长的职务。”但法院和检察院的高级干部中还很少有非党人士，因此应适当地增加一些。他说，“这样做是有好处的，一则不参加党的人总是有的，既然有，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的估计，不然就会限制他们的积极性；一则也可巩固学习政法专业的青年人的情绪，免得他们有前途无望之感”。

只依靠党员，不依靠教师

钱先生接着谈到了高等教育工作。他说：“这几年来，我们学习苏联有很大的成就，但也产生了和中国实际结合不够，和老教师商量不够的缺点。在学校中只是依靠党员，而依靠教师不够。高教部在某些问题上，如院系调整、教学改革、专业设置、教学工作量等，都是自己先拿出一套东西，从上往下贯，即使交下边讨论，也只能有小小的修改，所以，自上而下，不依靠广大教师，不结合实际，是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一个基本的毛病。这样一来，非党的教师也容易对领导有意见。”

钱先生认为学校中实行党委制，易使学校的领导搞两套：一边是党委会，一边是校务委员会一类机构，势必使几个党员负责同志多做许多重复的工作，浪费很多时间。因此他认为：“学校可以不要党委领导，而由校务委员会领导，这样省事得多。学校党的领导同志总得对党员和非党人士担负起政治思想领导，所以不要党委制并不是说党不领导了。”

采取灵活方式保证整风和教育工作两不误

钱先生还认为，在学校中有中心工作的提法不好，可能妨碍经常工作。他说：“学校的中心工作就是教育工作，这是经常在进行的，只能拿别的中心工作来加强教育工作，不能拿别的中心工作来把教育工作放在次要地位。要是教育工作被旁的工作挤了，学校就不成其为学校了。”在学校中如何

保证整风和教育工作两不误，钱先生认为是一个应该解决的问题。他说：“机关可以保证两不误，而在学校拿出普通的提法就不行，学校的经常工作不能打乱，当然整风也得搞，因此可考虑采取一些更灵活的方式来保证两不误。”

记者想探询一下北京政法学院的党群关系如何，大概是出于爱人以德之故吧，钱先生没有多谈。但是，记者也曾听人说过，过去北京政法学院老教授们住的一座楼，被称为“孤岛”。在最近政法学院的座谈会上，一个教授幽默地说：“我到政法学院来后，觉得不像一个学校，有人说像一个政权机关，我看也不像，倒更像一个军事机关。最近有人说北大像一个衙门，我看我们学校能像北大那样一个衙门也不错。”这就说明北京政法学院并不是平静无事的。在这个学校里，风毕竟是刮起来了，但不知能否吹皱一池春水，这就要看学校的党如何行动了。】

——叶迈：《为党群关系创造新经验 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先生谈整风》，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

5月17日

楼邦彦在九三学社10日、15日的座谈会上提及钱端升，就此批判老清华的“教授治校”。

【近来，随着高等学校中各类矛盾的被揭露，怎样改进高等学校的领导工作，已经成为各方面关心的问题。为了求得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邀请在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等机关工作的部分社员，在5月10日和15日举行了两次座谈会。到会的许多学者专家，围绕着是在高等学校中实行党委制好，还是实行教授治校好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积极的有益的意见。

对教授治校的不同看法

据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和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等同志谈，解放以前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实行教授治校。当时的清华大学，

是由副教授以上的人组成教授会，再由教授会推选九人组成评议会。凡是有关学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例如聘请或辞退教授、选派出国留学、增添或减少系科以及经费的支配等，都由评议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只有它不能解决的问题，才提交教授会讨论和决定。黄子卿教授认为，这种作法有许多好处，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够对教授在学术上的成就有个公平的估价，保证教授有一个安定的工作，减少人事上的互相倾轧和排挤。因此，他建议在继续保持党委制的情况下，在高等学校中采取教授治校的办法。今后凡是有关教学和学术上的重大问题，都应当由教授会来管，党委则主要负责政治思想工作。

前南京大学校长、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潘菽，基本上同意黄子卿教授的意见。他认为，有关教学和学术上的重大问题，都应当让教授知道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过去有许多事情，教授们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今后如能实行教授治校，就可以改变这种情况，并且有助于克服学校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进一步在高等学校中发扬民主，对党委的工作起一种监督作用。

楼邦彦副局长和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主任孟昭英等，认为对教授治校应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不应机械地搬用过去的作法。楼邦彦认为：清华的教授治校实质上是元老治校和寡头政治；所谓安定也只是安定了这一部分人。他说：当时清华在教授治校下的宗派主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一个人如果不是留美学生，要想进清华是很困难的。1939年他从国外留学归来，当时他的老师张奚若任清华政治系主任，要他到清华任教；而他的另一位老师钱端升在北大当政治系主任，要他到北大任教。虽然当时北大给他的月薪是320元，而清华只有280元；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清华而没有到北大，就是因为受了“清华精神”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宗派主义决不应当在今天的高等学校中复活。同时他也不主张搬用北大的教授治校，因为当时（指1946年以后）北大的教授治校，主要是为了同胡适作斗争，为了进行教授的民主运动；而在今天的高等学校中，共产党

并不是大家的斗争对象。因此他认为，教授治校虽然有好的地方，但也不应否认它有不好的地方；今天是否要提教授治校以及它的内容如何，都需要慎重地加以考虑。

对于楼邦彦的上述意见，好几位教授在发言中都表示赞同。孟昭英说：清华的教授治校和美国的国会差不多，形式很民主，实际是少数人把持校政。北大教授周炳琳（民革中央委员，特邀参加会议）反映说：一提起教授治校，年青人的反感很大，认为是封建把头的统治。清华机械制造系教授金希武，除同意过去的教授治校是资产阶级民主外，还认为它是脱离实际的学院教育的必然产物。

是制度不好还是思想作风问题

在对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进行分析批判上，几乎可以说，座谈会上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当前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所以存在着许多缺点，主要不是党委制这个制度不好，而是党员的思想作风有许多问题，它们的集中表现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许多位教授在会上分析了党员的情况。他们认为，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党员一般是品质优良的，工作是积极努力的；但是也存在着许多比较严重的缺点。这主要是：第一，他们一般都还比较年轻，缺乏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和办学经验，因而对人对事的方法比较简单，考虑问题不够周密和全面，难免不发生缺点和错误。第二，也正是由于他们一般都还比较年轻，因而在学术上的造就就比较浅薄，甚至在教学和学术方面完全是门外汉。这样，他们就不可能把党的政策方针和教学学术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拿出比较好的主意和办法。第三，几乎可以说，过去几年对老教师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他们学的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已经过时了。其实，老教师在学术上是有造就的。在办学上许多人是有丰富经验的。

许多教授认为，过去几年，高等学校中重政治、轻业务的现象很严重；重政治当然是应该的，但是轻业务就不对了。因为高等学校是教学和学术研究机关，轻业务就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就不可能提高我国的学术水

平。而且所谓重政治，又认为只有党团员和青年人才可靠，老教师似乎都是思想落后、历史复杂的人，不能在政治上加以信任。这样久而久之，就不仅在党员与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而且老教师在学校中的威望降低了。这不能不影响老教师的积极性。

好几位教授都提到，过去学校党委管的事情多了一些，有党政不分的现象。他们认为，把企业党委制的一套搬到高等学校中来，由党委来领导和监督学校工作是不适当的，在有关教学和学术问题上，应当多听听老教师的意见。

怎样改进领导工作

既然今天高等学校中许多缺点的发生，主要不是因为党委制不好，而是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作风有问题，其中又主要是民主作风不够，因此多数人不主张教授治校。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第一，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等认为，今天高等学校的情况同过去有很大不同，政治思想工作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单纯依靠教授治校，不可能把学校办好。第二，北大副校长周培源认为，今天高等学校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因此有关学校工作的方针任务问题，固然应当征求教授的意见，但最后还是要由国家来决定。回到过去的教授治校有很大困难。第三，北大教授周炳琳等认为，在高等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上，教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从教学工作的数量方面看，年青的讲师助教占的比重更大。因此，不论从搞好当前的教学工作，或者培养干部的角度出发，都不应当忽视他们的意见。第四，在今天的条件下，六分之五的问题已经没有保证，如果再实行教授治校，就更没有保证；而且有许多老教师只喜欢教书，不喜欢过问行政工作。

基于上述几方面的理由，多数人认为提民主办校比较好，而在具体的作法上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把现在的校务委员会加以扩大，主要成员是教授、副教授，同时也吸收讲师、助教和职工参加。凡是有关校务的重大问题，都由它讨论并作出决定，再建议学校行政当局采纳执行。另一种意

见基本同意上述的作法，但是主张校务委员会应成为最高决策机关，它通过的决定，校长必须执行。在校务委员的产生上，有人认为，由于学校不是政权机关，只应由校长聘请有威望、有群众基础的人担任。有人则认为，不仅校务委员，就是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都可用选举办法产生。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长之认为，也可以同时建立教授会。因为扩大校务委员会，固然是发扬民主的方法之一；但是由于参加校务委员会的教授只是少数，教授的意见就不会得到充分的反映。同时学校既可以有学生会，当然也可以有教授会。有了教授会，不但可以充分反映教授对办学的意见，而且教授的地位提高了，教授被尊重的问题也解决了。他说：他建议这样做的目的，不是用教授治校来代替党委制，而是为了帮助党委更好地贯彻执行政策，发扬民主，克服官僚主义。】

——《改进高等学校领导工作的关键何在——记九三学社讨论教授治校和党委制的两次座谈会》，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5月20日

北京政法学院学生章文岳致函钱端升，诉思想困惑。后成为“右派”罪证。

【有个学生叫章文岳，经常在班中发表谬论，钱端升立即接上了火种。章问他党的错误是否可以批评，他立刻答道：“这算什么话，党中央错了，也要反对！”5月20日章致钱一封信，大有“草木篇”之味，把今天的社会说成一团黑，说正直的人会碰得头破血流，受到排挤，甚至被迫致死，而阿谀奉承者却能得到信任。钱在5月22日复章一信，对这种反动言论采取大力支持的态度，叫他“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妄图帮助罗隆基成立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政党 钱端升是政法学界的右派阴谋家》，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20日。

5月21日

钱端升参加北京高等学校负责人座谈会，向高等教育部提出批评和

建议。

【（本报讯）高等教育部在昨天下午邀请了北京部分高等学校院长举行座谈会，请大家针对高等教育部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帮助高等教育部党组织进行整风。

会上，高等教育部杨秀峰部长要求大家毫无顾虑地给高等教育部的领导提意见，特别是对党员负责同志提意见。他恳切地说，高等教育部这次绝不能关起门来整风，一定要大家来批评，要依靠各高等学校帮助我们进行整风。同时，高等教育部要边整风，边解决问题。

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说，我基本上是同意钱伟长教授关于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目标的意见的。一个大学生受了四五年的高等教育，国家究竟把他们培养成怎样的人？这个问题部里应该虚心地研究一下，多吸取老教授的意见。由于各种专业性质不同，教授的方法也是不同的，有的教授是使学生在学校里就打下坚实基础，一出学校，就能独立工作。有的则是让学生在学到一定的东西，将来到工作岗位上锻炼。这种不同的方法究竟哪种好应很好研究。

关于费孝通教授提到在大学中，要恢复政治系和社会系的问题，我认为这两个系有些课可以放在一定的专业里，倒不一定要另成立系，摊子摆多了并不好。对于教科书问题，我认为要放手，大胆出书，减少教师、学生在教学中的困难。

我还建议学校的机关化作风要冲淡些，学校也称什么首长不好。

有些人兼职过多，反而工作做不好，我一人就兼了十四职，有些工作是挂名的，很容易造成脱离群众，养成官僚主义作风。

对于学校工作的安排，依靠非党员的学校负责人等问题，钱端升院长也发表了意见。

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说，我这里不说成绩，光谈缺点。这几年高等教育部领导高等学校进行教学改革工作，缺点究竟在哪里？我认为这几年我们是有目标的盲目性很大。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这总目标我们很清楚，也

是肯定正确的。但是如何达到这目标，教学改革中学习苏联的这条路如何走？我觉得这问题高等教育部和高等学校都不太清楚，而最感盲目的就是这点。一大套学习苏联的东西如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都发到学校里去了，许多教师虽然都拥护学习苏联，但因为在业务上的具体方针步骤不明确，使许多教授都有些意见。我认为在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中，高等教育部依靠老教师不够，对教学业务的研究重视也不够。因此产生了老教师“人心向院”的情况。当然，科学院条件好、设备好，也是造成“人心向院”的一个原因。而等到高等学校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了，老教授才成了宝贝，但旗帜都已插到科学院中去了。因此，我说，作为领导教学改革工作的高等教育部，是缺乏预见性的。

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说，我认为办什么事都有规律，如果连规律还摸不透，事情是办不好的。几年来，高等教育部对怎样办好学校的规律是摸得不够的。一个学校怎样才能办好，怎样就办不好；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部里是不太清楚的。我认为如果部里能及早注意这个问题，还是可以摸出些规律的，至少可以知道什么条件下的学校应怎么办才好。部里虽然也注意交流这方面的经验，但常常是要我们两三个月内就搞出经验，经验怎么可能在两三个月内就搞出来呢？学校没办法，只好上面要什么经验，就汇报什么，其实这个学校的经验不一定适合那个学校，因为各校的条件不一样。部里总想把一个经验在全国统一，这种强求统一有时会出问题。

培养教师是个细致、长期的工作，不能简单对待，但是部里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简单的。每年各校要来一大批助教，其实其中有些助教的质量很低，是不适合做教师的。我认为，要培养师资，就应送质量最好的人来培养，不能好坏搭配，要想把高等教育搞好，不坚持这一条是不行的。记得我在1952年就提过这个问题，并且还算了个账，要求领导上研究高等教育的师资来源问题，但并未引起重视，他们关心的却是数量问题。从一个大学生到一个能独当一面工作的教师，这中间要经过一个长期艰苦的努力过程。目前进修教师很多，但是他们进修得怎样，也没人检查过。我认为，要想把一

个学校办好，就要切实依靠校内有经验的教师，如果教师的来源得不到保证，学校是办不好的。

我认为部里对办一个学校、成立一个实验室的艰难性是体会不深的。例如对依靠老教师办好学校重视不够，学校里的教师常被调动，有些教师调到科学院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有些教师也不知道哪天会调走，结果就造成“人心向院”，不安心于高等学校工作。有些本来很好的研究机构由于人调走了而垮台。

会上，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副院长张席提、北京邮电学院院长助理刘宜伦和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施平等，针对高等教育部的领导作风以及对师资的培养提高工作、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和保证培养人才的任务和条件等，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北京高等学校负责人在座谈会上向高等教育部提出批评和建议》，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举行的常务委员扩大会议，讨论了有关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问题。入选代表团。

【（新华社21日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今天晚上举行了常务委员扩大会议，讨论了有关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问题。

会议由郭沫若主席、陈叔通副主席主持。

会上通过了出席科伦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名单。代表团团长是郭沫若；副团长是包尔汉；团员有：巨赞、朱子奇、刘宁一、汪德昭、吴耀宗、罗隆基、郑森禹、孟鞠如、侯德榜、唐明照、廖承志、钱端升、冀朝鼎。】

——《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我国代表团组成》，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5月22日

钱端升前往机场迎接法国前总理富尔。

【据新华社22日讯：法国前总理富尔和他的夫人今天下午从广州乘飞机到达北京。他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

富尔在机场上对记者说，由于他已离开法国一个时期，还是不要评论摩勒政府辞职的问题为好。

富尔说，这次法国内阁的危机并不是奇怪的事。因为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这种内阁危机是并不罕见的。他本人就经历过两次。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夫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乔冠华，秘书长吴茂荪，北京市副市长乐松生。】

——《法国前总理富尔到京》，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3日。

【钱端升的反动行为在给学生章文岳的信中，表现得最露骨。章文岳是一个有反动思想的学生，他写信给钱端升说：“广大的匈牙利青年，在十月事件英勇地斗争着的人倒是值得同情的。他们是自由和真理的热烈和勇敢的追求者。”信中还说，要烧杀“官僚主义”者。任何有头脑的人看了，一定会闻出这封信的反动气味。但是，作为教育者的钱端升，居然大为欣赏，亲笔复信给章文岳说：“一个人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必要的。此外还要不因感觉委屈而消极或失去正常的态度，要同不合理的事情作斗争。”向谁斗争？不言可知，钱端升是要章文岳和党作斗争，和社会主义事业作斗争。】

——洪文：《“法学家”钱端升原是反党阴谋家》，载《光明日报》1957年7月21日，第3版。

5月29日

出席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座谈会，做了题为《批评三害》的发言。该发言后来成为打为右派的罪证，收录于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的《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编》。

全文如下：

【批评“三害”】

我校肯定有三个主义，通过这次整风能否整好，我看不可能，因为我们的领导机关——国家的政法部门和高教部有严重的问题。一个是严重的宗派主义，一个是严重的教条主义，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如果上边不严格去掉这些毛病，我校孤立的除“三害”是很困难的，例如政法部门使用知识分子方面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大学毕业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高级知识分子更受歧视，积极性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地方的政法部门较负责的非党同志很少。党员总是少数的，工作作好应该依靠大家，政法部门有什么道理把门关得那么紧呢？部队中和外交部门中还有较负责的非党人士，难道政法部门一定要这样紧。我校五四年毕业生去天津的几乎全没搞政法，五五年毕业的稍好，但也有问题。因此希我校整好必须把上边整好。

我校五年来工作有不少改进，但还不够，还有很多不正常现象，我今天着重谈谈宗派主义和与此不可分的工作上的若干重大缺点。

（一）我院成立后的几个阶段

从工作的改进和党群关系、宗派主义的轻重和建校以来分为四个阶段：

1. 筹备、定型阶段：从筹备到戴铮同志离开、武付院长来校。

五二年八月二十日左右开始筹备，那时我曾多方奔走三个上司处（中央政委、华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但问题解决很慢，同时在配备干部时过分地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有四个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来了我院。

当时的教师和学生都不是为了干训，那么在配备新的领导干部时必须能照顾到合作的可能性，不然就等于大体上滞定了四大学来的人。对这点，我也有责任，我的责任就是当时看到了合作上的问题而没有能提出或提出而坚持意见。九月中，戴铮、刘昂等三位同志来校，我有两个星期全力搞筹备，但因参加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不得不放手了，同时也产生了党对我职权尊重不够的情况，这点可以检查一下。此时训练班的型已定下来了，作风以革大的为主。

2. 定型巩固加深阶段：武付院长来校到五四年初，党群关系特别不好。

戴铮同志走和武振声同志来，到五四年初训练班的型更加深刻化，更加巩固，在我是最苦闷的时期与党的负责同志关系不好，曾想法改进而没能作到。在这个时期内我同武振声同志吵了好几次架，互相扣帽子，不谅解。

3. 五四年初到去年知识分子报告前我们关系上有好转。主要原因是五四年决定由干训班改为四年制。其次是刘镜西同志来了，作风较好，同时专家来了对我们帮助很大。

4. 去年春天到现在有更多的好转。去年党委曾作过检查，但我看只能说是初步的检查。

(二) 宗派主义

1. 党内宗派主义太多。

有三方面来的党员（北大等校、革大和华北各地调来的）。在第三批党员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是革大来的，我那时有些敏感，嗅到一些问题，我曾给刘昂、武振声和刘镜西三同志都谈过，党内应该团结。这个问题可以检查。

2. 轻视民主党派、敬而远之。

对民主党派虽没说不合法但发挥作用很不够，而且武振声同志还给民主党派浇过水，王润同志也没给民主党派以重视和帮助，有的同志（如张文林）并说入了民主党派会影响入党，刘昂同志也曾经露过这种口气。

3. 对工会不重视相当突出，此风至今仍未改进。

4. 党的汇报制度和如何对待汇报问题。

汇报制度必须要，但听汇报必须选择，过去听党员和积极分子汇报好像无边无际，如武振声同志常从高连贵处听汇报，我认为很不好，这是对我是否信任的问题，从司机处片面地了解我的情况必然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这个办法很不高明，容易惹是生非。

5. 对老教授的宗派主义。

老教授中除了几个担任行政工作以外，成立了研究组。五二年夏社会上

搞司法改革运动，我院成立后上级也有意要我们搞司法改革，但后来一再反复，费青同志曾建议我们自己搞，但领导不同意，直到全国普选时才正式作罢。在研究组不让老教师搞专业课而叫他们搞“杂业”，这一思想武振声同志较严重，刘昂同志也如此，如张锡彤教授到要离开我校前刘昂同志还要他搞编译组。后来逐渐让他们搞法权史、国家法等，但核心课如民、刑法，民、刑诉还不放手，不但对老教授而且对其他人如杜汝楫、罗典荣、余叔通也情愿放在政治课而不放在四大专业课。五六年夏有较大的好转，这时才允许他们自己选择事业。

到现在是否完全解决问题呢？严景耀同志出国到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回来作了报告，报告后党内立即汇报，并且党委发现这一情况也没有按知识分子政策去纠正，这也是宗派主义的遗风。此时此地而对严景耀同志报告有些反映，是很不正常的，今后应避免不应有的类似的反映，否则教授和我是很不愉快的。

6. 照顾问题。

评工资时按类排队，也很细心，对靠近我们的人照顾比较周到，对不那么靠拢的照顾得就差些。对照顾爱人问题，徐敦璋教授的爱人要出来工作，我和王润同志谈过，考虑把她放在图书馆，但无下文。

人事处的工作整个都带有神秘性，这不对。开始时张苏同志曾对我说，要搞好工作必须抓人事工作。但我抓很困难，武振声、王润同志并未能体会张苏同志指示的精神。我对人事处谈的事往往无下文，对我职权不尊重，这可能王润同志的宗派情绪分不开。有人给我来信说，武振声、刘昂照顾革大的人多而你为什么不照顾四个大学的人？我把这信给武振声同志，武说他接到一封信，意思正相反，但却不把信给我看，我对他推心置腹，而他却不以平等待我。又如林国才的工资问题不合理，他五一年毕业，在五六年大调整以前有两次调整，不但没有提级反而把行政二下一级转为教学二十二级，工资也减少了，我提过意见，但置之不理，去年大调整后比外边可能仍低一点。我认为林国才工作不错，也安心，我虽提意见，但因是我学生而坚持。

又如刘芝莲在大调整前我两次提出提级，而王润、武振声等不同意，刘芝莲四六年大学毕业，四八年到北大，是图书馆领导的得力助手，去年提级我提出加两级以补以前的不足，刘院长同意而党员不同意，意见是说她自高自大，脱离群众，我认为这是乱扣帽子，今天请党检查她有哪些自高自大？这是某些同志严重的宗派主义。

(三) 工作

我认为正规化太慢，我们每人都应该认识原来所定的型是不对头的，革大在解放初那样做是对的，但现在应该整革大遗风。五三年初刘裕中曾提过有革大的经验主义，当时对他这种说法大加批判，由于认为过去不错，因而就可以不学，不懂装懂，保留了拖拖拉拉的游击作风。

(四) 略

(五) 几点建议

对高等教育的特点应该有深刻的认识，这样工作才可以做好。发挥教授的作用，变离心力为向心力。各部门要安定下来，干部在院内的工作岗位也不要时时调动。

对等级森严这一问题应该注意，可能党内对级别更起劲，要尽快的取消等级，行政上减少一些层次更好。

改进领导应该接近下层，接近同学，现在这方面问题严重，下去也不要形式主义的去。

（摘自北京政法学院“整风简讯”第9期，编者略加删节）

——钱端升：《批评三害》，载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资料室编：《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

6月7日

钱端升等北京政法学院师生谈宗派主义。

【（本报讯）据记者采访所悉：北京政法学院的老教师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内心非常苦闷。他们很多人的年龄超过半百，对本专业有几十年的经

验，却被长期安置在“研究组”内，既无教学任务，也没有进行科学研究工作。许多老教师叹息自己不该学政法科学。他们的心情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宗派主义的典型

这次通过“鸣”“放”，在一些座谈会上把问题揭开了。教师们认为，北京政法学院对老教师是刻薄寡恩，对老干部则照顾备至。陈芳芝教授（现已离校）说：“要在北京高等学校挑宗派主义的典型，如果投票的话，我首先选北京政法学院。”她认为北京政法学院的宗派主义已严重到敌我不分的程度，几乎是用国民党的作风来对待旧知识分子，不论什么问题都先横蛮的下个结论说“这是立场问题”，把人吓唬下去。曾炳钧教授也说：这个所谓“立场问题”，往往是歧视甚至敌视人的借口。他举例说，有一次，刘昂教务长（院党委会委员）听说老教师的情绪不好，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他们的情绪是不会好的，如果他们的情绪好了，那我们的立场就有了问题。”于振鹏教授也举出了一个例子。他说，我曾经提过入党问题，刘教务长马上拦住我，说我是资产阶级教授，谈不到这个问题。而且，刘教务长曾经居然认为自己到政法学院来，就像到“白区”一样。把政法学院比作“白区”，使得许多老教授非常痛心。

把老教师看作废物

曾炳钧教授谈到北京政法学院不让老教师开课的事，非常气愤。他说，过去领导上不相信我们，宁可让还不熟悉业务的老干部或学习业务不久的青年教师开课，而不敢或不愿意要我们来开课；宁可让某些老干部或青年教师从课堂上“垮”下去，也不要我们跨上讲台一步。他认为学校安排工作是“乱点鸳鸯谱”，尽叫老教师去打杂。他笑着说：不仅学生填写志愿、选择专业、服从分配，我们做老教师的，学校也一样要我们填几个志愿，选几个专业，最后又得服从分配。他说他自己曾经被指定教财政法（第三志愿），他要求改第一志愿——教国家与法的历史或者国家法，不但没有批准，还开工会小组会来“打通思想”，认为这是“个人主义”，应该批判。结果，他只

好作自我检讨，服从分配。因此，不少的老教师改行到图书馆或翻译室工作，有些人则干脆离开了政法学院。

有的教师指出，即使有的老教师参加了教学辅助工作，也是动辄得咎的，他们举出已经离校的芮沐教授，在研究教材时只说过一句“工人和农民也有矛盾”，就被扣上一顶大帽子，说这是资产阶级在向无产阶级进攻。有一次刘教务长试讲课，副教务长雷洁琼教授说了一句“我们应当使他正规化，这不是搞训练班”的话，刘教务长就当面指实她是否定解放区的一切，是资产阶级思想。青年教师杨鹤皋痛心指出，政法学院从上到下——从领导到学生，都视老教师为废物。领导上还叫对老教授提高警惕，免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袭，叫大家不敢接近老教师。

非党领导不被信任

雷洁琼副教务长说：虽然我是副教务长，但对党的措施不了解，有些工作作了什么也不清楚。如我们培养目标是什么，就没有很好的研究。我也没参加过这样的会议：讨论教学大纲事先也不同我商量，开会时还把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讨论。有些问题，我提了意见就没有下文。又说：过去老教师集中在教研组没有开课，情绪很不好，我劝刘教务长和他们见见面，并且主动地把大家召集起来，而刘教务长一进门就申斥：“干嘛把这些教师都召集起来？分散，分散！”使我感到很害怕，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钱端升院长也指出党员同志不尊重他的职权，他说：曾经有人给我来信，说武院长（前副院长武振声）和刘教务长只照顾老干部，不关心老教师。我把信交给他们看，武院长却说：“我接到一封信，意见正相反。”但不把信拿出来。钱端升院长并说：我对他们推心置腹，而他们却不以平等待我。而且，过去武院长还常从汽车司机（党员）处片面了解我的情况，这很不好，是对我是否信任的问题。

“一棍子打死”的办法

雷洁琼副教务长认为，有些党员领导同志把旧知识分子当作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把老教师们放到一个

孤岛上。她说：“我不否认我们有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但是，这并不等于就是地主和资产阶级。”黄觉非和曾炳钧两教授则认为，过去党员领导同志把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混为一谈，又把从前教政法的教师和旧的司法人员混淆起来，使得老教师顾虑重重，很难发挥作用。结果，使这门科学被窒息住了。现已离校的楼邦彦教授说：过去对政法界的旧知识分子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遭到彻底否定：一是旧知识分子的历史全部被否定，二是政法界的科学知识全部被否定。他说，否定是容易，恢复就难了。他还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并不等于全部的政法科学：老干部不好好学习，只凭自己的斗争经验和老资格来当政法科学家，是很危险的。旧知识分子过去被敌视、怀疑，到什么时候才能被信任，我还不知道。但是旧知识分子，并没有因为遭到上述两种否定而倒下去。这证明他们是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也相信总有一天正确的部分会被承认、被接受，而且他们决心贡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这种精神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北京政法学院教师谈宗派主义 陈芳芝教授认为该院是北京高等学校的宗派主义典型》，见《光明日报》1957年6月7日，第3版。

6月12日

国务院第四十八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新的委员名单，钱端升入选。

【（新华社12日讯）国务院第四十八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新的委员名单。

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3月。这一年来，委员会的工作已有很大变化，原来的组织已不能适应实际工作的要求，因此作了适当调整。委员名额由原来的三十五人增加到一百零六人。名单如下：（按笔划为序）

主任 聂荣臻

副主任 郭沫若、林枫、李四光、黄敬、杨秀峰

委员 丁颖、万毅、于光远、千家驹、尹赞勋、王铮、王涛、邓叔

群、包尔汉、刘春、刘彬、刘澜波、华罗庚、齐燕铭、吴有训、吴学蔭、吴德峰、宋任穷、宋应、李四光、李达、李宗恩、李范一、李斌、李强、李德全、李烛尘、李熏、杜润生、汪道涵、严希纯、严济慈、谷牧、贝时璋、林枫、周光春、周建人、周培源、周扬、周慧明、周鲠生、孟用潜、孟宪承、武衡、竺可桢、范长江、罗常培、金善宝、陈达、陈伯达、陈岱孙、陈望道、陈凤桐、陈赓、侯德榜、柳湜、胡绳、茅以升、茅盾、赵九章、郑昕、郑振铎、夏鼐、涂长望、袁翰青、郭沫若、崔义田、张大煜、张孝骞、张雨帆、张国坚、张劲夫、张德庆、梁希、陶孟和、曾昭抡、童第周、费孝通、冯至、冯仲云、冯宾符、黄文熙、黄汲清、黄松龄、黄家驷、黄敬、杨石先、杨秀峰、杨英杰、杨显东、邹秉文、廖鲁言、裴丽生、潘梓年、翦伯赞、褚应璜、赖其芳、钱三强、钱志道、钱学森、钱信忠、钱伟长、钱端升、薛暮桥、韩光、聂荣臻

秘书长 范长江

副秘书长 李强、武衡、安东、于光远、王顺桐、刘导生】

——《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名单》，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3日。

6月25日

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集中揭露罗隆基的右派真面目，钱端升亦做了发言。

【（本报讯）6月25日举行的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揭露了罗隆基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和行动，揭露了他的所谓“无形的”小集团，会议结束前，罗隆基表示要检查思想，交代同章伯钧的关系；但是他的发言主要是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他甚至还说，把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意图。这激起了大家的极大的反感。萨空了指出：花言巧语，无休止的争辩，是罗隆基几十年来的老办法。闵刚侯、胡愈之要求下次会议首先由罗隆基交代他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活动。

今天会上发言的人，多数同罗隆基在政治上划清了界限；但有些人的立

场还是模糊不清的。

在座谈会以前，举行了民盟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曾通过了关于盟内整风运动的补充指示。根据盟内整风进展的新的情势，会议决定全国各地盟组织可以同时进行整风。在目前阶段，盟内整风的主要内容，是检查和端正盟的各级领导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批判和揭露盟内右派分子的言论行动。

陈鼎文说：

罗说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是腰斩民盟

陈鼎文在发言中说，除少数例外，只要认识或略为知道罗隆基这个人的盟员，几乎都说他是右派。他一贯是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脑子里是资本主义，有时口头上也来点资本主义，于是“右派”这个称呼就在人群中有一口皆碑。

他说，罗隆基反对接受党的领导是一贯的。在1948年，盟的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罗对这一点就表示不同意。罗隆基在解放后到北京，不接受党的领导言论仍未停止。民盟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晗提出：盟的组织应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盟中央是同意的，但是罗隆基不同意，说“这是腰斩民盟”。罗隆基看到盟员中有人入党，犹如芒刺在背，他竟提出要盟内的共产党员都退盟。他的大员之一赵文璧（在森林工业部工作）直到现在仍然执行他的主张，排斥森林工业部支部两位入党的盟员。

他还说，罗隆基在1951—1953年的选举中，曾用陈腐的资产阶级的方式来竞选。罗隆基为了使陈新桂当选，竟不惜到清华大学去请客。罗还拉拢民盟北京市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请我们吃饭，说什么“抓住了北京市，民盟中央就有力量了”。这就是罗隆基的个人政治野心的表现。

费孝通说：

罗隆基认为知识分子和党的距离是思想改造搞出来的

费孝通说，他的有些思想和罗隆基是一致的，有些则不同。他说，罗隆基写发言稿时，老是找他、吴景超、潘光旦一起谈。罗隆基认为“正派”的知识分子是保留着资产阶级思想的那些人，凡是进步的都被他称为“教条主

义者”，他说，邓初民就是“教条主义”最突出的一个。罗隆基最讨厌进步分子，认为他们是“观风色，看气候，扣帽子，打冷拳”的人物。他认为那些思想落后的人是有本事的。他要他们“不必低估自己以往的工作和成绩”，不要“妄自菲薄”，要他们“各凭本事，各显神通”。费孝通说，罗隆基所指的本事实上就是受资产阶级思想所支配的那一套。

费孝通指出，罗隆基这几年来一直讨厌思想改造，说知识分子不喜欢这个名词。罗隆基认为知识分子和党的距离是思想改造运动搞出来的。思想改造和肃反是造成党和非党隔膜的原因，所以他要求党以“国士”对待知识分子，不这样，他们就不肯把力量发挥出来。

费孝通说罗隆基把盟北京市委的“争鸣”刊物夺过来据为己有，企图把这个刊物变成反社会主义的刊物。

潘大逵说：

罗隆基有一个所谓“无形的”组织

潘大逵承认他一向被认为是罗隆基意见的坚决执行者，是罗隆基小宗派中的一分子。他表示要和罗隆基划清界限，坚决跟着共产党走。他说，罗隆基一直用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名利观点来影响他，民盟中央曾经打算调他到北京来工作，当时他很犹豫。这时罗隆基就对他说：你到中央来工作，只是一个普通干部，最多是一个副部长；而在地方上则是一个领导人。这样，他就没有到北京来工作。他说，全国解放以后，罗隆基有一个“无形的”小组织或者小宗派，大约有十个人左右，其中有张东荪、刘王立明、周鲸文、曾昭抡、潘光旦、吴景超、叶笃义、费孝通、范朴斋、张志和等。这些人都是解放后对工作和地位的安排不满意的。他认为，民盟内部实际上有宗派，罗隆基所以不让我来北京工作，就是想让我在四川安个点，用地方的力量来支持他。潘大逵一方面企图说明近两年来这个所谓“无形的”组织已经不存在，另一方面他又承认个别人之间也仍然有往来，他到北京来开会时，罗隆基还是找他谈话。

他说，罗隆基曾经对他说过，民主党派没有什么搞头，但是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罗隆基立即积极起来，同章伯钧一

样主张民盟组织应当大发展，因为今后民主党派大有作为。他说，罗隆基几次责备他，认为民盟四川省的组织发展得太少。罗隆基还对他说过，资产阶级的民主虽然有缺点，但是也还有它的优点；无产阶级专政固然也有优点，但总觉得缺乏一点什么东西。他想拉拢一批大知识分子作他的政治资本，他有当领袖的野心。潘大逵还承认，他和罗隆基都是主张走中间路线的，在昆明时期就曾经搞过一个政纲，主张在政治上学英美，在经济上学苏联，是一个杂凑起来的東西。

彭迪先说：

要求潘大逵进一步交代小集团活动

彭迪先说，潘大逵今天的发言表示要同罗隆基划清界限，就这一点说，是应当表示欢迎的。但是，还有许多问题他没有谈，我们要继续帮助他。

彭迪先不相信在罗隆基当了民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以后，他们的小集团就不存在了。他说，这是奇怪的。为什么在罗隆基的活动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反而没有了小集团呢？他要求潘大逵进一步交代。

他说，罗曾经在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说，共产党来了，有法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时候删去了这句话；但罗隆基确实说过这句话。他对党的敌对情绪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了。

罗隆基在政协会议上常常谈知识分子问题，不是从正面帮助知识分子，加强思想改造，而是讲迎合知识分子落后意识的话，什么“士为知己者死”，“三顾茅庐”。

罗隆基到四川视察，中共省委请他提意见，他当面不谈，带回一批信来，作为成立什么“平反委员会”的根据。作为盟的领导人，这种作法是很不好的。

彭迪先说：潘大逵曾说过，储安平发言，罗隆基看过的，但他为什么不交代？

叶笃义揭发罗隆基解放前后和司徒雷登、国民党之间的暧昧关系

叶笃义揭发了罗隆基一系列的反动言论。他说1936、1937年正是抗日

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罗隆基办天津益世报和北京晨报，他竟然主张：在北方谈反蒋，在南方谈抗日。在北方谈反蒋实际就是帮助日本搞华北特殊化。当时，他还拿日本人的钱在天津搞了一个研究所。1946—1947年时，蒋介石对民盟是一打一拉。蒋介石打的是救国会，拉的是罗隆基、张东荪。拉罗隆基的是雷震。1947年底民盟被迫解散，罗隆基这时住在虹桥疗养院，名为软禁，实际上每月多少两金子的住院费都是由雷震代付的。罗隆基当时行动很自由，可以随便出去看朋友、买东西，但几次拒绝地下党请他到解放区去的约请。济南解放时，罗隆基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谈话，他说，美国买马买错了，如果把给蒋介石的钱的十分之一拿给民盟会要好得多。1948年底，吴晗经上海到解放区，罗隆基托他带信给已在解放区的沈钧儒等，跟党讲条件，要党采取协和外交政策，而不要一边倒，否则民盟将退居为在野党。1949年到北京后，他同张东荪在张宗炳家会见美国驻北京的总领事，罗隆基说司徒雷登曾托他转告周总理如果不一边倒，可以给几十亿美元的援助。他托美国总领事转告司徒雷登，说这话不必转达了。叶笃义说：既然不转达，有什么必要还要请美总领事转告司徒雷登？要转告给司徒雷登的，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内容？1949年底，民盟四中全会检查过去的错误路线，他认为是对他的打击。以后，他组织小宗派，向人说统战部如何对待我们，就看我们有多少本钱。这种说法除了抵抗党的领导而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1952年后，罗隆基和我疏远了，他说有人警告他，说我经常到统战部打小报告，要他提防。叶笃义说，统战部的门是大开的，不需要什么小报告，罗隆基应该说明，警告他的是谁，他为什么要提防？叶笃义还揭露，罗隆基曾告诉文汇报社长徐铸成，要他不要听文汇报党组的话，有事情到北京来反映。罗隆基还在家为文汇报请过几次客，训示文汇报副社长阎宝礼要如何如何做。叶笃义质问罗隆基究竟与文汇报是什么关系？

胡愈之谈到罗隆基的一封信

罗自称一生唯知斗争 他究竟斗争什么向谁斗争

胡愈之在发言中说：最近四川有人来，谈到这样一件事：民盟成都市委

吴汉家揭发：1951年夏，范朴斋带罗隆基的信给他，信上说，要范朴斋去重庆助潘大逵一臂之力。信上还说：“弟一生别无他长，唯知斗争到底而已。”胡愈之说：这句话值得研究，不知他究竟要和谁斗争到底，斗争的目的是什么。

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联合发言：

“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

千家驹、华罗庚和童第周在题为“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的联合发言中说，今年5月中旬，章伯钧、罗隆基没有经过民盟中常会讨论通过，就由少数人决定成立“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四个工作组，其中科学规划小组，指定由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负责。他们说，当时他们的政治警惕性不够，未怀疑其中有任何阴谋活动，就答应了。以后这个小组开过几次会，起草了一个“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而他们因事因病没有完全参加会议，特别是最后由费孝通（他不在五人小组之内）修改过的文件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就送走了。直到光明日报把这个文件发表以后，他们才知道其中有些问题的提法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主要的错误有：要“恢复”和“重视”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而“恢复”和“重视”的话在原稿中是没有的，是有人最后加进去的；强调“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这好像说国家过去对培养新生力量不是一视同仁，或者不是平等地看待似的，这不符合事实；“保护科学家”的提法也不妥当，意思好像是说党和政府不保护科学家，这也不符合事实。

浦熙修替罗隆基辩解

硬说罗隆基和文汇报没有关系

浦熙修在会上为罗隆基辩解，她谈到罗隆基从国外回来后没有和她谈过什么问题。浦熙修硬说罗隆基和文汇报没有关系。但她又承认，只有一次在罗隆基家里请过各民主党派人士吃饭，谈文汇报怎么工作，普遍征求意见。对叶笃义揭发罗隆基不让听文汇报党组的话，有事到北京来反映这件事，浦

熙修为罗隆基作了这样的辩解：她理解罗隆基的意思是说党员水平低，罗隆基知道得更多些。

罗隆基说他如有反社会主义阴谋愿意受国法和盟章的制裁

罗隆基在大家对他揭发批判之后，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说他没经过三反、五反运动。这次运动对民盟有帮助，可以扫除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对国家也有好处。因此他表示诚心诚意欢迎这次运动。他表示要作深刻的反省，他一方面说“我从来没有在民盟内说过我思想进步”，可是他接着又说，就是把他的骨头烧成灰，他也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的企图和阴谋，如果查出，愿意受国法和盟章制裁。

罗隆基说他的确没有看过储安平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他说，不但事先没看，事后也没看，直到这次回国才看到。他说他曾为这事打电话给章伯钧，章伯钧是含糊其词，他认为这个问题章伯钧要负责任。接着，他又说，章伯钧为什么不说不说别人看了储安平的发言稿，而偏要说我？章伯钧这样说，社会上很多人也都相信，这就是我应该检讨的。

罗隆基对他曾提出的“平反委员会”的问题，作了名词上的辩解。他说：我没有用过“平反委员会”这个名词。我说的是由人大常委会、政协、各民主党派共同组织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三个作用，其中有平反作用，领导党也要参加。他又说，这话是错误的，他不否认。据他说，他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对毛主席的指示体会不深刻。

罗隆基说：“最近有些人常常把章罗并提，我不愿意这样，我对自己的言论行动负责。”但他又说，他将交代他和章伯钧的关系。

会上吴景超、吴晗、聂国清、刘清扬、钱端升也作了发言。】

——《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集中揭露罗隆基的右派真面目 罗隆基说要检查自己，但对揭发的重要事实坚决抵赖》，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6日。

6月26日

钱端升遭到曾炳钧、芮沐、陈光中等学生的批判。

——见《在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 钱端升一反常态多方活动为的是什么？北京法学界座谈会上有好些人对他揭发并要他交待清楚》，载《光明日报》1957年6月26日，第3版。

7月3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大会和分组讨论，各地代表追击章罗联盟。钱端升亦遭到批判。

【（新华社3日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上午分组讨论，继续揭发和批判了章伯钧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行。

章伯钧今天在安徽省代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章伯钧承认了和罗隆基的联盟关系，他说：“报上指出的章罗联盟的关系，不是冤枉的。”他说：“我们两人心心相印，从思想到工作结成了联盟。”有的代表认为章伯钧的检讨仍很不老实，很不彻底。

甘肃省代表、民盟甘肃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子恒，今天在小组会上揭发了章伯钧的一些反动言行。杨子恒说，今年有一次他到北京开会，章伯钧曾请他和另外十几个人（杨子恒没有交代是那些人）到家里吃饭，章伯钧对大家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一百几十年以前，资本家剥削工人到了极点，马克思根据那时的情况，创造出马克思主义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有力量的；但它种到人们头脑中的东西是要人们反抗统治者，这种思想对于搞革命、推倒统治者、夺取政权很有用。但是现在已经取得了政权，工人阶级自己成了统治者，以前那一套就过时了，再强调就会引导到对自己的斗争。斯大林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因此社会制度要变一变。”

杨子恒说，章伯钧还恶意地歪曲毛主席的话来宣扬他的“天下要大变”的思想。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章伯钧大叫“看中了”形势的发展，说“天下要变，苏联也要变”。章伯钧说：“毛主席去年提出十条（指十大关系），今年提出十二条（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就是要作更大的转变，而教条主义者眼光短浅，不顾国际国内的客观事实，他们想永

远统治下去。”章伯钧说，其实“波匈事件就是教训”。

今年4月民盟工作会议期间，章伯钧同杨子恒等人谈话中，曾经流露出对国际上的修正主义者十分崇拜的情绪，他还讲了一些诬蔑苏联的话。

章伯钧还曾经说，世界政治还要走上“民主”，他认为“英国的民主生活很值得注意，英国海德公园的民主就很好”。

章伯钧还对杨子恒说：“生活有二个东西，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仅仅叫他穿西服、住高楼、吃西餐，而不叫他独立思考，这就好比西郊公园里的狮子和老虎，吃的虽好，可没有自由。”

杨子恒发言后，甘肃省代表们认为他能够进行揭发是好的，但是还不彻底，希望他作进一步的揭露。

在江苏省代表小组会上，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史良说，章罗联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讲不胜讲。她说，章伯钧对共产党的领导一直是不服的；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章伯钧经常说：“你看，三年之内（有时说“二年之内”或“一年之内”）中国一定要有变化。”

史良说，有一次，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民盟的正副主席都参加了。毛主席讲话时，章罗二人都没记录，会后向盟内传达，他们却添油加醋甚至歪曲事实，他们不谈毛主席讲话中的其他问题，单只强调匈牙利事件、斯大林的错误等方面的问题。史良听了章罗的传达报告后立刻指出：根据她的记录，章罗讲的有些内容，最高国务会议上并没有讲。这件事引起章罗很大不满。

在北京市代表小组会上，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揭发章伯钧、罗隆基的一些反动言行。华罗庚说，罗隆基在北京高等学校进行思想改造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脱裤子割尾巴”的提法颇表不满。他认为不学马列主义就有马列主义，并宣称他自己从不学马列主义却写出有马列主义的文章。当时，章伯钧还带着诬蔑的口气说，马列主义不值得学，学了也只是增加些教条，还不如学学“曾国藩家书”。

广东省代表小组今天要那些同章罗同盟关系密切的人物，出来交代清

楚。代表们特别对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和副秘书长李伯球表示不满，认为他们是最接近章伯钧的人，但是在揭露章罗阴谋的斗争中，他们的态度却十分暧昧。李伯球今天只谈了章伯钧怎样以帮助共产党整风为名，在北京市组织二十一次座谈会等别人已经谈过的一些情况。至于他自己怎样，并没有谈出具体事实，只是作出结论说，他自己是“深入堡垒，和平共居，失去警惕，陷于重围”。有的代表说，李伯球一方面以左派自居，说章伯钧如何排挤他，可是一方面又接受章伯钧的指使，在北京到处点火，大肆活动；并对执行章伯钧“组织大发展”的指示特别热心，亲自出马请客拉人。有的代表说，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李伯球常常请假，说是要去帮助章伯钧交代，可是到今天并没有帮助出什么东西来。代表们要求李伯球不要避开实质问题，那样对自己并无好处。上海市代表小组今天对这个组的代表杨逸棠、林汉达、钱端升三人的一些错误言行进行了批判。杨逸棠在今天的发言中，只是把报上早已揭露过的章伯钧的一些材料重复了一遍，丝毫没有交代他和章伯钧的关系以及章罗联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杨逸棠的发言引起代表们极大不满。胡愈之指出，章罗联盟是企图倚靠两个党派、两个报纸，而农工民主党是章伯钧完全可以控制的，杨逸棠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的组织部副部长应该交代章伯钧怎样叫他发展组织、招兵买马的情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大会和分组讨论，各地代表追击章罗联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7月4日

首都法学界反击右派分子。

【从二十一日起，接连几次大会上，又揭发了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是个右派分子，他有很多反党阴谋，其中如北京政法学院讲师陈光中所说的，钱端升曾透露过他口袋里有两个“大法学院”方案，其目的都是为了反掉党的领导，想达到推翻现有的政法院系，由右派分子自己另搞一套。其间楼邦彦在会上承认他是钱端升的袋中人，但不讲具体事实，想作假检讨以蒙

混过关，引起大家更加不满。经会上很多人提出意见，再次督促钱端升来参加会，作彻底交代，钱端升才在7月4日的会上作了“支支吾吾”的发言，大家更加愤怒，要求他交代与章罗联盟的关系。】

——《首都法学界反击右派分子》，载《政法研究》1957年第4期。

7月8日

钱端升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做了检讨。

【据新华社8日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上午继续分组讨论。

许多小组在讨论中驳斥了右派分子的各种谬论；有些代表小组讨论了这次会议的各项报告，对于政府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罗隆基小集团成员之一的潘大逵今天在四川省代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揭发了罗隆基企图用他所希望的“亲美的中间路线”，来反对中国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潘大逵具体谈了罗隆基所说的无形组织进行活动的方式。他说：“宗派阴谋现在肯定是有，不过形式改变了，由集中变成分散。他们的阴谋目的就是想利用知识分子作为与党分庭抗礼的本钱。而方法就是歪曲传达，利用他们的地位散布似是而非的消息，这样，小集团中的人接受了指示，回到地方就按照他们的指示进行工作。”潘大逵说：“我就是参加了他们这样性质的宗派和阴谋活动的一人，并且我在四川也就响应了他们的主张，执行了他们的意见。”

江苏省代表小组今天继续批判储安平、费孝通和钱伟长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陈忠经要储、费、钱三人严重注意，应抓紧时机勇敢地与昨天的同盟者一刀两断，揭露他们。储安平、费孝通和钱伟长都说，他们明天将在小组会上发言，交代具体的新的东西。

在上海代表小组，杨逸棠、钱端升、林汉达今天都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杨逸棠初步改变了他前几天含含糊糊不愿具体交代的情况，揭露了章伯钧一贯招摇撞骗进行政治投机活动的丑恶历史。在谈到章伯钧最近一年来阴

谋扩张势力，到处“招兵买马”的情况时，杨逸棠说，1956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章伯钧的劲头可大了，他说农工民主党在几年内要发展几十万党员。他要全国各省、各重要城市都建立组织，一直发展到县城地方。为配合组织大发展，章伯钧一方面想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成立干部部，一方面决定出版前进报半月刊，还要办一个学术性的刊物，定名为“中华论坛”，他自己来做总编辑。他准备请张申府、何仲珉等当这个刊物的编辑，并要农工民主党编制内为“中华论坛”留下五个名额。杨逸棠说，今年3月间农工民主党开全国工作会议时，章伯钧大声疾呼说：“现在是组织独立、政治自由，我们自己当家作主了！”杨逸棠还说，章伯钧自己说过：“有团体而后有力量，有力量而后取得权力，就是出卖也值钱些。”杨逸棠说，显然，章伯钧想把农工民主党出卖给资本主义。

谭惕吾今天在湖南省代表小组会上证实，黄绍竑曾把司法工作中错判案件和广西平乐专区饿死人的案件在政府没有公布的时候，就暗暗告诉了右派分子林希翎。黄绍竑还让林希翎到他家去看案卷。谭惕吾说，黄绍竑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叫一个与常委职务无关的人去看国家案卷，是企图挑拨青年反对党、反对政府。谭惕吾还证实了黄绍竑的其他的一些反动言行。她说，黄绍竑在视察浙江、上海的司法工作之后，认为司法工作异常黑暗，并认为他自己替反革命分子翻案卷、提讯反革命分子和到反革命分子家里了解情况，是替他们作了很多“好事”。谭惕吾还说，黄绍竑和罗隆基、黄琪翔关系暧昧。黄琪翔和黄绍竑来往很密切。湖南省许多代表对谭惕吾今天所采取的态度表示欢迎，并希望她继续交代。

陕西、新疆等代表小组在今天的小组讨论中，继续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广西、甘肃等代表小组讨论了乌兰夫副总理所作关于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报告。两个组的各族代表一致同意国务院关于建立这两个自治区向这次大会提出的提案。来北京汇报广西各界讨论僮族自治区情况的广西代表团，今天派副团长、政协广西省委员会副主席林虎列席了广西

代表小组的小组会。据林虎报告，目前广西省七十五个市县中，已有七十四个市县召开过人民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都热烈拥护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他们希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速批准这项提案，并开始建区的具体筹备工作。

辽宁、甘肃、河北、福建等代表小组，今天上午就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问题进行了讨论。】

——《赶快与右派同盟者一刀两断！潘大逵、杨逸棠初步改变含含糊糊不愿具体交代的态度 谭惕吾证实黄绍竑挑拨青年反对党和政府的反动言行》，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9日。

7月16日

章伯钧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向人民低头认罪》见报，提及钱端升。

——见章伯钧：《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向人民低头认罪》，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7月18日

芮沐发表文章《反动旧法学的“魂”招得回来吗？》，批判钱端升。

——见芮沐：《反动旧法学的“魂”招得回来吗？》，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

马哲民的检讨见报，提及钱端升。

——见马哲民：《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要重新做人》，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

7月20日

连日来，钱端升遭到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和北京政法学院师生批判。

【（本报讯）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和北京政法学院师生连日来举行集会，

对右派分子钱端升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钱端升是北京政法学院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在整风前后，他和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语言和行动相一致，在政法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挑拨煽惑活动，阴谋篡夺党对政法工作和政法教育的领导权，改变法制工作和政法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其走上资产阶级的老路。

早已怀有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鬼胎

北京政法学院的师生们揭露，钱端升早在整风以前就隐蔽地进行了反党活动。徐敦璋教授说，钱端升早已怀有鬼胎。在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钱端升就与罗隆基共同具名邀请各大学的盟员在文化俱乐部吃饭和座谈老知识分子的安排问题。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在大家的批判和质问下，钱端升承认：“罗隆基以知识分子的大好老自居。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出来以后，他建议成立知识分子问题小组，摸摸知识分子的情况，乘机成立知识分子政党，以便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罗隆基说他对政法界知识分子不熟悉，要我找一些有问题、有情绪的人在一起谈谈，我就开了一个名单。”他说，这正是用的费孝通所建议的串连办法。

自此以后，钱端升也就在如何拉拢知识分子同党对抗上大做起文章来了。中共“八大”以后，他忽然对学校工作感到兴趣了，抛开学校党委准备好的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不顾，自己召开了一系列的教职员工座谈会，要大家只讲缺点，不讲成绩。曾被钱端升“拉拢和利用”过的周仁说：“钱端升召开这些座谈会的目的，在于另搞一套，与党对抗；并通过鼓励大家对学校的缺点提意见来证明学校的工作是一团糟，也可借此对教员进行拉拢。”

钱端升是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北京政法学院民盟区分部主委，平常对盟的工作很不关心，这时也忽然积极起来了。民盟盟员刘裕中说：“今年2月，钱端升突然一股劲儿要开会，讨论为什么民盟这几年发展得这样慢，起的作用不大。他急于要在高级知识分子里发展盟员。”民盟组织委员于振鹏揭露，他之所以这样积极，是想把民盟组织当作自己对抗党的领导的政治资本。自称为钱端升“口袋中的人”的楼邦彦也说：钱端升早就想把政法学院的九三

学社、民主促进会和民主同盟合并起来，成立一个大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相对抗。

四处点火，公开煽动，个别拉拢

整风开始后，钱端升就四处点火，公开煽动，个别拉拢，企图造成舆论，使天下大乱。

讲师杜汝楫在肃反中因有严重的错误思想受到了批判，钱端升以为有机可乘，就对他进行挑拨，杜汝楫表示不愿谈这个问题，钱端升便别有用心地说：“肃反是搞反革命，思想批判超过了范围。”杜汝楫问到评学衔的问题，他又借机挑拨说：“党的领导方面不给你评，后来我坚持才评了，不是我替你说话，你连书也教不成了。”

有个学生叫章文岳，经常在班中发表谬论，钱端升立即接上了火种。章问他党的错误是否可以批评，他立刻答道：“这算什么话，党中央错了，也要反对！”5月20日章致钱一封信，大有“草木篇”之味，把今天的社会说成一团黑，说正直的人会碰得头破血流，受到排挤，甚至被迫致死，而阿谀奉承者却能得到信任。钱在5月22日复章一信，对这种反动言论采取大力支持的态度，叫他“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整风开始后，右派分子在学校散布谎言，说在分配毕业生时，党员都分配作审判员，非党员只能作书记员，这引起了部分学生的思想混乱。钱端升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来拨弄是非，企图鼓动学生闹事。他始而在座谈会上说：“政法部门在使用知识分子方面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大学毕业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校1954年毕业生去天津的几乎全没搞政法工作。”继而在电影晚会上向学生们说：“政法学院毕业生应该当审判员，但是当年把书记员也可以，不过当书记员太长时间不合理。现在整个司法界宗派主义非常严重，工农干部压知识分子，老干部压新干部。你们这次如果不把‘三害’反掉，将来可能当一辈子书记员。”

在师生们的批判和质问之下，钱端升对自己制造的一些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他说杜汝楫是胡说八道。杜反问他：“那你说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呢？”他

答不上来。他说复章文岳的信是针对另一封信写的。章文岳说他只给钱端升写过一封信。钱端升忙又改口说他没看信的内容就写了回信。关于毕业生的分配问题，有人对1954年分配到天津去的十六个人具体算了账：计到市公安局、司法行政部门、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做政法工作的有十二人，非党团员占多数，只有四人因其他原因做了别的工作。这怎么能说“几乎全没有搞政法工作”呢？事实一点也不容抵赖了，钱端升才不得不承认他是“无耻地捏造事实，有意污蔑党的领导，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

挑拨党群关系，硬把党员分成宗派

在政法学会座谈会的预备会上，钱端升与储安平“党天下”遥相呼应，指责“政法机关有严重的‘宗派主义’”，“较负责的非党同志很少”，“变成清一色”，因而大声疾呼“现在要开放”，让旧法人员“上台”当“头儿”。在学校的座谈会上，钱端升说，政法学院不可能整掉三个主义，因为学校的领导机关——国家的政法部门和教育部有严重的问题，一个是严重的宗派主义，一个是严重的教条主义。如果上边不严格去掉这些毛病，我校孤立地除“三害”是很困难的。许多人在发言中驳斥他说，钱端升这些耸人听闻的言论，就是要在政法部门打开一个缺口，让旧法人员“上台”，以篡夺党对政法部门的领导权。

在学校工会代表大会上，钱端升竟然声称：“高等学校中的工会如何接受党的领导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提法。”又说：“工会应关心群众的生活、思想，支持群众正确的意见。例如，我院有一个会员，自从来政法学院以来一直要求入党，但未得解决，这时工会应该起公断作用，客观公平地对党提意见。”师生们愤慨地责问道：“作为北京市教育工会主席的钱端升，为什么要散播这种极端错误的言论呢？这是他有意识地想把工会拉出去，离开党的领导。所谓‘工会应起公断作用’，更是想把工会放在党之上，而不是要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钱端升为了排挤党对学校的领导，一面在整风以前邀请人民代表来校视察，透露“党委制在学校行不通”的意思，在整风开始后又公开如此主张；

一面硬把党员分成派系，破坏党的团结。他在教授座谈会发言中说：“党内宗派主义太多。有三方面来的党员，在第三批党员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是革大来的。”以后又说：“来自革大的党员成为我们学校的一个核心，四个大学的党员，像余叔通等都受到排挤，群众更不用说了。”而且无中生有地加上一句：“市委有决心在整风中打散革大的核心。”戴克光教授揭露了他散布这些话的恶毒用意：“他把我校党员分成三类，并说他们的矛盾很厉害，要知识分子党员吐苦水，其实就是要把知识分子党员从党内拉出来。”

许多人在发言中指出，钱端升对党向来是要两面手法的：表面恭维，背地骂娘。他在政法学界座谈会的预备会上，主张党要向旧法人员“开放”，对于党没有吸收他以及楼邦彦、于振鹏等入党愤愤不平，装出替老知识分子说话的悲天悯人的样子。而正是这个于振鹏，在政法学界的座谈会上，透了钱端升的底。于振鹏说：“钱端升从来没谈过党和党员的好处，对缺点则谈的很多。”政法学院的另一个盟员揭露，钱端升在盟支部会上，提出要盟员经常了解学校中党员负责干部的缺点，并把所搜集到的缺点直接报告盟市委和盟中央。有人主张应将了解的情况和院党委共同商量研究，他疾言厉色地说：“我知道有些人想入党，不愿得罪院党委。”

打算推翻原来的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

在政法教育方面，钱端升自有一套方案计划。政法学院陈光中，北大教授芮沐、龚祥瑞等揭露，钱端升对院系调整是十分不满意的，当时为了抗拒院系调整方针的贯彻，他曾在清华大学和曾昭抡、钱伟长开会共商对策，又在楼邦彦家里召集一些教授密议如何抗拒。事后他主张打乱院系调整后的新院系，来个“院系再调整”，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课程改革，来个“二次彻底改革”。

钱端升在他的“检讨”里，矢口否认他有过这样的主张。但是，龚祥瑞教授在几次发言中证实说：“我三次耳闻‘院系再调整’的消息。”龚祥瑞在详细说明三次听到的时间、地点和在场的人后，又说：“可以说有三个方案：一是将人大法律系归并到北大法律系，搞一个法学院；二是将人大、北大法律系归并到政法学院，成立法学院；三是将人大、北大法律

系加上中央政法干校，归并到政法学院，成立为北大的大法学院，钱先生当副校长兼法学院院长。整个方案的实质就是推翻原来的院系改革，重搞一个院系改革。”

欺世盗名的学者——政法学界的右派阴谋家

钱端升自诩为“政法界的凤毛麟角”之士，但他到底是怎样一个学者呢？国务院参事李祖荫说：“钱端升是靠他和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起家的，而这本书不过是‘掠夺式’的作品罢了。”钱端升对人夸耀他手下有“三大将”、“三剑客”——他的学生、北大教授龚祥瑞和王铁崖，以及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自三反以来就认清了钱端升阴险面目的龚祥瑞，在谈到钱端升的学问时说：“《比较宪法》是王世杰著的，并不是钱端升著的。”还必须指出，《比较宪法》也不是王世杰的创作，而是法国人爱斯曼著作的翻版。钱的其他著作如《法国的政府》等是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写出来的，并非出于好学。《民国政制史》是他组织人写的。钱端升的学术高不高？他的门徒对外推崇他，但背后却将他骂得一文不值。如楼邦彦说钱端升是空疏的形式叙述，毫无己见；王铁崖说钱端升笨，食而不化。龚祥瑞又说：“钱端升不是学者，向来是个披着学者外衣的政客。”

戴克光、龚祥瑞、芮沐等教授还指出，钱端升之所以站在右派反党立场上，从他的历史上和思想根源上看，是毫不奇怪的。

他们指出，钱端升1924年留美回国后，就参加了当时垄断政法教育的王世杰的学阀集团，把持北大、清华、武汉大学等校的政法院系，并在王世杰办的《现代评论》上散播反共反人民的言论，说什么“在中国只有国民党能存在”，“共产党更是显而易见的敌人”。抗战前后，钱端升很想做官，王世杰便先后推荐他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和驻澳公使，但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于是他又办了《今日评论》，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大叫“红军及其边区政府应取消其特殊组织”，以便“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制”。1948年，钱端升到美国讲学，他还打电报和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联系筹办《新路》杂志，并要楼邦彦代他出任编辑，宣传反动的中间路线。解放前夕，钱

端升由美国回到北京，党和人民不念旧嫌，对他非常信任，但他并未认真改造自己，仍同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等勾勾搭搭，伺机进行反动活动。

钱端升自己在政法学会座谈会上谈到他与罗隆基的联系时说：“罗隆基和我同是清华毕业，留美。在清华时认得他。在重庆国民党参政会时期我同他过往较频。到了解放，在华北人民政府时期，据说罗考虑设一机构，有他也有我。现在追想，显然是在拉拢我。”

谈到同章伯钧的关系时，钱端升说：“章经常说民盟重视高级知识分子，某些高级知识分子应当连升三级，如钱端升就是。”由于受到章伯钧的青睐，钱端升果然在1952年加入民盟后，很快就升为中央常务委员。钱端升又说：“今年3月12日，章伯钧邀请我和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等人吃饭，说民盟是政治组织，要对国家大事加以讨论。我对他很佩服，感到他抓住了形势。这次还谈了两院制的问题。”钱端升说：“我被他们抓住，他们认为我是他们的小集团的一个成员。”但钱端升又一再申辩他“在组织上未参加章罗联盟”，只是“思想上有共同的倾向”，“有野心也没章罗那么大”。

可是，国务院参事李祖荫在政法界座谈会上质问钱端升道：“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杨清源告诉我，章伯钧自己说他请钱端升吃饭时，同钱端升详细商量过‘政治设计院’和‘两院制’的问题。你们是如何策划于密室的？”马哲民也在人大小组会上说：“钱端升是章伯钧在国家制度方面的顾问。”据费孝通揭露，在6月2日，正是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钱端升向费表示：“我反正跟着罗副主席走。”7月2日，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市主委吴晗到北京政法学院作报告，也说钱端升是罗隆基的“无形小组”和“策划于密室”中的人物。】

——《妄图帮助罗隆基成立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政党 钱端升是政法学界的右派阴谋家》，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20日。

7月21日

《光明日报》记者洪文批判钱端升的文章在该报见报。

——见洪文：《“法学家”钱端升原是反党阴谋家》，载《光明日报》1957年7月21日，第3版。

7月18-19日

徐铸成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揭露罗隆基、钱端升勾结他的事实。

——见《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 浦熙修徐铸成继续吐露罗隆基的阴谋活动》，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20日。

7月24日

汪子嵩发表文章《谁是“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者？》，提及钱端升。

——见汪子嵩：《谁是“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者？》，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24日。

7月30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顺便批判钱端升。

——见《揭穿右派分子在高等学校点火的阴谋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30日。

8月4日

钱端升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发言中承认解放后和美国特务“还有信件来往”。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大会讨论又进行了四天，在六百余人民代表声势浩大的反击下，一些右派分子开始向人民认罪。

几天的会议中，代表们继续揭露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

进攻的罪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白文华指出：“右派分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分嫉妒，十分不甘心，他们公开叫嚣要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且以民主党派的名义鬼鬼祟祟在驻京部队里发展组织和进行活动。他们并利用《戏剧报》、《文艺报》煽动部队文艺工作者，反对军队的党和政治机关对军队文艺工作的领导，想在文艺部门打开一个向军队进攻的缺口。”白文华指出：“这个罪恶活动总牵线人是章伯钧、罗隆基、黄绍竑、谭惕吾、李健生等。”

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燕京神学院院务主席王梓仲，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陈文渭，中华基督教会鼓楼西堂牧师殷继增三位代表的联合发言揭露了右派分子在宗教界的阴谋活动。他们指出：“章罗联盟亲信陈新桂利用北京基督教刊物《田家》大肆渲染宗教政策贯彻不好，煽动农村中的基督教徒对共产党的不满。陈新桂等右派分子还公开污蔑基督教内进步分子是筑墙的罪人。三位代表指出右派分子的目的就是妄想破坏基督教徒同全国人民爱国大团结，破坏基督徒的三自爱国运动。”

国务院法制局顾问王之相、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副主任劳君展在发言中指出：“九三学社反右派斗争已进行了一个多月，但是基层组织里真正行动起来的很少，主要原因是社的领导层中有右派分子，严重的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占着优势。他们并指责了由于前一个时期社的领导方面片面强调发展组织，并准备在1957年底将全国社员发展到一万到一万五千人，因而在发展上强调数量忽视质量，使九三学社成了培育反动政治资本的土壤。”

对于已经被揭发的右派分子，代表们也乘胜追击，要右派分子彻底向人民交代。在这样形势下，一些右派分子开始向人民认罪。薛愚在检讨中承认他想逐步篡夺党在药学上的领导权。承认他在一面搞学术活动，一面在搞社会活动，以增加自己资本。钱端升也承认自己是打着“学者”招牌的政治野心家，承认他的行动是接受章罗联盟的领导，承认他和披着“中国近代史学专家”外衣的美国特务费正清从1937年起就有密切联系，在解放后还有信件来往。不过他对自己反动活动还没有深刻检讨。但是还有一些右派分子仍

想顽抗。一向拒绝交代反动言行、谩骂人民代表的右派分子谭惕吾，在检讨时还极不老实。她说她和林希翎的关系的错误在于“自由主义”，她竟表示要和黄绍竑“划清界限”。代表们对她拒不交代自己罪行的态度，表示极大的愤恨。在她发言时，大会主席团收到了九十张抗议她检讨的条子，要她低头认罪，不要自绝于人民。

在这几天的发言中，代表们强调今后知识分子加紧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梅兰芳说：“由于过去旧社会的影响，我们戏曲界同行往往醉心于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和个人名利，受了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的侵蚀。解放以来，我们同行虽然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但总没有更直接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加以对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在政治锻炼和学习上自觉的努力还不够，往往对自己的进步估计过高，有人甚至以为自己已是‘工人阶级的化身’了。实际上本身的旧思想、旧意识并没有很好地改造，因而对新社会的新制度、新生活经常感到不习惯，有的还存在严重的抵触情绪，一旦碰上政治斗争大风暴，就很容易露出马脚，摇摆不定，甚至同右派分子一拍即合，被拖入泥坑。”梅兰芳希望戏曲界同仁们不再因循迟缓，加紧对旧思想旧意识的改造，展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

会议将继续举行。】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继续大会发言 揭露右派向解放军进攻的阴谋 钱端升承认解放后和美国特务“还有信件来往”》，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4日。

8月6日

钱端升自我检讨文章《我的罪行》见报。

【我的罪行

（北京政法学院院长 钱端升）

解放以前，我有过长期的反共反苏、拥护国民党反动派、亲美崇美的罪

恶活动。解放后，党和人民不念旧恶，给我以很大的信任和很重要的工作，原希望我能够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但是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上，心怀不满，不忠于党、不忠于人民。解放初期还和留京的美国特务记者见面多次，1949年和1950年还和美国特务教授费正清等通信。最近我更趁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妄图在政法学院削弱、摆脱党的领导，使政法学院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并且诋毁政法部门和高教部门的党所领导的工作，企图从而削弱党对政法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领导。我是罪人，我的罪行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性。我谨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全市人民和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接受章罗联盟领导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

章罗联盟是一个右派分子的罪恶集团。章伯钧是我所瞧不起的马路政客，但从我入盟以后，章恭维我是大知识分子，是高教界的重要人物，并说我在盟内应该连升三级。尽管他没有同我谈过他企图破坏我们国家基本制度的所谓“政治设计院”这一阴谋，可是我和章伯钧在政治上没有发生过争论。3月12日当章说盟今后应多讨论国家大事时，我还表示过赞赏。他谈到我们政协起上院的作用时，我还以为他很有见地。

罗隆基和我受过相同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昆明时早就有过频繁的往来。

1955年4月他要我联名在文化俱乐部请理工文法的大学教授（从前我说是政法方面未上课的教授，因为是临时答复质问，记忆上有了错误）座谈学习苏联、教研条件、工作安排、新老关系等问题时，我也欣然同意。

自章罗抓知识分子问题以来，由于我自己有罪恶思想，妄以为章罗的领导（这领导实际上是阴谋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接受了章罗在盟内的领导。这样使我愈陷愈深地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也越来越走上章罗联盟的道路。由于我和章罗联盟思想上的共鸣，客观上就产生了行动上的配合。

在政法学院开始了罪恶活动，多方面破坏党的领导

由于对政法学院的党有严重的不满和对立，我就在政法学院和政法方面

进行了反党的罪恶活动。

章罗联盟自封为大知识分子的领导者，他们包藏祸心，首先企图在高等学校中赶走党。由于我自己也有反党的罪恶思想，所以听到了他们的假传达后，便信以为真，便以为有机可乘。整风一开始，我就公然提出学校可以不要党委来领导。由以我为首的校务委员会一类机构来领导。

为了最后达到削弱政法学院党的领导和提高我自己的地位，满足我自己的野心的肮脏目的，我进行了一系列的罪恶活动。我企图破坏政法学院党组织坚强的团结，说党内“宗派主义太多，有三方面来的党员，处于领导地位的是革大来的，现在应该整革大遗风”，妄图实现使党内部闹不团结和削弱党的阴谋。

汇报制度、档案、鉴定都是党的人事制度。我诬蔑这些制度，说汇报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因此关于学生的档案和鉴定也成了问题。

为了削弱党的领导，我又寻找对党不满的对象，进行挑拨、离间和煽动。我看中老教授和老的司法人员，恶毒地说他们受到歧视。我对青年教师也同样进行挑拨，说他们不受重视。更突出的是，我利用政法学院讲师杜汝辑对肃反的不满情绪，示意他在整风中“大鸣大放”大闹特闹。

在我院的毕业生中，有些人对工作分配是有不满的情绪的。针对这一情况，我捏造事实，说1954年分配到天津的毕业生除一人外，都没有分配到政法部门；而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是在政法部门工作，而且我是知道这个事实的。

在整风初期，我在学生中进行的破坏活动，最突出的是我鼓动一个一贯对党不满的学生章文岳向党进攻。章写给我一封充满了反动内容的信。我支持了他对班领导以至于党组织的狂妄攻击。我还肆无忌惮地给了他一封回信，要他坚持反动的立场，向党进攻。

要破坏党的威信，从而达到削弱、摆脱党的领导阴谋，单枪匹马是不行的。我于是寻找助手。除了煽动、拉拢个别的人进行反党活动外，我还企图利用学校民盟和工会组织来作我的助手。我强调民盟和工会要对党进行监

督，实际上就是要盟员和工会会员寻找工作上的缺点来作为攻击党的根据。我还要求发展盟员，企图使盟有力量来和党分庭抗礼。此外，我还长期地、明确地有着这样一个和党闹对立的思想，我企图通过盟员来了解各有关单位的工作情况。这个思想自1952年起就存在着，也充分说明在这一点上我的反党思想也是长期存在的。

要最后把政法学院变成我的独立王国，也不仅仅为了大权独揽，而是有把政法学院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企图的。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政法学院建立起来了，随后就有了新的培养目标和新的教育方针。这几年来，年幼的政法学院，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办学的思想根深蒂固、经常作祟，我也只接受了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形式，而拒绝接受其精神实质。我对于早期的二年制和对于当时对青年学生所进行的必要的和正确的思想改造的教育，总是格格不入，不以为然。我仍然迷恋于较长期的和所谓“正轨”的教育，而实则就是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

关于大法学院的各种方案，我没有谈过，在回国以前也没有听人谈过。但我的确是企图拉些原来教过政法课程的人到政法学院来担任教学工作的。如楼邦彦，也同他谈过几次；复旦大学的张企泰，我虽没有同他谈过，心中也希望他能来；尚在德国的陈育凤，我也希望他来。这几个人都是我从前的学生。这些人我都希望他们自己会要求回国，要求来院，这样就可以掩盖我的拉人的意图。因为我知道明目张胆地拉人是会露马脚的。这种愿意为我的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学校服务的人来得多了，资本主义学校的复辟也必然成为唯一可能的结果。

我诬蔑政法部门有严重的宗派主义，诬蔑高教部门有严重的教条主义，也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使我在心目中的学校的毕业生能够很容易有工作。我于是在批评宗派主义的幌子下，诬蔑政法部门的“清一色”，妄图使政法部门对干部不再强调政治条件。这样，复辟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政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也自然可以有工作了。政法部门充满了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们之后，也必然会走向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制的反动道路。

我是一个披着“学者”外衣的政治野心家，长期以来，企图利用“教授”的好名称，来满足我的政治欲望，企图把学校作为地盘而增加我的政治资本。政治野心家的野心总是得寸进尺，总是没有止境的。尽管我在整风初期乱鸣乱放、大放毒素时，我还不自觉地意识到有这样大的政治野心，但政治野心是水涨船高的，野心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我有篡夺政法学院领导权的野心，更从而发展到具有篡夺政法部门的领导权的野心，也是客观的发展规律。我的罪恶活动的危害性，今天我认识到了，要远比我在作出罪恶活动时严重得多。我真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同美国特务结成“亲密朋友”，在解放以后仍有密切联系

我还和披着“教授外衣”的美国特务费正清有过长期的关系。自1937年起，我到美国必去访问他。在1947年冬到1948年冬，我到了现在看来是敌国的哈佛大学。当时我就住在他家中。这还不够，解放后，在1949年和1950年，为了促成我用英文写的一本关于旧中国政府的书出版，并为了要他代购一些书籍和代领应退的一部分所得税，我去过二十封信，他来过十八封信。信中还讲到许多爱国的中国人所绝不会讲的话。1949年3月9日去信有这样一段：“作为一个要求合乎时代的中国人，我诚意地钦佩新秩序的缔造者，尽管我本人可以遭受一些不方便和不谅解，而且在今后还会遭受。”9月6日去信有这样一段：“我的在贝克莱（加州大学所在地）和伦敦的中国朋友告诉我说，他们知道一些关于我的广为流传的信，我想这一定是指我给你的信。请将此信留给你自己（就是不要流传之意），因为，有时可以有复杂的事情发生。”这件事他于10月4日来信也承认了。我在1950年6月30日的去信中介绍了国家经济好转情况。写这些信，不但是敌我不分，丧失了民族的立场，而且使敌人可从中取得情报，从而加以渲染曲解，以达到诬蔑我们党、我们人民的企图。祖国是已经解放了，但我仍然保持着极端顽固的买办思想，而且在批判白皮书的学习之后还继续保持下去。不但不值一文钱而且对人民有害的书偏要出版，不义之财仍然要取回。我犯了极其严重的罪行，而且一直没有交代，更是罪加一等。

费正清披着“中国近代史专家”的外衣，长期为美国国务院服务，抗战期内更往来于中美两国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有意识地为美国帝国主义培养一批白皮书中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而我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我早年留学于美国，自1937-1948年，十一年中去过四次，第一次是跟胡适去的，目的是要求美国帝国主义为蒋介石反动派打气。第二、第三次是去出席美国反动的太平洋学会。第四次是卖身投靠式的教书。在此期间，我成了费正清的亲密朋友。他又把美国在华的不少官员和记者介绍给我。在官员中，在昆明做过领事的石博思和我往来频繁。由于费正清和石博思的介绍，我认识了十来个在美国或在中国的美国记者，而这些记者在大战期中又往往是美新处和战略情报局的人员。美国的所谓“教授”在大战期中也有不少人搞情报工作的。我记得昆明美新处的负责人最早就是一个叫作柏克的记者。

我是1948年12月初回到北京的。解放前后，在京原美国记者同我有过接触的有：赖文霍德之妻、斯蒂耳、巴乃德、柏克、赖盎斯（女）等人。赖文霍德夫妇是我1947-1948年在美国时由于费正清的介绍而认识的。赖服务于克简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印发一种有关国际事务的定期通讯，也当然是一个特务机关。其妻在我回京的次日即去了上海。斯蒂耳是所谓老牌“名记者”，首次是在昆明蒋梦麟家见面，以后陆续见过几次，解放前即已离京。巴乃德也是上述克简基金会的访员，是回京后由赖文霍德之妻介绍而认识的。柏克即上述昆明美新处的最先负责人，是我在纽约时在我爱人的哥哥陈公与的妻子（英人，美籍）处认得的，1948年在京时仍为记者。赖盎斯也是陈公与的妻子的朋友。

当1949年2月，北京初解放后，巴乃德和赖盎斯来访过我，出门后，附近解放军同志即进来作必要的查询。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照顾，此事即结束了。但我尚不知改过自新。因他们不断来电话要求访我，我在2月27日还去见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此时，人民政府下令停止外国记者活动，他们也终于消了声匿了迹。但当赖盎斯在4、5月离京返美，清华美籍教授温德为

她钱行时，邀我作陪，我仍然去了。这要是温情主义的话，也已经是买办的温情主义，而不是一般人的温情主义了。

这些特务记者同我谈的，在围城期中，是关于和平解放或是武力解放哪个可能性较大的问题，也问及学校情况，哪个人逃了等。进城后，主要是他们希望我能设法介绍他们给负责人见面。我拒绝了。他们也问及学校情况以及已否上课、已否接管等。

当时，美国帝国主义的领事柯乐博，在我军一进城后，即连二接三地要找我。我不愿意他来我家，我去过一次，他也提出了要我介绍他见负责同志的请求。我说负责同志太忙，绝不会见，而且我也不熟悉，要他不要再麻烦我。自此以后，我从未和他再见过面。他3月初送来过一封信转达哥伦比亚大学要我去，并要我将复电副本送他。我直接电复，拒绝前往，也没有把复电副本送给柯乐博。以后，7月4日美国国庆，他有请柬来，我早晨打去电话祝了国庆，但推有事下午没有去参加。

此外在北京解放后，我和美国人杜乐文还有过三、四次往来。杜是在昆明时由现在在北大的美籍教师温德介绍而认识的。他当时是美国红十字会的驻华代表。他在昆时，在医药上曾给我们不少帮助，过从较密。他比我先到北京。解放前他做过有关救济工作的美国驻华代表。以后他做木器家具出口的买卖。他的弟弟杜乐武和他住在相邻的房子中，在战时曾做过美军的情报工作。胜利后，他的职业是木器家具出口商，经常请茶会等，协和的医生们也时有参加的，围城期中或解放几天后，他即举家离京。

在解放之前，我是认识不到这些妖魔鬼怪是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的。党对我不咎既往，给了我宽大的对待。

我不但在解放以前有着长期的罪恶活动，而且1952年经过忠诚老实学习，我又不彻底交代我的罪行，这更增加我的罪行的严重性。我现在谨再向人民低头认罪。我甘愿受一切应得的处分和惩罚。我痛下决心，我一定要算清自己的账，新的要算清，旧的也要算清，要彻底交代一切罪恶的活动，也要彻底交代一切错误的言行，特别是关于和美国帝国主义有关的罪恶活动。

我记得的我一定要在几天之内逐件交代清楚。

(这是钱端升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本报略有删节, 插题系本报所加。)

——钱端升:《我的罪行》, 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6日。

王铁崖被批判, 顺带提及钱端升的“大法学院”方案。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大学支部法律系和历史系两个小组, 最近联合召开多次会议, 邀请两系部分教师参加, 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王铁崖的反动言行。

王铁崖把北京大学丑化成“漆黑一团”, 诬蔑北大的党政领导都是“行政主义”, 说教学工作中的计划、检查和汇报等制度就是“行政主义”的具体表现。他强调所谓“行政主义”就是学校里官僚主义的根源, 把素常学术风气比较浓厚的北大说成是“机关化”、“衙门化”, 叫嚣着要“肃清官风, 发扬学风”, “要坚决地和北大的领导作斗争”。

王铁崖向党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他所在的法律系。他说:“党的领导只能停留在校一级, 不能下到系一级, 党不应干涉科学研究和教学。”他放肆地污蔑了法律系的党员领导同志, 说什么“官风很盛, 系主任是首长, 教员是下级, 简直是衙门”, 要求工会“召开大会向法律系领导施加压力”; 然后又扬言:“法律系两个副主任都是党员, 不必要。”他在北大盟员座谈会上更进一步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异曲同调地说:“每个岗位上都安排一个或几个党员掌大权, 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根源。”

王铁崖也向校一级的党的领导“作了斗争”。他认为北大的“官僚主义”和“行政主义”表现在“把权集中在江副校长一人之手”, 说什么“北大过去是江副校长一长制, 现在是江书记负责制, 没有什么改变”。在民盟召开的座谈会上, 王铁崖公然提出取消党委制的主张。他说:“校委会应该由党委和民主党派共同来监督。”又说:“我认为应如清华某些人提出的五条线(指党、政、工、团和民主党派), 若只一条线(指党), 必生问题。”他一方面无中生有地说“毛主席已肯定了‘教授治校’”; 一方面又给党在学

校的领导工作划定一个圈，说什么“党在学校里只能管细致的思想教育，而不应该去‘干涉’教员的教学与科学研究，不要用行政系统和行政方法来约束他们”。参加座谈会的人一致指出，他的思想实质就是要取消学校的党委制，改变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其走上资本主义的老路。

王铁崖仇视人民的政法工作与政法教育事业。他说：“目前政法界的问题，主要是宗派主义。司法改革、院系调整、对旧法学人员没有妥当安排，都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又说：“关于宗派主义，它表现在对政法学界一棍子打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但前两年不是团结，而是打击；不是改造，而是取消。”他污蔑政法教育部门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中央政法干校是宗派主义的老母鸡，北大法律系是宗派主义的派出所。”

王铁崖参与了右派分子钱端升的“大法学院”的方案。根据龚祥瑞教授的揭发，这个“大法学院”的方案一旦实现，王铁崖将在钱端升手下当一名总务长。陈芳芝教授和历史系其他同志揭露了王铁崖的另一计划：王铁崖想以北大历史系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为基础，把外交学院、人民大学及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等有关部门，都合并到北大来，成立一个“大国际关系系”，由他自己做系主任，不要外交部领导。这个阴谋计划，就是想篡夺党在这方面的领导权。

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发表后，王铁崖和北大历史系教授杨人梗曾两次讨论“联合政府”的问题。章伯钧也指示浦熙修找“对政治有研究的人，像王铁崖”来写一篇文章，从国家体制的角度来论证“联合政府”，并为“党天下”的谬论辩护。因此参加座谈会的人，要求王铁崖交代他和章罗联盟右派分子的关系。】

——《王铁崖的反党阴谋破产》，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6日。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等单位批驳楼邦彦的反动言行，指斥楼“是政法学界右派阴谋家钱端升小集团的急先锋，他同钱端升的反动言行遥相呼应”。

【（本报讯）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北京市司法局最

近连日举行会议，对政法学界的右派急先锋楼邦彦的反党言行进行了揭露和批驳。

整风开始，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即对党展开了猖狂进攻。他反对整风采用“和风细雨”方针，说“和风细雨是对你们党员讲的，非党干部不受这个限制”，“群众有意见可以到大马路上去讲”。当司法局党组正在积极地召开座谈会，征求非党干部对党的意见时，楼邦彦却说：“大楼里（指司法局和高、中级人民法院等单位）没有整风气息”，“大楼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盖子还没有揭开”。又说这次整风的规律是：“党组不如一般党员，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共产党不如民主党派”，因此，“群众要对党施加压力”。他对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行大加赞扬，并对北大毕业的干部煽动说：“你们应该回去（指北京大学）看看，小弟弟比你们老大哥进步多啦！”右派分子陈建国、赵维侯、郭可宏等在楼邦彦数次煽动之下，连续张贴了污蔑党的大字报。当右派分子的大字报受到反击以后，楼邦彦马上大喊陈建国被“围剿”了，要陈建国“沉住气”，到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座谈会上呼吁，他们还共同研究了污蔑党的发言要点。

司法局干部朱金涛等揭露，整风开始不久，楼邦彦即拉拢一部分在肃反运动中被斗争从而对党怀有不满情绪的知识分子，经常进行密谈。他以个人名义召开座谈会，搜集反党材料。他还要求参加司法局整风领导小组，搜集党的缺点和错误。

楼邦彦还在北京政法学院座谈会上放火，污蔑党对政法界旧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棍子打死”，以挑拨党同老教师的关系。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非党局长座谈会上，他造谣说：“知识分子在机关里不被重视。肃反运动中被整的都是知识分子，而且都整错了。”楼邦彦是政法学界右派阴谋家钱端升小集团的急先锋，他同钱端升的反动言行遥相呼应。他认为，党对政法教育和司法工作的领导太多了，他这个副局长是“有职无权”。他说政法界从上到下宗派主义严重，应该吸收更多的非党人士担任政法界的领导工作。他还同钱端升共同阴谋策划“院系再调整”，组织“大法学院”，同共产党对

抗。大家指出，楼邦彦的阴谋是十分恶毒的，他企图削弱或取消党对政法教育和司法工作的领导，由右派分子取而代之，使我国的政法教育和司法工作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不能允许的。

许多人揭发，楼邦彦积极为储安平“党天下”谬论辩护。当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被揭穿后，楼邦彦认为储安平受了打击，并到处为储辩护。他对陈建国说：“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不过是知识分子常有的‘因词害意’。”他在九三学社支社说：“储安平在《光明日报》只做了两个月的准备工作，没有做什么事情”，又说报上的宣传是“歪曲造谣”。他还应《文汇报》右派分子浦熙修之约，准备“平心静气，从国家制度的角度”写文章，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辩护。他自己也承认，他企图把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拉到学术理论上去，并歪曲“言者无罪”和“言论自由”，以保护储安平。】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等单位批驳楼邦彦的反动言行》，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6日。

8月11日

龚祥瑞撰文批判钱端升小集团的阴谋和“大法学院”方案。

——见龚祥瑞：《钱端升小集团的阴谋和“大法学院”方案》，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11日。

8月19日

钱端升参加民盟中央第八次扩大整风座谈会，对罗隆基作出揭发。

【（本报讯）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反共集团已经进一步暴露。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共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在1949年以后进行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罪恶活动。它的核心分子有叶笃义、周鲸文、潘光旦和曾昭抡等。

这是19日民盟中央第八次扩大整风座谈会上被揭露出来的。

只谈远的不谈近的，只谈历史不谈现在，罗隆基企图蒙混过关

主持会议的民盟副主席史良在会上首先发言。她肯定了罗隆基上次交代了一些问题；并指出，罗隆基在交代中只谈远的（当然，就是解放前他也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交代）不谈近的，谈历史问题而不谈解放以后反共阴谋活动。史良说罗隆基同张东荪等在1949年成立的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具体行动的反共集团，并不如罗隆基所说的是什么“无形组织”和盟内“派系斗争”。她要求：罗隆基必须彻底交代这个反共集团的罪恶活动，尤其1952年以后这个反共集团的更隐蔽的秘密活动，以及这个反共集团怎样发展成章罗联盟的全部事实。史良说，有充分的材料证明，这个反共集团在1952年以后直到今天，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活动，只是采取了更隐蔽的方式而已。

罗隆基交代问题时，一方面承认1949—1952年，他积极地搞过宗派，有过“无形组织”；另一方面又说他的“无形组织”在1952年以后不再存在了。但是罗隆基在这次交代中已不敢完全否认他的小集团在1952年以后还有活动。他说，在1952年后，“这个无形组织在精神上和友谊上并没有断绝”。1956年民盟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曾同“无形组织”中的有些人见过面谈过话，他曾约孙大雨谈过两次话，曾昭抡和彭文应也在场。他承认他看过孙大雨向党猖狂进攻的八万言的“控告书”。此外，他说他同上海的彭文应、浙江的姜震中、昆明的李德家也分别谈过话。罗隆基还承认1956年他在四川视察时，曾召集了知识分子座谈会（马哲民也参加了），参加的都是有不满情绪和牢骚的人。他以后的发言就反映了这些人的意见。他说，这一期间他每天都同潘大逵见面，曾经批评潘不敢放手发展组织，鼓励潘积极搞盟务，放手发展组织。他说，在成都范朴斋请他吃过饭，在场的还有马哲民、潘大逵、张松涛等。罗隆基还同马哲民谈过湖北盟的工作，鼓励马“积极负责”，并且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后，民主党派大有前途，不应该消极”。罗隆基说他在1955年还曾劝湖北民盟副秘书长戴今生支持马哲民作湖北省盟的主任委员。罗隆基说，1955年路过上海时，韩鸣曾请他在

家吃过饭，应邀而来的全是上海小集团的人。罗隆基劝他们在沈志远领导下好好做盟的工作，叫他们拥护沈志远，说沈志远是领导上海盟的最适宜的人。罗隆基承认，他在人大、政协发言时，发言稿事先和曾昭抡、费孝通、吴景超、潘光旦等商议过，同时常同这些人谈知识分子问题，大家都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同情落后知识分子。接着，罗隆基竟然向大家做起盟的工作的总结报告来。他俨然以民盟副主席的身份，大谈他作为一个领导人对民盟今天的恶劣局面应负的责任，东拉西扯地谈了一大套。至此，大家对罗隆基的这种恶劣态度再也容忍不下去了。主席史良根据大家要求制止了他的“交代”，让大家来揭发他的罪行。

罗隆基给赵文璧的一封信

罗隆基在历次交代中总说他搞小集团的目的是在盟内争权夺利进行派系斗争，而不是反共反人民。这次会上，萨空了宣读了罗隆基给赵文璧的一封信。这封信证明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集团怎样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在全国发展他们的反共阴谋集团，怎样企图利用上次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这封信是罗隆基1950年8月2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后两个月）写给赵文璧的。信尾说“此函只可与真能合作之好友阅看，切勿广为传观，并请诸友切勿在外宣扬，切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最近与东荪、光旦、昭抡兄等多次详谈，均认为我辈应在全国范围内做有计划、有步骤的努力开展，此固友党希望民盟今后之前途，同时亦为我辈在盟中站稳脚步之唯一办法。西南方面，我辈能合作之人亦已回去努力布置。解放初期，左倾幼稚者亦如过去华东执行部之做法，一手霸占。经此次在盟中检讨，楚图南已承认彼之错误，已将华南特派员取消，且已成立西南总支部，而前次被排挤之西南领导人，均为总支部委员。大势如此转变，固非彼辈所料及也。在友党最近进行整风整党以前，弟曾坦白向友党提过此项意见。当时弟之意见，编为下列四句话：‘放宽统战抓紧党，共同纲领量长短，马恩列斯毛泽东，耐心学习都搞通。’主要用意即只能用共同纲领作统战标准，不能用思想问题来拆散统战，使一班政客幸进。同时党员太杂，必

须加以整理，当弟提此意见时，盟中又借题攻击。后来领导党表示如此做法，而盟中无聊之徒始哑口无言了。我辈把握此形势则一切好做。最近我们商量，拟乘暑假之便，由东荪、光旦、昭抡三位来沪一行，与沪上诸友商量盟务发展计划，并就近商讨如何整顿沪、宁、苏等地盟务。唯不知沪上诸友认为此行有必要否？你们得此函后，请约集真正可合作之少数可靠朋友，秘密一谈。如认为有用，即请函复。”

千家驹和楚图南在发言中都揭露了罗隆基和张东荪在抗美援朝时，站在反动立场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情况，他们认为人民民主政权不稳定，中国人民在战争中不能取得胜利，幻想美蒋通过朝鲜战争反攻大陆，成为对峙局面，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所作为，发挥更多、更重要的作用。他们觉得自己当时在中央人民政府中只担任委员也好，因为这样子“与共产党关系不深，沾染多了以后，局势变了对自己不利”。

反共小集团的两种活动方式

罗隆基反共集团的另一主要成员叶笃义也揭露了这个集团的阴谋活动。叶笃义说他们这个“小圈子”（即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反共集团）的活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限于盟内的“小圈子”集会，一种是包括了盟外人士的聚餐会。约请的盟外人士以大学教授为主，名为“以文会友”，研究学问，真正的目的是，如果可能就把他们拉进盟来作为小圈子里的人，即使拉不进盟，也可以扩大他们在社会上，尤其是在教育界的影响。抗美援朝开始时，这个反共集团的一些人曾在刘王立明家里开会，研究时局，罗隆基从马歇尔辞国务卿重任国防部长这件事推测，美国有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周鲸文则推测美国有占领东北的可能，张东荪就说他要劝毛主席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据叶笃义揭露，解放之初罗隆基与张东荪经常共同策划人事安排。1949年政协会议以后，张东荪以民盟的关系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张东荪和罗隆基商量以后，未通过民盟组织的讨论，就擅自把政协委员让给曾昭抡。曾昭抡1951年就任高教部副部长的职务，事先也是由曾和张罗共同商定的。

关世雄在发言中揭发了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反共集团和党争夺知识分子、争夺在教育界的领导权、反对院系调整、反对课程改革的一些事实。1950年5月，这个反共集团以民盟文教委员会名义召开了一次高等教育座谈会，反对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张东荪以民盟文教委员会主任身份主持座谈。参加座谈的有陈新民、潘光旦、钱端升、曾昭抡、陆志韦、钱伟长、费孝通、张伯驹等，大多都是右派骨干分子。张罗集团主持的这次座谈会，同今年6月间章罗联盟主持的六教授会议具有同样的反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座谈会上，费孝通叫嚣“在大学里搞专科像是在沙土上造高塔”。曾昭抡说什么“旧社会大学毕业生没事做是社会条件不好，不是学生找到事做不了。解放后，大学生反而办不了事”。又说“共产党拿出一个方案要大家照办，不但行不通而且还约束大学教授的创造性”等。潘光旦则反对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专才。他们主张保留旧大学的院系，反对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调整全国大学院系。

罗隆基召集会议，司徒雷登列席指导

在这次会议上，叶笃义、浦熙修、钱端升、罗子为还进一步地揭露了罗隆基和美帝国主义分子、李宗仁等的关系。据叶笃义揭露，1947年11月蒋介石已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当时叶笃义等到南京找罗隆基商量应对办法。罗隆基不但把他们的会见安排在美国大使馆内，还要司徒雷登数次“列席指导”他们的讨论。司徒雷登也就公然提出要民盟“光荣解散”，要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政治活动的狂妄主张。1948年，全国学生的反美运动爆发，司徒雷登发表了一个极端狂妄无耻的声明，以“自食其果”来威胁中国学生，引起了全国学生的极大愤怒。罗隆基这位民主人士竟然给司徒雷登写信要叶笃义带到南京，以“为亲者所痛”的姿态为司徒“惋惜”，司徒对这种“友谊方式”——司徒的原话——表示非常感谢。浦熙修揭发，就在罗隆基托吴晗带信给沈钧儒，要保留民盟随时退出联合政府的条件的时候，罗隆基在写信祝贺李宗仁竞选胜利时，竟然说：“民盟并没有说过不承认‘伪国大’及‘伪宪法’的话，只说‘保留’而已！”浦熙修说，这两个“保留”是有关

系的。前一个是“保留”退出联合政府的权利，后一个是“保留”随时参加南京伪政府的权利。据浦熙修揭露，1948年中共发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后，罗隆基曾派叶笃义到南京积极探询司徒雷登的意见，要司徒雷登支持李宗仁；罗隆基还同雷震商谈，想借易地养病之名，在南京、牯岭或台湾等地进行反共活动，幸经张澜制止而未实现。罗隆基当时对时局的估计认为起码还有五年。事实证明那时罗隆基和章伯钧就有联系。当时，章伯钧在香港要发动川、滇、黔的军事力量和共产党三分天下，而罗隆基也在给浦熙修写的信上说：“你对于时局的过分乐观，以为国民党就要垮了，那是错误的。据港方估计时局还有五年，港方还在发动川、滇、黔三省的军事力量呢！”这所谓港方不是章伯钧又是谁呢！

在钱端升的交代中，谈到了这样几个问题：1934年春夏之交，钱端升去南京看蒋介石，蒋知道罗在天津，就要钱转告罗：只要他安分，还可以去南京做官。罗隆基在昆明时的老婆王右佳是和军统有关的特务。钱端升还揭露罗隆基和美帝国主义的得力走狗缪云台之间的勾结。当时钱端升在云南办《今日评论》，经费就是经过罗隆基向缪云台要的。罗子为揭露罗隆基曾经坚持把反革命分子罗自梅（已被判刑）安置在民盟中央他所主持的宣委会工作。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华罗庚，他揭发罗隆基怎样拉拢他利用他的一些无耻行为。

最后史良宣布，为了给罗隆基重新做人的机会，在下次会上仍然要罗隆基交代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小集团的阴谋活动，同时希望这个反共集团中的其他分子要彻底地详细地揭露这个反共集团的阴谋活动。】

——《好险恶毒辣的阴谋 看罗隆基反共集团的内幕 核心分子是张东荪、叶笃义、周鲸文、潘光旦、曾昭抡 民盟第八次整风会上揭露出一些怵目惊心的材料》，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28日。

8月21日

“首都法学界的反右派斗争已取得很大的胜利，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和

一个以钱端升为首的右派反动集团。”

【（新华社21日讯）首都法学界的反右派斗争已取得很大的胜利，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和一个以钱端升为首的右派反动集团。

首都法学界的反右派斗争是法学界座谈会和各政法部门、政法院校互相配合进行的。法学界座谈会从5月27日开始到今天止已开了三十二次会议。在前六次座谈会上，即大鸣大放时期，法学界的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共产党和政府司法工作大肆进攻。到6月11日，首都法学界座谈会即展开了反右派的斗争，法学界中的右派分子就不断地被揭露出来。在法学界本月20日的座谈会上，揭露和批判了右派分子、最高人民法院顾问俞钟骆的反动言行。俞钟骆一贯仇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诬蔑人民政府“过去太强调专政，不重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甚至恶意地认为“现在的政府不保护公民权利的状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他对人民政府对惯盗、惯窃等坏分子实行专政“表示反对”。他还诬蔑在审判工作上“罪与非罪的界限划不清”，“出入人罪”。他别有用心地认为产生这种“坏现象”的原因有三点：“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和“审判人员判案可以随心所欲”。俞钟骆说现在的司法干部水平“极低”，在“政策掌握上左右摇摆不定”，在“量刑上总是纠左偏右，纠右偏左”。他很赞同右派分子杨玉清要共产党“下台下轿”的反动言论，认为应该“换班”。俞钟骆是民盟最高人民法院支部的负责人。在大鸣大放期间，他积极活动，企图拉一些对工作不满的人加入民盟，并常煽动青年人向党进攻。

在法学界座谈会上揭发的右派分子中还有法制局财贸法规组副组长吴传颐、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干部陈建国等。这些右派分子都歪曲、捏造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材料”，污蔑司法工作。陈果夫唯生主义的信徒和传播者吴传颐叫嚣“有法难依”，企图否定人民民主法制。陈建国叫嚣“无法可依，是造成错案的原因之一”，企图否定解放以后的立法工作的成绩。

在座谈会上揭发的右派分子中还有政法院校的教授、讲师，如北京政法

学院院长钱端升、北京大学教授王铁崖、现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的兰州大学副教授吴文翰、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吴宗麟、中央政法干校教员谢怀栻等。他们中有的企图否定司法改革运动的伟大成绩和政法院系调整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在这些工作中，“旧法学人员被一棍子打死”，提出要“招魂”。有的污蔑政法教育事业，说“目前政法界的主要问题是宗派主义”。有些右派分子还恶毒地说：“中国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中央政法干校是宗派主义的老母鸡，北大法律系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派出所。”有些右派教授在大鸣大放中暴露了他们的野心。北京大学教授王铁崖想以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为基础，把外交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及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等有关部门，都合并到北京大学，成立一个“大国际关系系”，由他自己做系主任，不要外交部领导。法学界人士在揭露王铁崖的阴谋计划时说，王铁崖的阴谋计划就是想篡夺党在政法教育方面的领导权。王铁崖也曾公开提出取消学校党委制的主张。

法学界中以钱端升为首的右派反动集团在最近已被法学界人士揭露出来了。这个集团的成员有楼邦彦、王铁崖等右派分子。他们共同阴谋策划“院系再调整”，组织“大法学院”，企图夺取政法学院领导权，从而再夺取政法部门领导权。他们这个反动集团是在章罗联盟策划之下进行阴谋活动的。钱端升在大家的揭发下，已承认他是“接受了章罗的领导，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法学界中的许多右派分子的历史是丑恶和肮脏的。有的做过国民党的特务，有的与美国特务有关系，有的是反共能手，有的是国民党的贪官污吏。曾公开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下轿”的右派分子杨玉清就是一个老牌的反共专家。杨玉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三青团中央干事、伪立法委员和伪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等重要职务，是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1943年，他在重庆国民党反动派集中营的讲台上，对着几百名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进行了“攻心斗争”的反动说教，他还同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进行过“短兵相接的挖心斗争”。法学界右派反动集团中的钱端升、楼邦

彦、王铁崖，过去都和美国特务有密切的关系。右派分子俞钟骆是拥有三百多两黄金和万元股票的资本家。在抗战胜利后，他专门为汉奸作辩护律师。

首都法学界还要继续召开座谈会，并将和各政法部门、各政法院校密切配合，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派的斗争，以取得彻底的胜利。】

——《首都法学界披荆斩棘搜索右派 以钱端升为首的小集团和一些右派分子躲藏不住了》，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22日。同日《光明日报》第2版以《首都法学界牛鬼蛇神纷纷现行 斗争将进一步深入开展以取得彻底胜利》为题，发表了该篇报道。

8月29日

陈振汉被揭发钱端升“内定”其当“大法学院”经济系主任。

——见《陈振汉是章罗联盟在经济学界的反共急先锋 北京大学师生据理驳斥他的反动谬论》，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29日。

9月1日

曾炳均批钱端升文章《去私·去惑·立诚》见报。

——见曾炳钧：《去私·去惑·立诚》，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1日。

9月6日

北京政法学院学生王英容、北大学生韦清豪撰文《要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见报。

【要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王英容、韦清豪

（一）

绝大多数青年学生，正因为我们既没有受过实际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又没有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所以分辨是非的能力很

差。当我院院长、右派分子钱端升以关心我们的面貌出现，许多同学中了他的毒箭。

当钱端升的反党罪行被揭发后，这些被迷惑的学生大部分，纷纷觉悟，检查了过去的错误，立即投入了反对右派的战斗；也有少数人还迟迟不动。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同学自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他们就立即投入了反对右派的战斗。为什么同是学生，竟会产生这样大的差别呢？这主要是：一些人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来观察问题；而另一些人则是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出发，所以犯了错误。

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必须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经常不懈地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积极参加实际生活锻炼。在全国高等学校各年级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这门课，就是针对我们青年学生的病症开的一个药方，我坚决拥护这一课程的开设。

北京政法学院王英容

(二)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深深地感到自己力量的不足，尤其是理论知识更是懂得极少，因此在运动一开始，自己就表现出了彷徨，甚至有时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以致失去了斗志。

现在要普遍在高等学校增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门课，要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教育新中国的青年一代。我保证在今后的学习中努力钻研，严格要求自己，一定要做一个有知识、有教养、具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大学生。

北京大学学生韦清豪】

——王英容、韦清豪：《要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6日。

9月12日

“首都法律界粉碎右派实现资产阶级复辟阴谋”。

【（新华社12日讯）首都法律界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广泛展开，中央和北京市的司法机关以及政法院校中，已经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和小集团，击破了右派分子妄图使旧法和旧法学复辟和夺取法律界领导权的阴谋。

法律界右派分子的阴谋，是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向共产党进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界的这场斗争又是继司法改革之后，一场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新法和旧法、新法学和旧法学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从目前已揭露出的材料来看，右派分子猖狂地向人民法制进攻的目的是想夺取已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刀把子”，企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实现资产阶级复辟。首都法律界和政法部门工作人员都认识到这场斗争的严重政治意义，他们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斗争。据了解，首都法律界和政法部门参加反右派斗争的有一万多人。首都法学界座谈会已经配合各个部门开了三十八次会议，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钱端升、俞钟骆、杨玉清、楼邦彦、王铁崖、吴传颐、陈体强、谭惕吾等二十多个主要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在中央一级机关揭发出来的法律界右派分子，从立法、司法等工作方面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猖狂进攻。他们到处点火，否定成绩，公开叫嚣恢复“旧法”，为“旧法招魂”，要旧法人员归队，翻司法改革之案。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室工作的右派分子张映南诬蔑说，解放后的政法工作简直毫无成绩，整个法律界是漆黑一团。他公开叫嚣“要学习旧法”，“新旧法应该并重，不能单纯迎接新的，抛弃旧的”。他认为法律界“单靠马列主义是不够的，对旧法不能一棍子打死”。他还说：“司法改革运动对法律界权威人士打击得太重”，现在应该让他们“上台”。在法制局工作的国务院参事、前法制委员会委员、右派分子吴传颐不仅诬蔑人民政府“无法可依”、“有法难依”，甚至公开叫嚣“司法改革做结论还早”；并煽动“旧法人员不要摘掉旧法帽子”，要做旧法的“孝子贤孙”，以与人民法制抵抗到底。最高人民检察院最近揭露出来的两个民盟盟员毛士英、李实育，都是执行章罗联盟恶性发展计划的右派分子。他们曾讨论并声言要“监督”检察工作，反对老干部和共产党员当检察员，借以篡夺检察工作领导权。李实育还

诬蔑老干部“占着格格不拉屎”，公然声言要把老干部推下台去。为了篡夺司法工作领导权，除右派首脑罗隆基想当司法部长以外，右派分子俞钟骆（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杨玉清（国务院参事、《政法研究》副总编辑）也已经作出了当司法部副部长的打算。

在中央法律工作机关里揭露出来的党外和党内的右派分子中，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张定夫、翻译唐鸣时，原法制局专门委员、现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卢蔚乾，法制局专门委员庞荇青（共产党员），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研究员袁健（共产党员）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的右派分子极为猖狂，有个别单位实际上已为右派分子所掌握。此外，在中央财经、工业、交通等机关的一些法律室里还揭露出了一些右派分子。他们旧法思想原封未动，在大鸣大放中向人民法制猖狂进攻。其中有做过几十年洋奴的对外贸易部法律室顾问董士濂，曾任伪上海和台湾的高等法院院长、为战犯冈村宁次辩护的交通部法律室专门委员杨鹏等。

北京各政法院校和科学研究机关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借反对教条主义为名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否定法学的阶级性，反对共产党的办学方针，阴谋篡夺政法教育的领导权，使旧法学复辟。同章罗联盟有密切关系的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是经章伯钧一手提拔、连升三级而做了民盟中央常务委员的。他身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法学会副会长等十多个重要职务，是章伯钧在国家制度方面的顾问，曾同章伯钧详细谈过“政治设计院”和“两院制”的问题。他曾同罗隆基一起在法律界高级知识分子中煽动向共产党进攻。钱端升还有一个由王铁崖、楼邦彦等右派分子组成的小集团。他们企图推翻1952年的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阴谋以钱端升为首成立一个像“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那样的大政法学院，以王铁崖为首成立一个不要外交部领导的“大国际关系系”，以楼邦彦为首成立一个“大法学研究所”，以篡夺共产党对法学和政法教育的领导权，培养资产阶级旧法的“接班人”。中央政法干校教员、右派分子谢怀栻等，在大鸣大放中企图改变学校一贯执行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针，企图取消学校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揭露出了以孔钊（讲师）为首，由黄守礼、朱华荣等右派分子组成的小集团。右派分子孔钊最不喜欢讲刑法的阶级性这一课。他说：“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处处讲阶级性就显得庸俗了。”深为罗隆基赏识的右派分子、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员陈体强，公开主张国际法要“向英美学习”。陈体强和右派分子王铁崖一样，狂妄自大地叫嚣国际法科学有“危机”，要“断种”。北京政法院校和科学研究机关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潘静成、吴家麟，北京政法学院教授于振鹏、讲师杜汝楫和罗典荣，北京大学法律系助教王克勤和潘世照，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田保生、助理研究员孙公绰等。

北京市司法机关已经揭露出来以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为首的反共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成员有陈建国、郭可宏、赵威侯等。他们利用整风运动企图夺取共产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权，进行了集会、密谋、搜集“材料”、串连等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大肆挑拨共产党与非党、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攻击人民司法工作。楼邦彦甚至叫嚣“要把矛盾拿到大街上去嚷嚷”。

根据目前已揭露的材料来看，首都法律界右派分子不仅在北京到处点火，还利用了视察和检查工作等各种机会，进行反共活动。如钱端升去天津，楼邦彦、谭惕吾等往上海，多方串连，搜集“材料”，向人民法制工作猖狂进攻。

目前首都法律界的反右派斗争已取得了初步胜利，有些右派分子已经低头认罪，但是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斗争还不够集中有力，已经暴露的问题追查得不够深透，不少右派分子还在继续顽抗。现在，首都法律界和政法部门反右派的领导工作正在加强，这个斗争正在进一步深入展开，正在继续克服温情主义和扭转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从目前已经暴露出的问题来看，右派分子中有一些是共产党员。他们歪曲党的政策，反对党的领导，同党外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首都法律界和政法部门也正在坚持“一视同仁”

的精神，追查到底，以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更加纯洁法律界思想和队伍，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握紧人民民主专政的“刀把子” 首都法律界粉碎右派实现资产阶级复辟阴谋》，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13日。

9月13日

陶希晋发表文章《法律界的斗争》。

【法律界的斗争】

陶希晋

目前全国法律界正在进行的反右派的斗争，是国家法制建设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法律思想上革命派与反动派的斗争。

法律和政治是分不开的。不管法律界右派分子们怎样说法律是超政治的，但是在这次斗争中，他们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个是纯法律的问题。他们散布反动的旧法观点，制造各种谰言，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法制。他们是章罗联盟和整个资产阶级右派的急先锋和应声虫。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阴谋，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产阶级复辟，所以社会主义法制就成为他们主要攻击的一个目标。正因为这样，法律界的这次斗争，也就表现得特别尖锐，特别激烈。

—

要说明法律界右派分子的这次疯狂的进攻，我们还必须回溯到1956年。大家知道，1956年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转变的一年。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们国家里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它还没有巩固；特别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目的就是要通过知识界的自由争论，来解决思想上、学术上的是非问题，从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更有效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可是有些挂着“法学家”招牌的右派分子，对这样一个方针是怎么样看法呢？他们从自己的阶级意识出发，以为这是要“变天”了。他们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对法律界来说，是起了招魂的作用，旧法学家过去被一棍子打死了，新法学家几年来被教条主义缠住，失了魂。因而都要把它招回来。”招什么魂？极明显，那就是说，无产阶级新法学要推翻，而资产阶级旧法学要复活。事实也确是如此。他们早就污蔑马克思主义为“教条主义”，以反教条主义为名，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律的学说。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部分，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是识别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之间的分水岭。一百年多来，一些资产阶级的仆从学者和无产阶级的卑鄙叛徒，没有一个不是从这一问题上来进攻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一个不是在这个问题上被历史事实碰得头破血流。可是今天法律界的右派分子，居然又步着这些人的后尘，来耍这一套早经拆穿了的惯技。例如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已不正确了”，他们歪曲列宁关于“专政是直接凭借于强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的定义，荒谬地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为不要法律的排斥民主的“恐怖主义”。谁也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一经确立以后，就依据斗争需要和人民意志陆续地创制法律来办事。但是十分明显，无产阶级创制法律的工作，在什么时候创制、怎样创制，（创制什么样的法律等）当然受无产阶级专政所“限制”、所决定，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受无产阶级的法律所“限制”、所决定。试问，如果不首先有胜利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可能着手创制无产阶级的法律呢？无产阶级专政愈巩固，无产阶级的法制才能愈完备，这难道还不是天经地义的吗？难道资产阶级的法律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反而资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法律的产物吗？难道人类历史上的一切胜利的革命斗争不是各个时代的法律的创造者，反而革命是法律规定出来的吗？其实，法律界右派分子的这些荒谬说法，并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只不过是早被历史否定了的资产阶级仆从们的反动理论的翻版而已，因为列宁这个定义，正是针对着这样反动理论说的；而且他明确地指出，这是

一个简单的真理，只要“不是如各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这班资本家收买的市侩混蛋的上层分子”，都是一目了然的。

法律界右派分子在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同时，也就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法学原理是我们法学的指导思想，故意把它列为法学流派之一，指责它“太强调阶级立场而有狭隘性”；并且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的定义，今天要“改一改”了，说法律不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什么“国民公共意志的表现”。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根本原理，就是它认为法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绝不是什么超阶级的“国民公共意志的表现”。世界上自从马克思揭明了这一真理以后，法学才成为真正的科学；而资产阶级的法学理论，也就从此整个地宣告破产，暴露了它彻头彻尾虚伪的反科学的实质。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的法学，不解释现行法律的社会根源，不揭开法律所保护的那些阶级利益，它只不过是用以巩固庸人头脑中的偏见而已。实际上，右派分子所谓法律是“国民公共意志的表现”的谎言，也早已被中国人民戳穿了。比如国民党在死亡前夕的“中华民国宪法”上，开头就写着“受全体国民之付托”。试问，中国人民有谁曾经相信过这种鬼话呢？

实际情况既然如此，那么右派分子为什么还到处散布这些早就破产了的陈词滥调呢？问题很明显，他们是在利用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时机，来偷天换日地篡改马克思主义，为那些政治野心家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恢复旧法统、实现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法律理论的根据。

现在人们已经不难了解，为什么不久以前，有些“法学家”们那样热衷于到处宣扬反动旧法的“可继承”，那样积极提倡“重视”、“恢复”旧法学，甚至不惜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统一和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原理，以及党对待旧文化的正确方针，来为早经废除了的旧法多方辩护。难道这都是单纯地为了学术的研究而不是别有用心吗？

二

法律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曾估计今年是“最关键的一年”。他们发动

进攻的总口号是要“法治”，他们说：“你们不是要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吗？那么，就必须健全‘法治’。”什么叫“法治”呢？右派分子王造时举出了美国警察不抓赌为例证，说美国的警察是那样的守法，明知人赌博，但因为仅见赌具而那些赌客并没有正坐在那里赌，所以就不抓人。他们说这就是我们应效法的“美国的认真的法治精神”。显然，他们说的这样一种诡诈的“赌客”，在我们这里是有的，而那样一种虚伪的“法治精神”，的确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

谁都知道，资产阶级的“法治”，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幌子。资产阶级为掩盖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的本质，只能把“法治”说成是超阶级、超政治、超党派的，是“全民民主”的最高体现，借以模糊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削弱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已戳穿了的；并且是所有进步的人们都懂得的。可是有些“法学家”就戴着这样一副所谓“法治”的有色眼镜，到处搜集材料，找政法工作中的所谓错误缺点，制造各种矛盾。

有这样一个事例：北京丰台区有一个农业合作社闹纠纷，要散伙，区的党委要该区法院院长去进行政治思想工作。院长去该社了解了情况，对要求退社的社员比生活讲道理，说明合作化运动的重要和好处。结果退社的人承认了错误，不退社了。在社召开的大会上，院长也讲了话，宣传了社章和遵守劳动纪律的必要。一场纠纷完全解决了，群众并且说，不遵守劳动纪律是犯法，我们要很好劳动。事后，区法院向市司法局写了一个报告。可是右派分子楼邦彦这位“法学家”，对法院办了这样的一件好事，毫无好感，反而在报告上批示，要干部们“研究法院在这件事上的法律地位”。结果引起一场争论，居然也就有人被这批示迷惑，认为：法院违法，没有告状不应受理；区委违法，法院人员不应去做政治思想工作。甚至有人认为说“不劳动就是违法”这句话也是不对的。这件事情，后来居然也就有人在这次鸣放中故意歪曲事实，作为向党和人民法院进攻的重要例证提出。当然，现在大家已经看清，这就是右派分子的所谓“法治”观念。这正是极好说明：右派分子就是那样不关心群众运动、不关心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就是

那样蔑视人民司法的优越性，就是那样反对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就是那样用“法治”这个口号来恶毒地点火，煽动对党的不满。

法律界右派分子也就是从这种“法治”观念出发，制造各种谰言，来恶毒地攻击“党发号施令”，“以政策代替法律”，污蔑“运动破坏法制”。总之是说“没有法治，只有人治”。他们说“法治与民主分不开，民主是原则，必须通过法治才能实现”。所以他们提出，一切要法定，一切要依法。要什么民主？他们公开讲，要“全民民主”，要“反革命分子判决了还可以讲话、写文章、出版东西”的民主。要什么法治？那自然就是要美国警察见赌不抓的“法治”，所以像胡风这样的“赌客”，他们就认为“是思想问题，而不是反革命分子”了。

请看！这就是法律界右派分子公然提出的要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法治”！试问这种“法治”，难道是中国人民所要的吗？中国人民都清楚，我们所要的法，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法治，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最高的法律，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就根本谈不到什么法治。

三

法律界右派分子否定过去几年来立法工作、司法工作和政法教育的成绩，在几个主要问题上，根据他们的“法治”观念，更竭尽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之能事。

他们明明亲自参与了过去几年来许多重要的立法工作，而却说“无法可循”。这种论调，本来是不值得一驳的。因为我们现在不仅有了根本法，而且建国以来，适应国家管理各个方面的需要，颁布了四千多件法规。虽然其中许多是临时的纲领性的，但是这种情况，正如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为了肃清残余的敌人，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反抗，破坏反动的秩序，建立革命的秩序，只能根据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一些临时的纲领性的法律。在这个时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因

此，那些纲领性的法律是适合于当时的需要的。”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的法制还不够完备，但这总不能说是“无法可循”吧。

那么，他们为什么提出“无法可循”呢？据他们提出的问题，是说没有刑法典、民法典。的确，我们还没有这些法典，但是，在上述四千多件法规中，据统计，刑法、民法的单行法规和带有刑法、民法性质的法规，即有二百八十余件之多。只要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就应该知道，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没有基本结束以前，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基本完成以前，制定完备的刑法典、民法典不但是很困难的，而且是荒谬的，其荒谬无异于强迫还没有出世的胎儿穿衣服。其实，我们知道，他们提出的问题，根本还不在于有无刑法典、民法典，否则，为什么现在刑法已经有了草案之后，高唱无法论的右派分子杨兆龙又回答人家说“我的意见不是一点一条的问题，而是整个体系的问题”呢？否则，又为什么还有些“法学家”对我们起草社会主义的刑法、民法，兴趣并不高，而非要从速制定什么“惩治诬陷法”和所谓“冤狱赔偿法”不可呢？问题很明显，他们所谓“无法”，就是没有符合他们所谓“法治”的“对反革命也给民主”的法。

在叫嚣“无法可循”的同时，他们提出了“立法工作路线问题”。他们拼命攻击我们党在法制工作中一向坚持的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逐步完备和群众路线的方针。他们把这样的正确方针，说成为“立法迟缓的根源”。右派分子杨玉清、俞钟骆等更恶毒地描绘成为“阿Q精神自我陶醉”。怎样才能迅速立出“法”来呢？他们说得非常清楚，要反对“立法的分散主义”，应该广揽“内行”，成立所谓“法律修订馆”，要“胡汉民”再生；特别重要的是：要党“收回过去关于废除六法全书的指示”，说“党在过去对六法观点的批判应当纠正”，“旧六法条文只要加上‘人民’两字，一样可用”。这就是他们提出的同我们完全背道而驰的“立法工作路线”。他们所以蛮无道理地诋毁和反对从实际出发的这一根本工作路线，其目的也就是企图借此进一步造成那些未经得好改造的旧法人员的思想混乱，安排“东山再起”，准备旧法统的复辟。

法律界右派分子，一提起四年多以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司法改革运动，总是咬牙切齿，把它说成“一团糟”，认为它“制造了法律界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拼命诋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说什么“司法机关中有共产党员，是与发扬民主、贯彻人民民主专政相抵触的”；竭力丑化现在的工农老干部“不如往日的旧司法人员”，要“改变过去以政治为首要条件的司法干部政策”。他们咆哮如雷地提出要追究搞司法改革的责任，要“司法再改革”。怎样再改革？那就是要旧法人员“上台”，“大换班”，抓“刀把子”。

司法改革是不是搞糟了呢？大家知道，司法改革是那时紧接着“三反、五反”后，针对着当时司法机关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存在着严重不纯的现象而进行的一次民主改革运动，它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不可缺少的一次群众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它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捍卫与贯彻执行了共同纲领和人民革命历来的司法工作路线，它纯洁了各级人民司法机关，使许多干部在思想上划清了新旧法律的原则界限，从而为国家法制建设进一步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就在于它正确执行了党对旧法人员的政策，除了清除极少数的坏分子外，都是继续留用或者通过调训学习、重新安排工作，以及组织参加一时期实际斗争的锻炼等各种具体措施，使许多人获得了思想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法律工作者。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是有些“法学家”，竟会把我们国家法制建设上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完全否定，硬说司法改革“把旧司法人员一棍子打死了”，于是“招魂”呀，“抢救”呀，“法律界不是争鸣而是哀鸣”，“更重要的是要从打死的人那里吸取营养”呀，闹得真像在鬼哭神嚎。

说来，这倒亦是好事。这教育了我们，“刀把子”是重要的；这提醒了我们，司法改革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我们还须继续斗争！

法律界右派分子针对着政法教育方面，也放出了许多毒箭，集中攻击点是过去进行的政法院系调整。他们说这是法律教育上的“突出的宗派主义表现”，“把老法学教师一脚踢开了，由清一色的党团员包下来了”。

谁都明白右派分子是在漫天撒谎。就拿北京、武汉、西北和复旦四个大学的法律系来说，据统计在现有讲师以上的人员中，所谓老法学教师即约占70%，党员老干部仅占20%，余为青年教师。再以北京、华东、中南和西南四个政法学院来说，统计所谓老法学教师，亦占讲师以上人员的将近半数。试问这叫作“清一色”吗？

谁都明白，旧中国的教育，尤其政治法律教育，是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根本性改革。当时对政法院系的调整，政府采取的步骤，是先集中办几个政法院校，一面积极改造旧教师，一面培养新师资，而后逐步重新建立各大学法律系。这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有些老法学教师也说，那时暂不开课，学而后教，是完全必要的，真是好事。可是有人却把这好事形容成：“旧法学家被攻击得体无完肤，拿钱不开课，连儿子也骂饭桶，这是多么沉痛的控诉。”试问这是在向谁控诉呢？

法律界右派分子为了对过去政法院系的调整进行翻案，他们竭力污蔑说党员老干部“只会讲马列主义，对法学是外行”，而青年干部又是“教条主义，十个和尚念一本经”；他们拼命吹嘘自己是什么“法学权威”，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法律教育，胡说什么“法律科学倒退了二十年”。因此，他们就大声疾呼：“红色专家滚出去！”、“老法学教师归队！”同时，就积极地进行了政法院系“再调整”的阴谋活动。现在事实已经揭露，在首都法律界，右派集团钱端升、王铁崖、楼邦彦等即早已处心积虑地为实现不要党委领导亦不要业务部门领导的所谓“大法学院”、“大国际关系系”和“大法学研究所”的方案，而作了“归队”的各种安排。因为他们安全懂得占领政法教育阵地的重要意义。

四

从上述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律界右派分子向国家法制的进攻，是有理论准备的，是有纲领、有计划和有路线的。现在他们的反动阴谋已经被揭露，在真理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犯了错误。可是他们不少是以“律师”出庭的姿态，采取所谓“四面交流、前后开门”的手法来作“检讨”，说他“原

来讲话不代表思想”，错误是偶然的。其实人们很清楚，他们长期以来，根本没有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确如他们所说，他们的生产资料就是旧法学的理论观点，因而是改造不得的。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要以自己的观点来改造我们的政治法律制度。何况其中还有些人，老早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英雄”，老早就是别有企图的。因此，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他们何去何从，首先就看他们是否真正认识到这一点。

斗争教育了人们和我们每个法律工作干部，资产阶级被剥夺了经济基础后，是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而反动的旧法观点，又是政治野心家们利用来企图复辟的思想武器。所以，彻底肃清旧法观点的斗争，仍然是我们法律界一项艰巨的任务。

斗争正在深入展开着。这是法律界的一场大辩论，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法律上层建筑方面的一场决定胜负的斗争。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社会主义法制的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任务还在于要通过这场辩论和斗争，提高自己，改进工作，解决我们法制建设上和法律科学上一系列的根本问题，从而使我们的各项法律工作更好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陶希晋：《法律界的斗争》，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13日。

9月13日

首都政法界四千人集会批判楼邦彦，钱端升被顺带提及。

【据新华社13日讯：首都政法界今天举行了有四千人参加的大会，批判以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为首的右派小集团的反动言行。根据会上所揭发的材料，证明这个小集团是章罗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

北京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常真首先在会上系统地揭露了楼邦彦及其小集团成员陈建国、郭可宏、赵威侯、朱平等人的罪恶活动。常真指出：在整风开始后，楼邦彦就积极地煽动群众闹“大民主”，他公然说：“和风细雨是对你们共产党说的，非党干部不受这个限制”，“如果非党干部也强调和风细雨的话，就会使他们有顾虑，不敢对党提意见”。楼邦彦还公开主张把政法

界的所谓“矛盾”到“大马路上去讲”，他说，如党组阻止这样行动，就是阻碍“群众对党提意见”。

常真说：“楼邦彦小集团的活动是章罗联盟阴谋在全国范围内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夺取领导权的一部分。楼邦彦反动小集团和章罗联盟领导下的钱端升、楼邦彦、王铁崖反共集团有密切联系。而后者是章罗联盟在政法界的一个反共堡垒，他们阴谋夺取党在政法界的领导权，妄图组织一个‘大法学院’。常真揭露了楼邦彦还与储安平、浦熙修、费孝通等右派分子有联系。”

常真说：“楼邦彦这个小集团活动是有理论、有主张和有目的的，他们污蔑我们国家没有民主自由，并表示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准备流血牺牲。他们污蔑我们的法制是立法迟缓，无法可依，破坏了法制。他们全部否定了肃反运动。他们借反对宗派主义为名反对司法改革，反对党员干部充当政法界领导骨干。他们妄想以这样活动来证明一切错误根源是在共产党，因此必须把共产党推下台。”

会上许多人对这个小集团的纲领和主张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揭露。

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委会第二法律顾问处副主任郑孟平引用大量事实说明现在我们国家具有历史上空前广泛的民主和自由，他说：“右派分子不承认这些民主和自由，还要争取民主自由，他们需要什么民主自由呢？请听他们自己回答吧！”楼邦彦曾说过：“我热衷于轰轰烈烈、五花八门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热烈场面。”大鸣大放期间出现了一些谬论，右派分子陈建国高兴地说“得到了满足”，“才是民主”。显而易见，他们所需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他们想以这样的民主和自由把共产党搞臭、搞垮。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马润生指出：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们国家颁布的法律、法令及单行法规就有四千多件，其中有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也有许多重要法律，这怎么能说“立法迟缓，无法可依”呢？马润生说，楼邦彦曾说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在三反五反后，指示法院对贪污分子依法从重处理，是“以党代政”、“干涉审判”，因为张友渔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员。马润生说：“根据当时《人民法院组织暂行条例》的规

定，人民法院受上级法院和同级人民政府双重领导。当时，张友渔是副市长又是北京市政法委员会主任，他无论以哪种身份对法院工作作出指示，都是完全合法的。即使他以中共北京市委委员的身份向法院党员或党组织发出指示，保证国家法令具体有效地贯彻执行，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中央政法干校教员朱育璜说：“楼邦彦等右派分子攻击人民法制的另一论调，是说我们以‘政策代替法律’，妄图以此来证明我们是没有法律的，以此来抵消八年来的立法工作。”朱育璜说：“右派分子这个阴谋是枉然的，我们十分重视法律，但不是迷信法律万能的。因此我们认为即便有了法律，为了适应我国阶级关系和社会生产的复杂情况，还必须有相应的政策为指导。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法律。以镇反为例：我们和反革命的斗争在制定《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前，就是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等政策为指导的。而在制订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后，这些政策仍然指导我们正确地运用法律，而且适应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又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来指导这一条例的贯彻执行，这样就更有力地分化瓦解了敌人，更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

北京市中级法院审判员余樾在发言中指出：楼邦彦等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夺取专政工具的罪恶目的，以反宗派主义的名义极力反对司法改革。楼邦彦说：“过去对政法界旧知识分子是采取了一棍子打死办法。过去我们遭到了两个方面的彻底否定，一是政法界知识分子的全部历史被否定，二是政法界的全部科学知识被否定。”余樾说：“法律是一定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是一个阶级保护自己的有力武器。旧的法律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而旧社会的司法人员中的所谓正派人也是很少的，绝大部分都是贪赃枉法、敲诈勒索，无所不为。他们直接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如果不经过彻底改造是不可能从事人民司法工作的。由此可见，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反动国家观、法律观，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必须否定，必须废除，旧司法人员必须彻底改造。”余樾说：“我自己是官僚家庭出身，曾当了六年伪法官，如果人民政府对旧司法人员像楼邦彦

所说的是一棍子打死的话，那我早就被打死了！但是我八年来始终没有脱离审判工作！”

北京大学教授龚祥瑞在发言中揭露了楼邦彦一贯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历史，龚祥瑞说：“在楼邦彦半生丑恶的历史中，至少有三次积极反共的行动。第一次是在1934年，楼邦彦在重庆脱掉了学者的外衣，放下了教授的架子，投奔到胡宗南的剿共军队里充当‘政治总教官’。第二次是1947年，他在北京搞所谓‘中间路线’。实际上，1946年他还在重庆三青团专门训练特务和青年军的干部学校里讲了两个月的课，和蒋经国喝酒跳舞。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已到了决定胜利的阶段，蒋介石政权完全溃烂得不可收拾了，楼邦彦还向蒋介石献策，主张坚决打内战，不要有行宪的打算，宪法解决不了问题，要狠狠地打共产党。第三次反共阴谋就是这次在借帮助党整风的牌子下，跟着章、罗联盟发起的反共反人民的进攻。但是这一次他的失败更大。”

发言的人把楼邦彦小集团的谬论一一驳斥得体无完肤，楼邦彦的原形再也无法掩藏了。在群众的要求下，他走上台，但是他的“检讨”却空空洞洞，没有具体内容，引起到会的人很大的愤慨。】

——《打垮右派分子对人民法制的进攻 首都政法界驳倒楼邦彦》，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14日。

9月14日

首都法学界座谈会批判吴传颐、张映南，钱端升被波及。

【据新华社14日讯：今天，参加首都法学界座谈会的法学界人士斗志高昂，有力地批判了右派分子吴传颐、张映南向人民民主法制特别是向人民立法工作进攻的反动言行。这两个右派分子在大家所揭发的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

法制局副局长吴大羽首先驳斥了右派分子吴传颐污蔑我们“无法可依”和“有法难依”的谰言。吴大羽说，吴传颐所说的“无法可依”是不符合事实的。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通过了具有

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几年来，还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惩治贪污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逮捕拘留条例》，等等；并且根据工作需要，还制订了许多单行条例和规章。这些法规，刊载在《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中的有五百六十件，刊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中的有五百五十件，此外，中央各部、会和前大行政区公布的还有近三千件法规。吴大羽说，吴传颐曾任前法制委员会委员，现在国务院法制局工作，并且曾经直接参加法规汇编的编辑工作，对于我们国家在宪法公布前后所发布的许多重要法律、单行条例、规章、决定、指示等，他是知道的。他现在还要以法制工作者的身份来叫嚣“无法可依”，显然看出他只是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才看法，而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法不看法。

吴大羽说，吴传颐又说我们是“有法难依”，把人民法制污蔑成是“乱七八糟”、“矛盾百出”，把我们的国家诬蔑成到处都是“违法乱纪”的世界。这些都是吴传颐抓住一些个别例子进行歪曲、夸大，甚至无中生有地捏造出来的。例如，他举出西安市在去年中央公布戏剧免征文化娱乐税的规定以后，仍继续征收文化娱乐税的“事实”，来攻击地方政府违法。这个“事实”经向税务总局查对，证明是吴传颐捏造的。

吴大羽说，吴传颐还污蔑人民政府“对司法改革今天作结论还早”，说司法改革“是否合乎马列主义还值得怀疑”。吴传颐还公开煽动旧法人员抵抗改造，要他们不要摘掉旧法人员的帽子。问题很清楚，那就是他坚决要做旧法统的“孝子贤孙”，企图“反攻倒算”，为司法改革“翻案”，让旧法人员“上台”，从而篡夺党的领导，使旧法复辟。

吴大羽说，吴传颐污蔑我们“没有民主自由”，他说我国“法制不健全”，而“民主是要法制保护的”，“目前的民主比资本主义初期总是有些欠缺”。共

产党是“一级吃一级”、“奴性的服从”，这正反映了他对共产党的仇恨。

吴大羽还揭发了吴传颐的反动历史。他说吴传颐是特务头子陈立夫“唯生论”的信徒和宣传者。

吴传颐在会上作了检查。他承认利用大鸣大放的机会，向共产党和人民放出了三支毒箭。第一支毒箭是射向人民法制；第二支毒箭是射向司法改革；第三支毒箭是射向社会主义民主。他说，他所以在这个时候进行罪恶的活动，是他认为“气候适宜的时候到了，想起来改变现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法律室副主任易家驹揭露和批判了伪立法委员、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法律室工作的张映南的反动言行（张映南的反动言行见9月13日本报第2版）。易家驹说，张映南的“新旧法并重”的主张是企图在社会主义法律和法学的理论基础上插一把刀子，为旧法统和旧法学的复辟打开一个缺口。易家驹最后说，党和国家坚持政法工作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而张映南却企图开辟一个资本主义法统复辟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和张映南的根本分歧，我们要坚决同张映南斗争到底，保卫社会主义法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何世琨在发言中指出张映南所说的“新旧法并重”、“在法律上单靠马列主义是不够的”、“政府不重视法律科学”等谬论是别有用心，其实质就是要反动的旧法复辟，要资产阶级起来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徐平说，右派分子吴传颐、张映南主要是在立法工作方面向共产党进攻。我们和他们进行斗争，实质上是立法工作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他又说，上海的右派分子杨兆龙5月9日在《新闻日报》上发表的《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是一篇有理论、有纲领的资产阶级、国民党立法路线的宣言。紧接着上海、北京两地法学界右派分子起而响应，用各种方法污蔑我们的立法工作。徐平接着分析了这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说明斗争的严重政治意义。他说，我们法学界人士应通过这场斗争得到生动的教育。

张映南在大家的批判下，承认自己是有言论和行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首都法学界座谈会已开了三十九次会议。从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有二百多人在会上用有力的事实，与钱端升、俞钟骆、杨玉清等右派分子进行了说理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这次会前的三次座谈会上，首都法学界人士还批判了右派分子杨鹏和卢蔚乾的反动言行。杨鹏是交通部法律室专门委员，解放前做过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的辩护人。他和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关系很密切，他参加农工民主党是章伯钧介绍的。在大鸣大放期间，他污蔑党员、团员和老干部只懂得阶级斗争，没有法律知识，还不如旧社会的审判人员。原法制局专门委员、现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右派分子卢蔚乾是恶霸地主出身。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时，他就是反共能手。1949年解放前夕，他任伪经济部首席顾问。蒋阎匪帮在重庆解放前组织“行动内阁”时，卢蔚乾参加了伪经济部的战时体制会议，策划进行游击战争等罪恶勾当。解放后一贯拒绝思想改造，在大鸣大放时，他恶毒地向人民法制进攻，说法制工作落后的原因是法制机关为“三害”所支配。他又说，刑法所以迟迟不能订出，就是因为“没有学过刑法的党员在做刑法起草的领导工作”。

首都法学界座谈会将继续举行。】

——《首都法学界连续举行座谈会批判法学界败类 粉碎吴传颐张映南攻击立法工作的谬论》，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15日。

9月14日、24日

9月14日、24日，北京政法学院师生连续集会批判钱端升。钱端升在北京政法学院作检讨。对于批判的具体过程，1957年9月28日出版的《政法学院训》（副刊）对此非常详细的报道。

【假期的时光干了什么？钱端升原来妄图翻案群情愤慨，一致据理驳斥

据张守衡报道：九月十四日和廿四日，我院教职员和部分学生代表以急不可耐的心情参加了暑假以后的第一次批判钱端升的会议。根据钱端升的要求，首先由他作了长达两小时的空洞无物同时也是翻案和向党进攻的所谓检讨以后，与会同志纷纷发言，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群情愤慨的原因是什么？

还是让我们先看看他的检讨吧！……】

——见张守蘅：《钱端升原来妄图翻案》，载《政法院训》（副刊）1957年9月28日。

9月17日

《人民日报》刊文批判批判王铁崖，钱端升被波及。

【（本报讯）右派分子王铁崖（北京大学教授）在整风期间大肆活跃，到处煽风、点火，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和右派分子钱端升、楼邦彦互相呼应，把解放后党领导的高等教育说成“漆黑一团”。他除了恶毒地攻击院系调整、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和党的干部政策以外，他还狂妄自大地叫嚣着什么“国际法科学在中国已经中断了七年”，国际私法这门科学“面临极大危机，快到绝种的境地”，“国际法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干部的培养，这几年来基本是失败的，虽然有些成绩，但是缺点是大于成绩的”。

王铁崖之所以如此大肆攻击和污蔑我们的高等教育工作和国际法的研究工作，原来他是为了实现他的“大国际关系系”的阴谋。

按照王铁崖的“大国际关系系”阴谋计划，首先是要把新中国有关国际关系和外交业务方面的学校“彻底整顿”，合而为一。他提出要把外交学院、人民大学及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有关部门，都合并到北京大学来，成立一个“大国际关系系”，由他自己做系主任，不要政府来领导。

按照王铁崖的“大国际关系系”方案，第二是取消党的领导。他极力反对党委制，主张所谓“教授治校”。他还极力反对每个岗位上都安排一个或几个党员，他说这就是“宗派主义”。为了排斥党的领导，他就到处招兵买马，要臭味相投的旧法学人员“归队”，极力拉拢他的得意门生右派分子薛谋洪、周仁等人，到他的“大国际关系系”任教。

按照王铁崖的“大国际关系系”方案，第三是恢复旧法学。他提出取消“人民民主国家法”等课程，把“苏联国家法”等课程列为选修。并要把资产阶级国家法照解放前的讲法讲。他还要他领导下的教师在准备“中国外交

史”时，应把帝国主义买办学者张忠绶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

由此可见，王铁崖组织所谓“大国际关系系”的目的就在于恢复资产阶级法学，搞垮社会主义法学。

王铁崖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并不是偶然的，这不仅由于他出身于官僚家庭，从小受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奴化教育，而且据已揭发出来的材料，他还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捐客。他从英国回来以后，他和伪外交部司长王化成，而且和伪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不断勾搭。

解放初期，他一方面钻进外交学会的领导核心，另一方面又妄图把他在解放前即组织好的北大政治系外交组，作为培养他的外交人员的基地。现在，王铁崖的反党阴谋已经彻底破产了。】

——《梦想组织“大国际关系系”贩运资产阶级法学 王铁崖偷天换日的阴谋彻底破产》，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17日。

首都法学界座谈会揭露和批判陈体强，钱端升受到波及。

【据新华社17日讯：首都法学界座谈会今天揭露和批判了披着学者外衣的政治野心家、右派分子陈体强和王铁崖的反动言行，彻底揭穿了他们企图篡夺国际法科学领导权的阴谋。

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首先对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右派分子陈体强的反动言行进行揭露和批判。孟用潜说，陈体强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都不是积极分子，而在右派猖狂向共产党进攻的时候，他却成了带头点火的积极分子。他鼓动别人向党进攻，并且告诉提意见的人要集中攻击党的支部书记。5月底6月初在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座谈会上，右派分子陈体强、田保生、陈公俤发动一个签名运动，准备写信给那时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那封信是一个反党文件，他们在反对所谓高级干部特殊待遇的借口下，将党丑化成一个“反人民的、追逐享乐的封建特权阶级”。6月7日，他在法学界座谈会上攻击我国的宪法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否定我国几年来在国际法方面的成就，恶意宣传“国际法存在有危机，科学水平低得可怜”，企图向党夺取国际法学的领导权，使资产阶级法学复辟。

孟用潜又说，陈体强在国际法学方面的反共活动有他自己的一套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也就是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的。陈体强对于资产阶级国际法学是五体投地的，他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立场。陈体强说我国的“国际法学存在有危机，科学水平低得可怜”，是不符事实的。二次大战后，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日益重大的作用。在国际上同我们敌对的是帝国主义。我们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基础，争取团结民族主义和和平中立国家，争取团结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以孤立帝国主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的国际关系一定要按这个战斗方向安排，不能照抄以往的国际关系的历史和国际法标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世界做出来和写出来的。八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也有不少新的创举。八年来，我国国际关系的实践都是在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进行的，其中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并从法理上加以肯定。这只会丰富和充实我国的国际法学，哪里来的危机呢？

孟用潜又说，陈体强篡夺国际法学领导权的重要步骤是将过去搞资产阶级国际法学的人重新集中起来，成为他可以依靠的一个力量。这就涉及院系调整问题。陈体强积极支持钱端升提出的“院系再调整”，支持钱端升的不要共产党领导的大法学院计划和王铁崖的大国际关系系计划。陈体强一面支持王铁崖，一面在争夺国际法的领导方面另有一套计划。陈体强到国际关系研究所担任国际法组长后，一直企图把持国际法组作为他个人的政治资本和反党的据点。陈体强是政法学会的副秘书长，企图在政法学会成立国际法组，还想另外成立一个国际法协会。在法学界座谈会上，他公然说：“我国国际联系日益频繁，将来联合国、国际法院能派谁去？不能只凭立场而派老干部，应派一些内行的人去，在那里不能在开会时打电报回国请示，要有当机立断的能力。”陈体强狂妄的个人政治野心在这几句话里暴露得十分明显。

外交学院副院长何戊双在发言中指出陈体强在攻击新中国国际法科学的同时，还攻击了解放后从事国际法教学工作的年轻干部和培养这些干部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外交学院。陈体强以反对宗派主义为幌子，举出一些所谓“事

实”，说中国人民大学和外交学院的年轻人，垄断了国际法的教学工作以及有关的工作。何戊双说，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解放后，有一些老专家在国家机关中工作，有一些专家继续从事国际法的研究工作或做教学工作。就拿陈体强攻击的东北人民大学来看，那里的老专家不是像陈体强所说的那样“没有开课”；据我们所知，在那里有一位教授担任国际法教研组的组长，并担任一部分讲授工作。何戊双说，陈体强歪曲事实，是为了恶意攻击共产党。

政法学会副会长张志让，理事阎宝航、周鲠生，国际关系研究员李浩培也在会上发言。周鲠生在发言中着重地批判了陈体强在国际法科学方面向党进攻的谬论。他说，陈体强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敌视国家培养的国际法学的新生力量。陈体强还推崇自己是国际法的“内行”，否定老干部的作用。周鲠生说，陈体强对于国际法所发出的谬论，可以看出他是恶意地对现状不满。周鲠生要陈体强深切悔悟，彻底改造。

陈体强在会上作了检讨。他在检讨中只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没有交代篡夺国际法学领导权等方面的具体活动。参加座谈的法学界人士对陈体强的空洞检讨表示不满，纷纷写条子要他交代他和章罗联盟以及右派分子钱端升的关系。

北京大学教授、政法学会理事芮沐说，在批判陈体强时，不能不同时提到另一个右派分子王铁崖（北京大学教授），因为他们自吹“现在搞国际法的只有我们两人”。芮沐说，王铁崖一贯否定国际法科学的党性阶级性，相反的，他主张大量翻译资产阶级国际法的著作。王铁崖还叫喊国际法科学在中国“绝种”了，抹煞我国八年来建立法律科学的成就，并说共产党不能领导法学和国际法律科学，企图篡夺共产党在国际法律科学方面的领导权。到了共产党整风的时候，他的丑恶面目和野心全部暴露出来。他阴谋计划成立一个不要外交部领导的“大国际关系系”。他还恶意污蔑政法部门的领导，说“政法界保守，有关门主义”，“共产党借口阶级性强，垄断政法界”。

首都法学界座谈会还要继续举行。】

——《陈体强妄图在国际法领域中称王 首都政法界揭穿他的野心批判

他的谬论》，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18日。

9月18日

新华社全部“全国司法界反右派斗争初获胜利”。

【据新华社18日讯：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已获得初步胜利。在各省、市司法厅、局和人民法院里揭发出一批右派分子和右派小集团。右派分子妄图夺取司法工作领导权夺取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的罪恶阴谋，已被彻底揭露。

司法机关中的许多右派分子，同章罗联盟是有联系的，有的是罗隆基右派集团的骨干分子。浙江省司法厅厅长、民盟浙江省委主任委员、右派分子姜震中，就是罗隆基小集团的成员之一。福建省揭露出的省司法厅厅长、民盟中央委员兼福建省委副主任委员、右派分子何公敢，是章罗联盟在福建的据点。何公敢对人民民主专政深恶痛绝，他不仅公然散布所谓“全民民主”的反动政治主张，而且还利用司法厅长的身份包庇反革命。四川省司法厅揭露出以司法厅副厅长、民盟四川省委委员、右派分子张雪岩为首的反共小集团。张雪岩是章罗联盟中潘大逵小集团的成员之一。他在司法厅内培植心腹，积极拉拢一批对党不满的分子，整风时在群众中点火。这个反共小集团的成员之一游克斌企图改变人民法院的性质和任务，他心怀叵测地提出：“国内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现在主要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法院已不是专政的工具。”同时他认为形势变了，法院干部也应该“换班”。北京市司法局揭露出的以司法局副局长、右派分子楼邦彦为首的反共小集团，与章罗联盟领导下的以钱端升为首的包括楼邦彦、王铁崖在内的反共集团有密切的联系。

上海市司法界揭发了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民盟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何济翔为首的包括刘和平、张中、龙镇中、李国机等人的右派小集团。整风一开始，何济翔即在沈志远、陈仁炳、孙斯鸣的授意和支持下，成了一支民盟市委右派集团在司法部门的“放火队”——“民盟司法工作组”，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在大鸣大放中，他们对司法工作大肆攻击。说司

法改革是“对旧司法人员扫地出门”，说人民法制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有法乱依”，还咒骂人民审判员“既执法，又立法，简直是封王了”。

在各地司法机关揭发出的右派分子中有党外的，也有党内的。安徽省揭发了司法厅副厅长、党组书记陈仁刚的反党言行。这个党内右派分子一贯违抗组织决定，反对党的领导。他有意制造“社会上没有坏分子”的谰言，并要对反革命施仁政。整风开始后，陈仁刚和党外的一贯对党不满的右派分子、安徽省司法厅厅长李湘若里应外合向党进攻。山西省司法厅揭露出的党内右派分子、审判机关管理处副处长丁仰轩，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党内右派分子李煜审理反革命案件时，认为反革命分子反动标语是“笔下之误”；对台湾派遣潜回的特务，说是“能回到大陆来，说明有初步觉悟”，有意放纵敌人。

此外，各地律师组织也揭露出一些右派分子，他们中间不少原是旧律师出身的，根本没有改造，他们不是依照法律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是有意识地为反革命分子开脱罪责。其中有安徽省律师协会筹委会秘书长吴桐，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九三学社成员张慎，乌鲁木齐市法律顾问处见习律师杨腾高。

揭露出的这批右派分子，经过严肃的说理斗争，有些已经开始向人民低头认罪，有些尚在继续顽抗。各地司法机关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广泛深入地进行，并有计划地向省一级以下的各级司法机关逐步展开。】

——《全国司法界反右派斗争初获胜利 右派妄图夺取人民民主专政武器的阴谋破产》，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20日。

9月24日

胡适日记附英文剪报，《北平压制“右倾”——共产党电台说，两党被彻底击败》。主要内容为：北平电台9月23日晚报道，北平的共产党政府已经肃清了两个右倾反对党，即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促进会。胡适于剪报后面写道：

【查1957中共的《人民手册》，“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马叙伦、史良、高宠民。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副主席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车向忱、林汉达。

胡愈之、费孝通、潘光旦、曾昭抡、华罗庚、陈望道、吴晗、潘大逵、钱端升，都在“民盟”的“中央常委”之中。】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9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310页。

9月25日

金真批判钱端升。

——见金真：《大小“四霸天”》，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25日。

9月28日

严端在《政法院讯》发表文章《哪里是交代问题，这是反攻！》，批判钱端升。

——见严端：《哪里是交代问题，这是反攻！》，载《政法院训》1957年9月28日，第2版。

10月2日

“编者”在《政法研究》发表《捍卫人民民主法制，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文，数次提及钱端升：

【法学界右派分子为实现其反动目的，采取了一系列的阴谋手段，甚至于计划要长期准备、彻底翻案……钱端升、楼邦彦、王铁崖右派集团已经本着这个方针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他们部署力量、串联规划，要夺取我国政法教育的领导权，企图控制新中国法律科学阵地，以使用资本主义政治法律思想来为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培养人才和干部，将来打入我国政法机

构，图谋篡夺人民的天下。】

【向新中国政法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律科学进攻，是右派分子向人民民主法制进攻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右派分子仇视教育改革采取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因为这摧毁了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阵地。他们诬蔑新成立的政法院、校、系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宗派主义的发源地”。钱端升右派集团，为了搞垮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法教育基地，阴谋策划“院系再调整”，企图仿照“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模样”，成立由他控制的“大法学院”，来篡夺政法教育的领导权，恢复他们旧日的学阀统治。钱端升哼哈二将之一的王铁崖，也要搞一个“大国际关系系”，由他们右派专家来培养国家的“外交人才”，把资本主义的触角伸展到新中国的国际活动中去。】

【右派分子向人民民主法制进攻的许多阴谋计划和所玩弄的卑鄙手法，完全是有组织地进行的。他们甚至集团之内还有集团，黑店之上还有股份公司。如钱端升的右派集团，在历史上已经有二十余年的资产阶级腐朽的宗派关系。现在又与章罗联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组成为章罗联盟向法律界进攻的一支尖兵。其骨干之一楼邦彦在北京市司法机关中又有自己的反党小集团，在政法机关、学校中达成一气。内外串通，八方呼应；企图造法律界大乱之势，由他们来“收拾残局”。利令智昏，总是要在历史面前碰得粉碎的……】

——编者：《捍卫人民民主法制，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载《政法研究》1957年10月2日，第5期。

卢一鹏在《政法研究》发表《政法界的右派大将——钱端升》一文。

——见卢一鹏：《政法界的右派大将——钱端升》，载《政法研究》1957年10月2日，第5期。

10月4日

吴德峰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法学界反右派斗争必须进

一步深入开展》见报，其中提及钱端升。

——见吴德峰：《法学界反右派斗争必须进一步深入开展——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57年10月4日。

10月15日

北京政法学院《政法院训》发表报道《粉碎了钱端升妄想翻案的阴谋》。

【在全院大辩论会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

粉碎了钱端升妄想翻案的阴谋

本报讯 本月4、5两日接连举行了批判和揭露右派分子钱端升的，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大辩论会。这次会是应群众的要求而举行的。自7月1日自由讲坛的辩论会以后，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内没有召开过对钱端升的全院规模的大辩论会，只开过几次小型的教职员座谈会。钱端升自己曾要求多给他些时间，让他认真彻底检查和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全部罪行，学院因此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的钱端升却以为人民可欺，狂妄地以为即此就可以混过关去了。因此他在暑假以后的第一次教职员座谈会上，首先说了几句非常“漂亮”的话，表示“要求自己能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彻底交代罪行”，并“坚决要走生路”，然后就在几项空洞的大帽子下面大作翻案文章，妄图推翻和抵赖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对于钱端升这种颠三倒四、反复无常的恶劣态度，群众极为愤慨，一致要求召开群众大会和这个富有反动政治经验的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

这个会开了两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发言的有许醒亚、黄觉非等9人。他们摆出大量确凿的事实，从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政策、一贯的反共反苏的政治力量和狡猾抵赖的态度等方面，揭露和批判钱端升这个“政法界鼎鼎大名”的右派阴谋家。如鲁直同志系统地分析和批判了钱端升对政法教育谋划已久的进攻，指出这个进攻是从教学方针到方法、从教学内容到各种教学形式、从学生成分到培养目标、从学习苏联到联系中国实际、从攻击司法部领导到诬蔑院党委的全面进攻，是一个有纲领、有计划、有组

织的阴谋。黄觉非教授戳穿了钱端升所谓自己的野心不是“学而优则仕”的骗人鬼话，指出钱端升这个反共反苏老手早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即卖身投靠蒋介石，竭力进行种种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许醒亚同志和汪暄副教授揭露了钱端升在反右派斗争中所采取的狡猾抵赖、反复无常的卑鄙手法。戴克光教授驳斥了钱端升所谓“外行不领导内行”的谰言，他说：“钱端升对办社会主义大学是完全外行，因为钱端升的立场观点完全是资产阶级右派的，他过去几十年的办学经验只是半殖民地的办学经验。”刘庆衍同志就钱端升在民盟组织内贯彻章罗联盟反共计划的罪恶活动作了揭发。

在以上发言的有力揭露和彻底批判的过程中，大家当场提出许多问题要他回答，在群众的质问下，钱端升支支吾吾语不成章。尽管如此，一有机会他仍然进行狡赖。如群众质问他，为什么捏造事实，说我院历年分配到天津去的毕业生大多数没分配到政法部门？他在回答中竟硬说是由于听了一个毕业生所反映的意见而把原来所掌握的情况“忘记”了。诸如此类不值一驳谬论越发激起与会群众的愤怒。在群众指责下，这个富有反动政治经验的右派分子迫不得已，终于勉强答应在一个星期以后再向大家交代他的反党罪行。

钱端升的这种表示已不是第一次了。党和群众对他进行了再三再四的帮助，我们对他的要求也并不过苛，只是要他“彻底交代和认真检查”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但人民的等待是有限度的，如果右派分子钱端升始终坚持反动立场，顽固地自绝于人民，那只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结果绝不是美妙的。】

——《在全院大辩论会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 粉碎了钱端升妄想翻案的阴谋》，载《政法院讯》1957年10月15日，第12期，第1版。

10月19日

黄觉非在《政法院讯》撰文《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钱端升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的言行》。

——见黄觉非：《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钱端升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的言行》，载《政法院讯》1957年10月19日，第1版。

11月22日

李云扬发表文章《略论我国高等教育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其中提及钱端升。

——见李云扬：《略论我国高等教育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载《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2日。

12月16日

芦一鹏在《政法院讯》发表署名文章《从历史上看钱端升“没有学而优则仕”思想的真相》。

——见芦一鹏：《从历史上看钱端升的“没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的真相》，载《政法院讯》1957年12月16日，第3版。

1958年（58岁）

待考

北京政法学院国家法教研室二、三、四年级部分师生组成联合批判小组，撰写长文批判钱端升的《比较宪法》。

——北京政法学院国家法教研室二、三、四年级部分师生联合批判小组等：《批判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油印稿，国家图书馆藏。

1月5-6日

钱端升在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被取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新华社上海电）在5-6日举行的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讨论了许建国副市长关于“动员城市剩余劳动力支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

代表们根据目前上海劳动力剩余的情况，认为这个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有利于上海这个沿海工业基地的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代表们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让上海市常住人口逐步控制在七百万左右是完全必要的。代表们在讨论中提出各种控制人口增长的办法，如国家工作人员和广大职工带头动员可以回乡的家属、亲友回乡生产，里弄中推广家务服务小组减少雇用保姆和大力提倡节育、提倡晚婚，等等。有些代表还批评至今仍有不少企业不遵守国务院规定，任意到农村去招收工人的违法行为，他们要求有关部门迅速制定出具体的有效措施，杜绝这个大漏洞。

到会的六百多个代表还一致通过依法撤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沈志远、钱端升、杨逸棠、江丰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决议，和依法罢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沈志远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议。】

——《动员剩余劳动力支援农村 上海市人代会讨论控制人口增长办法》，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10日。

1月18-20日

在中国教育工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决定撤销右派分子钱端升的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并撤销其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

【据新华社讯：中国教育工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18-20日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讨论了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来，一年多时间内的工作情况以后，根据我国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的基本任务和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确定教育工会当前具体任务是实现“改造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培养新的知识分子，建立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的要求。会议指出，教育工会的成员主要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在政治上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由于他们

的家庭出身和过去所受教育的影响，其中大多数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还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因此，要使他们担负起培养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所需要的劳动者和使科学研究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样的艰巨任务，必须彻底地改造旧知识分子的思想。会议指出，过去教育工会未能明确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具体考察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队伍的思想实际情况，因此在工作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右倾情绪，片面地强调团结、强调照顾，注意了解决他们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的问题（这是今后还必须做的），但是放松了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依靠自我教育的方法。教育工会是几乎包括全体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在内的，最广泛的、群众自愿结合的组织。因此它也是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组织。

会议认为，教育工会必须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各项活动的灵魂。当前教育工会的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发动和组织群众响应党的关于脑力劳动必须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号召，参加体力劳动，接受劳动锻炼。各地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农村教师已在支援农业生产大跃进方面采取了许多积极行动。各级教育工会今后要以更大的努力，有目的、有计划地发动和组织他们支援农业生产大跃进。会议认为，工会的思想政治工作，还必须结合日常群众生活福利工作进行；组织教师参观、旅行，以加强教师对社会生活的体察和活跃教师的文化体育生活，也同样应提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

会议指出，教育工会还必须把协助行政方面办好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事业列为重要任务之一。当前应该在党的统一安排下，首先配合行政把整改工作贯彻到底，然后及时地把群众的热情引导到钻研业务、提高工作质量方面去。同时，必须引导群众认识和贯彻执行勤俭办学、勤俭办科学事业的方针。

会议认为，为了改善教育工会的领导，密切同群众的联系，首先必须加强工会的思想建设，同工会运动中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时，根据教育工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从教师队伍中来的，本身就是知

识分子的特点，认为必须适当地改造工会干部的队伍，组织工会干部参加体力劳动。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撤销右派分子钱端升的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并撤销其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撤销右派分子郑逢昌的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撤销右派分子金海观、时钧两人的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中国教育工会批判右倾情绪确定当前任务 思想政治工作要在各项活动中领先》，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23日。

1月26日

钱端升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扩大）上，被撤销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

【（新华社31日讯）各民主党派最近分别举行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或盟员代表会议，讨论了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问题和处理右派分子的问题。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月19日到25日举行了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扩大）。民革主席李济深在会上作了关于反右派斗争的初步总结和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报告。李济深从民革成员的政治状态和组织状况说明民革开展一般整风的重要性。他指出，民革成员多数是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多数人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况下，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由于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有些人还有着反动统治思想的残余，对于社会主义还是有抵触的，还不是一心一意而是三心二意的。他们对工人阶级领导还不心服或不完全心服，对劳动人民翻身坐天下还看不顺眼，对反动统治的政治、法律和生活方式还有许多留恋，有时流露今不如昔的感叹，甚至有些人对反动阶级的消灭感到切肤之痛，这些思想感情都是反动的，都是和右派相通的。这种立场是同他们今天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不相称的，如果不进行根本的改造，在大风大浪当中，就会

迷失方向，站不住脚跟，甚至有坠入右派泥坑的危险。因此，每个成员都应该自觉地、积极地参加一般整风，争取在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上，继续向前跨进一大步。

会议还决定撤销龙云的副主席职务，陈铭枢的中常委兼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主委职务，黄绍竑的中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谭惕吾的中常委、中委、中央妇委副主任等职务，李俊龙的中常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会议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的其他右派分子也作了处理。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在1月26日召开第十七次会议（扩大），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右派分子，分别作了处理，同时通过《关于全盟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通知》，号召全盟立即在反右派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一般整风。会议决定撤销章伯钧、罗隆基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撤销叶笃义的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职务；沈志远的中央常务委员职务；马哲民、郭翹然、潘大逵、钱端升、韩兆鹗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撤销曾昭抡中央常务委员、中央高教研究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撤销费孝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文教部部长的职务；撤销黄药眠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撤销潘光旦中央常务委员、中央联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撤销李伯球、陈仁炳、彭文应、黄琪翔、钱伟长等中央委员职务。

会议还听了民盟副主席高崇民所作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的报告，通过了《在全盟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通知》。高崇民在报告中指出，为了使民盟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真正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就要通过以改造政治立场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在全盟进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教育，对盟员个人和盟的组织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社会主义关，这是民盟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

——《改造政治立场为社会主义服务 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胜利开始

整风 撤销右派分子在民主党派中的领导职务》，载《人民日报》1958年2月1日。

2月1日

钱端升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被撤销代表资格。

【(新华社1日讯)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马明方, 2月1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的代表资格和右派分子章乃器等三十八人的代表资格问题的审查报告》, 全体通过了这个报告。报告的全文如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第四次会议到第五次会议期间逝世的有穆义提、黄延芳、陈成义、蓝公武、官文森、齐白石、杨刚、简玉阶、王统照、吴焕或、龙三公十一人; 撤销代表资格的有右派分子钱端升、沈志远、杨逸棠、江丰、刘兰畦、沙文汉、杨思一、王国松、李士豪、宋云彬、姚顺甫、冯雪峰、曾昭抡、向德、谭惕吾、雷天觉十六人, 连同第四次会议以前的缺额五人, 应该补选三十二人。在第四次会议到第五次会议期间, 浙江省补选了吴宪、俞仲武、俞佐宸、徐赤文、唐巽泽、董聿茂、潘天寿、霍士廉八位代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据代表当选证书和其他有关材料, 就上述八位代表的代表资格进行了审查。审查结果, 认为应该确认他们的代表资格有效。】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向大会提出建议 右派分子丧失了人民代表的资格 章乃器等三十八人不应出席会议》，载《人民日报》1958年2月2日。

3月5日

钱端升被国务院撤销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职务。

【(新华社5日讯)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今天在国务院副总理、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主持下开幕。会议的任务是听取和讨论中国

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并安排 1958 年度的科学研究计划。

会议开始时，首先由秘书长范长江宣布了国务院关于撤销右派分子曾昭抡、钱伟长、钱端升、陈达、费孝通、李宗恩、袁翰青、周慧明八人的委员职务的决定。

中国科学院院长、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郭沫若今天上午向会议作了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的总结报告。他说：今年 1 月 18 日签订的《中苏两国政府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议定书》，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它为我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大跃进，准备了重要的国际合作条件。议定书的主要内容是更有计划、有重点地和苏联进行科学研究的全面合作；巩固和发展两国科学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之间的直接联系；商定两国科学家的来往主要将采取以短期学术公差为主的方式；解决了关于非商品的科学设备、器械、仪器、样品、材料、试剂以及少量零星器材的供应问题；并决定了执行议定书的两国的总的监督和协调机构，中国方面为中国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苏联方面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并明确规定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在执行本议定书中的任务。

郭沫若还谈到了对学习苏联发展科学事业的基本经验的体会。他指出苏联科学最基本的经验，在于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具体表现在以下八点：一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二是重点发展、全面安排；三是科学研究的计划性和协调工作；四是大力解决科学干部问题；五是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六是保护学派、提倡学术界的自由争论；七是勤俭办科学；八是重视科学情报工作。

他建议广泛深入地宣传和介绍苏联科学技术的成就和先进经验，以及中苏两国政府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他要求我方有关部门必须做好准备，以认真执行两国政府议定书中规定的合作项目。此外，在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在科学技术的研究上应该坚决采取以掌握和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苏联先进成就为主的方针，

同时注意发扬我国的科学遗产，总结我国工农业生产中的群众经验。同时，还要大力培养科学研究干部。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姜君辰作了以《争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重大发展》的报告。他说：哲学社会科学组织工作方面，从去年10月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办公机构以来，主要做了三件事情：先后成立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哲学、经济、历史、文学、法学、教育等七个专业小组，其中一部分已开始工作；对《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作了修改；草拟了1958年科学规划委员会掌握的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姜君辰接着对科学规划委员会今后开展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他最后说，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对促进生产大跃进是有重大意义的，在这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界担负着重大任务，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当前整风运动当中，继续开展思想批判，进行自我改造，鼓起革命干劲，使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来一个大跃进。

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武衡报告了1957年的研究工作情况和1958年的研究计划说明；冯仲云委员和李达委员作了重点发言。

这次会议将进行五天。参加的有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地方政府的代表、有关机关、团体的代表、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的团员和顾问等一百七十余人。】

——《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苏联先进成就 促进科学研究工作大跃进 科学规划委员会举行会议安排今年度计划 郭沫若作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的总结报告》，载《人民日报》1958年3月6日。

3月10日

钱端升被停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

【（新华社17日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10日举行了第五十次会议。

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关于整风办法的规

定》。规定说明：目前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全国范围广泛展开整风运动。政协组织也应该积极进行整风，就各方面在整风运动中辩论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和政协工作等带有根本性的共同性的问题，有计划地组织大辩论。以便通过学习和大辩论的方式，一方面，同资产阶级右派划清界限，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另一方面，克服工作中的缺点，改进政协的工作。会议又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名单》。

会议还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周鲸文的委员资格的决议》。

会议还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关于停止右派分子章伯钧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和右派分子章乃器等八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的决定》；又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关于撤销右派分子叶笃义等十二人职务的决定》。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的名单》。

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工作组组织简则》和《关于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处理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议案和建议案的初步处理意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关于停止右派分子章伯钧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和右派分子章乃器等八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的决定

停止右派分子章伯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停止右派分子章乃器、陈铭枢、罗隆基、黄琪翔、钱端升、叶恭绰、刘王立明、王葆真等八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

1958年3月10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规定 政协组织应积极进行整风 停止右派分子章伯钧政协副主席职务和右派分子章乃器等八人政协常委职务》，载

《人民日报》1958年3月18日。

1959年(59岁)

4月12日

钱端升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特别邀请人士(三百零八名)】

丁武选	于洪深	方与严	方少逸	方光焘	方鼎英	王之
王云霖	王只谷	王世英	王达甫	王冷斋	王克俊	王伯祥
王树常	王复初	王家楨	王致中	王笑一	王启贤	王弼
王宽诚	邓士章	邓哲熙	仇 鳌	甘思和	石志本	龙 云
卢庆骏	卢宗澄	申伯纯	叶长庚	叶恭绰	叶景莘	田奇隼
田厚义	白志文	白 薇(女)	江炳灵	江恒源	安春山	
安若定	刘子奇	刘少白	刘先胜	刘多荃	刘向三	刘定五
刘定安	刘学文	刘昌义	刘 型	刘显宜	刘俊峰	刘 斐
刘道衡	刘敬宜	刘瑶章	刘 贻	刘芦隐	米暂沉	孙文淑(女)
孙兰峰	孙本旺	孙仲逸	光 升	朱大纯	朱石麟	朱启铃
朱 遂	朱涤新	朱鼎卿	朱洁夫	乔明礼	伍培英	伍献文
华国英	沈从文	沈志远	沈体兰	沈济川	沈肇年	宋云彬
宋任远	宋 应	宋 筠	辛葭舟	苏延宾	劳敬修	杜春晏
李力果	李子诵	李木庵	李世杰	李乐平	李学海	李运昌
李春田	李保森	李祖荫	李 振	李根源	李书城	李培基
李 觉	李 隆	李嘉仲	李 耀	陆殿栋	陈云章	陈公培
陈半丁	陈丕扬	陈正湘	陈北辰	陈 达	陈先瑞	陈克非
陈明仁	陈豹隐	陈寅恪	陈 铁	陈铭德	陈瑾昆	吴文藻
吴化文	吴自立	吴家象	吴景超	吴诚忠	余纪一	谷 牧
何思源	何维忠	何 贤	何 辉	何 鲁	何德全	郑洞国

郑辟疆	武和轩	武惕予	林之翰	林葆骆	林虎	松谋
张广才	张之江	张仁初	张汉武	张有谷	张学铭	张松龄
张述祖	张家树	张振汉	张瑞麟	张震球	张慕尧	张德含
张濯清	孟庆山	邵循正	罗仁全	罗英	罗明	罗培元
罗湘涛	金芝轩	金城	周子祯	周文龙	周玉成	周亚卫
周仲英	周祥初	周凤九	周瘦鹃	周嘉彬	周鸣瀾	周骏鸣
邹秉文	洪沛	赵世兰	(女)	赵君迈	赵承金	赵启騄
赵熔	胡金魁	柯璜	范治农	茅祖暉	侯政	侯策名
浦熙修	(女)	高卓雄	唐生明	唐星	唐登岷	秦德君(女)
晋巩	马保三	马锡五	袁牧之	袁敦礼	茹欲立	倪志亮
倪征燠	徐介藩	徐长勋	徐洽时	凌其翰	梁从学	梁守槃
梁漱溟	章士钊	郭子化	郭宝珊	郭宗汾	康心之	康同璧(女)
曹焕文	梅汝璈	陶亨咸	陶峙岳	陶晋初	萧新槐	崔载之
汤传篪	童炎生	曾昭抡	曾苏元	曾泽生	彭文和	彭杰如
彭明治	彭镜秋	(女)	惠世如	覃异之	费彝民	黄子卿
黄文熙	黄启汉	黄绍竑	黄觉庵	黄翔	黄药眠	黄新彦
黄雍	喻楚杰	喻纉云	盛彤笙	程坦	程悦长	焦实斋
焦鸣奎	傅作义	傅柏翠	傅道伸	傅鹰	贾亦斌	杨公庶
杨松青	杨尚儒	杨拯民	杨建新	杨梅生	杨崇瑞(女)	
杨第甫	董守义	董竹君	(女)	董其武	董渭川	端木杰
廖安邦	廖沫沙	廖运泽	裴丽生	蒙定军	熊十力	熊大仕
熊秉坤	潘寿才	潘伯鹰	潘峰	蔡金涛	鲁崇义	赖毅
阎又文	阎宝航	冀春光	钱钧	钱端升	穆成宽	韩伟
韩祖德	韩诵裳	薛笃弼	钟成亮	钟赤兵	聂洪钧	戴文彬
戴济民	戴戟	魏自愚	顾卓新	顾懋勋	饶国模(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载《人民日报》1959年4月12日。

1961年(61岁)

4月30日

胡适等人在台湾闲聊中提及钱端升的境况：

【晚饭后，钱思亮夫妇来，大家就在客厅里随便谈天。先生说翁文灏的父亲是个大少爷，他本人也是大少爷出身。后来在比利时进一个修士办的学校，又受了这些修士的训练，养成了一种非常刻薄的性格，人家很难做他的下属的。据说翁文灏已经死了。李仲揆（四光）也病了。后来谈到陈寅恪，又谈到姜立夫。“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外，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先生也谈起“思杜1958年上半年之后就没有信来过，恐怕是不免了。”】

——胡颂平编：《胡适之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58-159页。

12月16日

钱端升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

【（新华社16日讯）中央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等单位根据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最近又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

这一批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有：钱端升、冯雪峰、柳湜、黄药眠、徐懋庸、许宝骥、陈达、吴景超、傅种荪、马松亭、孟鞠如、杨崇瑞、杨逸棠、刘一峰、王一帆、吴绍澍、王枕心、何北衡、李健生、顾执中、丘克

辉、吴春选、吴祖光、艾青、白朗、罗烽等三百七十多人。】

——《中央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 摘掉一批确实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载《人民日报》1961年12月17日。

12月20日

胡适谈起《联合报》上关于钱端升等摘去右派帽子报道。

【先生谈起前天《联合报》上登载大陆学人摘去右派帽子的姓名有三百七十多人，但此间发表出来的名单不过二十四个人。第一名就是钱端升。这里面一些年轻——四十来岁的如陈达（人口专家）等，好多是清华出国成绩很好的人。】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844页。

1962年（62岁）

4月25日

钱端升等集会谴责美国侵略越南。

【（据新华社25日讯）首都法律界人士今天上午举行集会，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越南南方，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反美爱国的正义斗争。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吴德峰主持今天的集会。他代表中国法律工作者表示坚决全力支持越南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和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他说，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的越南南方人民的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是正义的，是符合越南南方人民要求的，获得了全世界主持正义的人民的广泛同情和积极支持。

吴德峰说，1954年《日内瓦协议》必须贯彻，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必须得到维护，美帝国主义必须立即停止对越南南方的侵略和干涉，必须从越南南方滚出去。

政法学会副会长张志让说，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南方进行“不宣而战”的战争，严重地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粗暴地破坏了1954年《日内瓦协议》。他呼吁世界各地人民必须对美帝国主义这种侵略行动进行坚决斗争，使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的侵略阴谋遭到彻底的失败。政法学会理事史良发言说，最近，美帝国主义更加明目张胆地采取三光政策，将一千多万越南南方人民推入血海，这种残暴行为是与德、日法西斯一脉相承，而又更加绝灭人性。

政法学会理事李浩培、刘镜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副主任韩铭立等在发言中指出，美帝国主义公然在越南南方成立军事司令部，越来越多地把军队、武器和军事人员等运进越南南方，这是严重地破坏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行为，必须加以制止。

政法学会理事何戊双、周新民，北京政法学院教授严景耀，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珉在发言中谴责肯尼迪上台以来对越南南方进行更加疯狂的干涉和侵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秘书长彭炎说，中国红十字会强烈谴责美吴集团的这种罪行，并且认为全世界各国红十字会都应一致声讨美吴集团这种绝灭人性、侮辱人类尊严和违反世界公认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罪恶活动。

政法学会理事李祖荫、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芮沐、北京政法学院教授雷洁琼、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龚祥瑞先后在会上发言时一致指出，美帝国主义和美吴集团这一切都是吓不倒经过斗争锻炼的越南南方人民的。

今天在会上发言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支持越南人民正义斗争的还有政法学会理事、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孙格巴顿，北京政法学院教授钱端升、戴克光，北京大学国际法教授赵理海，政法学会理事潘汉典、陆殿栋等。】

——《首都法律界人士集会支持越南人民斗争 谴责美国破坏国际法准则侵略南越的罪行》，载《人民日报》1962年4月26日。

待考

钱端升开始奉高等教育部指派主编教材《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

【值得一提，却又令人深感痛惜的是，1962年我在北京政法学院奉命主编一套高等教育部拟定的教材，书名是《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其时，按原计划我从五六十名西方著名学者的书籍中酌择其要旨，由其他三人译成中文约一百五十万字，译后由我最后校阅，并对原著者写简短的介绍。全书成七八篇，二三十章，每章每篇也由我作篇章介绍，最后加以编者的长序。此项工程颇大，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已译一百二十万言，其中约十分之六七已经过我最后校阅；我还部分写出作者个人介绍。可叹“文革”，这一小小事业就成了“革命”的对象，译稿至今不知去向。】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0页。

1963年（63岁）

1964年（64岁）

12月14日

钱端升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特别邀请人士（四百三十九名）】

丁武选、丁秋生、于明涛、于洪深、于毅夫、万昕、马文瑞、马连良、马明德、马佩勋、方与严、方少逸、方善境、方鼎英、王大甫、王文义、王凤振、王凤梧、王世英、王只谷、王达甫、王启贤、王克俊、王伯祥、王学明、王诗恒（女）、王珊（女）、王致中、王宽诚、王家桢、王尊三、王弼、王慰曾、王耀武、戈定远、牛佩琮、毛钟鸣、毛懋卿、仇鳌、邓士章、邓汉祥、邓金铄、邓洁、邓洪、邓哲熙、邝安坤、冯兰洲、冯平、冯达、甘思和、石志本、卢宗澄、申伯纯、叶胥朝、叶恭绰、叶培大、叶景莘、叶毓芬（女）、田心、田厚义、田裕民、史永、白纪年、白志文、白薇（女）、司徒

慧敏、江炳灵、汤传麋、安志藩、安若定、安春山、刘士豪、刘飞、刘少白、刘先胜、刘向三、刘多荃、刘志汉、刘芦隐、刘君实、刘定安、刘雨岑、刘昆水、刘昌义、刘昌毅、刘绍庭、刘型、刘显宜、刘逊夫、刘家琦(女)、刘道衡、刘敬宜、刘斐、刘楷、刘瑶章、刘嘉树、刘贻、庄田、关士聪、关学文、米哲沉、吕斯百、吕澄、朱大纯、朱子帆、牛石麟、朱洁夫、朱涤新、朱遂、朱鼎卿、乔明礼、伍培英、伍献文、华国英、孙兰峰、孙廷芳、孙仲逸、孙孚凌、孙揆一、孙瀛洲、沈从文、沈从龙、沈志远、沈体兰、沈肇年、沈德纯、宋云彬、宋应、宋希濂、宋君复、宋劭文、宋维静(女)、宋裕和、辛葭舟、苏延宾、杜聿明、杜新波、李力仁、李子诵、李六如、李世杰、李乐平、李冲和、李伯球、李学海、李宝实、李果珍(女)、李觉、李春田、李荫楨、李保森、李悦言、李振、李根源、李雪三、李培基、李隆、李嘉仲、李整武、李耀、杨公庶、杨汉章、杨运珊、杨松青、杨尚儒、杨国夫、杨建新、杨济生、杨拯民、杨种兰、杨梅生、杨崇瑞(女)、杨耀德、束世澄、吴山民、吴文藻、吴世昌、吴仲华、吴仲超、吴咏湘、吴志超、吴诚忠、吴岱峰、吴家象、吴崇筠(女)、吴溉之、吴善多、吴敬业、吴景超、吴嘉民、余纪一、余非、余洪远、邱先通、何如愚、何克希、何贤、何思源、何维忠、何辉、何鲁、何德全、邹秉文、邹春座、邹钟林、张广才、张之江、张弓、张天云、张中、张仁初、张汉武、张世纲、张执一、张有谷、张有龄、张怀璞、张克明、张克侠、张作梅、张泊泉、张学铭、张宗燧、张英、张述祖、张松龄、张承祜、张宪武、张荣臻、张振汉、张瑞、张瑞麟、张慕尧、张曙时、陆殿栋、陈公培、陈半丁、陈正湘、陈丕扬、陈北辰、陈达、陈先瑞、陈华、陈克非、陈国栋、陈明仁、陈茹玉(女)、陈铁、陈涵奎、陈寅恪、陈康白、陈铭德、陈舜礼、陈璧如(女)、邵子言、邵均、邵循正、郑易里、郑洞国、郑辟疆、武惕予、范汉杰、范治农、范秉哲、范琪(女)茅以新、茅祖浸、林之翰、林文莹、林平一、林达光、松谋、罗仁全、罗明、罗培元、罗隆基、罗绳武、罗湘涛、岳劫毅、周子祯、周玉成、周亚卫、周诚浒、周鸣鷄、周祥初、周骏鸣、周康民、周跋、周瘦

鵬、周嘉彬、孟庆山、孟绍濂、洪沛、施嘉干、项叔翔、赵君迈、赵品三、赵深、赵琮、胡春圃、胡弼亮、胡懋华（女）、茹欲立、柳士英、侯仁之、侯政、饶辅民、费彝民、姚维钧（女）、贺东生、贺诚、贺培真、浦熙修（女）、高卓雄、郭汝瑰、郭宗汾、郭宝钧、郭宝珊、郭和夫、郭增恺、唐生明、秦元珍（女）、秦德君（女）、袁世海、袁敦礼、晋巩、聂洪钧、贾亦斌、顾启文、顾卓新、顾家杰、顾懋勋、晏福生、爱新觉罗·溥仪、钱希钧（女）、钱钧、钱端升、倪志亮、倪征燠、徐介藩、徐长勋、徐肇和、陶峙岳、陶晋初、凌其翰、梁从学、梁国兴、梁漱溟、章伯钧、康心之、康同璧（女）、阎宝航、阎揆要、萧丹峰、萧贤法、萧新槐、梅汝璈、曹承宗、曹冠英、曹菊如、曹焕文、龚苏民、盛彤笙、童炎生、童宪章、曾泽生、曾昭抡、曾碧漪（女）、谢威、谢瑞阶、谢锡臻、彭加伦、彭杰如、彭明治、彭镜秋（女）、蒋全（女）、蒋丽金（女）、蒋溶、黄子卿、黄异生、黄启汉、黄绍竑、黄觉庵、黄药眠、黄逊非、黄翔、黄新彦、黄雍、葛敬恩、董守义、董竹君（女）、董其武、董渭川、韩文信、韩伟、韩铁声、惠世如、覃异之、喻楚杰、喻缦云、程坦、程明升、焦实斋、傅其芳、傅柏翠、傅崇碧、傅道伸、鲁崇义、雷天觉、雷平（女）、雷震、裘法祖、蒙定军、蓝马、楼福卿、赖西夔、赖毅、端木杰、廖安邦、廖运泽、廖沫沙、廖耀湘、谭少佳、谭希林、蔡佩莹（女）、熊十力、熊正必、熊秉坤、潘寿才、潘孝硕、潘伯鹰、潘峰、薛立平、薛笃弼、冀春光、穆成宽、蹇先任（女）、戴文彬、魏自愚】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姓名均按笔划排列）》，载《人民日报》1964年12月14日。

1965年（65岁）

8月6日

钱端升出席全国政协欢迎李宗仁先生茶会。

【（新华社6日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今天下午举行茶

会，欢迎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以及陪同李宗仁先生回来的程思远先生。

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主持了今天的茶会。

出席欢迎茶会的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彭真、陈毅和黄炎培及夫人姚维钧，副主席徐冰及夫人张晓梅，副主席高崇民、邓子恢和傅作义及夫人刘芸生，副主席沈雁冰及夫人孔德祉。出席茶会的还有参加过1949年南京和谈代表团成员邵力子及夫人傅学文，代表团成员章士钊及夫人奚贞。

彭真副主席在茶会上致词。他说，李宗仁先生在海外16年，这次毅然回到祖国，加入爱国反帝的行列，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值得欢迎的。这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一个胜利。在李宗仁先生一生的政治生活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抉择和转折点。我们大家对此十分高兴，热烈欢迎。

彭真副主席说，我们党和国家对于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员和海外各方人士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所有在海外的人士，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凡是愿意走爱国反帝道路的，我们都欢迎。在座的朋友有些就是在解放以后回来的，我们欢迎。这次李宗仁先生和郭德洁女士回来，我们欢迎。今后对于所有从海外回到祖国的人，我们也一样欢迎。

彭真副主席说，李宗仁先生最近常常讲，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的，的确是这样。我们伟大的祖国各方面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16年前是大大不同了。这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经过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斗争的结果。

他说，一百多年来，特别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为了我国人民的翻身和国家的富强繁荣，无数仁人志士曾经提出各式各样的主张，做过各式各样的试验，但是都没有成功。中国人民经过无数次的斗争和挫折，取得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最后终于找到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国人民几十年来，在党和毛主

席的领导下，不断地战胜各种困难，克服各种错误和缺点，提高认识和觉悟，建立起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强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日益富强的国家。

彭真副主席最后指出，目前国内外的形势很好。我们坚信，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共同努力，奋发图强，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李宗仁先生接着讲话。他对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茶会欢迎他，表示感谢。他说，这些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表现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英雄气概，使国势蒸蒸日上。宗仁此次不远万里归来，实由于祖国日益强大。深望此一行动，能引起台湾军政人员和海外爱国人士同声响应，相率来归，促成国家最后统一。

李先生说，我所以决定返国，还因为对于美帝本质有了深切的认识。尤其最近一年以来，约翰逊政府积极扩大侵越战争，甚欲借此挑起一场跟中国人民为敌的战争。情势发展至此，我不能再对美帝国主义寄以任何幻想，并愿置身爱国卫国行列。

他说，宗仁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回到祖国，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殷殷照顾，优礼有加，内心铭感，毕生难忘。今后愿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同全国人民一道，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加强团结，为爱国反帝，实现台湾解放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而共同努力。

在茶会上，各界人士欢聚一堂。首都著名的文艺工作者在会上演出了精彩节目。

出席茶会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有：于树德、马寅初、王芸生、王学文、王雪莹、王照华、孔祥祯、卢汉、卢郁文、刘文辉、吉雅泰、朱蕴山、伍修权、孙晓村、宋裕和、严希纯、苏子衡、李国伟、杨东莼、吴研因、张孝骞、张奚若、陈此生、林修德、季方、周士观、屈武、俞大绂、钟

惠澜、侯德榜、饶毓泰、闻家驷、聂洪钧、徐伯昕、徐楚波、萨空了、曾宪植、董其武、舒舍予、傅连璋、赖际发、蒲辅周。

出席茶会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有：王昆仑、陈劭先、胡愈之、茅以升、胡子昂、胡传揆、陈其瑗、沈德纯、黄子卿、李俊龙、李蒸、侯镜如、翁文灏、千家驹、浦洁修、王力、郑昕、顾颉刚、黄琪翔、黄鼎臣、裴文中、叶浅予、梅龚彬、申伯纯、辛志超、郭则沉、孙承佩、宋希濂、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爱新觉罗·溥仪、黄绍竑、覃异之、廖耀湘、苏从周、周范文、贺麟、向达、翁独健、张纪元、葛志成、秦伯未、徐彬如、王之相、金克木、袁翰青、游国恩、程希孟、薛愚、关瑞梧、侯宝林、韩世昌、吴半农、陈岱孙、朱光潜、李麟玉、赵君陶、胡庶华、王子野、吴景崧、曹谷冰、叶心清、方善境、王伯祥、吴景超、何鲁、茅以新、袁世海、钱端升、蒋全、黄药眠、廖沫沙、王葆真、李平衡、楚溪春、古耕虞、吴大琨、吴觉农、资耀华、虞效忠、田富达、经叔平、凌其峻、王炎之、卢心远、张楚琨、巨赞、皮漱石、刘品一、陈撷宁、阎迦勒、王家楨、仇鳌、邓哲熙、叶景莘、刘瑶章、孙孚凌、李觉、何思源、张振汉、陈达、陈铭德、周亚卫、周嘉彬、赵君迈、凌其翰、梁漱溟、萧贤法、梅汝璈、黄翔、黄雍、董守义、焦实斋、陈公培。

出席茶会的还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国务院参事以及各界知名人士李任仁、刘仲容、华罗庚、沙千里、罗叔章、余心清、陈离、乐松生、胡子婴、谢南光、何基沣、李明扬、曾一凡、张知行、孙荪荃、舒宗鎏、谭惕吾、王卓然、李奇中、胡公冕、董燕梁、李一平、谌小岑、郭秉毅、郭兰英、王昆、李和曾、高玉倩、夏美珍、刘宝瑞、徐有光、寇家伦。

中共中央机关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平杰三、刘述周、周荣鑫、王新亭、冯铨、武新宇、薛子正、金城、罗青长、连贯、李金德、姚仲康、曹禺、高登榜等，也出席了茶会。】

——《政协举行茶会欢迎李宗仁先生 周恩来主席主持茶会 彭真副主

席致词》，载《人民日报》1965年8月7日。

1966年（66岁）

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下半年

钱端升奉高等教育部指派主编教材《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完成十分之六七，但文革开始即不翼而飞，引以为憾。

【……此项工程颇大，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已译一百二十万言，其中约十分之六七已经过我最后校阅；我还部分写出作者个人介绍。可叹“文革”，这一小小事业就成了“革命”的对象，译稿至今不知去向。】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著：《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0页。

1967年（67岁）

1968年（68岁）

1969年（69岁）

1970年（70岁）

1971年(71岁)

10月30日

钱端升已经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上班。

【乔冠华领命后，马上进入紧锣密鼓的临战状态。他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专程拜访外交部顾问、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上班的钱端升先生，商讨赴美事宜。

钱端升(1900-1990)，是资深的外交人士，曾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后曾出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曾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罗银胜：《才情人生乔冠华》，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页。

夏红注：

钱端升的长子钱大都曾记述乔冠华造访钱宅后，将侵占钱宅的北京政法学院工人们清理出去一事。可作为文革中钱端升的旁证。

1972年(72岁)

6月14日

费正清访华。钱端升出席乔冠华宴请费正清宴会。

【(新华社1972年6月14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乔冠华今天下午会见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夫人，会见时在座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有柯柏年、马家骏等。

会见后，乔冠华副会长设便宴招待费正清教授及夫人。金岳霖教授、钱端升教授等和美国友人柯弗兰、艾德勒出席了便宴。】

——《乔冠华副会长 会见并宴请美国费正清教授和夫人》，载《人民日报》1972年6月15日。

费正清回忆录述及此次宴会：

【当乔冠华设宴款待我们时，他的老师，逻辑学家金岳霖和钱端升一起参加了宴会。真正是老朋友了，他们穿着新制服，坐着轿车到来。他们两人都曾处于被隔离的状态。钱端升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来，一直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实际上，他被安排就座于餐桌的角落里，尽可能地远离主人。我几乎料想宴会供给他的只是几根狗骨头罢了。乔冠华以大家都听到的声音建议让钱端升、金岳霖两人到我们下榻的宾馆来看望我们。显然，这是在授权公安人员安排这件事。当他们来到我们的房间时，我们都为旧友重逢而感到兴奋激动。但他们对自己个人的遭遇却只字不提。我向他讲述了当我被指责与钱端升交往而同麦卡锡主义者争吵时，他却闭口不谈当年他被指责与我通信时的相同经历。他加强语气强调说：“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这就简洁地给了我们一个信息——绝不会这样！】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507-508页。

12月13日

钱端升出席周培源欢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学者访华代表团宴会。

【（新华社1972年12月13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培源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艾士坦教授为团长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学者访华代表团。

艾士坦教授的夫人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罗伯特·阿·斯卡拉皮诺和夫人、鲍大可、裴路生、罗伯特·吉尔摩和夫人、约翰·迪博尔德、卢亦汉、欧迈格、范乃思、肖约、牟锐，应邀出席宴会。

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部长助理章文晋，外交学会秘书长周秋野等出席了宴会。

周培源副会长和艾士坦团长先后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举杯祝酒。

出席宴会的还有冯友兰、吴蔚然、钱端升、费孝通、陈岱荪、周一良、

马海德、苏菲、王蒂激、庄则栋、李恩求、马家骏、钱大镛、邢仁先、谢启美、董超等。

代表团是12日晚上抵达北京的。】

——《周培源副会长举行宴会欢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学者访华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72年12月14日。

1973年（73岁）

3月12日

钱端升参加孙中山先生逝世四十八周年纪念活动。

【（新华社1973年3月12日讯）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纪念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四十八周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和许德珩，廖承志同志，在北京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参加了纪念仪式。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此生主持纪念仪式。

纪念仪式在上午十时举行。到会的各界人士在孙中山先生遗像前肃立、静默。傅作义副主席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孙中山先生遗像前献了花篮，廖承志同志献了花篮，随后刘友法代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朱蕴山代表民革中央委员会，杨俊生代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有：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于树德、王芸生、邓初民、史良、孙晓村、苏子衡、李国伟、杨东莼、吴研因、张孝骞、季方、周士观、赵朴初、荣毅仁、钟惠澜、袁任远、徐伯昕、萨空了、董其武；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卢汉、刘文辉、刘仲容、刘孟纯、刘斐、甘祠森、吴茂荪、侯镜如、许闻天、钱昌照、王葆真、李平衡、李俊龙、李蒸、陈离、聂轰、焦实斋、邵恒秋、覃异之；

各界人士：马纯古、区棠亮、庄希泉、严济慈、茅以升、罗叔章、胡子昂、胡厥文、胡耀邦、胡愈之、李金德、沙千里、汪菊潜、张含英、谭真、胡子婴、谢冰心、费孝通、叶圣陶、游国恩、吴作人、钱端升、尹赞勋、裴文中、顾颉刚、沈谦、王历耕、黄长水、庄明理、连贯、邹秉文、李明扬、王克俊、何思源、周嘉彬、王家桢、陈铭德、黄鼎臣、严信民、孙承佩、李文宜、葛志成、李伯球、梁漱溟、赵君迈、吕澂、刘品一、沈兹九、廖梦醒、阿沛·才旦卓噶、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程思远、郭有守、宋伟斌、洪希厚、郭翼青；

北京市政协等各方面人士：王林、王源兴、夏翔、丁贡南、关世雄、李贻赞、劳君展、陈士骅、顾均正、苏从周、张克明、李文澜、傅学文、闻家驷、浦洁修、莫艺昌、孙孚凌、徐楚波、王颖。】

——《首都各界人士举行纪念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四十八周年 政协副主席傅作义和许德珩，廖承志同志等参加纪念仪式 上海南京广州各界人士分别举行纪念仪式》，载《人民日报》1973年3月13日。

4月27日-5月

钱端升前往前门饭店，看望来北京的赵元任夫妇。

【到前门饭店前来看望元任夫妇的有邹秉文夫妇、章元善夫妇、张奚若夫人、韩权华女士、钱端升教授、丁绪宝夫妇等老同学和老朋友；来访的还有王岷源夫妇、严人赓夫妇、周一良夫妇、卞学镇、梅祖彦夫妇、李光模夫妇等。亲友往往多次来访，会客间里客人不断，每餐饭经常要开两桌，亲友也多次在饭馆请元任一家吃饭，一面开怀畅叙，一面让元任夫妇吃上真正的家乡风味，如北京烤鸭和涮羊肉等。】

——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80页。

5月6日

钱端升出席周培源宴请瑞士前政治部长宴会。

【(新华社1973年5月6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培源和王蒂澂同志今天晚上设宴招待瑞士前政治部长马克斯·彼蒂彼爱和夫人。

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周秋野、王本祚、钱端升、王尔庆、杨桂荣等出席了宴会。

瑞士驻华大使纳蒂拉尔和夫人也出席了宴会。

彼蒂彼爱和夫人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5日晚上到达北京的。】

——《周培源副会长宴请瑞士前政治部长彼蒂彼爱》,载《人民日报》1973年5月7日。

5月14日

赵元任夫妇在鸿宾楼请客,答谢钱端升等。

【5月14日,在鸿宾楼请客,有杨若宪和傅承义、杨赛(?)和鲍正鹄、王岷源和钱端升,还有旅游局的林慎木、周盼、苗同志和司机等人,答谢几天来的照顾。】

——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83页。

6月6日

钱端升出席外交学会欢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招待会。

【(新华社1973年6月6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今晚举行招待会,欢迎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主席迈克尔·布卢门撒尔、会长查尔斯·约斯特率领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

外交学会副会长周培源,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晋,以及有关人士谢黎、李思求、史林峰、钱端升、钟毅、徐立章、肖敬若、王蒂澂、丁原洪、林慧卿、李富荣等出席了招待会。招待会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霍尔德里奇和联络处其他官员应邀出席招待会。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6月5日到达北京的。】

——《我外交学会举行招待会欢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73年6月7日。

7月3日

钱端升出席周秋野宴请美国国会议员团宴会。

【（新华社1973年7月3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秋野今晚设宴欢迎由团长沃伦·马格纳森、副团长托马斯·摩根率领的美国国会议员团全体成员以及他们的夫人和随行工作人员。

参加宴会的有人大常委会委员贝时璋，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川，以及有关方面人士史林峰、钱端升、吴蔚然、钱伟长、康岱沙、程齐虹、千昌奎等。

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詹金斯和夫人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美国国会议员团一行23人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于7月2日到达北京的。】

——《周秋野宴请美国国会议员团》，载《人民日报》1973年7月4日。

7月23日

张奚若逝世。钱端升参加张奚若先生追悼会。

【（新华社1973年7月23日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先生，因病于1973年7月1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张奚若先生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追悼会会场里悬挂着张奚若先生的遗像，安放张先生的骨灰盒。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副主席宋庆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

德，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康生，军委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送了花圈。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外交部、国务院科教组、国务院办公厅、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清华大学也送了花圈。

参加追悼会的有：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傅作义、许德珩、邓颖超等。追悼会举行前，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颖超向张奚若先生的夫人杨景任及其子女表示亲切慰问。

追悼会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廖承志同志致悼词。

廖承志说：“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悼念张奚若先生。”

张奚若先生陕西朝邑人，同盟会会员，参加辛亥革命。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抗日时期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从抗日战争后期起，张奚若先生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深表愤慨，进行猛烈抨击，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召开的伪国民大会，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一贯积极支持并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民主运动。

1949年，张奚若先生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张奚若先生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二十多年来，张奚若先生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他热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努力贯彻执行党的对内对外政策，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努力从事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人民外交活动，不辞劳苦，鞠躬尽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张奚若先生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取得的独立自由和初步繁荣昌盛，对

我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感到欢欣鼓舞。张奚若先生始终关心祖国的统一，关怀台湾省同胞和知识界故旧，盼望台湾省早日获得解放。几十年来，张奚若先生为祖国的独立和统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张奚若先生与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包括台湾省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更大的胜利，为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和威胁，为台湾省的早日解放而努力奋斗！”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贝时璋、邓初民、卢汉、史良、庄希泉、严济慈、吴有训、武新宇、茅以升、罗叔章、季方、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谢扶民；人大代表丁西林、叶圣陶、刘仙洲、吕叔湘、宋一平、沙千里、杨钟健、李明扬、吴茂荪、连贯、林砺儒、钱昌照、魏建功；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于树德、王芸生、王雪莹、刘斐、朱蕴山、孙晓村、苏子衡、杨东莼、张孝骞、陈此生、周士观、赵朴初、荣毅仁、闻家驷、徐伯昕、徐楚波、萨空了、董其武、楚图南；政协委员冯友兰、江泽涵、刘皑风、吴文藻、陈达、郑昕、费孝通、黄子卿、章元善、葛志成、傅鹰；

有关部门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姬鹏飞、乔冠华、刘西尧、吴庆彤、刘友法、李金德、丁国钰、周秋野、柯柏年、林林、李梦夫、侯春怀、叶籁士、李蓝丁；

张奚若先生的生前友好及医护人员周培源、金岳霖、陈岱孙、钱端升、唐钺、段学复、李赋宁、钱伟长、韩权华、周尚珏、赵淑媛。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有关单位的群众代表。

张奚若先生病重住医院期间，周恩来总理等曾前往医院探望。】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外交学会会长 张奚若先生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董必武、宋庆龄、朱德、周恩来、康生、叶剑英

送了花圈 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傅作义、许德珩、邓颖超等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邓小平主持，廖承志致悼词》，载《人民日报》1973年7月24日。

8月3日

钱端升出席周恩来欢迎缪云台宴会。

【（新华社1973年8月3日讯）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今年晚上会见并宴请了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1946年旧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缪云台先生及其女儿缪瑜成和自香港陪同缪云台先生来京的缪先生的外孙女朱虹和她的丈夫陈静波。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人大常委会委员邓颖超，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李金德，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郭达凯、周康仁、肖心文、王业松。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还有缪先生在京的友好卢汉和夫人龙泽清、钱昌照和夫人沈性元、胡子昂、钱端升、邹秉文。

会见和宴会是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

缪云台先生是从美国前来观光和探亲的，于7月1日到达北京。

一个多月来，他在北京、东北等地参观了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学校，游览了名胜古迹，会晤了故旧。】

——《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会见并宴请缪云台先生》，载《人民日报》1973年8月4日。

11月12日

钱端升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零七周年活动。

【（新华社1973年11月12日讯）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纪念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零七周年。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许德珩，中共中央委员廖承志，中共中

央统战部负责人刘友法、李金德、童小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贾汀，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参加了纪念仪式。

中山堂里正面墙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像前放着翠柏和鲜花。

上午10时20分，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此生宣布纪念仪式开始。许德珩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孙中山先生像前献了花篮，廖承志献了花篮，刘友法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朱蕴山代表民革中央委员会、贾汀代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各界人士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马纯古、区棠亮、贝时璋、邓初民、史良、庄希泉、华罗庚、严济慈、李延禄、张鋈、武新宇、茅以升、林兰英、林巧稚、罗叔章、季方、孟继懋、赵忠尧、胡子昂、胡愈之、于树德、王芸生、王雪莹、孙晓村、苏子衡、李国伟、杨东莼、吴研因、张孝骞、金如柏、周士观、周培源、闻家驷、赵宗燠、荣毅仁、钟惠澜、袁任远、徐伯昕、徐楚波、萨空了、董其武、楚图南；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其他各界人士沙千里、汪菊潜、张含英、谭真、谢冰心、费孝通、叶圣陶、吴作人、裴文中、吴桓兴、曾宪九、王历畊、黄长水、庄明理、张砺生、连贯、邹秉文、李明扬、王克俊、周嘉彬、王家桢、陈铭德、黄鼎臣、严信民、孙承佩、李文宜、葛志成、李伯球、梁漱溟、赵君迈、刘品一、沈兹九、廖梦醒、阿沛·才旦卓嘎、韩权华、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何思源、胡子婴、徐萌山、程思远、郭有守、宋伟斌、赵明哲、洪希厚、郭翼青、许宝骥；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刘斐、甘祠森、吴茂荪、刘仲容、刘孟纯、钱昌照、侯镜如、许闻天、王葆真、李平衡、李俊龙、李蒸、陈离、聂轰、焦实斋、邵恒秋、覃异之、吴秀峰、王枫。

参加纪念仪式的还有北京市各界人士王林、王源兴、夏翔、关世雄、李

貽赞、劳君展、顾均正、苏从周、莫艺昌、张克明、李文澜、傅学文、孙孚凌、冯友兰、魏建功、钱伟长、游国恩、傅鹰、钱端升、王颖。】

——《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各界人士举行纪念仪式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零七周年》，载《人民日报》1973年11月13日。

1974年(74岁)

2月28日

钱端升等参加纪念台湾“二·二八”起义二十七周年。

【(新华社1974年2月28日讯) 首都各界人士和在京的台湾同胞一百多人，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座谈会，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二十七周年。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许德珩，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中共中央委员廖承志、罗青长、丁国钰，中共中央委员、台湾省籍同胞蔡啸、林丽韞，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刘友法、李金德、童小鹏，以及工人、青年、妇女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今天的座谈会是政协全国委员会举办的，由许德珩副主席主持。

廖承志同志首先讲话(全文另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发表了书面讲话(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董其武代读，全文续发)。

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的，还有蔡啸同志，不久前从台湾省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知名人士陈逸松先生，林丽韞同志，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王芸生，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李纯青，参加过“二·二八”起义的台湾同胞蔡子民，女作家谢冰心，去年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青年同胞吴英辅，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荣毅仁，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台湾省高山族同胞田富达，参加过“二·二八”起义的台湾同胞陈炳基，台湾同胞方宜。

发言的人们热烈赞扬台湾省人民热爱祖国、反压迫、反侵略的革命精神。赞扬他们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发言的人们指出，台湾省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解放台湾是包括台湾省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神圣义务。台湾一定要解放，祖国一定要统一。国际上一小撮顽固派还在妄想染指台湾，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和解放台湾。

大家在发言中一致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极力诋毁全国人民正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的罪恶行径。指出他们大搞尊孔反法活动，就是以孔孟之道继续镇压和欺骗台湾省人民，妄图维护法西斯统治，维持蒋家世袭王朝。他们顽固地倒行逆施，必将加速自己的灭亡。

大家在发言中谈到，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是我们的一贯政策。从大陆到台湾去的人员要认清形势，要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不要错过为统一祖国大业立功的机会。我们欢迎他们回祖国大陆探亲、访友，保证来去自由。

许德珩副主席最后讲话说，今天的座谈会，充分体现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对台湾同胞革命斗争的坚决支持。他说，台湾人民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也就是反对孔孟之道的革命行动。让我们团结起来，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积极参加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为贯彻执行党的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

在京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及各界人士（以姓氏笔划为序）：史良、刘芸生、刘斐、庄希泉、朱蕴山、沙千里、苏蘅、宋伟斌、宋希濂、杜聿明、严济慈、杨东莼、吴庆祥、陈之炎、陈此生、张全安、茅以升、郑洞国、范汉杰、林玲玉、罗西欧、罗叔章、经普椿、洪希厚、赵明哲、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费孝通、徐伯昕、钱昌

照、陶峙岳、黄鼎臣、程思远、楚图南；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代表和在北京的台湾省籍同胞代表（以姓氏笔划为序）：王茂胜、王思明、王瑞丰、王碧云、叶纪东、田中山、江重光、许良峰、庄德润、纪朝钦、李丙盛、李克世、李河民、李国仁、李玲虹、李森芳、李碧琴、李捷男、杨小英、杨国庆、吴克泰、吴河、吴崇连、陈丁茂、陈文彬、陈木森、陈和明、陈连生、陈荣福、陈瑞华、陈峰龙、郑炯灶、郑翼宗、林冈、林尚文、林丽芳、林思平、林栋、林清山、林盛中、林紫云、高纯真、郭承敏、徐萌山、钱福星、黄文浮、曾绍德、谢秋成、傅尧箕、蔡云莲、潘渊静、魏立、魏正明；

北京市各界人士（以姓氏笔划为序）：王林、浦洁修、钱伟长、钱端升、夏翔、傅学文。】

——《首都各界人士和在京的台湾同胞举行座谈会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二十七周年 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沈雁冰、许德珩、李达、廖承志、罗青长、丁国钰、蔡啸、林丽韞等出席 廖承志首先讲话，傅作义发表书面讲话。在会上发言的人们指出：台湾一定要解放，祖国一定要统一》，载《人民日报》1974年3月1日。

3月12日

钱端升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四十九周年活动。

【（新华社1974年3月12日讯）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纪念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四十九周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许德珩，中共中央委员廖承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丁国钰，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人刘友法、李金德、童小鹏，在北京的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参加了纪念仪式。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此生主持纪念仪式。到会的各界人士在孙中山先生

遗像前肃立、静默。许德珩副主席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孙中山先生遗像前献了花篮，廖承志同志献了花篮；刘友法代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朱蕴山代表民革中央委员会，丁国钰代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邓初民、史良、庄希泉、严济慈、茅以升、林巧稚、罗叔章、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于树德、王芸生、孙晓村、苏子衡、李国伟、杨东莼、吴研因、周士观、赵朴初、荣毅仁、钟惠澜、闻家驷、袁任远、徐伯昕、徐楚波、萨空了、董其武；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刘斐、甘祠森、吴茂荪、刘仲容、刘孟纯、钱昌照、侯镜如、许闻天、李世璋、王葆真、李平衡、李俊龙、李蒸、陈离、聂轰、焦实斋、邵恒秋、覃异之、吴秀峰、王枫；

各界人士：汪菊潜、张含英、谭真、谢冰心、费孝通、叶圣陶、尹赞勋、裴文中、王历耕、庄明理、邹秉文、李明扬、王克俊、周嘉彬、王家桢、陈铭德、黄鼎臣、严信民、李文宜、葛志成、李伯球、赵君迈、刘品一、沈兹九、廖梦醒、阿沛·才旦卓噶、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何思源、胡子婴、徐萌山、杨公庶、刘瑶章、程思远、郭有守、宋伟斌、洪希厚、郭翼青、刘芸生、赵明哲、许宝騵、章友江、黄翔、舒宗鎏、经普椿、陈逸松、张知行、陈修和；

北京市各界人士王林、夏翔、丁贡南、关世雄、李贻赞、劳君展、冯友兰、魏建功、顾均正、苏从周、张克明、李文澜、傅学文、钱伟长、浦洁修、莫艺昌、孙孚凌、游国恩、钱端升、王颖。】

——《首都、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各界人士分别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四十九周年》，载《人民日报》1974年3月13日。

7月31日

钱端升出席柯柏年宴请阿根廷最高法院法官埃克托尔·马斯纳塔和夫人。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柯柏年7月31日会见并宴请了阿根廷最高法院法官埃克托尔·马斯纳塔和夫人。参加会见和宴请的有何兰阶、陈德和、钱端升等。阿根廷驻中国临时代办罗斯也参加了会见和宴会。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何兰阶副院长会见了马斯纳塔先生和夫人。阿根廷客人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7月30日到达北京的。他们还将到外地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柯柏年会见和宴请阿根廷客人》，载《人民日报》1974年8月3日。

1975年(75岁)

3月12日

钱端升参加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仪式。

【(新华社1975年3月12日讯)首都各界人士五百多人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纪念仪式，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有关方面负责人姬鹏飞、廖承志、罗青长、丁国钰、金祖敏、谢静宜、杨坡兰、蔡啸、刘友法、李金德、童小鹏、贾汀等，参加了纪念仪式。

中山堂里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遗像两旁是翠柏和鲜花。上午10时，许德珩副委员长宣布纪念仪式开始。参加纪念仪式的各界人士在孙中山先生遗像前静默。接着，叶剑英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孙中山先生遗像献了花篮。吴德副委员长代表人大常委会、王震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沈雁冰副主席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献了花篮。廖承志献了花篮。刘友法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朱蕴山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丁国钰代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马纯古、王观澜、王冶秋、王道义、区棠亮、贝时璋、史良、刘大年、严济慈、杨东莼、沙千里、陈逸松、张文裕、武新宇、茅以升、林巧稚、罗叔章、季方、赵忠尧、荣毅仁、胡子昂、胡愈之、康克清、董其武、童第周、曾生、曾志；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于树德、王芸生、王学文、王雪莹、孙起孟、孙晓村、苏子衡、吴研因、张孝骞、陈维稷、林修德、金如柏、周士第、周培源、屈武、赵朴初、赵宗燠、胡克实、俞大绂、钟惠澜、贺诚、闻家驷、袁任远、徐伯昕、徐楚波、萨空了、曹菊如、楚图南；

全国人大代表杨秀峰、札喜旺徐、顾康乐、顾滨源、钱三强、唐弢、何基沣、张克侠、陈景润、曹禺、薛明、陈丁茂、陈木森、张国基、吴作人、钱伟长、冯友兰、庄明理、许杰、浦洁修、胡子婴、谢冰心、叶圣陶、顾颉刚、伍禅、魏建功、尹赞勋、金善宝、杨钟健、田富达、张璪、孟继懋、马坚、张缚、赵炳南、吴仲华、韩权华、刘芸生、侯宝林、华凤翔、吕叔湘、张志让、郭增恺、陈世骧、林兰英、阿沛·才旦卓噶、蔡翹；

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刘型、安春山、申伯纯、张学铭、孙越崎、林仲易、吴觉农、章元善、孙承佩、王克俊、王家桢、朱洁夫、宋希濂、杜聿明、李伯球、何思源、陈铭德、郑洞国、翁独健、赵君迈、张毕来、叶宝珊、吴羹梅、虞效忠、葛志成、李毅、徐萌山、冯和法、经叔平、费孝通、吴文藻、刘品一、苏从周、罗涵先、李贻赞、吴大琨、资耀华、莫艺昌、王力、傅鹰、张纪元、顾均正、丁贡南、徐彬如、劳君展、金克木、程希孟、薛公绰、汤绍远、薛愚、李纯青、陈文彬、沈方成、蒋兆和、古耕虞、程裕淇、吴半农、陈岱孙、王遵明、乐森珣、江泽涵、朱光潜、张明养、胡传揆、陆慈、叶至善、谢少文、方善境、卢心远、李梅、王伯祥、陈家镛、叶毓芬、刘家琦、刘瑶章、孙孚凌、李果珍、杨崇瑞、吴世昌、黄逊非、邹秉文、张克明、范秉哲、茅以新、周嘉彬、侯仁之、顾家杰、钱端升、叶培大、蒋丽金、蒋溶、黄子卿、黄药眠、黄翔、米哲沉、董竹君、于滋潭、徐

肇和、施洪熙、周立、黄肇兴、范琪、沈从文、宋君复、倪征燠、潘孝硕、郭慕孙、黄乃、黄育贤、黄凉尘；

在京的民革中央委员会成员朱蕴山、刘斐、陈此生、甘祠森、吴茂荪、钱昌照、侯镜如、许闻天、刘仲容、王葆真、李平衡、李俊龙、聂轰、焦实斋、邵恒秋、覃异之、吴秀峰、李觉、王枫；

各界人士李文宜、汪世铭、严信民、王深林、李明扬、程思远、胡耐秋、沈兹九、黄鼎臣、叶君健、袁复礼、黄汲清、谭真、张含英、黄国光、蔡无忌、韦恂、王历畊、林砺儒、洪丝丝、马大猷、王葆仁、汤佩松、蔡邦华、张致一、朱弘复、叶笃正、陆学善、雷洁琼、严景耀、彭桓武、何泽慧、郭有守、郭维城、张焕琪、郑壮怀、袁俊义、黄文岗、宋伟斌、郭翼青、洪希厚、罗西欧、黄晚霞、沈性元、林玲玉、赵明哲、许宝骥、经普椿、林盛中、赵子立、李振西、周一良、王茂胜、陈修和、董燕梁、李奇中、张知行、章友江、谭惕吾、李一平、余湛邦、张丰胃、曾又馨、张伯驹、章可、孙墨佛、盘珠祁、楚中元、李仙洲、陆达、史林峰、郑炳然、杨浚、马溪山、王竹溪、徐光宪、赵访熊、朱洪荫、王序、李敏华、吴素萱、周发岐、王恺谋、范伯林、张方佐、徐仁祥、董维域、徐荫祥、吴益修、朱临、夏翔、王世之、安士伟、关世雄、宗维新、杨昌乐、张青莲、梁树藩、李文澜、陆宗达、常子久、范至甫、毛之芬、方荣欣、叶恭绍、王敏生、严镜清、汪菊渊、冯希谦、陈炳基、周盼、孔昭恺、傅学文、季羨林、吴组湘、王瑶、江重光、陶葆楷、肖璋、王叔咸、王鹏飞、陆石如、张开济、郑翼宗、王阿雄、吴英辅、梁厚民、张淑桂、王志均、王颖等。】

——《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载《人民日报》1975年3月13日。

11月12日

钱端升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零九周年。

【（新华社1975年11月12日讯）首都各界人士今天在中山公园中山堂

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零九周年。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胡厥文，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中共中央委员廖承志，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刘友法、李金德、童小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贾汀，在北京的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以及北京市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各界人士，参加了纪念仪式。

中山堂正面墙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像前放着翠柏和鲜花。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此生宣布纪念仪式开始以后，沈雁冰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孙中山先生像前献了花篮。廖承志也献了花篮。刘友法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刘斐代表民革中央委员会、贾汀代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献了花篮。

参加仪式的各界人士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贝时璋、邓初民、史良、庄希泉、杨东莼、陈逸松、李延禄、武新宇、茅以升、季方、赵忠尧、荣毅仁、胡子昂、胡愈之、董其武、童第周、于树德、王芸生、王雪莹、孙起孟、孙晓村、苏子衡、李国伟、金如柏、周士观、周培源、赵宗燠、俞大绂、钟惠澜、袁任远、徐伯昕、徐楚波、萨空了、楚图南；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叶圣陶、庄明理、谢冰心、冯友兰、刘芸生、韩权华、尹赞勳、吴桓兴、顾颉刚、浦洁修、钱伟长、魏建功、沈谦、王克俊、陈铭德、黄鼎臣、孙承佩、赵君迈、刘品一、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何思源、徐萌山、刘瑶章、杨公庶、葛志成、李伯球、钱端升、李明扬、张含英、谭真、曾宪九、连贯、严信民、李文宜、沈兹九、廖梦醒、经普椿、郭秀仪、邹秉文、程思远、宋伟斌、洪希厚、郭翼青、赵明哲、章友江、黄翔、张知行、陈修和、张丰胄、余湛邦、许宝骥、赵子立、黄维、文强、李九思、溥杰、杨伯涛、杜建时、郑庭笈；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王昆仑、甘祠森、吴茂荪、刘仲容、屈武、刘孟纯、钱昌照、侯镜如、许闻天、王葆真、李平衡、李俊龙、聂轰、焦实斋、邵恒秋、覃异之、吴秀峰、王枫；

北京市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各界人士陆达、史林峰、夏翔、丁贡南、关世雄、李贻赞、顾均正、苏从周、张克明、李文澜、傅学文、游国恩、莫艺昌、孙孚凌、傅鹰、王颖。】

——《首都、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各界人士分别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零九周年》，载《人民日报》1975年11月13日。

1976年(76岁)

3月12日

钱端升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一周年活动。

【(新华社1976年3月12日讯)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一周年。

参加纪念仪式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帕巴拉·格列朗杰，中共中央委员廖承志，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刘友法、李金德、童小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贾汀。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此生主持纪念仪式。到会的各界人士在孙中山先生遗像前肃立、静默。许德珩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孙中山先生像前献了花篮，廖承志同志献了花篮，刘友法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仑代表民革中央委员会、贾汀代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史良、庄希泉、严济慈、杨东莼、陈逸松、季方、荣毅仁、胡子昂、胡愈之、陶峙岳、董其武、于树德、王芸生、孙晓村、苏子衡、赵朴初、闻家驷、徐伯昕、徐楚波、萨空了；

民革中央常委、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刘斐、屈武、甘祠森、刘仲

容、刘孟纯、吴茂荪、侯镜如、许闻天、钱昌照、王葆真、李平衡、李俊龙、陈离、聂袁、焦实斋、邵恒秋、覃异之、吴秀峰、王枫；

各界人士叶圣陶、谢冰心、庄明理、胡子婴、田富达、韩权华、刘芸生、费孝通、邹秉文、王克俊、周嘉彬、王家桢、陈铭德、黄鼎臣、孙承佩、葛志成、钱端升、李伯球、赵君迈、刘品一、郑洞国、宋希濂、何思源、杨公庶、刘瑶章、黄翔、张含英、严信民、李文宜、沈兹九、廖梦醒、经普椿、洪希厚、郭翼青、程思远、章友江、张知行、陈修和、许宝騄、宋伟斌、赵明哲、李毅、李仙洲、赵子立、黄维；

北京市各界人士陆达、史林峰、夏翔、丁贡南、关世雄、李贻赞、王竹溪、冯友兰、魏建功、朱光潜、顾均正、苏从周、张克明、李文澜、傅学文、钱伟长、浦洁修、莫艺昌、孙孚凌、王颖。】

——《首都、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各界人士分别举行仪式 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一周年》，载《人民日报》1976年3月13日。

11月12日

钱端升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活动。

【（新华社1976年11月12日讯）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徐向前、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中共中央委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邓颖超、廖承志、刘友法、李金德、童小鹏、贾汀参加了纪念仪式。

中山堂里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两旁摆着翠柏和鲜花。上午10时30分，沈雁冰副主席宣布纪念仪式开始。参加纪念仪式的各界人士在孙中山先生遗像前静默。接着，徐向前副委员长代表人大常委会、王震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沈雁冰副主席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向孙中山先生遗像献了花篮。邓颖超、廖承志也分别献了花篮。刘友法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朱蕴山代表中

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贾汀代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王观澜、贝时璋、史良、华罗庚、庄希泉、严济慈、杨东莼、沙千里、陈逸松、李延禄、张文裕、武新宇、茅以升、林巧稚、林丽楹、罗叔章、季方、赵忠尧、荣毅仁、胡子昂、胡愈之、康克清、董其武、童第周、曾志；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于树德、王雪莹、孙起孟、孙晓村、苏子衡、李国伟、金如柏、周士观、周培源、屈武、赵朴初、赵宗燠、钟惠澜、闻家驷、袁任远、徐伯昕、徐楚波、萨空了、楚图南；

全国人大代表胡子婴、林兰英、庄明理、何基沣、谢冰心、伍禅、吴作人、刘芸生、尹赞勋、韩权华、金善宝、许杰、张志让、张鋈、田富达、阿沛·才旦卓嘎、华凤翔、黄鼎臣；

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费孝通、陈铭德、孙承佩、赵君迈、刘品一、张学铭、李纯青、吴文藻、邹秉文、黄翔、米哲沅、王家楨、黄子卿、沈方成、叶宝珊、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何思源、徐萌山、刘瑶章、杨公庶、葛志成、李伯球、黄逊非、吴觉农、吴羹梅、经叔平、钱端升；

在京的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王昆仑、甘祠森、朱蕴山、刘仲容、刘孟纯、刘斐、吴茂荪、陈此生、侯镜如、许闻天、钱昌照、王葆真、吴秀峰、李平衡、李俊龙、陈建晨、焦实斋、聂轰、王枫、李觉、邵恒秋、覃异之；

各界人士李明扬、张含英、连贯、严信民、王深林、王历畊、李文宜、沈兹九、廖梦醒、经普椿、程思远、沈性元、赵明哲、张知行、陈修和、张丰胄、余湛邦、许宝骊、赵子立、黄维、文强、溥杰、杨伯涛、杜建时、郑庭笈、洪希厚、郭翼青、罗西欧、黄晚霞；

北京市各界人士史林峰、夏翔、丁贡南、关世雄、李贻赞、朱光潜、顾均正、苏从周、张克明、李文澜、傅学文、钱伟长、浦洁修、莫艺昌、孙孚凌、游国恩、雷洁琼、江重光、王颖，以及在京的港澳同胞陈静波；

正在北京访问的美籍人士缪云台、叶楠、袁晓园也参加了纪念仪式。】

——《首都、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各界人士分别举行仪式 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载《人民日报》1976年11月13日。

1977年（77岁）

3月12日

钱端升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二周年。

【（新华社1977年3月12日讯）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二周年。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中共中央委员廖承志，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刘友法、李金德、童小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贾汀，参加了纪念仪式。

中山堂里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摆着松柏和鲜花。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此生主持纪念仪式。到会各界人士在孙中山先生遗像前肃立、静默。许德珩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孙中山先生像前献了花篮。廖承志献了花篮。刘友法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代表民革中央委员会、贾汀代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史良、庄希泉、严济慈、杨东莼、沙千里、季方、荣毅仁、胡子昂、胡愈之、罗叔章、董其武；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于树德、王芸生、王雪莹、孙起孟、孙晓村、苏子衡、闻家驷、徐伯昕、徐楚波、萨空了、陈维稷、周培源、楚图南、张孝骞；

在京的民革中央常委、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王昆仑、甘祠森、刘仲容、刘孟纯、刘斐、吴茂荪、屈武、侯镜如、许闻天、钱昌照、王葆真、孙越崎、李平衡、李俊龙、聂轰、焦实斋、邵恒秋、覃异之、吴秀峰、王枫；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其他爱国人士叶圣陶、谢冰心、

顾颉刚、庄明理、田富达、韩权华、刘芸生、费孝通、邹秉文、王家桢、陈铭德、黄鼎臣、孙承佩、葛志成、张纪元、李伯球、李纯青、赵君迈、刘品一、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何思源、杨公庶、刘瑶章、黄翔、凌其翰、张含英、杨扶青、钱端升、严信民、李文宜、沈兹九、经普椿、郭翼青、罗西欧、郭秀仪、程思远、张知行、陈修和、许宝騫、宋伟斌、赵明哲、李毅、李仙洲、赵子立、黄维；

参加纪念仪式的还有北京市各界人士史林峰、夏翔、丁贡南、李贻赞、王竹溪、朱光潜、苏从周、张克明、李文澜、傅学文、钱伟长、浦洁修、莫艺昌、孙孚凌、雷洁琼、赵访熊、王力、徐荫祥、王颖。】

——《首都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各界人士分别举行活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二周年》，载《人民日报》1977年3月13日。

11月12日

钱端升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活动。

【（新华社1977年11月12日讯）首都各界人士今天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中共中央委员廖承志，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李贵，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贾汀，在北京的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北京市各界人士，参加了纪念仪式。

中山堂正面墙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像前放着鲜花和翠柏。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此生宣布纪念仪式开始，沈雁冰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乌兰夫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朱蕴山代表民革中央委员会、贾汀代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献了花篮。廖承志也献了花篮。

参加仪式的各界人士有：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贝时璋、史良、庄希泉、严济慈、杨东莼、李延禄、茅以升、罗叔章、季方、赵忠尧、荣毅仁、胡子昂、董其武、童第周、王芸生、王雪莹、孙起孟、孙晓村、苏子衡、李国伟、金如柏、周士观、周培源、赵朴初、赵宗燠、俞大绂、钟惠澜、闻家驷、袁任远、徐伯昕、徐楚波、萨空了、楚图南；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叶圣陶、胡子婴、庄明理、谢冰心、吴作人、刘芸生、尹赞勋、黄鼎臣、费孝通、王克俊、陈铭德、孙承佩、赵君迈、刘品一、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何思源、张学铭、李纯青、徐萌山、刘瑶章、杨公庶、裴文中、葛志成、李伯球、钱端升、孙越崎、李明扬、张含英、曾宪九、连贯、严信民、李文宜、经普椿、郭秀仪、邹秉文、宋伟斌、郭翼青、赵明哲、张知行、陈修和、张丰胄、余湛邦、许宝骙、赵子立、溥杰、黄维、文强、杨伯涛、杜建时、郑庭笈；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王昆仑、甘祠森、朱蕴山、刘孟纯、刘斐、吴茂荪、屈武、侯镜如、许闻天、钱昌照、王葆真、李平衡、李俊龙、聂轰、焦实斋、陈建晨、吴秀峰、王枫、李觉、邵恒秋、覃异之；北京市各界人士高戈、史林峰、夏翔、浦洁修、雷洁琼、丁贡南、关世雄、李贻赞、王竹溪、朱光潜、苏从周、张克明、李文澜、傅学文、钱伟长、莫艺昌、孙孚凌、游国恩、王颖。

正在北京的美籍人士叶南也参加了纪念仪式。】

——《首都、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各界人士分别举行仪式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一周年 乌兰夫、许德珩、胡厥文、沈雁冰等参加首都纪念仪式》，载《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3日。

1978年（78岁）

2月25日

钱端升入选第五届政协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主席团：(共二百二十五名，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光训 刀栋庭 于树德 于毅夫 丁树声 大洛桑朗杰 万毅
 马大猷 马万祺 马青年 马海德 王昆(女) 王益 王玉坤
 王芸生 王国栋 王昆仑 王学文 王建明 王首道 王炳南 王遐令
 王福重(女) 韦国清 乌兰夫 方仲如 尹林平 孔原 孔从洲
 邓小平 龙冬花(女) 申健 叶桔泉 田富达 史良(女)
 冯德培 齐燕铭 成仿吾 年维泗 朱光潜 朱理治 朱锦多 朱蕴山
 朱穆之 伍献文 任白戈 庄希泉 刘大铮 刘开渠 刘顺元
 刘家琦(女) 刘靖基 关布 江一真 江泽涵 汤佩松 安士伟
 许德珩 孙起孟 孙晓村 买合苏德·铁衣波夫 克力更 苏星
 苏静 杜聿明 李波(女) 李琦 李世璋 李页里(女)
 李金德 李春华(女) 李景林 杨公素 杨石先 杨东生 杨甲三
 杨汤城 杨奇清 杨秋玲(女) 杨静仁 肖鹏 肖贤法 吴文俊
 吴永富 吴旭芝 吴阶平 吴英辅 吴贻芳(女) 吴桓兴 吴雪之
 吴鸿宾 何贤 何长工 何泽慧(女) 谷志标 汪师贞(女)
 汪京涛 汪德昭 沙千里 沈浮 沈雁冰 宋立英(女) 宋任穷
 宋希濂 张冲 张轸 张大煜 张孝敬 张孝骞 张志让 张秀熟
 张含英 张南生 张香山 张莲花(女) 张超伦 陆镇藩 陈宇
 陈铁 陈批鲁 陈泽深 陈茹玉(女) 陈野苹 范重模 林一心
 林范洪(女) 欧阳钦 卓碧玉(女) 帕巴拉·格列朗杰 季方
 周扬 周志宏 周建人 周培源 周懿娴(女) 郑洞国
 郑敏之(女) 单书 屈武 孟目的 赵朴初 赵访熊 赵紫阳
 荣毅仁 胡子昂 胡子婴(女) 胡克实 胡厥文 胡愈之 柯灵
 柯麟 钟惠澜 段元星 段秀兰(女) 侯德封 闻家驷 费孝通
 费彝民 姚雪垠 姚淑平(女) 贺诚 贺绿汀 袁世海 耿绍光
 聂真 贾亦斌 顿星云 钱江 钱人元 钱昌照 钱端升
 徐中舒 徐伯昕 徐建春(女) 翁文波 高卓雄 郭沫若 郭慕荪

谈家桢 陶述曾 陶峙岳 黄岩 黄镇 黄维 黄汲清
黄欧东 黄鸣龙 黄钰生 黄逊非 黄家驷 黄鼎臣 曹广化
龚育之 康克清（女） 章蕴（女） 闫揆要 梁华新 博俊德（女）
彭冲 彭迪先 彭俐侬（女） 董其武 韩光 喻杰 程茂兰
程思远 傅承义 童小鹏 童祥苓 童第周 曾兆阁 谢冰心（女）
楚图南 雷洁琼（女） 鲍先志 蔡啸 蔡堡 蔡邦华
熊天荆（女） 熊向晖 薛国邦 薛暮桥 冀春光 蹇先任（女）
酆云鹤（女）
秘书长：齐燕铭】

——《五届政协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载《人民日报》1978年2月25日。

2月26日

钱端升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对外友好团体（二十八名）】

王炳南 王耀庭 卢绪章 司徒慧敏 朱良 孙平化 李寿葆
杨公素 杨伯箴 吴半农 汪名震 张化东 张铁生 陈忠经
陈翰笙 林林 郑森禹 柴泽民 钱端升 徐绳周 凌其翰
郭达凯 黄国光 曹言行 康岱沙（女） 焦若愚 曾涌泉 蔡无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共一千九百八十八名）》，载《人民日报》1978年2月26日。

5月3日

钱端升参加《人民日报》编辑部组织的政法界人士座谈会。

【（本报讯）为了更好地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新宪法，最近，本报编辑部邀请首都政法界人士举行了小型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北京市委政法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国际政治系、北京政

法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单位的代表赵石生、杨化南、陆石、钱端升、雷洁琼、张维涛、姜维新、芮沐、赵宝煦、关怀、刘镜西、郭纶、张希坡、肖蔚云、吴恩裕、王珉灿、郝双禄等同志参加了座谈。

在座谈中，有的同志说：新宪法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总章程，它把全国人民新时期的总任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有的说：新宪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它继承和发扬了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的优良传统，紧紧地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服务；严格区分敌我，明确打击目标，加强对敌专政；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干部接受群众的监督，保障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大家一致认为，新宪法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一部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是一部继往开来的好宪法。

几十年来，从事国际法理论研究的钱端升同志虽然年老体弱，但还是认真准备了书面发言稿。他还激动地补充说：叶副主席在《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强调指出：“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现在尤其重要。”这一点大得人心，大快人心。的确，民主集中制是关系到我国的盛衰兴亡极其重要的问题。只要民主集中制真正发扬光大，新宪法就一定能够实施，举国上下就能够团结一致，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谈到实施新宪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时，许多同志认为：当前严重的任务是批判“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蔑视法制的思潮；同一切摧残民主，破坏集中，破坏社会主义纪律，破坏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的行为作斗争；必须克服在一部分人中存在的法在人民内部不适用的糊涂观念，鼓励、教育人们自觉遵守法律。要使法真正成为对敌专政的铁腕、违法犯法的人的压力和约束、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司法部门的同志谈到，宪法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作了明确规定，我们公安部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是执法机关，更应模范地遵守和坚决地实行

新宪法。过去，政法战线深受“四人帮”的迫害，广大公安司法干警有法不敢依、不能依，依法成为“犯法”，即犯了“四人帮”的帮规帮法。“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以后，我们对“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一定要一一平反，落实政策。

赵宝煦、吴恩裕等同志谈到，新宪法规定：“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对此大家极为感奋，深信在党和国家亲切关怀爱护下，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一定能够胜利向前发展。

刘镜西、郭纶等同志提出：为了更好地实施新宪法，迅速恢复和加强政法教育十分必要。他们说，这几年来，由于“四人帮”大搞“两个否定”和“一个砸烂”，使政法战线遭受严重打击和摧残。目前，必须迅速恢复和加强政法教育，选拔培养新生力量。有的同志建议从中小学加强法制教育，设置有关法制的课程。

与会同志表示一定要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为认真学习新宪法，积极宣传新宪法，坚决实施新宪法而努力。】

——《积极开展宪法宣传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首都政法界人士座谈，决心认真学习、坚决执行新宪法》，载《人民日报》1978年5月3日。

1979年（79岁）

2月3日

钱端升错划右派得以改正。

【（本报讯）北京市各部门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错划右派进行改正的指示。经过复查，到春节前，全市已有二千五百三十一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了改正。其中，原市、区、局级领导干部和知名的教授、副教授王斐然、贺生高、罗青、钱端升、向达、陈达、薛愚、金

宝善、孟昭英、王重民、王铁崖、张岱年、孙念增、刘思职、于振鹏、张天麟、林传鼎、沈启无等三十五位同志都已得到改正。党的政策的落实，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对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中共北京市委在切实贯彻执行中央有关指示的同时，结合本市情况，对改正和安置工作作了一些具体规定。许多单位以1957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准则，参照市委的具体规定，依靠本单位的复审人员和群众进行讨论分析，分清大是大非，凡属错划的，坚决改正；凡应该安置的，妥善安置。北京大学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抓得较紧，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发动群众办案。北大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划右派分子七百一十五名，还有未戴右派帽子但受各种处分的人八百四十二名，需要复审的面相当大，光靠少数人关门搞专案是不行的。他们采取层层发动的办法，从校党委、系总支到党支部和每个党员，都动员起来，大家畅所欲言，提出审改意见。他们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抓住集团性案件，解决一个，改正一批人的问题。同时，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使受审人员和所有同志都能深刻理解中央文件精神，对当时定案情况分析有个准绳，做到既积极又慎重，坚持实事求是。市法院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把9名右派分子开除、强迫退职退休、遣送回乡。这些年来，他们虽然不断申诉，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中央文件下达以后，院党委从去年9月初开始，对这些人的改正、安置问题多次研究，并迅速派人到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给他们认真落实政策。在当地党委协助下，给这9位同志恢复了公职，并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作了妥善安排。市公安局对错划为右派的民警，做到了一个不漏地全部改正，千方百计找到他们的下落，把改正结论通知到本人。

据市委有关部门介绍说：北京市这项工作与中央一些机关相比，还是落后的。因此，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继续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打破条条框框，坚决落实党的政策，继续抓好这项工作。力求在较短时间内做好这项工作，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中去。】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北京市一批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载《人民日报》1979年2月3日。

6月15日

钱端升前往机场迎接缪云台夫妇回国定居。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原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缪云台先生偕夫人赵佩瑜女士决定放弃美国国籍回国定居，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缪云台先生和夫人是6月10日离开美国的。

缪云台先生今年85岁，曾是1946年旧政协委员。他于1949年秋去香港，1950年又由香港去美国，先后在美国、日本居住近三十年。今天，他回到祖国，高兴地说：“我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缪云台先生的外甥朱希贤和夫人杨美云陪同缪先生夫妇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熊向晖，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副秘书长薛子正，政协副秘书长孙起孟，以及缪云台先生的在京老友钱昌照及其夫人沈性元和邹秉文、钱端升等。】

——《缪云台先生夫妇离美回祖国定居 增补缪云台先生为五届政协委员》，载《人民日报》1979年6月16日。

8月

钱端升再次与陪同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来访的费正清见面。

【假如中国共产党想要继续统治中国，想要成为天子的接班人（对人们作出道义上的采掘仅是其无限职能的一部分）的话，那么，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姿态。简言之，中国共产党要起到天主教世界的罗马教皇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作用。这影响到我的许多受到革命风暴打击的朋友和熟人。

例如，我们的老朋友，政治科学家钱端升教授，在50年代初期，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使海外，1947-1948年曾是我家的客人。1954年，他打电话给我们说是在新斯科夏半岛的帕格沃什参加会议。但在1957年的反

右斗争中，他住在他北京的旧宅，或旧宅的一部分里，拿着少量的生活津贴，他的才能被淹没。1979年1月，他得到平反。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正缺少法律和政府管理方面的人才，而这样的人才，他本来是有可能为之培养的。1979年8月，我为有幸能够陪同琼·蒙代尔去拜访钱端升教授一家，作为对开明人士的一种表示而深感高兴。】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

10月26日

钱端升担任民盟中央常委会委员。

【中国民主同盟第四届中央委员会

主席：史良（女）

副主席：胡愈之、邓初民、楚图南、苏步青、华罗庚、彭迪先、萨空了、李文宜（女）、费孝通

秘书长：高天

常务委员会委员（四十一人，按姓氏笔划为序）：千家驹、邓初民、史良（女）、田一平、叶笃义、冯素陶、刘开渠、刘思慕、许杰、庄明理、原政庭、华罗庚、沈洪涛、沈兹九（女）、张毕来、吴富恒、吴作人、吴鸿宾、李文宜（女）、苏步青、周新民、罗涵先、罗雄才、金岳霖、金锡如、赵今声、赵访熊、胡愈之、闻家驷、费孝通、莫乃群、谈家桢、钱伟长、钱端升、徐寿轩、高天、唐哲、黄药眠、萨空了、彭迪先、楚图南】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中央领导机构名单》，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6日。

11月12日

钱端升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三周年。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

堂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三周年。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朱蕴山、史良，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季方、庄希泉、胡子昂、胡愈之、王昆仑，有关方面负责人平杰三、童小鹏、李贵、刘宁一、彭友今、王笑一，参加了纪念仪式。

中山堂里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此生宣布纪念仪式开始后，季方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平杰三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经普椿代表廖承志、朱蕴山代表民革中央、王笑一代表北京市革委会，在孙中山先生像前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各界人士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叶圣陶、严济慈、李延禄、茅以升、罗叔章、赵忠尧、董其武、楚图南；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于树德、王雪莹、孙承佩、孙起孟、孙晓村、严信民、苏子衡、杜聿明、李文宜、李纯青、张孝骞、张含英、周士观、赵宗燠、钟惠澜、闻家驷、徐伯昕、徐楚波、黄维、萨空了、程思远、雷洁琼、蔡啸、赵君迈、聂真；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庄明理、吴作人、刘芸生、尹赞勋、溥杰、沈兹九、钱端升、连贯、廖梦醒、徐萌山、方荣欣、葛志成、李伯球、郭秀仪、郭翼青、宋伟斌、赵子立、章夷白、张知行、陈修和、余湛邦、文强、杨伯涛、杜建时、郑庭笈、李霄路、秦德远、郭彤、孙统一、万景光、王奋；

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刘斐、屈武、李世璋、刘仲容、钱昌照、郑洞国、甘祠森、吴茂荪、王枫、许闻天、孙越崎、苏从周、李平衡、李俊龙、吴秀峰、张克明、陈建晨、邵恒秋、周颖、侯镜如、聂轰、覃异之、傅学文、焦实斋、廖运周、谭惕吾、王家祯、王静如、刘瑶章、李觉、李文澜、何思源、张学铭、陈铭德、郭麟阁、谌小岑、谢树英、王彦亭、方贤旭、宁光堃、刘甲樱、沈性元、张丰胄、陈迹冬、周泽甫、颜明宜；

北京市各界人士：高弋、史林峰、李恕、夏翔、浦洁修、丁贡南、孙孚凌、范至甫、陈炳基、司徒攀、关士雄、李贻赞、钱伟长、王竹溪、朱光潜。】

——《首都、上海、江苏、广东和湖北各界人士分别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三周年 胡厥文、朱蕴山、史良等在京参加纪念仪式》，载《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3日。

1980年(80岁)

时间不详

约翰·伊斯雷尔前往北京继续进行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费正清特地给金岳霖、钱端升写推荐信。

【约翰始终关心我所有的工作，就像对他其他的学生那样，但是没有人像我这样，在我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计划开始的1973年到结束的1991年，自始至终得到他的帮助。昆明的联大岁月，是中国自由主义教育的高潮，对此，约翰有某种类似传教士的兴趣，早在在清华的时候，他就认识其中的很多教师，他和威尔玛在战时的艰苦岁月里，尽他们所能，给背井离乡的中国西南的人们以身心的保护。1980年，当我去北京继续我的工作，约翰为我给他的老朋友金岳霖、钱端升和陈岱孙写了封推荐信。我惊奇地发现，那里，年轻的历史工作者，已经阅读了限于“内部发行”的《美国与中国》第三版的翻译本，并热烈地接受了费正清的看法——毛泽东也无法打破中国传统的抑制作用。】

——[美]约翰·伊斯雷尔语，载保罗·柯文、默尔·戈德曼编：《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张晓阳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89页。

4月27日

钱端升参加清华大学建校六十九周年校庆。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今天在清华园里到处是一派欢乐的气氛，从海外归来的和在京的校友近二千人，与母校师生欢聚一起，共庆建校六十九周年和校友返校节。

在校园的中央主楼接待室里，校长刘达，副校长张维、张光斗热情接待了台湾清华大学的校友和来自美国和香港的校友。他们亲切交谈，互勉在祖国建设中多做贡献。台湾清华大学的校友还参观了校园和一些实验室。有的校友高兴地说，希望台湾地区和祖国大陆的校友团聚，共同为祖国的建设出力。来自海外的校友有美国科学院院士陈省身、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教授张捷迁、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刘君若和清华大学纽约同学会代表黄中孚等，还有香港作家何达。新老校友亲切问候，互相祝贺。作家何达兴奋地当场挥笔题诗一首：“离开母校三十二年，身上穿着纪念装，短袖短裤不怕冷，纪念吾师马约翰。”黄中孚还带来珍贵的昔日清华园景色的照片、台湾清华大学校景以及纽约校友欢庆母校建校六十周年的照片等二十多张，送给母校留念。

今天到校祝贺的老校友还有蒋南翔、荣高堂、杨述、高士其、罗邦杰、陈岱孙、钱端升、袁复礼，以及已故的前校长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张奚若教授夫人杨景任等。校友们分别参观了新建的电化教学中心和许多实验室，有些校友还来到修葺一新的清华学堂、工字厅、闻亭、自清亭前摄影留念。】

——《从海外归来的和在京校友与在校师生共庆清华大学建校六十九周年》，载《人民日报》1980年4月29日。

9月11日

钱端升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见报。

【张化东、陈翰笙、钱端升委员谈扩大自主权的问题】

委员们听到明年起全部国营企业将推行扩大自主权的消息后，认为这是我国改革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措施。实施得好，则可预见它将为四化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必须有相应的经济法、严密制度和管理办法。张化东委员说，

前些日子，经委发了文件，说是要在重点企业进行试点，如今又要全面推广，要有必要的准备工作。

陈翰笙、钱端升委员认为，高等院校也要扩大自主权，教育部不能管得太死、太具体。钱端升委员还说，解放前北大教授选举的“评议会”，抗战时西南联大有“校委会”，都有充分的权力。】

——《政协委员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摘登》，载《人民日报》1980年9月11日。

9月12日

钱端升被增选为五届政协常委。

【副主席（8人）

何长工 肖克 程子华 杨秀峰 沙千里 包尔汉（维吾尔族）

周培源 钱昌照

常务委员会（24人，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力 扎喜旺徐（藏族） 尧西·贡保才旦（藏族） 任质斌

刘英（女） 孙作宾 孙越崎 孙伯钊（女） 肖三 沈其震

周谷城 赵伯平 胡嘉宾 柯麟 钱伟长 钱俊瑞 钱端升

崔科·顿珠次仁（藏族） 章夷白 梁漱溟 韩幽桐（女、回族）

覃异之 黎玉 霍英东】

——《五届政协三次会议增选副主席、常委名单（1980年9月1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1980年9月13日。

钱端升担任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委员。

【主任委员 邓小平

副主任委员 刘澜涛 朱蕴山 史良（女） 胡厥文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彦祥 王力 王首道 王炳南 王昆仑 王福重（女） 丹彤（回族） 乌兰夫

（蒙古族）古耕虞 叶至善 包尔汉（维吾尔族）庄希泉 刘宁一 关瑞梧（女）米哲沉 许德珩 孙孚凌 孙承佩 孙越崎 严中平 严信民 克力更（蒙古族）苏惠（女）杜聿明 李仙 李琦 李子诵 李维汉 杨东生（藏族）杨秀峰 肖克 肖乾 吴江 吴波 吴世鹤 吴亮平 何长工 沙千里 沈雁冰 张冲（彝族）张友渔 张含英 陆定一 陈宇 陈永龄 陈翰伯 武衡 林默涵 罗琼（女）帕巴拉·格列朗杰（藏族）季方 周培源 周建人 郑敏之（女）屈武 赵朴初 赵访熊 郝中士 荣毅仁 胡子昂 胡子婴（女）胡愈之 柯麟 钟师统 钟惠澜 夏衍 钱昌照 钱伟长 钱端升 殷明连 黄凉尘 黄鼎臣 萨空了（蒙古族）康克清（女）梁华新（壮族）彭桓武 董纯才 韩英 覃异之 程子华 雷洁琼（女）蔡啸 裴丽生 熊天荆（女）薛暮桥 戴爱莲（女）】

——《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名单（1980年9月1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1980年9月13日。

9月22日

钱端升参加政协常委茶话会。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下午在政协礼堂举行茶话会，向五届政协第三次会议新增补的政协副主席和常务委员们表示祝贺。新老常委们欢聚一堂，畅谈如何发挥政协的重要作用，为发展革命的祖国的统一战线和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政协主席邓小平出席茶话会。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乌兰夫在茶话会上讲话说，人民政协一定要充分发挥民主协商和监督的作用；要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四化建设以及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自由讨论，积极地提出批评和建议；要对宪法、法律、法令的实施，对政府工作和各级干部实行监督。他希望人民政协大力贯彻落实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和五届政协第三次会议的精神和各项决议，团结、号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力量，为实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而共同奋斗。

屈武、钱昌照、孙晓村、胡子婴、董其武、酆云鹤、钱端升、黄汲清、周培源、赵朴初和苏子蘅在会上发言。他们一致赞扬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五届政协三次会议开得好，充分发扬了民主，并且表示要把大会的精神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

——《政协常委会举行茶话会 新老常委欢聚一堂表示 努力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各项任务》，载《人民日报》1980年9月23日。

10月7日

钱端升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并担任委员。

【主任委员 叶剑英

副主任委员 宋庆龄(女) 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 邓颖超(女)

乌兰夫 韦国清 彭冲 廖承志 阿沛·阿旺晋美 许德珩 胡厥文

朱蕴山 史良(女)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 刘澜涛 沈雁冰

康克清(女) 季方 周建人 庄希泉 胡子昂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光训 于光远 于树德 马寅初 王力 王匡 王竹溪 王任重

王鲁明 王昆仑 王首道 文正一 巴金 邓初民 甘祠森 古耕虞

平杰三 叶圣陶 田桓 田富达 包尔汉 吕叔湘 朱学范 朱穆之

伍禅 任质斌 华罗庚 庄明理 刘斐 刘大年 刘宁一 刘念智

刘瑶章 关山复 汤无炳 孙起孟 孙晓村 孙越崎 严济慈 严信民

苏子蘅 杜聿明 李世璋 李纯青 李铁铮 李维汉 杨秀峰 杨拯民

杨静仁 肖克 吴茂荪 吴贻芳(女) 吴桓兴 何贤 何长工

何柱国 何思源 沙千里 沈其震 宋希濂 张杰 张冲 张天放

张申府 张执一 张孝骞 张含英 张学铭 陆定一 陈此生 陈逸松

武新宇 茅以升 林一心 林巧稚(女) 林乎加 林丽韞(女)

罗青长 罗叔章(女) 金宝善 金善宝 周扬 周士观 周叔韬

周培源 郑洞国 宗怀德 屈武 奎璧 赵朴初 赵忠尧 赵宗燠

赵祖康 荣毅仁 胡子婴（女） 胡乔木 胡愈之 钟惠澜 侯镜如
洪丝丝 费孝通 费彝民 姚依林 贾亦斌 夏衍 顾颉刚
爱新觉罗·溥杰 钱三强 钱伟长 钱学森 钱昌照 钱端升 倪志福
徐伯昕 徐彬如 高 戈 高登榜 郭棣活 郭瑞人 浦洁修（女）
陶述曾 陶峙岳 黄 华 黄 维 黄 翔 黄 镇 黄一欧 黄鼎臣
萨空了 曹 禹 梁必业 梁漱溟 姬鹏飞 董其武 韩 英 覃异之
程子华 程思远 童小鹏 曾 三 谢冰心（女） 楚图南 雷洁琼（女）
蔡啸 裴昌会 赛福鼎 缪云台 潘 菽

秘书长：屈武

副秘书长：平杰三 朱穆之 刘宁一 童小鹏 高登榜 甘祠森 吴茂荪 贾亦斌 高 戈】

——《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名单（共171人）》，载《人民日报》1980年10月8日。

11月12日

钱端升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四周年。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四周年。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许德珩、胡厥文、朱蕴山、史良，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刘澜涛、季方、庄希泉、胡子昂、王昆仑、钱昌照，有关方面负责人平杰三、张执一、童小鹏、李贵、刘宁一、彭友今、王笑一，参加了纪念仪式。

中山堂里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此生宣布纪念仪式开始后，胡子昂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平杰三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朱蕴山代表民革中央、王笑一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孙中山先生像前献了花篮，廖承志也向孙中山先生像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各界人士还有：武新宇、赵忠尧、董其武、王雪莹、孙

承佩、孙起孟、孙晓村、严信民、苏子衡、李纯青、张孝骞、周士观、赵宗燠、胡子婴、闻家驷、费孝通、黄鼎臣、萨空了、程思远、王克俊、赵君迈、聂真、钱端升、梁漱溟、杨拯民、刘斐、屈武、朱学范、郑洞国、甘祠森、吴茂荪、贾亦斌、王枫、许宝骙、许闻天、孙越崎、苏从周、李平衡、吴秀峰、何柱国、张克明、陈建晨、邵恒秋、周颖、侯镜如、覃异之、焦实斋、谭惕吾、王家楨、王静如、方少逸、刘瑶章、李觉、李文澜、何思源、张学铭、陈铭德、宗之发、梁蔼然、谌小岑、谢树英、王彦亭、方贤旭、宁光坤、沈性元、张丰胃、张廉云、陈迺冬、罗西欧、颜明宜、庄明理、连贯、廖梦醒、刘品一、方荣欣、葛志成、郭秀仪、宋伟斌、赵明哲、黄苗子、张素我、刘岱、刘春方、李一平、沈醉、李以诤、方靖、李霄路、秦德远、郭彤、焦琦、王奋、王仁、刘小萍、赵冠琪、高戈、史林峰、吴惟诚、罗青、林彤、夏翔、浦洁修、丁贡南、孙孚凌、范至甫、陈炳基、关世雄、莫艺昌。

美籍人士袁晓园也参加了纪念仪式。】

——《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各界人士举行各种活动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四周年》，载《人民日报》1980年11月13日。

12月6日

钱端升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十五周年、“一二·一”运动三十五周年活动。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首都青年学生和参加“一二·九”、“一二·一”运动的老同志共六千多人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十五周年、“一二·一”运动三十五周年。

彭真、王任重、宋任穷、胡乔木、姚依林、康克清以及当年“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牛荫冠、朱穆之、李昌、荣高棠、关山复、袁宝华、李颀伯、郭明秋、刘导生，当年“一二·一”运动的参加者郑伯克、马识途、王汉斌、钱端升、费孝通、楚图南和有关方面负责人贾庭三、韩英、顾大椿、白介夫、李瑞环、伍绍祖、刘达、韩天石、成仿吾、张再旺等出席了大会。

大会是由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召开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主持大会，教育部长蒋南翔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和青年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战斗历程。他指出，要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经济、文化又十分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巨的事业，需要好几代人的艰苦奋斗。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完成的事业，需要我们后继者继续完成。我们绝不能遇难而退，半途而废。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希望今天的青年学生像“一二·九”、“一二·一”时代的青年那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出色地完成革命先辈所没有能够完成的任务。为祖国争光，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会上，中央领导同志向北京市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的276名三好学生和76个先进集体的代表颁发了奖状。大会休息期间，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21名三好学生。彭真勉励青年们要正视和正确对待当前我国在四化建设中遇到的困难，继承和发扬“一二·九”、“一二·一”运动的革命精神，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沿着历史发展的必然道路前进。

会后，参加过“一二·一”运动的老同志和北京市大学生、少年儿童、专业文艺工作者同台演出了文艺节目。】

——《发扬革命传统 同心同德搞四化 首都青年学生和老同志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十五周年、“一二·一”运动三十五周年》，载《人民日报》1980年12月7日。

1981年（81岁）

1月1日

钱端升以笔谈形式发表1981年国际形势展望。

【展望一九八一年国际形势

（全国政协常委、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 钱端升）

过去三十多年的世界，一直是动荡不安，难以捉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人们寄希望于联合国组织，希望它能够逐步建立起一个和平的世界。不幸的是，三十多年来，局部战争几乎没有完全停止过，大战虽尚未爆发，却又经常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

这种长期动荡不安的局面，主要是由于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在作祟。以今日而言，就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帝国在作祟。

有国际社会，就有国际纠纷；你争我夺，吵吵嚷嚷，由来如此，不足为异。但是，本世纪以来多次出现的长期动荡不安，终于以世界大战，也即世界性浩劫来告一结束，则是19世纪所不曾有的情况。在19世纪的上半期，欧洲各大国大都为国内问题所困扰，不暇骛外。到了下半世纪，则各国之间形成了均势（即实力均衡）。因此，尽管国际纠纷，甚至局部战争是常见的，但并不出现不战不和、长期动荡的局面，从而随时有爆发战争的危险。但进入20世纪后，格局又有大变，结果是二十多年之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如今，在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大地上，又有勃列日涅夫之流自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大做称霸天下的美梦，妄图号令各国，奴役全世界人民。勃列日涅夫一伙软硬兼施，利用对方的苟安情绪，企图不战而胜，如不成功，再走上实战的道路。

可以断言，如果苏联不改弦更张，放弃霸权主义，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大战迟早将不可避免。在苏联改而采取真正的和平政策，或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形势将不定期地停留在动荡不定的阶段。这也就是我们今日所处的局势。】

——钱端升：《瞻望国际局势笔谈：展望一九八一年国际形势》，载《人民日报》1981年1月2日。

4月7日

钱端升参加纪念邓初民学术座谈会。

【据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纪念邓初民同志学术座谈会今天在政协礼堂举行。

邓初民同志是我国知识分子中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者之一。长期以来，他把教学和著书立说与中国革命的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是著名的社会科学家、教育家，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是一位坚强的民主战士，是民盟中央领导人之一。

这个座谈会是由民盟中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治学会联合举行的。参加座谈会的学术界人士共七十多人。

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主持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友渔、民盟中央副主席费孝通、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钱端升、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杜任之等，在座谈会上发了言；世界史研究所所长刘思慕作了书面发言。发言的同志认为，邓初民同志为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出了巨大努力。邓初民同志通过讲授社会发展史传播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发言的同志认为，邓初民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生信仰，是和他组织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邓初民是1962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他已73岁高龄。在这之前，虽然组织上没有入党，但他思想上直接接受党的领导，这就是他成为坚强的“民主教授”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的原因。

民盟中央主席史良等参加了座谈会。】

——《北京举行纪念邓初民学术座谈会》，载《人民日报》1981年4月8日。

7月31日

钱端升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委员会新近在北京成立。委员会由10人组成，陈宇为主任，钱端升、陈守一、陈用文为副主任。

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全国总工会向职工群众和工会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提出建议；为全国总工会代表职工群众参与国家立法提供建议；为全国总工会维护职工群众和工会组织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依

据，特别是对处理严重侵犯工会权利和职工合法权益的重大案件提供法律帮助；为全国总工会有关工会活动的涉外事件提供法律咨询。】

——《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委员会成立》，载《人民日报》1981年8月1日。

10月9日

钱端升担任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大会筹委会委员。

【筹委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于光远、于树德、王竹溪、王鲁明、文正一、甘祠森、古耕虞、平杰三、叶圣陶、田富达、朱学范、朱穆之、伍禅、任质斌、华罗庚、庄明理、刘斐、刘大年、刘宁一、刘念智、刘瑶章、关山复、孙起孟、孙晓村、孙越崎、严济慈、严信民、苏子衡、李世璋、李纯青、李铁铮、杨拯民、吴茂荪、吴桓兴、何柱国、何思源、沈其震、张杰、张申府、张执一、张孝骞、张含英、张学铭、陈逸松、武新宇、茅以升、林一心、林乎加、林丽韞、罗青长、罗叔章、金宝善、金善宝、周士观、周扬、郑洞国、宗怀德、奎璧、赵朴初、赵忠尧、赵宗燠、胡子婴、钟惠澜、侯镜如、洪丝丝、费孝通、贾亦斌、爱新觉罗·溥杰、钱三强、钱学森、钱端升、徐伯昕、徐彬如、高登榜、浦洁修、黄维、黄翔、黄镇、黄鼎臣、萨空了、梁必业、梁漱溟、董其武、韩英、覃异之、程思远、焦若愚、曾三、楚图南、雷洁琼、蔡啸、裴昌会、缪云台、潘菽。】

——《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各界人士名单》，载《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0日。

11月12日

钱端升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仪式。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纪念仪式，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主持纪念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

念、徐向前、阿沛·阿旺晋美、胡厥文、杨尚昆、姬鹏飞、杨静仁，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刘澜涛、陆定一、康克清、胡子昂、荣毅仁、胡愈之、王昆仑、何长工、杨秀峰、包尔汉、周培源、钱昌照，参加了纪念仪式。

中山堂里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画像。纪念仪式开始，各界人士在孙中山先生像前肃立。胡厥文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姬鹏飞代表国务院、胡子昂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王昆仑代表民革中央、罗青长代表邓颖超、杨荫东代表廖承志、刘澜涛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雷洁琼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孙中山先生像前献了花篮。接着，各界人士向孙中山先生像三鞠躬。

参加纪念仪式的各界人士还有：刘斐、屈武、朱学范、李世璋、郑洞国、甘祠森、李文宜、孙起孟、孙晓村、周士观、浦洁修、赵朴初、严信民、徐彬如、伍禅、潘菽、金善宝、王竹溪、孙承佩、李纯青、苏子衡、吴雪之、林丽韞、杜星垣、张执一、李贵、方知达、彭友今、聂真、焦若愚、王观澜、贝时璋、许杰、张文裕、陈逸松、袁任远、董其武、王力、王克俊、王雪莹、文正一、方仲如、叶道英、刘宁一、刘亚雄、关瑞梧、安士伟、李立、李铁铮、李淑英、杨东生、吴桓兴、张孝骞、张含英、陈维稷、易礼容、罗琼、金城、赵君迈、赵宗燠、胡嘉宾、钟师统、钱伟长、钱端升、徐逸樵、徐楚波、黄维、章夷白、梁漱溟、韩英、韩幽桐、程思远、蹇先任、林兰英、刘芸生、阿沛·才旦卓嘎、爱新觉罗·溥杰、千家驹、叶笃义、张乔音、张毕来、林亨元、罗涵先、贺麟、高天、王良仲、吴羹梅、钟复光、黄凉尘、章元善、吴世昌、钱人元、曾世英、张明养、郑效洵、葛志成、王一帆、方荣欣、李温平、郭秀仪、金克木、黄子卿、薛愚、徐萌山、经叔平、黄玠然、汤佩松、彭桓武、程裕淇、谢家泽、蔡邦华、陈岱孙、凌其翰、李梅、连贯、张楚琨、刘品一、巨赞、阎迦勒、马松亭、沈从文、宋伟斌、张申府、赵子立、倪征燠、郭翼青、赵明哲、刘毅、陈修和、李奇中、李一平、杨玉清、刘仁术、康博纓、刘春方、余湛邦、万枚子、张知行、王士卓、盘珠祁、孙墨佛、邹蕴真、丁佑曾、钟履坚、张伯驹、王益知、黄君坦、朱海北、章可、刘春海、高俊峰、曹四勿、耿幼麟、梁容若、

杨希枚、唐鸿烈、马璧、柳无非、盛此君、龚彬若、林玲玉、周振强、杜建时、文强、董益三、罗历戎、李以诤、杨伯涛、郑庭笈、方靖、沈醉、陈子坚、王枫、王家桢、王静如、刘瑶章、许宝骥、许闻天、孙越崎、李觉、李平衡、何柱国、何思源、吴秀峰、张学铭、陈建晨、陈铭德、邵恒秋、宗之发、周颖、骆介子、黄翔、湛小岑、覃异之、焦实斋、廖运周、沈求我、王彦亭、方贤旭、宁光堃、刘甲樱、沈性元、张丰胄、张廉云、陈迩冬、颜明宜、张素我、侯镜如、叶恭绍、廖沫沙、罗青、夏翔、林彤、苏从周、陆宗达、孙孚凌、丁贡南、杜若、史林峰、李恕、吴惟诚、胡传揆、张铸、傅学文、胡絮青、吴益修、张克明、李文澜、关世雄、汪金丁、沈一帆、陶大镛、莫艺昌、汤绍远、王敏生、倪家玺、常梦渠、毛之芬、卞慎吾、范至甫、谢莹、王企贤、李健生、李毅、胡志彬、陈明绍、过祖源、陈炳基、魏正明、陈木森、陈丁茂、刘锦汉、司徒攀。

正在北京的美籍人士叶南也参加了纪念仪式。

纪念仪式后，在政协礼堂放映了纪录影片《历史的纪念》。】

——《首都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 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人士一起参加纪念仪式》，载《人民日报》1981年11月13日。

待考

为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政治与政治科学》撰文《开展政治学研究的意义》。

——钱端升：《钱端升主要著作目录》，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1页。

1982年(82岁)

4月27日

周鲠生家人周小松发表文章怀念赵元任，提及钱端升。

【惊悉赵元任教授于2月24日在美国麻省剑桥逝世，我以悲痛的心情，回忆跟赵元任教授相处的那段快乐的时期。赵教授那和蔼可亲、令人尊敬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的父亲周鯁生，与赵教授夫妇是老朋友。解放前，我只身从国内远渡重洋到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学习时，因年纪轻，又是女孩子，人地生疏，父亲写信给赵教授，拜托他们照料我。正值赵教授在加州大学东方语文系任教，也住在柏克莱。我在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有幸在赵家寄宿。

赵教授夫妇，对我不论在生活上、学习上，关怀备至。他俩把我当女儿看待，使我虽身在异乡，却感到家庭的温暖，减少思家的痛苦。当赵夫人得知我的生日时，专门作佳菜为我庆祝，并赠我生日蛋糕。

赵教授是一个享有国际盛誉的语言学家，当时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名代表。他的工作勤奋，治学严谨。他有一台电动打字机，晚饭后，伏在案头备课，常工作到半夜。他精通英文，会说法语、西班牙语。在中国方言里，能说地道的北京话、上海话、广东话，真不愧是一个语言学家。他与大女儿赵如兰灌制了华语对白唱片，大受欢迎，是当时美国人学中文的主要工具。

赵教授虽然名气大，但为人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的桃李满天下。不论是来自国内的中国留学生，还是久居美国及欧洲的一些中国学者，路过旧金山，也专程到柏克莱向赵教授请教。赵教授夫妇待朋友诚恳热情，关心青年学生。大家都十分尊敬佩服赵教授。我第一次遇到老舍先生，就是在赵家。我的老校长吴有训先生，还有钱端升教授从国内来美，都曾住在赵家作客。

赵教授虽然在美国学术地位很高，有优厚的薪水，但生活简朴。他们家中除客厅、书房家具较好外，一般都是用普通的家具。赵教授吃完饭后，用开水把饭碗中的剩菜冲成汤喝。我们常说：“这是赵伯伯的黄花汤。”女儿们的衣服，常是赵夫人自己做。但他们待人慷慨大方，十分重视友谊。

我于1950年8月，从芝加哥赴旧金山乘船回国。由于赵教授全家都在密执安大学，未能见面。我临行前，打了长途电话向赵教授告别，从此到去年他回国前一直未见到他。

1981年夏天，我得悉赵教授回国探亲时，我与我的老朋友美籍中国教授刘君若女士（她正回国在清华讲学）一同去和平宾馆看他。虽已阔别31年，但赵教授模样未变，人虽消瘦，但精神抖擞。他仍认得我，吻了我的额角，显得很高兴。

我们与他的女儿及张奚若夫人陪他到日坛公园照相。我要扶他过街上车时，他说：“你不用扶我。我在美国参加老人竞走，但我不是第一名。”那时他已88岁了。他在公园里还询问二女儿新娜安排朋友会见他的日程。他回国见到祖国的兴盛富强，能与许多老朋友叙旧，情绪高涨。他告诉我：“我与女儿住在波士顿，我手头尚有工作。”年近九十岁的老人，还有这样强的事业心，真令人佩服。赵教授虽已逝世，但他留下了珍贵的学术著作。他对语言学的研究，为中国，为世界作出了贡献。安息吧，赵教授，您的朋友及晚辈怀念您！】

——周小松：《回忆跟赵元任教授在一起的日子》，载《人民日报》1982年4月27日。

7月13日

钱端升参加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座谈会。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中国政治学会最近在北京召开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座谈会。从事政治学和法学研究的专家们认真研究了宪法修改草案，并积极提出了修改意见。

大家指出，这次的宪法修改草案比建国以来的三部宪法都好。在内容上，它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正确地总结了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结构上和条文的表述上，它更加完备、严密、准确、规范化。

在讨论修改意见时，大家着重谈到了怎样维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

家最高立法和权力机关的问题。大家指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规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常委会有权制定普通法律、部分修改经全国人大通过颁行的基本法律、对国务院组成人员进行任免等，这些都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有必要在保障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地位方面，在人大常委会的权限方面作出更明确的规定，以防止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地位受到削弱或部分地被取代。比如，可以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如对全国人大已经通过的事项进行修改，在下一届全国人大开会时，都必须提请大会予以审议追认，否则不能继续生效，等等。

大家还讨论了关于人民代表的权力问题。专家们认为，总的精神应当是鼓励和保障代表行使自己的各项权力，特别是对各级政权机关的监督权。例如：应当更有效地保证代表们行使质询权，这样对充分发挥代表们的监督作用更有利。

座谈会认为，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这比1954年宪法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这项职权进了一步。为了保证将来宪法更好地实施，与会的同志建议，可增加专门一章，集中规定关于宪法实施的监督办法。

在历时两个半天的座谈会上，中国政治学会在京的理事和应邀参加座谈的专家们，还对宪法修改草案中的其他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建议。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钱端升，顾问李铁铮、师哲、吴其玉、郑思远、曾炳钧，会长张友渔，副会长杜任之、李正文，常务理事龚祥瑞、杜汝楫、云光、于造成、吴家麟、邱国栋、骆静兰、严家其等，共五十多人。】

——《中国政治学会举行座谈会 积极提出宪法草案修改意见》，载《人民日报》1982年7月14日。

【在垂暮之年，我幸能为我国外交政策的研讨和尔后1982年宪法的制定挥洒余热，这算是可以告慰于关心我的人们的两件事了。】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0页。

7月22日

钱端升当选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据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中国法学会成立大会今天在北京闭幕。会议选出了学会的第一届理事会，并推选杨秀峰为名誉会长。在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武新宇当选为学会会长。

中国法学会成立大会是7月22日开幕的。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原则通过了《中国法学会章程》。章程规定，中国法学会为全国群众性的法学学术团体。它的宗旨是，团结我国法律工作者和法律教学、研究工作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活动，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贡献。章程还规定，学会要发展我国同各国法学界的学术交流，加强对国外法律、法学的研究，并联合各国法律工作者、法学家，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奋斗。

当选为学会副会长的有张友渔、王一夫、梁文英、王汉斌、朱剑明、项淳、甘重斗、钱端升、宦乡、陈守一、王叔文。】

——《中国法学会成立大会闭幕 选出首届理事会，杨秀峰为名誉会长，武新宇为会长》，载《人民日报》1982年7月28日。

7月27日

钱端升参加民盟中央在京常委扩大会，座谈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的信。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民盟中央昨天下午举行在京常委扩大会，座谈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的信。

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说，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的信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祖国和平统一的热情与诚意。副主席闻家驷说，祖国和平统一，台

湾回归祖国，是潮流所向，大势所趋，凡属炎黄子孙，无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民盟中央常委刘思慕在座谈中用“情似长江深，义如泰山重”来形容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他说，今天代表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最明显的意志和最大的利益，就是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对于廖承志义正情殷的信，蒋经国先生应该作出积极的反应。副主席华罗庚说，廖承志的信说出了我们许许多多渴望祖国和平统一的人的心里话，海峡两岸的文化科技界人士要多做一些有益于祖国和平统一的事。

民盟中央副主席萨空了主持了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常委和委员还有：庄明理、叶笃义、高天、张毕来、钱端升、吴组缃、常任侠等。】

——《民盟中央常委扩大会座谈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 情似长江深 义如泰山重》，载《人民日报》1982年7月30日。

8月4日

钱端升就日本文部省修改历史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日本文部省篡改侵华史损害了中日友好关系 日本政府有责任作出严肃处理。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著名法学家钱端升教授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日本文部省篡改日本军阀侵华的历史是损害中日友好关系的行为，日本政府有责任对此作出严肃处理。

钱端升向新华社记者简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历史。他说，日本从1874年觊觎我国台湾起，复于甲午之战后把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强加于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国和日本同是协约国，而日本不顾国际条约规定，强行承继了德国在我山东的权益；1915年日本又将“二十一条”强加给我；“九·一八”、“七·七”两次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者进一步侵略、占领我领土，凌辱、屠杀我同胞，无所不用其极。如果这些只是“进入”，那么，人类历史上一切残暴不义之战争的发动者都只是“进入”而已，这真是荒谬绝伦，欺我太甚。

钱端升说，参与“进入”论的人，都推脱不掉损害中日友好关系的责任，对此，日本政府有责任作出严肃处理。】

——《法学家钱端升说日文部省篡改侵华史损害了中日友好关系 日本政府有责任作出严肃处理》，载《人民日报》1982年8月5日。

9月26日

钱端升参加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闭会。会议决定：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于1982年11月在北京召开，拟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改草案，列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李维汉副主席在今天的会议上就人民政协如何学习、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讲了话。王力、马璧、黄维、钱端升，在会上发了言，木沙也夫、买合苏德·铁衣波夫作了联合发言，程思远、赵朴初、沈其震、林修德、庄田、赵宗燠、谈家桢、覃异之、黎玉、钟惠澜、萨空了、蔡啸、包尔汉、关瑞梧、李伯钊，作了书面发言。

今天的全体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关于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贯彻十二大精神的决议。

在今天的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赴黑龙江省参观团做了关于参观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建设情况的书面报告。书面报告说，他们通过今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在黑龙江省的参观活动，亲身感受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坚决贯彻。

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工作机构的调整意见和部分人事任免名单。

康克清副主席主持了今天的会议。副主席刘澜涛、许德珩、庄希泉、胡子昂、胡愈之、何长工、杨秀峰、包尔汉、钱昌照，出席了会议。

昨天下午，会议进行了大会讨论，鄞云鹤、汪德昭、雷洁琼、胡愈之、

叶笃义、康克清、钱昌照、刘瑞龙，在会上发了言。】

——《五届政协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作出决定 政协五届五次会议 11 月举行 通过了学习、贯彻十二大精神的决议》，载《人民日报》1982 年 9 月 27 日。

11 月 12 日

钱端升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六周年活动。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2 日电）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六周年。

纪念仪式由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主持。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胡厥文、朱学范，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刘澜涛、康克清、王首道、胡子昂、王昆仑、周培源、钱昌照、董其武等参加了纪念仪式。

中山堂里，孙中山先生的画像悬挂在鲜花翠柏丛中。纪念仪式开始，各界人士在孙中山先生像前肃立。胡子昂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王昆仑代表民革中央，杨荫东代表廖承志，江平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雷洁琼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分别在孙中山先生像前献了花篮。接着各界人士向孙中山先生像三鞠躬。

参加纪念仪式的各界人士还有：彭友今、裴昌会、郑洞国、甘祠森、吴茂荪、贾亦斌、侯镜如、孙越崎、严济慈、赵忠尧、王雪莹、叶笃义、孙承佩、孙起孟、孙晓村、严信民、苏子衡、李文宜、李纯青、杨拯民、张含英、张敬礼、赵君迈、赵宗燠、胡子婴、钟惠澜、聂真、钱端升、凌其翰、黄维、黄鼎臣、萨空了、程思远、蔡啸、田富达、庄明理、刘芸生、溥杰、马璧、王光英、方荣欣、刘品一、杜建时、沈醉、宋伟斌、张素我、罗涵先、徐荫山、高天、郭秀仪、唐振绪、黄玠然、黄凉尘、梁容若、王炎堂、李霄路、赵明哲、刘春方、李一平、李奇中、杨玉清、余湛邦、张知行、陈修和、文强、罗历戎、杨伯涛、郑庭笈、曹秀清、王枫、许宝騫、苏从周、吴秀峰、何柱国、沈求我、张克明、陈建晨、陈铭德、邵恒秋、周颖、覃异之、傅学文、焦实斋、廖运周、谭惕吾、王彦亭、王家桢、王静如、方贤

旭、宁光堃、刘瑶章、李觉、李文澜、张学铭、沈性元、张丰胄、张廉云、宗之发、黄翔、刘甲樱、史林峰、李恕、吴惟诚、浦洁修、郭步岳、夏翔、孙孚凌、丁贡南、巫宝三、范至甫、陈炳基、司徒擎、莫艺昌、王力、甘莹、吴益修、赵琪璠、王恺谋、赖钟声、查守愚。】

——《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各界人士分别举行仪式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16周年》，载《人民日报》1982年11月13日。

12月14日-15日

钱端升参加中国法学会召开的学习、宣传新宪法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宋世琦、吴恒权报道:12月14日和15日,中国法学会召开学习、宣传新宪法座谈会。首都法学界三十多人欢聚一堂,畅谈颁布新宪法的重要意义。大家认为,新宪法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反映了十亿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是合乎国情、顺乎民意,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大法。他们说,作为法学工作者,一定要带头学习新宪法,宣传新宪法,遵守新宪法,为开创社会主义法学研究的新局面而努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雷洁琼、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陈守一等同志说,新宪法不仅在序言中充分肯定了四项基本原则,而且逐章逐条都贯穿了这个精神。四项基本原则既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前进的共同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法制建设才能得到发展。

司法部顾问王汝琪等同志说,新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从立法、执法到守法,都作了明确规定,并强调要加强法制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只要我们严格按照新宪法的规定去做,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可以有力地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进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谭惕吾等说,新宪法是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又是1954年宪法的发展。最高人民法院民庭顾问杨化南等同志说,

关于民主方面的条文，新宪法有许多重要新规定。

中国法学会负责人钱端升等同志表示，作为长期从事宪法教学、研究的人员，应对新宪法努力从法律理论上加以宣传和阐述。法律出版社顾问李波人建议，由法学会组织编写宣传宪法的通俗读物。

座谈会上，许多同志还就如何开创社会主义法学研究的新局面开展了热烈讨论。他们指出，不论是研究和解释我国法制建设中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还是总结我国的经验，借鉴外国的东西，都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法学工作者要充分利用新宪法所提供的有利条件，为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学努力工作。

座谈会由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杨秀峰和中国法学会负责人王仲方分别主持。张友渔、钱端升、王一夫、甘重斗、王叔文、梁文英、陈逸松、林享元等出席了座谈会。】

——《努力开创社会主义法学研究新局面 中国法学会召开学习、宣传新宪法座谈会》，载《人民日报》1982年12月18日。

1983年（83岁）

1月15—16日

钱端升出席国务院座谈会，拥护纺织品价格调整。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出席国务院座谈会的全国人大、政协在京的部分常委和各民主党派、各界各方面人士及经济工作专家，一致拥护国务院关于调整纺织品价格的方案，并表示要共同努力，把这件关系到10亿人民经济生活的大事做好。

这个座谈会是1月15—16日两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出席座谈会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赛福鼎、胡厥文、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朱学范；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刘澜涛、荣毅仁、周培源、钱昌照、董其武和部分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以及各方面人士共48人。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主持了座谈会。他向各方面人士详细介绍了国务院为调整纺织品价格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具体部署。他说，国务院采取这个措施是经过长期酝酿、进行过多次讨论以后才决定的。他指出，调整纺织品价格是价格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纺织品销售额约占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近1/4，把这部分商品价格调整合理了，对今后全面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说：“国务院委托我把有关情况通报一下，希望同志们就如何做好这项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国务委员薄一波说，在公布纺织品调价之前，邀请各方面人士座谈，通报调价情况，这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起来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同大家商量，不仅在党内，而且也要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集思广益，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把这项工作做好。他说，今后这种做法还要继续下去，国务院的工作要更多地听取大家的意见。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马璧、许涤新、罗叔章、孙晓村、钱伟长、钱昌照、董其武、周培源、钱端升、覃异之、赵子立、荣毅仁、孙越崎、沈其震、朱学范等先后在会上发言。大家认为国务院关于调整纺织品价格的决定，符合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合乎经济规律，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今天在纺织品价格上能够采取这样重大的措施，正说明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很好，安定团结，市场繁荣，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大家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发言的各方面人士认为，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并不是要把各种商品的价格都冻结起来，固定不变。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在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对一些商品作有升有降的调整是必要的、正常的。但调整物价毕竟是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方向要准，步子要稳，工作要细。这次调整纺织品价格，一定要做好宣传工作，使广大群众都能了解国家采取这一措施的重大意义。工业部门要努力提高产品质量，特别不能因化纤织品和其他一些轻工业品降价而降低产品质量，损害人民的利益；商业部门要加强经营管理，改善服务态度，做好商品供应工作，特别要遵守物价

纪律，不能超越国务院的规定，自行扩大提价的品种、范围和幅度，如果发生这种现象，希望政府严厉惩处。各界人士在发言中还希望各级政府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严肃纪律，加强法治，保持市场的稳定。除了纺织品调价问题以外，各界人士还对劳动工资制度、体制改革、商业工作、经营管理等问题，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和建议。

国务委员张劲夫代表国务院感谢各界人士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他表示要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周密细致地做好工作，保证这次纺织品调价工作的顺利进行。】

——《各界知名人士在国务院座谈会上一致表示 调整纺织品价格符合人民利益国家利益》，载《人民日报》1983年1月19日。

2月12日

钱端升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八旬以上老同志春节团聚会。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记者李尚志、邹爱国）：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今天上午在政协礼堂三楼大厅举行八旬以上老同志春节团聚会。四十多位老寿星欢聚一堂，畅谈天下大事，共话锦绣前程，互祝健康长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高龄长者表示问候和敬意。他说，在座的委员都经历了清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几个时代，亲眼看见了我国人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想即将一步一步地成为现实，大家对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的高兴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我们既有可畏的后生，又有高龄的长者，大家新老交替，密切合作，团结努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一定能开创出来。王震说，在座的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但大家都有丰富的经验和各种专门知识，在开创新局面中可以继续发出光和热。

93岁的许德珩今天特别高兴，王震同志讲话后，他第一个拱手向大家祝

贺新春，希望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和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把四化建设推进一步。

89岁的包尔汉兴奋地说，我们的祖国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值此新春佳节，我们更加怀念台湾同胞，他殷切盼望祖国早日统一，海峡两岸的兄弟姐妹一同携手并进。

1893年出生的梁漱溟在讲话中说：“我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生的，那时，我们中国开始走向衰弱，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国强盛起来了。”他用毛泽东同志说过的“坚持走路，基本吃素，精神愉快，劳逸适度”这四句话与大家共勉，做到更加健康长寿。

89岁高龄的缪云台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从35岁上升到69岁，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只有国家兴旺发达，我们这些人才有幸活到80岁以上。

“台湾大陆并中华，两地同心合则佳。此志金坚终必践，春来待看报春花。”88岁的叶圣陶兴致勃勃地给大家朗诵了他的诗作。这位须眉如雪的老人说：“前时有家杂志请我题词，我给他们写了八个字：‘多活几年，多做事’。我想这八个字，在座的老同志都会同意。”

89岁的孙越崎一开始讲话就把老寿星们逗乐了。他说：“我的名字叫越崎，意思就是要越过崎岖。可是在旧社会这个‘崎岖’老是越不过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才真正越过崎岖而达到康庄。我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

卫生部长崔月犁得知寿星聚会的消息，专门打来电话祝贺。八十六岁的医学教授张孝骞在会上向大家报告了一个好消息：我们国家已经成立了老年医学研究所，成立了老年医学学会，出版了《老年医学杂志》，今后将会有更多的老寿星出现。

今天的团聚会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主持。出席聚会的老寿星还有：胡子昂、杨秀峰、周培源、钱昌照、马辉之、王力、王维纲、冯定、严信民、李觉、杨献珍、吴觉农、何柱国、张苏、张友渔、张含英、陈维稷、

易礼容、郑洞国、屈武、赵伯平、赵君迈、胡风、钟惠澜、侯镜如、夏衍、钱端升、徐彬如、黄鼎臣、焦实斋、楚图南、熊天荆、吴岱峰、徐逸樵。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程子华和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有关负责人到会向大家恭贺新春。】

——李尚志、邹爱国：《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八旬以上老同志春节团聚会 多活几年多做事》，载《人民日报》1983年2月13日。

4月7日

钱端升出席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大会。

【（本报讯）记者吴恒权报道：4月7日，我国第一所综合性法律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胡启立到会祝贺并讲了话。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蒋南翔、郑天翔、杨易辰、郁文、张承先、刘复之、凌云、邹瑜和法学界的知名人士张友渔、钱端升、陈守一等出席了大会。

司法部部长兼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刘复之首先介绍了创办中国政法大学的筹备情况。他说，中国政法大学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关怀下建立的国家正式大学。总规模计划为7000学员。它实行一校三院制：一是以北京政法学院为基础建立本科生院，学制4年；二是以中央政法干校为基础建立进修学院；三是研究生院。这所大学的目标是培养又红又专的政法教学师资和政法专业人才。新校址定在北京黄村卫星城。

陈丕显在讲话中指出，法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我国目前政法队伍的实际状况和形势发展看，法学教育必须大力加强，要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他说，培养法律人才要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培养新的大学毕业生，给政法队伍补充新鲜血液；另一方面，要迅速而大量地培训现有的干部，把那些年龄适中的、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有培养前途的在职干部提高到大专或中专的法律专业水平。陈丕显同志希望中国政法大学从一开始就要十分注意学生的政治思想、法制观念

和道德品质的教育,使学生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但懂法,而且能够遵纪守法。要培养学生忠于法律、执法如山、刚直不阿的职业道德和革命情操,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新型法律工作者。

胡启立在讲话中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十分重视政法干部的培训和教育,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他勉励中国政法大学的全体学员克服困难,胜利完成自己的学业,为党为人民做出新贡献。】

——吴恒权:《为培养又红又专的政法教师和政法专业人才 中国政法大学在京成立》,载《人民日报》1983年5月8日。

5月11日

钱端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上海市(82名)

王应睐 王金大 王健康 王娟华(女) 王雷 贝汉廷 卢于道
包岳顺 朱正仙(女) 朱尔沛 朱学范 朱恒 任新民 向大威
刘佛年 刘念智 刘靖基 江建人 阮崇武 孙梅英(女) 苏步青
李良园 李建国 李逸群 李锐夫 李富荣 杨新才 杨樵 吴作人
吴若安(女) 吴肇光 何葆光(女) 余成洲 谷超豪 应忠发
汪万里 汪道涵 汪猷 沈敏康 张龙祥 张仲礼 张国民 张香桐
张骏祥 张燕(女) 陈之航 陈祖德 陈植 林佳楣(女)
郁蕾娣(女) 周谷城 周妙余 周念邦 周海婴 周恕(女) 郑霖
孙官宝 赵忠尧 赵祖康 荣毅仁 胡立教 胡耐秋(女) 胡桂清
胡厥文 逢树春 祝嘉铭 秦宝兴 袁雪芬(女) 钱信忠 钱端升
钱澄海 殷国芳(女) 高龙璋 高润华(女) 曹文英(女)
蒋兰荪 韩哲一(回族) 程晓伍 傅培彬 裔式娟(女)
蔡秀玲(女) 潘其槐】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共2978

名)》，载《人民日报》1983年5月11日。

6月7日

钱端升担任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主任委员 彭冲

副主任委员 张友渔 沈鸿 雷洁琼（女） 钱端升 项淳一

委员（按姓名笔划排列）

石 山 邢亦民 刘卓甫 严佑民 罗琼（女） 费彝民 顾大椿】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十三人）（一九八三年六月七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1983年6月8日。

6月18日

钱端升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和委员由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83年6月18日选出：

委员长 彭 真

副委员长 陈丕显 韦国清（壮族） 耿 飏 胡厥文 许德珩

彭 冲 王任重 史良（女） 朱学范 阿沛·阿旺晋美（藏族）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藏族） 赛福鼎（维吾尔族） 周谷城

严济慈 胡愈之 荣毅仁 叶 飞 廖汉生 韩先楚 黄 华

秘书长 王汉斌

委员（按姓名笔划排列）

丁光训 马木托夫·库尔班（维吾尔族） 马 璧 王永幸 王兆国

王 甫 王国权 王炳南 王淦昌 扎喜旺徐（藏族） 区棠亮（女）

贝时璋 牛荫冠 孔从洲 邓家泰 艾 青 古耕虞 平措汪阶（藏族）

叶 林 史来贺 白寿彝（回族） 吕 骥 伍觉天 任新民 华罗庚

刘大年 刘东生 刘有光 刘 达 刘 伟 刘念智 刘瑞龙 刘靖基
 江家福(壮族) 许 杰 许涤新 孙敬文 苏步青 李一清 李文清
 李 贵 李桂英(女,彝族) 李 琦 杨乃俊 杨立功 杨克冰(女)
 杨初桂(女,侗族) 吴世昌 吴仲华 吴作人 吴茂荪 吴 波
 吴桓兴 何英 何贤 谷景生 沈鸿 宋一平 宋劭文 宋承志
 张子斋(白族) 张友渔 张文裕 张秀龙 张杰(回族)
 张贤约 张秉贵 张承先 张 珍 张致祥 陈永康 陈宗基 陈惠波
 陈鹤桥 武 衡 茅以升 林一山 林月琴(女) 林丽韞(女)
 林雨(女) 欧阳毅 罗叔章(女) 罗琼(女) 季羨林 周占鳌
 周礼荣 郑伯克 赵忠尧 郝德青 荣高棠 胡克实 胡荣贵 胡绩伟
 段苏权 侯学煜 俞霁峰(女) 洪丝丝 宦乡 费彝民 秦宝兴
 袁雪芬(女) 莫文骅 顾大椿 钱 敏 钱端升 徐运北
 爱新觉罗·溥杰(满族) 高登榜 黄志刚 黄荣昌 梅行 梅 益
 曹龙浩(朝鲜族) 曹 禺 符 浩 章瑞英(女) 清格尔泰(蒙古族)
 彭迪先 董建华 韩哲一(回族) 曾绍山 曾 涛 谢怀德 谢铁骊
 楚图南 裘维蕃 雷洁琼(女) 解 方 裴昌会 廖海光 熊 复
 潘 焱 薛暮桥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1983年6月18日于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2号》，载《人民日报》1983年6月19日。

11月12日

钱端升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七周年活动。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七周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全国政协副主席程子华、康克清、钱昌照、董其武、周培源、王光英、邓兆祥、叶圣陶，有关方面负责人平杰三、陈欣、彭友今、杨拯民、程思远等，参加了纪念仪式。

中山堂正面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画像两边和前面是长青的松柏和鲜花。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主持纪念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子昂代表全国政协，民革中央主席王昆仑代表民革中央，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市副市长孙孚凌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分别在孙中山先生像前献了花篮，廖梦醒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马璧、孔从洲、林丽韞、赵忠尧、钱端升、爱新觉罗·溥杰、雷洁琼；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王克俊、方荣欣、叶至善、叶笃义、孙承佩、严信民、李纯青、李铁铮、沈其震、张含英、赵子立、赵君迈、赵宗燠、钟惠澜、聂真、徐逸樵、凌其翰、高天、黄维、黄鼎臣、梁漱溟；葛志成；

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常委、中委和候补中委郑洞国、吴茂荪、贾亦斌、王枫、许宝骙、苏从周、吴秀峰、何柱国、沈求我、张克明、陈建晨、陈铭德、邵恒秋、周颖、黄启汉、傅学文、焦实斋、廖运周、谭惕吾、王静如、方贤旭、宁光堃、刘瑶章、李觉、李文澜、杨春洲、沈性元、张丰胄、张廉云、陈迺冬、宗之发、罗西欧、骆介子、黄翔、徐国懋、谌小岑、颜明宜、刘甲樱；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人士田富达、庄明理、刘品一、李贻骝、杜建时、邹秉文、沈醉、宋伟斌、张素我、林盛中、徐萌山、郭秀仪、唐振绪、黄玠然、黄苗子、韩咏华、唐鸿烈、刘春方、李一平、李奇中、杨玉清、余湛邦、张知行、陈修和、文强、杨伯涛、郑庭笈、方靖、彭鸿文、孙瑛、徐子清；

北京市各界人士许顺、吴惟城、浦洁修、叶恭绍、廖沫沙、陆宗达、邓季惺、夏翔、郭步岳、巫宝三、丁贡南、林彤、关士雄、莫艺昌、王力、司徒攀、陈炳基、吴益修、赵琪璠、赖钟声、查守愚。】

——《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各界人士分别举行仪式 纪念孙

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七周年》，载《人民日报》1983年11月13日。

12月26日

钱端升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今天上午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泽东同志的遗容，参观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室。

前往瞻仰毛泽东同志遗容并参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室的有：

……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王甫、王国权、王炳南、王淦昌、区棠亮、贝时璋、牛荫冠、孔从洲、邓家泰、古耕虞、叶林、白寿彝、吕骥、刘大年、刘东生、刘达、刘伟、刘瑞龙、许杰、孙敬文、李一清、李贵、杨立功、吴世昌、吴仲华、吴茂荪、吴波、何英、谷景生、沈鸿、宋一平、宋劭文、宋承志、张友渔、张文裕、张杰、张贤约、张秉贵、张承先、张珍、张致祥、陈宗基、陈鹤桥、武衡、林一山、林雨、欧阳毅、郑伯克、赵忠尧、郝德青、荣高棠、胡克实、胡绩伟、段苏权、洪丝丝、宦乡、莫文骅、钱端升、爱新觉罗·溥杰、高登榜、黄志刚、梅行、梅益、曹禺、符浩、章瑞英、彭迪先、董建华、韩哲一、曾涛、谢怀德、谢铁骊、楚图南、裘维蕃、雷洁琼、熊复、潘焱、薛暮桥】

——《深切怀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各界人士瞻仰毛泽东同志遗容 参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室，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载《人民日报》1983年12月27日。

12月27日

钱端升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委员。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名单：

主席：史良（女）

副主席：胡愈之、楚图南、苏步青、华罗庚、彭迪先、萨空了、李文宜（女）、费孝通、闻家驷、钱伟长、高天、叶笃义、谈家桢、陶大镛

秘书长：叶笃义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千家驹、马大猷、王健、王金陵、叶笃义、叶培大、叶君健、田一平、史良（女）、冯亦代、冯克熙、冯素陶、朱德熙、华罗庚、邬沧萍、庄明理、刘开渠、刘思慕、关世雄、关梦觉、池际尚（女）、许杰、苏步青、李文宜（女）、杨明、杨奎章、吴汉家、吴廷璩、吴作人、吴鸿宾、吴富恒、沈兹九（女）、张乔音、张毕来、张楚琨、陆士嘉（女）、陆宗达、陈敏之、陈新民、林亨元、林宗彩、罗涵先、罗雄才、金锡如、赵今声、赵访熊、赵超构、胡愈之、闻家驷、费孝通、莫乃群、原政庭、顾敬心、钱伟长、钱端升、徐寿轩、高天、郭翹然、唐哲、谈家桢、陶大镛、黄药眠、萨空了、常迥、彭迪先、楚图南、潘大逵

执行局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健、叶笃义、冯亦代、杨明、吴汉家、张毕来、林亨元、罗涵先、高天

主任：高天

副主任：罗涵先、吴汉家

顾问（按姓氏笔划为序）：戈福鼎、刘良模、刘明水（女）、刘颖、朱裕璧、朱福炘、李汝祺、李瘦枝、张江树、张松涛、张锋伯、沈炼之、邵宗汉、谷霁光、陈翰伯、孟宪荪、武伯纶、金岳霖、胡克林、胡信德（女）、赵善欢、顾光中、谢高峰、曾庶凡、缪钺、霍秉权、操震球、魏曦

中央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丁聪、丁是娥（女）、万尚荫、千家驹、马大猷、马梅荪、王起、王健、王健、王越、王瑶、王丹凤（女）、王世锐、王丕建、王麦初（女）、王启东、王金陵、王治田、王振华（女）、王铁崖、王铸之、王湘浩、王源璋、王赣愚、方仲伯、方宗熙、左嘉猷、石任球、石兆棠、卢乐山（女）、卢治国、卢惠霖、叶春、叶生发、叶君健、叶笃义、

叶笃庄、叶培大、田一平、史良(女)、白寿彝、包望敏、包淑和(女)、冯之浚、冯亦代、冯克熙、冯素陶、司徒亮、曲林善、朱亚杰、朱光潜、朱宣人、朱景梓、朱德熙、乔传珏、任谦、华罗庚、邬沧萍、庄明理、刘开渠、刘延良、刘克静(女)、刘佩瑛(女)、刘思慕、刘馥英(女)、关世雄、关梦觉、江泽涵、池际尚(女)、汤松年、许杰、许祖岷、许杰夫、阮璞、阳含熙、寿进文、苏延宾、苏步青、苏翰彦、杜棻、杜任之、杜迈之、杜锡钰、李柱、李文宜(女)、李平一、李何林、李茂之、李沛文、李树元、李鸿寿、李锐夫、杨明、杨克勤、杨村彬、杨春霖、杨奎章、杨维骏、肖乾、时宜新、吴中枢、吴东儒、吴汉家、吴汝舟、吴克清、吴廷璆、吴作人、吴组缃、吴绍骥、吴春选、吴修平、吴鸿宾、吴富恒、余国器、余俊生、余鸿业、余瑞璜、汪金丁、沈晋、沈一帆、沈兹九(女)、张任、张大煜、张仁俊、张百庵、张乔音、张毕来、张纪域、张远谋、张楚琨、张毓德、张镜人、陆诒、陆士嘉(女)、陆宗达、陆星垣、陆钟祚、陈仁炳、陈仲言、陈庆魁、陈绍蕃、陈彦之、陈敏之、陈淑珍(女)、陈鼎文、陈新民、陈新桂、陈碧笙、范存忠、林亨元、林金铭、林宗彩、林宪章、尚丁、罗潜、罗涵先、罗雄才、季镇准、金若年、金锡如、周伯璜、周维迅、赵一明、赵今声、赵汝翼、赵访熊、赵修复、赵继游、赵敏学、赵超构、胡毅、胡一声、胡伟夫、胡钟达、胡章瑞、胡景儒(女)、胡愈之、项堃、侯杞新、闻家驷、俞元桂、洪盈(女)、洪丝丝、洪伯铿、祝宽、祝汝方(女)、费孝通、贺麟、秦西灿、都本洁、耿振华、莫乃群、原政庭、顾敬心、钱伟长、钱宝钧、钱端升、倪保珊、徐鹏、徐亦安、徐寿轩、徐景星、徐铸成、翁曙冠、高天、高元白、高成庄、高良润、高国泰、高尚荫、郭贻诚、郭振中、郭翹然、郭履容(女)、唐哲、唐弘仁、谈家桢、陶金、陶大镛、黄执中、黄志霖、黄药眠、黄铭新、萨空了、曹钟梁、曹慰农、盛家廉、常迥、常任侠、康振黄、章文才、章振乾、商承祚、梁若尘、彭少方(女)、彭少逸、彭迪先、彭燕郊、董民声、董鉴溶、蒋书楠、蒋阜南、韩伯林、韩罕明、韩学章(女)、傅世英、傅家麟、鲁在瑄、曾吴奎、楚图南、褚圣麟、强镠、蔡颐年、潘大逵、蹇先艾、戴今

生、戴执中、戴安邦、戴松恩、戴树和、戴爱莲（女）】

——《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名单》，载《人民日报》1983年12月28日。

1984年（84岁）

7月7日

钱端升等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分组审议了国务委员张劲夫作的《关于赵紫阳总理访问西欧六国和欧洲共同体情况的报告》。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的委员们今天上午分组审议了国务委员张劲夫作的《关于赵紫阳总理访问西欧六国和欧洲共同体情况的报告》。大家认为，赵总理这次出访，阐明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促进了我国人民同西欧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

耿飚副委员长说，张劲夫的报告总结得很好。特别是讲到外交政策的三个坚持，这是外交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我国今后外交工作重要的方针。我们要广泛宣传对外开放政策，争取更多的国家同我们发展经济技术合作关系。耿飚副委员长和林丽韞、洪丝丝委员认为，在外交政策上高举和平旗帜完全正确，我们的四化建设需要和平环境。

周谷城副委员长、钱端升委员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外交活动坚定不移的指导方针。国家不论大小，都要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是非常正确的。

曾涛委员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的政策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国际威望。赵总理的出访收效非常大，这是和我们大好的国内形势密切相关的。外国人现在认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得好，政治局势稳定。因此，我们国内各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得更好一些。他建议，同外国的经济交往，应该和我们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联系起来，要下决心尽快克服我们

的缺点，改进工作。

雷洁琼、许涤新委员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沂谈到，赵总理出访，宣传了富民兴邦政策，这是非常正确的，也是争取西欧国家合作的一个有力措施。王淦昌委员说，引进技术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韩哲一委员说，今后对外经济交往，要对引进的东西好好消化吸收，同时还要自力更生地进行科研和创造。】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认为 赵总理访西欧六国和欧洲共同体取得圆满成功》，载《人民日报》1984年7月8日。

7月18日

钱端升等举行座谈会，隆重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三十周年。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我国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和外交界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二百五十多人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隆重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三十周年。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已故周恩来总理1954年访问印度和缅甸时，由中印、中缅共同倡导的。

赵紫阳总理出席了座谈会并讲了话。他说，三十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促进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原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实际上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他强调说，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三十年来，我们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真诚地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继续建立和发展关系。我们同样希望，世界上所有国家在相互关系中都能严格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反对破坏这些原则的霸权主义行为。只有这样，国与国之间才能建立起健康的关系，国际紧张局势才能得到缓和，世界和平才能得到维护。

今天的座谈会是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和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举办的。

外交学会会长韩念龙主持了会议。二十二位发言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在讲话中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五项原则的提出就是要打破旧的国际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我们真诚地希望同各国共同维护和遵守五项原则，促进人类进步，维护世界和平，为建立新型国际秩序而努力。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周培源指出，中国科技工作者愿意同各国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和技术交流，本着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精神，在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中增进友谊，促进经济和科技发展。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钱昌照说，中国和印度是最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他说，发展中、印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加强双边的文化、学术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完全有必要，而且潜力很大。至于两国之间存在着边界问题，我们认为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协商谈判是可以解决的。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费孝通说，进一步推进和平共处，在共处中竞赛，在和平中发展，是国际学术文化界人士的广泛要求和热切期望。我们深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在各国人民的实践中进一步得到应用和发展。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李一氓说，在国际关系中，中国支持第三世界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同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致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身的要求。

外交学会副会长、前驻美国大使柴泽民说，中美之间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双方就必须不只是在口头上而在实际行动上不折不扣地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我们希望美国能同我们一起严格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真正以平等的原则处理两国间的问题，使中美关系按照两国人民的愿望在稳定、持久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委员、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刘克明在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苏关系问题时指出，最近两年，两国进行几次政治磋商，贸易和人员往来有了增加。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苏联至今仍在中苏边境和蒙古派驻重兵，继续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继续侵占中国的邻邦阿富汗。他说，这些情况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也是根本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他希望苏联采取实际行动排除三大障碍。

今天在会上发言或作书面发言的还有郑为之、程思远、叶笃义、李铁铮、钱端升、陈忠经、王铁崖、宦乡、刘思慕、孙平化、浦山、刘春、丁石荪、杨公素、王岳。

出席座谈会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乔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国务委员姬鹏飞、吴学谦，以及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部分委员，中共中央和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三十周年 经受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显示强大生命力 首都各界人士举行座谈会纪念，赵紫阳讲话，二十二人发言》，载《人民日报》1984年7月19日。

10月12-19日

钱端升参加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的座谈会。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中共中央于10月12日至19日邀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知名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对提交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的意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先后两次参加了座谈会的全体会议，听取意见并讲了话。邓颖超、习仲勋、胡启立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受中共中央委托，参加了座谈会。习仲勋同志主持了三次全体会议。

邓颖超同志在12日下午座谈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了话，希望大家

认真讨论，畅所欲言，对决定草案提出修改意见。林润青代表决定起草小组介绍了决定起草过程，并作了说明。

座谈会于13、14、15日分组进行了讨论。讨论会上气氛热烈，大家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决定草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

在16日上午的全体会议上，胡耀邦听取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知名人士对决定草案的修改意见，并且介绍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另一项议题——关于明年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在16日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有：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周谷城，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学范，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民建中央副主席孙晓村，致公党中央主席、全国侨联副主席黄鼎臣，台盟总部主席苏子衡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程思远。全国台联会长、全国妇联副主席林丽韞作了书面发言。他们在发言中认为，党中央召开这次座谈会，征求大家对《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的意见，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界人士的信任，是高度发扬政治协商精神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反映，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精神的体现。

大家一致赞同和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认为决定草案认真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建设和近几年城乡改革的经验，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反映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反映了我国四化建设和实际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大家认为，这个文件经过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后，一定会成为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必将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新的飞跃，从而对实现十二大确定的总任务和总目标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有些人士在发言中谈到，在四化建设中，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随

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应当提到日程上来。有的人士谈到，要重视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教育、为培养人才打好基础。还有人提出，要注意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

大家表示，人心齐，泰山移，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万众一心，站在改革的前列，为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19日上午继续举行全体会议，胡耀邦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出席座谈会的有：

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王昆仑、屈武、钱昌照、郑洞国、贾亦斌、侯镜如、孙越崎、彭清源、李贛骝、楚图南、萨空了、李文宜、费孝通、闻家驷、高天、叶笃义、陶大镛、许涤新、浦洁修、黄大能、蒋达宁、叶圣陶、陈舜礼、葛志成、季方、严信民、卢嘉锡、方荣欣、许志猛、陆榕树、周培源、潘菽、茅以升、严济慈、金善宝、孙承佩、郝诒纯、赵伟之、李纯青、田富达、钱福星、林盛中、徐萌山、罗叔章、吉耕虞、张敬礼、黄凉尘、孙孚凌、樊陶斋；

无党派民主人士缪云台；

其他知名人士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刘澜涛、程子华、康克清、董其武、肖华、包尔汉、爱新觉罗·溥杰、马璧、洪丝丝、庄明理、梁漱溟、易礼容、王力、赵君迈、程元、钱端升、赵忠尧、安士伟、郑坚；

【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平杰三、李贵、江平等。】

——《征求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的意见 党中央邀请各党派、无党派和知名人士座谈 胡耀邦到会听取意见并讲话。邓颖超习仲勋胡启立等也参加了座谈会》，载《人民日报》1984年10月22日。

11月12日

上午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八周年仪式。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

举行仪式，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八周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朱学范，全国政协副主席程子华、康克清、吕正操、包尔汉、邓兆祥、费孝通、茅以升，有关方面负责人李贵、李定、彭友今、杨拯民、程思远、罗涵先等，参加了纪念仪式。

中山堂正面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画像下面摆满了翠柏和鲜花。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主持纪念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缪云台代表全国政协，民革中央主席王昆仑代表民革中央，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市副市长孙孚凌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分别向孙中山先生画像献了花篮。廖梦醒也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各界人士还有：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贝时璋、孔从洲、吴作人、林丽韞、钱端升、雷洁琼；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王克俊、孙承佩、孙晓村、严信民、苏子衡、李觉、李文宜、李纯青、李铁铮、张含英、赵子立、赵君迈、钟惠澜、唐生明、黄维、黄凉尘、黄鼎臣、萨空了、葛志成；

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央常委、顾问，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顾问郑洞国、贾亦斌、侯镜如、孙越崎、彭清源、李贛骠、王枫、宁光堃、许宝骥、苏从周、吴秀峰、沈求我、陈建晨、陈铭德、邵恒秋、周颖、黄翔、覃异之、傅学文、焦实斋、廖运周、王奇、王彦亭、李文澜、李世军、杨纪琬、沈性元、沈鑫、张丰胃、张廉云、宗之发、骆介子、梁蔼然、谌小岑、谢树英、陈久敬、颜明宜、韦大卫、孙惠书、李沛钰、沈学斌、张子伊、林上元、姜亚农、夏从本、郭可诠、蒋建国、万枚子、尹文堂、尹冰彦、李泰华、张立钧、张德尊、周怀尼、周锡卿、姜卿云、祝修林；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人士杜建时、宋伟斌、郭秀仪、黄玠然、赵明哲、唐鸿烈、杨希枚、经普椿、刘春方、李一平、杨玉清、余湛邦、陈修和、文强、杨伯涛、郑庭笈、孙瑛；

首都各界人士沙里、李伯康、许顺、李天绶、任宁芬、吴惟诚、高戈、

邓季惺、夏翔、巫宝三、丁贡南、罗青、莫艺昌、范至甫、司徒擎、陈炳基、贾似曾、赵琪璠、赖钟声。

袁晓园教授也参加了纪念仪式。】

——《首都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各界人士举行仪式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18周年》，载《人民日报》1984年11月13日。

11月12-13日

钱端升参加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分组讨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昨天和今天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了关于李先念主席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四个亚洲国家的情况报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提交的两项议案和《草原法（草案）》。

委员们在两天的分组审议中，普遍认为，李先念主席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巴基斯坦、约旦、土耳其、尼泊尔获得了圆满成功。曹龙浩委员说，李主席的这次出访高举团结、友好、合作的旗帜，体现了我国的对外政策，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声望，是令人满意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委员长说，我国领导人这几年出访了许多国家，这很有必要，不但对促进我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的友谊有益处，而且可以与别国互相取长补短，对指导国内经济建设很有好处。郑伯克、刘达、沈鸿、罗琼、刘伟、段苏权、张致祥、张珍、吴世昌、袁雪芬、钱端升等委员也都发了言。

委员们在审议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草案）》的议案时认为，制定和颁布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是适时的、必要的。赛福鼎·艾则孜副委员长说，设立海事法院是形势发展的需要，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外贸工作的发展，必然在沿海城市发生一些海事纠纷，需要设立海事法院及时处理。同时，委员们对决定草案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有的建议，应明确规定海事法院由谁监督。朱学范副委员长，陈宗基、徐运北等委员提出，应尽快制定我国的海事法，培训海事司法人员，以适应新形势的需

要。何英、马万祺等委员发了言。

委员们对国务院提请审议的《草原法（草案）》进行了初步审议。侯学煜委员说，制定草原法是十分必要的。这个草案体现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梅行委员说，《草原法（草案）》是符合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的。胡绩伟委员说，草原法对于加强草原的管理、促进牧区的发展会有重要作用；他建议在修改这个草案时，要进一步体现出通过立法积极建设和开发草原的精神，要促进牧业改革的发展。胡绩伟建议对这几年牧区出现的新情况，如牧民承包草原，草案要明确写出鼓励、扶持、支持的意思，对今后征用草原的办法规定中要给予照顾，使牧民放心放手地进行草原建设。许涤新、谢怀德、韩哲一、董建华、孔从洲、扎喜旺徐、清格尔泰、王国权也发了言。黄华副委员长建议，在通过草原法时应强调各级人大常委会、政府在草原法颁布后要各司其职，切实保证这个法的贯彻实施。列席会议的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振江说，《草原法（草案）》对南方的情况写得少了一些，建议在修改时注意这个问题。

委员们认为，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有利于我国引进先进技术，有利于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荣毅仁副委员长说，我国虽然已公布了《专利法》，但由于没有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外国人对我们还不放心，加入这个公约，他们就放心了。符浩、洪丝丝、裘维蕃、秦宝兴等委员发了言。】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 审议李先念主席出访欧亚六国的情况报告和两项议案以及草原法草案》，载《人民日报》1984年11月14日。

1985年（85岁）

3月12日

钱端升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六十周年。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六十周年。乌兰夫代表中共中央在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遗像前献了花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王震、杨尚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彭冲、王任重、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周谷城、严济慈,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程子华、康克清、胡子昂、王昆仑、董其武、陈再道、包尔汉、缪云台、费孝通、屈武、茅以升参加了纪念仪式。

纪念仪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主持。各界人士在孙中山先生遗像前肃立、静默。许德珩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胡子昂代表全国政协,王昆仑代表民革中央,杨静仁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孙孚凌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侯镜如代表民革北京市委,向孙中山先生遗像敬献了花篮。全国政协秘书长彭友今受邓颖超同志委托,向孙中山先生遗像献了花篮。廖梦醒同志也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还有:

有关方面负责人李贵、江平、陈欣、杨拯民、程思远、罗涵先、宋德敏、沙里、宋堃、马正信、刘小萍、马永顺、冯廷雄;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甫、牛荫冠、孙从洲、艾青、古耕虞、刘大年、吴世昌、张友渔、陈宗基、欧阳毅、钱端升、高登榜、章瑞英、楚图南、雷洁琼。】

——《首都各界人士举行仪式 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六十周年 乌兰夫代表中共中央献花篮 习仲勋王震杨尚昆等参加》,载《人民日报》1985年3月13日。

8月25日

钱端升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欢迎美国参议院代表团宴会。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多尔率领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讲话中代表人大常委会和彭真委员长对美国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王任重说，美国国会的领导人和许多参众议员先后访问过我国，他们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了不少积极有益的工作。我们两国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况，也是与两国议会的交往分不开的。

王任重说，中美之间发展友好合作还有很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但是要发挥这样的潜力和实现这样的前景，还有一些障碍和困难有待克服，尤其是台湾问题。

他说，我们认为只要双方能够按照中美两国政府历次公报所确定的原则，履行各自承担的义务，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友好合作的精神，就能摆脱这些有害于两国关系发展的羁绊，从而集中力量开辟中美友好合作的新天地。中国人大愿为此尽心竭力。美国国会和来访的各位参议员在这方面也是大有可为的。

王任重说：“最近，李先念主席应里根总统的邀请，圆满成功地访问了美国，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们衷心地希望多尔参议员一行对我国的访问也将富有成果。”

多尔在讲话中说，我们是作为朋友来中国的。我们感到我们正处在朋友中间。确实，我们两国有许多共同之处。

他说，我们两国在经济和人员方面加强交流将会进一步增进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

多尔说，正像王任重副委员长指出，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其中之一就是台湾问题。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和平解决。

他还希望美中能友好地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多尔对王任重不久将率领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美国表示欢迎。

人大常委会委员曾涛、吴波、刘念智、林丽韞、张珍、钱端升等出席了宴会。】

——《人大常委会宴请美国参议院代表团 王任重和多尔讲话表示双方要加强交往》，载《人民日报》1985年8月26日。

11月12日

钱端升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九周年。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九周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荣毅仁,全国政协副主席程子华、康克清、钱昌照、吕正操、周培源、包尔汉、费孝通、赵朴初、马文瑞、茅以升,有关方面负责人李贵、江平、平杰三、程思远、罗涵先、沙里等,参加了纪念仪式。

孙中山先生的画像悬挂在中山堂的正面,画像下摆满了翠柏和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主持纪念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子昂、民革中央代理主席屈武、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北京市副市长孙乎凌分别代表全国政协、民革中央、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孙中山先生画像前献花篮。全国政协代理秘书长周绍铮代表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献花篮。廖梦醒也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各界人士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贝时璋、孔从洲、钱端升、爱新觉罗·溥杰、雷洁琼;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万国权、方荣欣、叶至善、孙承佩、孙起孟、孙晓村、许志猛、严信民、苏子衡、李觉、李纯青、李铁铮、张含英、赵子立、聂真、徐逸樵、凌其翰、高天、黄维、黄凉尘、黄鼎臣、萨空了、梁漱溟、葛志成、蔡啸、庄明理、章师明;

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央常委,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顾问郑洞国、贾亦斌、侯镜如、孙越崎、彭清源、李贛骝、王枫、宁光坤、许宝骥、苏从周、吴京、吴秀峰、沈求我、张克明、邵恒秋、周颖、黄翔、覃异之、傅学文、焦实斋、廖运周、谭惕吾、王奇、王彦亭、王静如、方贤旭、冯弗伐、刘甲樱、刘瑶章、李世军、沈性元、张廉云、陈迺冬、罗西欧、宗之发、骆介子、陈久敬、潘素、韦大卫、沈学斌、张子伊、林上元、姜亚农、夏从

本、郭可诤、蒋建国、万枚子、尹文堂、尹冰彦、李泰华、张立钧、张德尊、陈树华、周锡卿、祝修林、李健达、段绍浩；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人士田富达、伍禅、浦洁修、杜建时、沈醉、宋伟斌、林盛中、徐萌山、黄劫然、赵明哲、经普椿、杨玉清、罗历戎、杨伯涛、方靖、李大维、孙瑛、袁晓园、赵伟之、陆榕树、楚庄；

首都各界人士李伯康、许顺、李天绥、任宁芬、吴惟诚、叶恭绍、关世雄、邓季惺、巫宝三、丁贡南、甘英、沈一帆、莫艺昌、毛之芬、司徒攀、陈炳基、吴益修、甘莹、赵琪璠、赖钟声。出席民革组织工作座谈会的有关负责人也参加了纪念仪式。】

——《首都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各界人士分别举行仪式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九周年 王震向中山故居敬献花篮》，载《人民日报》1985年11月13日。

1986年（86岁）

1月

为《政治学研究》撰文《为我国政治学的发展进言》。

——参见钱端升：《钱端升主要著作目录》，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1页。

3月12日

钱端升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六十一周年。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六十一周年。

肃穆的中山堂里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下面摆着翠柏和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刘澜涛、费孝通，参加了纪念仪式。

纪念仪式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钱昌照主持。各界人士在孙中山先生遗像前肃立，行三鞠躬礼。胡子昂代表全国政协，阎明复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屈武代表民革中央，陈昊苏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侯镜如代表民革北京市委向孙中山先生像敬献了花篮。廖梦醒也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还有：

有关方面负责人江平、李定、平杰三、周绍铮、彭友今、刘大年、杨拯民、陆平、程思远、罗涵先、孙轶青、宋德敏、刘小萍；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林丽韞、钱端升、雷洁琼、方荣欣、孙承佩、孙起孟、孙晓村、苏子衡、李文宜、李纯青、李铁铮、聂真、凌其翰、高天、黄维、葛志成、李觉；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有关人士冯梯云、蒋达宁、赵伟之、陆榕树、樊陶斋、徐萌山、程元、陈修和、金冲及、经普椿、杨新人；

民革中央副主席郑洞国、贾亦斌、孙越崎、彭清源、李贻骝，民革中央常委、中常委顾问王枫、宁光堃、许宝骙、苏从周、吴京、吴秀峰、沈求我、张克明、张素我、陈建晨、邵恒秋、赵子立、黄翔、覃异之、傅学文、焦实斋、廖运周、谭惕吾、袁晓园，民革中央委员、候补中委、中委顾问王奇、王彦亭、王静如、冯弗伐、刘瑶章、杜建时、李沛钰、沈性元、张丰胄、张廉云、陈久敬、罗西欧、宗之发、骆介子、梁蔼然、颜明宜、潘素、韦大卫、孙惠书、沈学斌、张子伊、姜亚农、夏从本、蒋建国、万枚子、文强、尹文堂、刘春方、李泰华、杨玉清、杨伯涛、余湛邦、张立钧、张德尊、陈树华、周锡卿、郑庭笈、祝修林、唐鸿烈、李健达、段绍浩；

北京市各界人士李伯康、许顺、任宁芬、王宝亮、吴惟诚、关世雄、陶大镛、叶恭绍、陈明绍、邓季惺、夏翔、巫宝三、丁贡南、甘英、莫艺昌、梅向明、陈炳基、贾似曾、赵琪璠、王恺谋、赖钟声、田象奎、张思浚、祝步唐、宁向南等。】

——《北京、广州、南京、上海、武汉等地举行纪念活动 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六十一周年》，载《人民日报》1986年3月13日。

3月17日

钱端升参加朱光潜教授遗体告别仪式。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遗体告别仪式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赵紫阳同志送了花圈，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邓颖超、习仲勋、李鹏、胡乔木、胡启立、王兆国、彭冲、周谷城也送了花圈，并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钱昌照、周培源、费孝通，民盟中央领导人楚图南、李文宜、钱伟长、高天、叶笃义、陶大镛，以及其他民主党派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雷洁琼、黄鼎臣、苏子衡、阎明复、李贵、李定、平杰三、周绍铮、杨拯民、陆平、何东昌、杨海波、彭佩云、李锡铭、金鉴、汪家镛、李伯康、丁石孙、王学珍，朱光潜同志生前友好钱端升、钱逊、陈岱孙、季羨林、王力、钱钟书、冯至、吕叔湘、江泽涵、贺麟、黄镇等，共三百多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刘澜涛、陆定一、程子华、康克清、季方、庄希泉、帕巴拉·格列朗杰、胡子昂、钱昌照、董其武、陶峙岳、杨成武、陈再道、吕正操、周培源、包尔汉、缪云台、王光英、邓兆祥、费孝通、赵朴初、叶圣陶、屈武、巴金、马文瑞、茅以升、刘靖基，送了花圈。送花圈的还有民盟中央代理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国务院、全国政协、民盟中央、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国家教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北京大学、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学学会、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等单位。社会各界一些知名人士和朱光潜同志的生前友好也送了花圈。

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同志深切悼念朱光潜这位为我国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著名美学家、教育家。向朱光潜的夫人奚今吾及子女表示亲切的慰问。】

——《我国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朱光潜教授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1986年3月18日。

9月11日

鲍彤怀念吴世昌文章提及钱端升。

【献给一位正直的中国人的哀思】

——吴世昌教授的几件事

鲍 彤

舅舅死了。死意味着永诀。但这些天，我阖上眼，舅舅的音容笑貌就反复在我面前出现。他总是在议论，不断地议论，论文，论政。远远近近的往事，纷至沓来，交织在一起，又渐渐分开，有的趋于淡化，有的越来越明朗。

二十年以前，也就是那个“史无前例”的第一个年头的上半年，气温骤然下降，从春寒突如其来地倒退到漫长的严冬。万马齐喑。只有声讨《海瑞罢官》的尖叫声倒处处可闻。在一次全国性的座谈会上，有人念念有词地在历诉吴晗同志的“罪状”，许多人用惶惑和沉默来表示抗议。对聒噪的乌鸦，舅舅不屑苟同。对被迫噤声的同志，舅舅是同情的。但他不允许自己沉默。他说话了。“不过我想，贪官总不比清官好……”，“不过我想，用文海战术是不能判断是非的……”，“不过我想，……”——一半普通话，一半硃石乡音，短短几句，语惊四座，掷地作金石声。乌鸦说，这是马，并且胁迫别人也必须把鹿说成马。舅舅说，这是鹿，你不能靠黑压压的文海战术来封住别人的嘴巴，或者强制别人跟着你胡说八道。的确，吴晗同志是舅舅的挚友，但舅舅当时想到的不仅仅是友情，他是在为常识说话，他要维护常识。他深知，一个民族，一旦把常识丢掉了，随之而来的必是大灾大难。本来是常识，一遇到非常、无常、反常的气候，却成了大不韪。于是，是非问题就成了安危问题。当时我在外地，没有身历其境。我只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他的几句“尖端”的话，那些更“尖端”的话是几天后才知道的。回到北京，我去探望他。我心情非常沉重，舅舅却谈笑自若。我婉转地请他“三

思”，他淡淡地说：“我是想过以后才说的。”他反问：“我说得对不对？”我支支吾吾。他望了我片刻，一种责备的目光，不，应该说是怜悯的目光，好像在说：“我的可怜的没出息的外甥！”我战栗了。他是一位不懂人情世故的老孩子，通常不大会体贴别人的心境。但这次，像非常体贴他的被迫噤声的同志一样，也非常体贴我，他轻轻一转，捡起了别的话题，从此再也没有重提这件事。他怕我难堪。确实，我很难堪，惭愧。我，一贯以唯物论者自居；他，从来不说自己对唯物论有多少研究。但是，在惊涛骇浪中，他比我勇敢，坚强，镇定。真理所在，安危在所不计。“我是想过以后才说的。”舅舅说了他想说的话，也承担了他绝非没有考虑过的风险。

谁说共产党人不能向非党人士学习？不仅可以学到知识，学到礼貌，而且可以学到……党性！是的，舅舅使我懂得，共产党人应该而且可以从非党人士身上学到党性——明辨是非的党性，尊重常识的党性，追求真理的党性，告诉别人真理的党性。

舅舅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人们常常说他是一位汉学家。他确实是一位渊博而有独到见解的汉学家。他爱汉学，因为他爱中国。爱中国，可以爱科学，爱技术，爱经济……但他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在中药店里当了五年学徒，条件不允许他接触其他更有益于拯救中国的学科。在他的四哥、我的大舅舅吴其昌教授——梁启超、王国维、唐文治等国学大师晚年的学生——的熏陶下，他选择了汉学一途。于是出现了“离奇”的现象。他进的是浙江嘉兴的秀州中学，一所外国教会办的学校，半工半读，用两年半时间读完了初中和高中的全部课程，却终身与基督教无缘。他在燕京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得的也是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英文造诣极深，却终身潜心于中国文化：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国的史料典籍，中国的辞赋诗词。他在燕大二年级时发表的学术论文，得到国际汉学界特别是日本汉学界的推崇，被誉为“文史无所不通”；他本人在当时和此后半个世纪内，一直同日本汉学界保持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但民族大难当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他是坚定的抗日派，不做妥协派，更不当投降派。最初赏识他的，除了顾颉刚先生，还有

胡适之先生。胡先生甚至用一些溢美之辞来奖掖他：“知遇之甚，可谓至矣！”但是，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舅舅才二十几岁，就同胡适之就抗战还是妥协展开论战，分道扬镳。他个人的乐趣在治学，探源正本，考异钩玄。但他知道，在那个时候，民族的最强音是不当亡国奴。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各大学讲学之余，用了很大的力量撰写时局政论文章。如果说，今天，由于写了《红楼梦探源》和《探源外编》，他被许多称为红学家；那么，在抗战时期，他是被许多人称为抗日政论家的。他的最后一篇抗日论文是为重庆《时事新报》写的社评，题目大概是《日本投降指日可待》，是在日本投降的上一天写的。第二天，评论见报，几小时后，电讯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暑假，舅舅，伯升舅母，令徽和令安二位妹妹，到上海来，住在我们家中。加上别的亲戚，主客十二人，挤在总面积二十五平方米的两间亭子间中。长辈们睡在床上，晚辈都睡在地下，天气又闷热，无法歇息。大人们常常作彻夜谈，孩子们也不愿睡，都赖在边上听大人谈话。我当时十三岁，初中刚毕业，他们谈的许多内容现在都忘了。唯独谈的那篇《日本投降指日可待》的社评，以及舅舅爽朗的笑声，使我感到胜利的喜悦和民族的骄傲。“这是我写的最后一篇抗日文章。”舅舅这句话，至今还在我耳边回荡。

抗战使舅舅拿起政论的笔，胜利并没有使他放下。他接触了政治，认识了中共、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的朋友们。他放不下政论的笔。他是《观察》最热心的撰稿人之一。也在1946年暑假，储安平先生到我家来找舅舅，谈办《观察》的事。那是一天下午，我母亲见有贵客到，没有别的东西招待，就把准备充当晚饭的南瓜盛出来敬客。看到母亲把一碗南瓜端给西装革履的储先生，我觉得有点窘，舅舅却从容不迫地对储先生说：“好，好，老黄南瓜，老黄南瓜，我五姊亲手做的，尝尝！”他们谈了好久，好些我都似懂非懂，只有一句，我完全听懂了。舅舅指着我，对储先生说：“他是我的外甥，快上高中了，你送他一份《观察》吧。”储先生欣然允诺，认真地记下了我的名字。从此，我每星期收到一份邮寄的《观察》。我每期都读。我不完全同意《观察》的观点，但是，它告诉我许多关于时局的信息，

也使我知道了钱端升、费孝通、潘光旦、雷洁琼、樊弘以及其他许多教授的观点。舅舅的文章，我当然读得更仔细些。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力量很强。我从初中三年级起，就陆续受到来自教师和同学的一些启蒙教育，因此，我认为，他当时似乎还不大了解下层劳苦大众，不大了解我们党。但是，看到他骂国民党独裁、贪污、腐败的文章，笔势纵横，淋漓尽致，真使人痛快。是的，他爱中国，但他绝不爱中国的黑暗的东西。

第二年，1947年夏季，他又到上海来了，又挤在我家的两间斗室之中。牛津大学聘他去讲学。国民党教育部的朋友则告诉他，他被列入了黑名单，中央大学要解聘他。于是，他就经香港到英国去了。后来，1962年9月，他回国后的最初几天，我去看舅舅，正好翁独健教授也来看他。翁教授一进门，他们两位就做了一个几乎要拥抱的姿势，翁教授称舅舅“老吴”，舅舅称翁教授“拉·柏蒂”，相视而笑。他们二位在燕大是住同一间宿舍的，“拉·柏蒂”是当时燕大同学向翁教授亲昵地打趣时所常用的法文译名。翁教授说：“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舅舅说：“我没到英国就想到要回来了！郭老可以作证！”原来1947年舅舅在上海上飞机，一到香港，就去找郭老。郭老夫妇以及他们的几个孩子，住在一间极小的房间里。当时是夜间，孩子们都睡在地上，舅舅蹑起脚尖，从孩子们的身上跨过。舅舅对郭老说：“中大要解聘我，牛津要我去，我还没有拿定主意。”郭老说：“去好！不过不要太久。太久了，国内的情况你就疏远了。”舅舅对郭老说：“你看我什么时候该回来，就给我写封信。”确实，后来郭老以科学院院长身份向舅舅发出的聘书，我见过，时间是1962年，编号是001。

这是我1962年才知道的事。但在此之前，我就确信，我的舅舅总是要回来的。解放以后，我给舅舅写过两封信。一次是1956年，我以共产党员的矜持（应该说是幼稚），很不得体地问舅舅：“对人民政府的观感如何？”简直像外交谈判。舅舅很诚恳地回了我一封长信。其中有一段话，大意是：“有的朋友告诉我，新政权好。有的朋友告诉我，新政权不好。我已观察七年。我认为，新政权比旧政权好得多。”第二次是1959年，我以替母亲代

笔、姊弟谈心的形式，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些老气横秋的话，如“务必令二侄说中国话，学中国字”，另外也有一些稍为委婉的话，如“异岛雾重，故国春好，廉颇未老，想必能饭”。舅舅给我回了一封更长的信。他说：“你提出廉颇的典故，想来是两层用意。如问我身体如何，我告诉你：两鬓多情，对镜未白，群牙无力，遇食先摇。如问我何时回国，我的回答是，廉颇离开赵国是出于无奈，被迫的，我当然是要回到中国来的。”这两封信，我一直珍藏着。可惜，1966年8月，我被抄家，从此散失。

1962年国庆前夕，舅舅回来了。这对舅舅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正是“大跃进”后三年的困难时刻，舅舅不是不知道。那一年，牛津大学向舅舅提出要续聘。美国康奈尔大学也聘他去当教授。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大学聘他去当中文系主任。令安妹中学毕业，获得英国教育部为中学生设立的最高奖学金，可以免费任择牛津、剑桥等最高学府。但是，既然郭老请他回来，可见国家有此需要，他就举家回国，毅然决然，义无反顾。他的心，在中国。穷？“我是中国人，不怕中国穷。”挨斗？“即使预先知道有这场‘革命’，我还是要回来的。”为什么？还是舅舅自己的话：“爱国，总是要付点代价的。”

舅舅，请允许我问您最后一句话：您认为什么是爱国者的责任？舅舅，您永远不可能用语言来回答我了！但是，舅舅，我知道您的答案。您一生的经历和事迹，就是您的答案。

我见到过一些很爱国的人。他们想把中国的一切都说成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很善良，但是，如果把信念建立在缺乏了解——更不用说自大或者排外了——的基础上，那么，一旦打开窗户，难免眼花缭乱。舅舅在牛津讲了十五年学，还到过欧洲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到过日本，五大洲都有他的老师、学生或者朋友。他了解中国，也了解世界，不断加以比较。他知道，护短于国无益，爱国不在自吹。他知道，中国并不全好，外国并不全坏。外国有比中国好的东西，中国有比外国差的东西。他不爱中国的坏东西，比方说，他从来没有爱过那个“文化大革命”。他只爱中国的好东西，爱中国的解放，爱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爱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中国人，中国

的爱国者，应该致力于中国的进步。穷，把它变富。落后，就努力前进。

舅舅，您为什么爱中国？

因——为——我——是——中——国——人！

舅舅，什么是中国人的责任？

使——中——国——好——起——来！

舅舅，请安息吧！三天以后，您将长眠在您青年负笈和晚年治学之地。您心爱的中国，将在后死者的努力下，越来越好，臻于现代化。

1986年9月9日晨3时】

——鲍彤：《献给一位正直的中国人的哀思——吴世昌教授的几件事》，载《人民日报》1986年9月11日。

12月20日

钱端升当选为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

【（本报讯）记者张志业报道：已有七十多年历史的欧美同学会，12月20日在北京召开了新产生的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这是自1961年以来，该会理事在北京的首次聚会。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到会祝贺。茅以升致书面开幕词。

在当天的会议上，选举了以茅以升为会长的新理事会领导班子。同时，聘请了严济慈、周培源、费孝通、孙越崎、何长工、陈岱孙、陈翰笙、钱端升、雷洁琼为名誉会长。

七十八岁的副会长、曾经留学苏联的伍修权，在选举结束后的讲话中称：欧美同学会荟萃着新老几代传播先进科学技术的优秀人才，“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

据悉，欧美同学会即将修改有关章程，不仅吸收国内的留学人员，而且也吸收海外会员，成为拥有国内会员和海外会员两种成分的留学生组织。

欧美同学会成立于1913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除“文革”时期暂停活动外，始终保持了原来的组织和活动形式，以修学、游艺、敦谊、励行为会

务中心，以富强祖国为宗旨。目前，该会成员已由“文革”前的二百多人发展到三千多人。】

——张志业：《欧美同学会三千会员效力现代化一个心愿》，载《人民日报》1986年12月21日。

1987年(87岁)

3月12日

钱端升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六十二周年。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首都各界知名人士120多人，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六十二周年。

纪念仪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学范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楚图南参加了纪念仪式。

肃穆的中山堂里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下面摆放着翠柏。各界人士在孙中山先生遗像前肃立、行鞠躬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定，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北京市副市长孙孚凌，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北京市委主任委员侯镜如，分别代表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民革中央、北京市人民政府、民革北京市委向孙中山先生遗像敬献了花篮。廖梦醒同志委托女儿李湄代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还有：

有关方面负责人平杰三、周绍铮、彭友今、沙里、宋堃、刘小萍、马永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钱端升、爱新觉罗·溥杰，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方荣欣、孙承佩、孙起孟、苏子衡、李文宜、李纯青、聂真、高天、黄维、黄鼎臣、陈舜礼、葛志成；

各界人士叶笃义、冯梯云、蒋达宁、赵伟之、陆榕树、田富达、徐萌山、张澄生、陈修和、金冲及、赵明哲、经普椿；

民革中央副主席彭清源，民革中央监委副主席谭惕吾、焦实斋、傅学文，民革中央常委王枫、宁光堃、许宝骥、孙柏秋、苏从周、吴秀峰、沈求我、杨新人、张廉云、张素我、邵恒秋、赵子立、黄翔、蔡义江，民革中央监委常委刘春方、刘瑶章、杨玉清、袁晓园、唐鸿烈、梁蔼然、廖运周，民革中央委员王彦亭、王静如、王锡爵、方贤旭、韦大卫、杜建时、李世军、李沛钰、宋宝荣、陈久敬、陈迩冬、张丰胄、宗之发、骆介子、颜明宜、潘素，民革中央候补委员方俐洛、何鲁丽、张子伊、姜亚农、夏从本、蒋建国，民革中央监委委员万枚子、王遐举、文强、尹文堂、李泰华、杨伯涛、何兹全、余湛邦、张镒、张德尊、陈树华、尚传道、周怀民、周锡卿、郑庭笈、祝修林、曹国忠；

北京市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其他各界人士白介夫、许顺、任宁芬、王宝亮、吴惟城、关世雄、陶大镛、陈明绍、邓季惺、丁贡南、甘英、沈一帆、倪家玺、梅向明、司徒攀、陈仲颐、贾似曾、赖钟声、田象奎、张思浚。】

——《北京广州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分别举行仪式 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六十二周年》，载《人民日报》1987年3月13日。

6月26日

钱端升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编委会顾问。

【6月26日，《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编委会在京成立。编委会主任为张友渔，顾问为钱端升、宦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政治学》卷条目总表。（周五一）】

——周五一：《科教文零讯》，载《人民日报》1987年7月8日。

1988年（88岁）

5月

为《蔡元培政论集》写“跋”。

——钱端升：《蔡元培政论集·跋》，载《群言》1988年5月。参见钱端升：《钱端升主要著作目录》，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1页。

夏红注：十多年曾采访中国政法大学沈国锋教授。沈国锋教授告诉笔者，该文系他所代笔，当时钱端升先生在医院；沈国锋先生亦有誉录稿复印件出示。实际情况可能是沈国锋草拟、钱端升审定后，以钱端升的名义发表。

10月17日

钱端升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第六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中国民主同盟第六届中央参议委员会今天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这个荣誉机构的领导人。

著名数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苏步青再次当选为参议委员会主任。86岁的苏步青1952年加入民盟，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复旦大学校长。

冯素陶、李文宜(女)、沈兹九(女)、陈敏之、林亨元、闻家驷、彭迪先、潘大逵当选为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

常务委员共有39人，他们是：(按姓氏笔划为序)

田一平、冯素陶、刘开渠、许杰、江泽涵、苏延宾、苏步青、李文宜(女)、李何林、吴廷璆、吴春选、余瑞璜、沈兹九(女)、张乔嗇、陈彦之、陈敏之、陈碧笙、林亨元、罗雄才、金锡如、赵今声、赵访熊、赵汝翼、赵超构、胡一声、闻家驷、贺麟、莫乃群、原政庭、顾敬心、钱端升、徐铸成、郭翹然、唐哲、常迥、章振乾、彭迪先、韩学章(女)、潘大逵。

费孝通参加了中央参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在讲话中希望参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咨询和监督作用，帮助中央委员会做好民盟的各项工作，使新老同志能够密切合作，共同奋斗。】

——《民盟参议委员会举行会议 苏步青当选为参议委员会主任》，载《人民日报》1988年10月18日。

1989年（89岁）

1990年（90岁）

1月21日

钱端升于6时16分在北京逝世。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外交部法律顾问，著名法学家钱端升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90年1月21日6时16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钱端升同志逝世》，载《人民日报》1990年1月23日。

【至于我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

——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1页。

参考文献

一、钱端升先生著作（以完成或首版时间先后为序）

T. S Chien, *Parliamentary Committee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Govern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 American Congress, French Chamber of Deputies and German Reichsta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23.

钱端升著：《法国的政治组织》，商务印书馆 1929 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钱端升著：《法国的政府》，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钱端升著：《德国的政府》，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重版；商务印书馆 2004 年重版。

钱端升、萨师炯等著：《民国政制史》，商务印书馆 1945 年增订版，中国书店“民国丛书”1984 年影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年重版。

钱端升著：《建国途径》，重庆国民出版社 1942 年版。

钱端升著：《战后世界的改造》，商务印书馆 1943 年版。

Ch'ien Tuan-sheng,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商务印书馆 2011 年影印版。

钱端升著：《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钱端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孙宏云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屈勒味林：《英国史》，钱端升译，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重版。

二、文章（以姓氏拼音的音序为序）

陈夏红：“1949 年后的钱端升”，载陈夏红著：《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93 - 222 页。

陈夏红：“功过是非，留待来者评说”，载陈夏红著：《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 - 53 页。

刘剑君、刘京希：“钱端升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载《文史哲》1998 年第 3 期，第 18 - 23 页。

马勇、刘丽：“抗战时期大后方期刊介绍（续）《今日评论》《当代评论》篇目索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第 112 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潘惠祥：“钱端升的美国政治学背景析论”，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第 13 - 32 页。

潘惠祥：“钱端升与中国国联同志会”，载《社会科学论坛》2013 年第 11 期，第 174 - 193 页。

钱仲兴：“回忆父亲钱端升二三事”，载宗璞、熊秉明主编：《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北京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70 - 373 页。

王卫民：“反右前后的北京政法学院”，载《炎黄春秋》2015 年第 6 期，第 16 - 18 页。

谢慧：“《今日评论》与抗战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载《抗日战争研

究》2009年第1期，第135-148页。

许章润：“所戒者何：钱端升的宪政研究与人生历程”，载许章润著：《法学家的智慧：关于法律的知识品格与人文类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34页。

雨草、刘浪：“拼却老红一万点换得新绿百千重——访著名法学教育家钱端升教授”，载《法学杂志》1984年第4期，第23-25页。

三、著述

保罗·柯文、默尔·戈德曼编：《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张晓阳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大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1-6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下册），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陈述庆著：《岁月无痕：一个老律师的回忆录》，成都时代出版社2004年版。

崔国良、崔红编：《张彭春论教育与戏剧艺术》，崔秀桦英文编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大卫·阿古什著：《费孝通传》，董天民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费慰梅著：《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曲莹璞、关超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

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陈祖怀、陈维益、宋瑜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中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顾维钧著：《顾维钧回忆录》，1-13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

何炳棣著：《读史阅史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胡适著：《胡适日记全编》，1-10卷，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

胡适著：《胡适全集》，1-4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鲲西著：《清华园感旧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李贵连等编：《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林徽因著：《林徽因诗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刘长敏主编、张培坚执笔：《甲子华章——中国政法大学校史（1952-201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罗久芳著：《罗加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罗荣渠著：《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罗银胜著：《才情人生乔冠华》，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莫高义：《书生大使：胡适出使美国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纳拉纳拉扬·达斯著：《中国的反右运动》，欣文、唐明译，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南京大学校庆办公室校史资料编辑部、学报编辑部编辑：《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1982年印。

潘惠祥著：《在政治与学术之间：钱端升思想研究（1900-1949）》（上、中、下册），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

浦江清著：《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99年版。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齐家莹编著：《清华人物》，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

苏云峰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11 - 1929》，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苏云峰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28 - 1929》，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孙宏云著：《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 - 1937）》，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王世杰著：《王世杰日记（手稿本）》，1 - 10 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1990 年版。

吴宓著：《吴宓日记》，1 - 10 卷，吴学昭整理注释，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吴宓著：《吴宓日记续编》，1 - 10 卷，吴学昭整理注释，三联书店 2006 年版。

吴宓著：《吴宓自编年谱（1894 - 1925）》，吴学昭整理，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新星出版社 2010 年版。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 - 1946 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谢慧著：《知识分子的救亡努力：〈今日评论〉与抗战时期中国政策的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谢慧著：《西南联大与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杨永生编：《记忆中的林徽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姚杉尔著：《中国百名大右派》，朝华出版社 1993 年版。

尤风伟著：《中国一九五七》，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

于风政著：《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章含之著：《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年版。

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民国十五年）》，文海出版社印行。

智效民编著：《民主还是独裁：70 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下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中国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委员会编：《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主编、王改娇执行主编：《法大记忆——60 年变迁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朱地著：《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陕西人民出版社、书海出版社 1995 年版。

朱自清著：《朱自清全集》，1-10 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卓照恒、吴绍华等选编：《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四、报刊

《清华周刊》

《东方杂志》

《益世报》

《现代评论》

《独立评论》

《今日评论》

《观察》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后 记

如果真要追问我编订《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的灵感之源，我想必须归之于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早已想不起来是最早在哪看到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介绍了。但当时“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看到介绍之后，我立即被这套书深深吸引。尤其是随着后来有段时间对胡适的分外关注，我最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买来这套书。2016年胡颂平与联经出版公司共同推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即便我现在的研究兴趣几乎完全与“胡学”无关，但我还是千方百计购置一本，那怕是放着也好。

在我看来，年谱长编实在是研究人物史的一种极好的方式。现在流行“工匠精神”，提倡精益求精、从容做事，在我看来，通过年谱长编的方式，在研究对象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多花笨功夫，不计时间成本，这便是一种所谓的“工匠精神”。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84年首版时即10册、300多万字，花去胡颂平先生长达17年的时间，成为“年谱史上最浩大的工程”，可为“工匠精神”之一例。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编撰这部《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希望能够向胡颂平和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致敬，更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有机会望其项背于万一。

以上种种，便是我为什么在写钱端升评传之前，先编撰这部《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的由来。

研究钱端升先生是我由来已久的梦想。2004年大学毕业后，我先是关注过一阵杨兆龙，后来便转向钱端升，逐步由点到面，先后出版《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政法往事》《法意阑珊处：20世纪中国法律学人自述》等书，再后来又协助江平先生完成其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并写成江平评传《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完成这些书后，我又在2011年前后写了《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在这些不成样子的作品中，钱端升可以说是其中最大的公约数，几乎每部书中都多多少少有所涉及。可以说，我的法律人物研究，表面上看起来东一榔头、西一杠子，但实际上似乎围绕钱端升先生，转了一个大圈。钱端升先生就是圆心。除了计划中的钱端升评传外，将来或许还会有其他法律人物的研究，但我估计还是不会摆脱钱端升的磁场。

钱端升之所以在我的学术版图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有若干方面的原因。但如下两点尤其重要：

第一，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而我从大学时代开始，钱端升的大名就早有耳闻，这在一定程度上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不光“四年四度军都春”，而且“一生一世法大人”，现在看起来甚至有“子子孙孙法大人”的趋势。这种教育背景、工作环境与研究对象的重合，会成为我的好奇心不减反增的强大动力。

第二，就20世纪的中国法政人物来说，无论是早年的教育背景、中年以前的学术成绩还是1949年后的经历，标本性意义能够出钱端升之右者，可以说凤毛麟角，钱端升用他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学术与政治的最佳标本，也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人生经验与智慧。研究20世纪知识分子尤其是法政学者与时代的关系，或者通过个人经历观察中国的20世纪，钱端升都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

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不大。几乎每次散步，都会走过礼堂北侧的钱端

升的雕像。这个雕像是1956级一个叫唐自熙的校友捐建的，2002年中国政法大学50周年校庆时落成，当年我还以学生记者身份采访过唐自熙；他只是当时北京政法学院一个普通学生，但他对钱院长的尊崇与热情，深深感染了我。每次看见这个雕像，我都会浮想联翩。钱端升先生开创了北京政法学院，但也在北京政法学院度过了人生最苦涩的篇章。尽管这是时代悲剧与丑恶人性双重作用的结果，但我还是觉得北京政法学院永远地亏欠钱端升先生。这是一笔历史的债务。中国政法大学作为北京政法学院的继承者，对当年的师生员工犯下的恶行，只能通过钱端升加倍的尊重和纪念来偿还。这十多年，钱端升先生在法大日常中的地位渐隆，钱端升塑像、钱端升图片展、钱端升法学奖……这是一个值得欣喜的趋势，尽管我们需要做、可以做的工作还有更多。这份不成器的年谱长编，希望能够成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倘若钱端升先生在天有灵，我希望他看到这部有关他的年谱后，能够露出慈祥的微笑。

这里特别需要申说的是，尽管编撰这部年谱长编的工作早在2006年前后即已启动，甚至在当时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绝大部分，但后来由于我研究重心的再三转移，这部年谱长编在过去十年一直止步不前。而立之年仿佛就在昨天，而不惑之龄已向我招手。人生苦短，做不成的事情很多，重温旧梦，颇有蹉跎岁月之感。希望在接下来的人生历程中，有所取舍，知所进退，珍惜时光，认真问学，俾使十年后这种失败感能约略减淡些。

编订钱端升先生的年谱，注定是一份与时间赛跑的工作。尽管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搜寻钱端升的资料，但由于学术兴趣的偏移及养家糊口的重担，使得大量的资料始终还安静地躺在我书房的角落里。这次申请下来国家出版基金之后，由于版权、日程等各方面原因，我和出版社真正编辑《钱端升全集》同时重启编辑《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的时间极为有限。这就导致连续好几个月每天早八点、晚十点的高强度劳动。但尽管如此，依然无法使《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以完美的面貌出现，甚至一些钱端升生命中的重要事件还付之阙如；若非时间所限，至少就我手头现在搜集到的资料而

言，完全可以支撑《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的篇幅再大幅度扩充。这次趁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及中国政法大学建校 65 周年的东风，将这部年谱长编以“初稿”的形象示人，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我还能够有足够的心力和精力去打磨、充实和润色，让这部年谱长编朝着完美的方向不停更新。

在撰写并完成钱端升评传前，就先将十余年来费心搜集的资料文献悉数以年谱长编的形式出版，注定是一种冒险。这将考验我将来在这些资料基础上撰写评传的能力。但我更诚心希望这些工作，能够为同行相关研究奠定基础，共同开创“钱学”的美丽洞天。

对于《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来说，眼下的出版注定与其说是休止符，不如说是冲锋号。欢迎师友们不吝赐教，尤其是欢迎各界不吝提供与此相关的资料，我的个人邮箱 fadaren@126.com，永远在线等您。

最后再次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李海艳和陈斯荷、陈亦荷。学术事业注定是一种时间密集型的苦差。我的每天只有 24 小时，留给这套书的时间多了，留给她们的时间便少之又少了。感谢她们的理解与支持。

谨以这套《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献给钱端升先生！

陈夏红

2017 年 4 月 7 日于京郊昌平慕风斋

钱端升全集

第一卷 比较宪法

第二卷 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治组织

第三卷 德国的政府

第四卷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英文版)

第五卷 民国政制史(上)

第六卷 民国政制史(下)

第七卷 议会委员会(英文版)

第八卷 文选(上)

第九卷 文选(中)

第十卷 文选(下)

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上)

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下)